

中国共产党八十年

重大会议实录

张树军 齐生 主编 / 湖南人民出版社

中国共产党 八十年重大会议实录

上 册

张树军 齐生 主编

湖南人民出版社

中国共产党 八十年重大会议实录

下 册

张树军 齐生 主编

湖南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共产党八十年重大会议实录/张树军 齐生主编.
长沙: 湖南人民出版社, 2001.5
ISBN 7-5438-2582-1

I. 中... II. 张...齐... III. ①中国共产党-党史-史料-1921~2001②中国共产党-会议-简介-1921~2001
IV. D2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25822 号

责任编辑: 李声笑
穆陵宁
装帧设计: 廖 铁

中国共产党八十年重大会议实录
(上下册)

张树军 齐生 主编

*

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长沙市银盆南路 78 号 邮编: 410006)

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湖南省印研所实验工厂印刷

2001 年 5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35.75

字数: 870,000 印数: 1—5,000

ISBN7-5438-2582-1
K·431 全套定价: 60.00 元

序

郑 惠

湖南人民出版社为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 80 周年，出版《中国共产党八十年重大会议实录》和《中国共产党八十年重大事件实录》两本书。责任编辑约我为两本书作序，我欣然应允。

这两本书的内容，一本是写会议，一本是写事件。我考虑了一下，还是合写一篇序言为好。一是因为从严格意义上讲，会议也可算作事件；二是因为这两本书互为补充，可以看作是姊妹篇。一般来说，党史上的许多重大决策大多是在会议上作出的，而大量的事件则可以看作是这些决策的贯彻实施及其结果。

我们知道，以前不是完全没有同类的书，但我翻看了一下，这两部书还是有自己明显的特色的。概括起来说，这两本书是比较可信、可取、可读的。

说它可信，是因为书中选用的回忆录、文章、论著，大多出自党和国家领导人、知名人士以及专家学者之手，内容丰富，资料翔实。书中的回忆录都是亲历者的所见所闻，揭示了许多鲜为人知的历史情况；而专家学者的论著也大多是在查阅档案资料后写成的，有根有据，令人信服。从一定意义上讲，它既是严谨的学术论著，又是史料丰富的资料书。

说它可取，是因为对所要记述的会议、事件，这些回忆录和

论著大多将历史背景、来龙去脉、历史作用、经验教训写得比较清楚。它不仅实事求是地写出历史事件的本然，更重要的是写出它的所以然，可以引人深思，从中获得有益的东西。

说它可读，不仅仅是因为书中的许多文章文笔流畅，生动活泼，读来琅琅上口，更主要的是因为其中一些文章夹叙夹议，有血有肉，详略得当，严谨切实，堪称美文，读来全无枯燥沉闷之感。另外，书中在介绍每个会议和事件之前，编者写了一段简明扼要的导语，点出最精彩的话语或生动的情节，起到了画龙点睛的作用，便于读者阅读。

从总体上来说，这两本书是从不同侧面反映党的 80 年历史的好书。说是好书，除了上面所说的可信、可取、可读以外，更重要的是这两本书的内容符合党的历史决议精神，坚持了实事求是的原则，将一部信史呈现在读者面前。这也反映了编辑出版者的用意和眼光。

今年 7 月 1 日，是新世纪我们党的第一个生日。在上个世纪，我们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改变旧中国，建设新社会，曾经创造了无数人间奇迹，也曾经遭受过严重挫折。因此说，我们党走过 80 年的旅程是很不容易的，有许多事情是值得记下来，借以“鉴往知今”、“资政育人”的。在新的世纪，我们党肩负着带领中国人民向着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迈进的使命，依然任重而道远。历史是不能割断的，面对新形势、新问题，需要在新的实践中解决前进中的问题。这除了紧跟时代的步伐，勇于实践，敢于创新以外，总结历史经验教训，使之成为激励我们前进的精神动力，也是十分必要的。

这两本书的编辑出版，可以说正是做了这样一件有意义的事情。这也就是我愿向广大读者推荐这两本书的原因所在。

目 录

横空出世：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1）

1921年7月23日晚，夜色笼罩着中国最大的城市上海。在法租界的一座小楼里，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了。当时，对几乎所有的中国人来说，这不过是一个极其平常的夜晚，但对于中国的历史，它却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一个改变中国命运的伟大政党从此诞生了。

确立纲领：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18）

“中国共产党万岁”这个口号，几十年来，回响在祖国的大地和天空。大多数中国人并不知道，历史上第一次提出这个口号的，是1922年6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二大宣言的结尾处，赫然写着这个口号。二大另一个永载史册的第一，是在中国近代革命史上破天荒提出了明确的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

国共携手：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26）

参加过党的三大的徐梅坤回忆说：“‘三大’的中心议题是讨论国共合作及共产党员是否加入国民党。关于国共合作问题，开会以前就在党内有过酝酿，共产国际

也作过指示。根据国际的指示，才召开‘三大’专门进行讨论。这个问题争论得很激烈，一个多星期的会议，大部分时间是辩论这个问题。”

唤起工农：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32）

第一次国共合作正式形成以后，党遇到许多尖锐而复杂的问题。国共两党之间，中国共产党同共产国际及其代表之间和中国共产党内，都存在着各种各样的矛盾。不解决这些问题，党就无法迎接即将到来的革命高潮。于是，全国 994 名党员的 20 位代表再次聚首上海，召开了党的四大。

空谈泛论：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43）

党的五大是在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这样一个非常状态下召开的。全党期待着这次大会能清醒地判断当前局势，回答人们最焦虑的如何从危难中挽救革命的问题。可是，这次代表大会只是泛泛地进行脱离实际的空谈，没有能在党面临生死存亡的危急时刻，为全党指明出路，提供坚强有力的领导，却徒然丧失时机，坐视整个局势继续恶化。

风雨星火：八七会议……………（59）

1927 年 8 月 7 日在武汉召开的中共中央紧急会议，纠正了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错误，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起义的方针，在危急关头挽救了革命、挽救了党。毛泽东在发言中批评陈独秀放弃无产阶级领导权的错误。他把国民党比作等着人家去住的新房子，而党的领导人以为国民党是人家的，其后像新娘子上花轿一

样，勉强挪到这所空房子去了，但始终没有当房子主人的决心。

聚会在异国他乡：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71）

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唯一的一次在国外召开的全国代表大会便是党的六大。这次大会是在苏联的首都莫斯科召开的。会议认真总结大革命失败以来的经验教训，在一系列存在严重争论的有关中国革命的根本问题上作出基本正确的回答，在党内思想十分混乱的情况下大体上统一了全党的认识。

建党建军里程碑：古田会议……………（78）

1929年6月，在红四军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上，围绕要不要设立军委发生争论，毛泽东未能当选为前委书记。会后毛泽东离开部队到闽西帮助特委工作和养病。10月底，陈毅从中央返回红四军，传达了中央“九月来信”。前委决定请毛泽东回来主持工作。1929年12月28日，红四军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在上杭县古田召开了。

王明上台：六届四中全会前后……………（92）

李维汉回忆说：六届四中全会是1931年1月7日在上海秘密召开的，是王明为首的少数人，在共产国际及其代表米夫扶持下，取得党中央领导权的一次会议。这次会议没有什么积极意义，而且把我们党和革命事业，带到更加“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中去。

力挽狂澜：遵义会议……………（101）

长征途中召开的决定中国共产党与红军命运的遵义会议，确定了毛泽东的领导地位。会议开始，由博古作关于反五次“围剿”总结的报告。接着，周恩来作副报告。张闻天作反报告。毛泽东、王稼祥等发言，矛头直指“三人团”。“恩来同志及其他同志完全同意洛浦及毛、王的提纲和意见，博古同志没有完全彻底的承认自己的错误，凯丰同志不同意毛、张、王的意见，李德同志完全坚决的不同意对于他的批评。”

北上南下之争发端：两河口会议……………（114）

1935年6月，红一方面军与红四方面军在四川懋功胜利会师。26日，中共中央在懋功两河口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北上在川陕甘建立革命根据地的战略方针。毛泽东说：“为什么弄到这区域来？这区域有它的好处：把苏维埃运动放在更加巩固的基础上，一、四方面军会合也在此。大家懂得这是向前，在四方面军应作解释。”张国焘先是同意北上，接着出尔反尔，提出南下主张。一场争论由此发端。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瓦窑堡会议……………（126）

开会的地点在党中央总负责人张闻天住的窑洞。它坐落在半山坡上，窑洞内陈设简陋。窑洞中间有一张旧方桌和几条粗笨的凳子，是来客或开会时的坐席。窗纸是新糊的，使整个窑洞显得亮堂而有生机。出席会议的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博古、刘少奇、邓发、张浩等人，主要讨论两个问题：“政治形势与策略”和“军事战略”。会议最终确定了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策略。

清算张国焘的错误：1937年3月延安会议 …………… (132)

1937年3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延安召开。会议共有两项议程。第一项是讨论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与国民党三中全会以后，国内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形势以及党在这个阶段的新任务。第二项是讨论张国焘的错误。张国焘在检查中承认自己“是路线的错误，是退却逃跑的错误，是反党反中央的错误”。

确定战略方针：洛川会议…………… (138)

陕北洛川冯家村。1937年8月22日至25日，中共中央在这里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这次会议在党的历史上，亦称洛川会议。洛川会议在抗日战争爆发后极其复杂的形势下，制定了指导全国抗战的全面抗战路线和持久战的军事战略方针，通过了《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并决定了以毛泽东为书记，朱德、周恩来为副书记的新的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

毛泽东与王明交锋：1937年12月会议…………… (150)

1937年11月29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主席团委员和候补书记王明回到延安。毛泽东到机场迎接时说是“喜从天降”。可是，在随即召开的12月会议上，王明以“钦差大臣”自居，传达共产国际指示：“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否定洛川会议以来中共中央所制定和执行的正确路线、方针和政策。后来，毛泽东说：在12月会议上，我是孤立的。

再次肯定毛泽东的领袖地位：六届六中全会……………（159）

1938年9月29日至11月6日，中国共产党在延安举行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王稼祥传达共产国际指示，要以毛泽东为首解决统一领导问题。全会批准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央政治局的路线。如果说，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在全党、全军的领导地位，那么，六届六中全会则克服王明右倾错误的干扰，巩固了毛泽东在全党、全军的领导地位。毛泽东后来说：中国党历史上有两个重要关键会议，一次是1935年1月的遵义会议，一次是1938年的六中全会。

拉开整风帷幕：1941年9月中央政治局会议……………（181）

1941年九十月间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党的历史上特别是土地革命战争后期的路线问题，拉开了中央领导层整风的帷幕。毛泽东在第一次的会上作主题报告。张闻天检讨说：“我是最主要的负责人之一，应当承认错误，特别在宣传错误政策上我应负更多的责任。”博古检讨说：“我过去只学了一些理论，拿了一套公式教条来反对人家。”王稼祥检讨说：“我也是实际工作经验很少。”李维汉则“检讨一次比一次深刻”。

“为什么人”的问题：延安文艺座谈会……………（188）

延安文艺座谈会于1942年5月2日下午开始举行。请柬是以毛泽东、凯丰两人名义发出的，说明开会的目的是“交换对于目前文艺运动各方面的意见”。在第一次会议上，首先由毛主席作“引言”。他说：“我们有两支军队，一支是朱总司令的，一支是鲁总司令的。”后来正式发表时，还是改成了更有概括性的语言：“手里

拿枪的军队”和“文化的军队”。23日，毛泽东作“结论”时，把全部问题归结为一个“为什么人”的问题，即文艺要为工农兵服务和如何服务的问题。

“把历史搞清楚”：1943年9月中央政治局会议…………… (201)

习惯上称“九月会议”，实际上是从9月上旬至12月初，连续召开三次会议。王明称病不参加会议。毛泽东说：王明以国际的旗号，马列的招牌，“欺骗党十多年，好多同志被拉过去，自己也不清楚”。王明不服，对任弼时说：“四中全会搞得不对，自己思想上有错误，至于说有什么宗派那真是笑话。”毛泽东总结说：“我们虽然从历史中走过来，但是要从观念形态上恰当地反映历史是不容易的。经过这样多的折磨，这样多年，这次高干会才把历史搞清楚。”

七大序幕：六届七中全会…………… (219)

从1944年5月21日至翌年4月20日，全会断断续续开了近一年，创下党的历史上一项纪录。毛泽东说：七中全会的任务，第一是准备七大，第二是在七大以前处理日常工作。全会最后原则通过《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标志着整风运动结束，并为党的七大的召开在思想上做了充分准备。

党的全国第七次代表大会是我们党的历史上一次非常重要的大会。从六大到七大，时间相距达17年。七大会期很长，从1945年4月23日至6月11日，开了50天。这在党的历史上是创纪录的。

盛会宏图：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 (230)

从六大到七大，时间相距达 17 年，值得回顾和总结的事情很多。七大会期很长，从 1945 年 4 月 23 日至 6 月 11 日，开了 50 天。这在党的历史上又是一个纪录。这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最盛大、最完满的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会充分发扬民主，畅所欲言，会议的气氛始终是热烈的，代表们的情绪始终是高涨的。七大以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而载入党的史册。

“耕者有其田”：1947 年全国土地会议 …………… (249)

1947 年 7 月 17 日至 9 月 13 日，中共中央工作委员会在河北西柏坡召开全国土地会议。刘少奇主持会议并作报告和总结。会议通过《中国土地法大纲》，10 月 10 日，由中共中央公布。土地法大纲宣告：消灭封建性及半封建性剥削的土地制度，实行耕者有其田的制度。但是，“会议对党内不纯的情况估计得过于严重，强调反右倾，对‘左’的错误则批评不力，是会后土改运动中出现‘左’的错误的一个重要原因”。

转入战略进攻：中共中央前委“小河会议” …………… (255)

习仲勋回忆说：小河会议形成的指导人民解放军大举出击，经略中原，发展战略进攻的正确方针和加强西北战场的重要措施，反映了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关于把中央的决心与前线指挥员的见解有机地结合起来的战争指导艺术。对我军在陕北战场迅速转入战略进攻，解放大西北，夺取全国解放战争的胜利有着重要的历史意义。

迎接革命新高潮：1947 年 12 月会议 …………… (264)

在陕北米脂县杨家沟召开中共中央会议，讨论通过

了毛泽东所作《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报告。毛泽东说：12月会议就是要解决这篇文章。这篇文章是当做一个时期的政治纲领，“打倒蒋介石，建立新中国”的纲领。局面开展，胜利可期。开会期间，正值毛泽东54岁生日。他身边的工作人员想给他做寿，但毛泽东坚决不答应，并且讲了三条理由。12月26日那天，毛泽东白天主持会议，晚上同大家一起观看了贺龙从晋绥带来的平剧团演出的《恶虎村》。

“五年左右根本打倒国民党”：1948年9月会议 …………… (271)

1948年9月8日至13日，中共中央在河北平山县西柏坡村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在5年左右的时间（从1946年7月算起）从根本上打倒国民党。毛主席说：“我们的战略方针是打倒国民党，战略任务是军队向前进，生产长一寸，加强纪律性，由游击战争过渡到正规战争，建军500万，歼敌正规军500个旅，5年左右根本打倒国民党。”然而，此后的战争进程将这个时间表提前了。

为新中国奠基：七届二中全会…………… (279)

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于1949年3月5日至13日在河北平山县西柏坡村举行。全会集中讨论将党的工作重心从乡村转移到城市的问题。毛泽东说：二中全会，可以说是城市工作会议。城市工作必须以生产建设为中心。全会为夺取中国革命的全国胜利和迎接新中国的诞生，以及使中国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由新民主主义社会转变为社会主义社会，在政治上、思想上和理论上作了重要的准备。毛泽东警告“资产阶级的‘糖衣炮弹’将

成为对于无产阶级的主要危险”。

开国盛会：中国人民政治协商第一届全体会议…………… (302)

1949年9月21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北平隆重开幕。毛泽东在开幕词中豪迈地说：“诸位代表先生们，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感觉，这就是我们的工作将写在人类的历史上，它将表明：占人类总数1/4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会议通过《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和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选举产生以毛泽东为主席的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9月30日，会议胜利闭幕。

“不要四面出击”：七届三中全会…………… (309)

七届三中全会是中国共产党在全国执政以后召开的第一次中央全会。全会提出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在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的中心任务——为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而斗争。毛泽东在会上讲话，充分论述了“争取多数，反对少数，孤立敌人，壮大自己”的思想，并提出“不要四面出击”的策略方针。

过渡时期总路线：1953年6月15日中央政治局会议 …… (326)

毛泽东在会上讲话，第一次对过渡时期总路线和总任务的内容作了比较完整的表述。他说：“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10年到15年或者更多一些时间内，基本上完成国家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条总路线是照耀我们各项工作的灯塔。”

“批薄射刘”：全国财经工作会议…………… (332)

会议主要讨论贯彻执行过渡时期总路线和第一个五年计划问题，但高岗节外生枝，攻击刘少奇、周恩来等人。薄一波说：“1953年夏季召开的全国财经工作会议，是一次对当时社会经济生活和党内政治生活都有重大影响的会议。我是会上受批评的主要对象，也是高岗阴谋推倒刘少奇同志搞‘批薄射刘’的靶子。……”

揭批高岗、饶漱石：七届四中全会…………… (347)

高岗在“刮一种风，烧一种火”，叫做“刮阴风，烧阴火”，“其目的就是要刮倒阳风，灭掉阳火，打倒一批人”。七届四中全会，是以揭露和批判高岗、饶漱石的反党分裂活动，通过毛泽东建议起草的《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而载入史册的。

确立基本政治制度：第一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 (372)

1954年9月，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举行。会议通过了我国第一部社会主义类型的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了我国新的国家机构，选举了新的国家领导人。大会通过宪法时，“暴风雨似的掌声延续了5分钟”。

迎来农业社会主义改造高潮：七届六中全会…………… (383)

七届六中全会以批判“小脚女人”和迎来农业社会主义改造高潮而载入史册。毛泽东在会上说：中央农村工业部的一部分同志，首先是邓子恢同志犯错误。他这一次所犯的错误，性质属于右倾的错误，属于经验主义性质的错误。25年后的1981年3月9日，中共中央办

公斤转发通知指出：1955年夏季党内在农村合作化问题上的争论，“邓子恢同志的意见是对的，当时对他的这种批判，曾导致以后合作化运动高级化和人民公社化等急躁冒进的错误”。

“向现代科学进军”：知识分子问题会议…………… (400)

1956年1月中共中央召开知识分子问题会议，周恩来在会上响亮地提出：知识分子“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科学是关系我们的国防、政治和文化各方面的决定性的因素”，我们必须急起直追，“向现代科学进军”。毛泽东讲话时提出要进行技术革命、文化革命，革技术落后的命，革没有文化、愚昧无知的命。

强国之梦：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

…………… (422)

1956年全国政治生活中最大的一件事，是中国共产党召开了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此次大会筹备工作“好事多磨”：“政治报告”修改稿达80个；邓小平担纲修改党章；周恩来起草“二五”计划报告；毛泽东自己起草了两个开幕词讲话稿，不知为什么没有写完，后来让陈伯达起草了一个，毛泽东看后不满意，于是又叫田家英再起草一个。可见党的领导人对八大的重视。八大描绘了中国共产党人的强国梦想，显示了党的团结和党的事业兴旺发达。

正确与迷误交错：八届三中全会…………… (452)

八届三中全会在继承和发展八大的正确方针的同时，也开始产生了偏离八大正确路线的“左”倾错误，

尤其错误地改变了八大关于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正确判断。毛泽东说：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仍然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

“大跃进”的序幕：1958年南宁会议 …………… (463)

毛泽东在会上再次批评了1956年的反冒进，说反冒进使六亿人民泄了气，是方针性错误。毛泽东还说：“向人代大会的报告，我两年没有看了（为了照顾团结，不登报声明，说我不负责）。”“很多文件是闭着眼睛强迫签字的。大概你们像那个茶花女一样，见爱人时总要打扮得漂漂亮亮，临死之前还是如此。你们为什么不能像农家姑娘一样，可以蓬头散发见面呀！”

再批“反冒进”：1958年成都会议 …………… (489)

1958年3月的成都会议，是在党对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出现许多失误的情况下召开的。毛泽东在会上多次讲话，继续批判反冒进，说冒进是“马克思主义的”，反冒进是“非马克思主义的”；提出我国当前存在“两个剥削阶级”；提出要搞“正确”的个人崇拜；提出了办大社的意见……

吹响“大跃进”的号角：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 …………… (496)

八大二次会议正式通过中共中央根据毛泽东的倡议而提出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正式改变八大一次会议关于国内主要矛盾的正确分析，提出争取15年或者在更短的时间内，主要工业品产量赶上和超过英国。这次会议当时被称作

是“一次整风的会议，一次反对国际修正主义、反对混入党内的右派分子、地方主义分子、民族主义分子的会议，一次大跃进的会议”。会后，“大跃进”高潮迅速在全国掀起。

“跑步进入共产主义”：1958年北戴河会议 …………… (513)

北戴河会议宣布1958年要生产钢1070万吨，并通过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的决议，认为“共产主义在我国的实现，已经不是什么遥远将来的事情了”。会后，全国很快形成全民大炼钢铁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高潮，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严重地泛滥起来。

开始纠“左”：第一次郑州会议 …………… (540)

毛泽东说：“大跃进”搞得人的思想有些糊里糊涂，昏昏沉沉。“我们有些同志昏了头，以为快要上天了。”他在这次会上指出必须划清集体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两种界限，并批驳了陈伯达等要求在现阶段就废除商品生产，实行产品调拨的错误主张，指出这种主张实质上是要剥夺农民。

“压缩空气”：武昌会议和八届六中全会…………… (545)

会议开始的第一天，毛泽东就说：这次会议要唱个低调，把脑筋压缩一下，把空气压缩一下，变成固体空气。不要像唱戏拉胡琴，弦拉得太紧，太紧了，有断弦的危险。八届六中全会通过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并同意毛泽东提出的关于他不作下届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的建议。

继续纠“左”：第二次郑州会议…………… (575)

会议的主题是人民公社问题，讨论中触及到人民公社化错误的一些实质问题。“‘一平、二调、三收款’，引起广大农民的很大恐慌。这就是我们目前同农民关系中的一个最根本的问题。”毛泽东说：我们生产关系的改进方面，即是说，在公有制所有制问题方面，前进得过远了一点。

从纠“左”到“反右倾”的逆转：1959年庐山会议…… (580)

“大跃进”造成的严峻现实，迫使决策者们以一种较为冷静的气氛下总结经验，继续纠“左”。但庐山的“神仙会”上仍有分歧，毛泽东自己认为错误和成绩只是一个指头与九个指头的关系。彭德怀写了一封“横直是写给主席自己作参考的信”，却万万想不到闯了“大祸”。毛泽东怒责彭德怀：你是反中央，信是准备发表的，以争取群众，组织队伍，按照你的面貌改造党和世界。纠“左”骤然变成了“反右倾”。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遭到了严厉的斗争。

正式通过调整方针：八届九中全会…………… (632)

“大跃进”造成严重经济困难后，中共中央团结全党和全国人民，万众一心，为克服困难进行了不屈不挠、卓有成效的努力。1961年1月14日至18日召开的八届九中全会正式通过“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会上，毛泽东号召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

“向群众寻求真理”：1961年中央广州工作会议和北京工作

会议 (636)

广州工作会议集中讨论《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会议结束的这一天,毛泽东在会上讲话,突然提到邓子恢的名字,对邓子恢下农村调查研究,大加赞扬:“邓子恢同志那个时候顽强得很。邓子恢同志,为了说服你,我跟你谈过多次话。现在我跟你统一了。我跟你没有矛盾了。”在随后召开的北京工作会议上,刘少奇警告说:“再不回头,就要走到路线错误上去。”

“白天‘出气’,晚上看戏”:七千人大会 (652)

这次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出席者达到7000人,创党的历史上会议人数之最。毛泽东说:“为什么一定要回到你们家里过春节才算舒服?为什么我们在北京7000人一道过一个春节不好?我主张集体在北京过一个春节。有这么几天,我相信能够解决上下通气的问题。有一个省的办法是:白天‘出气’,晚上看戏,两千一稀,大家满意。”“有什么‘气’出什么‘气’,有多少‘气’出多少‘气’,不管正确之‘气’,还是错误之‘气’,不挂账,不打击,不报复。”对于前几年的错误,毛泽东说:“第一个负责任的应当是我。”

“七千人大会”的继续:西楼会议 (679)

刘少奇在中南海西楼召集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指出现在处在“非常时期”,如不采取果断措施,国民经济将进一步恶化。薄一波评价说:“我认为它是‘七千人大会’的继续,是贯彻大会指导思想的一次务实的重要会议;‘七千人大会’出了题目,西楼会议及其后召开的国务院扩大会议则交了一份比较完满的答

卷，对克服当时的经济困难起了不可磨灭的重大作用。”

为知识分子“脱帽加冕”：广州会议 …………… (685)

会上大家发言热烈，可以说是一马当先，百马奔腾。所谓一“马”当先，就是中国科学院的学部委员、声学家马大猷。陶铸说他在中南局的座谈会上已经宣布，今后在中南地区一般地不要用“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个名词了。但他的话只是“地方粮票”，中央领导人说了才是“全国通用粮票”。周恩来、陈毅在广州会议上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讲话，在党中央内部有少数人不同意甚至明确反对，在周恩来要求毛泽东对这个问题表示态度时，毛泽东竟没有说话。

全面贯彻“八字方针”：1962年5月中央工作会议 …………… (703)

这次在北京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由刘少奇主持，周恩来安排会议议程，拟定出席会议人员的名单。邓小平说：“如果照现在这样拖下去，无非是拖垮。”刘少奇说：“目前的经济形势到底怎么样？我看，应该说是一个很困难的形势。”周恩来说：“这两年的调整中，我们觉得，我们的经验，每次总是对困难估计不够，总是希望来得好，来得快一点。”会议之后，大幅度的调整国民经济的工作在全国范围内展开。

形势急转直下：1962年北戴河会议 …………… (737)

会议原定议题是讨论农业、财贸等方面的工作。但会议一开始，毛泽东提出阶级、形势、矛盾的问题，要大家讨论。毛泽东说：“1960年下半年以来，大家只讲黑暗，不讲光明，已经有两年了。”“这两年讲困难讲黑

暗合法，讲光明不合法了。这次会上就要解决这个问题。”

阶级斗争扩大化：八届十中全会…………… (745)

毛泽东在会上断言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中资产阶级都将存在，并存在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强调阶级斗争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全会严厉批判了所谓“单干风”、“翻案风”和“黑暗风”。此后，国内的政治形势发生逆转，由刚刚进行不久的、对扭转困难局面极为重要的纠“左”又变成了反右。

“中国出了修正主义中央”：1964年北京中央工作会议 … (773)

刘少奇说：“要想一想，我们会不会出修正主义。”毛泽东说：“已经出了嘛！像白银厂，还有陈伯达同志调查的天津小站公社，不是有了吗？我们国家，我看1/3或者还少一点，权力不掌握在我们手里，在坏人手里。”

突兀其来的事件：上海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 (778)

1965年11月，叶群到杭州向毛主席告罗瑞卿的状，据说讲了5个小时。这时罗瑞卿正在云南视察工作。12月8日会议开始后，林彪、叶群等罗织罪名，诬陷罗瑞卿。12月10日，中央要罗瑞卿马上到上海开会，罗完全没有思想准备，接到通知就飞往上海。一下飞机，就被接到一个戒备森严的地方，实际上是被软禁起来了……

发动“文化大革命”：1966年5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 … (783)

1966年5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气氛紧张。会议通过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指出：“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在睡在我们的身旁。”会议以“反党集团”的罪名对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进行了批判。林彪更是火上烧油：“有人可能搞鬼，他们现在已经在搞鬼。”“毛主席还健在，他们就背叛，他们阳奉阴违，他们是野心家，他们搞鬼，他们现在就想杀人，用种种手法杀人。”这次会议标志着“文化大革命”开始全面发动。

“炮打司令部”：八届十一中全会…………… (792)

1966年8月1日，毛泽东主持召开八届十一中全会。他说：“我是没有下去蹲点的，你们都有人蹲点，越蹲越压迫学生。”“牛鬼蛇神，在座的就有。”7日，全会印发毛泽东写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指责党内有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把斗争锋芒直接引向刘少奇等中央主持工作的领导人。全会通过“16条”等决定，在党内完成了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法定程序。

二月抗争：怀仁堂碰头会…………… (801)

1967年2月13日下午3时的碰头会上，军委主席叶剑英同志首先站起来讲话。为党和国家命运感到焦虑的老师，气愤地向坐在对面的陈伯达一伙，义正辞严地说：“你们把党搞乱了，把政府搞乱了，把工厂、农村搞乱了！你们还嫌不够，还一定要把军队搞乱！这样搞，你们想干什么？”

制造最大冤案：八届十二中全会…………… (816)

因一些八届中央委员会委员和候补委员已被打倒或受审查，以致在1968年10月13日至31日召开的八届十二中全会上，实到的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不足半数。全会批准在江青、康生、谢富治等人主持下，用伪证写成的《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作出了把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的决定，制造了共和国历史上最大的冤案。

闹剧叠出：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 (825)

九大的突出特点，是从始至终为强烈的个人崇拜和“左”倾狂热气氛所笼罩。毛泽东在《东方红》的乐曲声中一登上主席台，立即“全场欢声雷动，掌声震耳”。毛泽东一开口讲话，便不断地为“万岁”声所打断……

又一场庐山风波：九届二中全会…………… (834)

全会印发的简报说：大家“衷心赞成”小组会上有人提出的“在宪法上，第二条中增加毛主席是国家主席，林副主席是国家副主席”和“宪法要恢复国家主席一章”的建议。林彪让秘书把这份简报讲给他听，听后说：“听了那么多简报，数这份有分量，讲到了实质问题。”毛泽东认为有人“大有炸平庐山之势”。

提前召开的党代会：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 (847)

在林彪折戟沉沙、葬身异国后，十大不得不提前召开了。年迈的毛泽东在大会闭幕后，竟衰老得站不起来。这是他最后一次出现在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上。他选中王洪文作接班人，赞扬王洪文出身贫农，当过兵，年

纪轻，经过工农兵三条战线的考验，又通过十大让王洪文当上中央委员会副主席，并在周恩来患病期间一度让他主持中央日常工作。

新旧交织：中国共产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859)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1977年8月召开的党的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揭批‘四人帮’和动员全党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方面起了积极作用。但是，由于当时历史条件的限制和华国锋同志的错误影响，这次大会没有能够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理论、政策和口号，反而加以肯定。”

决定命运的36天：1978年中央工作会议…………… (881)

这次中央工作会议开了36天。华国锋宣布的议题是讨论经济问题，陈云发言改变了整个会议的进程。经过艰难的斗争，天安门事件在会上终于得以平反。华国锋、汪东兴不得不在会上承认“两个凡是”错了。邓小平在闭幕式上发表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著名讲话，实际上成为随后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主题报告。

新时期的里程碑：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 (921)

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西宾馆举行。这次全会只开了5天，却实现了建国以来党和国家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与此同时，邓小平作为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核心的地位得到实际上的确立。可是，这次只开了5天的会议，怎么会成为中国历史的转折点，怎么会成为“新时期的遵义会

议”呢？

澄清理论是非：理论工作务虚会……………（948）

1978年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从1979年起把全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然而，党内在一些重大理论问题上的认识并未得到统一。于是，便有了1979年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会上提出并讨论的若干重大理论问题，对后来的中国社会产生了重大影响。

《历史决议》一锤定音：十一届六中全会……………（966）

在1981年6月27日至29日召开的十一届六中全会上，一个伟大的历史文献诞生了。这就是《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决议》的通过，标志着党在指导思想上拨乱反正的历史任务已经完成。这次全会还同意华国锋辞去中央委员会主席和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的职务，并选举胡耀邦为中央委员会主席，决定邓小平为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

开创新局面：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987）

邓小平在致开幕词时，第一次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崭新命题。十二大总结拨乱反正的经验，制定了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的纲领，通过了新的《中国共产党章程》。邓小平在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金日成谈话时说：“十二大的作用与我们党的七大一样。七大把革命引向胜利，十二大将把建设引向胜利。”

再绘宏图：中国共产党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1022）

十三大的突出贡献，是系统地阐述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完整地概括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十三大根据邓小平的设想，提出了“三步走”的经济发展战略。十三大从指导思想、历史阶段、根本任务、发展动力、必要条件、总体布局、国际环境等方面，勾画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轮廓。

第三代领导集体形成：十三届四中全会……………（1044）

在1989年北京政治风波平息之后，中国共产党于6月23日至24日召开十三届四中全会。从十三届四中全会选出新的中央领导层到五中全会邓小平退出中央领导岗位，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和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实现了顺利的交接。

继往开来：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1049）

十四大以1992年初邓小平的南方谈话为指导，作出三项具有深远意义的重大决策：一是确立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在全党的指导地位；二是明确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三是要抓住机遇，加快发展。这次大会和邓小平南方谈话，成为中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进入新阶段的标志。一家海外报纸称：“中共十四大——跨世纪的伟大工程。”

为新世纪奠基：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1090）

十五大召开时，距新的世纪还有两年半的时间。江泽民说：十五大的主题是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把

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全面推向 21 世纪。十五大确定把邓小平理论作为党的指导思想写进党章，江泽民在报告中首次使用了“邓小平理论”的提法。十五大重申了党的基本路线，确立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纲领。十五大对跨世纪的经济、政治、文化、国防、外交以及党的建设等领域的改革和发展作出了战略性的部署。

横空出世：中国共产党 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1921年7月23日晚，夜色笼罩着中国最大的城市上海。在法租界的一座小楼里，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了。当时，对几乎所有的中国人来说，这不过是一个极其平常的夜晚，但对于中国的历史，它却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一个改变中国命运的伟大政党从此诞生了。

1920年秋天，第三国际的代表之一马迈也夫到武汉。当时我任共产党武汉支部书记，我同他作过两次长谈，知道俄国革命后的一些情况。他说他不久回莫斯科进陆军大学学习，他鼓励我到莫斯科去学习，因此我就写信给临时中央请求去莫斯科学习，中央答应了，但一时没有人接替我的工作，不能在短期内成行。同年的冬天，上海经济来源断绝，武汉的几个同志如刘伯垂、董必武、陈潭秋、张眉轩（他不久就脱离了）等都回家过农历年，我一人在武昌几乎无钱举火。我把武汉的工作结束一下，写信告诉陈潭秋，我即带着三个青年团（当时简称S.Y.）员到上海，作去莫斯科的准备。到了上海住在法租界霞飞路新渔阳里六号党的机关部。见了李汉俊，才知道第三国际的代表维经斯基（化名吴廷康）回国了，陈独秀应粤军总司令陈炯明之约，到广东去任广东政府教育委员会委员长兼广东大学预备科科长。中央书记的职务由李汉俊代理，新渔阳里六号办了一个华俄通讯社，由杨明

斋负责，并不经常出稿，办了一个俄文补习班，由杨明斋任教，约有十几个学生在那儿学俄文，这些学生中我记得有刘少奇、许之桢、傅大庆、李启汉、罗亦农及彭述之、卜士奇等。当时去海參崴的船还不通，经过大连、满洲里到赤塔的路也不通，去莫斯科的计划，一时没有办法。李汉俊留我暂在中央工作。中央成立了一个教育委员会，由我同杨明斋负责，主要的工作是选派学生赴莫斯科留学，办俄文补习班，并参加上海的一些宣传组织活动。当时上海的党员不多，只有李达、俞秀松、施存统（不久到日本去了）、沈玄庐（他来去，不常在上海）。陈望道、邵力子、沈雁冰还是1921年春天才加入，沈泽民是初夏才加入，李启汉（李士林）是同年五一劳动节后才加入。最初的工作是参加印刷工人、烟草工人、纺织工人的组织活动。四月间送了一批学生赴苏俄留学，是由海道到海參崴，再由西伯利亚铁路到莫斯科，我记得刘少奇及彭述之、卜士奇等是这一次去的。1921年五一劳动节，我们在上海天后宫举行了集会，在各报上写了一些宣传的文章，发了几种传单。这一次的五一劳动节虽然没有发动广大的劳动群众，但在中国举行五一劳动节的纪念会还是破天荒的第一次。^①统治上海的反动当局为这—次的运动震动了，法国巡捕房派了武装巡捕搜查了我们的机关部（渔阳里六号），住在六号一部分准备留俄的学生也搬走了。李汉俊也有点打饥荒，他决定暂时把机关部停止活动，要我到广州去找陈独秀决定如何进行工作的问题，或者把中央搬到广州去。

约在五月底我到了广州，见了陈独秀，报告了上海的情形。陈独秀说：上海无工作好做，广州的工作很多，你就暂在广州工作。于是，我就住在新兴马路（城内大新公司旁边）《新青年》

① 中国工人阶级第一次纪念五一劳动节，当为1920年5月1日——
编者

杂志发行部，在《群报》（《群报》是受党指导，陈公博任总编辑）任撰述，并派我在宣传员养成所当学监（尚未到差）。约在六月中旬，陈独秀召集我们开会说：接到李汉俊、张国焘等来信，临时中央在上海召集全国代表会议，第三国际、赤色职工国际也派来代表参加，要陈独秀回上海，要广州区派两个代表去出席。陈独秀因职务关系走不开，当时决定我同陈公博为广州区的代表。行前陈独秀同我说：大会后你还是回武汉工作，你在武汉工作比较有作用些。我接受了他的意见。我到了上海，先住在渔阳里六号，后迁到法租界打铁浜博文女校楼上，这是临时租定招待各地代表的地方，租房子的名义是北京大学暑期旅行团。在开会时统计出席代表有七个地区，共 13 个代表，计湖南毛泽东、何叔衡，湖北董必武、陈潭秋，北京张国焘、刘仁静，山东王尽美、邓恩铭，上海李达、李汉俊，广州包惠僧、陈公博，东京周佛海。还有第三国际代表马林，赤色职工国际代表李克诺斯基。开会的地址是法租界贝勒路树德里（门牌号数记不清，可向李书城夫妇）李汉俊家。各地区代表分别报告了各地工作情况和政治环境后即进行讨论党纲和劳动运动的计划，这两个问题占了这次会议主要的部分。会议进行到第四天，马林和李克诺斯基也参加了。宣布开会不到半点钟的时候，突然有个穿灰色竹布长褂的陌生面目的人跑上楼来把门帘揭开，一只脚跨进门内，就进到了我们的会场，说一句“对不起我走错了”，忙匆匆地就走了。马林很机警地问这是什么人？都说不认识。马林说：“一定是包打听，我们即刻解散。”在一分钟内我们都从前门走了，过了约两个钟头的时候，我再回去看看。据汉俊说：“你们走了不过十多分钟，陈公博还没有走，有十几个巡捕和包打听来搜查了一番，并没有搜去什么，他们问我们开什么会，我答应是北京大学的几位教授谈谈编辑新时代丛书的问题，并不是开会。好在他们都知道这是阿哥（李书城）的公馆，最后还说了几句道歉的话走了。”当夜

我们到李达家里会谈（在渔阳里二号，是陈独秀的住宅，李达也住在此处）。大家的意见，明天的会，要改地方，即决定以游览的姿态到嘉兴南湖找一只大船，尽一日之长来结束这个会。次日早晨我们都到了嘉兴南湖，只有陈公博没有去，李达的爱人王会悟（非党同志）是嘉兴南湖人，带她去当向导。此处风景甚好，游人并不多。我们雇了一只大船，并准备了酒菜，把船开到湖心，就开始开会，通过了党纲和劳动运动的计划，便进行选举，选出三个中央委员即陈独秀、张国焘、李达，两个候补委员即李大钊、周佛海，并决定陈独秀任书记，张国焘任组织，李达任宣传，陈独秀未返沪以前，书记暂由周佛海代理。

在第一次代表会议中，马林和李克诺斯基只到过两次会。第一次马林作了一个政治报告，时间比较长，李克诺斯基谈了一点赤色职工国际的情况。马林口若悬河，词令甚好；李克诺斯基好像是个工人出身，说话很简短，也没有讨论到党与第三国际的关系问题。党的经济来源和开支情况由张国焘一手包办，也没有在大会上和委员会上作过报告，开支代表的旅费，也是由张国焘一意为之，也没有人过问。这样的做法，我们都不满意，但也没有明白说出来，除了开了会就各回原处的代表们以外，留在上海的周佛海、李汉俊、李达和我都有同样的意见。

大会结束以后，成立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由张国焘任主任，这个组织并没有经过大会讨论过，出版一种《劳动周刊》，发行的对象是各工厂的工人，由张国焘、包晦生（我的化名）、李震瀛、李启汉负责编辑，这个刊物开支很大，收效不多，后来又加了董锄平、许白昊，都在劳动组合书记部工作，展开了纺织厂、香烟厂、各印刷工厂的工人组织活动，在闸北叉袋角（译音）办了一个工人补习夜校，由我同李震瀛、李启汉轮流去上课。

当时的工作情况比代表会议以前是有进步，可是我们的工作

仍局限于一部分工人和一部分知识分子中，对政治上的作用不大，作为一个无产阶级的政党，那是太不够了。马林对我们提出了意见：要我们把陈独秀请到上海来，重新布置党的工作。当时李达、周佛海等对马林的意见很不高兴，以为这是看他们不起，张国焘没有表示意见。经过了一次会商，接受了马林的意见，决定派我到广州去请陈独秀回上海。我即马上动身坐海船到香港改乘火车到广州。见了陈独秀说明了上海各同志的意见。他即决定辞职赴沪。我们回到上海以后，陈独秀同马林会面，谈了几次，意见未得一致，因为陈独秀是个最重感情的人，他听了我们同志间先入之见，也以为马林是看不起中国党。正在僵持当中，有一天晚上，我去看他。他说：“革命是我们自己的事，有人帮助固然好，没有人帮助我们还是要干，靠别人拿钱来革命是要不得的。”他并准备介绍我到重庆师范学校去教书，他主张同志们应从独立生活的环境中去发动革命，不要以革命为职业。此时张太雷也到了上海，他经常奔走于马林与陈独秀之间。有一天下午（约在1921年9月、10月之间），我到陈独秀家想问问他同马林再次会谈的结果。一会儿杨明斋、柯庆施（他此时还是青年团团团员）也来了。我们在他的楼下客厅里闲谈，陈独秀还在楼上，忽然有人打前门（经常是走后门），我们开门一看，来说会陈独秀，我们认为这几个上海白相人打扮的人一定是包打听。我们就说，陈独秀不在家。他问我们为谁，我们答应是客人。独秀听着人声嘈杂，知道出了事，下楼来想从后门出去，但是后门已有武装巡捕把守，不准出门。他只好回到客堂同我们坐在一起。接着，进来了四五个便衣侦探，七八个武装巡捕，问我们哪个是陈独秀？我们都说：陈独秀不在家。我们一一报了假名（陈独秀报的假名是高坦甫）。他们守着我们，随即开来了两部汽车，叫我们跟他们走。我们走上了汽车，一会儿到了薛华立路法国总巡捕房，在候审室等了约两个多钟头，并到技术室取了我们的指纹。

邵力子、褚辅成（他两人当天就释放了）也都从陈独秀家里解来了。褚辅成同陈独秀见面就说，我刚到你家就被押解来此。于是，陈独秀就不得不承认是陈独秀。这一次被捕的有陈独秀及他的夫人高君曼，杨明斋、柯庆施及我。我们坐了四天洋牢，经过了保释，打了官司，罪名是《新青年》有过激言论，罚了款，这一段公案算是完了。过了两天，陈独秀来找我：“派你到武汉去工作，负党的责任兼任劳动组合书记部武汉支部书记。今后党不开支经费，只劳动组合书记部接受赤色职工国际的经济支援。你的生活费由劳动组合书记部开支，你今后不要教书或当记者，做一个职业革命者好了。”从他的这一段话，我了解他出监以后同马林会商，意见已经一致了，他也不坚持他的反对职业革命论了。

一、创党的开始及武汉临时支部

五四运动以后约在 1920 年春，第三国际的代表维经斯基（化名吴廷康）随苏俄大使尤林来到中国，由北大俄文专修馆的一个俄国教授鲍立维的介绍，见了陈独秀、李大钊等，谈了几次中国革命问题。因为五四运动后陈独秀常住上海，维经斯基同杨明斋也到上海。上海方面参加新文化运动并主张改革中国政治的除新青年派（《新青年》杂志是陈独秀主编，当时被称为新青年派）外，还有上海《星期评论》，负责人是戴季陶、沈玄庐、孙棣三等。《时事新报》（研究系的报纸）主编人是张东荪。维经斯基由陈独秀介绍同戴季陶、张东荪见面，会谈了好几次，对中国政治改革有些共同的意见，最后发起组党。但张东荪是标榜基尔特社会主义的，戴季陶有点河上肇那一派社会主义的思想而主张议会政策的（李汉俊也是这一派的思想），陈独秀、维经斯基是主张中国革命一定要走俄国的路，完全接受十月革命的教训来发

展中国的革命，在《新青年》杂志上，曾发动对张东荪等改良主义的论战，结果张东荪、戴季陶退出了这一活动。沈玄庐、李汉俊等站到陈独秀这一边来了。张东荪仍以研究系的面貌办他的《时事新报》，戴季陶因为做交易所的投机生意失败回四川，船到宜昌，他曾投江自杀遇救，最后他成了共产党的敌人。《星期评论》由沈玄庐、李汉俊等接办了几期也停刊了。

约在同年的夏天成立了中国共产党，在上海成立临时中央，推陈独秀为临时中央的书记。当时上海的党员不多，推选的方式很简单，尤以维经斯基的意见有决定作用，一切部署也是维经斯基与陈独秀共同决定的。临时中央通讯处是法租界大自鸣钟《新青年》发行部苏新甫转，重要的文件及工作的地点，在法租界老渔阳里二号，在中央工作的同志除陈独秀外还有李汉俊、李达、俞秀松等。中央主要的工作是宣传鼓动，编印《新青年》杂志及新青年丛书，并与各地支部或小组取得联系（我记得当时没有小组这个名词，凡经中央组织起来的地方都叫支部）。各地支部成立最早的是北京、天津、上海、武汉、广州、长沙等处。同年夏秋之交，刘伯垂由广州过上海回武汉，他在上海同陈独秀谈了几次，陈独秀即吸收刘伯垂入党，并派他到武汉发展组织，介绍郑凯卿（文华书院的工友，是五四运动时陈独秀到武汉讲演时结识的）和我做他的助手。刘伯垂回到武汉，即找董必武、张国恩（他不久就脱党了）、陈潭秋、郑凯卿、赵子俊、包晦生（包惠僧）、赵子健等商谈，都同意加入共产党，即以上述这几个人为基础成立武汉临时支部。第一次会议是在武昌抚院街董必武寓所内开的，推定包惠僧为临时支部书记，经常在机关部工作。张国恩管钱，租定武昌山前多公祠五号为机关部，刘伯垂的律师事务所的招牌亦挂在此处。刘伯垂带来了一个抄写的中国共产党纲领草案，详细内容记不清楚，大体不出《共产党宣言》的范围，对党员政治活动规定很严格，如不做资产阶级政府的官吏，不加入

资产阶级的政党等，并带来一些新青年社出版的丛书及有关苏俄革命的小册子。当时，我们对于学习马列主义知识是太少了，我们多数同志几乎是当了共产党员才学习马列主义，我们主要的读物是《共产党宣言》、《新青年》杂志，李汉俊译的《资本论浅说》、《共产党月刊》，考茨基著的《唯物史观》，李季译的《社会主义史》、《马克思传略》与关于巴枯宁、克鲁泡特金、托尔斯泰的著作及传记。大家都很喜欢读。一般同志的思想情况：反对现状，憎恨政府是主要的，至于社会主义的前途，共产主义的远景都有可望而不可及之感。同年冬季，李汉俊由上海回家路过武昌，我们集会请李汉俊讲《唯物史观》，也是在抚院街董必武寓内举行的。李汉俊常说：马克思主义体现在各国都不是一样的，如在法国为工团主义，在英国为基尔特社会主义，在德国为社会民主党，在美国为 I. W. W.，在俄国为布尔什维克。当时，大家听了以为很新奇，其实除苏俄的布尔什维克是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以外，其余的一切都是歪曲了马克思主义，与马克思主义并无相同之处。党支部是每星期开会一次，有时是在抚院街董必武同志寓内，有时是在多公祠五号开，规定每次会是要做工作报告或读书报告或国内外时事报告，是作为教育同志的一个基层组织，但执行时并没有完全做到。

当时的工作情况：党是完全秘密的，社会主义青年团(S.Y.)是半公开的，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是公开的（这个名称在当时各地恐怕不一致，有的地方称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有的地方称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武汉是用马克思学说研究会），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会员的吸收及青年团团员的吸收方法，是以同志们的个人关系进行的。如陈潭秋是武高毕业，他就负责吸收武高方面的进步学生；我是一师毕业，我就负责吸收一师方面的进步学生；刘子通在女师教书，就负责在女师方面活动；武汉中学是董必武办的，陈潭秋也在该校教书，就由他们负责活动，主要的活动是

这几个学校。其他如外国语专校、中华大学及一中的学生也有些接触，但影响不大。对工人运动方面，在1920年临时支部时代，还没有发动起来，就是说，我们的工作，此时还没有深入到劳苦群众中去，郑凯卿虽然是工人出身，他为生活关系在文华书院（教会学校，后改为华中大学）当校工，也是一筹莫展。他做了一些调查工作，陈独秀曾制了一个工人状况调查表，是郑凯卿调查填报的，在《新青年》杂志上发表过。我写了一篇《武汉劳工状况及其活动》，于1921年春夏之间在上海《民国日报》副刊《觉悟》上发表过。赵子俊是个失业工人，生活很苦，后来由党介绍他进黄埔军校第一期，毕业后干军事工作，不知所终。

在这几个月的工作中，对于吸收党员非常慎重，并没有吸收新的同志，临时中央曾有信给我，要我们吸收恽代英及他领导的利群书店的分子。我也去访问过他们，恽代英我也同他谈过，李书渠、廖焕星、芦斌（陆沉）、林育南等，我和刘伯垂、陈潭秋都直接同他们接触过。但他们此刻热衷搞新村运动，办书店，注意个人进修，一个个都像清教徒似地不容易使人接近。李汉俊来武昌，也到利群书店谈过，马迈也夫同鲍立维来武昌也到利群书店参观过，终没有同他们联系上。一直到1921年冬天，在第三国际领导之下，针对华盛顿举行的太平洋会议而在伊尔库茨克举行了远东弱小民族会议，我们吸收利群书店的分子林育南为武汉学生的代表出席远东弱小民族会议（中国代表团是张国焘任团长）。林育南从伊尔库茨克开会回来以后，才加入共产党，这是1922年春天的事。接着恽代英、芦斌、李书渠、李求实等都加入了共产党，这是后话。青年团员的发展，也不过十几个人，以武汉中学及第一师范为最多。青年团倒是每星期开会一次，每次开会都有宣传作用的报告，有详细的记录，记录报告中央，并与北京、天津、上海、广州、长沙等处的青年团互相通报交换经验。我记得很清楚的是上海青年团的报告是署名秀松（即俞秀

松)，天津青年团的报告署名春木（张太雷），其余各地负责人记不清楚了。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当时也不过 20 多个人，会开得比较少，每次开会都是由我们轮流做读书报告或发给宣传品（如介绍十月革命后的苏俄的各种小册子），开会的地点都是在多公祠五号。至 1921 年 1 月间，因维经斯基回国，中央的经济来源断绝，我便到上海准备赴莫斯科，武汉的工作停顿了一个时期。

二、第一次全国代表会议中的情况

1921 年 6 月间，第三国际派马林为代表，赤色职工国际也派李克诺斯基为代表，先到北京。北京支部负责人张国焘同马林等到上海与临时中央负责人李汉俊、李达等商谈发展党的工作问题，并决定在上海召集全国代表会议。此时，陈独秀及我都在广州，接到临时中央的信，要陈独秀回上海，要广州区派两个代表出席会议。陈独秀因为职务离不开即召集我们开会，决定推选我同陈公博代表广州区。我们都到了上海，共计七个地区，13 个代表，计湖南毛泽东、何叔衡，湖北董必武、陈潭秋，广州包惠僧、陈公博，上海李达、李汉俊，济南王尽美、邓恩铭，北京刘仁静、张国焘，东京周佛海。这一次代表的分配是以地区为标准，不是以党员的数量为标准，东京只有周佛海、施存统，原来邀请的也是两个代表，因为施存统没有回国，所以只有周佛海一人出席。开会的时间，是在各学校放暑假不久，约计总在 7 月 10 日左右，临时租定法租界打铁浜博文女校楼上为各代表住宿之所，开会的地址在法租界贝勒路与望志路之间的树德里最后一个弄堂最末了的一家，即李汉俊家。开会的时间，原决定 4 日至 5 日。第一天的会，各地代表与马林、李克诺斯基都出席了。首先由马林作了一个报告，大意是：（1）国际形势；（2）第三国际的工作状况及其使命；（3）中国共产党的任务。马林很善于言

词，报告的时间很长。李克诺斯基也报告了赤色职工国际的工作及任务，他的报告很简短。报告完毕时间就不早了，即宣告散会。第二、三天的会，马林、李克诺斯基都没有出席。各地代表的工作报告，都很简单，因为党在诞生的初期，工作还不多，报告也不可能长。这两天的时间集中讨论两个问题：第一，是“党纲”问题；第二，是“劳动运动的计划”问题。

“党纲”问题大家都重视，不过在当时标题不是“党章”，好像是“中国共产党纲领”，或是“中国共产党组织大纲”，我也记得不很清楚，内容是规定中国共产党的任务和工作方针。讨论党章时，是有些争论的，但不是“左”倾机会主义与右倾机会主义的问题。因为我们的党是受了俄国十月革命影响而诞生的，这一次的代表大会也是在第三国际的代表指导之下举行的。代表们的思想和情绪对于学习苏联与组织无产阶级革命的党，大体都是一致的。即令有人有右倾或“左”的倾向，但在此时还没有形成。至于李汉俊是日本帝国大学毕业，他是河上肇的得意门生，他对于书本上的马克思主义有些研究，对苏俄十月革命以后的材料也看得较多。他的性情很强悍，可是聪明伶俐，在这个场合太煞风景的话，他是不会说出来的。所以，他对中国共产党总的任务和总的方向，并没有突出的与大家不同的意见。至于李汉俊的右倾及他的堕落是以后的事。再说刘仁静，他此时还是19岁的小孩子，他在北京大学读书，看了几本马列主义的书籍，如他在会场和人谈话时，好搬教条，好抬杠，所以大家叫他“小马克思”，是讽刺他的。他在这次会上，也没有什么成套的意见。至于他的“左”倾及他的堕落，也是以后的事，此时也没有什么惊人的意见。

争论的问题是什么呢？因为“党章”有“共产党员不得参加资产阶级的政党及团体”。这两项规定本来不是值得研究的问题，但对于陈公博和李汉俊就是一个很大的刺激。因为陈公博刚在北

大毕业，凭借陈独秀的政治关系，镶上了国民党的边，当了广东法专的教授，宣传员养成所的所长，《群报》的总编辑，大有脱颖而出之势。李汉俊刚从日本帝大毕业回国，在上海《星期评论》及《新青年》中也露了点头角，加以有李书城的政治关系，也正在准备袍笏登场中。他们当共产党是个思想的发展，是个远景，做官是摆在面前的现实问题，这就是“存在决定意识”，他两人很激动地先后发言反对这个规定。在当时的情况，这种反对意见，也不是没有理由的，如果是出于他人之口，这个意见也还是可以加以讨论的，因为是出于他们两人之口，又加以他们态度过于紧张，所以激起了一些代表对他们两人意见的反对意见。首先由张国焘、刘仁静搬出阶级的仇恨，阶级斗争的大原则，多数代表同意这个意见，一场舌战，颇为激烈。中间李汉俊提出修正意见：“共产党员不得做资产阶级政府的政务官。”原案的“官吏”是包括从内阁总理一直到低级科员，修正案的“政务官”只是在中央的阁员，在地方的督军省长，问题就不大了，但是大家也不同意，辩论了很久，陈公博也软下来了，李汉俊虽然坚持他的意见，但是少数，最后提出表决：“维持原案”占多数。经过这一场的论战，张国焘等就说李汉俊对资产阶级妥协，有改良主义的倾向，而李汉俊自以为是，见多识广，目空一切，也不向同志们说明他的见解，仅在主观上认定别人不懂马列主义，不懂政略，只有他懂，因此李汉俊就孤立起来了，也并没有什么李汉俊的一派。好像第二天的会，党纲还没有讨论完，时间不早就散会了。第三天的会，没有继续讨论党纲，因张国焘说，马林对党纲还有意见，等马林来出席时再讨论，就开始讨论“劳动运动计划”。

我们都知道共产党是工人阶级的政党，应该吸收广大的工人群众来参加，但是这一次代表会议共 13 个代表都是知识分子，代表各地的党员总共不过 50 余人，除了湖北区有两个失业的工

人同志外，就没有什么工人，尤其是没有产业工人。这说明我们党还是在软弱无力的幼年时期。马林在他的报告中，也指明这个问题。因此，大家都认定如何深入到劳工群众中去，如何发动工人和组织工人是我们的党当前的一个重要任务，所以把劳动运动的计划提出作为一个重要的问题来讨论。最先发言的是刘仁静，他把各国劳动运动的历史和组织形式讲了一大套，归结到我们的劳动运动要采取产业组合的方式，反对职业组合，甚至说我们要尽先把产业工人组织起来，职业工人无关紧要。周佛海译过一部社会问题概论，李达译过一部社会问题详解，他们对各国劳动运动的历史和理论也算是有点研究，也是每人讲了一套，都是空论甚多，接触到实际问题很少。各地做实际工作的同志的意见是说中国是个产业落后的国家，产业工人较少，有很多城市没有产业工人只有职业工人，还有很多手工业工人，我们的劳动运动的总方针应该把整个工人阶级团结在一起，组织起来。产业组合固然好，但有些职业工人没有什么产业的凭借，如码头夫、黄包车夫等就不能采取产业组合的方式了。毛泽东也是同意这个意见。辩论了很久，终于决定采取产业组合的方式。关于劳动运动的总方针也写了一个文件，大意是：（1）组织起来；（2）经济斗争（增加工资，减少工作时间，工人福利等）；（3）政治斗争（工人集会结社的自由，罢工请愿的自由等）。这一个问题讨论了很久。最后张国焘说：马林对这个问题还有意见，今天讨论的结果留在下次开会时马林出席再作决定。

第四天的会是当天上午八时起，马林、李克诺斯基及 13 个代表都出席了。宣布开会不到半个钟头，突然有一个陌生面貌的中年男子闯进我们的会场。我们问他干什么？他把我们看了一下说，“对不起，我找错了地方”，就匆忙下楼走了。马林很机警地说：“一定是包打听，我们马上解散，再定期开会。”在一分钟内，我们都从前门走了（上海房子通常都是走后门）。我也不敢

到博文女校，即到环龙路老渔阳里二号。一会儿李达、周佛海也来了，我们谈了一会儿。距我们离开李汉俊家不到两点钟的时间，他们要我到汉俊家去看看动静。我当时是没有经验的人，就冒冒失失地跑到李汉俊家里，走上楼梯的中间，汉俊和陈公博迎出来说：“你回来干什么？你快走吧！巡捕房来了十几个武装巡捕和包打听搜查了一番，没有搜到什么，很侥幸！我的写字桌抽屉里有一份中国共产党的纲领，一开抽屉就看见了，他们竟没有发现，好在我还会说几句法国话，他们也知道这是阿哥的（李书城）公馆，把紧张的场面缓和了些，最后还说几句客气话走了。”汉俊还说：“你还是多绕几个圈子再回宿舍，防着还有包打听盯梢。”我即匆忙出来，走了几步，叫了一辆黄包车，到三马路买了一点零碎食物，从爱多亚路绕了几个弄堂回到渔阳里二号。张国焘、李达、周佛海等还在那里等着我的汇报。我把情况讲了之后，大家商量了一下，就决定明天到嘉兴南湖尽一日之长来结束这个会。当夜，我还是回到博文女校睡觉，博文女校倒是平安无事。次日黎明，我们都到了火车站，只有陈公博没有去，马林、李克诺斯基当然也不方便去。约在十时左右，我们都到了南湖，此地风景甚好，游人不多，我们便雇了一只大船，买了酒菜，把船开到湖心，就开始开会。经过了前夜一场虚惊以后，大家发言也精简了些，在正午一点钟前，顺利地通过了“党纲”，通过了“劳动运动计划”，就吃饭。吃完午饭以后，就开始讨论“宣言”，讨论“宣言”时，也有一些小的争论。对于孙中山的问题是在讨论“宣言”时提出的，我认为孙中山代表资产阶级，作为一个无产阶级政党的政治宣言，还能对他表示丝毫妥协吗？当时有很多同志同意我的意见，董必武反对这个意见。讨论了一会儿，结果好像是把这一段删去了。最后进行选举，事先张国焘同各代表商谈过的，所以票很集中，选举结果是陈独秀、张国焘、李达当选为中央委员，李大钊、周佛海当选为候补中央委员，并决定陈独

秀任书记，张国焘任组织，李达任宣传。在陈独秀没有回上海以前，书记由周佛海暂代。约在下午六时太阳还没有下山，我们的会结束了，当即乘车回沪，到达上海时间虽不很晚，已是灯火万家了。接着各地代表准备离沪，只有张国焘、李达、周佛海、包惠僧、刘仁静留在上海部署中央的工作。李汉俊住在上海，间或也参加一些写的工作，但接触不多。

三、几点回忆和感想

1. 第一次全国代表会议正式宣布中国共产党成立，奠定了中国无产阶级革命的基石，在历史上的意义很重大，可是这次会开得不够好，主要的原因是我们在当时对马列主义的修养及政治水平很低，第三国际代表马林、李克诺斯基同我们的接触太少。张国焘是我们和马林间的中间人，他包办一切，把持一切，他对代表们是挟马林以自重，他对马林是包围了马林而孤立了马林，我们同马林开了两次会可是没有从马林那里得到什么，马林也没有从我们代表中得到什么。即是说我们在这次会议中有机会学习苏联的革命经验和教训，可是没有去进行学习。马林在这次会议中有机会了解中国，了解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共产党人，也没有来进行了解，他一切听张国焘的，使代表们的意见与马林的意见发生隔膜，这种隔膜一直到陈独秀回沪经过了很多次的会谈解释仍没有得到一致，几致中国共产党与马林翻脸，如果不是陈独秀和我们四个人在渔阳里二号被捕，马林出钱出力援救而缓和了那个僵局，可能马林这一次到中国来是劳而无功。

2. 这一次的13个代表，多数住在博文女校，相互间的来往很少，会前没有什么交谈，会后也没有什么联系，代表们的提案简直可以说是没有。开会期间随张国焘等几个人拿出什么就讨论什么。除了“党纲”和“劳动运动计划”是事前准备好了开会时

发给各代表而外，就没有什么提案。“宣言”也是张国焘在南湖船上临时提出来的，“宣言”是如何重大的事，不经过事前的研究与交换意见，如何讨论？虽然说是幼年的党，是在草创时期，也未免太草率了。

3. 中国共产党得有今日，是得力于伟大的毛泽东的正确领导，毛泽东的功业，从上井冈山、十年内战、二万五千里长征、八年抗日战争、三年解放战争、统一全中国、土地改革、抗美援朝等事实中说明了，他的学养从他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实践论》、《矛盾论》、《新民主主义论》、《论人民民主专政》、《论持久战》、《论联合政府》等名著及他在各种会议上的报告中说明了。

他的突出的天才，优越的智慧，山岳一般不可动摇的毅力，艰苦卓绝奋斗到底的精神，把三千年来的封建势力推翻了，把国际帝国主义的蹂躏榨取到半生不死、残破不全的中国拯救出来，复兴起来了（他是有史以来历史上有数的人物，他是近代以来中国历史上独一无二的人物）。

我是一个庸人，同毛泽东是在第一次全国代表会议时才见面。在见面以前，我在武汉临时支部负责时曾为工作的联系通过信。在第一次代表会议中我对他的印象是老成持重，沉默寡言，如果要说话即是沉着而有力量。除此之外，我对他并没有更深刻的了解。在第一次全国代表会议以后，他回到长沙负党的责任，我回到武汉负党的责任，我们为了工作也常有信札来往。在1922年春，长沙黄宠惨案发生，我党声援、发动长沙的学生罢课示威活动。毛泽东因反动统治当局压迫避居武汉，就住在武昌黄土坡我们的机关部内。我们同住了十余日，朝夕在一起，工作余暇我同他还游逛了几次街，有一次在长沙柏寿巷对过一个小馆子里吃了一顿，像这样的接近，我对他也没有深刻的了解。在1924年初夏，我由武汉调广州工作，路过上海，中央发给我50

元路费，由毛泽东发给，我见他气色不太好，身体很瘦弱，有一次我同陈独秀谈及，陈独秀说：“润芝的身体很不好，经常是一个星期才大便一次。”我倒常为他的健康担忧。后来，他在广州办农民运动讲习所，我在黄埔军校当政治部主任，在省议会附近的一个弄堂里遇见一次，我见他的身体还是不够健康。从此以后，经过 20 余年的艰苦岁月，我总以为他的健康不够好。后 1949 年我到北京看了他挂在天安门的照片，去年国庆节在天安门观礼，看见他站在天安门上主席台中间的神采，才了解毛主席的健康，也就看见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光明前途，感觉到愉快！

（包惠僧：《回忆中共第一次全国代表会议》）

确立纲领：中国共产党 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

“中国共产党万岁”这个口号，几十年来，回响在祖国的大地和天空。大多数中国人并不知道，历史上第一次提出这个口号的，是1922年6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二大宣言的结尾处，赫然写着这个口号。二大另一个永载史册的第一，是在中国近代革命史上破天荒提出了明确的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

从党的一大到二大前夕的一年里，工人运动得到发展，共产党员、青年团员有所增加。到1922年6月底，全国党员195人，其中上海最多，有50人，其次为广州有32人，长沙、北京、武汉、济南等地党员人数也比过去增加。社会主义青年团在全国已有17个地方组织，有团员5000人左右。面临帝国主义重新瓜分中国和国内各派军阀争夺加剧的严峻的形势，以及党的队伍的不断壮大和各项实际工作的开展，迫切需要党制定出符合中国社会实际情况的革命纲领作为自己的行动指南。党的二大就是在这种历史使命的召唤下揭开帷幕的。

1922年7月16日至23日，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陈独秀、张国焘、李达、张太雷、施存统、蔡和森、邓中夏、向警予、高君宇、王尽美、邓恩铭、项英12人出席，陈独秀主持大会，并代表中央局作中央工作的概况及政治主

张的报告，张国焘汇报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代表大会和第一次全国劳动代表大会的情况，施存统汇报社会主义青年团一大的情况与决议。大会选举陈独秀、邓中夏、蔡和森、张国焘、高君宇 5 人为中央执行委员。陈独秀为委员长，蔡和森为宣传委员，张国焘为组织委员。二大的会址之一是原公共租界南成都路辅德里 625 号，今成都北路 7 弄 30 号，当时是李达的寓所，第一天的大会是在这里举行的。吸收一大的经验，为避免租界巡捕房的注意，其他几天的会议都易地举行。

陈独秀在大会的报告中，着重阐述了党的民主革命的纲领和策略，指出中国共产党的最终目的是要在中国实行社会主义革命，但是，根据中国的社会基础和政治经济的现状，当前还不可能达到此目标。现时的中国革命，无产阶级必须联合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驱逐帝国主义，推翻封建军阀，完成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任务，然后再实行社会主义革命。大会推举陈独秀、蔡和森、张国焘组成起草委员会，负责起草大会宣言与其他文件。

二大的中心议题是制定党为共产主义而奋斗的最高纲领和民主革命的最低纲领。这次大会发表了《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大会宣言》，宣言分析了当时的国际形势和国内政治经济状况，阐明了中国革命的性质、对象和动力，在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次明确地提出了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对中国革命起了巨大的影响，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

宣言分 3 个部分。

第一部分：国际帝国主义宰制下之中国。分析了欧美资本主义的发展，多半是靠掠夺非洲和亚洲做大市场和掠夺场。在现今资本主义进程中，全世界有 12.5 亿的殖民地和被压迫的人民辗转就毙于伦敦、巴黎、纽约、东京等处极少数银行家工业家和他们政府重压之下。宣言列举了帝国主义侵华的大量事实，说明帝国主义列强侵略中国的过程，最足以表现世界资本帝国主义的

本相。你争我夺，都想夺得最优越的权利。因而形成中国目前的国际上的特殊地位。“帝国主义的列强在 80 年侵略中国时期之内，中国已是事实上变成他们共同的殖民地了”，“而最近华盛顿会议给中国造成的新局面，就是历来各帝国主义者的互竞侵略，变为协同的侵略。这种协同的侵略将要完全剥夺中国人民的经济独立，使四万万被压迫的中国人都变成新式主人国际托拉斯的奴隶”。面对帝国主义的世界性掠夺，世界出现了两种反资本主义的革命势力——无产阶级革命和民族革命，其联合日趋密切。“中国劳苦群众要从帝国主义的压迫中把自己解放出来，只有走这条唯一的道路。”

第二部分：中国政治经济现状与受压迫的劳苦群众。指出中国“在政治方面还是处于军阀官僚的封建制度把持之下”。中国的经济基础“尚停留在半原始的家庭农业和手工业的经济基础上面，工业资本主义化的时期还是很远”。政治上分析了各派军阀的状况，经济上列举帝国主义阻挠中国经济自动改进的事实，然后分析了各个阶级。对于民族资产阶级，指出：中国幼稚的资产阶级“为免除经济上的压迫起见，一定要起来与世界资本主义奋斗”。现在“已能结合全国的力量，反对外国帝国主义和北京卖国政府”。特别指出，“中国的知识阶级，商业和工业的资产阶级，要自己能够避免美国的愚弄，他们的民主运动才能依正轨进行”。

对于农民，指出：“中国三万万的农民，乃是革命运动中的最大要素。”农民可分为三种界限：（一）富足的农民地主；（二）独立耕种的小农；（三）佃户和农业雇工。第一种占最少数，第二第三两种的贫苦农民至少也占 95%。贫苦农民要除去穷困和痛苦的环境，那就非起来革命不可。大量的贫苦农民能和工人握手革命，那时可以保证中国革命的成功。

手工业者小店主小雇主也日趋困苦，甚至破产失业，加以本

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又增加了手工业者无产阶级化的程度。

对于工人阶级，指出中国劳动运动已是在第一个阶段中发展起来，香港海员和其他工人为经济要求的罢工运动，足够证明工人们伟大势力。工人们处在中外资本家的极端压迫之下，革命运动是会发展无已的。发展无已的结果，将会变成推倒在中国的世界资本帝国主义的革命领袖军。

在审察了今日中国的政治经济状况后提出：“我们无产阶级和贫苦的农民都应该援助民主主义革命运动。”“只有无产阶级的革命势力和民主主义的革命势力合同动作，才能使真正民主主义革命格外迅速成功。”

第三部分：中国共产党的任务及其目前的奋斗。提出了党的最高纲领和最低纲领，革命分两步走的战略方针。

最高纲领：“中国共产党是中国无产阶级政党。他的目的是要组织无产阶级，用阶级斗争的手段，建立劳农专政的政治，铲除私有财产制度，渐次达到一个共产主义的社会。”

最低纲领：“中国共产党为工人和贫农的目前利益计，引导工人们帮助民主主义的革命运动，使工人和贫农与小资产阶级建立民主主义的联合战线。”目标是：消除内乱，打倒军阀，建设国内和平；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到达中华民族完全独立；统一中国本部（东三省在内）为真正民主共和国；……工人、农民在各级议会有无限制的选举权，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罢工的自由；以及制定关于工人、农民及妇女的法律。

中共二大还通过了《关于“世界大势与中国共产党”》、《关于“国际帝国主义与中国和中国共产党”》、《关于“民主的联合战线”》、《中国共产党加入第三国际》、《关于议会行动》、《关于工会运动与共产党》、《关于少年运动问题》、《关于妇女运动》等决议案。

《关于“民主的联合战线”》的议决案，有着重大的意义，这

是第一次提出了同资产阶级民主派——以孙中山为代表的国民党为主要对象建立联合战线的政策。决议说：“在中国的政治经济现状之下，在中国的无产阶级现状之下，我们认定民主的革命固然是资产阶级的利益，而于无产阶级也是有利益的。”指出：封建武人是无产者和民主派公共的仇敌，两派联合起来打倒公敌，才能得着出版集会结社的自由，任何阶级都必须得着这几种自由方有充分发展的机会。“因此我们共产党应该出来联合全国革新党派，组织民主的联合战线，以扫清封建军阀推翻帝国主义的压迫，建设真正民主政治的独立国家为职志。我们应该号召全国工人农人在本党旗帜之下去加入此种战争。”指出：无产阶级加入此种战争，不是为了民主派的利益，做他们的牺牲，“乃是为了无产阶级自己眼前所必须的自由而加入此种战争，所以无产阶级在战争中不可忘记了自己阶级的独立组织”。无产阶级加入民主革命的运动，“并不是投降代表资产阶级的民主派来做他们的附属品，也不是妄想民主派胜利可以完全解放无产阶级”。所以在民主的战争期间，无产阶级一方面固然应该联合民主派，援助民主派，然亦只是联合与援助，决不是投降附属与合并，因为民主派不是代表无产阶级为无产阶级利益而奋斗的政党；另一方面应该集合在无产阶级的政党——共产党的旗帜之下，独立做自己阶级的运动。

关于民主联合战线的组成的设想是：共产党、社会主义青年团同国民党为主，联合各革新团体组成“民主主义大同盟”，这个新团体包括各城市的工会、农民团体、商人团体、教职员联合会、学生会、妇女参政同盟团体、律师公会、新闻记者团体等。

党的二大专门作出了《关于共产党的组织章程决议案》和制订了《中国共产党章程》，这是总结了创立党以来的经验，以及党员中存在的若干模糊思想而制定的。由于创立党以来到二大前夕，党员中知识分子占多数，二大时在全国 195 名党员中，工人

成分为 21 人，占 10.77%，那么共产党的性质是什么，怎样体现？共产党怎样来建设？怎样来提高共产党员的素质，在革命斗争中发挥作用？怎样区别共产党员与安那其的共产主义者的不同，都必须有规范。在组织章程决议案中清楚地指明：

“我们共产党，不是‘知识者所组织的马克思学会’，也不是‘少数共产主义者离开群众之空想的革命团体’，‘应当是无产阶级中最有革命精神的广大群众组织起来为无产阶级之利益而奋斗的政党，为无产阶级做革命运动的急先锋’。”这就把共产党的性质明确起来：为无产阶级利益而奋斗的政党，为无产阶级做革命运动的急先锋。

关于党的性质明确有两条重大的准则。决议案称：“我们既然是为无产群众奋斗的政党，我们便要‘到群众中去’，要组成一个大的‘群众党’；我们既然要组成一个做革命运动的并且一个大的‘群众党’”，我们就不能忘了两个重大的规律：

（一）党的一切运动都必须深入到广大的群众里面去。

（二）党的内部必须有适应于革命的组织与训练。

决议案指出：凡一个革命的党，若是缺少严密的集权的有纪律的组织与训练，那就只有革命的愿望便不能够有力量去做革命的运动。

关于严密的集权的有纪律的组织与训练，提出了 7 条原则：

（一）自中央机关以至小团体的基本组织要有严密系统才免得乌合的状态；要有集权精神与铁似的纪律，才免得安那其的状态。

（二）个个党员都要在行动上受党中军队式的训练。

（三）个人党员不应只是在言论上表示是共产主义者，重在行动上表现出来是共产主义者。

（四）个个党员须牺牲个人的感情意见及利益关系以拥护党的一致。

(五) 个人党员须记牢一日不为共产党活动，在这一日便是破坏共产主义者。

(六) 无论何时何地个个党员的言论，必须是党的言论，个个党员的活动，必须是党的活动；不可有离党的个人或地方的意味。离开党的支配而做共产主义的活动这完全是个人的活动，不是党的活动，这完全是安那其的共产主义。

(七) 个个党员须了解共产党施行集权与训练时不应以资产阶级的法律秩序等观念施行之，乃应以共产革命在事实上所需要的观念施行之。

二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章程》是中国共产党诞生以来第一个章程，共有6章，这6章是：党员；组织；会议；纪律；经费与附则。在党员一章中规定：本党党员无国籍性别之分，凡承认本党宣言及章程并愿忠实为本党服务者，均得为本党党员。在纪律这一章里规定了全党服从中央，下级服从上级，一切会议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对党员违纪的处理规定：言论行动有违背本党宣言章程及大会各执行委员会之决议案；无故连续2次不到会；欠缴党费3个月；无故连续4个星期不为本党服务以及泄漏本党秘密的，必须开除。地方执行委员开除党员后，必须向中央和区委员会报告其理由。

中共二大通过的组织章程决议案和党章，对党的建设对党员言行规范都是根本的依据，是党领导革命斗争的组织保证。在严格的纪律面前，有些知识分子尽管有革命的愿望，相信共产主义，但因对规定的纪律难以遵守而离开了党。然而，正是有了严密的组织，严格的纪律，虽全国党员不到200人，各城市党员数最多的50人，最少的8人，他们在艰难的环境下，在不离开职业岗位的条件下，展开了工人运动、青年运动和开辟宣传舆论阵地，以及为建立民主联合战线的准备工作。

二大还通过了参加共产国际的决议，从此以后，中国共产党

成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二大之后，1922年9月13日，中共中央机关刊物《向导》周报问世，由蔡和森主编。《向导》周报在宣传党的方针政策，进行革命理论的宣传方面发挥了重大的作用。

总之，二大制定的民主革命纲领，成了团结各阶层群众的战斗旗帜，对于当时的革命斗争起到了极大的指导作用。当然，二大宣言中对中国国情的认识还有待深化；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无产阶级应该起领导作用尚不清晰；对于工农联盟的问题，彻底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以及建立怎么样的政权等问题，也都还没有认识。这些问题在经过长期而又曲折的斗争实践以后，才逐步得到认识。党的一大完成了从组织上建党的任务，二大又提出了正确的民主革命纲领，指明了党在现阶段的斗争目标，制定了党章，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的创建事业进入了新的阶段。

二大之后，1922年10月，中共中央机关自上海迁到北京，1923年二七惨案以后，中央机关迁回上海。

（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著《中国共产党上海史》）

国共携手：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

参加过党的三大的徐梅坤回忆说：“‘三大’的中心议题是讨论国共合作及共产党员是否加入国民党。关于国共合作问题，开会以前就在党内有过酝酿，共产国际也作过指示。根据国际的指示，才召开‘三大’专门进行讨论。这个问题争论得很激烈，一个多星期的会议，大部分时间是辩论这个问题。”

1921年十一二月间，我在上海经陈独秀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上海的第一个工人党员。

1922年7月党的“二大”以后，中共决定将上海地方委员会改为江浙地区委员会。当时中共中央下设四个区委员会，除江浙区外，还有北方区、两湖区和广东区。根据党的决定，我担任了第一任江浙区委书记。江浙区委除直接管辖上海工作外，还负责江苏（长江以南地区）、浙江两省的工作。中共“三大”以前，江浙区党员已发展到40多人，大都集中在上海。1923年6月，我作为江浙区委的代表，出席了在广州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现将我记忆中的“三大”情况，作一简要回顾。

赴广州参加“三大”

大约在“三大”前半个月左右，中央有人口头通知我去广州参加党的第三次代表大会。因为我是区委书记，所以被指定为当

然代表。当时规定江浙区委可派两名正式代表参加，我便指定负责区委工运的王振一为出席“三大”的另一名代表。王振一是山西人，北京大学学生，早年在山西开展革命活动。1923年初，中央从北方派他来上海参加江浙区委的工作，成为我的得力助手。出席“三大”的代表，没有规定具体条件，但代表名单要上报中央，经过批准才能与会。开会之前，中央通知我们有什么问题都可以向中央提出，并要求我们汇报工作。

我和王振一去广州开会是从上海坐船走的。和我们同船前往的还有李大钊、陈潭秋、于树德、金佛庄四人。于树德和金佛庄是江浙区委下辖杭州支部的成员，他俩都作为列席代表参加，记得于树德当时生活很困难，没有钱买船票，急得没办法，我给他出主意，他就把邻居一位朋友妻子的金手镯借来卖掉，买了船票。船不能从上海直开广州，途中必须在香港停留一天，记得在香港停船时，我和李大钊还上岸去喝了一点酒。船到广州，在太古码头上岸。这时，天气已经很热，街上卖荔枝的很多，价钱很便宜。到广州后，广东党组织派人在长堤码头接我们。因为我们相互认识，所以也不用介绍信。我们都没有带行李，随身只有一个小包。一上码头就沿珠江岸边步行到“三大”会址。因其他代表还没有到齐，我们休息了两天才正式开会。

“三大”会址和代表

“三大”会址是在恤孤院路的西侧（原东山恤孤院后街31号，现恤孤院路3号），从庙前街到恤孤院路的地势是由高至低的斜坡路，到开会的地点，马路转为平路。会址的四周比较空旷，北边有“逵园”，是华侨女青年读书的地方；南边走一段路就是“春园”；西边有一片荒草地和一个鱼塘；东边是“简园”。

会址是临时租用的，一幢两间两层砖木结构的普通楼房。楼

下南边一间是会议室，北边一间是饭厅。楼上两间是宿舍，一部分代表就住在这里。屋内灰白色的墙壁，由于失修显得很脏很旧，看上去这房子很长时间没住人了。会议室当中摆放着一张西餐式的长方台子，西面是一列长条凳，前后两端都是小方凳。

我记得出席“三大”的代表有 20 多人，他们是，北方区：李大钊、邓培；两湖区：毛泽东（湖南）、陈潭秋（湖北）；江浙区：徐梅坤、王振一；广东区：谭平山、冯菊坡、阮啸仙、刘尔崧；中央：陈独秀、张国焘、张太雷；京汉铁路：王俊、孙云鹏；津浦铁路：沈茂坤；杭州支部：于树德、金佛庄；法国回国的：蔡和森、向警予；苏联回国的：瞿秋白；刘仁静以中共出席共产国际“四大”代表的身份列席了会议。广东的罗绮园担任会议纪录，但他不是代表。共产国际代表马林自始至终参加了会议。

会议期间，马林、毛泽东、张太雷、瞿秋白、蔡和森、向警予等住在“春园”；沈茂坤、于树德、王振一、徐梅坤、金佛庄、王俊、孙云鹏、陈潭秋等住在会址楼上；广东代表都住在家里。

会议情况

“三大”前夕，党中央机关已由上海迁到广州。为了召开“三大”，陈独秀、毛泽东、蔡和森、向警予、瞿秋白、张太雷以及马林等提前来广州进行筹备工作。具体事务性工作由广东区谭平山、阮啸仙、刘尔崧、罗绮园等负责。

“三大”会议由陈独秀主持召开，没有举行开幕仪式。第一天上午，首先由陈独秀代表中央作工作报告。他着重谈了“二大”以来的革命形势和党的发展情况。下午，马林报告国际形势与国际工运问题。他英语讲得很好，张太雷作翻译。

第二天，讨论陈独秀的报告。

第三天，各地代表汇报工作。瞿秋白简短地介绍了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的情况。张国焘报告铁路工会的情况。陈潭秋作了京汉铁路“二七惨案”报告，其中谈到烈士施洋，讲了他的家庭情况，孩子小、生活苦等等。孙云鹏讲京汉铁路大罢工被捕工人的救济工作。他带来的《京汉工人流血记》在会上发给每人一册。这个小册子刚刚出版不久。

第四天是大会发言。我在会上谈了农民运动情况。毛泽东发言主张党的工作重点应放在城市工人运动上，同时也应特别注意农民运动。他以 1922 年长沙第一纱厂和 1923 年京汉路罢工为例，说明工人是有觉悟的。他还说到历史上农民斗争的力量是很大的。

“三大”的中心议题是讨论国共合作及共产党员是否加入国民党。关于国共合作问题，开会以前就在党内有过酝酿，共产国际也作过指示。根据国际的指示，才召开“三大”专门进行讨论。这个问题争论得很激烈，一个多星期的会议，大部分时间是辩论这个问题。会上，陈独秀发言认为，我们的党员不多，力量不强，工人没有文化，觉悟不高，不懂革命，也没有革命理论，甚至污蔑工人有流氓习气。所以他主张要在国民党里去发展共产党，可以暂时不要共产党的独立工作，整个党参加到国民党那里去，中国革命应该由国民党来领导。

张国焘发言反对国共合作，尤其反对全体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支持他的有王振一等。他们只要知识分子和工人的联合，认为这样就可以完成中国革命。

张国焘发言后，我接着发言骂了张国焘，而且骂得很凶，气得我站起来拍桌子，骂他不像共产党员。他不但反对国共合作，还搞小宗派活动，所以我主张开除张国焘。会上，马林支持我的观点。张国焘见势不妙，参加几次会后，就偷偷溜走了。他走后蔡和森成了反对加入国民党的主要发言人。可是，向警予却反对

蔡和森的观点。

李大钊汇报了北京工作情况，但他在会上讲话不多。张太雷在会上发言慷慨激昂，主张国共合作。

毛泽东在开会期间很活跃，多次发言，提出主张国共合作的许多理由。他利用休息时间经常到“简园”去。湖南军阀谭延闿当时就住在“简园”。我问他经常到那去干什么，他告诉我，主要是跟谭延闿谈国共合作问题，谭有兵权，耐心做谭的工作，想把他争取过来。李大钊、张太雷和我也都去“简园”见过谭延闿。

会议的最后一天，是通过各项决议案、党章和宣言。制定党纲、党章是“三大”的另一项重要议题。毛泽东、蔡和森、张太雷、陈独秀、瞿秋白以及马林参加了党章起草工作，是开会前写好的。其他决议案是开会时才提出来的，边讨论边起草决议案。关于共产国际“四大”决议案及“三大”宣言，由马林起草；农民问题决议案由毛泽东、谭平山起草；妇女问题决议案由向警予起草；关于国共合作决议案由毛泽东起草；青年运动决议案由张太雷、刘仁静起草；劳动运动决议案是集体起草的。

在举手表决国共合作问题决议案时，蔡和森和王振一没有举手，他们是少数，张国焘没有参加表决。

马林的理论水平较高，“三大”通过的宣言及各项决议，他的贡献不小。他自己带来一部英文打字机，他把会议讨论的意见集中整理好，打成英文，再由张太雷、瞿秋白翻译成中文发下来讨论。

通过决议后，全体代表到黄花岗烈士墓举行悼念活动，马林也参加了。由瞿秋白领着代表们唱会议期间刚学会的《国际歌》，之后宣布会议胜利闭幕。

“三大”中央

“三大”选举产生了新的中央执行委员会。选举前，曾提出几个类似候选人的名单，征求意见，然后举手表决。我记得当选“三大”中央委员的有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谭平山、蔡和森、向警予、张太雷、瞿秋白等；候补中央委员有邓培、徐梅坤等。

“三大”还选出五人组成的中央局，有陈独秀、毛泽东、蔡和森，其他记不清了。陈独秀任书记，毛泽东负责组织，瞿秋白负责宣传（后来由蔡和森接替）。

开完“三大”，代表们陆续离开广州，也有些代表停留了几天。这期间，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等曾到廖仲恺家谈国共合作，他们为促成同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进行合作，付出了很大的心血。

我们回到上海以后，立即向江浙区的党员传达了“三大”的情况和决议。为了党的工作需要，我们先后以个人身分加入了国民党。虽然规定全体共产党员加入，但实际上有的参加，有的不参加；有的公开，有的秘密。大部分是参加了，当时叫“跨党”分子。

“三大”后，大约七八月间，毛泽东、蔡和森、向警予来到上海。这时党中央机关也迁回上海。蔡和森继续负责主编《向导》周报。毛泽东也参加过一段时间的编辑工作。第二年，毛泽东第二次从湖南来上海后，主要是在国民党上海执行部工作。

（徐梅坤：《参加中共“三大”》）

唤起工农：中国共产党 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

第一次国共合作正式形成以后，党遇到许多尖锐而复杂的问题。国共两党之间，中国共产党同共产国际及其代表之间和中国共产党内，都存在着各种各样的矛盾。不解决这些问题，党就无法迎接即将到来的革命高潮。于是，全国 994 名党员的 20 位代表再次聚首上海，召开了党的四大。

1924 年 1 月的国民党一大以后，中国共产党内对于在国共合作的情况下，共产党如何发展、如何开展工人运动和农民运动，存在着分歧。简而言之，共产党人是应当在国民党的旗帜下为了国民革命运动而去组织中国工人、农民以及青年，还是应当由共产党直接去组织群众？中国共产党内的分歧，实际上也涉及对共产国际的决定的分歧。因此，共产国际东方部建议中共中央在上海召开一次会议。

共产国际对于上述问题的基本观点，见之于 1923 年 11 月 28 日的共产国际主席团《关于中国民族解放运动和国民党问题的决议》和 1924 年 1 月 15 日共产国际东方部给共产国际主席团的报告。在决议中是这样说的：“革命政党国民党将更多地考虑中国工人运动日益发展的情况，为了加强全国的解放运动，将放手发动工人阶级的力量，全力支持它的经济组织及其阶级的政治组织——中国共产党。”就共产党方面而论，“共产国际曾经而且

还将指示中国共产党、工人阶级和劳动农民，必须全力支持国民党”。在东方部的报告中是这样说的：“至于如何组织中国工人的问题，我们认为有必要向党指出，当前的问题不是在什么样的政治旗帜下去组织他们，而是把他们聚集到阶级的经济组织中去，并尽快摆脱工人组织分散的状态。”

共产国际的意见很明白，就是不要去争旗帜，尽可以用国民党的旗帜。但是中共中央并不赞成这个意见，所以在1924年5月在上海专门就这些问题举行了中国共产党扩大执行委员会，问题提得非常尖锐。

5月的中共中央扩大会经过争论，最后指出：我们在国民党中和国民党外，做种种复杂的工作，即使比我们强大的党，也很容易有不偏于“左”倾即偏于右倾的危险，何况是我们这毫无经验的党。因此，我们越发感觉在国民党工作的重要，便越发感觉认识国民党及巩固我们党的重要。又指出：劳动运动尤其近代产业工人运动是我们的党之根本工作，我们在国民革命运动中若忽视了这种工作，便无异解散了我们的党。

对于国民党，共产国际1923年11月决议是这样评述的：国民党的三民主义，可以通过共产国际的解释，说明国民党是一个符合时代精神的民族政党。它所进行的是反对外国帝国主义和本国封建主义的斗争。还认为，国民党革命派已认识到必须接近劳动群众，必须通过广泛的宣传和组织工作同他们保持最密切的联系，从而巩固和扩大中国革命运动的基础。

中共中央从不同的角度，提出了不同的看法，提出：国民党于第一次代表大会之后，思想上及组织上都渐渐地形成起来，大半是因为我们党员积极参加工作的结果。国民党内一大部分党员本来很明显地属于工业及农业的有产阶级的倾向，并且回避反帝斗争，他们的阶级利益和劳动平民的利益，将来当然不能一致；他们的阶级性每易趋于妥协，也很难能为中国民族完全独立奋斗

到底。既如此，国民党内——对于反帝国主义，民权主义农民问题的改良政策，对工人利益的让步问题——便出现两派的力量。照现在的状况看来，国民党的左派是孙中山及其一派和我们的同志——我们同志其实是这派的基本队；因此所谓国民党左右派之争，其实是我们和国民党右派之争。所以假使现在我们因为巩固扩大国民党起见而取调和左右派的政策，那就是一种错误。

对于工人经济组织、工会的组织问题，中共中央指出：凡在可能的范围内我们不必帮助国民党组织上的渗入产业无产阶级，不然，就是一个很大的错误。这不但是使先进的无产阶级内心掺入混乱的种子，——产业的无产阶级，是我们党的基础，——而且使无产阶级自己的阶级斗争要发生很大的困难。还指出：我们的党，对于国民党最好的帮助，在工会运动方面并不是帮助他设立国民党的铁路工会及矿工工会，或者使已成的工会全体加入国民党，而是先组织纯粹阶级的斗争的工会，于每次用得着的时候，指挥这些工会赞助国民党所指导的国民革命运动。

这次中央扩大会议，还讨论和通过了共产党和青年团的关系问题、党内组织及宣传教育问题、农民工作和兵士工作问题的决议。

对于国民党的认识以及对于国民党左右派之间如何处理，对于工农运动的领导问题，中共中央的决定与共产国际的意见有着很大的差别，这些决定、决议，就很难与俄共（布）派来的顾问统一，也就影响到中国共产党内的统一。所以在5月的中央扩大会议以后，分歧更尖锐起来。

中共广东支部与国民党中央直接打交道，在国民党掌握政权的地区开展工作，俄共（布）中央派来的国民党顾问鲍罗廷对中共广东支部的影响很大。1924年7月15日，中共广东支部就鲍罗廷的报告作出决议，决议称：会议确认鲍罗廷同志就我们党在国民党队伍中的工作问题作出的实际结论是正确的。会议认为，

迄今为止国民党在自己的实际活动中还没有完全放弃第一次代表大会通过的行动纲领。现在还可以利用合法的方式在广大劳动群众中进行工作，以便深化国民革命运动，加强工农潮流。会议认为在准备可能退出国民党的问题上，我党实际上走上一条不正确的道路，没有意识到自己在中国现时条件下应起的作用。

就在此时，国民党右派或出版刊物，或召开会议，猛烈攻击共产党人。8月15日至30日举行了国民党中央第二次全会，右派要求“共产党员友好地退出国民党”，即开除共产党员。中派责问共产党员为什么在国民党内还要保守自己的“秘密”，要求把秘密公布于众。指责共产党中央政治局与第三国际联系是企图“垄断中国革命”。认为共产党的决议中用粗俗的、不礼貌的语言评论国民党员。提出国民党要有一个特殊的组织，能知道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对国民党的态度等等。鲍罗廷作了妥协，并擅自同意在国民党中央政治局下设立国际联络委员会，任务之一是尽力弄清共产党对国民党的态度。对此陈独秀致函维经斯基，提出这次会议对我们是很大的打击。其目的在于把中国共产党置于国民党的领导之下，或至少使中国共产党对它开放。陈独秀指出：我们必须反对这种行为。可是鲍罗廷不是出来反对，而是建议成立所谓国际联络委员会，并且拥有解决国共两党问题的全权。陈独秀指出：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绝对不同意这个建议。建议共产国际提醒鲍罗廷同国民党打交道必须十分谨慎，还要提醒他始终要同我们进行协商。

1924年10月，中共中央全会就瞿秋白同志关于广东路线的报告作出决议，决议称：“我们觉得，国际代表和瞿秋白同志在广州如何在国民党内做工作的问题上犯了一些错误。”在列举了一些事实以后，提出：“鲍罗廷同志犯了许多错误，他过高地估计了国民党中央的作用并同它达成了妥协，还有在实行自上而下对国民党的改造政策时犯的错误。特别大的错误是他支持国民

党的军事行动。”指出：“由于目前国民党中有许多反动的右派分子，而中派摇摆不定，又由于在国民党军队中是清一色来自反动右派的指挥员，没有可靠的革命力量，缺乏足够数量的革命分子在军队中做宣传工作和对它施加影响，所以国民党根本不能采取革命的军事行动。如果在这个时期我们支援国民党的军事行动，那么客观地说，这就会加强国民党中的反动派，削弱对国民革命的宣传。”

这些问题，尤其是军事问题，与其说是批评鲍罗廷，还不如说批评俄共（布）和共产国际。

陈独秀还直接写信给共产国际远东部，提出了类似的问题。

陈独秀在1924年9月7日给维经斯基的信中说到，由于5月中共中央扩大的全会决议在实践中没有很好贯彻执行，因此决定将中共四大提前举行。由于中国共产党的经济状况很严重，经费不足，许多工作处于荒废状态，召开全国20个代表的四大也没有钱。需等维经斯基到上海，才能举行。

共产国际感到了陈独秀和中共中央同鲍罗廷之间的冲突，同时认为以陈独秀为首的中共中央，从极左的立场上反对共产国际的开展中国国民革命运动的策略，因此，于1924年11月，派维经斯基到上海，以纠正中共中央的路线和调解陈独秀等同鲍罗廷之间的矛盾。

中共四大于1925年1月11日至22日在上海举行。代表20人，全国共产党员数为994人。

大会着重讨论了中国的民族革命运动问题，指出无产阶级在民族革命运动中的目的及其特性，以区别于封建阶级、资产阶级的民族革命运动，指出无产阶级是为了推翻一切民族中资产阶级资本帝国主义而参加民族运动。无产阶级参加民族运动是为了推翻全世界资本帝国主义之压迫，推翻外国的资本主义，同时也反对本国的资本主义，并且要由民族革命引导到无产阶级的世界革

命，这种世界革命性的民族运动，只可称为民族解放运动，决不是什么民族主义的运动。因此，无产阶级的政党应该知道无产阶级参加民族运动，不是附属资产阶级而参加，乃以自己阶级独立的地位与目的而参加。

大会分析了中国各社会阶级在民族运动中的趋向。指出中国资产阶级的民族运动，虽然有了多年历史，总不能逃出妥协而流产的命运，现在中国的无产阶级已开始参加此运动，并在许多实际运动中，已露出阶级的分化，不但使中国民族革命运动增加了新的力量，并且使中国民族革命运动有了新的意义。

从中国社会各阶级现状也可以看出越是上层阶级越富于妥协性。最受压迫而最有集合力的无产阶级是最有革命性的阶级。指出：现在中国无产阶级在客观上的力量虽还幼稚，而他们革命的要求及决战的心理，在最近中国民族运动中，已站在最前进的地位。因此中国的民族革命运动，必须有最革命的无产阶级有力的参加，并且取得领导的地位，才能够得到胜利。中国民族民主运动之发展，当与工人、农民及城市中小资产阶级普遍的参加为正比例。

中共中央与鲍罗廷的分歧，通过维经斯基的工作，在一些重要问题上得到统一。其中之一，就是是否应该支持国民党以广东为根据地。陈独秀在 1924 年 10 月给共产国际远东部的信中提出：国民党必须放弃广东政府。而鲍罗廷认为国民党占领广东省具有很大意义。党的四大则肯定了占领广东的事实，决议称：“南方政府所在的广东，不但是民族革命之根据地，并且已经是无产阶级最重要的工作地。”

大会总结了中国共产党对于民族革命运动政策的历史经验，指出：党的三大以后，国民党因我们的同志积极参加之努力，实现了改组大会，思想上组织上都具有了显著的进步。国民党改组大会后，我们的同志大半加入了国民党，因此，在农民、工人中，

并且在军事上得了许多实际工作的机会及能公开的做反帝国主义运动。同时因为接触了实际工作，党的幼稚也暴露出来了：大部分同志疏忽了党的三大指出的“我们以国民运动为中心工作并同时发展我们党的组织及国民运动中拥护劳动阶级利益的宣传”及“防止国民党妥协政策”之决策，出现了“左”倾或右倾的错误。“左”倾的错误，是主张继续做无产阶级的革命运动及无产阶级专政的宣传，反对加入国民党，甚至反对参加国民革命。右倾的错误比“左”倾的错误更危险，而且更普遍：（一）以为我们既然以国民运动为中心工作，便应集全力于国民党的工作，不必同时进行我们党的工作；（二）以为我们既然加入多阶级的国民党做国民运动，便只好采取劳资协调的政策，不便鼓动阶级斗争；（三）以为我们应该帮助整个的国民党，不必助长左右派之分裂。大会指出我们在民族运动中错误的倾向，确定无产阶级在民族运动中的地位与目的，是此次大会的重要的任务。

大会提出：第一，中国民族革命有两个特点：它是继续或完成辛亥革命，其内容是反对封建的经济关系，反对封建的军阀政治；同时，中国的民族运动是反对国际帝国主义。因此，中国民族革命性，是由这两个特点决定的，在历史上说，是一个资产阶级性的民主革命，在政治上是含有社会革命的种子，因为中国民族革命的特点之一是反对世界资本帝国主义，是和世界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推翻世界资本主义建设共产主义运动相联结的，所以，中国民族革命运动是十月革命后广大的世界革命之一部分。第二，民族革命胜利后，能否接着就是无产阶级的革命，是否必须经过资产阶级民主制度，必须由无产阶级在民族革命中自己阶级的革命准备至何种程度及那时的社会的客观条件决定。第三，若要民族革命运动得到较彻底的胜利，固然需要最革命的无产阶级站在领导地位，同时这领导阶级也要能够抓住被压迫的各社会阶级的力量，向共同的敌人——帝国主义及其工具（国内军

阀及地主买办阶级)——作战，才免得处在孤立地位。

大会提出，我们在国民党中的工作，已经进入一个新时期，为此决定了新的工作方针：（一）我们在国民党中工作，对于各种运动，须努力保存阶级斗争的成分。（二）我们固然承认国民党是中国民族运动中一个重要工具，然亦仅仅是一个重要工具，而不是中国民族运动的全部；因此，我们在国民党内各级党部，并且要在国民党外各社会团体宣传：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军阀政治，反对帝国主义工具之买办阶级，拥护工人、农民、一切劳苦群众之利益，指摘国民党中及民族运动中的右派对敌人的妥协，和压迫农工一切劳动平民的每个反革命事实；暴露国民党中派游移态度。（三）我们应当在思想上、组织上，尤其是在民众宣传上扩大国民党的左派；对于国民党中派，应该在具体事实上，纠正其右倾政策之错误。（四）我们固然要帮助国民党在实际运动上、在组织上发展，同时也不可忘了在国民党中的斗争，反对帝国主义的政治斗争，农工阶级的经济斗争，使其行向革命。凡是国民党政权所及之地，我们的党即应做公开的活动，每个政治问题发生，须将我们党的主张在民众中发表；对于国民党政治上妥协政策，尤其是不利于工人、农民的行动，我们必须暴露其错误，号召工人、农民群众起来反抗。（五）须使国民党明了，工人、农民自己的职业组织应该独立，而不可与政党的组织紊乱，工人、农民自己有了强固的组织，才更有力量帮助革命运动，整个的工人、农民组织加入革命运动，比工农个人加入国民党尤为重要。今后我们的党员及在我们指导之下无党的产业工人，必须有工作上的需要才加入国民党。（六）完全在我们同志指导之下的国民党各级党部应该努力宣传党员群众，使他们都有明确的左倾观念，才算是整个的左派结合。单靠感情的联络，或只是党部领袖是左派分子，那是不够的。

大会对于职工运动作出决议，指出在半殖民地的中国，工人

阶级不仅为本阶级的利益而奋斗，同时还要参加民族革命运动，并且在民族运动中须取得领导地位。但工人阶级要真能达到领导者的地位，督促其他阶级前进，自身就须有强固的组织和独立的工作，所以一方面要努力参加民族革命运动，但同时绝不要忘了自己的独立工作——职工运动。大会指出，中国的职工运动一开始便几乎完全在共产党指导之下，已经经过两个时期，在“二七”以后，中国工人几乎取纯粹的退守态度，就是南方的职工运动也几乎完全依附民族运动。这是“二七”后的第一时期。国民党的改组，影响到南方及江浙和北方的职工运动，职工运动在这一时期，由退守的地位渐进于进取的趋势。这是第二时期。北京政变之后，职工运动又有开始一个新时期的可能。在国民军领域内可以公开组织工会，其他地方也可以有公开工会的可能。这就进入第三时期。可是，职工运动公开的可能愈多，工人势力膨胀的机会愈多，帝国主义力谋摧残也愈急，军阀及资产阶级工贼的力谋破坏或利用的方式也愈复杂。因此，要处理好职工运动与民族运动的关系。

在民族革命运动的过程中进行职工运动，往往容易混乱阶级的观点，而发生种种弊病。有些地方把职工运动完全拿到国民党里，而失了自己的独立性。因此提出：（一）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唯一的指导者，要使工人阶级取得民族革命运动的领导地位，对于职工运动应当特别注意；工人阶级必须有强固的群众的独立的阶级组织，它在民族运动中才能成为独立的政治势力；然后民族运动中的领导地位，方才能有保障。（二）为在国民党中发展劳动群众的左派势力，必要时在一定区域内我们亦须领导广大产业工人群众加入国民党，使国民党特别的革命化。不过国民党组织尚未达到的工人区域内，非必要时，不必急急为国民党组织党部。民族运动中工人阶级的危险，还不在于工人加入国民党，却在于共产党在真正工人群众中没有势力及没有独立的职工

运动……

关于职工运动的策略，提出：（一）主动力争工会的公开；（二）主张工会的统一；（三）职工运动中我们应当指导群众的行动的时候，必须注意于提出的口号，使能适合当地群众的组织力量、需要及情绪，而促起群众做切实的、更进一步的奋斗；（四）工人阶级固然可以赞助资产阶级性的民族革命运动，然而不论企业家是外国人或中国人，私人或国家，进步的或反动的，工人对于他们在经济斗争里是一样的关系——便是劳动对抗资本的形势。只能使他们让步以求工人的赞助，决不能使工人受他们的影响而灭杀自己阶级的攻势。

此外，还有职工运动中共产党的政治教育及党的组织的问题；职工运动的组织问题等等。

大会通过了《对于农民运动之议决案》，指出：经济落后的中国，农业经济基础，虽经国际帝国主义长期的侵略而崩溃后，农民阶级至今还是社会的重要成分，约占全国人口的 80%。所以农民问题在中国尤其在民族革命时代的中国，是特别的重要。中国共产党与工人阶级要领导中国革命至于成功，必须尽可能地、系统地鼓动并组织各地农民逐渐从事经济和政治的斗争。没有这种努力，我们希望中国革命成功以及在民族运动中取得领导地位，都是不可能的。会议总结了近几年来宣传和组织农民的经验教训，提出了如何开展农民运动等问题。

大会还作出了关于青年运动、妇女运动、宣传工作和组织工作的决议案，修订了党章，发表了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选举了新的中央执行委员会。中央执行委员会选举陈独秀、张国焘、彭述之、蔡和森、瞿秋白组成中央局，陈独秀为总书记。

中共四大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指出无产阶级在中国民族革命运动中的目的、特性，与封建阶级、资产阶级的根本区别，以

及提出中国各社会阶级在民族运动中，无产阶级之领导地位的趋向。这是从当时的实际状况来提出问题的。中共四大是党在革命实践中遇到许多尖锐的矛盾，共产党在国民党内的的工作面临很大威胁，共产党内以及中国共产党同共产国际和共产国际、俄共（布）的代表之间存在各种矛盾的情况下召开的，大会是为了解决这些矛盾而提出了理论与实践的问题，纠正党内“左”的与右的倾向。当时党员人数不足 1000 的中国共产党，在共产国际和俄共（布）重视国民党，轻视共产党的情况下，提出解决种种矛盾的方案，突出共产党必须大力地开展职工运动和农民运动，使自己有必要的、足够的力量去实现工人阶级在民族解放运动中的领导地位，这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实事求是的，因而也是可行的。正是党的四大，统一了全党的思想，才有工人运动的重大发展，才有上海的二月工潮以及五卅运动为标志的全国反帝运动的掀起，它拉开了中国大革命的序幕。

（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著《中国共产党上海史》）

空谈泛论：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

党的五大是在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这样一个非常状态下召开的。全党期待着这次大会能清醒地判断当前局势，回答人们最焦虑的如何从危难中挽救革命的问题。可是，这次代表大会只是泛泛地进行脱离实际的空谈，没有能在党面临生死存亡的危急时刻，为全党指明出路，提供坚强有力的领导，却徒然丧失时机，坐视整个局势继续恶化。

1927年上半年，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处在严重关头。继蒋介石集团公开叛变革命后，汪精卫集团也日趋反动。我党在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的领导下，不仅不能对反革命势力进行有效的抵抗，反而企图以让步和妥协来挽救革命的失败，我国人民的大革命，面临严重危机。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就是在这种错综复杂的矛盾和尖锐激烈的斗争中召开的。

五次大会的准备

早在1926年九十月间，党中央就决定于1927年春季召开党的五大，以后又曾具体确定1927年2月举行。1927年1月，党中央收到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七次扩大会通过的《中国问题决议案》之后，多次进行了讨论与辩论，决定接受这一决议，并通过了《中央政治局对于国际第七次扩大会中国问题决议案的解

释》。这个决议性质的《解释》，第一次明确承认了“二次革命论”的错误。指出：这种错误就是死守着旧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概念，在现实的革命中以此自限，一步也不肯超过；它使“我们自第四次全国大会以来所高叫的国民革命中无产阶级的领导地位，去年第二次扩大会议以来所高叫的和资产阶级争领导权，都成了好听的一句空话”。《解释》决定：不必等五次大会而立即在实际工作中实行国际执委七次扩大会的《中国问题决议案》，并决定将这一决议案交给全党讨论；要求首先讨论国际决议所提出的根本方针和战略以决定赞否，同时讨论以下四个问题：（一）关于中国革命非资本主义的发展；（二）民主独裁制；（三）和民族资产阶级争领导权；（四）农民政纲。《解释》强调，对于国际的决议，不能够也不应当盲目的一致接受，而应使全党都能懂得其全部意义；“与其由盲目一致而到实际不一致，不如由意见不一致而得到实际一致”。这种讨论虽然由于后来的政治形势日益恶化而未能普及到全党，但仍是对五次大会的一种政治上的准备。

共产国际代表罗易的到来，加快了召开五次大会准备工作的进程。

从1926年下半年起，特别是北伐军占领武汉，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迁到武汉的前后，党的大部分四届中央委员，就陆续集中到了武汉，并于1926年底前后在武汉成立了一个中央临时委员会。到1927年3月底时，留在上海的中央委员，只剩下了陈独秀和彭述之两人。4月1日，彭述之也离开上海赴南京，并于4月7日或8日到达武汉。4月3日，共产国际代表罗易等到达武汉，谭平山、蔡和森也同时到达。从4月4日起到4月20日，在武汉连续召开了国际代表、中央委员以及湖北区委的联席会议，先后参加会议的有瞿秋白、谭平山、蔡和森、张国焘、张太雷、罗章龙、毛泽东、陈延年、苏兆征、李立三、贺昌、项

英、彭述之、邓中夏以及罗易、维经斯基、鲍罗廷等。会议经过讨论后决定：4月20日召开中央全会，4月25日召开五次大会。同时决定：驻汉口的中共中央临时委员会在10天内撤销，中央委员、湖北区委与共产国际代表联席会议成立一个常务委员会，当即选举瞿秋白、谭平山、张国焘为常务委员。会议还决定致电上海催陈独秀速来，并把中央迁到武汉；以中央名义发电报要各地代表来武汉开会。会议赞成罗易关于成立几个委员会为五次大会准备材料的建议，并通过了三个委员会的主持人名单：农民土地问题委员会——瞿秋白、毛泽东；职工运动委员会——李立三；组织委员会——张国焘。

4月16日或17日，陈独秀到达汉口，并参加与主持了18日和20日的会议。4月22日至26日期间，举行了中央全会，讨论确定了五次大会的议事日程和中央委员会向大会的报告以及大会各委员会、秘书处的名单。

大会的经过与结果

五次大会于1927年4月27日在武昌开幕。出席大会的有北方、广东、湖南、湖北、山东、山西、河南、四川、江西、安徽、上海（江浙）等11个省区的党组织以及共产主义青年团的代表共计82人（注：关于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人数，原来中央分配各地正式代表的人数是94人，即有表决权的代表。计北方10人，山西1人，山东1人，河南2人，四川2人，湖北15人，湖南14人，广东14人，江西5人，安徽1人，上海14人，青年团15人。据苏共《真理报》1927年5月8日报道也是94人；而11日《真理报》的报道又把代表分为工人11人，知识分子70人，合共80人。除了正式代表之外，还有候补代表。据知中央最初通知上海到会正式与候补代表各11人，后又通知各增

加2人。另据苏共《真理报》5月8日报道，有发言权与表决权的代表有30人。这里写的82人，是实际出席大会的正式代表的人数)。四届中央委员会的委员和候补委员，除李大钊被奉系军阀逮捕入狱，并于4月28日遭杀害之外，陈独秀、蔡和森、张国焘、谭平山、瞿秋白、李维汉、项英、彭述之、邓培、王荷波、张太雷、朱锦棠、罗章龙都出席了大会。其他出席或参加大会者，据现在看到的与考证所得的材料，还有毛泽东、苏兆征、陈乔年、陈延年、彭湃、李立三、陆沉、郭亮、易礼容、陈佑魁、邓中夏、黄锦辉、刘少奇、陈潭秋、恽代英、王若飞、李震瀛、罗亦农、张佐臣、庄文恭、杨培森、王根英、郑复他、林钧、顾顺章、黄平等人。此外，出席开幕大会的还有群众组织的代表和各方面的来宾，如由谭延闿、徐谦和孙科等组成的国民党中央委员会代表团，共产国际代表以及英国、法国、美国和苏联共产党的代表。

陈独秀首先代表中共中央宣布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并致开幕词。继之，共产国际代表罗易向大会致祝词；徐谦代表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向大会致祝词。之后，英国、法国、美国共产党的代表以及联共（布）中央委员会的代表，也先后向大会致词祝贺。出席开幕大会并致贺词的，还有中华全国总工会、全国农民协会、共产主义青年团、少年先锋队等的代表。

大会组成了政治委员会、农民土地问题委员会、职工运动委员会和秘书处。

政治委员会由13人组成，其中有陈独秀、谭平山、张国焘、瞿秋白、蔡和森、李维汉、彭述之、张太雷、苏兆征、陈乔年……等，瞿秋白为秘书。

农民土地问题委员会由10个人组成，其中有瞿秋白、谭平山、毛泽东、彭湃、易礼容、陈延年、蔡和森、陆沉……等，毛泽东为秘书。

职工运动委员会由9人组成，其中有李立三、邓中夏、苏兆征、项英、张国焘、郭亮、李震瀛……等，邓中夏为秘书。

大会秘书处由五个人组成，其中有蔡和森、张太雷、黄平等。

4月29日的大会上，陈独秀代表第四届中央委员会，作了政治报告和党的组织状况的报告。

据陈独秀的报告，到1927年4月，党已经发展到了57,967个党员。分布情况是：湖南13,000人，湖北13,000人，江浙13,000人，广东9027人，北方3109人，江西3000人，陕甘388人，河南1300人，山东1025人，福建168人，满洲380人，北满137人，安徽233人，四川200人。

党员成分：工人——50.8%；农民——18.7%；知识分子——19.1%；军人——3.1%；中小商人——0.5%；其他成分——7.8%。

党员以性别分：男党员占91.73%，女党员占8.27%。（关于五次大会时的党员数字，我们所看到的材料是不一致的。五次大会的有关外文材料中有三个数字：一个是59,140人，另一个是57,991人，陈独秀的报告是57,967人。此外，六次大会时的一份统计表则是64,000人。我们分析研究认为57,967这个数字比较接近于实际情况，同时认为这个数字也不是十分准确的。因为据一份报告材料，1927年4月，湖南的党员人数为9,099人，而不是13,000人；另一方面，这个统计数中，没有莫斯科、海参崴、德国、法国和日本等地的党员数字。在陈独秀的报告中，我们发现总计数与分省统计数不符。我们研究了另两份俄文材料的统计数，发现它们统计有河南党员1,300人，而山东的党员数不是1925人，而是1025人。这样合计恰好是57,967人。因此我们补进了河南的数字，并改正了山东的数字。）

直属中央的党的地方组织，计有八个区委和六个地委。

八个区委是：湖南区委，湖北区委，江浙区委（包括上海和安徽之沿津浦路的部分），广东区委（包括广西及福建南部等地），北方区委（包括北京、河北、吉林、山西绥远、察哈尔和热河），江西区委，河南区委，陕甘区委。

六个地委是：山东地委，福州地委，南满地委，北满地委，安徽芜湖地委，四川重庆地委。

此外，在莫斯科、海参崴、日本、法国……等地，都有我党的党员，并设有通讯处或支部。

据陈独秀的报告，共产主义青年团的组织也有了很大的发展，由党的四次大会时的 2300 余人，发展到了 35000 人，即增加了十四五倍。

党、团组织的这种大发展，是以工人、农民、学生等群众组织的广大发展为基础的。据陈独秀的报告：

在党直接领导下的有组织的工人，发展到了 2,838,791 人。计：江浙皖区 130 万人，湖北区 40 万人，湖南区 393,791 人，广东 52 万人，北方地区 1 万人，山东 5000 人，江西 13 万人，海员工人 8 万人。

在党直接领导下的有组织的农民，达到了 9,829,412 人。计：湖南区 5,204,112 人，湖北区 1,714 万人，江浙区 23 万人，广东区 120 万人，北方地区 2 万人，江西区 30 万人，河南区 100 万人，陕甘区 11.6 万六千人，安徽 3800 人，四川 37,000 人。

在党直接领导下的学生会，由四次大会时的 60 个，增加到了 420 个；会员人数达 42 万人。

陈独秀在报告中谈到的党在组织工作上的主要问题是：党中央机关很不健全，仅有 9 个中央委员，还不能经常在一起工作。经常在中央工作的只有两三个人，有时甚至只剩一个人。陈独秀说：“因此，中央自然而然就产生了独裁。”关于中央各部，陈

独秀说：四次大会后“由我来主管组织部的工作”，但后来组织部“实际上是不存在了，因为不论是我还是其他人没有在组织部里工作过”。中央宣传部也只是做了出版工作，北伐开始以后，《向导》周报的发行量增加到了5万份以上；四次大会后的两年多当中，编译出版了16种书，鼓动性小册子由9万册增加到了40万册。对于党的组织建设问题，陈独秀在报告中提出：五次大会必须选出更多的同志到中央工作，以加强党的中央；必须把支部建设成真正能进行工作的组织。陈独秀还宣布：中央计划创办一个可以容纳500人的党校，并准备于五次大会后出版一种党的日报。

4月30日大会一开始，根据大会主席团的提议，罗易首先作了题为《中国革命问题和无产阶级的作用》的讲话。然后，大会开始讨论陈独秀的报告，谭平山等三人在会上作了发言。

5月2日和3日在大会上发言的有彭述之、蔡和森、林钧、张国焘、维经斯基、李维汉、张太雷、罗章龙、陈乔年、彭湃等13人。5月3日的大会上，罗易又作了《无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讲话。罗易讲话后，陈独秀作了一个简短的发言。

汪精卫出席了5月4日的大会。会议一开始，汪精卫首先讲话，继之罗易作了题为《中国革命的前途和性质》（内容是共产国际执委七次扩大会关于中国问题决议案和国际形势）的报告。罗易报告后，汪精卫发表了第二次讲话。之后，陈独秀有一个简短的发言。随后罗易又发表了题为《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的第二次讲话，作为对汪精卫第二次讲话的回答。罗易讲话后，汪精卫又作了第三次讲话。最后是陈独秀、谭平山等人发言。

5月5日，在大会上发言的有李立三、李维汉、张太雷、张国焘……等七人，有些人是两次甚至三次发言。这一天大会的最后，罗易又以《非资本主义发展和社会主义，民主专政和无产阶级专政》为题，发表了讲话。这篇讲话，实际上是关于政治报告

讨论的总结。

5月7日和8日，大会讨论了组织问题、修改党的章程的问题和职工运动、农民土地等问题。

5月9日，大会通过了以下的决议案：《中国共产党接受共产国际第七次扩大会议关于中国问题决议案之决议》、《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议决案》、《土地问题议决案》、《职工运动议决案》、《组织问题议决案》、《对于共产主义青年团工作决议案》、《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大会宣言》。此外，在会议进行过程中的5月1日，以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名义，发表了《为五一节纪念告世界无产阶级书》和《为五一节纪念告中国民众书》。

大会决定扩大党的中央委员会并建立党的中央和省监察委员会。5月9日在通过上述决议案和宣言的同时，大会选举产生了由31名中央委员和14名候补中央委员组成的第五届中央委员会。

中央委员31人：陈独秀 李维汉 瞿秋白 蔡和森 李立三 邓中夏 苏兆征 项英 向忠发 张国焘 罗亦农 陈乔年 赵世炎 张太雷 陈延年 谭平山 周恩来 刘少奇 任弼时 恽代英 彭湃 夏曦 贺昌 易礼容 彭述之 杨之华 罗珠 罗章龙 李涤生 顾顺章 杨其珊

候补中央委员14人：毛泽东 郭亮 黄平 吴雨铭 陆沉 刘伯庄 袁达时 毛科文 陈潭秋 薛六 林育南 庄文恭 李震赢 王亚璋

大会同时选举产生了中央监察委员会。

正式委员7人：王荷波 张佐臣 许白昊 杨匏安 刘峻山 周振声 蔡以忱

候补委员3人：杨培森 萧石月 阮啸仙

选举结束后，罗易向新当选的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以及正式与候补中央监察委员发表了题为《布尔什维克的党》的讲话。

5月10日，大会宣告闭幕。

接着举行的五届中央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选出了中央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常务委员和中央委员会总书记。

中央政治局委员7人：陈独秀 蔡和森 李维汉 瞿秋白
张国焘 谭平山 李立三

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3人：苏兆征 周恩来 张太雷（这份五届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名单，原存于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档案中，是六次代表大会时统计列出的。据1927年5月10日刊登在苏共《真理报》上的塔斯社的报道，五次大会选出的31名中央委员和14名候补中央委员中各有一名女委员，这个名单则把杨之华和罗珠都列在了中央委员之中。这样，她们二人究竟谁是候补中央委员，14名候补中央委员中谁是正式委员，以及《真理报》的报道是否准确，都有待作进一步的考证。）

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陈独秀 蔡和森 张国焘

中央委员会总书记：陈独秀

五次大会根据共产国际执委七次扩大会《中国问题决议案》关于组织工作的指示，决定：（一）努力扩大党员的数量，吸收产业工人、进步农民和革命的知识分子到党的队伍中来，加强党内教育，用各种方法训练新党员。（二）把党的基础建立在产业支部上面，使所有大工厂、铁路、码头……等都有党的支部，以真正领导工人群众。（三）中央要强毅的实行集体领导，加强党内纪律，尤其是政治纪律，“其重要的先决条件，就是吸引工人到所有党部的指导机关来”。（四）党要对工会、农会、国民党和其他团体等各方面工作实行集中的指导，必须很好地组织和运用党团。（五）党要严重注意和加强对党外劳动群众的工作并指导他们；“吸收劳动群众到国民党来，乃是本党解决这些任务之一方法”。

根据五次大会“必须改正并补充旧时党章”的决定，五届中

央委员会政治局修改并于6月1日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修正章程》。这个修正章程，共有12章、85条。与以前的三个党章比较，无论是结构上还是内容上都作了较大的修改和增补，因而更加充实和完备。

五次大会后之组织建设

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后，先后逐步地建立和健全了党的中央机构和省委的组织。这里根据我们所看到的不完整不系统的材料，分别作一点介绍。需要说明的是，从五次大会后到七月底的两个半月里，人事变动十分频繁，常常是任命后还未到职又改变了决定。这种情况，反映了当时政治形势复杂多变的特点。

关于党的中央机关

中央常委——5月25日，中央决定李维汉任中央秘书长。5月底，中央常委决定张国焘去河南视察和了解情况，同时决定在此期间由周恩来代理张国焘的常务委员职务。这以后不久，常委讨论了本身增补人员的问题，并于6月3日决定瞿秋白补入常委；而由于李维汉一直未来中央任职，决定中央秘书长职务由陈乔年暂代，并催李维汉速来中央。时隔不久，代理秘书长陈乔年请求辞职，6月14日中央常委在决定陈乔年仍暂代理的同时，再次催李维汉速来中央任职。这以后，大约在6月20日前决定蔡和森兼任中央秘书长，并于6月20日决定中央常委会议由常委三人、秘书长一人组成；政治局委员有时间即可到会。23日，中央政治局讨论了政治局和常委的改组问题，但没有看到作出的具体决定。6月24日，蔡和森因病请假，中央常委批准其休息，并决定秘书长职务由张国焘兼任。至30日，中央常委又决定：邓中夏担任中央秘书长；中央常委由陈独秀、张国焘、蔡和森、谭平山和邓中夏组成。以后大约在7月7日或8日前后，中央政

治局缩小为张国焘、李维汉、李立三、周恩来、张太雷 5 人。

中央秘书厅——大约在 5 月中旬，中央常委决定王若飞继续担任中央秘书厅主任。这以后不久，王若飞奉中央常委之命赴上海办理秘书厅的有关事务。王若飞走后，常委于 5 月 29 日决定任作民暂代其职务，瞿景白、陈昭礼担任记录等工作，黄文容专任陈独秀的秘书。

中央组织部——5 月 25 日，中央常委决定张国焘任中央组织部部长。

中央宣传部——部长是谁未看到记载（但据分析当是蔡和森或瞿秋白）。5 月 22 日中央决定宣传部分科，尹宽负责宣传科工作。5 月 29 日决定五步文负责出版科工作并任《向导》周报编辑。

中央军事部——5 月 25 日中央常委决定周恩来任中央军事部部长。在此前后，常委决定并组成了 7 人参加的中央军事委员会，周恩来任军委主任。30 日，中央常委决定顾顺章加入军委；6 月 20 日又决定张国焘参加中央军事部部务会议。

中央农民部——部长谭平山，秘书任旭。5 月 14 日中央常委决定由谭平山、毛泽东、周以栗、瞿秋白、蔡以忱、任旭、罗绮园、阮啸仙、陆沉等 9 人组成中央农委。

中央工人部——5 月 30 日，中央常委讨论了中央工人部和工委的人选，决定：李立三任中央工人部部长，林育南为秘书；以李立三、林育南、苏兆征、项英、刘少奇、王荷波、许白昊等 7 人组成中央工委。

中央妇女部——部长不详。5 月 14 日，中央常委决定陈志筠任中央妇委秘书。

党报委员会——瞿秋白任书记。5 月 25 日，中央常委决定沈雁冰到中央准备出版的党的日报，随之决定其参加党报委员会，并决定张太雷、沈雁冰、汪原放等组成党报筹备委员会，指定沈雁冰为书记。6 月 13 日，中央常委讨论了党的宣传工作，

决定催瞿秋白速出版党的日报，同时指定金树成筹备创办“国民通讯社”。7月5日，中央决定日报及通讯社停办。

中央党校——5月22日，中央常委讨论了开办中央党校的问题，决定：地址在武昌；招收学员300人；半年一期。这以后不久，常委决定以张秋人、任作民、陈潭秋，另加庶务会计一人，组成中央党校筹备处，负责进行各项筹备工作。至6月23日，常委再次讨论了中央党校的筹办工作，批准了筹办预算和每月经费，并决定尹宽为副教务主任，张秋人为事务主任，7月20日开学。

各党团——6月4日，中央常委讨论了中央组织部的提议，决定了各党团以及党团书记的人选：

国民政府党团干事会由谭平山、苏兆征、林祖涵、杨匏安、吴玉章组成；书记谭平山，秘书杨匏安。

中华全国总工会党团干事会由李立三、苏兆征、林育南组成，书记李立三。

全国农民协会临时党团书记任旭。

中华全国学生总会党团书记唐鉴。

中华全国济难总会党团书记蒋毅。

6月9日中央常委决定：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团会议由瞿秋白出席，并决定李立三加入党团。

关于党的地方组织

陕西省委——5月14日，中央常委讨论决定：耿炳光任陕西省委书记；20日又补充决定：黄平万任省委宣传部长，李子洲任组织部长；李秉乾由莫斯科回来后加入省委。与此同时，决定汪泽楷调回中央另行分配工作。

顺直（河北）省委——5月19日，中央常委讨论了顺直省委的组成问题，决定彭述之任省委书记，陈为人任组织部长，李渤海任宣传部长；同时决定刘伯庄任北京市委书记，傅茂么任唐

山市委书记。这以后由于彭述之的工作分配多次变动，一直未能到职，中央常委乃于6月9日决定：在彭述之未到职以前，由刘伯庄代理顺直省委书记职务。

山西省委——中央常委于5月19日讨论决定：颜昌杰任山西省委书记，王鸿钧任组织部长，崔长顺任宣传部长。

湖北省委——张太雷任省委书记。5月14日中央常委决定：刘少奇任湖北省委工委书记兼汉口市委工委书记，并任湖北省总工会委员长。5月20日中央常委在决定刘少奇任中华全国总工会经济斗争负责人的同时，决定项英少担任工人纠察队的工作，多做湖北省总工会的工作。

东三省（奉天）省委——5月18日和19日，中央常委讨论了东北三省的工作，决定成立东三省（奉天）省委，调邓鹤皋、尹才一去奉天（沈阳），指定邓鹤皋为省委筹备委员会书记。与此同时，决定大连、哈尔滨两个地委改组为市委，奉天成立市委；吉林方面的党组织暂属奉天市委，待发展以后再成立省委。

广东省委——5月20日中央常委讨论了广东的工作和组织问题，决定：陈延年不再回广东，由彭湃、穆青、黄平另加赖玉润、阮啸仙等组织广东省委。

四川临委——6月6日，中央常委决定傅烈去四川任临委书记。

湖南省委——6月7日，中央常委批准毛泽东、周以栗去湘潭，同时决定由李维汉、毛泽东、易礼容、夏曦、郭亮、周以栗、×干臣、王则鸣、柳直荀等组织湖南临时省委，毛泽东任书记。此后不久，常委重新审议了湖南省委及其各部的组成，决定易礼容任书记，蔡以忱为组织部长，罗章龙为宣传部长，彭公达为农民部长，何资琛任秘书，夏明翰为军委主任，李子骥任秘书，编辑曹典琦。6月17日，中央常委再次讨论湖南的工作问题，蔡和森主张改组省委，仍由毛泽东任书记。但直到24日常

委才作出决定，由毛泽东、曹典琦、彭公达、林蔚、柳直荀、郭亮、易礼容、谭影竹、李植、廖如愿、袁铸石、夏明翰、潘心源、陈佑魁、何资琛、殷美琮、熊季光等 17 人组成省委，以毛泽东、何资琛、夏明翰、李植、林蔚组织常委，毛泽东任书记。

山东省委——中央常委于 6 月 13 日讨论批准成立山东省委，指定吴芳为省委书记。

河南省委——6 月 14 日中央常委决定汪泽楷去河南省委工作，继之又于 18 日决定其与在河南的罗亦农对调。

江西省委——中央常委于 6 月 24 日决定调薛世伦、夏曦到江西工作。

江苏、上海——没有看到中央专门讨论和任命江苏、上海党组织和人员的材料。仅知道以下片断情况：5 月 14 日决定顾修、盛松林到上海工作；19 日决定调吴雨铭到上海工作；25 日在讨论了上海要求派人的问题之后，决定袁达时派赴上海任上海总工会工作。至 6 月 13 日，决定将赵世炎调出江苏省委，随之又决定暂留。至 30 日又决定郭亮调上海代赵世炎，催易礼容、夏曦等来汉调上海工作。

从两党联席会议、参加政府到全面破裂和大革命的失败

开两党联席会议，最初是国民党于 1925 年底或 1926 年初提出的。1926 年 2 月中央北京特别会议讨论后拒绝了这一提议。参加政府问题，在北伐以前，是有可能也没有必要的。北伐开始以后，由于对北伐的性质和意义缺乏正确、足够的认识以及避“包办”之嫌……等原因，陈独秀和党中央的方针是“处处保持在野党的地位”。因此当北伐军占领江西，我党一些同志如涂振农等被群众拥戴为县长时，陈独秀和党中央认为是“腐败堕落”、“机会主义做官热”，下令“严厉取缔”，并以处分甚至“断然开

除”，“限期命令”退出政权。

共产国际执委第七次扩大会议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案》，批评了党内存在的退出国民党的主张，要求进一步密切同国民党的合作关系并参加国民政府。党中央接受了这一决议。之后，在武汉召开的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于1927年3月13日通过了《统一革命势力案》和《国民政府增设各部案》。《统一革命势力案》要求中国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两党联席会议“立时开会”，并提出：为了共同担负政治责任，共产党应派负责同志加入国民政府及湖北省政府；同时决定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汪精卫、宣传部长顾孟余、农民部长邓演达、工人部长陈公博、青年部长孙科，为国民党方面出席两党联席会议的代表。我党随后决定的两党联席会议出席人是陈独秀、瞿秋白、谭平山、张国焘等人。6月14日，中央常委讨论了与国民党谈判的问题，决定以后常委讨论两党关系和谈判问题，谭平山、李立三要参加会议；两党谈判之我党出席人为瞿秋白、陈独秀、谭平山、蔡和森、张国焘、李立三、张太雷等。至6月30日，中央常委又讨论了两党联席会议问题，决定每周两次的两党联席会议，一次由陈独秀、瞿秋白、张国焘三人出席，另一次只瞿秋白、张国焘出席，陈独秀缺席。两党联席会议大约到7月5日前后停止。

《国民政府增设各部案》决定增设劳工、农政、教育、实业和卫生五个部，并规定“人选问题，由政治委员会决定”。大约在3月下旬或4月上旬，经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提名，我党中央同意，谭平山出任国民政府农政部部长，苏兆征出任劳工部部长，并分别于5月20日和5月30日举行仪式正式就职。

然而也正是在这时，政治局势急剧逆转：夏斗寅、许克祥先后发动叛乱，继之冯玉祥、唐生智也开始反共，汪精卫也于6月中旬散布所谓共产党利用群众和军人反对政府，以及他要“辞职”和把国民政府搬到河南等等。6月20日前后，汪精卫更进

一步直言不讳地说他已不再相信共产党，要把国民政府改组为纯国民党左派的政府，并要召开国民党第三次代表大会改组国民党中央。在此前后，武汉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的政策也急剧地走向反动，工农等群众运动受到愈来愈多和严重的扼制与镇压，我党内部在政策上的分歧也日益加深，谭平山遂向汪精卫谈话提出辞职，并向党中央写信，请求辞去所任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的职务，并说明如果这会造两党关系紧张，就只辞农政部长职，暂不辞职国民党中央主席团（或政治委员会）委员职务。6月23日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讨论了谭平山的辞职问题，陈独秀认为这不是谭平山个人的问题，如果辞职，就不可能和国民党很好的合作；而且我们也不能轻易放弃这些位子，谭平山与汪精卫谈话提出辞职是错误的。作为中央政治局委员，谭平山在与汪精卫谈话前，应先提到政治局讨论。会议最后认为谭平山应继续留任。之后不久，大约在6月27日前后，谭平山向国民政府请病假，两党关系进一步恶化。7月13日，我党发出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对政局宣言》，在指责武汉政府反人民的政策并宣布对此不负责任的同时，宣布撤回参加国民政府的共产党员。7月15日，武汉国民党中央摒除任国民党中央委员的共产党员开会并决定反共，苏兆征宣布辞职，随之发表了《谭平山、苏兆征辞职书》。7月24日，党中央对内发出了《对于武汉反动时局之通告》，要求各地党组织领导工农群众，采取各种形式，反对武汉政府的反动政策，并指示将党的组织转入秘密状态。

至此，中国共产党与中国国民党的第一次合作全面破裂，中国第一次人民大革命终于失败。它宣告了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一个旧的阶段的结束，同时，也标志着这个革命进入了一个由中国共产党独自领导的新的历史时期。

（赵朴：《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六）——五次大会前后》）

风雨星火：八七会议

1927年8月7日在武汉召开的中共中央紧急会议，纠正了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错误，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起义的方针，在危急关头挽救了革命、挽救了党。毛泽东在发言中批评陈独秀放弃无产阶级领导权的错误。他把国民党比作等着人家去住的新房子，而党的领导人以为国民党是人家的，其后像新娘子上花轿一样，勉强挪到这所空房子去了，但始终没有当房子主人的决心。

八七会议前武汉的局势和党的情况

当我们问：八七会议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召开的？陆定一同志说：八七会议是在党和革命的危急关头召开的。国共合作进行的北伐战争，取得了重大胜利。但国民党内部情况复杂，右派是反对和共产党合作的。作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的蒋介石，起初还是以“左派”的面貌出现，中山舰事件、在江西惨杀工会领袖陈赞贤，特别是四一二政变以后，蒋介石彻底暴露了他的反革命面目，实行白色恐怖，党和团在上海的活动都很困难，很多同志转移到了武汉。这时国民政府已由广州迁到武汉，武汉成了政治中心。国民政府主席汪精卫表现上和蒋介石有分歧，实际上他们已暗中往来，排斥共产党。陈独秀仍然推行他的右倾机会主义路

线，反对农民运动，反对搞自己的武装，把革命的领导权拱手让给国民党，党内同志意见越来越多。武汉政府对于如何统治武汉拿不出主张，工人要求增加工资，减少工作时间，可是资本家由于战争的原因，周围各省原料不能运来，产品销不出去，面临着经济困难的局面。我们党缺乏经验，也拿不出办法来。4月底到5月初，党召开五大，批评了陈独秀的错误，通过了实行土地革命的决议，仍选举陈独秀为总书记，希望他改正错误。但是决议不能实行，这次大会实际上没有解决任何问题。6月下旬，党在武昌东湖召开会议，许多同志对党的路线提出意见。在这次会上，任弼时同志（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团的总书记）和我（团中央委员、宣传部长）起草了一份“政治意见书”，对党推行的错误路线提出批评。陈独秀一看，气得当场撕掉，踩在脚下。后来陈独秀就攒纱帽不干了。

7月上旬，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讨论如何对付这种局势，同时组成张国焘、张太雷、李立三、李维汉、周恩来五人的常委会。7月13日，党中央发表对时局的宣言，这个宣言只是指出武汉政府限制工人运动，放任反动派向革命进攻，使国民革命陷于危境，还没有公开点名谴责汪精卫。虽然宣告撤回参加国民政府的共产党员，但仍声明共产党员继续留在国民党内，同真正的革命分子进行反帝反封建的斗争。这个宣言是我们党的路线、政策开始转变的一个重要标志。当时我并不知道是怎样作出这个决定的，后来才了解这是共产国际和斯大林的主张。宣言发表的第二天，即7月14日，汪精卫加紧了反革命活动。他召开秘密会议，策划“分共”。7月15日，又召开了“分共会议”，正式宣布和共产党决裂，公开背叛国民革命。善于搞阴谋诡计的汪精卫，于7月25日发表了他那臭名昭著的《夹攻中的奋斗》一文，竟把分裂的责任推给共产党。

当时我们还想争取国民党中真正的左派同汪精卫对抗，但七

一五事变后不久，宋庆龄即离开武汉到上海，宣布在国民党现行政策不改变之前，决不参加任何活动，后来又出国到苏联去了。邓演达也离开了武汉。汪精卫反革命以后，他的屠刀即向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和革命群众杀来，武汉三镇一片白色恐怖，党、团和赤色工会都不得不转入地下。

周恩来同志领导南昌暴动的消息传到武汉，我们异常兴奋。留在武汉的同志怎么办呢？同志们一直在等待中央的指示。8月6日，任弼时同志通知我，明天去参加中央的一个重要会议。开的是什么会，讨论什么问题，他都没有向我说明。我想，既然是中央的重要会议，一定会对当前的局势作出重大决策，今后的斗争方向就明确了。这一夜我思绪万端，久久不能入寐，巴不得快一点天亮去参加会议。

八七会议开会的过程

我们问：八七会议是一次重要会议，虽然已经过去50多年了，您一定还有印象，请您谈谈开会的过程好吗？

陆定一同志说：8月7日早晨，我按照通知来到汉口三教街41号（现在鄱阳街139号）。这个地区住了许多外国人，有个惠罗公司，是一家洋行，专卖高级消费品，价格很贵，中国人很少去买它的东西。街上往来行人很少。街上有一列公寓式楼房，建筑形式完全一样。一楼是铺面房子，和二楼是隔断的，从临街雨廊直接上楼梯就到二楼。这里是我们的机关，住着苏联农业顾问洛卓莫夫夫妇。我看了后面没有人跟踪，才由雨廊上了楼梯。到了二楼敲门，来开门的是洛卓莫娃，她是我们机关的管理人员，我们戏谑地称她的谐音“老祖母”，其实她才30来岁。她认识我，很快放我进去了。会场很小，大概只有20多平方米。陈设也很简单，只有一张三屉桌子和一些椅子、凳子。会场里已有不

少人，有当天到的，也有两三天前由“交通”带进来的。当时白色恐怖很厉害，如果敌人发现，很可能被一网打尽。因此会议也作了应付万一的准备，倘若反动军警闯进来，我们就说是在开股东会议。

在我记忆中，参加会议的有十几个人，20人不到。前不久看到会议记录，才知道出席的代表共21人。其中：

中央委员10人：罗迈（李维汉）、瞿秋白、张太雷、邓中夏、任弼时、苏兆征、顾顺章、罗亦农、陈乔年、蔡和森；

中央候补委员3人：李震瀛、陆沉、毛泽东；

中央监察委员2人：杨匏安、王荷波；

共青团中央委员3人：李子芬、杨善南、陆定一；

湖南代表1人：彭公达；

湖北代表1人：郑超麟；

中央军委代表1人：王一飞。

邓小平同志是中央秘书，他负责筹备并参加了这次会议。此外还有共产国际代表罗明纳兹。记录上说参加会议的还有两个苏联同志。在我印象中，会场上没有别的苏联人，“两个苏联同志”大概是指洛卓莫夫夫妇，但我只见到“妇”，未见到“夫”。

因为事隔多年，我已记不清是谁作的记录。听说有人怀疑这份记录的真实性，也有人说是为了向共产国际作报告而在事后追记的。我看到记录后，觉得它的真实性无可怀疑，是当场记的，不是事后的追记。

会议由李维汉同志主持，他简略讲了中央的一些情况，如上面说的成立五人常委会，鲍罗廷已经回国，共产国际派罗明纳兹来担任驻中国代表（鲍罗廷只是同国民党联系的，在我们党的会议上，我从来没有见过他）。李维汉同志还说，共产国际来了“训令”，指出中国党内有机会主义，应召开紧急会议来清算这个错误倾向，并改组中央，等等。他也说明这次会议是由瞿秋白、

张太雷、李维汉和罗明纳兹一起筹备的，原定7月28日召开，因为通知开会困难和来不及准备报告，才延期到8月7日。直到今天，到会的中央委员还不到半数，地方党组织只有湖北、湖南有代表参加，因此会议不能称为中央全会，而是紧急会议。他宣布会议的议程是三项：一、共产国际代表报告；二、常委代表报告，报告人为瞿秋白；三、改组中央政治局。

接着，罗明纳兹作了长篇报告，瞿秋白担任翻译。罗明纳兹只有30岁左右，侃侃而谈，颇善于辞令。因为要经过翻译，他的报告占去很长时间，几乎是一个上午。

中午，洛卓莫娃为大家准备了午餐，吃的是面包和午餐肉罐头，一个罐头有好几斤重，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大的罐头，因此印象很深。记不得有什么饮料，大概只是喝茶或开水吧。吃完午饭只休息半小时左右，又继续开会了。

下午首先讨论罗明纳兹的报告，然后瞿秋白代表常委会作报告。接着讨论《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告全党党员书》、《最近职工运动议决案》、《最近农民运动的议决案》和党的《组织问题议决案》等文件。这些文件都没有成文，只由主持人讲一讲大意和读一读稿子，即交代表表决。自从四一二以后，党内多次讨论土地革命、武装斗争以及和国民党的关系等问题，常常是议而不决，决而不行，党的五大就土地问题作出决议，也没有见诸行动。这段时间里，我们简直是束手无策。这次会议制订了这些文件，指出了斗争的方向，可以说是很丰硕的成果了，当然还要看是否能真正实施。因此讨论常委报告和文件时，没有发生分歧意见，很快就通过了，然后由常委去作文字修改。

会议最后是选举临时政治局成员。当选为政治局委员的9人是：苏兆征、向忠发、瞿秋白、罗亦农、顾顺章、王荷波、罗迈、任弼时、彭湃；候补委员7人是：邓中夏、周恩来、毛泽东、彭公达、张太雷、张国焘、李立三。有的书上写，八七会议

撤销了陈独秀总书记的职务，这不是事实。会议没有作出撤销陈独秀职务的决定，在批判右倾机会主义路线时，也很少点陈独秀的名，因为他还是共产党员，大家仍希望他能改正错误，继续在党内工作。

八七会议只开了一天，散会时天还没有黑。为了安全，每隔半小时左右才出去一个人。我是离开得早的，出了门太阳还没有下山。有的同志则是第二天或第三天离开的。

八七会议怎样批判右倾机会主义及 确定土地革命和武装斗争的总方针

我们问：八七会议是怎样批判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的，怎样确定土地革命和武装斗争的总方针的？

陆定一同志说：八七会议对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进行了激烈的批判。罗明纳兹的报告中，一开始就指出陈独秀犯了不要农民、只要资产阶级、放弃无产阶级领导权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他说，陈独秀违反共产国际的指示，为了拉住资产阶级，对国民党让步，使我们党失去独立性，以致现在国民党赶跑我们，杀戮我们。陈独秀的理论和实际行动是“少数派的”（即“孟什维克的”）、“不革命的”和“社会民主党的”。

毛泽东同志在发言中用很生动的事例批评陈独秀放弃无产阶级领导权的错误。他把国民党比作等着人家去住的新房子，而党的领导人以为国民党是人家的，其后像新娘子上花轿一样，勉强挪到这所空房子去了，但始终没有当房子主人的决心。群众中也有不听中央命令，抓住国民党下级党部，当了房子的主人翁的，但这是违反中央意思的。广大党内的群众要革命，党的领导机关却不革命，实在有点反革命的嫌疑。

其他同志也尖锐批判右倾机会主义。蔡和森很激动地说，陈

独秀是以几个国民党上层领袖的意志为转移，一味退却，一直反对所谓“过火”行动，简直和国民党一样。他还提出家长制非打倒不可。邓中夏、任弼时同志发言时也很激动，集中批评陈独秀不发动群众、不实行土地革命的错误。这些批评都切中要害。可以说，八七会议是对右倾机会主义一次猛烈的开火，宣告陈独秀路线的结束，这在我们党的历史上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这是八七会议的第一个功绩。

第二个功绩，是确定土地革命和武装斗争的总方针。这个方针并不是八七会议首先提出来的，早在1926年11月召开的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七次扩大会议上，就曾指出土地革命问题是中国的“中心问题”，批评中国党内有人“担心农村阶级斗争的尖锐化会削弱反帝统一战线”的观点。斯大林也说过：“把中国农民卷入革命愈迅速愈彻底，中国反帝国主义的战线就愈有力愈强大。”中国共产党“应当满足农民最切身的要求”。因此党的五大把减租减息的政策推进到没收大中地主土地的政策。但是陈独秀拒绝执行。党内对土地问题进行多次讨论，总是没有真正的行动。

八七会议上，罗明纳兹强调：“目前中国已进到土地革命时期。土地革命可以引导中国到另一个新阶段。”尖锐批评过去党的政策是反工农的，是可耻的。瞿秋白在代表常委会的报告中也指出：当前“土地革命已进到最高点”；要通过组织农民暴动来实行土地革命。任弼时同志尖锐地批评党中央没有实行土地革命的决心，甚至创造一种理论说土地革命是很长远的过程，而不知道是目前的行动纲领。八七会议通过的《告全党党员书》，明确指出了“土地革命问题是中国资产阶级民权革命中的中心问题”。确定土地革命为我们的总方针，不论从理论上和当时的实际情况来说，都是完全正确的。因为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根本问题是农民问题，不实行土地革命，就不能完成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任务。同时，大革命失败后，我们已很难在城市活动，必须转移

到农村，如果不发动农民实行土地革命，就没有群众基础，甚至没有立脚之地。

关于武装斗争问题，罗明纳兹在报告中没有明确提出。瞿秋白只是说到要组织农民暴动来实行土地革命。对这个问题讲得比较透彻的是毛泽东。他说，从前我们指责孙中山专做军事运动，不做民众运动；我们恰恰相反，不做军事运动，专做民众运动。蒋介石、唐生智都是拿枪杆子起家的，我们却不管军事，新的政治局应当注意军事问题。会议确定要举行湘、鄂、粤、赣四省秋收暴动。毛泽东同志强调秋收暴动非军事不可，“须知政权是要由枪杆子去取得的”，这句话发展成为后来的“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这个著名的论断。这是毛泽东同志高瞻远瞩、胜人一筹之处。

但是，会议对武装斗争的战略问题并没有认真讨论过，大家的想法只是要像孙中山那样，在广东建立根据地，然后进行北伐，还没有农村包围城市的思想。这是因为会议虽然提出土地革命和武装斗争是我们的总方针，实际上党的工作重心还没有放在武装斗争上面，城市中心论的错误观点没有受到批判，党内多数领导同志也缺乏武装斗争的经验。直到毛泽东同志的《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等重要文章发表，才有了系统、完整的武装斗争的战略策略思想。尽管如此，当时确定了武装斗争的总方针，仍然有重要意义。没有军队，就不能保护自己，更谈不上发展革命力量了。回想在我们党60多年的历史，大革命时期需要军队，陈独秀不要军队；土地革命时期需要农民，王明不要农民，说什么山沟里出不了马列主义；解放后进行社会主义建设，需要知识分子，我们党对知识分子实行“左”的政策，这些做法使我们的革命和建设受到严重的挫折，这都应引以为鉴戒。

如果没有陈独秀推行右倾机会主义路线，革命能不能成功

呢？恐怕也未必成功，因为当时我们还没有完善的革命理论，全国人民对国民党反动本质的认识还不深刻，我们也缺乏坚实的群众基础，并不像 1949 年那样，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已经瓜熟蒂落、水到渠成。但是，如果当时我们党掌握了领导权，能深入发动群众，又有一支党领导的实力强大的军队，足以和国民党较量，国共分家时国民党就不敢那样欺侮我们，我们的同志和许多革命群众就不会那样手无寸铁、处于引颈受戮的境地。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给我们党造成了危害，这个教训是应该永远记取的。

八七会议在理论上的错误及其对革命实践的影响

我们问：八七会议功绩巨大，这是无可置疑的，但它决议中的某些观点并不都是正确的，能谈谈您的看法吗？

陆定一同志说：八七会议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同时，却为“左”倾错误开辟了道路，主要是对中国的资产阶级作了不正确的判断和提出所谓“不断革命”。

四一二事变发生后，共产国际认为“中国资产阶级背叛了反帝斗争”。斯大林也说：“蒋介石的政变表示民族资产阶级退出革命。”七一五事变后，他们又都认为小资产阶级上层也叛变革命了，这些观点当时我们党是接受的。八七会议上，罗明纳兹不仅接受这些观点，而且走向了极端。他在批评陈独秀放弃领导权、把阶级斗争同国民革命对立起来的同时，强调中国资产阶级现在已经反动了，“打击资产阶级愈厉害，阶级斗争愈剧烈，就愈能打倒帝国主义”。甚至主张把反对资产阶级作为革命的首要任务。瞿秋白在报告中也说“中国资产阶级一点民权性也没有”，实际上是代表常委会接受了罗明纳兹的观点。会议通过的《告全党党员书》，更是明确指出：“民族资产阶级离开了国民革命的战线而走入反革命的营垒。”这些观点都是错误的。产生这一错误的原

因，首先是对革命的性质、对象、任务不清楚。我们进行的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对象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资产阶级有买办资产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之分。买办资产阶级是依附帝国主义，并和封建势力勾结的。它也是革命的对象。而民族资产阶级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矛盾并没有解决，他们的处境没有任何变化，整个民族资产阶级都背叛了民主革命，这怎么可能呢？其次是对蒋介石、汪精卫的阶级属性弄错了，“四一二”和“七一五”以后，蒋介石和汪精卫已不是民族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上层的代表，而转化成为大地主和大资产阶级的代表。我们依然用老眼光看问题，因而作出了整个资产阶级都背叛革命的判断。当时确实有一部分资产阶级代表人物跟着蒋介石、汪精卫跑，骂我们共产党。这是因为他们幻想蒋介石能统一中国，使中国获得独立的地位，可以发展资本主义。并不是所有民族资产阶级都倒向蒋介石一边。五卅惨案特别是九一八事变以后，民族资产阶级中许多有识之士，对蒋介石的幻想破灭，他们也反对蒋介石了，杨杏佛、史量才公开反对蒋介石的反动统治，就是有力的证明。当时我们都没有这种认识。

造成这一错误最重要的原因，是当时我们党还在幼年时期，理论水平不高。从全党来说，对中国革命这一基本问题的认识，还是教条主义地照抄列宁在1905年写的《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的观点。列宁在这篇文章中认为俄国当时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反对沙皇制度的是三种力量：自由派大资产阶级、激进的小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资产阶级赞成革命是不彻底的……不可避免地会大批转到反革命方面，转到专制制度方面去反对革命，反对人民。剩下的只有‘人民’，即无产阶级和农民。”列宁曾批判那种为了使资产阶级不退出革命而迫使无产阶级采取温和柔顺的态度，指出无产阶级的任务是“应当实现社会主义，这就是要把居民中的半无产阶级群众联合到自己方面来，

以使用强力打破资产阶级的反抗，并麻痹农民和小资产阶级的不稳定性”。那时列宁的这一著作还没有中文译本，瞿秋白可能从俄文本中看到过。尽管我们党内许多同志没有看过，但是我们党是以它作为领导革命斗争的理论基础的。俄国和中国的社会性质不同，列宁所指的资产阶级是沙皇俄国的资产阶级，而不是中国这样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资产阶级，我们没有认识，不能加以区别，生搬硬套，这就不可避免地要犯错误了。

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都叛变了革命，这就产生了一个大问题，中国革命的性质究竟是什么？是民主革命还是社会主义革命？八七会议虽然接触到这个问题，但谁也没有说清楚，甚至是自相矛盾的。比如罗明纳兹作结论时，谈到中国革命的性质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但他又把资产阶级作为革命的首要对象。后来他又说什么中国革命“不只是按其政治内容来看，而且也按其社会经济内容来看，都已超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瞿秋白在报告中指出“要去掉以为中国革命分两阶段的幻想”，也就是把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毕其功于一役”。这和罗明纳兹的观点是一致的。会后不久在中央政治局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任务与策略决议案》中，则提出“无间断革命”即“不断革命”这个问题，这就混淆了革命发展的阶段，造成了党内一部分思想的混乱。我说“一部分”，是指我们党对于基本群众——工人和农民始终认为是革命的动力，这一点从来没有动摇过；而对于资产阶级甚至小资产阶级上层，则把他们看成是敌人，不能分清民主革命中的敌、我、友。这种错误观点一直沿袭了一个时期，影响很大。党的六大功绩之一是提出了十大纲领，肯定中国革命的性质是民主革命，敌人是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统一了思想，这在全党起了很大的作用。但是六大没有对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叛变革命的说法进行批驳和分析，看来当时我们党和共产国际都没有应有的水平来做这件事。因此，这种思想影响在党内许多人的脑

子里没有得到清算，没有正确地解决，成为一种“潜意识”，这恐怕是后来许多次“左”倾错误的根源。关于中国资产阶级的问題，直到抗日战争时期，才由毛泽东同志在《新民主主义论》中作了完整、系统的理论上的阐述。他在这篇文章中说：“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是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资产阶级，是受帝国主义压迫的，所以，虽然处在帝国主义时代，他们也还是在一定时期中和一定程度上，保存着反对外国帝国主义和反对本国官僚军阀政府……的革命性，可以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反对他们所愿意反对的敌人。这是中国资产阶级和旧俄帝国的资产阶级的不同之点。在旧俄帝国，因为它已经是一个军事封建的帝国主义，是侵略别人的，所以俄国的资产阶级没有什么革命性。在那里，无产阶级的任务，是反对资产阶级，而不是联合它。在中国……无产阶级的任务，在于不忽视民族资产阶级的这种革命性，而和他们建立反帝国主义和反官僚军阀政府的统一战线。”从而使这个问题得到彻底的解决。

此外，八七会议没有指出中国革命处于暂时的低潮，而认为是持续高涨，形势一直是好的；对于党的领导成员，过分强调工人成分，这也都是“左”的表现。

总之，回顾八七会议，它在我党历史上是有重要功绩的，这是主要方面；缺点、错误也是有的，是次要的。

（陈清泉：《陆定一谈八七会议》）

聚会在异国他乡：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

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唯一的一次在国外召开的全国代表大会便是党的六大。这次大会是在苏联的首都莫斯科召开的。会议认真总结大革命失败以来的经验教训，在一系列存在严重争论的有关中国革命的根本问题上作出基本正确的回答，在党内思想十分混乱的情况下大体上统一了全党的认识。

由于国民党统治下的白色恐怖太严重了，而党又迫切需要有一段比较充裕的时间和安定的环境来认真总结一下大革命失败以来的经验教训，研究并部署今后的工作，所以，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决定在苏联的莫斯科召开。

六大的召开，经过了将近一年的酝酿和准备。会议的主题是要总结大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特别是八七会议以来党的工作，制定党在新时期的路线、方针和政策。

会前不久，1928年6月9日左右，斯大林在莫斯科市内的一个大楼里，接见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瞿秋白、向忠发、周恩来、李立三、邓中夏、苏兆征等都参加了。斯大林主要谈了两个问题：一个是中国革命的性质，一个是革命的高潮与低潮。这正是六大所要解决的两个带根本性的问题。斯大林指出：中国革命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不是“不断革命”，也不是社会主义革命，并以俄国的二月革命为例来作了说明。他又说：现在的形势

不是高潮，是低潮。这个问题引起了辩论。李立三说：现在还是高潮，因为各地还存在工人、农民的斗争。斯大林回答说：在低潮时也有几个浪花。斯大林这些看法是正确的。他的谈话，使大会有了明确的指导方向。

14日和15日，布哈林以共产国际代表的身分，召集了一次“正当谈话会”。布哈林提出三个问题，要求到会者发表自己的意见。这些问题是：一、关于当前革命形势的估计；二、关于过去的经验教训即党的机会主义错误问题；三、党在今后的任务和方针。中国党出席谈话会的有瞿秋白、苏兆征、周恩来、蔡和森、李立三、项英等21人。这实际上是六大的一次小范围的预备会议。

17日下午，由周恩来主持召开各省代表团书记联席会议，初步通过了大会主席团和秘书长、副秘书长名单。当晚，举行大会预备会议。

6月18日，党的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莫斯科郊外的一所旧式庄园里召开。出席大会的有正式代表84人、候补代表34人，代表党员4万多人。周恩来担任主席团成员和大会秘书长。瞿秋白致开幕词，共产国际和其他国家共产党的代表致祝词。19日，共产国际书记布哈林作报告：《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的任务》。20日，瞿秋白代表第五届中央委员会作政治报告：《中国革命与共产党》。然后，分组讨论这两个报告。讨论进行得十分热烈，主要集中在中国革命的性质、任务、要不要进行合法斗争、革命的高潮与低潮等问题上。

讨论政治报告时，周恩来在6月27日作了长篇发言。在这段时间里，他显然已想了很多。他的发言一开始就说：这次大会讨论的目的，是为了使同志们回去不再发生错误和误解，在工作上得到很好的结果。所以，“我们并不要重在个人的对与不对，我们并不以个人错误或误会为批评的重心”，而是要使问题都得

到明白的解答，使大家都了解正确的路线。

对革命性质问题，他同意中国革命仍然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并且分析党内一些同志混淆革命性质的原因说：“五次大会以后，大家还是把革命任务与革命动力混为一谈。”抱有这种看法的同志以为既然是工农革命，那就不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了。于是，产生了没收一切土地的口号和其他超越革命阶段的观点，甚至连工厂要归工人、车子要归车夫这些不恰当的口号都有人提出来。周恩来说：“这都是不懂革命性质的结果。”

对革命形势问题，他特别注意到革命发展的不平衡：“以地方言，南部与中部、北部的不同；以阶级言，农民发展与城市沉闷不相配合。”他改变了原来认为中国革命潮流仍是高涨的看法，明确地说：我们不必在名词上去争论，总之，“现在不像五卅或北伐时代那样的高潮和高涨”。同时，他又说：“我们虽然不能说是高潮，的确也说到高涨，但我们相信革命是前进（的），是向高潮、高涨方面的前进。”在谈到党的主要任务时，他要求争取千百万群众，促进革命高潮的到来。显然，他这时对中国革命的认识比六大召开以前已有了很大提高。

他在这次发言中特别强调：由于中国革命的不平衡性等原因，证明中国革命有割据的可能。“对于南中国的几省中，在目前就应该开始割据局面的准备，因为这与全国的准备工作是有极大的关联。同时，我们要组织广大群众于苏维埃口号下，以总暴动来实现苏维埃政权。”当全党还把城市工作放在中心地位的时候，他的这种认识虽还不够明确和系统，仍是十分可贵的，是十分值得注意的。

会议期间，周恩来的工作异常繁重。作为秘书长，他主持会议的全部日常工作。大会成立了十个委员会，他参加了其中的七个，并担任组织委员会和军事委员会的召集人。随后，又参加新成立的湖南问题、湖北问题、南昌暴动、广州暴动四个专题委员

会。他精力充沛，工作有条不紊，行动敏捷，处事果断，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在会上，他还充当了两个重要问题的报告人：组织问题报告和军事报告。

6月30日，他向大会作了组织问题的报告。报告回顾了一年多来的政治环境和党的组织状况。指出：自从蒋介石、汪精卫相继背叛革命以后，“中国的白色恐怖可以说是全世界历史上所绝无而仅有的残酷”。在这个时期内，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被杀害的约有31万至34万人，还有4600多人被监禁着。工会、农会和其他群众团体遭受严重的摧残。全国的工会组织由734个锐减到81个，而这些工会都是秘密的，群众也很少。但就在这种严酷的环境中，共产党人仍然进行了英勇的反抗，并把力量重新集合起来。在农村中，建立了苏维埃政权。一些地方的党组织在遭受破坏后，又重新恢复了。这是近一年来艰苦工作的成果。

党在今后的组织任务是什么呢？周恩来在报告中把党和群众的关系问题突出地提出来，把争取群众作为工作的中心点。他说：“革命的先锋——中国共产党有隔离群众和削弱的危险，虽革命已走入一个新的阶段，党内外组织也开始了一种新的结合，但实际上这种危险还很大，我们必须在国际决议指示下，在组织上巩固自己的政治影响，建立和发展工农革命的组织，并发展党的组织，使党真能成为群众的斗争的革命党。”

这时，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指导思想出现了一种错误倾向：因反对机会主义而变成反对知识分子。在会上，瞿秋白和张国焘发生激烈的争论。布哈林在大会的报告中责备张国焘和瞿秋白，说他们是“大知识分子，要让工人干部来代替他们”。周恩来在报告中特别指出：党在组织上的错误倾向之一是“反知识分子的倾向，我们对知识分子应用无产阶级的方法去使知识分子无产阶级化”。

在周恩来作了组织问题的报告后，瞿秋白、张国焘、项英、王若飞等十人在大会上就这个问题作了发言。周恩来最后作了结论。

7月3日，周恩来又向大会作了军事报告，刘伯承作补充报告。

周恩来在这个报告中肯定了大革命时期党在军队政治工作中所取得的成绩，同时也指出，在当时军事工作中存在着一个根本性的错误观念：为了联合战线，不能破坏国民革命军，而要帮助国民党巩固国民革命军。“这种巩固国民革命军的工作方针，就是根本取消了我们自己独立的军事工作的意义。”结果，“没有尽力发展工人纠察队，没有将农村中的农军发展起来，来做夺取乡村政权的力量”。一旦蒋介石叛变，革命便遭受严重的挫折。南昌起义失败后，又产生了另一种偏向：抹杀一切军事工作，反对一切军事准备，军事技术的训练，都目之为军事投机。由那一极端直趋到这一极端，事实上将取消军事工作。

周恩来在报告中专门谈了建立红军的问题。他说：建立红军的原则，一是要把旧军队的雇佣性质加以改变，可先采取志愿兵制；二是军官不一定非工农分子不可，但一定要无产阶级化；三是红军一定要有政治工作。红军建立后，不是保守在一个地方，而是要移动的，这与赤卫队的常在一起是不同的。红军要帮助苏维埃政权的发展。他还指出：红军一定要与工农群众打成一片，否则就“失了红军的阶级基础”。

在这次大会上，李立三作了农民问题的报告，向忠发作了职工运动的报告。9日、10日，大会通过了经过修改的《中国共产党党章》和各项决议案，选出了中央委员23人、候补中央委员13人，组成新的中央委员会。周恩来继续当选为中央委员。

7月11日，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举行闭幕式。周恩来在会上讲话。他说：大会为了求得革命的真理，开展了批

评自我批评。“我们不要以为有了争论就是不好的，因为只有批评讨论之下，才能得到正确的道路。”现在有了正确的路线，回国后要使每个同志了解和执行。

7月19日，在莫斯科举行的中共六届一中全会上，周恩来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20日，中央政治局第一次会议上，向忠发、周恩来、苏兆征、蔡和森、项英五人当选为政治局常委。在分工中，周恩来负责党的组织工作和军事工作，并兼中央政治局常委的秘书长和中央组织部部长。

六大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次有着重要意义的全国代表大会。大会指出：中国的社会性质仍然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革命现在阶段底性质，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当前的政治形势，是处在两次革命高潮之间；中国共产党的总任务不是进攻，而是争取群众，准备暴动；并且批评了“左”、右倾机会主义，特别是“左”倾盲动主义的错误。延安整风时，周恩来在《关于党的六大的研究》这个报告中评论说：“总起来说，‘六大’关于革命的性质、动力、前途、形势和策略方针等问题的决定基本上是对的，所以说‘六大’的路线基本上是对的。”由于这些决定是党的全国代表大会的正式决议，它所产生的影响特别巨大，从而在一系列带根本性的问题上澄清了党内长期存在的错误认识，对以后中国革命的发展起了积极的作用。这是六大的巨大历史功绩。

六大也有它的缺点：第一，当时全党的认识还是把城市工作放在中心的地位，没有认识到中国革命的中心问题是农民的土地问题、中国革命的特点是农民斗争和武装割据，因而对中国革命的长期性和农村革命根据地的重要性认识不足。第二，继续把民族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排除在中国革命的动力之外，对中间阶级的作用、反动势力内部的矛盾缺乏正确的估计和政策。对这方面，周恩来以后也有评论：“六大也有毛病，犯了一些错误。但

这些错误没有形成路线错误，没有形成宗派主义，虽然一些倾向是有的。这些，对以后立三路线、宗派主义的形成是有影响的，但不能负直接责任。这是我个人的看法。”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传》）

建党建军里程碑：古田会议

1929年6月，在红四军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上，围绕要不要设立军委发生争论，毛泽东未能当选为前委书记。会后毛泽东离开部队到闽西帮助特委工作和养病。10月底，陈毅从中央返回红四军，传达了中央“九月来信”。前委决定请毛泽东回来主持工作。1929年12月28日，红四军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在上杭县古田召开了。

1929年12月29日，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在福建省上杭县的古田召开了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制定了《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即著名的“古田会议决议”）。这个决议案总结了工农红军创建两年多以来建党建军的基本经验，批判了各种错误思想，奠定了我军政治工作的基础。决议案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集体智慧的结晶，是建党建军的伟大纲领。

红军第四军的成立和古田会议召开前的情况

1928年4月，朱德、陈毅率领南昌起义保留下来的部队及湘南起义的农军，到井冈山同毛泽东领导的湘赣边秋收起义部队胜利会师。会师后，为了统一编制、统一指挥，即决定成立工农革命军第四军。于同年5月4日在江西宁冈砵市召开庆祝会师和

四军（同年6月改为红军第四军）成立大会，朱德为军长，毛泽东为党代表，陈毅任政治部主任。部队编为3个师，9个团（后因人、枪不足改为6个团），1个教导队。红四军的成立在我军建军史上具有重大的意义，它把经历过北伐战争和保留了北伐战争优良传统的两支精锐武装聚集到了一起，壮大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红军力量。

红四军成立以后，部队在毛泽东、朱德等同志的领导下，出现了一系列的新变化。同年5月，召开了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了军委，毛泽东为书记。同年11月6日，根据党中央的指示，成立了红四军党的前敌委员会，以毛泽东为书记。14日红四军召开了党的第六次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了由23人组成的军委，朱德为书记。同年底，红四军在前委和军委的领导下，连续打破了江西敌人对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多次“会剿”。同年12月11日，彭德怀、滕代远率领湖南平江起义部队红五军2000余人到达宁冈城，与红四军会师，又进一步壮大了红四军的力量。1929年初，毛泽东、朱德、陈毅率领红四军主力进军赣南、闽西，经过近半年的斗争，又开创了赣南、闽西革命根据地。

红四军在不断发展壮大的同时，在军内和党内思想上也逐渐暴露出一些问题。

随着胜利形势的发展，红四军不断的扩大，部队成分较前复杂，党内也涌进大量的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出身的同志。自下井冈山后，仅“三个月，人数增加1600，枪数增加500”。并将不少的俘虏兵，经过教育改造表现很好的提拔当干部；至5月份，全军约8000人，党员1329人，占16.6%。其中工人311人，占23.4%，农民626人，占47%，小商106人，占8%，学生192人，占14.5%，其他95人，占7%。合计农民和小资产阶级出身的党员占70%，红军的主要成分，多是农民，至1929年上半年时，又增添大批俘虏兵。这种组织状况的变化，无形中

加剧了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在红四军中的影响。

由于部队下井冈山以后，战斗频繁，伤亡较大，特别是中下级干部和政治工作人员损失太多，不得不大量提拔干部，以致把一些政治上很不成熟，又缺乏实际斗争经验的同志提拔到前委等领导机关担任领导工作，他们的意见往往不一致，因而影响到“领导机关不能形成对错误倾向的坚决一致的斗争”。加上部队长期处于高度分散的农村游击战争环境，缺乏马列主义政治书籍的学习和有利的政治思想教育，常常几个月看不到报纸，严重影响到干部政治理论水平和思想觉悟的提高，使相当数量的干部，对正确的新鲜的东西，不能很快接受和习惯，而对一些错误的东西不能识别和抵制。这就使红四军中一些错误的倾向，有了一定的市场。

对于红四军党内思想上出现的问题，毛泽东、朱德、陈毅等前委负责同志都有察觉。1929年6月19日，红四军第三次打下龙岩城后，于22日召开了红四军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本来打算通过这次大会认真总结红四军建军以来的经验，解决党内出现的争论，纠正各种错误倾向。但是，由于各方面条件不成熟，前委领导机关又未能取得一致意见，结果，展开了争论，没能统一认识。争论的主要问题是：

一、关于红军的根本任务问题。在井冈山时期，毛泽东就提出了红军的三大任务：（一）打仗消灭敌人；（二）打土豪筹款子；（三）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帮助群众建立革命政权。但有的同志则认为建立根据地不是军队的任务，而是地方党组织的事，军队只管打仗。特别是在红四军不断发展壮大的情况下，有些同志热衷于打城市，提出“走州过府”，“拿它十几个州县”的口号，主张走到哪里，吃到哪里。不要政策，不要政权，表现出极端严重的流寇思想。

二、关于党对军队的领导问题。三湾改编时，毛泽东就强调

党对军队的领导，支部建在连上。但是，一些受旧军队影响较深的同志，对党委、支部讨论决定问题的制度感到受约束，喜欢个人说了算。也有的同志错误地主张事无大小，先交下级讨论，然后上级再作决议。

三、关于红军中政治工作与军事工作的关系问题。有的同志在会上曾经就“军事首长、政治首长，倒是谁大呀？”“是司令部对外还是政治部对外呀？”进行争论。有的同志认为军队能打仗就行了，军事高于一切，甚至还说“军事好政治自然会好”。因而在组织上主张政治机关附属于军事机关，提出“司令部对外”的错误口号。甚至认为政治工作人员“是吃闲饭的”，表现出严重的单纯军事观点。

四、关于红军的民主制度与管理教育问题。红军本已在军队内部建立了民主制度和新型的官兵关系。但是，有的干部却随便处罚人，搞体罚，造成官兵对立。老兵也欺侮新兵。他们认为士兵不打不骂不好带，对逃兵则主张枪毙，并要求取消士兵委员会，表现出严重的军阀主义。

在“七大”，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主张，未能为多数同志所接受。毛泽东也未能当选为前委书记。会后毛泽东离开部队到闽西帮助特委工作和病休。毛泽东离开部队以后，红四军错误出击闽中受到损失，陈毅又去上海参加中央召开的军事工作会议。此时，前委领导削弱，部队思想混乱，干部不安心工作。因此，1929年9月，红四军召开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仍然没有解决问题。

中央“九月来信”及古田会议的召开

1929年9月，党中央在上海召开军事工作会议。红四军前委决定派陈毅参加。陈毅在出发前专程到闽西蛟洋见毛泽东，听

取他的意见。到上海后，陈毅在会上向党中央作了书面报告（《关于朱、毛红军及其历史状况的报告》），并如实地向党中央汇报了红四军第七次党代表大会上的争论，部队存在的不良倾向以及毛泽东离开部队的情况。由于陈毅采取了大公无私、实事求是的态度，使党中央得以了解红四军的真实情况，从而对红四军的工作能够作出正确的指示。

当时，中央负责军事工作的周恩来与其他负责同志一起详细地研究了红四军的情况，指示陈毅代中央起草了《中共中央给红军第四军前委的指示信》（即中央“九月来信”），指示信经周恩来审定。交陈毅带回时，又对陈毅谈了有关指示信中各项要求的详细解释与贯彻执行的具体办法，并希望红四军前委在贯彻执行时，能制定一个决议，使大家有章可循。

中央“九月来信”根据红四军两年来建党建军的经验，针对红四军“七大”争论的问题，结合全国各部红军的经验教训，从目前的形势和红军的根本任务与前途，战略战术，发展方向，红军与群众，给养与经济，组织与训练，党的工作，行动问题等九个方面，作了详细的阐述和指示（此信收入《周恩来选集》上卷的有八个部分）。其要求有：支持前委的正确主张。肯定了红四军两年来建党、建军等方面所取得的伟大成绩。对红四军的存在与发展对于全国革命斗争的伟大意义给予了高度评价。充分肯定红军中实行民主制度的好处和规定这种制度的限度。提出要加强红军的政治思想教育和纠正一切不正确的倾向。指出红四军必须加强群众工作等等。

1929年10月底，陈毅从中央返回红四军。11月18日，在上杭县的官庄，前委召开了会议，由陈毅传达中央指示信和周恩来的指示。红四军再占长汀城后，前委立即决定请毛泽东回来主持工作。同年11月28日，毛泽东在长汀主持召开了前委扩大会议。会议决定召开红四军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毛泽东等前委领

导同志深入连队召开座谈会，找干部、战士个别谈话，仔细调查了解部队和党内存在的各种问题，听取各种不同的意见和反映，同时深入地方召开群众座谈会，听取意见。12月中旬，红四军领导机关进驻上杭县古田，毛泽东又召开支队及纵队党代表联席会议，充分发扬民主，大胆揭露红四军党内存在的各种不良倾向，共同分析研究各种错误思想产生的根源、危害和克服的办法。会议开了十多天，统一了思想，为红四军党的“九大”作了充分准备。1929年12月28日，红四军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在上杭县古田召开。会上，陈毅传达中央“九月来信”精神，毛泽东作政治报告，朱德作军事报告。大会进行了三天，全体代表一致通过了毛泽东为大会起草的《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大会还选举产生了新前委，毛泽东为书记。

古田会议决议的基本思想和主要内容

红四军第九次党代表大会决议案，是毛泽东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建立无产阶级政党及其军队的基本理论同红四军建党建军实践相结合的产物。决议总结了两年来红四军建党建军的经验，规定了我军建设的基本路线、方针和政策，从而使我军建立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础上，也为我军政治工作奠定了基础。决议案的基本思想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教育部队，树立无产阶级思想，克服非无产阶级思想，把红军建设成为一个服从无产阶级领导的，服从于人民斗争和根据地建设的工具。这是毛泽东建军思想的一个根本点，也是红军区别于其他军队的根本标志。

决议的内容是极其丰富的，其要点是：

一、规定了红军的性质、宗旨和任务。决议明确指出：“中国的红军是一个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特别是现在，

红军决不是单纯地打仗的，它除了打仗消灭敌人军事力量之外，还要负担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帮助群众建立革命政权以至于建立共产党的组织等项重大的任务。”决议还提出，如果离开了对群众的宣传、武装和建设革命政权等目标，红军“就是失去了打仗的意义，也就是失去了红军存在的意义”。决议要求在部队中认真进行红军与白军根本不同的建军宗旨教育，划清红军与旧军队的界限，肃清一切旧军队的影响。决议批判了不重视根据地建设的单纯军事观点和流寇思想的错误倾向，指出它的错误在于：“不承认军事只是完成政治任务的工具之一。”“以为红军的任务也和白军相仿佛，只是单纯地打仗的。”“不愿意做艰苦工作建立根据地，建立人民群众的政权，并由此去扩大政治影响，而只想用流动游击的方法，去扩大政治影响。”世界上的军队，都是为一定的阶级和政治服务的，所不同的是：反动军队，它是反动统治阶级统治人民、压迫人民的工具；革命军队，它是为人民群众自己争取解放的斗争工具。决议还明确规定我军不仅担负打仗的任务，还执行筹款，做群众工作的任务，即三大任务。

二、规定了党对红军绝对领导的原则。决议规定在红军中要建立党的领导中枢，健全党的各级组织，厉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生活，实行集体领导的原则。一切工作，必须在经过党的讨论和决议之后，再经过群众路线的方法去执行。“各级党的会议（从支部到前委），均须将军事工作计划及报告列入议事日程，加以讨论和决定。”决议批判了极端民主化思想和非组织观点等错误倾向，指出极端民主化的危险“在于损伤以至完全破坏党的组织，削弱以至完全毁灭党的战斗力，使党担负不起斗争的责任，由此造成革命的失败”。指出它的来源“在于小资产阶级的自由散漫性”。要求党的领导机关要有正确的指导路线，“上级机关要明了下级机关的情况和群众生活的情况，成为正确指导的客观基

础”。上级机关的重要指示应迅速传达下级机关和党员群众中去。“党的下级机关和党员群众对于上级机关的指示，要经过详尽的讨论。以求彻底地了解指示的意义，并决定对它的执行办法。”

为了提高党的战斗力，决议对健全组织，提高党员质量，加强党的组织性、纪律性和党的组织生活，都提出了详尽的要求。指出发展党员要以战斗兵为主要对象，“每连建设一个支部，每班建设一个党小组，这是军中党的组织的重要原则之一”。指出要克服党的组织的松懈，就要对“旧的基础厉行清洗”。新分子入党必须具备五个条件：政治观念没有错误（包括阶级觉悟）；忠实；有牺牲精神，能积极工作；没有发洋财的观念；不吃鸦片，不赌博。指出“各级党部不单是解决问题和指导实际工作的，他还有教育同志的重大任务”。要“严格的执行纪律，废除对纪律的敷衍现象”。这些规定都有效地纯洁、巩固了党的组织，大大地增强了党的战斗性。

决议确定的党对军队的领导原则，是建设一支无产阶级的新型的人民军队的首要条件。后来，毛泽东在《战争与战略问题》一文中更通俗地说：“我们的原则是党指挥枪，而决不容许枪指挥党。”

三、规定了对部队进行马列主义及党的正确路线教育，克服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的原则和方法。我军政治工作的基本任务，就是从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保证党对军队的领导。其中，思想领导又是首要的一环。决议开宗明义地指出：红军第四军的共产党内存在着各种非无产阶级的思想，这对于执行党的正确路线，妨碍极大。若不彻底纠正，则中国伟大革命斗争给予红军第四军的任务，是必然担负不起来的。决议对各种错误思想的表现，社会思想根源以及克服的办法都作了精辟的阐述。指出：“红军党内最迫切的问题，要算是教育的问题。为了红军的健全与扩大，为了斗争任务之能够负荷，都要从党内教育做起。不提

高党内政治水平，不肃清党内各种偏向，便决然不能健全并扩大红军，更不能担负重大的斗争任务。因此，有计划的进行党内教育，纠正过去之无计划的听其自然的状态，是党的重要任务之一。”对党内教育的内容（10项）及方法（18项）都作出了具体规定和要求。

决议对士兵政治训练的材料和方法也作了具体的规定。关于材料问题，规定了目前政治分析及红军任务、土地革命、武装组织及战术、三条纪律、怎样做群众工作、各种偏向之纠正、红军白军比较、共产党国民党比较等19项内容。还提出了上政治课的十大教授法：1. 启发式（废止注入式）；2. 由近及远；3. 由浅入深；4. 说话通俗化（新名词要释俗）；5. 说话要明白；6. 说话要有趣味；7. 以姿势助说话；8. 后次复习前次的概念；9. 要提纲；10. 干部班要用讨论式。这十大教授法，不仅适用于政治教育，对其他教育也是完全适用的。决议案在规定早晚点名说话、集合讲话、游艺、改良待遇等方式进行集体教育的同时，还十分强调对新兵及俘虏兵的特别教育和个别人的思想教育问题。具体规定了对有偏向的、受了处罚的、伤兵、病兵、新兵、俘虏兵、对工作不安心的、思想动摇的等八种人必须进行个别谈话，并要求谈话前，须调查谈话对象的心理及环境。谈话时，要站在同志的地位，用诚实的态度和他谈话。谈话后，要记录谈话的要点及其影响。此外，对青年士兵还作了特种教育的规定，各纵队政治部负责编制青年识字课本，每个纵队设一所青年士兵学校，政治部主任为校长，宣传科长为教务主任，等等。

四、阐明了军事与政治的关系。决议指出：“军事只是完成政治任务的工具之一。”批判了那些把军事与政治对立起来，认为“军事好，政治自然会好，军事不好，政治也不会好”的错误观点。决议严肃地指出：“这种思想如果发展下去，便有走到脱离群众，以军队控制政权、离开无产阶级领导的危险，如像国民

党军队所走的军阀主义道路一样。”为此，要“从教育上提高党内的政治水平，肃清单纯军事观点的理论根源，认清红军与白军的根本区别”。“发动地方党对红军党的批评和群众政权机关对红军的批评，以影响红军的党和红军的官兵。”“党对于军事工作要有积极的注意和讨论。”

决议对军事机关和政治机关的关系问题，也作了明确的规定。指出：“红军的政治机关与军事机关，在前委指导之下，平行地执行工作。”“凡有全军意义的事项，如发布政纲等，军事政治两机关会衔发布。”“凡给养、卫生、行军、作战、宿营等项，政治系统应接受军事系统的指挥。凡政治训练及群众工作事项，军事系统应接受政治系统的指挥。但指挥的形式，只能直达对方机关里头的从属机关（总务科或副官处等）。”还规定“凡没有建设政权机关的地方，红军政治部既代替当地政权机关……”。

五、规定了正确处理红军内部、外部关系的原则。决议指出：红军官兵都是阶级兄弟，在政治上是平等的，“官兵之间只有职务的分别，没有阶级的分别，官长不是剥削阶级，士兵也不是被剥削阶级”。官长应爱护士兵，关心士兵的政治进步和生活状况，保障士兵的民主权利，尊重士兵的人格，坚决废止肉刑，纠正打骂士兵等旧军队的管教方法。士兵要尊重官长，自觉接受管理，遵守纪律，纠正极端民主化和平均主义、雇佣思想等错误倾向。我军的全体成员在革命目标是完全一致的，这是我军官兵一致的政治基础。

在红军中实行官兵平等和建立民主制度，是我军无产阶级性质所决定的，是与一切旧军队的传统和管理方法根本不相同的，“是破坏封建雇佣军队的一个重要武器”。当时，“红军中，官兵生活待遇平等；白军里，将校尉起居饮食不同”，歌谣就是对两种不同性质军队的鲜明写照。毛泽东说：“同样一个兵，昨天在敌军不勇敢，今天在红军很勇敢，就是民主主义的影响。”

为了充分体现革命军队的官兵平等，密切官兵关系，决议还专门提出了优待伤病兵的问题，要求军政机关对于卫生问题应该充分讨论和重视，官长应该随时看望伤病兵，送茶水给他们吃，晚上给他们盖被窝，要按伤病轻重分别发给伤病兵零用钱，在行军中要照顾好沿途落伍的伤病兵，所有这些既是最能取得群众信任的好方法，也是唤起全军团结互助的好方法。

六、规定了红军宣传工作的任务和要求。决议指出：“红军宣传工作的任务，就是扩大政治影响争取广大群众。由这个宣传任务之实现，才可以达到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建立政权，消灭反动势力，促进革命高潮等红军的总任务。所以红军的宣传工作，是红军第一个重大工作。”宣传内容要根据红军政纲和针对各阶级、阶层不同对象的情绪去进行，宣传的方式方法要灵活多样。“到一个地方，要有适合那个地方的宣传口号和鼓动口号。又有依照不同的时间（……）制出不同的宣传和鼓动口号。”同时，军队要遵守群众纪律，“红军纪律是一种对群众的实际宣传”。红军应该做到“上门板，捆禾草，扫地，谈话和气，买卖公平，借东西照还，赔偿损失”，还要尊重人民群众，接受人民群众的监督和听取人民群众的批评，以增强军民团结。决议还指出：优待俘虏兵，医治敌方伤兵，是对敌军宣传极有效的方法。明确规定了不准没收俘虏身上的财物，要以极大的热情欢迎俘虏兵。使他们感觉到精神的欢乐，反对给俘虏兵以任何言语上的或行动上的侮辱；给他们和老兵一样的待遇。不愿留下当红军的，发给路费释放他们回去。

七、论述了红军政治工作的作风和方法，反对主观主义。决议指出：“主观主义，在某些党员中浓厚地存在，这对分析政治形势和指导工作，都非常不利。”“其必然的结果，不是机会主义，就是盲动主义。至于党内的主观主义的批评，不要证据的乱说，或互相猜忌，往往酿成党内的无原则纠纷，破坏党的组织。”

为了纠正这种偏向，要求党员的思想 and 党内的生活都要政治化、科学化。教育党员要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去作政治形势的分析和阶级势力的估量，要注意社会经济的调查研究，由此来决定斗争的策略和工作方法。党内批评要防止主观武断和把批评庸俗化，说话要有证据，批评要注意政治。要设法改善红军的物质生活，处理问题、分配工作、执行纪律等都要做的得当。

古田会议决议，是人民军队建设史上的一个纲领性的文献，它对政治工作的建设，以致对我党我军的建设具有伟大的意义。

古田会议制定了一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建军路线，奠定了我军政治工作的基础。古田会议决议，不仅迅速统一了红四军的思想，而且各部分红军都先后不等地照此做了，这样就使整个中国工农红军完全建立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础上，肃清了一切旧式军队的影响，成为真正的人民军队。几十年来，我军党的工作和政治工作有了极大的发展和创造，现在的面貌和过去大不相同了，但基本的路线还是这个决议的路线。

古田会议决议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建党学说，创造性地解决了在农村游击战争环境中怎样建设无产阶级政党的问题。由于当时党的中心在农村，党组织成员大多数出身于农民小资产阶级，这就必然将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带进党内来，随时随地侵袭和腐蚀着我们党的组织。只有着重从思想上建党，才能使党统一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础上，用无产阶级思想去克服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与此同时，还非常重视坚持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既反对压制民主的军阀作风，也反对极端民主化、非组织意识。这就从根本上保证了我们党即使处于长期分散环境，在各种非无产阶级成分较多的情况下，也能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础上实现统一。从而使党成为一个马克思列宁主义武装的、按照民主集中制组织起来的、采取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密切联系人民群众的党。

古田会议为正确地开展党内斗争树立了良好的榜样。当时，

红四军党内非无产阶级思想和无产阶级思想的矛盾十分尖锐。对于党内的这种矛盾，采取了用加强思想教育的方法，正确开展批评的方法解决，而不搞过火的斗争。使党内批评成为坚强党的组织，增强党的战斗力的武器，藉以“达到阶级斗争的胜利”。古田会议自始至终开得非常顺利，上下心情舒畅，团结一致，充满了对敌战斗的激情。

1956年，罗荣桓在政治学院讲话，系统地谈了古田会议和我军政治工作问题。他说：古田会议就是总结经验，把部队中存在的错误的东西，如流寇思想、军阀主义、无组织无纪律、单纯军事观点、个人主义等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总括起来，做个总结，重申军队内的民主作风，确立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军第九次党代表大会以后，我军要建立一支什么样的军队，就定型了。古田会议总结的党委制、集体领导、民主化、军民一致、官兵一致等等已经成为我们的优良传统。它体现了人民军队的本质，没有这些，哪行啊！因之红四军九大决议的精神也适用于今天。他还说：要向军阀主义作斗争，就必须加强政治工作，要有新的一套，反对旧的一套。那时把政治工作的地位提得很高。指出军队要生存，就要靠政治工作。政治工作要保证部队的行动符合党的要求，按党的政策办事。在这个基础上，后来毛主席就提出了政治工作是我军一切工作的生命线。与此同时，罗荣桓指出：军队中的军事工作是要用命令的形式，例如出操，军事工作干部就要发出“立正”、“向右看齐”的口令。为了保持战斗部队的高度集中统一，保证战斗行动的一致，指挥员、军事工作人员就要用这种形式。而政治工作却是在发扬民主的基础上，用群众路线的方法，用说服教育，提高觉悟，提高自觉性的方法，来达到同一目的。军事工作和政治工作是有区别的，又是统一的。军事指挥员下命令是适合军事工作需要的，却又有一定的局限性。政治工作是可以弥补军事工作的局限性的。有的政治指导员和连长争权

力，争高低，说连长能下命令，政治干部为什么不能下命令？其实用说服教育的方法，使战士听了你的话，自觉地把你的话变成命令一样去执行，这多么宝贵呀！军事工作和政治工作要互相结合，互相补充，这样才能解决矛盾。政治干部不要和军事干部争权，争那些无味的东西干什么！罗荣桓在讲话中特别强调了连队工作。他说：政治工作的基础在连队，要做好政治工作，就必须把连队工作做好。红军时期，毛主席常是一到宿营地，就留下党代表、指导员，要他们汇报，问他们连队里发生了什么情况，有什么问题，不厌其烦地了解连队的情况，帮助解决问题。可是现在有些人光浮在上层，不重视连队工作。有些机关光拚命地向下发文件，轻重缓急也不管，闹得连队的指导员晕头转向。还有些人下连队是为了写报道、找材料，而不是一方面了解情况，一方面解决问题。

（姜思毅主编《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史》）

王明上台：六届四中全会前后

李维汉回忆说：六届四中全会是1931年1月7日在上海秘密召开的，是王明为首的少数人，在共产国际及其代表米夫扶持下，取得党中央领导权的一次会议。这次会议没有什么积极意义，而且把我们党和革命事业，带到更加“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中去。

四中全会的召开和王明的上台

1930年9月由瞿秋白、周恩来同志主持进行的六届三中全会，是根据共产国际的调子对李立三所犯的“左”倾错误进行批判。三中全会对于停止立三的“左”倾错误起了积极作用，是有贡献的。当然，批评得还很不够，不彻底。后来，共产国际十月来信，说李立三犯的是路线错误，批评三中全会对立三的错误采取了所谓调和主义的态度。这一点后来被王明的小宗派利用了。

王明等少数人，是米夫培植起来的宗派。王明这个人我在1927年就认识他。1925年秋天，在莫斯科创办中山大学，党派了一些青年到那里去读书，其中有共产党员，也有非党青年，王明就是在这个时候被派到中山大学去学习的。这个人有点小聪明，在学习期间得到中山大学米夫的赏识。1927年初，共产国际代表团（米夫在内）到中国工作时，由他当翻译。那时，我在武汉同俄国顾问谈话时，也由他当翻译。大革命失败后，米夫返

回苏联，他也跟着回去了。后来，成了中山大学支部局的负责人。

1929年4月，王明回国，在上海沪东区委做过一段宣传工作，后来又中央宣传部担任《红旗》报的编辑。我当时是江苏省委书记，经常到上海各区委出席会议，见到他参加过沪东区委。一次区委在讨论支部工作，谈到有些党员不缴纳党费时，我说：党员应该缴纳党费，要进行教育。他写了个条子给我，说党员不但要缴党费，还要做工作。我没有理他，因为我谈的只是交党费问题，没有谈别的。王明对三中全会及其后的中央的态度，在共产国际的十月来信到达中国以前，总的是拥护的，有些“左”倾观点也是同李立三一致的。王明回国不久，一些在中山大学学习的学生也陆续回国。王明得知共产国际批评三中全会的消息后，便在中山大学回国学生中互相串连，积极反对三中全会及其后的中央。11月13日中国共产党收到了十月来信。11月中旬，他和博古连续写信给党中央，批判三中全会继续立三路线，要求中央撤销对王明留党察看6个月和对博古等人最后严重警告的处分，公开打出“拥护国际路线”，“反对三中全会的调和路线”的旗号，抛出《两条路线》（即后来改名的《为中共更加布尔塞维克化而斗争》）的小册子，煽动党员反对三中全会及其后的中央，要求彻底改造党的领导。

在这种情况下，11月25日，中央通过了《关于最近国际来信的决议》（即补充决议），表示完全同意国际十月来信，并指出立三的错误是路线错误。12月1日，恩来在党中央机关工作人员会议上作了批判立三路线的报告；同时也指出王明、博古等人的错误。当时中央一再对他们让步，还是不行，分配工作他们也不干，硬要召开紧急会议。有一次政治局开会，我主张跟他们进行斗争。我说，他们不像话，没有实际工作经验，还闹，分配工作还不干，党中央开的会还不行，还要开紧急会议。这个时候中

央很软，他们很硬。他们为什么很硬？后来才知道他们有米夫做后台。

12月中旬，米夫突然来到中国，直接插手中国党的内部事务。在这种形势下，党中央取消了对王明、博古等四人的处分，并委派王明担任江南省委（习惯仍称江苏省委）书记，博古任团中央宣传部长，这为他们取得中央领导权作了准备。后来，中央又发了第96号通告，全面接受共产国际对三中全会的批评，决定改造各级领导机关，引进积极反立三路线反调和主义的干部，尤其是工人干部到领导机关。但王明等人还是指责96号通告右倾。

本来我是主张同王明等人斗争的，后来共产国际代表来了，说他们是正确的，我的态度就转变了，政治局同志的态度都转变了，因为那个时候共产国际的威信是很高的。中国党自己还没有一个公认的领袖。既然共产国际来人了，那还有什么说的。我虽然改变了态度，但仍有一个看法，认为他们是吃面包的，没有中国革命的实际经验。

六届四中全会是1931年1月7日在上海秘密召开的。参加会议的有向忠发、瞿秋白、周恩来、任弼时、贺昌、罗登贤、关向应、王明（即陈绍禹，当时名陈韶玉）、沈泽民、夏曦、王稼祥、陈原道、何孟雄、罗章龙、陈郁、徐锡根、王克全、余飞、史文彬、张金宝、王凤飞、韩连会、秦邦宪、温裕成、顾顺章、徐兰芝、邱泮林、肖道德、顾作霖、柯庆施、陈云、周秀珠、袁炳辉、袁乃祥、沈先定、许畏三和我，共计37人。共产国际代表米夫也参加了会议。还有记录2人。会议从早晨到晚上十点多钟，共开了十几个小时。会议由推举出来的主席团主持，主要主持人是向忠发。米夫是全会的实际操纵者。会议有八项议程，四项是主要的，即向忠发代表中央政治局作报告；讨论报告；米夫代表远东局作结论；补选中央委员和改选政治局。

由于四中全会是共产国际和米夫扶持王明等人取得中央领导权的一次会议，这与罗章龙一派企图通过召集紧急会议成立临时中央以取得领导权是完全不一致的。与何孟雄等人的主张也有矛盾。所以会议自始至终都充满着激烈的争论。当向忠发刚宣布开会，罗章龙一派的韩连会首先提出会前不知道要开四中全会，仍坚持召开紧急会议。接着王凤飞支持韩的发言。米夫急忙制止，要求停止讨论，立即进行四中全会的工作。说四中全会已经得到共产国际的批准，它可以解决一切问题。王凤飞对此表示不满。接着罗章龙作了较长的发言，同意韩连会、王凤飞的意见，力主召开紧急会议，取消三中全会的决议，改变中央领导。米夫又急忙制止说：四中全会是共产国际批准的，现在要马上举行。米夫的发言得到夏曦、博古、沈泽民等人的支持。会议在米夫的坚持下，通过表决，否定了罗章龙等人的提议。但是韩连会、王凤飞、史文彬等仍然不服，罗章龙却对这些人表示支持，并保留要求召开紧急会议的权利。接着向忠发提出主席团名单：向忠发、徐锡根、罗登贤、任弼时、陈郁等五人，获得多数通过。

向忠发在会上作了《中央政治局报告》，共讲了十个问题，主要讲的是：国际路线是中国共产党唯一正确的进攻路线；批判立三路线与共产国际对立，立三敌视共产国际；指责三中全会及其后的中央站在调和主义立场上，没有实行真正的转变，秋白要负最主要的责任；提出党最迫切的八项任务。但中心是两条：一是改造中央和地方各级党部，尤其要取消三中全会补选的赞成立三路线的中央委员，引进反立三路线反调和路线的所谓“斗争干部”，尤其是工人同志到中央委员会。二是在实际工作中实行坚决的转变，在反对“左”倾的同时，更要加紧反对右倾机会主义。这个报告是共产国际十月来信和王明等人一系列“左”倾言论的翻版。

向忠发报告后进行讨论，许多人发了言。王明在张金宝、韩

连会简短发言之后，以马列主义“理论家”的姿态作了长篇发言，一开场就说他的《两条路线》的意见书没有带来，要大家去详细地看，气焰十分嚣张。他一共讲了四个问题：首先说立三路线是“左”倾空谈掩盖下的右倾机会主义的消极，在每个问题上都表现得极为明显。虽然他也指出立三路线中若干“左”的政策，但主要是批判立三的右倾机会主义。如否认一省或数省的首先胜利；对自由资产阶级分子、富农、上层小资产阶级分子的右倾政策等。其次，他完全抹煞三中全会的成绩，指责三中全会在接受国际决议的名义下，继续立三路线。他点名批判瞿秋白与李立三的错误有不可分割的联系，所以对立三路线采取公开调和的态度。第三，他强调只撤换某几个中央负责人是不够的，必须发展全党的政治斗争，从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全面彻底地改造党，特别要以所谓反三中全会反调和路线的“新干部”、“工人干部”来代替“旧干部”。第四，他尤其强调要加紧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等等。很显然，王明的这个发言是他的“左”倾冒险主义总纲领的体现，也是为他们取得党的最高领导权制造舆论。

王明发言之后，有几个人继续发言，有的完全同意他对立三路线的批判。接着何孟雄提议政治局的同志先发言，要听听他们是否改正了错误。何的提议得到了一些人的支持。接着周恩来、关向应、瞿秋白、向忠发、我和顾作霖等发了言。瞿秋白的发言在这种形势下主要是进行自我批评。他主动地、诚恳地承担了三中全会及政治局所犯错误的最主要责任。说他参加了国际七月决议案的讨论，对情况是了解的，他认为立三的意见和政治局的路线是个别错误，而不是路线上和国际不同，因此十月来信后没有认识到犯了“调和主义”错误，而是经十月来信所领导起来的党员群众的斗争和国际代表的指导，才了解到这一点。秋白也批评了立三路线的“左”倾错误以及和自己若干大致相同的观点，并提出党应领导中国人民进行斗争的若干建议。

我在会上也作了简短发言。首先作自我批评。我说立三路线的形成，实际上也有我的意见，我不是简单的执行者。对于说立三的错误是个别人的策略上的错误，我也是赞成的，因此也犯了“调和主义”错误。同时，我对立三的“左”倾路线错误也进行了批评，指出他过高估量了有利的革命形势，不去认真准备力量、建立红军和苏维埃根据地，相反却积极执行苏维埃区域和红军的冒险政策，命令其他地方到处组织暴动，取消党、团、工会和一切群众组织。指出他在党的组织军事化的口号下，实行家长制、命令主义、委派制度，破坏民主集中制，抑制党内自下的批评和自我批评，严厉打击了反立三路线的何孟雄同志。此外，我还具体批评了布置上海暴动、南京暴动、武汉暴动。批评了决定徐海蚌无条件地首先暴动、通海地区的先占南通再攻南京的盲动主义错误。现在看来，这些批评还是正确的。但其他一些批评就不完全正确，甚至还有许多过左的地方。对三中全会的批评也有许多过头的地方。

政治局的同志发言之后，何孟雄、王稼祥、罗章龙等十几人又发了言，大都是批评立三路线、批评三中全会，强调要彻底改造党的领导。至此，国际代表米夫说已有 18 人发言，相信不会有新的意见发表，会议必须在十点半结束，不能再延长下去，讨论要在七点半结束。米夫的插话刚完，一些人又表示对四中全会不满，有的人要求秋白等马上离开中央。这时，米夫提出停止讨论，由他作结论。米夫的结论，强调立三“左”倾路线的实质是右倾，用“左”倾词句遮盖了实际工作的机会主义；批评三中全会将国际路线隐藏在立三路线后面继续推行立三路线，尤其瞿秋白要负责；指责三中全会不是反李立三，而是反对那些反李立三的王明、沈泽民等，说这些人是站在国际路线上反对立三路线，是坚决执行国际路线的。他对罗章龙等人坚持要求召开紧急会议也进行了批评。随后，会议就基本上通过了由米夫等事先准备好

的《中共四中全会决议案》，选出王明等五人委员会同远东局共同修改。

尔后，即补选中央委员和改选政治局。远东局和中央政治局事先拟定了一个名单，这个名单是让我和贺昌从三中全会补选的中央委员中退出来，让瞿秋白、李立三和我从三中全会的政治局中退出来，并提出向忠发、王明等16人为新的政治局委员或候补委员。这个名单一宣布，即遭到罗章龙、余飞、史文彬等人的反对。罗章龙不仅要求把李立三、我和贺昌开除出政治局和中央委员会，而且要求彻底改造政治局，说政治局的大半是立三路线的执行人。国际代表急忙提议先表决我和贺昌退出中央委员。许多人提出质疑。罗章龙一派的韩连会则提出另一个名单，他们是徐锡根、何孟雄、张国焘、罗章龙，可能还有顾顺章、王克全、韩连会、唐宏经、徐炳根、蒋云等。国际代表米夫立即制止这样的讨论，要求照远东局和中央政治局提出的名单先行表决，然后再提议其他人。会议通过了我和贺昌退出中央委员会。但有人仍提出三中全会补选的中委统统退出，另选中委。罗章龙表示不同意远东局和中央政治局提的名单。由于争执不下，付诸表决。结果，赞成三中全会补选的中委统统退出的只占少数。在这种情况下，罗章龙、史文彬、王凤飞等人仍坚持己见，罗章龙并威胁要退出会场，被人拉住。他说，请国际代表指定，我不表决。米夫说：应当安静地解决问题，捣乱会场是不许可的。现在要表决远东局和政治局的名单和韩连会的名单。有人提问：什么人有权表决？米夫说：现在都有表决权。在米夫的操纵下，又由于罗章龙等人对原中央领导人采取打倒一切的态度，远东局和政治局提出的名单获得多数通过。结果，退出的中委是我和贺昌，补选的中委是韩连会、王荃仁、王明、许畏三、沈先定、沈泽民、黄苏、曾炳春、夏曦等九人；退出政治局的是瞿秋白、李立三和我三人，新选人政治局的是刘少奇、王明、王克全、任弼时、陈郁等

五人。这样，在米夫支持下便实现了王明等人取得中央领导权的计划，使原来连中央委员都不是的王明，进入党中央最高领导机关政治局。向忠发名义上虽然继续担任政治常务委员会主席，但实际上由王明等人独揽中央领导大权。

王明等人之所以能够上台，我认为：一是得到共产国际的赏识和支持，这是最主要的原因；二是教条主义唬住了一些人，一部分同志对他们实行妥协和支持；三是八七会议以来党内一直存在着的“左”倾情绪还浓厚地存在着，容易为王明的一套更“左”的理论和政策所迷惑。

总之，六届四中全会的召开，没有什么积极的建设的作用，其结果就是接受了以王明为代表的新的“左”倾冒险主义在中央的统治，它给中国共产党和革命事业带来了更加严重的灾难。

关于罗章龙的分裂主义问题

罗章龙在立三路线时期，他在全国总工会工作，当时刘少奇同志到共产国际开会去了，不在国内，罗在那里掌权。四中全会上，他竭力反对召开四中全会，力争召开紧急会议，把执行立三路线的中央领导人，连同党中央，统统换掉和彻底改造，以选举他们这样的所谓反立三路线反三中全会的“斗争干部”或工人。由于他们提出的名单被否决，没有达到目的，四中全会后就更有组织地反对四中全会，搞分裂党的活动。

党内斗争，搞分裂是党的纪律所不允许的。组织第二党是非常错误的，这是背叛党的行为。但罗章龙等一些入却搞了一个第二党的组织，叫“非常委员会”，江苏搞了“第二省委”，上海的一些区搞了“第二区委”，他们还派人到其他地方搞分裂。因此，中央于1932年1月27日作出《关于开除罗章龙中央委员及党籍的决议》，这是完全正确的。

罗章龙对这段历史的态度，我是很不满意的。1977年他来北京后，我同他谈过一次。他说在四中全会上，他们是反对王明宗派主义的，是反对米夫的。我说：你们搞第二党是实实在在的。当时，如果你们只是反对王明的宗派主义，那是对的。但我们党在当时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四中全会的召开是经过共产国际批准的，其结果又为共产国际所承认，因此从组织原则上来说，召开四中全会是合法的。你们对四中全会不满，另外建议召开紧急会议也是可以的，但你们单独搞会场开会，组织“中央非常委员会”，成立“第二省委”、“第二区委”、“第二工会党团”等组织，则是不对的。可是他却认为这样做不是分裂党。我说：你们搞“第二中央”的具体情况我不清楚，但你们搞“第二省委”、“第二区委”的情况我是清楚的。在江苏省委我是当事人。当时我的省委书记职务虽然已被撤销，但还没有离开省委。那时王克全、徐锡根等人参加了你们的组织，他们到江苏省委来闹事，要我们让出省委机关给你们的省委，我们没有让，并与你们进行了斗争。这是实实在在的。我是当事人，可以做证明。我说：你们是在分裂党的组织，这是党纪所不允许的。罗章龙说，他们搞第二组织，是要与共产国际发生关系。这种辩解也是说服不了人的。即使他们当时想与共产国际发生关系，也不能说明另立中央就是对的。这个问题是他的要害。

当时也有人跟着罗章龙一起闹，但后来承认了错误，就没有受处分。有的同志还被派到莫斯科去学习，陈郁同志就是这样。罗章龙没有承认错误，而且坚持错误，才被开除党籍的。当时跟着罗章龙受害的人不少，王克全等人也被开除了，这些人都是坚持分裂的。

（李维汉：《回忆与研究》）

力挽狂澜：遵义会议

长征途中召开的决定中国共产党与红军命运的遵义会议，确定了毛泽东的领导地位。会议开始，由博古作关于反五次“围剿”总结的报告。接着，周恩来作副报告。张闻天作反报告。毛泽东、王稼祥等发言，矛头直指“三人团”。“恩来同志及其他同志完全同意洛浦及毛、王的提纲和意见，博古同志没有完全彻底的承认自己的错误，凯丰同志不同意毛、张、王的意见，李德同志完全坚决的不同意对于他的批评。”

1935年1月，长征途中在贵州遵义举行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以下简称遵义会议），是我党的一个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转折点。这次会议结束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党中央的统治，开始了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新的中央的正确领导，在我党的历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位置。但是由于对这次会议的一些重要情节长期未弄清楚，以致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为了“把党史资料立好，立准确”，我们对有关遵义会议的历史情况进行了调查研究，现报告如下。

目前我们掌握的资料，除原有的遵义会议的决议——《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遵义会议）》（1935年1月8日政治局通过）、《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总结粉碎五次“围剿”战争中经验教训决议大纲》（1935年2月8日）之外，在这次调查过程中，陈云同志还证实了《乙、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

是他在长征途中所写的传达手稿（以下简称陈云同志手稿）。这份宝贵的历史文件为弄清楚遵义会议的真实情况，提供了可靠的依据。遗憾的是，会议的一些其他重要资料，如博古同志的报告，周恩来同志的副报告，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等同志发言的文字记载尚未找到，有待于继续收集。

此次调查，在中央组织部、中央档案馆、解放军军事科学院、贵州省有关部门以及遵义会议纪念馆等单位的配合和协助下，经过反复核对考证，初步弄清了下列几个问题。

一、遵义会议开会的时间

遵义会议决议上注明，该决议于“1935年1月8日政治局会议通过”。但是，当年的有关资料证明，这个时间是不准确的。

从红军第一次占领遵义，以及中央领导同志进入遵义的时间来看：

1935年1月7日21时10分，军委电报通报各军团及军委纵队首长：“我二师今2时（按：7日晨2时）已袭占遵义”。同日23时，再次电告各军团：“总司令部决9时（按：应为8日9时）移至遵义城。”

1月8日，军委主席朱德又在《关于我军9日行动部署》电报中说：“军委纵队明日进驻遵义。”同日，红军总政治部发布了9日进驻遵义城的通令，颁发了口号和进城的八项注意。

军委进驻遵义后，1月10日5时40分又电告各军团：“军委纵队昨日（按：9日）进驻遵义，将继续留此工作。”

我军占领遵义及中央领导同志进驻遵义城的时间，在敌伪资料中亦有记载：

当时任贵州邮区邮务长的王庆云于1935年1月17日密报称“遵义1月7日失陷”。伪遵义县县长徐道伟在呈文中也说：“至

(6日)午夜12时……新城失陷，始由老城北门撤退。”

当时在湘黔边境追堵红军的国民党军第九十三师甘丽初部呈报称：“一、三、五、八、九军团一月三四日由瓮安窜遵义，七日进陷遵义。”“毛泽东九日到遵城。”国民党“追剿”军第二兵团总指挥薛岳，黔军副军长侯之担等在当时的有关文件、电报中所谈我军占领遵义的时间皆与上同。

上述资料说明，我军是在1月7日占领遵义，总司令部于8日移至遵义，军委纵队则是在9日进驻遵义的。当时，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同志随同军委纵队行动，因此，在1月9日之前是不可能召开遵义会议的。

根据目前掌握的资料来看，遵义会议召开的时间应为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依据如下：

1月13日24时，中央以“恩来”的名义发出电报通知：“卓然、少奇：15日开政治局会议，你们应于明14日赶来遵义城。”这是目前找到的唯一正式通知。

陈云同志手稿中说：遵义政治局会议“经过三天，完成了自己的决议”。会议从开幕的1月15日起，经过三天，决议通过的日期应为17日。这个时间，在军委机要干部伍云甫同志的长征日记中亦可得到印证。伍云甫的日记中记载：“2月10日阴。驻扎西（即威信县）。上午9时开营、科长以上干部会议，洛甫报告五次‘围剿’的总结和目前任务（即1月17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决议）。”

此外，当时军委发给各军团首长的电报亦可作为参考：

1月14日14时，军委电示一军团：在林（彪）、聂（荣臻）未回部队前，该军团“统归左参谋长朱主任统一指挥”。1月15日，一军团即以朱（瑞）、左（权）的名义开始向军委报告战况。

由于一军团林、聂，三军团彭、杨已先后离开部队，军委于1月14日至17日23时前，中断了给他们的电报。五军团政委

李卓然同志因故迟到，参加了最后一天的会议。军委1月16日24时，也中断了给他的电报。会议中间，彭德怀同志因黔敌进攻，提前返回了部队。会议结束后，参加会议的各军团首长除林、聂外，均开始陆续返回部队。从1月17日23时起，军委又开始恢复发给彭德怀、杨尚昆和李卓然同志的电报。

至于遵义会议决议上为什么标明该决议是在1月8日通过的，现在尚未查清。陈云同志手稿中说：会议“指定洛甫同志起草决议，委托常委审查后，发到支部中去讨论”。这就说明，决议由洛甫写成文字是在会议之后了。当时戎马倥偬，事后标错日期是可能的。建议今后重新刊印遵义会议决议时，加注予以说明。

二、参加遵义会议的人员以及他们在党内外的主要职务

据陈云同志手稿记载，“参加这个会议的同志除政治局正式及候补委员以外，一、三军团的军团长与政治委员林、聂、彭、杨及五军团的政治委员李卓然、李总政主任及刘参谋长都参加了”。

邓小平、伍修权同志和李德列席了会议。

参加会议人员以及他们在会议前的党内外主要职务是：

政治局委员：（以姓氏笔划为序）

毛泽东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主席

朱 德 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红军总司令

陈 云 全国总工会党团书记、长征开始时为五军团中央代表、军委纵队政治委员、遵义警备司令部政治委员

周恩来 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红军总政治委员、长征开始时为“三人团”成员

张闻天（洛甫）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主

席

秦邦宪（博古） 红色区域中央局的领导者、长征开始时为“三人团”成员

政治局候补委员：（以姓氏笔划为序）

王稼祥 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红军总政治部主任

邓 发 国家政治保卫局局长

刘少奇 全国总工会委员长、中共福建省委书记、长征开始时为八军团中央代表

何克全（凯丰） 共青团中央书记，长征开始时为九军团中央代表

红军总部和各军团负责人：

刘伯承 红军总参谋长、军委纵队司令员、遵义警备司令

李富春 中央候补委员、红军总政治部副主任、代主任

林 彪 一军团军团长

聂荣臻 一军团政治委员

彭德怀 中央候补委员、三军团军团长

杨尚昆 中央候补委员、三军团政治委员

李卓然 五军团政治委员

邓小平 《红星报》主编

李 德 共产国际驻中国军事顾问、长征开始时为“三人团”成员

伍修权 翻译

未参加会议的军团首长，除九军团外，五军团军团长董振堂同志亦未出席这次会议。

三、遵义会议前的酝酿情况

早在反五次“围剿”时，毛泽东等同志对李德错误的军事指挥就曾提出过许多意见。据陈云同志手稿记载：“错误的军事上的指挥，是经过了一个很长时期的，在这一时期中，党内军委内部不是没有争论的，毛张王曾经提出过许多意见……但是没有胜利的克服这种错误。至于各军团……的首长不知有多少次的建议和电报，以及每个战役的‘战斗详报’，提出他们的作战意见，可惜完全没有采纳。”遵义会议决议也指出：军委的一切工作为华夫同志一个人包办，把军委的集体领导完全取消，对军事上一切不同意见，采取各种压制的方法，虽是军委内部大多数同志曾经不只一次地提出了正确的意见，而且曾经发生过许多剧烈的争论，然而这对于华夫同志与××同志是徒然的。

长征开始后，“广大干部眼看反五次‘围剿’以来，迭次失利，现在又几乎濒于绝境，与反四次‘围剿’以前的情况对比之下，逐渐觉悟到这是排斥了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正确路线，贯彻执行了错误路线所致，部队中明显地滋长了怀疑不满和积极要求改变领导的情绪。这种情绪，随着我军的失利，日益显著，湘江战役，达到了顶点”。周恩来同志回忆说：“过了湘江后，毛主席提出讨论失败问题，从老三界一直争论到黎平。”当时争论的中心是关于红军的战略行动方针问题。遵义会议决议指出：“当红军到了湘黔边境，在当时不利于我的情况下，却还是机械的要向二六军团地域前进，而不知按照已经变化的情况来改变自己的行动与方针。红军到了乌江地域，又不知按照新的情况的变化，提出在川黔边转入反攻消灭蒋介石追击部队的任务。”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同志向中央建议放弃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计划，改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前进。1934年12月，中央负责同志在

途经湖南省通道县时开了会，毛泽东同志的主张得到了与会大多数同志的赞同。于是红军遂由湖南进入贵州。

同年12月18日，中央政治局于贵州黎平举行会议。据周恩来同志回忆，在黎平会议上争论得很激烈。军事顾问李德要在黔东南和敌人硬拼，毛泽东同志则主张向黔北走。主持会议的周恩来同志采纳了毛泽东同志的意见。这次会议作出了《中央政治局关于在川黔边建立新根据地的决议》，确定了新的战略行动方针。

1935年1月1日，中央政治局在贵州瓮安县猴场（草塘）召开会议，作出了《中央政治局关于渡江后新的行动方针的决定》。

毛泽东同志的正确意见虽然逐渐取得多数同志的拥护，但斗争并没有结束。对此，周恩来同志后来回忆说：“从黎平往西北，辗转从黄光（？）、黄平，然后渡乌江，达到遵义，沿途争论。在这个中间，主席就说服了中央许多同志。”“在长征中，毛主席先取得了稼祥、洛甫的支持。那时在中央局工作的主要的成员，经过不断斗争……在遵义会议前夜，就排除了李德，不让李德指挥作战。这样就开好了遵义会议，很多的中央同志都站在主席方面。”

陈云同志手稿中也指出：“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的召集，是基于在湘南及通道的各种争论而由黎平政治局会议所决定召集的。这个会议的目的是在：（一）决定和审查黎平会议所决定的暂时以黔北为中心，建立苏区根据地的问题。（二）检阅在反对五次‘围剿’中与西征中军事指挥上的经验与教训。”因此，我军占领遵义后，政治局扩大会议遂于遵义举行。

遵义会议的召开，本身就是毛泽东同志的正确主张的一大胜利。

四、遵义会议进行情况

遵义会议集中全力纠正了当时具有决定意义的军事上的错误，并在组织上作了一些调整。

会议开始，由博古同志作了关于反五次“围剿”总结的报告。他在报告中为导致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错误军事领导进行辩护。正如会议决议所指出的：“博古同志的报告基本上是不正确的。”接着周恩来同志作了副报告。

毛泽东同志在会上作了重要发言。对错误军事路线进行了切中要害的分析和批评，正确阐述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指明了今后正确的方向。陈云同志在1977年8月23日接见遵义会议纪念馆同志的讲话中说：在遵义会议上，“毛主席讲得很有道理。内容就是中国革命战争战略问题”。周恩来同志后来在谈到当时的情况时也说：在遵义会议上，毛泽东同志批判了当时错误领导在军事路线上的错误：先是冒险主义，继而是保守主义，然后是逃跑主义。其他问题暂时不争论，很多人一下子就接受了。

会上，其他同志也对博古同志的总结报告进行了批评。

经过三天的讨论，会议作出了《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遵义会议）》（会议的决议在会后由洛甫写成文字）。决议指出：“军事上的单纯防御路线，是我们不能粉碎敌人五次‘围剿’的主要原因。”在反对五次“围剿”的战争中，“左”倾错误的领导者“以所谓‘短促突击’的战术原则来支持这种单纯防御的战略路线。这就使敌人持久战与堡垒主义的战略战术，达到了他的目的。使我们的主力红军受到一部分的损失，并离开了中央苏区根据地”。而我们的突围的行动，又“是一种惊慌失措的逃跑的以及搬家式的行动”。三个月的突围战役，红军“减员到空前的程度”。“为了粉碎敌人新的围攻，创造新苏

区，必须彻底纠正过去军事领导上所犯的错误的，并改善军委领导方式。”

据陈云同志手稿中记载，在“扩大会中恩来同志及其他同志完全同意洛甫及毛、王的提纲和意见，博古同志没有完全彻底的承认自己的错误，凯丰同志不同意毛、张、王的意见，A（即李德——编者注）同志完全坚决的不同意对于他的批评”。

会议着重指出，军事领导上的错误，“A、博二同志是要负主要责任的”。

“扩大会议一致决定改变黎平会议以黔北为中心来创造苏区根据地的决议，一致决定红军渡过长江在成都之西南或西北建立苏区根据地。”

扩大会最后作出了下列决定：

“（一）毛泽东同志选为常委。

（二）指定洛甫同志起草决议，委托常委审查后，发到支部中去讨论。

（三）常委中再进行适当的分工。

（四）取消三人团，仍由最高军事首长朱、周为军事指挥者，而恩来同志是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人。”

博古同志在回忆遵义会议时说：“因有遵义会议毛主席挽救了党、挽救了军队，教条宗派统治开始完结，基本上解决问题。”

遵义会议纠正了“左”倾冒险主义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取消了“左”倾错误领导的军事指挥权，这在当时是一个生死攸关、急待解决的问题。由于当时战争形势紧迫和大多数同志尚未认识到中央政治上的错误，因而，会议“认为当时党的总的政治路线一般的是正确的”。在当时的条件下，这样做，对顺利解决迫在眉睫的军事路线问题、动员全党团结一致去克服长征中的困难，是必要的。

五、关于洛甫同志代替博古同志 职务和三人军事指挥小组的成立

遵义会议期间，中央在组织上只作了部分的调整，至于洛甫同志接替博古同志的职务和中央三人军事指挥小组的成立，则是在会议之后完成的。

（一）关于洛甫同志代替博古同志的职务问题

1943年，博古同志回忆说，遵义会议之前，“三人团处理一切（博、李、周）”。这就是说，当时三人团实际上是党、政、军的领导核心和最高权力机构。遵义会议决定取消三人团，而周恩来同志仍是最高军事指挥者，这就是在实际上取消了博古领导全党工作和李德指挥军事的权力。但当时博古并未正式交出职务。陈云同志的手稿中提到：“在由遵义出发到威信的行军中，常委分工上，决定以洛甫同志代替博古同志负总的责任。”

周恩来同志回忆博古同志交出职务的情况时说：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后，“博古再继续领导是困难的，再领导没有人服了”。当时部队行进到四川、贵州、云南交界的地方，在一个叫鸡鸣三省的庄子里，“主席把我找去说，洛甫现在要变换领导”。于是“说服了大家，当时就让洛甫做了”。现经查明，在长征途中，党中央于1935年2月5日曾在鸡鸣三省这个村子宿营。

李德在《中国纪事》一书中也提到这件事，可供参考。他写道：遵义会议之后，“毛只是进了政治局的常务委员会，他本来就已是政治局委员了。博古开始仍然是总书记，一个月以后，也就是在1935年2月，经过长时间的犹豫，他才同意将他的职位让给洛甫，自己继续担任政治局委员和中央委员会书记”。

可以认为，洛甫同志接替博古同志的职务，是1935年2月5日在鸡鸣三省，当中央政治局常委进行分工时决定的。

经查对，当时中央并无总书记职称，洛甫和博古也未用总书记的名义。

早在1931年，向忠发被捕叛变后，临时中央政治局即决定不设总书记。

1943年11月13日，博古同志在政治局会议上提到：向忠发被逮捕后，临时中央政治局“到酒店开会（明、周、卢、博四人）决定不设总书记。当时决定我为书记，我的实权是总书记，但是在中央会议并没有决定我是总书记”。

洛甫同志于1943年12月16日在自述材料中说，王明、周恩来决定离开上海，提出新中央的名单时，“当时卢福坦想当总书记，所以我记得当时特别提到无总书记问题”。

周恩来同志于1943年11月27日在政治局会议上也提到：“在分配工作时，曾向卢福坦解释不设总书记。”

由于博古同志的正式名义不是党的总书记，因而陈云同志手稿中只是说：“常委分工上，决定以洛甫代替博古同志负总的责任。”六届七中全会《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注释（九）中也说：“秦邦宪同志……1931年9月至1935年1月，曾先后担任党的上海临时中央局和红色区域中央局的领导者。”周恩来同志1972年回忆说：遵义会议后，“撤销博古的那个声明也没有用总书记”。“这个‘总’字好像没有加上。反正他是书记就是了，因为其他的人作常委嘛。”

1938年4月12日的武汉《新华日报》上刊登了《张闻夫（洛甫）启事》，其中提到：“中共中央设有由数同志组织之书记处，但并无所谓总书记。”

由此可见，博古和洛甫同志当时并没有正式用总书记的名义。

（二）关于三人军事指挥小组的成立

遵义会议结束后，中央政治局常委进行了分工，“以泽东同

志为恩来同志的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1935年3月4日，中央军委又决定“特设前敌司令部，委托朱德同志为前敌司令员，毛泽东同志为前敌政治委员”。此时，三人军事指挥小组显然尚未成立。它究竟于何时何地成立的呢？以下的资料提供了重要的线索：

毛泽东同志在1943年说：长征途中，“在打鼓新场，洛甫每天要开二十余人的中央会议。洛甫提议要我为前敌总指挥……以后组织三人团（毛周王）领导”。

1943年，周恩来同志在谈到当年撤销进攻打鼓新场敌据点的计划时说：在鸭溪会议上，“毛主席坚决反对那个军事计划，后来还是停止了……自此以后成立三人团，集中军事领导，少开会议”。1972年，周恩来同志再次谈到这件事，他说：第二次从遵义出发，大家一致要打驻守在打鼓新场的敌人。“硬要去攻那个堡垒，只主席一个人说不能打”。由于“大家一致通过”，“主席那个时候只好服从”。会后，毛主席“半夜里提马灯又到我那里来，叫我把命令暂时晚一点发，还是想一想。我接受了主席的意见，一早再开会议，把大家说服了”。“这样，主席才说，既然如此如此，不能像过去那样指挥，还是成立一个几个人的小组，有主席、稼祥和我，三人小组指挥作战。”

1978年5月18日，陈云同志在审查中国革命博物馆党史陈列时，谈到过三人小组成立的情况。他说：“成立三人小组是在遵义会议以后，四渡赤水时定的。大概在打鼓新场的地方。当时大家意见很多，就搞了个三人军事小组，决议上没有。”

洛甫同志在自述材料中也说：“在抢渡乌江以前，泽东同志提议以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三人成立三人团全权指挥军事。”

李德在谈到这个问题时说：第二次进遵义后，“成立一个‘军事领导小组’……成员有毛泽东、周恩来和王稼祥”。

上述材料，说明三人军事指挥小组的成立是和第二次撤离遵

义后，作出撤销攻打打鼓新场决定紧密联系着的。根据这些线索，我们查阅了当时部队行动的有关电报。这些电报记载：军委二次撤离遵义后，1935年3月10日1时，一军团林、聂曾发电报给军委，建议我“野战军向打鼓新场、三重堰前进，消灭西安寨、新场（按：即打鼓新场）、三重堰之敌”。11日，军委在离鸭溪不远的苟坝附近发给一、三、五军团《关于我军不进攻新场的指令》的电报。电文指出：“滇军鲁旅已到黔西，12号可到新场。安、龚两旅则跟进。依此，我主力进攻新场，已失时机……军委已于昨10号21时发出集中平家寨、枫香坝、花苗田地域之电令，以便寻求新的机动。”

上述电报记载了中央军委撤销进攻打鼓新场计划的时间和中央军委当时所在的地点。那时，红军处于强敌围困之中，情况瞬息万变，亟需成立一个具有权威的军事指挥机构以保证毛泽东同志实施正确的军事指挥，因而在改变进攻打鼓新场计划后即成立了三人军事指挥小组。这一点，从毛泽东、陈云同志的讲话中可以看出，特别是在周恩来同志的两次讲话中说得更为清楚。

据此，可以认为，三人军事指挥小组是在1935年3月11日左右在贵州鸭溪、苟坝一带成立的。

三人军事小组全权指挥军事，在当时是全党全军最重要的领导机构。毛泽东同志进入三人军事指挥小组，表明了新的中央的领导地位在全党得到了进一步的巩固。

遵义会议具有伟大的历史意义，这次会议为中国革命开辟了走向胜利的航道。

（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关于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若干情况的调查报告》）

北上南下之争发端：两河口会议

1935年6月，红一方面军与红四方面军在四川懋功胜利会师。26日，中共中央在懋功两河口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北上在川陕甘建立革命根据地的战略方针。毛泽东说：“为什么弄到这区域来？这区域有它的好处：把苏维埃运动放在更加巩固的基础上，一、四方面军会合也在此。大家懂得这是向前，在四方面军应作解释。”张国焘先是同意北上，接着出尔反尔，提出南下主张。一场争论由此发端。

这次会议，距今已49年，它的会议记录完好地珍藏在中央档案馆，这是党在长征的艰苦岁月中保存下来的档案，成为我们研究党史和军史的宝贵文献。记录共25页，8000余字，记载着会议的报告、讨论发言、结论和决议事项。会议记录反映出这次会议的到会人有：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刘伯承、王稼祥、洛甫、博古、刘少奇、凯丰、邓发、林彪、彭德怀、聂荣臻、张国焘、林伯渠、李富春。会议于当日结束。

会议首先由周恩来作目前战略方针的报告。他在回顾了红一方面军离开中央苏区九个月来战略方针几度变化之后，着重地谈了以下三个问题：

（一）关于战略方针

《报告》指出：一、四方面军会合前，四方面军决定西去懋功向西康，一方面军决定到岷江东岸。战略方针两个方面军是不

同的。现在两个方面军都是离开了苏区，都在新的地区创建新的根据地。现在在什么地区建立苏区？其条件应力求：（1）便利我们的作战。现在一、四方面军会合了，力量大了，应是地区大，好机动。松潘、理番、懋功这地区虽大，但多是狭路，敌易封锁我，使我不易反攻。敌人正想在这些地方逼死我。（2）群众条件，要人口较多、有利于红军本身发展、能大批扩大红军的地方。而松潘、理番、懋功、温川、抚边等地方，多是少数民族地区，人口只有 20 万，这地方是不能成为根据地的。（3）经济条件，能解决军队供给的比较优裕的地方。而这一带粮食缺少，牛羊有限，衣著之布皮也不易解决，军事上的补充更困难。因此，在这岷江西岸懋、松、理地区是不利于建立根据地的，如陷在这里就没有前途。我们应迅速向前，在川陕甘建立革命根据地。

（二）关于战略行动

《报告》说：一、四方面军转移，向南不可能；向东过岷江，敌在东岸有 130 个团，对我不利；向西北是广大草原。现只有转向甘肃，向岷山山脉以北，背向西，争取这一地域。这里道路比较多，人口多，山少。在此必会遇到敌人，我可用运动战消灭它。敌进慢，我可得这一大的地区，可向陕西迎击敌人，再向北行动背向西发展。南可以以南青海一部分作依靠。四川方面，现地区可成为游击区。拟到的地区是否再扩大，要看到那地区后再决定。我们现在是反攻，是无后方的运动战，这性质是不可久的。我们要勇猛果敢、巧妙机动、毫不迟疑地打击敌人。消灭蒋介石的主力是我们的主要任务。

转移计划是战略的主要计划，实现战略计划的原因：第一，向松潘与胡宗南作战，向松北转移，基本条件要迅速。敌人会首先阻我向西北，我主要任务是与敌作战。第二，高度机动。现敌先我部署，因此我应高度机动，使敌对我估计发生动摇，使其部署赶不上我们。我们不要被敌牵制，不要因此妨碍我们的机动，

这样才能消灭敌人。第三，坚决统一意志。两个方面军部队大，要特别坚决的统一指挥，遇到困难，也要统一意志来克服。——这三个条件是最高原则，必须实现。

在地域布置上，分左中右三个纵队。中央纵队六个团。右纵队进攻松潘，佯动主要在东岸，使敌不会集中松潘。现地域不好而我主要力量在东岸，应早点过来。在南边须四个团兵力牵制敌人。三个纵队的部署指挥须统一。战争指挥：第一，须在前线，主要都应在左纵队。各部队最终须平行的走，主力须力争过去。这游击区留小部队在此活动。第二，走到北边，或还须过草地，在此夏天一般能克服过去；如不力争迅速过去，到冬天更困难。第三，万一不能过向西，或许困难更多，因而这条退路须保留。

（三）关于战争指挥

指挥问题的最高原则：第一，应集中统一，指挥权要集中军委；第二，为使作战更有力量，须组成左中右三个纵队，游击支队，另专门讨论决定；第三，实现战略计划要有政治的保证，当前的一些困难须从政治工作的加强来克服。

周恩来报告之后，会议进行了充分的讨论，有13人相继发言。发言的次序为：张国焘、彭德怀、林彪、博古、毛泽东、王稼祥、邓发、朱德、刘伯承、聂荣臻、凯丰、刘少奇、洛甫。

张国焘在发言中说：“恩来已说过，我以为政治局〔应〕通过战略方针，主要在陕〔甘〕南怎样实现，政治局来布置。”继而在讲了一些两军会合前的情况之后，又说：“在懋功一、四方面军会合了，消灭敌人当更有把握。现在怎样打？现接近我的是胡宗南与刘湘，其他为陪角，如战略向南向成都，打这些敌人是不成问题。若消灭了他，成都蒋会加军力，向东打受地势的限制。现发现方向，西边青海是过草原，冬天过，没帐帆冷得很，夏天雨期长途行军会大减员。”“发展条件是甘南与我有利，但一定要把胡宗南打下。如他来打可消灭他，如他不来也不便多事去

打。但一定会有后来追我〔之敌〕，兵力至少会有15个团，他有20个团一定来牵制我，还有蒋。我们去甘南还是立足不稳的，还是要移动地区，还是要减员。所以，要向甘南一定要取得主力打下胡敌，至少打下他几个团，才能立稳运动战中各个击破敌人。现以消灭胡敌为重点。如有同志有这观点，可勿庸下打胡敌，是没这道理的。两个主力会合，力量增强，指挥统一，经验增加，另方面〔敌人〕不会让我们很易占领大的区域，只要有一个地方有一个月的根据地，就可消灭敌人。政治局应决定在甘南建立根据地。至于怎样打，军委应作具体计划。许多军事计划不容慢，要快，有错随时可改。政治局与军委又接近。政治局应赶快决定迅速的定下。”

彭德怀作了简短的发言，对战略方针表示同意，认为报告对形势的分析向东，向南，向西都说得清楚。指出战术只能临时决定。

林彪发言中说：恩来报告国焘发言是同意的，根据这方针定出以后的行动。这战略方针的实现，靠打胜仗，消灭敌人有生力量，不然没法扩大红军、创造根据地。作战方式，应采取运动战。在这战役中应尽可能控制广大地区。应把主力拿前面去与敌人作战，拿少数部队去扩大红军，征集资材。他发言说到：再后在新疆打通苏联，蒙古包括进去。这些计划上应提到。

博古发言中指出：一、四方面军会合后，战略方针应有新的决定。现在力求到达经济、居民、政治、军事条件上比现在好的地区，这要依靠两个方面军消灭敌人来实现。我们必须有一定地区成为根据地，并作出模范来影响全国。现在川陕甘首先在甘南，依靠群众工作，游击战争，这就能影响全国。这是我们的战略方针。夺取松潘，打击胡敌，是实现战略方针的枢纽。今后应努力做到不像从前那样没有后方的作战。现在战争性质与前不同，每个大战役都应建立临时后方，并由游击区发展成根据地。

毛泽东在会上作了重要发言。他首先表示：“周报告国焘等发言我同意。”接着谈了以下五点：

(一) 根据地问题。为什么弄到这〔川陕甘〕区域来？这区域有它的好处：把苏维埃运动放在更加巩固的基础上，一、四方面军会合也在此。大家懂得这是向前，在四方面军应作解释，因他们是打成都。

(二) 战争性质，不是决战防御，不是跑。是什么？是进攻。根据地的建立是依靠进攻的。我们过山战胜胡宗南，占取甘东，迅速向前。前面打退敌人后建立根据地。

(三) 我没根据地，蒋介石高度机动。我应看到哪些地方他是致我命的，应先打破。我须高度机动，这就有走路问题、掉队问题。蒋介石军队与四川军是不同的，如不好走的路他也能走，如我迟缓他即占了先机。

(四) 要集中兵力，把主力集中在主攻方面。胡敌是会集中兵力的。敌与我打野战，我有 20 个团以上是够的；敌不与我打野战，守堡垒，这一个一定要打破。如实在打不破，就要估计好距离打。现迅速的就是打破胡敌向前，今天决定，明天即须行动。这地区条件太坏，后退不利，应力争六日突破，经松潘到预定地区去。

(五) 统一指挥问题，责成常委军委解决。

王稼祥在发言中指出：(一) 一、四方面军会合后力量大了，甘陕川又有好的条件，这地区能使我建立根据地。但能否成为根据地，就靠我们能否消灭敌人。如认为一面无敌，后退无穷，这就错了，这是躲避斗争。我们把苏维埃扩大到全国，主要不是打通苏联，而是坚决斗争，扩大苏区，主要是消灭敌人。(二) 战争怎样打？敌采取堡垒战对我，因此，我应有大区域，好机动，以运动战去消灭敌人。如我取堡垒战是不能取胜的。现我没有后方，还是带游击战争的形势，中央苏区的经验告诉我们不能全采

正规战争，应正确的运用过去的经验。（三）这区域条件坏，它能使我与四方面军会合，因敌不易来；但会合了，这地区对我即不利。敌想陷我在此，逼到草地。我应迅速打出，到甘川陕广大地区。从松潘打出去是一个关键，动作如快，困难即少，慢即更难打。蒋介石很机动，但机动的红军总是超过他。只要指挥正确、坚决、迅速，我们能战胜困难，战胜敌人。

邓发的发言，除同意周恩来的报告和其他发言外，还指出：一、四方面军会合，红军主力在这里，党的力量也在这里，发展前途是推动中国革命的前途。我们现在向前打去，不是打通苏联，而是向前，向甘南发展。这里的后方需要整理，应组织委员会来缩编，大的机关单位如政治部和医院要缩编，闲杂人员补充到战斗部队。一、三军团应补充。要进行大的政治动员，消灭对雪山、草原的恐惧。

朱德发言说：同意报告。背靠西北，面向东南，总的方针应决定下来。要迅速打出松潘，进占甘南，打下敌人，建立根据地。要调动敌人，在野战中消灭敌人。目前建立临时后方，在大战中是必要的，它很快就可变成真的根据地。两主力会合增加很大力量，不但数量，同时统一指挥，一致行动，更有利于打击敌人。我们还须要用很大力量从政治上来保障胜利。

刘伯承说：报告、发言对战略说得很清楚。在战略上，中心向东南发展，引起时局变化，使蒋介石兵力分散。对胡宗南，最好在松潘消灭他，如不可能就在岷江消灭他。要通过作战，增强我有生力量，消灭敌有生力量。现在这个区域，要建立党的工作，开展游击战争，特别是民族问题的正确解决，都对我整个行动有利。

聂荣臻说：两主力会合，部队很兴奋。对口号，政治部应改变过来。此前四方面军的口号是打到成都去，一方面军口号是赤化全四川，这些口号在部队中很有力量。现在是相反的走向，应

向部队解释。

凯丰的发言，除同意大家意见外，还指出：实现这一战略方针，首先打胡宗南是主要关键，应坚决向前。这一战略方针的实现，将使苏维埃运动成为领导全国的革命运动。我们从甘南向川陕发展，把苏区巩固在此。要坚决，如不坚决就要向西走，使敌人更易封锁我，虽有苏联帮助也不易出来。应向部队解释，最中心的是进攻松潘。

刘少奇的发言，首先表示同意战略方针。指出：要很好的向部队解释敌情，解释为何不能向成都去，去川陕甘好的条件也要解释清楚。我们坚决通过松潘，但有些部队万一不能通过，应交代以后的工作，应在此区域成立特委。

洛甫发言说：战略方针大家一致意见，应一致来实现。这战略方针，是前进的，唯一正确的。要实现这战略方针，首先进攻和控制松潘。困难是可能发生的，我们应想法来克服，但不是转变，放弃这一方针是错误的。创造川陕甘苏区，只有依靠决战胜利，想起减员等我认为没必要。这地区窄狭，不能以大的运动战消灭敌人，故不好。争取前进，前有广大地区，建立苏区意义比其他区域大。保持后面的路也是一个条件。这区域要尽量发展游击战争，成为游击区，安插病员与笨重的东西。最后他指出：（一）组织上应统一；（二）依照战斗部队组织队伍；（三）缩小政治部以及大的机关，干部的调剂、人员的调剂要有具体商量。

会议讨论发言后，由周恩来作了结论。他说：各同志都是同意的意见。（一）战争性质，现方针当然是进攻的。我们过去在路上讨论过战争性质问题，那时是无后方的运动战，现在不同，是转入反攻，建立根据地，进到大的地区须与敌战斗。（二）在甘肃南部更便利消灭敌人。对胡宗南一般求在野战中消灭他，有可能时就在工事中消灭他，也有可能他在堡垒中，我们不易打他，但并不是不消灭他我们就不能前进。当然他会尾追、切断

我，我可用隐蔽、高度机动来处理变化的情况。

自两主力会合开始到到达预定地区的口号是：赤化川甘陕。通过新的战略方针，司令部应有战役计划，政治部须有政治训练口号发出。两个方面军都要行动，粮食计划等都应在明天就要弄好。

会议记录的最后部分，记载着此次会议的决议事项：“全体通过恩来的战略方针；政治部作训令（博古）；政〔治〕局写一个决定（洛甫）。”

1935年6月28日，根据两河口会议的精神，中央政治局发出了《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战略方针的决定》。内容有以下五点：

一、在一、四方面军会合后，我们战略方针是集中主力向北进攻，在运动战中大量消灭敌人，首先取得甘肃南部，以创造川陕甘苏区根据地，使中国苏维埃运动放在更巩固更广大的基础上，以争取中国西北各省以至全中国的胜利。

二、为了实现这一战略方针，在战役上必须首先集中火力消灭与打击胡宗南军，夺取松潘与控制松潘以北地区，使主力能够胜利的向甘南前进。

三、必须派出一个支队，向洮河、夏河活动，控制这一地带，使我们能够背靠甘、青、新、宁四省的广大地区，有利地向东发展。

四、大小金川流域，在军事、政治、经济上均不利于大红军的活动与发展，但必须留下小部分力量发展游击战争，使这一地区变为川陕甘苏区之一部。

五、为了实现这一战略方针，必须坚决反对避免战争退却逃跑以及保守偷安停止不动的倾向，这些右倾机会主义的动摇是目前创造新苏区的斗争中的主要危险。

以上就是两河口会议的基本情况和关于到川陕甘建立革命根

据地的新的战略方针产生的过程。

张国焘在其所著《我的回忆》第三册《懋功之会》一章中，对两河口会议的史实作了任意的篡改。下面我们征引张著的原文来作些考辨。

张国焘说：“上午九时，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张闻天、秦邦宪和我六个政治局委员以及参谋长刘伯承，齐集在毛泽东的住所举行军事会议。首先由毛泽东提出了向甘北宁夏北进的军事计划。他说明共产国际曾来电指示，要我们靠近外蒙古，现在根据我们自身的一切情况，也只有这样做。我当即发问：‘共产国际何时有这个指示？’张闻天起而答复：在他们没有离开瑞金以前（约十个月前），共产国际在一个指示的电报中，曾说到中国红军在不得已时可以靠近外蒙古。中央离开江西苏区后，即与共产国际失去联系，现在无法通电报。

“毛泽东谈笑风生的说下去。他说他打开地图一看，西北只有宁夏是富庶的区域，防守那里的马鸿逵部，实力也比较薄弱。莫斯科既有这样的指示，虽然事隔多时，相信仍会从外蒙古方面来策应我们，那我们也不怕外蒙与宁夏之间那片广大沙漠的阻隔了。

“他自己问自己：‘为甚么我们要到宁夏去？’他自己答复说：‘主要是蒋介石的飞机和大炮厉害，现在蒋介石得意，我们倒霉。他耀武扬威的找我们打，我们不中他的鬼计，偏不和他打，我们不动声色的跑到宁夏，背靠着外蒙古，看他还有甚么办法？’他继续说明：我们的同志们不肯老老实实的承认飞机大炮的厉害，现在我们只有变个戏法，也到外蒙古去弄点飞机大炮，来回敬蒋介石。如果没有飞机大炮，那就再不要说‘打倒蒋介石’这句话了。

“他加重语气继续说：‘打开窗子说亮话，我们是有被消灭的危险的。’他说到宁夏去必须由四方面军担负掩护的责任，这样，在最恶劣的情况下，也可以掩护中共中央和多数干部安全到达宁

夏地区。如果在宁夏再不能立足，至少中共中央和一部分干部，也可以坐汽车通过沙漠到外蒙古去，留下这些革命种籽，将来还可以再起。他还说这是他的冷静想法，也许被人视为右派，但他请求我们慎重考虑他所提出来的计划。”

查当时的会议记录，如上文所述，会议乃是由周恩来作的报告，是周恩来“首先发言”。周恩来提出的是到川陕甘建立革命根据地的战略方针，而不是“向甘北宁夏北进的军事计划”。毛泽东发言是在张国焘之后，是讨论发言的第五位，他的发言内容与张国焘的《我的回忆》所写的并无共同之处。可知张著作伪。

张国焘说：“我继起发言，将我所知的西北情况和我的想法报告出来，供同志们参考。我说我们在西北的活动，可能有三个计划：一是以现在我们所占领的地区为起点，向川北甘南至汉中一带发展，以西康为后方，可以名之为‘川甘康计划’；二是移到陕甘北部行动，夺取宁夏为后方，以外蒙古为靠背。这就是毛泽东所提出来的‘北进计划’；三是移到兰州以西的河西走廊地带，以新疆为后方，可以名为‘西进计划’。我提出资料，阐释这三个计划的优点和缺点。我说着的时候，大家都一边听一边在翻阅地图。”张国焘接着用了2000多字的篇幅絮絮叨叨地描绘他如何陈述所谓的“三个计划”，那些文字这里已无征引之必要。

查会议记录，如前所述，（一）张国焘除同意周恩来的战略方针之外，并未提出任何不同的“计划”；（二）历史事实上根本没有所谓的“毛泽东所提出来的‘北进计划’”，没有“首先由毛泽东提出……”这桩事实。会议记录上记载的张国焘的发言，明白地是说“政治局应决定在甘南建立根据地”，又足证明张著作伪。

历史事实是，在会上张国焘表面上同意红军北上，但在会后又暗中酝酿南下，这是在玩弄两面派手法。后来他在《我的回忆》中的说法，是蓄意伪造历史，为自己的两面派行为作辩解。

张国焘说：“参加会议的同志们，多表示现在我们的着重点

是避开战争，找寻一个能有较长时间休养生息的地方，到什么地方都好，只是不喜欢这个吃糍粑的区域。他们虽然大多数表示支持毛的主张，但也没有否定我的西进意见。”

遍查与会者所有的发言，有一点点张国焘所说的影子吗？周恩来在报告中指出：为实现战略方针，我们要勇猛果敢、巧妙机动、毫不迟疑地打击敌人。消灭蒋介石的主力是我们的主要任务。毛泽东在发言中更加明确地指出：战争的性质不是决战防御，不是跑，而是进攻。根据地是靠进攻去创建的。这里根本没有如张国焘所诬陷的见飞机大炮就怕、就跑；没飞机大炮就休言打倒蒋介石的意思。王稼祥在发言中说：那种认为一面无敌，后退无穷，是躲避斗争。要把苏维埃扩大到全国，就要坚决斗争，扩大苏区，主要是消灭敌人。邓小平发言中说：红军主力在这里，党的力量也在这里，发展前途是推动中国革命的前途。朱德指出：要迅速打出松潘，进占甘南，打下敌人建立根据地。其他与会人在发言中也都反映了同样的思想和决心，也根本没有任何类似张国焘编造的言论。这又足以证明张著是伪，是污蔑和诽谤。

张国焘：“会议一连开了三个多钟头，并未达成确定的结论。到了吃午饭的时候，毛泽东以主席的身份宣布：‘这个问题关系重大，我们再从长研究吧！’不料毛的这句‘从长研究’并未兑现，我们以后一直没有再开会讨论这个问题，毛的北进主张便当作多数赞成，开始实施。”

亦如前述，会议结论是由周恩来作的。会议有明确的决定：“全体通过恩来的战略方针。”而张国焘在会上的发言，开头是“我以为政治局通过战略方针，主要陕〔甘〕南怎样实现，政治局来布置”；结尾又是“政治局应决定在甘南建立根据地”，“政治局应赶快决定迅速的定下”，等等。所以，周恩来的结论一开头便说：各同志都是同意的意见。这些又足以证明张著作伪。

至此，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张国焘对会议的描述，自始至

终，通篇都是谎话。

但是，还有一点值得澄清一下，即张国焘所说的“后来事实说明中共中央在我未到抚边前，即已决定了北进，可是并没有告诉我”。这段话依然是扯谎。

实际情况是：在中央政治局两河口会议之前的10天——6月16日，中央即发电给张国焘，提到“为把苏维埃运动之发展，放在更巩固更有利的基础上，今后我一、四方面军总的方针是占领陕甘川三省，建立三省苏维埃政权”。同时指出张国焘的川康计划，正是敌人所希望的，“主力出此似非长策”。最后告张国焘有何意见乞复为盼。6月17日，张国焘复电反对。复电说：“川北一带地形给养均不利大部队行动”，而“敌已有准备”，不宜过岷江东打。他提出了“集中主力”西进“青海、新疆”或南下川、康的退却方针。6月18日和20日，中央两次电示张国焘，指出他向西或向南发展方针的错误。18日电指出：“目前形势须集中火力首先突破平武，以为向北转移枢纽。”并针对张国焘的错误，指出：“兄我如此大部队经阿坝与草原游牧区域入甘、青，将感绝大困难，甚至不可能。向雅（安）、名（山）、邛（崃）、大（邑）南出，即一时得手，亦少继进前途。因此力攻平武、松潘，是此时主要一着，望即下决心为要。”由于中央北进方针遭到张国焘的抵制，中央20日电末尾遂通知张国焘“宜立即赶来懋功，以便商决一切”。

中央在五天内给张国焘连发三电，张国焘也曾回电，而且看到最后一电后才有懋功之行和他所说的“懋功之会”。这足以证明：张国焘《我的回忆》所称中央的北进计划事先没有告诉他，又是一大谎言。

（李云龙：《介绍两河口会议——兼辨张国焘〈我的回忆〉为伪》）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瓦窑堡会议

开会的地点在党中央总负责人张闻天住的窑洞。它坐落在半山坡上，窑洞内陈设简陋。窑洞中间有一张旧方桌和几条粗笨的凳子，是来客或开会时的坐席。窗纸是新糊的，使整个窑洞显得亮堂而有生机。出席会议的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博古、刘少奇、邓发、张浩等人，主要讨论两个问题：“政治形势与策略”和“军事战略”。会议最终确定了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策略。

1935年12月13日，毛泽东继周恩来之后从前线到达瓦窑堡。这时，张闻天和林育英（张浩）、博古应毛泽东12月8日电约已到安塞等候。12月14日深夜，张闻天接到毛泽东的电报，知道毛已于13日抵瓦窑堡，遂立即返回。党中央两部分同志自11月4日在甘泉下寺湾分手以后，已经一个多月，现在又会合在一起了。从12月17日起，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瓦窑堡中央政治局会议开始举行。

开会的地点就在张闻天、刘英住的窑洞。它是田家院内一排窑洞中间的一孔，坐落在半山坡上。窑洞内陈设简陋。临窗一张条桌，是张闻天平时办公写文件的地方。窑洞中间有一张旧方桌和几条粗笨的凳子，就是来客或开会的坐席。窗纸是新糊的，使整个窑洞显得亮堂而有生机。出席会议的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博古、刘少奇、邓发、张浩等人，随便坐定，讨论两个主要

议题“政治形势与策略”和“军事战略”，决定着在此历史转折关头关系党、红军与整个中国命运的大事。政治局委员们精神都很振奋。毛泽东、周恩来在直罗镇前线打了胜仗，敌人对陕甘根据地的第三次“围剿”被粉碎了；同共产国际中断了一年多的联系如今恢复了；广泛的统一战线的策略路线基本上已经明确，重大的政策改变已经开始，从内战到抗战的伟大战略转变的序幕已经拉开了；从国民党统治区又传来了北平学生“一二九”反日游行示威的消息，一个抗日救亡运动的新高潮正在全中国兴起。中国革命摆脱了危机，走出了困境，一个新的大变动的时代来到了！

张闻天主持了这次重要会议。他就会议的第一项议程——政治形势与策略，作了报告。张浩在会上作了关于共产国际“七大”的传达报告。他没有带回文件。他离开莫斯科的时候，共产国际“七大”还没有开完，他仅凭记忆，传达了共产国际为适应新形势的发展，改变在“第三时期”理论指导下的“左”倾政策，实现革命战略转变等主要精神。自12月17日至19日，中央政治局进行了充分的讨论，从中国实际出发，具体地分析了国内外形势，确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毛泽东对会议很满意。在12月19日20时给当时正在指挥围攻甘泉的彭德怀去电报中说：“政治局会议开了三天，关于总的政治问题（形势与任务）讨论完了，真是一次很好的讨论，可惜你没有来参加。”当天24时，毛致林彪、彭德怀、叶剑英、程子华电中又说到：“政治局已开了三天会，很好的讨论了当前的形势、力量与任务。”

张闻天受政治局委托，起草了会议决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通称《瓦窑堡会议决议》），经12月25日政治局会议通过。决议分六部分：（1）目前形势的特点；（2）党的策略路线；（3）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4）苏维埃人民共和

国；(5) 党内主要危险是关门主义；(6) 为扩大与巩固共产党而斗争。

这个决议对于当时中国内外的形势，阶级关系的变化作了完整的分析，确定并系统地阐明了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路线和各项方针、政策。决议指出，目前时局的基本特点是日本帝国主义准备“单独吞并中国”，这一行动“震动了全中国和全世界”，使帝国主义内部矛盾空前紧张，使中国掀起了新的民族革命高潮，引起了中国各阶级、阶层相互关系的变化。在新形势下，不仅工人、农民、广大的小资产阶级群众和革命的知识分子是抗日的基本力量，而且“一部分民族资产阶级与军阀”，也有“直接参加”反日战线的可能。即使“在地主买办阶级营垒中间”，也可能发生分化，“党的策略路线，是在发动、团结与组织全中国全民族一切革命力量去反对当前主要的敌人——日本帝国主义与卖国贼头子蒋介石”。为了战胜日本和蒋介石，必须运用“最广泛的反日民族统一战线（下层的与上层的）”。决议提出，“不论什么人，什么派别，什么武装队伍，什么阶级”，只要反日反蒋，“都应该联合起来开展神圣的民族革命战争”；“我们的任务，是在不但要团结一切可能的、反日的革命力量，而且要团结一切可能的反日同盟者，是在使全国人民有力出力，有钱出钱，有枪出枪，有知识出知识，不使一个爱国的中国人不参加到反日的战线上去。这就是党的最广泛的民族统一战线策略的总路线”。决议宣告：把“苏维埃工农共和国”改变为“苏维埃人民共和国”；“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是反日反卖国贼的最广泛的与最高的民族统一战线的组织”，实行“十大政纲”；决定改变对小资产阶级群众、知识分子、富农、民族资本家以及白军官兵的政策。决议要求全党“大胆的运用广泛的统一战线”，在实际的群众的斗争中“表现出他们是无坚不破的、最活泼有生气的中国革命的先锋队”，去取得民族革命战争的领导权。为此，必须同党内的主

要危险关门主义做坚决的斗争，同时要警惕“1927年时期的陈独秀主义，在新的大革命中，在部分的党部与党员中的复活”。

自红军落脚陕北以来两个月间，张闻天所作的报告、结论、发言，撰写发表的文章，起草或主持下形成的宣言、决定、决议，数量十分可观。他发扬民主，集中中央领导集体的智慧，正确地分析了新的形势，提出了新的战略任务、新的策略路线和新的方针政策，及时地、逐步地推动了党的策略转变，所有这些都为瓦窑堡会议的胜利召开奠定了理论基础和政策基础。而《瓦窑堡会议决议》正是上述一切的系统概括与充实发展，使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路线更为明确、更为全面、更为完整。同时，作为中国共产党中央的总负责人，张闻天成功地主持了这样一次极其重要的会议，起草了这样一个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文件，说明他完全摒弃了党内长期存在的家长制和一言堂的作风，真正实现了集体领导，说明包括张闻天在内的党中央领导核心，已经从过去革命历程中汲取了教训，学会了从中国当时的具体实际出发，不是机械地照搬，而是创造性地运用共产国际提出的策略方针，来指导中国的抗日救国斗争。

在1935年1月的遵义会议上，张闻天作了反对错误军事路线的报告，会后被推选在党内负总责，主持扎西会议，通过了他写的《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即《遵义会议决议》），为解决军事路线作出了贡献。1935年12月，他又主持了瓦窑堡会议，通过了他写的《中央关于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为解决政治路线作出了贡献。一年之间，成就这样两件大事，其光耀将永远照亮中国共产党的历史。

瓦窑堡会议还讨论了军事战略问题。12月23日通过了毛泽东起草的《关于军事战略问题的决议》，确定“把国内战争同民族革命战争结合起来”、“准备直接对日作战”、“扩大红军”的方针，确定红一方面军行动部署的基础应放在“打通苏联”与“巩

固扩大现有苏区”这两个任务之上，并把“打通苏联”作为中心任务。同时提出了游击战争在民族革命战争中的重大战略作用。张闻天在讨论时发言，结合自己的认识过程，充分肯定毛泽东总结土地革命战争经验而概括出来的积极防御、诱敌深入、大踏步进退、集中兵力于主要方向、战略的持久战与战役的速决战等作战原则。并自我批评说，过去在上海对毛泽东游击战争的正确的作战原则“未能了解”，还说什么是“机会主义动摇”，五次反“围剿”战争和长征都证明这些战略、战术原则是正确的。张闻天提出，要吸取历史教训，“教育我们同志，使同志能灵活运用”。张闻天自己对毛泽东的军事思想领会是深刻的，确实能够自觉地灵活运用。就在一个多月前，1935年11月18日，他主持了专门讨论游击战争问题的中央政治局会议并作了“总结”，论述了游击战争的战略地位，相当系统地提出了发展陕甘游击战争的指导思想和具体意见。张闻天指出：“游击队任务不仅是配合红军作战，主要的是创造、巩固、扩大苏区，与红军担负同样的任务，主力红军在突击方向，各方应靠游击队。”11月21日作出的《中央关于发展陕甘游击战争的决定》，其要点同张闻天所作“总结”是一致的。

瓦窑堡会议开启了中国革命历史的新篇章。会议一开完，毛泽东和张闻天等一起立即为传达、贯彻会议而紧张忙碌地工作。12月27日，党中央在瓦窑堡龙虎山脚下西北办事处的礼堂（原是基督教的一座礼拜堂）召开了党的活动分子会议。张闻天主持会议，毛泽东作《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著名报告，传达瓦窑堡会议的决议，系统地、精辟地阐述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毛泽东指出，中国正处在大变动的前夜，即处在新的全国大革命的前夜，这是现时革命形势的第一个特点。又一个特点是，帝国主义还是一个严重的力量，革命力量的不平衡状态是一个严重的缺点，要准备打倒敌人必须准备作持久战。这两个特点

就要求我们必须勇敢地抛弃关门主义，采取广泛的统一路线。党的任务就是把红军的活动和全国的工人、农民、学生、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的一切活动汇合起来，成为一个统一的民族革命战线。毛泽东的报告在全党起了振聋发聩的作用。

接着，张闻天连续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贯彻瓦窑堡会议决议，转变各项政策，全面部署工作。12月29日，政治局会议讨论北方局工作方针和组织领导。1936年1月2日，讨论新形势下组织工作的转变。1月3日，讨论了工会工作怎样纠正“左”的倾向，按照统一战线策略来发展工人运动。1月10日和17日，先后召开常委会和政治局会议，决定红军渡黄河东征的作战方针和组织领导。1月22日的政治局会议讨论了少共工作，张闻天要求彻底转变工作方式，克服第二党倾向，在青年中实现广泛的统一战线。同时，联合东北军的工作也在进行。总之，在瓦窑堡会议后短短一个月时间里，张闻天同党中央领导集体一起，对政治策略和军事行动都作了一系列部署，促使各项工作自觉地实行转变，为“组织千千万万民众进入伟大的民族革命战场上去”，建立起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努力奋斗。当然，这仅仅是开始，要达到瓦窑堡会议提出的目标，还需要经过许多尖锐复杂以至惊心动魄的斗争，走过曲折漫长的道路。

（程中原著《张闻天传》）

清算张国焘的错误： 1937年3月延安会议

1937年3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延安召开。会议共有两项议程。第一项是讨论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与国民党三中全会以后，国内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形势以及党在这个阶段的新任务。第二项是讨论张国焘的错误。张国焘在检查中承认自己“是路线的错误，是退却逃跑的错误，是反党反中央的错误”。

1937年3月在延安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是抗日战争爆发前夜中国共产党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这次会议分析了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与国民党三中全会以后，国内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形势以及党在这个阶段的新任务。这是这次会议的主要议题。会议的另一项重要内容是，系统地揭发和批判张国焘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

现将延安会议的情况介绍如下：

一、延安会议的时间、日程和参加人

延安会议于1937年3月23日召开，31日结束。目前有些文章和书籍说会议时间是3月27日至30日，是不准确的。

会议共有两项议程。从3月23日到26日，进行第一项议程，讨论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和国民党三中全会以后，国内抗日民

族统一战线的形势和中共的任务。第一天，听取张闻天、毛泽东的报告，24日和26日讨论两天，最后由张闻天作结论。参加这一阶段会议的有毛泽东、张闻天、朱德、彭德怀、贺龙、任弼时、博古、林伯渠、罗荣桓、廖承志、徐特立等26人。

3月27日到31日，进行第二项议程，讨论张国焘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张国焘在会议开始的时候作了检查，以后进行揭发批判。毛泽东、朱德、任弼时、彭德怀、贺龙、林伯渠等在会上发言。31日的会上，由张闻天作总结，最后张国焘、何畏等作了表态发言。参加这一阶段会议的，除参加第一阶段会议的大部分同志外，又扩大增加了董必武、萧劲光、胡耀邦、林彪等，与会的共56人。

目前有些书籍和文章一般都说延安会议只有后一项内容，也是不准确的，实际上会议的主要议程是第一项内容。

二、会议第一项议程的内容

会议在听取了张闻天、毛泽东的报告并进行讨论后，一致同意两个报告。会后根据毛泽东报告的主要内容，发表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告全党同志书》（为巩固国内和平，争取民主权利，实现对日抗战而斗争。1937年4月15日），根据张闻天报告的内容和毛泽东报告的部分内容，发表了《国民党三中全会后我们的任务》（中央宣传部宣传大纲。1937年4月3日）。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告全党同志书》的主要内容是：

（一）指出当日本帝国主义侵袭，民族存亡千钧一发之际，中日矛盾成为主要的矛盾，国内矛盾降到次要和服从的地位，这是中共提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新政策的依据。要求全党同志在任何曲折变化的形势下，紧紧抓住这个基本矛盾，作为自己一切行动的基点，认定中华民族的最大敌人是日本帝国主义，并坚信这

个敌人我们是能够战胜的。

从这个观点出发，《告同志书》批驳了关于中共给国民党三中全会的四项保证是“共产党的投降”的胡说。指出中共的让步是为实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必要步骤。这种让步不但不是削弱党的发展，而且更能扩大党的政治影响与组织力量，以增强党在民族革命运动中的领导作用。

从这个观点出发，《告同志书》阐明了中国共产党对三民主义的态度。目前在民族危机与社会危机极端严重，国民党已不能照旧统治下去，全国人民与国民党多数党员重复要求国共合作的时候，再整顿革命三民主义的精神，实行国共两党重新合作，团结全国人民共同为民族解放、民权自由、民生幸福三大目标而奋斗，乃是完全适合中国革命客观历史行程的光荣事业。

从这个观点出发，《告同志书》还指出，在民族矛盾是主要矛盾的前提之下，国内阶级矛盾依然存在着，有时还会相当尖锐，中国共产党的原则是使这些矛盾能够得到适当解决，不但不削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并须使之增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力量。

（二）指出由于国内外形势的变动，由于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初步胜利，全国人民与党的“停止内战”的目的已经实现了，中国革命形势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在目前新阶段内，党的工作的中心一环，应该是抗日的民主运动的发展。

（三）指出中国无产阶级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中，从没有放弃力争自己政治领导的责任。因为半殖民地中国的资产阶级存在着严重的软弱性与不彻底性，民族解放运动只有得着无产阶级的政治领导才有彻底胜利的可能。

《中央宣传部宣传大纲》的主要内容是：

（一）指出因为国内外形势的变动，迫使国民党不得不放弃

自己原来的政策。国民党三中全会的宣言和决议，虽还有许多不足之处，但无论如何，它是表示国民党政策开始转变。而国民党政策的开始转变，又影响了国内国外形势的变化。（二）分析了日本对华新政策的实质，指出佐藤外交并没有放弃广田的三原则，他只想在新政策和平烟幕的掩盖下，利用时间，巩固在中国已得的地位，拆散中国的团结，而准备新的占领，以达到灭亡中国的目的。（三）指出国民党三中全会以后，中国形势开始了一个新的时期。如果三中全会前一个时期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的中心一环是停止内战，一致抗日，那末争取民主权利的实现便是巩固和平统一、准备对日抗战的关键。（四）申明了中国共产党对三民主义的态度，主张恢复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五）阐明了中日矛盾成为主要矛盾的前提下，解决国内矛盾的基本原则。（六）揭露了中国托派的汉奸面具。（七）提出了和平实现以后中国共产党的基本任务：1. 坚持抗日统一战线的政策，坚持抗日救国的方针，对于民主权利的实现与人员生活的改善，都是要环绕在抗日的问题上。2. 善于应用一切适用的斗争方式，由武器的批评转到批评的武器。3. 建立全国范围的工作，培养每一个地区的坚强的独立的干部。4. 重新教育干部，使他们了解新的策略和新的工作方式。5. 发展党内民主，提高党员干部的积极性、自动性、警觉性。6. 加强党内的思想斗争。关于坚持无产阶级领导权问题，除了两个文件中所提到的以外，毛泽东和张闻天的报告都强调了注意加强苏区、红军中党的领导。

为了贯彻延安会议的精神，进一步动员全党和全国人民为巩固和平，争取民主，实现抗战而斗争，延安会议决定召开中国共产党苏区代表会议。

三、会议第二阶段的情况

3月27日会议上，首先由张国焘作检查。他承认，在鄂豫皖工作时期，没有巩固政权的观念，因此发生了失败观念。开始在肃反中发生“左”的错误。在反第四次“围剿”中，以为国民党是“偏师”，发生“左”倾观点，影响到粉碎四次“围剿”的胜利。肃反错误进一步发展，一直到陕北。在川陕苏区时期，在城市政策中又发生“左”的现象，肃反错误严重，不信任知识分子，在党内形成家长统治。张国焘承认1935年一、四方面军会师以后，发生了路线错误。由于对民族运动估计过低，对敌人力量估计过大，对中央红军的胜利估计不足，反对中央北上的战略方针，成为右倾机会主义的逃跑路线。由于军阀主义等倾向，发生反抗中央的表示，特别是错误地提出了改组中央，最后发展到另立中央。由于中央的耐心教育和路线的正确，朱德同志和二方面军领导坚定的立场，四方面军的干部拥护中央，才取消了第二“中央”。张国焘在检查中承认自己“是路线的错误，是退却逃跑的错误，是反党反中央的错误”。但是对一些具体错误事实，却又进行辩护。张国焘检查以后，朱德、毛泽东、彭德怀、贺龙、廖承志等发了言。这些发言，用大量事实揭露了张国焘右倾分裂主义和军阀主义的错误和罪恶，指出了张国焘的错误给中国革命事业造成的严重危害，分析了张国焘错误产生的思想根源和历史根源，指出了从张国焘的错误中应该吸取的教训。许多发言，在批判张国焘错误的同时，还充分肯定了广大四方面军干部对中国革命作出的重大贡献，指出四方面军的大批干部，在过去艰苦奋斗，不怕牺牲，不畏险阻，英勇苦战，忠诚献身中国的革命事业，在将来是“中国革命的很大基础”。会上，许多同志提出，要求给张国焘做组织结论，并开除其党籍，撤消中央委员、政治

局委员、红军总政委、军委副主席等职务。

3月31日，张闻天代表中共中央在会上作了总结发言。发言指出张国焘错误的主要内容，分析了错误发生、发展和破产的历史过程，说明了取得反对张国焘路线斗争胜利的原因，分析了张国焘错误的历史根源和思想根源，指出了这一错误给中国革命造成的恶果以及全党应该从中吸取的教训。总结充分肯定了四方面军广大干部对中国革命的贡献，指出一切把反对张国焘主义的斗争故意解释为反对四方面军全体干部的斗争的企图与阴谋，应该受到严重的打击。总结最后提出，考虑到张国焘在党内的历史，对于错误，他已开始承认，还应该帮助他，提议暂不作组织结论，还保留他在中央的大部分工作。

总结以后，张国焘等又在会上表示同意中央的路线，承认自己有错误，表示要同自己的错误斗争。

最后大家一致同意停止讨论，对张国焘不作组织结论，并根据张闻天代表中央所作总结的内容作出《关于张国焘同志错误的决定》。会议于31日结束。

会后，4月6日张国焘又发表了《关于我的错误》，表示完全同意中央政治局关于他的错误的决议。但后来的事实证明，张国焘的检讨和表态完全是口是心非的。

延安会议为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实现和全国性抗日战争的兴起作了重要准备。同时，会议清算了张国焘的错误，加强了党内团结。这次会议在党的历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曹雁行：《1937年延安会议述评》)

确定战略方针：洛川会议

陕北洛川冯家村。1937年8月22日至25日，中共中央在这里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这次会议在党的历史上，亦称洛川会议。洛川会议在抗日战争爆发后极其复杂的形势下，制定了指导全国抗战的全面抗战路线和持久战的军事战略方针，通过了《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并决定了以毛泽东为书记，朱德、周恩来为副书记的新的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

一、洛川会议召开的历史背景

中国共产党自1921年7月成立到抗日战争爆发，已经走过16年的光辉战斗历程。这期间，取得了两次胜利，也经受了1927年和1934年两次严重失败的考验。失败的原因，在客观上是中国革命的敌人非常强大，在主观上则是因为党还处在幼年时期，还不懂得把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共产国际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的发展起过积极作用，但它脱离中国国情的许多原则、指示常常是错误的，也给中国革命造成种种损失。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的艰苦奋斗中，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为把马列主义同中国实践结合起来，做过许多探索，科学地总结了中国革命的经验。1935年1月在党的遵义会议上，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新的中央的正确

领导，结束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统治。新的中央领导的确立，不仅使党中央和中央红军从当时的危难之中解脱出来，也为其后党领导全国人民胜利地进行抗日战争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935年10月，中共中央率中央红军长征胜利到达陕北后，中央政治局根据日本侵略者准备独占全中国的新形势，于12月在瓦窑堡召开了会议，确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治路线。这条政治路线，是马克思主义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产物。瓦窑堡会议后，共产党即着手倡导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首先做张学良、杨虎城的统一战线工作，并于1936年上半年停止了与东北军和十七路军的敌对行动。接着，正式提出建立国共合作的主张，和平处理了西安事变，迫使蒋介石基本结束反共内战。1937年2月，中共中央又致电国民党三中全会，促使会议通过实际接受国共合作抗战的决议。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中国军队的抗战，开始了全国性的抗日战争。7月8日，中共中央发布《中国共产党为日军进攻卢沟桥通电》，号召：“全中国同胞、政府与军队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抵抗日寇的侵略！国共两党亲密合作抵抗日寇的新进攻！”接着，中共派叶剑英在西安与国民党方面取得联系，于7月14日代表中共中央向南京政府表示：“愿在蒋指挥下努力抗敌，红军主力准备随时出动抗日，已令各军十天内准备完毕，待令出动，同意担任平绥线国防。”7月15日，中共代表根据西安事变后国共两党关于停止内战实现抗战的协议，将《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送交国民党中央。7月17日，周恩来、秦邦宪、林伯渠代表中共中央与国民党代表蒋介石、张冲、邵力子在江西庐山举行谈判，中共代表提出以《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作为国共合作的政治基础，约定由国民党的中央通讯社发表。

这时，蒋介石对抗日还很动摇，他虽于7月17日在庐山发

表谈话，表示“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但又声言，“我不求战，只在应战”。蒋介石政府仍在和日本侵略者继续谈判，并表示“希望由和平的外交方法，求得卢事的解决”，对《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的发表，尽力拖延，迟迟不予公布。在国共合作抗日的谈判中，蒋介石集团千方百计要限制和取消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军队和政权，并计划在抗日战争中削弱共产党力量 2/5。

要抗战，就得有正确的指导路线。抗日战争开始时，国民党掌握着全国政权，拥有庞大的军事力量和经济力量，共产党仅仅掌握着陕甘宁根据地的政权。但是，由于国民党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利益，十分害怕人民革命力量的成长，因而实行的是政府和军队抗战的片面抗战路线和单纯防御的军事方针。他们宣扬“救国有党在，不与民相干”，坚持一党专政，拒绝一切有利于抗战的改革，不改善工农大众的生活，限制群众抗日运动，甚至解散抗日团体。国民党不可能领导抗战取得胜利。事实正是如此，七七事变后国民党战场出现了军队不断后撤的败局。在华北前线，国民党军队有 65 个步兵师、21 个独立步兵旅和骑兵炮兵等部队共 70 余万人，却抵挡不住日军 12 个半师团约 30 万人的进攻。1937 年 7 月底，相继丢弃了北平、天津。随之，日军沿平绥、平汉、津浦铁路长驱直入。在华中地区，日军进攻上海后，日本侵略者企图以 3 个月时间击败国民党中央军，速战速决地解决中国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广大人民特别是人数众多的中间力量，一方面，把抗战的希望寄托在掌握全国政权的国民党身上；另一方面，对国民党的腐败、军队后撤，又极其不满，担心抗战难于取得胜利。

二、洛川会议确定了正确的抗战路线和方针

要实现中国共产党对抗日战争的领导，中共中央必须独立自主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研究各个方面的实际情况，制定指导全国抗战的路线、方针、政策。为此，1937年8月22日至25日，中共中央在陕北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

当时，由于战争任务紧迫，许多红军干部在前线，来不及返回延安，因而会议是在陕西洛川县城附近的冯家村（红军总部所在地）举行的。这次会议在党的历史上，亦称洛川会议。参加会议的政治局委员、中央委员和各方面主要负责人有：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朱德、任弼时、关向应、刘伯承、贺龙、博古、彭德怀、张浩、林彪、聂荣臻、罗荣桓、张文彬、萧劲光、林伯渠、徐向前、周建屏、傅钟、凯丰、张国焘、周昆共23人。

首先，毛泽东代表中央政治局在会上作了军事问题以及同国民党关系问题的报告。

毛泽东的军事问题报告的主要内容是：（1）深刻地分析了卢沟桥事变以后中国革命的形势，指出抗日战争将是用持久战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建立民主共和国。中国共产党的任务是争取对民族革命战争的领导权。他强调指出：单纯从共产党和红军的数量，不能解释领导权问题。但从共产党的声威和红军作战能力，全国人民的瞩望来看，共产党必须争取抗日战争的领导地位。我们的方针，最基本的是持久战。中日双方都有其弱点和长处，持久战的结果，是中国的胜利。（2）红军对日作战的基本战略原则，应该根据今天的实际条件，即我方技术贫弱，但在其他方面，如军队素质等方面，敌人弱于我们来考虑。红军的基本任务是创立敌后抗日根据地，钳制与消灭敌人，配合友军作战（战略支持任务），保存与扩大红军，以挫败日寇亡华方针。（3）红军

必须坚持独立自主的游击战。所谓游击战，就是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跑。红军作战着重于山地游击战，包括有利条件下消灭敌人的主力兵团与在平原地区发展游击战。山地游击战要达到创立根据地。红军在抗战初期的作战地区主要是晋察冀三省边界山区。(4) 必须扩大中共中央军委。中央军委的任务是：领导主力红军，领导苏区与游击区军事和义勇军工作；与国民党军的统一战线工作；情报工作。过去只注意红军工作，现在义勇军和国民党军队的工作，也是大事，因此军委组织应健全起来。现在只有参谋部，政治部与统一战线部也要建立起来。战略方针的制定，要集中在军委。(5) 后方是基本立足点，必须巩固。后方主要是陕甘两省。要扩大我们的工作，发展陕甘苏区。(6) 扩大红军并加强军事教育。为着扩大红军，可以成立补充团，每师一个，军部设两个补充旅。军事教育，连长以下，由前方负责；连长以上，由后方负责。

毛泽东所作的关于同国民党关系问题的报告的主要内容是：(1) 共产党必须坚持、巩固并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现在统一战线正在成熟中，周恩来、博古等已和国民党谈判了4次，谈判的中心问题是红军的独立性问题。在共同委员会与总指挥部问题上，我们准备有所让步，采取不决裂的方针，以通过政治纲领为原则，现在要催促国民党发宣言。同时，还要作地方军阀的统一战线工作。山西有进步，桂李（即李宗仁）已公开提出联共，同意催促蒋介石抗日。现在推动抗日的工作即将过去，而是动员一切力量，去争取抗战的胜利。(2) 共产党必须在统一战线中坚持党的阶级的独立自主的立场。应提醒全体党员注意，防人之心不可无，从根本的阶级利益上看，国民党是敌人，对国民党应保持高度的阶级警觉性。国民党的方针，一是限制我们，二是破坏我们。因此，一时一刻也不要忘记蒋介石想通过抗日战争消灭和限制共产党和红军的阴谋诡计。这种独立性包括政治上和组织上两

个方面。1927年春夏做了资产阶级的尾巴的教训，必须吸取。(3) 必须保证共产党对红军的绝对领导。限制红军，对红军派参谋长来，是万万不可能的。红军的调动，只能由中国共产党来决定，而不能由国民党决定，红军开赴前线作战，必须根据战局的发展，选择有利时机，分批进行，并须留一定兵力，担负保卫后方的任务。

接着，出席会议的人员围绕毛泽东的两个报告，进行了讨论。先后在会上发言的有：朱德、林伯渠、任弼时、彭德怀、刘伯承、周恩来、林彪、凯丰、聂荣臻、张国焘、博古、关向应、张浩、张闻天等。他们完全同意毛泽东报告中关于战局的分析和提出的共产党独立自主领导抗日战争的方针政策，认为全国抗战开始以后，共产党和国民党的争论，已经不是应否抗战的问题，而是如何争取胜利的问题，且争取抗战胜利的关键，是坚持统一战线中的独立性，动员组织群众，发展红军力量，开展抗日游击战争，经过持久抗战，去争取胜利。

朱德说：争取统一战线中的独立性，我们是主导，从组织上、工作上迅速布置，才能争取。持久战，主要的是发动广大群众，军事上发动游击战争。争取华北持久战，即使各友军都退下来，我们也能在华北支持。

林伯渠说：红军在抗战中，负民族复兴的责任。军委组织很重要，红军的人员要补充，应有补充团。

任弼时说：最近中央所采取的立场是对的，国共两党的合作，是代表不同阶级，且在斗争着，合作要经过斗争的过程。抗日战争是长期的战争，要保持我们的力量，队伍的补充是很大的工作。

彭德怀说：只有广泛开展游击战争，才能抗击日军。陕甘宁三省的工作非常重要，要成为将来转变的核心。要阻止日本前进，基本条件是动员和组织群众，因此，应用一切可能实现十大

纲领。

刘伯承说：抗日战争是持久、困难、曲折的，保存力量是自然的事，但最中心是扩大力量。号召全民族抗战，就是争取领导。

周恩来说：国民党对抗战的战略方针，总的是怕群众起来。我们的作战地区是在敌人后方的游击战争。加强全国组织群众工作，做到国民党的战略方针不能束缚我们自己的战略方针。我们能在华北进行持久战，群众的积极性可能更大地调动起来，我们的部队能壮大起来，敌人就愈增困难。今日我们要加强三方面工作：（1）加强政治警觉性，取得合法地位；（2）全国群众运动的发动；（3）上层统一战线的开展。

聂荣臻说：同日本作战，应时时顾到我们不要吃亏，因此战略上采取小区——游击战。小的游击队要繁殖，在敌人后方发展，还是依靠当地。

张闻天说：抗日战争中的危险性，主要是国民党限于政府抗战，而压抑人民，控制群众运动。我们的总方针是发展全民族抗战，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胜利。这是艰苦、持久、变化很多的斗争过程。如何使抗战得胜，大家都仰望我们，指出胜利的道路，是争取领导权的基础。抗战是持久战，尽量扩大我们的力量，指挥问题是独立自主的方针，作战方面主要是游击战争。正确的领导，模范的工作，谦逊的态度，艰苦的作风，准备打持久战，是我们争取领导的要害。

毛泽东在8月24日的会上作了总结报告。主要内容是：（1）关于形势，现在情况有两种可能：一是能在前线阻止敌人一个时期（半年左右）；另一可能是相当迅速起变化。红军的使用，应根据此两种情况。如第一种情况，红军则为策应任务；如第二种可能，我们准备着迅速起变化，山西河北之间是我们主力之地。（2）关于红军出发问题，无根本不同意见，只有搁到前方去一种

意见，无原则分歧。(3) 关于战略原则，目前是在全国范围内成立游击支队，起钳制作用，并不否认在一定条件下，取得消灭敌人的胜利，我们要把抗日战争变成真正的民族革命战争。(4) 关于苏区和白区，苏区要巩固，扩大白区工作。(5) 关于前方和后方，要双方顾及。(6) 关于经费问题，要在全中国号召艰苦奋斗的精神。毛泽东还指出，这次会议是一次团结的会议。

8月25日，会议发布了《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定》，强调了中国共产党对抗日战争的领导责任，实行党的全国抗战的政治路线和持久战的军事战略方针的重要意义。所谓全面抗战路线，即主张全国人民和军队总动员，改革国民政府的政治经济机构，给人民以充分的抗日民主权利，适当地改善工农大众的生活，充分动员、组织和武装民众抗战，使抗日战争成为真正的人民战争。所谓持久战的军事战略方针，即是说中国人民的抗战，必须经过一个转变敌强我弱的过程，才能最后打败日本侵略者。《决定》指出：“今天争取抗战胜利的中心关键，在使已经发动的抗战发展成为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战。只有这种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战，才能使抗战得到最后的胜利。”“今天的抗战，中间包含着极大的危险性。这主要是由于国民党还不愿意发动全国人民参加抗战。……所以在今后的抗战过程中，可能发生许多挫败、退却，内部的分化、叛变，暂时和局部的妥协等不利的情况。因此，应该看到这一抗战是艰苦的持久战。”“共产党员及其所领导的民众和武装力量，应该最积极地站在斗争的最前线，应该使自己成为全国抗战的核心，应该用极大力量发展抗日的群众运动。不放松一刻功夫一个机会去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只要真能组织千百万群众进入民族统一战线，抗日战争的胜利是无疑义的。”

为了实现中国共产党对抗日战争的领导责任，贯彻全面抗战的政治路线和抗日持久战的军事战略方针，会议通过了以下几个

具体决定：（1）决定以《抗日救国十大纲领》作为党领导抗战的纲领。（2）决定在敌人后方放手发动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使游击战争担负配合正面战场、开辟敌后战场、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的任务。（3）决定在国民党统治区放手发动抗日群众运动，争取全国人民应有的政治经济权利。（4）决定以减租减息作为党在抗日战争时期解决农民问题的基本政策。（5）决定进一步扩大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中央军委由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彭德怀、任弼时、叶剑英、张浩、贺龙、刘伯承、徐向前、林彪共 11 人组成，毛泽东为军委书记，朱德、周恩来为军委副书记。军委的书记、副书记，实际上是主席、副主席。

洛川会议在抗日战争爆发后极其复杂的形势下，制定了指导全国抗战的全面抗战的政治路线和抗日持久战的军事战略方针，并作出了开展敌后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决策，为全党和全国人民指明了抗战的正确方向，极大地增强了人们争取抗战胜利的信心。洛川会议确定的政治路线和军事战略方针，为实现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抗战，争取抗战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三、共产党成功地开创了全民族抗战的新局面

洛川会议期间，在蒋介石打电报要八路军迅速全部开赴抗日前线的情况下，会议在讨论红军开赴抗日前线的时机、陕甘宁边区是否要留兵、红军出兵后的作战原则等三个问题上，出现过不同意见。

（一）在红军开赴抗日前线的时机问题上，一部分同志主张晚出兵，认为红军的出动，必须在国民党发表国共合作宣言、承认陕甘宁边区政府、解决行政经费武器补给和共产党取得公开合法地位的条件下；另一部分同志主张晚出兵不如早出兵，认为形势紧迫，战局严重，早出兵对我党政治上将有好的影响，对我军

军饷武器弹药的补给有好处。

(二) 在陕甘宁边区是否留兵问题上，一部分同志认为，鉴于战争的长期性和残酷性，鉴于国民党尚有 10 个师的兵力在边区周围，必须留一部分部队保卫党中央，主张红军出动 1/3、1/2 或 2/3；另一部分同志出战心切，主张全部出动兵力上前线。

(三) 在关于红军的作战原则问题上，一部分同志认为，红军出动后主要是实行分散的游击战争，发动群众，创造根据地；另一部分同志主张部队开出后，实行“运动游击战”，集中打几个大仗，以振奋军民斗志。

经过讨论，大家取得了要出兵又要留兵和边出兵边争取条件的一致意见。由于形势紧迫，对究竟留多少兵保卫陕甘宁根据地以及红军的作战原则，未能深入讨论统一认识。以上 3 个问题的讨论，是对具体行动方针问题的交换意见，是正常的讨论和争论，不是党内的路线斗争。有的同志对从国内战争时期的运动战到抗日战争时期的游击战的转变，一时思想没有完全转过弯来，是属于思想认识问题。

8 月 25 日，中共中央军委发布命令：中国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从 9 月 12 日起，按抗日战争的战斗序列，又称第十八集团军），朱德任总指挥，彭德怀任副总指挥，叶剑英任参谋长，左权任副参谋长，任弼时任政治部主任，邓小平任政治部副主任，下辖第一一五师、第一二〇师、第一二九师，全军编制 4.5 万人。

为了实现中国共产党对八路军的绝对领导，1937 年 8 月 29 日，中共中央决定：在中央军委领导下，成立前方军委分会（后改称“华北军分会”），由朱德、彭德怀、任弼时、张浩、林彪、聂荣臻、贺龙、刘伯承、关向应 9 人组成，朱德为书记，彭德怀为副书记。在前方军委分会领导下，各师成立军政委员会，负责领导全师的军事、政治、党的工作。第一一五师军政委员会由林

彪、聂荣臻、周昆、萧华组成，林彪为书记；第一二〇师军政委员会由贺龙、关向应、萧克、甘泗淇、王震组成，贺龙为书记；第一二九师军政委员会由刘伯承、张浩、徐向前、陈赓、王宏坤组成，刘伯承为书记。接着，八路军总指挥部率各师，先后出师山西前线抗日。第八路军主力东进后，留在陕甘宁边区的部队于1939年9月以第一二九师三八五旅（不含七六九团）为骨干，组成八路军后方留守处（后改称留守兵团），萧劲光任司令员，直属中央军委领导，担负保卫陕甘宁边区的任务。

洛川会议以后，为了更好地贯彻独立自主的敌后游击战争的战略方针，毛泽东代表中共中央于1937年9月12日至29日，连续地给朱德、彭德怀等发出了5个电报。主要内容是：（1）强调红军坚持独立自主游击战争的重要性。他说：“今日红军在决战问题上不起任何决定作用，而有一种自己的拿手好戏，在这种拿手好戏中一定能起决定作用，这就是真正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不是运动战）。”“整个华北工作，应以游击战争为唯一方向。一切工作，例如兵运、统一战线等等，应环绕于游击战争。华北正规战如失败，我们不负责任；但游击战争如失败，我们须负严重的责任。”（2）阐明了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争的基本原则：中国共产党有依照情况使用兵力的自由；红军有发动群众创造根据地组织义勇军和有执行国民政府战略计划之自由；红军坚持依傍山地与不打硬仗的原则。（3）指出红军出师后的具体任务是处于敌之侧翼，分散兵力，发动群众，创造根据地。并对八路军在华北开展游击战争作了具体部署：第一二〇师转至晋西北管涔山等地区活动；第一二九师进至吕梁山脉活动；第一一五师进入恒山山脉南段活动。

八路军出师抗日前线时，中共中央规定八路军的战略任务是：一方面配合国民党正面战场作战，从侧翼阻击进犯山西之敌，以打击日军的锐气并掩护友军的退却；另一方面，伺机深入

敌人占领区，广泛发展抗日游击战争。在中共中央的正确方针指引下，八路军出师后，主要是从战役上配合国民党军作战。于是，国共两党首先实现了军事上的合作。周恩来说：“国共实际的合作，是从军队开始的。”1937年9月25日，八路军第一一五师一部在平型关进行了对日军的伏击战，一举歼灭了日军板垣师团第二十一旅团一部1000余人，击毁日军汽车100余辆，缴获了一批辎重和武器。平型关这一仗是全国抗战开始以来中国军队取得的第一次大胜利。它粉碎了“日本皇军不可战胜”的神话，极大地鼓舞了全国军民胜利信心，提高了共产党和八路军的声威。平型关伏击战后，八路军三个师配合国民党进行忻口战役。忻口战役历时20余天，是华北战场上规模最大、战斗最激烈的一次战役，也是国共合作抗日配合得较好的一次战役。

1937年11月上旬太原失陷后，八路军着重执行向敌后发展、开辟敌后战场、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的任务，主要从战略上配合国民党军队作战。虽然敌后抗战，是世界战争史上最艰苦的事业，不仅要从日占区夺回已沦陷的国土，在日军的包围中建设抗日根据地，而且这种敌后抗日根据地大多首先建立在穷乡僻壤，物质条件的恶劣是罕见的，但是，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在人民群众的支持下，很快打开了局面，开辟了广阔的敌后战场。实践证明，洛川会议决定的政治路线和军事战略方针是正确的。

（王秀鑫：《中共中央洛川会议》）

毛泽东与王明交锋： 1937年12月会议

1937年11月29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主席团委员和候补书记王明回到延安。毛泽东到机场迎接时说是“喜从天降”。可是，在随即召开的12月会议上，王明以“钦差大臣”自居，传达共产国际指示：“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否定洛川会议以来中共中央所制定和执行的正确路线、方针和政策。后来，毛泽东说：在12月会议上，我是孤立的。

一、中共中央预防右倾情绪的滋长

国共两党的军队并肩作战后，经过共产党的一再催促，国民党中央通讯社于1937年9月22日发表了《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9月23日，蒋介石发表了实际承认中国共产党合法地位的谈话。共产党的《宣言》和蒋介石谈话的发表，宣告了国共两党的重新合作，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正式形成。

然而，在统一战线中共产党的洛川会议制定的全面抗战路线和持久战的军事方针，同国民党蒋介石集团实行的片面抗战路线和单纯防御的军事方针，完全是对立的。在共产党的合法地位问题上，蒋介石则采取“溶共”政策。他在1937年9月23日的谈

话中，一方面承认各党各派的合法地位，另一方面，又说共产党是个派，不承认是个党，强调要集中在国民党领导之下，以三民主义为抗战建国的最高准绳，妄图要中国共产党放弃共产主义，只信仰三民主义。国民党统治集团还主张速决战，反对持久战，幻想依靠国外的援助来抗日。南京沦陷前，蒋介石打电话给斯大林说：“啊呀！我这个地方已经不能苟安了，请你赶快出兵吧！”他们依靠国外力量抗战，其目的是保存实力，准备将来再次发动反革命内战。南京失守时，蒋介石对抗日动摇了，想对日求和。英美出头调解。当时，日本提出的条件是：（1）沪占领区划为租界。（2）华北自治。（3）内蒙独立。（4）取消中国捕鱼权。只因日本侵略者的条件苛刻，全国抗日高潮汹涌澎湃，蒋介石才不敢投降。此外，国民党还进行“共产党投降”等种种反动宣传，甚至采用升官发财、酒色逸乐等手段引诱腐蚀中国共产党的干部，企图加以“溶化”。

国共两党两条抗战路线的存在和斗争，充分说明抗日战争爆发后，在中日民族矛盾成为主要矛盾的条件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内部仍然存在着深刻的阶级斗争。中国共产党既要抓住民族矛盾这个主要矛盾，又不可忽视阶级矛盾。共产党如何正确处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统一和独立、团结和斗争的关系，成为能否贯彻洛川会议的路线、方针，对抗战成败具有决定意义的关键性问题。

在从国内战争向抗日战争转变的过程中，随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和国民党在策略上的某些转变，党内一些同志由于对蒋介石反动本质认识不够，产生了右倾情绪。洛川会议前后，在一些具体工作和地区工作中，表现出右倾思想在滋长。8月底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后，由于一度取消了政治委员制度和把政治部改为政训处，党的集体领导削弱了，个别干部独断专行，出现了军阀主义等不良倾向。有的共产党员主张参加国民政府，个别人以接受国民党委任为荣耀。在救亡工作中，有些人同意章乃器“少

号召，多建议”的意见。9月间，湘鄂赣边区有的负责人在谈判游击队改编时，接受国民党提出的由武汉行营派遣副司令、军需主任等条件（中共中央发现后制止）。10月间，西安地方党组织受国民党市党部欺骗，将西北救国会组织无原则地取消。

中共中央及时注意到了右倾情绪的滋长，对已经发生和可能发生的右的倾向，进行了纠正和必要的预防。

红军改编时，共产党拒绝了国民党派人来八路军当干部的要求。1937年10月下旬，在八路军中恢复了政治委员及政治机关制度，并开始向新军阀主义倾向作斗争。在参政问题上，中共中央于1937年9月25日通过了《关于共产党参加政府问题的决议草案》，明确指出：“只有将国民党一党专政的政府转变为全民的统一战线的政府的时候……中共才能去参加。”“在原有红军中及一切游击队中，共产党绝对独立领导之保持，是完全必要的；共产党员不许可在这个问题上发生任何原则上的动摇。”

1937年9月下旬，八路军总指挥部到达太原，中共中央北方局向八路军高级干部及地方党干部，提出了广泛准备游击战争、扩大八路军数十万人、建立广大根据地的任务和方针。当时，少数有右倾情绪的同志，不同意北方局的意见，他们认为：华北不至于全部沦陷，也许用顽强的正规战还可能阻止敌人前进，因此，没有必要在全华北准备游击战争；扩大八路军数十万人是做不到与不可能的，而且这将给国民党以受不了的刺激，一定要引起统一战线发生大破裂；在华北建立我党领导的根据地及统一战线政权，更是统一战线政策所不能允许的行动。这些同志提出的方针是：要集中一切力量联合国民党进行正规战，抵住敌人前进。“游击战争只能在敌人侧后不大的地方去进行一些，辅助华北正面作战，它的意义与前途是不大的。”接着，在平型关战役胜利的影响下，1937年10月8日，华北军分会发出一个错误的指示。这个指示有轻敌速胜观点，过低地估计了日军的进攻

力量，过高地估计了国民党军队的力量及其进步性，否认敌后游击战争的战略地位，主张运动游击战，放松了以共产党为主、自力更生，发动群众，组织游击战争和进行长期艰苦奋斗的精神准备。针对这个错误指示，刘少奇于10月16日写了《抗日游击战争中各种基本政策问题》一文，指出：游击战争将成为华北人民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主要斗争方式。今后华北的游击战争，是有胜利前途的。11月15日，北方局作出《关于目前形势与华北党的任务决定》，再次确定了坚持华北敌后游击战争的方针。

11月，朱德在前方总司令部接见来访记者，回答了记者提出的问题。在回答有关抗日战争的战略战术问题时，强调了利用山地开展抗日游击战争的重要性。朱德说：“我们要发动全国群众作战！敌人有的是武器，我们有的是人员，敌人有的是火力，我们有的是活力。”“我们有了山，不可敌的器具也就可敌了。”“我们只需要有游击战、侧面战，不论多少人，来了就敢打”，“这样，抗战前途是乐观的，是胜利的”。

为了教育全党同志克服右倾情绪的滋长，1937年11月12日，毛泽东代表中共中央在延安活动分子会议上，作了《上海太原失陷以后抗日战争的形势和任务》的报告，强调党要坚持全面抗战路线，反对片面抗战路线，指出要实现共产党领导抗战，当前具体的政治任务，是把国民党提高到共产党所主张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和全面抗战路线上来，决不能把共产党降低到国民党的地主资产阶级专政和片面抗战路线上去。毛泽东还阐明了共产党在统一战线中坚持独立自主的重要任务，提醒全党注意克服右倾思想。

二、12月会议出现王明右倾投降主义

正当洛川会议确定的路线、方针胜利贯彻和中共中央注意纠

正党内右的倾向的时候，1937年11月29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主席团委员和候补书记王明被派回到延安。在1937年十二月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开始出现王明右倾投降主义。

早在全国抗日战争爆发前夕，王明的右倾投降倾向已有所滋长。1935年7月25日至8月20日，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制定的反法西斯统一战线政策，及支持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于8月1日发表《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八一宣言》），对中国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起了一定作用。但是，共产国际对当时的形势估计为帝国主义发动反苏战争，认为日军向中国的进攻“是更加向前作反苏战争的一步”，因而，共产国际的基本政策是要求各国党服从“武装保卫苏联”的政策。斯大林认为，中国共产党和工人阶级，作为反侵略斗争中的领导者还是弱的，中国共产党要把群众争取到自己方面来还需要时间，究竟需要多少时间还很难说。因此，他们把中国的抗战寄托于国民党和蒋介石的军队，要中国共产党服从国民党的领导，把共产党领导的武装力量改编为蒋介石的军队，去打阵地战，以便牢牢地捆住日本侵略者的手脚。王明是坚决执行共产国际的政策。1937年3月，王明在莫斯科写的题为《救中国人民的关键》一文，提出红军改编“不仅仅是改变红军的名称，而且要相当当地改变红军的性质”；陕甘宁边区改为特区后，“这个政权将其活动同意于全中国统一的中央政府”。这里很明显是放弃无产阶级的领导权。

王明回国前，共产国际书记处于1937年8月10日召开专门会议，讨论中国抗战形势和中国共产党的任务。季米特洛夫认为，中国红军是一支农民军队，党内的工人比例很小。他担心中国共产党能否适应新的环境和任务。在共产国际看来，中国共产党难于作抗日战争的领导者，他要求中国共产党运用法国共产党“一切服从人民阵线”和“一切经过人民阵线”的经验，把中共

领导的武装力量改编为国民党军队，做到共同领导，进行阵地战。

王明到达延安后，竭力贯彻共产国际这一“新政策”，反对洛川会议的路线和方针。王明回国不久，中共中央于1937年12月9日至14日在延安召开政治局会议，参加会议的有政治局委员和陕甘宁边区负责人共13人。他们是：毛泽东、张闻天、王明、周恩来、陈云、博古、林伯渠、彭德怀、凯丰、刘少奇、项英、康生、张国焘。王明在会上传达了共产国际如下指示：季米特洛夫建议中国共产党在建立抗日统一战线中，运用法国共产党组织人民阵线时期的经验，采取“一切服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一切经过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口号。王明还在会上作了《如何继续全国抗战和争取抗战胜利呢？》的报告和会议结论，除在坚持抗战和国共合作方面发表了一些正确意见外，在如何进行抗日战争和如何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问题上，比较系统地提出了右倾投降主义的主张，极力否定洛川会议以来中共中央所制定和执行的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特别是反对毛泽东关于《上海太原失陷以后抗日战争的形势和任务》一文的基本观点。

王明在会上的报告和结论的主要内容是：（1）抹煞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不同阶级集团的存在，极力夸大蒋介石集团在抗战中的进步性。王明说，国民党在抗战中是有进步的，南京政府开始走向统一的政府，开始实行国防的任务，中国政治制度已走上了民主自由，救国运动已在各地发展。对于CC与复兴社，过去是叫法西斯，现在应当公开纠正过来，法西斯是侵略殖民地的，复兴社是民族独立与社会进化的。（2）否认无产阶级在抗战中的领导权，鼓吹蒋介石集团在抗战中的领导作用。王明说，在统一战线中，两党谁是主要力量？在全国政权与军事力量上，要承认国民党是领导的优势的力量，我们不能够提要把国民党提高到共产党的地位，空喊领导，只有吓走同盟军。（3）提出一系列与中共中

央根本对立的方针和政策。王明说，今天的中心问题，是一切为了抗日，一切经过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一切服从抗日，今天不是组织群众狭小的团体，而是利用现在合法的团体，要利用合法，取得合法。现在我们不是反对党，而是政府党。过去提国民党片面抗战，使他们害怕，现在要提政府抗战很好，要动员武装广大人民来帮助政府和军队抗战。在抗战的条件下，不怕国民党的限制，我们一定要取得合法，到国民党去立案。我们对政权问题，不要提出改造政权机构，而是要统一的国防政府，共产党员及一切反日派别中有威望有能力的代表，加入国民政府。我们反对地方不服从中央，八路军也要统一接受蒋介石的指挥，建立真正统一指挥、统一纪律、统一武装、统一供给和统一作战计划的军队。目前中国战争胜利的根本因素之一是全国军队的统一指挥，没有统一的国防军与统一的正规军是不能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游击战争不能战胜日本。（4）攻击中共中央在洛川会议到12月会议期间在统一战线工作中犯了“错误”，并把所谓“错误”归纳为七条，即“对抗战后国民党的基本估计不足”；“把民主民生与抗日问题并列起来”；“没有抓住国共合作为中心”；“没有强调发动群众也须经过统一战线这个主要环节”；“没有提出共同领导、共同负责、共同发展，对国民党态度有错误”；“强调独立自主，妨害了统一战线”；“宣传工作中还有党八股，如独立自主地游击战的宣传”。事实上，王明所攻击的，恰恰是马克思主义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抗战路线。

从上述王明的报告和结论的内容可以看出，他在12月会议上所主张和鼓吹的方针政策是系统的右倾投降主义。只认识日本帝国主义这个民族敌人，忘记了国民党这个阶级敌人；只提出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任务，不讲建设新中国的革命任务；主张依靠国民党军队抗战，反对依靠发动组织人民开展敌后游击战争；宣扬国民党在抗战中的领导地位与作用，否认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

的领导责任；提出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反对无产阶级的独立自主。

在这次会议上，和王明一起从莫斯科回国的康生，极力支持王明的主张。他说，现在要内部团结，须提出下列口号：拥护蒋委员长继续领导全国抗日，拥护中央政府继续抗日，共产党要帮助国民党改造军队，帮助国民党购买军火，帮助蒋介石创设军事工业。关于片面抗战与全面抗战，今后最好不用，现在最好都用反日民族自卫战争，不用反日民族革命战争。

由于中国共产党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由于王明的“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口号来源于共产国际，因此使参加会议的一部分同志产生了盲目信赖，一时没有辨明是非，支持王明的主张，并把“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错误口号写进了会议《传达大纲》——《中央政治局12月会议的总结与精神》，并向下面传达。正是因为以上情况，所以党的12月会议标志着王明右倾投降主义开始出现。

党的12月政治局会议在组织上决定：王明、康生等留中央书记处工作；由周恩来、博古、项英、董必武组成长江中央局，领导南中国工作。当时，会议鉴于蒋介石打电报要见王明，决定王明去武汉一次，限1个月返回延安。会后，王明即赴武汉。1937年12月21日，王明等见到蒋介石，向蒋说明了目前抗战形势、国共两党关系、合作抗战的任务和共产国际的某些提议。接着，蒋介石留王明“在汉相助”。在这种情况下，12月23日，中央代表团与长江中央局召开了第一次联席会议，为工作集中和便利起见，决定中央代表团与长江中央局合为一个组织，对外为中央代表团，对内为中央长江局，以周恩来、项英、博古、叶剑英、王明、董必武、林伯渠7人组成，王明为书记兼党报委员会主席。后来，周恩来曾说：“长江局书记，本来是我，我错误地推给你（指王明——引者）。”

王明在中共中央长江局工作中，把自己凌驾于中共中央之上，不执行中共中央洛川会议所制定的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自行其是。1937年12月25日，王明以中共中央名义发表《对时局的宣言》，27日，又发表了《挽救时局的关键》一文，大肆吹捧国民党蒋介石，公开宣扬国民党在抗战中的领导地位。他说：“自卢沟桥事变以来，我国军民在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先生领导之下，对暴敌已进行了五个半月的英勇抗战；……相当地打击了日寇的凶焰，部分地消耗了日寇的力量，增加了日寇前进的困难，助长了日寇内部的矛盾，……因而也就奠定了我们今日继续抗战和争取最后胜利的基础。”“如果国共两党以合作的力量和方式达到驱逐日寇出境的胜利，那么，国民党在实际上证明其为为中国人民的民族生存而奋斗的最大政党，国民党的领袖蒋先生及其他坚决领导抗战的人物，将成为中国的不朽的民族英雄。”不仅如此，而且王明公开提出六大纲领，与洛川会议通过的十大纲领相对抗。他的六大纲领是：（1）动员全中国的武力、人力、智力、财力、物力，继续守土抗战，巩固国防，保卫武汉，阻止敌人的深入，以便争取时机，加强力量，准备进行决定的战斗。（2）巩固和扩大全中国的统一的国民革命军——统一指挥、统一纪律、统一武装、统一待遇、统一作战计划的国防军队。（3）充实和加强全中国统一的国防政府。（4）实行国防的经济政策。（5）建立巩固后方，动员和组织广大人民群众协助军队和政府积极抗战。（6）扩大国际宣传和增加国际援助。从总体上看，这六大纲领否定了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的领导地位，是完完全全的投降主义的纲领。

（王秀鑫：《中共中央政治局12月会议和3月会议》）

再次肯定毛泽东的领袖 地位：六届六中全会

1938年9月29日至11月6日，中国共产党在延安举行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王稼祥传达共产国际指示，要以毛泽东为首解决统一领导问题。全会批准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央政治局的路线。如果说，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在全党、全军的领导地位，那么，六届六中全会则克服王明右倾错误的干扰，巩固了毛泽东在全党、全军的领导地位。毛泽东后来说：中国党历史上有两个重要关键会议，一次是1935年1月的遵义会议，一次是1938年的六中全会。

一、共产国际的正确指示促进了六届六中全会的胜利召开

1938年9月29日至11月6日，中国共产党在延安举行了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毛泽东在《论新阶段》的报告中，一开始就说：自从1934年1月在江西开过第五次中央全会以来，差不多五个年头了。因为各中央委员分散工作于国内外各种不同的环境，使我们不能聚集一块，此次则除了几个同志之外，最大多数的中央委员都到了，而且到了全国各地许多领导工作的同志，使我们的这次中央全会，成为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以来人数到得最多的一次。本来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准备在本年召开的，因为战

争紧张的缘故，不得不把七大推迟，而当前时局向我们提出了许多的问题，必须作明确的解决，以便争取抗战的胜利，所以召集了这次扩大的中央全会。

党的六届六中全会，是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召开的。

抗日战争已经进行了15个月，日本侵略者在1年多的时间中，虽然占领了中国大片土地，但由于其战线延长，兵力不足，特别是由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日游击战争和抗日民主根据地的发展，给日本帝国主义的后方造成极大的威胁，将不得不放弃“速战速决”的战略计划，抗日战争即将进入新的发展阶段，即战略相持阶段。15个月抗战的经验证明，抗日战争是长期的而不是短期的，战略方针是持久的而不是速决的，最后胜利是中国的，悲观论者是毫无根据的，王明的一套主张是错误的，中共中央制定的全面抗战路线是符合中国实际的，在实践中已经取得巨大胜利。

共产国际的正确指示，促进了六中全会的胜利召开。1937年11月，王明离莫斯科回国后，由在苏联养病的王稼祥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他的经常工作，是向共产国际执委会反映中国共产党内、中国国内的形势，并说明中共中央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和独立自主原则。1938年春夏，任弼时到莫斯科汇报中共中央关于中国抗战的路线、方针和工作期间，王稼祥协助任弼时作了许多工作。1938年7月，王稼祥离莫斯科回国。行前，季米特洛夫会见王稼祥，任弼时也在场。季米特洛夫对王稼祥说：应该承认毛泽东同志是中国革命实际斗争中产生出来的领袖，请告诉王明，不要竞争了吧！在六届六中全会的准备工作中，王稼祥于1938年9月14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作了《国际指示报告》。《报告》的主要内容是：（1）国际对中共党的路线的估计；（2）关于国共合作与统一战线问题；（3）关于国际援华运动；（4）关于中共七次大会问题；（5）关于党内的团结问

题。《报告》传达了共产国际和季米特洛夫的指示：“认为中共一年来建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尤其是朱（德）、毛（泽东）等领导了八路军执行了党的新政策，国际认为中共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中共在复杂的环境及困难的条件下真正运用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今天，日寇特别要很巧妙的挑拨破坏党内的团结”，“在领导机关中要在毛泽东为首的领导下解决，领导机关中要有亲密团结的空气”。“要中共团结才能建立信仰。在中国，抗日统一战线是中国人民抗日的关键，而中共的团结又是统一战线的关键。统一战线的胜利是靠党的一致与领导者间的团结。”

由王稼祥传达的共产国际的正确指示，对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经洛川会议制定的路线，是极大的支持和鼓舞，对统一全党认识，尤其是对加强中央领导机关的指导思想的一致，起了重要的作用。1938年9月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再次举行会议，决定六中全会的主要议程为：（1）张闻天主持开幕式；（2）王稼祥传达共产国际的指示；（3）毛泽东作政治报告。所以，共产国际和季米特洛夫在1938年夏秋对中国问题的正确指示，无疑成为中共召开六届六中全会的一个重要条件。后来，毛泽东于1945年6月10日在七大上作关于选举问题的讲话中说：“六中全会是决定中国之命运的。六中全会以前虽然有些著作，如《论持久战》，但是如果没有共产国际的指示，六中全会还是很难解决问题的。共产国际指示就是王稼祥同志从苏联养病回国带回来的，由王稼祥同志传达的。”

二、六届六中全会概况

六届六中全会正式出席人员共53人。

（一）政治局委员：1. 毛泽东、2. 朱德、3. 周恩来、4. 王明、5. 张闻天、6. 项英、7. 博古、8. 康生、9. 王稼祥、10. 彭

德怀、11. 刘少奇、12. 陈云。

(二) 中央委员：13. 关向应、14. 张浩、15. 杨尚昆、16. 李富春、17. 罗迈。

(三) 各方面负责人：18. 贺龙、19. 邓小平、20. 罗荣桓、21. 彭真、22. 潘汉年、23. 徐特立、24. 曾山、25. 吴玉章、26. 张文彬、27. 朱理治、28. 贾托夫、29. 林伯渠、30. 谢觉哉、31. 冯文彬、32. 李昌、33. 林彪、34. 罗瑞卿、35. 滕代远、36. 萧劲光、37. 谭政、38. 郭述申、39. 高自立、40. 高岗、41. 成仿吾、42. 高文华、43. 柯庆施、44. 孟庆树、45. 曹轶欧、46. 萧克、47. 杜里卿、48. 徐海东、49. 宋一平、50. 谭余保、51. 涂振农、52. 李六如、53. 程子华。

此外，陈刚、杨松也参加了全会。全会的秘书长为李富春；秘书为王首道、陈刚。

全会选举的主席团成员是：毛泽东、王稼祥、康生、周恩来、朱德、彭德怀、博古、刘少奇、张闻天、陈云、王明、项英。

9月29日，中国共产党第六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会开幕，张闻天致开幕词。他说，五中全会至现在，是中共为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而奋斗的五年。这次全会的任务，是如何克服困难，坚持抗战，争取胜利。为此，要讨论：（一）一年三个月抗战的经验教训；（二）目前抗战的形势；（三）如何使共产党成为抗战的核心与领导者；（四）七大的准备。接着，王稼祥在会上作《国际指示报告》，又一次传达了共产国际和季米特洛夫的指示。

9月30日上午，项英作关于新四军工作报告，讲了新四军组成的经过和组成后到全会召开前夕的情况。下午，周恩来以中共中央代表团的名义，作关于统一战线工作的报告。周恩来详细叙述了六届五中全会以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和发展的历史过程；剖析了抗战中国国民党政策的矛盾性；阐明了中国共产党统一

战线的方针和坚持统一战线的任务。

10月2日至3日，朱德作八路军工作报告。他总结了一年多来抗战的经验；回顾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和坚持持久战的情况；阐明了怎样认识和建立敌后抗日民主根据地；汇报了八路军的状况；提出了今后抗战的任务。朱德说：“我们党的任务，是继续坚持统一战线，坚持抗战，坚持根据地，争取友军，巩固本身。巩固本身，是中心问题。”

10月4日，贺龙作关于晋西北工作的报告。

10月7日，罗荣桓作关于晋西工作报告。

10月8日，杨尚昆作关于同阎锡山的统一战线以及晋西南工作的报告。

10月12日至14日，毛泽东代表中央政治局作《论新阶段——抗日民族战争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发展的新阶段》的政治报告。报告共分8个部分：（一）五中全会到六中全会；（二）抗战15个月的总结；（三）抗日民族战争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发展的新阶段；（四）全民族的当前紧急任务；（五）长期抗战与长期合作；（六）中国反侵略战争与世界反法西斯运动；（七）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八）党的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毛泽东在报告中强调指出：“在全国炮火连天，全世界战争危机紧迫的环境中，来开我们的六中全会扩大会议，我们要做些什么工作呢？我们的目的何在呢？我们一定要同全中国一切爱国党派、一切爱国同胞永远的团结起来，克服新的困难，动员新的力量，在目前，停止敌之进攻，在将来，实行我之进攻，达到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建立三民主义共和国之目的，我们一定要自由，我们一定要胜利——这就是我们的目的，也就是我的报告的总方向。”

10月15日，张闻天作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与党的组织问题的报告。《报告》讲了18个问题：（1）组织工作的一般原则；（2）党在组织工作中的任务、成绩和弱点；（3）统一战线的特点

和工作；(4) 不同地区，党的任务和工作应有所不同；(5) 创建敌后抗日根据地的重要性；(6) 党在军队中的工作；(7) 党在政府中的工作；(8) 党在群众中的工作；(9) 党在少数民族中的工作；(10) 巩固党在统一战线中的地位；(11) 关于干部问题；(12) 关于宣传教育工作；(13) 关于领导中间的问题；(14) 公开工作和秘密工作；(15) 发展党的组织；(16) 提高党的警觉性；(17) 发展党内民主，巩固铁的纪律；(18) 全党的团结。他在《报告》最后结论中说：“要求组织强大的统一战线。要求组织强大的党。怎样使党成为强大的条件呢？(一) 要有坚定的正确的政治立场；(二) 灵活运用党的策略；(三) 要求艰苦奋斗的精神；(四) 大众民主的工作作风。”

10月19日，全会发出《为追悼鲁迅逝世二周年致许广平女士的慰问电》。

10月19日至29日，先后在全会上发言的有：林伯渠、朱德、吴玉章、王明、徐特立、朱理治、贾托夫、曾山、涂振农、彭德怀、张文彬、郭述申、潘汉年、谢觉哉、宋一平、李昌、谭余保、高文华、孟庆树、李维汉、李富春、冯文彬、杜里卿、张浩、彭真、刘少奇、萧克、高自立。他们都表示完全同意毛泽东《论新阶段》的政治报告、张闻天《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与党的组织问题》的报告、王稼祥的《国际指示报告》。有的同志还结合自己的具体工作，论述了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制定和执行的指导抗日战争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正确性。

10月29日，全会通过关于修改决议案委员会。成员有：王稼祥、张闻天、刘少奇、毛泽东，由王稼祥负责。

10月31日，陈云作关于讨论青年工作问题的结论。他指出：“青年问题，从先有不同的看法，不同的意见，现在都得到一致。”“青年有他的好处，如勇于任事、敢说话，但另一方面青年容易发生好胜与不服气，所以大家应注意冷静、忍耐，不要过

于刺激人。”接着，张闻天作关于讨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与党的组织问题》报告的结论。他说：“讨论中，大家的意见基本一致，这以后团结在中央周围已有保证。”

11月1日，康生作关于七大准备工作的报告。

11月5日，全会通过《致斯大林、季米特洛夫电》和《致蒋委员长电》，决定交主席团作文字审查后发出。在《致蒋委员长电》中说：中共同人深信，我国目前正处于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相持的过渡时期，我们相信伟大的中华民族曾经经历过艰巨斗争的磨炼，定能举国一致，精诚团结，渡过抗战难关，争取最后胜利。

11月5日至6日，毛泽东作全会的总结。他的总结分为5个部分：（一）会议的成功；（二）武汉、广州失陷后的形势；（三）民族统一战线的长期性；（四）战争与战略问题；（五）其他问题。毛泽东指出：“广州武汉失守后，抗日战争会进入相持阶段。”“相持阶段主要战争形式是游击战为主，运动战为辅。我们要把游击战分成两大区域，巩固华北，发展华中华南。”在谈到党的团结问题时，毛泽东强调：“过去干部政策上所作的错误，我同意予以平反。”

11月6日，通过以下文件：（一）六中全会政治决议案；（二）六中全会关于召集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决议；（三）六中全会告全国同胞、全体将士和国共两党同志书；（四）全会致各国共产党电；（五）致西班牙共产党电；（六）致日本共产党电；（七）致八路军新四军电；（八）致东北义勇军及全体同胞电。

11月6日，刘少奇作党规党法的报告。通过以下决定：（一）六中全会关于各级党委暂行组织机构的决定；（二）六中全会关于中央委员会工作规则与纪律的决定；（三）六中全会关于各级党部工作规则与纪律的决定。

11月6日，王稼祥在六届六中全会上致闭幕词。中国共产

党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胜利结束。

三、六届六中全会解决的主要问题

中国共产党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把中国抗日战争和民主事业，极大地推向前进。全会批准了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的政治路线，基本上克服了王明右倾投降主义的错误，统一了全党的步调，并为实现共产党对抗日战争的领导，进行了全面的战略规划。全会解决的主要问题是：

（一）全会总结了抗日战争的经验，指出了中国人民在抗日战争新阶段的任务。

毛泽东的政治报告，全面地总结了15个月以来抗日战争的基本经验，深刻地分析了当时抗日战争的形势，阐明了中国人民在抗日战争中的任务。

毛泽东指出：“15个月抗战的经验给了我们以什么呢？我以为主要的有三个方面。第一，证明了抗日战争是长期的不是短期的，因而抗战的战略方针是持久战而不是速决战。第二，证明了中国的抗战能够取得最后胜利，悲观论者是没有根据的。第三，证明了支持长期战争、取得最后胜利之惟一正确的道路，在于统一团结全民族，力求进步与依靠民众，借以克服困难，争取胜利，而不是其他。”

毛泽东指出：“抗日战争正向着一个新阶段发展，新阶段中有许多新任务。”“新阶段的基本特点是：一方面更加困难，一方面更加进步。更加困难表现在：（1）由于主要的大城市与交通线的丧失，国家政权与作战阵地在地域上被敌人分割了；（2）财政经济异常困难；（3）英、日某种程度的妥协倾向；（4）如果敌攻占广州，中国主要的海道交通有被割断之虞，国际援助将暂时的部分的减弱；（5）全国性伪政权有形成的可能及其对于抗日阵线

的影响；（6）抗日阵线中部分叛变的可能，妥协空气的增长；（7）悲观情绪的生长，意见分歧的现象的增加，等等。”“相持阶段，是中国准备反攻的阶段。其时间长短，依敌我力量变化的程度及国际环境如何而定。但我们应该准备长期战争，熬过这段艰难的路程，胜利的坦途就到来了。”

毛泽东指出：“在新阶段中，全民族的当前紧急任务是什么？总的任务应该是：坚持抗战，坚持持久战，巩固与扩大统一战线，以便克服困难，停止敌之进攻，准备力量，实行我之反攻，达到最后驱逐敌人之目的。”毛泽东提出了15条具体任务：（1）高度的发扬自尊心与自信心，坚持抗战到底，克服悲观情绪，反对妥协企图。为此目的，一是宣传民族革命典型；二是揭发清洗、淘汰民族阵线中消极因素；三是将敌人的残暴罪行向全国公布，向世界控诉。（2）拥护国共合作，反对分歧与分裂，反对任何汉奸政府。（3）提高主力军的战斗力，保卫华中华南与西北，停止敌人进攻。（4）广泛发展敌后游击战争，创立和巩固我之根据地，缩小敌之占领地。（5）提高军事技术，创立机械化兵团，准备反攻实力。（6）实行集中领导下的民主政治，密切政府与人民的联系，发挥抗日政权的最大能力。（7）扩大统一的民众运动，全力援助战争。（8）改良民众生活，激发民众的抗战热忱与生产热忱。（9）实行新的战时财政经济政策，渡过战争难关。（10）实行抗战教育政策，使教育为长期战争服务。（11）力争国际援助，集中反对日本帝国主义。（12）建立中国与日本兵民及朝鲜、台湾等被压迫民族的反侵略统一战线，共同反对日本帝国主义。（13）团结中华民族，一致对日。（14）厉行锄奸运动，巩固前线与后方。（15）发展国共两党及各抗日党派的团结，强固统一战线，支持长期战争。

（二）全会阐明了中国共产党领导抗日战争的重大历史责任，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口号。

毛泽东在六届六中全会上非常强调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民族革命战争中的领导地位和神圣职责。他说：“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处于何种地位的问题，这就是共产党员应该怎样认识自己，加强自己、团结自己，才能领导这次战争达到胜利而不致失败的问题。”“伟大的斗争需要伟大的力量，团结全民族，发动全民族一切生动力量进入这个斗争中去，是我们确定了方针，而要达到此目的，中国共产党内部的团结，是有决定作用，是最基本的条件。”

如何实现共产党对抗日战争的领导呢？全会认为党必须做到以下几点：

(1) 中国共产党必须将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结合起来，在民族战争中表现其高度的积极性，在各方面起先锋模范作用。毛泽东指出：“对于我们，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密切结合着。”“理由是：只有为着保卫祖国而战，才能出全民族于水火，只有全民族的解放，才能有无产阶级与劳动人民的解放，爱国主义就是国际主义在民族革命战争中的实施。为此理由，每一个共产党员必须发挥其全部的积极性，英勇坚决地走上民族革命战争的战场，拿每一枪口瞄准日本侵略者，不容有任何消极。”“在这里，共产党员的先锋作用与模范作用是十分重要的。在八路军与新四军，应该成为英勇作战的模范，执行命令的模范，纪律的模范，政治工作的模范与内部团结统一的模范。共产党员在与友党友军发生关系中，应该坚持统一团结的立场，坚持统一战线的纲领，成为实行抗战任务的模范。应该言必信，行必果，不要傲慢态度，诚心诚意地同友党友军商量问题，协同工作，成为统一战线中各党相互关系的模范。”

(2) 中国共产党必须扩大自己的组织。毛泽东指出：“为了克服困难战胜敌人，共产党必须扩大其组织，向着真诚革命，而又信仰党的主义，拥护党的政策，并愿意服从纪律，努力工作的

广大工人农民与青年积极分子开门，使党变为伟大的带群众性的党。在这里，关门主义倾向是不能容许的。但同时，对于奸细混入的警觉性也决不可少。”“不可因为怕奸细而把自己的党关起门来，大胆的发展党是我们确定了的方针。但同时，又不可因为大胆发展而疏忽对于奸细与投机分子乘机侵入的警戒。‘大胆发展而又不让一个坏分子侵入’，这就是我们发展党的总方针。”同时，要扩大党的组织，必须关心干部，善于识别干部，使用干部和保护干部，有计划地培养大批德才兼备的领导干部。

(3) 中国共产党必须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原则，反对教条主义。毛泽东指出，指导一个伟大的革命运动的政党，如果没有革命理论，没有历史知识，没有对于实际运动的深刻了解，要取得胜利是不可能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理论，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理论，不应当把他们的理论当作教条看待，而应当作行动的指南。“成为伟大中华民族的一部分而和这个民族血肉相联的共产党员，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因此，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洋八股必须废止，空洞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教条主义必须休息，而代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毛泽东在六届六中全会上，号召全党开展学习竞赛，学会把马列主义的理论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环境，使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具体化。

在全会上，张闻天在作讨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与党的组织问题的结论时，也论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意义，以及如何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任务。他说：“我们党的 17 年，最大的进步是学会了运用马列主义，从抽象的教条的了解，到更具体更深刻更生动的了解马列主义，这是 17 年革命实践所得的结果。”

在哪些地方学会运用马列主义呢？他指出：（1）懂得了马列主义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我们一定要从书本上学习，但并不是会背这些原则，就了解了马列主义。我们应该根据这些原则分析当时当地情况，对马列主义边学边用。使马列主义民族化、中国化，就是把马列主义方法运用在中国具体情况中间，并以之来研究中国文化、历史等。（2）我们了解了中国社会发展客观规律，把握阶级斗争规律，依靠这些来规定我们的政治方向和工作方针。过去，我们在工作中公式主义太厉害，吃过许多亏，由此不知流了多少血，牺牲了多少生命。现在我们不要怕抛弃马列主义中某些不适合中国情况的原则。（3）我们党今天更能够根据具体情况的分析来决定我们的方针、战略、策略口号。（4）客观情况，一次是认识不清的，不能一次就完全认识，我们必须在斗争实践中不断补充我们的认识。因此，在决定了方针策略后，应在实践中考验与审查其是否正确，在实践中补充与发展，错的改正，蛮干不能建立党的威信。马列主义指导实践，而实践又发展马列主义。

在全会上，徐特立在发言中还说：“我们研究马克思主义要中国化，我们的理论从具体实际情形得来，我们的决策，就是科学的马克思主义的。”

由于六届六中全会阐明了中国共产党领导抗日战争的重大历史责任，特别是明确提出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化的口号，这就从根本上批判了王明的右倾投降主义，并为共产党正确领导抗日战争的胜利，准备了条件。

（三）全会肯定了中国共产党的既统一又独立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

毛泽东在全会的政治报告和总结报告中，系统地阐述了中国共产党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基本政策的极端重要性。他说：“克服困难、战胜敌人的中心任务，是团结全民族，巩固扩大统

一战线，发动全民族各个阶层一切生动力量，这是独一无二的方针。”“巩固与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巩固与扩大国共合作，顺利执行当前紧急任务，渡过战争难关，是有重要意义的。”“由于中国的历史原因，使得今天中国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不同于任何外国的统一战线，如人民阵线等，也不同于中国历史上的统一战线，如第一次国共合作等，有它今天的中国的特点。认识这些特点，对于巩固与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有非常严重的意义。”“这些特点是什么呢？归结起来，共有八个。即是：全民族抗日的；长期性的；不平衡的；有军队的；有 15 年经验的；大多数民众尚无组织的；三民主义的；处于新的国际环境的。”毛泽东还特别强调，所谓“有 15 年经验”，即“1924 年至 1927 年第一次国共合作的 4 年，1927 年至 1936 年国共分裂的 9 年，现在国共重新合作又有两年。这 15 年中，合作——分裂——又合作的经验是：只应合作，不应分裂”。

毛泽东又指出，要巩固和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必须保持加入统一战线中任何党派在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的独立性。他说：“所谓统一战线，就是拿两个以上的阶级与党派之存在作前提的。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才能胜敌，并须是长期的坚持，这是确定了方针。但同时，必须保持加入统一战线中任何党派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的独立性，不论国民党也好，共产党也好，其他党派也好，都是一样。……否认独立性，只讲统一性，这是背弃民权主义的思想，不但我们共产党不能同意，任何党派也是不能同意的。统一战线中，独立性不能超过统一性，而是服从统一性。统一战线中的独立性，只是也只能是相对的东西。不这样做，就不算坚持统一战线，就要破坏团结对敌的总方针。但同时，决不能抹煞这种相对的独立性，无论思想上也好，组织上也好，各党必须有相对的自由权。如果被人抹煞或自己抛弃这种相对的独立性或自由权，也同样将破坏团结对敌，破坏统

一战线。”“我们的方针是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既统一，又独立。”

为了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各党派的长期合作，毛泽东提出，应该有合作的组织形式。他说：“为了保证长期合作，还必须解决合作的组织问题。”“统一战线可能有三种组织形式：第一种，国民党本身变成民族联盟，各党派加入国民党而又保存其独立性；第二种，共同组织民族联盟，各党以平等形式互派代表组织中央以至地方的各级共同委员会，为着执行共同纲领处理共同事务而努力；第三种，就是现在的办法，没有成文，不要固定形式，遇事协商，解决两党的问题。我们极力赞成有一种统一的形式，使之利于长期合作。”

毛泽东还从理论上科学地说明了抗日战争时期民族斗争与阶级斗争的关系。他指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在日本帝国主义武装入侵的情况下，为了拯救民族的危亡，无产阶级政党必须紧紧抓住中日民族矛盾这个主要矛盾，阶级的利益必须服从民族的利益，阶级斗争必须服从民族斗争，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建立和坚持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集中打击日本侵略者这个最主要的敌人。因此，用长期合作支持长期战争，就是说使阶级斗争服从于今日的抗日的民族斗争，这是统一战线的根本原则。但是，决不能借口民族斗争而否认阶级斗争。“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存在是个事实，有些人否认这种事实，否认阶级斗争的存在，这是错误的。企图否认阶级斗争存在的理论，是完全错误的理论。”

如何正确处理民族斗争与阶级斗争的关系呢？毛泽东指出，在民族斗争中，阶级斗争是以民族斗争的形式出现的，这种形式，表现两者的一致性。一方面，阶级的政治经济要求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内以不破裂合作为条件；又一方面，一切阶级斗争的要求都以民族斗争的需要（为着抗日）为出发点。既要坚持抗日民

族统一战线，又要保持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再具体地说，有些事情可先得国民党同意后再做，这叫做“先奏后斩”；有些事则造成既成事实再告诉它，这叫作“先斩后奏”；有些事估计它一时不会同意，则暂时“斩而不奏”；有些事做了可能妨碍大局，则“不斩不奏”。

统一战线中，要不要让步？毛泽东指出：“共产党员对于一切为国为民的事业，应该坚持自己的立场，始终不变地向着战胜日寇建立新中国的方向走去，谁要是违背了这种立场，这个方向，谁就丧失了共产党员的资格。但共产党员又必须有互助互让的精神，必须有尊重友党及和友党同志用谦和商量的态度解决问题的精神，一切有友党同志的地方，都应和他们商量解决有关事项，不应独断。”“统一战线中的各党各派实行互助互让是必需的，但应该是积极的，不是消极的”，是“为了更好的一跃而后退”。把让步看作纯消极的东西，不是马列主义所许可的。“我们的让步、退守、防御或停顿，不论是向同盟者或向敌人，都是当作整个革命政策的一部分看的，是联系于总的革命路线而当作不可缺少的一环看的，是当作曲线运动的一个片断看的。一句话，是积极的。”

总之，六中全会认为，中国共产党一定不要破裂统一战线，但又决不可自己束缚自己的手脚。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调整统一战线中各阶级相互之间的关系，以便放手发动和依靠广大人民群众，联合一切可以联合的力量，更好地进行民族斗争。

毛泽东在系统阐明中共中央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基础上，深刻地批评了王明的“一切经过统一战线”和“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右倾投降主义的口号。他说：“我们提这个口号，如果是要求国民党‘一切’都要‘经过’我们同意，是做不到的，滑稽的。如果想把我们所要做的‘一切’均事先取得国民党同意，那末，它不同意怎么办？国民党的方针是限制我们发展，我

们提出这个口号，只是自己把自己的手脚束缚起来，是完全不应该的。”“‘一切服从统一战线’，如果解释为‘一切服从’蒋介石和阎锡山，那也是错误的。”六届六中全会决议还指出，王明右倾投降主义的危险，在于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中，牺牲党的政治上和组织上的独立性，把无产阶级为反对共同敌人而与其他阶级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曲解成为使无产阶级及其政党成为资产阶级的尾巴。

（四）全会强调了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敌后抗日游击战争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并作了部署。

毛泽东在《论新阶段》报告中论述了敌后抗战在中国的特殊意义。他说：“敌人占领中国主要的大城市与交通线后，敌据城市以对我，我据乡村以对敌。乡村能够战胜城市吗？答复：有困难，但是能够的。”“今天中国的城市乡村问题，与资本主义外国的城市乡村问题有性质的区别。在资本主义国家，城市在实质上形式上都统制了乡村，城市的头一断，乡村之四肢就不能生存。……半殖民地大国如中国，在今天，却产生了这种可能。这里明显的是三个三位一体的条件。第一是半殖民地条件。在半殖民地，城市虽然带着领导性质，但不能完全统制乡村，因为城市太小，乡村太大，广大的人力物力在乡村不在城市。第二是大国的条件。失去一部，还有一部。敌以少兵临大国，加以我之坚强抵抗，就迫使敌人发生兵力不足与兵力分散的困难，这样就不但给了我方一个总的抗日根据地，即大后方，例如云、贵、川等地，使敌无法占领；而且在敌后也给了我以广大游击活动地盘，例如华北、华中、华南等地，使敌无法全占。第三是今日的条件。如果数十年前中国被一个强大的帝国主义国家武装侵占，例如英占印度那样，那是难免亡国的。今天则不同，今天主要是中国进步了，有了新的政党、军队与人民，这是胜敌的基本力量。……总之，在今天的半殖民地大国如中国，存在着许多优好的条件，利

于我们组织坚持的长期的广大的战争，去反对占领城市的敌人，用犬牙交错的战争，将城市包围起来，孤立城市，从前期战争中逐渐生长自己的力量，变化敌我形势，再配合之以世界的变动，就能把敌人驱逐出去后恢复城市。”“在内战的条件下，极小部分的乡村，支持了长期反对城市的战争，还当帝国主义各国一致反共的时期。谁能说在民族战争条件下，又当帝国主义阵营分裂之时，中国以极大部分的乡村，不能支持长期战争去反对城市敌人呢？毫无疑问，是能够的。”毛泽东还强调指出，开展敌后抗日战争，实际上是在民族战争条件下，坚持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

毛泽东在全会上重申游击战争在抗战中的战略地位。他指出，在抗日战争的相持阶段中，敌后游击战争将变为主要的形式。没有这种游击战争，便不能牵制大量的敌军，停止敌人的进攻；便不能使敌人占领区限制于一定地带；便不能在敌后建立根据地，并准备将来的战略反攻。因此，党的主要工作方面是在战区和敌后。在一切敌人后方地带，必须广泛地建立游击队，发展游击战争，并创立广大的抗日民主根据地。毛泽东说：“一般说来，新阶段中敌后游击战争是比较前一阶段要困难得多。我们必须预先看到这种困难，承认这种困难，可不因为前一阶段的发展容易而冲昏了头脑，因为敌人一定要转过去进攻游击战争。然而能够坚持的，一切敌后工作的领导人们，必须要有这种自信心。”

关于相持阶段到来后，敌后抗日游击战的战略部署问题，毛泽东在报告中指出：“在现在，为了策应正面主力军的战斗，为了准备转入新阶段，应把敌后游击战争大体分为两种地区，如华北，主要方针是巩固已经建立了的基础，以准备新阶段中能够战胜敌之残酷进攻，坚持根据地。又一种是游击战争尚未充分发展，或正开始发展的地区，如华中一带，主要方针是迅速的发展

游击战争，以免敌人回师时，游击战争发展困难。”六届六中全会经过讨论，决定抗日战争转入相持阶段之后，党在敌后武装斗争的战略部署是：巩固华北，发展华中。

王明于1938年10月20日在全会上作的《目前抗战形势与如何坚持持久战争取最后胜利》的长篇发言中，虽然同意毛泽东的政治报告，但仍然坚持其右倾投降主义。他认为，俄国革命是依靠城市反对乡村的敌人，中国抗战要依靠乡村争取胜利是困难的，因此，要尽一切可能保卫武汉。对此，彭德怀立即给予了批判。彭德怀在发言中说：“王明认为乡村反对城市更加困难，我认为中国的城市还不能统治乡村经济，中国抗战不完全决定于城市。如果不了解中国这个特点，结果便会强调城市的重要，只有拼命去保卫城市；另一方面，城市失掉了便会认为中国抗战没有胜利的可能。同时，强调城市的作用，便忽视游击战争的作用。”

毛泽东在全会的总结中指出，革命的中心任务和最高形式是武装夺取政权，是战争解决问题。在中国，主要的斗争形式是战争，而主要的组织形式是军队。其他一切，例如民众的组织和民众的斗争等等，都是非常重要的，都是一定不可少，一定不可忽视，但都是为着战争的。党的组织工作和民众运动，也是配合战争的，只能也只应服从前线的要求。一句话，全党都要注意战争，学习军事，准备打仗。毛泽东还强调说：“共产党员不争个人的兵权（决不能争，再也不要学张国焘），但要争党的兵权，要争人民的兵权。现在是民族抗战，还要争民族的兵权。在兵权问题上患幼稚病，必定得不到一点东西。”毛泽东回答了王明对乡村能否战胜城市的怀疑，再次科学地论述了中国必须走乡村包围城市的道路。

（五）全会确定在中国共产党内，扩大民主和加强纪律，再一次肯定了毛泽东在全党的领袖地位。

毛泽东在政治报告中指出，处于伟大斗争面前的中国共产

党，要求整个党的领导机关、全党的党员和干部高度地发挥积极性。为了发挥全党的积极性，既要扩大党内的民主生活，又不要走到极端民主化，走到破坏纪律的自由放任主义。鉴于张国焘、王明严重破坏纪律的行为，毛泽东强调，必须重申党的纪律：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谁破坏这个纪律，谁就破坏了党的统一。彭真在全会的发言中 also 说：“实现党的团结中，地方党与军队党要亲密团结，党的青委不要建立独立的系统。”

六届六中全会为了扩大党内民主和加强党的纪律，通过了《关于各级党委暂行组织机构的决定》、《关于中央委员会工作规则与纪律的决定》、《关于各级党部工作规则与纪律的决定》。这些《决定》规定：“各级党委的重要文件决议须经多数委员或常委之同意，才能发表，各级党委负责人的重要文章及谈话，在可能时须经其他委员同意后发表。”“各级党的委员会、代表会及党员大会所通过的决定文件，凡未经决定发表者，除向上级党委报告外，各委员、各代表及到会的党员，均不得向会外任何人泄露。”“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党的一切工作由中央集中领导，是党在组织上民主集中制的基本原则，各级党的委员会的委员必须无条件的执行，成为一切党员与干部的模范。”这些重要决定，是加强党的建设的经验总结。刘少奇在作关于党规党法的报告中说：作出关于党规党法的决定，是为了保证党的团结和统一。除政治思想的统一外，条文上亦应规定，以免个别人破坏党的团结，并以此党规党法教育同志。几个文件的通过，也是党组织的建设，保证民主集中制的实施。

六届六中全会根据当时形势的发展，决定撤消中共中央长江局，设立中共中央中原局和中共中央南方局。中原局以刘少奇、朱瑞、朱理治、彭雪枫、郑位三为委员，刘少奇兼任书记，负责

领导长江以北、陇海路以南的河南、湖北、安徽、江苏地区党的工作。南方局由周恩来、董必武等组成，周恩来任书记，负责领导大后方蒋管区党的工作。

在中共中央六届六中全会上，许多同志以亲身的经历，说明了毛泽东同志是中国革命的正确领导者，是经过考验的中国共产党的领袖。张闻天在会上说：“能否成为党的领袖，决定于他的聪明能力、对党的忠实及其实际工作，在最困难的时期最能坚持党的正确路线。有了这些条件，则不但党内承认，民众也承认为革命领袖。”彭德怀在会上说：“党有了群众信仰的领袖。在我所知道的十年中，毛泽东同志基本上是正确的。”“领袖的培养，是在坚决斗争中锻炼出来的，是由正确的领导而取得的。领袖不能委任，领袖也不是抢来的，领袖是长期斗争中产生的。我们党要经常把握正确的方向，党的领袖很重要。”刘少奇在会上说：“领袖不是自称的、委任的，而要拥护。要使委任的领袖成为真正群众所拥护的领袖。”陈云在会上说：“我感到中央自1935年遵义会议以后到现在，无什么大的错误，这主要是由于中央有远见，起了把舵的作用。党的团结，首先应要思想上的一致，要党的高级领导机关看问题方法差不多，研究思想方法的一致。”李富春在会上说：“党的成功有：1. 党的统一与团结；2. 保存广泛干部；3. 党的组织路线之正确。……最主要是中央路线的正确，以毛泽东为首的领导。”谢觉哉在会上说：“我党朱（德）毛（泽东）领袖，都是了解中国古今实际情况，是能中国化的。”

由于中国共产党六届六中全会扩大了党内民主，加强了党的纪律，并再一次肯定了毛泽东在全党的领袖地位，这就巩固了遵义会议以来形成的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正确的核心领导，从而实现了党的坚强团结，保证了中国共产党的事业迅猛发展。

四、六届六中全会的历史地位

中国共产党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是党的历史上一次很重要的会议。关于这次全会的意义，王稼祥在全会的闭幕词中讲得非常明确。他说：“这次得到了大的成绩，大的进步。大会中所估计所想的问题，在大会结束时已变成事实。此次会表示我们已掌握马列主义，以之分析具体的复杂的环境，定出正确的政策与方针。此次大会表示了党的团结与一致。此次会在党史中占重要地位，总结了过去的经验，定出了工作，将会完成光荣的任务。此次会在中华民族史上亦有重大意义，推动抗日战争走向最后胜利。”后来，毛泽东在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又说：“中国党历史上有两个重要关键会议。一次是1935年1月的遵义会议，一次是38年的六中全会。”

中国共产党六届六中全会在党的历史上有着重要地位。如果说，遵义会议开始纠正了党内错误的指导思想，确立了毛泽东在全党、全军的领导地位，那么，六届六中全会就是维护了党内的正确思想，巩固了毛泽东在全党、全军的领导地位，加强了党的团结和统一，增强了党的战斗力，使党能在领导中国革命的航程中，乘风破浪，胜利前进。

中国共产党六届六中全会在复杂的环境中，及时克服了王明为代表的“这样一种软弱无能的腐朽的违背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的思想”，澄清王明推行共产国际指示造成的混乱，坚持了洛川会议制定的独立自主领导抗日战争的基本路线和政策。同王明右倾投降主义所作的这场斗争，有着重要意义。后来，毛泽东在1947年中共中央十二月会议上，进一步总结抗日战争初期党同王明右倾投降主义斗争的历史经验时，又指出：这场斗争“不但保证了我党在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时期能够战胜日本帝国主义，而

且保证了我党在日本投降以后蒋介石举行反革命战争时期，能够顺利地不受损失地转变到用人民革命战争反对蒋介石反革命战争的轨道上，并在短期内取得了伟大的胜利”。

中国共产党从洛川会议到六届六中全会领导抗日战争的过程，是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过程。这一过程反映了党敢于反对教条主义，坚持真理，坚持独立自主，坚持实事求是。这一过程表明：中国这个客观世界，整个地说来，是由中国人认识的，不是在共产国际管中国问题的同志认识的，共产国际是不了解或不很了解中国社会、中华民族、中国革命的；到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对于中国这个客观世界，在认识上已经出现了一个飞跃，从认识的必然王国到达了自由王国，这是中国共产党高度、完全成熟的重要标志。

（王秀鑫：《中共六届六中全会》）

拉开整风帷幕：1941年 9月中央政治局会议

1941年九十月间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党的历史上特别是土地革命战争后期的路线问题，拉开了中央领导层整风的帷幕。毛泽东在第一次的会上作主题报告。张闻天检讨说：“我是最主要的负责人之一，应当承认错误，特别在宣传错误政策上我应负更多的责任。”博古检讨说：“我过去只学了一些理论，拿了一套公式教条来反对人家。”王稼祥检讨说：“我也是实际工作经验很少。”李维汉则“检讨一次比一次深刻”。

在毛主席看来，整风运动的重点既然是高级干部，那么通过以上准备之后，首先在中央领导层开展整风，便是水到渠成的事情了。1941年9月10日至10月22日，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讨论党的历史上特别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路线问题，批判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拉开了中央领导层的整风运动的帷幕。这次会议开的时间虽长，实际上只有9月10日、11日、12日、29日和10月22日开了五次会。到会的政治局成员有在延安的毛泽东、任弼时、王稼祥、王明、朱德、洛甫、康生、陈云、凯丰、博古、邓发；列席者有李富春、杨尚昆、罗迈、陈伯达、高岗、林伯渠、叶剑英、王若飞和彭真；王首道和胡乔木担任会议记录。

毛主席在第一天的会上作了主题报告。内容可概括为这样三

点：（一）指出苏维埃运动后期的“左”倾机会主义是主观主义的统治，比立三路线的危害更为严重。他说：过去我们的党很长时期为主观主义所统治，立三路线与苏维埃运动后期的“左”倾机会主义都是主观主义。苏维埃运动后期的主观主义表现的形态更完备，统治时间更长久，结果更悲惨。这是因为他们自称为“国际路线”，穿上马克思主义的外衣，其实是假马克思主义。他们提出不合实际情况的任务，要求扩大百万红军，进攻中心城市等，在政治上、军事上、组织上都比立三路线更厉害。这种主观主义与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是相对抗的，对这段时期的路线要准备在七大作总结。（二）分析了主观主义的根源和遗毒。毛主席说：遵义会议虽然变更了错误的政治路线，但思想上主观主义的遗毒仍然存在。这在延安的各种工作中，学校教育中和文化人中都有表现。现在的延安，学风上存在着主观主义，党风上存在着宗派主义。它们的来源是：过去党内“左”的传统，共产国际中某些思想的影响，中国广大小资产阶级的影响。（三）提出了克服历史和现实中的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不正之风的十六条办法。基本精神是，首先在理论上要分清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与教条式的马克思主义，宣传前者，批判后者，要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研究实际问题，使中国革命丰富的实际经验马克思主义化；要实行两条路线斗争，反对主观主义与宗派主义，反对教条主义与事务主义；要实行干部教育制度的改革，把过去的一套彻底打碎，研究马、恩、列、斯的方法论，奖励写辩证唯物论反对主观主义的文章；组织方法论的研究小组，首先从政治局做起，中央研究小组一方面研究马列主义的思想方法论，一方面研究六大以来的中央决议；政治局以思想、路线、政策、军事、组织五项为根本业务，掌握思想教育是我们第一等的业务；在延安开一个动员大会，中央政治局全体出马，大家都出台讲话，集中力量反对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但是“打倒两个主义，把人留下来”，把犯了

错误的干部健全地保留下来。毛主席在报告的最后还宣读了稼祥同志拟就的从四中全会至遵义会议这段历史的 16 个研究题目，包括四中全会的历史估价，主观主义与中国革命的理论问题，主观主义与政治策略路线、军事路线、组织路线问题，主观主义在各个地区及各个方面工作的表现，以及遵义会议后主观主义的遗毒等问题。这些题目分别由在延安的政治局委员及有关方面负责人准备研究。毛主席的报告和稼祥同志拟的研究题目，为这次会议，也为中央领导层的整风运动奠定了基调。

在政治局的五次会议上共有 28 人次发言，都表示拥护毛主席的报告，认为在中央内部开展反对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的斗争对于党的路线的彻底转变有极大的意义。不少同志列举了历史上的和延安工作中的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的种种表现和危害，认真、尖锐地开展了批评与自我批评。特别是一些曾经在历史上犯过错误的同志，本着对中国革命高度负责的态度，在会上进行了沉痛的检讨，不少同志是两次发言，有的同志甚至作了三次发言，诚恳检讨自己的错误。

张闻天同志第一个检讨。他在 9 月 10 日和 29 日的发言说：对土地革命后期工作估计，同意毛主席的意见，当时路线是错误的。政治方面是“左”倾机会主义，策略是盲动的；军事方面是冒险主义，打大的中心城市等；组织上是宗派主义，不相信有实际经验的老干部；思想上是主观主义与教条主义，不研究历史与具体现实情况。这些错误在反五次“围剿”中发展到最高峰，使党受到很严重的损失。闻天同志说，我是最主要的负责者之一，应当承认错误，特别在宣传错误政策上我应负更多的责任。过去国际把我们一批没有做过实际工作的干部，提到中央机关来，这给党的事业带来很大损失。过去没有做过实际工作，现在还要补课。闻天同志说话算数，不是口头表示，而是决心补课。在这次会后三个月，从 1942 年 1 月起，他主动要求去农村调查，在陕

北神府、绥德、米脂和晋西北的兴县等地的几十个村庄调查了将近一年半时间，直到1943年5月才回到延安。

博古同志也两次发言作了检讨。他说，1932年至1935年的错误，我是主要的负责人。遵义会议时，我是公开反对的。后来我自己也想到，遵义会议前不仅是军事上的错误，要揭发过去的错误必须从思想方法上、从整个路线上来检讨。我过去只学了一些理论，拿了一套公式教条来反对人家。四中全会上我与稼祥、王明等反对立三路线的教条主义，也是站在“左”的观点上反的，是洋教条反对土教条。当时我们完全没有实际经验，在苏联学的是德波林主义的哲学教条，又搬运了一些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教条和西欧党的经验到中国来，过去许多党的决议是照抄国际的。在西安事变后开始感觉这个时期的错误是政治错误。到重庆后译校《联共党史》才对思想方法上的主观主义错误有些感觉。这次学习去检查过去错误，感到十分严重和沉痛。现在我有勇气研究自己过去的错误，希望在大家帮助下逐渐克服。

稼祥同志在9月11日作检讨说：我也是实际工作经验很少，同样在莫斯科学了一些理论。我回国后便参加四中全会的反立三路线斗争，当时不过是主观主义反主观主义，教条主义反教条主义。中国党过去主观主义的传统很久，其产生根源，除由于中国社会原因外，就是经验不够。学了一些理论而没有实际工作经验的人，易做教条主义者。从莫斯科共产国际回来，没有实际工作经验的人，更易做教条主义者。实际工作经验多的人，不易做教条主义者，而容易成为狭隘经验主义者。

罗迈（李维汉）同志虽然不是政治局成员，但在立三路线时期和中央苏区时都在中央担负过领导工作。这两个时期的错误，他都较为积极贯彻过。在会上，不少同志对他批评较重，说他检讨不好，有的同志用词还很尖刻。但他还是愿意作自我批评的，检讨一次比一次深刻。

什么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党性呢？这种勇于自我批评，愿意改正错误的精神就是党性纯洁的表现，就是无私无畏的崇高品质表现。20年代、30年代的党还幼稚，没有经验，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也不高，领导中国革命是在摸索着前进。有摸对的，也有摸的不对的。没摸对，犯了错误，给革命事业带来重大损失，应当检讨，总结教训。但是这些领导同志犯的错误也为寻找正确的革命方法和道路积累了经验。只要他们认识了错误，愿意改正错误，就应当受到尊敬。

这次会议还提出了两个重要问题，对后来的历史决议产生了较大影响。

一是提出经验主义是主观主义的一种表现形态。稼祥同志在9月11日的发言中说过，实际工作经验多的人，不易做教条主义者，而容易成为狭隘经验主义者。弼时同志在9月12日的发言中检讨了到中央苏区后毫无军事知识，却不尊重毛主席的意见而指挥打仗的事。他说：在赣南会议上，毛主席反对本本主义（书本子主义）即是反对教条主义，我们当时把毛主席的思想当做狭隘经验论加以反对是错误的。弼时同志检讨说，从党的20年来的历史看，作为主观主义的思想统治，其中有些是经验的主观主义。做过许多实际工作的狭隘经验者，便是狭隘经验的主观主义。9月12日会议以后休会近三个星期，在9月29日会议上，洛甫同志在检讨主观主义的错误时对狭隘经验主义的问题从理论上作了些分析，第一次明确指出：教条主义常与经验主义结合而互相为用，教条主义无经验主义者不能统治全党，经验主义者常作教条主义者的俘虏。经验主义者也是一种主观主义，故能与教条主义者合作，只有理论与实际一致才能克服教条主义与经验主义的错误。后来毛主席在《整顿党的作风》中讲主观主义的两种形态吸收了闻天同志的观点。教条主义与经验主义关系的思想也写进了后来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二是提出少奇同志是白区工作正确路线的代表。陈云同志在9月11日的发言中说，过去十年白区工作中的主观主义，在刘少奇、刘晓同志到白区工作后才开始改变。刘少奇同志批评过去的白区工作路线是错误的，现在检查起来，刘少奇同志是代表了过去十年来的白区工作的正确路线。据此，陈云同志提出，有些干部位置摆得不适当，要正位，如刘少奇同志将来的地位要提高。第二天，弼时同志说：主观主义在认识论上是唯心论，在政治上的具体表现就是“左”或右的机会主义。我党的毛主席、刘少奇同志能根据实际情形来工作，所以犯主观主义少些。康生在29日的发言中检讨了在白区工作的政策上与少奇同志的分歧，承认今天看起来是少奇的对。他当时反对少奇，一是由于自己的主观，二是听国际说少奇是机会主义，三是受了1931年12月的中央告同志书的影响，把少奇完全看成机会主义者。主观主义的错误路线把白区工作弄光了。如果那时中央是刘少奇负责，情况将是另一样。九月会议上陈云等对少奇同志在白区工作的评价，后来也成为历史决议的一个重要观点。

在九月会议上，发言者对1932年至1935年间的中央路线的认识趋于一致，都承认是路线错误。但是涉及到评价六届四中全会，中央领导层的认识差距则较大。除王明肯定四中全会的路线是正确的外，也还有别的同志认为四中全会决议基本正确。比较多的发言是没有完全否定四中全会，但持明显批评态度。有的说，四中全会时的中央主要负责人，多数是从莫斯科回来的，用马列主义的金字招牌压服实际工作者。有的说，四中全会的中央是书生式的领导。有的则说，四中全会虽然反对了立三路线，克服了某些明显的“左”倾错误，但从根本上说尚未克服，以致使白区工作完全垮台。有的还认为，四中全会反对立三路线在党的历史上有其意义，如停止了暴动方针，恢复了中共与国际的正常关系等，都是正确方面；但有些问题没有解决，特别是在思想上

以主观主义、教条主义反对另一种主观主义、教条主义，造成以后既反立三路线，又与立三路线合作的基础。对这个问题，在会上是各谈各的，没有统一思想。只是在经过两年之后，到了1943年的九月会议才解决了对这个问题的认识。

在九月会议上，王明的表现使与会者普遍感到不快。尽管他发言两次，但未作丝毫的自我批评。他表示同意毛主席的报告，承认1932~1935年的错误是路线错误，但是强调四中全会的路线是正确的，他对博、洛在中央苏区的政策和做法是不同意的；还说博古是苏维埃运动后期最主要的错误负责者，与他没有关系。他还抓住罗迈同志的一句话（在检查和认识了错误之后会感到“轻松愉快”）作文章，说“轻松愉快”就会检讨“不诚恳”、“不彻底”，想“马虎过去”，“这是不能改正错误的”，云云。谁都听得出，这是恣意歪曲，节外生枝。他在发言中谈论了到会的与未到会的、担任中央领导的与未任中央领导的、活着的与去世的约20人的这样那样的“错误”，唯独未说他自己有什么政治性错误。这无疑是在转移目标，把水搅浑来保护自己。

（胡乔木著《胡乔木回忆毛泽东》）

“为什么人”的问题：延安文艺座谈会

延安文艺座谈会于1942年5月2日下午开始举行。请柬是以毛泽东、凯丰两人名义发出的，说明开会的目的是“交换对于目前文艺运动各方面的意见”。在第一次会议上，首先由毛主席作“引言”。他说：“我们有两支军队，一支是朱总司令的，一支是鲁总司令的。”后来正式发表时，还是改成了更有概括性的语言：“手里拿枪的军队”和“文化的军队”。23日，毛泽东作“结论”时，把全部问题归结为一个“为什么人”的问题，即文艺要为工农兵服务和如何服务的问题。

座谈会前的延安文艺界

整风运动是全党范围的运动，包括各个部门和各级干部在内，文艺界和文艺工作者当然也不例外。不过文艺界的整风有文艺界的特殊内容。

按照中央领导的分工，文艺界的整风运动由毛主席分管。

当时延安究竟有多少文化人？没有做过详细统计。1944年春毛主席在一次讲话中，说延安的“文学家，艺术家，文化人”“成百上千”，又说“延安有六七千知识分子”。这给了我们一个大概的数字。这些文化人的绝大部分都是抗战爆发后一两年从全国各地甚至海外汇集到延安的。他们有的是受党组织的派遣，更

多的则是出于对延安的仰慕心情投奔光明而来。

毛主席作为一位伟大的思想家和革命领袖，深知文学艺术是整个革命战线不可缺少的一个方面，所以自西北内战局面基本结束后，他就分出一部分精力来抓文艺工作。同时，毛主席又是一位文学造诣很深的人，他的诗词和散文都具有很强的文学魅力，这又为他联系文化人提供了更好的条件。延安不少重要的文艺团体和单位，如中国文艺协会、西北战地服务团、鲁迅艺术学院、边区文化协会、抗战文工团、民众剧团等，都是在毛主席的亲自关怀、大力支持下成立和开展工作的。许多知名的以至不甚知名的作家、诗人、艺术家，受到过毛主席的接见。每当毛主席看到一篇好的作品问世，他都会表现出一种难以抑制的兴奋之情。1938年5月，他得知诗人柯仲平的长篇叙事诗《边区自卫军》受到群众的欢迎，便立即索要诗稿，亲自批道：“此稿甚好，赶快发表。”不久即连载于党中央机关刊物《解放》上面。1939年5月，他看了《黄河大合唱》的演出，据冼星海的描述：“当我们唱完时，毛主席和几位中央领导同志都站起来，很感动地说了几声‘好’。”这些无疑都是对艺术家们的巨大鼓舞。

在延安文艺运动兴起之初，毛主席就多次发表讲话，阐明他的文艺观点。

1936年11月22日“中国文艺协会”在保安县（今志丹县）成立时，他号召艺术家们“发扬苏维埃的工农大众文艺，发扬民族革命战争的抗日文艺”。

1938年4月10日，毛主席在延安鲁迅艺术学院成立典礼上论述“艺术的作用和使命”。他把经过长征到达陕北的原苏区文化工作者称作“山顶上的人”，把由上海、北平等城市奔赴延安的文化工作者称作“亭子间的人”，说“亭子间的人弄出来的东西有时不大好吃，山顶上的人弄出来的东西有时不大好看。有些亭子间的人以为‘老子是天下第一，至少是天下第二’；山顶上

的人也有摆老粗架子的，动不动，‘老子二万五千里’”。他要求这两部分人都不要以过去的工作为满足，都“应该把自大主义除去一点”。“作风应该是统一战线。统一战线同时是艺术的指导方向。”他还特别讲到：“亭子间的‘大将’‘中将’”到了延安后，“不要再孤立，要切实。不要以出名为满足，要在大时代在民族解放的时代来发展广大的艺术运动，完成艺术的使命和作用”。

4月28日，毛主席再次到鲁艺发表演说，论述怎样做一个艺术家。他认为，一个好的艺术家必须具备三个条件：第一，要有“远大的理想”。“不但要抗日，还要在抗战过程中为建立新的民主共和国而努力，不但要为民主共和国，还要有实现社会主义以至共产主义的理想”。第二，要有“丰富的生活经验”。艺术家的“大观园”是全中国，“要切实地在这个大观园中生活一番，考察一番”。第三，要有“良好的艺术技巧”。技巧不好，“便不能表现丰富的内容”，“要下一番苦工夫去学习和掌握艺术技巧”。

1939年5月，他为鲁艺成立周年题词，提出“抗日的现实主义，革命的浪漫主义”的文学创作主张。

1940年1月，毛主席在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讲演，明确规定了“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新民主主义文化方向。他说：“这种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是大众的，因而即是民主的。它应为全民族中90%以上的工农劳苦民众服务，并逐渐成为他们的文化。”

把毛主席上述主张同他后来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联系起来，不难看出，为人民群众服务，为现实的革命斗争服务，作家应深入群众，深入生活，这是他一贯坚持的文艺思想。

由于毛主席和中央其他领导人的重视和提倡，同时由于全民抗战热潮的推动与成百上千文艺工作者的努力，延安和各根据地的抗日文艺运动获得蓬勃发展。正如毛主席在文艺座谈会讲话中所说的：“我们的整个文学工作，戏剧工作，音乐工作，美术工

作，都有了很大的成绩。”文艺运动有力地推动了抗战事业的进行，繁荣了根据地的文化生活。

但是，就当时涌进延安的大多数文艺工作者来说，他们尚没有真正完成从小资产阶级到无产阶级的转化。他们的思想感情还需要有一个改造的过程，对革命根据地的生活还需要有一个适应的过程，在文艺为人民群众服务的方向问题上，还需要有一个从口头承认到彻底解决、从“化大众”到“大众化”的发展过程。就是说，在大多数文艺工作者身上还存在着各种各样的弱点。当抗日战争困难时期到来后，随着客观条件的变化，他们之中一些人所具有的思想弱点，就更加突出地表现了出来。

对于主要是1940年以后延安文艺界暴露出的问题，在整风后期的一份文件中曾作了这样概括：在“政治与艺术的关系问题”上，有人想把艺术放在政治之上，或者主张脱离政治。在“作家的立场观点问题”上，有人以为作家可以不要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或者以为有了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就会妨碍写作。在“写光明写黑暗问题”上，有人主张对抗战与革命应“暴露黑暗”，写光明就是“公式主义（所谓歌功颂德）”，现在还是“杂文时代”。从这些思想出发，于是在“文化与党的关系问题，党员作家与党的关系问题，作家与实际生活问题，作家与工农结合问题，提高与普及问题，都发生严重的争论；作家内部的纠纷，作家与其他的方面纠纷也是层出不穷”。这里的概括是符合实际的，其中列举的观点，有的是在报刊上公开发表出来的，有的是作家们在同毛主席交谈时谈出来的，有的则是在文艺座谈会期间反映出来的。以下几方面问题尤为明显：

首先，是所谓“暴露黑暗”问题。一个时期，“暴露黑暗”、“不歌功颂德”、使用“讽刺笔法”、“还是杂文时代”等主张，几乎成为一种时髦。《解放日报》文艺专栏和一些文艺刊物上，也有宣传这类主张的文字发表。有人在会议上直截了当地说：“我

是不歌功颂德的。”

其次，是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的倾向。以鲁迅艺术学院为例，其办学方针也存在着一些问题。比较突出的就是从1939年强调“正规”和“提高”后，脱离实际、脱离群众、“关门提高”的倾向发展起来。大戏、洋戏充满了舞台，而且影响到延安的整个演出界。讲写作，就是契诃夫和莫泊桑的小说。鲁艺的新校址桥儿沟，紧邻农民的场院，但不少教师却关在自己的窑洞里，不与农民往来。前方的文艺工作者对鲁艺提出了这样的批评：“堡垒里的作家为什么躲在窑洞里连洞门都不愿意打开去看看外面的世界？”“提高是否就是不叫人看懂或‘解不了’？”前方缺乏剧本、歌曲，但鲁艺提供出来的就是大、洋、古的东西。这是很尖锐的批评意见。延安整风开始后，鲁艺领导人也主动检查了这方面的问题。

第三，是学习马列主义与文艺创作的关系问题。这在延安一些文艺工作者中也存在着模糊认识。作家欧阳山曾批评过“马列主义妨碍文艺创作”的观点。但也有的作家主张不要把“什么‘教育意义’，‘合乎什么主义’的绳索”套在文艺上面。

第四，是“小资产阶级的自我表现”。相当多的作家由于出身于小资产阶级，又只在知识分子中找朋友，所以就把注意力放在研究和描写知识分子上面，甚至对知识分子的缺点也加以同情、辩护和鼓吹。反之，对工人农民则缺少接近和了解，不善于描写他们，倘若描写，也是像毛主席所说的，“衣服是劳动人民，面孔却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是文艺界没有真正解决为什么人问题的一个重要表现。

第五，是文艺工作者的团结问题。在文艺界发生的数不清的争论中，当然有些是有意义的，但也有许多是没有什么意义的，甚至是彼此攻击，在一些细小的问题上挑起争端。30年代左翼文艺运动中就存在的宗派主义情绪，又被带到了延安，影响着文

艺工作者的团结进步。

党中央和毛主席看到了上述种种问题。尽管这些问题并没有构成延安文艺界的主流，但它们对抗战和革命事业是不利的，也阻碍着文艺本身的发展。为了解决这些问题，并系统地制定党的文艺工作的方针政策，党中央决定召开文艺座谈会。

座谈会的召开和讲话的正式发表

如同解决其他重要问题一样，为了召开文艺座谈会，毛主席做了大量调查研究工作。他给许多作家写信，找了许多作家谈话，对有些人，信不止一封，谈话不止一次。他让作家们帮他搜集材料，提供有关文艺工作的意见。与此同时，中央组织部部长陈云、宣传部代部长凯丰等也分别找作家谈话。根据一些当事人的回忆，毛主席约去谈话的文艺家有丁玲、艾青、萧军、舒群、刘白羽、欧阳山、草明、何其芳、严文井、周立波、曹葆华、姚时晓等多人。

丁玲是抗战前夕第一个从大城市到达陕北苏区的名作家，西北战地服务团的组织者、领导者，在“文抗”、“文协”中都有职务。她到陕北后，写过不少以人民军队将领和群众生活为题材的作品，很受毛主席的器重。从1941年9月至1942年3月，她担任《解放日报》文艺副刊主编。她的《三八节有感》，曾受到贺龙和其他一些同志的批评。毛主席同丁玲有过多次交往，座谈会前同她的谈话，主要是就文艺批评问题交换了意见。

艾青是1941年皖南事变后，在周恩来同志的鼓励和资助下，同罗峰等一起到延安的。不久，即先后受到张闻天同志、毛主席的接见，相继担任了“文抗”理事、《诗刊》主编、边区参议员等职务。文艺座谈会前，毛主席三次给他写信，两次约他面谈。交谈之中，毛主席对当时发表的某些文章提出了尖锐批评，认为

有的文章“像是从日本飞机上撒下来的”，有的文章“应该登在国民党的《良心话》上”。艾青恳切地要求毛主席亲自“开个会，出来讲讲话”，他并把自己写的对于目前文艺上几个问题的意见，送给毛主席审阅。毛主席不仅自己仔细阅读了艾青同志的书面意见，而且把它交给几位政治局委员传阅。毛主席尤其在“歌颂和暴露”的问题上，对艾青谈了自己的看法，艾青也就根据当时对毛主席所谈看法的理解，修改了他的书面意见，后来发表在《解放日报》上。

萧军 1938 年 3 月第一次到延安时，毛主席就曾亲自到招待所看望他。1940 年 6 月第二次到延安后，担任“文抗”理事、《文艺月报》编辑、延安鲁迅研究会主任干事等职。从 1941 年 8 月至 1942 年 5 月，毛主席写给萧军的信共有 10 封之多。其中 4 封写于 1941 年 8 月，4 封写于 1942 年 4 月，两封写于文艺座谈会期间和其后。萧军性格豪爽，有才华，但固执、孤傲，看问题有些片面和绝对化，尤其不善于处理人际关系。他因为不赞成周扬《文学与生活漫谈》一文的某些内容和《解放日报》没有刊登他们几个人同周扬商榷的文章，而负气要离开延安。他向毛主席辞行，毛主席对他作了开导，随后又于 1941 年 8 月 2 日写了第一封信。信写得非常坦率诚恳，既有批评，又有表扬，并指出了努力方向。信中说：“延安有无数的坏现象，你对我说的，都值得注意，都应改正。但我劝你同时注意自己方面的某些毛病，不要绝对地看问题，要有耐心，要注意调理人我关系，要故意地强制地省察自己的弱点，方有出路，方能‘安心立命’。否则天天不安心，痛苦甚大。你是极坦白豪爽的人，我觉得我同你谈得来，故提议如上。”1942 年 4、5 月的 6 封信，都同座谈会有关。毛主席还同萧军两次面谈有关党的文艺方针政策问题。

刘白羽当时担任“文抗”的支部书记。毛主席为了更多地了解情况，要刘白羽找“文抗”的党员作家先行座谈，听取意见。

在同毛主席交谈中，刘白羽提出人犯了错误怎么办的问题，毛主席回答说：在哪里犯的就在那里改，如果是写了文章，影响更大些，应该是在哪里发表的就在那里改正。

欧阳山是中央研究院文艺研究室主任，草明是该室研究员。毛主席同他们谈话中，除就作家的立场、文艺与政治的关系、文艺为什么人等问题交换意见外，还对草明提出的“文艺界有宗派”的问题，谈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宗派主义也是个原则问题，但只有确立起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并到工农兵中去改造思想，宗派主义问题才能解决。

同鲁艺教员们的谈话，是集体进行的。谈论内容十分广泛，包括有“暴露黑暗”与“歌颂光明”，作家与群众，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幻想与牢骚，“人性”与“人类之爱”，李白与杜甫，《聊斋志异》与今人作品等多方面问题。

文艺座谈会于1942年5月2日下午开始举行，地点在杨家岭中央办公厅楼下会议室。请柬是以毛泽东、凯丰两人名义在座谈会前几天发出的，上面说明开会的目的是“交换对于目前文艺运动各方面问题的意见”。除毛主席、凯丰以外，当时在延安的中央政治局委员朱德、陈云、任弼时、王稼祥、博古、康生等也都出席了会议。被邀请参加会议的文艺工作者连同中央和一些部门负责人，共一百余人。座谈会举行过三次全体会议，有几十位党内外作家发言，毛主席自始至终地参加了这三次会议。

在5月2日的第一次会议上，首先由毛主席作“引言”。他说：我们有两支军队，一支是朱总司令的，一支是鲁总司令的。这种风趣的说法，不但形象生动，而且表明了他对中国文化革命主将鲁迅的一种崇高的评价。当然后来正式发表时，还是改成了更有概括性的语言：“手里拿枪的军队”和“文化的军队”。毛主席根据文艺工作本身的任务和延安文艺界的状况，提出立场、态度、工作对象、转变思想感情、学习马列主义和学习社会五大问

题，要大家讨论。座谈会上，不少作家争先恐后地发言，有的谈自己的见解，有的对其他人的发言提出不同意见。这次会后，报纸并没有作报道。5月14日，萧军在《解放日报》上发表《对于当前文艺诸问题的我见》，文章开头说：“5月2日由毛泽东、凯丰两同志主持举行过一次‘文艺座谈会’，作者为参加者之一”，这是第一次在出版物中报道了延安召开文艺座谈会的消息。该文于6月12日由《新华日报》转载，又把这一信息传递到了国统区。

5月13日，延安戏剧界40余人集会，座谈剧运方向和戏剧界团结等问题。会议从早到晚，开了整整一天，中心是“文艺运动的普及和提高”的问题。与会者一致认为一两年来延安的“大戏热”是一种偏向，不适当地强调了提高，忽视了广大工农兵的需要，自觉不自觉地把观众对象局限于机关公务人员、学生、知识分子的狭小圈子，以后应更着重于普及工作。但普及与提高两者的关系是什么呢？大多数人认为普及和提高是同一工作的两方面，要有精确的分工，又要有有机的联系；另一些人认为应把两者分开，使它们各自专门化起来。这次会议既是对毛主席“引言”的响应，又为他10天后作结论提供了重要资料。

5月16日召开座谈会的第二次会议。整天时间，毛主席都在认真地听取大家的发言，并不时地做着记录。有几个人的发言格外引起与会者的注意。一位作家从“什么是文学艺术”的定义出发，讲了一个多小时文学基本知识，引起大家的不满。一二〇师战斗剧社社长欧阳山尊根据自己几年来在前线和农村工作、学习的体会，讲了前线部队和敌后群众对于文艺工作的迫切需要，以及实际斗争给予文艺工作者的教育，认为文艺工作者应该有一分热，发一分光，甚至发两分光，这样做似乎付出很多，但实际上学到的东西更多。他呼吁延安的文艺干部到前方去。从毛主席的表情上可以看出，他对这个发言很满意。柯仲平报告了民众剧

团在农村演出《小放牛》受欢迎的情况，说：不要瞧不起《小放牛》，我们就是演《小放牛》，群众很喜欢，老百姓慰劳的鸡蛋、花生、水果、红枣，我们都吃不完，装满了衣袋、行囊和马褡。他的发言引起大家的欢笑，毛主席也很高兴，但他说：如果老是《小放牛》，以后就没有鸡蛋吃了。会上继续有人发表“人类之爱”和“爱是永恒的主题”、“不歌功颂德”之类的言论。

5月23日召开的第三次会议，气氛更加热烈。朱老总在下午最后发言，他针对前两次会上出现的一些思想观点和情绪指出：要看得起工农兵，中国第一、世界第一，都得由工农兵群众批准。不要怕谈“转变”思想和立场，不但会有转变，而且是“投降”。他说，他自己就是看到共产党能够救中国而由旧军人“投降共产党的”。共产党、八路军有功有德，为什么不该歌不该颂呢？有人引用李白“生不用封万户侯，但愿一识韩荆州”的诗句，现在的“韩荆州”是谁呢？就是工农兵。朱老总的发言深入浅出，生动有力，很受艺术家们欢迎。他发言后，由摄影家吴印咸为与会者摄影留念。

毛主席作“结论”时，已是晚饭之后。由于人数增加，会址只好改在广场上。在煤气灯光下，人们专注地听着毛主席的讲话。他以深刻的洞察力和高度的概括力，把全部问题归结为一个“为什么人”的问题，即文艺要为工农兵服务和如何服务的问题。在对这个根本问题给以充分的马克思主义阐述的基础上，对座谈会之前和座谈会期间延安文艺界反映出来的思想观点，一一分析、辩驳。他希望文艺工作者积极投入整风运动，划清无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两种思想、革命根据地和国民党统治区两种区域的界限，毫不迟疑地同新的群众结合起来，克服“唯心论、教条主义、空想、空谈、轻视实践、脱离群众等等的缺点”，写出“为人民群众所热烈欢迎的优秀作品”。

座谈会后的一周内，毛主席又两次发表关于文艺问题的讲

话，对座谈会讲话内容作进一步申述。

第一次是5月28日在整风高级学习组的会议上。他指出：召开文艺座谈会的目的，就是要解决一个“结合”问题，“文学家、艺术家、文艺工作者和我们党的结合问题，与工人农民结合、与军队结合的问题”。这是一个“长期的过程”。而为了实现这几个“结合”，又必须“解决思想上的问题”，即“要把资产阶级思想、小资产阶级思想加以破坏，转变为无产阶级思想”，这是“结合的基础”。党的政策就是“要小心好好引导小资产阶级出身的艺术家，自觉的不是勉强的、慢慢的和工农打成一片”，“以工农的思想为思想，以工农的习惯为习惯”，如此才能写好工农，教育工农。他把文艺界存在的问题区别为两种，一种是某些作家发表了含有错误内容的文章、作品、言论，他认为这“不是什么严重问题”，原因在于这些作家“根本都是革命的”，“某些时候或某次说话写文章没有弄好，这是部分的性质”。另一种是作家“头脑中间还保存着资产阶级的思想，小资产阶级的思想。这个东西如果不破除，让它发展下去，那是相当危险的”。这后一种是“最基本的问题”。“把这个问题解决，文学艺术为工农，服务于工农大众，向工农大众普及，再从向他们普及中间来提高他们，这些问题也都可以解决”。总之，毛主席这次讲话所强调的文艺界的基本问题，就是一个克服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思想影响的问题，这同全党整风精神是完全一致的。讲话中，毛主席还指出，在文艺创作上，不仅要反对只讲艺术性而抹煞革命性的倾向，也要反对只讲革命性而忽视艺术性的倾向，应该把革命性与“艺术形态”这两者很好结合起来。

第二次是5月30日在鲁艺。他提出著名的“小鲁艺”、“大鲁艺”的观点，指出现在学习的地点是小鲁艺，只在小鲁艺学习是不够的，还要到大鲁艺学习，这个大鲁艺就是工农兵群众的生活和斗争。鉴于鲁艺曾有过的片面强调提高的倾向，毛主席说：

长征经过的毛儿盖地方有许多又高又大的树，那些树也是从豆芽菜一样矮小的树苗苗长起来的。提高要以普及为基础，不要把“豆芽菜”随便踩掉了。

毛主席在文艺座谈会上讲话，事前备有一份提纲。提纲是他本人在同中央其他负责人和身边工作人员商量后亲自拟定的。讲话时有速记员作记录。整理的时候主要是调整一下文字顺序，使之更有条理。毛主席对整理稿表示满意。但稿子整理后并没有立即发表，其原因，一是他要对稿子反复推敲、修改，而他当时能够抽出的时间实在太少了；二是要等发表的机会。到1943年10月19日鲁迅逝世7周年时，讲话全文正式在《解放日报》上发表。

由于受当时猛烈进行的“抢救运动”的影响，讲话稿发表时，加进了一些不适当的言辞。如说在中国，除了封建文艺、资产阶级文艺、汉奸文艺之外，还有一种“特务文艺”；在文艺界党员中，除了思想上没有入党的人以外，还有一批更坏的人，“就是组织上加人的也是日本党、汪精卫党、大资产阶级大地主的特务党，但是他们随后又钻进了共产党和共产党领导的组织，挂着‘党员’和‘革命者’的招牌”。这些原来讲稿所没有、同全文精神极不协调的不实之词，在建国后把《讲话》收入《毛泽东选集》时，完全删除了。

谈到建国后毛主席对《讲话》的修改，除上面所说的情况及一些文字上的加工和引文的重新考订外，还应提到一些提法的改动。这些改动说明了毛主席对文艺上的某些重要问题作了进一步思考。这里只举两个例子。一是关于文学遗产的借鉴与继承问题。原稿的提法是：对古人和外国人的文艺作品，“我们必须批判地吸收，……作为我们的借鉴”，“但这仅仅是借鉴而不是替代”。《毛泽东选集》本相应的句子改为：“我们必须继承一切优秀的文学艺术遗产，批判地吸收其中一切有益的东西，作为我们

……的借鉴”，“但继承和借鉴决不可以变成替代自己的创作”。这里虽然主要是加进了“继承”二字，但却是对一个文艺理论问题所作的原则性的变动。因为对文学遗产，有些就是只有继承，根本谈不到什么借鉴。如诗体、语言之类。今人写七律，写菩萨蛮，就诗体而言，只是继承。各时代的语言尽管都有创新，但作家不可能离开历史形成的语言传统，另外创造一套语言。二是在论到一些文艺工作者“轻视工农兵、脱离群众”的问题时，原稿说：这些同志“与国民党的轻视工农兵，脱离群众，是有些不同的”。《毛泽东选集》本把“有些”二字去掉，改为“是不同的”。这也是原则性的改动，划清了两种脱离群众的根本界限。

（胡乔木著《胡乔木回忆毛泽东》）

“把历史搞清楚”：1943 年9月中央政治局会议

习惯上称“九月会议”，实际上是从9月上旬至12月初，连续召开三次会议。王明称病不参加会议。毛泽东说：王明以国际的旗号，马列的招牌，“欺骗党十多年，好多同志被拉过去，自己也不清楚”。王明不服，对任弼时说：“四中全会搞得不对，自己思想上有错误，至于说有什么宗派那真是笑话。”毛泽东总结说：“我们虽然从历史中走过来，但是要从观念形态上恰当地反映历史是不容易的。经过这样多的折磨，这样多年，这次高干会才把历史搞清楚。”

1941年“九月会议”最重要的收获是中央领导层的多数人，对苏维埃后期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基本上取得共识，但是，这条以王明为代表的错误路线起始于何时，“九一八”后组成的临时中央和后来召开党的五中全会是否合法，特别是对抗战初期，王明在武汉工作时所犯右倾错误的严重性及其危害，以及党内影响团结统一的宗派主义问题等，由于王明先是以攻为守，继而逃避思想斗争，讨论没有展开；加以政治局的重要成员周恩来、刘少奇、彭德怀等当时不在延安，会议只好暂时停顿。

1943年9月，为了深入推进整风运动，加紧筹备党的七大，总结历史经验，进一步讨论王明的错误，消除宗派，巩固团结，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也称第二次“九月会

议”)。毛泽东曾说：“我们虽然从历史中走过来的，但是要从观念形态上恰当地反映历史是不容易的。经过这样多的折磨，这样多年，这次高干会才把历史搞清楚。”这是第二次“九月会议”对党的七大的召开所作出的重大贡献。

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交织 形成会议的紧张气氛

1943年9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是在非常严峻的政治气氛下召开的。

一是国共关系因蒋介石的政策日益法西斯化而重趋紧张。1943年3月，蒋介石在《中国之命运》一书中，诬蔑共产党是“新式军阀”，抗日根据地是“新式割据”，暗示两年之内予以解决。5月，他利用共产国际解散的机会，掀起第三次反共高潮。6月中旬，周恩来、林彪离开重庆返延安时，蒋介石的代表、时任三青团中央书记长的张治中非正式地告诉他们说，共产国际解散后，国民党拟有两个方案：一是中共交出军权、政权，以取得合法化；二是国共两党合一，即是要搞一个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的专制主义。蒋介石命胡宗南进攻延安，在中共中央的反击下，虽暂时停止，但国共关系仍保持紧张状态。

二是面对共产国际的解散，王明再度暴露出严重的投降主义面目。长期养病的王明，对中央给予他的批评根本不认账，一有机会就攻击中央的政治路线和整风运动，甚至挑拨关系。1943年初，他曾向从华中前线回延安的刘少奇申诉，企图争取同情，没有得逞。3月，张闻天从晋西北调查归来，王明竟然对他说：“这次整风主要是整我们从莫斯科回来的同志，尤其是你，因为你的教条比我更多。”他又碰了一个钉子。5月下旬，中央派李富春前去征求王明对共产国际解散的意见。他看了“国际”来电

后大放厥词，说什么共产国际解散后，各国共产党可能有进一步的大变化，资产阶级国家的党将与社会民主党采取广泛的统一战线，殖民地国家的党将与资产阶级的党进一步实行广泛统一的战线。这和拉英美有很大关系；国民党的性质除十年内战时期外，是民族联盟，带有民主革命的方向，又有民粹派的特点；苏俄过去五年内战即取得胜利，中国党十年内战未打出名堂，原因是革命方面只占偏僻的农村，没有中心城市及工业，农民的游击战争是不能最后解决问题的；今后国共两党合作形式要进一步改变，这种改变不只是政治方针的变动，而且是组织形式的变动。王明还得意忘形地对李富春说：“这是我的胡说八道。”

王明的这番奇谈怪论，实际上是认为共产国际解散以后天要变了。这是王明右倾投降主义的新发展，也是他向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政治挑战。

5月26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作出《关于共产国际执委主席团提议解散共产国际的决定》，指出：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斗争中“曾经获得共产国际许多帮助”，很久以来，中共“已能够完全独立地根据自己民族的具体情况和特殊条件，决定自己的政治方针、政策和行动”，今后，“必将继续根据自己的国情，灵活地运用和发挥马克思列宁主义，以服务于我民族的抗战建国事业”。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宣读了由李富春记录整理的王明自称为“胡说八道”的意见。以后，毛泽东一再就王明的新投降主义论调进行批判，而且言辞越来越激烈。毛泽东的批判集中在以下两方面：

（一）政治上的右倾投降。6月16日，他在政治局会上说：王明认为国民党是民族联盟、民主主义与民粹派的这种估计是不正确的。现在的国民党已不是大革命时代的国民党。他们所说的“民权主义”实际上是法西斯主义，没有民主，民生主义是闹得民不聊生，到处发生民变。《中国之命运》出版后，蒋介石转好

的可能性很小。7月13日，他又批评说：抗战以来，党内部分同志认为和大资产阶级只要团结不要斗争的思想，是假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是王明。对国民党打共、骂共、捉共、杀共、钻共没有义愤，不坚决反对，是右倾投降主义。认为无产阶级不能领导资产阶级的观点也是错误的。我们党内要把历史问题弄清楚，把非无产阶级思想弄清楚，党外把革命与反革命弄清楚。机会主义者不改正，有走向当敌人之危险，如张国焘。

8月30日，从重庆回延安不久的周恩来向政治局汇报中共南方局的工作后，毛泽东在讲抗战以来党的路线时说：王明的思想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在党内的应声虫。他回国后，抹杀国民党内部的区别，反对抗日阵线中有左中右，只分抗战与非抗战，认为中国没有军阀了，被侵略国家就没有法西斯主义。事实证明，蒋介石集古今中外反革命之大成，是封建买办的法西斯主义。蒋出版《中国之命运》，主张一个领袖、一个主义、一个党，又调兵遣将进攻陕甘宁边区，更加反动了。我们对国民党反动派的批判还可进行，直到他们向我们有所表示后方可停下来。

(二) 党内的宗派主义。8月8日，在中央党校第二期开学典礼上，毛泽东指出：党从四中全会以后，就有两大宗派，一是教条宗派，一是经验宗派。教条宗派是主观主义的第一形态，经验宗派是第二形态。这是反宗派主义的具体对象。反掉这两个东西，党就统一了。他说：教条宗派最主要的是王明，四中全会后是博古。这个宗派是相当有计划地派出干部到各地之中央局去改组，只有几十个人。我说的钦差大人满天飞就是指此而言。他们利用四中全会来夺取中央的权力，打击许多老干部，拉拢一些老干部，凭着“国际”的招牌，使许多实际工作者不是盲从就是跟着他们走。他们统治中央计3年又4个月，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无处不被其毒。结果白区损失10/10，苏区损失9/10。教条宗派只有罪恶无功劳，超过李立三、陈独秀，他们没有参加大

革命。王明有何功劳？四中全会已被揭穿，八一宣言还能考虑。洛甫在广昌战役后有转变。在长征途中，稼祥、洛甫从这个集团中分化出来了。遵义会议上改变了军事路线，撤了博古，书记换了洛甫。遵义会议后，抗战以后，教条宗派中有的同志还有宗派活动。从1937年“十二月会议”到1938年六中全会，在武汉时期形成两个中央，造成党内危机。

关于经验主义宗派，毛泽东说：这个集团大多数是正派人，也有许多不正派的，少数是帮派，像张国焘。

在两个宗派中，教条宗派是主要的，经验宗派不是主要的。教条宗派穿了马列主义外衣，利用“国际”名义来吓唬人，与经验宗派中不正派的人结合起来，危害最大。反对整个宗派主义，要从破坏教条宗派开始，在全党揭露，对犯错误的“将一军”。整风以来就是反对教条主义。王明对洛甫说：“整风就是整你和我。”这话又对又不对。说是对的，首先要揭破教条宗派，要整，要将军，要全党揭露。说是不对的，还要把一切宗派打坍，打破各个山头。我们只整思想，不把人整死，是治病救人，做分析工作，不是乱打一顿。对犯错误的同志还是要有条件地与他们团结，打破宗派主义来建设一个统一的党。

1943年9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就是在反对国民党顽固派的阶级斗争和批判王明右倾投降主义和宗派主义的党内斗争交织的背景下召开的，而毛泽东在会前的一系列原则性讲话，对会议起着引导的作用。

总结历史经验，确立党内斗争 准则，把整风引向健康深入

这次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是1943年9月7日开始的，之后或因重要工作穿插，或安排党史文件的学习，或等待政治局委员

彭德怀回延安，会议时开时停，直到1944年5月21日结束，历时共8个半月。

先后出席这次会议的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有：毛泽东、刘少奇、任弼时、朱德、周恩来、陈云、康生、洛甫、博古、邓发和稍后到达的彭德怀等11人，王明、王稼祥、何凯丰请病假。列席者有：李富春、杨尚昆、林伯渠、吴玉章、彭真、高岗、王若飞、李维汉、叶剑英、刘伯承、聂荣臻、贺龙、林彪、罗瑞卿、陆定一、孔原、陈伯达、萧向荣和胡乔木等19人。会议大体上分为3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从1943年9月7日到10月6日。

从9月7日起连续3天，会议由博古、林伯渠、叶剑英、陈伯达和朱德发言，揭发、批评王明。

博古揭发，抗战初期王明在武汉推行的是一条“孟什维克的新陈独秀主义”，它影响到东南局及华北的若干地方，他承认自己是这条错误路线的“负责者之一”。他从王明对形势和前途的估计、领导权、斗争策略、党的建设和工作作风等诸方面揭发和批评王明另搞一套，和中央的正确路线格格不入。他说王明只看到国民党由不抗日到抗日、反共到不反共的表面现象，没有看到大资产阶级的两面性和反动性的实质。在外国记者面前称蒋介石是“英明全才”，“雄才大略”，说国民党“没有军阀”；两党合作似乎只少一个“共同纲领”和“共同组织”；说抗战要靠国民党，八路军在华中、华南起不了直接配合作用，不同意发表《论持久战》的文章；对统一战线中的领导权问题，王明说：领导权是对同盟者而言的，无产阶级对农民可以讲领导权，和资产阶级是讲统一战线，不能讲领导权。主张一切服从统一战线，服从国民党的法，放弃独立性，求同不存异，不敢批评，不要刺激；军队则讲“七个统一”，武汉失守前不敢到敌后去组织武装，不发动游击战争；作风上“钦差大臣”味十足，张口斯大林，闭口法兰

西、西班牙，到处发通报，形成另一个中央。博古说：王明的新陈独秀主义“十二月会议”后形成，“三月会议”是高潮，六中全会没有根本解决，皖南事变中彻底破产。

朱德指出王明的新投降主义和陈独秀有共同点：一是不要革命领导权，二是看不起无产阶级的力量，三是瞧不起游击战争，四是害怕统一战线破裂。朱德说：中国资产阶级靠自己干革命，老实说是不会成功的，无产阶级不拒绝和它合作，但是你不来我们还是干的。五是只讲团结，不要批评。两者的不同点是：王明有“国际”的招牌，而陈独秀则是反“国际”的。

叶剑英批评王明不知己，不知彼，不知蒋介石为何人。在处理国共关系上“身在毛营心向蒋”，躺在统一战线的软椅上睡觉，不能不犯投降主义错误。

9月13日，康生对前3天的会议开法表示不满，说不仅不能解决问题，还会延误很多应做的工作。他听到毛泽东的一些意见后，故作惊人地说，“我花了两天时间读完了王明更加布尔什维克化的小册子，发现这是个大骗局”，它比李立三路线“左”得多，“是代表‘左’的纲领”，“王明主义”要从1930年的小册子算起。接着，他批评博古不揭发具体事实，“抽象”地批一下“这是不行的”。对长江局的机关报《新华日报》，他一言以蔽之，说：“它完全成为国民党的报纸，有许多反共言论。”进而他向“在武汉工作过的”周恩来、叶剑英等施加压力，“要求长江局的同志更多地揭发”。最后，他趁机洗刷自己和王明的关系。康生说：“在共产国际时期，王明说我要篡他的位，我哪敢！事实上矛盾是有的。政治上我虽跟他走，但组织上不愿与他同流合污。回国后（他）有组织上的阴谋，我是知道的，他想抓军权。我与王明的关系，如果他得势是十年也说不清的。抗战以来，我在毛主席教育下，没有执行王明投降主义路线，真是幸福。”他故作谦虚地说：“假如将来换一个环境，遇到一个不是王明而是李明，

是否受蒙蔽，这可是要常想到的一个问题。”

康生所谓“十年也说不清”的问题，在座的周恩来、任弼时和王稼祥等是了如指掌的。康生是四中全会王明上台后被提拔为中央组织部长的，“九一八”后，王明临去莫斯科前又提拔康生为临时中央政治局委员，之后的近两年间，康生竭力推行王明比李立三更“左”的“新策略”，先后在《红旗周报》、《斗争》、《团的建设》和《职运指南》等报刊上发表文章近 20 篇，乱扣“立三派”、“调和派”、“两面派”等政治帽子。1937 年 7 月后，康生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副团长，成为王明的副手。此后的 4 年内，他在列宁学院讲授的正是他“新发现”的王明“左”的纲领《为中共更加布尔塞维克化而斗争》的小册子。他不仅策动旅莫留学生联名请共产国际批准王明为中国党的总书记，而且还在纪念中共成立 15 周年的招待会上当众高呼“王明同志万岁！”这就是康生不愿与王明“同流合污”的真相。因为会议重点是批判教条宗派问题，康生的借机洗刷和表白，虽然拙劣，但也起到一定的作用。

会议结束时，毛泽东对党内两个宗派作了比较后说：教条主义是主要的，苏维埃后期，武汉时期都是教条主义为主，和经验主义者结合，所以要从破坏教条宗派开始。他说：王明是长江局的“总司令”，有一条投降主义路线，一切问题不让中央知道，项英如没有王明，没有这么大的胆子。毛泽东又指出，我党现在很不统一，目前必须强调统一；要一元化，反对闹独立性。犯宗派主义错误的同志和党有同一性，是党内矛盾，但要建设一个统一的党，必须打垮宗派主义。所以他主张先学习有关文件，大家交头接耳酝酿。火力不够，不能克“敌”制胜。

这以后，政治局扩大会议停了 20 多天。9 月底和 10 月初书记处两次开会研究深入整风的办法。10 月 6 日，毛泽东向政治局扩大会议汇报了书记处提出的三项措施：一是为郑重起见，在

政治局委员彭德怀未回延安前整风会议停开。二是扩大学习范围，除了在延安的高级干部和七大代表外，再吸收政治纯洁、有前途的青年干部参加；先讨论抗战后的问题，再逐段研讨大革命以来党的历史；大会小会和个别漫谈结合。三是成立领导学习的总委员会，毛泽东为主任，刘少奇、康生为副主任。书记处还向政治局提出允许参加学习的干部公开讨论党的路线问题。

会上，毛泽东讲了学习和形势问题。他说王明的教条宗派是在莫斯科时在假马克思主义者米夫支持下形成的，有一条政治纲领，四中全会时他们大闹天宫，王明的小册子是想改造全党的，它是错误路线的开台始祖，临时中央许多文件的指导思想都从这里来的。四中全会是错误的，可当作一个问题来研究。毛泽东指出，遵义会议后这个集团分化了。六中全会在政治路线上克服了他们的错误，但未作结论，组织问题也没有提出。现在的中央是以王明、博古时代为基础的，六大选出的中央委员还有5个人，也有执行王、博路线的。没有长的时间，不能使大多数同志觉悟。目前中央停止开会，组织700人来学习，目的就是要打碎教条宗派、经验宗派，主要打教条宗派，因为它是经验宗派的灵魂。现大家先讨论，在此期间什么文件、什么人都可以批评，七大再作结论。他告诫犯错误的人要自觉地以灵魂相见。要内力外力结合来克服各种宗派主义。

刘少奇说：在党内自由讨论党的路线是一种党内斗争。过去党内斗争传统有许多不好的。八七会议不让陈独秀参加，不许陈独秀方面的人说话。四中全会上，王明领导的党内斗争搞了许多非法活动，学了米夫与中山大学支部局的最坏的方法。只有遵义会议的斗争和延安反张国焘的斗争是很好的。这一次应该有意识地造成健全的布尔什维克的传统。首先要有自由批评的空气，中央负责同志要有随时接受干部群众监督和批评的精神准备。第二，批评只准明枪，不许暗箭，彼此挑拨也是不对的。第三，发

言一律称同志，不称首长。

周恩来是从重庆返回延安后第一次参加政治局整风会议。他离开延安3年，在国共斗争最紧张时刻归来，重庆政治谣言颇多，他在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出席的欢迎晚会上公开演讲说：“毛泽东同志的路线，就是中国布尔什维克的路线”，“我们党的组织是统一的，是基于主义的信仰、阶级的觉悟和革命的锻炼的，并有自觉的纪律来巩固它”。当毛泽东在政治局会上讲党内宗派主义时，周恩来郑重地说：经验主义者政治上没有创见，不认识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容易崇拜打着马列主义、国际路线旗号的教条主义。他进一步指出，革命者的政治品质有三类：一是为人的品质，有人品质恶劣，连做一个普通人都不够格。二是革命的品质，如勇敢，不怕牺牲，联系群众，作为共产党人是需要的，但是不够的。三是布尔什维克的品质，要开展思想斗争，既要联系群众，又不做群众尾巴，要有高度的纪律性。经验主义者或者有革命品质，但缺乏布尔什维克的品质。故要通过整风来提高自己的。有人连革命者的品质都没有，更要反省。

毛泽东在会议结论中就团结问题和党内斗争方法讲了重要意见。他指出，团结有四个范畴：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求团结，前提是坚决与他们的反共反人民政策进行斗争；与农民和小资产阶级求团结，必须帮助他们克服落后性、狭隘性和动摇性；无产阶级本身的团结，也要与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倾向斗争，达到内部统一；无产阶级先锋队的团结，要使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武器。有问题不要争论才是真正不要团结。为了把党斗好，言论一概自由。关于党内斗争，毛泽东指出陈独秀后期以家长制压制不同意见，是错误的。前年“九月会议”整风，从思想方法上解决问题，这是中央现在能团结的关键。毛泽东又说：我们所以能坚持下来，原因是有关苦奋斗的历史传统。内战时期，大多数干部还是正确的，地方宗派中大多数还是正确的。中央的“码头”，虽

是四中全会的基础，但政治上已起了变化，教条宗派和经验宗派可能还是有一点残余，所以“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完全适用。“思想斗争一要放手，二要谨慎。”

在整风进入组织“火力”、克“敌”制胜的阶段，政治局通过集体讨论，对党内斗争的性质、目的和方法，好坏的传统、界限更加具体明确，毛泽东和周恩来有层次地分析了团结的原则和革命者的品质，肯定内战时期大多数党员艰苦奋斗的革命传统，正是这种可贵的传统，使得在错误路线统治下历尽磨难的党得以坚持下来。肯定了这点，就把阶级矛盾和党内矛盾区别开来；思想政治上的错误和政治路线的机会主义区别开来；错误路线的制订者和执行者区别开来。同时，确立了党内斗争的准则，有利于缓解会议的紧张气氛。这是党成熟的表现。

以斗争求团结，就是提倡自我批评，反对自发论

10月中旬，彭德怀从前方回到延安。经过两个月的研究和学习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于11月13日进入第二阶段。

在进入第二阶段前的党史学习中，毛泽东在西北局和陕甘宁晋绥联防军高干会上对王明路线概括为四个特点：一是以速胜论反对持久战；二是以一切经过统一战线反对独立自主；三是军事上反对游击战主张运动战；四是组织上闹独立性不服从中央，闹宗派主义。他指出马列主义改造世界的方法论，自我批评是一条，反对自发论的思想又是一条。要以斗争求团结。11月初，高级学习组召开了几次大会，揭发批判王明。发言者有六大后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成员王若飞，驻少共国际代表陆定一。1931年以前他们在代表团团长瞿秋白领导下，曾和王明的教条宗派进行过斗争。陆定一批评王明在中山大学期间，就利用教条和从米夫那里学来的散布流言蜚语，排除异己，夺取党政的一套恶劣手

段搞宗派活动，四中全会后把这一套带到国内，对中国党遗害很大。王盛荣和李国华以反戈一击的姿态，揭发王明攻击中共旅莫支部，反对代表团，迫害同志以及后来驻共产国际期间遥控临时中央的活动。这就形成第二次“九月会议”清算王明错误的范围更大、群众基础更广的特点。

11月13日，在政治局整风会议上，毛泽东首先指出：王明以国际的旗号，马列的招牌，“欺骗党十多年，好多同志被拉过去，自己也不清楚”。遵义会议只集中解决军事路线，因为中央在长征中，军事领导是中心问题，当时，军事领导的解决差不多等于政治路线的解决。六中全会只作正面批评，党内关系根本不谈。现在我们要用恰当的方法来揭破它，最后由七大解决。他指出：统一的东西要经过分析与综合，发现问题，暴露问题，才能有正确的结论。党内存在的两个宗派，如不揭露，党就不统一。九州万国，八百诸侯，一国三公。教条宗派、经验宗派虽然是相互依存的，但两者有区别。教条宗派没有参加大革命，无功；经验宗派有功有过，特别在危险时不动摇，因为无马列见解，故对假马列者跟着走。教条宗派也有区别，遵义会议如无洛甫、王稼祥分化出来，不能解决问题。他们做了件好事。打教条宗派也要分是非轻重，有一点功绩也要指出。许多问题要等候同志觉悟程度才能决定。

毛泽东讲话后，博古作第二次检讨。他承认在莫斯科时自己是教条宗派中仅次于王明的人物，他们的“第一仗”是反对中国代表团；在临时中央他是推行新的立三路线的“第一名”，在中央苏区反罗明路线实际是反对毛泽东的游击战争传统，打击支持毛的干部。他们对朱德不尊重，将任弼时“外放”到湘赣；又打击苏维埃政府、工会系统和几个省委的干部，使毛不能工作。遵义会议上强调客观原因，没有认错，会后思想上出现反复。抗战初，新教条主义者说，中国如和国民党统一则存，分裂则亡，从

极左转到了右。他内心里不同意独立自主，成了王明投降主义路线的“执行者和赞助者”。

11月21日，继李维汉和杨尚昆之后，张闻天作自我批评。张是中山大学的首批学员，1927年担任向忠发的俄文翻译（后由博古接替）。在1928年米夫、王明制造所谓“江浙同乡会”的假案排除异己时，他和王明等结合。六大以后，张进入红色教授学院，和王明等渐疏远。他们都是米夫器重的人，所以王明、博古回国后，张就成了教条宗派在莫斯科的重要人物之一。四中全会结束不久，张回国代理沈泽民为中宣部长。张说：临时中央的重要决议多是博古起草的，我多写文章。自己毫无实际工作经验，却在发号施令，指示苏区工作。反罗明路线是反毛及老干部，彻底贯彻“左”的路线。一方面打击毛，一方面排挤任弼时。他检讨教条宗派的特点是：一，崇拜教条，不问实际；二，布尔什维克气少，“买办”、“政客”气浓；三，不讲党性，只有宗派成见；四，从米夫那里学了一套吓人、打人、造谣污蔑的恶劣作风。

周恩来从大革命后期起，就参加党中央核心领导，经历的政治风暴最多，对党史上重大事件的来龙去脉了如指掌。他的发言分两部分：一是自我反省，二是检讨历史。从11月27日下午开始到12月4日止，共讲了5个下午。他按照毛泽东提示的两个宗派的思路，检讨了四中全会、临时中央、洛川会议、“12月会议”和武汉工作期间的错误。他摆事实，总结经验教训，认为：宗派主义有三类情况，一类是宗派观念，对某些事认识不谋而合，这种观念可能是不完整、不自觉的。一类是有宗派的行动，如对某些事商量过，但仅是一时的。他说，关于独立自主的游击战方针，洛川会议通过了，当时他没有深刻认识其战略意义，以为这是对民众的，部队还是运动战，因此产生急性病，主张红军快些出动。这种认识和八路军总部的领导同志比较接近，以致对

游击战争的战略方针产生动摇。整个说还是执行中央路线，但遵守纪律是不够的。一类是在党内搞小组织活动，有政纲，有组织活动，如张国焘。

周恩来对党的历史的检讨分7个部分：党的五大到六大；“真假”共产国际，即共产国际指导的正确和错误；三中全会到四中全会；从中央苏区到遵义会议；瓦窑堡会议到洛川会议；“十二月会议”；1941年以后。他从这7个方面系统地梳理了1927年以来他亲身经历的重大事件，从对矛盾的陈述中客观公允地清理历史，用实践检验是非，把自己的言行置于一定的历史环境中，坦率地进行反省；又从革命的创造性、决断方的能力和党内斗争的软弱性方面，总结自己受教条主义者迷惑的教训。他的历史检讨澄清了许多重大问题。如九一八后组成临时中央是否合法，是不是篡党？他说：1931年6月，向忠发被捕叛变，他和王明无法继续留在上海，国际代表要他们离开。当时，他们还没有把中央搬到苏区去的观念。他决定进江西苏区，王明要去莫斯科，留在上海的政治局委员只有卢福坦一人。远东局代表提出组织临时中央，于是一面报告国际，一面由王明和他商量名单。最初提出在上海的博古、洛甫、卢福坦、康生、陈云和王永成等7人；黄平和刘少奇是后来加上的。远东局召集王、周、博、洛4人开会，决定由以上9人组成，不设区书记，由博古负责，洛甫负责与国际接头。为此，对原来的政治局委员卢福坦做了说服工作，并嘱咐博古到有中央委员较多的地方应该报告。这就把鲜为人知的、在非常时期组成临时中央的过程说清楚了。

在周恩来发言后，有人说：教条宗派再想来统治已很困难，但经验宗派的危害尚未过去，仍是危险人物。但周恩来是坦然的，而毛泽东是全面而冷静的。他在政治局扩大整风会前的讲话中，对周恩来的“评语”是“有功有过”四字。功在何处？他具体地说：大革命有功；八七会议坚持革命；三人团有功；反张国

焘有功；促成民族统一战线有功；1940年从国际回来同中央可以说是一致的。

任弼时并不是教条宗派的成员，但他也执行过错误路线，正如他自己所说：“那个时候并不知道四中全会后的路线是错误的，这个错误路线是过了七八年之后才发觉的。”11月下旬，他在政治局会上检讨说：在江西苏区时，他虽然认为毛泽东“有独特见解，有才干”，建议临时中央“以毛代项”为中央局代理书记，但是在苏区党代表大会上却对毛泽东关于“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的正确观点，当作不重视理论的“狭隘经验论”予以批评；在宁都会议上又认为毛泽东推行“进攻路线”不得力而同意将他召回后方。1938年3月，王明热衷于搞新的投降主义时，他却奉命向共产国际汇报了毛泽东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独立自主的正确路线，取得了国际的支持，毛泽东对他的“评语”是“功大于过”，希望他在原则斗争中“尖锐顽强点”。

11月底，第二阶段的整风会议告一段落，中央委托任弼时和李富春先后向王明夫妇谈话，希望王明正确对待错误。王明对任弼时说：“四中全会搞得不对，自己思想上有错误，至于说有什么宗派那真是笑话。”12月1日，王明向毛泽东并中央政治局诸同志写了一封信，信中说，1941年9月他向毛泽东谈的关于国共关系和抗战路线的意见“都是错误的”，“我完全放弃”那些意见；政治局扩大会议最近对他的批评，“虽然我现在没有精力详细检讨和说明，但我认为有向此次政治局会议作原则上承认的必要”。信中表示要“纠正自己的教条宗派主义错误”。这封信是由王明的妻子孟庆澍起草，王明签名送出的。

为了把全党的整风引向深入，为七大讨论历史问题作准备，12月28日中央政治局发出指示，要求各中央局、分局及区党委，向领导机关中的高级干部“初步传达初步讨论内战时期王、博宗派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错误及其严重损失”，抗战时期

“这个反党宗派的右倾机会主义（投降主义）路线及严重损失”。这是中央指名批评王明、博古错误的第一个正式文件，它表明参加延安整风的大多数高级干部对党的历史问题的认识基本趋于一致，并且有步骤地扩大研讨范围。

分析是发现问题和暴露矛盾， 综合是得出正确的结论

毛泽东曾经说：分析是发现和暴露问题，综合是得出正确的结论。政治局整风第三阶段的特点是进行总结和得出初步结论，然后提交党的七大讨论。

12月14日，延安1000多高级干部通过学习马列著作和党的历史文件，进一步提高认识，巩固整风成果。其中约1/3文化理论水平高的干部读《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个策略》、《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和《两条路线》，大多数干部只学习《两条路线》。从11月底后的4个多月中，政治局很少开会。

1944年3月5日，政治局继续召开扩大会议，讨论七大的准备工作和2月下旬书记处对党的历史问题作出的五项决定：（一）王明、博古的错误应视为党内问题。（二）临时中央与五中全会因有“国际”承认是合法的，但手续不完备。（三）学习路线时，历史上的思想要弄清楚，结论力求宽大。目前应强调团结一切同志共同工作。（四）六大的基本方针是正确的，六大是起了进步作用的。（五）从四中全会到遵义会议时期，也不采取一切否定的态度，凡做得对的应承认。会上，毛泽东作了具体说明，他说：在学习讨论过程中，部分同志怀疑王明、博古的错误是党外问题，现确定是党内问题；成立临时中央，在严重的白色

恐怖下，有在上海的“国际”代表机关批准，后共产国际又来电批准，应是合法的；五中全会也经过共产国际批准，但选举手续不完备；四中全会形式上也是合法的，但政治内容是不好的。毛泽东重申整风是政治上治病救人，思想上要清算彻底，组织结论要慎重和适当。我们党的历史上除反张国焘的斗争外，有两次大的斗争，即反陈独秀和反李立三。那时，思想上没有彻底地讨论，结论作得很严重，因此未达到治病救人的目的。前车之覆，并没有成为后车之鉴。这一次要思想弄清，结论宽大，对党有利。四中全会到遵义会议这一段，也不要一切否定，当时我和博古在一起工作，共同点都是要打倒蒋介石，分歧是如何打倒，是策略上的分歧。土地问题上，六大决议是没收地主阶级的土地，分配给佃贫中农，博古主张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要分析，不要笼统地一概否定，如果把过去的一切都否定，就是一种偏向。六大指出革命性质，提出十大纲领，指出形势是两个高潮之间，反对速胜论，提出争取群众，基本上是正确的，是有群众观点的。在解释书记处决定之后，毛泽东特别指出：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经过几次分化，“现在没有这个团体了”，“经验宗派也没了”。现在比较严重的是山头主义，反映在党政军民关系上，新老干部关系上，本地干部和外来干部的关系上。“历史上的问题已经不是主要的东西了。”去掉这个包袱，才符合事实，利于团结。

教条宗派，自1928年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形成以来，16年间从国外到国内，是严重影响中国革命、妨碍团结统一的重要因素，虽屡经分化，却没有系统地清理，在整风运动中，通过召开会议，除了王明以外的绝大多数有关同志，作了认真的揭发和检查。在书记处决定的基础上，毛泽东对党内宗派主义的总结性发言是非常重要的。通过这个问题的清理，使大家对党组织政治上的统一性，组织上的纯洁性，思想上的严肃性以及党内斗争的正

确方针，都是一次极深刻的教育。政治局批准书记处所作的五项决定和毛泽东对宗派主义的意见成为政治局的结论。

5月21日，中共六届七中全会在杨家岭开幕，会议主要审查包括党的历史问题结论在内的七大的各项准备工作。毛泽东在会上汇报了政治局的结论后，全会一致通过对党的历史问题的决议：

“1. 中央某个别同志曾被其他一些同志怀疑为有党外问题，根据所有材料研究，认为他们不是党外问题，而是党内错误问题。

2. 四中全会后1931年的上海临时中央及其后它所召集的五中全会是合法的，因为当时得到共产国际批准，但选举手续不完备，应作历史教训。

3. 对过去党的历史上的错误应该在思想上弄清楚，但其结论应力求宽大，以便团结全党共同奋斗。

4. 自四中全会至遵义会议期间，党中央的领导路线是错误的，但尚有其正确的部分，应该进行适当的分析，不要否定一切。

5. 六次大会虽有其缺点和错误，但基本路线是正确的。

6. 在党的历史上曾经存在过教条宗派与经验宗派，但自遵义会议以来，经过各种变化，作为政治纲领与组织形态的两个宗派，现在已经不存在了，现在党内严重存在的是带着盲目性的山头主义倾向，应当进行切实的教育，克服此种倾向。”

这个结论是后来七大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基础。至此，历年3年又8个月的延安整风运动在空前团结的气氛中落下帷幕。

（章学新：《1943年9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

七大序幕：六届七中全会

从1944年5月21日至翌年4月20日，全会断断续续开了近一年，创下党的历史上一项纪录。毛泽东说：七中全会的任务，第一是准备七大，第二是在七大以前处理日常工作。全会最后原则通过《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标志着整风运动结束，并为党的七大的召开在思想上做了充分准备。

党的全国第七次代表大会是我们党的历史上一次非常重要的大会。从六大到七大，时间相距达17年。七大会期很长，从1945年4月23日至6月11日，开了50天。这在党的历史上是创纪录的。

其实，召开七大的动议很早，准备工作也进行过几次。

早在1931年1月的六届四中全会上就提出要召开七大。在1930年12月写就的《中共四中全会决议案》中，把召开七大，总结苏维埃运动经验，通过党纲和其他文件作为“最不可延迟”的任务。但不久，国民党军队对中央苏区进行第二次“围剿”，此后战事连绵；中共中央在上海站不住脚，转移到中央苏区；及至红军长征到达陕北，才日渐安定。

第二次提出召开七大是抗战开始以后。1937年12月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召集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决议》，要求“在最近时期内”召开七大，初步规定了七大的主要议事日程，并宣布成立一个由毛泽东为主席、王明为书

记的七大准备委员会。但事实上，这个委员会并未工作。

1938年3月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了召开七大的问题。这次会议提出，中央应“立刻进行具体准备”，包括发表为召集七大告全党同志书和告全国同胞书；给地方党部发出关于七大准备工作的指示；成立大会各主要议程的报告草案委员会，责成政治局及中央同志起草报告提纲。这次会议没有形成正式文件。这一年4月14日，任弼时同志向共产国际报告说，中共决定于最近半年内召集党的七大，希望共产国际派人指导。

1938年11月党的六届六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召集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决议》，提出“在不久的将来”召开，中心任务是讨论坚持抗战，争取和保证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问题。会议还对代表名额分配、选举代表的方法，做了若干规定。1939年6月14日、7月21日，中央书记处先后向各地党组织发出两个如何选举七大代表的通知，并要求9月1日前选出代表待命。但从这时起，国民党顽固派相继发动了两次反共高潮，随后日军又加紧向我抗日根据地进攻，七大筹备工作受到影响。

再一次研究召开七大，是在1941年3月12日的政治局会议上。这是在刚刚打退第二次反共高潮之后。会议决定一切准备工作在“五一”前完成，初步议定“五一”开会。会议还决定七大议程只要三个大报告，即政治报告（毛泽东），军事报告（朱德），组织报告（周恩来），并相应作三个决议；原定的党章报告并入组织报告，职工报告不单另报告，改为就职工问题作专门讲演；组织问题和军事工作开始准备报告材料，各种政策条例由政策委员会加快讨论，编集成册，作为大会材料。这次会议还审查了代表情况，重新指定个别代表，确定了大会秘书处等会议机构，宣布任弼时为大会秘书长，王若飞、李富春为副秘书长。这是准备工作讨论得较为具体的一次，也有部分代表到延安等候了半年，但不久又决定延期召开。在1941年9月政治局整风会议

以后，曾打算在1942年上半年召开。后因部署整风运动、大生产运动和其他工作而未能举行。

又一次讨论召开七大，是在1943年7月17日的书记处会议上。这时整风运动早已全面展开，书记处会议向政治局提议在8至9个月内召开七大，并指定各主要抗日根据地的一些负责人来延安参加七大。这一年的8月1日，中央政治局发出《关于七大代表赴延出席大会的指示》，改定在年底举行，要求代表“须于最近期间启程来延”。随后，中央政治局重新召开整风会议，并号召高级干部学习党史，七大再次延期。

整风进入总结阶段以后，1944年5月10日的书记处会议决定，立即着手各方面的准备，在7月内开预备会，8月内开大会；各种公开决议及发表的演讲内容须做到：是给党员、民众和中外人士看的，道理是充分的，人家驳不了的；在5月内将大会报告及指定发言的提纲写出，6月上半月写成文字；正式大会前的预备会开1个月，正式大会一部分公开举行，可邀请党外人士参加。这次会议还确定了大会各个报告的准备委员会成员。军事问题报告委员会成员为朱德、彭德怀、林彪、刘伯承、陈毅、叶剑英、谭政、徐向前、贺龙、聂荣臻，由朱德负责召集；组织问题报告委员会成员是刘少奇、周恩来、彭真、高岗、谭政、王若飞，由刘少奇负责召集；周恩来准备在大会上作关于统一战线工作报告，统战工作报告委员会成员有邓颖超、陈毅、王若飞、薄一波、贾拓夫、林伯渠、林彪，由周恩来召集。会议还决定在七大前召开七中全会，并于5月20日左右召开首次会议。5月19日，中央书记处通知，决定5月21日召开七中全会第一次会议。这样，召开七大就实实在在提上了日程。

六届七中全会

5月21日下午2时，六届七中全会召开第一次会议。在全会前一个小时，毛主席召集政治局会议，通报了11天前的书记处会议内容，说七中全会的任务，第一是准备七大，第二是在七大以前负责处理日常工作。会议决定七中全会期间设主席团，由书记处三位书记毛泽东、刘少奇、任弼时加朱德和周恩来担任，书记处与政治局在此期间停止工作；七大议程，除拟作政治报告（毛泽东）、组织与党章报告（刘少奇）、军事报告（朱德）、统一战线工作报告（周恩来）、四中全会至遵义会议历史报告（任弼时）外，还拟安排关于边区（高岗）、华北（彭德怀）、华中（陈毅）三个地区工作的讲演；七大先开预备会，后开正式会（准备对外界公开报道）。在中央全会上，毛泽东又讲了政治局会议的决定并作了简单的中央工作报告。

毛泽东在会上说：从六大到现在16年，要作详细的中央工作报告很难。过去联共中央向大会作工作报告，实际上就是政治报告，只解决已经成熟了的中心问题。过去中央的工作，到会的同志都是知道的。现在即使要作工作报告也不能发表，准备将过去的中央工作放在历史总结中讲。

毛主席在报告中，主要回顾了自1935年12月瓦窑堡会议确定的在日本帝国主义侵入我国国土的情况下，中共为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的方针的执行情况。他说，抗战以来都是实行这个方针，方法是“发展自己”，“团结友军”。在大部分时间，大家的认识是一致的，但在个别时期对如何发展自己，团结友军曾经也发生过争论，关键是要不要有独立自主的政策。到六中全会，这个问题解决了。抗战以来，“发展自己”大体经过三个阶段。第一阶段，1937~1940年，是发展游击战争，采用“麻雀满天

飞”的办法到处发展。第二阶段，1941~1942年，日本主力对我，我根据地与军队缩小，一面坚持反扫荡、反蚕食，一面注意了许多政策，十大政策大部分是这个时期形成的。第三阶段，1943年以来到现在一年半，根据地人口和军队又得到了发展；开展整风，搞透思想，团结了全党，高级干部学习路线的方法是有效的；注意经济工作，陕甘宁边区的工业有了较大发展；现在要准备应付将来的大事变，准备由乡村去夺取城市。

在报告中，毛主席还谈到关于七大议程准备的一些变化情况。他说，在1937年“十二月会议”上曾指定了一个准备委员会，并安排了一些议事日程。在六中全会上对“十二月会议”的决定作了些改变，即将王明作政治报告、毛泽东作工作报告，改为毛泽东作政治报告，不要另外的工作报告，王明作组织报告。到1940年，又根据季米特洛夫同志意见，决定恩来同志作组织报告，最近又改为少奇同志作组织报告。过去的准备委员会亦未做工作，这工作是由中央自己做的。目前各个报告准备委员会已经组成，即将开始工作。

6月5日，七中全会举行第二次会议，中心议题是城市工作问题。根据抗战形势的发展，应否把夺取大城市作为一个战略任务，已提上议事日程。毛主席起草了《中央关于城市工作的指示》。全会就此展开了热烈讨论。毛泽东、刘少奇、康生、周恩来、彭德怀、聂荣臻、彭真、朱瑞、洛甫、朱德等先后发言。毛主席首先对“指示”作了说明。他说：城市工作问题是从国民党战场，尤其在河南汤恩伯不战而溃的情况引起来的。要靠国民党来收复大城市是不可能的。将来可能出现三股子力量，即罗斯福的美军、蒋介石和共产党，看谁先进城。我们要不要争取起决定作用？我以为在此种情况下应争取起这个决定作用，即争取做铁托（意即主要依靠自己的力量来解放国家，取得政权）。要有夺取城市的准备，担负起解放中国的责任。少奇同志在讲话中说：

我们现在进入城市的条件，超过世界各国的党。军事上有近百万军队和根据地，将来还可以大发展。列宁在准备暴动时还没有现在我们这样大的力量。政治口号，可以实行“先到为君，后到为臣”。我们进了城还是讲团结。你要来打，就自卫回击。不管将来情况怎样，我们都要夺取大城市。如果我们现在不准备城市工作，要犯错误的，历史会惩罚我们的。现在应该提出这个任务，下决心加强城市工作。毛主席提出这个方针是我们党的一件大事。现在要立即发出指示进行布置，不一定要等待七大来讨论。恩来同志在发言中主要讲了策略问题，指出争取伪军也是城市工作的一个内容，可以利用伪军起义建立统一战线政权。在城市搞武装起义，主要是里应外合，而不是以前欧洲式的单独的城市暴动。在宣传上，要强调民族的口号与人民的口号。我们先进了城，人民选举我们，我们就是合法的，国民党要反对我们，他就是非法的。洛甫同志强调，提出城市工作问题在思想上要有一个大的转变。过去认为国民党是老大哥，今后我们就是老大哥。七大战略计划，就是夺取城市，提高我们的自主性。朱老总认为，城市工作的主要方针是抓住民族解放的旗帜，要用各种各样的形式去组织群众，过去许多人怕“暴动”这个词，现在我们可用“起义”、“光复”等名词。最后，毛主席总结说：现在提出城市工作问题恰是时机。国内国际的舆论都对我们有利。从现在起，在思想上、物质上都要积蓄力量，有所准备。在根据地主要是巩固、练兵整训和生产；大后方要有所发展；对外交工作要加强；我们要处处有理，对蒋介石又拥护又批评，用人民的口号，将来可能成立各党联合的民族联盟。会议通过了毛主席起草的中央指示，决定组织城市工作委员会，成员包括少奇、陈云同志等 14 人，以彭真同志为主任；建议七大议程增加城市工作一项。

这以后，国内外形势在进一步发生变化。英、美联军在法国诺曼底地区登陆，开辟了第二战场。中外记者团和美军观察组先

后到延安，我党与美国方面建立了直接沟通的渠道。日本侵略军发动了湘桂战役，国民党军继续溃败。改组国民政府、成立联合政府的社会舆论高涨。在这种形势下，9月初，六届七中全会主席团举行会议，讨论关于提议召开各党派会议成立联合政府问题。这不仅成为重庆国共谈判和在延安同赫尔利谈判的中心议题，也为起草七大政治报告提出了新的主题。但是由于蒋介石拒绝接受成立联合政府的建议，在11月至12月间，六届七中全会及其主席团多次举行会议，准备组织解放区联合会，作为尔后组成独立政府的初步步骤；并且成立了由党内的周恩来同志、林老等14人和党外李鼎铭、续范亭先生等19人共同组成的筹备委员会。为了了解美国方面的反应，毛主席会见美军观察组的包瑞德时还通报了准备成立解放区联合委员会的想法。后来，中央全会反复讨论，还是决定暂缓成立解放区联合委员会，明确肯定现在全国总的任务是建立统一中国一切力量的民主联合政府，其他的不提，即将召开的七大也要取这种态度。在1945年2月3日的六届七中全会主席团会议上，毛主席进一步肯定了提出联合政府的意义。他说：去年9月提出联合政府是否错了？不提，别人将提，我们反而被动。提了，蒋介石至多不理我们，我们反而主动。去年9月提出联合政府是原则的转变。以前是你蒋介石的政府，我为人民。9月以后是改组政府，我可参加，实行联合政府的原则，抗战期内搞联合政府。这样，尽管在重庆的国共双方关于成立联合政府的谈判未能达成协议，但我党对于联合政府的主张越来越坚决了。

1945年3月31日，六届七中全会再次举行全体会议，讨论为七大准备的政治报告草案和党章草案。毛主席对《论联合政府》的政治报告作了说明。他指出：现在是有更大希望的时期，我们应在此时机提出适当的纲领，动员全国人民来实现。这个纲领就是动员全党全国人民打败日本侵略者，建设新中国。我们的

方针是放手发动群众，这是与蒋介石有根本区别的。在报告中对国民党蒋介石如何措辞？我曾考虑半年之久。还是批评九分，批评很尖锐，但留了余地，指出希望，虽然只是一分，这一分是需要的。不留这个余地就犯错误。对一切要联合的对象，我都采取联合态度，但也显示区别，各有批评。没有区别是不好的，惟有区别才能领导。中间派是有前途的，他们的壮大是对我们无害的，他们可以听我们的话，但他们是动摇的，要坚决领导。现在国际国内的人心向我，连高桂滋这些人人都说天下是我们的。在报告中我没有说这样的话，但有这股神气。我们要准备迎接胜利。

毛主席在说明中还讲了三个问题。一是在报告中对孙中山是否讲得太多？毛主席说，不多。我们要善于引用他，这没有害处，只有好处。列宁也要我们发挥他的东西。他的遗嘱，唤起民众，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这两条是基本策略。他关于民主讲得最好，为一般平民所共有。美国党现在把华盛顿、林肯都当做自己的旗子，我们就拿孙中山做旗子。而且我们与孙中山还有一段姻缘，曾经和他一道开过会。内战时期不讲他，不能怪我们。现在不同了。党内厌恶孙中山的情绪相当广大，应该说服。二是共产主义要不要讲？毛主席说：在报告中，共产主义，我括去一次，又恢复了。不讲不好。对党名，党外许多人都主张改，但改了一定不好，把自己的姿势搞坏了。所以这里索性强调一下共产主义的无限美妙。但提过了一下以后，仍着重说明民主革命，把它称为马克思主义的天经地义。这里着重区别于民粹主义，民粹主义在中国与党内是很广大的。这次报告与《新民主主义论》不同的是，确定了资本主义的广大发展，又以反专制主义为第一。蒋介石不是什么旧民主主义，而是专制主义。资本主义的广大发展在新民主主义政权下是无害有益的，而且这里也说明了有三种成分。国家资本主义在苏联也存在了好几年；十月革命后列宁就想要有一个国家资本主义而不得，富农存在得更久。

这些都比《新民主主义论》有发展。三是关于一般纲领与具体纲领。毛主席说，这个区别过去没有指出。其实大革命、内战、抗战时期的一般纲领都没有变，以后还可用若干年。具体纲领在各个大小阶段是不同的。长期以来找不出一个适当的口号，现在有了联合政府这个口号很好。联合政府是具体纲领。这个口号一提出，重庆的同志如获至宝，人民群众如此广泛拥护，我是没有料到的。

在讨论中，与会同志都表示完全同意毛主席的报告和说明意见，并对报告作了高度评价。董老说：我们提的纲领这样完整，蒋介石他们再提也很难超出我们的范围。吴老还认为，毛主席的这个报告可比于列宁的四月提纲，现在国际国内的形势都成熟了，党外的人都同意我们联合政府的主张，要集中全党精神，团结全党力量来实现党的纲领，迎接新的胜利。毛主席在总结中又对联合政府的可能性作了分析。还在2月18日中央全会讨论恩来同志关于联合政府问题的国共两党谈判的报告时，毛主席就曾经讲过联合政府的几种可能性：以蒋介石为主，希腊式；以我们为主，波兰式；还有第三种可能，即蒋与我们合作的政府，这要看政府设在什么地方，若设在重庆蒋介石的刀尖上则本质上仍是蒋介石的，独裁加若干民主，这样的政府我们也要，因为可以宣传，可以做工作，但不要幻想。只要成立了联合政府，一切要由国民党、共产党、民主同盟商决。这样，他们的文章就不好做，我们的文章就好做。这次，毛主席又讲了联合政府的三种可能性。他说：第一种坏的，我们不希望的可能，即要我们交军队而做官。军队我们当然是不交的，官做不做呢？我们不要宣传做，也不要就拒绝。要准备这种可能性，其坏处是在独裁政府做官，这是可以向群众解释的；但也有好处，可以宣传。第二种可能是以蒋介石为首，形式是民主，承认解放区，实质蒋介石的政府仍是独裁的。第三种可能是以我们为中心，在我们有150万军队、

1亿5千万人民时，在蒋介石更加削弱无联合可能时，就要如此做。这是中国发展的基本趋势和规律，我们要建设的国家就是这样一个国家。大家同意毛主席的分析。对这个方案付诸表决时，“全体一致通过毛主席所准备在七次大会的政治报告中提出的方针”。

这次全会还讨论了党章报告，少奇同志在会上对党章报告作了说明。他说，党章照顾了现在和将来。一方面肯定了严肃性，一方面允许了灵活性。总纲是党的基本纲领，作为党章的前提与组成部分，可以更加促进党内的一致。党章以毛泽东思想来贯穿，这是一个前所未有的历史特点。党章强调了保证党与广大群众联系的群众路线，强调扩大党内民主，也就是党内的群众路线，包括党员有在一定的会议上批评党的任何工作人员的权利。对于这一条，少奇同志说他动摇了几回。“任何”两字写了又圈掉，圈了又写上。但仍倾向于给党员这个权利。这样虽会出一些乱子，但没有这一条，乱子会更多。在讨论中，对“任何”二字是否要写有不同意见。恩来同志以亲身经历表示，过去就是吃了没有下级批评的亏，如果路线错误早有人说，至少要好点。写上“任何”二字，是整风经验的总结，实践起来，利多害少。毛主席也表示，应该信任群众，绝大多数的群众是为党好的。因此，最后决定“任何”二字还是保留。弼时同志将此议案付诸表决时，“全体一致通过刘少奇同志准备提交七大讨论的党章草案”。

4月20日，六届七中全会举行最后一次会议，讨论通过军事报告、历史问题决议和七大的议事日程等问题。朱老总就军事报告作了说明。他说，这个报告写了两次。第一次写的报告是准备大会不公开时对内讲的。后来改为对外兼对内。因为时间匆促，大家没有充分讨论。昨晚谈了一下，认为报告主要缺点是对内意义不足，战争关节说得不清楚。现在请大家提出意见，以便基本上通过后再修改，好在大会上讲。毛主席提议，赞成就基本

内容通过。基本内容就是人民战争与打败日本侵略者。文字上在讲话以前与发表以前再加修改。这样，“全体一致通过朱德同志拟向七次大会所作军事报告的基本内容”。

关于历史问题决议的讨论，前节已作叙述，这里不再重复。对七大各项议程，均已按主席团提出的意见一致通过。这样，六届七中全会胜利地完成了七大的各项准备工作，几经延期并为全党关注的七大就要召开了。

（胡乔木著《胡乔木回忆毛泽东》）

盛会宏图：中国共产党 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

从六大到七大，时间相距达 17 年，值得回顾和总结的事情很多。七大会期很长，从 1945 年 4 月 23 日至 6 月 11 日，开了 50 天。这在党的历史上又是一个纪录。这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最盛大、最完满的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会充分发扬民主，畅所欲言，会议的气氛始终是热烈的，代表们的情绪始终是高涨的。七大以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而载入党的史册。

七大预备会议

4 月 21 日，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举行预备会议。大会代表，无论正式的，候补的，除有病、有事请假者外均出席了会议。大家把参加七大看做是非常崇高的荣誉。七大代表总共 755 名，其中正式代表 547 名，候补代表 208 名（无表决权）。共分中直（包括军直系统）、陕甘宁、晋绥、晋察冀、晋冀鲁豫、山东、华中和大后方 8 个代表团。除中直代表团外，其他是以地区为单位划分的。各个根据地有 6 个代表团。大后方代表团是指蒋管区和沦陷区的，包括两广、两湖（云、贵在内）、闽粤边、江西和四川等地。恩来、剑英同志都参加这个代表团。各个代表团又根据人数不等分成若干小组。如中直代表团分杨家岭一组、

杨家岭二组、党校组、王家坪组、枣园组和解放社组。

在预备会议上，弼时同志首先报告大会筹备经过。他说：七大早应举行，但因战争关系，交通分割，迟至今天才开。这固属缺点，但也有其积极方面。因为在延期当中，首先是充分发展了我们的力量。现在党员有120万，党领导的军队近100万，解放区人口近一亿。经过锻炼，党已成为全国政治的决定因素。七大在这样的基础上召开，其意义与作用是非常伟大的。其次是党的思想更加一致。经过整风、路线学习和审查干部，使党内思想一致，组织上更纯洁。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正是党的空前团结的反映。这是对七大的思想上的准备，其意义也是非常伟大的。弼时同志还就七大代表的产生经过、七大的议事日程和报告草案的准备情况一一作了说明。毛主席就七大的工作方针问题作了报告。他说，这次大会的方针是“团结一致，争取胜利。简单讲，就是一个团结，一个胜利。胜利是指我们的目标，团结是指我们的阵线、我们的队伍。我们要有一个团结的队伍去打倒我们的敌人，争取胜利；而队伍中间最主要的，起领导作用的，是我们的党。没有我们的党，中国人民要胜利是不可能的”。他还指出：我们党在24年的历程中，尝尽了艰难困苦，轰轰烈烈，英勇奋斗，不怕牺牲。当然，党内在一个时期也有不同意见，主要在三个问题上：第一，什么是敌人，什么是朋友；第二，如何组织队伍；第三，如何打法，发生过意见分歧。昨天七中全会基本通过了历史决议案，交给七大以后新的中央采纳修改。我们的大会要向前看，而不是向后看。我们现在还没有胜利，前面还有困难，我们必须谦虚谨慎，戒骄戒躁，全党要团结得如兄弟姐妹一样，为全国胜利而奋斗，不达胜利誓不罢休。毛主席的这番话，赢得了全会的热烈鼓掌。

预备会议表决通过了六项议案。这就是七中全会提议的毛泽东等15人为大会主席团；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

弼时为大会主席团常委；任弼时、李富春为大会正副秘书长；以彭真为主任的22人组成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七大会场规则。七大议程确定为：一、政治报告（毛泽东）；二、军事报告（朱德）；三、修改党章报告（刘少奇）；四、选举中央委员会。

七大第一阶段议程

4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延安隆重举行。弼时同志首先代表大会主席团宣布七大开幕，并发表了简短演说。毛主席致开幕词，这就是收入《毛泽东选集》第3卷的《两个中国之命运》。他指出：我们的大会是处在反法西斯战争最后胜利的前夜。在中国人民面前摆着两条道路、两种命运：或者是一个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富强的新中国；或者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分裂的、贫弱的老中国。我们的任务就是为着打败日本侵略者，建立一个独立的、自由的、民主的、统一的、富强的新中国而奋斗。毛主席讲话后，朱德、刘少奇、周恩来、林伯渠和在延安的日本共产党代表冈野进，先后在开幕典礼上发表了讲话，肯定中国共产党取得的伟大成就和毛主席的正确领导，预祝七大成功。此外，彭真还作了关于代表资格审查的报告，全体一致通过。胡乔木担任大会记录和主席团会议的记录。

4月24日，由毛主席向大会作政治报告。他写了一个书面政治报告，即《论联合政府》，发给大会代表，每人一册。这个书面报告，分析了国际国内形势，总结了抗战中两条路线的斗争，阐述了中国共产党的一般纲领和具体纲领，并指出了中国人民应当争取打败侵略者、建设新中国的前途。书面报告的内容非常丰富。现在读起来，仍能被其深邃的思想、精辟的分析、严谨的逻辑和高屋建瓴的气势所吸引。报告中许多重要思想至今仍很有意义。比如说，关于最低纲领与最高纲领问题。毛主席说，我

们的主张，是在彻底打败日本侵略者之后，建立一个全国绝大多数人民为基础而在工人阶级领导之下的统一战线的民主联盟的新民主主义国家制度，这是党的最低纲领；党的最高纲领则是将中国推进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但是，一切中国共产党人首先必须为着现阶段的目标而奋斗，如果不为着这个目标而奋斗，“而空谈什么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那就是有意无意地、或多或少地背叛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就不是一个自觉的忠诚的共产主义者”。这个思想很好，把如何正确处理两者的关系说清楚了，并且讲得很尖锐，值得深思。又比如说，对于资本主义经济成分的政策问题。毛主席说：我们主张的新民主主义经济，必须是由国家经营、私人经营和合作社经营三部分组成。所谓“私人经营”，即是允许自由发展那些有益于国计民生的私人资本主义经济。毛主席解释道：“有些人不了解共产党人为什么不但不怕资本主义，反而在一定条件下提倡它的发展。我们的回答是这样简单：拿资本主义的某种发展去代替外国帝国主义和本国封建主义的压迫，不但是一个进步，而且是一个不可避免的过程。它不但有利于资产阶级，同时也有利于无产阶级，或者说更有利于无产阶级。”由此，毛主席提出了检验政策的标准问题，这就是广为人知的一段论述：“中国一切政党的政策及其实践在中国人民中所表现的作用的好坏、大小，归根到底，看它对于中国人民的生产力的发展是否有帮助及其帮助之大小，看它是束缚生产力的，还是解放生产力的。”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论，既属于基本原理又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再比如说关于党的三大作风的思想。毛主席说：“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思想武装起来的中国共产党，在中国人民中产生了新的工作作风，这主要的就是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作风，和人民群众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作风以及自我批评的作风。”“应该使每个同志明了，共产党人的一切言论行动，必须以合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为最广大人民

群众所拥护为最高标准。应该使每一个同志懂得，只要我们依靠人民坚决地相信人民群众的创造力是无穷无尽的，因而信任人民，和人民打成一片，那就任何困难也能克服，任何敌人也不能压倒我们，而只会被我们所压倒。”这是党的建设理论的核心内容。能否做到这些，至今仍是我们加强党的建设需要解决的根本问题。

《论联合政府》书面报告，编入《毛泽东选集》第3卷时，经毛主席本人作了修订。这里要指出的是，毛主席的修订主要是文字性的；就内容言，除在国家、政权、军队等问题上有一些段落的删节外，有关国际形势与涉外关系部分删节得更多些。其中较为重要的，有这样一段话：“为着发展工业，需要大批资本。从什么地方来呢？不外两方面：主要地依靠中国人民自己积累资本，同时借助于外援。在服从中国法令，有益中国经济的条件之下，外国投资是我们所欢迎的。对于中国人民与外国人民都有利的事业，是中国在得到一个巩固的国内和平与国际和平，得到一个彻底的政治改革与土地改革之后，能够蓬蓬勃勃地发展大规模的轻重工业与近代化的农业。在这个基础上，外国投资的容量将是非常广大的。一个政治上倒退与经济上贫困的中国，则不但对于中国人民非常不利，对于外国人民也是不利的。”删去这段话，与建国初期我们国家所处的国际环境以及毛主席对这个问题认识的变化有关。毛主席当时提出这个问题，表明他的思路是很开阔的，思想是很开放的。这对于我们认识今天的对外开放政策也有意义。

毛主席在4月24日的大会上主要就书面报告中的一些问题以及其他问题作了口头报告。这个报告在档案文献里也叫“政治报告”。它主要讲了三个问题。第一，关于路线问题。毛主席说：七大的路线是，放手动员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解放全国人民，建立新民主主义的中

国。我们党历来的路线用一句话讲，就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毛主席特别强调了农民问题的重要性。他说：所谓人民大众，最主要的部分是农民。所谓人民战争，就是农民战争，基本上主要的就是农民战争。忘记了农民就没有中国民主革命，也就没有一切革命。“马克思主义的书读得很多，但是要注意不要把‘农民’这两个字忘记了。这两个字忘记了，就是读一百万册马克思主义的书，也是没有用处的。”同时，毛主席也讲了另一面，强调对党来说，就领导思想而言，我们要同农民划清界限，要把农民提高到无产阶级水平，不要把党同农民混同起来。没有这一条，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第二，关于政策问题。毛主席讲了11条。最要紧的有两条。一条是继续解释发展资本主义的问题。毛主席说，“新民主主义就是我们的总纲”，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就包括“要广泛发展资本主义”。“在我们党内有相当长的时期对于这个问题不清楚，这是一种‘民粹派’的思想。”“我们不要怕发展资本主义。俄国十月革命之后，还有一个时期让资本主义当作部分经济而存在，而且还是很大的一部分。”我们的同志急得很，“不要急嘛”。毛主席这样反复强调发展资本主义问题，是因为他敏锐地看到了党内存在害怕资本主义的倾向，这妨碍对新民主主义政策的认识和实施。在我们这个党里，这样的思想是会经常冒出来的，需要不断地警惕。毛主席这里讲的思想，也有助于我们认识新时期党的经济政策的调整。另一条是准备转变问题，即由游击战转变到正规战，由乡村转变到城市。毛主席说，我们要有这个准备，事先要有清醒的头脑，以减少转变中的意见分歧。“现在就要用很大的力量转到城市，准备到城市做工作，准备夺取大城市”，“像北平、天津这样大的三五个中心城市，我们八路军就要到那里去，一定要在那里开‘八大’。有人说，这是机会主义，恰恰相反，如果‘八大’还要在延安开会，那就近乎机会主义了”。毛主席当时讲这番话，

似乎是随便说的，其实是很认真的。因为对国内形势的发展，在七中全会上中央一直在分析。日本人战败投降已成定局，国民党腐败无能有目共睹，中国的天下将是共产党的天下，已成为人心所向。中央早已作了加强城市工作的安排。因此，说将来八大一定要在北平这样的大城市召开，既充满了对革命一定胜利的无比自信，也表现了毛主席高瞻远瞩的伟大预见。第三，关于党内问题，实际上是党的建设问题。毛主席讲的方面很多。他首先讲了个性与共性问题。因为有人说共产党要消灭个性，只要党性。毛主席从哲学方法的角度批驳了这种观点，指出：党员是有种种不同的差别的，抹煞各种不同的差别是不行的。抹煞差别性就没有统一性。党性就是共同性、普遍性，个性就是不同性、差别性。没有一个普遍性不建立在差别性的基础上。毛主席还谈到干部问题。他强调了知识分子的作用，说：一个阶级革命要胜利，没有知识分子是不行的。整风审干好像把知识分子压低了一点，有点不公平，我们这个大会要把它扶正，欢迎知识分子为党的利益、人民的利益而奋斗。毛主席还十分重视干部团结问题，提出要肃清山头主义，“就要承认山头、照顾山头，这样才能缩小山头、消灭山头”。这样，才能很好地团结，走向胜利。最后，毛主席提出“讲真话”问题，就是“不偷、不装、不吹”。懂得就是懂得，不懂得就是不懂得，懂得一寸，就讲懂得一寸，不讲多了。为了教育全党多读书，提高马列主义水平，毛主席再次提议读五本马列著作。这就是：《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个策略》、《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和《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毛主席的这个报告内容很丰富，虽然没有发表，但是这个报告的精神和许多思想在党内传达了，使全党对《论联合政府》报告的精神有了进一步的把握。

4月25日，朱德同志向大会作《论解放区战场》的军事报

告。这个报告几易其稿。在起草过程中，胡乔木被找去写了个初稿提纲，并写过部分初稿。这个报告最早是准备讲讲建军的几个问题，其中第六个问题曾拟为“论毛泽东军事学派”，写了数千字。报告初稿阐述了毛泽东军事学派形成和发展的历史，在理论上同古代的孙吴兵学、近代取法西欧的中国的军事学派，以及同苏联革命军事学派之间的区别；并分析了毛泽东军事学派的特点，毛泽东军事学派基本理论、战略战术和革命本质及研究方法等等。但是后来没有被采用。因为“毛泽东军事学派”这个提法不如“毛泽东军事思想”覆盖面广。

毛主席和朱老总报告后，大会进行讨论。4月27日，毛主席和朱老总都出席了在枣园召开的七大主席团和各代表团主任会议，听取各代表团讨论两个报告的情况汇报。原拟七大的会议时间较短。大会开始后，代表们纷纷要求延长，会议议程不断改变。原定大会发言人数也不很多，后来也突破了。从4月30日始，在继续讨论政治、军事报告同时，主要进行大会发言。到5月11日，先后在大会上发言的有：周恩来、彭德怀、陈毅、高岗、洛甫、康生、博古、彭真、聂荣臻、杨尚昆、陈云、李质忠、陆定一、刘伯承、朱瑞、古大存和李富春同志。在刘少奇同志作关于修改党章报告（5月14日、15日）后，从5月21日至23日，继续在大会上发言的还有：冈野进（日本共产党代表）、乌兰夫、朴一禹（朝鲜独立同盟代表、朝鲜革命军政干部学校副校长）、林彪、马凤舞、刘澜波、张鼎丞、傅钟和叶剑英。大会发言一共进行了10次，有26人讲了话。除两位外国党代表的发言外，其他发言主要是报告一个方面或一个地区的工作。过去犯过这样那样错误的同志，特别是在路线斗争中犯过严重错误的同志，还结合自己的情况作了检讨。这些发言都贯穿了“团结一致、争取胜利”的精神。尽管各组讨论对一些同志的发言提出了这样那样的意见，但总的说这些发言普遍地受到大会欢迎。

少奇同志作的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是大会的三大报告之一。他在会上讲了一天。整个报告都很好，特别是对作为党的指导思想——毛泽东思想的阐述，讲得非常精辟，是七中全会通过的“历史决议”的思想进一步发展，也是七大的一个重要理论成果。

七大第二阶段议程

大会在听取三个报告并进行几天讨论后，即进入第二阶段议程，一方面对三个报告的讨论作总结，另一方面也是主要的，转入酝酿中央委员会选举。这是与会代表普遍关心，议论最多的一个问题。选举标准是什么？犯过错误的同志要不要选？各个方面包括“山头”要不要照顾？是不是主要看能力强，有各方面知识和经验的同志才能选？等等。对许多问题，人们不甚清楚。大会主席团交换过几次意见，决定了一个基本方针。在5月17日的主席团常委与各代表团主任联席会议上，就中央委员名额的多少（40、50还是70）与提名方式（由主席团提，各代表团提，还是由各代表团的小组会提）进行过讨论，曾决定由弼时、少奇、恩来、彭真、富春5位同志组成一个非正式的委员会，与各代表团主任商量提出初步候选名单与选举手续，然后由主席团将初步候选名单提出交各代表团讨论。在5月19日的主席团会议上，通过了选举中央委员会条例草案，并决定印发各代表讨论后在大会上通过。5月23日，大会主席团与各代表团主任继续举行会议，听取对选举问题讨论情况的汇报，毛主席在会上讲了几点意见。联席会议请毛主席在大会上讲一讲。

5月24日，大会举行第17次会议，由毛主席代表主席团作关于中央委员会选举方针的报告。他回顾六大选举以来的历史教训，摆了许多情况，包括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经验，回答代表们

提出的疑问。首先，选不选举犯过路线错误的同志？毛主席说：犯过错误的，只是一种好的理想。但是，一个人在世界上哪有不犯错误的道理呢？过去我们图简单，爱方便，不愿意与有不同意见的人合作共事，这种情绪在我们党内还是相当存在着的。六大没选陈独秀，四中全会没选李立三，这都不好，也没有保证我们党不犯错误，甚至犯更大的错误。原因是政治路线问题没有解决。遵义会议以后的这10年，中央的主要成分还是四中全会、五中全会选的。在25个中央委员里头，六大选的现在只剩下4个。但是，我们和这些同事一道共事，没有犯大的错误，工作还算有进步。现在把这个账挂在我的身上，其实，没有这些同志以及其他很多同志——反“左”倾路线的一切同志，包括在第三次“左”倾路线中负有很重要责任的同志，没有他们的赞助，不仅遵义会议的成功是不可能的，而且今天的局面也不会有这样大。因此，我们选举的原则应当是：犯过路线错误，已承认错误并决心改正错误的人，可以选。这是现实主义的方针。鉴于历史，为着将来，为着全国人民，为着全党，我们要采取这样的方针，尽可能团结更多的人在我们的纲领下。第二，要不要照顾各个方面？毛主席说：这就是所谓照顾山头的问题。主席团认为，要照顾才好。中国革命有许多山头，即有许多根据地，白区也有许多块，这就是中国革命的实际，离开了这个实际，中国革命就看不见了。有山头不是坏事，坏的是山头主义，宗派主义。要消灭山头主义，就要认识山头，照顾山头，缩小山头，这是一个辩证法。没有全国产业的发展，交通的方便，要彻底消灭山头主义情绪是不可能的。过去的老中央委员会，没有反映各个方面的革命力量，是有缺点的。这次选举要注意这个问题。第三，中央委员是不是要通晓各方面的知识的人？毛主席说：每一个中央委员应当都通晓各方面的知识，是一个很好的理想。但事实上，任何一个人都不可能通晓各方面的知识。我们的新的中央应该包

罗各种人才，尽可能地照顾各个方面、各个山头，知识也是一样，要尽可能的通晓的方面多一点。如果我们的中央有各方面的人，每一个都通晓一方面或者有更多的专长，那么这个中央就会比较完全。我们要从集体求完全，不是从个人求完全。现在比较完全，但过几年可能又不完全，这就要从对现实的学习中来求完全，选有学习精神的人进中央委员会。毛主席还解释了按照这样几个原则来选，会不会产生所谓庞杂问题、落伍问题和不公平的问题。至于中央委员会的人数问题，他指出：主席团考虑了很久，没有提出确定的人数。有大、中、小三个方案。大的 100 人左右，中的 70 人左右，小的 30 人左右，在这三个方案中间，我们两头不要，取一个中间，就是 70 人左右。主席团认为这个比较好。七大应当选一个比较大的中央，必须比现在的中央委员会 25 个人要扩大，才能够适应目前党的状况、将来的发展以及国际国内的形势。毛主席的报告把代表们提出的问题讲透了，大家拥护毛主席代表主席团提出的选举方针。

5月27日，大会主席团和各代表团主任联席会议，讨论中央委员会选举问题，提出 94 人的预选名单，决定中央委员会由正式中央委员 45 名和候补中央委员 25 名组成。会议还研究了军事报告和政治报告的总结问题。刘伯承同志提出，毛主席的军事思想问题应着重讲，这是正本清源。在他看来，毛主席的军事思想最主要的有两点：一是武装与人民结合的问题，在中国这是开天辟地的思想。二是理论与实际的结合，它是中国的马克思主义。

5月30日，朱德同志向大会作军事问题的结论报告。他讲了五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讲的毛泽东军事思想问题。这个报告的基本内容，他在前几天的联席会议上谈过，大家赞同他的基本观点。在大会上的报告，他对这些问题讲得更充分。他说：毛主席的军事思想的全部系统是和国民党完全对立的。它是马克思

主义的中国化，用辩证法来分析中国的实际情况，在农村开展土地革命，军队的产生、发展、壮大也要依靠农村，依靠根据地。军队来自人民，取自人民，既靠人民打仗，也靠人民养活。因此，军队要为人民服务，搞好军民关系。人民军队的这个特点也决定了它的战略战术特点，多半采取游击战、袭击战、运动战或者大规模的运动战。毛主席的这些思想在井冈山是萌芽时代，红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是初步发展，到现在完全形成了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军事思想的整个系统。朱老总的这个报告是对他前次报告的补充。

5月31日，毛主席向大会作政治报告讨论的总结报告。这是他在七大的第6个报告（包括预备会议上的讲话在内）。他根据各代表团讨论的意见和要求，着重讲了三个问题。首先是国际形势问题。毛主席指出：把世界引向进步，这是历史的总趋势。英、美联合一切反动力量反对苏联，发生第三次世界大战的这种可能性，现在还不存在。从整个世界来说，资本主义是向下降，但不是讲英、美资本主义明天就要死。资本主义的发展是不平衡的，有一部分资本主义还是有用处的，落后地区还要发展资本主义。中国应该发展资本主义，这一部分资本主义是新民主主义的，我们现在提倡新民主主义的资本主义，它的性质是帮助社会主义的。它是革命的，有用的，有利于社会主义发展的。第二，关于国内形势问题。毛主席讲，我们的《论联合政府》小册子在重庆发了三万份，蒋介石侍从室的秘书陈布雷看了这本书，只说了两个字，就是“内战”。他们要打内战，消灭我们。但是很多人说，共产党有办法，讲得头头是道。我们对国民党的内战要有些准备。我们要看到光明，但是要准备困难。于是，毛主席论列了七大以后可能出现的17种困难，如英美大骂；国内大骂；根据地丢失几大块；损失若干万军队；内战全面爆发；跑掉若干万共产党员；党内出现悲观心理；天灾流行，赤地千里；经济困

难；国民党实行暗杀政策；党的领导机关发生意见分歧；外国无产阶级长期不援助我们，等等。全党高级干部要有对付非常不利情况的精神准备，包括许多意想不到的事。我们的方针是全党团结起来，克服困难，可能暂时吃亏，但终究我们要胜利。第三，关于党内若干思想政策问题。毛主席共讲了领导、方法、民主集中制、干部关系、准备转变、理论等 13 个问题。讲到领导和准备转变问题时，毛主席强调了预见的作用，指出：如无预见，即无领导；为着领导，必须预见。既要预见前途，也要预见偏向，要去掉盲目性。东北四省是极其重要的区域，有许多工业设备，有大工厂，大城市，如果能在我们领导之下，我们的胜利就有了基础。东北四省今天还不是我们的，但大会已经指出这是明天的事，我们要有这个预见。如果我们对于工业问题不能解决，对于大城市问题不能解决，那么一定要灭亡的。25 年来，我们没有解决这些问题，再过 25 年不解决，就要灭亡。不能设想，我们党永远没有这些东西，还能活下去。不解决这些问题，那也就是没有马克思主义。毛主席把转变问题，把掌握工业问题的认识提得这么高，这是过去没有过的，使代表们的思想再一次豁然开朗。毛主席对党性与个性问题作了进一步发挥，说：这是普遍性与差别性、集体与个人的关系问题。我们党不仅承认个性、独立性、人格、自由，而且在党领导的解放区内还大大地发展了这些。《共产党宣言》讲，“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不能设想，每个人不能发展，而社会有发展；每个党员没有个性，而我们党有党性。不能把党员变成纸糊的人，没有一点个性、独立性。只要服从党纲、党章、决议案，在这个大框子里尽量使大家能发挥能力，发展各人的长处。毛主席还说，个性有两种，有创造性的个性，有破坏性的个性。创造性的个性和党性完全不矛盾，是统一的。破坏性的个性与党性不一致，如个人主义，无政府主义等。我们要创造性的个性，不要破坏性的个

性。毛主席的讲话再次受到代表们的热烈欢呼。大会通过政治报告决议案，“完全同意毛泽东同志的政治报告《论联合政府》，并认为必须将报告所提出的任务，在全党的实际工作中予以实现”。

三个报告的总结作完后，大会剩下的惟一任务就是选举中央委员会。6月2日，七大主席团各代表团主任会议继续听取各代表团对候选人意见的汇报，并进行讨论。各代表团在讨论候选人名单时，充分发扬民主。实际上，是党史上空前的民主，做到了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有的提意见点名道姓，非常尖锐。情况汇报后，毛主席发表讲话说，大家把想讲的话讲出来是好的。对有的同志不管怀疑的内容如何，可以怀疑，被怀疑的同志也有权申诉。但是选举问题不是个人问题，要顾全大局。一些被选举人听到意见后，提出不做候选人行不行？你们考虑。选不选自己，自己有自由。只有在自己选自己对党不利时就不选，否则就应自己画自己的圈。我就准备自己打自己的圈。对谁有意见，所有同志应把自己想讲的话彻底讲清楚好。历史证明，凡是原则性的问题，敷衍下去，不知哪一天就会出来的。彻底弄清楚，才有利于团结。

大会休会几天后，6月9日开始选举。正式中央委员与候补中央委员分两次选。这天选举正式中委。6月10日宣布正式中委选举结果。毛泽东、朱德等44人当选为正式中央委员。接着酝酿候补中委的选举。毛主席在会上作了关于选举候补中央委员的报告。他讲了这样几点意见：（一）关于候补中委的作用。他说，候补中央委员的选举，意义也是很重大的。如果八大推迟，不能如期召开的话，候补中央委员的作用就更大。所以希望大家重视这个选举。（二）关于王稼祥同志的功过。毛主席说，王稼祥同志是犯过错误的，在四中全会前后，犯过路线错误。但是，他是有功劳的。他参加了二、三、四次反“围剿”战争，支持过正确意见；从长征一开始，他就开始反对第三次“左”倾路线

了；在遵义会议和六中全会这两个关键的会议上都发挥了重要作用；此后在中央工作中也做了很多好事。他现在病中，他的病也是在反四次“围剿”中负伤而起的。我认为他是能够执行大会路线的。在昨天的选举中，他没有当选，所以主席团把他做为候补中央委员的第一名候选人，希望大家选他。（三）关于东北问题。毛主席说，我觉得这次要有东北人当选才好。从我们党，从中国革命的最近将来的前途看，东北是特别重要的。如果我们把现有的一切根据地都丢了，只要我们有了东北，那么中国革命就有巩固的基础。在这里，毛主席进一步强调了东北问题的作用，这说明毛主席在深入考虑抗战胜利后的战略格局问题了。毛主席作完报告后，大会进行选举候补中央委员的投票。

6月11日，举行闭幕式。首先，大会宣布候补中央委员选举结果，廖承志、王稼祥等33人当选。会议基本通过《关于军事问题的决议（草案）》和通过《中国共产党党章》，并决定以七大名义召开中国革命死难烈士追悼大会。在闭幕会上，朱德、吴玉章和徐特立同志发表演讲后，由毛主席致闭幕词。它的主要内容经修改后以《愚公移山》为题收入《毛泽东选集》第3卷。毛主席对这次会议评价非常高，认为开了一个胜利的大会，团结的大会，达到了预期目的。谈到选举时，他说：这次选举，大家非常慎重，考虑分析，调查研究，比我们党的历史上任何一次的选举都民主些，但也很集中。整个大会可以这样说：放手的民主，高度的集中，是在集中领导下的民主，在民主基础上的集中，是民主与集中相配合的模范。这种制度，这种方式，全党都应采用。对于中国革命发展的前途，毛主席也作了些分析，指出：中国革命的发展可以经过从小半个中国（即目前有1亿人口、100万军队和许多块解放区的状况），到大半个中国（打败日本侵略者，华北、东北等解放区联成一片，打下若干大城市），到整个中国（人民最后挖掉帝国主义、封建主义两座大山）。从民主革

命转变到社会主义革命，一是长期的；二可能和平转变（和平的与浴血的两种可能都有，但和平转变的可能性大）；三是由人民来决定何时转变。毛主席希望代表们回去以后坚决执行大会的路线。

开了 50 天的七大胜利闭幕了。这是中国共产党有史以来最盛大、最完满的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这次会开得长了些，但由于充分发扬民主，畅所欲言，会议的气氛始终是热烈的，代表们的情绪始终是高涨的。当时国民党正在开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与我党七大形成对台戏。根据毛主席的意思，胡乔木对国民党六大文件作了些研究，为《解放日报》写了篇题为《评国民党大会各文件》的社论。这篇评论的最后结论是，“每一个客观地比较过的人，都会很快发现：共产党大会的文件，其内容是一贯的，它从事实与逻辑的分析出发，它不说中国人民在现在条件下不能做、不必做以及不准备做的事，它所提出的任务坦白、确定，而且有切实可靠的行动基础。相反地，国民党大会的文件，其内容是矛盾的，反动的和表现‘漂亮’实质反动的东西支配着并取消着‘漂亮’的东西；它没有事实与逻辑的分析；因而它所规定的工作，如果不是不应做的，就是不能做的，或者虽然应做能做，但是不准许有实行的前提；因而它的措辞也就既武断，又暧昧”，“只能乞灵于两面三刀的官样文章与阴谋词令”。当时的这篇评论对国民党六大采取了非常“客气”的态度。历史为这两个大会做了结论，对国民党六大是报之以无情的否定。

七届一中全会

七大以后，大多数代表陆续离开延安回到原来的地区和部门去了。6月15日，七大主席团举行会议，七大各代表团主任列席会议，讨论七届一中全会议程，酝酿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的人

选。6月19日，在杨家岭召开了七届一中全会第一次会议。出席的有正式中委27人，候补中委17人。曹瑛同志和胡乔木仍作会议记录。全会由弼时同志主持，报告了主席团会议的酝酿情况。最后全体一致选举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陈云、康生、高岗、彭真、董必武、林伯渠、张闻天、彭德怀等13人为中央政治局委员；选举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为中央书记处书记；选举毛泽东为中央委员会主席兼中央政治局、中央书记处主席。同时，还选举任弼时、李富春为中央委员会正、副秘书长。在这次会议上还讨论通过了《关于召开中国解放区人民代表会议及其筹备事项的决议》。本来，在六届七中全会上曾决定不再成立解放区联合会一类组织，但由于国民党不赞同组成联合政府，并宣布在11月召开国民大会，在七大期间党中央决定，也唱一出对台戏，召开中国人民解放区代表会议。毛主席在会上讲话说：参加蒋介石召开的国民大会是危险的，故我们拒绝参加。蒋介石过去每当摇摇欲坠之时，就说要召开国民大会，以欺骗人民，但说了就放下了。这次蒋介石一定要开，我们决定不参加，把难题摆在美蒋面前，也使中间派有文章做。中间派劝我们不参加。蒋介石一定要开，就骑虎难下，成为众矢之的。我们召开解放区人民代表会议则是稳当的，有利无弊的。它可能向两个方面发展，一个是向联合政府发展，选举一个解放区联合会；另一个也是向联合政府发展，但要经过一个曲折，即可能形成以重庆为主的联合政府——独裁加若干民主，然后再变为真正的民主联合政府。成立解放区联合会，这是一个重大的步骤，前途就是成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的政府。以前没有这样一个斗争形式，现在找到了这样一个统一战线的反日、反反动派的斗争形式。

50天后，即8月9日，七届一中全会举行第二次会议，除通过前述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外，主要讨论了时局问

题。7月26日，中、美、英三国发表波茨坦公告，促令日本无条件投降。8月8日，苏联政府根据雅尔塔协议，宣布对日作战。这次会议就是讨论苏联参战后的形势和党的方针、任务。朱德、彭德怀、陈毅、彭真、聂荣臻、叶剑英等15位同志作了发言。毛主席作了两次讲话。他说：苏联参战，使抗日战争进入最后阶段。我们准备发表一个声明（这就是收入《毛泽东选集》第3卷的《对日寇的最后一战》——引者注）。目前我们的任务有四项：配合作战；制止内战；集中统一；国共谈判。关于配合作战，毛主席说，现在同苏联红军配合作战，是痛快的。具体如何配合，还要等战争的展开。我们现在要做的是配备干部，发展攻势，准备几十个旅打仗，考虑一个计划。防御的问题在解放区一般是不存在了，只有局部还有敌人的“扫荡”，因此我们应广泛发展进攻，这与制止内战有关。我们要对日本军队放手进攻，学习较大规模的作战，这不会犯冒险主义。如果在战略上今天还不放手就会犯错误，当然战役上要谨慎。关于制止内战，毛主席说：日本交防给蒋介石，这种接防一般地是难于阻止的，中间大块是蒋的，我们的文章就在左右两翼做。我们在第一个时期的主要方针是取之于日伪，扩大地方，扩大力量，然后才有可能在第二个时期回过头来对付内战的威胁。关于集中统一，毛主席说：在干部分配、财政、城市工作、装备分配等方面，都要考虑集中统一问题。比如中等城市的问题归各解放区管，大城市问题则归中央管。关于国共谈判，毛主席说：在苏、美、中协定的基础上准备继续国共谈判，国共谈判要在国际的基础上（不是一切）来解决。苏联参战后，美国的政策可能有某些改变，但依靠蒋介石是一定的，故我党与美蒋是一个长期的麻烦。内战危险随日本垮台而增加。

抗战形势的发展进一步证明了七大制定的路线是正确的。许多干部纷纷要求到前方去，各根据地干部一批一批地离去。许多

在党中央机关工作的同志，当时也动了心。但毛主席说，后方总是要留人的，不能都到前方去，要提倡不动心，大家听从组织安排。随着日本军队的投降和抗日战争的迅速胜利，中国革命的历史又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毛主席和党中央又开始为新的任务运筹。

(胡乔木著《胡乔木回忆毛泽东》)

“耕者有其田”：1947年全国土地会议

1947年7月17日至9月13日，中共中央工作委员会在河北西柏坡召开全国土地会议。刘少奇主持会议并作报告和总结。会议通过《中国土地法大纲》，10月10日，由中共中央公布。土地法大纲宣告：消灭封建性及半封建性剥削的土地制度，实行耕者有其田的制度。但是，“会议对党内不纯的情况估计得过于严重，强调反右倾，对‘左’的错误则批评不力，是会后土改运动中出现‘左’的错误的一个重要原因”。

1947年7月17日至9月13日，中央工委在河北省建屏县（今平山县）西柏坡召开了全国土地会议。各解放区都派出较大的代表团参加。会议由刘少奇同志主持，朱德、董必武、康生等工委负责人自始至终出席会议。

会议第一阶段从7月14日到8月31日开了45天，由各代表团汇报情况，提出问题，讨论解决办法。

少奇同志在听汇报过程中讲话，提出要解决四个问题：一是要消灭封建与半封建剥削制度，满足无地少地农民的土地要求；二是要使新翻身的农民有从事耕种的资金、农具；三是要减轻农民负担；四是要保障农民行使其民主权利。他指出：从几个边区的汇报中看出，解决土地问题是最基本的，接着就是农民要求民主，但生产和负担问题也必须解决。不然，新翻身的农民只获得了土地，依然缺乏生产的资金、农具、牲畜，负担又太重，必然

减少从事生产的兴趣。

在会议第一阶段，根据晋冀鲁豫区的情况，我在发言中讲了三个问题。

第一，进行了土地改革，并不等于就能增加生产。贫苦农民虽然获得了土地，但缺乏资金和生产工具。受“左”的错误打击的中农也对增产不感兴趣。由于在土改中没有划清封建剥削和资本主义剥削的界限（前者是消灭的对象，后者则是保护的对象），犯了侵犯工商业的错误，影响了农具生产、采购和农产品的运销。高利贷被消灭了，是好事，但政府的农贷却跟不上，农民需要的资金难解决。这些都是应当看到的不利条件。

第二，土改运动过后，必须靠切实的经济措施来推动农业生产。在农村中搞变工队、互助组，是抓住了要害，对发展农业生产很有效，但是不能解决农村生产中的全部问题。良种，肥料，饲养大牲畜，旱地改水地等增产措施，必须用经济办法来推动，比如发放农贷、奖励副业、增产不加收公粮等等。

第三，必须做到“负担虽重而民不伤”。单从公粮来看，一般占农民人均收入的20%，还可以负担得起。最重的是战勤和支差，为了支援解放战争，要说服农民挑起这副重担；可是，由于无组织、无制度、计算不精确而造成的浪费，则是无谓地消耗人民的血汗，必须坚决改变。

会议的第二阶段，从9月1日开始，9月13日少奇同志作结论，共开了13天。

这个阶段的会议内容，是根据1947年7月27日《中共中央关于在土地会议中讨论的问题给刘少奇同志的指示》，面向全国，重点讨论如何消灭封建土地制度，并且“在实行土地改革运动过程中如何改造党、政及群众组织与工作”。

会议讨论了党在现阶段的土地政策。基本上是按照“五四指示”，坚决实现耕者有其田，可以根据当地情况采取不同的方法。

还提到由政府颁布实施办法、农会仲裁、必要的赎买等。

正在讨论时，新华社于1947年9月1日发表社论《学习晋绥日报的自我批评》，提出“现在的情势与抗日时期已经不同，……我党的土地政策改变为彻底平分田地”。少奇同志于9月5日向中共中央请示：“因新华社社论提出彻底平分土地，（会议）便又集中到土地政策问题上来。多数意见赞成彻底平分，认为办法简单，进行迅速，地主从党内党外进行抵抗可能减少，坏干部钻空子怠工多占果实的可能亦减少。而缺点就是除一般要削弱富农外，还可能从约占人口5%的上中农那里抽出或换平一部土地。得利者在老区亦占50%~60%，不动者占20%~30%，仍可团结80%以上的农民，因系彻底平分，中农的不安与动摇反而减少。故大家认为利多害少。因此，决定普遍实行彻底平分，由土地会议通过一个公开的土地法大纲，而各解放区政府提议，同时通过一个党内决议，以总结一年来土改经验，并提出执行政策的方法，及整党、组织农民与进行农村民主运动及生产运动的方法等。土地法大纲及决议草案，待通过整理后，即电中央批准并发出。上述各项，特别关于彻底平分土地的原则，是否妥当？望即复示。”（少奇同志这个“请示”，并未反映出虽是“少数人”但吃过苦头而有经验教训的同志的意见。——薄一波注）

9月6日，中共中央复示：“平分土地利益极多，办法简单，群众拥护，外界亦很难找出理由反对此种公平办法。”“同意即由土地会议通过土地法大纲，作为向各解放区政府的建议。同时，起草一个党内决议，由中央公布。”

会议讨论通过了《中国土地法大纲》草稿，并起草了《中共中央关于公布中国土地法大纲的决议》。9月13日，由少奇同志作会议结论。他说：会议上通过的《中国土地法大纲》，代表着今天土地政策的基本和主要部分；有了彻底的政策，还要有贯彻政策的纯洁的党组织，因此要进行整党；还要有群众路线的方

法，而不是官僚主义的方法。与此同时，他还部署了整党工作。

1947年10月10日，中共中央公布《中国土地法大纲》，向全国人民宣告：消灭封建性及半封建性剥削的土地制度，实行耕者有其田的制度。指出：封建性及半封建性剥削的土地制度，“是我们民族被侵略、被压迫、穷困及落后的根源，是我们国家民主化、工业化、独立、统一及富强的根本障碍”。号召“展开及贯彻全国的土地改革运动”。这是在我军转入战略反攻的新形势下，公开举起废除封建土地制度的战斗旗帜。它极大地推进了解放区的土改运动，并在国民党统治区产生了广泛的政治影响。

至于“彻底平分土地”，在实际工作中很快就得到了纠正。1948年2月22日，《中共中央关于在老区半老区进行土地改革和整党工作的指示》中就规定：在封建制度已被推翻的老区半老区，不再平分土地；在封建制度还存在的老区半老区，平分也限于“地主的土地财产和旧式富农的多余的土地财产”；在新解放区，对一切中农的土地都不再抽动。这就实际上取消了“彻底平分土地”的政策。在1950年6月28日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更进而保护富农经济。

会议对党内不纯的情况估计得过于严重，强调反右倾，对“左”的错误则批评不力，是会后土改运动中出现“左”的错误的一个重要原因。

当时，会议的空气相当“左”。一是对贯彻执行“五四指示”一年多来的“九条照顾”政策，统统否定，视为右倾。我在发言中谈到对大、中、小地主和封建富农、一般富农区别对待的时候，就遭到一些同志的反对。二是对党内不纯的情况估计过重。我谈到区村干部的主流是好的，康生在发言中就表示反对。我讲这两条，是吃过苦头的教训，并非徒托空谈，同时也是在作自我批评。会上形成的看法是：区村干部完全不受地主、富农影响者不多，多年未改选，大多是完全不对群众负责，不受群众监督，

在工作中强迫命令，其中自私贪污及多占果实者甚多。以前是贫雇农者，由于当干部，现在大多成为中农或富裕中农与富农，他们怕群众揭发、报复。脱离群众最甚者，常为村中五大领袖，即支书、村长、武委会主任、治安员、农会主任。三是允许侵犯中农利益。我在发言中讲到不能侵犯中农，我区曾经犯过这种错误，应当接受教训。康生却拿出他和陈伯达在晋西北郝家铺“土改”的“经验”说：“发动起群众来，动了中农不算‘左’；发动不起群众，不动中农也是右。”会上形成的看法是：如果有的中农坚决反对平分土地，那自然要进行必要的斗争。

会后不久，中央就发现了彻底平分土地必然要导致侵犯中农利益，必须迅速加以改变。对党内不纯现象估计过重的情况，也得到了纠正。从1947年12月中共中央会议开始，通过转发任弼时同志《土地改革中的几个问题》的讲话、邓小平同志《关于新区工作问题的报告》等重要文件，对土地改革的政策作了更加完善的规定和说明，有力地纠正了“左”的错误。

1948年3月2日，中共中央工委召开会议，首先请陈毅同志传达中央12月会议精神和毛主席的重要指示。会议由刘少奇同志主持，朱总司令、董老、康生，晋冀鲁豫区的薄一波、滕代远，晋察冀区的聂老总、黄敬，华东区的饶漱石，中原区的李先念都参加了会议。陈老总传达到土地改革问题时，说了毛主席三个意思：第一，土改整党是中国革命的主流，主流向东，保障胜利。第二，但主流东向中引起三个浪花，即：侵犯中农，对中小资产阶级采取冒险政策，踢开“三三制”，不再要党外人士参加政权。陈老总特别强调了毛主席的名言：我们不怕美援，只怕“左”援。第三，根据不同地区采取不同的土改办法，新区先实行减租减息。

我觉得陈老总传达的毛主席关于土改讲的三句话，实在讲得好，是画龙点睛之笔，值得久久回味。第一句，讲成绩。记得毛

主席在 1950 年 6 月七届三中全会上讲，“我们已经在北方约有一亿六千万人口的地区完成了土地改革，要肯定这个伟大的成绩。我们的解放战争，主要就是靠这一亿六千万人民打胜的。有了土地改革这个胜利，才有了打倒蒋介石的胜利。”这就是“主流向东，保障胜利”。看不到这个主流，就要犯错误。第二句，讲问题。即使是“战争空气掩盖了土改空气”中出现的“左”，毛主席也是毫不留情的，当时就严肃指出，“在战争、整党、土地改革、工商业和镇压反革命五个政策问题中，任何一个问题犯了原则的错误，不加改正，我们就会失败”。这就叫“不怕美援，只怕‘左’援”。第三句，讲方法。从实际出发，区别不同情况，采取不同政策。这一点，在毛主席指导全国胜利后广大地区的土改中，表现得更突出。这就叫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正是采取了这种马克思主义的方法，我们才取得了土改的伟大胜利。

（薄一波著《七十年奋斗与思考》）

转入战略进攻：中共中央前委“小河会议”

习仲勋回忆说：小河会议形成的指导人民解放军大举出击，经略中原，发展战略进攻的正确方针和加强西北战场的重要措施，反映了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关于把中央的决心与前线指挥员的见解有机地结合起来的战争指导艺术。对我军在陕北战场迅速转入战略进攻，解放大西北，夺取全国解放战争的胜利有着重要的历史意义。

1947年3月，蒋介石在全面进攻我解放区的计划遭到严重挫折后，被迫改为对山东及陕甘宁两解放区实施重点进攻。3月13日，集结在西北的10倍于我的敌胡宗南集团和宁青马鸿逵、马步芳集团，分由南、北、西三面向陕甘宁边区进犯，主力直取我党中央和人民解放军总部所在地延安。

面对这一严峻的形势，中共中央决定主动撤出延安。3月16日中央军委发布命令，陕甘宁边区各野战兵团和一切部队，统归中央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彭德怀和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习仲勋指挥。同时决定组成西北野战兵团，以彭德怀为司令员兼政委，我为副政委。中共中央决心利用陕北的复杂地形和老根据地军民团结一致的有利条件，诱敌深入，与敌周旋，在运动中各个歼灭敌人，彻底粉碎敌人的进攻。

我军撤出延安后，中共中央又相继决定，由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等组成前敌委员会，代表中央，继续留在陕北，指挥全国的解放战争；由刘少奇、朱德、董必武组成中央工作委员

会，前往华北进行中央委托的工作；由叶剑英、杨尚昆等组成中央后方委员会，率领转至晋西北的部分中央和军委工作机构统筹后方工作。小河会议，就是中央前委转战至陕北靖边县小河村时召开的一次扩大会议。

这次会议的最初主题，是准备商讨晋冀鲁豫野战军陈（赓）谢（富治）纵队到陕北战场配合作战问题。敌胡宗南部占领延安后，我西北野战兵团根据中央军委的作战方案，采取“敲核桃”和“打西瓜”的战法，积极歼敌。即集中优势兵力，消灭各点上立足未稳的小股敌军，这叫“敲核桃”战术。一口吃掉，吃了就走，再捕捉下次战机，通过这么几个回合，疲劳敌军，消磨敌军士气，而我军则就地隐蔽，以逸待劳，就可以抓住战机，争取在运动中歼灭大股敌军，积小胜为大胜，这叫“打西瓜”战术，从而使敌我力量对比由量变到质变。从3月底至5月初，我军相继取得了青化砭、羊马河、蟠龙镇三战三捷的重大胜利，奠定了粉碎胡宗南集团重点进攻的基础。为加强西北战场我军的力量，5月初，中共中央决定，陈谢纵队在结束晋南反攻战役后现地待命，准备西渡黄河至陕北，受彭、习指挥，协力击破胡宗南系统，收复延安，保卫陕甘宁，夺取大西北。6月中旬，毛泽东主席电告陈赓，要他于二十五六日动身来中央商量作战方针。这时，我西北野战兵团刚刚胜利结束陇东战役，为策应陈谢纵队西渡黄河，彭总和我向中央军委提出，准备乘胜北进，收复被宁夏马鸿逵部占领的我三边（定边、安边、靖边）分区。6月20日，毛主席复电：陈谢纵队准备7月初由曲（沃）翼（城）地区出发，约7月15日在绥德集结完毕，20日左右开始向榆林方向出击，约一个月完成任务，然后向南作战。你们边区野战军月底开始执行歼灭宁马十八师，收复三边之任务甚为适当。胜利后并望向西扩大战果。指出，依西北之敌情、地形、补给等条件来看，边区野战军与陈谢集团在数月内似宜分开行动，而不宜集中行

动。并提出在榆林、三边两役完成之后，准备向南出击之前似宜开会一次，讨论作战及补给等事，届时当请你们及陈谢来中央集会。

正当我西北野战军收复三边的过程中，山东战场的战局发生了变化。6月30日，刘邓大军发起鲁西南战役，一举突破敌人的黄河防线，迅速控制了黄河南岸的广阔地区，与陈粟野战军形成夹运河东西呼应作战的态势。中央军委对于整个战略部署有了新的考虑。7月4日，我们刚到被收复的定边地区驻扎下来，就收到毛主席给彭总和我的电报，提出：“关于击灭胡宗南夺取大西北有两个方案仍然值得考虑：（一）陈谢纵队照原议，来边区从内线歼灭其相当数量，然后出外线（陇南）与边区集团直接协力完成任务；（二）估计到边区人口稀少，粮食及各种供应颇为浩繁；又估计到鄂豫陕三省交界及平汉以西、汉水以北、渭水以南广大地区敌力空虚；又估计到假如使用陈纵于该区，必然要吸引胡部一个军（五个到八个旅）使用于该方面，而如果胡部有一个军出该方面，则边区敌力大减，利于边区集团各个歼敌；又估计到刘邓12万人已渡河向陇海前进，如若陈纵到鄂豫陕边开辟新战场，对刘邓亦有帮助。”以上两案究以何者较为适宜，请予考虑。并通知我们在收复盐池后到小河开会。7月7日，我军攻克盐池，三边全境收复。11日，毛主席又明确电告彭总和我：陈赓19日到小河，请你们亦于此时到达或提早数日先来。

7月16日，我和彭总从野司驻地张家畔（靖边）出发，跃马扬鞭，前往靖边小河村。一到中央驻地，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等中央领导同志就与我们及随后到达的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司令员贺龙，一起研究磋商了陈谢纵队使用方向的两个方案。还向我们介绍了如何正确解决陈赓纵队作用方向这个带战略性问题。此前不久，中央领导同志曾召见绥德分区负责干部，商讨筹集粮食问题。绥德分区的同志说，要2万兵不成问题，要2万石粮食

可是大问题。毛主席还为此组织调查研究组在农村进行了调查，了解一个区一年收成多少，交公粮多少，敌人破坏了多少。调查结果证实，由于敌人的破坏，群众存粮很少。毛主席认为在陕北打这么多人的仗是不可能了。所以，中央鉴于刘邓野战军主力实施战略突破后，战局已有重大变化，决心改变在陕北打大仗的计划，决定陈赓纵队由原定西渡黄河来陕北腹地，改为南渡黄河出豫西，协助刘邓经略中原，从相反的方向牵制敌人，配合陕甘宁边区军民击破胡宗南集团的进攻。7月19日，陈赓带领部分侦察人员到达小河村，中央领导同志在听取了他关于部队准备情况的汇报后，向他说明了上述情况和中央的决策，并最后与大家一起研究决定：“（一）为着协助陕甘宁击破胡宗南系统，同时协助刘邓经略中原，决定将陈谢纵队使用方向改为渡河南进，首先攻占潼（关）、洛（阳）、郑（州）段，歼灭该区敌人，并调动胡军相机歼灭之。尔后，向豫西、陕南、鄂北进击，创建鄂豫陕边区根据地，作为夺取大西北之一翼。陈谢纵队仍属彭习序列不变，同时仍属晋冀鲁豫建制。（二）提议赵基梅纵队（五师主力）、秦基伟纵队及孔（从周）汪（锋）三十八军与陈谢纵队一同南进，统受陈谢指挥。（三）上述陈、赵、秦、孔四部统于电到20天内完成一切政治、军事、经费、干部等项准备工作，8月19日以前渡河。”

接着，中央领导同志又同我们一起进一步全面地研究和讨论了军事形势。认为这时解放战争已进行了一年，在这一年中，人民解放军在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和毛泽东主席的领导下，正确地执行了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内线歼敌百余万，战争形势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虽然敌人在解放区东西两翼发动的重点进攻还没有被粉碎，但它的主力已深深地陷了解放区腹地。敌人战线之长和兵力不足之间的矛盾，已经十分尖锐，在全国战场上已经没有进行战略进攻的能力。根据军事形势的新变化，人民解放军有

必要而且有可能打到外线去，将战争引向国民党统治区。我军在各战场的局部反攻和刘邓野战军兵出鲁西南，转入外线作战的胜利，这些都显示了我军转入战略进攻的时机已经成熟了。因此，中央领导同志决定召开一次前委扩大会议，进一步讨论如何组织和发展战略进攻问题。

经过几天的酝酿和准备，中央前委扩大会议于7月21日至23日正式举行。会议是在小河村中间的一座大院里召开的。简陋的会场设在一顶用树枝、草席搭成的天棚下面，桌椅是临时从乡亲们家里借来的。三天的会议都在这同一地点进行。参加会议的有：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陆定一、杨尚昆、彭德怀、习仲勋、马明方、贾拓夫、张宗逊、王震、贺龙、张经武、陈赓等同志。

会议的第一天，首先由毛泽东主席就军事计划、战争形势作了讲话。他说，原先计划边区、陈赓两部集中打，现在决定分开打，从战略上与粮食上均有利。今年只能削弱胡宗南，到明年可以造成消灭他的条件。毛主席说，对蒋介石的斗争计划用5年（从1946年7月算起）来解决。这个计划，看过去一年的成绩是有可能实现的。山东战场局面最近可以转变，陕北战场还不可能，但基本上停止了胡宗南的进攻，这就打下了一个基础。现在我们有主力军90万，地方军60万，如能把主力军发展到150万，就足够解决问题。毛主席在讲话中分析了战争形势，指出，现在，蒋介石在政治上更加孤立，就是群众更加不信仰他，他更加众叛亲离。当然他还没有达到绝对孤立，还有一些人迷信他，这需要有一个过程。日本投降后的国共和谈是必要的，但是我们希望全部问题政治解决的目的没有达到，然而蒋介石的确是更加孤立了。我们说对蒋介石的斗争计划用5年来解决，这也用不着讲出去，还是要作长期准备，5年到10年甚至15年，而不要像蒋介石那样先说三个月要解决共产党，又说几个月，到了现在又

说是才开始。毛主席还向我们分析了统一战线的形势。他说，现在是一部分减少了，一部分增加了。减少的是解放区的地主，因为我们现在要土地革命，不像抗日期间仅仅减租减息。但南方的地主却因征兵征粮首先与蒋介石闹翻，与我们还没有决裂。增加的是中间派，这些人在抗日时期相信蒋介石，现在则与我们共同抵抗蒋介石。坚持土地革命不至于吓跑民族资本家，但如不坚持土地革命，则势必丧失了农民，丧失了战争，丧失了民族资本家。在城市，我们是打倒官僚资本，而保护民族工商业。毛主席说，蒋介石最近颁布的“戡乱总动员令”，解决了一个极大问题，即人民要和平，现在人民弄清了谁要战争。全国人民的同情，全世界人民的同情，民族民主统一战线，土地革命，这些因素是经常起作用的，而军队的优势，突然的袭击，这些因素是临时起作用的。总之，蒋介石是在走向众叛亲离：众叛，是群众不要他；亲离，是他的内部不和，美帝国主义和他之间也不和。毛泽东主席讲话之后，周恩来同志接着在会上总结了解放战争第一年的战绩。他说，过去一年内敌军有了极大变化。从建制、人员、武器来说，都损失了1/3，若从质量说，则不止降低1/3。他说，到今年3月至6月，敌军攻势已成强弩之末，仅在山东、陕北两处进攻，在其他各处我军均转入反攻。敌正规军由190万降为150万，明年仍照此推算，则我正规军数量上亦将超过敌人。我军去年停战时，主力、地方部队共为140万，复员中减掉一些，7月大打后又陆续增加，连后方机关现已达195万人。但解放区能实际负担的人口不足1亿，负担脱离生产人员以1.5%计，已经超过负担能力。所以今后发展必须求之于新区，而主力的发展则须求之于地方部队之升级。

毛主席和周副主席的讲话，给我们以极大的鼓舞，使我们加深了对战争全局的了解，增强了对党中央提出的军事计划和战略决策的认识和信心。但同时也感到要实现中央的计划和决策还需

要我们作出艰苦的努力。为了保证后方对前线的支援，建立巩固的后方基地，会议从第二天起，认真研究了陕甘宁、晋绥两解放区的地方工作和西北局的工作。彭德怀、贺龙同志和我以及西北局副局长马明方、西北局秘书长贾拓夫分别就陕甘宁、晋绥两解放区在土改中的问题和财政经济、后勤供应上的种种矛盾和不良现象作了发言。任弼时在会上介绍了陕北土改的一些情况，提出要保护中农以及如何斗争地主和加强群众团体的问题。

贺龙同志在会上提出，陕甘宁和晋绥两个边区党和军队早就统一，就是财政和行政不统一。如果不统一，就很难支持目前的战争。并就两个边区的统一问题谈了自己的意见。毛主席对此表示，边区在军事上与财政上均以依靠晋绥为主，今后更加如此。现决定由贺龙同志以联防军司令的资格来统一指挥和解决统一后方、精简节约、地方工作三个问题。

彭德怀同志在发言中谈到陕甘宁、晋绥两区统一和财政与粮食问题时说，拥护两个区统一，这很必要；财政统一也很重要。他认为由于敌人的进攻，边区缩小，人口减少了，因此精简节约非厉行不可。以90万人养9万人，甚至不能维持三个月。农村粮食枯竭，人力浪费太大。前后方均应有严格的编制与制度。财政工作中存在从财政而不从经济出发，从干部而不从人民出发的错误偏向。他指出团以上干部生活标准同下级过于悬殊，应该纠正；战士生活水平不能太高，群众负担不起，亦不能太低，影响体力。指战员的生活只能随着群众生活水平的提高而改善。对于战争，他说有人对胜利仍抱着侥幸心理，在领导机关中也存在，寄希望于陈赓来陕，而不认真准备艰苦奋斗。胜利并非唾手可得，这种思想必须切实解决。根据1947年2月中共中央关于在军队中组织党委会的指示，结合西北野战军的实际，彭德怀同志还在会上建议，在西北野战兵团中成立党的前线委员会，以讨论重大方针政策和执行战略任务。对于彭总的建议，毛主席当即表

示同意。

我在会上对西北土改中出现的问题谈了自己的看法，认为土改中损害中农和民族工商业利益、乱斗乱打、抓“化形地主”等偏向应该纠正，否则对战争和发展经济都不利。

最后，毛泽东同志作了会议结论。他说地方工作就是要联系群众，其中心关键就是土地问题。关于财政和粮食问题，毛泽东同志指出，“处处从全面长期着想”，这一句口号非常重要，要在全党全军进行解释。敌人的把握放在我们不能长期支持这一点上，我们的对策就是主力转入外线，内部精简节约，实行军民兼顾。土地政策今天可以而且需要比“五四指示”更进一步，因为农民群众的要求更进了一步。平分是原则，但按情况可有某些伸缩，如对杜斌丞，但对共产党员则不应例外。中农土地应该不动，在群众大潮流中，如中农同意，富裕中农拿出少许土地也是许可的，但不能正式写在文件上。军队打出去时，在新区与其没收地主土地，不如按阶级路线摊派缴税，利用旧机构有时也是需要的。立即实行耕者有其田，势必成为强迫群众。西北局领导上应加强。这个区域有几个有利条件便于团结群众、坚持斗争：第一，有本地的领导骨干；第二，有政治上可靠的军队；第三，人民是好的；第四，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许多老区工作作风至今是好的。有了这些条件，敌人是可以战胜的。

根据会议的决定，为了进一步组织和发展战略进攻，确保与扩大已经开始取得的主动权，会议结束的当天，中央军委即致电刘伯承、邓小平、陈毅、粟裕、谭震林及华东局，作出军事部署：“刘邓对羊山集、济宁两点之敌，判断确有攻歼把握，则攻歼之。否则，立即集中全军休整十天左右，除扫清过路小敌及民团外，不打陇海，不打新黄河以东，亦不打平汉路，下决心不要后方，以半个月行程，直出大别山，占领大别山为中心的数十县，肃清民团，发动群众，建立根据地，吸引敌人向我进攻，打

运动战。我们已令陈赓纵队并指挥太行纵队、五师、三十八军共7万余人，8月下旬出豫西，建立鄂豫陕边区根据地，吸引胡宗南一部打运动战。”“陈粟谭率鲁中主力并在刘到大别山后指挥陈（士榘）唐（亮）纵队担负整个内线作战任务。陈谢集团至豫西后受刘邓指挥作战。”

小河会议决定加强西北战场的一些措施，在会后也迅速落实。7月底，中央军委即批准由彭德怀、习仲勋、张宗逊、王震和刘景范组成西北野战军前委，彭为书记。将西北野战兵团正式定名为西北野战军，彭德怀为司令员兼政委，我为副政委。将抗日战争胜利后从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分出来的晋绥军区，重新并入陕甘宁晋绥联防军，由贺龙任联防军司令员，我为政治委员，统一领导陕甘宁和晋绥两个解放区的地方武装。贺龙同志还兼任西北财经委员会和财经办事处主任，以他为核心，统一领导这两个解放区的地方工作和财经工作，以加强陕北作战的后勤支援。由于会议确定组成西北野战军前委，决定西北局回后方主持工作，会后，我即与彭总分开，与贺龙同志一起前往绥德，统筹后方工作，全力支援野战军作战。

会后不久，根据中央军委的部署，西北野战军于8月中旬在沙家店战役中，一举歼敌整编第36师主力共约6000余人，彻底粉碎了敌人企图将我军歼灭于陕北或赶过黄河以东的狂妄计划，此战即成为西北野战军转入战略反攻的转折点。

小河会议形成的指导人民解放军大举出击，经略中原，发展战略进攻的正确方针和加强西北战场的重要措施，反映了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关于把中央的决心与前线指挥员的见解有机地结合起来的战争指导艺术。对我军在陕北战场迅速转入战略进攻，解放大西北，夺取全国解放战争的胜利有着重要的历史意义。

（习仲勋：《忆党中央在转战陕北中召开的小河会议》）

迎接革命新高潮：1947年12月会议

在陕北米脂县杨家沟召开中共中央会议，讨论通过了毛泽东所作《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报告。毛泽东说：12月会议就是要解决这篇文章。这篇文章是当做一个时期的政治纲领，“打倒蒋介石，建立新中国”的纲领。局面开展，胜利可期。开会期间，正值毛泽东54岁生日。他身边的工作人员想给他做寿，但毛泽东坚决不答应，并且讲了三条理由。12月26日那天，毛泽东白天主持会议，晚上同大家一起观看了贺龙从晋绥带来的平剧团演出的《恶虎村》。

11月22日，毛主席率领中央机关全体人员到达陕北米脂县杨家沟，“九支队”从此改为“亚洲部”。来杨家沟之前，毛主席在佳县的谭家坪住了几天。他走门串户，访问了十几家贫苦农民。由于支援前线、敌人摧残，加上庄稼受冻，陕北人民的生活很苦，有些人家眼看就要断粮了。毛主席知道这些情况以后，非常焦急、难过，立即找到佳县县委书记说：“一定要把群众的生活和生产切切实实地安排好。我讲的切切实实，就是说不是一个区、一个乡地安排，而是要一村一户地安排。”来杨家沟以后，毛主席和恩来、弼时同志商量决定，“亚洲部”全体工作人员和中央警备团的指战员，每人每天从口粮中节约一两粮，帮助群众渡荒。毛主席每次吃饭都要问管理员：“今天我的一两口粮节省下来了吗？”他还对饲养员说：“把大青马的料减上一半，我以后

出门可以少骑马。”很快地，“亚洲部”全体人员节约了70石黑豆和30石小米，分给杨家沟和邻近各村的贫苦农民。

杨家沟是陕北地区一个典型的封建地主庄园。全村270多户人家，就有72户地主，占有周围四五个县的18万亩土地。其余200户人家中，除一户中农外，全部是贫雇农。毛主席不但派出一批工作人员参加杨家沟的土改，而且还抽空亲自参加土改会议，听取群众的意见和要求。有一次，在部分区、乡干部和土改积极分子座谈会上，毛主席听到有的干部随便没收粮食时说：“贫雇农生活困难，中农有粮食可以借，将来逐步还，但不能没收。”他一再强调团结中农的重要性，打了一个比方说：“贫农好比骨头，中农是肉。一个人只有骨头没有肉，那就不成其为一个人了。”

12月25日至28日，党中央在杨家沟召开会议。参加会议的有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陆定一、彭德怀、叶剑英、贺龙、林伯渠、张宗逊、习仲勋、马明方、张德生、甘泗淇、王维舟、李井泉、赵林、王明、谢觉哉、罗迈（李维汉）、李涛等人。这次会议讨论和通过了毛主席的《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报告和他所写的《关于目前国际形势的几点估计》。会议决定指出，毛主席的报告“是整个打倒蒋介石反动统治集团，建立新民主主义中国的时期内，在政治、军事、经济各方面带纲领性的文件”。这次会议的其他重要决定有：1. 中国人民革命战争应该力争不间断地发展到完全胜利，应该不让敌人用缓兵之计（和谈）获得休整时间然后再来打人民。2. 组织革命的中央政府的时机目前尚未成熟，须待我军取得更大胜利，然后考虑此项问题，颁布宪法更是将来的问题。林彪在1947年春夏之交曾经打电报给毛主席，建议考虑建立民主联合政府。毛主席在7月25日复电称：“建立民主联合政府时机尚未成熟，在第二年作战再歼敌100个旅左右，攻占中长、北宁大部，平绥、同蒲全部，并向长江流域

发展，全国人民更加同情我党之时，可以考虑此问题。”在12月会议上，又有一些同志提出了这个问题，所以会议经过讨论作出了这一决定。这次会议还详细讨论了当时党内的倾向问题以及土地改革和群众运动中的几个具体政策问题。讨论的结果后来由毛主席写在《关于目前党的政策中的几个重要问题》一文中。

在撤离延安八个月之后，战争形势发生了这么大的变化，实在使毛主席喜出望外，兴奋不已。在第一天的会议上，他分析敌我形势时说：人心动向变了，蒋介石很孤立，群众站在我们方面。这个问题长期没有解决，内战时期我们孤立，抗战时蒋介石逐渐失掉人心，我们逐渐得到人心，但仍未根本解决，直到这一两年来才解决。军事方面，蒋介石转入防御，我转入进攻。以前讲反攻，不完全妥当，以后都讲进攻。经济方面，蒋介石困难严重，我们也困难，特别是山东、陕北，但可以解决，根本出路是土改，而蒋介石没有出路，况且我军主力又打出去了。

毛主席说，从现在到明年一年内，国内形势还会有很大变化，有利于我们。革命的长征已经进到了高潮，将来还会更高。以前我们希望高潮有城市暴动配合，现在看来这是困难的。高潮主要表现在战争的胜利，但战争仍是长期的，这样大的国内敌人和美帝国主义，不会甘心于失败的。战争还要准备四五年，也可能还要长些。战争需要不间断的，不让蒋介石喘息，但也不能说死。我们不靠外援，不是不要外援，这是我们历来的方针，是完全可以办到的。我们要依靠自己的努力，依靠自己的政策，依靠群众。

毛主席说，关于统战，原则是孤立敌人，而不是孤立自己，既要反“左”，又要反右，以便划清界限，避免自己的孤立和失败。现在反右，第一是反对对敌人估计过高，害怕到国民党区去，害怕美国。到国民党区，我们三路出兵，一个月就解决了棉衣问题，证明了并不可怕。第二是对中间派认识模糊不清，但政

治上打击与经济上消灭不同，内战时期混淆了这两点。因此，对中间派问题也是既反右又反“左”。对消灭封建阶级，如同对美蒋斗争一样，在全局问题上要大胆，在具体斗争中则要谨慎。有的同志则相反，重视抽象之敌，小视具体之敌。

毛主席最后说，世界战争的危险是存在着的，但战争是完全可以避免的。各国人民的方针是按照不同情况进行不同的斗争。

会议讨论时非常热烈，周恩来、彭德怀、林伯渠、王明、贺龙、任弼时、习仲勋等同志先后发言。恩来同志说，半年转入进攻，各战场无例外地转入主动。现在切忌骄傲，我们才四分天下有其一。彭总说，毛主席的报告现在发表很好，在胜利中易于轻敌，在受挫中易于怯敌，军事上如此，地方工作亦如此。华北各根据地土地问题未能彻底解决，均由“大体上已解决”的估计而来。贺总说，陈赓一出去就搞土改，我觉得是太早了。伏牛山土地很集中，地主都有寨子武装。要先消灭胡宗南反动派，统一战线要广泛些，等站住脚再保护群众翻身。西北野战军到关中也要注意这一点。另外，部队中非战斗员太多，要精兵，提高质量。

会议结束时，毛主席在会上作了结论。毛主席说，这次会议是很令人高兴的一个会，20年未解决的优势问题，今天解决了，局面开展，胜利可期。北伐时期局面也很开展，但优势问题未解决，反而失败了。土地革命时期，战争频繁，党内纠纷太多，一直到长征，这是革命的最大难关，幸而渡过。抗日时期，特别是三次反共高潮到日本投降，形势一直严重，我们处于只有招架不能还手的地位。日本投降时，我们还是一则以喜，一则以惧。喜的是日本投降，抗战胜利了；惧的是优势问题未解决，蒋介石很强大，严重的内战危险临头，成败两个可能还在斗争。我到重庆那时候，蒋介石的事情好办，我们的事情不好办。日本投降后长时期内没有写过文章，的确是兢兢业业，很担了一分心，对形势只能估计“有利于我”，或者是说“可能”，而不能作出结论。现

在不同了，现在好了，不再胆战心惊了。现在能作出结论，不是估计，而是事实，我们确实是占了优势。毛主席还说，我们这次会议，同今年7月小河会议不同，要解决新的问题，即中农问题，中小资产阶级问题，党外人士问题。中农问题所以提出，因为划成分在晋西北已经发生了严重的问题，发生了不团结中农的问题。在“左”倾成为一种潮流的时候，共产党要反对这个潮流，如同在抗日时期反对投降倾向的潮流一样。

在报告中，谈到10月13日少奇同志主持在西柏坡村召开的全国土地会议时，毛主席说：土地会议把右反掉了，是一次最伟大的整党，增进了党与人民群众的联系，把混入党内的地主分子及党员的地主思想洗掉了，通过了一个完整的土地法。这是保证战争胜利的一个伟大的会议。今天，只有在此基础上谈反“左”问题，才不会给群众泼冷水。毛主席又说：土地会议，整党会议，是黄河主流，是一个伟大的潮流，一直流到大海，是成功的。但仅仅讲到这里还不够。主流向东流时，卷起了三个浪花，即侵犯中农利益、破坏工商业、把党外人士一脚踢开。不把这三个浪花反掉，它会成为一股逆流。维护主流，反对浪花，坚决保证革命成功，一定反“左”。

谈到《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时，毛主席说，12月会议就是要解决这篇文章。这篇文章是当做一个时期的政治纲领，“打倒蒋介石，建立新中国”的纲领。它比《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更进一步。这篇文章所要解决的问题是：1. 宣布美国是帝国主义，这是肯定了的。2. 宣布蒋介石是官僚资本主义，要打垮他是肯定了的。有些人赞成打倒蒋介石，不赞成打倒官僚资本主义，不懂得蒋介石是代表，官僚资本是基础。3. 推翻地主阶级，这是不错的。我们要打垮蒋介石集团，蒋介石是这个反革命集团的代表，但不能用打蒋介石一样的力量去打千百万地主富农。地主当作阶级要消灭，当作个人则要区别情况。要知

道，千百万地主富农现在是生产力，将来是朋友，现在要改造，将来会改好的。这三条不错，其余就不会错。此次会议要注意的问题是中农问题，中小资产阶级问题，党外人士问题。

12月会议开得很热烈，很成功。《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这篇文章经新华社和陕北新华广播电台广播后，在全国人民中间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在蒋介石营垒中引起了不安和恐慌，也在全世界引起了震动。

开会期间，正是毛主席54岁生日。在毛主席身边的工作人员，当然很想给他做寿。但是，毛主席坚决不答应，并且讲了三条理由：一是战争时期，许多同志为革命流血牺牲，应该纪念的是他们，为一个人祝寿，太不合情理；二是部队和群众都缺粮食吃，搞庆祝活动会造成浪费，脱离群众；三是我才50多岁，往后的日子长着哩，更用不着祝寿。做寿是不会使人长寿的。这样，12月26日那天，毛主席白天主持会议，晚上和大家一起观看了贺龙同志从晋绥带来的平剧团演出的《恶虎村》。

1947年快要过去了。毛主席把“亚洲部”各大队负责人召集在一起辞旧迎新。人们的心情都很激动。正是在这一年，如毛主席在解放后一次谈话中所说：“胡宗南进攻延安以后，在陕北，我和周恩来、任弼时同志在两个窑洞里指挥了全国的战争。”（周总理补充了一句：“毛主席是在世界上最小的司令部里，指挥了最大的人民解放战争。”）正是在这一年，在毛主席的领导下，中国人民解放军已经在中国这一块土地上扭转了美国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蒋介石的反革命车轮，使之走向覆灭的道路，推进了自己的革命车轮，使之走向胜利的道路。“这是一个伟大的事变。这个事变所以带着伟大性是因为这个事变发生在一个拥有四亿七千五百万人口的国家，这个事变一经发生，它就将必然地走向全国的胜利。这个事变所以带着伟大性，还因为这个事变发生在世界的东方，在这里，共有十万万以上人口（占人类的一半）遭受帝国

主义的压迫；中国人民的解放战争由防御转到进攻，不能不引起这些被压迫民族的欢欣鼓舞。同时，对于正在斗争的欧洲和美洲各国的被压迫人民，也是一种援助。”毛主席在《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中讲的这番话，各大队负责人体会最深刻，感觉最亲切，因为他们从延安撤出以后跟随毛主席转战千里，亲眼目睹了这个伟大的事变是如何发生的。他们尤其钦佩毛主席的预见性，由衷地称赞他是一个伟大的预言家。列宁曾经说过：“神奇的预言是神话。科学的预言却是事实。”人们亲眼看到，蒋介石一次又一次地预言“三个月到五个月”、“半年之内”要“消灭共军”等等，最后都变成了昏话而破产；而毛主席一次又一次地预言中国革命的新高潮“毫无疑问地将要到来”，“也许今年、明年、后年”等等，最后都变成了事实，而且比预计的时间提前变成了活生生的事实！原因是，蒋介石依据的是反革命的主观愿望，而毛主席依据的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回顾以往，毛主席也和大家一样心情激动。他对各大队负责人说：“1947年是胜利年，也是辛苦的一年，大家要好好地过这个年。”

当1948年元旦的钟声响起的时候，蒋介石在元旦广播中又一次预言：“一年内消灭共军主力。”这恐怕连他自己也不相信了。而毛主席在陕北的杨家沟，热情地向大家举杯祝福：“1948年，我们要以更大的努力取得更大的胜利！”

（胡乔木著《胡乔木回忆毛泽东》）

“五年左右根本打倒国民党”： 1948年9月会议

1948年9月8日至13日，中共中央在河北平山县西柏坡村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在5年左右的时间内（从1946年7月算起）从根本上打倒国民党。毛主席说：“我们的战略方针是打倒国民党，战略任务是军队向前进，生产长一寸，加强纪律性，由游击战争过渡到正规战争，建军500万，歼敌正规军500个旅，5年左右根本打倒国民党。”然而，此后的战争进程将这个时间表提前了。

1948年9月至1949年1月，是解放战争取得决定性胜利的时期。

决战前夕，党中央在西柏坡召开了一次政治局会议。这是近三年来到会人数最多的一次中央会议。会议开了6天，从9月8日至13日。参加会议的有毛主席、少奇、恩来、朱德、弼时、彭真、董老7位政治局委员，还有中央委员和中央候补委员14人，以及重要工作人员10人。召开这样一个会议，从一个侧面说明形势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在这以前，绝大多数中央委员都分散在各解放区，交通十分困难，不可能举行这样大的会议。会议开始后，首先由毛主席作报告，谈了八个问题。随后，大家围绕毛主席提出的要点结合自己负责的工作进行讨论。大家发言时，毛主席经常在关键的地方插几句话。会议的气氛很活跃也很

热烈。最后，毛主席作会议总结。这次会议反映出我们党内的思想、意志和纪律已达到高度统一。

毛主席在报告中首先重申了1946年提出的对国际形势的三点估计。首先即世界大战的危险“必须而且必能克服”，美苏之间在若干国际问题上将或迟或早达成妥协，美苏之间的妥协是苏联及一切民主力量向反动派力量作斗争的结果，并不意味着各国人民都必须向反动派妥协。他说：“反动派从古以来，对民主势力就是两条原则，能消灭者一定消灭之，暂时不能消灭者留待将来消灭之……我们对反动派也应采取同样两条原则，我们今天是第一条。”在讨论中，许多同志谈到，几次看到美国气势汹汹，担心世界战争会打起来，担心美国会直接干涉，但两年多来国际形势的发展证实了毛主席的估计，美国是纸老虎，外强中干，这就解除了人们思想上的一个很大顾虑。不过，党中央当时并没有排除美国在局部地区实行直接干涉的可能性。周恩来同志在发言时提醒说，还有一种可能，即是美帝出兵，我们不能不作此估计，但大批的、几十万上百万恐怕不可能。美国可能由此控制一些最大的城市，使我更须组织大的力量去围歼，夺取胜利所需的时间可能长些。

毛主席讲的第二点是解放战争第三年的战略方针。这是会议讨论的重点。毛主席提出：“我们的战略方针是打倒国民党，战略任务是军队向前进，生产长一寸，加强纪律性，由游击战争过渡到正规战争，建军500万，歼敌正规军500个旅，5年左右根本打倒国民党。”毛主席当时所说的5年时间是从1946年中算起，预计到1951年中完成消灭国民党军主力的任务。关于这一点，他在作结论时又补充说明，所谓蒋政权就是表现在他的军队上，我们一时打不到江南去也不要紧，蒋的力量80%在江北，消灭了他的力量，也就算把它打倒了。

关于要不要公开宣传“5年左右基本上打倒国民党”的问

题，毛主席说，我原则上不反对，但现在倾向于讲困难一些。毛主席估计，可能遇到两种困难，一种是大的，我们对整个形势作了错误的判断，还有一种是比较小的。他说，我们党曾遇到过两次大困难，是在两次大错误之下产生的，1927年的大革命失败和1935年的万里长征。后来的困难比较不同，也比较容易克服。今后的困难就是假设我们估计错误，世界战争爆发了，而且爆发得很快。战争不爆发，对中国革命有利得多，国际方面可能援助我们，再有三年就能打倒国民党。如果我们估计不足，大战来了怎么办？还不是要干，还不是要打，天要下雨娘要嫁人，有什么办法。中国共产党是一个打仗的党，也不怕，我们对此有了精神准备。其他的困难有大的旱灾，指挥失误，军事上不顺利。毛主席说，这些都有可能使战争延长。在讨论中，来自前线的同志大多谈到，经过两年战争国民党更加困难了，但我们面临的困难也很大。为了支援前线，各解放区的负担已达到极限，特别是农村劳动力十分缺乏，继续从解放区征兵扩军几乎已不可能。许多同志提出要把战争负担加到敌占区去，部队兵源的补充主要依靠俘虏敌军。在总结时，毛主席强调既要充分估计困难，也要充分估计克服困难的可能性。

在会上，毛主席还明确了一个重要的战略问题，这就是要把战争打下去，不给敌人以喘息之机，直到取得最后胜利。毛主席说，如果李宗仁等人出来成立政府，搞个曲折，那时有两种情形，或拒绝和谈，或进行和谈。如果群众觉悟，要打下去，认识到和谈就是让敌人休息后再打，是费力的，则打之；如果没有这种觉悟，要和，那就和谈，一面谈，一面打，努力做到继续打下去，不上他们的当。总之那时看人民的觉悟，党内党外群众的觉悟，但始终不要关死门；那时如果说要谈，就派代表去谈，在谈判中教育群众。毛主席预计的这种情况实际上很快就出现了。由于思想上、策略上已有所准备，事到临头处理得很好。

会议期间还讨论了其他一些重要问题。其中，有些问题，如加强纪律性、发展党内民主和准备干部等前面已作了叙述；还有一些问题，因与对新中国的构想有关，留待稍后再叙述。

9月会议一结束，毛主席立即把全副精力投入对三大战役的指挥。经过解放战争第二年的作战，我军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敌军则由战略进攻转为战略防御。大约在1948年初，毛主席就开始考虑要打几场大仗，但想法还不明确。此后，经过几个月的反复酝酿，到7月至10月间，三大战役的轮廓陆续变得清晰起来。

解放战争进入第三个年头，总的战略形势有两个突出特点：第一，国民党军在总兵力上还占有一定优势，但它的大部分力量已被钉死在东北、华北和华东的大城市和交通线上，处于被我军分割的状态，机动兵力比我们要少得多，因此我军掌握着战略主动权。第二，在组织辽沈、淮海、平津这三个决定性战役时，我军在各个战场上面对的都是敌方拥有数十万人的重兵集团，而在各战区的敌我兵力对比上，我军尚未占优势或仅占相对优势。在这种情况下，主动寻求战略决战，每战务求全歼敌军，不仅需要极大的魄力、决心和勇气，还必须全局在胸，有周密细致的安排，并准确把握每次战役的时机以及每个环节的衔接。一旦指挥失当，发觉处境不利的敌人就可能实行战略撤退，与其他军事集团靠拢，重新组织防御，使我军失去大规模歼敌的机会；特别是每场战役的首战，如果受挫就可能影响整个战役。任务很艰巨，战场形势又瞬息万变。说毛主席的军事指挥艺术高超，高超在什么地方，不了解这些情况就难于理解。关于三大战役，人们已写得很多，特别是许多亲身经历这些战役的老同志写了回忆录。这里仅就毛主席决策的关键之处简略地说几点。

在辽沈战役中，毛主席最重要的决策是以极大的决心，选择敌人防御相对薄弱而对全局来说又最关键的锦州作为突破口，实

施出其不意的打击，从而取得整个战役的主动。从东北战场局部来看，依次打长春、沈阳、锦州似乎更为稳妥，风险较小。当然也有一定的困难，比如我们的部队还不善于对设防坚固的大城市作攻坚战。但是，这样打最大的问题是有可能迫使原先处于是撤是守举棋不定的卫立煌集团拼全力打通北宁线，将主力撤往锦州一带，守住东北通向关内的咽喉要道，进而伺机转移于华北、华中战场。从消灭蒋军有生力量的全局来看，这是很不利的。因此，早在1948年2月7日，东北我军正开展冬季攻势时，毛主席就根据这种可能致电林彪、罗荣桓、刘亚楼，指出“对我军战略利益来说，是以封闭蒋军在东北加以各个歼灭为有利”，要求他们下一步作战应考虑以主力转至北宁路，截断敌军由陆上撤向关内的通路，抓住敌人予以各个歼灭。冬季攻势结束后，东北野战军首长于4月中旬致电中央军委，认为南下北宁路及入关作战极为困难，提议先打长春，并以此吸引沈阳之敌增援而歼灭之，得到军委同意。此后，他们又数次变更计划，至7月中旬，提出还是以南下作战为好，但仍有所犹豫。结果，受到毛主席严厉批评。9月7日，毛主席和中央军委下最后决心，作出战略决断，指示东北野战军将主力使用于锦州至唐山一线，攻克锦州、榆关、唐山诸点。“而置长、沈两敌于不顾，并准备在打锦州时歼灭可能由长、沈援锦之敌。”毛主席还要求林彪、罗荣桓等“确立你们前所未有的打大歼灭战的决心，即在卫立煌全军来援的时候敢于同他作战”。辽沈战役从9月12日发动至11月2日结束，完全实现了毛主席的战略意图，歼敌47万，解放了东北全境，并为解放平津和全华北创造了条件。

辽沈战役刚一结束，淮海战役就开始了。这场战役是我军在数量上仍处于相对劣势的情况下发动的大决战。毛主席在决策过程中最突出的一点是，根据全国形势的巨大变化，及时调整战略布局，扩大战役规模，将原先准备分几步实现的战略意图一举完

成。这就是人们所说的从“小淮海”到“大淮海”。9月24日，在济南战役临近结束时，华东野战军粟裕同志向中央提出下一步举行淮海战役的建议。第二天，毛主席复电同意并加以指示。至10月中旬，确定淮海战役的作战任务主要是消灭国民党军刘峙集团主力的一部，开辟苏北战场，使山东、苏北打成一片。根据这一布置，淮海战役后尚需根据情况再打几仗，才能把固守在徐州一带的敌人全部吃掉。但是，在战役发起前，战场形势出现了两个变化：第一，10月下旬，中原野战军按照中央军委的预订布署顺利攻占郑州、开封，主力得以挥师东进；第二，辽沈战役于11月2日结束，全国军事形势发生重大变化，敌我力量的总对比改变了。这两点变化，特别是第二点变化促使毛主席下决心打一场规模更大的战役。11月1日，毛主席根据粟裕同志的建议，决定淮海战役由小平、陈毅同志统一指挥。11月7日，战役按照预定计划发起的第二天，毛主席发出指示，扩大淮海战役原定规模，准备全歼以徐州为核心的刘峙集团。以刘伯承、陈毅、邓小平、粟裕、谭震林5同志组成的总前委出色地贯彻了这一战略意图。经过两个月零三天的激战，淮海战役胜利结束，歼敌55万余人。这场战役的结果，正如毛主席在11月16日致淮海战役总前委电所说：“此战胜利，不但长江以北局面大定，即全国局面亦可基本上解决。”

平津战役是三大战役的最后一个。辽沈战役结束后，面对不利形势，傅作义集团需要迅速作出抉择的严重问题是固守平、津、张、唐地区，还是实行战略撤退。对我军来说，这场战役决策的关节点首先在于能否稳住傅作义集团，为将其就地歼灭创造条件。毛主席形容敌人已是“惊弓之鸟”，他巧妙地布下了一张天罗地网，使这只“惊弓之鸟”在不知不觉中就陷入灭顶之灾。11月18日，毛主席决定东北野战军提前结束休整，隐蔽入关，以最快速度行进，突然包围唐山、塘沽、天津三处敌人。11月

23日，战役第一阶段开始，我军按照毛主席和中央军委的作战指示，首先攻击张家口、宣化诸点，吸引东面之敌西援，拖住平津之敌，使其难下从海路逃走的决心，同时为东北野战军主力入关，完成对天津、北平、塘沽地区之敌的分割包围争取时间。随后，毛主席又提出“围而不打”、“隔而不围”的战术原则，以待整个部署完成之后，再各个歼灭。到12月20日，战役第一阶段结束，毛主席的部署完全实现了，我军此时已胜券在握。平津战役决策中的另一个特点是军事打击和政治争取相结合。在进行战役部署时，毛主席就提出要“争取使中央军不战投降”，并指出“此种可能很大”。从12月中旬起，毛主席陆续发出指示，直接指导与傅作义的谈判。但是傅作义一直犹豫动摇，直到我军解放了天津、张家口之后，才表示愿意接受我党我军提出的和平条件。1949年1月31日，北平和平解放，平津战役结束。此役歼灭和改编了52万国民党军，并创造了解决国民党残余部队的“天津方式”、“北平方式”和后来实行的“绥远方式”三种形式，这对进一步加速解放战争的进程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三大战役的胜利实现了毛主席在9月会议上提出的把国民党军队主力消灭在长江以北的设想，为夺取全国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使原来预计的战争进程大为缩短。还在辽沈战役刚刚结束，淮海战役正激烈展开时，毛主席就对全国形势作出了新的判断。11月14日，他在为新华社写的评论《中国军事形势的重大变化》中兴奋地宣布：中国的军事形势现已进入一个新的转折点，即战争双方力量对比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人民解放军不但在质量上，而且在数量上已经占有优势。这是中国革命的成功和中国和平的实现已经迫近的标志。“现在看来，只需从现时起，再有一年左右的时间，就可能将国民党反动政府从根本上打倒了。”两个半月以后，平津战役的结束进一步加快了全国形势的变化。在1948年的最后一天，毛主席为新华社写了新年献词，提出

“将革命进行到底”的任务，着重揭露了中国反动派和美国政府正在推行的“和平”阴谋，说明“敌人是不会自行消灭的。无论是中国的反动派，或是美国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侵略势力，都不会自行退出历史舞台”。革命人民对垂死的敌人决不能妥协，必须将革命进行到底，而不容许半途而废。

（胡乔木著《胡乔木回忆毛泽东》）

为新中国奠基：七届二中全会

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于1949年3月5日至13日在河北平山县西柏坡村举行。全会集中讨论将党的工作重心从乡村转移到城市的问题。毛泽东说：二中全会，可以说是城市工作会议。城市工作必须以生产建设为中心。全会为夺取中国革命的全国胜利和迎接新中国的诞生，以及使中国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由新民主主义社会转变为社会主义社会，在政治上、思想上和理论上作了重要的准备。毛泽东警告“资产阶级的‘糖衣炮弹’将成为对于无产阶级的主要危险”。

一、全会的酝酿和准备

在中国人民革命取得全国胜利的前夕，中国共产党召开的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是为建立新中国奠基的一次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会议。

中共中央酝酿召开这次会议，从1948年9月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就已开始。当时，正值全国解放战争临近最后决战的关头。这次政治局会议对此前毛泽东主席向全党提出的5年左右（从1946年7月算起）从根本上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的估计作了进一步的论证。认为根据头两年的战争形势，这个估计是稳健的、实际的，并有提前胜利的可能性。为了不使因胜利推迟而不耐

心，又不使因胜利太快而没有准备，政治局会议在确定实现这一战略决策的各项方针、政策的同时，还对夺取全国政权后如何建设新中国进行了认真的研究和探讨。会议首先听取了毛泽东的报告，然后围绕着这个报告的主题，即如何实现战胜国民党反动派的斗争任务以及胜利后中国共产党准备实行的基本方针和政策，进行了充分的讨论。刘少奇就上述主题作了全面的发言，特别是他对新民主主义社会的经济构成、主要矛盾以及如何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等重大问题的阐述，毛泽东听后均表示赞同，认为关于经济成分的分析尚需作进一步的考虑，并请刘少奇草拟文件，以便提请七届二中全会讨论。中共中央政治局9月会议后，战争形势迅速发展。10月底，中共中央军委和毛泽东对战争胜利的时间重新作了估计，认为根本上打倒国民党的任务可能提早一年完成。要求各中央局“应有精神准备，从而加速组织准备，并以此种精神教育干部”。11月2日，辽沈战役胜利结束。14日，毛泽东在为新华社撰写的评论《中国军事形势的重大变化》中即向中外公开宣布，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革命力量有信心有把握提前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提出：“原来预计，从1946年7月起，大约需要5年左右时间，便可能从根本上打倒国民党反动政府。现在看来，只需从现时起，再有1年左右的时间，就可能将国民党反动政府从根本上打倒了。”

根据形势的发展，1949年1月初中共政治局会议，对召开七届二中全会作了具体安排。1月8日政治局会议通过的《目前形势和党在1949年的任务》的指示中提出：“北平解放后，必须召集第七届第二次中央全体会议。这个会议的任务是：（1）分析目前形势和规定党的任务；（2）通过准备提交政治协商会议的共同纲领的草案；（3）通过组成中央人民政府的主要成分的草案；（4）批准军事计划；（5）决定经济建设方针；（6）决定外交政策；（7）其他事项。”政治局会议结束后两天，1月10日，淮

海战役胜利结束，中共中央即向各中央局、中央分局、工委、军分委、总前委、前委发出这一指示。此后不久，1月31日北平和平解放，平津战役胜利结束。这样，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全国解放战争，经过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后，消灭了国民党军队的主力，国民党军的作战部队仅仅剩下100多万人，且分布在从新疆到台湾的广大的地区内和漫长的战线上，已无法在战略上组成有效的防御，国民党反动统治从根本上发生了动摇，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在全国的胜利已成定局。为了迎接即将到来的全国胜利和新中国的诞生，解决中国共产党所面临的一系列新的重大问题，根据一月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七届二中全会的准备工作亦随之加紧进行。会前，除由毛泽东起草了向全会所作的报告10条外，还编印了由刘少奇修改审定的1948年以来党的《政策汇编》，毛泽东还提议将党的六大政治决议案印发参加会议的人员，作为讨论经济政策问题的参考。2月中旬起，中共中央陆续向在前线和各地的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发出通知，要求2月底以前到达中央驻地。

二、全会的主要议程和议题

经过充分的酝酿和认真的准备，中国共产党七届二中全会于1949年3月5日至13日在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村举行。出席这次会议的中共中央委员有：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任弼时、林祖涵（林伯渠）、董必武、康生、张闻天、彭德怀、林彪、李富春、饶漱石、李立三、张云逸、贺龙、陈毅、蔡畅、邓小平、陆定一、曾三、聂荣臻、邓子恢、吴玉章、林枫、滕代远、张鼎丞、李先念、徐特立、谭震林、陈绍禹（王明）、廖承志、王稼祥、陈伯达共34人；候补中央委员有：陈少敏、王首道、邓颖超、谭政、程子华、王震、张际春、云泽（乌兰夫）、

赵振声（李葆华）、王维舟、万毅、古大存、马明芳、吕正操、罗瑞卿、刘子久、王从吾、习仲勋、刘澜涛共 19 人。中央委员及候补中央委员因交通条件等原因缺席者 20 人。列席会议的有李井泉、杨尚昆、傅钟、罗迈（李维汉）、李涛、胡乔木、安子文、杨立三、陈刚、刘少文、高文华、廖鲁言共 12 人。

3 月 5 日，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主持会议。在宣布会议开始后，由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周恩来报告了会议议事日程，并通过由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任弼时 5 人组成会议主席团。接着毛泽东代表中共中央向全会作了工作报告。全会在听取毛泽东的报告后，集中讨论了这个报告，并根据毛泽东的报告通过了相应的决议。全会批准了 1945 年 6 月七届一中全会以来中央政治局的工作，认为中央的领导是正确的；批准了由中国共产党发起，并协同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及民主人士，召开没有反动分子参加的新的政治协商会议及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建议；批准了 1949 年 1 月 14 日毛泽东主席关于以八项条件作为与南京国民党政府及其他任何国民党地方政府、军事集团举行和平谈判的基础的声明。全会还通过了《关于军旗的决议》，规定“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军旗应为红地，加五角星，加‘八一’二字”。因七届一中全会后有 4 名中央委员去世，中央委员出缺。根据七大党章规定，全会决定依次递补候补中央委员廖承志、王稼祥、陈伯达 3 人为中央委员出席全会。原拟提交全会讨论的共同纲领草案，因内容不能适应发展变化的形势，需重新起草，未列入会议的议程。

毛泽东向全会所作的工作报告，是七届二中全会的主要议题。这个报告“提出了促进革命迅速取得全国胜利和组织这个胜利的各项方针；说明了在全国胜利的局面下，党的工作重心必须由乡村移到城市，城市工作必须以生产建设为中心；规定了党在全国胜利以后，在政治、经济、外交方面应当采取的基本政策，

特别着重地分析了当时中国经济各种成分的状况和党所必须采取的正确政策，指出了中国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由新民主主义社会转变为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方向。毛泽东估计了中国人民民主革命胜利以后的国内外阶级斗争的新形势，及时地警告资产阶级的‘糖衣炮弹’将成为对于无产阶级的主要危险”。

毛泽东的报告，是一篇建设新中国的纲领性文献，也是全党集体智慧的结晶。在七届二中全会召开之前，随着革命战争胜利进程的发展，中共中央就为创建新中国进行着积极的准备。毛泽东和其他中央领导人为此所作的思考和探索，就构成了他在这个报告中的重要内容。

毛泽东在报告中关于接收城市和管理城市的方针，就是对中国共产党当时已接管城市正反两方面经验的概括和总结。1947年底，中国人民解放军开始陆续占领若干较大城市。如何接收和管理好大城市，是关系到已占领城市能否迅速稳定和恢复发展生产的大问题。由于过去中国共产党的工作重心是在农村，人民解放军长时期生活、战斗在乡村，开始许多人不熟悉城市工作，因此在城市的接管上往往自觉不自觉地搬用农村工作的经验，发生过一些问题。如有的在解放城市后，乱抓物资，乱搬机器，使工业受到了很大破坏；有的认为原有工商业均带封建性，不斗工商业资本家，不能肃清封建、满足群众要求，损害了工商业的发展；甚至有的干部在进入城市后贪污腐化，盲目采购，又不照顾乡村工作，等等。为此，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提出要十分重视城市政策问题。1948年2月19日，中共中央工委总结了收复石家庄的城市工作经验和存在的问题，并向党内发出通报，指出：（一）我们及晋察冀中央局，鉴于收复井陘、阳泉等重要工业区和收复张家口市的经验教训，“在这次进攻石家庄以前及攻入城市过程中，即训令部队及民兵的干部，注意保护机器、物资及一切建筑物，不准破坏，不准自由抓取物资。因此，部队进城的秩序是比

较好的。但这种训令只有干部知道，而未向部队士兵进行教育，故在作战中，仍有不少士兵照过去经验拿取东西，并鼓动城市贫民去搬取物资”。“故大批煤粮及其他公物被抢，许多公共建筑的门窗杂物亦被破坏或被取去，私人被抢者亦不少，很久还不能停止，后来实行戒严、断绝交通，并枪决数人才停止下来。”（二）我们曾向派入石家庄工作的干部和警卫部队宣布：石家庄不会再被蒋介石占去，石家庄是人民的石家庄，我们工作应作长期打算，方针是建设，而不是破坏。一切到石家庄工作的干部和士兵，不准私人拿取一点东西，不准制新衣，大吃大喝，必须保持纯洁与艰苦的作风，如有人违犯这些规定立即送出石家庄。并规定所有缴获物资，一律归公。因此，“由于进城而瓦解内部团结与战斗意志的现象”就没有了。（三）最初，石家庄市政府及市委，“对城市工作的方针和政策是模糊的，对石家庄国民党的残余势力又重视不够”。“同时派到石家庄工作的同志又非常性急，他们没有在群众中去清查国民党与逃亡地主，立即就组织工会与贫民会，登记会员，登记纠察队员，救济失业”，并进行清算斗争。“笼统提出了由工人、贫民当家，工人武装及翻身报仇等口号”，使“国民党员及特务与逃亡地主，很多都到工会、贫民会及纠察队登记，并表示积极，不少这种人被选举到工会及贫民会的委员会”。在清算斗争中出现了使用肉刑，打死数人，没收商店，扣留清算对象，因而在全市引起恐慌。我们发现这些情形之后，立即加以批评、制止，使这种情形没有继续发展下去。（四）“为停止上述现象，市政府出了布告：除政府及公安局得依法逮捕与没收财产外，禁止任何团体和个人没收财产及逮捕殴打任何人。同时政府并委派人员组织了人民法院，接受人民控诉，代表人民申冤报仇，惩治罪大恶极的汉奸恶霸”，“所有逮捕、没收、赔偿及对罪犯的处分，均经人民法庭有秩序的进行”。此外，市政府还召集各界代表座谈会，宣布政策；在选举正式市人民代表

大会之前，聘请若干工农商学各界参议员，成立临时参议会，作为市政府咨询机关。中央工委在通报中认为：如何去收复城市，收复后又如何管理，这在党内一般是还没有完全解决的问题，特将在石家庄这些不完整的经验介绍给你们，作为参考。25日，中共中央还就此向各中央局、分局、前委发出指示，指出：中央工委所述石家庄城市工作经验，必须引起全党注意。要求各级党委注意总结城市工作经验。指示中说：“多年以来我们占领了很多城市，有了丰富的经验。但是没有总结，让这些经验埋没，让各种错误的方针及方法反复重犯，让良好的经验限于一地无法为全党取法。”“像石家庄这样重要的经验，是由中工委总结的。”“为了将党的注意力不偏重于战争与农村工作，而引导到注意城市工作，为了使现已取得的城市的工作在我们手里迅速做好，为了对今后取得的城市的工作事先有充分的精神准备与组织准备，中央责成各中央局、分局、前委对于自己占领的城市，凡有人口5万以上者，逐一作出简明扼要的工作总结。”4月5日，人民解放军再次攻克洛阳后，8日，中共中央在《再克洛阳后给洛阳前线指挥部的电报》中，就及时对接管城市的政策问题作出9点指示，其中指出要极谨慎地清理国民党统治机构，只逮捕其中主要反动分子，不要牵连太广。对于官僚资本要有明确界限，不要将国民党人经营的工商业都叫作官僚资本而加以没收。禁止农民团体进城捉拿和斗争地主。入城之初，不要轻易提出增加工资、减少工时的口号。一切作长期打算。严禁破坏任何公私生产资料和浪费生活资料，禁止大吃大喝，注意节约。随后，中共中央又先后批转了济南市军管会副主任曾山《关于接管济南的经验的报告》和中共中央东北局副书记陈云《关于接收沈阳经验简报》。特别是沈阳，当时是中国共产党最早接管的最大的工业城市，接管工作进行得有条不紊。主要的经验是采取了“各按系统，自上而下，原封不动，先接后分”的接收方法，并首先抓紧解决在政

治上、经济上有助于恢复秩序、稳定人心的一些关键性的问题，要求参加接管的部队和干部，严格执行政策，遵守纪律。中共中央和毛泽东集中概括了这些经验，并及时用于指导全党和人民解放军的工作。1949年2月8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复第二、第三野战军的电报中，要求他们在淮海战役结束后的整训期间，着重学习政策，准备接收并管理大城市；同时明确提出，今后将一反过去20年先乡村后城市的方式，而改变为先城市后乡村的方式，并阐明了接收和管理城市的若干具体问题和方针政策。这些，形成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会上报告的重要内容之一。

毛泽东在报告中关于全国胜利后，党在政治、经济、外交等方面将采取的基本方针和政策，既有毛泽东个人的思考，也包括党内其他领导同志的研究和探索。上述这些问题的基本原则，虽然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和《论联合政府》中已经提出来了，但到七届二中全会前夕，中共中央在为创建新中国的准备过程中，通过对这些方面问题的研究和探索，认识上向前发展了，理论、政策更系统化了。例如，在党中央酝酿和讨论如何组建新中国的人民政权的过程中，毛泽东进一步阐明了新中国政权的性质和构成形式，即国体和政体。他指出：“我们政权的阶级性是这样：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但不是仅仅工农，还有资产阶级民主分子参加的人民民主专政。”“我们政权的制度是采取议会制呢，还是采取民主集中制？过去我们叫苏维埃代表大会制度”，“又叫‘苏维埃’，又叫‘大会’，就成了‘大会大会’，这是死搬外国名词，现在我们就用‘人民代表会议’这一名词。我们采取民主集中制，而不采用资产阶级议会制。议会制，袁世凯、曹锟都搞过，已臭了。在中国采取民主集中制是很合适的。我们提出开人民代表大会，……我看我们可以这样决定，不必搞资产阶级的国会制和三权鼎立等”。在七届二中全会

上毛泽东又作了更为准确的表述，并据此提出了全国胜利后，党在政治方面将采取的基本政策。

关于新中国经济建设指导方针，毛泽东在1947年12月陕北杨家沟会议提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三大经济纲领和新中国的经济构成的基础上，报告中又吸收了刘少奇、张闻天关于新民主主义经济构成和社会主要矛盾等重要思想内容。如在1948年9月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在阐述了新中国的政权性质之后，他说：“我们的社会经济呢？外面有人说是‘新资本主义’，我看这个名词是不妥当的，因为它没有说明，在我们社会经济中起决定作用的东西是国营经济、公营经济，这个国家是无产阶级领导的，所以这些经济都是社会主义性质的。农村个体经济加城市私人经济在量上是大的，但是不起决定作用。我们国营经济、公营经济，在量上较小，但它是起决定作用的。我们的社会经济名字还是叫新民主主义经济好。”接着，刘少奇在这次会议上就新民主主义经济作了系统发言，指出新民主主义经济由国家经济、国家资本主义经济、合作社经济、私营经济等4种经济成分构成，认为上述各种经济成分，以国营的社会主义经济为其领导成分。刘少奇在发言中说，“分析这些问题，其目的在于发现社会经济中的矛盾。在新民主主义经济中，基本矛盾就是资本主义（资本家和富农）与社会主义的矛盾。在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胜利以后，这就是新社会的主要矛盾，农民是无产阶级的巩固的同盟军”，“我们的政策也就应该从这种基本分析中订出来”。最后，毛泽东在这次政治局会议的结论中，肯定了刘少奇的意见，认为“新民主主义与社会主义问题，少奇同志的提纲分析得具体，很好，两个阶段的过渡也讲得很好，各同志回中央局后，对这点可作宣传。新民主主义中有社会主义的因素，在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都是这样，并且是领导的因素，而总的来说是新民主主义的”。毛泽东还说：“现在点明一句话，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完成之后，

中国内部的主要矛盾就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外部就是与帝国主义的矛盾。”“我们努力发展国家经济，由发展新民主主义经济过渡到社会主义，这些观点是可以宣传的。至于经济成分的分析还要考虑，由少奇同志考虑。”在这次政治局会议不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东北局常委张闻天在对东北的实际经验进行调查研究并作出科学分析的基础上，于9月15日为东北局起草《关于东北经济构成及经济建设基本方针的提纲》上报中央。提纲中指出，东北经济在解放后由国营经济、合作社经济、国家资本主义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小商品经济5种经济成分所构成。其中还从东北的实际出发，系统和科学地对各种经济形态进行了分析，指出：“在无产阶级领导下的新民主主义国家所经营的这种经济，已经是社会主义性质的经济。这种国营经济，是当前支援人民革命战争，争取胜利的最主要的物质力量；是城市无产阶级同乡村农民在经济上结成联盟的依据；是新民主主义政治的主要的经济基础；是新民主主义经济的支柱；是无产阶级在经济战线上反对投机操纵和资本主义进行经济竞争的最有力的武器。这是国家最可宝贵的财产。它的发展前途是无限的。”“现在的合作社，主要的是农业生产中的劳动互助组织”，“在城市中还有手工业合作社”，“供销合作社（或消费合作社）”。“把小生产者（主要为农民）组织在劳动互助组一类的合作社中的工作，今后必须严格根据自愿和两利的原则，使之继续发展”，“给将来农民的集体化准备若干有利条件”。“但把一切小生产者和劳动人民组织在供销合作社中的工作，今天更必须引起我们的严重的注意。”“在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制度之下的合作社经济，是在各种不同程度上带有社会主义性质的经济，是国营经济的最可靠的有力的助手。”“国家资本主义经济的特点，是国家为了经济上的需要，给私人资本家以进行生产或交换的一定的必要条件，而私人资本家利用这种条件，从生产与交换活动中挣

得一定的利润，是国家根据同资本家依自愿和两利的原则所订立的合同，对资本家的活动进行必要的管理与监督。这种国家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方向，对于新民主主义经济的发展是有利的。”“由于目前国营经济的力量还很有限，由于合作经济还不发展，由于战争与人民的各方面的需要，由于自由贸易的发展，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是必然的，在一定限度内还是必要的。”“同时，由于无产阶级在国家机构中政治与经济力量的强大，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也不是可怕的。我们目前对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的方针，就是把必然要发展的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引导到有利于国计民生的方向，并限制在有利于国计民生的范围之内，除把一部分私人资本引导到国家资本主义的轨道上去以外，其他私人资本都应使之战争与人民服务。”小商品经济，“主要地是农民的小商品经济”。这种经济“在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制度下”，“是会要发展到社会主义方面去的”。“由于我们这里是国营经济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同时并存，所以小商品经济向着社会主义方面发展，还要经过比较长期的教育与斗争过程。”提纲中指出：“所有上述的5种经济成分，现在都应加以发展，但在发展中，我们在经济政策上必须实行一条明确的无产阶级的领导路线。”即“以发展国营经济为主体，普遍地发展并紧紧地依靠群众的合作社经济，扶助与改造小商品经济，容许与鼓励有利于国计民生的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尤其是国家资本主义经济，防止与反对商品的资本主义经济所固有的投机性与破坏性，禁止与打击一切有害于国计民生的投机操纵的经营”。这份提纲，立即受到毛泽东和刘少奇的高度重视。9月间，毛泽东在阅读这个提纲时，还充实和修改了以下5方面的内容：（1）实行国民经济组织性与计划性必须严格限制在可能和必要的限度内，国营经济首先要适应这种组织性与计划性；（2）因为中国的广大及经济发展的不平衡，除开国家总的计划外，必须特别重视地方性的国

民经济计划；(3)使合作制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制度，决不是在短期内能够做到的，必须经过长时期的艰苦的组织工作与教育工作，才能一处一处和一步一步地做到；(4)在批判小资产阶级或资产阶级路线时，又必须严格防止任何急性的“左”倾冒险主义；(5)由于我们不仅只有农村，而且有了城市；由于有了多种经济成分，而且有了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特别是商人资本主义这一切情形，这使我们必须有无产阶级明确而周密的经济政策、经济计划与整套的经济组织去指导国民经济建设，绝不容许有任何的模糊和混乱。毛泽东修改后，刘少奇又进一步对提纲作了修改。10月26日，毛泽东看了刘少奇的修改稿后，在写给他的批语中说，“此件修改得很好”，“‘决不可采取过早地限制私人资本经济的办法’，改为‘决不可以过早地采取限制现时还有有益于国计民生的私人资本经济的办法’。因为就我们的整个经济政策说来，是限制私人资本的，只是有益于国计民生的私人资本，才不在限制之列。而‘有益于国计民生’，这就是一条极大的限制，即引导私人资本纳入‘国计民生’的轨道之上”。修改后的提纲，虽然当时只印发给东北局、华北局和部分领导同志征求意见，但毛泽东及刘少奇、张闻天的研究和探讨，为七届二中全会对中国经济方面的决策作了理论上的准备。毛泽东在报告中关于新民主主义经济的构成和经济建设的指导方针，正是吸收了这些重要思想，作了更加完整、准确的阐述。

围绕会议的主要议题，全会进行了认真的讨论。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等先后作了重要发言。

3月6日，朱德在会议讨论时发言，指出：过去从城市到农村，是个大转变。现在从农村转到城市，又是个大转变。我们的工作要适应这个大转变。今后我们进了城市，取得全国政权，就有了自己的国家，就要搞好国防。要实行征兵制，建立自己的海军、空军、炮兵、步兵等，建立和训练国防部队，敌人来了就得

打。他还说，中国是个多灾多难的国家，要把这样的国家建设好，有许多事情要做，我们的科学知识不够，没有什么值得骄傲的，骄傲的人往往是幼稚的人。

12日，刘少奇在会上作了《关于城市工作的几个问题》的发言。他说，今后全党的工作重心是城市工作，要有城乡一体的观点。他还就城市的接管和依靠工人、发展生产问题谈了自己的意见。他认为：“接收城市的问题，现已大体解决”，但“接收后的城市管理问题，现尚未基本解决。二中全会后，大家应努力学习解决”。他说：“我们党过去同工人很有联系，但后来被迫转入乡村。国民党在工人中活动了这么多年，散布了影响，工人内部也复杂起来了；而我们与工人的联系减弱了，我们的干部（包括中央委员在内）对工人工作生疏了，对工人的面貌也不熟悉了。所以必须努力学习，时刻注意毛主席关于依靠工人的指示，加强工人工作，使工人成为完全可靠的。其主要办法有三：尽可能保障工人的生活水平勿使之过低；深入广泛地教育工人；组织工人。”

13日，周恩来在会上发言指出：3年多来，党中央在毛主席的领导下，大家非常团结，取得很大成绩。我们党的发展，不是突然而来的，而是在斗争中发展的。我们党内过去有错误，但我们有自我批评的精神。他说，现在我们正处于从根本上打倒国民党走向完全打倒国民党的过渡时期，正在由分散到统一。这不是几个月而是要几年才能走完的。过渡时期是特点，我们要抓住这一特点，不然会犯错误。由于地区的不平衡，因而又产生了区域性的问题，分权的问题。中国不是联邦，但是带区域性的。这么大的中国，如果过分强调集中，会办不好事。所以在组织形式上不能一下子都集权，一定要授权地方，才能发挥积极性。但中央必须成为掌握政策的司令部。根据过渡时期的特点，统一的方针是：在分区经营的基础上，有步骤有重点地走向统一。他还指

出，现在是前方打仗前进，后方搞生产。后方生产，第一是要恢复，支援前方，争取全国胜利。今天还不是转入建设。周恩来在发言中还对金融、交通、工业、城市接收、兵工生产等各方面工作提出了系统的意见。

任弼时也在13日的会议上发了言。他说：“毛泽东同志的报告，提出了一个带历史性的问题，就是从现在起，我们党的工作重心要由乡村转到城市。这次会议，要求全党在思想上认识由以乡村为重心转到以城市为重心的重要意义，没有城市或不能把城市搞好，我们是不可能获得最后胜利的。所谓以城市为重心，基本意思就是依靠工人阶级，恢复和发展工业生产，包括轻工业、重工业和交通运输业等，并组织贸易；城市中的一切其他工作，如市政建设、民众运动、财政金融、文化教育、党的建设等都应服从于工业的发展。”他指出：“我们在政治上、军事上取得独立自主，这已经没有问题，但是还必须在经济上取得独立自主，才能算完全的独立自主。”

在全会讨论毛泽东报告的过程中，李富春、王首道、王稼祥、邓小平、彭德怀、张闻天等许多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也先后发言。李富春、王首道、王稼祥着重讲了工业和城市工作问题。彭德怀在发言中认为，毛主席的报告是发展胜利，争取新民主主义在全国胜利的纲领性文件；文件指出了防止左右的倾向，尤其是这时提出不骄不躁，特别重要。他说，七大以来中央的领导是正确的，这一时期党的领导艺术是很高的，值得学习。他总结了自己两年来在西北战场的领导工作和存在的问题，并提议今后应动员全党着重学习毛主席的思想、著作，特别是毛主席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中的战略思想，认为这是马列主义中最丰富的部分。邓小平在发言中说，中央领导正确，领导方法很值得学习。中央领导既高度集中，又真正高度民主，好处是避免或减少犯错误。他还提出要加强中央机构的意见。张闻天的发言，着重谈了

原则的坚定性和策略的灵活性问题。他说，毛主席的报告很好，最重要的是他对原则性与灵活性的结合运用得好。

七届二中全会3月13日结束，毛泽东向全会作了总结讲话。他总结了中共七大以来中央、地方和军队的工作及经验，阐述了关于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俄国十月革命与中国革命的关系，党委会的工作方法12条等。他说，凡是自己没有弄清楚或自己不懂的都要先问下级。先做学生，然后再做先生；先向下面请教，然后再下命令。他指出，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的统一，这样提法较好，应该这样提，而不应该像王明的提法，说“毛泽东思想是马列主义在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应用和发展”，这种提法不妥当。我们不要忙于想宽了，要先把中国的事情做好。现在，应该在全国、全世界善于宣传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辩证唯物主义，关于党和国家的学说，政治经济学等等。不要把毛泽东与马、恩、列、斯并列起来。关于十月革命和中国革命的关系，他说，十月革命是无产阶级革命时代人类第一个最伟大的胜利，第二次世界大战打倒德、意、日帝国主义是第二个最伟大的胜利，中国革命是第三个最伟大的胜利，历史的次序也是如此。不能设想没有十月革命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胜利而有中国革命的胜利。如果没有十月革命，中国革命的胜利是不可能的。关于中国由新民主主义革命转变到社会主义革命的问题，他说，“毕其功于一役”，我是在流血的革命这一点上说的，就是说，流血的革命只有这一次，将来由新民主主义革命转变到社会主义革命那一次不用流血了，而可能和平解决。但这只是可能，将来是否不流血，还要看我们工作的努力。如果国家（主要的就是人民解放军）和我们党腐化下去，无产阶级不能掌握住这个国家政权，那还是有问题的。至于说，“政治上、经济上都毕其功于一役”，那是不能这样说的，王明同志这样说，那就错了。

三、全会决议的基本内容

七届二中全会根据毛泽东的工作报告和其他同志的发言，3月13日通过了相应的决议，即《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决议》。决议共10项，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确定了迅速消灭国民党残余军事力量，夺取民主革命在全国胜利和组织这个胜利的方针。

决议指出，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以后，国民党军的主力已被消灭，今后解决残余国民党军队的方式，不外天津、北平、绥远3种。“天津方式”，即用战斗去解决敌人；“北平方式”，即迫使敌军用和平方法，迅速彻底地按照人民解放军的制度改编为人民解放军；“绥远方式”，即有意识地保存一部分国民党军队，暂让其原封不动，或大体上不动，在一个相当的时间之后，再去按照人民解放军的制度进行改编。决议中认为，用天津方式解决敌人，仍然是我们首先必须注意和必须准备的。但是，按照北平方式解决问题的可能性是增加了，这是一种不流血的斗争方式，并不是不用斗争可以解决问题的。毛泽东在向全会的报告中指出：“用这种方法解决问题，对于反革命遗迹的迅速扫除和反革命政治影响的迅速肃清，比较用战争方法解决问题是差一些的。但是，这种方法是在敌军主力被消灭以后必然地要出现的，是不可避免的；同时也是于我军于人民有利的，即是可以避免伤亡和破坏。”毛泽东还指出，绥远方式“对于反革命遗迹和反革命的政治影响，较之北平方式将要保留得较多些，保留的时间也较长些。但是这种反革命遗迹和反革命政治影响，归根到底要被肃清，这是毫无疑问的”。

为了迅速夺取民主革命在全国的胜利，决议中要求人民解放

军的全体指挥员、战斗员，绝对不可以稍微松懈自己的战斗意志。指出任何松懈战斗意志的思想和轻敌的思想都是错误的。为了解决已经解放和即将解放的广大地区需要大量干部去开展工作的问題，决议中提出，人民解放军永远是一个战斗队，同时又是一个工作队，特别是在南方各地用北平方式或者绥远方式解决问题的時候是这样。而且随着战斗的逐步减少，工作队的作用就增加了。

(二) 明确提出要终结农村包围城市的工作方式，把党的工作重心由乡村转移到城市，城市工作必须以生产建设为中心。

决议指出，从1927年到现在，我们的工作重点是在乡村，在乡村聚集力量，用乡村包围城市，然后取得城市。“历史已经证明这个方针是完全必要，完全正确，并且是完全成功的。”但是，采取这样一种工作方式的时期现在已经完结。从现在起，开始了由城市到乡村并由城市领导乡村的时期。党的工作重心由乡村移到了城市，但决不可以丢掉乡村，仅顾城市，而必须城乡兼顾，使城市工作和乡村工作，使工人和农民，使工业和农业紧密地联系起来。

为了实现党的工作重心的转移，决议还指出，党和军队必须用极大的努力去学会管理城市和建设城市。必须学会在城市中和帝国主义者、国民党、资产阶级作政治斗争、经济斗争、文化斗争和外交斗争。既要学会和他们作公开的斗争，又要学会和他们作隐蔽斗争。在领导城市人民进行斗争时，中国共产党必须全心全意地依靠工人阶级，团结其他劳动群众，争取知识分子，争取尽可能多的能够和我们合作的自由资产阶级及其代表人物站在我们方面，或者使他们保持中立，以便向帝国主义者、国民党、官僚资产阶级作坚决的斗争，一步一步地去战胜这些敌人。决议指出，管理和建设城市的中心任务是恢复和发展城市中的生产事业，第一是国营企业的生产，第二是私营企业的生产，第三是手

工业生产。城市中的其他工作，都应当围绕着生产建设这一个中心工作并为这个中心工作而服务。全党同志必须用全力去学习生产的技术和管理生产的方法，必须去学习和生产有密切联系的商业工作、银行工作及其他工作。

决议强调，只有将城市的生产工作恢复和发展起来了，将消费的城市变成生产的城市了，人民政权才能巩固起来。如果我们在生产工作上无知，不能很快地学会生产工作，不能使生产事业尽可能迅速地恢复和发展，获得确实的成绩，首先使工人生活有所改善，并使一般人民的生活有所改善，那就必然地会使我们不能维持政权，我们就会站不住脚，我们就会失败。

(三) 规定了全国胜利以后，党在经济、政治、外交等方面将采取的基本政策。

决议指出，中国革命在全国胜利以后，要迅速地恢复和发展生产，对付国外的帝国主义，使中国稳步地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由新民主主义国家转变为社会主义国家。为此，决议中规定了向这个方向发展的各项基本政策。

在经济方面，决议分析了中国经济的基本状况，指出，由于旧中国长期遭受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压迫，经济十分落后。中国的工业和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就全国范围来说，大约是工业占 10% 左右，农业和手工业占 90% 左右。这是在中国革命的时期内和在革命胜利以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一切问题的基本出发点。从这一点出发，产生了我党一系列的战略上、策略上和政策上的问题。对于这些问题的进一步的明确的认识和解决，是我党当前的重要任务。决议认为国营经济、合作社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个体经济和国家资本主义经济将是构成新中国经济的几种主要成分。据此，决议确定党采取的政策是：第一，没收官僚资本归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共和国所有，使这部分经济成为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决议指出，中国的现代性工业的产值

虽然还只占国民经济总产值的 10% 左右，但是它却极为集中，最大量的和最主要的资本是集中在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中国官僚资产阶级的手里。没收这些资本归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共和国所有，就使人民共和国握有国家的经济命脉，成为国民经济的领导成分。第二，对于占国民经济 90% 左右的分散的、个体的、落后的农业和手工业经济，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还不能改变它分散的、个体的性质。谁要是忽视或轻视了这一点，谁就要犯“左”倾的错误。但决议指出，分散的、个体的农业经济和手工业经济，是可能和必须谨慎地、逐步地而又积极地引导它们向着现代化和集体化的方向发展的，任其自流的观点是错误的。应当逐步地组织生产的、消费的和信用的合作社，这种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在无产阶级的国家政权管理之下的劳动人民群众的集体经济组织，是半社会主义性质的。这种合作经济，是推动新民主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转变的不可缺少的重要条件。因为单有国营经济而没有合作经济，我们就不可能领导劳动人民的个体经济逐步地走向集体化，就不可能由新民主主义国家发展到将来的社会主义国家，就不可能巩固无产阶级在国家政权中的领导权。第三，对占我国现代工业经济第二位的私人资本主义经济，采取利用和限制的政策。这是由民族资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所处的地位和中国经济的落后状态所决定的。决议指出，由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压迫或限制，在民主革命中常常采取参加或保持中立的立场，由于中国经济现在还属于落后状态，在革命胜利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还需要尽可能地利用城乡私人资本主义的积极性，对一切不是于国民经济有害而是于国民经济有利的城乡资本主义成分，都应容许其存在和发展，以利于国民经济的向前发展。但是，中国资本主义的存在和发展，不是如同资本主义国家那样不受限制和任其泛滥的，也不是如同东欧各新民主主义国家那样被限制和缩小得非常大，而

是中国型的。即要在活动范围、税收政策、市场价格、劳动条件等方面，受到恰如其分的有伸缩性的限制，也就是所谓“节制资本”的政策。决议强调指出，如果认为我们现在不要限制资本主义，认为可以抛弃“节制资本”的口号，这是完全错误的，这就是右倾的观点。但是反过来，如果认为应当对私人资本限制得太死，或者认为简直可以很快地消灭私人资本，很快地进入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社会，这也是完全错误的，这就是“左”倾的或冒险主义的观点。对内节制资本和对外统制贸易，是新中国在经济斗争中的两个基本政策。

在政治方面，决议分析了中国革命在全国胜利以后中国社会的基本矛盾，提出要巩固和加强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决议指出：中国革命在全国胜利以后（这句话，在1960年9月正式出版的《毛泽东选集》第4卷收入的《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中，改为“中国革命在全国胜利，并且解决了土地问题以后”，表述更为准确），中国尚存在着两种基本矛盾。第一种是国内的，即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第二种是国外的，即中国与帝国主义国家的矛盾。因此，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共和国的国家制度，不是可以削弱，而是必须强化。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要求我们党去认真地团结全体工人阶级、全体农民阶级和广大的革命知识分子，这些是这个专政的领导力量和基础力量，没有这种团结，这个专政就不能巩固。同时也要求我们党去团结尽可能多的能够和我们合作的小资产阶级和自由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它们的知识分子和政治派别，以便孤立反革命势力。决议指出，鉴于我们党的历史上对待党外民主人士的问题方面曾经有过不正确的态度，对此，全党必须有认真的检讨和正确的认识，必须反对右的迁就主义和“左”的关门主义或敷衍主义两种倾向，而采取完全正确的态度。全党必须在思想上和工

作上确立与党外民主人士长期合作的政策，必须把党外大多数民主人士看成自己的干部一样，和他们诚恳坦白地商量和解决问题，使他们在工作岗位上有职有权。同时，从团结他们出发，对他们的错误和缺点给以认真的和适当的批评或斗争，达到团结他们的目的。

在外交方面，决议中提出要采取有步骤地彻底地摧毁帝国主义在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控制权的方针。决议认为，旧中国是一个被帝国主义所控制的半殖民地国家，中国人民民主革命的彻底的反帝国主义的性质，使得帝国主义者极为仇视这个革命，竭尽全力地帮助国民党，因而激起了中国人民对于帝国主义者深刻的愤怒。同时战后帝国主义制度的削弱和世界反帝国主义阵线力量的空前增长，这些就使得我们可以采取和应当采取有步骤地彻底地摧毁帝国主义在中国的控制权的方针。毛泽东在向全会所作的报告中还提出：“不承认国民党时代的任何外国外交机关和外交人员的合法地位，不承认国民党时代的一切卖国条约的继续存在，取消一切帝国主义在中国开办的宣传机关，立即统制对外贸易，改革海关制度，这些都是我们进入大城市的时候所必须首先采取的步骤。”这就是后来被称之为毛泽东的“另起炉灶”的外交方针。毛泽东还提出：对于“帝国主义的经济事业和文化事业，可以让它们暂时存在，由我们加以监督和管制，以待我们在全国胜利以后再去解决。对于外侨，则保护其合法的利益，不加侵犯。关于帝国主义对我国的承认问题，不但现在不急于去解决，而且就是在全国胜利以后的一个相当时期内也不必急于去解决。我们是愿意按照平等原则同一切国家建立外交关系的，但是从来敌视中国人民的帝国主义，决不能很快地就以平等的态度对待我们，只要一天它们不改变敌视的态度，我们就一天不给帝国主义国家在中国以合法的地位。”这就是后来称之为毛泽东“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的方针。

（四）强调要加强党的思想建设，警惕居功骄傲和资产阶级思想侵蚀。

鉴于中国革命在全国的胜利即将到来，决议强调必须加强党的思想建设，保持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告诫全党不要居功骄傲，不要被资产阶级的捧场所征服。决议指出，因为胜利，党内的骄傲情绪，以功臣自居的情绪，停顿起来不求进步的情绪，贪图享乐不愿再过艰苦生活的情绪，可能生长。因为胜利，人民感谢我们，资产阶级也会出来捧场。敌人的武力是不能征服我们的，这点已经得到证明了。资产阶级的捧场则可能征服我们队伍中的意志薄弱者。他们经不起人们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在糖弹面前要打败仗。我们必须预防这种情况。决议还指出，中国的革命是伟大的，但是，夺取全国的胜利，只不过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今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这一点现在就必须向党內讲明白，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要掌握好批评与自我批评这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武器，去掉不良作风，保持优良作风，迎接新的更加伟大的任务的到来。为了防止对个人的歌功颂德，根据毛泽东的提议，全会还作出了禁止给党的领导祝寿，禁止用党的领导者的名字作地名、街名和企业的名字，不要把中国同志和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并列等重要规定。

中国共产党七届二中全会，为中国革命的进一步发展制定了明确的方针；为夺取中国革命在全国的胜利和迎接新中国的诞生，以及使中国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由新民主主义社会转变为社会主义社会，在政治上、思想上和理论上作了重要的准备。毛泽东的报告以及根据这个报告通过的相应的决议，与毛泽东在此后所写的《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构成了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所通过的、在新中国成立以后曾经起了临

时宪法作用的《共同纲领》的理论和政策基础。七届二中全会以后，为适应革命形势发展的需要，中共中央机关于1949年3月25日由西柏坡迁到北平。不久，在国民党政府拒绝签订国内和平协定后，人民解放军立即发起渡江战役，向全国胜利进军。

（萧姓等主编《最后的决战》）

开国盛会：中国人民政治 协商第一届全体会议

1949年9月21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北平隆重开幕。毛泽东在开幕词中豪迈地说：“诸位代表先生们，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感觉，这就是我们的工作将写在人类的历史上，它将表明：占人类总数1/4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会议通过《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和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选举产生以毛泽东为主席的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9月30日，会议胜利闭幕。

新政协的筹备

自1948年中国共产党提出“五一”节口号后，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民主同盟、民主促进会、民主建国会、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致公党、台湾自治同盟、中国人民救国会、在港各界爱国人士、学术工作者留港理事、留港妇女界、国外华侨团体等，相继发表声明、宣言和通电，响应中共的号召，拥护和赞成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明确表示了参加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立场。8月1日，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复电给响应“五一”节号召的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社会贤达及民主人士李济深等人，正式邀请他们或他们的代表，到解放区与中国共产党及各民主阶

层，共商召开新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事宜。在中央的精心指导下，筹建新中国的各项准备工作加紧运行。

应中共中央的邀请，经周恩来周密细致的安排，从1948年秋开始，原在国民党统治区的爱国民主人士约350余人，分别从全国各地包括香港和海外启程，陆续进入东北、华北解放区。1949年1月北平获得和平解放以后，各路民主人士相继云集北平。在此期间，各民主党派和抵达解放区的爱国民主人士纷纷发表对时局的声明或意见，抨击蒋介石策划的“和谈”阴谋，拥护中共提出签订国内和平协定的八项条件，拥护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发布的“向全国进军的命令”，表明坚决摒弃“中间路线”、“第三条道路”，将革命进行到底，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建设新民主主义中国的政治立场。至此，筹备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的时机，已渐次成熟。

6月15日，新政协筹备会在北平中南海勤政殿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参加会议的有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各人民团体、国内少数民族、海外华侨等共23个单位，134人。与1946年国民党召集的旧政协会议相区别，这是一次完全没有国民党反动派和一切反动分子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故称为新政治协商会议。后来正式定名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新政协筹备会的任务，是拟定参加新政协的单位及其代表名额；起草新政治协商会议组织条例；起草共同纲领；拟定中央人民政府组织大纲；起草会议宣言；拟定国旗、国徽及国歌方案。总之，就是要通过多方协商和酝酿，事先把所有开国的大政方针、法律文件全部准备好，再拿到正式会议上讨论和通过。为此，新政协筹备会成立六个工作小组，分别进行各项法律文件和有关方案的起草准备工作。由于当时还没有条件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所以新政协实际上是代表全中国人民，执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决定关于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事宜，最终完成

建立新国家的必要的法律程序。

毛泽东在新政协筹备会上致词说：必须打倒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的统治，必须召集一个包含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界民主人士、国内少数民族和海外华侨的代表人物的政治协商会议，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并选举代表这个共和国的民主联合政府，才能使我们伟大的祖国脱离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命运，走上独立、自由、和平、统一和强盛的道路。这是一个共同的政治基础。这是中国共产党、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界民主人士、国内少数民族和海外华侨团结奋斗的共同的、政治基础，这也是全国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的、政治基础。这个政治基础是如此巩固，以至于没有一个认真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和民主人士提出任何不同的意见，大家认为只有这一条道路，才是解决中国一切问题的正确方向。

鉴于共同纲领决定着民主联合政府的产生，并且是各党派各团体团结建国的基础，新政协筹备会委托中国共产党负责并由周恩来主持起草共同纲领的初稿。经过起草小组分政治法律、财政经济、国防外交、文化教育等几方面反复讨论，分别写出具体的条文，由周恩来执笔写出全文，交付起草小组。到达北平的政协代表以及新政协筹备会常务委员会先后进行七次讨论，在广泛吸收各方面意见的基础上几经修改，形成共同纲领的草案，准备提交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体会议讨论。经过三个多月的紧张筹备和反复协商，参加新政协的单位及其代表名单已经确定，关于创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准备工作已经全部就绪。中国人民翘首以盼的新中国恰如喷薄欲出的朝日，即将升起在世界东方的地平线上。

开国盛会

1949年9月21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在北平开幕。“时维九月，序属三秋”，古老的北平城精英荟萃，群贤毕至。出席会议的正式代表、候补代表及特邀代表共662名。这个名单，是经过各个方面的反复斟酌和协商所确定的，它包括全国各党派、各区域和人民解放军总部及各野战军的代表，包括工人、农民、妇女、青年、学生、文化教育、文学艺术、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各社会团体，以及工商界、宗教界、少数民族和国外华侨共54个单位的代表。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作为中国共产党代表出席会议，朱德、聂荣臻、贺龙、徐向前、刘伯承、陈毅、薄一波等一批共产党员，作为解放区、人民解放军及工会、妇联、青联等人民团体代表出席会议。

为建立新中国而奋斗并积极参加新政协筹备的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国民主同盟、中国民主建国会、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国人民救国会、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中国致公党、九三学社、台湾民主自治同盟等11个民主党派，分别派出以李济深、张澜、黄炎培、马叙伦、彭泽民、李章达、谭平山、蔡廷锴、陈其尤、许德珩、谢雪红为首的党派代表出席会议。无党派民主人士的代表有郭沫若、马寅初、张奚若等。代表中的各界知名人士有：作家沈雁冰，画家徐悲鸿，京剧艺术家梅兰芳，科学家茅以升、侯德榜、竺可桢、梁思成，实业家陈叔通、李烛尘、胡子昂，华侨领袖陈嘉庚、司徒美堂等。

大会特别邀请了自辛亥革命以来不同历史时期富有影响的代表人物。孙中山的夫人宋庆龄，是应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专函邀请并派人专程迎接，由上海来到北平商筹建国大计的。特邀代表

中，有前清翰林张元济，老同盟会员张难先，曾任北洋政府教育总长、司法总长的章士钊；还有不久前才从国民党反动营垒中分化出来的前南京政府和谈代表团首席代表张治中，起义将领程潜、傅作义、董其武等，其中最年长的是92岁的前清海军耆宿萨镇冰。这样的代表阵容，不仅表明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已完全孤立，更展现了即将诞生的新国家社会基础的广大和全国爱国民主力量空前的团结。

大会在中南海内修葺一新的怀仁堂举行。会场布置庄严，主席台正中是庄重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会徽，左右两边是中国革命领袖孙中山和毛泽东的画像。毛泽东致开幕词。他指出：这次政治协商会议是在完全新的基础上召开的，它具有代表全国人民的性质，执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决定关于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事宜。“我们的工作将写在人类的历史上，它将表明：占人类总数1/4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我们的民族将从此列入爱好和平自由的世界各民族的大家庭。”毛泽东的致词，充满了民族自信心和民族自豪感，道出了近百年来为民族复兴不懈奋斗的中国人的心声，几乎每一句话都博得全场热烈的掌声。

有60位代表在大会上发言。中共代表刘少奇讲话说：中国共产党以一个政党的资格参加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和其他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少数民族、国外华侨及其他爱国民主分子一起，在新民主主义的共同纲领的基础上忠诚合作，来决定中国一切重要问题。特邀代表宋庆龄讲话说：我们达到今天的历史地位，是由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这是唯一拥有人民大众力量的政党。孙中山先生的民族、民权、民生三大主义的胜利实现，因此得到了最可靠的保证。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代表李济深、中国民主同盟代表张澜发言表示，要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把握住千载一时的建国机会，精诚团结，共相勉励，以完成建设新中国

新社会的历史使命。

大会洋溢着“民主、团结、严肃、负责”的精神。与会代表怀着参与开国盛事的使命感，集思广益，畅所欲言，经充分讨论和民主协商，于9月27日一致通过《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组织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人民政协组织法规定：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为全国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组织形式，它在普选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以前，执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以后，就有关国家建设的根本大计或重要措施，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或中央人民政府提出建议案。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基于民主集中制原则的人民代表大会制的政府，还规定了与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性质相适应的政府组织形式。当天，会议还通过四项决议案：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首都定于北平，将北平改名为北京；中华人民共和国采用公元纪年；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歌正式制定前，以《义勇军进行曲》为国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旗为五星红旗，象征中国人民革命大团结。

根据两项组织法，会议选举毛泽东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主席，周恩来、李济深、沈钧儒、陈叔通为副主席。选举毛泽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朱德、刘少奇、宋庆龄、李济深、张澜、高岗为副主席。选举周恩来等56人为委员，组成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

9月29日，会议一致通过《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作为中国人民革命建国的基本纲领。30日，会议通过《宣言》向全世界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现已宣告成立。”至此，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圆满完成创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光荣使命，宣布闭幕。

当天下午6时，全体代表来到天安门广场举行人民英雄纪念碑奠基典礼。毛泽东宣读由他起草的碑文：“三年以来，在人民

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三十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由此上溯到一千八百四十年，从那时起，为了反对内外敌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自由幸福，在历次斗争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宣读完毕，毛泽东主席第一个执锹为奠基石破土。在欢庆胜利的日子里，中国共产党和全国人民以崇敬的心情，缅怀和纪念在长期斗争中为中华民族独立和中国人民解放而英勇献身的革命先烈。

（庞松、陈述著《中华人民共和国简史》）

“不要四面出击”：七届三中全会

七届三中全会是中国共产党在全国执政以后召开的第一次中央全会。全会提出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在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的中心任务——为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而斗争。毛泽东在会上讲话，充分论述了“争取多数，反对少数，孤立敌人，壮大自己”的思想，并提出“不要四面出击”的策略方针。

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以下简称七届三中全会），是中国共产党在全国执政以后召开的第一次中央全会。这次会议是党在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转变的历史转折时期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

严峻的形势与任务

中国共产党七届二中全会以后，党领导人民经过一年零三个月的斗争，取得了中国革命史上最伟大的胜利：推翻了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解放了除台湾和西藏以外的全部国土，巩固了新生的人民政权；没收官僚资本，建立起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统一了全国财政经济工作，制止了通货膨胀，稳定了物价，为恢复国民经济创造了条件。但是，当时的形势依然十分严峻。

首先，旧的经济结构解体，新的经济体系尚在形成中，工商

业界发生了严重的困难。1950年5月8日到26日中财委召开的全国七大城市工商局长会议指出，这“主要表现在商品滞销，生产减缩，关店歇业增多，失业人数大大增加”。“困难的程度是大城市重于中小城市，工业重于商业，上海重于其他地区。”

据上海等11个大中城市的调查，歇业的厂、店高达12750家，开业的不及1/3，仅5903家。当时国民经济的特点表现为“大国小生产，小生产又表现为很大的过剩”，存货很多，卖不出去。

中财委主任陈云深刻地分析了这一现象的原因，他说：“第一是通货物价的稳定，暴露了同时又停止了过去社会上的虚假购买力。这就是说，人们在过去十余年的通货膨胀时期，为了避免钞票跌价的损失，不愿存放钞票，宁愿竞购和囤积并不是为了消费的货物。现在这种情况已经起了变化，他们不但不再囤积货物，而且将过去囤积的物资吐到市场上来。这样就使市场上若干货物一时供过于求，生意不好，许多工商业者发生困难。……第二是过去适合于殖民地半殖民地经济发展起来的若干工商业，由于帝国主义的统治、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在中国的消灭，许多货物失去市场，另有许多货品也不合人民需要的规格。这种情况引起了一部分工商业的倒闭，从而发生一部分工人失业的现象，需要救济及转业。第三是许多私营企业机构臃肿，企业经营方法不合理，成本高，利润少，甚至还要亏本。这也引起许多工商业发生缩小营业，甚或停工歇店的现象。必须重新调整，才有出路。第四是经营中的盲目性，同一行业内部盲目竞争，地方与地方之间供求不协调，这也引起许多企业减产、停工和倒闭。至于因为长期战争，人民购买力大为降低，使得工商业不景气，则是人人共知的现象。”“所有这些，都是历史遗留给我们的。这些问题现在之所以突出，是因为长期存在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经济情况现在发生了根本的变化。”

其二，由于社会经济结构的改组及其所带来的暂时困难，使资产阶级和我们的关系一时显得很紧张。他们怀疑共产党要实行社会主义，惶惶不可终日，消极经营，乃至遣散职工，关厂歇店，有的资本家甚至弃厂潜逃。武汉的商人说“挂红旗五星（心）不定，扭秧歌进退两难”，表现了内心的惶恐不安和对我们的不满。

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的长期统治，造成了社会经济的不正常状态，造成了广大的失业群。革命胜利后，整个旧的社会经济在不同程度上进行了改组，私营工商业的停工歇业，更带来了失业大军的扩大。据不完全统计，1950年3月至5月初，“各地新失业的有10万人，全国失业人数达到万人”。

由于战争在继续，新区在扩大，财政支出在增加，工商业者的负担在加重，尤其是农民的负担最重。这种情况，正如毛泽东指出的：“现在我们跟民族资产阶级的关系搞得很紧张，他们惶惶不可终日，很不满。失业的知识分子和失业的工人不满意我们，还有一批小手工业者也不满意我们。在大部分农村，由于还没有实行土地改革，又要收公粮，农民也有意见。”

其三，民主革命任务尚未彻底完成。到1950年6月，台湾、西藏还没有解放；在已解放的土地上，尚有40多万国民党的散兵游勇以及土匪在兴风作乱。3.1亿万农村人口的新解放区，还没有进行土地改革，这些地区的广大农民与地主阶级的矛盾依然尖锐地存在着。不完成土地改革，新生的人民共和国的政权就不能巩固，经济就不能恢复，广大农民的积极性就难以调动起来。倘若决计实现3亿多人口地区的土地改革，推翻整个地主阶级，“我们的敌人是够大够多的。他们会扑过来全力反对。第一，帝国主义反对我们；第二，台湾、西藏的反动派反对我们；第三，国民党残余、特务、土匪反对我们；第四，地主阶级反对我们；第五，帝国主义在我国设立的教会学校和宗教界中的反动势力，

以及我们接收的国民党的文化教育机构中的反动势力，反对我们。这些都是我们的敌人。我们要同这些敌人作斗争，在比过去广大得多的地区完成土地改革，这场斗争是很激烈的，是历史上没有过的”。

其四，帝国主义继续支持蒋介石，对我实行经济封锁和军事包围，妄图把新生的人民共和国扼杀在摇篮之中。新中国建立不久，美国对华政策经历了一段短暂的不稳定时期后，其驻外使馆开始得到明确指示，称美国目前不想讨论对新中国的承认问题。其后，并处心积虑地拼凑不承认新中国的“统一战线”。

为了遏制新中国，美国还拉拢、拼凑一些国家形成了一个对新中国的包围圈，妄图抵消新中国日益扩大的国际影响。与此同时，美国一方面大幅度地改变对日政策，采取一系列措施扶植日本，使日本变成它在远东地区对付共产主义的“遏制力量”；另一方面，美国国会通过拨款法案，加强了对中国周围国家的军事、经济援助。

美国还阴谋策划分割我国领土台湾。为达此目的，在新中国建立前后，美国曾设计了种种方案：在台湾培植取代蒋介石的势力，其主要对象一是国民党内部的“开明派”，一是反共的台独分子；制造“台湾地位未定论”，削减对大陆国民党的经济援助，把重点转移到台湾；争取国际支援，实现台湾“托管”等。但这些方案都没有能行通。1949年10月间，美国政府终于确认蒋介石是“台湾的最终真正权威”，决定继续援助在台湾的国民党政权。1950年2月，《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在莫斯科签订，当天，美国军方即要求艾奇逊进一步向台湾提供军援。5月30日，美国助理国务卿腊斯克交给艾奇逊一份备忘录，宣称美国应当在台湾显示“决心和信心”，采取强有力的措施使台湾“中立化”。驻远东的美军事将领麦克阿瑟公然提出台湾在战时将是美“不沉的航空母舰”。美国防部长路易斯·约翰逊甚至还提出要考虑美国

不惜动用军队拒共产党于台湾之外。不久，美国政府公然决定派第七舰队进入台湾海峡，以武力阻止我解放台湾。由此，加剧了台湾海峡的紧张局势。

鉴于如此严峻的国内形势和国际形势，我党必须及时制定正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必须以极大的力量继续完成民主革命尚未彻底完成的任务，同时必须迅速地恢复经济，发展生产，安定人民生活，以巩固新生的政权，把革命事业推向前进。而最根本的是要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根本好转。这是一场异常艰巨的斗争。这就是中国共产党七届三中全会所面临的形势和它所要完成的历史使命。

会议的一般情况

关于召开这次会议的目的、议程和要求，中共中央于1950年5月26日作了决定并发出通知。

中央通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将于6月11日开会，为了准备和通过提交全国委员会讨论的各项凡要问题并讨论其他问题，中央政治局决定，在全国委员会会议之前，召开第七届第三次中央全体会议。”“全会议程为报告并讨论土改、财政、经济、军事、政治和党的组织及整党等项问题。”“全会日期定于6月6日到6月9日，共4天，准时开会，不延期，不延长。各地同志务于6月5日前到达北京。”“中央委员及中央候补委员现在北京、天津、太原者，必须一律出席，各大行政区的中央委员及候补中央委员，除必须留原地主持工作或因交通不便无法赶到者外，亦须一律出席。”“各直属省、市党委书记，与交通便利地区的省、市书记，均列席中央全会（灾情严重地区除外）。”“中央直属各部委及中央人民政府党组与军事委员会各部门列席人员名单，由中央决定后通知。”

其后，按照中央通知的要求，出席这次会议的有中共中央委员 35 人，候补中央委员 27 人，并有各省市党委书记及其他工作人员 43 人参加会议。如期举行的会议上，毛泽东主席作了题为《为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而斗争》的报告。此外，刘少奇作了关于土地改革问题的报告，周恩来作了关于外交工作和统一战线工作的报告，陈云作了关于财政经济工作的报告，聂荣臻作了关于军事工作的报告。全会讨论并一致同意毛泽东主席的报告及其他报告。

全会上，还另有三个专题报告：薄一波关于税收问题的报告；安子文关于党的组织情况及发展和巩固党的组织问题的报告；胡乔木关于整党工作的报告。此外，几个大行政区的负责人也在会上发了言。

这次全会，还作出了关于王明同志的决定，关于撤销刘子久同志候补中央委员的决定以及关于撤销黎玉同志候补中央委员的决定。

中心任务及策略方针

七届三中全会作为一次重要的历史性的会议，不仅因为这次会议是在伟大的历史转折之后执政党召开的第一次中央全会，而且还在于这次会议主要的中心的议题是确定党在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的总任务以及为此所必须进行的各项工作和所应采取的战略策略方针。

全会讨论并一致同意的毛泽东的报告，在正确分析国际国内形势的基础上，提出了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在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的主要任务——为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根本好转而斗争。刘少奇等同志的报告和发言，也主要是围绕着怎样创造条件实现国家财政经济的根本好转这一中心议题。

毛泽东充分肯定从渡江战役起 13 个半月以来所取得的胜利。他说：“我们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全国范围内取得了胜利，成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这是一个伟大的胜利，是中国从古未有的大胜利，也是十月革命以后一个带世界性的大胜利。”他还说，“在伟大胜利的形势下，我们面前还有很复杂的斗争，还有许多困难”。“我们现在经济战线上已经取得的一批胜利，例如财政收支接近平衡，通货停止膨胀和物价趋向稳定等等，表现了财政经济情况的开始好转，但这还不是根本好转。要获得财政经济情况的根本好转，需要三个条件，即：（一）土地改革的完成；（二）现有工商业的合理调整；（三）国家机构所需要经费的大量节减。”

为了创造上述三个条件，力争在三年左右时间内实现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根本好转，并为进行有计划的经济建设和全国范围内社会主义改造准备条件，毛泽东提出全党全国人民必须一致团结起来，做好以下八项工作：

（一）有步骤有秩序地进行土地改革工作。

（二）巩固财政经济工作的统一管理和统一领导，巩固财政收支的平衡和物价的稳定。

（三）在保障有足够力量用于解放台湾、西藏，巩固国防和镇压反革命的条件下，人民解放军应在 1950 年复员一部分，保存主力。

（四）有步骤地谨慎地进行旧有学校教育事业和旧有社会文化事业的改革工作，争取一切爱国的知识分子为人民服务。

（五）必须认真地进行对于失业工人和失业知识分子的救济工作，有步骤地帮助失业者就业。必须继续认真地进行对于灾民的救济工作。

（六）必须认真地团结各界民主人士，帮助他们解决工作问题和学习问题，克服统一战线工作中的关门主义倾向和迁就主义

倾向。

(七) 必须坚决地肃清一切危害人民的土匪、特务、恶霸及其他反革命分子。

(八) 坚决地执行中央关于巩固和发展党的组织的指示，关于加强党和人民群众联系的指示，关于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指示，关于全党整风的指示。

要顺利完成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的中心任务，需要制定正确的战略策略方针。“争取多数，反对少数，孤立敌人，壮大自己”，是毛泽东的一贯思想，也是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党制定战略策略方针的指导思想。

三中全会期间，毛泽东在6日的开幕会上讲了话，9日闭幕会上做了总结，会议中间于8日还讲了一次话。这三次讲话，毛泽东透彻地分析了当时的国内国际形势，充分论述了“争取多数，反对少数，孤立敌人，壮大自己”的思想，并提出“不要四面出击”的方针（后来，根据这几次讲话，整理成题为《不要四面出击》一文，收入《毛泽东选集》第五卷、《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不要四面出击”，是毛泽东在七届三中全会上几次讲话的基本精神，是对《为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而斗争》这个书面报告作的说明，从理论高度阐发了《报告》的策略思想。

毛泽东指出，革命胜利引起了社会经济改组。这种改组是必要的，但暂时也给我们带来很重的负担。由于社会经济改组和战争带来的工商业的某些破坏，许多人对我们不满。我们当前总的方针是什么呢？就是肃清国民党残余、特务、土匪，推翻地主阶级，解放台湾、西藏，跟帝国主义斗争到底。为了孤立和打击当前的敌人，就要把人民中间不满意我们的人变成拥护我们。这件事虽然现在有困难，但是我们总要想各种办法来解决。“总之，我们不要四面出击。四面出击，全国紧张，很不好。我们绝不可

树敌太多，必须在一个方面有所让步，有所缓和，集中力量向另一方面进攻。我们一定要做好工作，使工人、农民、小手工业者都拥护我们，使民族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中的绝大多数人不反对我们。这样一来，国民党残余、特务、土匪就孤立了，地主阶级就孤立了，台湾、西藏的反动派就孤立了，帝国主义在我国人民中间就孤立了。我们的政策就是这样，我们的战略策略方针就是这样，三中全会的路线就是这样。”

在“不要四面出击”的策略方针指导下，要处理好方方面面的关系，要有一系列相应的正确的政策和措施。

——缓和同民族资产阶级的关系

对民族资产阶级要“有所不同，一视同仁”。所谓“有所不同”，就是国营经济是社会主义性质的，处在领导地位，它和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合作社经济都不同，要加以区别。但在其他问题上，则要“一视同仁”。即国家应在经营范围、原料供应、销售市场、劳动条件、技术设备、财政政策、金融政策等等方面，调剂国营经济、合作社经济、农民和手工业者的个体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和国家资本主义经济，使各种经济成分在国营经济领导之下，分工合作，各得其所，以促进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陈云在三中全会上作的关于财政经济问题的报告说：“五种经济成分是兼顾好，还是不兼顾好？当然是兼顾好。”“我们要搞经济计划，如果只计划国营，而不把许多私营的生产计划在里头，全国的经济计划也无法进行。只有在五种经济成分统筹兼顾、各得其所的办法下面，才可以大家夹着走，搞新民主主义，将来进到社会主义。”

为了缓和同民族资产阶级的关系，中央决定减去许多税目。原先税收项目有 1100 多个，全会后减去 800 多个，只剩下 300 多个，有些税率也减轻了。这样做，大大缓和了同民族资产阶级的关系，同时也缓和了同工人阶级的紧张关系。

——认真而谨慎地处理同各民主党派、民主人士的关系

统一战线是我党在长期革命斗争中创造的一大法宝。建设新中国，依然要做好统一战线工作。全会指出，要向干部讲明这个道理，并且拿事实证明，团结民族资产阶级、民主党派、民主人士是对的，是必要的。“这些人中间有许多人过去是我们的敌人，现在他们从敌人方面分化出来，到我们这边来了，对这种多少有可能团结的人，我们也要团结。团结他们，有利于劳动人民。现在我们需要采取这个策略。”

共产党和其他党派也应当“有所不同，一视同仁”。无产阶级的党和民族资产阶级的党是有所不同的，但在待遇上，要“一视同仁”。关于团结各界民主人士，毛泽东指出，要帮助他们解决工作问题和学习问题，“必须认真地开好足以团结各界人民共同进行工作的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人民政府的一切重要工作都应交人民代表会议讨论，并作出决定。必须使出席人民代表会议的代表们有充分的发言权，任何压制人民代表发言的行动都是错误的”。

——缓和同知识分子的紧张关系

建国之初，我们从乡村到城市，接收了国民党遗留下来的大量的宣传教育机构、学校和文化团体、企事业单位。对这些单位中的大量知识分子，我们采取什么政策，至关重要。是要他们还是不要他们？是团结他们还是抛弃他们？是改造他们还是赶走他们？中央认为，不要排斥他们，不要抛弃他们，而应该采取团结、教育、改造的方针，使他们为新中国服务。这些从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大约有 200 多万人，他们的绝大多数受过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压迫，有不同程度的革命性。但是，他们还没有同共产党相处，对共产党领导的革命事业，对共产党的政策、主张，对人民政府的领导方法和工作作风还很不了解，很不熟悉。在他们头脑里主要还是民主主义和个人主义的思

想。要使他们适应新中国的需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就必须对他们进行教育，帮助他们重新学习，逐步改造旧的世界观，使之逐步转变为工人阶级的知识分子。

毛泽东指出，改造知识分子，不要过于性急。企图用粗暴方法进行改造的思想是不对的。他说，观念形态的东西，不是用大炮打得进去的。他主张缓进，主张用10年到15年的时间来做这个工作。“要办各种训练班，办军政大学、革命大学，要使用他们，同时对他们进行教育和改造。要让他们学社会发展史、历史唯物论等几门课程。就是那些唯心论者，我们也有办法使他们不反对我们。他们讲上帝造人，我们讲从猿到人。有些知识分子老了，70几岁了，只要他们拥护党和人民政府，就把他们养起来。”

——处理好同少数民族的关系

当时，全国少数民族约有3000万人。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改革，是一件重大的事情，务必谨慎地稳妥地进行。毛泽东在三中全会上强调说，我们无论如何不能急躁，急了会出毛病。“条件不成熟，不能进行改革。一个条件成熟了，其他条件不成熟，也不要进行重大的改革。”按照《共同纲领》的规定，少数民族地区的风俗习惯是可以改革的。但是，这种改革必须由少数民族自己来解决。“没有群众条件，没有人民武装，没有少数民族自己的干部，就不要进行任何带群众性的改革工作。”我们一定要帮助少数民族训练他们自己的干部，团结少数民族的广大群众。

关于土地改革的新政策

如前所述，七届三中全会是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第二次会议的召开作准备的一次中央全会。中央草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草案）》要提交全国政协委员会审查

讨论；刘少奇将代表中央人民政府作《关于土地改革问题的报告》。因此，研究土地改革的方针政策，是这次中央全会的一个重要内容。

“有步骤地将封建半封建的土地所有制改变为农民的土地所有制”，这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制定的《共同纲领》规定的任务，也是巩固新生政权的一项根本性的措施。

毛泽东指出，在全国胜利地完成土地改革，是获得财政经济状况根本好转的第一个条件。道理很简单，全国90%以上人口在农村，农业人口超过4亿，当时已完成或基本完成土地改革的地区只有农业人口1.45亿（总人口约1.6亿），尚有约2.64亿农业人口的地区（总人口约3.1亿）还没有进行土地改革。各地请求在当年（1950年）冬季实行土地改革的人口就有1亿多。正如刘少奇作的《关于土地改革问题的报告》最后说的，这样大规模的土地改革有秩序有步骤地有分别地去完成，“就为我们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根本好转创造一个最根本的条件，就在政治上将广大的农民群众组织起来了，我们的国家和人民政府就能达到从来未有的强大和巩固了”。

我党有关对富农经济的政策曾有一个变化的过程。毛泽东在对刘少奇的《关于土地改革问题的报告》草稿的修改中，加写的一段文字，对这个过程作了这样的说明：

“1946年7月至1947年10月，华北、山东及东北许多地区的农民群众和我们的农村工作人员，在实施土地改革中，没有能够按照中共中央在1946年5月4日颁发的基本上不动富农土地财产的指示，而按照他们自己的意志行动，将富农的土地财产和地主一样也没收了。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这一时期，是中国人民和国民党反动派双方斗争最紧张最残酷的时期。土地改革中发生偏差，也以这一时期为最多，侵犯了一部分中农的利益，破坏了一部分农村中的工商业，并在一些地方发生了乱打乱杀的现

象。发生这些现象的原因，主要是由于当时紧张的政治形势和军事形势，同时，也由于我们的大多数农村工作人员没有土地改革的经验，他们不知道正确地划分农村阶级成分的方法，划错了一部分人的阶级成分，将某些富农当成了地主，将某些中农当成了富农。鉴于这种情况，中共中央于1947年10月10日颁发了土地法大纲，将富农和地主加以区别，但允许征收富农多余的土地财产。同年冬季，中共中央颁发了划分农村阶级成分的文件，毛泽东发表了《关于目前形势与任务》的文告，任弼时也发表了关于土地改革问题的演说。从这时起，农村中发生的某些混乱现象停止了，土地改革走上了正轨。”

而在建国后的这次土地改革中，对富农经济实行什么政策，对土地改革的顺利完成至关重要。党中央对此十分审慎。三中全会之前，毛泽东致电各地征询在对待富农策略问题上的意见。电报说：“关于暂时不动富农的问题，去年十一月政治局会议中，我曾提出过，惟未作详细的分析和未作出决定，现在已到需要作决定的时机了。决定之后，需要修改土地法及其他关于土改的文件，并颁布出去，以利新区各省土改干部的学习，方有利于今年秋后开始土改，否则将错过时机，陷于被动。因此，不但请中南局，而且请华东局、华南分局、西南局、西北局的同志们对此问题加以讨论，并请将此电转发所属各省省委各市市委加以讨论，将赞成和反对的意见收集起来迅速电告中央，以凭考虑决策，是为重要。”

由于酝酿已久，到了这次三中全会，意见成熟。全会决定，党对富农经济采取新的政策——即由征收富农多余的土地财产的政策变为保存富农经济的政策。这一政策明文写进了中央建议草拟的土地改革法。后来，这个土地改革法（草案）被提交1950年6月14日开幕的政协全国委员会审查讨论，并于6月28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八次会议讨论通过，6月30日又由毛泽东

主席颁布命令正式施行。

刘少奇在他的《报告》中，就土地改革法有关条文作了如下说明：

“第一，富农所有的自耕和雇人耕种的土地及其他财产，加以保护，不得侵犯。因为只有这样，才能保存富农经济。

第二，富农所有的出租的小量土地，亦予保留不动；但在某些特殊地区，经省以上人民政府的批准，得征收其出租土地的一部或全部。因为富农出租的小量土地一般不多，为了确实地中立富农，并保护中农和小土地出租者，保留富农这一部分出租土地，也是必要的。但在某些特殊地区，则有不同的情况，富农出租的土地相当的多，如不征收富农这一部分出租土地，贫苦农民就不能分得适当数量的土地。因此，在这些地区，经省以上人民政府的批准，得征收富农出租土地的一部或全部，以解决这样的问题。

第三，是有少数富农出租大量土地者，对其出租的土地则是应予征收其一部或全部的。例如富农出租土地超过其自耕和雇人耕种的土地数量时，这就已经不是一种单纯的富农，而是一种半地主式的富农了，所以土地改革法草案规定：半地主式的富农出租大量土地，超过其自耕或雇人耕种的土地的数量者，应征收其出租的土地。”

为什么在过去的土地改革中曾经允许农民征收富农多余的土地财产，而现在又主张在今后的土地改革中保存富农经济呢？这样做的理由：第一是这次土改规模空前伟大，容易发生左偏，如果我们只动地主不动富农，则更能孤立地主，保护中农，防止乱打乱杀；第二是过去北方土改是在战争中进行的，战争空气掩盖了土改空气，现在情况不同了，土改显得特别突出，给予社会的震动特别大，地主叫唤的声音亦将特别尖锐，如果我们暂时不动半封建富农，待到几年之后再去动他们，则将显得我们更

加有理由，即是说更有政治上的主动权；第三是我们和民族资产阶级的统一战线，现在已经在政治上、经济上和组织上都形成了，而民族资产阶级是与土地问题密切联系的，为了稳定民族资产阶级，暂时不动半封建富农似较妥当。

全会上，刘少奇纵观全国形势的发展，说明我党对富农经济实行新的政策的可能和必要。他说：现在形势已经与过去根本不同。人民革命战争在大陆上已基本结束，现在我们所遇到的困难的性质，已经不同于我们在过去战争中所遇到的困难，现在的困难主要是在财政经济方面的困难，是恢复、改造与发展社会经济上的困难。同时，全国各民族、各民主阶级、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革命大团结，已经在政治上和组织上形成，富农的政治态度一般的也比以前有了改变，如果人民政府实行保存富农经济的政策，一般的是能够争取富农中立的，并且能够更好地保护中农，去除农民在发展生产中某些不必要的顾虑。因此，在目前的形势下，在今年的土地改革中，采取保存富农经济的政策，不论在政治上和经济上都都是必要的，是比较对于克服当前财政经济方面的困难，对于我们的国家和人民更为有利些。

消灭封建制度，保存富农经济，这是一种长期的政策。刘少奇在《报告》中讲到，“在整个新民主主义的阶段中，都要保存富农经济的。只有到了这样一种条件成熟，以至于在农村中可以大量地采用机器耕种，组织集体农场，实行农村中的社会主义改造之时，富农经济的存在，才成为没有必要了，而这是要在相当长远的将来才能做到的”。

全会指出，为了汲取历史上（1946年7月至1947年10月）在土地改革工作中产生偏差的经验教训，在今后土地改革中，不能允许混乱现象的发生，不能允许在偏向和混乱现象发生之后很久不加纠正，而必须完全依照中央人民政府和各级人民政府所颁布的法令及其所决定的方针、政策和步骤，有领导地、有计划

地、有秩序地去进行。

全会的伟大历史作用

七届三中全会，向全党全国人民指明了前进的方向。历史证明，三中全会的路线是正确的。在三中全会的路线指引下，党的各项工作迅速见效。到1952年，即胜利地完成了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的各项任务，除台湾和一些少数民族地区以外，基本完成了土地改革，大大解放了生产力，工农业生产的总产值和主要产品的产量均已达到或超过了历史最高水平。

1952年6月24日，时任中财委主任的陈云在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筹备代表会议上讲话，列举事实说明了两三年来，我国工农业生产的恢复，已达到了预期的要求。他说：“在农业生产方面，我们大体上已恢复并部分超过了抗日战争前的水平。就粮食来讲，如以1949年的总产量为100，则1951年的总产量已增加到128，今年预期可以达到137，将要恢复到抗日战争前的平均年产量，其中小麦和大米等主要粮食将要超过抗日战争前的平均年产量。棉花的增产更加显著，如以1949年的总产量为100，到1951年总产量已增加到252，今后预期的产量又会超过去年，这样，我国棉花的产量就远超过了抗日战争前的最高年产量。其他农产品的产量，三年来也有同样显著的增长。由于农业生产的恢复并超过抗日战争前的水平，使我们可以不再依靠从外国运来的洋米、洋麦、洋棉，完全依靠自己的生产来满足全国人民和工业生产的需要。在工业生产方面，我们也同样已经恢复并部分超过抗日战争前的水平。我们的重工业原来是很幼稚的，战争中又受到了严重的破坏；现在我们已经把它恢复起来，并进行了初步的调整。今年煤、铁、钢锭、钢材、机器等主要产品的预期产量，有的可以接近，有的可以超过中国历史上的最高年产量。轻

工业的恢复同样显著，就最有代表性的纺织工业来讲，如以1949年的棉纱产量为100，则1951年的棉纱产量已增加到124，今年预期可以达到162以上，也已超过抗日战争前的年产量，此外如造纸、橡胶等工业，都有显著的发展；就连最困难的卷烟工业，今年预计产量也将要远超过抗日战争前的水平。现在我们的轻工业还有相当大的潜在力量，我们的工业产品又有着日益扩大的国内市场，因此它的继续发展是完全有保证的。除生产的恢复外，我们还开始以中国历史上空前的速度，进行着某些规模巨大的建设工程。如从满清末年以来四川人民盼望了几十年而没有兴修的成渝铁路，现在以两年的时间即已建设完成，下月一日即可通车；陇海铁路在今年10月也可以通到兰州。从去年开始的伟大的淮河水利工程和今年开始的荆江分洪工程，按其规模和进行速度来讲，不但在中国历史上是空前的，在世界上也是少见的。当然从中国经济建设的远大前途来讲，我们还只走了万里长征的第一步。”

对这三年的成就，当时的政务院总理周恩来亦于1952年8月在他的《三年来中国国内主要情况及今后五年建设方针的报告提纲》中作了这样的概括：“1950年6月，毛泽东同志曾在党的三中全会上指出要获得财政经济情况的根本好转，大约需要三年时间，现在我们已提前完成了这个目标。”

在国家财政经济状况根本好转的同时，人民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也有了显著的改善和提高。政治上，社会秩序稳定，各族人民安定团结，人民民主专政得到了巩固和加强，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威望大大提高，而这一切都为在全国范围内开始有计划的经济建设和全面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创造了条件，奠定了基础。

（郑世铨：《中国共产党七届三中全会》）

过渡时期总路线：1953年 6月15日中央政治局会议

毛泽东在会上讲话，第一次对过渡时期总路线和总任务的内容作了比较完整的表述。他说：“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10年到15年或者更多一些时间内，基本上完成国家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条总路线是照耀我们各项工作的灯塔。”

对《学习》杂志1952年第1、2、3期发表的关于批判资产阶级思想的几篇文章，毛泽东当时就明确批评，这些同志的文章，在关于资产阶级的问题上，犯有片面性的错误。第4期发表的《关于掌握中国资产阶级的性格并和中国资产阶级的错误思想进行斗争的问题》一文，历史地分析了资产阶级的两面性，同时指出“反击资产阶级的进攻并非在现在就要消灭资产阶级”。毛泽东作了肯定，认为这篇文章的观点基本上是正确的。

但是，毛泽东对城乡资本主义的发展是非常注意的。他尤为关注所谓农民的自发势力，担心农民走向资本主义。因此，1951年山西省委关于把互助组提高为合作社以动摇私有基础的意见，得到了毛泽东的肯定。刘少奇认为这是农业社会主义思想的批语，受到了批评。于是制定了第一个互助合作决议（草案）。决议（草案）批评说，对互助合作运动采取消极态度，看不出这是我党引导广大农民群众从小生产个体经济逐渐走向大规模的使用

机器耕种和收割的集体经济所必经的道路，否认现在业已出现的各种农业生产合作社是走向农业社会主义化的过渡的形式，否认它们带有社会主义的因素，这是右倾的错误的思想。同时还批评说：“片面地提出‘发家致富’的口号，是错误的。”

关于全国革命胜利后的基本矛盾，二中全会决议有过如下的分析，即中国革命在全国胜利以后，中国尚存在着两种基本的矛盾。第一种是国内的，即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第二种是国外的，即中国与帝国主义国家的矛盾。因为这样，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共和国的国家制度，在人民民主革命胜利以后，不是可以削弱的，而是必须强化。对内的节制资本和对外的统制贸易，是这个国家在经济斗争中的两个基本政策。经过近3年的新民主主义改革，国民经济已基本恢复，这时，毛泽东对国内的矛盾作了进一步的思考和判断。1952年6月6日，他在中共中央统战部的一个文件上批示说：“在打倒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以后，中国内部的主要矛盾即是工人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故不应再将民族资产阶级称为中间阶级。”在打倒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以后，民族资产阶级就是剩下的最后一个剥削阶级。就阶级矛盾的范围而言，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较之劳动人民内部的矛盾而言，无疑是主要的。但是，断定工人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已成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这就不能不引起对原有战略重新进行考虑。

对于正确判断主要矛盾的意义，毛泽东早在他的哲学名篇《矛盾论》中有过精采的阐述。他说：在复杂的事物发展过程中，有许多的矛盾存在，其中必有一种是主要的矛盾，由于它的存在和发展，规定或影响着其他矛盾的存在和发展。因此，研究任何过程，如果是存在着两个以上矛盾的复杂过程的话，就要用全力找出它的主要矛盾。捉住了这个主要矛盾，一切问题就迎刃而解了。正因如此，毛泽东在作出土改以后国内主要矛盾的判断之后

不久，就开始在中共中央领导层酝酿解决这个新的主要矛盾的新的方案了。

1952年9月，毛泽东在中央书记处会上讲到：10年到15年基本上完成社会主义，不是10年以后才过渡到社会主义。此后，毛泽东在视察工作时，同一些地方上的领导同志也谈到从现在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去的问题。1953年2月，毛泽东在中央书记处会议上说：我给他们（指孝感等地委）用扳指头的办法解释，比如过桥，走一步算过渡了一年，两步两年，三步三年，四步四年，五步五年，六步六年……10年到15年走完了。我让他们传到县委书记、县长。在10年到15年或者还多一些的时间内，基本上完成国家工业化及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1952年10月2日，刘少奇率领中共中央代表团抵达莫斯科出席苏共第19次代表大会。受毛泽东委托，刘少奇于10月20日写信给斯大林，向他阐述了关于中国怎样从现在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去的设想。信中说：中国现在的工业生产总值（不包括手工业），国营企业已占67.3%，私人企业只占32.7%。我们估计：再过5年，即我们执行了第一个五年经济计划之后，在工业中国营经济的比重将会有更大的增加，而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的比重则会缩小到20%以下。再过10年，则私人工业会缩小到10%以下。私人工业在比重上虽将缩小，但在绝对数上则还会有些发展，因此，多数资本家还会觉得满意，并和政府合作。在10年以后，中国工业将有90%以上是国有的，私人工业不到10%，而这些私人工业又大体都要依赖国家供给原料、收购和推销它们的成品及银行贷款等，并纳入国家计划之内，而不能独立经营。到那时，我们就可以将这一部分私人工业不费力地收归国家经营。到那时，少数资本家可能完全处在社会主义的包围之中，全部工业（手工业除外）国有化的步骤，已经不能抵抗。这是我们

设想的将来可能的一种工业国有化的方式。至于将来所要采取的具体的方式以及国有化的时机，当然还要看将来的情形来决定。在农业中，在土地改革后，我们已在农民中发展互助合作运动。我们准备在今后大力地稳步地发展这个运动，准备在今后 10 至 15 年内将中国多数农民组织在农业生产合作社和集体农场内，在基本上实现中国农业经济集体化。在完成农村经济集体化的最后时期，应该采取怎样的办法来消灭虽然不很多的富农，则要看那时的情形来决定。对于手工业，我们准备用力帮助小手工业者组织生产合作社，并鼓励手工作坊主联合起来采用机器生产，所需的时间可能要更长些。这就是我们所设想的怎样过渡到社会主义去的大体方法。

斯大林在收到刘少奇的信后，会见了中共代表团，对中国向社会主义过渡问题的认识和意见作出了答复。他说，我觉得你们的想法是对的。当我们掌握政权以后，过渡到社会主义去是应该采取逐步的办法。你们对中国资产阶级所采取的态度是正确的。

但是，直到 1953 年 6 月以前，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问题还处在酝酿阶段。据刘少奇说，当时“这些问题还没有在中共中央的会议上讨论过，还只是若干同志的一种设想并在非正式的谈话中谈论过”。1965 年，薄一波在写给田家英的一封信中说：“过渡时期总路线，主席是从 1952 年 9 月以后经常讲的，但开始未形成一个完整的辞。”而且，从刘少奇给斯大林的信来看，除了农业集体化的问题按照第一个互助合作决议作了说明外，如何实行私营工业国有化的问题，仍然是在完成了国家工业化——由农业国到工业国的转变以后，再开始进行的原有设想。

为了研究在新的形势下的公私关系和如何加强对资本主义工业的改造等问题，1953 年 3、4 月间，中共中央统战部组织了包括国家计委和工商管理总局参加的调查组，由中央统战部部长李维汉带领，到武汉、上海、南京、无锡、常州、济南等地进行调查

研究。调查组邀请各地党的和财经行政各主管方面的负责人进行座谈讨论，谈情况，摆问题，讲看法。调查组结合调查同时学习《列宁、斯大林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着重地研究了国家资本主义问题，边学习，边调查，边讨论。讨论的结果，给中央写了调查报告，其中主要是《资本主义工业中的公私关系问题》。李维汉并就此报告给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写了信。这个报告根据三年来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利用和限制政策的经验及其存在的问题，向中央提出了加强党的统一领导，积极发展国家资本主义（尤其是作为国家资本主义高级形式的公私合营），并经过国家资本主义改造资本主义工业的重要建议。

李维汉在信中说：经验似已证明，国家资本主义的各种形式（其中一部分将由低级向高级发展），是我们利用和限制工业资本主义的主要形式，是我们将资本主义工业逐步纳入国家计划轨道的主要形式，是我们改造资本主义工业使它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的主要形式，是我们利用资本主义工业来训练干部，并改造资产阶级分子的主要环节，也是我们同资产阶级进行统一战线工作的主要环节。抓住了这个主要形式和主要环节，在经济和政治上都利于领导和改造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分子的其他部分。所以建议我们在目前集中地或者着重地来解决我们同这一主要部分的资本主义工业的关系问题。

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刘少奇等，都非常重视中央统战部的调查报告，决定提交中央政治局讨论。毛泽东在报告上批示：“党的任务是在10年至15年或者更多一些时间内，基本上完成国家工业化和社会的改造。所谓社会主义改造的部分：（一）农业；（二）手工业；（三）资本主义企业。”6月15日，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会议肯定了这个报告，决定通过国家资本主义的道路对资本主义工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过渡到社会主义。毛泽东在会上讲话，第一次对过渡时期总路线和总任务的内容作了比较

完整的表述。他说：

“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10年到15年或者更多一些时间内，基本上完成国家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条总路线是照耀我们各项工作的灯塔。不要脱离这条总路线，脱离了就要发生‘左’倾或右倾的错误。”

毛泽东关于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建议，为中央政治局所接受，并开始作为党的总路线正式向下传达，要求全党贯彻执行。1953年12月，由中共中央宣传部拟订，经毛泽东修改和中共中央批准的《为动员一切力量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斗争——关于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学习和宣传提纲》，对总路线作了更为完整的表述：

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是一个过渡时期。党在这个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对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条总路线是照耀我们各项工作的灯塔，各项工作离开它，就要犯右倾或‘左’倾的错误。

1954年2月6日，刘少奇代表中央政治局向七届四中全会作报告。报告说：1953年，我国进入有计划的经济建设时期，并开始执行第一个五年建设计划。党中央政治局认为在这个时机提出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是必要的和适时的，因此根据毛泽东的提议，确定了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2月10日，全会通过决议，批准了中央政治局所提出的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

（林蕴晖等著《凯歌行进的时期》）

“批薄射刘”：全国财经工作会议

会议主要讨论贯彻执行过渡时期总路线和第一个五年计划问题，但高岗节外生枝，攻击刘少奇、周恩来等人。薄一波说：“1953年夏季召开的全国财经工作会议，是一次对当时社会经济生活和党内政治生活都有重大影响的会议。我是会上受批评的主要对象，也是高岗阴谋推倒刘少奇同志搞‘批薄射刘’的靶子。……”

1953年夏季召开的全国财经工作会议，是一次对当时社会经济生活和党内政治生活都有重大影响的会议。我是会上受批评的主要对象，也是高岗阴谋推倒刘少奇同志而搞“批薄射刘”的靶子。这次会议作为一个历史事件已过去近40年，了解它的人已不很多了。我作为一个重要的当事人，深感有责任把它如实地写出来，以便让更多的同志了解它、研究它，找寻它所蕴含的历史经验。为此，我想适当地多引证一点重要的史料也就成为必要了。

（一）财经会议的起因：修正税制

这次财经工作会议，重点批判了修正税制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回顾这次会议的情况，先要从修正税制说起。

建国后，我们很快建立了自己的税制，大体是按照“暂时沿用旧税法”，部分废除，逐步整理的方针建立起来的。1950年

初，政务院通过并颁布了《全国税收实施要则》。当时国营和合作社经济还很薄弱，税法从实际情况出发，作了这样一些特殊规定：国营工商业总分支机构内部调拨货物不纳税；委托私营企业加工只就工缴收益按工业税率纳税，私商为国营企业代购代销产品，按实际所得的手续费征税；新成立的供销合作社免纳1年所得税，营业税按2%的税率征收，并打八折优待；新成立的手工业生产合作社免纳营业税和所得税3年，等等。

1952年下半年，税收工作出现了许多新情况：由于五种经济成分不断改组，国营商业和合作社商业在经济中已经占了很大的比重；总分支机构内部调拨、加工订货及代购代销等经营方式日益扩大；私营企业主看到国营经济总分支机构内部调拨不纳税，亦更多地采取“产零见面”的办法，即工厂直接售货给零售商或委托零售商代售，以逃避一道批发营业税。由于经营方式、流通环节的变化，商品中间流转环节减少，使得营业税中的批发营业税减少或很难收上来，国家税收有下降趋势。而为了适应大规模经济建设的需要，又要求不断增加税收。一方面原定的税难以收上来，一方面税收任务还要增加，再加上“三反”、“五反”刚结束，资本家叫苦，这诸多原因决定了税制必须修正。保证国家税收是巩固国本的大事，国本不能动摇。

这年9月召开了一次全国财经工作会议，着重研究了在流通渠道发生变化的情况下如何保税的问题，并确定修正税制。同时，还召开了各大区财政部长会议和第四次全国税务会议，研究这个问题。根据几次会议酝酿、讨论的意见，财政部提出了修正税制的具体方案。修正税制工作是由财政部吴波副部长具体负责。修正税制方案起草后，经我点头，由吴波同志向周总理进行了汇报，总理用了好几个钟头的时间，逐字逐句对方案进行了修改。修改后的方案经政务院12月26日召开的164次政务会议批准同意。吴波据此向民主建国会、全国工商联筹委会黄炎培先

生、章乃器先生及工商界知名人士通气并征求意见。这符合毛主席的一贯教导，不论当时，乃至今天，我们党遇事都向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通气、征求意见。12月31日《人民日报》公布了《关于税制若干修正及实行日期的通告》，发表了题为《努力推行修正了的税制》的社论和《全国工商联筹委会拥护修正税制》的报道。

修正税制有两条原则，一是保税，一是简化税制。从保税而不是增税出发：（1）工业总分支机构从生产、批发到零售，要缴纳三道营业税；商业总分支机构从批发到零售，要交两道营业税，改变过去“相互拨货”“不视为营业行为，不课征营业税”的做法；（2）为了堵塞漏洞，规定工厂直接卖货给零售商时，须将工商两道批发营业税移到工厂直接缴纳；（3）取消对合作社征收营业税打八折的优待，取消合作社成立第一年免纳所得税的规定。从简化税制，变“多种税，多次征”为“多种税，一次征”出发：（1）试行商品流通税。将卷烟、烟叶、酒等22种（国营工业能够大量生产，国营和合作社商业在批发环节上能够控制的）商品的货物税、批发营业税、零售营业税及附加、印花稅等，合并为单一的商品流通税，在批发和收购环节一次征收。一种商品只要缴纳了商品流通税，就可行销全国，不再交其他各税和附加，大大简化了纳税手续；（2）货物税、营业税、所得税等也将一些项目合并简化。对批发环节征税问题，原来曾设想公私区别对待，即国营不征，私商照征。在征求意见时，商业部、全国供销合作总社不同意，理由是：“三反”、“五反”后，私营企业在生产经营上有困难，应适当扶持一下，而在税收上区别对待，势必挤了它们。资本家躺倒了，对发展经济不利。财政部采纳了这一意见。

修正后的税制公布后，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反响和波动。1953年1月9日，山东分局向明等三同志联名写信给中央，反

映执行新税制引起了物价波动、抢购商品、私商观望、思想混乱等情况。1月11日，北京市委也写信给中央反映了类似情况。各大区、各省市财委也纷纷写信、打电报给中财委，反映在执行过程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这件事引起了毛主席的重视。他于1月15日给周、邓、陈、薄写了一封信，全文如下：

新税制事，中央既未讨论，对各中央局、分局、省市市委亦未下达通知，匆率发表，毫无准备。此事似已在全国引起波动，不但上海、北京两处而已，究应如何处理，请你们研究告我。此事我看报始知，我看了亦不大懂，无怪向明等人不大懂。究竟新税制与旧税制比较利害如何？何以因税制而引起物价如此波动？请令主管机关条举告我。

周总理收信后，连夜给毛主席写回信，谈了处理办法。可见他把毛主席这封信的分量是看得很重的，而且周总理一向办事勤敏精细，这是他的过人之处。我看信后，也立即召集中财委有关人员开会，汇报各地执行新税制的情况。我当时的心情半是沉重，半是茫然。信是批评出台刚半个月的新税制，而且词锋甚严，显然事出有因。我很注意信中两句话，“此事我看报始知，我看了亦不大懂”，已预感到事情有些严重了。

随后，财政部和税务总局派出若干个小组分赴各大中城市检查，并每天与各主要城市通话联系，解决发生的问题。经过努力，执行新税制中所发生的较大问题，很快都采取了补救措施，得到妥善解决。2月10日，财政部吴波、商业部姚依林、粮食部陈希云三同志联名写信给毛主席和党中央，就修正税制的目的、新税制对物价的影响和在执行过程中发生的问题等，作了说明。接着，财政部又向毛主席、政治局作了一次汇报，由吴波同志把税制修正了哪些地方，实行中出现了哪些问题，如何解决的，一一作了说明。毛主席尖锐地批评说：“公私一律平等纳税”

的口号违背了七届二中全会的决议；修正税制事先没有报告中央，可是找资本家商量了，把资本家看得比党中央还重；这个新税制得到资本家叫好，是“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毛主席这些批评的话，比信中又进了一步，语气更为严厉，批评重点仍侧重于“事先没有报告中央”，而且把错误提到了“右倾机会主义”的高度，当时听起来，不免感到震惊。

修正税制本身虽然是一项具体的业务工作，但检讨起来，确实存在着一些严重缺点。主要表现在：

1. 在修正税制的过程中，操之过急，工作较粗糙。为了赶在元旦前公布实施，并能在春节前一个半月的旺季多收点税，新税制从9月财经会议酝酿到年底发布，仅三个多月时间，许多该做的工作没有去做，或虽然做了但做得粗率。比如，方案提出来以后，没有发到地方财政、税务部门去征求意见，更没有同地方党政领导打招呼。在有的中央部门负责同志对某些具体条文明确提出反对意见之后，我们主管的同志特别是我自己未予认真考虑，也没有提交中财委党组会议讨论。新税制方案公布前，我们主管的同志，特别是我本人没有直接向毛主席进行汇报，听取他的意见，这是不应有的疏失。

2. 修正后的税制，有些具体条文修改得不适当。意见最多的是，把在流通环节难以收上来的工业品的批发营业税移到工厂去征。由于担心物价引起波动，未能及时调整出厂价格，以及其他一些相应的措施没有跟上，致使2000多户被合理批准免缴批发营业税的专营批发商，得到了一些便宜，工厂税负相应增加，这样乍一看来，新税制就给人一种似乎偏袒了资本家的印象。还由于取消了对供销社的一些优待条件，使得供销部门的意见也很大。新税制公布时正赶上商业系统贯彻中央关于调整商业的指示，正在调整一些商品的价格。个别商品确实因为实行新税制的缘故而提了价。宣传解释工作又没有跟上，因而使人们产生了误

解，以为修正税制是又要涨一次物价。人民对国民党统治下的物价飞涨吃够了苦头，记忆犹新，十分珍惜解放后经过几年努力赢得的市场繁荣、物价平稳。当时正值年关，人们在心理上十分害怕物价上涨。由于这种种原因，新税制公布后，在很短的时间里确曾引起过一些混乱。

3. 关于“公私一律平等纳税”。当时发表的《人民日报》社论，为了说明修改税制的必要性和目的，原稿上有这样一句话：“国营企业和私营企业都要按照修改的税制纳税。”我在修改时，把这句话简化为“公私一律平等纳税”。看来，这是多余的，以不改为好。这次修正税制主要是针对流通环节的，货物一上市，就只能对物不对人了，商品按照一定税率平等纳税是应该的。它不同于所得税，可以根据收入区别不同对象去纳税。

我作为中财委副主任兼财政部长，应当承担这次修正税制工作中所犯错误的责任。好在新税制执行的时间仅半年，许多问题一暴露出来就采取了措施加以纠正，直至停止执行。当然，也应当看到，新税制确曾起到过保税、增税的作用。1953年5月30日，财政部在给毛主席并中央的报告中提到：“1至4月份工商各税共收起225000余亿元，完成全年计划的29.64%，其中商品流通税、货物税、营业税三种主要税收均完成全年计划的30%以上。……从全年税收计划本身看，根据4个月的税收情况估计，上半年可以完成全年计划的43%或稍多一些，按照历年上半年约收全年税收的40%，下半年约收60%的规律，完成并且超过全年任务是有把握的。”吴波同志后来在财经会议上的检讨中，也坚持这一条。当有同志不同意说新税制保了税时，他反复强调：“我们认为确是多收了税。”“计算起来，还是多收了税。”“犯了错误，不管受什么处分，我说，还是多收了税。”他坚持按事实说话，我一直认为这是做得对的。至于他给周总理递条子要求发言，说修正税制从开始到出台，都是他一手办的，主

要错误在他，薄一波同志只负点头的责任和领导的责任，我就不能苟同了。吴波同志这样说的意思很清楚，这是他勇于负责，想替我分担一些责任。但我是“承上启下”的人，“启下”就包括给下面挑担子，承担责任，我怎么能反而让吴波同志替我分担责任呢？我应当永远完全承担这个责任。

（二）财经会议的召开和会上对我的批评

这次全国财经会议，起初是按照中财委的例会进行准备的，后来改由周总理主持，实际上变成了中央召开的全党性质的重要会议。毛主席5月6日给陈云、富春同志和我的信，我根据这封信于5月22日起草的会议《通知》，周总理6月9日给毛主席和党中央写的关于会议如何进行的请示报告，都列举了会议应予讨论的问题，主要是讨论关于五年计划、财政、民族资产阶级三个方面的问题，以及财经方面其他一些具体问题。参加会议的有中央各部门负责同志，各大区、省市委和财委的负责同志（各大区、省市的财委主任都由第一书记兼）。6月12日晚上召开预备会议和第一次领导小组会议，周总理作了关于目前形势和建设新中国的基本情况的报告。6月13日会议正式开始，我宣读了财政方面的文件，并做了简要解释。

会议第一、二周（6月13日~27日），先是按六大区分组（块块），后是按专题分为税制修正、商业、粮食、农业税等四组（条条），讨论财政工作中的问题。第三周（6月29日~7月4日），由高岗作《关于编制五年计划几个问题的意见》的报告，李富春同志作《在苏联商谈我国五年计划问题的几点体会》的报告，并分组进行讨论。第四、五周（7月6日~18日），主要是召开各种专题座谈会。到第五周星期一（7月13日），领导小组举行扩大会议，有131人参加，由我作第一次检讨。从此会议中

心转为批评我的错误，都是以扩大的领导小组会议方式进行的。这可以说是这次财经会议的一个转折点。第六周（7月19日~25日），到北戴河休息三天。回来后，由李维汉同志作《关于利用、限制、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问题》的报告，并分组进行讨论。第七、八、九周（7月27日~8月13日），继续举行扩大的领导小组会和各种专题座谈会。这次会议原定会期半个月，由于中间发生了变化，一直开到8月13日结束，长达两个月。

讨论和批评新税制，实际上成了会议的中心问题。头一个月大家在发言中多是就税制的业务问题发表意见，讨论比较正常。在分组讨论中，高岗等人看到对新税制意见较多，就鼓动一些同志“放炮”，进行不适当的责难。当时会议每天进行的情况，都是由周总理向毛主席汇报。毛主席得知这一情况后，就让我在会上作出公开检讨，好让大家把话摆到桌面上来说。周总理7月12日夜写给我的信，把毛主席的这个意图传达得很清楚。信上说：

昨夜向主席汇报开会情形，他指示领导小组会议应该扩大举行，使各方面有关同志都能听到你的发言，同时要展开桌面上的斗争，解决问题，不要采取庸俗态度，当面不说背后说，不直说而绕弯子说，不指名说而暗示式说，都是不对的。各方面的批评既然集中在财委的领导和你，你应该更深一层进行检讨自己，从思想、政策、组织和作风上说明问题，并把问题提出来，以便公开讨论。此点望你在发言中加以注意。

7月13日下午，在扩大的第15次领导小组会议上，我按照信的要求作了第一次检讨。会议气氛立刻变得紧张起来，我也就成为“桌面上斗争”的集中目标。从7月14日起到7月25日之间，连续召开了八次扩大领导小组会议，对我进行批评。7月25日，吴波同志在扩大的第24次领导小组会议上作完检讨，周总

理宣布要我 27 日作第二次检讨。我当即给周总理写了个条子：“第二次检讨发言，我正在准备中，星期一恐怕准备不好，特别关于财经政策方针检讨的部分，有些材料还须搜集对照一下。”到 8 月 1 日，我才作第二次检讨。

在两次检讨中，我都努力从思想深处去挖掘自己的错误，但在当时的会议气氛下，还是过不了关。这次长达两个月之久的会议，既没有实现毛主席关于讨论总路线的意图，也没有认真讨论五年计划、财政问题和民族资产阶级问题，也就是说，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我当时在思想上产生了这样的疑问，会议为什么会变成这个样子？

几个月后，真相大白了。原来是高岗、饶漱石在会上的串连造成的。据陶铸同志后来揭发，财经会议开过第一次领导小组会议后，高岗就请他到家里吃饭，在饭桌上高岗对他说，这次会议的方针就是要重重地整一下薄一波，“希望大家能勇敢发言”，并要他放头炮。陶铸同志没有答应。

高、饶在会上抓住几件事向我猛攻。一是“东北一党员信”。这封信是原鞍山市委书记和原东北局党校教育处长在马列学院学习期间写的，通过我于 1952 年 1 月 27 日转给了毛主席。信中揭露了高岗及东北个别干部贪污腐化、铺张浪费的问题。我给毛主席写了几句话：“这封检举信是叙述东北三个阶段的贪污浪费情况，写信的人是响应主席的号召，衷心爱护党的；而对贪污腐化则表示愤慨。”毛主席把这封信批在很小的范围内进行传阅。这件事使高岗大为不满，认为是故意给他抹黑。二是“鞍钢检查组”问题。鞍钢无缝钢管厂发生了八号高炉铜管瓦斯部分爆炸事故，死 11 人，伤 15 人。1952 年 8 月，由中监委和中财委联合组织了一个检查组去调查事故发生的原因。调查组认为这是鞍钢没有按基本建设程序办事，不仅造成了事故，还推迟了建设进度。高岗对此也大为不满，认为是我专挑东北的毛病。于是，他

在批判我的发言中，无限上纲，什么“打击别人，抬高自己，投机取巧”，什么“品质不良”等大帽子不断向我扣来。他这样做是“项庄舞剑，意在沛公”。“批薄”是为了“射刘”，为了进而达到推倒少奇同志的目的。他在发言中，采取移花接木的手法，把少奇同志曾经说过的一些话，比如1947年土改中说过的“村村点火，户户冒烟”，1949年在天津讲话中的一些观点，1950年有关东北富农党员问题谈话中的观点，1951年有关山西互助合作批语中的观点等等，统统安到我的头上加以批判。这种明里攻我，暗中攻刘的“批薄射刘”诡计，明眼人一看便知。高岗调到中央工作后，政治野心越来越膨胀。他把少奇同志视为实现其野心的最大障碍，因此他首先把矛头集中指向少奇同志。先推倒少奇同志，同时推倒周总理，这就是他篡党夺权的如意算盘。

但是，聪明反被聪明误。不久，高岗、饶漱石妄图分裂党的阴谋被揭穿。1955年3月21日，小平同志在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上的报告中，对高岗在财经会议上的所做所为作了结论。他说：高岗利用财经会议“大大施展他的阴谋活动。他和他的追随者不但在会议上为了有意制造党内纠纷而发表种种无原则的言论，并且在会外大肆散播各种流言蜚语破坏中央的威信，特别攻击中央书记处刘少奇和周恩来同志，同时鼓吹他自己。他是想经过这些阴谋活动把这次会议转变为对党中央的进攻”。

（三）周总理的结论和毛主席的讲话

由于高、饶的干扰，会议后期走偏了方向，与毛主席的原意大相径庭。毛主席希望早点结束会议，要周总理尽快做结论。但是，会上批评我的调子一直居高不下。我既然已意识到高、饶绝不仅仅是攻击我，而是进而攻击刘、周，为了不使事态扩大到中央领导核心，我决定再不多说一句话。当时毛主席还要我作第三

次检讨，我拒绝了。周总理把我的态度报告了毛主席，毛主席说：薄一波同志可以不检讨了。

在这种情况下，周总理确实是很难作结论的。他是会议主持人，话说轻了，会上已是那种气氛，不大好通过，且有开脱、庇护之嫌；话说重了，就会为高、饶利用。最后还是毛主席出了个主意，他对周总理说：结论做不下来，可以“搬兵”嘛！把陈云、邓小平同志请回来，让他们参加会议嘛！

陈云同志在北戴河时，一些同志去看望他，谈到财经会议的一些情况。他就明确表示：不能把薄一波同志几年来在中财委工作中的成绩抹煞了，我反对两条路线斗争的提法。他在8月6日召开的第29次扩大的领导小组会议上的发言中，批评了我的错误，同时又明确地指出：“同志们在会议上提出中财委内部是否有两条路线的问题。我以为在工作中间个别不同的意见是不会没有的，在一起做了四年工作，如果说没有一点不同的意见，当然不行；这些意见，也不能说他的都是错误的，我的都是对的，也不能说他的都是对的，我的都是错的。总的说起来，我在今天这样的会议上不能说中财委有两条路线。”

在高、饶问题尚未揭露，会议批评的调子降不下来的形势下，陈云同志的这些话，无疑起到了降温和替我解围的作用。

小平同志回京后，也在一次会议上发了言。大意是：大家批评薄一波同志的错误，我赞成。每个人都会犯错误，我自己就有不少错误，在座的其他同志也不能说没有错误。薄一波同志的错误是很多的，可能不是一斤两斤，而是一吨两吨。但是，他犯的错误再多，也不能说成是路线错误。把他这几年在工作中的那样那样过错说成是路线错误是不对的，我不赞成。

由于陈云、小平同志讲了话，会议气氛起了变化，结论就比较好作了。8月9日，在中南海西楼会议室召开政治局会议，讨论周总理的结论讲话稿，毛主席通知我这次会一定要参加。会上

毛主席问大家有什么意见，也问到我。我表示，我有错误，但有些具体事情还说不清楚。高岗站起来批评我，说我态度不好时，毛主席打断他的话说：你为什么不准上书的人写信给中央（指“东北一党员信”）？东北的工作为什么就不能检查（指检查鞍钢一事）？东北各省出了错误，你东北局还不是要进行批评、检查！高岗还想为自己辩解，但毛主席的态度十分严厉，他也就退缩了。后来回想起毛主席这些话，觉得他对高、饶在财经会议上的表演，可能已有某些察觉了。

8月11日晚，在怀仁堂召开大会，陈云同志主持，周总理做总结报告。毛主席对总结报告作了多次修改。他修改的要点是：

1. 在报告的第一部分，毛主席第一次引用了他概括出来的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比较完整的提法，并指出：“这条总路线的许多方针政策，在1949年3月的党的二中全会的决议里，就已经提出，并已作了原则性的解决。可是许多同志，却不愿意遵照二中全会的规定去工作，喜欢在某些问题上另闹一套不符合于二中全会规定的东西，甚至公然违反二中全会的原则。”在引述了七届二中全会决议中四段论述同私人资本主义进行限制和反限制斗争的文字后，毛主席加上了“以薄一波同志为代表的若干财经工作干部在对私人资本主义所犯错误，是直接违反上述规定的”。但他在修改时，把凡是说我犯了“带路线性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的地方都删掉了“带路线性”四个字。并明确指出，由于“所有这些错误，还未构成一个系统，所以还不应该说成是路线错误”。

2. 在报告中讲到党的统一领导问题时，毛主席所作的修改甚多。下面这段引文中的黑体字，都是毛主席加的：“**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历来总是强调党的统一领导，反对各个党的组织和党员个人向党闹独立性，反对无政府无组织无纪律的错误倾向，反**

对分散主义，这决不是偶然的。这次税收、商业、财政、金融工作中所犯的许多错误，是与向党闹独立性、与无政府无组织无纪律的错误倾向、与分散主义离不开的。修正税制及其他许多违反党的原则的措施，不向党中央请示，不与地方党委商量，亦不考虑有关部门的不同意见，就独断专行地加以实施，而修正税制竟反与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事先取得协议，离开了党的立场，这都是分散主义发展起来的必然恶果。”

3. 在报告中讲到我犯错误的地方，毛主席加了一段文字：“应该指出，薄一波同志过去对敌斗争是勇敢的，在各个时期中当他正确地执行党的路线的时候，他的工作是有相当成绩的。现在的问题是薄一波同志能不能虚心接受各同志的正确批评而坚决改正自己的错误。我们希望他虚心接受同志们的正确批评，坚决改正错误，以便在党的领导下继续做有益于党和人民的工作。”

毛主席对这次会议是非常关心的。会议结束的前一天，即8月12日，他在怀仁堂向出席、列席会议的全体人员作了一次重要讲话。讲话的主要内容大体可分为五个方面：

1. 说明“三反”、“五反”运动后他主要考虑和警惕的问题。他正在酝酿提出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因而特别重视和警觉资产阶级思想在党内的反映，认为这是“向社会主义发展还是向资本主义发展的问题”。

2. 批评“新税制”的错误。认为新税制是“有利于资本主义，不利于社会主义的错误”。他说，资产阶级用“精神的糖衣炮弹打中了一个靶子——薄一波，还有吴波等人”。

3. 批评主观主义和分散主义。他认为，在建设时期，既要反对急躁冒进的、不顾人力物力情况的主观主义，又要反对保守的主观主义。强调必须巩固集体领导，坚持民主集中制，反对分散主义。

4. 要求各级领导干部要有谦虚、坚韧的精神。他说，建设

“要有狠劲”，要有坚韧不拔的精神。“不要骄傲，要学习，不能看不起人”，“永远是学习的态度”。

5. 对自己的错误进行自我批评。他说：

在批判薄一波的错误中间，周、陈都说要负责任，我说我也要负责任，各有各的帐。我的错误在于：（1）抓得少，抓得迟，这是第一条，也是主要的一条。过去忙于土改、抗美援朝，‘三反’后应抓财经，抓了一些，但没有钻。我对财经工作生疏，是吃老资格的饭，过去一凭老资格，二凭过去的革命工作较丰富的经验，现在是建设时期，缺乏知识，未钻进去，要亡羊补牢。（2）统的死，我也有份。我说过要统收统支，对统收我抓了，统支我没有抓紧，不注意。这一次会议提醒了我，要统一集中，但分级管理也是很必要的。（3）预算问题。去年11月搞起，经过1月财经会议，中央也讨论了。预算中16万亿是虚假数字（指将上年结余打入下年的预算——一波注），我现在才知道。利润打的太多，支出的太多了。我虽然说了“三道防线”——增产、节约、发行，但错误是报纸上公布的早了，应该慢慢来（苏联今年预算现在才公布），我也有急躁冒进。（4）查田定产，我支持过。到武汉、南京后，听到对此问题有反映，我说做个五年计划吧。回到北京，邓子恢同志看我口气松了，说查田定产否定了土改成果，根本行不通。我说，听你的吧。（5）扫盲，我开始是支持过，后来不行了，接受了大家的意见，修改了原来的意见。（6）失业人员登记，是我的意见，失业的160万人，加上半失业的人数很多。原因是我接到800封信都是这个问题，劳动部当时又说这样做没有问题，有些失业救济经费还花不出去。我让恩来同志召集了会议，宣布了劳

动就业办法，给地方上增加了麻烦。但也给失业者些希望。……我是中央主席，都有我的份。这些错误，中央政治局在逐步的纠正中。

一位受全党尊敬的伟大领袖，能在大庭广众之中诚恳地检讨自己的错误，给大家以很大的启发和教育。他的这番话，在一些具体问题上承担了责任，就使做实际工作的同志减轻了压力。更重要的是，可以从中看出他的本意是希望这次财经会议能通过批评、自我批评来总结经验，提高认识。

（薄一波著《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

揭批高岗、饶漱石：七届四中全会

高岗在“刮一种风，烧一种火”，叫做“刮阴风，烧阴火”，“其目的就是要刮倒阳风，灭掉阳火，打倒一批人”。七届四中全会，是以揭露和批判高岗、饶漱石的反党分裂活动，通过毛泽东建议起草的《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而载入史册的。

1953年，中共党内高层发生了高岗、饶漱石事件。关于这一事件的大体经过和处理过程，已为人们熟知，唯高岗向党发难的背景，七届四中全会解决高岗、饶漱石问题的最初方针，过去一般史书甚少涉及，本文就这些问题作一介绍。

1951年高岗得了“两分”

东北全境解放以后，作为中共中央东北局书记的高岗，在对私人资本主义，民族资产阶级，以及土改后农村新发展起来的富裕农民的政策上，基本的思想倾向是“左”的。1949年5月，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刘少奇起草了《中央关于对民族资本家政策问题致东北局电》，指出那种“实际上立即消灭资产阶级的倾向，实际工作中的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路线，和党的方针政策是在根本上相反的”。“望东北局立即加以检讨并纠正”。1950年初，刘少奇在同安子文的谈话中，对东北局部分领导那种把农村中新发展起来的，拥有三马一犁的中农当作新富农加以限制的做法，也

作了批评。

到1951年，在两个重大问题上中共中央内部出现了不同意见。结局是：刘少奇的意见被否定，高岗的意见得到了肯定。

第一个问题：关于工会工作的方针。

建国以后不久，如何正确处理工会同党、政府、工人群众之间的关系问题就被提出来了。1950年7月，邓子恢在中南总工会筹委扩大会议上作报告，鉴于当时工会工作中已经出现脱离工人群众的情况，国营工厂中有些工会组织不重视维护工人群众的正当利益，放弃了自己应有的独立的主动的工作等问题，邓子恢指出，国营企业的工会工作者与企业行政管理人员，政府工作人员之间，在“基本立场”一致即双方都是为国家，同时也是为了工人自己的利益服务这样的前提下，在“具体立场”上仍有所区别。他们各自的工作岗位、任务不同。即使在国营工厂中，工会仍有“代表工人的利益”，“保护工人群众日常切身利益”的基本任务，而不能脱离这个基本任务，形成为“厂方的附属品”。当厂方某些规定或措施对工人不利时，工会工作者就应该反映工人的意见，同厂方商量修改完善。邓子恢的意见曾于7月29日在中南局关于中南总工会筹委扩大会议情况的电报中向中共中央作了报告。8月4日，刘少奇为此拟稿批转邓的报告，批语中说：“这个报告很好”，望“照邓子恢同志的作法，在最近三个月内认真地检讨一次工会工作并向中央作一次报告”。这个批语经毛泽东、周恩来、朱德、李立三圈阅后发了下去。同日，《工人日报》登载了邓子恢《在中南总工会筹委扩大会议上的报告》。全国总工会通知全国工会干部学习。9月4日，《人民日报》全文转载了邓文。

同年12月22日，毛泽东在西北局关于职工运动的报告上批示说：四中全会一定要讨论工会工作，并且以管好工厂工会工作为中心来研究，因此要组织一个委员会，起草一个决议案。过去

工会工作是有成绩的，成绩很大，问题甚多。有的工厂企业中，党、工会与群众关系不正常。如群众正在谈话，党员一去便不谈了，群众害怕党员，怕党员汇报，甚至有个别地方把党员看成“特务”，这是一种脱离群众的现象。工会也是如此，脱离群众的现象很多。因此，全党都要注意这个问题，各中央局，分局，省市市委要专门讨论工会工作，不是小规模地讨论，要大规模地讨论。

高岗对邓子恢的上述观点持否定态度。1951年4月，他主持写出了《论国营工厂中行政与工会立场的一致性》的文章，准备作为《东北日报》社论发表。该文对邓子恢的观点提出了针锋相对的批评。文章说，国营工厂中没有阶级剥削，没有阶级矛盾，行政与工人的利益是一致的，行政与工会没有立场的不同。认为“具体立场不同”的说法，第一是模糊了工人阶级在国家政权中的领导地位。第二是模糊了国营企业的社会主义性质，模糊了国营企业与私营企业在本质上的区别。高岗于4月22日写信请毛泽东审改此文，并请示“可否在报上发表”。4月29日，胡乔木就此事向毛泽东和刘少奇写信报告，认为“具体立场不同”的说法，“确有不圆满的地方”，但高文“用正面批驳的方法也不适宜”；认为“最好指出所以如此是有原因的，工会更应当重视工人的直接福利，许多工会不重视是不对的”。5月10日，刘少奇在胡乔木的信上批示：“同意高岗同志文章暂不发表，待四中全会讨论此问题时，当面谈清楚。高文可送邓子恢同志一阅。”5月16日，刘少奇又写信给高岗说：“关于工厂与工会立场问题你写的文章，我已看过，已送交主席，可能主席尚未来得及看。我的意见以为四中全会即将召开并要讨论这个问题，子恢同志亦来，可以在那时加以讨论，因此，你的文章暂时以不发表为好。”

1951年10月2日，全国总工会主席、党组书记李立三写了《关于在工会工作中发生争论的问题的意见向毛主席的报告》。报

告说：有同志认为在国营企业中公私利益是完全一致的，无所谓矛盾，甚至认为“公私兼顾”的政策不适用于国营企业。另一种意见认为在国营企业中公私利益是基本一致的，但在有关工人生活和劳动条件等问题上是存有矛盾的，但这种矛盾的性质是工人阶级内部的矛盾，因而是可以而且应当用协调的方法，即公私兼顾的方法来求得解决的。李立三明确表示：“我个人是同意后一种意见的。我觉得公私关系问题，不仅在目前国营企业中，而且在将来社会主义时期各种对内政策问题上也还是一个主要问题，否认‘公私兼顾’的原则可以运用到国营企业中的意见，可能是不妥当的。”从收入《刘少奇选集》下卷的《国营工厂内部的矛盾和工会工作的基本任务》一文的内容来看，刘少奇同李立三的意见是基本一致的。

不久，李立三的意见被否定。毛泽东在中央一个文件上批示说：工会工作中有严重错误。11月，中共中央批准成立由刘少奇、李富春、彭真、赖若愚、李立三、刘宁一组成全国总工会党组干事会，负责指导全总党组工作（刘少奇外出休假，实际由李富春主持）。12月13日至22日，李富春主持全总党组举行第一次扩大会议，通过了《关于全国总工会工作的决议》。认为李立三，第一，在工会工作的根本方针问题上犯有狭隘经济主义的错误；第二，在工会和党的关系问题上犯有严重的工团主义错误；第三，在工作方法上犯有主观主义、形式主义、事务主义甚至家长制的错误等。并指出这些错误，“是严重的原则错误”，“表现了社会民主党的倾向”，“是完全反马克思主义的，是对于职工运动和我们党的事业极其有害的”。于是，这场关于工会工作方针的争论，就以李立三被解除全国总工会主席、党组书记而告结束。实际就是否定了刘少奇的意见，肯定了高岗的意见。1954年2月，刘少奇在七届四中全会作的自我批评中说，对于李立三在工会工作中的“错误”，“我是应该负一定的责任的”。这就使

高岗在政治上得了“一分”。

第二个问题：关于农业互助合作。

土改以后，我国的个体农业要向现代化和集体化的方向发展，党内意见是一致的。在当时的具体条件下，劳动互助的形式对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具有的积极作用，党内也无异议。但对农村基本中农化以后，是否应当允许少数富裕中农冒尖，以及在手工劳动的基础上是否仅通过组织合作社就能实现社会主义，在党内却有着明显的不同看法。

具有代表性的意见之一是1951年4月17日中共山西省委《把老区互助组织提高一步》的报告。报告认为：随着农村经济的恢复与发展，农民自发力量是发展了的，它不是向着我们所要求的现代化和集体化的方向发展，而是向着富农的方向发展。提出：对于私有基础，不应该是巩固的方针，而应当是逐步地动摇它，削弱它，直至否定它。为此，应该把“公共积累”和“按劳分配”这两个进步因素，在互助组织中逐步地增强，使互助组织大大地前进一步，以战胜农民的自发因素。

中共中央华北局和刘少奇则持另一种意见。

5月4日，华北局对山西省委的意见作了批复，指出省委“抓紧对互助组领导，注意研究发生的问题是对的”。但是提出“用积累公积金和按劳分配办法来逐渐动摇、削弱私有基础直至否定私有基础是和党的新民主主义时期的政策及共同纲领的精神不相符合的，因而是错误的”。目前“提高与巩固互助组的主要问题，是如何充实互助组的生产内容，以满足农民进一步发展生产的要求，而不是逐渐动摇私有制的问题。这一点必须从原则上彻底搞清楚”。华北局书记薄一波，在为纪念中国共产党30周年发表的《加强党在农村中的政治工作》一文中进一步作了说明。他说，中国将来一定要达到农业集体化（即集体农场），如果没有农业集体化，就不会有全部的巩固的社会主义，就不能最后地

解放农民。而要达到农业集体化，还必须发展以国有企业为基础的强大的工业，没有强大的国有化的工业，就不能有全体规模的农业集体化。因此，“所谓‘在互助组内逐渐动摇、削弱直至否定私有财产，来达到农业集体化’，这样的农业集体化道路，是一种完全的空想，因为目前的互助组是以个体经济为基础的，它不能在这样的基础上逐渐发展到集体农场，更不能由这样的道路在全体规模上使农业集体化”。

1951年2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决议明确提出了“3年准备，10年计划经济建设”的战略设想。3月30日，毛泽东在一则批语中指示刘少奇，请他将中央关于“3年准备10年建设的思想”，向正在举行的第一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的与会人员讲一下，“使他们有所准备”。5月7日，刘少奇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作报告，对中央关于“3年准备10年建设”的基本思路作了说明。他说：3年准备之后，我们来一个10年经济计划。到10年以后，新中国的面貌就要改变，那时我们将不但有强大的农业，而且有我们自己强大的工业，使中国变成一个富足的国家。到那时，我们的国家才可以考虑到社会主义去的问题。据此他指出：有的同志现在就想从实际上来提社会主义改造的问题。山西省委在农村里边提出要组织农业合作社（苏联叫共耕社）。这种合作社也是初步的，10家，8家，30家，20家的农民组织起来，土地，牲畜，农具共同使用。当然这种合作就是有社会主义性质的，可是单用这一种10家、8家组织的农业合作社、互助组的办法，使我们中国的农业直接走到社会主义化是不可能的，那是一种空想的农业社会主义，是实现不了的。我们中国党内有很大一部分同志存有农业社会主义思想。这种思想要纠正，因为仅仅依靠农村的条件不能搞社会主义，农业社会化要依靠工业。7月3日，刘少奇将山西省委的报告，作为党内农业社会主义思想的一个例子，要中央办公厅印发马列学院学员，各中央和

中央局。刘少奇在批语中指出：在土地改革以后的农村中，在经济发展中，农民的自发势力和阶级分化已经开始表现出来了。党内已经有一些同志对于这种自发势力和阶级分化表示害怕了，并且去加以阻止或避免。并且认为山西省委指出的应该逐步地动摇、削弱直至否定私有基础，把农业生产互助组织提高到农业生产合作社，以此作为新的因素去“战胜农民的自发因素”，这是一种错误的、危险的、空想的农业社会主义思想。

在党内关于中国农村如何走向社会主义的两种不同意见中，毛泽东批评了刘少奇关于互助组不能生长为农业生产合作社的观点和现阶段不能动摇私有制基础的观点，并表示支持山西省委的意见。于同时，毛指示陈伯达召集第一次互助合作会议，起草农业生产互助合作决议。

就在这重要时刻，高岗于10月14日向毛泽东送上了《关于东北农村的生产合作互助运动》的报告。报告说：东北农村在土地改革的基础上，经过三年多发展生产的运动，农村经济获得了普遍的上升。经济上升的农户约占总农户的95%。其中上升到中农水平的约占60%~70%；较土改时有显著改善的约占25%~30%；上升户中约有20%已成为富裕中农。新富农发展较慢，据各省中发展最多的黑龙江省统计，约占农户的0.8%。“东北农村经济普遍上升的主要原因，是由于经过土地改革，摧毁了地主与旧富农的经济之后，党就将贯彻毛主席关于组织起来、发展生产的方针，作为农村工作的重点，并在组织农民生产与交换方面积极推行了合作互助与供销合作政策，以便有步骤地改造农业经济，使之由个体逐步向着集体发展。”当前组织起来的合作互助组，主要有四种形式：插犋组；农业三大季换工组；农业、副业结合，长年不散，比较定型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型的，即有一定数量的公共财产，并进行集体劳动的。根据东北地区的经验，报告认为合作互助发展的一般规律是：“由季节性的、单纯农业

生产的小型合作互助组（第一种形式），到农业三大季的插犍换工（第二种形式），再到农、副业结合的常年互助（第三种形式），然后到土地入股，集体耕种，或共同占有有一定数量的公共生产工具，共同生产的农业合作社形式（第四种形式。”报告列举合作互助组的作用主要有三点：第一，提高了农业生产力，多打了粮食，扩大了经济作物的种植面积，推广了新式农具的使用范围，容易使农业逐渐走向计划性的生产，增加农民收入；第二，促进了农村经济的普遍上升，使农民破产下降的可能性大为减少，农村的阶级分化也小；第三，教育组织了农民，起了逐渐地改造农村经济，改造农民的思想与生活习惯的作用。在对合作互助组的指导方针上，报告明确表示：“继续坚持贯彻毛主席屡次指示的方针，即根据群众的自愿与需要，加以积极扶助与发展，并逐步由低级引向到较高级的形式。”强调要有重点地发展农业合作社，同时力争各类形式的合作互助组能够做出比较优良的成绩，来积极动员与吸引“单干”的农户自愿加入各种类型的合作互助组。

毛泽东看了高岗的报告以后，于10月17日将此件批给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彭真、陈伯达、胡乔木、杨尚昆，并嘱杨尚昆“印成一个小册子，分送各中央局、分局、各省市区党委。同时发给中央各部门，中央政府各党组，此次到中央会议各同志及到全国委员会的各共产党员”。毛泽东还同时为中共中央起草了一个批语，充分肯定了高岗的报告。批语说：“中央认为高岗同志在这个报告中所提出的方针是正确的。一切已经完成了土地改革任务的地区的党委都应研究这个问题，领导农民群众逐步地组成和发展各种以私有财产为基础的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组织，同时不要轻视和排斥不愿参加这个运动的个体农民。”这样，高岗就又得了“一分”。

在批评“新税制”中高岗组成了“经济内阁”

1952年12月31日，政务院财经委员会颁布《关于税制若干修正及实行日期的通告》和《商品流通税试行办法》，于1953年1月11日在全国实行。新税制规定：“应税货物，一律按国营公司批发牌价核税；加工，定货，包销者同。”也就是不分公营，私营，一律平等纳税。

毛泽东认为，新税制提出“公私一律平等”纳税，有利于资本主义，不利于社会主义，违背了七届二中全会的决议。是政务院在组织上犯了分散主义的错误。根据他的提议，中共中央于1953年3月10日作出了《关于加强中央人民政府系统各部门向中央请示报告制度及加强中央对于政府工作领导的决定（草案）》。决定尖锐地指出：为了使政府工作避免脱离党中央领导的危险，今后政府工作中一切主要和重要的方针、政策、计划和重大事项，必须经过党中央的讨论和决定或批准。为此决定：

第一，政府各部门对于中央的决议和指示的执行情况及工作中的重大问题，均须定期地和及时地向中央报告或请示，以便能取得中央经常的直接的领导。

第二，为了加强中央对于政府工作的领导，以及便于政府各部门中的党的领导人员能够有组织地、统一地领导其所在部门的党员，贯彻中央的各项政策、决议和指示的执行，今后政府各部门的党组工作必须加强，并应直接接受中央的领导。因此，现在的中央人民政府党组干事会（1950年1月9日建立，其职责相当于统一领导中央人民政府各部、委中共党组的总党委，由周恩来担任书记——引者注）已无存在的必要，应即撤销。

第三，今后政务院各委和不属各委的其他政府部门一切主要的和重要的工作均应分别向中央请示报告，如属两个部门以上而

又不同隶于一委的事项，则经由政务院负责同志向中央请示报告。如系主席直接交办的事项，应直接向主席请示报告。

如应向中央请示报告的事项而竟未向中央提出，则最后经手的政府负责同志应负主要责任。

为了更好地作到现在政府工作中的各领导同志直接向中央负责，并加重其责任，特规定明确的分工如下：

国家计划工作，由高岗负责；

政法工作（包括公安、检察和法院工作），由董必武、彭真、罗瑞卿负责；

财经工作，由陈云、薄一波、邓子恢、李富春、曾山、贾拓夫、叶季壮负责；

文教工作，由习仲勋负责；

外交工作（包括对外贸易、对外经济、文化联络和侨务工作），由周恩来负责；

其他不属于前述五个范围的工作（包括监察、民族、人事工作等），由邓小平负责。

根据中共中央的决定，5月15日，政务院发出了《关于中央人民政府所属各财政经济部门的工作领导的通知》。对中央人民政府所属各财政经济部门的工作领导，重新作了分工。即：

（一）所属的重工业部、一机部、二机部、燃料工业部、建筑工程部、地质部、轻工部和纺织部，划归国家计委主席高岗领导；

（二）所属的铁路、交通和邮电部，划归政务院副总理邓小平领导；

（三）所属的农业、林业和水利部，划归财委副主任邓子恢领导；

（四）所属的劳动部，划归计委委员饶漱石领导；

（五）所属的财政、粮食、商业、对外贸易和人民银行，仍

属财委主任陈云领导；在陈云养病期间，由副主任薄一波代理。

中央作出的上述决定和分工，无疑是对中央人民政府党组干事会书记、政务院总理周恩来的严重批评。根据这个决定和分工，周恩来对政务院的工作除必须担负全部责任外，实际上他所直接领导的只剩下一个外事口了。与之同时，中央决定把政务院20个部中的8个主要工业部划归国家计委主席高岗领导，这不能不认为是对高岗的信任和重用。而这同他1951年得的“两分”，显然是有着直接关联的。正因为此，高岗自认为已经组织了“经济内阁”，并准备进一步跃登龙门了。

毛泽东批评“离开总路线的右倾观点”

在1953年6月15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正式向党中央提出了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的建议。同时指出：有人在民主革命成功以后，仍然停留在原来的地方。他们没有懂得革命性质的转变，还在继续他们的“新民主主义”，不去搞社会主义改造。这就要犯右倾的错误。就农业来说社会主义道路是我国农业唯一的道路。发展互助合作运动，不断的提高农业生产力，这是党在农村中工作的中心。毛泽东批评说，右倾的表现有这样三句话：“确立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这种提法是有害的，是妨碍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的；“由新民主主义走向社会主义”，这种提法不明确，是不妥当的；“确保私有财产”，因为中农怕“冒尖”，怕“共产”，就有人提出这一口号去安定他们，其实，这是不对的。

毛泽东在8月12日全国财经会议上的讲话，再次对“新税制”等问题作了尖锐的批评，并提出：“要在党内开展反对资产阶级思想的斗争。”他说：对于财经工作中的错误，从去年12月薄一波同志提出“公私一律平等”的新税制开始，到这次会议，

都给了严肃的批评。说新税制发展下去，势必离开马克思主义，离开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向资本主义发展。他指出：过渡时期，是向社会主义发展，还是向资本主义发展？按照党的总路线，是要过渡到社会主义。这是要经过相当长期的斗争的。新税制的错误跟张子善的问题不同，是思想问题，是离开了党的总路线的问题。要在党内开展反对资产阶级思想的斗争。他强调，为了保证社会主义事业的成功，必须在全党，首先在中央，大区和省市这三级党政军民领导机关中，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倾向，即反对党内的资产阶级思想。

毛泽东还对刘少奇、薄一波等认为在没有强大的国有工业的支援，企图经过互助合作，就能把个体农民引上社会主义集体化道路，“是一种完全的空想”的观点，作了尖锐的批评，说这是违反七届二中全会决议的。他还强调要反对所谓“分散主义”。

高岗急于发难

高岗急于在1953年夏季举行的全国财经工作会议上和会后连续向周恩来、刘少奇迭次发难，显然是对毛泽东的上述批评作了错误的判断。在他看来，毛泽东把“确立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等问题提到“离开总路线”的高度进行批评，证明周、刘在政治上犯了“路线错误”。联系在此以前在组织分工上的重要调整，他认为周恩来、刘少奇已“失去了”毛泽东的“信任”。而他自认为是为毛泽东“信任”，并越来越受到“重用”的一颗上升的“明星”，于是企图趁机一举将周、刘拱倒，取而代之。

1953年6月开始举行的全国财经会议，主要议题是关于五年计划、财政、民族资产阶级三个问题，但在讨论中，批评新税制实际上成了会议的中心问题。高岗看到对新税制意见较多，就鼓动一些同志“放炮”，并上纲说这是路线错误，是两条路线斗

争。据后来陶铸揭发：财经会议开过第一次领导小组会议后，高岗就请他到家里吃饭，在饭桌上高岗对他说，这次会议的方针就是要重重地整一下薄一波，“希望大家能勇敢发言”，并要他放头炮。陶铸没有答应。实际上，高岗这样做完全是“项庄舞剑，意在沛公”，“批薄”是为了“射刘”，目的在推倒刘少奇。这一点，高岗曾直言不讳的对人说：“我在全国财经会议上不讲话则已，要讲就要挖少奇的老底。”所以他在发言中，采取移花接木的手法，把刘少奇曾经说过的一些话，比如1947年土改中说过的“村村点火，户户冒烟”，1949年在天津讲话中的一些观点，1951年有关山西互助合作批语中的观点等等，统统安到薄一波的头上加以批判，以暗示刘少奇犯有一贯的，系统的路线错误。

为了推倒刘少奇，高岗公然散布“军党论”（即所谓“党是军队创造的”）。他说，党的历史上有“二元论”，党的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要修改，决议中关于刘少奇是党的正确路线在白区工作中的代表的提法不对头，需要重新作出结论。他别有用心地把中共党的干部分成两部分，说毛泽东代表红区，刘少奇代表白区，现在党和国家领导机关的权利掌握在“白区的党”的人们手里，应当彻底改组。并煽动说现在白区干部要篡夺党了。

彭德怀后来也揭发说，在1953年12月里，军委准备召开一次军队系统的党的高级干部会议，在讨论军委准备的报告草稿时，高岗说这个报告草稿没有思想性。毛泽东当即指示：“以彭为主，请高加以修改。”当彭为修改报告草稿去找高时，高就指着桌上的刘少奇在天津的讲话、华北土改工作会议的讲话和在延安的关于“和平民主新阶段”等讲话记录，问彭看过这些文件没有？彭说，没有看过，现在的文件实在太多了。高一再要彭看看这些文件。第二天，高到彭的住处。彭德怀回忆说：他在这里又提起少奇同志来，高说：“刘少奇这个摊摊在七大时就安排好了，

说什么刘为白区的领袖，这就是说毛主席只是苏区和红军的领袖，你看这样还像话吗？他把某某安在华北，某某安在华东，某某安在东北，有朝一日他就要篡党，取毛而代之。”彭说：不会的，有毛主席在，谁也篡不了党。高说：毛主席去重庆谈判回延安后，身体很不好，那时真危险啊！彭驳斥说：少奇同志对毛主席是绝对忠诚的。并举了一个例子来说明少奇同志的可靠。高岗却说：此一时，彼一时，难道“和平民主新阶段”的讲话也是主席的意思吗？彭说那次讲话，少奇同志是“走了一点火”。高岗又继续说：天津讲话站在资本家那边去了，难道也是主席的意思吗？也是“走了一点火”吗？妄图煽动彭跟他反刘。

当高岗得悉中央正在考虑国家最高行政机关是否采取部长会议的形式，党中央是否增设副主席或总书记时，更是迫不及待地多方活动起来。邓小平说：毛泽东同志在1953年底提出中央分一线、二线之后，高岗活动得非常积极。他首先得到林彪的支持，才敢放手这么搞。那时东北是他自己，中南是林彪，华东是饶漱石。对西南，他用拉拢的办法，正式和我谈判，说刘少奇同志不成熟，要争取我和他一起拱倒刘少奇同志。我明确表示态度，说刘少奇同志在党内的地位是历史形成的，从总的方面讲，刘少奇同志是好的，改变这样一种历史形成的地位不适当。高岗也找陈云同志谈判，他说：搞几个副主席，你一个，我一个。这样一来，陈云同志和我才觉得问题严重，立即向毛泽东同志反映，引起他的注意”。

在高岗积极进行反对刘、周的篡权活动中，饶漱石密切进行配合，尤其是在1953年9月10日，党中央召开的第二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期间，他故意夸大中央组织部工作中的某些缺点错误，大批长期主持日常工作的副部长安子文，施展“讨安伐刘”的政治诡计。

毛泽东笑谈历史掌故“秦灭楚”

对高岗、饶漱石从全国财经会议到组织工作会议一系列不正常举动，毛泽东逐步有所察觉，引起他对党内团结的关注。他在1953年10月23日审阅刘少奇在全国组织工作会议领导小组会上的讲话稿时，专门加了一段“全党团结起来实现总路线”的话。即：现在是全党团结起来认真执行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时候，我们要将一个落后的农业国，改变为一个工业国，我们要对现存的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社会主义的改造，我们要在大约15年左右的时间内基本上完成这个伟大的任务，我们的组织工作就要好好地在这个总路线而服务，我相信同志们是高兴并且是能够担负这个任务的。针对高、饶散布的所谓“圈圈”、“宗派”问题，毛泽东在向各大区负责同志的讲话中，回顾了大革命时期和土地改革时期党和军队干部成长的情况，指出：中级干部北方人多，高级干部南方人多，是历史形成的。这是因为，在早期南方革命运动发展较为普遍，后来革命运动转到北方来了。现在，不管南方干部，北方干部，中级干部，高级干部，都不要有“圈圈”，要消灭“圈圈”。大家都要重视党的团结，消除山头。

1953年12月4日，中央政治局举行会议揭露了高岗的问题，毛泽东在会上指出，高岗他们在“刮一种风，烧一种火”，叫做“刮阴风，烧阴火”，“其目的就是耍刮倒阳风，灭掉阳火，打倒一批人”。据此，毛泽东提出了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建议。中央政治局一致同意这个建议，决定起草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当日，毛泽东带着一个宪法起草小组南下杭州。

1954年1月3日，毛泽东在杭州会见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提沃西安和驻华大使尤金时，在谈话中暗示了高岗错误的反党性

质。据当时担任翻译的师哲回忆，毛泽东说：我们党内，或许也是国内要出乱子了。自然，我今天说的只是一种可能性，将来情况如何变化，还要等等看，这个乱子的性质用一句话来说，就是有人要打倒我，我们中国历史上曾出现过秦灭六国，秦灭了楚。秦就是他们陕西（说着，毛泽东又用手指了指师哲），楚就是湖南（说着，毛泽东又用手指了指自己）。这是历史上的事实，那么现在怎么样？还要等等看。

即便这样，毛泽东对高岗、饶漱石的基本方针，仍是团结的方针，等待着他们向中央作自我批评。

在杭州确定的开会方针

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决定起草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的时候，对于是否需要召开一次中央全会讨论通过，并未作议论。当刘少奇在北京主持起草好决议草案的初稿送毛泽东审改时，毛泽东才又提出召开全会的动议，并对中央全会的议程和开会方针提出了明确的具体意见。

1954年1月7日，毛泽东致信刘少奇和中央书记处各同志。信中说：决议草案已作了修改，使之有根据些和更明确些。参加修改的，有在这里的几位同志。林彪同志亦表示同意。接着，他建议：此决议似宜召开一次中央全会通过，以示慎重。中委大多数在京，不在京的是少数，召集甚易，加上若干负重要工作责任的同志参加会议。此议是否可行，请你们考虑。如召开全会，时间以在一月下旬为宜。议程可有三个：（一）批准三中全会以来中央政治局的工作；（二）决定于本年内召开党的全国代表会议讨论第一个五年计划纲要；（三）通过关于加强党的团结的决议。报告请刘少奇同志做，事先写好，有四五千字就够了。……此报告有三五天功夫即可写成，如时间许可，请用有线电发给我一

看，如定于1月25日开会，则时间完全来得及。

毛泽东还交待说：全会应发一个简单公报，将三项议程公布就可以了，其它都可不公布。“关于第三项议程，应尽可能做到只作正面说明，不对任何同志展开批评。”

同日，毛泽东另外又专门写了一封给刘少奇个人的信。毛泽东说：如各同志同意开全会，于你的报告稿宣读完毕后，似宜接着宣读你已有准备的自我批评稿，两稿各有一小时左右即够。自我批评稿宜扼要，有三四千字即可，内容宜适当，不可承认并非错误者为错误。如可能，请一并电告我一阅。

在毛泽东关于召开一次中央全会的建议得到中央书记处同意后，毛于1月18日致电刘少奇并书记处各同志，建议将决议草案在会前发到会者征求意见。毛说：中央全会既定本月30日开会，还有十几天时间，为使在各地的中央委员，中央候补委员及参加会议的同志事先有所准备起见，建议将关于加强党的团结的决议草案即日用电报发给他们阅看，如有因病因事不能到会的，请他用电报表示意见。同时可征求各中央局分局省市的意见，以供全会参考。

高岗得知中央决定召开四中全会的信息后，当即写信给毛泽东，要求到杭州面见毛。为此，毛于1月22日，专就四中全会的开会方针致电刘少奇。电称：杨尚昆同志到此，收到所需文件，并收到高岗同志一信。高岗同志在信里说完全拥护和赞成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草案，并说他犯了错误，拟在四中全会上作自我批评，想于会前来这里和我商量这件事。我认为全会开会在即，高岗同志不宜来此，他所要商量的问题，请你和恩来同志或加小平同志和他商量就可以了。关于四中全会的方针，除文件表示者外，对任何同志的自我批评均表欢迎，但应尽可能避免对任何同志展开批评，以便等待犯错误同志的觉悟。这后一点我在1月7日致你和书记处各同志的信中已说到了。如你们同意这个

方针，就请你们据此和到会同志事先商谈，并和高岗同志商谈他所要商谈的问题。尚昆留此几天即回北京。此电请送高岗同志一阅，我就不另复信了。

刘少奇的自我批评

毛泽东发现高岗在财经会议期间对刘少奇的“错误”进行攻击后，曾要高岗找刘少奇直接谈清问题。但高岗不予理睬。刘少奇则两次主动找高岗谈话，并对工作中的缺点作了诚恳的检讨。后来，针对高、饶诬告刘少奇有“圈圈”，毛泽东指出，说少奇同志有圈圈，是错误的说法。毛还说，少奇同志是大公无私的，是正派的，他决不是那种搞宗派的人。

在七届四中全会上，刘少奇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作了诚恳又不失分寸的自我批评，并对某些问题作了说明。主要内容有：

（一）关于农业生产合作社问题。

刘少奇说：关于农业生产合作社问题，我曾有过一种想法在基本上是不正确的。在土地改革完成以后，要对我国农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要实行农业集体化，对于这个基本方向，我是没有怀疑过的。因此，我主张向农民宣传社会主义，要经常地向农民说明，仅仅实行土地改革还不能最后地解放农民，只有实行社会主义才能使农民最后地获得解放，免于贫困并富裕起来。在目前要广泛地发展劳动互助组和供销合作社，要限制富农经济，对将来要普遍地组织集体农场和消灭富农经济，对于这些，我的观点都是明确的。但是，我有过一种想法，就是我以为还要等一个时候才能在我国农村中大量地，普遍地组织农业生产合作社和集体农场，而没有想到立即就可以大量地组织半社会主义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并由此逐步地发展到完全社会主义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即集体农场。同时，在目前的劳动互助组与将来的集体农场之间没

有抓住以土地入股的半社会主义的农业生产合作社这个组织形式，作为由互助组过渡到集体农场的十分重要的中间过渡形式，因而，就以为互助组不能过渡到集体农场，而把二者看成在组织上是没有多少联系的两回事。因为有了这种想法，所以在1950年1月与东北个别同志谈到农村互助合作问题时，我有一些话是说得不妥当的。在1951年春，我赞成华北局在个别地方试办农业生产合作社，但不赞成推广。同年7月间我批评了山西省委《把老区互助组织提高一步》的文件，并在向马列学院第一期毕业生讲话时，也说到这个批评。应该说，我这个批评是不正确的，而山西省委的意见则基本上是正确的。……在1951年秋，中央讨论农业生产互助合作问题后，由于毛泽东同志的指示得到了改正，我也就抛弃了这种想法。

（二）1947年我主持的全国土地会议，确定了普遍实行分配土地的原则，制定了土地法大纲，并提出了整党的方针。这个土地法大纲和整党方针，是经过党中央的修正和批准的。全国土地会议的工作是有成绩的。但是这个会议有重大的缺点，这就是没有对于农村的阶级分析做出恰当的决定和没有能够制定一个正确的切实可行的详细的没收、分配土地的办法，同时对于错误倾向的批判不够全面。在会议上着重批评了党内反对地主不坚决以及同情、可怜、庇护地主的右倾错误，这是完全必要的，并从此结束了这方面的错误。对于当时已经发生的一些“左”倾错误，虽然也做了批评，但这种批评是不充分的，没有系统的，因而也就不能够认真地去堵塞有些地方的“左”倾错误的发生和发展。……直到1947年12月在中央会议上毛泽东同志提出了关于《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报告，1948年中央重新发表1933年怎样分析阶级的文件和任弼时同志的文章后，各地土地改革才逐步完全纳入正轨。我在当时没有能够把指导土地改革这样一个严重的任务完全正确地担当起来。

(三) 1946年2月1日，旧政协会议开过会，中央发出了一个指示，说旧政协决议付诸实施，中国从此走上和平民主阶段。同时向八路军、新四军和各解放区提出练兵、减租和生产三大中心工作，并指出“一切准备好，不怕和平万一被破坏”。在这个指示中所谓“和平民主阶段”是属于一种对时局的估计。而关于练兵、减租和生产三大中心工作的规定，则是对于我们的革命起实际作用的性质的东西。对于和平可能性的估计只是一方面，而关于练兵、减租和生产这些中心工作的指示，则在于我们可和可战，使我们在任何时局变化的场合下，都能够有恃而无恐。对于这个文件，我想是应该作这样的分析的。……中央通过的这个指示，是我起草的，我曾经根据这个指示在干部会上作过一个报告，在报告中有些话讲得不妥当，应当纠正。

(四) 1949年春中央派我去天津研究和帮助天津市委的工作，我对天津当时的工作说过许多话，曾经批评了当时某些对资产阶级的“左”倾情绪，虽原则上没有错误，但其中有些话是说得不妥当的。

从刘少奇的上述自我批评，不难看出，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撇开问题本身的是非不谈，从组织上说，在中央没有作出决议以前，党员持有不同认识和意见是许可的，说不上有什么错误；1947年老区土改中出现的“左”倾错误，刘少奇负有指导上的责任，但属工作指导上的错误；“和平民主新阶段”、“天津讲话”不存在什么错误。值得指出的是“剥削有功”一说。其实，刘少奇这个话是有前提的，即在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民主政权的领导下。其道理如列宁在《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个策略》中说的，无产阶级领导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胜利，在客观上是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扫清了道路，这与其说是对资产阶级有利，不如说对无产阶级更为有利。因为只有工业生产的极大发展，才有利于社会主义的建立、巩固和发展。这是推不倒的历史

唯物主义原理。当然，从用语来说，换个词，对我们这个以出身小生产的党员占优势的党来说，可能更易被大家接受。

邓小平一席公道话

在七届四中全会上，邓小平针对高岗攻击刘少奇所散布的流言蜚语，作了尖锐的批评，对刘少奇为顾全大局在全会上作的自我批评，说了一席公道话。他说：

我们常常闻到这样一些味道，例如有的人把某些人或者把他自己夸大到与实际情况极不相称的地步，不愿意受检查，不愿意受批评，自以为是，听不进别人的意见，批评与自我批评的空气稀薄，不注意集体领导，不注意团结，对犯错误的同志不是采取治病救人的态度，不大照顾别的地区，别的部门等等。尤其严重的是，有些同志不注意维护中央的威信，对中央领导同志的批评有些已经发展到党组织所不能允许的程度。毛泽东同志提倡对党的任何负责同志（毛泽东同志经常说，包括他自己在内）的批评，但是这种批评必须根据党的原则在一定场合下进行，或者向他本人提出。这样的批评是应该的，不可少的。中央的主要负责同志过去经常讲到这一点，他们是欢迎别人批评的。但是不能允许这样的言论发展到党的组织所不能允许的程度。他明确指出：我们常常遇到，某些同志对中央几个主要负责同志的不正确的言论，常常是不经过组织，不合乎组织原则的。全国财经会议以来，对少奇同志的言论较多，有些是很不适当的。我认为少奇同志在这次会议上的自我批评是实事求是的，是恰当的。而我所听到的一些传说，就不大像是批评，有些是与事实不相符合的，或者是夸大其词的，有的简直是一些流言蜚语，无稽之谈。

邓小平着重指出：比如今天少奇同志在自我批评里讲到的对资产阶级的问題，就与我听到的那些流言不同，对资产阶级问

题，虽然我没有见到 1949 年初少奇同志在天津讲话的原文，但是据我所听到的，我认为少奇同志的那些讲话是根据党中央的精神来讲的。那些讲话对我们当时渡江南下解放全中国的时候不犯错误是起了很好的作用的。虽然在讲话中个别词句有毛病，但主要是起了很大很好的作用的。当时的情况怎么样呢？那时天下还没有定，半个中国还未解放。我们刚进城，最怕的是“左”，而当时又确实已经发生了“左”的倾向。在这种情况下，中央采取坚决的态度来纠正和防止“左”的倾向，是完全正确的。我们渡江后，就是本着中央的精神，抱着宁右勿“左”的态度去接管城市的，因为右充其量丧失几个月的时间，而“左”就不晓得要受多大的损失，而且是难以纠正的。所以，我认为少奇同志的那个讲话主要是起了很好的作用的，而我所听到的流言就不是这样的。

事隔 40 年之后，重读邓小平这一席话，可以看出，他在这里不只是对刘少奇的天津讲话作了客观的公正评价，而且阐明了一条真理，即：共产党掌握全国政权以后，各项政策的正确，错误，利弊得失，其基本立足点，就是看是否有利于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在当时，突出反映在是否有利于迅速恢复和发展城市的工业生产。遗憾的是，这一点在当时远未成为党内的共识。

对高岗、饶漱石的结论

中共七届四中全会，是以通过《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载入史册的。决议不点名地批评了高岗、饶漱石，向全党，特别是中央委员和党的高级干部，强调了增强和维护党的团结的极端重要性。重申党的团结的重要保证之一是严格遵守民主集中制，严格遵守集体领导的原则。决议明确规定：“全党高级干部的重要的政治活动和政治意见应该经常向所属的党的组织报告和反映，其

关系特别重大者则应直接向党中央的政治局，书记处或中央主席报告和反映；如果避开党组织和避开中央来进行个人的或小集团的政治活动，避开党的组织和避开中央来散布个人的或小集团的政治意见，这在党内就是一种非法活动，就是违反党的纪律，破坏党的团结的活动，就必须加以反对和禁止。”

这就不只重申了党的纪律，而且划清了党内组织是非的界限。对于加强党的建设具有长远的指导意义。

然而，在这次全会上，尽管对高岗、饶漱石采取了团结的方针，但高、饶却执迷不悟，不作深刻检讨、痛改前非。为全面查清他们的反党阴谋活动，中央书记处在2月中旬分别召开了关于高岗问题和饶漱石问题的两个座谈会。经毛泽东修改批准，2月25日，周恩来在高岗问题座谈会上作总结发言说：“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高岗虽有其正确的有功于革命的一面，因而博得了党的信任，但他的个人主义思想（突出地表现于当顺利时骄傲自满，狂妄跋扈，而在不如意时，则患得患失，泄气动摇）和私生活的腐化欲长期没有得到纠正和制止，并且在全国胜利后更大大发展了，这就是他的黑暗的一面。”“高岗在最近时期的反党行为，就是他的黑暗面发展的必然结果。”高岗在事实面前拒不悔改，于1954年8月17日再次服安眠药自杀身亡。饶漱石也拒不彻底认错。

1955年3月31日，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通过了《关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决议》。决议结论说：高岗、饶漱石反党活动的特点“就是他们始终没有在任何党的组织或任何党的会议上或公众中公开提出过任何反对党中央的纲领，他们的唯一纲领就是以阴谋手段夺取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利”。遂决议开除高岗、饶漱石的党籍。

1980年，在拨乱反正中邓小平谈到高岗问题时说：“揭露高岗的问题没有错。”“高岗想把少奇同志推倒，采取搞交易，搞阴

谋诡计的办法，是很不正常的。所以反对高岗的斗争还要肯定。”“总之，高岗问题不揭露，不处理是不行的。现在看，处理得也是正确的。”

值得指出的是，过去说高岗、饶漱石形成了一个反党联盟，说他们是“适应了帝国主义和资产阶级反革命分子的愿望”，“实际上成为资产阶级在我们党内的代理人”，后来又说这是一次“路线斗争”。现在看来，这些论断，都是与历史事实不相符的。饶漱石尽管与高岗分裂党的活动作了积极配合，但只是两个人的个人行为，并不存在一个以他们两人为首脑的什么反党联盟。高、饶当时搞的完全是一种阴谋活动，根本没有提出过他们的什么政治路线，更谈不上与当时的国内外阶级斗争有什么联系。所以，这些说法是应该加以澄清的。

40 余年后的评说

1954 年至今，已过了 40 余个年头。对七届四中全会在历史上的地位，可以看得更加清楚一些。就组织上解决高岗问题来说，如邓小平指出的，不揭露，不处理是不行的。处理得也是正确的。全会通过的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对于防止党内出现类似高饶那样的地下宗派活动，也是起了积极作用的。

但是今天看来，四中全会没有在政治思想上解决好问题，即未能如邓小平在发言中指出的，鉴别党内的思想是非，政策是非的基本点，就是看它是否有利于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而不是什么超越时空的、抽象的所谓政治立场。正是在高岗攻击刘少奇的这个带根本性的问题上，全会存在偏误。

于是，事隔十几年以后，在“文化大革命”动乱开始不久，过去高岗攻击刘少奇的“炮弹”重又被搬了出来。1967 年 3 月，戚本禹在《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的批判文章中，断章取义

地大肆攻击刘少奇 1949 年的“天津讲话”。诬蔑刘是“为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而奔走呼号”。到了 1969 年 4 月，在中国共产党的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竟然把刘少奇关于和平民主新阶段的讲话和天津讲话作为“修正主义”的罪行，写进了中央委员会的政治报告。

“文化大革命”这场灾难，当然与七届四中全会没有什么直接关系。但是，毛泽东先是要刘少奇找高岗谈清问题，继之要刘少奇在四中全会上作自我批评，以及全会根本没有批评高岗在政治上对刘少奇的诬蔑，这就实际上确认了刘少奇在对待资本主义问题上，犯有“右倾错误”。从而，混淆了党内政治思想是非的界限。显然，这与“文化大革命”又是有着潜在的联系。

（林蕴晖：《高岗发难与中共七届四中全会的召开》）

确立基本政治制度： 第一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

1954年9月，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举行。会议通过了我国第一部社会主义类型的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了我国新的国家机构，选举了新的国家领导人。大会通过宪法时，“暴风雨似的掌声延续了5分钟”。

1954年9月15日下午3时，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中南海怀仁堂隆重开幕。出席开幕式的代表1141人，旁听人员136人、各国驻中国外交使节和外交官44人、外宾39人应邀参加开幕式。

毛泽东主持会议并致开幕词。他说：我们这次会议具有伟大的历史意义。这次会议标志着我国人民从1949年建国以来的新胜利和新发展的里程碑，这次会议所制定的宪法将大大地促进我国的社会主义事业。我们的总任务是：团结全国人民，争取一切国家朋友的支援，为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为了保卫国际和平和发展人类进步事业而奋斗。他号召全国人民努力学习苏联和各兄弟国家的先进经验，老老实实，勤勤恳恳，互勉互助，力戒任何虚夸和骄傲，准备在几个五年计划之内，将我们现在这样一个经济上文化上落后的国家，建设成为一个工业化的具有高度文化程度的伟大的国家。他最后强调的几句话像口号，很鼓舞人心，曾在一段时间内成为中国人民耳熟能详的警句：

我们的事业是正义的。正义的事业是任何敌人也攻不破的。

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

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

我们有充分的信心，克服一切艰难困苦，将我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共和国。

我们正在前进。

我们正在做我们的前人从来没有做过的极其光荣伟大的事业。

我们的目的一定要达到。

我们的目的一定能够达到。

全中国六万万人民团结起来，为我们的共同事业而努力奋斗！

我们的伟大的祖国万岁！

在毛泽东的开幕词结束以后，乐队奏起庄严的国歌（这一点和后来不一样，后来都是先奏国歌，再致开幕词）。然后是全体起立，为在中国人民革命事业中牺牲的革命烈士默哀3分钟。开幕式到此结束。

休息40分钟后，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于下午4时举行。

大会首先通过了本次会议的议程：

（一）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二）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组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组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组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检察院组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委员会组织法》。

（三）通过关于政府工作的报告。

（四）选举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副主席，选举第一届全国

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副委员长、秘书长、委员，选举最高人民法院院长，选举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通过国务院总理人选，通过国务院副总理、部长、委员会主任、秘书长人选，通过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委员人选等。

会议随即进入第一项议程，由刘少奇代表宪法起草委员会向大会作《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的报告》。刘少奇首先指出，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在我国国家生活中，是一件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事情。所以，宪法草案初稿完成后，即组织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和社会各方面的代表认真讨论。修改后于1954年6月14日在全国公布，以便更广泛地听取意见。根据这些意见，宪法起草委员会对原来的草案再度作了修改，才产生了提交大会的这个草案。这个宪法草案是中国人民100多年来英勇斗争的历史经验的总结，又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新的历史经验的总结。没有这个伟大的革命实践，这宪法草案是不可能制定的。我们的宪法是社会主义类型的宪法，是真正地反映人民的意志，代表人民根本利益的宪法。因此在宪法中，正确地规定了我国人民民主专政的各项原则和制度，规定了人民在国家中的地位，规定了我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道路和方针政策。

大会对宪法草案开展热烈的讨论。代表们纷纷指出：这部宪法草案从上到下，又从上到下，吸收各方面意见，修订多次，对一个字，一个标点符号，都经过多少人反复推敲，这个制定过程如此严肃认真，实事求是，充分发扬民主精神，在世界制宪史上也很少见，单是这一点，就值得我们引以自豪。为着这个宪法，艰苦奋斗数十年，今后还要继续艰苦奋斗，贯彻实行这个宪法，以此为基础向前迈进，争取更大的胜利。著名侨领陈嘉庚代表兴奋地说：长期以来，华侨就期望祖国能够实行民主宪政，今日在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下已可实现了。宪法公布实行以后，不但全国人民热烈欢庆，海外千余万华侨亦欢欣鼓舞。

从 16 日到 18 日，代表们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和刘少奇的报告，上午分组讨论，下午大会发言。共有 89 人作大会发言。与修改宪法不同的是，代表们更关心的是怎样贯彻宪法。

四川代表吴玉章说：在宪法通过以后，应该展开广泛的、深入的、全民性的宣传教育。这是贯彻实施宪法的重要条件。在全国范围内进行宪法的宣传教育应当作为长时期的具有根本性质的政治工作，当做人民群众的爱国主义教育和社会主义教育的一个基本内容。我们的国家机关和各种社会群众组织以及宣传教育组织，都应当把宪法的宣传教育当做自己的重要职责，采取各种有效方式和利用各种适当条件，在广大城乡人民群众中进行经常的宣传教育工作，使宪法的精神家喻户晓、深入人心，成为社会生活中每个人的行动规范，而把我们的国家管理工作和建设工作推向前进。学习宪法是全国人民大家的事情。全国人民都应当了解宪法的内容和宪法同自己的切身关系，按照宪法行使自己的权力，实现应享的权利，执行应尽的义务，提高社会主义觉悟和国家主人翁的品格，发挥政治积极性和劳动积极性。我们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作为人民派到各级国家权力机关来的使者，应当首先深入地学习宪法，以身作则，成为宣传宪法和遵守宪法的模范。一切国家机关工作人员都是人民的勤务员，必须认真学习宪法，加强法治观念，按照宪法办事，效忠人民民主制度，服从宪法和法律，努力为人民服务。青年一代是我们国家的未来，宪法教育对于青年有着重大的意义。要使广大青年了解宪法，热爱祖国，积极准备成为国家的社会主义事业的忠实建设者和保卫者。因此，我认为，在中等学校和高等学校中，应当适当地采用苏联宪法教育的经验，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或包括宪法内容的课程列为共同必修的政治课程，以便进行系统的教育。

四川代表张澜说：为了彻底实施这个宪法，必须要全国人民

共同努力。首先，应当在全国范围内普遍展开关于宪法的宣传、学习，务求做到家喻户晓。宪法是国家根本大法，从中央到地方，从政府到人民，都要切实遵行，共同信守。我们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全体代表，都亲自参加了这个庄严的制宪会议，更应当以身作则，严格遵守宪法，并担负起监督宪法实施的重大责任。以中国共产党为领导的各民主阶级、各民主党派和各人民团体，都要共同负责，以保证宪法的彻底实施。

浙江代表包达三说：我觉得我们对于宪法的实施与贯彻中，尚有一个问题要我们很好地来注意。这就是我们中国人，受过去的反动独裁统治和社会制度不合理的影响，缺乏一种守法的观念。例如，目前在有些私营工商业者中发生的违法现象，以及在若干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中发生的违法乱纪等现象，都是缺乏守法观念的表现。如果说宪法的实施是意味着我国法治的开始，那么我以为尤其重要的是一般人民，特别是私营工商业者必须养成守法习惯，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也必须在守法精神方面起模范作用。

仅从字面上看，这些意见颇有点作官样文章的味道，但若联系以后的历史看，则他们不但讲得很中肯，而且很有些警示作用和预见性。在我们国家所经历的曲折当中，极重要的一个教训就是法的观念不强，守法与犯法的界限在人们心目中很模糊。更具有悲剧色彩的是，在本次会议上作关于宪法草案报告的刘少奇在十年动乱中，用宪法维护自己正当权利的呼声竟被揪斗的喧嚣淹没殆尽。

代表们在发言中还结合宪法对政府工作存在的问题进行了批评。

广西代表李济深说：在过去几年中，我们在各方面已经取得了惊人的成就，这是谁也不能抹煞的事实。但工作中也不是没有缺点和错误的。例如，在国家机关中有些工作人员脱离群众，违

法乱纪，有损政府的威信。又如，在建设事业中，也有因为不经过详细的调查研究，没有周密的计划或者好大喜功、盲目冒进以致造成国家的损失，这些缺点和错误，哪怕是较小的、个别的，今后也必须坚决改正。

安徽代表陈荫南说：现在，在我们的国家里，如果就国家制度来说，就整个领导来说，我们可以毫无愧色地说我们完全是民主的了。但并不是说我们每个组织，每个工作干部的作风，所有的部门，都具有这种民主精神。我们还有一些基层干部存在强迫命令的作风，他们对完成任务的责任心是好的，但忘记了对上负责和对群众负责的一致性。当然，这种情况的产生，不应过多地责备基层干部，因为下面的强迫命令往往来自上面的官僚主义，甚至来自中央一些部门的官僚主义。比如前一时期要“人畜分居”，要“创造无蚊区”，他们的出发点是好的，可是在现有的农村条件下，这种希望是脱离实际的，是主观的。这样的任务要基层干部去办，怎能不发生命令主义呢？又如有些地区在组织互助合作时，一下说冒进了，一下又说自流，莫衷一是，因此，不仅群众有意见，就是下面干部也是有意见的。可见基层干部思想作风上的毛病，往往不单是他们本身的缺点，如果领导干部都能从实际出发，了解下情，领导得及时，交代得具体，给下级干部树立一个良好的榜样，许多毛病是可以避免或者减少的。

西藏代表达赖喇嘛的发言回顾了西藏和平解放以来的民族关系，他说：自从1951年签订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中央代表、进藏人民解放军及工作干部先后到达西藏以后，执行了中央的民族团结政策，遵守和执行了和平解放西藏办法协议17条，这些正确的政策和其他各项措施，都是可以清楚地看得到的。与此同时，由于三年多以来，先后从西藏地方派出了几次参观团、致敬团来到祖国内地，他们回到西藏以后，将所了解的祖国内地的情况，作了宣传解释，因而逐步解除了西藏人民的疑虑。中国

各兄弟民族，特别是汉藏民族正在日益走向亲密团结之中。班禅额尔德尼能回返西藏和我相会，也进一步加强了西藏内部的团结。根据毛主席的各民族间与各民族内部应该团结的政策，在西藏业已出现了新的和平友爱的气象。

达赖特别指出：关于宗教方面，在敌人的各种挑拨离间中，主要的一项，就是造谣共产党、人民政府毁灭宗教。西藏人民具有很浓厚的宗教信仰，这些谣言，曾经使他们疑虑不安，但是现在“共产党、人民政府毁灭宗教”的挑拨离间的谣言，已经全部破产了，西藏人民已经切身地体会到了他们在宗教信仰上是有自由的。

9月20日，大会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正式表决。

这一天到会代表1197人。浅红色的表决票上，印有汉、蒙、藏、维吾尔四种文字，代表席按照座位划分为八个投票区，每区设置一个投票箱。下午4时45分投票开始，代表分区同时进行，4时55分投票完毕。计算结果：发票1197张，投票1197张，同意票1197张。执行主席周恩来根据表决结果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于1954年9月20日通过。”全场起立。作家周立波回忆：“暴风雨似的掌声延续了5分钟。”

9月21日，大会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组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组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组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检察院组织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委员会组织法》。

9月23日，周恩来代表中央政府向大会作了《政府工作报告》。《报告》全面总结了五年来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外交等方面的巨大成就和存在的问题，提出了今后的任务。他强调，要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工业国家，

这是一个伟大而艰巨的任务。我们必须用全力去实现宪法所规定的过渡时期的总任务。周恩来说，如果我们不建设起强大的现代化的工业、现代化的农业、现代化的交通运输业和现代化的国防，我们就不能摆脱落后和贫困，我们的革命就不能达到目的。

这句话被认为是对四个现代化最早的表述。

会议经过4天的热烈讨论，先后有75位代表在大会上发言，他们一致同意周恩来的报告，有些对报告作了补充说明，列举出许多事实证实报告所指出的各项工作成就；有些对政府工作报告发表了自己的意见，提出了许多有益的建议。9月26日，会议一致通过了《关于政府工作报告的决议》，对中央人民政府在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主席的领导下五年来的努力和取得的巨大成就表示满意。

9月27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进入第四项议程，选举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副主席及国家机关的其他领导工作人员。

会议在下午3时开始，出席代表1210人。

执行主席刘少奇宣布根据33个代表小组的109名代表的联合提名，毛泽东和朱德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副主席候选人的时候，全场响起了热烈的掌声。

“有没有别的提名？”刘少奇征询代表们的意见。全场没有一点声音。停了一阵，刘少奇又问：“有没有别的提名？”全体代表用暴风雨般的掌声表示欢迎这个提名。刘少奇郑重宣布选举注意事项：自己可以选自己；如不同意选票上提名的人，可以另外选自己认为恰当的人。

投票从3时40分开始，到3时50分结束。

接着，会议开始选举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长、副委员长、秘书长和委员。选举之前，会议一致通过主席团的提议：经协商拟定副委员长的名额和委员的名额为副委员长

13人，委员65人。

4时45分，投票开始。4时53分，投票完毕。

5时37分，执行主席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和副主席的选举结果：

毛泽东由全体会议一致选举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朱德由全体会议一致选举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

顿时，像风暴卷过了会场，全场响起了热烈的掌声，欢呼声震动殿宇。一位部队代表用送话器欢呼着毛主席万岁，新疆维吾尔族代表挥舞着他们的帽子鼓掌，重庆市一位21岁的女代表陈树兰，因为个子小，跳到椅子上去欢呼去鼓掌。

接着，执行主席宣布：毛泽东主席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规定，提名周恩来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请大会决定。经主席团决定，为了节省时间，将选举最高人民法院院长、选举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的两张选举票和通过国务院总理人选的表决票共三张同时投票。投票至6时25分完毕。

晚上10时，大会经暂时休会后复会。执行主席宣布其他各项选举结果：

刘少奇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宋庆龄、林伯渠、李济深、张澜、罗荣桓、沈钧儒、郭沫若、黄炎培、彭真、李维汉、陈叔通、达赖喇嘛·丹增嘉措、赛福鼎13人为副委员长；彭真为秘书长；王昆仑等65人为委员。

董必武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院长。

张鼎丞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的提名，决定周恩来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

第二天，《人民日报》发表署名文章，以《六亿人民，一个心愿》为题目，描述了在会场上代表们“选毛主席当咱们的引路

人”的心情和毛泽东当选以后当天晚上全国各地万众欢腾的情景。文章称这次选举“又一次地实现了全国人民的嘱托，完善地表现了六亿人民的心愿”。

9月28日，根据国务院总理周恩来的提名，大会通过了国务院组成人选的决定，陈云、林彪、彭德怀、邓小平、邓子恢、贺龙、陈毅、乌兰夫、李富春、李先念10人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副总理。习仲勋为国务院秘书长。国务院共有30个部和5个委员会。谢觉哉为内务部部长，周恩来为外交部部长，彭德怀为国防部部长，罗瑞卿为公安部部长，史良为司法部部长，钱瑛为监察部部长，李富春为国家计划委员会主任，薄一波为国家建设委员会主任，李先念为财政部部长，章乃器为粮食部部长，曾山为商业部部长，叶季壮为外贸部部长，王鹤寿为重工业部部长，黄敬为第一机械工业部部长，赵尔陆为第二机械工业部部长，陈郁为燃料工业部部长，李四光为地质部部长，刘秀峰为建筑工程部部长，蒋光鼐为纺织工业部部长，贾拓夫为轻工业部部长，沙千里为地方工业部部长，滕代远为铁道部部长，章伯钧为交通部部长，朱学范为邮电部部长，廖鲁言为农业部部长，梁希为林业部部长，傅作义为水利部部长，马文瑞为劳动部部长，沈雁冰为文化部部长，杨秀峰为高教部部长，张奚若为教育部部长，李德全为卫生部部长，贺龙为体育运动委员会主任，乌兰夫为民族事务委员会主任，何香凝为华侨事务委员会主任。

根据毛泽东提名，大会通过了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和委员人选的决定，朱德、彭德怀、林彪、刘伯承、贺龙、陈毅、邓小平、罗荣桓、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程潜、张治中、傅作义、龙云15人为国防委员会副主席；于学忠等81人为国防委员会委员。

下午3时50分，毛泽东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已经顺利地完成了自己的任务。本届会

议的全部议程已经进行完毕。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圆满结束。

在这次会议上，达赖喇嘛当选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班禅当选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三个月以后，又当选为第二届全国政协副主席。这是有史以来藏族代表在中央政府担任的最高职务。

第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的召开，结束了由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体会议代行人民代表大会职权，以《共同纲领》代替国家根本大法的过渡状态；会议确定了我国根本的政治制度——人民代表大会制，是建国以来人民民主建设的重大发展，是我国政治生活进一步民主化的标志，会议通过宪法形式肯定了我国从新民主主义转变到社会主义的基本途径，开创了我国人民革命和建设事业的新里程。

这几条是就国家的根本政治制度的变化而言的。

而从国家体制看也有根本性的变化。突出表现在中央人民政府由原来的两级体制变为一级体制。在《共同纲领》时期，即从1949年10月至1954年9月，中央人民政府由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及其所属的政务院、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署两级组成。政务院等都要向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负责并报告工作，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休会期间，向中央人民政府主席负责并报告工作。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实施以后，国务院“即中央人民政府”，它只对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负责并报告工作，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对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负责并报告工作，这就是《宪法》所说的国务院“是最高权力机关的执行机关”。

（刘国新著《大业雄图——1954年的中国》）

迎来农业社会主义改造 高潮：七届六中全会

七届六中全会以批判“小脚女人”和迎来农业社会主义改造高潮而载入史册。毛泽东在会上说：中央农村工业部的一部分同志，首先是邓子恢同志犯错误。他这一次所犯的错误，性质属于右倾的错误，属于经验主义性质的错误。25年后的1981年3月9日，中共中央办公厅转发通知指出：1955年夏季党内在农业合作化问题上的争论，“邓子恢同志的意见是对的，当时对他的这种批判，曾导致以后合作化运动高级化和人民公社化等急躁冒进的错误”。

众所周知，七届六中全会是以批判“小脚女人”、加速农业合作化而载入史册的。问题是这场反“右倾”运动在当时何以能发动起来？直到今天，仍然是值得总结的。

会议的背景和简况

问题是由对1955年春季农村紧张形势原因的不同判断引起的。

邓子恢认为，农村关系紧张，固然是有农民小生产者对社会主义改造相抵触的一面，但主要是工作上的行政命令作风，违背了自愿互利政策。而这又是因为1954年冬季，农村基层任务过

重，农业合作化、粮食统购统销、对私改造，三管齐下。所以他指出，这三项任务都是造成紧张的带根本性的因素。而其中最根本的是合作化，因为，合作化是要根本改变个体农民的土地私有制。据此，他提出农业合作化的方针是：必须搞好，必须慎重，必须稳步前进。

毛泽东认为：春天农村关系紧张，主要是富农、富裕中农对社会主义改造反抗的表现。亦即农村两条道路斗争的尖锐表现。因此，他主张，在粮食征购数上可减少一点，作点让步，但合作化不应放慢速度，而应采取积极发展的方针。应当利用广大农民由于土地不足，生活贫苦或者生产还不富裕的状况而希望变革的心态，从速引导他们向社会主义过渡。这样才能使农业的发展适应工业的需要。

邓子恢则认为，整个合作化运动应与工业化速度相适应，第一个五年计划工业化还是打基础时期，农业技术改造的速度可能很慢，合作社还是手工劳动为主。在这样的情况下，要使农业生产有比较显著的发展，超过一般富裕中农水平，就必须认真把经营管理搞好。而要做到这些，在办社的初期阶段，各种条件很差的情况下，过多过猛的发展，是不适当的。他主张合作化运动，应由点到面，积极而稳步地分批分期展开。这样做，当前看似乎缓慢一些，但从整个来看，会是更快一些和更好一些。

毛泽东坚持认为，只有他的主张才是有利于向社会主义发展，因而也是符合广大农民利益的；而邓子恢的主张则是有利于资本主义，因而是不符合广大农民利益的。他在1955年7月31日作的《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中，把这种不同意见上纲为“两条路线的分歧”。

尽管毛泽东7月31日的报告事实上已成为党中央的主导意见，但终究还只是个人意见。为了把全党的思想统一到这个报告上来，有必要召集一次中央全会并作出相应的决议。

1955年9月5日，毛泽东致函周恩来、陈伯达、邓小平，“请小平商少奇同志”，对他起草的中央关于召开七届六中全会的通知“加以斟酌修改，印发各政治局委员，立即召开一次政治局会议讨论通过”，用电报发各省市和地委。7月，中共中央发出通知，明确会议议程两项：（甲）讨论和通过关于农业合作化的决议；（乙）讨论和通过关于召开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和代表选举工作的决议。通知还明确六中全会是一次扩大会议。列席会议的同志，有发言权，无表决权。并要求参加的同志立即开始准备发言稿。

六中全会（扩大）于10月4日至11日举行。出席会议的有中央委员38人和候补委员25人。上海局书记，北京、天津、上海市委书记，各省、自治区和地委书记，及中央有关部门负责人388人列席会议。会议第一日，在毛泽东主席宣布开会以后，由中央委员陈伯达代表中央政治局作《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决议草案的说明》，由中央政治局委员邓小平代表中央政治局作《关于召开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决议草案的说明》。在全体会议上发言的有80人，167人作了书面发言。10月11日，全会通过《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决议》。同日，毛泽东在会上作了题为《农业合作化的一场大辩论和当前的阶级斗争》的结论性讲话。

会上的重要发言

刘少奇强调指出：社会主义革命，是比民主革命更加广泛更加深刻得多的革命。

他说，毛泽东同志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是从规定党的总路线以来，为进一步地贯彻实现总路线而斗争的一个极关重要的历史文件。

他指出，我们正处在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斗争中，这个革命，就它的广度和深度来说，是比民主革命更加广泛更加深刻得多的革命。民主革命曾经是一场长期激烈的武装斗争。社会主义革命则要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改造农业、手工业及其他个体经济为集体经济，消灭富农阶级，并消灭产生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经济基础。这是一个要永远消灭剥削和剥削阶级的革命。虽然这个革命在我国是通过“和平道路”去进行的，但它终究是一场激烈的深刻的阶级斗争。我们正处在这场斗争中间。城市中的社会主义群众运动的高潮，早已到来，农村中全国性的社会主义群众运动的高潮即将到来，但是我们有許多同志对于社会主义革命的精神准备却还是不够的，因此，他们在领导这个革命的斗争中就表现了信心不高，决心不够，劲头不足。另有一些同志则在斗争中表现了不可容许的犹豫和动摇，甚至被群众运动吓昏了头脑，从而阻碍群众运动的发展，这在目前的农业合作化运动中是表现得特别明显的。

他强调指出，我们从这里应当得到一种严重的教训：共产党员要善于分别社会上各种人的意见，在听到各种叫喊的时候，要注意是什么人在叫，是代表什么人在叫。如果是地主、资产阶级分子在叫，有余粮的人在叫，企图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人在叫，我们听到这种叫喊，就要小心，不但不应当跟着叫，并且要在研究之后加以揭发，像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最近在粮食问题和农村问题上所作的揭发一样。如果我们能够认真吸取这一次的教训，那就更要增强我们抵抗各种谣风和错误意见的力量，保证以后不再发生这种动摇。

周恩来着重阐明了怎样过社会主义关的问题。他说：从农村中正在走向改革高潮联系到全国正在经历着社会主义革命阶段，我想讲一讲怎样过社会主义这一关的问题。

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为标志，我国革命已由前一阶段的

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转到目前阶段的社会主义革命。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早就提醒我们，要准备过社会主义这一关。我们过革命战争的关，过土地改革的关，都过得很好；现在，我们过社会主义这一关，也必须而且应当过得很好。

不能认为我们全体共产党员对于过社会主义这一关都已经有了充分的精神上的准备。有一些同志原来是抱着赞成我党的民主革命纲领的态度来参加党的，一到同党走完民主革命这段路，他们便不愿意继续前进了。有一些同志平日熟悉的只是民主革命的纲领，全国解放以来没有来得及或者没有注意去熟悉社会主义革命的纲领，因而便迷失了方向，丧失了对新鲜事物的感觉，表现出政治上和思想上的某些动摇。有一些同志虽然接受了社会主义革命的纲领，但是由于骄傲自满，自以为是，对于中央的方针和路线存在着不正确的认识，对于广大劳动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估计不足，对于社会主义革命发展的客观过程也缺乏认真的研究，因此他们就在这样或那样的工作上发生抵触情绪，并在革命高潮面前惊慌失措起来。同时，还有一些人，由于受到资产阶级思想的严重腐蚀，变成资产阶级个人主义、资产阶级阴谋手段和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的俘虏，直接走上了政治上堕落和背叛社会主义革命的道路。这种种情形，应当引起全党，首先是高级领导同志的严重注意。

在这个阶段，我们党同资产阶级的关系是集中在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上。我们要实行社会主义工业化，而资产阶级却要求放慢社会主义工业化的步骤，企图多多保存和发展资本主义企业。我们要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利用、限制和改造，而资产阶级却要无条件利用，反对限制和抵抗改造。我们要对农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而资产阶级却采取各种方式通过地主分子和富农，影响富裕中农，企图破坏或推迟这种改造。

由此可见，在社会主义革命阶段，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

盾已经成为主要矛盾。党内曾经出现过城市依靠商人亦即依靠资产阶级、农村容许四大自由亦即容许自由剥削的资产阶级论调，这是多么严重的错误！同时，也可看出，在我们同资产阶级又联合又斗争并且要经过联合它来达到消灭它的非常复杂的情况下，全党同志是多么需要站稳工人阶级立场，学习毛泽东同志的著作，提高马列和毛泽东思想的理论水平，并从实践中磨练自己，来很好地过社会主义这一关！

要使所有共产党员站稳工人阶级的立场，并且经过他们逐步教育广大劳动人民，过好社会主义这一关，首先就需要在共产党员中，大张旗鼓地并且极其广泛深入地宣传党的社会主义革命的纲领，也就是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我们相信，只要我们在全党能够很好地进行社会主义教育，绝大多数的共产党员是会愿意过好社会主义这一关的。

但是，要过好这一关，单靠有这个理论还不行，需要在实践中考验。在社会主义革命的实践中，最带根本性的问题，是同资产阶级进行两条路线的斗争。由于我们党现在处于当权地位，对资产阶级是采取经过联合达到消灭的政策，同时在社会上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还像汪洋大海一样包围着我们，而我们党内出身于小生产者阶层的党员还占很大的比重，他们又同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保持有广泛的联系，这样，资产阶级思想便不会不经过他们传播到党内来，以动摇、阻碍甚至破坏我们对于社会主义革命的进行。这种斗争是极其尖锐的，也是逃避不了的。……资产阶级对我们党内的影响是会不断发生的，我们必须有准备地在长期的实践中来肃清它。

由此可以得出结论，过社会主义这一关，确实是很不容易的；但是，如果全党有了精神准备，全党保持团结和统一，加强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并且在实践中学会了如何战胜资产阶级和它的影响，绝大多数的共产党员是能够过好这一关的。只有那些

混入党内的阶级异己分子和那些不堪造就的蜕化分子才会被历史前进的列车所抛弃。

朱德发言强调要贯彻决议，迎接高潮。他说，毛主席的报告和这次会议通过的关于农业合作化的决议，是过渡时期农村社会主义革命的纲领。希望同志们很好地学习毛主席的报告和决议及有关文件，并在实际工作中正确加以贯彻。如何贯彻农业合作化的决议呢？……各级党委书记，必须牢牢地站稳自己的工作岗位，劲头十足地亲自领导和研究这一工作，切切实实地把自己变成内行。必须学会在不同问题上贯彻自愿、互利原则；在不同季节、不同作业上加强生产的经营和管理。总之，要具体，不要空洞，不要浮夸。

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过程中，我们要预见到农业合作化高潮到来以后，农村中将必然出现许多新的情况。对于这些新的情况，我们应该及早研究准备，采取有效的措施紧紧地跟上。……由于农业合作化的发展，乡政权任务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乡政权的组织领导和文教、财政工作，都将引起重大的改变。乡政权的组织形式应当适应农业合作化的要求，领导作风应该更加深入细致。基层干部应该具备农业科学的知识，农民群众对于文化教育，卫生福利等要求增加，乡政权应逐步建立和筹划。凡此种种，都需要及早进行研究，预先准备。总之，各级党委，各级国家管理机关和各有关部门，都应该研究和改进自己的工作，使自己的工作适应这种新的情况，从各方面来支援和保证农业合作化的发展。

陈云说，农业的发展要适应工业化的需要，要适应国家计划经济的需要。

他指出：工业和农业是国民经济的两个主要部门。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投资重点是重工业，这是完全正确和必要的。但是农业生产不但供应全国人民的食粮，而且工业设备和建设器材所

需要的外汇，绝大部分是以农产品出口换来的，用农产品作原料的工业产品占目前国家工业产值的50%以上。农村经济发展了，也就更加扩大了我国工业品的市场。因此，我国在发展工业的同时，必须发展农业，必须用多种方法来增加农业的产量，使农业能够适应，或者至少不落后于工业的发展。

他说，增加我国农业产量的方法是很多的。例如，我们可以开垦荒地，兴修水利等等，但是大规模的开荒，像开垦4亿亩荒田，还不是最近几年所能办到。第一个五年计划中，我们正在尽可能开垦荒地，但是能够垦出不到1亿亩，兴修水利，无论是大型的或者小型的，都是需要的，而且我们将尽力推行。但是短期内，也不可能大量增加灌溉面积。就目前的需要和可能来说，增加农业产量的主要办法，无疑是实现农业生产的合作化，只要把分散的小农经营组成几十户或更多户的联合经营，就能使个体农民难于单独进行的种种措施得以实现。如果农业生产合作社在建设的第一二年内，没有拖拉机，仍旧使用畜力和现有农具，一般可以增产20%的话，那末，单单这一项，在全国农民组成了农业生产合作社以后，就可以增产粮食6~7百亿斤。在目前，这是一种投资最少，收效最大、收效最快的增加农业产量的办法。也只有把小农的经营组成为农业生产合作社，才有可能在具备了客观条件以后，使我国农业由使用畜力农具的小规模的经营跃进到使用机器的大规模的经营。

他还指出：把农民组织到农业生产合作社里面，这不但是目前增加我国农业产量的主要办法，而且是我国实现社会主义改造的一个主要方面。我们知道，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和全体农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是党在过渡时期在变革生产关系方面的两项根本任务。在这两项任务中，由于农民的数量特别大，改造农民的任务尤其繁重。只有在农村社会主义化了之后，我们才可以说，社会主义确实战胜了资本主义。

邓小平着重阐明了工农联盟问题，他说：因为对合作社问题抱着右倾观点的同志的重要论据之一是怕破坏工农联盟，究竟农业合作化是有害于工农联盟呢？还是有利于工农联盟？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工农联盟的基本条件是工人阶级的领导。工人阶级领导下的工农联盟的目的在中国革命第一阶段是为了反封建革命的彻底胜利，在现阶段就是为了建设社会主义。既然我们所要的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建设社会主义为目的的工农联盟，那么为了巩固工农联盟，我们的党就应当明确提出合作化的道路是农民继续摆脱贫困走向富裕生活的唯一道路，并且用事实来向农民证明这条道路的正确性；就应明确依靠贫农的方针，热情地支持广大贫农和下中农的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积极性，在合作社中树立贫农的优势，就应当不断地用说服的方法，并通过事实来克服中农特别是富裕中农的动摇性，同时采取各种经济措施（例如实行统购统销、办供销合作社、办信用合作社等）来割断他们同城乡资本主义经济的联系，扩大社会主义阵地，缩小资本主义阵地，这样来达到团结中农一起走到社会主义的目的。毫无疑问，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有真正巩固的工农联盟。反之，如果我们迁就富裕中农，抹杀贫农和下中农的利益，那就是既损伤了贫农和下中农群众的积极性，也不能使还在动摇的中农坚定起来。巩固地联合中农当然是工农联盟的一个基本内容，但是，如果采取右倾机会主义的方针，结果不但贫农会对我们失望，而最后连中农也会离开我们，因为按照这种方针，结果只能是农村资本主义自发势力的自由发展，而发展资本主义只是有利于极少数的富农，对中农群众甚至对大多数富裕中农都是不利的。由此可见，如果执行这个错误方针，结果决不会是什么工农联盟的巩固，而只能是彻头彻尾地破坏了工农联盟。

彭真强调，农业合作化是一场革命的群众运动，不可能按照

画好的格子沿着一条直线前进。他说：目前，在农村中，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道路的斗争是很尖锐的，阶级关系是紧张的。在过渡时期中，在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前，农村中的经济关系和政治关系将总是相当紧张的，虽然紧张的程度有时不同。我们对于这种形势加以分析和估计是有好处的，免得临时因为缺乏精神准备和工作准备，惊慌失措。

他认为，如果只是富农和少数富裕中农叫嚣，那还不要紧，严重的是一般中农因为是私有者，有个人发财的幻想，有时很容易受富农、富裕中农的影响。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农村中有一部分党员，在土地改革以前是贫农，现在“发了财”了，他们中间有些人有时也叫喊得很凶，他们的叫喊最容易影响我们，往往使空气显得特别紧张，使问题表现得特别严重和复杂。我们必须估计到，现在抵抗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逆流不但有它的社会基础，而且在党内有它的支持者……。因此，就在党内形成一种相当紧张的关系，也就是说在党内发生了两条道路的斗争。农业合作化运动，是一个最后彻底消灭农村中生产资料的私有制，消灭富农阶级的斗争，是五万万农民群众的一个翻天覆地的社会改造运动，是使城市资产阶级彻底地孤立起来，造成一种使他们非接受社会主义改造不可的形势，因而可以彻底地消灭一切城市资本主义痕迹的社会主义革命运动。毛泽东同志很早就已经提出，“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而是劳动群众大手大脚的激烈的斗争。这样一个由五万万农民所进行的震撼全世界的群众运动，绝不可能像有些人所幻想的那样，会在一切方面都按照画好的格子沿着一条直线前进，它必然还会发生一些“左”的或右的偏差和大大小小的乱子。……我们必须遵从着中央、毛泽东同志所屡次给我们的指示。在战略上坚决地勇敢地毫不迟疑地前进，藐视一切敌人的反抗和工作中的困难，在实际解决各种具体问题的时候，必须小心翼翼地分析具体情况，谨慎从

事，决不可粗心大意。只要这样，我们就可以少犯错误，少出乱子；犯了错误，出了乱子，也可以及时克服，保证运动完全健康地发展。

毛泽东结论说：我们的目的就是要资本主义绝种，小生产也绝种。

他说，我们这次会议，是一场很大的辩论。这是在由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过渡期间，关于我们党的总路线是不是完全正确这样一个问题的大辩论。

他强调指出，农业合作化使我们在无产阶级社会主义的基础上，而不是在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基础上，巩固了工农联盟。这就会使资产阶级最后的孤立起来，便于最后地消灭资本主义。在这种事情上，我们是很没有良心哩！马克思主义是有那么凶呢，良心是不多哩，就是要使帝国主义绝种，封建主义绝种，资本主义绝种，小生产也绝种。……使资产阶级、资本主义在6亿人口的中国绝种，这是一个很好的事，很有意义的好事。我们的目的就是要使资本主义绝种，要使它在地球上绝种，变成历史的东西。

他还说，中央农村工作部的一部分同志，首先是邓子恢同志犯错误。他这一次所犯的错误，性质属于右倾的错误，属于经验主义的性质错误。同时指出，邓子恢同志作了自我批评，……只要虚心，愿意接受同志们的帮助，我们相信他的错误是能够改正的。

农村工作部的检讨

邓子恢在会上发言，从五个方面作了检讨：

(1) 中央农村工作部在我主持之下曾于1953年及1955年春间先后犯了两次原则性的错误。1953年春第一次农村工作会议

曾经把农村工作中的“五多”问题和反对互助合作运动中错误的“贪多贪大”、“急燥冒进”的问题混在一起，对于合作社发展计划未作布置，片面强调“从小农经济现状出发”“稳步前进”，结果变成“宁缓勿急”，“稳步不前”，从而形成合作化运动在一个时期内的自流倾向，并引起某些地区解散合作社的混乱现象……。到了今春，当整个合作化运动已取得巨大发展，局部地区出现了高潮，全国高潮即将到来的时候，本来应该采取一个积极发展的方针以推动这个高潮，但我对合作化运动发展却采取了相反的、消极的、错误的指导方针。在新区有条件大发展，我却主张小发展，主张先慢后快，主张严格控制；在老区还可以再发展（特别是空白乡村和发展不够的地区），我却主张停一年以后再说。合作化发展较多的省份虽然当时发生一些问题，但只要加强领导，端正政策，作好工作，绝大部分是可以巩固的。我却主张“适当收缩”，这种错误方针是同中央方针完全相反的，是违背中央路线的，是脱离群众的，特别是在收缩方针的影响下有些地方发生了强迫群众退社，强迫群众解散合作社的严重情况，大大挫折了干部和贫农、下中农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积极性，助长了农村资本主义分子的嚣张气焰。这种类似革命时期解散人民游击队的令人痛心的极其错误的行为，应该完全由我负责。这种错误方针幸得中央及时纠正，所以在实际工作已发生的不良影响，这也应该由我完全负责任。

(2) 为什么会提出这种错误方针呢？主要是由于我在思想上的右倾，这种右倾思想，首先是对于广大农民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积极性估计不足，……当时反映到我思想上的正是占人口 20%~30% 的富裕中农对社会主义改造的动摇抵触情绪……。其次是对党在农村中的领导作用估计不足。……这就是我的右倾思想的另一表现。正是由于上述的错误估计，当然对于即将到来的农村中的全国性社会主义革命大高潮就不可能作出正确的估计，也不

敢去估计。

(3) 此次错误除上述右倾思想之外，还由于我长期存在下述两个机械论点：首先是不适当地简单地过分地强调土改可以较大胆迅速，而合作化则必须谨慎小心，必须慢慢来。因而始终不敢提放手发动群众的口号，固然社会主义革命是要触动一切私有制，不仅要逐步消灭富农，而且要改造一切农民私有制，从而是它的震动面比之土改要大一些，因此谨慎小心是需要的……但应该估计到，我们目前的农业合作社，还是半社会主义的过渡形式，土地仍然可以分取报酬，而又坚持互利自愿原则，我们只是打击富农而不是中农……，而且在土改中我们已经充分发动了农民群众，打下了群众基础，土改后又有了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政权，有了城市工业和国家财政支援，这就给合作社增加了有利条件。这些有利条件过去我们也是估计不足的。从而不适当的过分强调了“合作化运动要比土改难”，“比土改慢”，而不敢放手发动群众，这是第一个错误的机械论点。其次是过分强调“发展容易巩固难”，“建设容易办社难”，这也是不对的。……我是在困难面前退缩，而不是鼓起勇气去克服困难。这也是第二个错误机械论点。

(4) 为什么我会产生这种右倾思想，长期的存在而不能改变？今天认真检查起来，应该指出它的根源正是一部分富裕中农对社会主义改造的动摇抵触情绪在我思想上的反映。……因此，我的错误思想，其本质是资本主义思想隐藏在脑子里作怪，模糊了社会主义思想，克服不了资本主义思想。这就是我对广大贫农和下中农的社会主义积极性熟视无睹不去爱护它，而却与此相反，敢于挫折它，从内心去对他们“泼冷水”的根本原因，这也是富裕中农的动摇抵触情绪，很容易影响我的决心，而不敢去克服它的根本原因。这种资本主义思想不清除，我的错误是无法加以根绝的。

(5) 我此次错误之所以形成，还由于犯了组织纪律的错误。某些重大问题，如浙江省合作社收缩的方针，未请示中央，即擅自对该省农村工作部发出电报。今年5月初，主席初步发现我的错误即提出警告，要我不要犯1953年的错误，再来一次检讨，当时我对这个警告并未引起警惕。6月间中央政治局否定了农村工作部代中央起草的关于合作化运动的指示，我思想上仍然有抵触，7月中间，主席召集我们几个人作了严正的批评，我也未完全想通。我总以为我只是在合作社发展速度问题上同中央存在不同意见，而未认识到这是方针路线的不同。直到7月31日看了主席《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指示，才开始转变过来。这说明我对中央意见是采取了十分不尊重的无组织无纪律的错误态度，也说明我在组织上何等严重的何等危险的分散主义错误。

农村工作部秘书长杜润生也在会上作了检讨。他说：从骨子里看，还是从1953年残存下来的安于小农经济现状的思想作祟。这种思想，实际上是反映着具有资本主义自发倾向的富裕中农对小私有制暂时性的满足情绪和对社会主义的抵触。……1954年冬天，有些省发展合作社的速度比一般地区稍快，我就无根据地认为那里定有比较严重的强迫命令，和违反了群众自愿原则的情形，就主张“停止发展”或“坚决收缩”。

由于误认为发展很快的地方即将出现损失，所以就有勇气去坚决收缩。结果是在本无损失的情况下，无故制造了重大的损失。像浙江所发生的收缩了15000个合作社所引起的那种大损失，我是应当负很大责任的。因为虽然在事先，中央农村工作部对省委农村工作部作过收缩合作社的建议，但是我亲自去宣传了“坚决收缩”的错误方针，我为了说明坚决收缩的必要性，曾宣传了许多错误的道理，像“合作社发展太快是造成农村紧张的重要因素之一”，“不下马恐怕有一批社要减产，影响工农联盟”等等。我当时的工作态度，完全是靠自己的错误成见去考虑问题，

而不是从当地客观实际情况出发考虑问题。我受部委托到河北省商量停止发展的方针，也有类似的情形，也同样负有应有的责任。

10月25日，杜润生又再次向中央报告，进行检讨。主要内容是：一、一些具体的错误事实；二、我的错误从政治上说，是在新阶级斗争形势激烈变化时期，阶级立场发生了动摇；三、中央农村工作部在1953年和1955年两次工作错误中间都同时犯有对中央的分散主义错误。这种分散主义错误中我同样是有很大责任的。

历史的评述

七届六中全会，在50年代是以迎来了农村社会主义改造高潮载入史册的。

1955年10月18日，《人民日报》发表的题为《完满地实现党的七届六中全会的决议》的社论中说：“党的七届六中全会经过详尽的讨论，经过深刻的批评和自我批评，使全国各省市和各地委的领导同志充分地认识了中央的方针的正确性，并且对农业合作化的伟大前途充满了信心。”“根据各地农业合作化运动的经验，七届六中全会对农业合作化的许多基本政策和工作方法都作了妥善的决定。完满地执行这些决定，将使党在农村社会主义群众运动的高潮中有保证取得伟大的胜利。”

历史的发展正是如此，七届六中全会不仅是农业合作化运动的一个重要转折点，也是整个社会主义三大改造的一个重要转折点。这次全会推动了农业合作化运动“高潮”的到来，进而推动了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和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高潮”的到来。以至这样的事实，在当时又被用来证明：中国的工业化规模和速度，科学、文化、教育、卫生等项事业的发展的规模和速度，已

经不能完全按照原来所想的那个样子去做了，这些都应适当地扩大和加快。

经过历史的检验，1981年3月9日，中共中央办公厅转发国务院农委党组《关于为邓子恢同志平反问题的请示报告》的通知。指出，1955年夏季党内在农业合作化问题上的争论，“邓子恢同志的意见是对的，当时对他的这种批判，曾导致以后合作化运动高级化和人民公社化等急躁冒进的错误”。“把这些问题当作是挑起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争论，而给予斥责和批判，这实际上是否定了中央原来制定的、体现于两个互助合作决议文件的正确方针，损害了党内民主讨论和实事求是的传统作风，助长了业已存在的‘左’的思潮，给农业生产带来以后长时间的本来可以避免的损失。”“从组织上说，当时邓子恢同志和中央农村工作部所作的工作部署，都是事先向中央请示报告，得到同意后才进行的。在中央作出不同于自己的决定后，邓子恢同志和中央农村工作部从来没有过非组织活动；而且，即在当时提意见的方式，也是符合党规党法的。因此不存在分散主义、闹独立性的错误。”

对邓子恢和中央农村工作部的平反，可以被认为经过实践检验以后，对七届六中全会的历史评估。

问题是当年在农业合作化的速度问题上，何以会形成一种一面倒的局面？应该承认，在50年代上半期，党内的政治生活，总的来说，基本上还是正常的。从会上发言的内容来看，在一些基本问题的认识上又是一致的。如对农民自发倾向，尤其是对富裕中农自发倾向的担忧；把劳动农民个体经营的积极性与资本主义的自发倾向等同起来；把贫富差距的相对扩大与两极分化等同起来。与之相应的是，关于个体农业的出路，当前得以迅速提高农业生产产量的途径，关于过渡时期的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关于新时期工农联盟的基础，社会主义改造是一场革命的群众运动，等等。集中到一点，就是实现农业合作化，是当时解决一切

矛盾的焦点。即只有实现了农业合作化，才有可能实现我国几千来的个体小农经济向集体化大农业的过渡，使农民走上社会主义的幸福大道，获得彻底解放；才有可能使工农联盟在新的基础上获得巩固；才有可能迅速提高农产品的产量，并将其纳入国家计划的轨道，使农业的发展适应工作化的需要；才有可能最后消灭农村的富农阶级，孤立并消灭城市资产阶级；才有可能顺利地实现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总任务。因此，农业合作化是大发展还是小发展，就是走社会主义还是走资本主义这两条道路斗争在党内的反映，即所谓两条道路的问题了。由此可见，根本问题，是一个对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认识问题。诚如邓小平在1984年6月30日同外宾的谈话中指出的：“什么叫社会主义，什么叫马克思主义？我们过去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不是完全清醒的。”这就是问题的症结所在。

(林蕴晖：《中国共产党七届六中全会》)

“向现代科学进军”： 知识分子问题会议

1956年1月中共中央召开知识分子问题会议，周恩来在会上响亮地提出：知识分子“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科学是关系我们的国防、政治和文化各方面的决定性的因素”，我们必须急起直追，“向现代科学进军”。毛泽东讲话时提出要进行技术革命、文化革命，革技术落后的命，革没有文化、愚昧无知的命。

亚非会议结束后，周恩来在以大量精力拓展外交工作新局面的同时，又把目光转向国内。1955年12月5日，他在中共中央召开的有各省市负责人参加的座谈会上说到自己正在考虑三个问题：一是政府的组织形式，二是工资问题，三是知识分子问题。在这三个问题中，他最重视的是知识分子问题。

对中国的知识分子和它在国家建设中的特殊重要性，周恩来是十分了解的。早在建国初的1950年8月，他在中华全国自然科学工作者会议上作《建设与团结》的报告时就指出：为了在满目疮痍的旧中国的破烂摊子上进行建设，“现有的专家不是太多而是不够”，“现在愈接触各种事实，愈使我们感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

1951年8月，他在有各部门负责人和很多知识分子参加的会议上再次指出：现在，“人才缺乏，已成为我们各项建设中的一个最困难的问题”，“只要我们的工作开展了，中国的知识分子

就不是太多，而是太少了”。“这是旧社会遗留给我们的一个困难，也是中国的一个特点。”周恩来十分熟悉和理解知识分子，并且同他们有着广泛的联系和友谊。为了使原来长时期生活在旧社会的知识分子能够尽快地适应新时代的需要，更好地为新中国各项建设事业服务，他在一次报告中诚恳地指出：知识分子“要为新中国服务，为人民服务，思想改造是不可避免的”。“因为我们过去的思想不是受着封建思想的束缚，就是受着帝国主义奴化思想的侵蚀。只要我们有些知识，就要受到这些影响。”“这就需要我们每一个人不断地在思想上求得改造，以适合我们今天新中国的需要，适合于人民的利益。”因此，“进行学习，来改造我们的思想是很值得的”。

听了周恩来这个报告后，北京大学的汤用彤、张景钺、杨晦、张龙翔等12位教授自动发起组成“教师学习会”，并通过马寅初校长请周恩来等来校讲演。周恩来十分高兴地接受了这个邀请。为了使这个学习运动能够扩展到更大的范围去，他向教育部建议：报告会“以北京大学为主，把北京、天津各大学的先生以及同学代表也请来”。教育部根据周恩来的建议，及时地作出部署。

9月29日，周恩来在北京、天津高等学校教师学习会向1700多位教师作了题为《关于知识分子的改造问题》的报告。在报告中，他以亲切感人的态度，阐释了中国共产党对待知识分子的方针政策，并且以自己思想改造的亲身经历，回答了知识分子为什么需要改造和如何进行改造的问题。他说：

我们在学习和工作中，总有一个站在什么立场的问题。我们现在还不能说都已经站在工人阶级的立场上来看待一切问题、处理一切问题了。这不仅是你们诸位，就拿我来说，几十年以前就参加了共产党，是不是进了共产党之后工人阶级立场就那么清楚了呢？也许看书学

习、写文章的时候是那样，但是到实践的时候，是不是办每一件事情都合乎工人阶级的立场呢？认真检查起来，还是差得很远的。工人阶级立场不是从空中掉下来的，也不是自封的，决定的关键是实践，只有实践才能证明是否合乎这样一个立场。

知识分子的改造也要经过锻炼，经过学习，经过实践。知识分子到工厂去，到农村去，就是要学习工人阶级、劳动人民思想和立场。

也许有人会说，我们受过资产阶级教育，恐怕很难改造了。这种悲观的想法是不必要的。我们都是同时代的人，都受过资产阶级教育。有些比我们长一辈的老先生，参加过辛亥革命，甚至参加过戊戌变法，现在还要求进步。所以，我们对思想改造要有信心。只要决心改造自己，不论你是怎么样从旧社会过来的，都可以改造好。

周恩来的报告持续了五个小时。这对亲眼看到新中国欣欣向荣、迫切要求投身到新中国建设事业中去的众多知识分子是一个很大的鼓舞。不少与会者反映：“听了总理的这次报告，对共产主义和中国共产党才有了认识，跟着共产党人前途远大光明。”“周总理是革命前辈，为人民立了大功，是党和国家的领导，尚且如此谦虚，当着我们的面解剖自己，我们还有什么不能向党交心的呢！”有的说：周总理的报告“时间虽长而听者不觉得疲倦”。“周总理以自我批评的精神坦白地说出自己的社会关系，听者莫不感动。以这样的办法来领导知识分子改造思想，在我看来是最有效的。这不仅启发了知识分子学习的要求，而且巩固了学习者的信心，提高了学习者的情绪，推进了思想改造的进程。”当年担任南开大学校务委员会主任委员的杨石先教授，在20多年后所写的一篇文章中还说到，周总理的重要报告“至今仍牢记

在我的心里”。总觉得他“是针对我的思想讲的，他说的是那么真挚，那么中肯啊”！

著名哲学家金岳霖教授在他晚年所写的回忆中说：“前一时期的领导同志当中，对我这一年龄层的知识分子来说，交往最多、对我们影响最大的是周总理。早在1949年，我们就经常在北京饭店看见他，听他讲话。头一个印象就是共产党员也仍然干干净净、整整齐齐，而谈吐又斯斯文文，总的印象是非常之特别，又非常之平常。”他接着讲到关于知识分子改造问题这次报告：“听众好些都是50过头的人，我就是。我从来没有听说过有周总理这样地位高的人在大庭广众中承认自己犯过错误。对我们这些人来说这是了不起的大事。”因此，他就以积极而认真的态度投入思想改造运动。

这以后，现实生活中的两个重要因素更大大增强了周恩来对知识分子问题的重视程度。一个是：从1952年下半年起，周恩来以很大精力投入研究和制定第一个五年计划。一搞五年计划，哪一方面都需要有足够数量和质量的专业人员参加，使他更强烈地感受到中国建设人才的严重缺乏。到1955年底，农业合作化高潮的兴起，预示着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新时期即将到来。这样，各种人才匮乏的问题显得更加突出了！另一个是：1954年和1955年他多次出国，参加重要国际会议和进行访问，在国外亲眼目睹世界范围内科学技术正在突飞猛进地向前发展，给人类的物质生活以及整个社会生活带来巨大变化。这给他留下深刻的印象，使他更深切地意识到掌握现代科学知识的知识分子在我国社会生活中的重要作用。他说：“我们现在所进行的各项建设，正在愈来愈多地需要知识分子的参加。”“知识分子已经成为我们国家的各方面生活中的重要因素。”这是一个很有远见卓识的判断。

正因为如此，知识分子问题，特别是国家建设迫切需要的各

种高级专门人才问题，在他思想上便占着越来越突出的地位。1951年8月11日，他会见将要启程出国的第一批375名赴苏留学生，对他们说：“国家目前很困难，但下决心送你们出去学习，是为了将来回国参加建设。”日内瓦会议期间，他又号召在海外的中国科学家回国参加建设。从1949年8月到1955年11月，由西方国家归来的高级知识分子多达1536人，其中从美国回来的就有1041人。他们中间包括许多著名的科学家和作家，如李四光、华罗庚、钱学森、老舍、吴阶平、汪德昭、邓稼先、吴仲华等。

李四光是新中国地质事业的奠基人，对地质力学理论和中国地质构造的研究做出了卓越贡献。1948年，他作为中央研究院地质研究所所长到伦敦出席第十八届国际地质学会大会后留居国外。新中国成立那一年，周恩来嘱咐郭沫若借出国的机会，带信给李四光，希望他早日归国参加新中国的建设工作。年底，李四光就经意大利秘密回国。1950年5月，李四光终于在冲破重重阻力后回到北京。李四光的夫人许淑彬回忆道：“到了北京，许多新旧朋友都来迎接。有的老朋友告诉仲揆（这是李四光的字——编者注），解放后不久人民政府就曾考虑召开第一次全国地质会议，但周总理指示要等仲揆回国后再开。谁知一直等了5个月还不见仲揆回来。于是有人造谣说：李某人是不会回来的，他去台湾了。周总理听了这话后说：我相信他不会去台湾，现在还没有回来，一定是给什么困难耽误了，我们一定等他回来再开会。仲揆听到总理这样信任他，极为感动，就决定听从党和政府的安排，留在北京工作。”李四光住进北京饭店的第二天，周恩来立刻到住处去看他，一见面就说：“你终于回来了，欢迎，欢迎！祖国需要你呀！”不久，李四光便应周恩来的要求，出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中华自然科学专门学会联合会主席、地质工作计划指导委员会主任委员，领导新中国地质事业的全面发展。

1952年8月，被任命为中央人民政府地质部部长。

钱学森是研究导弹的著名专家，本来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工作。新中国成立后，他决心归国，投身祖国的建设事业。美国政府却以种种蛮横手段强行阻挠。1955年6月，钱学森通过外国朋友请求中国政府帮助他回国。周恩来立刻指示在日内瓦参加中美大使级会谈的王炳南，通知美方说中国将提前释放11名美国战俘（飞行员），要求美国政府取消对钱学森等归国的无理限制。同年10月，钱学森归国。周恩来立刻委托他起草《建立国防航空工业意见书》，组织力量，自力更生地开始了新中国导弹的研制工作。张劲夫回忆说：“钱学森从美国回来后，懂得搞导弹关键靠推进器，于是科学院下决心搞新的推进器，靠两条腿走路，很快就搞出来了。没有两条腿，苏联毁约停援，我们就抓瞎了。”

但是，对知识分子这样一个极端重要而紧迫的问题，中国共产党内的认识却并不一致。不少干部仍严重地存在着不尊重知识分子的“左”的宗派主义倾向。一些人中间还流行着“生产靠工人，技术靠苏联专家”的错误思想。少数人甚至对知识分子抱有一种盲目的排斥心理，把他们看作“异己分子”，加以压制和打击。

据当时在中共中央统战部负责联系民主党派工作的于刚回忆：

1955年下半年，一天李维汉部长找我和张力之同志去他那里。他说部里近期工作的重点准备抓一抓知识分子问题，要设法摸清党的知识分子政策贯彻执行的情况。

办法之一，是通过民主党派去摸高级知识分子的情况。考虑到同高级知识分子联系最密切的是中国民主同盟，它的许多盟员是高级知识分子，他们都是‘身在其

中’的人，对当时知识分子的思想状况，以及他们的愿望和要求，会比我们了解得更清楚、更深透一些。这样，我们议定推动民主同盟去摸情况。随后，我们把民盟中央文教委员会负责人费孝通先生请到统战部，由李老和我在礼堂的一间会议室里同他商议这件事。经过李老的说明，费孝通先生态度很积极。于是，在费孝通先生的串联下，民盟中央文教委员会花了两三个月的时间搞调查，获得了一大批第一手材料。

这批材料，一份留在民盟，同样的一份交给统战部。我们接到这批材料后，民主党派工作处马上进行分类研究，大体上把问题分成六个方面，反映出我们党对高级知识分子的工作在这些方面做得还不够。我们把这些问题的简称为“六不”：一是估计不足，包括对他们的政治进步和业务水平都估计不足；二是信任不够，如他们应该看的资料不让他们看等；三是安排不妥；四是使用不当，该用的，有的没有用或用非所长；五是待遇不公；六是帮助不够。

材料整理完后，我们就按这六个方面的问题向李老作了汇报，接着李老就向总理面谈了。

过了几天，中国民主同盟负责人章伯钧在11月9日也向周恩来反映这方面的情况，说农业合作化了，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了，这两翼配合社会主义工业化这个主体都前进了，那么，知识分子的地位和作用也应该讨论一下。

1955年11月22日，在年初就有过要召开一次知识分子问题会议的想法的周恩来，向刚从外地回到北京的毛泽东汇报了这方面的情况，并且陈述了他对知识分子受到伤害的忧虑，说：“这是非常严重的事情，因为它危及中国的进步。”他提出打算在政协全国委员会会议上讨论知识分子问题。毛泽东表示：“我们

应该先在党内很好地讨论，提出这个问题，解决这个问题。”第二天，毛泽东召集中共中央书记处全体成员和中央有关方面负责人开会，进行商讨，决定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即将开始的历史转折关头召开一次大型会议，全面解决知识分子问题。会议的日期定在1956年1月。同时决定成立由周恩来负责，有彭真、陈毅、李维汉、徐冰、张际春、安子文、周扬、胡乔木、钱俊瑞参加的中共中央研究知识分子问题十人小组，下设办公室，进行会议的筹备工作。

筹备工作一开始，周恩来首先抓紧的是对知识分子情况的详细调查，作为制定政策的依据。这是正确解决知识分子问题的前提。

中央决定成立研究知识分子问题十人小组的第二天，周恩来邀请中国科学院、建筑工程设计院、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医学院、中国戏剧学院的有关人员座谈，了解高等学校和研究机构中知识分子的现状。又请了各门学科的第一流科学家谈话，核实情况。他还要求各地、各部门向中共中央送交的调查研究材料应该包括高等院校、科研机构、卫生部门、文化艺术界、中小学校六个方面，每一个方面都要有好、中、差三种典型；同时要有几年来党的知识分子政策贯彻执行情况、对知识分子队伍所发生的变化的基本估计和提出解决知识分子问题的具体意见等三项内容。

同一天，他又在中共中央召集的有各省、市、自治区党委负责人参加的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问题座谈会上，专门就知识分子问题作了一次讲话。他说：这个问题“现在已经提到我们要处理的日程上来了”。“对于大知识分子，尊重他，重视他，尤其是向他们学习，这是有好处的。就是一技之长，我们把它搞出来，对于丰富我们的知识，对于我们国家的建设，对于今天和明天，都是有用处的。”他指出：我们在对待知识分子问题上，的确存在

“估计不足，信任不够，安排不妥，使用不当，待遇不公，帮助不够”的问题，“需要我们很好地分析和解决”。各地也要像中央这样成立一个领导小组，“这样可以上下通气，收集材料，研究问题，便于党领导这项工作”。各地应在12月下半月先召开一次知识分子问题会议，党的组织部、宣传部、统战部和政府的文教办公室、高等院校等部门的负责人都应该参加。他最后说：今天是通知性的，就是为的帮助大家了解这个问题，好在回去除了讨论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这个主题以外，把这个问题也谈一下。

当天，他还召集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各部门负责人开会，布置了这项工作。

应当以什么标准去衡量知识分子，这是关系到能否正确估计知识分子现状的关键。周恩来明确地回答说：在政治思想方面，“对于知识分子衡量的标准，首先应该是爱国主义，其次才是属于世界观范畴的马克思主义”。

为了更好地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解决知识分子问题，11月30日，周恩来起草了《知识分子问题》提纲，并审定了《关于收集知识分子问题材料的题目单》，责成十人小组对知识分子政治和业务状况的估计、对知识分子的信任问题等12个方面，更加系统和全面地整理出研究材料。

在调查知识分子状况的同时，周恩来要求有关部门将苏联、美国、英国、法国、日本等国的科技发展状况，同我国科学技术的现状进行比较，研究改变这一落后面貌的方针和办法。

细致周密的调查，使周恩来和中国共产党对如何正确解决知识分子问题得出重要的结论。12月16日，由他主持起草并改定的《中共中央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指示（草案）》下发征求意见。这个《指示（草案）》明确地写道：

目前，党外高级知识分子的政治状况，较之全国解放以前和解放初期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但是，目

前党内的主要倾向，却是对于他们的政治变化估计不足，不按照他们的实际工作和政治立场把他们看作劳动人民的一部分，不了解工人、农民、劳动知识分子的亲密联盟是建设社会主义的基本条件，因而同他们之间存在着某种程度的隔阂。

在伟大的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为了完成国家工业化和国民经济的技术改造的艰巨任务，每一项工作愈来愈多地依靠科学、文化和技术，也就是愈来愈多地依靠高级知识分子的积极参加。我们必须在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使我国的科学文化技术尽可能迅速地脱离落后状态，赶上世界先进的水平。

12月17日、19日，周恩来两次约胡乔木商谈如何起草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并就报告的指导思想、结构、基本内容和重点系统地提出意见。1956年1月初，报告初稿已经写成。6日，周恩来召集十人小组会议讨论修改报告稿。随后，他自己一遍又一遍、一丝不苟地对稿子进行推敲和修改。从保留下来的历次修改稿中可以看到，他又增写了一些重要的论点。例如，在报告第八段中加写：“知识分子已经成为我们国家的各方面生活中的重要因素。”在第二部分第三段中加写：“在目前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造的高潮当中，需要我们加强领导，迅速地克服这些缺点，才能更充分地动员和发挥知识分子的力量。”在第二部分第十段中增写：“应该尊重他们的意见，应该重视他们的业务研究和工作成果，应该提倡和发扬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学术讨论，应该使他们的创造和发明能够得到试验和推广的机会。”在第三部分第六段中增写：“我们应该在高级知识分子中间培养出大批的坚决为社会主义奋斗的红色专家……我们应该热情地帮助他们进行自我改造，实现他们的这种愿望，任何排斥和歧视他们的态度都是错误的。”在第五部分第一、二段中增写：“随着汹涌澎湃的社会

主义经济建设的高潮而来的，将要出现一个文化建设的高潮。”“党一定能够领导知识分子在科学文化事业中取得新的更大的胜利。那种认为党不能够领导知识分子进行科学文化建设的想法，是毫无根据的。”

对报告稿的修改，一直持续到知识分子问题会议召开的当天凌晨。当他写下“印一千四百份 周恩来 一·十四”的批示后，才躺下稍作休息。

与此同时，在周恩来指导下，十人领导小组各个专题组还起草并铅印出《关于科学家研究工作条件问题的情况和意见》、《关于解决在党外科学家、教授、医生、作家、艺术家中一部分人社会活动过多和兼职过多问题的意见》、《关于高级知识分子待遇问题的意见》、《关于从资本主义国家回国留学生工作分配情况的报告》、《关于在知识分子中发展党员的问题的报告》等 11 个专题报告。

1956 年 1 月 14 日下午 3 时，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知识分子问题会议，在中南海怀仁堂隆重开幕。会议规模宏大，出席的有 1279 人。他们中有中共中央委员、中共中央候补委员；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和 27 个省辖市市委书记或副书记，以及这些省、市、自治区党委组织部、宣传部、统战部负责人；全国重要高等院校、科研机关、设计院、厂矿、医院、文艺团体和军事机关的党组织负责人。

会议主席刘少奇宣布大会开幕后，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作大会的主题报告——《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这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次把知识分子问题、发展科学技术问题，作为全党上下都必须密切关注的重大工作郑重地提了出来。

周恩来在报告中响亮地宣布：“我国的知识界的面貌在过去六年来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他们中间的绝大部分已经成为国家工作人员，已经为社会主义服务，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

分。”这就明确地规定了新中国知识分子的阶级属性。如果说，在革命战争年代由于客观社会历史条件的限制，中国共产党在知识分子中所能依靠的主要还只是为数有限的参加革命队伍的知识分子，那么，到历史条件已发生根本变化的建设时期，自然必须把广大知识分子包括在内。

周恩来问道：“知识分子问题，同我们目前的加速社会主义建设的任务，究竟有什么关系呢？”他接着便作了一段精辟的回答：

我们所以要建设社会主义经济，归根结底，是为了最大限度地满足整个社会经常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的需要，而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就必须不断地发展社会生产力，不断地提高劳动生产率，就必须在高度技术的基础上，使社会主义生产不断地增长，不断地改善。因此，在社会主义时代，比以前任何时代都更加需要充分地提高生产技术，更加需要充分地发展科学和利用科学知识。因此，我们要又多、又快、又好、又省地发展社会主义建设，除了必须依靠工人阶级和广大农民的积极劳动以外，还必须依靠知识分子的积极劳动，也就是说，必须依靠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密切合作，依靠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的兄弟联盟。

周恩来在报告中用相当篇幅来谈“向现代科学进军”的问题，把它看作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一项“有决定性的因素”，并且从世界全局的高度，对这个问题作了细致的考察，要求全党给予极大的注意。他说：

我想在这里稍微多说一点科学方面的事情，这不但因为科学是关系我们的国防、经济和文化各方面的有决定性的因素，而且因为世界科学在最近二三十年中，有了特别巨大和迅速的进步，这些进步把我们抛在科学发

展的后面很远。现代科学技术正在一日千里地突飞猛进。……这些最新的成就，使人类面临着一个新的科学技术和工业革命的前夕。

周恩来以异常紧迫的心情呼吁：

我们必须急起直追，力求尽可能迅速地扩大和提高我国的科学文化力量，而在不太长的时间里赶上世界先进水平。这是我们党和全国知识界、全国人民的一个伟大的战斗任务。当我们向前赶的时候，别人也在继续迅速地前进。因此我们必须在这个方面付出最紧张的劳动。只有掌握了最先进的科学，我们才能有巩固的国防，才能有强大的先进的经济力量，才能有充分的条件同苏联和其他人民民主国家一起，无论在和平竞赛中或者在敌人所发动的侵略战争中，战胜帝国主义国家。

这就是说，谁想在当今世界的经济、政治、军事的剧烈竞争中取得主动或胜利，就必须依靠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如此明确、尖锐和深刻地把发展科学技术的极端重要性提出来，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还是第一次，在新中国的历史上也是第一次。

周恩来在作出知识分子“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科学是关系到我们的国防、经济和文化各方面的有决定性的因素”，这两个极其重要论断的基础上，把报告的重心放在阐明如何最大限度地发挥知识分子作用的政策和措施上，如何大力发展我国科学技术的战略考虑和规划上。

周恩来尖锐地指出：“目前在知识分子问题上的主要倾向是宗派主义”，具体表现在“低估了知识界在政治上和业务上的巨大进步，低估了他们在我国社会主义事业中的重大作用，不认识他们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对于怎样充分地动员和发挥知识分子的力量，怎样进一步改造知识分子、扩大知识分子的队伍、提高知识分子的业务能力等迫切问题，漠不关心”。

怎样才能“最充分地动员和发挥知识分子的力量”呢？十分了解知识分子的周恩来，中肯地提出三条指导原则：“第一，应该改善对于他们的使用和安排，使他们能够发挥他们对于国家有益的专长。”“第二，应该对于所使用的知识分子有充分的了解，给他们以应得的信任和支持，使他们能够积极地进行工作。”“第三，应该给知识分子以必要的工作条件和适当的待遇。”其中包括“必须保证他们至少有5/6的工作日（即每周40小时）用在自己的业务上”，改善生活待遇和政治待遇，确定和修改升级制度，拟定关于学位、学衔、发明创造和优秀著作奖励等制度。

这三条原则是缺一不可的。其中，周恩来尤其重视对知识分子的信任和支持问题。他在会议前夕的一次讲话中说：“信任的中心问题，就是我们要尊重这些知识分子。”“光是口头上尊重不行，要尊重还是要重视他们那个知识”，“要尊重他们，要用他们，要用得得当”，“尤其是向他们学习”，使他们能够心情舒畅地运用自己的知识。

与此同时，周恩来十分重视知识分子的生活待遇问题。他在上述那次讲话中说：我国知识分子生活待遇的现状，“比抗战时期好。因为抗战时期生活一天天下降”，“但是比抗战前差”，就其整体情况看，“比旧社会稳”。“知识分子的工资一定要调整，其中有特殊贡献者的工资还可以超过国家主席。这件事将由中央直接抓。”为此，周恩来在知识分子问题会议的报告中进一步提出：“应该根据按劳取酬的原则，适当调整知识分子的工资。”他说明：提高的目的是为了增强他们在业务上的上进心，加强新生力量的培养，刺激科学文化的进步，同时也是为了使他们“能够把更多的精力用于工作”。在他的督促下，这年6月间，高级知识分子的工资普遍有了增加，其中教授、研究员的最高工资由253元提高到345元，增资幅度为36.4%。

这些切实有力的措施，不仅改善了知识分子的工作和生活条

件，而且使 1955 年因错误地处理“胡风反革命集团”而引起同知识分子比较紧张的关系得到缓和。

为了实现“向现代科学进军”的目标，周恩来认为，既要瞄准世界先进水平又要在务实精神指导下，确定正确的发展中国科学技术的战略决策和制定具体的方针政策。根据这种设想，他在知识分子问题会议的报告中提出了追赶世界先进科学技术的战略决策：“就是要在第三个五年计划期末，使我国最急需的科学部门接近世界先进水平，使外国的最新成就，经过我们自己的努力很快就可以达到。有了这个基础，我们就可以进一步解决赶上世界水平的问题。”他说：我们将要制定的从 1956 年到 1967 年科学发展的 12 年远景计划，“必须按照可能和需要，把世界科学的最先进的成就尽可能迅速地介绍到我国的科学部门、国防部门、生产部门和教育部门中来，把我国科学界所最短缺的而又是国家建设所最急需的门类尽可能迅速地补足起来”。

周恩来在报告中要求：国家除了拟定一个大规模的培养干部规划外，还要“集中最优秀的科学力量和最优秀的大学毕业生到科学研究方面”。他提出要“用极大的力量来加强中国科学院，使它成为领导全国提高科学水平、培养新生力量的火车头”。各高等院校也要“大力发展科学研究工作”。同时，政府各部门“应该迅速地建立和加强必要的研究机构”。他指出，“必须为发展科学研究准备一切必要条件”，如图书、档案资料、技术资料和其他工作条件等，“以便尽可能地用世界最新的技术把我们国家的各方面装备起来”。

周恩来在报告中还认为，应该正确处理基础理论研究和应用科学的关系，使之“保持适当的比例”，纠正忽视基础理论研究的偏向。他说：“必须打破近视的倾向，在理论和技术工作之间，在长远需要和目前需要之间，分配的力量应该保持适当的比例，并且形成正确的分工和合作，以免有所偏废。”如果说，

过去我们对这个问题“注意得比较少，这是难免的，也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到了现在，如果我们还不及及时地加强对于长远需要和理论工作的注意，那么，我们就要犯很大的错误。没有一定的理论科学的研究作基础，技术上就不可能有根本性质的进步和革新”。

周恩来在报告快要结束时说：

我们相信，经过我们的工作，知识分子将更进一步地团结在党的周围，并且在伟大的社会主义事业中更积极地贡献他们的力量。全国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在社会主义事业中所形成的联盟，将随着我们的工作的发展，而一天比一天更巩固，更强大。依靠这个联盟，我们一定可以在不很长的时间内，把我们的国家建设成为一个完全现代化的、富强的社会主义工业大国，一定可以在不很长的时间内，实现毛泽东同志的伟大号召——“我们将以一个具有高度文化的民族出现于世界”。

周恩来这个报告，博得了与会者经久不息的雷鸣般的掌声。

会后，这个报告在各党派民主人士中也引起巨大的反响。

黄琪翔说：“当我们看到了周恩来主席在中共中央会议上所作的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后，每个人都不能不为党对知识分子的重视和深切关怀而受到深深的感动。”

章伯钧说：“在党召开关于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之前，为了深入了解高级知识分子的情况，中国民主同盟做了一系列串联工作，向党反映了文教界有代表性的意见和要求。在这次周恩来主席的报告中，我们看到所有的正确意见和合理要求都得到了解决，更叫我们感动的是报告中还有关于党对知识分子工作的检查批评。”

1月20日，知识分子问题会议在成功地实现预期目的后胜利闭幕。这一天，毛泽东称赞“这个会议开得很好”，并且提出

要进行技术革命、文化革命，革技术落后的命，革没有文化、愚昧无知的命，号召全党努力学习科学知识，为迅速赶上世界科学先进水平而奋斗。

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作为中国共产党在成为执政党后召开的解决知识分子问题和发展科学技术问题的一次历史性会议载入史册。但在周恩来看来，会议的圆满结束，只是表明问题的解决有了一个良好的开端。他继续以很大精力投入贯彻执行这次会议精神的艰苦工作。

他首先抓了中共中央、国务院有关解决知识分子问题的许多指示、决定、通知和典型材料等文件的修改定稿、下发实施和检查落实工作。

1956年2月22日，周恩来审阅批准了争取留学生回国工作组《关于争取尚在资本主义国家留学生回国问题的报告》。中共中央为转发这个报告写了批示。《报告》指出：“根据总理关于大量争取留学生回国参加建设、今年内至少争取一千人回国的指示，我们认为对在资本主义国家的留学生应采取普遍争取的方针，重点应放在美国。”

2月2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通过并下发《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指示》。《指示》确认了周恩来的报告中对知识分子问题的分析和提出的有关政策，同时强调：

我们必须知道，知识分子的基本队伍已经成了劳动人民的一部分，在建设社会主义的事业中，已经形成了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的联盟。党有必要进一步把知识分子问题放在全党和国家的各个工作部门的议事日程上，要求全面规划，加强领导，克服我们在这方面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采取一系列的有效措施，充分地动员和发挥现有知识分子的力量，不断地提高他们的政治觉悟和业务能力，并且大规模地培养新生力量来扩大知识

分子的队伍，以便尽可能迅速地改变我国的科学和文化的落后状态，力求最急需的科学部门能够在12年内（即第三个五年计划期末）接近世界的先进水平，而使我国建设中的很多复杂的自然科学和技术的问题能够逐步地依靠自己的力量加以解决。

这年四五月间，中共中央先后转发了中共中央组织部《关于在知识分子中发展党员计划的报告》、《关于高级知识分子入党情况的报告》，中共中央统战部《关于解决高级知识分子中一部分人士社会活动过多和兼职过多问题的意见》等文件。7月20日，国务院转发了由研究改善高级知识分子工作条件小组提出的《关于高级知识分子工作条件问题的情况和意见》以及关于这个文件的《通知》。《情况和意见》就有关知识分子工作条件的14个问题（图书、资料、情报、学术交流、仪器、试剂、实验用土地、研究经费、工作室、助手、工作时间等），分别提出具体的改进意见和措施。《通知》除规定由新成立的国务院专家局“负责研究有关高级知识分子工作条件问题”外，还开列了一个很长的应由有关单位办理的有关事项的目录，要求这些单位在规定的时间内作出关于工作进展情况的报告。

中央知识分子问题十人领导小组会同国务院专家局，在这一年有计划地检查了高级知识分子较为集中的中国科学院和国务院十多个部委解决知识分子问题的工作进展情况，并深入到这些部委若干有代表性的单位，通过同高级知识分子座谈、对他们访问等形式了解情况，总结经验，找寻差距，明确了进一步工作的方向。

这一系列活动，有力地推动了全国范围内知识分子工作的开展。中央各部委、各省市召开各种会议，成立有关办事机构，有效地解决了知识分子的工作条件、安排使用、政治与生活待遇、入学、学术民主等问题。知识分子心情舒畅，普遍感到现在是自

己充分发挥聪明才智的时候了！在全国迅速掀起一个贯彻执行知识分子问题会议精神的热潮，同时也掀起一个“向现代科学进军”的高潮。有些人曾把这一年称为“兴旺的1956年”。

为了贯彻执行知识分子问题会议的精神，周恩来所抓的另一项重要工作是制定科学技术发展的12年远景规划。这次会议，对于中国科技事业的发展，对于12年科学规划的制定，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

会议一结束，周恩来就调国务院地方工业部副部长、党组书记张劲夫担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党组书记。张劲夫回忆道：“调我去科学院时，周总理找我谈话。他说：你一到，就要马上抓科学技术发展规划。”

1956年5月26日，周恩来在中南海怀仁堂举行盛大酒会，招待参加全国科学规划工作的300多名科学家，勉励他们努力开展科学研究，学习苏联和其他一切先进国家的科学技术，争取在12年内使我国重要的和急需的科学技术部门接近和赶上世界先进水平。他对曾留学西方国家的科学家说：我们反对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和社会制度，但对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科学应该虚心学习。6月14日，周恩来又陪同党和国家领导人毛泽东、朱德、陈云、邓小平、林伯渠等接见了参加全国科学规划工作的科学家。

在科学规划制定过程中，遇到一些重要的方针性问题。周恩来立足国家当前需要，放眼未来的发展，及时妥善地处理了这些问题。据当时参与科学规划工作的中国科学院副秘书长武衡回忆：在规划制定过程中，负责这项工作的十人小组曾向周总理作过多次汇报。周总理强调指出：要尽量采用世界先进技术，瞄准当时的新兴科学、新兴技术，不失时机地“迎头赶上”；同时又根据解放不久、国力有限的客观实际，要求“重点发展”，避免力量分散，拖延时日。当时，为了使我国的科学技术工作密切结

合社会主义建设的实际，有效地解决生产建设中的科学技术问题，规划小组曾提出以“任务带学科”的口号。周总理听到后，迟疑了一下，便提问说：“那么，还有一些任务带不起来的学科将怎么办？”接着又说：“是不是再补充一个基础科学的规划？”因此，在原定 56 项重大任务外又增列了《现代自然科学中若干基本理论问题的研究》，扩充为 57 项，并专门制定了基础科学研究规划。

7 月 24 日，周恩来又召集有关部门领导人开会，商议编制科学发展远景规划的有关问题，部署下一步的工作。8 月下旬，陈毅主持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扩大会议，讨论修改《1956~1967 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纲要（草案）》。11 月 15 日，周恩来就 10 月 29 日陈毅、李富春、聂荣臻《关于科学规划工作向中共中央的报告》一事，致信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我意可以原则批准，以便按照他们提出的程序进行讨论和审议，最后再提中央批准。”19 日，邓小平写道：“同意总理批语。”

在周恩来直接过问和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负责人陈毅、李富春、聂荣臻等具体领导下，经过来自 23 个单位的 787 名科学家半年多的努力，终于在 1956 年 12 月编成我国《1956~1967 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纲要（修正草案）》。《规划》共确定 57 项国家重要科学技术任务和 616 个中心问题。在此基础上，又挑选出有全局性意义的 12 个重点，在人力、物力上优先予以保证。对某些特别重要而在我国却很薄弱、甚至还是空白的学科，采取了紧急措施，如发展计算机技术、半导体技术、无线电电子学、自动化和远距离操纵技术四项紧急措施，加上当时没有公开的发展原子弹和导弹研究的两项绝密任务，共六项紧急措施，构成我国发展尖端科学技术的关键性措施。措施中，包括工作条件和干部培养计划等，是配套的。规划确定下来后，一项一项地进行检查，做到贯彻始终。这就为我国依靠自己的力量在不太长的时间

内突破某些重要尖端技术，并使“两弹”过关，奠定了基础。张劲夫回忆道：“知识分子会议对整个科学事业的发展起了很大的历史作用。有了科学规划，就有了奋斗目标。”

不幸的是，对知识分子问题的认识，在中国共产党内实际上仍存在较大分歧，并没有真正取得一致，不久后又出现重大反复。当年9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又把许多知识分子称为“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第二年3月，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召开的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进一步提出：知识分子的“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他们还是属于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

在这种状况下，相当一段时间里，周恩来着重抓住各种实际措施，使改进知识分子工作条件、生活待遇的规定得到进一步的落实，知识分子用非所学、使用不当的现象有了明显改变，给许多专家配备了助手和辅助人员，高等院校、科研机构购置图书资料的费用有了增加，高级知识分子得到普遍的增薪和晋级。此外，还吸收了相当数量的高级知识分子入党，其中有不少是全国知名的科学家、教授、医务和文艺工作者。

在科学技术的发展方面，许多高新科技如原子能、喷气技术、电子计算机、半导体和无线电电子学技术等，从无到有，从小到大，迅速发展起来；在传统科学技术领域里，也开辟新的研究课题，取得喜人的成就；一系列新兴工业在中国土地上开始建立起来。原定在12年完成的科学发展规划的主要任务，大多提前5年到1962年就完成了，使我国科学事业有了长足的发展，有效地解决了一批国家急需的科学技术问题，大大缩小了我国科学技术同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促进了我国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文化事业的繁荣。我国科学研究机构由381个发展到1296个，人员由18000余人增加到86000余人，初步改善了我国原来科学力量薄弱的状况。这些变化，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发展产

生了深远的影响。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传》)

强国之梦：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

1956年全国政治生活中最大的一件事，是中国共产党召开了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此次大会筹备工作“好事多磨”：“政治报告”修改稿达80个；邓小平担纲修改党章；周恩来起草“二五”计划报告；毛泽东自己起草了两个开幕词讲话稿，不知为什么没有写完，后来让陈伯达起草了一个，毛泽东看后不满意，于是又叫田家英再起草一个。可见党的领导人对八大的重视。八大描绘了中国共产党人的强国梦想，显示了党的团结和党的事业兴旺发达。

1956年全国政治生活中最大的一件事，也是对后来影响颇大的一件事，是中国共产党在相隔11年之久，召开了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以下简称八大）。此时的中国共产党与1945年在延安召开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时相比，已经是天壤之别，不可同日而语。那时，中国共产党仅有121万党员，仅控制着以华北和西北为主的部分乡村，抗日战争虽然胜利在望，但是战后中国的命运和党夺取全国政权道路是否漫长，还是一个没有确定的问题。总之，中国共产党还是一个没有取得正统地位、受到国民党压制的政党。但是1956年的情况则大不相同，中国共产党的党员数量已经增至1073万，这还是严格控制发展的结果；已经建立和稳固了新中国政权，成为领导世界1/4人口、令世界瞩目的政

党。它的代表大会，不仅是自己的事情，还直接关系到整个中国内地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事业，影响到台、港、澳和国际关系。

一、空前充分的会前筹备工作

- 毛泽东解释两次大会相隔 10 年的原因
- 筹备工作“好事多磨”
- “政治报告”修改稿达 80 个
- 邓小平担纲修改党章
- 周恩来起草“二五”计划报告没有受“冒进”影

响

- 七中全会确定中央领导集体
- 毛泽东提议选举李立三和王明
- 八大预备会议确定候选人
- 毛泽东称赞、举荐邓小平、陈云

早在 1952 年，党中央就开始考虑召开八大，1953 年曾经将此提上议事日程。但是由于自 1953 年以来事情太多，过渡时期总路线、机构调整、统购统销、高饶事件、朝鲜停战谈判、社会主义改造，一事情接着了一事情，令人喘不过气来，这件事遂暂时搁置下来。

1955 年 3 月的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终于确定于 1956 年下半年召开八大。3 月 31 日，毛泽东在全国代表会议闭幕式上所作的结论中说：党的代表大会十年没有开，很不好，到 1956 年 8 月十年半了，只好明年开。当然头五年不应该开，头五年兵荒马乱，又开了七大，后五年可以开而没有开。没有开也有好处！高饶问题搞清楚再开，不然他们要利用八大做文章。同时，我们的五年计划也上了轨道，社会主义总路线提出后各方面都清楚了。又经过这次代表会议使大家在思想上更加统一了，再

来开八大。

毛泽东代表中央提出了八大的三项议事日程：1. 中央委员会的工作报告；2. 修改党章；3. 选举新的中央委员会。并要求在明年7月以前需要完成代表的选举及文件的准备工作。

召开中共八大的时间和大会的内容一经确定，筹备工作便开始运转起来。在七届五中全会上新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的邓小平，作为中共中央秘书长，具体负责筹备大会的组织工作。

1955年10月4~11日，中共中央举行扩大的七届六中全会。会议讨论和通过了《关于召开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决议》和《关于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代表名额和选举办法的规定》。《决议》说：党的八大将于1956年下半年召开，其主要议程为：（1）中央委员会的工作报告；（2）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3）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4）选举党的中央委员会。于是八大议程比毛泽东在全国代表会议上所说的三项议程多了一个讨论经济的内容。《决议》还提出：召开八大的具体时间，由中央政治局决定。选举办法规定：（1）出席八大的代表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中共中央直属机关、中央国家机关和解放军分别召开党的代表大会选举产生。（2）代表名额的分配为每一万名党员选举代表1名，同时考虑到各地区、各系统党员分布不平衡的情况，每个选举单位分别增加代表4至8人；人口在200万以上的大城市可分别另行增选10至15名代表。（3）全部代表必须于1956年6月底以前选出。

在七届六中全会上，邓小平代表中央政治局作了《关于召开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决议草案的说明》，介绍了确定召开八大的酝酿过程。邓小平说：党的七次代表大会是在1945年召开的，到1956年召开八大，中间相距11年。这是因为1945年至1949年这4年，我们正处于急风暴雨的革命战争中；1950年至1952年这3年，我们全神贯注地进行了完成民主改革、恢复

国民经济和巩固人民民主专政这些极为繁重的工作，并且进行了紧张的抗美援朝斗争。1952年年底，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在考虑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同时，就曾考虑到召开党的八大问题，当时决定了先召开一次党的全国代表会议。1953年我们国家开始了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建设。同年下半年，经过全国财经会议和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之后，党中央察觉了高饶反党联盟的问题。党经过1954年2月的四中全会和1955年3月党的全国代表会议，对这个事件作了严肃的处理。在这两年多中，党规定了国家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和公布了宪法，第一个五年计划已进行了一多半的时间。同时，又经过整党、建党、审查干部工作，总路线的宣传，社会主义改造，所有这些，为召开党的八大做了政治准备和组织准备。所以，1956年召开八大，将会开得更为完满一些，这是可以肯定的。

1955年12月5日，中央政治局召开了一次各省、市负责人参加的座谈会。会议由刘少奇主持，他宣布了中央政治局准备在1956年9月召开八大的决定。刘少奇还传达了毛泽东关于召开八大的指示精神：八大的中心思想是要反对右倾思想，反对保守主义，提早完成我国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改造，保证15年同时争取15年以前超额完成。主席讲，我们要利用目前国际休战的时间，利用这个国际和平的时期，再加上我们的努力，就可加快我们的发展，可提早完成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改造。由此可见，此时仍在受1955年下半年社会主义改造高潮的影响，将急于求成的思想列入了八大的指导思想。

半年之后，1956年6月2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毛泽东的主持下专门召开了研究八大问题的会议。会后，中共中央办公厅于6月26日发出了政治局关于八大会期与准备工作的几点决定的通知。通知说：党的八次大会定于9月15日开幕；大会的政治报告、党章和修改党章的报告、关于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及

其报告等5个文件，必须在8月中旬定稿；8月下旬召开扩大的七届七中全会，讨论和通过八大的几个主要文件和其他有关问题；9月1日起举行八大的预备会议（全体代表到会），预选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讨论八大的几个报告并安排大会发言。通知还说，7月初发布消息，宣布八大的会期和日程；邀请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的代表参加。

7月6日，中共中央通过新华社向全国发出了中共中央关于召开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通知。《通知》宣布：中共中央已经决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于1956年9月15日在北京召开，大会的议程如下：（1）党的中央委员会的工作报告；（2）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3）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4）选举党的中央委员会。

八大政治报告的起草和修改，如果从1955年5月算起，经过了1年零4个月的时间，前后的各种修改稿多达80多份。整个报告经过了5次大的修改，认真程度，可谓“空前绝后”。1955年5月12日，中央政治局通过了邓小平草拟的八大政治报告起草委员会名单。起草委员会由刘少奇等7人组成。按照中央的分工，刘少奇主持八大政治报告的起草工作。

第一稿是由陈伯达于1955年12月写出的，稿子计划写6个部分，但只有第一、二部分成稿。12月15日，刘少奇批示印送毛泽东、周恩来、朱德、陈云、彭真、邓小平等26人审阅。此后，刘少奇、毛泽东分别进行了大规模的调查。1956年4月，毛泽东在调查的基础上，形成了《论十大关系》报告。基本代表了苏共二十大和我国社会主义改造高潮以后党对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问题的最高认识水平。因此，八大报告第一稿就需要在此认识基础上作较大修改。1956年7月，第二稿写出，稿子仍然没有写完，计划写8个部分，但只有前4个部分成稿。这个稿子充分体现了毛泽东《论十大关系》精神。7月14日，刘少奇批示

将稿子印发给中央领导和有关人员审阅修改。

8月8日，修改写出完整的第三稿，这也是第一个完整的八大政治报告稿子。稿子写出后，毛泽东、刘少奇等自己动手同时督促有关人员加紧修改，于七中全会前又拿出了第四稿。8月22日，七届七中全会第一次会议讨论政治报告的起草问题，提交会议的初稿有9万字；毛泽东要求代表对草稿提出修改意见。毛泽东说：政治报告9万字，我们现在提议，这个报告有些地方要重写，精简节约，能够缩减1/3就好。缩小1/3，更通达一点，看起来不那么费力，大家还欢迎。政治局准备公推少奇同志作报告，如果中央委员会同意，那就请少奇同志作报告。

刘少奇也就政治报告的修改说：中央有一个起草委员会，进行了工作，现在还没有完全搞好。这个稿子是很多人写的……其中有一些部分恐怕需要重写，就是要推翻，打乱重分，重新再搞。所以还要花很大的功夫，请各位看一看，讨论一下，提出意见，批评，大家出点力，做一点工作，我们集体创作，就可以搞这么一个比较合乎规格的东西。

会后，毛泽东、刘少奇再次抓紧修改，于8月27日拿出第五稿。八大预备会议以后，毛泽东、刘少奇第三次亲自动手修改稿子和润色，并于9月12日完成，拿出第六稿，13日印发代表征求意见。在13~15日八大开幕前，毛泽东等对稿子仍继续进行修改、润色。

至于修改党章及其报告，则是在邓小平主持下进行的。

1955年5月9日，中央政治局会议批准党章修改和修改党章报告起草委员会。委员会由邓小平、杨尚昆、安子文、刘澜涛、宋任穷、李雪峰、胡乔木、马明方、谭震林组成，即由中央正副秘书长组成，由邓小平负责。

1955年10月20日，党章的第一稿（初稿）完成。邓小平批示印发中央政治局委员和起草委员会成员。1956年4月22

日，中央政治局开会讨论党章初稿。会后，邓小平吸收会议意见，写出党章第二稿。中央将二稿印发省、市、自治区党委征求意见。上述两稿，与七大党章相比，没有原则性修改。

随后于4月25~28日召开的有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参加的政治局扩大会议对第二稿进行了讨论。根据毛泽东、刘少奇和省、市、自治区党委负责人的意见，起草委员会又对第二稿进行了较大修改，拿出了第三稿。5月中、下旬，中央政治局连续开会讨论党章修改问题，并向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和中央各部委党组发出《关于讨论党章修改稿的通知》，要求对有关问题进行讨论并将意见报告中央。

7月30日，中央政治局开会，决定成立一个专门委员会来讨论落实中央机构的设置方案。8月3日，起草委员会吸收专门委员会的意见，拿出党章第四稿。8月17日，形成党章第五稿，并以此提交七中全会讨论。会议期间，毛泽东又对第五稿个别字句提出修改意见，遂形成党章第六稿，并作为定稿提交八大讨论通过。

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第一稿是由胡乔木起草的，他于1956年8月11日写出。然后由邓小平修改，并于8月27日将修改稿（即第二稿）送毛泽东审阅的同时，提交起草委员会讨论、修改。经过吸收毛泽东和起草委员会成员的修改意见，邓小平写出第三稿，并将其提交8月22日召开的七中全会讨论，该稿得到会议的审查和通过。至此，邓小平基本完成了政治局交办的关于修改党章的两大任务。

《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和《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的报告》，在1955年10月召开的六中全会上被列入八大的主要议程。这两个文件是在周恩来主持下完成的。

第二个五年计划轮廓数字是在周恩来指导下从1955年8月

开始着手编制的。由于当时受批判“右倾保守主义”影响，以及对作为基数的1955年经济增长速度估计过高，结果轮廓数字规定的年均递增速度实际为：工农业总产值19.1%，工业总产值24.6%，农业总产值11.7%，粮食总产量10.3%，棉花16.4%。这些高指标在1956年4月得到毛泽东的认可。但是按照这个指标，1956年的财政收支和物资供应无法平衡。于是国家计委又于1956年6月继提出对轮廓数字修改不大的第一方案后，再提出了第二方案。但第二方案对轮廓数字的增长指标仍然降低不多。

这时，离八大召开只有两个多月的时间了。在此情况下，周恩来、陈云等认为：要制定一个切实可行的方案，就必须推翻已有的“冒进”方案；而要推翻已有的“冒进”方案，就必须做各部委负责人的思想工作，只有打通思想，才能妥善地把各项指标降下来。

从7月3日开始，周恩来连续三天主持国务院常务会议，讨论“二五”计划的第二方案，磋商编制一个符合实际的新方案。周恩来在会上说：制定新方案“是为贯彻既积极又稳妥可靠的方针”。他以充足的理由说明前两个方案都不是稳妥可靠的。经过充分交流思想后，与会者一致同意第二方案仍然不稳妥，同意在稳妥可靠的基础上，搞一个比较可行的方案提交八大讨论。

这次会议以后，周恩来集中精力主持编制“二五”计划的建议。他同薛暮桥、国家计委的王光伟、陈先反复计算各项指标的可行性（李富春、张玺正在苏联）。到7月下旬，终于写出《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1958—1962）的建议（草稿）》。

8月3~16日，周恩来、陈云在北戴河先后主持召开9次会议，对7月下旬提出的“二五”计划建议的第三方案和调整意见中的部分指标又作了适当调整，相继形成《“二五”计划的建议》

(第二次草稿)、《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的报告》(第一次草稿)和《“二五”计划的建议(修改稿)》(即第三稿)。8月23日,又形成了《“二五”计划的建议(草案)》,即第四稿。9月6日,形成《“二五”计划的建议的报告(草稿)》,即第二稿。9月11日,又形成第三稿。

9月13日晚,毛泽东在七中全会上认可了上述两个文件。这次会议原则通过了这两个文件。至此,八大的文件准备工作基本完成。

8月22日,中共七届七中全会召开第一次会议。共有中央委员、候补委员61人参加,中央各部委负责人和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42人列席。

毛泽东主持会议并作了讲话。他说:这次全会的任务,就是准备八大。

邓小平代表中央书记处、政治局,就准备八大的“三大工程”(即政治报告、修改党章、“二五”计划建议)和提交全会通过的6个文件作了说明。这6个文件是:大会的日程;大会的规则;预备会议的安排;选举工作的建议;代表团团长、副团长名单;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名单。

关于大会发言,毛泽东提出:“原则是不要太长,内容要精彩一点。”邓小平提出准备安排80~100人发言,毛泽东又提出还可以搞一些书面发言。

关于大会的选举工作,毛泽东说:先由代表团提出一个名单(中央不提名单,由个人自己提,想提什么人就提什么人),然后中央集合起来,由政治局和各代表团团长、副团长制定一个预选名单,再发下去,各代表团进行预选,然后再由政治局集合起来,制定一个向大会提出的正式的候选人名单。毛泽东还提议选举李立三、王明。

在邓小平作完说明之后,毛泽东又谈了未来中央机构的组

成。毛泽东说为了国家的安全和工作有利，准备设立4个副主席、政治局常委、书记处、总书记等机构和职务。准备推举过去的几位书记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为副主席；推举中央秘书长邓小平为总书记。毛泽东说：我们这么一个大国，6亿人口，1100万党员，一个主席，一个副主席，总觉得孤单。“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或者是从飞机上掉下来，或者是一个炸弹下来，把主席打死了，还有副主席，把一个副主席打死了，还有三个副主席，把两个打死了，还有两个，把三个打死了，还有一个，统统打死了，还有一个总书记，总而言之是有备无患。此外还在必要时设名誉主席。

8月30日，八大预备会议召开第一次会议，946人参加。

毛泽东主持会议并作了《增强党的团结，继承党的传统》的讲话。毛泽东主要讲了三个问题。

一是关于大会的目的和宗旨。总的来说，就是总结七大以来的经验，团结全党，团结国内外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为建设伟大的社会主义中国而奋斗。

二是关于继承党的传统。提出要把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切实反一下，此外，还要反对官僚主义。

三是关于中央委员会的选举。毛泽东说，由于“三八式”干部太多，不好安排，故这届暂不考虑。同时，希望选举王明、李立三。认为一来他们代表小资产阶级，而具有小资产阶级思想的人在党内还很多；二来他们代表犯过错误的人，选举他们，说明了我们的团结政策，可以使犯错误的同志安心。

邓小平作提交文件说明。关于大会发言，邓小平说：发言时间是8天半，实际上发言时间只有36个小时，因此必须要求大会的发言短，争取比较多的发言。每个人讲得少一点，内容生动一些，活泼一些。各省、市、自治区都有一个主要发言，另外，大省市再准备三篇1000字左右的短小发言，中等省准备两篇，

小省准备一篇。这次会议讨论的中心问题是国家建设，少奇报告的中心问题是国家建设，如果中央各部没有十几篇稿子也不像话，中央各部准备 20 篇左右发言稿；另外还有大约 20 篇讲一点问题的。这样，准备的大会发言稿就有 120 篇以上。

9月8日，中共七届七中全会又举行第二次会议。会前，先由陈云主持召开了由中央委员、候补委员和各代表团团长、副团长 62 人出席的讨论候选人会议。随后会议正式开始，由毛泽东主持，共有 56 名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参加。会议讨论确定了八届中央委员的候选人名单。

9月10~12日，八大预备会议召开第二次会议。会议的主要内容是讨论确定候选人名单。10日的会议，共有 927 人出席，52 人请假。毛泽东主持了会议，陈云作候选人名单说明。薄一波、李先念、谭震林分别代表华北、中南、华东代表团发言。

会议确定八大选举 170 名中央委员，并采纳了中央政治局与各代表团正副团长反复研究的候选人名单。

毛泽东在讲话中特别提到缺少建设经验、要造就大批知识分子。毛泽东说：“现在的中央委员会，我看还是一个政治中央委员会，还不是一个科学中央委员会。所以，有人怀疑我们党能否领导科学工作、卫生工作，也是有一部分道理的，因为你就是不晓得，你就是不懂。现在我们这个中央的确有这个缺点，没有多少科学家，没有多少专家。”

11日，各代表团正副团长举行会议，讨论预选问题，布置预选工作。

12日，各代表团举行第一次预选。结果，170 人被提名为八届中央委员候选人。这次预选，没有区分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

9月13日，中共七届七中全会举行第三次会议。中央委员、候补委员 62 人参加，中央各部委负责人和各省、市、自治区党

委第一书记 37 人列席，毛泽东主持了会议。

会议通过下列七个文件：1. 八大政治报告；2. 中国共产党的章程（草案）；3. 修改党章报告；4. 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草案）；5. 关于第二个五年计划建议的报告；6. 大会主席团名单（草案）；7. 大会秘书处名单（草案）。

毛泽东再次就大会的文件、选举和中央机构的设立等问题作了长篇讲话，并特别介绍和推荐陈云和邓小平。

毛泽东说：

我看邓小平这个人比较公道，他跟我一样，不是没有缺点，但是比较公道。他比较有才干，比较能办事。

他比较周到，比较公道，是个厚道人，使人不那么怕。我今天给他宣传几句。他说他不行，我看行。顺不顺要看大家的舆论如何，我观察是比较顺的。

对陈云，毛泽东说：

我看他这个人是个好人，他比较公道、能干，比较稳当，他看问题有眼光。我过去还有些不了解他，进北京以后这几年，我跟他共事，我更加了解他了。不要看他和平得很，但他看问题尖锐，能抓住要点。所以，我看陈云同志行。

至此，八大的各项准备工作已经就绪。这时，距离八大召开也只剩下两天时间了。

二、空前公开，高朋满座

- “开幕词”出自田家英之手
- 刘少奇唱了主角
- 邓小平担当重任
- 民主党派礼品和欢呼

- 宋庆龄的心声
- 高朋满座
- 与外国代表团广泛交流
- 不同国家和政党的反应

1956年9月15日下午2时，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政协礼堂隆重召开。大会由七届中央政治局委员共同主持。2时零5分，毛泽东庄严宣布：“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现在开幕了。”于是全场代表起立，热烈鼓掌，然后奏《国际歌》。

接着，毛泽东致开幕词。开幕词虽然简短，仍然不时地被热烈掌声打断。

据逢先知等编的《毛泽东和他的秘书田家英》中说：毛泽东原来自己起草了两个开幕词讲话稿，不知为什么没有写完，后来让陈伯达起草了一个，毛泽东看后不满意，认为扯得太远，太长，于是又叫田家英再给起草一个。毛泽东对田家英说：“不要写得太长，有个稿子带在口袋里，我就放心了。”田家英写好后，毛泽东看了比较满意，经过修改后，即交给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等人提意见修改定稿。

毛泽东致完开幕词，在回到休息室后，许多人称赞毛泽东的开幕词写得好，毛泽东对大家说：“开幕词是谁写的？是个秀才写的，此人是田家英。”

毛泽东致词结束以后，大会通过了中央委员会提出的大会主席团、大会秘书处、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三个名单，并通过了大会的会议日程和会议规则。每天的大会一般都是在下午2点开始，至晚上7点40分左右结束。

接着，大会进入第一项议程，由刘少奇代表中央委员会向大会作政治报告。9月16日下午，邓小平作“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随后，周恩来又作了“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

年计划的建议的报告”。

从9月17日起至25日，代表们做大会发言，讨论三个报告。同时，民主党派代表、外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团开始穿插致词。9月17日民主党派代表李济深和苏共代表团团长米高扬分别致词。

八大召开以前，根据七中全会和八大预备会议的要求，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中央机关各部委和国家机关各部委党组，还有一些中央负责人、基层代表，都准备了发言稿，并将其报送大会秘书处审阅，有些还分送中央领导人审阅，然后修改定稿。例如，彭德怀、李立三、周扬等人的发言稿就曾经毛泽东的审阅或修改。

会议期间，共有68人作了大会发言，45人作了书面发言。另外，还有70人已经准备了发言稿，但因故未在大会上发言，也没有在报刊上作为书面发言刊登。其中已经定稿的62篇，尚未定稿的8篇。这70篇稿子，包括张闻天、徐向前、贺龙、聂荣臻、叶剑英、陆定一、谭震林等人的发言稿。

在总计183篇大会发言、书面发言和未刊发言稿中，既有中央领导人的，也有中央各部委、国家各部委、地方各级党委负责人的，还有来自基层党组织负责人和普通党员的。发言人数之多，代表面之广，内容之丰富，为党的历次代表大会所少见，体现出当时党内高度的政治热情和民主气氛。

9月26日，大会代表一致通过中国共产党章程，并以无记名投票方式选举了第八届中央委员会委员。27日，大会又以无记名投票方式选出候补中央委员。接着大会一致通过了《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和《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大会全部议程到此进行完毕。陈云宣布大会胜利完成任务，在对国内外来宾的祝贺及贺礼表示感谢后，宣告大会闭幕。

9月28日，第八届中央委员会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选举

中央机构。会前，毛泽东召集大会主席团常委和各组组长、副组长开会研究了选举办法。全会分两段进行。

第一阶段是 28 日下午，进行预选。邓小平对选举办法作了说明：原来主席团常委提的那个名单只作为参考，中央委员自己写一个名单投入票箱，然后由大会主席团常委和各组长、副组长根据这个预选结果拟定一个名单，到晚上 11 点再开始正式选举。毛泽东又补充说：你们想提什么人就提什么人，也可以相互商量。

第二阶段是 28 日夜至 29 日凌晨进行正式选举。

邀请国内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代表列席党的全国代表大会，这还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第一次，也是这次大会的特点，体现了中国共产党贯彻“长期共存，互相监督”方针的诚意和对各民主党派的信任。

列席八大的各民主党派负责人有：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主席李济深；中国民主同盟主席沈钧儒；中国民主建国会主席黄炎培；中国民主促进会主席马叙伦；中国农工民主党主席章伯钧；中国致公党主席陈其尤；九三学社主席许德珩；台湾民主自治同盟主席谢雪红等。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宋庆龄、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则以无党派民主人士身份列席大会。

9 月 17 日，列席会议的李济深代表民主党派致词。李济深说：“我们各民主党派愿意长期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和全国人民一道不断地加强团结，相互督促，各尽所能，为建成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和维护世界和平而共同努力。”

致词结束时，民主党派代表沈钧儒、黄炎培、郭沫若等在热烈的掌声中走到主席台前，向大会敬献礼品。礼品是一件象牙雕刻的工艺品，反映的是在二万五千里长征中红军英雄胜利渡过大渡河时的情景。李济深说，我们用这件礼品来象征我们各民主党派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同舟共济”，胜利地过渡到繁荣幸福的

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民主党派敬献礼品时，代表们全体起立，热烈鼓掌，经久不息。这天的大会执行主席邓颖超、李富春接受了礼品，并代表大会表示感谢。这件事也是空前绝后的。

在八大召开前后，各民主党派还极为关注大会，并号召学习公开发表的八大文件和代表的发言。

在八大召开的前一天，即9月14日，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就召开座谈会。座谈会决定：民革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组织都要对八大的文件进行深入的学习和讨论。

同一天，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常委召开第四次会议，通过了《关于迎接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决定》。

同一天，中国民主促进会也召开中央常委会议，并作出决议，号召全体会员及时认真学习中共八大的文件，以加深政治认识和思想水平。

9月15日，九三学社中央常务委员会向所属各级组织下达及时组织社员学习中共八大各项文件的决定。

9月17日，中国民主建国会发出通知，要求各地方组织及时组织会员认真学习中共八大文件。

9月19日，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央执行局也发出通知，要求全党认真学习中共八大文件。9月26日，宋庆龄向大会致词。宋庆龄说：

像我这样一个非共产党员，能够列席这次具有历史意义的大会，这是我毕生中感到最光荣和最愉快的事。

中国人民积了几十年惨痛的经验教训，终于在中国共产党正确领导下，很快地解脱了帝国主义的束缚，消灭了封建主义，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的决定性的胜利。经过两次革命，我们已经推翻了那人吃人的剥削制度而站立起来。这在人类历史的进程中，再一次树立了一个伟大的里程碑。我们要感谢不断为人类解放事业而奋斗

的共产党。没有党的领导，我们的胜利是不可能的。

八大召开时，正逢中国共产党在国际共运中威望最高的时候，共有 56 个国家的共产党、工人党、劳动党代表团列席大会，日本共产党代表团则因日本当局阻挠未能成行。

毛泽东在大会开幕式上，对外国党代表团表示了真诚的欢迎：

今天在座的有五十几个国家的共产党、工人党、劳动党和人民革命党的代表。他们都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他们和我们有一种共同的语言。他们走了很长的路程来到我国，以崇高的友谊参加我们党的这次代表大会。这对于我们是一个很大的鼓舞和支持。

在这次大会上，共有 49 个外国党代表团代表在大会致词；12 个国家的共产党中央发来贺电。美国共产党全国委员会的贺电说：

在我国人民中间，要求采取步骤缓和远东紧张局势，要求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正常关系的情绪日益增长。这种要求包括接纳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入联合国，美国政府在外交上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以及在我们两国之间发展互利的商务关系和文化交流……我们严厉地谴责艾森豪威尔政府和美国国会对中国所采取的反动政策，我们和越来越多的民主人士、民主团体一起，要求作根本的改变。

9月21日晚，中共八大主席团举行宴会，招待应邀参加大会的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的代表。毛泽东在宴会上致词。50 多个国家的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欢聚一堂，这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是空前绝后的。

对中国共产党来说，八大是建党以来最广泛的一次国际共运社交活动。在中共八大期间，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陈云、

邓小平等人与参加会议的兄弟党代表团广泛交换了意见，加深了相互了解。毛泽东十分明确地说，中国的前途就是社会主义。要使中国变成一个富强的国家，需要 50 年到 60 年的时光。现在已不存在阻碍中国发展的力量。

毛泽东的谈话比较充分地体现了中国党的谦虚、平等、顾全大局的风度。

中共八大期间，刘少奇三次陪同毛泽东、八次单独会见外国代表团，八次单独会见的外国党代表团为：印度共产党代表团、伊朗人民党代表团、比利时共产党代表团、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代表团、加拿大劳工进步党代表团、意大利共产党代表团、土耳其共产党代表团、尼泊尔共产党代表团。

刘少奇在与外国党代表团谈话中，着重介绍了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情况和经验。

中共八大期间，周恩来两次陪同毛泽东、七次单独会见外国党代表团。七次单独会见的八个外国党代表团为：印度共产党代表团、希腊共产党代表团、挪威共产党代表团、以色列共产党代表团、匈牙利劳动人民党代表团、澳大利亚共产党代表团、新西兰共产党代表团、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代表团。

在谈话中，周恩来回答了客人提出的各种问题，介绍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国内的情况，讲述了中国党的历史经验，说明了中国共产党对国际形势和国内问题的一些看法和认识。

中共八大期间，陈云分别会见了芬兰共产党代表团、瑞典共产党代表团、瑞士劳动党代表团、奥地利共产党代表团、匈牙利劳动人民党代表团。

当瑞典共产党代表团谈及苏共二十大后欧洲党内产生混乱现象，引起人民的激动情绪时，陈云说，我们党内没有什么混乱，但也不能说没有震动，主要就是斯大林的估价，过去说斯大林那样好，后来一下子又很坏。我们党所以没有引起混乱，主要是

我们党中央特别是毛主席经常说：一个人做工作不犯错误是没有的。这句话对我们印象很深。毛主席经常在中央会议、干部会议上说：“这件事我又做错了。”在谈及中国的公私合营时，陈云还对中国资本家的状况作了简要分析。说明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为什么愿意接受改造，以及中国的经验。

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受到了国际舆论的普遍关注。

中共八大召开的当天，世界各社会主义国家的主要报刊都发表了社论和专文，祝贺大会的召开，称赞这次大会不仅是“中国共产党和全体中国人民的一件大事。同时，也对国际共产主义和工人运动有巨大的意义”。

苏联的《真理报》、《消息报》和其他中央一级的报纸都连续刊登了中共八大的消息和会议发言。莫斯科广播电台还播送了由它的记者采编的中共八大特别节目。9月29日，即中共八大闭幕的第三天，苏联《真理报》发表社论《中国共产党代表大会的伟大历史意义》，热情称赞中共八大对进一步创造性地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作出了重大贡献。

中共八大召开期间，不仅苏联和社会主义国家的报纸以大量篇幅刊载大会文件和消息，许多资本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的报刊也刊载了大会的消息。9月19日，印度共产党政治局还就中共八大的召开发表声明，向八大致敬。

法国《人道报》从9月15日开始，连续报道中共八大消息并摘要刊登了毛泽东的开幕词、刘少奇的政治报告、邓小平的关于修改党章报告和周恩来的关于第二个五年计划报告。意大利的《团结报》对中共八大的消息和报告十分重视，几乎每天都有比较详细的报道。

美国的《工人日报》除了刊登有关中共八大的消息外，还全文刊登了毛泽东的开幕词。加拿大《论坛报》不仅刊登消息，还

刊登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的照片。

奥地利《人民之声报》连续刊登了中共八大的综合报道，并摘要发表了毛泽东的开幕词和刘少奇、邓小平、周恩来的报告。

1955年万隆会议的召开，加强了亚非国家之间的相互了解和关心。中共八大自然也受到这些国家的重视。

印度报纸大量刊登中共八大消息，许多报纸还发表了社论。

缅甸的《缅甸人报》9月18日发表的社论说：“我们并不是为共产主义辩护但是必须承认，在把国民党赶出中国大陆之后，中国幸而找到了一个它非常需要的能够给予稳定和效率高的政府。”

正处于苏伊士运河事件旋涡的埃及，几乎各报都在9月16日以显著的位置刊载了毛泽东在中共八大开幕词中关于支持埃及的一段话。

西方国家的一些非共产党报纸也对中共八大发表了评论。

日本的《读卖新闻》说：“同非共产党集团共处的长期计划，显然是中国共产党解决面临的巨大任务的现实方法。”

美国的《基督教科学箴言报》说，中国共产党是世界上最大的全国性共产主义组织，目前举行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反映了“巨大的权力和极大的信心”。“不管承认与否，中国共产党已经使中国成为世界一大强国。”《纽约先驱论坛报》的报道则说：“代表大会发表的演说令人心寒，使人意识到共产党中国日益增长的力量。”

英国的《星期日泰晤士报》在评论毛泽东开幕词和刘少奇的政治报告时认为，北京代表大会的气氛“是充满了信心、喜悦、乐观和团结的。这是能够理解的，任何不抱偏见的观察家都将承认这一点”。

巴黎《世界报》9月17日的评论指出：“这次代表大会似乎将成为世界共产主义历史上、特别是中国历史上有意义的日子。”

三、辉煌的成就

- 最佳领导集体的建立
- 毛泽东准备“退位”
- 反对个人崇拜和加强集体领导
- 八大删掉了“毛泽东思想”
- 对社会主要矛盾的论述
- 经济建设方针的确定
- 陈云关于经济体制的新思想

八大的最大成就是采用高度民主的方式，建立了一个最佳领导集体。

八大关于中央委员会以及中央领导机构的选举，采用了高度民主的办法。这主要表现在：

1. 选举采取五个步骤：（1）大会代表自由提名；（2）汇总讨论提名，确定候选人名单；（3）举行第一次预选，确定整个候选人名单（不分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4）举行第二次预选，确定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候选人名单；（5）正式选举。

2. 公布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得票的多少。

3. 八届一中全会选举中央机构高度民主化。中央不提候选人名单，先预选，再正式选举。

八大选举的中央委员会，基本包括了抗战以来党的最优秀的领导干部。这可以从下面的中央委员和中央候补委员名单中看出。

中央委员 97 人（按得票多少顺序排列；得票相同的按姓氏笔划排列）：

毛泽东 刘少奇 林伯渠 邓小平 朱德
周恩来 董必武 陈云 林彪 吴玉章

陈伯达	蔡 畅	李富春	罗荣桓	徐特立
陆定一	罗瑞卿	徐向前	邓颖超	刘伯承
陈 毅	彭德怀	廖承志	李先念	陈 赓
聂荣臻	林 枫	张鼎丞	彭 真	乌兰夫
黄克诚	滕代远	萧劲光	谭 政	柯庆施
粟 裕	贺 龙	王首道	王维舟	邓子恢
李克农	杨尚昆	叶剑英	宋任穷	张云逸
刘 晓	李维汉	王稼祥	康 生	叶季壮
刘澜涛	刘宁一	薄一波	胡乔木	杨秀峰
舒 同	赖若愚	张际春	程子华	陈 郁
刘长胜	伍修权	萧 克	钱 瑛	王从吾
邓 华	马明方	张闻天	谭震林	刘亚楼
李雪峰	陈少敏	李葆华	许光达	王 震
曾 山	林 铁	郑位三	徐海东	萧 华
胡耀邦	赵尔陆	欧阳钦	习仲勋	刘格平
谢富治	安子文	贾拓夫	李立三	黄 敬
李井泉	吴芝圃	吕正操	王树声	陶 铸
曾希圣	陈绍禹	(即王明)。		

候补中央委员 73 人（按得票多少排列，得票相同的按姓氏笔划排列）：

杨献珍	王思茂	杨得志	韦国清	罗贵波
张经武	谢觉哉	叶 飞	杨成武	甘泗淇
章汉夫	潘自力	李大章	许世友	帅孟奇
杨 勇	刘 仁	陈锡联	万 毅	张宗逊
周 扬	黄火青	李 涛	陈奇涵	陈漫远
徐子荣	黄欧东	古大存	李志民	刘澜波
苏振华	冯白驹	周保中	吴 德	奎 璧
张德生	区梦觉	范文澜	朱德海	邵式平

张启龙	黄永胜	李坚真	马文瑞	张霖之
张 玺	王世泰	阎红彦	桑吉悦希	
张达志	高克林	赛福鼎	廖汉生	洪学智
章 蕴	徐 冰	江渭清	廖鲁言	宋时轮
谭启龙	周 桓	钟期光	陈丕显	赵健民
蔡树藩	钱俊瑞	潘复生	蒋南翔	江 华
韩 光	李 昌	王鹤寿	陈正人	

八大选举的中央领导机构及其成员，也充分体现了决策趋于民主化和领导成员德才兼备。特别是陈云和邓小平进入中央领导集体，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是一件具有深远影响的大事。

中央政治局委员由中央七大的 13 个增加至 17 个，除任弼时、高岗已故外，康生、张闻天落选，变成候补委员；增加了邓小平、林彪、罗荣桓、陈毅、李富春、刘伯承、贺龙、李先念，扩大了部队和经济工作领导干部比重。

八届一中全会除确立了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这个领导集体外，还成立了书记处和中央监察委员会。

八届一中全会选举的中共中央领导机构及其成员如下：

中央委员会主席：毛泽东。

中央委员会副主席：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

中央委员会总书记：邓小平。

中央政治局委员：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林彪、林伯渠、董必武、彭真、罗荣桓、陈毅、李富春、彭德怀、刘伯承、贺龙、李先念。

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乌兰夫、张闻天、陆定一、陈伯达、康生、薄一波。

中央政治局常委：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

中央书记处书记：邓小平、彭真、王稼祥、谭震林、谭政、黄克诚、李雪峰。

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刘澜涛、杨尚昆、胡乔木。

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按姓氏笔划排列）：王从吾、王维舟、王维纲、帅孟奇、刘格平、刘锡武、刘澜涛、李士英、李楚离、萧华、吴溉之、高克林、高扬、马明方、张鼎丞、董必武、钱瑛。

中央监察委员会候补委员（按姓氏笔划排列）：王翰、刘其人、李景膺、龚子荣。

中央监察委员会书记：董必武。

中央监察委员会副书记：刘澜涛、萧华、王从吾、钱瑛、刘锡五。

八大通过的党章中有一个新的内容，就是第三章规定：设立主席一人，副主席若干人和总书记一人；中央设立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由主席、副主席和总书记组成；中央政治局和政治局常委会在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闭会期间，行使中央委员会的职权。“中央委员会认为有必要的时候，可以设立中央委员会名誉主席一人。”

早在会前召开的七中全会第三次会议上，毛泽东就说：

我说我们这些人（包括我一个，总司令一个，少奇同志算半个。不包括恩来同志、陈云同志跟小平同志，他们是少壮派），就是做“跑龙套”工作的，我们不能登台演主角，没有那个资格了，只能维持维持，帮助帮助，起这么一个作用。你们不要以为我现在在打“退堂鼓”，想不干事了，的确是身体、年龄、精力各方面都不如别人了。

我是准备好了的，就是到时候就不当主席了，请求同志们委我一个名誉主席。名誉主席是不是不干事呢？照

样干事，只要能够干的都干。

会议期间，毛泽东会见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代表团时又说：

我老了，不能唱主角了，只能跑龙套。你们看，这次党代表大会上我就是跑龙套，而唱戏的是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同志。

1956年1月苏共二十大揭露了斯大林的错误后，在中国共产党内引起巨大震动，如果说斯大林的错误不是制度造成的（中国共产党正是这样认为的），那么比较合理的解释就是个人崇拜造成斯大林“独断专行”，不受制约是他错误的主要原因。这个教训，被八大充分吸收到新的党章中，邓小平在《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中指出：

关于坚持集体领导原则和反对个人崇拜的重要意义，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作了有力的阐明，这些阐明不仅对于苏联共产党，而且对于全世界其他各国共产党，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很明显，个人决定重大问题，是同共产主义政党的建党原则相违背的，是必然要犯错误的，只有联系群众的集体领导，才符合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才便于尽量减少犯错误的机会。

个人崇拜是一种有长远历史的社会现象，这种现象，也不会不在我们党的生活和社会生活中，有它的某些反映。我们的任务是，继续坚决地执行中央反对把个人突出、反对对个人歌功颂德的方针，真正巩固领导者同群众的联系，使党的民主原则和群众路线，在一切方面都得到贯彻地执行。

把“毛泽东思想”作为党的指导思想并写入党章，这是中共七大作出的重要决策，也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标志。刘少奇在七大的修改党章报告中，用了一个整章的篇

幅来论述党的指导思想——毛泽东思想。七大党章中规定：“中国共产党以毛泽东思想作为自己一切工作的指针。”

八大通过的党章则规定：“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自己行动的指南。”另外，在八大形成的所有文件中，都没有提到“毛泽东思想”，也没有说明为什么要从党章中删除“毛泽东思想”这个词。按说，七大以来中国革命的胜利、新中国的日益强大和社会主义改造的顺利进行，似乎都进一步证明了毛泽东思想的存在及其正确性，毛泽东的威信如日中天。因此，八大以后，中外不少人对此猜测不一，认为这引起毛泽东的不快。

实际上，这种变化并不是在八大才发生的。1949年3月召开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曾经规定禁止给党的领导人祝寿，禁止用党的领导人名字作地名、街名和企业的名字，反对在文学艺术中夸大领导者的作用。从那以后，毛泽东在审阅一些重要文件时，他本人就把遇到的“毛泽东思想”这个词改掉或删除。有的改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有的改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

1950年8月19日，在编辑《毛泽东选集》第三卷收入1945年4月中共中央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的决议》时，由毛泽东提议，经中央政治局同意，把“毛泽东思想”一律作了上述处理。

1953年5月24日，在4月3日董必武关于中国政治法律学会召开成立大会给彭真并政法党组干事会的信上，毛泽东批示：“彭真同志：凡有‘毛泽东思想’字样的地方，均应将这字删去。”

1954年2月，中共中央宣传部根据毛泽东的指示精神，专门下发了《关于毛泽东思想应如何解释的通知》。《通知》说：“党章已明确指出：‘毛泽东思想’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它的内容和马克思列宁主义是同一的。”“毛泽东同志曾指示今后不要再用‘毛泽东思想’这

个提法，以免引起重大误解。我们认为今后党内同志写文章做报告，应照毛泽东同志的指示办理。”

正是遵照毛泽东本人的意愿，八大的文件，包括政治报告、党章、修改党章的报告都没有出现“毛泽东思想”的字样。至于大会没有对此作专门解释，不知是认为不需要，还是认为越解释越复杂了。

刘少奇的政治报告提出，随着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完成，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谁战胜谁的问题，现在已经解决了。但是没有提出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我国社会的基本矛盾是什么，主要矛盾是不是阶级矛盾。

八大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则在这方面完善了政治报告这方面的不足。这个决议与一般决议不同，它不是简单地复述和认可报告，而是在非常重要的理论和实际问题上作出了新的论断。并且这些论断事后引起了毛泽东的不满。

决议指出：

我国的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已经基本上解决。

我们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这一矛盾的实质，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建立的情况下，也就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党和全国人民的当前的主要任务，就是要集中力量来解决这个矛盾，把我国尽快地从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

关于“决议”的起草过程，据石仲泉等主编的《中共八大史》说，“决议”的起草动手较晚，是从9月17日才开始的，也

就是八大正式会议开始之后，因此决议的起草和修改时间比较紧迫，不如报告那样从容。

决议的第一稿于9月19日写出，稿子分送大会主席团常委和秘书处。主席团认为不行，于是由胡乔木从头改写，于23日写出第二稿，约8000字。对这一稿，毛泽东可能提出了主要矛盾问题。根据9月24日华北代表团讨论决议草案的记录，华北团在讨论时，介绍了薄一波传达毛泽东意见的情况，其中很重要的一条意见是“要把矛盾突出一下，现在主要是先进与落后”。9月24日写出第三稿，第三稿最重要的修改是增加了关于主要矛盾的内容。关于主要矛盾的论述，第三稿写到：“在基本上解决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以后，我们现在面对着的主要矛盾，是先进的国家制度和社会制度同落后的经济和文化之间的矛盾。”9月26日，根据代表们的修改意见，起草委员会删去了“先进的国家制度和社会制度同落后的经济和文化之间的矛盾”这句话，将其改为“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

经过修改的稿子很快送给毛泽东审阅。毛泽东审完稿子，已经是27日凌晨2点钟。毛泽东改了几个字，并在稿子上批道：“即送胡乔木同志：照此付印，付翻译。”

据石仲泉等主编的《中共八大史》说：根据现存档案，在毛泽东定稿退还胡乔木之后，胡乔木又作了少量的文字修改。其中比较重要的修改是在关于主要矛盾的论述方面，加写了一句话：“这一矛盾的实质，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建立的情况下，也就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加写的这句话与26日删除的那句“先进的国家制度和社会制度同落后的经济和文化之间的矛盾”意思差不多。胡乔木加写这句

话，是在毛泽东定稿之后，不知他是否报告了毛泽东。虽然这句话在大会讨论通过时没有任何人提出异议，但是事后却遭到毛泽东的诟病，认为表述得不够科学。因为马克思主义从来就认为生产关系必须适应生产力，没有说过生产关系可以超越生产力，让生产力去适应生产关系。

今天看来，八大关于社会主要矛盾的论述，在当时不仅符合社会和理论发展的逻辑，也确实符合八大前后党关于将工作重心转到经济建设的思想，有利于社会的安定和经济的发展。但是，就理论与实际的关系来说，这个论断脱离了实际，当时社会的主要问题，并不是先进的社会制度与落后的生产力的矛盾，而是社会主义改造“四过”造成的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不相适应的问题，生产关系必须适应生产力的问题并没有解决。

八大充分吸收了1956年上半年党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探索成果，并以《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和《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的形式将其确定下来。

大会肯定和吸收了毛泽东等人关于农、轻、重产业政策、积累与消费关系的思想，提出优先发展重工业同时兼顾其他，国家建设和人民生活二者必须兼顾。大会虽然重申“必须继续坚持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方针”，“对于优先发展重工业这一基本建设方针不能有任何的忽视”，但是也强调“在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同时，我们必须根据原料、资金的可能和市场的需要，积极发展轻工业”。“应该在农业发展的基础上，适当地加速轻工业的建设，以适应广大人民群众对消费品的日益增长的需要，并且增加国家的资金积累。”“我国目前农业生产还不能适应日益增长的需要，今后必须用更大的力量发展农业。”

大会还根据上半年经济建设出现的“冒进”及纠正“冒进”的经验，提出了“综合平衡、稳步前进”的建设方针。八大在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中明确提出：在反对保守主义的同时，

“我们也必须估计到当前的经济上、财政上和技术力量上的客观限制，估计到保持后备力量的必要，而不应当脱离经济发展的正确比例。如果不估计到这些情况而规定一种过高的速度，结果就会反而妨碍经济的发展和计划的完成，那就是冒险主义的错误。党的任务，就是要随时注意防止和纠正右倾保守的或“左”倾冒险的倾向，积极而又稳妥可靠地推进国民经济的发展”。

大会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还吸收了陈云 1956 年 6 月提出、在八大发言中进一步明确三个“主体”和三个“补充”思想。政治报告决议指出：

这种社会主义的统一市场应当以国家市场为主体，同时附有在一定范围内的国家领导下的自由市场，作为国家市场的补充。

全国工农业产品的主要部分都将列入国家计划，由生产单位按照计划进行生产。但是，为了适应社会的多方面需要，在国家计划许可的范围内，有一部分产品将不列入国家计划，而由生产单位直接按照原料和市场的情况进行生产。

社会主义经济的主体是实行集中经营的，但是也需要有一定范围的分散经营作为补充。

要在城市居民区和农村中保存适当数量的小商小贩，以便利居民日常生活的需要。

手工业生产合作社的组织也不宜过分集中，某些行业还应该适当分散，并且容许一部分手工业，特别是特种手工艺品的生产者继续独立经营。

（武力著《意气风发——1956 年的中国》）

正确与迷误交错：八届三中全会

八届三中全会在继承和发展八大的正确方针的同时，也开始产生了偏离八大正确路线的“左”倾错误，尤其错误地改变了八大关于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正确判断。毛泽东说：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仍然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

(一)

1957年，党中央和毛泽东一方面坚持和发展了八大路线，把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继续推向前进；另一方面，由于国内外的种种原因，在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的理论和实践上，以及在指导经济建设的方针上开始偏离了八大的正确路线，出现了“左”的错误观点和工作指导，对我国的政治生活和经济、文化建设产生了消极影响。这种正确与迷误的交错，比较集中地反映在党的八届三中全会上。

1957年9月20日，八届三中全会在北京举行。这是一次扩大的中央全会。出席会议的有：中央委员91人，候补中央委员62人。中央各单位负责人，各省、市、自治区负责人，各地委、直辖市的区委书记416人也参加了会议。实际上也是一次三级干部会议。

毛泽东在开幕词中说，中央全会扩大会议的议程，原先通知

的是两个问题：整风问题，农村问题。现在合并在一起，因为整风把各方面的问题都提起来了。他还说，在这次会议上，陈云同志准备讲体制问题，恩来同志准备讲劳动工资、劳保福利问题，但主要题目是整风运动。

接着，邓小平作关于整风运动报告。由于这个报告已书面印发与会同志，因而，邓小平的报告，实际上是对关于整风运动报告的一些补充和说明。

9月24日，陈云在全会上作报告。他着重谈了关于工业、商业、财政体制改革和农业增产问题。9月26日，周恩来在全会上作关于劳动工资和劳保福利问题的报告。

10月9日，邓小平作总结发言；最后，毛泽东作了题为《做革命促进派》的长篇讲话。

在会议过程中，朱德、彭真、李富春、李先念、薄一波、邓子恢等围绕会议的议题也发了言。

会议认真地讨论了邓小平、陈云、周恩来的报告。对于中央政治局提交会议讨论修改的文件提出了许多好的意见。在比较充分讨论的基础上，会议通过了上述三个报告，并基本上通过了《1956年到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关于改进工业管理体制的规定（草案）》、《关于改进商业管理体制的规定（草案）》、《关于改进财政体制和划分中央与地方对财政管理权限的规定（草案）》，以及有关工人、职员的劳动工资和劳保福利问题的规定草案等文件。这次会议的结果，对我国革命和建设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实事求是地分析这次会议的正确方面和错误方面，对于我们充分认识八届三中全会在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十年历史中的地位和作用，是有帮助的。

(二)

八届三中全会的正确方面，在于继续贯彻八大路线。这次会议强调把整风运动引向深入，认真改进工作。邓小平指出：“党的领导能否巩固和加强，决定于党的本身，决定于领导是否正确，能否切实改正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他指出整风以来党内党外提出的很多批评意见，绝大部分是正确的，认为必须坚决改变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严重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的现象和特殊化的倾向；改变制度上和组织上一些不合理的规定，调整党政之间和上下之间的关系，纠正过分集中和分散主义的现象。他强调在整风中改进工作是真刀真枪的事情，各级党委必须真抓整改，转变作风，工作才能生气勃勃。同时指出，不真抓整改，唯恐揭露缺点，或利用反右派掩盖自己的错误，甚至对提意见的人进行打击报复，是不能允许的。这些意见无疑是正确的。但是，由于反右派斗争已经出现扩大化的错误，党的指导思想开始发生“左”的偏向，报告虽然对此有所反映，但报告中提出的许多正确意见，后来没有能真正贯彻落实。这次会议，听取并讨论了周恩来的报告，正确估计了建国以来劳动工资和劳保福利工作的工作成绩和缺点错误，明确了今后的方针和政策。会议根据八大的精神，强调今后应当从六亿人口出发，贯彻“统筹兼顾，适当安排”的方针，使全国人民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生活得到改善，提出要把劳动就业、精简机构、改革工资三者结合起来统一安排，特别强调精简脱产人员，压缩机构，节约更多人力、财力促进经济建设。但是，由于1958年轻率地发动了“大跃进”运动，这方面的工作不仅没有做好，反而造成巨大的浪费。这次会议关于经济管理体制改革和发展农业生产方面提出的方针政策，尽管后来也没有完全得到贯彻，但它的基本内容是八大路线的继续和发

展，对促进我国的经济发展，是有积极影响的。

八届三中全会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开始起步的重要标志。这次会议基本通过的经济体制改革的三个文件，其总精神是调整中央和地方、国家和企业的关系，把一部分权力下放给地方和企业。邓小平在会议的总结发言中指出：工业、商业、财政三项体制上的变动，主要的精神是下放一部分权力，以利于发挥地方的积极性，利于加强各种企业和事业的领导，利于克服主观主义和官僚主义。同时，也不致于损害统一领导和重点建设。

这三个文件是在调查研究和总结我国建设经验的过程中形成的。早在50年代中期，党中央对我国经济体制存在集中过多、统得过死等弊端已经开始有所觉察。毛泽东、周恩来、陈云等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先后提出了改革经济体制的问题。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的报告中，对中央和地方等一系列关系问题作了原则的正确阐述。在周恩来主持下国务院在1956年5月到8月召开了全国体制会议，检查了中央集权过多的问题，讨论了改进经济管理体制的原则草案。1956年9月，党的八大对我国经济体制的几个基本问题提出了许多正确的改革意见。陈云根据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的新问题和基本国情，第一次提出了“三个主体、三个补充”的思想。1957年1月，党中央召开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进一步讨论了中央和地方在管理体制上的分权问题。1月27日，陈云在会议总结中指出：毛泽东同志在《论十大关系》中关于这个问题的方针是完全正确的。周总理去年主持的体制会议，原则上也已经把中央和地方分权的问题确定了。现在的问题是把它具体化。他指出：党内的意见并不完全相同，要进一步统一认识。并且提出“去年讨论，今年准备，明年实行”的具体意见。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指定中央经济五人小组再进一步加以研究，于是分别组成工业、商业、财政、农业、交通、文教六个组研究体制问题。会后，国务院各部委同东

北、华北、中南及四川等 12 个省市分批讨论，认为最迫切需要解决的是改进工业体制、改进商业体制、改进财政体制三个问题，并初步形成了改进工业、商业、财政体制的三个文件，提交八届三中全会讨论。

1957 年 9 月 24 日，陈云在八届三中全会上对以上三个文件的内容作了说明。指出改进工业管理体制的主要内容，一方面是增加地方对工业管理的权限，把中央各部所管的工厂下放一部分给地方管，增加地方在物资分配和人事管理方面的权限，另一方面是增加企业领导人员在企业管理方面的权限，减少计划管理方面的指令性指标。他认为商业体制中最大的缺点是条条很多，机构重叠、臃肿，急需加以改进。因而改进商业体制的文件规定：由地方决定建立商业厅、局；一级批发站实行中央为主、地方为辅的双重领导；二级批发站实行省、市为主，当地为辅的双重领导。陈云指出改进财政管理体制的主要内容，一是地方收入分三类：（1）固定收入；（2）企业分成收入；（3）调剂分成收入，这是作为平衡地方收入之用。地方第一类收入不够，中央以第二类收入补助，第一类和第二类两项收入还不够，中央以第三类调剂分成收入补助。二是中央和地方的分成比例，规定以后三年不变，有不适当的地方，再作局部的调整。会议基本上通过了这三个文件，并根据邓小平的建议，把文件交中央政治局修改，然后经过适当程序公布施行。1957 年 11 月，国务院第 61 次全体会议通过了这三个文件。然后又经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 84 次会议原则批准，并以国务院名义正式公布。这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开始起步的标志，也是继续贯彻八大正确路线的重要方面。但是，正像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所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问题的决定》中所指出的：“由于我们党对于如何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毕竟经验不足，由于长期以来在对社会主义的理解上形成了若干不适合实际情况的固定观念，特别是由于一九五

七年以后党在指导思想上的‘左’倾错误的影响，把搞活企业和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种种正确措施当成‘资本主义’，结果就使经济体制上过度集中统一的问题不仅长期得不到解决，而且发展得越来越突出。其间多次实行权力下放，但都只限于调整中央和地方、条条和块块的管理权限，没有触及赋予企业自主权这个要害问题，也就不能跳出原有的框框。”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体制改革的三个文件，同样存在上述的历史局限性。同时，由于不久即开始了全国范围的“大跃进”运动，致使上述体制改革的规定，没有得到切实的贯彻，经济体制方面的不少弊端一直延续了20多年。

八届三中全会着重讨论了农业发展纲要40条，强调要尽快地发展农业生产，重视整顿和巩固农业生产合作社。为此，各地负责同志介绍了本地区的经验，发表了许多正确的意见，陈云、李富春、薄一波、邓子恢等也着重谈了这个问题。邓小平在会议总结发言要点中专门强调了这个问题。毛泽东的讲话也对此阐述了许多重要的意见。

全会强调了发展农业的极端重要性。邓小平认为：现在应该着重宣传发展农业的重要意义。毛泽东指出：过去我们经常讲把我国建成一个工业国，其实也包括了农业现代化。工业与农业必须同时并举。陈云指出：现在看来，农业已成为建设中的弱点。如果第二个五年计划对农业再不加注意，就要晚了，赶不及了。

全会讨论和基本上通过了1956年到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修正草案）。纲要的内容包括农村建设的各个方面，其中最主要的内容是巩固合作社制度；大力提高粮食和其他农作物的产量，要求从1956年起的12年内，不同地区粮食平均每年亩产分别达到400、500、800斤，棉花（皮棉）分别达到40、60、80和100斤；要求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大多数合作社赶上或超过当地富裕中农的水平。全会要求各省在当年秋收以后作出分期

分批达到纲要的具体规划，号召人人对农业的发展尽自己的一份责任。

会上，陈云对于农业的增产问题发表了意见。邓子恢对巩固农业生产合作社问题作了专题发言，认为争取五年时间赶上或超过当地上中农水平，是巩固合作社的基本关键。他还着重谈了农业生产管理工作方面的意见。经全会讨论修改，中央批发了第四次农村工作会议制定的《关于整顿农业生产合作社的指示》、《关于做好农业生产管理工作的指示》、《关于在农业合作社内部贯彻执行互利政策的指示》三个文件，明确地提出了当时巩固农业生产合作社应该解决的几个重大问题：（1）明确规定了整顿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内容，指出整社是巩固农业生产合作制度的重要关键。（2）进一步改进生产管理工作。合作社必须实行“统一经营，分级管理，明确分工，个人负责制”，必须普遍推行“包工、包产、包财务”的“三包制度”，并实行超产提成奖励，减产扣分的办法，必须切实建立集体和个人的生产责任制，分别推行“工包到组”、“田间零活包到户”的办法。中央还指出，大社、大队一般是不适应于当前生产条件的。因此，除少数确实办得好的大社以外，规模过大而没有办好的社，应根据社员的要求，适当分小。所有的合作社，都应在适当增加社员收入的基础上，逐步增加公共积累，扩大再生产。（3）正确执行贫农与中农之间的互利政策是巩固农业生产合作社的一项重要保证。必须通过合理的生产分工和合理的分配制度，既保护贫下中农利益，又切实照顾中农和上中农的利益，以求发展生产，巩固合作社。

全会关于农业问题的决策和意见，完全符合八大的精神，对巩固农业生产合作社，促进农业生产是有积极意义的。可惜，没有实行多久就被人民公社化运动所否定了。

(三)

八届三中全会在继承和发展八大的正确方针的同时，也开始产生了偏离八大正确路线的“左”倾错误。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由于对我国社会阶级斗争形势估计过于严重，全面地肯定了反右派斗争，助长了反右派斗争扩大化的错误，并由此而轻率地改变了八大关于国内主要矛盾的正确结论；二是由于背离了实事求是的思想原则，错误地批判了1956年纠正经济工作中急躁冒进的正确决策，开始背弃了八大所坚持的经济建设方针。这两个方面的错误，是“文化大革命”前党内逐步发展起来的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和社会主义建设问题上“左”倾错误的源头。

第一，八届三中全会错误地改变了八大关于我国主要矛盾的正确论断，造成了严重的政治后果。

党的八大一次会议决议，对我国国内主要矛盾的问题作出了正确的论断。决议指出：“社会主义改造已经取得了决定性胜利，这就表明，我国的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已经基本上解决，几千年来的阶级剥削制度的历史已经基本结束了，社会主义社会制度在我国已经基本上建立起来了。”阶级斗争还将存在，但是，“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因此，“党和全国人民当前的主要任务，就是要集中力量来解决这个矛盾，把我国尽快地从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这个论断是符合马列主义基本原理和我国的实际情况的。

1957年5月，党中央决定开展整风运动。在广大党员和群众发表了许多正确批评意见的同时，国内确实出现了极少数人攻击党、否定社会主义制度的言论。对此党中央于6月8日发出了

《组织力量反击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的指示，开展了反右派斗争。

在这种情况下，有的同志向毛泽东提出，看来八大对矛盾的分析 and 方针任务的规定是不对的。毛泽东对此曾表示确有问题，同时认为八大的路线、方针是大家一致决定的，现在不宜提。但是，没有过多久，毛泽东在《1957年夏季的形势》一文中，就指出“和城市一样，在农村中，仍然有或者是社会主义或者是资本主义，这样两条道路的斗争。这个斗争，需要很长时间，才能取得彻底胜利。这是整个过渡时期的任务”。1957年9月，毛泽东在八届三中全会上正式提出了国内主要矛盾的问题。他认为现在还是要提出两条道路的斗争和两个阶级的矛盾。全会对这个问题开展了讨论。10月7日，毛泽东在组长会议上申述了他对国内主要矛盾的看法。10月8日各组长分别传达了毛泽东对主要矛盾问题的讲话后，各组继续热烈地讨论这个问题。不少同志认为，“八大决议对当前国内主要矛盾的分析仍然是正确的，不能因为这次反右派斗争而改变这种估计”。有的同志指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解决了同三大敌人的矛盾，而过渡时期社会主义改造又解决了生产资料所有制的问题。在这个基础上，八大决议对我国当前主要矛盾的提法是正确的。”但是，有相当一部分同志对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的问题在认识上是比较混乱的。例如有人说，在所有制解决以后，才提出人民内部矛盾是主要的，而其中也包括了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不同的是矛盾的性质已经起了变化。又有人说，八大会议中所提出的主要矛盾同“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两者如何结合起来理解，值得研究。也有一部分同志赞成毛泽东的意见，认为主要矛盾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矛盾。

对于这一重大理论问题，在党内充分展开讨论以求得正确的认识，是十分必要的。但是，10月9日，毛泽东在全会结束前

所作的长篇讲话中，就作出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毫无疑问，这是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的论断。他认为八大决议上讲主要矛盾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这种提法是不对的。此后八大关于主要矛盾的正确论断，便逐步被否定了。

八届三中全会关于国内主要矛盾的错误论断，进一步导致了我们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错误，使党在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的理论和实践方面的错误越来越严重。

第二，八届三中全会错误地批判 1956 年的反冒进，开始背离了八大关于经济建设的正确方针。

1956 年的反冒进本来是正确的，正如 1956 年 9 月，周恩来所指出的：“当我们制定 1956 年计划的时候，由于上年度农业丰收，社会主义改造又取得了巨大的胜利，因而有必要也有可能把国民经济发展的速度定得比较高些。但是我们没有很好地对于基本建设规模和物资供应能力进行适当的平衡，因而把基本建设的规模定得大了一些。同时，国民经济的某些部门也出现了齐头并进和急于求成的倾向。结果，不但财政上比较紧张，而且引起了钢材、水泥、木材等各种建筑材料严重不足的现象，从而过多地动用了国家的物资储备，并且造成国民经济各方面相当紧张的局面。”当时，党中央肯定了周恩来和陈云等同志的正确意见，采取了积极稳妥的措施和步骤加以纠正，使这种倾向没有盲目发展下去，减少了不必要的损失。这次纠正急躁冒进的经验，为八大所坚持的既反保守又反冒进即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经济建设方针提供了重要的依据。1956 年 11 月举行的八届二中全会，再次肯定了反对冒进的方针。这个反对经济建设中急躁冒进的思想，还直接指导了 1957 年计划的编制，并使 1957 年经济工作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然而，到了八届三中全会，情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毛泽东

在会议结束前的讲话中，第一次在党内公开批评 1956 年的反冒进。他说：“去年这一年扫掉了几个东西。一个是扫掉了多、快、好、省。不要多了，不要快了，至于好、省，也附带扫掉了。”“有些同志叫‘冒’了。”“还扫掉了农业发展纲要 40 条。这个‘四十条’去年以来不吃香了，现在又‘复辟’了。”“还扫掉促进委员会。”他强调：我们总的方针，总是要促进的。他认为去年反冒进是给群众泼了凉水，损害了他们的积极性。这表明党的最高领导人在经济工作的指导上，已经开始抛弃八大所坚持的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经济建设方针。

从八届三中全会开始到 1958 年 5 月八大二次会议，接连不断地对 1956 年的反冒进进行错误的批判，同时，八大关于经济建设的正确方针也被“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所取代了。正是由于这一忽视客观经济发展规律的总路线的提出，相伴而来的就是轻率地发动了“大跃进”运动和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使得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严重地泛滥开来。由此可见，1958 年开始的三年“左”倾冒进，同八届三中全会对 1956 年反冒进的错误批判是有直接的内在联系的。

（陈雪薇：《八届三中全会述评》）

“大跃进”的序幕：1958年南宁会议

毛泽东在会上再次批评了1956年的反冒进，说反冒进使六亿人民泄了气，是方针性错误。毛泽东还说：“向人代大会的报告，我两年没有看了（为了照顾团结，不登报声明，说我不负责）。”“很多文件是闭着眼睛强迫签字的。大概你们像那个茶花女一样，见爱人时总要打扮得漂漂亮亮，临死之前还是如此。你们为什么不能像农家姑娘一样，可以蓬头散发见面呀！”

狠批反冒进

1958年1月11日至22日的南宁会议，有两大内容：一是毛泽东对过去经济工作的批评，主要是进一步批判反冒进；二是关于工作作风与方法问题，产生了《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会上听取了薄一波关于1958年经济计划和预算问题的汇报，一些省市也汇报了与此有关的情况。毛泽东于1月11日、12日、13日、16日先后4次讲话，并于15日、16日、17日、19日、20日听取汇报时，插了许多话。

毛泽东在三中全会上批评反冒进，形成要加快建设速度首先在农业上突破的想法。1957年11月13日《人民日报》社论（《发动全民讨论40条纲要，掀起农业生产的新高潮》），是经过毛泽东亲自审定的，认为1956年公布了《纲要》以后，已经

“造成了全国农业生产的高潮”。全国已经有 29 个县市达到 400 斤、500 斤、800 斤的指标；广东和福建有 7 个千斤县；湖北红安县土地瘠薄，今年平均亩产已达 834 斤（这些指标是否浮夸，史家应予鉴定）。接着就批评 1956 年反冒进的错误：“有些人害了右倾保守的毛病，像蜗牛一样爬行得很慢，他们不了解在农业合作化以后，我们就有条件也有必要在生产战线上来一个大的跃进。这是符合于客观规律的。1956 年的成绩充分反映了这种跃进式发展的正确性。有右倾保守思想的人，因为不懂得这个道理，不了解合作化以后农民伟大的创造性，所以他们认为农业发展纲要草案是‘冒进了’。他们把正确的跃进看成了冒进。”社论最后号召：“让我们展开全民大讨论，动员全国的力量，万众一心地行动起来，掀起一个规模巨大的农业生产建设的高潮吧！”这是通过报纸对反冒进的第一次公开批判，“大跃进”一词也是首先在报纸上出现。毛泽东对此非常欣赏，说这是一个伟大的发明，这个口号剥夺了反冒进的口号。他在社论的批语中写道：“建议把一号博士头衔赠给发明‘跃进’这个伟大口号的那一位（或者几位）科学家。”12月12日，《人民日报》又发表了《必须坚持多快好省的建设方针》的社论，这篇社论也经过毛泽东的修改审定。文中再次批评了反冒进，称 1956 年的国民经济为“跃进的发展”，这个方针完全正确，可是，“还有少数有保守思想的人实际上在反对这个方针”。“在去年秋天以后的一段时间里，在某些部门、某些单位、某些干部中间刮起来一股风，居然把多快好省的方针刮掉了”，引起了消极的“促退作用”。社论要求“1958 年的各项计划指标订得尽可能先进些”。这篇社论的精神，可以认为代表了毛泽东最初的“大跃进”思想，即至少应当有冒进的 1956 年那样的增长速度。

这是舆论方面的响应。地方上的响应呢？毛泽东在三中全会上的两个重大意见，即关于八大国内主要矛盾提法的改变，批评

反冒进以加快建设速度，首先在上海和浙江得到最积极的响应。两地都在党的四级干部会或党的代表大会上予以热烈讨论，负责人的报告都形成了文件并予发表。其中柯庆施的报告最被看重。因此，趁热打铁，1958年1月3日至8日，毛泽东亲自到杭州召开了华东六省市党的负责人会议，并有两次较长的讲话。会议所涉及的问题以及讨论中形成的十几条工作方法，可视为南宁会议的开端。毛泽东的两次讲话都谈到右派和右派分子处理问题，以及两类矛盾问题；认为如果没有1956年的跃进，工业产值比上年增长31%，就不能完成五年计划。会议中提出讨论的问题，主要是农业纲要中的12项规划（水、肥、土壤、品种、密植、病虫害、农业机械、副业、畜牧、绿化、除四害、地方病），以及经济和文教12项规划（工业、手工业、农业、副业、林业、渔业、牧业、交通、商业、文教、科学、卫生）。确定从中央到地方各级，都要搞十年规划；几次检查，年终评比。今后一年要开一二次大中型会，小型会下去开。省委负责人要常下去跑跑，走马观花，下马看花，一年用4个月下去。毛泽东谈到的其他问题还有：政治与业务要结合，即红与专的问题；要反对空头政治家，也要反对迷失方向的经济家，科学家；称赞湖北省委领导干部搞试验田，麻城、红安两县经验要推广，要普遍搞试验田；工业部门也可搞试制品，这是领导方法问题。提出不断革命问题，农业改造两三年完成，不能断气，要趁热打铁，不能去“建立新民主主义秩序”，然后再破坏，得花力气，因资产阶级思想扎了根（东欧的教训就是断了气）；思想战线、政治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整风运动的办法，应长期进行；今后重点放在技术革命，政治家与科学家结合起来。他从事物的相对稳定性谈到订计划、做决议，是相对地平衡，而不平衡、闹矛盾是绝对的；企业与企业间、个人与个人间，是不平衡的。不平衡不仅是社会法则，也是宇宙法则；刚刚平衡，立即突破；刚刚平衡，又不平

衡。早在1955年12月，刘少奇在一次有在京中央委员参加的党政军各部负责人的座谈会上，传达毛泽东关于批判右倾保守思想，争取提前完成过渡时期总任务的指示时，其中就有这样一段话：“客观事物的发展是不平衡的，平衡不断被冲破是好事。不要按平衡办事，按平衡办事的单位就有问题。”这个不平衡的哲学思想，是毛泽东在“大跃进”时期经常谈到的观点，后来成为计划工作的理论根据，导致做计划的随意翻番乃至无法做计划，这是后话了。这里谈到的一些问题，后来在南宁会议上又继续谈开或有新的发挥。概括起来，最后形成的《工作方法六十条》，其中有十多条是杭州会议议论过的。

在这次会议上，柯庆施特别提到要有干劲等问题，受到称赞。杭州会议还提出全国按原来大区（中央局），搞成几个经济协作区，有的省可交叉，认庙不认神。八大二次会议后，1958年6月初，全国划分为东北、华北、华东、华南、华中、西南、西北7个协作区。

南宁会议是紧接着杭州会议开的，可以说是杭州会议的继续。由于部分党中央和国务院负责人、各大区（协作区）负责人和中南各省第一书记参加了，会议时间较长，讨论的重大问题也多，最后形成了《工作方法六十条》，所以史家称南宁会议为发动“大跃进”最初的一次会议。1月11日、12日，毛泽东接连讲了两句话；14日，集中讲了24条工作方法。之后，在各省和中央财经负责人作关于1958年计划汇报时，毛泽东又有许多插话，这些分散的意见或者即兴之言，还有讨论时的部分众人之言，几条几条凑起来，有分有合，总结了我国革命多年来的经验，也总结了国际共运的经验，最后形成了《六十条》。这个集当年“工作方法”之大成的重要文件，其中有许多光辉的思想、值得永远学习的工作方法，也有不少是推动了“大跃进”狂潮的错误的东西。可以作这样的看法，产生这个《六十条》的原动

力，是1956年和1957年这两年发生的国内外重大事件：反冒进，右派鸣放，整风、反右，农业尤其水利“高潮”中出现的最初高指标，以及斯大林问题和波匈事件。毛泽东以“反潮流”的大无畏精神，以“呼风唤雨”的英雄气概，从尽快改变中国“一穷二白”的愿望出发，想用最短时间超英赶美，使中国迅速强大富裕起来，从而发动了轰动全国也震惊世界的“大跃进”运动。《工作方法六十条》的草稿，1月31日就印出来了。

三中全会批评反冒进，是从经济方针来谈；南宁会议时，前前后后，反反复复，多次谈及此事，主要将反冒进同政治联系起来，同右派进攻联系起来，是大政治问题；认为这个问题必须从思想上，政治上彻底澄清，否则，无法前进。虽然语言上照例生动风趣，但辞锋犀利，甚至偶带挖苦，有时还不免疾言厉色。现集纳如下：

——不要提“反冒进”这个名词好不好？这是政治问题。一反就泄了气，六亿人民一泄了气，不得了。十个指头问题要搞清楚，伸出手看看，究竟有几个指头生了疮？不过一个指头有毛病，不过多用了一些钱，多用了些人，就“库空如洗”呀，“市场紧张”呀。只讲一个指头长了疮，就不会形成一股风。吹掉了三个东西：一为多快好省，二为四十条纲要，三为促进委员会。这些都是属于政治问题，而不属于业务。一个指头有毛病，治一下就好了，原来“库空如洗”，“市场紧张”，过了半年不就变了吗？钱多花了，计划大了，要批评，我也批评过，如广东，河北通县专区产量定得过高。我是“抱着石头打泡湫”（湖南土语：游泳），做事历来是稳当的。

——十个指头是关系六亿人的问题。对于我们共产党，对于我们的事业来讲，总是九个指头是好的，不过一个指头有毛病。那就是究竟成绩是主要的，还是错误是主要的？是保护热情，鼓励干劲，乘风破浪，还是泼冷水，搞泄气，使整个工作受到很大

损失的问题。这一点被右派抓住了，来了一个全面“反冒进”。陈铭枢批评我“好大喜功，偏听偏信，喜怒无常，不爱古董”。张奚若（未划右派）批评我“好大喜功，急功近利，轻视过去，迷信将来”。陈叔通也讲过：“我看方针是冒进为主，保守为副。”过去北方亩产一百多斤，南方二三百斤；蒋委员长积20年之经验，只给我们留下4万吨钢（年产）。“好大喜功”，看什么大，什么功，是反革命的好大喜功，还是革命的好大喜功。不好大，难道好小？中国这样大的革命，这样大的合作社，这样大的整风，都是大，都是功。不喜功，难道喜过？“急功近利”，不要功，难道要过？不要对人民有利，难道要有害？“轻视过去”，轻视小脚，轻视辫子，难道不好？北京、开封的房子，我看了就不舒服，青岛、长春的房子就好。我们不轻视过去，迷信将来，还有什么希望？“偏听偏信”，不偏听不可能，是偏听资产阶级，还是偏听无产阶级的问题。有些同志偏得不够，还是要偏。我们不能偏听梁漱溟、陈铭枢的。“喜怒无常”，有常，也并不好，不能对资产阶级右派老是喜欢。“不爱古董”，这是比先进，还是比后进的问题，古董总落后一些嘛。我们除四害，把苍蝇、蚊子消灭了，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总是后来居上，不是“今不如古”，古董不可不好，也不可太好。北京拆牌楼，城门打洞，也哭鼻子。这是政治问题。

——1956年“冒进”，1957年反“冒进”，1958年恢复“冒进”。看是“冒进”好，还是反“冒进”好（这里举了河北和安徽两个例子，后者曾载《人民日报》社论《乘风破浪》）。河北兴修水利，1956年1700万亩，1957年200万亩，1958年2700万亩。治淮河，七八年共花了12亿元，只做了12亿土方；安徽去冬今春8亿土方已超额完成，决定再做8亿土方（随后报纸公布，去冬今春共搞16亿土方），一共不过用几千万元。双轮双铧犁，浙江发动全省讨论，浙江、安徽、两湖都能用（周小舟发言

时，谈到双轮双铧犁推广中确有缺点)，要为双轮双铧犁恢复名誉，重新用。扫盲，路上挂识字牌，还要坚持。

——我乃罪魁祸首。1955年12月写了《农业社会主义高潮》一书序言，反了右倾保守，对全国发生了很大影响。是个人崇拜也好，偶像崇拜也好，不管是什么原因，各地大小报纸刊物都登了。这样，我就成了“冒进”的罪魁祸首。后来又心血来潮，找了34个部长谈话（大家劲都很足），谈了十大关系，就头脑发胀了，“冒进”了，我就不敢接近部长了。三中全会，我讲去年砍掉了三个东西，没人反对，我得彩了，又复辟了，就又有勇气找部长谈话了。这三年有个曲折，右派一攻，把我们一些同志抛到离右派只有50米远了。右派来了个全面反“冒进”，什么“今不如昔”，“冒进比保守损失大”。研究一下，究竟哪个大？（谈到此处，就提出1956年6月20日《人民日报》社论《要反对保守主义，也要反对急躁情绪》的问题。）

——这是一篇反“冒进”的社论，既要反右倾保守，又要反急躁冒进，好像“有理三扁担，无理扁担三”。实际重点是反“冒进”的，不是一个指头有了病。这篇社论，我批了“不看”二字，骂我的，为什么要看？那么恐慌，那么动摇。只有一个指头有病，是9与1之比。这篇东西没有弄清这个比例关系，这就是资产阶级的方法，像陈叔通、黄炎培、陈铭枢的方法。社论针对谁？是针对我的“序言”提出批评。又引用了我在“序言”中讲的一段话（按：社论引了这一段：“人们的思想必须适应已经变化了的情况。当然任何人不可以无根据地胡思乱想，不可以超越客观所许可的条件去计划自己的行动，不要勉强地去做那些实在做不到的事情。”）。我的文章重点不在此，而在反右倾保守，要引就应引用全文（引用全文就否定自己了）。文章把我撇开，又要利用我。一不麻烦我，二可利用我打别人。

——我要争取讲话。1956年1月至11月反“冒进”。二中

全会我讲了7条，是妥协方案，解决得不彻底。省市委书记会议，承认部分钱花得不当，未讲透，那股反“冒进”的风就刮普遍了。廖鲁言（农业部长）向我反映，四十条被吹掉了，似乎并不可惜。对此可惜的人有多少？叹了一口气的人有多少？一下吹掉了三个东西。有三种人：第一种人说，“吹掉了四十条，中国方能得救”；第二种人是中间派，不痛不痒，蚊子咬一口，拍一巴掌就算了；第三种人叹气。总要分清国共界限，是国民党是促进的，还是共产党是促进的？

——反“冒进”的人为党为国，忧虑无穷，脱离了大多数部长和省委书记，脱离了六亿人民。请看一篇文章，宋玉的《登徒子好色赋》，此文使登徒子2000年不得翻身。宋玉的方法是，攻其一点，不及其余。九个指头不说，只说一个指头，就是这种方法。我们就怕六亿人民没有劲。不是讲群众路线吗？六亿人民泄了气，还有什么群众路线？看问题，要从六亿人民出发，要分清事情的主流、本质、现象。

——5月间右派反攻，使得那些有右倾思想的同志提高了觉悟，这是右派的功劳，也是激将法。

认为反冒进的矛头是针对“序言”，是同历史方向背道而驰，挫伤了广大干部和群众的积极性，乃至同右派只差50米远了……两年来，对1956年那篇《人民日报》的社论，毛泽东是一直耿耿于怀的，只有到南宁会议时，才将这些看法一一道出。首当其冲的是周恩来和陈云（陈没有参加会议）。在八大之前，最后修改二五计划草案时，鉴于多快同好省之间的关系，人们往往只抓住前者而忽略后者，周恩来曾在一个重要之处删掉了“多快好省的精神”几个字。此事在会上，也被毛泽东一再提出。因此会议形势极其紧张，有的同志晚上睡不着觉。当时，立即从北京把社论原件找了来。原来社论是由中央宣传部起草的，先后经过陆定一、刘少奇、胡乔木三人修改定稿。少奇批示：“主席审阅

后交乔木办。”35年之后的现在，我们重读这篇著名的“历史文献”，会感到这篇文章虽然重点在反对急躁冒进，但也确实处处照顾了题目的另一面，“要反对保守主义”。文章一开头就肯定了1955年下半年以来，“反对保守主义的斗争”已经取得重大效果，即全国已有90%以上农户加入了生产合作社，私营手工业和工商业改造也已基本完成。“社会主义革命高潮的鼓舞下，广大工农群众生产热情空前高涨。”引用“序言”中那一段话，也恰到好处。而且在“什么是右倾保守，什么是急躁冒进，这里有一个客观标准的，这个标准就是实际的可能性”，这样一段论述之后，还有以下一段话：“我们应当根据事实下判断，是什么偏向，就反对什么偏向，有多大错误，就纠正多大错误，万不可一股风，扩大化，把什么都反成保守主义，或者都反成急躁冒进。如果反对过火，就会反了一面又造成另一面的偏向，于工作反而有害。”文中关于急躁冒进的具体例子只举了两个，一个是双轮双铧犁，“生产计划定得过高，没有考虑到南方水田的条件，以致在南方水田区大量积压”。另一个是农村扫盲，中央本来规定的时间是五至七年，可是“至某些县里成了三年，愈到下面定的时间愈短”。以致农忙时也大搞，“个别的地方甚至设立识字岗、拦路识字站，强迫群众识字”，“妨碍农民生产，招致农民埋怨之外，并收不到好的效果”。据薄一波著《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说：“乔木同志加写的双轮双铧犁的例子，定一同志修改突出的扫盲例子，在当时是比较敏感的两件事，因为都直接涉及毛主席亲自主持制定的《农业发展纲要（草案）》。为适应农业合作化后的新情况，推广新式农具，纲要规定：‘在三年至五年内，推广双轮双铧犁600万部。’在急于求成的气氛下，1956年原设想生产500万部，后来计划安排生产350万部，推销270万部，但仍满足不了各地需要，以致中央在4月19日不得不致电各省委，说明全国钢材紧张，不能按原计划组织生产，要求

各地降低生产和销售指标。结果，却因为没有考虑到这种犁根本不能用于南方水田，以致到10月底，虽生产出170多万部，却只销出80万部，还退回15万部；没有退回的也有一部分是只能挂在墙上无法使用的‘挂犁’。”

应当说，这篇社论完全符合毛泽东思想实事求是的精神，完全是从当时客观实际情况出发提出意见的，也就自然要联系毛泽东最近的教导。社论在引出“序言”中那段话之后说道：“现在的情况正是有些同志违背了毛主席的这一指示，超越了客观情况所允许的条件去计划自己的行动，去硬办一些一时还办不到的事情。”然后，农业方面举了扫盲的例子，工业方面举了双轮双铧犁的例子。特别引起毛泽东不快的，可能还在下面这两段话：

“急躁情绪所以成为严重问题，是因为它不但是存在在下面的干部中，而且首先存在在上面各系统的领导干部中，下面的急躁冒进有很多就是上面逼出来的。全国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一出来，各个系统都不愿别人说自己右倾保守，都争先恐后地用过高的标准向下布置工作，条条下达，而且都要求得很急，各部门都希望自己的工作很快做出成绩来。”

“为什么反对了右倾保守之后，在有些工作中又发生了盲目冒进的偏向呢？这主要是由于我们思想方法上的片面性造成的。由于没有运用辩证法的方法，没有从事物的复杂的矛盾和联系中全面地观察问题，只从一个方面，一个角度去看问题，就把许多问题看得太死、太绝对化。又由于缺乏深入的调查研究工作，对实际情况了解得不够，心中无数，有盲目性，在这种情况下，处理事情就当然容易偏于一面，发生片面性，在反保守主义之后，特别是中央提出‘又多、又快、又好、又省’的方针和发布《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之后，在许多同志头脑中就产生了一种片面性。他们以为既然要反对保守主义，既然方针是‘又多、又快、又好、又省’，既然要执行四十条，于是一切工作，不分

缓急轻重，也不问客观条件是否可能，一律求多求快，百废俱兴，齐头并进，企图在一个早晨即把一切事情办好。这样由一个极端到另一个极端当然免不了要犯错误。”关于怎样正确了解多快好省方针，防止片面化，绝对化，社论特加论述。最后说道：“总之，做任何工作，都要善于把上面的方针、要求与本地区、本单位的实际情况结合起来，从实际情况出发去考虑和确定自己的工作步骤。只有这样，才不至于犯右倾保守或者急躁冒进的错误。”

我们党的漫长历史说明，革命精神与“左”倾急躁总是结缘不解。对于1955年农业改造高潮之后出现的这种积习和传统，这篇社论是触及到了的。同随后而来的“大跃进”那阵十级台风相比，当时冒进之风不过“起于青萍之末”罢了。可是，这样一种及时敲响的小小警钟，并已经事实证明是敲得及时的警钟，硬是听不进去，听进去的人也多连忙“洗耳”不止。对一篇符合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精神的文章的错误批判，竟然导致历史的逆向发展，这确实是任何人也始料不及的。

我没有去查证过，不知当年这篇针砭时弊——反对急躁冒进，反对片面性盲目性的社论，是否是1958年至1978年这20年间，《人民日报》敲响的最后一声警钟？然而，历史确在嘲弄这篇社论。既然是冒进的“罪魁祸首”，南宁会议后发生的事情，似乎是理所当然地要按照它所指责的反其道而行之：你们不是反对急躁冒进吧？请看我们急躁冒进到何种程度吧；你们不是反对片面性吗？请看我们做到怎样的片面性吧；你们不是反对盲目性吗？请看我们达到何等的盲目性吧；你们不是说不要只顾多快而不顾好省吗？请看我们的各种“卫星”是怎样上天的吧。

除开批判“反冒进”之外，南宁会议上受到批评的还有国务院尤其经济系统的工作作风问题，主要是报党中央主席的重要文件只拿最后成品，逼着签字，这实际是一种“封锁”。又附带批

评了分散主义，说这回是攻击部长以上的人，攻击“下倾盆大雨”的人。在谈到这方面问题时，提出“务虚”与“务实”的问题，“虚业”与“实业”即思想政治和专业实务如何统一结合的问题，其中有具体的中肯批评。这个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要求，在“大跃进”时期，是广大干部经常念道，却又难以结合好的一种苦恼。这方面的批评也是令人极其紧张的，仍集纳如下：

——会议的开场白即说道：向人代大会的报告，我两年没有看了（为了照顾团结，不登报声明，说我不负责）。章伯钧说国务院只给成品，不让参加设计，我很同情。不过他是搞资产阶级政治设计院，我们是无产阶级政治设计院。有些人一来就是成品，明天就开会，等于强迫签字。平时不给一点情报，不下一点毛毛雨，四时八节要开会了，一个成品拿来了，倾盆大雨下给我们。我们都是如团粒结构不够的土壤，怎么能吸收得了呢？水都从地表流走了。你们平时就不跟我们通气，不拿一点半成品、原材料来，一定要等到你们把什么都搞好了，才拿给我们，这实际上对我们是一种封锁。很多文件是闭着眼睛强迫签字的。大概你们像那个茶花女一样，见爱人时总要打扮得漂漂亮亮，临死之前还是如此。你们为什么不能像农家姑娘一样，可以蓬头散发见面呀！农业纲要40条，最初是8条，后来是17条，同地方的同志多次交谈议论，最后才形成40条。这回先到杭州，同华东同志谈了十几条；在这里又谈了20多条。做汇报要离开本子讲问题，把主要思想提出来交谈，说明为什么要这样办，不那样办，财经部门不向政治局通情报，报告也一般不大好议论，写得不讲考据之学、辞章之学和义理之学，前者是修辞问题，后者是概念和推理问题。

——党委方面的同志，主要危险是“红而不专”，偏于空头政治家，脱离实际，不专，也就会慢慢地褪色了。我们是搞“虚业”的，你们是搞“实业”的，“实业”和“虚业”应当结合起

来。搞“实业”的，要搞点政治；搞“虚业”的，要研究点“实业”。搞“实业”的人不同政治结合，脱离了政治，那就会成为灰色的或白色的，就会成为迷失方向的实际家、科学家、经济学家或艺术家。思想政治是统帅，是灵魂。红安县搞试验田的报告，是一个很重要的文件，我读了两遍，请你们都读一遍。红安县报告中所说的“四多”、“三要”、“三不要”，是全国带普遍性的毛病。就是对“实业”方面的事不甚了解，而又要领导。这一条不解决，批评别人专而不红，就没有力气。党委领导要有三条：工业、农业、思想。省委也要搞点试验田，如何？不然，空头政治家也就会变色。管“实业”的人，当了大官、中官、小官，自己早以为自己红了，钻到那“实业”里面出不来，义理之学也不讲了。北京工作的同志不下去跑跑，不动脑筋，光在那里罗列事实。于是局长领导部长，秘书专政。北京难出真理，真理常在下面。

——中央只揽了一个革命，一个农业，其他实权在国务院。有人反对党政不分，想把大权揽过去，让党委搞点小权，最好的好意也是想将一半大权揽过来。这样就没有集中了。集中只能集中到党委，到政治局、书记处、常委，只能有一个核心。为了反对分散主义，我编了8句口诀，“大权独揽，小权分散”那32个字。

我们打了20多年仗，打仗必须发动群众。土改也是要发动群众，历来反对恩赐观点。社会主义发动群众应当更充分些。大鸣大放，发动群众。为搞水利，不发动群众不行。冒进是全国人民热潮冲起来的，是好事（只有部分是坏事，九个指头与一个指头）。搞工业，搞农业，难道比打仗还厉害些？我就不相信。搞经济就那么复杂，那么多学问？

有一次插话中还谈到：唐朝诗人三李（李白、李商隐、李贺）有点幻想，令人喜读；光搞现实主义这一面不好。

在南宁会议上，形势当然是一边倒。与会者都程度不同地接受了毛泽东的教诲，“头脑大大清醒起来”，都表示要当促进派。记得三峡问题谈完后，周小舟向我介绍那几十条时，说大家都希望主席多谈一些，多受到一些启发，甚至表示他也不想将英文捡起来。李井泉等人还从自己的工作出发，说明“反冒进”受到的损失；有不少人汇报时，谈了反省性的意见。批反冒进首当其冲的是周恩来、陈云，以及国务院财经方面负责人，他们曾是反冒进的主角。周恩来除在会议上表态外，还单独向毛泽东作了检讨。事实上，凡犯有“反冒进”错误的人，都得一再检讨下去。后来在1958年5月八大二次会议上，周恩来和陈云等都为此又作了正式书面检讨。

在南宁会议上再次受到表扬的是柯庆施，以及湖北的王任重等。1月15日，毛泽东在会上说：上海对内部矛盾问题的讲法，有所发展，他们搞了两个月；浙江对此也有创造。各省理论怎样？没有理论，领导困难。中央工作同志不动脑筋。这一下把中央许多同志比下去了。1月16日，毛泽东在会上又说：柯庆施“乘风破浪”的文章很好。上海有100万工人，也是资产阶级集中的地方，才能产生出这篇文章。北京不是没有也，不多也。任何一省委、部委，特别《人民日报》，主要东西，宁少勿多，认真搞，是并不难的。省委、各部都忙得要死，昼夜奔忙，不搞考据之学、辞章之学、义理之学。1月15日，湖北汇报时，毛泽东赞扬说：真理在湖北，为什么不在别处？他们十年计划能六年完成，农业能如此，工业为何做不到？问题是过去没有抓。在南宁会议上，柯庆施成了头号标兵。有些人就表示，我们要“赶上柯老，我们要赶”。

在讨论1958年计划草案时，大家贯彻对反冒进的批判精神，都尽可能要“赶上去”。会议根据国家经委汇报制定的1958年国民经济计划草案，比1957年2月全国计划会议刚确定的指标，

又大大提高了一步（工业总产值增长指标12月为10.4%），主要项目的增长速度为：工业总产值15.1%，农业总产值6.5%，基建投资12%，钢17%，生铁22%，煤16%，发电量15%，粮食5.9%，棉花6.7%。这个增长速度已经超过了当时正常发展所能达到的高度，但同随后成都会议、八大二次会议到北戴河会议所定的高指标比，又瞠乎其后了。

南宁会议所开始造成的后果，首先是经济上比1956年更严重的急躁冒进，急于求成的错误从此一发不可收拾。八大通过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指标，以及经济建设上积极稳妥、综合平衡的方针，统统置诸脑后了，而以盲目追求多快、打破平衡的方针代之。

其次，经济问题变成政治问题。反冒进为右派所喜，为右派言论，冒进为左派所好，为革命精神；冒进是发动群众的，马克思主义的，反冒进是不依靠群众的，非马克思主义的；前者轰轰烈烈，多快好省，后者冷冷清清，少慢差费。党内历史上有过的只能反右、不能反“左”的传统恶习，错误的所谓反倾向的“路线斗争”，在新的历史时期——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又以“两种思想、两种方法、两条路线斗争”的分野，重新出现。从而不仅对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而且对整个政治社会生活，带来日益严重的影响。

第三，党内组织生活开始出现个人专断的格局。民主集中制和集体领导制，无产阶级政党这一有史以来的基本原则，从此遭到严重破坏。党的八大所通过的一系列正确决策，1956年反冒进以来一系列正确的经济建设方针，包括二五计划的一些主要指标，本来都是党中央常委和政治局集体领导的决策，毛泽东本人也是同意的，但最后在南宁会议这样的会议上，对本来集体决定的正确东西，进行不容反驳的无理指责，如同对待右派一样，过火批判，予以否定。从此，这种中央主席个人专断个人随心所欲

的局面，就再也难以改变了。

回顾一下，南宁会议为何形成如此一边倒的局面？除开外部的反右形势和斯大林问题、波匈事件等有关外，当然，这同毛泽东的历史威信和对他的“个人崇拜”有关，也同党内民主生活已经不很正常有关，特别是还同那些极力迎合也敢胡思乱想的人有关。从更广泛的范围或就当时全党干部的认识来看，可不可以这样说，总存在一个同“左”的东西“结缘不解”的问题。多年的历史说明，“左”似乎是共产党员安身立命之处：不怕“左”，不怕“过火”。不怕“冒进”，而只怕被认为“右倾”、“保守”；因为不论怎样，前者是保险的，是“为了革命”，而后者是“立场问题”，“不想革命”，甚或“阶级异己”、“反革命”问题。这是一种自觉或不自觉的存在意识。人们啊，谁不怕戴“右倾”或“右派”的帽子呢！

《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

回到北京三四天后的一个晚上，我去看望黄克诚。我们是1952年9月一起调到北京的。来京后，每年总要去看望两三次，有一次还是请他帮助，要部队的转业干部。南宁会议的情况他已清楚，我谈了这次的“奇遇”和自己的担心，也谈到毛主席有如抗战初期的兴奋状态。入党多年来遇到的领导，黄克诚是最能让人随便交谈、可以交心的人。落坐还只有刻把钟，忽然中南海主席处来电话，要我立即去。

从颐年堂的正门进去，来到现在让人们参观的起居工作的菊香书屋，庭院和房屋一仍旧式。毛泽东穿着那件成为文物的旧毛巾睡衣，半靠半卧在宽阔的板床上。见我进来让我坐在靠近床边的椅子上。谭震林正坐在沙发上同他谈话。谭是认识的，1956年新安江上马前，我到上海找华东局要干部，是由他主持商定，

让淮委支持，并派人同我去蚌埠找过淮委负责人。这时，谭正在谈淮北如何水网化的问题，说可以变成江南一样的产稻区，办法是搞小型水利为主。我同水利的最早接触，是在延安《解放日报》评论部工作时。评论部分解放区、陕甘宁和大后方三个组，我负责解放区组。除开新华社的电讯外，还经常翻阅华北、华中敌后解放区的报纸。1943年，我写了一篇几年来解放区水利事业成就的综合报道，附有一份详细的统计表，同国民党当时的水利加以对比，并写了一篇以《敌后解放区的水利事业》为题的社论（“解放区”这一名词也是第一次在《解放日报》上出现），说明烽火连天的敌后解放区，在水利事业上，比国民党的大后方成就要大得多。这篇报导引起毛主席和中央同志的重视，后来在《论联合政府》中曾予提及。因此，我对小型水利的作用印象很深，对几年来水利系统的好大作风，不以为然，当问到我对淮北水利意见时，虽然并不了解具体情况，仍随声附和回答了一句：赞成搞小型水利。引起毛泽东一句话：呵，你也赞成。不久，谭震林就起身走了。

当他俩谈着话时，我注意了一下室内情况：这张大板床的另一半，堆满了种种线装书；远处靠墙是一列书架，上面绝大部分也是线装书；两个大沙发对着床放着，靠床头还有一个较大茶几（这也是就餐时的饭桌）。后来我去卫生间，发现一个方凳上有一本线装《红楼梦》，正打开平放着。原来听说，每逢外出，总要带一大批书。至此，落实了这个印象：手不释卷，置身于书海之中。这个晚上还谈过些什么，已记不清楚；记得最确切的是，我提了这样一个问题：今后您要我注意哪些方面的事？回答真是出乎意外：中华人民共和国。随即将一份打印的《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给我（封面上有“毛泽东同志”楷体蓝色印字），这是他自己用的一份，要我过细看看，提些意见。

我的旧档中有一叠《对六十条的意见》，共25页纸，其中有

底稿和有关札记、分类统计。大概是几天之后寄还的。现在将“底稿”抄在下面：

有些小意见写在原件上。这里还有些零碎意见、感想写上，仅供参考：

1) 六十条的分类统计，主要是领导和工作方法 30 多条；农业问题 4 条；提出今后要着重抓工业的问题，但工业只有两条，写了抓先进典型、新技术、新产品试制三项。因此觉得关于工业还应多写几句。如要抓些什么，如何抓法，一个时候，围绕一个中心问题开几天会，由中央有关单位主持，参加的人有部长、局长、总工程师（也可以请个别非党、政治好的）、厂长、个别车间主任，基建工程负责人等，包括中央系统和地方系统的人，开会可分大、中、小型三种，到工业集中城市和各省去开。

2) 关于计划问题。首先要求年度计划与五年计划如何很好结合，在投资、速度、各部门间比例关系等重要环节上结合得好。这方面第一个 5 年中有教训。现在经委同计委的具体工作部门，也还有些扯皮现象。苏联经验，5 年的叫做国民经济发展计划，10 年的叫现实性远景计划，15 年的叫假设性远景计划（更长远的计划如 20 年、25 年就只能根据更多的假定来考虑）。三者之间，有区别也有联系，须善于区别其间的关系。有一些部门如电力部门，必须有比较可靠的 10 年至 15 年的远景计划。编制得最好的计划，也会由于群众的积极性和许多未能估计到的因素，需要在执行过程中经常修改。远景计划的制定，计划部门要同科学研究部门合作，也可发动有关部门和有关人员讨论。一个大的经济单位，要有几个很实际，知识较渊博，又有远大眼光的人，来考虑、研究长远计划，以保证在计划工作中不迷失方向。这样的人只要几个，助手也不要多，主要是善于利用国内外各种资料。

3) 积累问题。研究的方向应当是如何最大限度地积累资金，

如何全民勒紧裤带，不惜巨金来发展工业和农业。

4) 在各种经济建设中，如何避免力量与资金的分散，是各级领导要经常注意的一个问题。

5) 社会主义建设中速度问题的总原则，是只可加快，不可减速。如像长跑运动员一样，很懂得掌握自己的体力和速度，每段距离中如何分配，如何压倒对手，最后如何冲刺（这一条说明，我当时的头脑也是发热的，尽管这种要求主要是从自己本位工作水电出发）。

6) “技术革命”口号如何提法。当然，技术也是不断革命的。但这个口号容易狭隘地理解为，只是落后与先进、新与旧的一种关系。而我们今天提出这个口号主要意义在：为学会并掌握技术，为技术不断进步而斗争，即为社会主义生产力的跃进、不断提高而斗争。

7) 推广新经验，新技术。如果条件、情况相同，就不能采取自愿态度，而应当用自上而下的适当办法使之执行。

8) 老干部、各级领导干部如何从外行变成内行，要作个规划。总结第一个五年中这方面的成绩和教训。总结现在各大学所办老干部班的经验。如何以内行或比较内行逐渐代替外行，这是总的干部路线。

9) 干部能上能下应逐渐形成风气。

10) 各个部门的领导应帮助一批政治上好的技术干部，懂得做组织工作，有工作方法，善于走群众路线，以便参加领导工作。目前技术、经济部门中，领导干部内行较少，应当作这样的安排和长远打算。

11) 善于发现新人才，更加注意提拔德才兼备的年轻干部到领导岗位上来。经过整风、反右和劳动锻炼之后，更有基础来进行这项工作了。

12) 有一些习惯性、周期性的问题，如浪费、贪污等，必须

经常注意，绳之以法，年年大反一次。

13) 各经济、技术部门必须经常了解世界各国本行业中的尖端，最先进的情况。要有计划地定期地派人出国（苏联、东欧和资本主义各国）考察，考察团人员一般不要超过 10 人，要都是真正的专家，要有一个政治上很强的人带队。

14) 各单位要有一个很好的小图书馆，一个很好的小资料室，要经常注意新书目录，各种新资料。

15) 不要害怕反对意见，要重视自己认为是不正确的反对意见，不要去压制坚持反对意见的同志，要容许不同观点的无拘束的争论，要有意识地启发各种不同意见展开充分讨论，以便在决定问题时，能比较全面地反映客观事物的各个侧面，从而作出正确的决定。

以上这 15 条，似乎并非最后送出的定稿，因为现在抄录的这份底稿只有 7 页，其他 18 页还有许多内容未包括在内，草稿是用几种颜色的铅笔写的，可见不是一天或两天之内的构思。现在再摘录出一些，以说明自己当时注意的问题，当时的思想水平，和如何尽“兼职秘书”之责的。

有两页专门写的工业方面应注意事项：

1) 国家发展水平与速度关系问题。高度的生产技术，才能有高度的速度。

2) 各经济部门比例关系：农业与工业（寓工于农），轻、重工业，煤、电、铁路交通先行工业，钢铁与机械，民用与国防，骨头与肉（主件与配件）等。

3) 国力与基建规模，生产力布局问题（资源分布与经济地理），地区规划。

4) 中央与地方的结合。

5) 大中小结合。

6) 先进与落后结合。洋办法、土办法，机械化与人力。

7) 勘测设计, 资源勘探, 产品设计, 基本建设设计等。工程施工问题。

8) 新产品试制。

9) 产品质量检查。

10) 新技术推广。在勘测设计、生产运行和基本建设诸方面, 有许多技术规程、规范都是从苏联照抄照搬来的, 有些已不完全符合我们情况, 应当及时修改, 否则会束缚生产力的发展。这方面我在几年水电建设中有所体会。

11) 专业化, 标准化, 协作关系。各部门协作的重要。

12) 节约问题, 投资效益(先进定额, 节约材料, 减少储备和流动资金, 降低成本, 等等)。

13) 劳动生产率, 是综合指标, 最后结果。有关技术安全、生产组织管理等问题。

14) 工资、福利制度。

15) 产供销平衡。

16) 资源综合利用问题。

另外还有一些条条, 是上面 16 条中没有写上的:

——要善于找帮手, 广交各界朋友, 各种耳目, 利用记者, 各种各样群众联系。

——领导部门, 要有意识让一两个人减少日常事务, 较“清闲”一点, 以便保持头脑清醒, 尤其计划部门搞长远规划的, 要有这样的人, 他们当然都是最实际又最能听奇谈怪论的人。领导人定要不被事务洪流困住, 重大问题亲自过问, 打破砂锅问到底。

——反映意见, 定要全面, 正面、反面, 赞成、不赞成, 决不可随风倒。

——不会开会, 还是一个大问题。

——选拔干部的德才标准, 逐渐转向业务能力。

保留自己这些过眼烟云的资料，也在如实说明，当年如何第一次履行这个“秘书”身份的，以后继续受到表扬也好，庐山会议最终实践了“几不怕”也好，是合乎逻辑发展的。

旧档中标明“1958年”的一个本子上，记录了《南宁会议60条》，当是寄出意见并附还原件时，特意抄下来的。同随后党内公布的《草案》相对照，则出入较大。后者不仅是条目及其次序的调整变动，主要是文字修改和内容的充实，还加了“前言”。篇幅后者大约扩充了一倍。如原件第一条是：全面规划，几次检查，年终评比。后者是第六、七两条，分写如何检查，如何评比。又政治和经济、政治和技术的统一问题，原来是放在不断革命这一条内的，后者分开写了，增加了农业高产的例子。也有一些内容删除了，如关于人的生到死是辩证法规律，“死亡就要庆祝”；也删掉了一些具体例子（如“培养秀才”这条，曾将我名字写进去了）。后者的第二条“县以上各级党委要抓社会主义工业工作，这里也有14项”，是原件中没有的。上述我草写的“工业方面应注意事项”的16条，大体都包括在内，也有的不在内。这14项当是国家计委、经委等业务部门参加定稿的。

《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是毛泽东主持起草的。其中提出了许多有关领导经济建设的工作任务和方法。由于当时的主导思想是反冒进，是追求建设的速度，从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高度就此提高全党的认识，这些任务和方法以及某些理论原则，就不能不包含许多错误的东西，而且有些正确的东西在执行时也会走样甚至走到反面。总之，《六十条》和“大跃进”的关系，同反冒进一样，也起了承先启后的作用。

《六十条》提出了一些正确的原则、任务和方法。例如，县以上各级党委要抓工业，提出14个项目，内容虽然还不全面，确是生产和基建中重要的基本东西。如必须把工作重点转移到技术革命上去，“过去我们有本领，会打仗，会搞土改，现在仅仅

有这些本领就不够了，要学新本领，要真正钻研业务，懂得科学和技术，不然就不可能领导好”。“这个问题必须引起全党注意。”“一方面，要反对空头政治家，另一方面，要反对迷失方向的实际家。”要破除不合理的规章制度。八年来积累的规章制度有许多还是合用的。但有相当一部分妨碍了群众的积极性，应加以修改或废除（问题在“大跃进”时，群众一发动，规章制度被横扫乱破，造成严重后果）。关于领导干部要打掉官风，实事求是，如何深入下层，同群众打成一片；每年要有4个月离开办公室，到下面作调查研究，增加感性知识；要以真正平等的态度对待干部和群众，要以一个普通劳动者姿态出现，决不可摆架子，等等。这些都是有价值的思想观点和多年积累下来的正确经验。

《六十条》推动了急于求成的“大跃进”的到来和浮夸风的出现。首先是这样一些脱离实际的过高指标：“争取在3年内大部分地区的面貌基本改观”；在今后5年或8年内“完成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的规定”（原规定12年完成）；各地方工业产值，争取在5年或10年内“超过当地农业产值”；还介绍湖北、四川等地，每年总结亩产2130斤、1680斤等“单季高产的经验，各地可以研究试行”；提出生产计划中央和地方共三本账的办法，助长了脱离实际，盲目提高指标，为层层加码大开“绿灯”的错误作法。“不断革命”的观点和要求，引入经济领域，成为“大跃进”的思想理论武器。《六十条》写道：“我们的革命是一个接一个的。”从1949年夺取政权开始，接着就是土地改革，农业合作化，接着是社会主义三大改造于1956年基本完成，“接着又在去年进行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这个问题还没有完结，“今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每年都要用鸣放整改的方法继续解决这一方面的问题。现在要来一个技术革命，以便在15年或者更多一点时间内赶上和超过英国”。“我们的革命和打仗一样，在打了一个胜仗之后，马上就要提出新任务。”这种

“不断革命”的观点，同“共产党的哲学就是斗争哲学”，“阶级斗争一抓就灵”，“斗则进不斗则退”等等观点是一脉相通的。这种观点在战争年代、革命时期起过主导作用；但在夺取了全国政权，进入建设的和平时期以后，经济建设需要按照经济工作本身的规律。持续协调地发展，尤需要稳定有秩序的环境。“不断革命”则鼓吹事物经常处在一种人为的不停止的变化状态之中，“一波不平一波又起”，要求经济生活也像打仗一样由政治挂帅，边建边破，快速而跳跃地发展，及至运用集中兵力，打歼灭战等等方法，这就不能不造成严重后果了。

同“不断革命”论密切关联的是“不平衡”论。《六十条》写道：“企业和企业之间，企业的内部车间和车间、小组和小组、个人和个人之间，都是不平衡的。不平衡是普遍的客观规律。从不平衡到平衡，又从平衡到不平衡，循环不已，永远如此，但是每一循环都进到高的一级，不平衡是经常的，绝对的；平衡是暂时的，相对的。”根据这种观点或法则，自然就可以任意打破平衡，搞人为的不平衡；“打破旧的平衡，建立新的平衡”，“事物也就前进了一步”。这样，以“不平衡是绝对的规律”作指导思想，导致“大跃进”时期计划工作放弃了综合平衡的规则，否定了国民经济必须在综合平衡中发展的规律。

此外，《六十条》中的“大权独揽”，第一书记挂帅（“大事一定要问。要有二把手、三把手，第一书记不在家的时候，要另外有人挂帅”），造成了“大跃进”时，从上到下，层层独断专行的不良作风，民主集中制遭到严重破坏。“挂帅”是我国自古以来封建用词，战争中“元帅”是可以发号施令的。经济生活中没有元帅，自然不能用打仗的方法来领导经济建设。

《关于传达和讨论毛主席六十条指示向中央的报告》，河南这回走在前面，1958年2月2日发出，中央于2月7日向全党转发了。河南省委的报告说：“主席不断革命的指示，给我们以敢

于理想、敢于向前看的无限勇气，从理论上、思想上解决了能不能跃进、敢不敢跃进的问题。打破了庸俗的‘平衡论’，粉碎了‘反冒进’（就是反跃进）的观点，以最锋利的马克思主义的武器把我们武装起来，乘风破浪，跃进再跃进。贯彻执行主席的六十条指示，就能缩短我国的过渡时期，在这与帝国主义比时间、比胜负的时期，中国的大跃进，对世界的命运有着决定性的影响。”河南确实这样说到做到，后来放粮食卫星，办人民公社，放炼铁卫星，都走在全国的前列。许多省纷纷表示决心，要在5、6、7年时间内，完成农业发展纲要提出的任务。许多省市的地方工业，在此后5年内不是增长百分之几十，而是要增长几倍。在杭州和南宁会议上，因干劲大受到表扬的甘肃，这时决心在5年内，地方工业产值要比现在增长16~19倍，以赶上或超过农业总值。

接着2月28日，《人民日报》发表《打破旧的平衡，建立新的平衡》的社论。以对立统一的辩证法法则说明，事物的平衡是相对的，不平衡是绝对的，认为“积极平衡和消极平衡，这是计划工作中两种相互对立的方法”；支持新生事物和群众的积极性，不断地提高落后的指标和定额，这就是积极的平衡，否则，就是慢与差的消极平衡。只有冲破旧的平衡，达到新平衡，事物才能前进，社论以此论点再次批判了1956年的反冒进，说当时工农业“显然是一个很大的跃进。但是那时候有一些人被这种跃进所造成的国民经济迅速发展中的不平衡状态惊呆了。他们只看到这种不平衡所引起的某些在进步中不可避免的暂时的困难，以为这也困难，那也困难，惶恐得很。这就是因为他们对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缺乏正确的了解，对党和广大群众克服困难的力量缺乏足够的估计。因此就错误地提出了‘反冒进’的口号，给当时正在蓬勃发展的群众高潮泼了一瓢冷水”。社论认为工业农业的“大跃进”局面已经到来。最后号召：“我们必须反对庸俗的平衡论，

或均衡论，反对消极的平衡方法。从庸俗的平衡论的思想束缚中解放出来，我们也就敢于跃进了。”从此以后，计划工作中不断地出现层层加码高指标，“打破平衡”、“积极平衡”成为计划工作的理论；从此高指标风漫天而起，一发不可收拾。

（李锐：《“大跃进”的序幕——南宁会议》）

再批“反冒进”：1958年成都会议

1958年3月的成都会议，是在党对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出现许多失误的情况下召开的。毛泽东在会上多次讲话，继续批判反冒进，说冒进是“马克思主义的”，反冒进是“非马克思主义的”；提出我国当前存在“两个剥削阶级”；提出要搞“正确”的个人崇拜；提出了办大社的意见……

1958年3月的成都会议，是中共中央在成都召开的一次政治局扩大会议，它对“大跃进”运动的发动，起到了相当重要的作用。

成都会议，是在党对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出现许多失误的情况下召开的。政治上，1957年夏，党中央错误地发动了一场大规模的反右派斗争，使一大批党员干部、知识分子和爱国民主人士遭到了不应有的打击。同年9月和10月召开的党的八届三中全会，又错误地改变了八大关于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正确论断，为阶级斗争扩大化提供了理论依据。经济上，从1956年11月的八届二中全会开始到八届三中全会和1958年1月的南宁会议，对1956年的反冒进进行了不断升级的错误批判，否定了八大确定的既反保守又反冒进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经济建设方针，提出了过高的生产计划指标和“积极平衡”、生产计划两本账等领导经济建设的错误方法，并于1957年11月提出了15年赶上英国的任务和“大跃进”口号。这些失误，对成都会议产生

了直接的影响。

1958年3月9日至26日，中共中央在成都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简称成都会议），中央各部门负责人和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参加了会议。会议总结了过去几年的工作，研究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有关问题，讨论通过了《关于1958年计划和预算第二本账的意见》、《关于发展地方工业问题的意见》、《关于在发展中央工业和发展地方工业同时并举的方针下有关协作和平衡的几项规定》、《关于农业机械化问题的意见》、《关于把小型的农业合作社适当地合并为大社的意见》以及《关于继续加强对残存的私营工业、个体手工业和对小商小贩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指示》等37个文件。毛泽东在会上先后作了六次讲话。

成都会议的主要内容是：

一、对反冒进进行了再次批判。

在成都会议上，毛泽东旧事重提，对反冒进又一次进行了批判。他在讲话中指出，1956年的反冒进，吹掉了多快好省、促进派和40条纲要，是一个方针性的错误。在领导方法问题上，有两种领导方法，一种是马克思主义的“冒进”，一种是非马克思主义的反冒进。究竟采用哪一种，我看应采取“冒进”。他还指出，反冒进是把个别的、特殊的东西，误认为一般的、全面的东西，只听少数人的意见，没有反映广大人民群众的意见。把次要矛盾当成了主要矛盾，把支流当成了主流，没有抓住主要矛盾和本质。为了批判反冒进，毛泽东还重印了他在1955年为《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所写的部分按语，并在说明中把反冒进说成是“打击群众积极性”、“给右派猖狂进攻以相当的影响”的事件。这样，毛泽东批判反冒进的调子，又比南宁会议提高了一步。

二、提出了“两个剥削阶级”的错误观点。

毛泽东在成都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我国存在着两个剥削阶

级，一个是帝国主义、官僚资产阶级和封建地主阶级，另一个是民族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他们是反对社会主义的，是我们的敌人。这里，毛泽东对国内的阶级状况作了完全错误的分析，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剥削阶级基本消灭之后，又人为地提出了“两个剥削阶级”。这种错误的分析，必然导致错误地发动大规模的阶级斗争，并把斗争的矛头指向知识分子。

三、提出要搞“正确的”个人崇拜。

毛泽东认为，个人崇拜有两种：一种是正确的，如对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正确的东西，我们必须崇拜，永远崇拜；另一种是不正确的崇拜，不加分析，盲目服从，这就不对了。反个人崇拜的目的也有两种：一种是反对不正确的个人崇拜，一种是反对崇拜别人，要求崇拜自己。问题不在于个人崇拜，而在于是否是真理。是真理就要崇拜，不是真理就是集体领导也不成。在会上，毛泽东还对个别人提出的“相信毛主席要到迷信的程度，服从要到盲从的程度”的说法表示了欣赏。毛泽东的这一观点和态度，明显违背了八大借鉴苏联的经验教训所提出的反对个人崇拜的正确思想。在他的个人威望越来越高的情况下，必然会助长全党和全国人民对他的个人崇拜，从而，给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带来灾难性的后果。

四、提出了地方工业产值超过农业产值以及实现农业机械化和半机械化的任务。

关于发展地方工业问题，成都会议通过了《关于发展地方工业问题的意见》，强调了发展地方工业对于支援农业、促进整个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意义，要求“各省、自治区应该在大力实现农业跃进规划的同时，争取在5年或者7年的时间内，使地方工业的总产值赶上或者超过农业总产值”。关于农业机械化问题，会议通过了《关于农业机械化问题的意见》，要求全国普遍开展农具改革运动，“在7年内（争取5年内做到）基本上实现农业

机械化和半机械化，实现农业生产力的大发展”。成都会议重视发展地方工业和农具改革，想走出一条通过发展地方工业实现国家工业化的道路，无疑是正确的。但是，在我国工业基础十分薄弱的情况下，5到7年就想使地方工业总产值超过农业、实现农业机械化和半机械化，显然是脱离实际、难以完成的。它必然促使各地盲目乱上工业建设项目。

五、制定了过高的1958年国民经济计划指标。

关于1958年的国民经济发展计划，会议批准了国家经委党组《关于1958年度计划第二本账的报告》和财政部党组《关于1958年国家预算第二本账的简要报告》，提出了《关于1958年计划和预算第二本账的意见》。会议确定的1958年国民经济计划第二本账，其各项指标在一届人大五次会议确定的第一本账的基础上又有了很大幅度的提高。工农业总产值，第一本账是1435.7亿元，比1957年的1328.6亿元增长8.1%；第二本账是1658.2亿元，比1957年增长24.8%。国家财政收入，第一本账是332亿元，比1957年的308亿元增长7.7%；第二本账是372亿元，比1957年增长20.7%。基本建设投资，第一本账是145.7亿元，比1957年的128.7亿元增长17.8%；第二本账是175亿元，比1957年增长41.5%；钢，第一本账是624.8万吨，比1957年的524.4万吨增长19.2%；第二本账是700万吨，比1957年增长33.5%。煤，第一本账是15072.4万吨，比1957年的12861.8万吨增长17.2%；第二本账是16737.4万吨，比1957年增长30.1%。粮食，第一本账是3920亿斤，比1957年的3700亿斤增长5.9%；第二本账是4316亿斤，比1957年增长16.6%。棉花，第一本账是3500万担，比1957年的3280万担增长6.7%；第二本账是4093万担，比1957年增长24.8%。以上各项指标，完全超过了国民经济正常发展所能达到的增长速度。用这样的方案来安排各项生产建设，必然会造成国民经济的

全面紧张。

六、提出了办大社的意见。

在农业合作社问题上，会议通过了《关于把小型的农业合作社适当地合并为大社的意见》。这一文件，不切实际地分析了农田水利建设等对于扩大合作社规模的需要，提出了把小型的农业合作社合并成一乡几社这样规模的大型合作社的意见。这一意见的提出，反映了在农业合作社问题上的盲目贪大情绪，直接促成了1958年上半年部分农村对于大型农业合作社的大办，并为1958年夏天的人民公社化运动开了先声。

七、作出了对私有制继续改造的指示。

在生产关系问题上，会议作出了《关于继续加强对残存的私营工业、个体手工业和对小商小贩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指示》，认为残存的个体经济存在着“资本主义自发倾向”，要求对其进一步实行严格的限制和改造措施。会议还通过了《关于合作社社员的自留地和家庭副业收入在社员总收入中应占比例的意见》，从提高社员对集体生产的积极性的认识出发，提出降低自留地和家庭副业收入在社员总收入中所占的比例。以上两个文件的制定，明显地反映了党的领导人所存在的社会主义必须是单一的生产资料公有制的片面认识，反映了生产关系上的盲目求纯和急于过渡情绪。文件指导下的对私营经济的基本消灭和对社员自留地、副业收入的限制，影响了广大人民群众的生活，禁锢了社会主义经济的活力。

八、作出了下放权力的规定。

成都会议还讨论了计划、工业、基本建设、物资、财政、物价、商业和教育等方面的管理问题，决定把大量的管理权限下放给地方。例如，在基本建设项目审查管理方面，会议通过的《关于在发展中央工业和发展地方工业同时并举的方针下有关协作和平衡的几项规定》中规定，今后地方兴办限额以上的建设项目，

除了提出简要的计划任务书报送中央审批外，其他设计和预算等文件一律由省、市、自治区审查批准。为了调动地方的积极性，确有必要改革过于集中统一的经济管理体制，适当下放中央的一些管理权限，但如果权力下放太多，也必然会使中央失去对国民经济的宏观控制。成都会议关于下放权限的文件，就作出了下放一些不该下放的权力的规定，给以后的国民经济发展造成了十分不利的影响。“大跃进”运动中各地乱上项目，基本建设战线急剧拉长，就与成都会议不适当地下放基建项目的审批权很有关系。

另外，毛泽东在会上肯定了河南提出的一年实现农业发展纲要的计划，要求在全国范围内至多5年实现农业发展纲要。他号召，要“破除迷信、解放思想”，破除旧的规章制度。在工作方法上，要搞群众运动，要轰轰烈烈，不要寻寻觅觅，冷冷清清。毛泽东还提出了在15年赶超英国的基础上，20年赶上美国的任务。这一切，也都在相当程度上鼓励、助长了高指标和浮夸风的错误。

成都会议后，4月1日至6日，毛泽东又在武汉召集了由河南、江苏、安徽、福建、广东、广西、浙江、湖南、山东、江西、湖北、上海、重庆等省市负责人参加的会议。会上，毛泽东听取了各地的工作汇报，在讲话和插话中，肯定了各省市的“跃进”计划，重申了“两个剥削阶级”的观点，并对反冒进再次进行了批判。武汉会议，实际上是成都会议的继续，它在某些方面，进一步发展了成都会议的错误。

由上可以看出，成都会议是政治、经济、思想等方面的错误全面发展的一次会议，它大大发展了在八届三中全会上形成、在南宁会议上得到进一步发展的“左”倾错误指导思想。在政治上，提出了“两个剥削阶级”和“正确的个人崇拜”等错误观点；在经济上，制定了国民经济发展的各项“跃进”指标；在思

想上，进一步对反冒进作了错误批判；在生产关系问题上，作出了办大社和继续改造私有制的指示。“大跃进”运动中的各项主要错误，在成都会议上已经有了雏形。成都会议的文件精神的传达、贯彻，大大加快了“大跃进”运动的发动。成都会议使经济工作中冒进的“左”倾错误开始发展起来。成都会议后，生产指标一再提高，“高产卫星”开始发射，“跃进”口号越喊越响，农业合作社竞相合并。1958年春天，全国范围的经济建设的“大跃进”运动已经开始。

（谢春涛：《1958年的成都会议》）

吹响“大跃进”的号角： 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 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

八大二次会议正式通过中共中央根据毛泽东的倡议而提出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正式改变八大一次会议关于国内主要矛盾的正确分析，提出争取15年或者在更短的时间内，主要工业品产量赶上和超过英国。这次会议当时被称作是“一次整风的会议，一次反对国际修正主义、反对混入党内的右派分子、地方主义分子、民族主义分子的会议，一次大跃进的会议”。会后，“大跃进”高潮迅速在全国掀起。

一、会议的召开

毛泽东在八大二次会议上说，经过去年冬天今天春天的大跃进，已经证明了过去三年是个马鞍形。前年是一端，去年是低部，今年有另一端，两头高中间低。有了这个高低，我们的会议好开了。又说，1957年9月八届三中全会给了我们一个鼓励，全党全国人民有了比较正确的方向。我们这个会有南宁会议、成都会议的准备，有去冬今春水利、积肥大跃进的事实，这个会就好开。毛泽东这两段话说明了八大二次会议召开的背景。

所谓“马鞍形”，是八大二次会议前三年经济建设曲折发展

和领导核心认识分歧的形象化概括。不过，这是一个被扭曲了的形象。1955年冬季，毛泽东认为农业社会主义改造中右倾保守思想已经解决，提出现在的问题，是要不断地批判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右倾保守思想。为了加快农业和工业的发展速度，1956年初又提出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以下简称“农业四十条”）和多快好省的建设方针。由于不合实际地反“右倾”，1956年的社会主义建设发生了冒进。同年5月，党中央改变了片面反对右倾保守的提法，决定采取既反保守又反冒进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经济建设方针（这一方针为八大所采纳）。周恩来、陈云根据党中央的决定及时地纠正了1956年的冒进。1957年的经济建设，遵循八大通过的经济建设方针，稳步前进，成为建国以来效果最好的年份之一。但是，毛泽东对反冒进是有不同意见的。经过1957年的反右派斗争，党内“左”倾思想日益发展，在9月八届三中全会上批评了反冒进，重提“农业四十条”和多快好省的建设方针（这两个东西没有写进八大一次会议的文件）；11月提出15年赶上英国的口号。随后又召开南宁会议、成都会议等多次会议，继续反“右倾”，批评反冒进，为确立“左”的指导思想，发动“大跃进”作了充分准备。在“左”倾思想的指导下便出现了1957年冬、1958年春的“全面跃进”。三年经济建设的曲折发展，在毛泽东看来，像1956年和1958年那样实行高速度的方针是正确的，形成了经济建设的高潮，是马鞍的两个高部；像1957年那样稳步前进是错误的，造成了建设的低潮。是马鞍的低部。他认为，八届三中全会以来不断地反“右倾”、反冒进，大跃进思想，高速度思想，已经为党的主要领导干部（中央和省部两级）所接受。因此召开一次党的代表大会确认这一指导思想的条件已经成熟。

会议从1958年5月5日至23日在北京举行。与会代表组成华北、东北、华东、中南、西南、西北、军队、中直和国家机关

八个代表团。

刘少奇向大会作了关于党中央委员会的工作报告（5月5日），邓小平作了关于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的莫斯科会议的报告（5月5日），谭震林作了关于农业发展纲要（第二次修正草案）的说明（5月17日）。毛泽东在5月8日、17日、20日、23日大会上以及5月18日代表团团长会议上讲了话。会议自6日至22日进行小组讨论和大会发言。周恩来、朱德、陈云等都在大会上发了言。在大会上发言的还有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政府各部门的负责人，人民解放军的负责人，地委、县委、工矿企业、农村合作社、学校的负责人等117人，书面发言的145人。

5月23日，大会通过了《关于中央委员会的工作报告的决议》、《关于在莫斯科举行的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的决议》、《关于1956年到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的决议》，并增选了王任重等25名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

二、“左”倾指导思想的几个问题

（一）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

八大二次会议正式通过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充分体现了党中央、毛泽东的“左”倾指导思想。

刘少奇代表党中央所作的工作报告，在说明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时，系统地阐述了1955年冬季反右倾以来，毛泽东提出的高速度思想。报告写道：1955年冬，“毛泽东同志及时地提出了号召，要求以更高的速度来代替第一个五年计划原来规定的速度”。“马鞍形教训了党、教训了群众。现在全国的广大群众对于生产的跃进充满信心，而且决心把社会主义建设的速度继续提高。”刘少奇说：“建设速度的问题，是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后摆在

我们面前的最重要的问题。”工作报告还接受了毛泽东关于政治战线上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阶级斗争依然是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我国还存在两个剥削阶级和两个劳动阶级等一系列错误观念。所有这些都为以阶级斗争推动社会主义建设提供了理论依据。

5月17日、20日、23日，毛泽东在大会几次讲话中都谈到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问题。他说，这次大会做了认真的工作，制定了我们的路线。七大使全党有了个共同纲领。这次会议我们又制定了个共同纲领：全党团结一致的总路线，全国人民团结一致的总路线。毛泽东说，我们是世界第一人口多的国家，社会主义建设有很大发展，我们已经看出了前途。早些时候还看不清楚多快、多大的规模，要多少时间可以摆脱落后状态、被动的状态、在世界上没有地位的状态。我们6亿人口的大国，杜勒斯不看在眼里，总有一天我们赶上英国，赶上美国，他才知道确实有这个国家。接着，毛泽东对总路线做了具体分析，他说，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这个提法很好，是新鲜的说法，反映了人民的干劲。干劲各有不同，早就有这个提法，鼓足是个新话。力争上游从前就有了，不是新话，现在有新意。什么叫力争上游呢？从国内来说，无非就是争千斤亩，争四、五、八，争两千斤亩，争出钢的炉数。“农业四十条”现在不要12年了。有些省有些项目3年可以实现，有的省可以一年实现。大体上可在5年内实现四十条，这不是上游吗！不是多快吗！但还要好省。从国外来说，同外国比较，争取7年超过英国，15年超过美国。报纸上宣传还是15年超过英国，这次大会对这个提法有些修改，把“15年或者更多一些时间”改成“15年或者更短一些时间内超过英国”。有些项目如煤炭不要7年，2~3年就可以赶上了。从刘少奇的报告和毛泽东的讲话中不难看出，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实质就是高速度，就是短期内超过英国，赶上美国。八大二次会

议闭幕后，6月21日的《人民日报》在《力争高速度》的社论中，把这种精神概括为“速度问题是总路线的灵魂”。

作为一条总路线，理应反映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客观规律，但是，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并没有达到这个根本要求，片面强调高速度。高速度思想同毛泽东对三大改造完成后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以及反右派斗争的影响作了不适当的、错误的估计有密切关系。显然，八大二次会议确定的高速度思想，7年超英，15年超美的战略目标，是没有经过科学论证，违反客观可能性的。

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方法和道路问题，毛泽东在几次讲话中说，苏联的方法可以建设社会主义，我们也可以有另一种办法，都是搞社会主义。他说，为什么讲十大关系？十大关系就是同苏联比较，除了苏联的办法以外，是否还可以找到别的办法比苏联、欧洲各国搞得更快、更好。苏联是由上而下的方法，我们学习列宁，搞发动群众，搞阶级斗争。我们的口号是多些快些好些省些，是不是高明些呢？我看是高明些，我们的共产主义可能比苏联提前到来。我们有了苏联的经验，6亿人口，三个“并举”，群众路线，一个普通的劳动者面目出现，真正的民主集中制。我们发展了列宁的民主集中制。整风以后，作到了真正民主，不是假民主，大家敢想、敢说、敢做，连落后阶层也积极起来了。毛泽东说，斯大林的两个口号没有辩证法，技术决定一切，政治呢？干部决定一切，群众呢？列宁是对的，他说“苏维埃加电气化”，这就是以虚带实，政治带业务，苏维埃就是政治，电气化就是技术。政治与技术结婚就产生社会主义，它俩结婚就会生儿子，就产生7年超英国，再加8年超美国这两个儿子，第一个叫超英，第二个叫超美。

在正式通过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会议上，认真研究社会主义建设的方法、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问题，是题中应有之义。本来，在1956年的《论十大关系》中，毛泽东已经提出，

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不能照搬苏联的方法，要走适合自己情况的路。八大一次会议采纳了毛泽东的思想，作了富有成果的研究。八大以后，中央领导人继续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很可惜，八大二次会议没有把社会主义建设的方法和道路的探索继续下去。毛泽东依照老经验，强调的仍然是政治挂帅、阶级斗争和群众运动。实践已经证明，用阶级斗争统帅社会主义建设是错误的，不符合新形势的需要。虽然刘少奇在工作报告中重申了一些正确的原则，例如，要严格区分人民内部矛盾和敌我矛盾，要继续贯彻执行“双百”方针，要正确解决中央集权和地方分权的问题，等等。但是，这些原则都在“大跃进”运动中受到扭曲。

八大二次会议的空气是热烘烘的。代表们展开了热烈的讨论，一致同意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有的组说：“7年赶上英国，再加8年赶上美国是完全可能的。问题不在于能不能赶，而在于敢不敢赶，主席讲话使我们从思想上解决了这个问题。在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正确领导下，我国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的速度，必将打破古今中外的一切记录，也将大大超过苏联建成社会主义社会的速度。”许多代表认为，要实现高速度，必须继续反“右倾”，批判反冒进。他们说，刘少奇的工作报告对右倾保守思想批判得不够，对反“冒进”的思想根源、错误性质和后果论述不充分。有的代表批评反冒进说：“主席的思想是一贯的，但是从1956年下半年到三中全会期间，主席的思想在中央委员会中贯彻了多少，值得研究。八大的报告和决议中都没有提多快好省和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八大关于二五计划指标的建设也很保守。1957年的计划已经肯定是个保守的计划。”有一位省委书记说，右倾机会主义是当前党内的主要危险。他把提倡奖励私人开荒、植树、繁殖耕畜、大量养猪、扩大社员自留地、发展个人家庭副业、开放自由市场等有利于发展商品生产，促进农业生产力发展的一些积极的作法，都说成是右倾。虽然毛泽东曾在大会上说，反冒进的

问题，1957年6月就已经解决了。但是在这种反“右倾”的气氛下，周恩来、陈云在大会发言中都不得不对反冒进的所谓错误做了检讨。

代表们一致同意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认为它贯穿了毛泽东指示的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和走群众路线的精神。一位省委第一书记说，主席关于建设总路线的一个重要的基本点，是要发展工业，必须加速发展农业，所以他亲自主持制定了“农业四十条”。怀疑毛主席的多快好省方针的人，首先就是从怀疑“农业四十条”能否实现开始，怀疑农业发展速度。两年实践斗争证明这种怀疑是没有根据的。他说，总路线的另一个重要的基本点，是发展地方工业，加快社会主义建设的速度。他表示，他所在的省决心提前3年或5年实现“农业四十条”；争取在5年内使地方工业总产值超过农业总产值，到1962年，将比1957年增长3倍多。有些省委第一书记在大会发言中，互相攀比。有的说，在多快好省总路线方针指引下，他们省1958年近6个月水利工程的成绩就等于1957年的10倍；有的说，他们省“7个月完成的工程等于过去8年总和的4倍”。以此证明总路线的正确性和无比威力。

国务院有几个工业部提出今后5年或稍长一些时间内，我国工业建设的生产水平赶上或超过英国，15年或稍长一点时间，赶上或超过美国。有一个部竟提出，它的工业主要产品在5年内超过英国赶上美国。

文化教育工作也要实现高速度。一位市委第一书记在大会上提出如下的文化革命设想：15年不但每个专区每个县都办了大学或专科学校，在广大乡村中，也都办了大学或专科学校，人民“个个都有较高的科学文化知识，像毛泽东同志曾经预言过的：大家都能够读‘资本论’，大家都懂得高等数学，什么天文学、地质学、农业学、机械学、化学、物理学、电子学等等，都会变

为普通人的常识”。关于教育问题，主管的负责人在大会上说：“根据各省汇报，扫盲工作在5个省可以1年完成。全国范围3年可以完成，边远地区（西藏除外）最迟的7年可以完成。普及小学，几个省、市1年完成，全国3年基本完成，边疆地区最迟7年完成。”对照30年后的今天，我国尚有将近1/4的文盲、半文盲，可见上述的设想和目标，是多么不着边际！

急于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思想在成都会议上已经萌芽，这次会议上又有所发展。有人在大会发言中传达了中央领导人关于共产主义公社的设想。他说：“毛主席和少奇同志，谈到几十年以后我国的情景时，曾经这样说：那时我国的乡村中将是许多共产主义的公社，每个公社有自己的农业、工业，有大学、中学、小学，有医院，有科学研究机关，有商店和服务行业，有交通事业，有托儿所和公共食堂，有俱乐部，也有维持治安的民警等等。若干乡村公社围绕着城市，又成为更大的共产主义公社。前人的‘乌托邦’的梦想，将被实现，并将被超过。”果然，这种空想共产主义思想，会后不久就在人民公社化运动中表现出来。

从以上的讨论、发言中可见，八大二次会议的代表一致拥护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拥护“农业四十条”，呈一边倒之势。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一个原因是，毛泽东在全党享有很高的威望，代表们认为他提出的路线、方针是不会错的。另一个原因就是，党内政治生活开始不正常了，个人崇拜的气氛，不断地反“右倾”、“左”比右好的舆论，都形成一种压力，使人难以讲真话。代表中许多人是省、地、县的领导人，他们对于群众的思想感情，对于许多工人、农民、知识分子不相信神话般的高速度，并非毫不知情，但是他们不敢讲同“左”的指导思想相悖的话。还有一个原因是，有些负责干部，本身就好大喜功，有“左”的思想；有些人见风行事，上级领导喜欢什么，他就讲什么。在党的“左”倾错误的形成中，上下之间相互影响。上面“左”一

分，下面就“左”一寸；下面的“左”，又为中央的“左”倾指导思想提供更多的依据。在八大二次会议的活动过程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一点。

（二）再论破除迷信

在毛泽东看来，要实现打破常规的高速度，需要有非常的思维。因此，他在成都会议上就提出了“破除迷信，解放思想”问题。八大二次会议上又做了进一步的论证。5月8日他在第一次大会上讲话的题目就叫做“破除迷信，不要怕教授，不要怕马克思”。毛泽东说，我们有些同志有几怕，其中有的怕资产阶级教授。另外，是不是还有一种怕无产阶级教授呢？比如怕马克思，因为马克思在很高的楼上。在成都会议上我讲过，不要怕，马克思也是两只眼睛，两只手，跟我们差不多。他脑子里有一堆马克思主义，他写了不少书给我们看。我们没有时间，也没有当教授，所以就没有读他那么多，读那么一部分基本的东西也就够了。并且我们做的东西超过了马克思，实践就要出道理，反映到意识形态上就成为理论。不要妄自菲薄，看不起自己。中国被帝国主义压迫100多年，要服从洋人，服从外国100多年，吓怕了，什么都怕。关于不怕资产阶级教授问题，5月18日在代表团团长会议上，毛泽东要求写一个近300年来的各种科学技术发明家的小传。他说，一个人能够发明什么，学问不一定好多，年纪也不一定大，只要方向是对的。他列举瓦特等一些发明家的材料以后说，总而言之，我这些材料要证明这一条：是不是贫贱者最聪明，富贵者最愚蠢，来剥夺那些翘尾巴的高级知识分子的资本，鼓励工人、农民、老干部、小知识分子的自信心，自己起来创造。要少一点奴隶性，多一点主人翁的自尊心。同日，毛泽东在看了一个报告后写了题为“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的批语，要求中央各工业交通部门，各大学，各省、市、自治区都要各自收集材料，编印一本书，说明世界（包括中国）近300年

科学、技术发明大都出于被压迫阶级。即是说，出于那些社会地位较低，学问较少，条件较差，在开始时总是被人看不起甚至受打击、受折磨、受刑戮的那些人。他写道：如果能够有系统地说明这一点，就将鼓舞很多小知识分子，很多工人和农民，很多新老干部，打掉自卑感，砍去妄自尊大，破除迷信，振奋敢想、敢说、敢做的大无畏创造精神。对于我们7年赶上英国，再加8年或者10年赶上美国的任务，必然会有重大的帮助。5月20日在大会讲话中，毛泽东再次强调上述观点，并提出只有外行才能领导内行，“外行领导内行，这是一般规律”。

用什么态度和方法对待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是一个十分严肃的问题。党领导中国革命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正确的态度和方法是：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结合中国实际运用马克思主义，从而发展马克思主义。采取这样的态度和方法，革命事业就前进，否则，革命就遭受挫折。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如何对待马克思主义是一个更加重要的问题。此时此刻，提出“不要怕马克思”、“超过马克思”的口号，而且把它同“破除迷信”连结在一起，是很不郑重的。这样的提法也是不谦逊、不科学的。其结果，助长了骄傲乃至狂妄情绪和轻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倾向。“大跃进”运动中，发生那么多荒唐事，甚至把唯心主义的“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当作唯物主义大肆宣传，这是同我们轻视理论密切相关的。

毛泽东激励工人、农民和广大干部打掉自卑感，消除妄自尊大的思想，教育人们敢于破除迷信，在实践中发明创造，是一番好意。但是，因此就打击“资产阶级教授”，“翘尾巴的高级知识分子”，则是令人难以理解的，不能不说是知识分子的极大偏见。在世界科学技术革命成为生产力发展的最主要源泉的年代，我们不但不依靠掌握科学技术的知识分子，反而硬给他们戴上“资产阶级”帽子，把他们排斥在现代化建设之外，在这种情况下

下，企图很快赶上或超过世界上经济最发达的国家，是根本不可能的。

“外行领导内行”是一个不尊重客观规律的口号。它同毛泽东的一贯主张也是完全抵触的。毛泽东曾多次号召党的干部要成为各行各业的里手。例如，1955年3月，他在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上说过：为了适应新形势的需要，“成为内行，这是我们的任务。所以必须对那些钻不进去的人，浮在皮面上的人进行教育，使他们都成为内行”。现在，正值党需要极力探索社会主义建设客观规律的时候，提出“外行领导内行，这是一般规律”的论点，其后果是可想而知的。

毛泽东关于“破除迷信”的讲话，在八大二次会议上引起强烈反应。有的组说：“主席的几次讲话，对大家启发很大，这是真正的思想大革命、大解放。要贯彻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不彻底破除迷信、解放思想是不可能的。”不少领导人都结合讲话精神检查自己的思想和工作。有人认为：“当前阻碍多快好省总路线贯彻执行的主要问题是，思想没有大解放，迷信没有打破。”有的组说：“过去我们有自卑感，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迷信洋人，一是迷信高级知识分子，主席的指示把我们从两个思想中解放出来。这就是，一方面要反对民族自卑感，不仅要敢于超过英美，而且也要敢于超过苏联，事实上我国在建设速度方面已经超过上述国家；另一方面，要反对劳动人民的自卑感，近来出现的许多发明和创造都是人民群众创造出来的。”有人批评科学院对资产阶级教授估计过高，迁就太多，对党外资产阶级专家信任过多。有人说，自1953年以来，对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强调他们的作用一面多，而对必须改造他们则强调不够，1956年知识分子会议更在某种程度上加强了这种偏向。主席指示对知识分子必须戴上“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帽子，而且把他们放在应该改造、消灭的阶级之内，才又把对知识分子的认识端正过来。有人说：

“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用‘洋人’、‘外国’、‘学问’吓唬人，实际上没有什么学问。”

从代表们的共鸣可以看出，破除迷信的号召在党内产生了多么大的影响！虽然毛泽东在论证这个问题的时候说过，不要狂妄，敢想、敢说、敢做，基础是马列主义。但实际上，人们的思想和行动必须以当时党中央的思想，即“左”的指导思想为准则，因此，破除迷信便偏离了正确方向。

（三）个人崇拜的发展

成都会议上，毛泽东提出个人崇拜问题时曾说过，为什么要崇拜马、恩、列、斯，因为真理在他们手里。八大二次会议上，刘少奇在工作报告中提出向毛泽东学习的号召。5月17日毛泽东在大会上说，昨天有同志讲，“跟上某人走，就不会错”，这个某人就是我毛泽东。我看这个说法不全面。我说是又跟又不跟，对就跟，不对就不跟。不管是领导人，还是担大粪的，要看真理在谁手里。我们要跟马克思、列宁正确的部分。5月20日在大会上又说，谁有真理，我们就服从他。既然谁有真理就崇拜谁这个命题一再强调，代表们便就“真理的代表”问题议论起来了。一个组说：“我们衷心地跟着毛主席走，并不是崇拜个人，迷信个人，而是崇拜真理，因为中国几十年革命和建设的历史经验证明，毛主席就是真理的代表。”他们“建议中央作出决定，今后干部学习，必须以毛主席的著作作为骨干”。一位省委第一书记说，刘少奇报告中“向毛主席学习的提法不够，似乎还不能完全概括毛泽东同志对共产主义运动的贡献。为使全党同志对此有个确切的估计，是否可考虑提‘毛泽东主义’或其他提法”。另一位省委第一书记在总结反冒进的教训时说：“教训是什么？这就是我们在任何时候都不能离开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正确路线。当我们坚决执行了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方针政策的时候，革命就能取得胜利，反之就一定蒙遭损失。”“经过这次反‘冒进’的反复，也已

为铁的事实所证明。”他强调：“要破除迷信，做到解放思想，必须在全党广泛地学习毛主席著作。这几年我们的学习有教条主义倾向，过分强调外国的经典著作，而忽视对毛主席著作的学习，这是不对的。毛泽东同志是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在一系列根本理论上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因此，毛主席的著作对于我们中国共产党人说来，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最好的教科书。”他认为，党内不少人不去钻研学习毛主席的著作，转而“向外国的书本中寻找经验，这当然是崇拜‘洋人’思想的表现”。“毛主席经常教导我们不要怕马克思，人人都可以做马克思。”最后他建议在全党有组织、有系统地开展学习毛主席著作的运动，并坚持下去，成为一个固定的学习制度。一个组的代表在讨论中一致认为：“我们出现毛主席这样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也正像当时德国出马克思，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俄国出列宁一样，是完全合乎事物发展规律的。”

八大二次会议对于“毛主席是真理的代表”这样一个绝对化的提法，没有表示异议。它对于个人崇拜的发展提供了新的依据。个人崇拜的发展，便利了“左”倾指导思想的贯彻执行。

（四）辨风向和防止党内分裂

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能否顺利执行，是否还会出现1956年反冒进和1957年那样的右倾反复？毛泽东深深地思考着。为此，他在会上提出辨风向和防止党内分裂问题。

5月20日，毛泽东在大会讲话中提出“插红旗、辨风向”问题。他说，红旗就是我们的五星红旗。横竖世界上什么地方都要插旗帜的，是插红旗，还是插白旗？不是无产阶级插红旗，就是资产阶级插白旗。为了插旗子，就要提高嗅觉，辨别方向，看是什么风向。我特别请同志们注意的问题，就是辨别风向，要有辨别能力，不要怕插红旗，哪个学校、工厂、连队、机关没有插旗子的地方都插起来。5月23日的大会讲话再一次谈到这个问

题，毛泽东说，我讲的是“插红旗、辨风向”，不是“辨方向”。每个生产队都要插面旗子，看到白旗子把它扯下来，灰旗子也不行，要请他扯下来，他不肯扯就通过辩论把它扯下来，插上红旗子。风向，东风压倒西风。反冒进的风，是1956年6月开始的。大风是容易知道的，小风不容易辨别，领导干部更加要注意。毛泽东把怀疑或反对高速度的人称作“观潮派”、“秋后算账派”。联系1956年的反冒进，他说，那时的“观潮派”相当多，中央、省、专、县、乡、社都有“秋后算账派”。他认为反冒进错误的发生是由于不懂得农民同盟军问题，不相信多快好省，首先是不相信“农业四十条”，不相信农业发展速度可以相当快，可以大跃进。他说，现在的情况好了些，生产大跃进，整风反右派，把那些说农村没有希望，“四十条”不能实现的，一扫而光。但仍有一些“观潮派”、“秋后算账派”，要有团结有斗争，对他们就要进行斗争，斗争是为了团结，不能不准人家革命。

毛泽东把应付可能发生的怀疑或反对总路线的问题提到了防止党内分裂的高度。5月17日，他说，经过反右派斗争，今后大的问题不会有了，小的问题还会有。有了去年的经验，全党得到了锻炼，“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台”。还要准备对付灾难，世界大战，还有党内会不会闹分裂。5月20日他在大会上又说，上次讲灾难，是大灾难——战争、分裂。关于对付世界大战，毛泽东说，现在看来，和平可能性很大，战争可能性也有。一打起来，顶多三年，把帝国主义一扫而光。关于防止党内分裂问题，他说，假如有人不顾大局，出现党内分裂，就要乱一阵子。代表，特别是中央委员，都需要注意顾全大局。谁不顾全大局，谁就要摔跟斗。他还指出，在1957年的风浪中，各省的领导机关都出现了党内的右派分子、地方主义分子、民族主义分子。北京的政法部门垮了，文教部门垮得更多，这是政治上的分裂。今后不会有新的分裂，我看有可能，只要有党就有可能。有人说，听

了不舒服。我看讲了，大家就有了精神准备。我们是乐观主义者，不怕党的分裂。现在无事，我们很团结，中央和地方都如此。经过整风、反冒进事件，现在搞清楚了，经过团结、斗争，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5月23日会议结束那天，毛泽东在大会讲话中联系1956年反冒进发生的所谓曲折，再一次谈到世界大战和党的分裂问题。他请大家预料将来还可能发生曲折，要求大家，各省委、中央都要研究一下。他说，预料到了就不要紧，党内如果起波折，不正确的力量总归要被批评的，正确的力量总归是要胜利的。一半以上的省、市、自治区出了问题，并没有推翻省市自治区党委。在点了一些省委的所谓党内右派分子之后，他接着说，有些省很不少，地委、县委、支部怎么样？多少也有问题。这是阶级斗争的正常现象，这些人必然要混进党内来。

党内认识上的分歧，是随时都可能发生的正常现象。特别是党在指导思想上、路线上发生偏差的时候，有人提出不同意见，更是不可避免的。党内认识上的分歧，一般来说，决不意味着党的分裂。不应当轻率地给持不同意见的人戴上“观潮派”、“秋后算账派”的帽子，更不应当用阶级斗争的方法解决党内认识上的分歧。八大二次会议发出的制止党“分裂”的警告，为以后错误的党内斗争埋下了伏笔。一年以后，彭德怀在庐山会议上对党中央的“左”倾错误提出了批评，果然被视为“分裂”行为。1959年8月2日，毛泽东在八届八中全会上说，现在有一种分裂的倾向。这种倾向，我在去年5月党代会上讲了的，我说这个时候危险，一个是国际上的战争，世界大战；一个是在国内把党分裂开来。那个时候并没有显著的迹象，现在已经有显著的迹象，要分裂我们这个团体。彭德怀等人因此被错误地打成“反党集团”。用阶级斗争方法处理党内认识分歧的错误方针，给党的建设和社会主义建设造成了极其严重的危害。

三、八大二次会议之后

1956年八大一次会议制定的路线是正确的。八大二次会议本应在此基础上前进，使党的路线更加完备起来。但是，这次会议没有完成这个任务，反而从八大一次会议后退了，它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历史上产生了重大影响。

从党中央当时转发的一个省委《关于传达和学习党的八大二次会议情况的报告》，可见这次会议反响的一斑。省委的报告说：“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一定能够用最高的速度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完成，向共产主义迈进。”该省委着重向党中央汇报破除迷信产生的效果：“这次会议（按：省委召开的全体会议）上，首先，大破了农业生产不能高速度发展的迷信，肯定了农业生产可以一翻再翻。”报告说：当前对跃进的认识已经不成问题了，“但是小跃进还是大跃进，就是增产百分之几、百分之几十，还是一翻再翻的问题，在一部分人的思想上还是没有解决的。怀疑派在这上面作文章。”“会议认为，有些人把农业增产问题，说得那么神乎其神，玄而又玄，是一种很大的迷信……实践经验告诉我们，要使产量成倍地翻，必须措施成几倍地翻，干劲成十倍地翻。”“其次，是继续大破了办工业的神秘观念，肯定了地方工业可以在自力更生为主的情况下大发展……××市的同志在会上发言，他们要在5年之内，钢的产量达到300万吨，超过人口仅次于我国的东方大象——印度，赶上资本主义世界工业比较发达的瑞典的水平。”“第三，是大破了对于‘科学技术’和‘科学家、技术人员’的迷信……科学技术并没有什么神秘，自然科学就是生产斗争经验的总结，把我们现在在生产上所干的一套总结起来，有许多就是最新的科学技术，有些还是世界科学技术的尖端（如我国小麦亩产4000多斤）。”省委的报告极力贬低、攻击知识

分子：“从这次交心运动中，暴露出这些道貌岸然的‘学者’，有的是对党有刻骨仇恨愿意带着花岗石的脑子去见上帝的顽固分子，有的是一贯崇美亲美的投机政客和实行奴化教育的‘专家’，有的是不择手段弄虚作假骗取名利的大骗子手，有的虽有一些真才实学，但却是以奇货自居，向党向人民讨价还价的贪心分子；具有真才实学而又诚心诚意为劳动人民服务的还是少数……我们决心通过交心运动把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贯彻到底，拔掉所有的灰旗、白旗，把工人阶级的革命红旗插遍各个角落（例如大学的各个教研室，厂矿的各个科室，各个科学研究所和技术推广站等）。”报告还说：“会上有人说‘破除迷信没有底，解放思想没有边’。主席关于破除迷信、解放思想的指示，正像第一个中子打进了原子反应堆，迅速在干部和群众中引起了连锁反应，产生了巨大的物质力量。”报告提出“在三五年内，可能争取达到平均每人粮食1500斤到2000斤的水平”。1958年7月8日党中央向全国转发该报告时说：“这个报告很好，发给你们参考。”

八大二次会议以后，《人民日报》、《红旗》杂志以及各省市的报纸连篇发表《把总路线的红旗插遍全国》、《力争高速度》等一类社论和文章，宣传高速度思想。中央领导人频频视察各地，大鼓干劲。“大跃进”运动便以雷霆万钧之势在全国各条战线全面展开。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从这里拐了一个大弯儿。

（裴棣：《1958年八大二次会议》）

“跑步进入共产主义”： 1958年北戴河会议

北戴河会议宣布1958年要生产钢1070万吨，并通过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的决议，认为“共产主义在我国的实现，已经不是什么遥远将来的事情了”。会后，全国很快形成全民大炼钢铁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高潮，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严重地泛滥起来。

1958年北戴河会议，是指1958年8月在北戴河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这是“大跃进”运动发动起来之后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它对“大跃进”运动的进一步展开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兴起产生了直接的重要作用。

会议前的形势

北戴河会议前，经过一系列中央会议，“大跃进”运动已经全面地大规模地开展起来。正如毛泽东在北戴河会议上所说：“去年三中全会，今年南宁会议、成都会议、党代表大会，提出了破除迷信的口号，起了很大作用。因此，才有大跃进。”党的八大二次会议以后，从中央到地方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以实现各项工作的全面“跃进”。

1958年6月1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加强协作区工作的

决定》。这个决定提出：为适应建设事业发展的新形势，除了应当发挥中央各部、委和各省、市、自治区的积极性以外，还必须充分发挥协作区的积极作用。决定提出要在中央集中领导下，按照全面规划，逐步形成若干个具有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的经济区域。因此，决定提出不但对于财政经济工作要实行分级管理的制度，而且对于建设计划，特别是经济计划工作，充分采取全面规划、分级平衡、点面结合、以点带面的方针。决定认为1958年2月中共中央关于召开地区性协作会议的决定已不完全适应形势的要求，提出必须充分发挥各协作区的作用，逐步扩大各协作区的职权。决定规定了协作区的任务，主要是在几个省、市、区范围内对新建大型的冶金、煤炭、电力、机械、炼油、化工等企业进行统一规划和协作平衡；组织工业基础较强的省、市、自治区帮助工业基础较差的地区，实行重点和全面相结合，以点带面的方针；合理地使用各地人力、物力、财力，避免某些基建项目不应有的重复和缺漏；通过协商方式，互相支援，统一步调，千方百计地解决各省、市、自治区之间的矛盾和问题。

根据中共中央的决定，全国划分为7个协作区，每个协作区成立协作区委员会，作为各协作区的领导机构；协作区委员会下设立协作区经济计划办公厅，作为它的办事机构。这7个协作区是：东北协作区（辽宁、吉林、黑龙江），欧阳钦为主任委员；华北协作区（北京、河北、内蒙古、山西），林铁为主任委员；华东协作区（上海、江苏、浙江、安徽、江西、福建、山东），柯庆施为主任委员；华南协作区（广东、广西），陶铸为主任委员；华中协作区（湖南、湖北、河南），王任重为主任委员；西南协作区（四川、云南、贵州、西藏），李井泉为主任委员；西北协作区（陕西、甘肃、青海、新疆、宁夏），张德生为主任委员。协作区成立后，各协作区先后召开了协作区计委主任会议和协作委员会议，分别讨论了中央和省市委布置的重点建设问

题、农业问题和 1959 年年度计划等。

在决定成立协作区的同时，中共中央于 6 月 2 日又作出《关于企业、事业单位和技术力量下放的规定》，对企业、事业单位和技术力量下放的具体办法做了规定。按照这个规定，轻工业部门所属各企业、事业单位除 4 个特殊纸厂和 1 个铜网厂外全部下放；重工业部门所属各企业、事业单位大部下放，下放的单位约占全部的 60%~70%；各工业部门下放的单位和产值（除军工外）约占全部的 80% 左右。铁道部所属工程局、管理局实行中央和地方双重领导；邮电部除保留北京通讯枢纽和通各省的长途通讯干线及北京通各省的邮政干线管理权以外，全部下放；交通部所属公路工程的设计、施工单位，除留必要的部分支援国外以外，全部下放；农垦部除直属 3 个地方的国营农场外，其余的国营农场均交地方管理；森林工业管理体制改变后，关内的全部下放；粮食、商业部门所属加工企业全部下放。中央要求下放企业、事业单位和技术力量的交接工作，于 6 月 15 日以前一律完成。

随即，中共中央于 6 月 6 日批转了冶金、第一机械、化学、水利电力、石油、建筑、轻工、纺织等工业部党组关于企业下放问题的报告。

建立协作区，下放企事业单位和技术力量，目的都在于加快经济建设的速度。八大二次会议以后，速度问题被提到了一个更加突出的位置。

对高速度的强调，导致高指标风的兴起，各部门、各地区对本系统、本地区的生产指标层层加码。不久，各协作区先后召开钢铁规划会议，制定 1959 年钢铁生产计划。各地区均提出了不切合实际的钢产量指标。6 月 19 日，毛泽东在中南海听取有关部门负责人汇报，提出 1958 年的钢产量干脆翻一番，即搞 1100 万吨钢（1957 年钢产量为 535 万吨）。毛泽东还估计，1959 年钢

产量可能达到 2500 万吨，两年就可以在钢产量上超过英国。6 月 21 日，冶金工业部党组重新提出 1959 年产钢计划。这份计划在向中央汇报了各大区关于钢铁生产规划会议的情况后认为：“根据这种情况看，明年钢的产量可以超过 3000 万吨，而 1962 年的生产水平则约可能争取到八九千万吨以上。”第二天，毛泽东向各大协作区，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各中央委员，中央各部委，中央国家机关各党组，军委会议各同志转发了这个文件。

钢铁生产指标的加码，促进了整个国民经济指标的追加。6 月中旬，国家计委向中央政治局提交《第二个五年计划要点》的报告。报告说，今年工农业大跃进已成定局，现在看，以钢铁为主的几种主要工业产品的产量有可能不用 3 年就赶上和超过英国，全国农业发展纲要有可能 3 年基本实现；“第二个五年计划的任务就是：提前完成全国农业发展的纲要；建成基本上完整的工业体系，5 年超过英国，10 年赶上美国；大大推进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为在 10 年内赶上世界上最先进的科学技术水平打下基础”。报告估计，到 1967 年我国钢产量能够达到 1 亿吨。6 月 16 日，国家计委又向中央政治局提交《关于第二个五年计划的要点》报告。报告预计 1958 年的财政预算收入，其增长速度将达到 35%；第二个五年计划的财政收入初步匡算为 4000 亿元，每年平均递增 33.8%；二五计划财政支出中，基建投资为 3050 亿元，占总支出的 70% 以上。6 月 17 日，国家经委向中央政治局提交《两年超过英国》的报告。报告认为：1958 年第二本账肯定可以超额完成，1959 年的国民经济可能会有更大的跃进；这样经过 3 年苦战，我国就可以在钢铁及其他主要产品产量方面赶上和超过英国，在农业方面实现水利化，达到“四、五、八”的要求，基本上建立起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毛泽东在这个报告上批示：“超过英国，不是 15 年，也不是 7 年，只需要两到三年，两年是可能的。”6 月 27 日，中央又批转国家经委党组《关

于增加基本建设投资 25 亿元分配意见的报告》，决定 1958 年再增加基建投资 25 亿元。

伴随高指标风的兴起，浮夸风也越来越盛行。其中农业方面的浮夸尤为突出。一时间，报纸、电台、广播里竞相传出亩产高产纪录的“奇迹”。7 月 1 日的《今日新闻》报道：我国小麦总产量已经超过美国跃居世界第二位。8 月 13 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祝早稻花生双星高照》。所谓“双星”是指两个高产“卫星”：一个是湖北省麻城县麻溪河乡早稻亩产 36900 多斤，一个是福建省南安县胜利乡花生亩产 10000 多斤。而 1957 年我国水稻单季稻亩产最高纪录是 2400 斤，花生亩产最高纪录是 1500 斤。浮夸风表现的另一面，是大批“粮食增产有限论”、“定局论”。认为粮食增产要受到天时地利等自然条件限制的观点，被概括成“粮食增产有限论”。而“粮食增产有限论”被认为“是同资产阶级的‘土地报酬递减律’学说和反动的人口论殊途同归的”。所谓“定局论”，是指一些人认为农作物的生长后期，收成是丰是歉已成定局。这种观点从防止松劲情绪的角度看，是应该批评。但是当时主要是把“定局论”作为妨碍全面丰收的思想来批判的，把“定局论”当成了农业生产上促进派的对立面。这些批判反过来助长了虚报、浮夸之风的蔓延。

就在这个过程中，急躁情绪也开始在变革农村生产关系方面表现出来，并逐渐形成“共产风”。6 月，《红旗》杂志 1958 年第 1 期公开发表这年 4 月 15 日毛泽东写的一个批示，题为《介绍一个合作社》。毛泽东说：“共产主义精神在全国蓬勃发展。广大群众的政治觉悟迅速提高。群众中落后阶层奋发起来努力赶上先进阶层，这个事实标志着我国社会主义的经济革命（生产关系尚未完成改造的部分）、政治革命、思想革命、技术革命、文化革命正在向前奋进。”八大二次会议以后，个别地方即试办过共产主义公社。7 月，《红旗》杂志第 3 期发表陈伯达的文章《全

新的社会，全新的人》；随后第4期又发表陈伯达在北京大学庆祝党成立37周年大会上的讲演，题为《在毛泽东同志的旗帜下》。这两篇文章向外界透露了毛泽东关于公社的思想。文章说：“毛泽东同志说，我们的方向，应该逐步地有次序地把‘工（工业）、农（农业）、商（交换）、学（文化教育）、兵（民兵，即全民武装）’组成为一个大公社，从而构成为我国社会的基本单位。在这样的公社里面，工业、农业和交换是人们的物质生活；文化教育是反映这种物质生活的人们精神生活；全民武装是为着保卫这种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在全世界上人剥削人的制度还没有彻底消灭以前，这种全民武装是完全必要的。”陈伯达在文章里说：“毛泽东同志关于这种公社的思想，是从现实生活的经验所得的结论。”“很显然，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在毛泽东同志的旗帜下，在这样‘一天等于二十年’的国民经济和文化普遍高涨的时候，人们已经可以看得见我国将由社会主义逐步过渡到共产主义的为期不远的前景。”建立人民公社，当时不仅被认为是进行生产关系变革的设想，而且也被当作向共产主义过渡的途径。

建立人民公社的最早实践，还是从农村开始的。河南省新乡县成立了七里营人民公社，遂平县成立了嵒嵒山人民公社，这是最早的农村人民公社。8月6日，毛泽东视察了七里营人民公社。8月9日，毛泽东在视察山东历城县时说：还是人民公社好，它的好处是，可以把工、农、商、学、兵合在一起，便于领导。毛泽东关于办人民公社的思想和谈话公布之后，一些农村争先恐后模仿七里营、嵒嵒山，创办人民公社。

在农村，还出现了农业社公共食堂。办公共食堂最早是湖南邵阳、桃源县，湖北公安县和福建安溪县的部分农村，农业社在生产紧张、劳畜力短缺的情况下，根据社员自愿参加的原则所采取的一种办法。7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的署名文章《这件事要提倡》认为：“湖南、福建等地一些农业社开办公共食堂，

集体吃饭，是一件很有意义的农村新事。它标志着农民生活习惯和生活方式上的新发展、新趋向。在个体经济时代，农民一家一户就是一个生产单位。适应着这种分散的个体经济制度，吃饭也是一家一灶。现在情况完全不同了：广大农村已经合作化，生产再不是以家庭为单位，而是以社为单位在进行。大规模的生产建设运动和广泛开展的的技术改革运动，使广大农村经常处于紧张的突击状态，劳动力普遍感到不足。集体的生产和紧张的劳动，必然要求有同它相适应的生活方式、生活习惯。由一家一灶发展为公共食堂，正是这种要求的反映。”农村公共食堂的兴办，使得平均主义之风也开始滋长起来。

总之，北戴河会议之前，左倾错误已经发展得很严重了。问题也开始暴露出来。在毛泽东看来，经济建设主要是抓住钢铁和粮食。8月11日和12日，毛泽东在视察天津时说：一个粮食，一个钢铁，有了这两个东西就什么都好办了。当时，由于正处于夏收，粮食问题不突出。许多人甚至认为粮食问题已经解决，毛泽东还提出“粮食多了怎么办”的问题。但是钢铁的问题则不然。由于追求高指标，许多地方和部门、企业只注重搞计划，而忽视抓生产，各地“自我为政”，中央指挥调度不灵。更重要的是，由于生产指标的层层加码，使生产能力和产量的实际情况，与计划指标的距离越来越大。到7月份钢产量只完成380万吨，离1100万吨的年产量指标悬殊很大。这引起中央领导人的担心。为了解决上述问题，为了促进全面跃进的进一步实现，中共中央决定召开北戴河会议。

会议的概况

1958年8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召开北戴河会议的通知，决定于8月16日举行会议，要求参加会议的各同志于15日

以前到达。通知还附了会议要讨论的 17 个问题。

8 月 17 日，北戴河会议正式开始，8 月 30 日结束。参加会议的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委的主要负责人。8 月 25 日至 31 日，中央还同时在北戴河召开了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工业书记会议。参加这个会议的除了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主管工业的书记外，还有各省、市、自治区计委主任和有关厅、局的主要负责人。8 月 30 日，参加工业书记会议的代表旁听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听取了毛泽东在最后一天大会上的讲话。

毛泽东在北戴河会议上作了多次讲话。其主要内容是：

第一，关于北戴河会议要讨论的 17 个问题。

关于北戴河会议要讨论的 17 个问题，毛泽东在会议第一天的讲话中作了说明。毛泽东说：这次会议是政治局扩大会议，每省和自治区的负责同志都参加。第 1 个问题，是明年和第 2 个五年经济计划问题，主要是工业计划问题。这是重点、主题。这次会议也可以说是工业会议，农业、商业也有一点。第 2 个问题，也是工业问题，即今年的铁、钢、铜、铝的问题。钢由 1957 年的 535 万吨翻一番，达到 1100 万吨，到年底只有 4 个月零 13 天了，有完不成的危险。要保证完成。中心问题是搞到铁。第 3 个问题，明年农业问题。第 4 个问题，明年水利问题。第 5 个问题，农业合作化问题。第 6 个问题，今年商业收购和分配问题，包括今年粮食处理问题。粮食产量今年可能达到 6500 亿斤（一说 7000 亿斤），6.5 亿人口，每人 1000 斤。明年每人争取达到 1500 斤，后年达到 2000 斤。是否搞到 2800~3000 斤，到底多少好，以后再议。是否无限制地发展粮食，恐怕超过每人 3000 斤就不好办了。第 7 个问题，是教育问题。第 8 个问题，是干部参加劳动的问题。包括我们在座的，每年参加劳动 1 个月总是可以的。第 9 个问题，是劳动制度问题。第 10 个问题，从明年起，

搞 570 万人去边疆问题。第 11 个问题，是技术保密问题。第 12 个问题，是国际形势问题。这个题目是我出的，因为到处有人问会不会打世界大战？打起来怎么办？恐怕不会打。还是西方怕我们多一点。党内外都有怕西方的情绪，有恐美病。第 13 个问题，是今冬明春在农村展开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教育问题，要搞大辩论、大字报。第 14 个问题，是协作问题。第 15 个问题是我提出的，深耕问题。目前，总而言之农业的主要方向是深耕。不深耕，水装不了，肥放不进，不能分层施水，肥再多也不行。深耕可以使土地变成个大水库，大肥料库。北方要深耕 1 尺，南方七八寸。密植的基础是深耕，深耕有利于除草，把草根挖掉又有利于除虫，草翻到底下又可以变成肥料。这样一来可以 1 亩当 3 亩，我们的土地多了。苦战 3 年之后，土地的观念要改变，用不着那么多地。将来可拿 1/3 的土地种树，有 2/3 的土地就够了。人口的观念要改变，现在是人少，不是人多了。过去我说搞 8 亿，现在看来搞十几亿人口也不要紧，不成问题。但也不要提倡多子女。人民文化水平提高以后就会真正节育了。第 16 个问题，是肥料问题。第 17 个问题，是民兵问题。搞大合作社，工农商学兵一套都有。用 6 年时间 4 人发一支枪，全国共 1 亿支枪，每人一年发几十发子弹，下一道命令必须打光，不打光不算完成任务。全民皆兵，有个壮气作用，吓人作用。

与会者根据会议的安排，围绕计划和工业生产问题，对上述 17 个问题逐一进行了讨论。8 月 17、19、21、24、29、30 日，毛泽东在会上先后讲话，其中 19、21、24 日是他同各大协作区委员会主任的谈话。刘少奇、朱德、陈云、邓小平也在会上作了讲话或插话。李富春就 1959 年计划和第二个五年计划，薄一波就工业生产问题，谭震林就农业问题，陆定一就教育问题分别在会上作了说明和发言。除了上述 17 个问题之外，会议还讨论了交通运输问题。会议还涉及整风问题及其他一些问题。会议采取

逐日讨论、逐个通过的办法，先后通过了近 40 个文件。

第二，关于工业和计划问题。

这是毛泽东讲话的重点之一。他说：第一书记要亲自抓工业。他对与会者说：你们回去后，什么事情也不搞，专门搞几个月工业。不能丢就不能专，没有专就没有重点。粮食问题基本上解决了，亩产卫星不要过分重视。帝国主义压迫我们，我们一定要在三年、五年、七年之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大工业国。为了这个目的，必须集中力量把大工业搞起来，抓主要的东西。要下紧急命令，把铁交上来，不许分散。大中钢厂的产钢计划必须完成，争取超过。有所不为才能有所为。毛泽东说：这次会议工、农、商、学、兵都有，重点是工业。全党全民办工业，从今以后，第一书记要偏到工业方面来。过去我们偏到农业方面，拿农业压迫工业，将它的军，农业搞起来了。农业上了轨道，工业没有上轨道。工业要抓，有人说，睡到工地上，睡到机器旁边去，就可以搞起来，不到机器旁边睡觉不行。东北三省过去抓工业，但农业未搞好，东北要一面抓工业，一面抓农业。其他各省、各自治区重点抓工业。明年是决战的一年，主要是指抓工业，首先是钢铁、机械。

钢铁生产是毛泽东多次讲话的内容。他说：冶金部汇报原计划 600 万吨，以后又讲 700 万吨，后又讲 900 万吨。我说：索性翻一番，何必拖拖拉拉呢？搞 1100 万吨。问了许多了，都说可以，有希望。今年 1100 万吨钢，到底扎实不扎实，我是怀疑的，拿到手才算数。“钢铁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明年 3000 万吨，后年再增 2000 万吨，苦战 3 年，达到 5000 万吨，基础就可起来了。剩下两年，到 1962 年搞到 8000 万吨到 1 亿吨钢，就赶上美国了。

在北戴河会议上，毛泽东还特别强调统一和纪律。毛泽东说：“统一计划，分级管理（全国、省只能搞一个计划），重点建

设，枝叶扶持（枝干相联）。”分级是在统一计划下，小部分中央管理，2/10（投资利润都可归中央）；大部分归地方管理，8/10。全党办工业，各级办工业，一定要在统一计划下，必须要有重点有枝叶。不妨碍重点的大家搞，凡是妨碍重点的必须集中。毛泽东还说：所有计划统统要公开，不要瞒产。地、县、乡不控制不行。调东西调不出来要强迫命令。有几项东西，非下命令不可了。要逐级搞平衡，逐级上报，社向县，县向专，专向省，这叫社会主义秩序。他说：三令五申，凡有铁拿不出来者，要执行纪律。对搞分散主义的，一警告，二记过，三撤职留任，四撤职，五留党察看，六开除党籍。不然反而不利。毛泽东说：这几条都是神经战，不可少，是属于惩罚一类的性质。九个指头是说服，靠马克思主义，靠开会，靠政治，凭“良心”办事，一个指头是纪律。

毛泽东在讲话中也谈到统一与分散、死与活的关系。他说：没有死不行，统得太死也不行，一点不死也不行。1959年的钢如果是2700万吨，2500万吨必须卡死，200万吨是活的；如果是3000万吨，就有500万吨是活的；如果超过3000万吨，还可以分成。死者保证重点，活者重点之外不妨碍重点。大包干就是有死有活，大家都要管。死与活两方面就是统一与分散兼而有之。包干制就是有死有活的矛盾统一。大权独揽小权分散就是这个道理。毛泽东总结说：要有死有活。统一计划，分散管理。各级办工业，全民办工业，有重点，有骨干，有枝叶。

第三，关于建立人民公社问题。

关于人民公社的名称问题，毛泽东说：可以叫人民公社，也可以不叫。我的意见叫人民公社。这仍然是社会主义性质的，不过分强调共产主义。人民公社一曰大，二曰公。人多，地大，生产规模大，各种事业大，政社是合一的，搞公共食堂，自留地取消（养猪都归公，自留地暂时还留一点），鸡、鸭、屋前屋后的

小树还是自己的，到将来也不存在了。粮食多了，可以搞供给制。还是按劳付酬，工资按各尽所能发给个人，不交给家长，青年、妇女都高兴，这对个性解放有很大好处。搞人民公社，我看又是农村走在前头，城市还未搞，工人的级别待遇比较复杂。不论城乡，应当是社会主义制度加共产主义思想。苏联片面强调物质刺激，搞重赏重罚。我们现在搞社会主义，也有共产主义的萌芽。学校、工厂、街道都可以搞人民公社。不要几年功夫，就把大家组成大公社。

谈到我国人民公社的由来，毛泽东说：人民公社是群众自发搞起来的，不是我们提倡的。我们提倡不断革命，破除迷信，解放思想，敢想、敢说、敢做，群众就起来了。南宁会议、成都会议、八大二次会议都未料到。共产主义本来是有群众自发的因素，先有空想社会主义，古典唯物论、辩证法，然后再有马克思那些人总结出来的。我们的人民公社是在合作社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不是没有来由的。把这个问题条理化，需要我们去搞清楚。但是，毛泽东又说：《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中几个按语，都说办大社好，山区也可以搞大社，多种经营综合发展，开始办小一些也有好处。1955年我就提倡办大社。全国搞15000个到25000个社，每社5000到6000户。两三万人一社，相当大了，便于搞工、农、商、学、兵与农、林、牧、副、渔这一套。

北戴河会议讨论了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的决议，对此，毛泽东说：人民公社决议草案发下去，每一县搞一两个试点，不一定一下铺开，也不一定都搞团、营、连、排、班。要有领导、有计划地去进行规划。毛泽东认为：共产党讲话过去讲的都灵了，抗日、打蒋介石、土改、合作化都灵了，农民相信。这次提出办公社，全民所有制，农民也会很快接受。

关于人民公社的内部结构，毛泽东很欣赏河北省徐水县的经

验。河北徐水搞军事化、战斗化、纪律化，在公社内部设团、营、连、排、班。毛泽东说：人民公社搞军事化，我看是好的。师、团、营、连，有的地方没有，但“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纪律化”这三化的口号很好，这就是生产大军，可以增产，可以改善生活，可以休息，可以学文化，可以搞军事民主。似乎一讲军事就没有民主，恰好民主出在军队，即军事、政治、经济三大民主，战斗中可以互助，官长压迫士兵在我们军队中是犯纪律的。公社“三化”很好，人民公社军事化，并不是资产阶级军事化，有纪律，有民主，相互关系是同事关系，是说服不是压服。

毛泽东把人民公社看作是向共产主义过渡的一个重要途径。他认为，大概10年左右，可能产品非常丰富，道德非常高尚，我们就可以从吃饭、穿衣、住房子上实行共产主义。公共食堂，吃饭不要钱，就是共产主义。将来一律叫公社，不叫工厂，如鞍钢公社，城乡一律叫公社，大学、街道都办成公社。乡政合一，政社合一，挂一个牌子。

第四，关于破除资产阶级法权和向共产主义过渡的问题。

在北戴河会议上，毛泽东从人民公社的建立，讲到了破除资产阶级法权、向共产主义过渡的问题。毛泽东说：社会主义，农民先走一步。要破除资产阶级的法权思想，例如争地位、争级别，要加班费，智力劳动者工资多，体力劳动者工资少等，都是资产阶级思想的残余。“各取所值”是法律规定的，也还是资产阶级的东西。毛泽东说：在所有制解决以后，资产阶级法权制度还存在，如等级制度，领导与群众的关系。整风以来，资产阶级法权制度差不多破坏完了，领导干部不靠威风、不靠官架子，而是靠为人民服务，为人民谋福利，靠说服。要考虑取消薪水制、恢复供给制的问题。取消薪水制，一条有饭吃，不死人，一条身体健壮。空想社会主义的一些理想，我们要实行。马克思关于平

等、民主、说服和人们的相互关系、打成一片的思想没有发挥。

毛泽东说：八级工资制这也是资产阶级法权制度的表现。现在不分级，工资一律也不行。将来要实行各取所需，无所谓八级工资制，要做到没有区别，而现在又搞那么多的区别也不好。我们过去二十几年搞供给制并没有出懒汉，而且打仗还是死人的，还不是靠政治挂帅?! 那也不是少数人，当时实行供给制的人数有几百万。战争中组织民兵坑道作战，没有报酬，拼命打仗。徐水县能够搞军事化，也是因为有这个经验。但是进城以后说供给制不行了，要实行薪水制，说它能够刺激生产，结果由军事共产主义倒退一步，向资产阶级法权让了一步。现在还是要靠政治，政治和科学结合。

毛泽东还由此谈到干部问题。他说：农村作风吃不开了，城市要求正规化，衙门大了，离人民远了。要打成一片，要说服，不要压服。多年如此，这些怎么都成了问题呢？原因在于脱离群众，在于特殊化。我们从来就讲：上下一致，官兵一致。供给制比较平等，衣服差不多。但进城以后变了。城市恰恰要推行农村作风和游击习气。我看还是农村作风、游击习气好。22年的战争都打胜了，为什么建设共产主义不行了呢？为什么要搞工资制？这是向资产阶级让步，是借农村作风和游击习气来贬低我们，结果发展了个人主义，讲说服不要压服也忘掉了。是不是由干部带头恢复供给制？我们已相当地破坏了资产阶级的法权制度，但还不彻底，要继续搞，不要马上提倡废除工资制度，但是将来要取消。要强调农村作风，游击习气。毛泽东强调干部要参加劳动。他说道：不劳动不好，官作久了容易脱离群众，脱离实际。还有几千万干部子弟，近水楼台易做官，搞久了我们也容易脱离群众脱离实际。

关于向共产主义过渡，毛泽东说：共产主义的第一个条件是产品丰富，第二个条件是要有共产主义精神，一有命令，每个人

都自觉地去工作。有人说，平均主义不分高低，要出懒汉。共产主义不分高低，我们有 22 年的军事共产主义生活，没有懒汉，不发薪水，与苏联不同，苏联叫余粮征集制，我们没有搞。我们叫供给制，军民一致，官兵一致，三大民主。我们原来分伙食尾子，津贴。进城以后，熬了 3 年，到 1952 年搞了薪水制，说资产阶级的等级、法权那样神气，把过去的供给制说成落后的办法，游击习气，影响积极性。其实是把供给制变成资产阶级的法权制，发展资本主义思想。难道二万五千里长征、土地革命、解放战争是靠发薪水发过来的吗？抗战时期，二三百万人，解放战争时期，四五百万人，是军事共产主义的生活，没有星期天，在一元化领导之下，没有什么“花”，官兵一致，军民一致，拥政爱民，把日本鬼子打走了，打败了蒋介石。打美国的时候也没有“花”。现在有“花”，发薪水都要等级，分将、校、尉，可是有的还没有打过仗，结果是脱离群众，兵不爱官，民不爱干，因为这一点跟国民党差不多，衣分三色，食分五等，办公桌、椅子也分等。工人、农民不喜欢我们，说“你们是官——党官、政官、军官、商官、工官”。其官之多，怎么不出主义？官气多，政治少，所以出官僚主义。毛泽东说：人民公社三四年（明年、后年）内能不能由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把农业工厂化，实行工资制，土地国有行不行？有个文件写第三个五年计划向共产主义过渡，我加了个第四、五个五年计划。毛泽东说：讲从第三个五年计划开始过渡还可以。

第五，关于上层建筑问题。

毛泽东在讲话中还谈到法治问题。他说，法律这个东西没有也不行，但我们有我们这一套，还是马青天那一套好，调查研究，就地解决，调解为主。大跃进以来，都搞生产，大鸣大放大字报，就没有时间犯法了，对付盗窃犯不靠群众不行。不能靠法律治多数人，多数人要靠养成习惯。韩非子是讲法治的，后来儒

家是讲人治的。我们每个决议都是法，开会也是法，治安条例也靠成了习惯才能遵守，成为社会舆论，都自觉了，就可以搞共产主义了。

毛泽东还讲了意识形态问题。他说，意识形态、宇宙观、方法论、报纸、文化教育的作用大得很。资产阶级的自由破坏得越多，无产阶级的自由就越多。我们政治思想的革命搞得比较彻底，干部参加生产，和群众打成一片，彻底改革规章制度，就是对资产阶级自由的彻底破坏，工人的干劲冲天。毛泽东说，意识形态是客观实际的反映，关心基础，为基础服务。改革规章制度，开会就是搞意识形态。北戴河会议就是搞意识形态。去年三中全会，今年南宁会议、成都会议、党代表大会，提出了破除迷信的口号，起了很大作用，因此才有大跃进。不正确的反映客观规律危害很大。

毛泽东还谈到学校教育。学校教育要和劳动相结合。我们的农业学校要统统搬到乡下去，农业学校办在城里不是见鬼吗？一切学校都要办工厂。

毛泽东还说，政治经济学和历史唯物论有些问题要重新写。我们解决了一个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问题。先搞农业，同时搞重工业。赫鲁晓夫和莫洛托夫之争，就是说重工业多了。我们一反苏联之所为，先搞农业，促进工业发展，先搞绿叶，后搞红花。经济学和历史唯物论要有新的补充和发展。生产关系中的三个方面，所有制、劳动者的相互关系和分配问题，都来展开。讲到将来，是一定有许多模糊地方的。苏联有41年的经验，我们有31年的经验，要破除迷信。

毛泽东还谈到要采取群众运动的方式搞经济。他说，农村作风、游击习气，这是资产阶级批评我们的，或者是苏联正规化来对我们批评。实际上，农村作风、游击习气，这才是正规化的马列主义的作风。这样大的事情，不搞运动怎么行？办工业和办

农业一样，不能由少数人冷冷清清地去办，必须由全党和广大人民去办。要依靠群众，和群众打成一片，同甘共苦。

北戴河会议讨论的问题、制定的文件很多，但是中心问题是工业生产问题，其中钢铁工业生产的问题更为突出。另外一个重点就是建立农村人民公社问题。会议始终是围绕上述两个重点进行讨论的。

会议主要文件的基本内容

北戴河会议的主要文件，在会议结束之后分别由国务院公布和《人民日报》发表，这里就不再概述了。除了已公开发表或公布者外，北戴河会议的另一重要文件情况如下：

一、《中共中央关于1959年计划和第二个五年计划问题的决定》、《1959年度国民经济计划主要指标》、《关于第二个五年计划的意见》

1959年计划和二五计划是第一次大协作区会议之后，国家计委、经委的有关同志搞出来的，然后提交中央政治局作了初步讨论。之后又经过修改，再次提交中央政治局讨论，然后，作为初步草案提交各大协作区会议讨论。经过各大协作区会议讨论后，又提交北戴河会议讨论。会上，毛泽东、刘少奇等都提出要调整计划的意见。根据这个意见，国家计委对原计划作了4个方面的调整，一是调整项目，重大项目增加148个，减少38个项目，净增118个项目；二是调整收入和投资，投资比原计划的480亿增加了21.22亿元，财政收入增加了22.5亿元达到722.5亿元，其中地方增加了15亿元，中央各部增加了7.2亿元；三是保证重点，电力由原来520亿度增加到580亿度，保重点，保生产指标，保新增生产能力；四是预算外投资各省要做计划。另外，二五计划也作了调整。

会议最后通过了 1959 年计划和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决定。1959 年国民经济计划的主要目标是：粮食产量达到 8000 亿到 10000 亿斤；钢产量达到 2700 万吨，争取 3000 万吨；铜 40 万吨，铝 30 万吨；机床产量达到 30 万台；发电量达到 550 亿度；煤产量达到 3.7 亿吨；石油产量达到 800 万吨；水泥产量达到 3000 万吨；化肥产量达到 530 万吨；棉纱产量达到 1000 万件；新建铁路 1.05 万公里。为了实现这些指标，并且为 1960 年的建设作准备，在预计的 1959 年国家财政收入的 722 亿元中，用于基本建设投资的将为 500 亿元；地方和企业的用于基本建设的自筹资金在外。实现 1959 年这个计划，我国的钢铁和其他主要工业产品的产量，除电力等少数几种以外，都将超过英国；1956 年到 1967 年的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规定的粮食和棉花的指标，都将提前 8 年超额完成。

决定说：在 1959 年计划的基础上，准备在 1960 年使粮食产量达到 13000 亿斤左右，钢产量达到 5000 万吨左右，在科学技术方面基本上掌握原子能技术和喷气技术。经过 1958 年、1959 年、1960 年这 3 年的苦战，再加上以后两年的继续努力，即到 1962 年完成第二个五年计划的时候，我们就完全可能使粮食产量达到 15000 亿斤，或者更多一些，钢产量达到 8000 万吨至 1 亿吨，并且提前 5 年实现 12 年科学规划，在主要的科学技术部门赶上世界的先进水平。这就是说，在 1958 年到 1962 年的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我国将提前建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并创造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条件。

决定说：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在全国建立强大的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的同时，各协作区都应当建立起比较完整的、不同水平和各有特点的工业体系，各省、市、自治区也都应当建立起一定程度的工业基础。全国和各地方在建设工业体系的过程中，

应当注意合理地分布工业生产力，按照大型企业和中小型企业同时并举、在目前多建中小型企业的方针，使企业的布置适当分散，以适应国防安全，特别是适应逐步消灭工农差别、城乡差别、全国走向平衡发展的共产主义要求。

决定要求统一计划，分级管理，保证重点建设，加强协作，共同负责。决定要求各级党委抓紧 1958 年最后 4 个月的工作，特别是要保证完成 1100 万吨钢和冶金设备、发电设备、机床的生产任务。决定指出：在保证今后农业继续跃进的条件下，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应当立即把主要力量转到工业战线上，要全党办工业，全民办工业，由第一书记挂帅，抓紧工业的生产和建设的工作，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大搞技术革命，大力推广先进的生产技术和生产方法，采取能够迅速发挥作用的措施，开展评比、竞赛运动，交流经验，以便在尽短的时间内，在全国掀起一个工业生产、建设的新高潮。

《1959 年度国民经济计划主要指标》是对上述文件的具体化。1959 年工农业总产值为 3516 ~ 3706 亿元，比上年增长 68%；其中工业和手工业总产值为 2060 亿元，比上年增长 91%；农业和农副业总产值为 1456 ~ 1646 亿元，比上年增长 44%。1959 年财政总收入为 722.5 亿元，其中基建投资支出预算为 501.22 亿元。

《关于第二个五年计划的意见》，是国家计委党组提出的。《意见》说：1962 年的工业总产值约为 5700 亿元，将比 1957 年增长 7.4 倍左右，平均每年增长 53% 左右（比 1958 年预计增长 4.3 倍左右，平均每年增长 51% 左右）。1962 年农业总产值约为 2400 亿元左右，将比 1957 年增长 2.5 ~ 2.8 倍，平均每年增长 30% 左右（比 1958 年预计数增长 1.2 倍左右，平均每年增长 70% 左右）。在 1962 年工农业的总产值中，工业的比重将达到 70% 左右。《意见》说：第二个五年计划合计的基本建设投资约

需 3850 亿元，比第一个五年计划增长 6.8 倍左右。重大建设项目，初步安排 1000 个以上。需增加职工 2800 万人左右。

二、《中共中央关于经济协作的几项具体规定》

这个文件强调经济协作的计划性和组织性，对经济协作作了 3 条规定：

1. 所有列入国家计划的协作任务，必须由协作双方具体订立合同，严格执行，保证按时完成。

2. 各地区、各部门、各企业之间现有的协作关系必须继续保持。某些协作关系需要改变的时候，必须进行协商，双方同意后，再加改变，不得单方面废除。

3. 凡是超过省、市、自治区界限而未列入计划的经济协作，包括技术力量的支援和培训，必须统一归口，同有关省、市、自治区党委互相协商解决，并报有关的中央机关备案。各专区、县、乡、社和企业单位不得直接向其他省、市、自治区的机关、事业单位和企业单位提出协作要求，以免影响正常计划的执行。

三、《中共中央关于 1959 年农业生产安排的决议》

《决议》指出：1959 年农业生产安排的方针是，在保证粮食总产量达到 8000 亿 ~ 10000 亿斤的前提下，扩大棉花播种面积到 1 亿亩，总产量达到 8000 万到 1 亿担；大力增产油料作物，保证 1960 年生产年度生产 600 万吨食用植物油的原料；注意粮食品种和各种小杂粮的生产，注意各种经济作物的生产和蔬菜的生产。在数量大体满足之后，应该注意质量和花色品种，以适应人民的生活习惯和整个国民经济全面发展的需要。

关于粮食生产，《决议》认为主要关键是：增加小麦和早稻的播种面积，提高夏收作物在全年粮食总产量中的比重；实行以深耕、密植为中心的精耕细作，努力提高亩产量。《决议》提出了有关粮食、棉花、油料作物生产的几项具体措施。

关于畜牧业，《决议》要求 1959 年底毛猪存栏数达到 5 亿

头，屠宰数达到2亿头，大牲口达到1.05亿头，羊达到1.7亿头。

四、《中共中央关于储备粮食问题的决定》

《决定》认为，1958年我国农业空前高额增产的形势已成定局，按全国人口平均每人有粮食近1000斤。《决定》认为，这种新情况表明我国的粮食局势，已经开始根本改变，从而有可能也有必要有计划地进行粮食储备。《决定》指出：粮食储备应该以农业社储备为主，同时，国家也应该作必要储备，原则上80%由农业社和农户储备，20%由国家（包括中央和地方）储备，根据可能和需要，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内，全国争取储备粮食4500亿斤左右，相当7亿人一年口粮和十几亿亩耕地一年种子的需要，其中1958年应该争取储备粮食1000亿斤。

五、《中共中央关于农业社积累与消费问题的指示》

农业社积累与消费问题，是北戴河会议讨论的议题之一。会上，一些同志提出公社积累要扩大。有的同志谈到积累与消费问题时，提出将生活水准放在当地富裕中农的平均水平。会议最后通过的这个文件认为：正确处理积累与消费的原则，应该是：在苦战3年期间，尽量多地积累一些，以利迅速发展生产；同时，在生产发展的基础上，使社员的生活有适当的改善。改善社员生活，主要靠扩大集体福利事业，而不是单纯地增加社员的个人收入。《指示》说，1958年社员个人的实际收入，一般应该比1957年略有增加，以利于鼓励群众的生产积极性。但是增加不可过多。农业社社员的平均收入水平，不应该超过当地普通工人的平均收入水平。有的社收入很多，已经普遍超过了这个水平的，要向社员解释清楚，不再增加社员的个人收入。有的社收入低于当地富裕中农的平均水平，应该根据1958年的增产程度，增加社员的个人收入；但是，必须增加一定的公共积累，以适应扩大再生产的需要。

《指示》说，根据以上的原则处理之后，不少的社积累的比例可能是很大的。迅速增加的公共积累，首先应该用来购买生产资料，增加基本建设，扩大再生产。公共积累，除了用于本社的生产事业和集体福利事业以外，还应该采取县联社统筹资金的形式或者其他适当的形式，抽出一定的比例，用于全县、全省、全民的生产事业或者文化、教育、福利事业。这也要向农民解释清楚。

六、《中共中央关于民兵问题的决定》

《决定》说，现在，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已进到人民公社的时代，为实现全民皆兵提供了空前优越的条件。因此，随着人民公社的建立，把生产、工作、学习的组织军事化，把全民武装起来，工、农、商、学、兵结为一体，实行全民皆兵，把军队的后备力量建立在全民的基础上，这对生产建设和国防建设，都具有深远的政治意义和战略意义。

《决定》说，全民皆兵，就是以人民公社为单位，逐步实行全民武装。1962年，预计全国有7亿人口，除了地、富、反、坏、右和残疾人员之外，把年满16岁至50岁的能拿武器的男女公民，都组织在民兵之内，预计约3亿左右。其中又以复员退伍军人为骨干，把年满16岁至30岁的男性青壮年组成基干民兵，预计大约5000万。在农村中，以人民公社为单位，根据生产组织情况和民兵多少，以基干民兵为主，编为民兵大队、中队、小队。在城市，以厂矿、企业、学校、机关为单位，或者视城市人民公社的组织形式以人民公社为单位，建立民兵组织。这种武装起来的人民，既是民，又是兵；既是生产队、学习队、工作队，又是战斗队。

《决定》还对民兵组织的体制、领导方式、各项训练和思想政治工作等问题作了规定。

七、《中共中央政治局北戴河扩大会议公报》

这是1958年8月31日由新华社公布的，题为《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号召全党全民为生产1070万吨钢而奋斗》。公报介绍了北戴河会议的简况。公报说：会议指出，1958年农业生产的大跃进，将使粮食作物的总产量达到6000亿斤至7000亿斤，比1957年增产60%至90%；棉花将达到7000万担左右，比1957年增产1倍以上。

公报说：会议决定，全国的省、市、自治区党委的第一书记，从现在起，就必须首先注意工业的领导，但是同时不应当放松农业的领导。按照今年2月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所通过的1958年国民经济计划，今年钢产量是620万吨，比去年增产85万吨，这个数字早已显得不够了。今年5月底，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建议把今年的钢产量增加到800万吨至850万吨。现在看来，这个数字仍然嫌低。会议经过讨论，决定号召全党和全国人民用最大的努力，为在1958年生产1070万吨钢，即比1957年的产量535万吨增加1倍而奋斗。

公报说，会议热烈地讨论了在全国农村中建立人民公社的问题。会议指出，把规模较小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合并和改变成为规模较大的、工农商学兵合一的、乡社合一的、集体化程度更高的人民公社，是目前农村生产飞跃发展、农民觉悟迅速提高的必然趋势。人民公社是加速社会主义建设和过渡到共产主义的一种最好的组织形式，并将发展成为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的基层单位。人民公社的建立必须是在人民群众自觉自愿的基础上，必须通过群众的鸣放辩论。

公报还强调了高速度发展经济，既要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又要严格保持全国范围建设事业的计划性、纪律性。

会议的影响

北戴河会议对当时的各项工作都发生了重大的影响。它把“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迅速推向高潮，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严重地泛滥起来。

首先是加速了“大跃进”运动步伐，特别是掀起了“大炼钢铁”的运动。北戴河会议之后，从中央到地方，炼钢成为压倒一切的中心工作，各项工作都要围绕这个中心，为炼钢“停车让路”。在“土洋结合”的方针下，一方面拼命提高各大中钢厂的生产指标，另一方面在全国各地推广“小（小转炉、小平炉）、土（土法炼钢）、群（群众运动）”的炼钢经验。各地党委以第一书记挂帅，广泛动员社会各行各业支援炼钢。据1958年9月14日《人民日报》社论介绍，在生铁方面，仅9月上旬全国各地建成的土高炉和小高炉有11万多个，使土高炉和小高炉总数达到35万多个。全国各地约9000万人脱离本职岗位，投入炼钢炼铁的运动。大批的工人、学生、士兵、教师、居民为炼钢炼铁找燃料，找原料，以至砸锅炼铁，把家庭日用的钢铁也当作原料回炉。大炼钢铁的运动，一是导致了工业内部结构的失衡，过分偏重于钢铁生产，使能源、运输、铁路、电力等行业全面紧张，纷纷告急；二是浪费了许多森林、矿产资料，由于生产技术落后，生产设备原始，土炉炼出的铁基本上是废品；三是破坏了其他行业和社会生活的正常运转。

其次是直接掀起了人民公社化运动。北戴河会议作出建立人民公社的决议之后，原来零星的个别的人民公社的建立便成了铺天盖地而来的高潮。各省在会后未经过充分准备，就匆忙进行并小社转公社的工作。据1958年10月1日新华社报道，全国农村基本实现公社化。全国农村共有人民公社23397个，参加公社的

总农户占全国总农户的 90.4%，平均每社 4797 户。建立起来的人民公社，规模都相当大。据 10 个省、市的统计，5538 个公社中，5000 户以下的公社有 3343 个，5000 ~ 10000 户的公社有 1628 个，10000 ~ 20000 户的公社有 516 个，20000 户以上的公社有 51 个。此外，据 13 个省的统计，有 94 个县是一县一社或一个大联社。人民公社还实行政社合一，政权机关与经济组织不分。这种规模和体制，在管理上引起很多混乱和漏洞。公社新建时，实行社一级所有制，把贫富不一的农业社统统拉平，社员自留地全部交公，公社无偿调拨社队的劳力、物资。在分配方面，实行供给制和“吃饭不要钱”，“一平二调”、“共产风”日盛一日，挫伤了农民的积极性。

北戴河会议不仅在实际工作方面带来严重的消极影响，而且在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方面也在一个长时期内造成很多失误。

比如向共产主义社会过渡的问题，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这个问题上只提出过一些基本的原则，并没有详尽地论证。不过，有一点是肯定的，人类社会向共产主义过渡是一个必然的但又是相当漫长的过程。到底要具备什么条件，才能开始这个过程，这是需要不断探索才能解决的，而且需要实践已经向人类提出这个问题时才能开始解决。但是毛泽东在北戴河会议上却轻率地提出了这个问题。他简单地把“产品丰富”和“共产主义精神”当作进入共产主义的两个条件，在他看来这两个条件在中国都已经解决或正在解决，因此进入共产主义就成了并不遥远的事。这就在当时以至后来使我们对于共产主义的理解十分简单和狭隘，而且极易在这种对共产主义作图解的情况下产生幼稚和狂热的举动来。

又比如破除资产阶级法权问题，“资产阶级法权”是翻译的错误，这个词应译成“资产阶级权利”。这是马克思最早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提出来的，他把按劳分配中的等量劳动交换的原

则叫做“资产阶级权利”。他认为这个原则和资本主义商品的等价交换中的等量劳动决定等量价值的原则是同一原则；在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等量劳动相交换的原则性质改变了，但形式还存在。马克思还指出，按劳分配中等量劳动的交换所体现的“资产阶级权利”，包含着在劳动者中间存在的事实上的不平等，如劳动者工作能力的不同，家庭负担的不同等等。这些只有到了共产主义社会的高级阶段，实现按需分配时，才能完全消除。马克思是在抽象的意义上来使用这个概念的，他没有否定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性质，也没有把社会主义的按劳分配同资本主义的商品交换混为一谈。

毛泽东在北戴河会议上批判资产阶级法权，把按劳分配、工资制等列入社会主义社会要取消的对象，实际上是对马克思原意的误解。其一，他把按劳分配中等量交换劳动原则体现的“资产阶级权利”，误解为似乎按劳分配本身就是带有资产阶级性质的权利，把马克思在特定的抽象意义上使用的、不反映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资产阶级权利”，同反映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本来意义上的资产阶级权利混为一谈，从而模糊了社会主义的分配同资本主义的分配制度的本质区别。其二，他把消费资料的分配中存在的“资产阶级权利”，误解为几乎全部经济关系和社会关系中都存在“资产阶级权利”。其三，他把对共产主义社会来说应当否定的按劳分配所体现的“资产阶级权利”，误解为是社会主义社会就应该破除的弊病。毛泽东的理论上的误解，在理论上造成了混乱和错误，在实践中也导致了严重后果。到“文化大革命”后期，“批判资产阶级法权”达到顶点。

再比如法治与人治的问题，法制完备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特征，健全法制是社会主义的题中应有之义。同社会主义社会应具有比资本主义社会先进得多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一样，社会主义社会也应该具有比资本主义社会更为健全同时远为先进的法

制。同时，社会主义社会的道德、纪律、政策同社会主义法制是相辅相成的关系，二者有不同的功能和不同的适用领域，但是却不能相互混淆，也不能彼此替代。在纪律约束、道德规范的同时，社会主义也需要法律保护和法律制裁。北戴河会议上，毛泽东认为多数人不能靠法律，而要靠习惯，靠开会，靠文件。开会、文件属政策范畴，习惯属传统。政策和传统固然可以作为人们行动的规范，但它们并不能解决所有的问题，而且很大程度上带有弹性。法律则不然，具有强制性，是一种硬约束。毛泽东过分相信革命战争年代和建国初期的经验，而没有看到法制对建设现代化国家的极端重要性。这在当时和后来也曾极大地影响了中国的法制建设历程。

当然，北戴河会议在总体上发展了“左”倾错误的同时，也包含一些积极的值得肯定的东西。比如，会议十分强调干部联系群众，提倡学校教育与实际相结合，要求领导干部及其子女防止特殊化，这些思想对于党的建设，对于干部队伍建设，对于改进学校教育和培养学生的情操与技能，都有值得借鉴的意义。因此，在研究它时，我们应该做一分为二、实事求是的分析和总结。

(韩钢：《1958年北戴河会议》)

开始纠“左”：第一次郑州会议

毛泽东说：“大跃进”搞得人的思想有些糊里糊涂，昏昏沉沉。“我们有些同志昏了头，以为快要上天了。”他在这次会上指出必须划清集体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两种界限，并批驳了陈伯达等要求在现阶段就废除商品生产，实行产品调拨的错误主张，指出这种主张实质上是要剥夺农民。

从1958年11月初的郑州会议开始，到1959年7月中旬庐山会议前期，毛主席和党中央接二连三地召开了一系列重要会议，领导全党努力纠正已经察觉到的“左”倾错误。八个半月的纠“左”，是逐步深入和富有成果的。如果不是庐山会议后期中断了这一进程，“大跃进”造成的损失可能会小得多。但是，历史是无情的，历史就是历史。它的发展，并不因为我们开始纠“左”而不犯更严重的“左”倾错误。这既说明了“左”的思想根深蒂固，也说明了人们对“左”的危害的认识不可能是一次完成的。作为这一过程的见证人，重温这段历史，我想是会有助于总结这方面的经验教训的。

（一）毛主席在“大跃进”的高潮中提出要“压缩空气”

1958年以大炼钢铁和大办人民公社为标志的“大跃进”高潮，9、10月达到巅峰。它的出现，固然反映了我国人民要求迅

速改变“一穷二白”面貌的强烈愿望，同时在很大程度上也反映了我们党对经济建设的客观规律不甚了了的状况，带有很大的盲目性。在这之前，自上而下地层层发动，批判反冒进、“拔白旗”、“插红旗”、“大辩论”，其结果是指标越提越高，头脑越弄越热，以致使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在全国范围内严重地泛滥开来。

在一片“胜利冲昏头脑”的气氛下，毛主席虽然赞赏“六亿神州尽舜尧”那热气腾腾的局面，却最先冷静了下来。为了弄清真实情况，10月13日至17日，他外出视察，14日，在天津约黄火青、黄欧东、吴德、林铁、万晓塘等同志谈话。15日，约林铁、万晓塘、吴德、欧阳钦、黄火青等谈钢铁生产和人民公社问题。16日，约彭真、陈伯达、林铁、万晓塘、张春桥，保定地委书记，徐水、安国、唐县县委书记等开会，讨论人民公社问题。17日，先在杨村约刘子厚同志谈话，稍后在天津又约河北省委、天津地委、保定地委和唐县、安国、正定县委主要负责人开会。通过接触，他发觉在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很多人“急急忙忙往前闯”，有一大堆混乱思想。19日上午，毛主席两次致信陈伯达：“你和张春桥同志似以早三天去河南卫星社进行调查工作为适宜”，“建议将胡绳、李友九都带去，练习去向劳动人民做调查工作的方法和态度，善于看问题和提问题。我过了下星期就去郑州，一到，即可听你们关于卫星社观察所得的报告”。23日，他电告正在河南的陈伯达：“你们调查研究卫星社大约要一个星期，包括调查团（社）、营（大队）、连（队）的各项问题。然后，请找遂平县级同志们座谈几次，研究全县各项问题。”26日，同吴冷西、田家英同志谈话后，28日再次电告陈伯达：“如果遂平调查已毕，你们可去附近某一个县再作几天调查，以资比较。于11月2号或3号回到郑州即可。已令吴冷西、田家英二同志昨夜车出发，分赴修武七里营两处调查几天再去郑州。”

这期间，他在北京又同周总理、陈云同志以及彭真、陈毅、李富春、薄一波、王鹤寿、赵尔陆等同志交谈。10月31日，毛主席乘专列南下，途经保定、石家庄、邯郸、新乡，每到一地，都会见了当地省、地、市、县委负责同志，同他们交谈，进行调查研究，听取地方负责同志的汇报。尽管这些调查对象，不少人思想上尚未摆脱“左”的束缚，还不可能真正反映实际情况和群众的要求，但通过接触，取得感性认识，仍然是有用的。

11月2日至10日，党中央在郑州召开了有部分领导人和若干省委书记参加的会议，广泛地讨论了公社化运动中出现的问题。继2日下午在专列上与河南、河北、山西、陕西、甘肃等省委书记谈话后，3日下午，毛主席在听取吴芝圃、王任重、周小舟、张德生、张仲良、林铁、陶鲁笳、曾希圣、舒同等9位省委书记汇报时，开始向党的高级干部做“降温”工作。他说：10月钢产量七百二，还差400万吨，真是逼死人了。脑筋里头就是钢了。农业没有人抓了。现在开的支票太大了，恐怕不好。要让社员吃饱吃好，还要加一个睡足歇足。4日下午在听取吴芝圃、王任重等同志关于议论十年规划文件时，毛主席说：还是社会主义为题目，不要一扯就扯到共产主义。你现在牵涉到共产主义，这个问题就大了。你说十年就过[渡]了，我就不一定相信。这是个客观的东西，人们的想法是一回事，是否符合客观规律又是一回事。我们要参考《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研究公社的性质、交换、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集体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过渡。5日，柯庆施同志到会，汇报了上海市思想混乱的情况，毛主席问：上海有没有200万人人心大乱？柯答：恐怕有百把万。又问：干部有没有30%怕“共产”？柯答：恐怕还没有30%，是少数的。毛主席说：县以下恐怕没有，省一级，大城市，我看恐怕有。周小舟、舒同、曾希圣同志反映，怕废除票子，怕归公，因而提款的多，发生了抢购。毛主席说：废除货

币，陈伯达就有这个倾向。北京现在也混乱得很，我们没有章程，天下大乱。人民公社城市恐怕搞不了。在议论到“十年规划”的钢铁指标时，毛主席主张把时间延长一点，不去赶美，只赶英国，并风趣地对李富春、王任重同志说：我就比你差四年，我就比较右倾一点，叫你们当左派，世界上一点右派没有也不行。我现在顾虑，我们在北戴河开那个口，少者三四年，多者五六年，就由集体所有制搞成全民所有制，像工厂那样，是不是开了海口，讲快了。在谈到产品调拨问题时，毛主席说：调拨跟商业交换不同，现在还是要等价交换，将来共产主义的产品交换，现在还办不到。要区分两种全民所有制，这是个客观规律，不能混同。9日，在审议《十五年社会主义建设纲要四十条（1958—1972年）》草案时，毛主席批评了这个文件避开商品问题，说：起草这个文件的同志以及在座诸公，都是避开这一点的。我就想写上去，当一点右派。这可能触犯许多人，因为许多左派实在不愿意。他们是竭力想把这方面缩小的，就是要急于过渡到共产主义。他接着说：我们国家是个商品生产不发达的国家，现在又很快地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同商品交换还要发展，这是肯定的，有积极作用（小平同志插话：商品和工资是关联的，统统都是供给了，商品也就很难交换了）。现在有那么一种倾向，就是共产主义越多越好，最好一两年内就搞成共产主义。山东范县说两年进入共产主义，说得神乎其神，我是怀疑的。为了澄清思想混乱，同日，毛主席写了《关于读书的建议》，要求中央、省、市、自治区、地委、县这四级党的委员会的委员同志们，认真读一点书。当然，书本上也未必能找到现成的答案，但读与不读，毕竟大不一样。尽管斯大林对“商品”的认识，最后也只是觉悟到“城乡”交换问题而已。10日，毛主席提议将《郑州会议纪要》改成《郑州会议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因为这都是些政策问题。下午，他又亲自向到会同

志讲解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说：大跃进搞得人[的]思想有些糊里糊涂，昏昏沉沉。我睡不着，还是想搬斯大林，企图对一些同志进行说服工作。在谈到商品交换时，毛主席指出：

我们是工人阶级的产品跟过去的小资产阶级（农民）的产品进行交换。农民在中国是一个海。现在还是个农民问题。许多同志觉得，农民现在忽然变得跟无产阶级一样，或者更高，农民现在是第一，而无产阶级呢？变成二哥了。我们有一些同志在读马克思主义教科书的时候，是马克思主义的，一碰到具体问题，马克思主义就要打折扣了。

我们有些同志昏了头脑，以为快要上天了。看起来是国家要什么拿什么，实际上要拿，那是痛心得很的。中国有个河南省，河南省有个修武县，修武县有个第一书记，据田家英同志跟我讲，他现在考虑了两个问题，不敢宣布全民所有制。第一条，怕灾荒的时候不能发工资，国家不能给补贴。全国这么多公社，你有了灾荒，不能发工资，国家来给你发工资？第二条，是丰产。一宣布全民所有制，你是不是把我拿去了？全民所有制，产品所有是属于全民，就得拿。这个同志是想事的同志，不那么冒进。徐水，还有什么地方，就急急忙忙往前闯。

（薄一波著《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

“压缩空气”：武昌会议和八届六中全会

会议开始的第一天，毛泽东就说：这次会议要唱个低调，把脑筋压缩一下，把空气压缩一下，变成固体空气。不要像唱戏拉胡琴，弦拉得太紧，太紧了，有断弦的危险。八届六中全会通过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并同意毛泽东提出的关于他不作下届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的建议。

两次郑州会议之间，中共中央在武昌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和八届六中全会。两个会是连起来开的。1958年11月21日至27日先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然后11月28日至12月10日开八届六中全会。两个会我都参加了。

毛泽东在武昌会议上的两次讲话

1958年11月，斯大林格勒水电站截流，我应邀率中国代表团去苏联。等到回国后赶到武昌开会时，已经迟到了两天，23日才开始参加会议。记得晚到的还有田家英、张平化、张春桥等。毛泽东在第一天的讲话，是会上听传达得知的。

参加武昌会议的除了部分中央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外，还有中央书记处的部分成员，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和中央各部委负责人。常委除周恩来、朱德、林彪外，都参加了。会议主要是讨论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草案和工农业生产指标问题，

目的是继续第一次郑州会议的精神进行降温。21日和23日，毛泽东在大会上作了两次讲话。

1958年秋，“大跃进”和公社化运动的乱子越来越多，问题也越来越暴露。武昌会议前，毛泽东批阅过的反映农村问题的几件材料，就反映了“大跃进”和公社化的混乱情况。如11月10日，批转《中办机要室关于在徐水县劳动中所见所闻情况的报告》。11月14日，批发了新华社《内部参考》电讯稿《邯郸专区伤寒疫病普遍流行》。电讯稿说，入秋以来，河北省邯郸专区伤寒疫病普遍流行，痢疾、肠胃炎症也有发生。患病人数之多、蔓延之快是历年所未有的，已波及到21个县市、70多个村庄。发生流行病的主要原因是，某些领导干部只注意生产，忽视了对群众集体生活的领导和关心，食堂办得不好，社员得不到休息，身体抵抗力下降，疫病蔓延得快。这些文字材料所反映的问题，不过是冰山之一角，实际情况要严重得多、广泛得多。毛泽东认为，在“大跃进”和公社化运动中很多人有一大堆混乱思想，急急忙忙往前闯，有必要使头脑清醒起来。

21日，会议开始的第一天，毛泽东就说：这次会议要唱个低调，把脑筋压缩一下，把空气压缩一下，变成固体空气。不要像唱戏拉胡琴，弦拉得太紧，太紧了，有断弦的危险。这可能有一点泼冷水的味道。23日，毛泽东又说：“我说把空气压缩一下，不是减少空气；物质不变，空气还是那样多，只不过压缩一下而已，成为液体和固体状态。他强调，路线还是那个路线——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办法仍然是政治挂帅，群众路线，几个并举，三个结合，还加上土洋结合。在毛泽东看来，“空气”只是过于膨胀了一些，压缩一下就好了，不是减少“空气”，更不能改换“空气”，总路线还是要坚持的，三面红旗必须高举。

毛泽东在讲话中承认，在向共产主义过渡的问题上，包括他

自己在内的中国人大概是“冒失鬼”。开会的前几天，11月15日《人民日报》发表了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一大的报告提纲，这个提纲提出苏联未来15年的主要任务是全面地建立共产主义社会的物质技术基础。毛泽东要大家看看这个提纲：苏联已经41年了，还准备搞12年（按应为15年）。看它的思想是想过渡，但并没有讲过渡。赫鲁晓夫很谨慎，他已经有了5500万吨钢，1亿吨以上石油，他还那样谨慎，还要12年过渡。现在国内局势，我们倒有几十万、上百万的干部，就是想抢先，都想走得越快越好，对全局照顾得不够。这时，毛泽东批评北戴河讲三四年或五六年或更多一点时间搞到共产主义，是个缺点。他说，三个差别、资产阶级法权没有消灭，没有一二十年不行。现在是吃穷的饭，什么公共食堂，现在就是太快，少者三四年，多者五六年，我有点恐慌，怕犯什么冒险主义错误。

但是，会上有不少人的意见仍然是快些过渡。如刘少奇说：达到150~200元的消费水平就可以转一批（按由集体所有制转变为全民所有制），将来分批转，这样有利，否则，等到更高了，转起来困难多，反而不利。彭真则认为：每人到150~200元才可能过渡，太多了，如罗马尼亚那样，农民比工人收入多时就不好转了。把“三化”（即机械化、电气化、园林化）压低，趁热打铁，早转比晚转好，三四年即过渡。

对这种意见，毛泽东似不以为然。他说：整个中国要进入共产主义要多少时间，现在谁也不知道，难以设想，10年？15年？20年？30年？苏联41年，再加12年，53年还说是准备条件。中国人就那么厉害？我们还只有9年，就起野心，这可能不可能？从全世界无产阶级利益考虑，也是苏联先进好。也许在巴黎公社百年纪念时（1971年），苏联进入共产主义。我们12年怎么样？也许可能，也许不可能，我看不可能。即令10年，到1968年我们已准备好了，也不进，至少等苏联进入两三年后再

进，免得列宁的党、十月革命的国家脸上无光。这样的意思毛在两次讲话里都说过。在第一次讲话中，他就说：苏联已经搞了41年，再搞12年，还没有过渡，落在我们的后面，现在他已经发慌了。他们没有人民公社，他搞不上去，我们抢上去，过渡了，苏联脸上无光，全世界无产阶级脸上也无光。怎么办？我看要逼他过，形势逼人，逼他快些过，没有这种形势是不行的。你上半年过，我就下半年过，你过我也过，最多比他迟三年。

在向共产主义过渡的问题上，武昌会议时毛泽东有所退却。北戴河会议提出三四年或者五六年即可过渡，这时的估计比北戴河会议的说法延长了，而且说这个时间“难以设想”。这就遏制了“抢先进入共产主义”的势头。当然要看到，毛泽东仍然是在相对短的时间内“难以设想”，比如10年、15年或20年、30年，而没有认识到从现在起到开始向共产主义过渡，需要经历漫长的过程（这是按当年应当具有的理解说）。还要指出，毛泽东一方面承认苏联的基础比中国强，另一方面似乎又以为中国有可能先进入共产主义，从国际影响考虑，要“逼”苏联先过渡，思想上还是有急于求成的情绪。

同第一次郑州会议一样，毛泽东再次批评了取消商品的主张。他说，有一个时期仿佛认为商品愈少愈好，时间愈短愈好，甚至两三年就不要了，这是有问题的。我看商品时期搞久一点好，不要100年，也要30年，至少也得15年，这有什么害处呢？他还说，资产阶级法权只能破除一部分，如“三风”、“五气”、过分悬殊、老爷态度、猫鼠关系，一定要彻底破除，越彻底越好。另一部分，如工资等级、上下级关系、国家一定的强制，还不能破除。一部分资产阶级法权要破，一部分在社会主义时代还有用，这就要保护它，使它为我们服务。毛泽东在这里所讲要破的那一部“法权”，其实是干部作风和干部制度问题，与马克思所说的“资产阶级权利”并无关系。不过破除这一部分东

西，应该说是对的。他提出要保护工资制，是对他在北戴河会议上关于取消薪水制主张的改正。至于提出“商品时期搞长一点”，则否定了取消商品、取消货币、取消价格的“共产风”主张。

毛泽东在会议上讲的另一个主要问题，是降低过高的指标。这也是会议讨论的主要内容之一。

北戴河会议曾确定 1959 年钢产量 2700~3000 万吨，这个目标根本没有实现的可能。会议第一天，毛泽东就提出要不要这么多钢、搞不搞得出来这么多钢的问题。他说：钢 3000 万吨，要不要这么多？搞不搞得出来？邓小平说：“明年任务，各省自议。3000 万吨他们同意不同意？不同意就得改。是不是定 3000 万吨，是应该考虑的。”薄一波也认为值得考虑。薄是经委主任，对工业生产的情况比较熟，他说：今年 1700 万吨铁，是 6000 万人搞出 1000 万吨来，实际有 700 万吨是估出来的，但能炼钢的高估也就是 200 多万吨。说钢 1100 多万吨，数量上可能有超过，分析内容，情况大变，好钢不会超过 900 万吨，可能是 850 万吨好钢。如到 3000 万吨钢，就要翻 2.5 倍。薄的估计接近事实，1958 年经过核实的好钢只有 800 万吨。毛泽东于是说：明年是不是老老实实只翻一番，今年 1070 万吨，明年 2140 万吨。他还谈到，北戴河会议时，我们对搞工业，还没有经验，搞了两个月，钢铁运输到处水泄不通，这就有了相当的经验。总要有实际可能才好。

毛泽东承认：我们搞社会主义建设没有经验。真正掌握客观规律，要熟悉地掌握与运用它，整个说来，还是个问题。多快好省是客观的东西，有它的客观规律，能速则速，不能速就不速，不能勉强。第一次郑州会议搞的《关于 15 年社会主义建设纲要 40 条》，毛泽东不主张作为武昌会议的重点。他说：40 条这次可以议一下，但不作为重点。郑州会议提出来了，很好，有伟大的历史意义。但再议下去，没有把握，也议不出名堂。需要不需要

4亿吨钢，能不能搞到？王任重给我的说明不解决问题，只说明可能的问题，需要不需要，没有回答。毛泽东点王任重的名是有来由的，第一次郑州会议起草40条时，王提出10年内工业主要产品按人口产量赶上或超过英美，钢在1967年达到4亿吨产量，机床达到1000万台。对毛泽东的发问，王无言以答。倒是最早提议搞40条的曾希圣说：全国4亿吨，安徽就要（生产）3000万吨。毛泽东追问说是不是可能？是不是需要？曾也承认：连明年120万吨钢也是有困难的。毛泽东接着说，40条如果传出去，很不好，叫做务虚名而受实祸。

毛泽东提议，把1959年产钢3000万吨降为2200万吨。但他心里仍无把握，当晚半夜里，又找李富春、薄一波、赵尔陆等人谈指标。他认为不是3000万吨有无把握的问题，而是2200万吨有无把握的问题。薄一波建议定为1800万吨，对外公布1600万吨。第二天晚上11点钟，毛泽东找各大区负责人谈钢指标，对1800万吨也表示怀疑。23日的大会讲话，毛泽东说：昨天和大区同志吹一下，究竟1800万吨有无把握？要能说服，才能打通。现在说的那些根据，我远不能服。我已经是站在机会主义立场上，并为此而奋斗。打我屁股，与你们无关，无非将来又搞“马鞍形”。过去是人家反我的冒进，现在是我反别人的冒进。1800万吨，我觉得现在还是根据不足。如果没有充分根据，还是减到1500万吨。

从钢铁生产，毛泽东谈到了有计划、按比例的问题。他说：钢铁上去，各方面都要上去。64种稀有金属，都要有一个比例。什么是有计划、按比例，要在实践中慢慢摸索。恩格斯说：要认识客观规律，掌握它，然后去熟练地运用它。我看斯大林认识也不完全，运用也不灵活，至于熟练地运用就更差；他对轻重工业不那么正确，重工业太重，是“铁拐李”。现在我们摸了一点比例，是搞两条腿走路，三个并举。我们搞三个并举，就是使腿长

得差不多，使农业的腿长一些。

除了提出压缩钢的指标外，毛泽东说，还有什么任务实在压得透不过气来，也可考虑减轻些。任务不可不加，但也不可多加，要从反面考虑一下。会前，谭震林、廖鲁言向中央提交了有关农业生产安排的报告，提出1958年冬1959年春全国农田水利建设要搞1900亿土石方。这个工程量相当于1957年冬1958年春的近4倍。毛泽东认为，1900亿土石方多了，要减轻任务。他说，你要人家睡足觉、吃饱饭。“睡足觉、吃饱饭”，是要求各级干部要关心群众的生活问题。会议期间，毛泽东批发了云南省委的一个报告。1958年春夏间，云南发生了因病死人的严重情况，其主要原因是领导对持续紧张苦战中的群众生活关心不够，造成发病多，死亡率高。毛泽东在批语中批评一些干部“不善于用鼻子嗅出干部中群众中关于人民生活方面的不良空气”；同时指出，这“同我们对于工作任务提得太重，密切有关”。提出两条解决方法：（一）任务不要压得太重，不要超过群众精力负担的可能性，要为群众留点余地；（二）生产、生活同时抓，两条腿走路，不要片面性。

高指标的生产，同弄虚作假的浮夸风有直接关系。毛泽东在讲话里特别批评了作假之风。他说：现在横竖要放“卫星”，要出名，就管他作假不作假。没有那么多东西，就要作假。我建议同县委书记、人民公社党委书记，切实谈一下，要老老实实，不要作假。本来不行，就让人家骂，脸上无光，也不要紧嘛，不要急虚荣。如扫盲，说什么半年、一年扫光，两年扫光，我就不相信。从中央、省委、地委到县委都相信，主要是前三级相信，这就危险了。

作假的原因不只是在于上面相信，更主要的是上面压任务、上面好浮夸导致的。其实毛泽东本人就有直接责任。为了完成他提出的钢翻一番的指标，他在北戴河宣布六条纪律，泰山压顶，

谁敢少一吨。

北戴河会议之后，我忙于自己的业务，到甘肃和青海出差，参加刘家峡水电站的开工典礼，查看黄河最上游的龙羊峡坝址，并到青海北部看当时的“引大（通河）工程”。随后，11月又率一个代表团到苏联，参观斯大林格勒水电站的截流工程。由于北戴河会议前我写给毛泽东的第一封信反映了华东1959年产钢600万吨的计划对机械工业造成的严重困难，以及电力难以相应保证计划的完成等情况，可能同当时的狂热太不协调，有点泼冷水，所以整个北戴河会议期间他没有找我谈过话，之后也没有见面的机会。武昌会议时情况起了变化，即狂热已过，开始降温。有一天晚上，接到通知，要我到毛泽东的住处东湖招待所去。这个地方我是非常熟悉的，不仅珞珈山与东湖分不开，而1952年从湖南调北京之前的夏天，我到中南局组织部谈话时，在这里住过几天。这是一个不规则的长廊式的平房，就在东湖之滨。毛泽东先提到这封信，说是“观点不甚明朗”。我没多作解释。谈话的时间不到一个小时，现在记得起来的谈了三件事：一是大炼钢铁，谈到小土群，几千万人上山并不能解决问题，而且决非长策，钢铁这个东西还得靠大洋群，否则不能保证质量，反而会影响到用户，首先是机械行业一系列问题。我最后说了一句：不到黄河心不死。他也笑了起来，这些话听进去了。其次谈到大炼钢铁产生乱砍树木毁林的恶果，当时我就有所感触，联想到水土流失。这个问题未能深谈下去。第三件事是粮食放卫星问题，我特意问他，你是农村长大的，长期在农村生活过，怎么能相信一亩地能打上万斤、几万斤粮？他说看了一位科学家写的文章，相信科学家的话。原来1958年农业放高产卫星时，这位科学家在《中国青年报》发表了一篇文章，说太阳能如果利用了多少，一亩地可打几万斤粮。这篇文章对毛泽东固然起了作用，但当时毛泽东恐怕主要还是欣赏群众的冲天干劲，相信这种积极性或许能

创造奇迹，不想给这种“热情”泼冷水，因而对高产“卫星”宁可信其有，不愿信其无。即便在武昌会议上，他还是相信1958年粮食产量有7500亿斤。对这个比头年翻一番的产量，他是很满意的（后来经核实，1958年只有4000亿斤）。

我的《龙胆紫集》中，“戊己诗”九首组诗中，有一首七绝即记这夜谈话情景：

岂有闲情忆少年，湖边夜召话当前。

黄河不到心难死，特作如斯斗胆言。

这晚谈话使我感到，钢铁也好，粮食也好，毛泽东确实比较清醒了，“不到黄河心不死”这样重的话，不仅不以为意，还笑了起来。虽然粮食产量仍坚持公布7500亿斤，他还是号召反对作假，直接批评了当时盛行的浮夸风和弄虚作假的恶劣风气，这就有利于降温工作的进行。

值得指出的是，这次会上毛泽东把阶级斗争扩大化的思想又推进了一步，提出了“政治思想上的阶级”的概念。他在讲话中谈到消灭阶级时说：消灭阶级有两种情况，一种是经济上的，容易消灭，我们可以说已经消灭了；但是作为政治、思想上的阶级（地主、富农、资产阶级，包括他们的知识分子），不易消灭，还没有消灭。由此他又说，我看消灭阶级这个问题让它吊着，不忙宣布为好。究竟何时宣布才有利？恐怕基本上没有害了，才能宣布消灭。如果宣布消灭，地主都是农民了，资本家都是工人了，有利无利？记得毛泽东在成都会议上提出“两个剥削阶级”的概念时，政治标准和思想标准，是隐含在他作出这个判断的过程之中的，这两个标准还没有显性化，更没有归纳成为明确的概念。武昌会议则沿着成都会议的逻辑轨迹，将隐含在“两个剥削阶级”概念中的政治、思想标准显性化了，并且提出了“政治、思想上的阶级”的明确概念。关于这个概念的错误，我在《“大跃进”亲历记》上卷作过分析。一是没有正确反映社会主义改造完

成后，我国的阶级关系和阶级状况，把已经消灭和正在消亡的地主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依然作为存在的实体。二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的学说，把非经济标准（政治、思想标准）作为划分阶级的标准，这不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坚持与发展，而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曲解与偏离。

在这里，我想说这么一点意思，就是经济上的“左”的错误，实际上也推动政治上“左”的错误发展。反过来，当然也一样。从1957年反右派斗争开始产生的阶级斗争扩大化思想，到武昌会议又有发展。“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推波助澜，是一个重要原因。有人以“大跃进”是搞经济为理由，否认这中间有政治上“左”的错误。这种说法是站不住的。从成都会议到八大二次会议、武昌会议，直到后来的庐山会议，阶级斗争扩大化的思想与认识，总是伴随着经济上的冒进错误同步发展，每一步都是阶级斗争扩大化理论系统过程中的一个环节。这一个环节构成了阶级斗争扩大化理论的链条，即经过一步步发展，最后形成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这不是理论推导，而是历史事实。不管承认不承认，它都是已经发生过的客观存在。

武昌会议期间，对第一次郑州会议提出的关于人民公社的问题的决议草案和1959年经济计划都进行了讨论，然后将两个文件提交给八届六中全会继续讨论、审议。

八届六中全会的开始和小组讨论

武昌会议结束的第二天，11月28日，接着举行八届六中全会。没有参加政治局扩大会议的中央委员、中央候补委员纷纷赶到武昌。周总理和朱老总也来了。

会前，11月27日，中央办公厅发出通知：“六中全会拟于12月2日开会，由11月28日起到12月1日止，在这4天内，

请同志们阅读文件。”全会按大区分组，一共7个组。华北组组长林铁，副组长陶鲁笏、张苏；华东组组长柯庆施，副组长曾希圣、江渭清、廖鲁言；华中组组长王任重，副组长吴芝圃、安子文；华南组组长陶铸，副组长刘建勋、叶季壮；西南组组长李井泉，副组长宋任穷、谢富治；西北组组长张德生，副组长王恩茂、王震；东北组组长欧阳钦，副组长黄火青、李葆华。

28日晚7点钟，邓小平主持全会的预备会议，讲了会议的日程安排和全会的任务。从29日开始，每个小组阅读了4天文件并分组讨论。这个期间，11月30日下午，毛泽东同常委和各小组组长谈过一次话，可以看作是在全会正式开始前的吹风。第二天，各小组作了传达。

——今年夏、秋两季，我们国家出现了两个大问题：一为人民公社，二为以钢为纲。大家有点紧张。郑州会议感到紧张，现在搞出些章程来，心情就比较舒坦了。21号开会，10天了，也比较紧张。斯大林的书过去看过，不感兴趣，现在感兴趣了。人民公社的文件是从郑州会议搞起来的，有所准备。工业问题也有所准备，但计划会议是条条搞的，中央没跟地方结合，条条没跟块块结合。块块第一书记，过去你们不是干劲冲天吗？华东现在就走下坡路嘛！过去没有经验嘛！

——这次是不是泼李富春的冷水？工业与农业不同，工业方面的相互关系牵制很多，搞钢必须搞煤、电等等，缺一项也不行。农业方面相互牵制也有，但比较少一点。计划要积极可靠，放在稳妥的基础上，还要鼓气，气可鼓而不可泄，不要挫伤群众的积极性，要接受1956年的教训。我现在代替了总理和陈云，你们在北戴河反我的冒进，现在不一样。那时反冒进就是不对。

北戴河会议一股热情，3000万吨钢，那时谁听了3000万吨钢不喜欢？现在看来，当中至少有1000万吨是主观主义。事非经过不知难（总理插话：确非神秘，并不简单。小平插话：钢的

指标，各地还可研究，减一点国家计划不会受影响，钢、电、交通按第二方案，其他指标按第一方案)。

1959年农业生产的指标，究竟提多少？今年粮食是7500亿斤，明年增产3000亿斤，达到10500亿斤，每人平均1500斤以上。苦战三年达到每人2000斤。今年来一个以多报少的方针，留有余地。棉花今年报6700万担，明年1亿担。粮食收成到底有多少？是不是增加一倍左右？可以写增加90%左右，比较稳当。现在还未收完，还要看看，这次会议不公布最后数字。明年人代会上再公布。

——少种多收。粮食原来没有计划翻一番，开了几次会，就翻上去了。农业的“八字宪法”，只管地，不管天（管不了日照和空气），天地是对立的统一。山西石楼县的经验很好。要深耕细作。这是党、群众、技术人员三结合创造出来的经验；试验田、高产，是人类的一大解放，是人类对自然界认识的大解放。三三制，这个提法，舍不得丢掉。我已经打了许多保险系数。这一条还是写进去好，时间再灵活一些，再修改一下，全国大多数地方每人一亩左右（关于粮食产量，毛泽东当时还是极其乐观的。会上印发的《关于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是不是真老虎的问题》，文中说了这样的话：“使亩产一百多斤或几百斤粮食向亩产几千斤或者甚至几万斤粮食转化。”）。

——城市要不要办公社？肯定要办，但可以等候一下。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听了思想很混乱，要作酝酿，要使人懂得，要把问题讲清楚。

——军事化、民兵，展开一下，讲得理直气壮。

生活集体化，以家庭问题为中心，展开回答。杜勒斯攻击我们，一有机会就整我们的人民公社，说我们一是奴隶劳动，一是破坏了家庭，这要回答。其实资本主义国家早就消灭了家庭，完全是金钱关系……我们现在是社会养老，“老吾老以及人之老，

幼吾幼以及人之幼”。

——工资差额问题，要开展一下。四倍左右或者更多一些。因为农民有平均主义的倾向，工资过于悬殊，他们不赞成，但也不能没有差别。

——作风问题，以半天时间谈一谈。现在的问题是相当地发生了一些强迫与作假。造假比强迫的害处轻一些。比如，枣阳县，文盲一个未消灭，县委一布置，限三天消灭，结果县委登报说文盲消灭了，伟大的胜利。但为什么造假比强迫好些？无非是文盲未消灭，四害、蚊子未消灭；强迫就要打人、捆人、劳改。要专门将这个问题谈一下。

分组讨论从11月29日开始，一直进行到12月8日。讨论的内容主要是两个，一是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草案，二是关于1959年经济计划安排问题。这里分为几个问题对讨论内容作些介绍。

一、关于从集体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从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问题。

在公社化运动中，急于从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从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成为全国范围内的一股风。刘少奇在华中组第一次讨论中，就提出这个问题请大家讨论：到底怎样从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怎样从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有人认为，社会主义社会建成之时就是开始进入共产主义社会之日，这中间没有一道鸿沟。有人认为，从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有两个条件：一个是按人口平均，农民的生活水平相当或超过工人的生活水平，即农民每年收入达到150~200元。另一个是收入稳定，在此条件下由国家包下来，给农民发工资，就过渡到了全民所有制。

东北组有人认为，讲从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应该把精神条件强调一下，甚至在决议中专门写一段。有人不同意这个意

见，认为现在一方面有见物不见人的现象，但也有人把物质条件看得很轻，因此还是以文件中物质条件与精神条件并提为好。

从社会主义到共产主义如何转法，华南组有人说，必须根据条件成熟的程度分批地转，但是，不能认为，在一个县、一个地区转了，就算建成社会主义。所谓建成社会主义，应指整个国家来讲。现在有的县的标语写着：“1959年建成社会主义，1960年实现共产主义”，是不对的。

二、关于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问题。

讨论中普遍认为，决议草案强调在现阶段发展商品生产，是针对当前一些人企图过早地取消商品生产出发的，这些是很正确的。有人提出，草案中“继续保留商品的外壳”这句话，用“外壳”仍然是回避商品生产的提法，实际上，即使到共产主义社会，还有商品存在，所以不要“外壳”两字。

西北组有人提出，草案中“商品经济仍将存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给人一个很长的印象，可否改为一定时间。多数人认为原来的提法较好，可以不改动，就是到了共产主义也不可能完成消灭商品经济，如稀有产品，不过这种商品和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说的商品有本质的区别。华南组也有人认为，商品是随着社会性质的改变而起不同作用，到共产主义社会，商品也还会在生产与分配过程中起它的作用的，但不一定叫它“商品”。

讨论中还提出了一些与现实直接相关的问题。华南组提出，现在国家调拨的产品（主要指生产资料）算不算商品？有的人认为是商品，而且是实在的商品，不是“商品外壳”，如鞍钢的产品装备轻工业部的工厂，轻工业部生产的商品，在计算成本时包括了鞍钢产品的价值。有人则认为全民所有制的工厂企业范围内进行产品调拨，不能算是商品，只有从全民所有制的工厂企业调拨产品给集体所有制企业的公社，才能算是商品。华东组还有人认为，在实现全面的全民所有制后，国家和公社、公社和公社之

间仍然实行劳动价值相等的新产品交换，商品就不止是“外壳”作用了。

三、关于人民公社问题。

对于城市人民公社问题，比较普遍的意见是赞成“缓办”。很多人都提到，城市办公社是个很复杂的问题，这不仅是由于资产阶级思想在资本家和知识分子中还相当浓厚地存在着，还由于城市经济情况复杂，究竟采取什么组织形式和办法为好，都没有经验，需要进行试点，取得一套适合城市情况的经验。刘少奇在华中组讨论城市公社问题时说：城市要以市或区建立公社，不能以机关或工厂为单位建立公社，将来要下放一部分小工厂给公社，大工厂还是国家的，人员可以参加公社，机关、工厂不挂公社的牌子。城市公社要进行重点试验，取得经验。

对人民公社的分配制度，有人提出，现在人民公社不能“包”得太多，因为每个人的需要和爱好都不一样，特别是因为当前产品还不丰富，如果“包”多了，就会使生活搞得简单化，就不能刺激生产的发展。对“吃饭不要钱”的提法，西南组有人建议把草案中“实现了吃饭不要钱的理想”，改为“做到吃饭不要钱”。华南组有人认为这个提法严格推敲起来，不够确切，容易使人误解为“白吃”，因农民自己劳动吃自己的，不是“不要钱”的问题。华东组有人认为这一提法不很准确，因为实际上是要了钱的。但不少人认为这句话很重要，不改为好。

对公社的规模，华中组有人指出，草案说“生产队是组织劳动的基本单位”，这里面有社大、社小的问题。根据北戴河会议的意见，一个公社以不超过两千户为宜，但现在的情况是一般都超过了此数，这样队就大了，因此考虑队以百户左右，山区四十户至五十户，一个公社下属十至十五个队为好。

对“资产阶级法权”问题，华南组有人认为，在现时提出取消资产阶级法权是十分必要的，但不能将社会的必要分工同等级

制度混淆起来，加以反对。

四、关于农业生产问题。

对实行耕作“三三制”，许多人都认为应该因地制宜，根据本地情况有所变通。西北组有人指出，草案要补充这样的意思：应根据各地不同的具体情况采取有所不同的步骤和办法，如地少人多的地方，种树、种草和休闲地可以少于 1/3；而地多人少的地方则可以各 1/3，或多于 1/3；并且实行的时间可以有快有慢。华北组讨论中，大家赞成写“三三制”，但是为了避免下面机械地硬套，修改时可以把这个问题写得灵活些，说明“三三制”是就全国范围来讲的，各个地区应当根据耕地的好坏、山地、平川、人口多少等具体情况，进行统一的规划。华中组许多人认为，“三三制”是在单位面积高额丰产的基础上逐步实现的，实行这种制度，需要经过若干年在农业生产上的努力，但这是耕作制度改革上的一个方向。华东组的意见，认为农业“三三制”在全国范围这样提是可以的，但是由于南方某些地方地少人多等情况，做起来恐怕有困难。在执行中应该根据南方北方、平原山区、地少人多和人少地多、复种指数高低等不同情况，因地制宜。在人多地少、复种指数较高的地区，首先是降低复种指数，水利、土壤条件较差的地区，暂时还不要过多缩减耕地面积。还有人认为“三三制”这样固定化的提法，还值得研究。华中组也有人认为“三三制”、“18 亿亩”、“2000 斤”的数字在草案中讲的死了一点，可否修改得灵活些。华南组有人说，根据有些地方的条件，实现“三三制”不是在几年内就能办到的事情，故建议在决议中对如何搞好当前农业生产、认真贯彻“八字宪法”问题，强调一下。

华东组有人提出，亩产万斤粮、千斤棉，在部分地区是可以办到的，但普遍实行不易做到，在文件中不具体提为好。对 1959 年农业生产，不少人感到工业生产的安排，财力、物力都

很紧张，将化肥、排灌机械、农业用电等支援农业的项目，几乎挤掉了，对这方面要作适当安排。

五、关于干部作风问题。

许多人都指出强迫命令和弄虚作假的问题是比较普遍存在的，有些地方很严重。比较普遍的现象是“压”、“逼”、“拔”（拔白旗）、“辩”（辩你一下）等办法强迫群众；有的地方对群众体罚很严重，甚至使用了吊打等刑法；个别地方组织了“劳改队”、“督战队”等等。浮夸、虚假不仅表现在谎报粮食和钢铁生产成绩上，在扫盲、商业、税收、地质调查，以至公安部门的破案中都有。弄虚作假已经带来不良后果，有的群众对放“卫星”这样说：“不怕办不到，就怕说不到。”

关于发生强迫命令、弄虚作假严重现象的原因，大家作了分析，比较一致地认为，除了干部本身的问题外，同各级领导有直接关系。东北组许多人认为，造假和强迫命令现象，除干部品质问题和个别地方组织不纯外，也是同有些地方领导的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分不开的。如给下面的任务太重，超过实际可能，完不成又要批评为“右倾”，要“拔白旗”。有的只喜欢听好的一面，只看到“红旗招展，遍地灯火”，而看不到“十里埋伏”的真相。下边干部往往看领导颜色行事，有的形容说：下边干部汇报时两个口袋装材料，一是“左”的，一是“右”的，你喜欢什么就拿什么材料。这个组的讨论特别指出：现在有一种情绪，一提纠正缺点就被认为是泼冷水，抹杀成绩，“右倾”。这种连一个指头的缺点也不让批评的现象是危险的，应当警惕。不解决这个思想问题，纠正强迫命令和弄虚作假是不容易的。

西南组讨论认为：强迫命令和虚假倾向的滋长，除了部分干部思想作风不纯外，各级领导都有一定的责任。领导头脑太热，不善于冷静地分析情况，布置任务超过了实际的可能，布置任务时又没有充分教育干部发扬民主、走群众路线与关心群众生活。

这个组还指出，由于这种不良倾向是在一种“左”的幌子掩盖下滋长的，有些干部误以为一提纠正缺点就会“泼冷水”，有的人明知有问题也不敢提出，怕戴“右倾”帽子，不少基层干部甚至地、县委干部不愿和不敢暴露问题。

西北组有些人指出，“大跃进”以来各方面的成绩很突出，另一方面却也滋长了讲形式、图表面的风气，有的检查团下去时，到处扎彩棚，贴标语，过分铺张。也有干部滋长了骄傲情绪，只讲成绩，看不到缺点。报纸在一个时期内也只表扬，没有批评，在一定程度上也助长了这种作风。

华东组总结了发生干部作风问题的六条原因：（1）有些干部的思想不纯；（2）省地县级对基层干部的教育不够；（3）上面交下面的任务重，弄得下面干部为难；（4）干部对党的政策、方针理解有片面性；（5）干部听正面的话很愿意，听“九个指头”的话很有劲，而听“一个指头”的话就听不进去；（6）报纸宣传不冷静。

对纠正强迫命令和弄虚作假，大家认为关键在于领导，首先在领导布置任务时，必须实事求是，无论布置任务或听取反映，都必须有清醒的头脑。还有人特别提出，进行各项工作时要让人民群众充分发表意见，允许人们讲不同的意见，不能认为讲反面意见不利于工作。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同群众有共同的语言，才能造成广大群众心情舒畅、生动活泼的局面。

讨论中也有一些人唯恐出现对三面红旗的怀疑，认为高产“卫星”总还是真的多假的少；还认为对干部作风上的问题应该有确切的估计，要认识到这是“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的关系，否则，反对弄虚作假的口号一喊，有些人就会误认为什么都是假的，很可能把成绩和缺点真假不分，把“大跃进”和群众路线也反对掉。

六、关于1959年经济计划安排问题。

如何安排 1959 年计划，首先有个如何估计和总结 1958 年经济建设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看法一般维持在基本肯定的基调上，但也有些意见较为尖锐。华中组有人指出：1958 年以钢为纲的方针非常正确，取得了异常巨大的成绩，在社会主义国家中，我国找到了一条利用群众路线的办法发展工业的新道路。但是，在办钢铁以来，也出现了国民经济各部门之间的某些失调现象，致使有些人又回顾到 1956 年出现的“马鞍形”，中央各部也感到“元帅”升帐以来有苦有乐，所以大家都想搞运动，都讲第一书记挂帅。这样一样，其结果是压力太大，处于过分紧张的状态，相应也带来各种物资供应不上，长久下去，群众会反对我们。这个组认为：我们不是“唯条件论”，但是必须注意和考虑到客观条件，因为我们是唯物主义者。

东北组在讨论中，有些人认为决议草案以 1070 吨钢为例，说明“经济发展速度必须建立在客观可能的基础上”，似乎是说这个任务没有建立在客观可能的基础上，因而不主张举这个例子。另外有些人则认为决议草案的写法是适当的，1070 万吨钢的问题本身就包含着既可能又太紧张这两个方面，我们正是从这里得到了文件中所提的经验教训的。

对 1959 年的计划，西南组建议将决议草案所说“为 1959 年钢、铁、铜、铝、机床、发电设备等产品的产量赶上或超过英国”的项目，分别加以斟酌，确能赶上的才列上去。东北组谈到轻工业和重工业，工业与农业，煤、铁、木材内用和外调等等矛盾。由于东北电力不足的影响，不少轻工业工厂已经停产，这样势必影响今后轻工业品的供应。

在讨论计划的具体安排时，各方面的矛盾还是较大的，降低指标也不很容易。东北组感到全国任务指标降了 36%，投资也降了 36%，但东北各省的任务减得很少，有的不但没减，反而增加了，但投资却减了 36%，因此在计划项目的安排和投资、

材料供应上还有矛盾。西北组认为，投资安排西北困难更多一些。因为西北地区工业基础薄弱，钢铁、机械元帅没有升帐，钢铁指标的削减，就会影响西北的基本建设，如石油、石油机械、有色金属、军工、铁路占了很大部分，这些方面的项目和投资都不会削减很多，这样就势必削减地方基建项目。在讨论中，部门也有类似意见。机械工业部门反映 1959 年计划生产重型设备 155 万吨是不够的，按各方面的需要是 200 多万吨；机床 13 万台也是不够的，按各省最近提的要求计算是 60 多万台。

情况其实是很清楚的，造成指标难降的原因，主要在总路线、“大跃进”仍然是旗帜，高指标产生的根源没有消除。此外，由于前一段已经造成各方面比例失调和关系紧张，一下子降低指标势必继续导致各地方、各部门的重重矛盾（比如一些在建工程就要停工下马），这些矛盾短时间内也难以解决。

从上面概要介绍的分组讨论情况，可以看出，经历了近一年，尤其是经历了北戴河会议以后几个月的“大跃进”运动，不少人感到出了许多乱子，照这几个月的搞法还会继续出乱子，所以开始从狂热中有所降温。有的还作了某种萌芽性质的反思（如指出不良倾向是在“左”的幌子掩盖下滋生的）。“大跃进”的一整套路线、方针以至做法，在实践中碰了壁，撞了南墙，人们才往回退却。但这只是一种实践本能的反应，还不是一种意识的觉醒。退却和降温都只是量的减少，远远不是对质（即“三面红旗”）的改变，因此它不能纠正全局性的错误，也难以遏止更大灾难的发生。我知道一件事情，是胡乔木讲的，很说明这种退却的局限性。武昌会议通过有关公社的决议后，王稼祥向刘少奇说，不要公布。王不敢向毛泽东汇报，刘少奇向毛泽东转告了，结果毛泽东发了脾气。关于 7500 亿斤粮食，持怀疑态度的人是不不少的，因为这关系到国家的征购。会后彭德怀到湖南考察时，就担心征购多了影响农民的生活，要给中央打电报。关于耕种

“三三制”的问题，毛泽东仍然坚持，许多人倒是发表了不同意见；照此办的地方，后来吃了大亏。

毛泽东的讲话和全会决议

除了11月30日同常委和各小组组长的谈话，在正式的全会上毛泽东只作过一次讲话，时间是全会结束前的一天，即12月9日。

毛泽东一共讲了12个问题。这里概要叙述一下。

(1) 人民公社的出现。中国出了这么一件事，3月成都会议没有料到，5月党的八大二次会议也没有料到。其实4月间这件事已在河南出现，我们5、6、7月都不知道；一直到8月才发现，北戴河会议作了决议。这是一件大事。我们找到了一种建设社会主义的形式，便于由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也便于由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全民所有制，便于办工农商学兵，规模大、人多，便于办很多事。

(2) 关于保护劳动热情问题。没有对90%以上犯错误的干部采取不处分的方针，就不能保护干部，就会挫伤干部的劳动热情，也会挫伤劳动人民的热情，没有对严重违法乱纪的一部分人，经过辩论之后，给以轻重不同的处罚，也会挫伤群众的热情，因为他们严重违法乱纪脱离群众。有些特别严重的要作刑事犯处理。总而言之，在这个问题上，处罚极少，保护极多。

(3) 有一个口号问题。“苦战三年，基本改变全国面貌”，这个口号是否适当？3年办得到办不到？农村也许能够办得到，至于全国，我看还要考虑一下。3年之内，能搞多少钢？大概能搞到3000到4000万吨钢，六亿五千万人口的大国，搞三四千万吨钢，就能说基本改变了面貌了吗？这个标准我看提的低了一点，如果这就算改变了全国面貌，今后就没有改头了。这个口号到底

怎么说好？值得商量一下，因为报纸已经在大宣传了。或者提5年基本改变，10到15年彻底改变；或者说超过英国，算基本改变；超过美国，算彻底改变。我们把改变全国面貌的时间说长一点，无非是当“机会主义”者，但是这样的机会主义，当了很有味道，我愿意当，我说马克思会赏识这种机会主义，不会批评我们的。

(4) 党内外某些争论的问题。围绕人民公社，党内外有各种议论，国际上也有议论。主要就是说性急了一点。有冲天干劲，革命热情很高，非常宝贵；但是对于国际的、历史的情况，对于内外局势条件，缺乏分析，过早地纷纷宣布自己进入全民所有制，两三年进入共产主义。这些人好处是热情高，缺点是太急了一点。我们这次决议的主要锋芒，是对关键的这一方面讲的。可能有几千几万干部，他们是很好的同志，忠心为党为国，他们怕我们搞得太急了，他们不是观潮派、算账派，不是站在对立面的，是同我们商量问题的。各省都有，有的不讲出来，实际上他们内心是有忧虑的，恐怕我们跌交子。这些人是好的。这个决议也可能说服他们，因为我们并不那么性急。这个决议也给了观潮派、算账派以答复，他们则是不怀好意的，他们不懂得当前国内外局势的迫切要求，而且时机已经成熟，并不是不成熟的问题。

我提倡读斯大林的书，提出了两个过渡。两个过渡，如何过渡？这个问题过去不可能答复，比如，南宁会议、成都会议就没有解决。郑州会议作了些准备，经过一个月，已经成熟，现在可以答复了，就有可能在12月这次会议上作出这个决议。共产主义分两个阶段：初级、高级。现在全世界对这个问题议论甚多，都要我们答复。杜勒斯也在议论，一有机会就讲一篇，他说我们搞奴隶劳动，破坏家庭；说我们剥削太多，积累太多，因而建设的速度快；他们剥削少，所以速度慢。中间阶层、资产阶级、无产阶级、共产党人也都议论纷纷，各国共产党、无产阶级、外国

的同志出来替我们辩论，替我们答复。他们的根据就是北戴河会议和报纸上的消息。我们如果不答复，一大堆混乱思想就会蔓延开来，就会出现很多无政府状态，各搞各的，省、地管不了县，县管不了社，成为脱缰之马。所以，一方面要防止太急，一方面要答复这些问题。

(5) 讲一讲研究政治经济学的问题。在这几个月内，读一读斯大林的论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和苏联出版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还有一本马恩列斯论共产主义社会，拿出几个月的时间，各省要组织一下。目前研究这个问题，有很大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6) 研究辩证法问题。郑州会议，小平同志他们提出“大集体、小自由”，这一提法很好。要抓生产，又要抓生活，两条腿走路，都是属于对立统一学说，都是属于辩证法范畴内的。马克思关于对立统一的学说，1958年在我国有很大发展。例如，在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前提下，工农业同时并举，重工业与轻工业同时并举，中央工业与地方工业同时并举，大、中、小企业同时并举，小土群与大洋群、土法与洋法，几个并举。在农业中也是很复杂的，现在有高产、中产、低产同时存在。实行耕作“三三制”是群众创造，北戴河会议抓着了。提出了在高产条件下，减少耕作面积，实行“三三制”，这可能是农业革命的方向。

再有是在社会主义制度方面。在共产主义的第一阶段，社会主义阶段，有两种所有制同时存在，是对立又结合，是对立的统一。公社，它的根本性质是集体所有制，但是包含了共产主义全民所有制的因素，徐水、遂平都看到此点。

武昌会议提出要实事求是地制定1959年的计划，订计划时要有热有冷，要雄心很大，但又要有相当的科学分析。明年搞3000万吨钢我也赞成过，一到武昌后，就觉得有点不大妙了。过去，我也想过1962年搞到1亿或1.2亿吨。那时我只忧虑这些钢谁用，只担心需要不需要的问題，那时我还没有考虑可能性

的问题。现在看来，还有能不能生产这些的可能性问题，今年搞1070万吨，把大家累得个要死。因此对可能性发生问题，明年3000万吨，后年6000万吨，1962年1.2亿吨，这种可能，是虚假的可能性，不是现实的可能性。现在要提高客观可能性，不不搞3000万吨，把这盘子放小，只搞1800~2000万吨。是否可能超过呢？到明年再看情况，2200~2300万吨都可以，甚至更多点，行有余力则超过嘛！提出的计划低点，让实践去超过。

现在我们有些人、有些县总是好抢先，提出要先进入共产主义。其实要先进入共产主义，应该是鞍钢、抚顺、辽宁、上海、天津。中国先进入共产主义，一个是对国际主义不利，中国比苏联先进，跑到苏联前头，看起来不像样子；再一个有没有可能也是个问题，值得研究。

(7) 15年纲要。在郑州会议搞的15年纲要，这次会议上搁下没有谈。15年搞4亿吨钢，可能不可能，需要不需要，都缺乏根据，不仅没有充分的根据，而且连初步的根据都没有。所以，目前不定这样的计划纲要。

(8) 1958年我们的军事工作有相当大的发展。

(9) 关于教育制度的改变。实行教育与劳动生产相结合的制度，应该说这也是一件大事。当然，也发生了一点问题。例如，有的学生不想读书，劳动搞出味道了。如果很多人不想读书，就成了问题。成了问题，就开会；开了会，又想读书。

(10) 两种可能性问题。一种事物总有两种对立的東西。人民公社、公共食堂、托儿所，会不会巩固？看来会巩固。但也要准备有些可能垮台。巩固与垮台两种可能性是对立的两面，同时存在，如果不准备就会大垮其台。我们这个决议是为了让它巩固，但是如果垮几个，就不会巩固。总趋势是巩固、发展。

我们的党也有两种可能：一是巩固，一是分裂。精神上要有准备。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也有两种可能：胜利下去，或者灭

亡。所以，我们要积极准备，大搞钢铁、搞机器、搞铁路，争取三四年内搞几千万吨钢，建立起我们的工业基础，使我们国家比现在巩固。我们现在全世界名声很大，一个是金门打炮，一个是人民公社，还有钢 1070 万吨。这几件大事，我看名声很大，而实力不大。这一点要看清楚。不要外国人一吹，报纸一登，打开报纸一看，尽是说的大话，尽是说于劲冲天，就搞得神乎其神飘飘然了。

要估计到不高兴的这一面，索性讲清楚。别人讲不爱听，我就借机到处讲一讲倒霉的事情。无非是托儿所垮台，公共食堂垮台，人民公社垮台，党内分裂，脱离群众，或者被美国占领，国家灭亡垮台，只剩下一些游击队打游击。但是我们有一条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规律管住了，不管怎样，所以这些倒霉的事，总是暂时的、局部的。

(11) 关于我不担任共和国主席的问题，这次要作个正式决议，希望同志们赞成。

(12) 国际形势。今年这一年有很大的发展。敌人方面乱下去，一天一天乱下去；我们方面好起来，一天一天好起来。真正丧失的是帝国主义，它们烂、乱，矛盾重重，四分五裂，它们的日子不好过，它们的好日子已经过去了。它们没有变成帝国主义之前，自由资本主义时代是它们的好日子，现在的时代是帝国主义灭亡的时代，是我们的好时代。我们社会主义的情况是一天比一天好起来，当然，也要估计到曲折，还有长期的、复杂的、艰苦的斗争，并且要估计到战争的可能性，可能要打大仗（会议期间印发了毛泽东写的《关于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是不是真老虎的问题》，充满了豪情壮志，大大鼓舞了与会者的情绪）。

毛泽东的这篇讲话，对一些过高的指标有所降低。比如，1959年钢产量计划，由 2700 ~ 3000 万吨下降到 1800 ~ 2000 万吨；“3 年改变基本面貌”的口号，延长为 5 年以至 10 年、15

年；对抢先进入共产主义的风浪头，也批评“性急了一点”。他号召大家读《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研究政治经济学；还认为《15年社会建设纲要》缺乏起码的根据，主张目前不定这种计划。

然而，也就在这次讲话中，毛泽东对人民公社有许多由衷的肯定，认为人民公社是找到了一种建设社会主义的形式，便于实现两个过渡，便于办很多事。他以徐水、遂平为例，说明人民公社包含了共产主义全民所有制的因素，并认为人民公社总的趋势是巩固、发展。毛泽东确实对人民公社极为欣赏，因为同他的理想社会模式是一致的。

会议期间，毛泽东批示印发了《三国志》中的《张鲁传》。他先后写了两个批语。第一个批语说到：“这里所说的群众性医疗运动，有点像我们人民公社免费医疗的味道，不过那时是神道的，也好，那时只好用神道。道路上饭铺里是吃饭不要钱，最有意思，开了我们公共食堂的先河。大约有1600年的时间了，贫农、下中农的生产、消费和人们的心情还是大体相同的，都是一穷二白。不同的是生产力于今进步了许多了。解放以后，在共产党的领导之下，人们掌握了自己这块天地了。但一穷二白古今是接近的。”“历代都有大小规模不同的众多的农民革命斗争，其性质当然与现在马克思主义革命运动根本不相同。但有相同的一点，就是极端贫苦农民广大阶层梦想平等、自由，摆脱贫困，丰衣足食。这一方面，带有资产阶级急进民主派的性质。另一方面，则带有原始社会主义性质，表现在互助关系上。第三方面，带有封建性质，表现在小农的私有制、上层建筑的封建制——从天公将军张角到天王洪秀全。”“现在的人民公社，是有我国的历史来源的。”

第一个批语的铅印件，毛泽东用墨笔划去，另写了一篇，即第二个批语，印发给会议。这个批语主要是介绍汉末张鲁行“五

斗米道”的情形：“其法，信教者出五斗米，以神道治病；置义舍（在路上的公共宿舍），吃饭不要钱（目的似乎是招徕关中区域的流民）；修治道路（以犯轻微错的人修路）；‘犯法者三原而后行刑’（以说服为主要方法）；‘不置长吏，皆以祭酒为治’，祭酒‘各领部众，多者为治头大祭酒’（近乎政社合一，劳武结合，但以小农经济为基础）。”

显然，在小农经济基础上孕育、形成和发展起来的绝对平均主义思想传统，在中国源远流长，不仅被历史上无数次的农民起义当作旗帜，而且一直影响到近代中国的许多先进人物。

毛泽东在八届六中全会既讲划清两个界限，又着力维护人民公社这面旗帜，恐怕还同国际上的反应有关。人民公社化运动一哄而起，国际上议论纷纷，有褒有贬。两方面的评论他都注意到了，对其中来自西方的批评和指责更为注意。11月10日《参考资料》刊载合众社电讯称，美国官员说“毛泽东已经使他的国家野心勃勃地执行过去从来没有执行过的共产主义原则”；“这位共产党中国领袖正在纸面上把社会组织成为最有效的生产单位”。14日和19日的《参考资料》，再次先后刊载了美国国务卿杜勒斯在美国的两次演说，其中指责了中国的公社化运动。这些材料毛泽东都批示印发给了全会。

毛泽东是“挑战”与“应战”心理极为强烈的人，对于来自西方的批评自然是一概予以坚决回击。这就是他在讲话中说的，“要答复这些问题”。反对西方国家对国内政的干预，理所当然，天经地义。问题是在解决国内问题时，他也带有这种心态，把国内的批评意见指责为“观潮派”、“算账派”，认定有不同意见的一些人，“是不怀好意的”。相反，即便是批评“抢先进入共产主义”时，仍然肯定这些抢先的人，“有冲天的干劲，革命热情很高，非常宝贵”。结果是自然给予这种“想象中的农村乌托邦”以更多的维护，对急于过渡的批评则打了几折折扣。无怪

乎，八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公社的决议，一开始就是对人民公社的礼赞：“1958年，一种新的社会组织像初升的太阳一样，在亚洲东部广阔的地平线上出现了，这就是我国农村中的大规模的工农商学兵相结合的、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它一出现，就以它强大的生命力，引起了人们广泛的注意。”

全会于12月10日结束，这天的会议通过了四个文件：《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关于1959年国民经济计划的决议》，《关于改进农村财政贸易管理体制的决定》，《同意毛泽东同志提出的关于他不作下届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候选人的建议的决定》。

《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首先肯定人民公社的出现不是偶然的，它是我国经济和政治发展的必然产物，是整风、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和“大跃进”的产物；北戴河会议关于建立农村人民公社的决议是正确的，是具有历史意义的。《决议》认为，农村人民公社成立的时间虽然不久，但广大农民已经看到了它带来的显著利益；并认为它指出了农村逐步工业化的道路，农业中的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的道路，社会主义“按劳分配”逐步过渡到共产主义“按需分配”的道路，三大差别逐步缩小以至消失的道路，国家对内职能逐步缩小以至消失的道路。

《决议》认为，人民公社将加快社会主义建设速度，并将成为实现两个过渡的最好形式。《决议》提出，全国人民的任务是经过人民公社这种社会组织形式，高速度发展生产力，促进国家工业化、公社工业化、农业机械化电气化，逐步使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过渡到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从而使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全面地实现全民所有制，逐步地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高度发展的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决议》说，全部完成这个过程，从现在起，将需要经历15年、20年或者更多一些的时间。同时指出，由农业合作社到人民公

社的转变，由集体所有制到全民所有制的过渡，由社会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过渡，是互相联系而又互相区别的几种过程。企图在农村过早否定集体所有制，匆忙改变为全民所有制，是不适当的，也是不成功的；企图过早地否定按劳分配的原则而代之以按需分配的原则，企图在条件不成熟的时候勉强进入共产主义，无疑是一个不可能成功的空想。

《决议》还指出，人民公社的生产、交换、消费和积累，都必须有计划。人民公社的计划应当纳入国家的计划，服从国家的管理。《决议》又说，在今后一个必要的历史时期内，人民公社的商品交换，必须有一个很大的发展。继续发展商品生产和继续保持按劳分配的原则，对于发展社会主义经济是两个重大的原则问题，必须在全党统一认识。有些人在企图过早地“进入共产主义”的同时，企图过早地取消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过早地否定商品价值、货币、价格的积极作用，这种想法对于社会主义建设是不利的，因而是错误的。

《决议》还提出，农村人民公社分配给社员个人消费的部分，要实行工资制和供给制相结合的分配制度。人民公社必须注意关心群众生活，办好公共食堂、托儿所和幼儿园、敬老院、中小学和成人教育。《决议》要求公社各级领导人员必须对社员群众采取同志式的态度，严格禁止用那种压服群众的国民党作风、资产阶级的作风来对待群众。

《关于1959年国民经济计划的决议》，主要是对北戴河会议通过的1959年计划作调整，降低一些过高的指标。毛泽东在12月9日的讲话中说，这个决议慢一点发表为好，只发表一个公报，到明年三月人民代表大会上再发表好一些。所以会后没发表这个《决议》。但是新华社发表的全会公报，还是公布了钢、煤、粮、棉四大主要指标，钢为1800万吨，煤为3.8亿吨，粮为1.05亿斤，棉为1亿担。其中除了钢的指标下降了之外，煤的

指标还略有提高，粮、棉指标没变；就是已经降低的钢指标，后来证明也是不可能达到的。因此，经过调整的指标仍然很高。会议期间，陈云曾向胡乔木谈到，公报不要公布钢、煤、粮、棉指标和 1958 年 7500 亿斤粮食产量。乔木没有向毛泽东汇报。后来上海会议时，毛泽东批评了乔木，说你有什么权力不报告中央副主席的意见；反过来表扬了陈云，还说“真理有时在一个人手里”。这是后话。

武昌会议和八届六中全会，是继第一次郑州会议之后再次给“大跃进”降温的会议。对原定 1959 年的某些过高的经济指标，会议作了压缩；对急于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的势头，有所遏制。但是，由于对总路线领衔的“三面红旗”从根本上肯定，因而降温只能在这个大框架内进行，不能不带有很大的局限性。

（李锐：《中共中央武昌会议和八届六中全会》）

继续纠“左”：第二次郑州会议

会议的主题是人民公社问题，讨论中涉及到人民公社化错误的一些实质问题。“‘一平、二调、三收款’，引起广大农民的很大恐慌。这就是我们目前同农民关系中的一个最根本的问题。”毛泽东说：我们生产关系的改进方面，即是说，在公有制所有制问题方面，前进得过远了一点。

八届六中全会结束后，毛主席继续深入实际调查研究，在湖北、湖南和返京途中，又与当地负责同志进行了广泛的交谈，于1958年12月30日回到北京。

1959年1月26日至2月2日，中央召开了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会议，讨论1959年的年度计划等问题。2月1、2日，毛主席两次到会讲话。他说：我们对于搞经济建设还是小孩子，虽然我们现在年纪不小了。应该承认这一点，向地球作战，向自然界开战，这个战略技术，我们就是不懂，就是不会。……关于客观经济规律、按比例，这个问题我是没有解决的，这个问题，我不懂。毛主席的这种坦诚态度，发人深省；而他那种“从实践中找经验”的求知欲望和对党和人民事业高度的负责精神，更为全党树立了榜样。

1月15日，毛主席从新华社内部参考上，看到了广东《新会县人民公社在发放第一次工资后出勤率、劳动效率为什么普遍下降》一文，其中谈到：究其原因是多劳不能多得，干多干少都

一样。2月中旬，毛主席看到了广东省委批转赵紫阳同志关于雷南县干部大会解决粮食问题的报告，其中谈到瞒产私分的严重情况，引起了毛主席的极大关注。23日，他再次外出视察，在天津与河北省委书记刘子厚、天津市委书记万晓塘等省、市负责人谈公社问题。24日，分别与山东省委第一书记舒同和省、市委负责同志谈公社问题。25日，又跟舒同和历城县委书记、东郊人民公社第一书记、大辛管理区总支书记、生产队长等谈公社分配问题。他了解到，吕鸿宾合作社用一张条子（调东西调不动），一把秤（让人拿秤去称粮食，群众普遍抵制，于是便翻箱倒柜），一顶帽子（本位主义，进行神经战）都不灵，于是，受了教育，改变主意，用一把钥匙（解决思想问题），一张布告（安民告示），一个楼梯（下决心解决所有制问题）解决问题的经验。26日，他与河南省委书记吴芝圃等同志谈公社分配问题。27日上午，又与新乡、信阳、许昌、洛阳地委书记谈公社生产、分配问题。

2月27日至3月5日，毛主席主持召开第二次郑州会议，主要讨论人民公社的分配制度问题，形成了具有重大意义的《郑州会议记录》。

在郑州会议上，毛主席作了多次讲话。这里，我想着重引述毛主席对人民公社存在的问题，是怎样透过现象弄清本质的。

毛主席是这样提出问题和分析问题的：

大家看到，目前我们跟农民的关系在一些事情上存在着一种相当紧张的状态，……几乎普遍地发生瞒产私分，大闹粮食、油料、猪肉、蔬菜“不足”的风潮，其规模之大，较之1953年和1955年那两次粮食风潮都有过之无不及。……我们应当透过这种现象看出问题的本质即主要矛盾在什么地方。

六中全会的决议写明了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

制和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所必须经过的发展阶段（这从理论上讲是对的，但作为历史发展的具体过程来讲，似应指出大体需要多长时间。经过30多年的实践，现在回过头来看，当年想的过渡时间显然是太短了，过急了。——作者注）。但是没有写明公社的集体所有制也需要有一个发展过程，这是一个缺点。因为那时我们还不认识这个问题。这样，下面的同志也就把公社、生产大队、生产队三级所有制之间的区别模糊了，实际上否认了目前还存在于公社中并且具有极大重要性的生产队（或者生产大队，大体上相当于原来的高级社）的所有制，而这就不可避免地要引起广大农民的坚决抵抗。从1958年秋收以后全国性的粮食、油料、猪肉、蔬菜“不足”的风潮，就是这种反抗的一个集中表现。一方面，中央、省、地、县、社五级（如果加上管理区就是六级）党委大批生产队、生产小队的本位主义，瞒产私分，另一方面，生产队、生产小队却几乎普遍地瞒产私分，甚至深藏密窖，站岗放哨，以保卫他们的产品。

他们误认人民公社一成立，各生产队的生产资料、人力、产品，就都可以由公社领导机关直接支配。他们误认社会主义（其实，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有很多东西我们并未真正弄清楚。——作者注）为共产主义，误认按劳分配为按需分配，误认集体所有制为全民所有制。他们在许多地方否认价值法则，否认等价交换。因此，他们在公社范围内，实行贫富拉平，平均分配，对生产队的某些财产无代价地上调；银行方面，也把许多农村中的贷款一律收回。“一平、二调、三收款”，引起广大农民的很大恐慌。这就是我们目前同农民关系中的一个最根本的问题。

从这样的分析入手，毛主席认为首先应该纠正平均主义倾向和过分集中倾向。他说：

所谓平均主义倾向，即是否认各个生产队和各个个人的收入应当有所差别。而否认这种差别，就是否认按劳分配，多劳多得的社会主义原则。所谓过分集中倾向，即否认生产队的所有制，否认生产队应有的权利，任意把生产队的财产上调到公社来。

对事物的分析，并没有到此为止。请看毛主席是怎样从实践升华到理论高度的：

上述两种倾向，都包含有否认价值法则、否认等价交换的思想在内，这当然是不对的。凡此一切，都不能不引起各生产队和广大社员的不满。

公社在 1958 年秋季成立之后，刮起了一阵“共产风”。主要内容有三条：一是穷富拉平。二是积累太多，义务劳动太多。三是“共”各种“产”。……这样一来，共产风就刮起来了。即是说，在某种范围内，实际上造成了一部分无偿占有别人劳动成果的情况。

我们对于民族资产阶级这样的剥削阶级所采取的政策（指赎买政策。——作者注），尚且是如此，那么，我们对于劳动人民的劳动成果，又怎么可以无偿占有呢？同志们，价值法则依然是客观存在的经济法则，我们对于社会产品，只能实行等价交换，不能实行无偿占有。违反这一点，终究是不行的。

目前的问题是必须承认人民公社有一个必不可少的发展过程（看来，当时问题的本质还是急，而没有实事求是地研究，农村要根本摆脱贫困落后状态，实现农村人民的富裕，究竟需要多少年，需要经历哪些发展阶段？如同现在估计的那样，实现农业的“两个飞跃”需

要上百年的时间。——作者注)，而不是什么向农民让步的问题。事情是客观世界强迫我们一定要这样做，只能这样做，不许可别种做法，无所谓让步不让步，是如实遵守客观法则去办事，不可能违反它。

我们都钦佩毛主席驾驭全局的本领。以上的记述再一次说明，他看问题总是比我们站得高，看得深，一旦了解了真实情况，就毫不犹豫地果断决策，工作效率之高，行动之快，在党内是无与伦比的。如果不是毛主席从纷繁的事物中，找出人民公社问题的症结所在，我们的事业就可能被“共产风”所葬送。有了上述的分析，问题就清楚了，就是人民公社在生产关系的变革方面超前了，脱离了生产力的发展水平。正如毛主席指出的：“问题只是我们在生产关系的改进方面，即是说，在公社所有制问题方面，前进得过远了一点。”

症结找到了，解决问题的办法也就出来了（这是指当时的认识水平而言的，那时还很难设想，像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那样，尊重群众的创造，实行以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生产责任制）。郑州会议根据毛主席的意见，规定了整顿和建设人民公社的方针：“统一领导，队为基础；分级管理，权力下放；三级核算，各计盈亏；分配计划，由社决定；适当积累，合理调剂；物资劳动，等价交换；按劳分配，承认差别。”

（薄一波著：《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

从纠“左”到“反右倾”的 逆转：1959年庐山会议

“大跃进”造成的严峻现实，迫使决策者在一种较为冷静的气氛下总结经验，继续纠“左”。但庐山的“神仙会”上仍有分歧，毛泽东自己认为错误和成绩只是一个指头与九个指头的关系。彭德怀写了一封“横直是写给主席自己作参考的信”，却万万想不到闯了“大祸”。毛泽东怒责彭德怀：你是反中央，信是准备发表的，以争取群众，组织队伍，按照你的面貌改造党和世界。纠“左”骤然变成了“反右倾”。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遭到了严厉的斗争。

关于庐山会议我有一个记录本，现在好不容易找到了。可以谈得比较清楚一些。

庐山会议之前

庐山会议前有一系列会议，除郑州会议外，我都参加了。先简要介绍一下几次会议。

南宁会议反反冒进，大家都知道。陈云没有参加这次会。这次会前，柯庆施曾在毛面前攻击过陈云。我是为三峡问题去南宁的，会议已近尾声。毛泽东多年来听了林一山的意见，想上三峡（因此写了“高峡出平湖”词）。会上他听说李锐是反对派，于是

把我们两个人都找去。我到的时候，大家为我捏把汗。可是，听到我们两人当场的说明，又各写一篇长文之后，便采纳了我的意见。由此可见，只要言之有理，个别问题他还是听得进意见的。就在这次会上决定水利、电力两部合并，要我做他的兼职秘书。

接着3月成都会议，参加会议的各部门和各省市，都写了如何“大跃进”的报告，通过了30多个决议。柯庆施提出15年全民都成为大学生。成都街上有群众锣鼓声……“大跃进”已经开始。会中我去汇报过一次小组会情况（乔木在座）。我进去时，毛指着我说，“这也是一个不知世事的人”。我反映了对柯庆施、陶铸两人的发言称“对主席就是要迷信”，我颇不以为然。毛说，“他们是有所指而言的”。我还反映了少奇发言时的感想：“跟主席比，我们差一大截。”所谓“不知世事”，乔木告诉我，毛对国务院的工作不满意，说“几十个部，不知都干些什么”（后来提出“以钢为纲”带动全局）。回到北京后，毛找我谈过两次。主要谈粮产如何倍增的问题。有次先同谭震林谈淮北如何水利化，批评了水利部领导。

4月广州会议，各主要工业部参加了，地方同志很少。讨论15年超英国时，第一个汇报的是地质部刘景范，还没听十分钟，毛听不进去，中止了刘的发言。大家颇紧张。

6月间，有天找到游泳池谈话，讲到钢要翻一番。第二天碰到王鹤寿，告知此事，他很感突然。

6月底，各大区开计划会，定1959年指标。各主要工业部和富春在上海帮助订华东计划，我代表水电部参加。华东1959年要生产600万吨钢。开会期间，六大区互通电话，指标节节拔高。华东会上考虑的二五钢铁指标上限竟达1亿吨。这时一机与冶金两部矛盾已尖锐暴露。参加会的各部1959年都照600万吨安排，惟独我没有接受电力指标。柯庆施因此对我极为不满，让人带我去参观江南造船厂等三个“跃进厂”。我走时留一封信，

仍坚持电力无法满足。7月7日我给主席写了一封长信，忧心忡忡，反映华东会议高指标情况，以及各种难以解决的矛盾。从用电“你碰我挤”出发，提出“必须坚决排队，坚决分轻重缓急”。说“这次还碰到好大喜功，而对其目标所需要的必要条件却又茫然无知的事例。有些事情需要时也可以‘霸蛮’（湖南土语，难搞而硬搞），但有些事‘霸蛮’也无济于事。大家确实都是鼓足了24分干劲，但是在计划上很少听见‘留有余地’”。

8月北戴河会议，钢翻一番，决定将当年的钢产量提高到1070万吨，只好背水作战，登报。这些情况大家都知道。这次会议没有找我谈话，我知道那封长信毛看不进去。

12月武昌会议，通过会议决议，粮食产量公布7000亿斤。找我谈过一次话，讲到钢铁翻番之不易，问题复杂。会上1959年钢指标降到2000万吨。我斗胆说了一句：“不到黄河心不死。”于是，毛提到7月那封长信，说我“写得不明朗”（我心中想：你没看进去）。陈云不同意公布7000亿斤，跟乔木说了。王稼祥不同意搞公社决议，同少奇谈了，少奇要他去反映，王不敢。后来少奇反映了，结果毛大为反感。

1959年4月上海会议之前，我感到形势严峻。陈云在抓配套，抓薄弱环节。交电公司已抢购一空。一季度计划完成很差。从计委廖季立处得悉，钢的计划无法完成，问题极多。新安江缺水泥，我只好带总工去找总理解决。于是又写了封信，反映2000万吨绝不可能完成，应赶快调整，还提出“宁肯少些、但要好些”等等意见。这封信交周太和并转陈云看了。周让我将副本寄富春一阅（以免背后放冷箭之嫌）。上海会议之初，毛找我去谈过一次（乔木先在座）。我一进门，他便指着我说：“此人是 不敢做强盗的。”说我给他的信为什么要给富春看。这次谈得很融洽，接受了我们的一些意见。乔木谈了陈云不赞成公布粮产等。回来后我又写了一封信，提几点意见（毛说“只是几根骨

头”)：1959年计划涨六次、降两次，上下摆动，工作全面被动；人们不敢大胆怀疑，怕被批评“离开总路线”；二五计划盘子要快定；要重视苏联和西方的经验；大家忘记了主席在成都会议讲过的“要留有余地，波浪式前进”的话。两天后，开中央全会，毛讲了十来个问题。首先鼓励大家学海瑞，说“明朝皇帝搞廷杖，甚至当场打死，但还是有臣下敢进言”。无非五怕：怕撤职、怕开除、怕离婚、怕坐牢、怕杀头。表扬陈云：“有时真理在一个人手上。”批评乔木：“你不过是个秘书，副主席的意见敢不报告。”（乔木事后说，他这是保护陈，否则陈不能恢复名誉。）还讲了一条“李锐怕鬼”（意指我不该将信寄富春），指着坐在最后排的我，大声说：“我很感谢你呀！为什么只给我几根骨头，不给肉吃？”（这两封信都写得简明，是接受第一封信“不明朗”的教训。）此外，还说“我当主帅，你小平当副帅”，大家感觉突然，不解。这次会议小平主持压指标，压到1400万吨。

经过上海会议，以钢为纲的问题也大都暴露。总之，农业和工业两方面的“左”倾后果都很严重。农村问题虽已有所纠正，但对形势的总估计，还认为只是一个指头顶多两三个指头的问题。这时有许多省粮食已很紧张，出现成片地区挨饿的情况。广东边境县有到湖南抢粮的。会前，毛视察了两河、两湖四个省。

神仙会阶段

6月30日，彭真召集在北京被通知上山的人，说是开神仙会，讨论13个问题，后来改为18或19个问题。毛泽东6月29日在船上，7月2日在山上，两次讲话所谈问题的简要内容如下（在山上又作了一次传达）：

1. 读书。鉴于许多领导同志不懂得经济发展规律，地委以上干部应读苏联版《政治经济学》下卷。此书总结了苏联经验，

但有缺点，如和平过渡、通过议会之类。（1957年右派无一根枪，还要进攻。）8月份读一个月。给县社干部编三本书：“好人好事”，“大跃进”中敢于坚持真理，不随风倒者；“坏人坏事”，犯错误的，专门说假话的，违法乱纪者，各省找几个例子；从去年到现在中央的各种指示文件。三本书十万字，十天读完，还要考试。大家冷一下，不要做热锅上的蚂蚁。

2. 形势。是好是坏？有些坏，但还不到“报老爷，大势不好”程度。八大一次会议方针政策对不对？对！要坚持。湖南说的巧妙：有伟大成绩，有丰富经验，实际是有不少问题，前途是光明的。去年一年经验，主要是：综合平衡，群众路线，统一领导，注意质量。最主要是综合平衡；宁肯少些，但要好些。现在盲目性减少，形势在好转。何时能彻底好转，明年五一。去年脑子发热，但热情宝贵。有些问题弄不清，为何粮紧？缺肉？似乎促进派腰杆不硬了，怪话让人说。

3. 任务。今年钢1300万吨，不能超过就算了。粮食去年增产有无三成？今后每年增加1000亿斤，1964年搞到10000亿斤。钢明后年都只能增加400万吨。确保质量。15年赶英要坚持。去年做了件蠢事，好几年指标一年完成。现在是否提农轻重？这几年农业第一，成立农机部。过去陈云提过，先安排好市场，再安排基建。黄敬不赞成。现在看来陈是对的。衣食住行安排好了，就不会造反，过得舒服，才有利于建设。两种积极性：盲目和实事求是。

4. 体制。有些半无政府主义，四权下放，现在要适当收回。强调集权，统一领导。

5. 食堂。自愿参加，节余归己。积极办好，不要一哄而散。保持30%也是好的，形式可以多种多样。

6. 学会过日子。湖北农民批评干部：一不懂生产，二不会过日子。要富日子当穷日子过。今年不管增产多少，按4800亿

斤标准过日子。

7. 恢复三定。产、购、销，三年不变。增产征四留六。

8. 恢复农村初级市场。

9. 综合平衡，大教训之一。包括：农业本身，工业内部，工业与农业以及整个国民经济比例关系。无综合平衡即无群众路线。

10. 使生产小队成为半核算单位。

11. 农村党团基层组织的领导作用。党不管党，生产队长代替了。

12. 宣传问题。去年浮夸。怎样说法？四大指标定高了（指1959年），找个适当时机改过来。粮食以后是否不公布绝对数。

13. 质量问题，争取一二年内解决。铁的含硫超过标准。出口退化，名誉不好。

14. 对去年的估计：有伟大成绩，有不少问题，前途是光明的。缺点是一二三个指头问题。许多问题要比较长的时间才能看得出来。

15. 群众路线，有没有？有多少？

16. 全国协作关系。破坏了原来协作，协作区要搞些调查研究。

17. 团结问题，统一思想。河南120万基层干部，40万犯错误，3000受处分，是个分裂。

18. 国际问题。对资产阶级不易一次认清，界限要分清。同蒋介石打了几十年，讲统战时一切都忘了。

开会的人都上了山后，7月3日开始，分六个组开座谈会，按照18个问题摆情况，谈意见。白天开会，晚上跳舞。《到韶山》、《登庐山》两诗（寄周小舟与乔木求订正）传开后，大家游山赋诗，很是轻松。我参加中南组。少奇和朱总都参加过这个组，各有一次发言。7月4日会上，王任重作了沉痛检讨：比

1954年水灾更困难，500万人几两粮，吃稀饭教训才深刻。追求密植、高产、放卫星，老老实实在说假话。吴芝圃一边向全国道歉，一边说食堂一个不垮。

7月4日少奇作了下述发言：去年大跃进，吃了前年的库存，预支了今年。凡事不要轻信。要有办法使人不说假话。一股风批右倾保守，拔白旗，使人老在“帽子”的威胁下。说老实话的人，去年不好混。领导看好的多，估计偏高。去年二类苗比一类好。红旗队低产，白旗队高产。十一二月大吃大喝时，老农已提警告：今年不可乐观。大家挨饿，给武汉调粮。去年的错误，对经济生活造成很大影响，决不可小视。粮食好转才能解决副食。手工业要恢复。工厂财务混乱。纱厂炼钢，用掉流动资金。22万吨铁，至少赔5000万，成本高的要停产。各县盲目办工厂。1958年有丰富经验和深刻教训，要充分估计；但怕说错误多了，影响积极性。讲清楚，出点冷空气，“右倾”也不怕。今年4月份报告，还有点发热，不合实际（指平均亩产450到500斤）；1962年达到450斤，没作结论。赞成恢复四十条。说大话，吃大亏，粮食部不满。脑子发热，很少看到不利；困难时，很少看到有利。过与不及永远存在。1958年最大成绩是得到教训，全党全民得到深刻教训。也证明确可大跃进，另一面又出这么多乱子，有破坏作用。斯大林似乎说过，平衡要破坏了，才知其重要。聪明人是碰了钉子知道转弯。争取不犯长期性、全国性错误；暂时错误非犯不可，有好处。全民炼钢，亲身经验，碰钉子转弯，就是马克思主义，就是正确领导。立三路线，短促突击，损失完了，还不知转弯，要让历史学家总结。当前毫无悲观、抱怨之必要。认识大大提高一步。半成品还有用。小高炉、小转炉，吸取双轮双铤犁教训。设备达到设计能力要时间，欲速则不达。大家注意，不要泄气；泄一点难免，不泄为好。不要责备下面，省地县，责任主要由省委担起来。干部也不要老检讨。

7月6日中南组会上，朱总发言：农民还有私有性一面。供给制、共产风损害很大。食堂在生产上对，消费上吃了大亏。工人还得发工资，供给制是共产，农民就如此愿意共产？食堂自负盈亏，可以存在一部分，全垮了也不见得是坏事。家庭制度要巩固起来，否则，干什么？有了钱就吃光。原则上回到家庭过日子。食堂要吃好，吃饱，有烧的，这样人心才稳定。农民要富，要使之富起来，不会成富农路线，是关系五亿人口的稳定问题。食堂办不起来不要硬办，回家好。陈云多年来对粮食抓得多紧。北戴河一时高兴起来，从粮食多了出发。工业主要是大炼钢铁搞乱了，其他乱得不太大。农轻重安排好。农民立家立业重要。对农民私有制要看重些。苏联依靠经济核算制、商品规律，生产越来越多，要多搞粮食，变成鸡、鸭、蛋出口，换回东西。各省不要自搞工业体系，工业方向要讲。

从北京到浦口的专车上，乔木找我谈过对1958年的总看法，认为综合平衡出了问题。他以太阳系运行为例，说行星与太阳之间的关系，轨道运行，都是平衡关系；又说火车、汽车的行驶，也不能离开轨道与公路，否则就会出轨。在火车上，富春主持开了一次工交各部部长的计划会。会上我多嘴，讲了乔木同我的谈话。刚上山的7月3日夜，乔木又找我谈了一次，陶铸在座（后来富春也来了）。他谈到：共产风是从北戴河刮起来的；资产阶级法权问题（张春桥参加过郑州会议），毛转得较快；毛很欣赏徐水群众那种干劲，有废除家庭的思想；他多次提起海瑞，目的却在不要出海瑞。钢铁翻一番的想法，大概是从粮食问题引起的。成都会议有些人受宠，因此发展了迎合之风（指柯庆施等）。乔木怀疑“平衡是暂时的、不平衡是绝对的”说法，认为许多自然现象都是平衡的（又谈到太阳系），不能套用矛盾规律。平衡内部即矛盾的两个方面，无矛盾即无所谓平衡。因此，计划工作必须以综合平衡为主。不论如何政治挂帅，必须遵从经济规律，

要尊重和懂得前人（包括苏联）的经验。我们也谈到《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所论战争规律的道理，以为佐证。7月6日夜，我又在乔木、田家英、吴冷西（还有陈伯达，他们四人住在一处）处作过一次长谈。大家又研究了平衡问题。认为综合平衡是社会主义国家经济规律；不平衡是资本主义国家规律，因此，常受破坏。多少米煮多少饭，人走路也要保持平衡。谈到公社问题之由来，七里坪、碴牙山、徐水成万人去参观，供给制也来源于此。在北戴河提出公社等问题，无人有精神准备。乔木还谈到：报纸一反常规，毛和中央的活动、言论，均要及时报道。（为什么南宁、成都会议都没有报道？）王稼祥应当受表扬。整风、反右，整得人人都不敢讲真话。都感觉毛常有出尔反尔之事，使人很难伺候。以钢为纲、三大元帅的提法，违反按比例规律；元帅是可以下命令，要绝对服从的。富春提“运动中求平衡”，也是遁词，办不到的。

这之后的几天，我还去看过周小舟和周惠。他们谈到湖南情况比邻省要好，原因是三万个小土炉没有点火，没有搞吃饭不要钱，注意到粮食问题等。1958年韶山吃偏饭，也只增产14%。小舟特别谈到他同彭总的交谈（上庐山之前，彭到过湖南），议论了主席。彭说常委内部民主生活不正常，小舟的话是：二公（刘）不便讲，三公（周）和朱总不能讲，陈和邓也很难讲，小平说话不多。主席凡事总要一竿子插到底，不愿转弯或回头。我们当时都感觉会议还有压力，缺点、问题还不敢彻底暴露，大家还不能畅所欲言。其间周小舟同乔木也有接触和交谈。

7月11日传达了毛泽东的讲话：对形势看法不一致，即不能团结。龙云说我们人心丧尽，天安门工程如秦始皇修万里长城。党内天津局、科长议论，“得不偿失”。上海一党委书记否认“大跃进”，辩论之后，杀头也不承认。对这些同志要讲清道理。去年四件事：钢翻番；基建1900多项；粮食翻番；办公社。缺

乏综合平衡，引起各方不满，缺点都承认。有人从根本否定总路线、“大跃进”。多快好省不会错。有这么些中国人，认为美国一切都好，连月亮也好。如黄万里（清华大学水利系教授，被打成右派）就是一个。但他的诗（指黄的一首词《贺新郎》，歌颂百花齐放的）还想读。通过合作化、公社化，农业总增产了，苏联则否。没哪个将军不打败仗，三仗一败二胜，就有威信。对去年一些缺点错误要承认，一个、最多三个指头，彭老总说一个多一点（可见此时对彭毫无戒心），成绩还是主要的。公社要整顿。对干部要有分析。北戴河被动，特别是四大指标不公布为好。郑州—武昌—郑州—上海—庐山，这几次会议，逐渐认识客观实际，腰杆才硬。像打仗一样，有缴获，有损失，有所得有所失，总不能说得得不偿失。斯大林讲过：客观规律，人们适应时不感觉，破坏时才感觉。去年破坏一部分规律，才有了认识。经验从成功、失败两方面来，打仗的经验既从胜仗，也从败仗来；建设亦如此。要接受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遗产。我们要快一点，要找正确道路。发现缺点快，纠正也快。苏联长短腿几十年未解决。我们有两条腿，五个并举。

张奚若说我（指毛）好大喜功，急功近利，否定过去，迷信将来。陈铭枢说我好大喜功，偏听偏信，轻视古典，喜怒无常。偏听偏信，就是要偏！同右派作斗争，总得偏一边。

北戴河以来的一年，有些事搞得不好，但总是抓了工业了，自己负了责任。可能有主观主义，但总比不搞好。一年实践，取得这么多经验。不像过去只听训、走过场、签字。

毛泽东找我们两次谈话

7月11日夜，毛找周小舟、周惠和我三人去谈话。毛说，1958年有些事他有责任，提倡敢想敢干（八大二次会议是高

峰)，也有胡思乱想，引起唯心主义。因此不能全怪下面和各个部门。否则，人们会像蒋干一样抱怨：“曹营之事，难办得很！”（讲完这句话之后，我们哄堂大笑，毛本人也大笑了一阵。）关于钢翻一番，不料王鹤寿当成了法律，登报则是一波和乔木建议。又批评王鹤寿 1958 年只搞“两小无猜”——小高炉、小转炉，把别的忘了，本末倒置。（谈完话之后，我找鹤寿谈了，动员他在小组会作了检查。）关于农业高指标的由来，我问为什么就相信亩产万斤？毛说他受了钱学森发表在《中国青年报》“学科学”副刊上的一篇文章的影响，钱说太阳能只要多利用一点点，即可亩产万斤或更多。说 1958 年粮食是否增产了三成，他还怀疑，从而讲了填平补齐的道理：增产、减产与低产一拉平，增产三成很不容易。谈到他自己常常是自己的对立面，上半夜下半夜互相打架。小舟于是讲，高指标是“上有好者，下必甚焉”。这句话毛也听进去了。我们谈到陈云管理经济历来稳重，还是由陈出来主管为好。毛同意让陈当总指挥，说陈有长处，也有短处，重复谈了上海会议时对陈的称赞。由此又谈到曹操打袁绍，失败之后想念郭嘉的故事，说“国乱思良将，家贫思贤妻”。又谈起自己 40 岁以前肝火大，总觉正义在自己手中，现在也还有肝火。说毛泽覃在江西时，有次他大发脾气（或者是要动手打人），毛泽覃说：“共产党又不是毛氏宗祠。”为此我们又笑了一阵。关于公社问题，毛说：“在七里营，记者问我‘公社好不好’，我说‘好’，谁知就登上报了：‘人民公社好’。”我们认为会议还有压力，许多问题并没有彻底揭出来，应当进一步摆开谈。关于讲假话的问题，毛说，转告大家，也不要那么沉重。说去年是几件事挤在一起了，“郑州会议后，我开始右倾。打麻将 13 张牌，基本靠手气”（意指客观规律不易弄清）。我们又说到 1958 年是小资产阶级思想、唯心主义大发展的一年（这句话也带点影射味道）；反对“以钢为纲”，“三大元帅”的口号，说这些口号不科学。毛

当即同意以后可以不提这些口号了。我将当年第九期《宣教动态》送上，请他翻翻。这一期辑录了一些斯大林的语录：如果社会主义发生经济失调，其危机会比资本主义国家更严重等等。

谈完话出来之后，小舟比较得意，将“国乱思良将”这些话传了出去，并说自己这次把话讲完了。这当然引起当时“左派”的议论和谋划对策。我将全部谈话情况同田家英谈了，没同其他人谈。这时我们的共同感觉是：毛的思路还比较偏在我们这一方面。因此我鼓励田将罗世发的材料送上去。田在四川蹲点（田是四川人）刚回来，在下面饿过肚子。过分密植，农民反对，为此他同李井泉有过很大争论。他发现真假两个罗世发的问题。罗是全国人大代表，著名劳模。过去罗的高产都是上面压，虚报的。田领导的工作组专门写了一份调查材料。田同我谈的事情很多。说有些问题书记处常让乔木去反映。有次他和谭老板在毛处谈话，毛拍桌而起：“就只陈云能管经济，我就不能！”他怕毛再激动下去，就促谭一起离开了。田过去同我讲得更多的是关于毛任性。有时一些想法（思路或意见）变化太快，易生反复；今天跟上去了，也许明天挨批。还喜欢让别人写检讨。反右之前，为鼓励鸣放，毛当时批发一个文件（或同民主人士谈话中），批评了放手发动群众鸣放的阻力有来自党内的，举了政治研究室副主任田家英的例子。田说，根本没有这回事，他根本没有反对过鸣放。这即是不顾事实，借题发挥。这种例子并非个别。关于废除家庭的想法，这都属于胡思乱想，我们都感到忧虑、不安。这也是朱总在小组会上反复讲要巩固家庭的原因。在庐山时，关于1958年的问题，我同田谈的最多。田还讲过这样一副有针对性的对联：“隐身免留千载笑，成书还待十年闲。”我们都认为主席不如总结中国革命经验，专从事理论著作作为好。

彭总的信是7月14日印发的，上面只批了“传阅”二字。就在第二天或第三天，在田的住处，我们几个人议论这封信，都

很感兴趣，因信中观点同我们是一致的。我说，只有彭才有胆量敢写。当时乔木提出一个我们意料不到的看法，说这封信可能出乱子。他大概是根据自己多年的经验和观察而得出这个看法。

7月17日下午5点到夜10点，毛泽东又找小舟、周惠、乔木、家英和我五个人去谈话。他谈得多，也谈得比较融洽，还议论了韶山、庐山那两首诗，留我们吃晚饭，喝茅台。以下是毛谈的要点：

关于总路线，真有70%人拥护就不得了了，真正骨干30%也不得了，大部分人是随大流的。

不要怕乱，乱了才好治（大概是谈到1957年反右前情况引起的。周惠说，学生还是不上街、不打扁担好。乔木也是怕乱的，以人长脓疮需要白血球攻为例，说：全身溃烂，白血球失去平衡，则无法治了）。

现在的情况，实质是反冒进，我是反冒进的头子。要有几个右派朋友，我是机会主义的头子。我要找唱反调的人通信。计委这次来了反对派的人（指贾拓夫、宋平、韩哲一），正面的有富春一个够了。工业系统是独立王国，谁也进不去。孙悟空偷桃子，只有这个办法，开庐山会议之类。过去不懂得管经济之复杂。革命是捣乱，乱人有隙可乘。六个大组打乱，再分成若干组讨论（这是7月11日夜，我们反映同一个地区的在一起发言有妨碍，第二天就重新分组了），不要一个腔调。国务院那么多部组成的院，不包括省，任何一个工厂总办在一个省，权力集中不易。过去司令部、政治部有矛盾，好不容易集中在前敌委员会。中央红军八万多人，到吴起镇剩7000，开干部会说比过去强（干部经过锻炼），当时许多人不同意。（这还是指1958年虽吃了亏，但取得了经验。）

反复讲1300万吨来之不易（这是当时1959年落实指标，有人说是否右倾机会主义了），说是不能完成，也不要如丧考妣。

只要真正鼓足了干劲，指标没完成也没有关系。成绩讲够很重要。他们（各省书记）在当家。“人为财死，鸟为食亡”，人都有保卫自己劳动果实的本能。（这段话是田谈到同李井泉的争论引起的。）

田反映了罗世发问题之后，毛说，现象与本质不容易弄清楚。万人检查团是形式主义，不能深入了解情况，不会说真话。称赞《宣教动态》、《外事动态》办得好，应当办《经济动态》。关于粮产估计，比11日夜那次谈的更谨慎，说真正高产的只有5%，一般水平是95%，而我们只能立足于95%。全国年增产30%不大可能。

又谈了平衡是相对的，不平衡是绝对的道理。（谈到这个问题时，乔木一言未发，他是不同意这个理论的。）毛颇同意乔木建议，让工业部长们下去当几年厂长。说孔夫子作过会计，管过田地（职业为道士）。政治挂帅，不能代替具体的经济工作。我们又提到还是由陈云挂帅好；乔木并说，少奇意见，还是让陈主管计委好。

这时彭总的信已经发出。毛从彭的信谈到洛川会议，说华北军委分委的决定不同意中央游击战的方针。

这是7月17日，彭的信还刚刚传阅。从这天谈话的内容以及情绪来看，我认为，这时毛还没有完全转向“左派”，要发起一场反击。但对彭的信（及彭本人）是有他自己的看法的，谈到洛川会议，是让我们知道彭在历史上是反他的，也是启发我们不要倒向彭一边。同11日夜间的谈话相比较，这时无疑有变化了，要找“左派”朋友谈了。同我们这两次谈话之前，还没有传出正式找哪些人谈过话。田家英有内线（警卫副官、英文秘书林克、机要秘书等，都同他关系较密切），有什么动静，他会知道。当时都知道找我们谈过两次话，大家都想探问，摸摸风向。我是守口如瓶的，怕惹出麻烦来。

田家英从他的内线得知，毛这时找各大区人谈话时，还说要印发《阿 Q 正传》，让大家受点启发，不要自己的缺点、毛病触动不得，像阿 Q 一样，一触即跳。

彭总的信和《会议纪要》

在座谈 19 个问题，毛即指定了胡乔木、谭震林、曾希圣、周小舟、田家英和我几个人，起草一个《会议纪要》，由乔木当组长。各人分写一或两个问题。我负责写“综合平衡”，乔木写总结性的一段。（1988 年写《庐山会议实录》时，我才查清《纪要》共 12 个问题，正式名称是《庐山会议诸问题的议定记录》，我还写了“加强企业管理和产品质量问题”。）从人员组成情况来看，毛当时还是希望这个文件是一个纠“左”的文件，谭、曾不是主要起草人。神仙会原来不准备开很长，十天半月结束，通过这个《纪要》，大家下山各奔前程。可是这个《纪要》和彭总的信先后发出之后，形势就逐渐起变化了。《纪要》在各个小组中引起程度不同的非难，非难大都集中在乔木写的总结性那一部分，又特别攻击其中不要忘记苏联经验那一段。我在小组会上（组长是林铁，这已是 7 月 18 日以后）就听见有人说，总结 1958 年经验的说法，看不下去；今天的缺点是否是“左”的问题？等等。对于这些非难，我们几个起草人都在各自的小组会上为《纪要》辩护。

这个时候，发生周惠闲话事件。周惠在同别人闲谈时，半认真半开玩笑说，1958 年无非三种人：官僚主义；不讲真话（圆滑）；看风使舵。又说各省第一书记都该打一百板屁股。这话传出去了，引起轩然大波。总理为此在 7 月 20 日专门开过一次会，批评了周惠。黄克诚在这次会上同谭老板有过争执。黄是 7 月 17 日上山的，第二天早晨二周与我三人去看过黄。黄同情我们

的观点，说他在书记处会上说过：现在讲话很难，我黄克诚总算是一个敢发表意见的人，现在也不敢讲话了。所谓有压力，在神仙会阶段就存在的。

彭总的信出来后，成为小组发言的中心议题。许多人都赞成彭总的观点。记得东北组（组长欧阳钦）几乎全部赞成（这在《简报》上都有反映的）。自从参加中央会议以来，由于自己工作人员的身份，我从来没有在小组会上发过言。关于人民日报1958年浮夸风的报道，吴冷西似在小组会上作了检讨。有天我们两人一起散步，他鼓励我发言。我大概是7月21日发的言，指出1959年高指标来自1958年的华东计划会议，没有点名地批评了柯庆施（发言刊《简报》）。说彭总的信，精神是好的。7月20日，张闻天在小组会也作了长篇发言，也谈到会议压力大，只能讲好，不能讲坏。在山上，彭同张住得靠近，他们两人有过交谈。从7月3日到10日彭在西北小组共发过好几次言，当时并未引起很大议论。

围绕彭信和《纪要》，所谓“左”和“右”两方面的意见和分歧，才逐渐明朗。我参加的小组会上，浙江同志说形势很容易好转，如绍兴一抓，鸡和鸡蛋都供过于求。这个发言引起叶季壮极大兴趣，因为当时外贸很困难。

刘澜波同我的观点是一致的（我们住在一栋楼），但当时所有内情我都没有同他谈。有天他告诉我：柯庆施向他谈到，毛跟柯谈到对乔木的观感，说乔一直跟他20年，还是一介书生。使我想起广州会议时，毛谈到要善于听不同意见和反面意见时说：我们身边有个胡乔木，最能顶人，有时把你顶得要死（这次会乔木等没有参加）。我连忙将柯庆施的话告诉田家英。田说，毛对乔木，是既爱之又恶之。田跟我谈到，他们的估计，“左派”司令部由柯庆施和李井泉挂帅，他们攻《会议纪要》，攻彭总的信，也攻周惠，这些都是由他们发动的。正在这几天紧张交锋之中，

一天吃午饭时，陈正人将彭的信指给我看：“小资产阶级狂热性”指谁？为什么说“有失有得”？“得心应手”这些话还不是有所指的。陈对我说这些，也许是好意，怕我陷得太深。我心中明白，我的发言得罪了柯庆施。这时许多说法都传出来了，说彭的信刺很多，许多话都是影射主席；“小资产阶级狂热性”的提法是路线性质问题，路线错了，要换领导才能改正错误；书记处的人，“左”、“右”一半对一半；等等。彭在西北小组发言，说了“操了我四十天娘”的话；彭总反对唱东方红，反对喊万岁，等等，也传出来了。

毛泽东当时除找我们谈过两次话外，当时还找各大区负责人谈过话。究竟柯庆施等怎样在他面前攻击彭总（以及我们这些“右派”），详情不得而知。毛同中央常委同志，这时肯定没有交换过意见。有以下二事为证：

7月20日左右，晚上跳舞时，我坐在总理的旁边，我问总理：你认为彭总的信怎么样？总理说：那没有什么吧。意思即这是一种正常的情况。

我的记录本上，7月20日记有少奇提的三个问题：（1）（1958年）是“左”倾错误还是右倾错误？（2）去年三个月时间，是否犯了路线错误？（3）1300万吨是否右倾？3000万吨是否左倾？

此外，以下情况也是最好的证明：从7月12日到22日，总理三次找国务院各部开会，谈形势，摆问题，算细账。讲陈云总强调财政、物资、现金三个平衡，要略有节余。去年全冲乱了，单生铁即补了15亿。总理认为继续跃进，过分紧张；综合平衡工作没有做好，不能这样过日子，特别是三材太不平衡。冶金部今年24个亿，上半年已经用了19个亿。从而提出问题：指标到底放在哪个杠杆上？基建到底铺多大摊子？由于毛7月23日的讲话，总理主持的会议当然中断了。

去年听黄克诚说，彭本不准备上庐山的，是他催促彭上山的。在湖南视察时，小舟陪着彭总，谈得比较融洽，许多观点都一致，上山之后，小舟动员彭写的信。信中有些材料是贾拓夫提供的。

毛泽东 7 月 23 日讲话

下面 7 月 23 日毛的讲话，是根据本人当时记录本做的详细摘要，内容如下：

看了发言记录、文件，与部分同志谈了话，感到有两种倾向：一种是触不得，大有一触即跳之势。不让人家讲坏话，只愿听好话。两种话都要听。劝这些同志听坏话。党内外刮风。右派讲秦始皇修长城倒台，我们修天安门，一塌糊涂。党内有许多动摇分子，看不到完全，有火气。有的人历史有问题，挨过批评（广东军区）。江西党校有集中反映，党内代表也是右派，可以辩论，三四年再转过来。这回会内会外结合，地方太小，不然把右派都请来开会。越讲得一塌糊涂越好，硬着头皮顶住，反右时发明这一名词。顶一个月，顶三四年，十年，神州不会陆沉，天不会掉下来，原因是做了一些好事，现在腰杆子不真正硬，多数派要硬起来。什么猪肉、头发夹子、肥皂等有所失调，工农商交都紧张，搞得人心也紧张。据我看，没什么紧张。小资产阶级狂热性有一点，不那么多。公社运动，碴牙山书记告诉我，七、八、九这三个月，每天 3000 人参观，徐水、七里营也是这么多人，到那里去取经，其中也有县、社、队和省地委干部。大概是出了真理，免于贫困的自由，想早点搞共产主义。对这种热情如何看法，不能说

全是小资产阶级狂热性，是有一些，只想搞多搞快。三个地方三个月 90 万人朝山进香，如此广泛的群众运动，不能泼冷水，只能劝说：你们心是好的，事实难于办到，要有步骤，不能一口吃个胖子。……农民一个时期有狂热性。春节前后，两个多月不高兴，干部下乡不讲话了，请吃稀饭、蕃薯。因刮共产风，一平二调三收款，群众不欢迎。说服这些干部。三四月风即压下去了。现在听说大多数转过来，留恋共产主义的是少数。平调东西要收回，几亿人受到教育，不能你的就是我的。没读政治经济学，不知等价交换，价值法则；公社一级不懂一点不好。不识字，可以给他们讲课。北齐斛律金作《敕勒歌》：“敕勒川，阴山下，天似穹庐，笼盖四野。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按：此歌乃敕勒民歌，非斛律金作。）斛律金一字不识，可以做到丞相（按：北齐左丞相是斛律光，不是斛律金。）柯老讲 15 年全民进大学。农民、工人不是也学哲学吗？同他们讲课，比知识分子易懂。

庐山会议召开的本意是反“左”，纠正“大跃进”偏差，会议前期基本是在轻松气氛下进行的，白天开会，晚上跳舞，有“神仙会”之称。自从 7 月 14 日彭德怀写信给毛泽东，对 1958 年以来产生的“左”倾错误及其经验教训提出一些中肯的意见之后，形势急转直下，7 月 23 日，毛泽东以突然袭击的方式发动了对彭德怀的极其严厉的批判和斗争。

北京来的人哇啦哇啦，我们作过多次检讨，他们没有听到。有些问题这次不会解决，有些同志不会放弃观点。要养成习惯，听得进坏话。我少年时代也是一股火气：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现在这个原则还不放弃，硬着头皮顶住，学会这一条。如果我错，我作自我批评。

第二方面，对另一部分同志，在此紧急关头，不要动摇；有一些同志是摇摆的，在历史上大风大浪中不坚定。历史上四条路线，现在一条总路线，站不稳，扭秧歌（蒋帮谓我“秧歌王朝”）。这部分同志扭秧歌，忧心如焚，想把国家搞好。对动摇分子不赞成戴帽子。如果讲小资产阶级狂热性，反过来则是资产阶级泄气性、悲观性。那些同志是要搞社会主义，没经验，一点风吹草动，就以为冒了，就反冒进。（讲到这里，偏过头对坐在旁边的总理说）总理，你那次反冒进，这回站住脚了，干劲很大。受过那次教训，相信陈云同志也会站住脚的（陈云和小平没有参加庐山会议）。那次批周、陈的人，取其地位而代之。“有失有得”，失放在前，这都是仔细斟酌了的。如果要戴帽子，资产阶级动摇性或小资产阶级动摇性，是右的性质，受资产阶级影响，屈服帝国主义压力之下。

70万个生产队，70万条错误，都登报，一年也登不完，这样，国家必完蛋。帝国主义不来，人民要起来革命。专办讲坏话的报纸，一个星期也会灭亡的。要别人坚定，首先自己要坚定。他们不是右派，像中间派，偏左偏右还要分析。重复了1956年下半年、1957年上半年犯错误同志的道路，自己把自己抛到右派边缘，还有30公里。现在这种论调，右派欢迎。这种同志采取边缘政策，相当危险。我不讲，对这些同志有益、有害？有害。

食堂问题，是好东西，无可厚非。赞成自愿参加，节余归己。保持1/3即好，1.5亿人。坚持下来了了不起。希望达到一半左右，2.5亿人。《红旗》登的一个食堂，败而复成，不仅节省劳力，还节省物资。有的用

上了自来水。建议河南为食堂搞一套机械化，科学院到昌黎县调查，有右派出来说，无一点好处。攻其一点，不及其余。

有许多事根本料不到，如计委是计划机关，却不会管计划。各个部、地方，一个时期不管综合平衡。地方可原谅。计委和中央各部，十年了，忽然在北戴河开始不管了。名曰计划指标，等于不要计划。真没有料到！我、总理、少奇根本未管。为自己开脱一下，因我不是计委主任。去年8月前主要精力放在革命，对建设根本外行。没有领导，哪来英明。在西楼时讲过，不要写“英明领导”。1958、1959年主要责任在我身上，应当说在我（过去说周、陈）。实在是一大堆事未办。“始作俑者，其无后乎。”我无后乎？发明权是我？还是柯老？柯讲600万吨。我6月讲1070万吨。北戴河发公报，一波建议，也觉得可行。从此闯下大祸，9000万人上阵。始作俑者，应绝子灭孙。补贴80亿，搞小土群、小洋群。得不偿失，得失相等，即由此而来。浪费一些，要提高质量，降低成本，为好铁奋斗。无一股热气、神气，办不好事。李逵太急，列宁热情磅礴。有话就讲，口说无凭，立此为证。不要怕穿小鞋，成都会议讲过，不要怕坐班房，不要明哲保身。病从口入，祸从口出，我今天要闯祸。两部分人都不高兴：一部分触不得；一部分方向危险。始作俑者，其无后乎。1070万吨，我下的决心；其次，人民公社有推广之权。北戴河公社决议是我建议写。当时碴牙山如获至宝，记者问我，我说“好”，便登了报。小资产阶级狂热性也有一点。你们赞成了，也分点成；但始作俑者，推不掉。公社全世界反对，苏联也反对。总路线是个虚的，见之于

农业、工业。其他一些大炮，别人也分担一点。

要快之事，马克思也犯过不少错误。欧洲革命要来了，又没来，反反复复。他死了好多年，列宁才来。那不是急性病，小资产阶级狂热性？列宁也搞和平民主新阶段。后来一国可胜利，可建设社会主义。马克思反对巴黎公社，季诺维也夫反对十月革命。巴黎公社起来后，马克思赞成，估计会失败。但看出这是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哪怕三个月也好。要讲经济核算的话，当然划不来。

我们现在的经济工作，是否像1927年失败了？缩小到1/10？不能这样讲。刮了一次共产风，全国人民受到教育。现在要研究政治经济学。

如果说富春、鹤寿有责任，谭老板有责任，柯老要搞600万吨，那第一个责任是我。屎都拉出来，人就舒服了。

“不仅对事，也要对人”

毛泽东讲话完了，即散会。彭总在门口挡着毛，说他的信是向主席个人写的，并没有让大家来讨论。

我的心情很沉重，与田家英、吴冷西（还有陈伯达）四个人走出会场，散步了很久，谁也没有说一句话，都感到沉重之至。走到一个石亭中，田用木炭枝在石柱上写了这首旧联：“四面湖山来眼底，万家忧乐到心头。”

晚上，我到周小舟、周惠处，大家都不能接受毛的讲话，觉得再无处可诉了，满肚子意见要发泄。小舟特别激愤，建议到黄克诚处谈谈。我不赞成，怕有人看见犯嫌疑。小舟坚持去，于是给黄打电话，黄不赞成去，他也不愿来，但拗不过小舟的坚持，

只好同意我们三人去。小舟和我都有点火气。小舟谈到斯大林晚年问题。说袁世凯称帝时，下面单独办一种报纸给袁看，专门讲劝进的话。意指毛仍偏听偏信。我说，这不是钓鱼吗？还说了一句很重的话：他不能一手遮天。黄说“主席又不是慈禧太后”，他比较冷静，劝我们有意见还是当面谈。我说这时正在火头上，谈不得。谈话之间，彭总走进来了（他住在黄的对面房）。房中无多余椅子，我忙站起让座，心中觉得不大好，示意小舟辞去。我们三人即起身出来，各自归去。但出来后，被人碰见了，随即毛知道了此事。于是7月26日传令：划清界限，不仅对事，也可以对人。大概第三天起，我们在小组中即开始挨批斗。小组会批评我的第一天，习仲勋说我还算是中间偏左的。可是有人受柯庆施的指使，说我在火车上讲1958年出了轨。柯之不放过我，原因就在我曾在小组会发言批评了他。康生也不放过我，说我是中央的“间谍”，在延安挨过抢救，住过保安处，因而对党怀恨。还散播谣言，说我的父亲是红军杀掉的（我的父亲死于1922年）。别的小组也传出，有“文班子”，也有“武班子”。

7月23日到29日之间，田家英还悄悄跟我联系。有天晚上他来住处告我：在起草反党集团文件，周小舟在内。让我通知二周，加倍小心谨慎。田还告我，问过总理，没有我的名字（后来的“决议”，我被列入“追随者”）。这期间田还告我二事：在毛居处大区负责人会上，有人说彭就是纳吉。毛一人在房时，林克在旁，对林克说：朱德是老右派，张闻天也是，李锐这次也是个右派。

“对人”之后，批斗升级，小组会上提出“湖南集团”和“军事俱乐部”。为了消除毛的疑虑，田转告乔木的主意，让我给主席写了信，以释去23日夜间的疑心。我于是向毛写了一信，说明23日夜间是怎样去黄克诚处的，谈了些有关湖南的情况（那夜也确谈了湖南形势），黄劝我们有问题找主席谈。特别说明

彭总进来后，我们立即离去。当然隐瞒了“斯大林晚年”之说这些要害。信晚上送去，第二天（30日）大早，就找我们四人去谈话。毛说，不了解黄克诚的历史。谈了一军团、三军团的问题。提出（传说彭黄）“父子关系”问题。黄说明在江西被打成AB团时，是彭救了他，因此同彭的感情关系始终很好；但在某些政治、思想问题上，同彭常有争论，有不一致处。毛就说：政治、思想、感情是统一的东西，“我自己的思想感情总是一致的”。并说，这些疙瘩要解开（意指过去不了解彭黄关系）。随后又说，同我们几个人不通心，同小舟尤格格不入。我们反映会议空气太紧张。毛说，要容许交锋，容许自由辩论。还跟我们谈到遵义会议之前，怎样将张闻天和王稼祥争取过来的故事。我们提出“湖南集团”的问题，希望能予澄清。毛说，这是一种误会。

谈完出来后，遇见田家英，我将“解疙瘩”之语告他，田说，不要轻信，大难还在后面。当然他们知道内情。

这时，田还告我们几点看法：彭是政治局委员，政治局没有开会讨论，就让小组批斗，太不应当了。慨叹毛这样独断专行，晚节不终。还担心总理也牵扯上，这些党的元勋应当受到保护。由于《纪要》同时挨批，他们也有自危之感。

8月1日常委会及最后阶段

8月1日上午10点到下午5点（中间没有休息，吃的包子），由毛泽东主持，开中央常委会。参加的有少奇、总理、朱总、林彪、彭真，以及彭总和贺龙。让黄克诚、周小舟、周惠和我四人旁听。彭真让我做记录。（记录本今年找到了，铅笔字迹潦草、模糊，尚无时间整理出来。）

林彪大概是17日以后才上山，他当然是搬来的主要“救兵”；可能担心军权旁落，已决定让林接管国防部。但在会上并

没有同意彭辞职。这个会议是算彭的历史总账。一多半时间由毛讲话，讲的内容很广泛，从江西到庐山，从军事到哲学，从马克思到斯大林，几次路线，苏联教训，等等。彭在谈到一些历史等方面情节时，有不少对话。总理只问过他与彭总一起同斯大林谈话后，斯大林送彭出门说过什么话这一件事。少奇也只问过长征时在三军团一件不关紧要的事。彭真解释过延安整风时，平江暴动士兵委员会人员受审查事。

第一个发言的是朱总，内容比较温和，“没有击中要害”。没等朱讲完，毛即将腿抬起，用手指搔了几下鞋面，说：“隔靴搔痒。”弄得总司令红了脸，就停止发言，直到散会，没有再讲一句话。接着就是林彪发言（我的记录本上没有朱总的发言，也没林最初讲的几句话，但我记得极清楚，估计彭真、黄克诚、周惠也可能记得清楚），只简短几句，可说“击中要害”，为整个会和斗彭纲领定了调子。林彪说：这回是招兵买马。是野心家，阴谋家，伪君子，冯玉祥。中国只有毛主席是大英雄，谁也不要当英雄。

毛前一部分谈井冈山，几次军事情况和几次历史路线斗争。打长沙，打南昌，打吉安、九江，打赣州等等。

彭插话：1934年一二月，我已转了，认为仍由老毛领导好，过去事实可作证明，我同黄克诚谈过。

毛说：李立三多高多大，你不知道，我是知道的。华北局受长江局领导，听王明的话。高饶事陷得很深。纠“左”比纠右难吗？第二次王明路线，高岗死了，王明至今不认错。纠正铁托容易？整右容易？请包整王明。高饶能改？右倾联系资产阶级，“左”倾联系小资产阶级。路线本身不能改，要让别人来改。几次路线都摇摆，心里恨得要死，由于挨了整。今后也很难说。（彭插话：61岁了！）

以下又讲了一段“大跃进”的过程。说气可鼓不可泄，人而

无气不知其可也。说主要是一平二调，三收款只两个亿；搞平均主义，无非想早一点进入共产主义。说过食堂留一半、三分之一也好的话（吴芝圃是百分之百），这对右派也给了些影响。到郑州，以为我是不办食堂之人。食堂无可厚非。平江一个大队书记下令解散，第二天群众自动集合办起来。赫鲁晓夫很不喜欢公社，总有一天给张楼梯让下来。物质基础，西欧雄厚，波兰、东欧也不错，但办食堂、公社难。我们物质条件就是人，要组织起来。物质条件好，不出政治觉悟。中国东部几亿人，土地少，组织合作化较易。苏联地广人稀，如入无人之境。

北戴河高兴中埋伏了不高兴。比例问题，今年5月已解决。原来谈19个问题，未提反右倾。北京就有人越落越低、气越泄。彭的信和《会议纪要》，很有功劳。小舟等人主要锋芒对着除自己人以外庐山会议所有的人，要发牢骚，要出气，要讲失调原因，被插了白旗。（小舟插话：并非出气问题。）谁笑到最后，谁笑得最好。

随后对彭说：我同你的关系，合作，不合作，三七开，融洽三成，搞不来七成，31年，是否如此？

彭说：政治与感情，你结成一体，我没达到此程度。跟不上、掉队远，这种分歧多。立三路线自己是动摇的。许多历史事件，一生无笔记，文件全烧了。然后谈湘鄂赣历史，一、三军团问题。在平江时有人问，何时革命胜利？我说等胡子白了总要胜利，因而挨斗。对立三路线并不那样坚决，但也没反对。谈富田事变。张辉瓒搞反革命布告（打倒毛，拥护朱彭黄）。主席过去曾送我两本书：《左派幼稚病》、《两个策略》，批语还记得，一直带在身边。（这一段话是不同意三七开）接着谈到抗战时期。毛说：蒋介石十年，打红了眼；抗日一来，忽然漂亮了。这是暂时的朋友，不久以后的敌人。（林彪插话，谈平型关吃了亏，头脑发热，说是弼时作的决定。批评百团大战是大战观念。）彭谈百

团大战的过程，怎样逐步扩大；战后才搞武工队，对以后整伪军也有好处。谈到“张飞”的外号是毛取的。说自己对敌斗争是坚决的。马克思主义没学通，但盲从也不行。“我有农民无政府思想，叫‘主席’都不习惯。在北京打过八九次电话，找不到，面谈机会少，得不到具体帮助。养成孤僻性格，无事不上三宝殿。”然后谈到同毛的关系是对半开，毛则坚持三七开。两人相持不下。毛强调，多次重要时期，从没有写过信，为什么这次要上万言书，责备彭背后议论。“我同常委之间、同别人，从来没讲过你什么。为了使你安心工作，给林彪发转业费。”之后又回过来谈1958年，谈到抗美援朝时同朝鲜领导人的关系。最后谈到《内参》不可不看，决不可尽信。《内参》是专搞黑暗的。彭最后表示三条：不反革命，不自杀，可以去作田。

8月1日晚上开大会，总理通知“问题不少”，即右倾机会主义，怀疑、动摇总路线；向党、向中央、向主席进攻，打着所谓无产阶级旗帜，向所谓“小资产阶级狂热性”进攻，这一切有思想根源，有体系，有活动；彭的信起了反面教材作用，等等。

8月2日召开中央全会。毛长篇讲话，动员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猖狂进攻。八大二次会议定的路线究竟对不对？起初神仙会，并无紧张局势，有些同志要求民主，感到说话不自由，有压力。后来才了解，他们要求点紧张形势，要言论自由，想攻击、破坏总路线，要破坏、批评总路线的自由。重点在去年是否工作基本做坏了？1957年要求大民主、大鸣大放，看来是这么回事。社会主义之命运由我们掌握，应该团结，现在有分裂倾向。对犯错误的同志，经过批评、斗争，达到团结。一看二帮，还是有希望的。无非改或不能改。立三路线、王明路线，一时跑到那方面，形势有利，经过说明，可以过来。在延安时，洛甫开始不承认是路线错误；《两条路线》书一出来，就承认了。这回旧病复发，向楚太子大喊一声，有病要治呀！寄生虫作怪，可潜伏，气

候适宜就出来了。上山原来总结三句话，后来就在“问题不少”上发生问题。同时改换题目：右倾机会主义向党猖狂进攻问题。

8月3日起，到会162名中央委员分成三个大组，批斗彭德怀、黄克诚和张闻天、周小舟（和张一组）四同志。斗争自然是激烈的，无限上纲上线。一直开到8月10日。我参加彭总这组。康生尤其激昂慷慨。也听到这样的发言：你们搞俱乐部，搞阴谋活动；我们也有一个俱乐部，搞革命活动。

这个期间毛批发了好几个文件。如关于安徽省委书记张恺帆解散无为县公社食堂的批语：我怀疑这些人是混入党的投机分子。站在资产阶级立场，蓄谋破坏无产阶级专政，分裂共产党，在党内组织派别，另立他们机会主义的党。这个集团（军事俱乐部）的主要成分，原是高岗叛党集团的重要成员。漏网残余又在兴风作浪，迫不及待，急于发难。要挽救他们，就要进行彻底揭发，使他们的市场缩得小而又小。张恺帆就这样被打成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

8月10日，我被调到黄克诚组去对证一个问题。结果，7月23日夜二周与我在黄处的谈话，有关斯大林晚年的议论被揭发出来，这就使斗争更火上加油，白热化起来。

8月11日开全体大会，毛长篇讲话，从世界观方法论讲起。说历来犯错误的是唯我主义、极端主义、唯心主义。三十几年，阶级立场没有变过来，总是格格不入。这些同志不是马克思主义，而是以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资格参加党。经验主义、教条主义都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同党员称号不符，是无产阶级革命的敌人。纠“左”比纠右难？历史经验证明：陈独秀、罗章龙、张国焘、高岗哪里去了？骂人民公社，是地富反坏骂，兄弟国家怀疑。对“大跃进”，内外怀疑。指标搞高了，只要略有增产，农业有无一成？一成就是跃进。可能三成，还得了。

高饶事件，有的保护过关，实是彭高联盟。庐山两种气候，

好得很。另一种是同罗隆基接近，政治上一贯右倾机会主义，这次挂帅，组织派别，进行分裂活动。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有问题，其实是鸡毛蒜皮。共产风、浮夸风吹遍全国，至少国防部、外交部、湖南省三地未吹遍。浮夸风吹一吹极有好处，总要吹的，这一切是好东西，大可教育全党全民。然后又讲哲学，讲必须政治挂帅。“自由、平等、博爱”（这时特别从北京调来当年彭在太行写的文章），根本不懂马列主义。

第一书记挂帅，实在讨厌，我却高兴；你挂帅，不如我挂。只要大家通过，一朝权在手，就把令来行。集体领导要不要？赫鲁晓夫强调的。有无集体领导？有无民主言论自由？这次要求民主，要求集体领导，鼻子不灵，头两周不灵。庐山两个司令部。这次满足同志们要求，不能我一个人说了算。以后一个月开一次中央全会都干，天天开，免得老说没有民主，个人独裁。你那个军委会有无民主集中制？现在攻击不民主自由，他们要搞政治挂帅，搞小跃进、不跃进。（延安）华北座谈会操40天娘，操20天不成，这次满足40天，加五天，听你操，满足操娘欲望。现在要求民主自由，同章罗联盟一个性质。资产阶级有了民主、自由、博爱，无产阶级就无反资产阶级的民主、自由、博爱！你讲我搞阴谋，就大鱼、小鱼、吃人鲨鱼一起钓（23日夜，我讲过钓鱼问题）。

想把秀才们挖去，不要妄想，秀才是我们的人。李锐不是秀才，是俱乐部的人。（听到这里，我倒放心了，知道田家英等不致受牵连。）周惠挨了边，小舟不交心。

我怎么180度转变？（这是小舟讲的）我是蝙蝠，开头属俱乐部，7月23日是转变了。臭屁、香屁都放，通通让人讲话。估计有两重性：革命、反对，完全不革命不合乎事实。彭同许多人合作，不单反对我，七个政治局委员，有几个合得来？十个元帅，九个合不来。大将、上将有几个合作？从不提团结口号。

31年关系，难道庐山就分手？不应当分手。欢迎最近几天同志们进步。

8月13日至15日，开全体大会，彭、黄、张、周作检查，大家批评，当然进一步加码，尤其逼彭承认是老野心家、阴谋家、伪君子；要定性质：是魏延、冯玉祥、纳吉、铁托。（说实在的，这十多天会，我的心理状态极复杂，产生一种很悲观的情绪：这是中央委员会，竟没有一个敢讲半句公道话。）

8月16日开大会，通过决议，毛泽东再作长篇讲话。开首说，庐山会议解决了大问题，总结经验就要这样总结。19个问题变成第二位了，犯错误同志帮了大忙。之后说彭德怀犯过五次路线错误，依历史顺序又算了总账：没有社会主义革命的精神准备。接着谈海瑞问题，说海瑞历来是左派。我提倡海瑞，又不喜欢海瑞。彭黄问题带复杂性、曲折性。昨日还是功臣，今天变成祸首。人们不理解，由于不了解历史变化，不知道他们历史的复杂和曲折。这次大会打了防疫针。大家要对他们做工作，要往来，采取热情帮助态度，要开团结大会，要看作是我们的同志，帮助他们改正。最后还谈到，估计70%的右派可以争取过来。牛训练三年才耕田，岂可人而不如牛乎？刘仁静现在当翻译，要给人出路嘛！立三也改了。（林彪最后插话：这次会，避免了大马鞍形，避免了分裂。）

关于庐山会议，《机关枪和迫击炮的来历及其他》的文本，则这样定性：“庐山出现的这一场斗争，是一场阶级斗争，是过去10年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两大对抗阶级的生死斗争的继续。在中国，在我党，这一类斗争，看来还得斗下去，至少还要斗20年，可能要斗半个世纪，总之要到阶级完全灭亡，斗争才会止息。”

上面就我的记录本，将1959年庐山会议的情况，作了一个概述。特别是将毛的几次讲话、谈话要点录下，以便了解会议和

毛在山上思想变化的过程。回头看这段史实，试作如下总结：

1. 上山之初，毛泽东迫于形势，准备继续纠一下“左”，只认识到是局部问题：农村已调整得差不多（还要保食堂），工业再调整一下指标之类，形势就可以很快好转起来，丝毫没有认输。因此，是开神仙会，有闲情赋诗，开十来天，讨论好若干问题，通过一个《纪要》。

2. 对问题认识的深度虽不同，但当时头脑清醒的人包括大区负责人是多数。不仅彭总、少奇、朱总都发了言，表了态，总理直到7月23日前，一直召集国务院各部领导开会，算细账，抓调整。问题从何发生的呢？就在从毛主席起，大体还是有这么一部分人（主要是当时挂帅的柯庆施等）并不服输，还是要鼓足干劲，强调气可鼓不可泄（认为落实指标即泄了气）；大体还是这一部分人又犯阿Q之病：触动不得，一触即跳，过于护短，过于保护自己，“人为财死”。毛当然要靠诸侯，不能靠秀才。

3. 彭德怀是刚直的人，讲话直率，“有张飞之粗，无张飞之细”，有些话听者有心（伤了人），又有所谓历史旧账。那些进谗言邀宠之人（其中有阿Q们），加油添醋，渲染上纲，说“人都被彭德怀拉过去了”。于是毛沉不住气，主观武断为是“反毛”，是“魏延反骨”作怪，要“搞分裂”，组织“章罗联盟”（这也是老虎屁股摸不得）。也许还有这样一种因素：凡属反对过自己的人，又不转变为百依百顺，一遇到机会，就不惜当场廷杖，乃至“昨日功臣，今朝祸首”。

4. 军权不能旁落。机不可失，调林彪上山。林彪看似讲话不多，也没有在大会上张牙舞爪，慷慨陈词，但三言两语，起了定调的作用，有“护驾”之功。

5. 当然，在这场惊心动魄、关系党和国家历史命运的大斗争中，有一批风派人物，也起了不好的作用，不过这是次要因素。

6. 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理论与实践，在庐山会议时，毛泽东就已经有了一整套“左”倾的东西。“矛盾和斗争是永远的，否则不成其为世界。无产阶级的政治学说，共产党的哲学就是斗争哲学。”在他的这种哲学思想的自我支配下，七年以后的“文化大革命”自是历史的必然产物了。

（李锐：《庐山会议始末》）

关于庐山会议前后的情况

庐山会议前中央召开的两次郑州会议、武昌会议、上海会议，我参加的情况：

两次郑州会议我只参加了一次。这次郑州会议，由于收到通知较晚，只参加了会议的最后一天。那次会议是某天黄昏后在火车上召开的，会上是毛主席讲话，其大意是反对“共产风”。因为到会者取得了一致的认识，所以会议时间不长即散。我同意主席的意见，并未提出其他意见。

武昌会议时，我参加了西北小组。在小组讨论公布 1958 年的粮棉数字时，有的同志说，粮食有 1 万亿斤以上；有的同志说，粮食有 9000 亿斤，棉花有六七千万担；也有的同志说，粮食要多少有多少，现在是工业大大落后于农业。我说粮食没有那么多。当时有的同志对我提出了客气的批评，他说：“老总呀！你这也怀疑，那也怀疑，怎么办呢？”我说：“公布的数字少些，将来追加数字，比较主动；公布数字多了，将来被动。”后来主席说公布 7500 亿斤，我当时同意了，但心中对此数还是有怀疑的。

会议闭幕后，我先到了湘潭县的乌石、韶山两公社，后又到了平江县。这几处给我的印象是实际收获的粮食数字没有公布的数字那样多。其根据：由于劳动力不足，没有收获好；有些地区又多吃了一些粮食。在平江展览馆参观时，发现将两个年度的生产数字颠倒公布了，即将 1957 年高产数字公布为 1958 年的生产数字，而将 1958 年的较低数字公布为 1957 年的生产数字。这样

的造假数字，真是令人可怕的。

回到株洲市，恰与薄一波同志相遇，当谈到粮食数字时，我说：“实产粮食数字可能没有估计的那样多，今年征购 1200 亿斤粮食是很勉强的。如果征购了过头粮，不仅将来返运困难，而且会影响农民的生产情绪。估计征购 900 亿斤为宜。”薄一波同志说：“你给中央打个电报。”我说：“请你写吧。”后来还是用我的名字写了一个电报，说明不能征购 1200 亿斤，只能征购 900 亿斤。这个电报妥当与否，应由我个人负责。但是可以看出，我的怀疑观点，是没有隐瞒下来的。

上海会议时（1959 年 4 月），正值西藏发生叛乱，当时我把主要精力放在进军西藏的一些事务性工作上了，因此，对其他问题没有提意见。

我在 1959 年 5 月访问了东欧各国，6 月中旬回到北京。第二天到国防部办公楼，听了黄克诚关于国内情况的说明。山东菏泽地区的粮荒情况，比我出国时要稍微缓和些。4 月开上海会议时，甘肃还说是余粮省，现在已成为严重的缺粮省，运输力缺乏，运粮进去也不容易。我问：“军队中还可抽出一部分运输力吗？”黄说：“凡能抽出的已全部抽去了，海军舰只抽了一部分到重庆帮助运粮，空军也抽出了一部分，如再抽调要影响备战。现在油的储备也有问题。”黄说：“西藏平乱，虽已胜利，但运输车辆还不能减少。”他在谈话时，有些为难的表情。我说：“还是想办法抽出一部分运输力来帮助地方。”我说：“东欧各兄弟国家人民，对中国很热情，各国领导对西藏叛乱是很关心的。”我又说，7 月 1 日中央在庐山召集工作会议，我现在很疲劳，想休息一下。庐山会议请你参加，因你是书记处书记，地方和军队情况都比较熟悉。他说，庐山会议还是你自己去的好。他愿留在军委管家。我就只好自己去，未便过于勉强。

6 月 29 日在武汉乘轮船到庐山，7 月 1 日休息 1 天，2 日开

会。毛主席概述了形势，大体是：成绩伟大，问题不少，前途光明。中央办公厅所发材料不少。我编入西北小组，几乎每次会都去出席，约十次。参加国务院两次会是讨论计划工作；参加了中央常委会一两次，其他任何地方都未去。

周小舟来我处谈过两次。第一次谈了湖南工业情况，他说，过去湖南没有重工业基础，现有钢铁厂、电机制造厂、机械厂等；轻工业有很大发展；水利建设成绩也很大，平均40天不下雨，还可保收。约谈了数十分钟，吃午饭去了。过了两天，周小舟第二次来谈，他说去年粮食造了假！我说：“为什么呢？”他说：“是压出来的。一次说粮食数字不落实，第二次又说不能落实，连造了几次数字，下面干部就摸了一个底——要虚报不要实报。”我说：“只能是有多少报多少，决不能虚报也不能少报。”他又说：“现在吃大锅饭（公共食堂），就要大锅大灶，烧柴火也不节省，劳力也不节省；小锅小灶，妇女、弱劳力都可以煮饭，现在非强劳动力不可。搞了公共食堂，家庭用水也不方便，群众对公共食堂有意见。”我说：“这些问题，你应当如实地向主席反映。”周说：“昨天向主席谈了一些。”他希望我有机会同主席谈谈，向主席反映一些具体情况。我说：“军队方面也常反映一些社会情况，我都送给主席看。”他说：“主席能看到吗？”我说：“能看到。”

张闻天住在我隔墙院子，一出门就见到，谈的次数多些。多在散步时，随便谈谈。时间久了，已记不清楚，大概谈及几件主要的事情：小土炉炼铁是得不偿失。我说，炼土铁是有得有失（后来我给主席信，别人抄错变为有失有得）。张说：“你的估价还比较高。”张说：“要很好学习历史，毛主席从中国历史中学了很多东西。”我说：“在党内真正懂得中国历史的还只有毛主席一人。”我表示会议后要认真学习政治经济学，认为斯大林解决了社会主义经济法则问题，但没有正确解决人民内部矛盾，在这个

问题上，是犯有错误的。毛主席解决了这个大问题，把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分析得很清楚。这进一步巩固了无产阶级专政，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列主义。

以上是在庐山会议期间、7月10日前后和周小舟、张闻天谈的大致内容。此时，黄克诚还未去庐山。

1959年7月庐山会议初期，我参加了西北小组。7月2日开幕以后，从7月3日到10日的8天中，我在小组会上共有7次发言（或者插话）。这些都在会议时期中央办公厅的简报上陆续印发给到会同志。7月23日上午，主席对我7月14日信批判以后，西北小组又将我在小组会上的发言（或插话）几经校对，集中印发给到会同志。

从这些事实中可以看出，在我给主席写信以前，并不是一言不发，而是在言词中表露了对某些“左”的现象不满，这才是事实。

从7月1日起，除参加会议外，就是坐在室内看中央部门有关财经的文件、群众来信、会议简报。到7月12日晚，在我的思想上已形成目前国家计划工作严重比例失调，毛主席的两条腿走路的方针没有贯彻到各方面实际工作中去的看法。这也就是我7月14日那封信的主要内容。本决定13日晨向主席反映。去时，警卫员说，主席刚睡。我就去西北小组参加会议去了。13日晚饭后，就开始写那封信（实际上，7月12日晚腹稿已成），7月14日晨将写成的信，送给主席亲收。16日中央办公厅印发出来了，我于18日参加小组会时，我说明这封信只是写给主席个人参考的，请求中央办公厅收回我这封信。可是20日前后，张闻天、周小舟还有其他人发了言，都说基本上同意我那封信，黄克诚18号晚或19号晚才到庐山的。他在小组会上的发言，我未看到。毛主席于7月23日上午批判了我那封信是反党性质的纲领，说在写这封信之前，就有人发言支持，形成有唱有和，这

不是反党集团又是什么呢？自主席批判了我那封信以后，会议的空气就变了，我的情绪也是紧张的。

为了表白我当时写信的动机和愿望，故在这里再次把我对当时国内形势及对当时一些具体问题的观点说明一下（成绩就不详细谈了）。

我对当时国内形势的看法：我认为当时是处于大好形势之下。1958年，全国人民在党的领导下，在总路线的光照耀下，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大跃进运动，人民公社在各地陆续组成。大跃进运动的广泛掀起，和人民公社这一组织形式，都是符合人民利益的，是与我国人民为迅速摆脱“一穷二白”的愿望相适应的。这些总的大好形势，给了我们在执行总路线、巩固人民公社和持续大跃进方面，都创造了有利的条件。但是，是不是在当时就没有什么问题呢？不是。而相对的在某些地区，或某些具体政策上，是存在着严重的缺点或错误的。在庐山会议时，我所写的信，是起源于这些问题。

首先，我当时对计划工作是有意见的。认为1958年基本建设项目过多过急，不少工厂返工和窝工，分散了资金，致使必成项目推迟，而形成了原材料紧张。1959年并没有加以控制，而盲目地继续扩大基本建设。在发展钢铁工业上，也有一定的片面性：注重了加工工业及材料工业的建设和发展，而相对的忽视了原料工业。原料工业是材料工业和加工工业的基础，如果基础不巩固，就会影响加工工业的发展。对于这个问题，我在7月14日给主席的信上，举出了一系列的例子，如：没有认真研究炼钢、轧钢及碎石设备和煤炭、矿石、炼焦设备；对于坑木来源、运输能力和劳动力增加、购买力扩大以及市场商品安排，等等，也注意得不够。总之，是没有必要的平衡计划。我当时认为，在计划工作方面的不够实事求是，是产生一系列问题的起因。我当时也顾虑，对1958年和1959年上半年的一些基本建设项目，不

下最大决心暂时停止，会要延长比例失调（主要是农业远远地落后于工业），某些被动局面就难以摆脱，将会直接妨碍四年赶英或超英的跃进速度。在给主席的信中，我也提到“国家计委虽有安排，但因各种原因，难于决断”。我当时认为有四个难于决断的原因：一是地方要求多快；二是政府各部门要求多快；三是中央也希望多快；四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速度，还没有得出客观规律。斯大林同志对于苏联社会主义建设速度，摸索了约近 20 年才得出结论，即社会主义建设速度每年平均增长 13% ~ 14%。苏联五年计划，国民经济翻一番，每年即递增 14.87%。我国情况，比苏联当时的情况有所不同。首先我们人力比他们多；其二是国际环境比较好；但是我们的工业基础是比较差的。根据具体条件的比较，我国的建设速度可能会快些。但是究竟快多少呢？如果四年翻一番，每年要递增 18.93%；如果三年翻一番，每年要递增 26%。我当时想，我们四年翻一番，争取三年半完成，因无经验，没有提出来。我总觉得，计划工作没有一个年度标准是不好作的，容易产生冒进或保守现象，只好检讨再检讨。我在给主席的信中，批评计划工作就占了信的一半，只有“国家计委虽有安排，但因各种原因，难于决断”这句话，是原谅计委的。

我认为，在农业方面也要有一个标准为宜。从解放以来，在现有条件下，平均每年能够增长 7% 就算不错了。至于将来农业机械、水利、肥料条件改善和加强后，那时肯定会快得多。从解放后，我国农业每 3 年中就有丰年 1 年，平年 1 年，歉年 1 年。1952 年是丰年，1953 年是平年，1954 年是歉年；又 1955 年是丰年，1956 年是平年，1957 年是歉年。过去是以丰补歉。1958 年是一个特大丰年，但由于好多地区收获得不好和保管得不好，也有些地区发生多吃和其他浪费现象，不但国家库存没有增加，反而减少了。如果过去的自然气候是带有规律性的，那么 1959 年就是平年，1960 年是歉年。1958 年秋有 9000 万人炼铁，1959

年继续 7000 万人大搞水利建设，这对长远利益来讲，当然是有好处的，但对当年的农业生产来讲，是有些不适应的。再加上各方面一齐有几个“大办”，这就势必造成农业缺乏劳动力，而直接影响农业增产，又进而影响到一些工业、轻工业的原料来源和副食品的供应。

在当时对小土群炼铁问题的议论，有三种意见：一是有损无益；二是得不偿失；三是有得有失。我是第三种看法，反对前两种看法。

当时，在贸易政策方面，我对“内销服从外贸”，也是有不同看法的。出口过多，就会引起国内市场紧张，将影响货币回笼和财政收入，也就会影响大跃进。

那时我把这些概括起来为“现时我们在建设工作中所面临的突出矛盾，是由于比例失调而引起各方面的紧张。就其性质来看，这种情况的发展，已经影响到工、农之间，城市各阶层之间，以及农民各阶层之间的关系，因此也是具有政治性的。是我们今后动员广大群众继续实现跃进的关键所在”。

在那个时期，有许多地区的领导同志，滋长了思想方法上的主观主义，有时他们把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长远的战略性的任务，错误地作为当时的行动口号。在某项工作任务中，缺乏认真研究具体条件，凭自己的主观愿望作决定。有时中央下达了任务，他们层层加码。甚至流传了一些纯主观主义口号，如“人有多大的胆，地就有多大的产”；“左比右好，左是方法问题，右是立场问题”。当然，这些错误说法，他们是不会直接讲给主席等领导同志听的。我认为，这种作法和说法，实际上是在破坏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在农村劳动力的组织方面，有许多地区过分强调大兵团作战，不按照强弱劳动力相互搭配，反而实行强弱分别组织。这样组织劳动力，是不适合我国现阶段农村生产技术水平的。

在当时，某些地区严重地刮起了几股黑风——共产风、浮夸风、强迫命令风。有相当数量的基层干部（其他各级干部也有不少），把才组织起来的人民公社，误当作共产主义已经来临，把大批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盲目地集中起来，实行所谓“共产主义”；新居民点还没有建立起来，就盲目地拆房子和砍伐树木、竹林。有不少农户怕“共产”，就低价变卖家产。有些干部为了表白自己的工作成绩，就无限制地上报“卫星”数字。本来产量不高，而报上去的数字很高。如果这些数字堆集在一起，那真是令人可怕！这种现象的产生，不能说与某些领导部门要求的任务过重无关。许多基层干部，为了放更高的卫星或完成上一级交给他的层层加码下来的生产指标，便采取了强迫命令的手段。有的地区打人竟成了风气，完不成任务打，出工迟到也打，说话不好听也有挨打的。在劳动生产中，有些地区不照顾妇女生理特点的现象也很严重，致使不少妇女发生子宫下垂和停经的疾病。这些风气，在1958年12月我至乌石、平江等地时，给我的印象尤为深刻。因为有不少农民到我处申诉、告状。由于这些黑风在某些地区刮起，直接影响了我党基层组织在那些地区群众中的威信，使中央领导同志在那些地区的威信也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损失，更严重的是影响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我把这些问题概括为浮夸风、“小资产阶级狂热性”、强迫命令等。这些问题，在庐山会议初期，到会同志并没有倾心地谈出来。鉴于以上这些情况，就促使了我给主席写信的念头。

7月23日对我是一个严重的考验

1959年7月14日我写给主席的那封信，主要是将我在西北小组会上不便讲的一些问题，提要式地写给主席。这些问题是涉及到执行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一些具体政策问题，以及

某些干部的工作方法问题。在这些问题上，我当时认为主要是产生了一些“左”的现象，而右的保守思想也有，但那只是个别的或者是极少数的。我当时对那些“左”的现象是非常忧虑的。我认为当时那些问题如果得不到纠正，计划工作迎头赶不上去，势必影响国民经济的发展速度。我想，这些问题如果由我在会议上提出来，会引起某些人的思想混乱，如果是由主席再重新提一提两条腿走路的方针，这些问题就可以轻而易举地得到纠正。正如在1958年秋，人民公社刚成立不久，曾有一些人对于人民公社的所有制问题和按劳分配原则问题在认识上有些模糊，但是经过主席的开导，那个问题很快得到了纠正。既纠正了偏差，又没有伤害同志们的积极性，我对此非常满意。所以我7月14日给主席写信的目的，就是为了尽早地纠正当时存在的那些问题，也正是为了维护总路线、大跃进和巩固人民公社，并没有什么“阴谋篡党”、“反对毛泽东同志”的目的。那封信，只概括地提出了几个比较突出的问题，并没有论述那些问题产生的原因，同时我也论述不出许多的原因，我想，横直是写给主席自己作参考的信，他会斟酌的。

可是，事与愿违。在7月17日上午就收到了中央办公厅对那封信的印发本，并在起头加了一个大字标题——“彭德怀同志的意见书”。7月18日，在小组会上我就要求收回这封信，申明这封信是仓促写成的，而没有完全写明意思。7月23日上午，主席在大会上讲话，从高度原则上批判了那封信，说它是一个右倾机会主义的纲领；是有计划的、有组织的、有目的的。并且指出我犯了军阀主义、大国主义和几次路线上的错误。听了主席的讲话，当时很难用言语形容出我沉重的心情。回到住所以后，反复思索主席的讲话，再衡量自己的主观愿望与动机，怎么也是想不通。当时抵触情绪很大。

当日黄昏，我带着沉重的心情在马路上散步时，迎面碰见了

一个同志，他叫了声：“老彭，今天上午主席的讲话，考虑好了没有？”我说：“是非曲直由人断，事久自然明吧。”他很严肃地说：“老彭，不能采取满不在乎的态度，主席午前讲话，从政治上、组织上、路线上，已经提到了高度原则，你应当考虑对党对人民如何有利的问题，写成书面发言。”我说：“现在很疲劳，一时写不出来，也写不清楚。”他说：“你讲意思，叫秘书记录并加以整理，然后你自己再去斟酌，这样比较严密，也比较深刻些。”我说：“没带秘书，只带来一个管军事电报的大尉参谋，他写不了这类文章。”我知道他说的话是好意，是从人民利益出发的，即别而归。

回到住所后，参谋同志送来军委转西藏军区电报，是要求增派运输车辆。即拿着电报想同黄克诚同志商量一下。推开黄的门时，听到黄克诚同志说：“你们不要激动，事情会弄清楚的，主席是不会错的。”我进到黄的室内时，见到在座的有周小舟、周惠、李锐三人。周小舟同志即对我说：“老总呀！我们离右派只有50步了。”我说，50步也不要着急，把一些模糊观点弄清楚也是好的。仅停片刻，没有谈及别的，我即回自己办公室去处理电报。当晚，怎么也睡不着，直至天晓还在想：我的信是给主席作参考的，为什么成了意见书呢？为什么能成为右倾机会主义的纲领呢？为什么说是有计划、有组织、有目的呢？那位同志的话虽对，但怎样才是对党对人民有利呢？是保留自己的看法呢，还是作检讨呢？总之，有一系列的问号在我脑子里盘旋着。甚至产生了一种埋怨情绪，想：我虽然认识主席时间比较晚，可是也有30余年了，我这信有如此严重的错误，为什么不可以找我谈一谈呢？同时也考虑到，我党中央坚持反对帝国主义和现代修正主义，并积极支援国际上的民主、民族解放运动。如果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中央的威信受到了损失，那就会给国际无产阶级运动带来更大损失。想到这里，我动摇了原先保留看法的念

头。

第二天，即24日上午，有两个同志来到我处。问我考虑好了没有？我说，我写给主席的信，是根据国内某些具体情况和庐山会议的情况写的，并没有什么准备和怀有什么阴谋目的。他们又问我写信事先同其他同志交换过意见没有？我说：“除周小舟同志有两次到我处谈了些湖南省的具体工作情况，我给他说我准备写封信（没谈内容）给主席以外，没有同其他同志提起过。张闻天同志有几次来我处谈了些带全国性的经济建设工作，并没谈写信的问题。”他们又说：“不能单从信的方面来看，而要从如何对全局有利着想。”他们并以热情和激动的心情谈到，“要抛开信的本身，从全局利益来作检讨。”谈了两个多小时，热泪盈眶而别，感人至深。我非常感激他们对我的帮助，决心从严检讨自己。

但是，在会议发展的过程中，我采取了要什么就给什么的态度，只要不损害党和人民的利益就行，而对自己的错误作了一些不合事实的夸大检讨。唯有所谓“军事俱乐部”的问题，我坚持了实事求是的原则。对于这个问题，在庐山会议期间，就有追逼现象，特别以后在北京召开的军委扩大会议时期（8月下旬至9月上旬），这种现象尤为严重。不供出所谓“军事俱乐部”的组织、纲领、目的、名单，就给加上不老实、不坦白、狡猾等罪名。有一次，我在军委扩大会议上作检讨时，有一小批同志大呼口号：“你快交代呀！”“不要再欺骗我们了！”逼得我当时气极了，我说：“开除我的党籍，拿我去枪毙了罢！你们哪一个是‘军事俱乐部’的成员，就自己来报名罢！”有几个同志说我太顽固，太不严肃。其实，在庐山会议结束后，我就想把我在军队30年来的影响肃清、搞臭。这样作，对保障人民解放军在党的领导下的进一步的巩固，是有好处的。我就是持着这个态度，赶回北京来作检讨的。但是我不能乱供什么“军事俱乐部”的组

织、纲领、目的、名单等，那样作，会产生严重的后果。我只能毁灭自己，决不能损害党所领导的人民军队。

（彭德怀：《彭德怀自述》）

彭德怀同志于 1959年7月14日给毛主席的信

主席：

这次庐山会议是重要的。我在西北小组有几次插言，在小组会还没有讲完的一些意见，特写给你作参考。但我这个简单人类似张飞，确有其粗，而无其细。因此，是否有参考价值请斟酌。不妥之处，烦请指示。

甲、1958年大跃进的成绩是肯定无疑的。

根据国家计委几个核实后的指标来看，1958年较1957年工农业总产值增长了48.4%，其中工业增长了66.1%，农副业增长了25%（粮棉增产30%是肯定的），国家财政收入增长了43.5%。这样的增长速度，是世界各国从未有过的。突破了社会主义建设速度的成规，特别是像我国经济基础薄弱，技术设备落后，通过大跃进，基本上证实了多快好省的总路线是正确的。不仅是我国伟大的成就，在社会主义阵营也将长期的起积极作用。

1958年的基本建设，现在看来有些项目是过急过多了一些，分散了一部分资金，推迟了一部分必成项目，这是一个缺点。基本原因是缺乏经验，对这点体会不深，认识过迟。因此，1959年就不仅没有把步伐放慢一点，加以适当控制，而且继续大跃进，这就使不平衡现象没有得到及时调整，增加了新的暂时困难。但这些建设，终究是国家建设所需要的，在今后一两年内或者稍许长一点时间，就会逐步收到效益的。现在还有一些缺门和薄弱环节，致使生产不能成套，有些物资缺乏十分必要的储备，

使发生了失调现象和出现新的不平衡就难以及时调整，这就是当前困难的所在。因此，在安排明年度（1960年）计划时，更应当放在实事求是和稳妥可靠的基础上，加以认真考虑。对1958年和1959年上半年有些基本建设项目实在无法完成的，也必须下最大决心暂时停止，在这方面必须有所舍，才能有所取，否则严重失调现象将要延长，某些方面的被动局面难以摆脱，将妨碍今后四年赶英和超英的跃进速度。国家计委虽有安排，但因各种原因难以决断。

1958年农村公社化，是具有伟大意义的，这不仅使我国农民将彻底摆脱穷困，而且是加速建成社会主义走向共产主义的正确途径。虽然在所有制问题上，曾有一段混乱，具体工作中出现了一些缺点错误，这当然是严重的现象。但是经过武昌、郑州、上海等一系列会议，基本已经得到纠正，混乱情况基本上已经过去，已经逐步的走上按劳分配的正常轨道。

在1958年大跃进中，解决了失业问题，在我们这样人口众多的、经济落后的国度里，能够迅速得到解决，不是小事，而是大事。

在全民炼钢铁中，多办了一些小土高炉，浪费了一些资源（物力、财力）和人力，当然是一笔较大损失。但是得到对全国地质作了一次规模巨大的初步普查，培养了不少技术人员，广大干部在这一运动中得到了锻炼和提高。虽然付出了一笔学费（贴补20余亿），即在这一方面也是有失有得的。

仅从上述几点来看，成绩确是伟大的。但也有不少深刻的经验教训，认真地加以分析，是必要的有益的。

乙、如何总结工作中的经验教训：

这次会议，到会同志都正在探讨去年以来工作中的经验教训，并且提出了不少有益的意见。通过这次讨论，将会使我们党的工作得到极大好处，变某些方面的被动为主动，进一步体会社

会主义经济法则，使经常存在着的不平衡现象，得到及时调整，正确的认识“积极平衡”的意义。

据我看，1958年大跃进中所出现的一些缺点错误，有一些是难以避免的。如同我们党30多年来领导历次革命运动一样，在伟大成绩中总是有缺点的，这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现时我们在建设工作中所面临的突出矛盾，是由于比例失调而引起各方面的紧张。就其性质看，这种情况的发展已影响到工农之间、城市各阶层之间和农民各阶层之间的关系，因此也是具有政治性的。是关系到我们今后动员广大群众继续实现跃进的关键所在。

过去一个时期工作中所出现的一些缺点错误，原因是多方面的。其客观因素是我们对社会主义建设工作不熟悉，没有完整的经验。对社会主义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规律体会不深，对两条腿走路的方针，没有贯彻到各方面的实际工作中去。我们在处理经济建设中的问题时，总还没有像处理炮击金门、平定西藏叛乱等政治问题那样得心应手。另一方面，客观形势是我国一穷（还有一部分人吃不饱饭，去年棉布平均每人还只18尺，可缝一套单衣和两条裤叉）二白的落后状态，人民迫切要求改变现状。其次是国际形势的有利趋势。这些也是促使我们大跃进的重要因素。利用这一有利时机，适应广大人民要求，加速我们的建设工作，尽快改变我们一穷二白的落后面貌，创造更为有利的国际局面，是完全必要和正确的。

过去一个时期，在我们的思想方法和工作作风方面，也暴露出不少值得注意的问题。这主要是：

1. 浮夸风气较普遍地滋长起来。去年北戴河会议时，对粮食产量估计过大，造成了一种假象。大家都感到粮食问题已经得到解决，因此就可以腾出手来大搞工业了。在对发展钢铁的认识上，有严重的片面性，没有认真地研究炼钢、轧钢和碎石设备，煤炭、矿石、炼焦设备，坑木来源，运输能力，劳动力增加，购

买力扩大，市场商品如何安排等等。总之，是没有必要的平衡计划。这些也同样是犯了不够实事求是的毛病。这恐怕是产生一系列问题的起因。浮夸风气，吹遍各地区各部门，一些不可置信的奇迹也见之于报刊，确使党的威信蒙受重大损失。当时从各方面的报告材料看，共产主义大有很快到来之势，使不少同志的脑子发起热来。在粮棉高产、钢铁加番的浪潮中，铺张浪费就随着发展起来，秋收粗糙，不计成本，把穷日子当富日子过。严重的是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不容易得到真实情况，直到武昌会议和今年一月省市书记会议时，仍然没有全部弄清形势真象。产生这种浮夸风气，是有其社会原因的，值得很好的研究。这也与我们有些工作只有任务指标，而缺乏具体措施是有关系的。虽然主席在去年就已经提示全党要把冲天干劲和科学分析结合起来，和两条腿走路的方针，看来是没有为多数领导同志所领会，我也是不例外的。

2. 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使我们容易犯左的错误。在1958年的大跃进中，我和其他不少同志一样，为大跃进的成绩和群众运动的热情所迷惑，一些左的倾向有了相当程度的发展，总想一步跨进共产主义，抢先思想一度占了上风；把党长期以来所形成的群众路线和实事求是作风置诸脑后了。在思想方法上，往往把战略性的布局和具体措施、长远性的方针和当前步骤、全体与局部、大集体与小集体等关系混淆起来。如主席提出的“少种、高产、多收”、“15年赶上英国”等号召，都是属于战略性、长远性的方针，我们则缺乏研究，不注意研究当前具体情况，把工作安排在积极而又稳妥可靠的基础上。有些指标逐级提高，层层加码，把本来需要几年或者十几年才能达到的要求，变成一年或者几个月就要做到的指标。因此就脱离了实际，得不到群众的支持。诸如过早否定等价交换法则，过早提出吃饭不要钱，某些地区认为粮食丰产了，一度取消统销政策，提倡放开肚皮吃，以及

某些技术不经鉴定就冒然推广，有些经济法则和科学规律轻易被否定等，都是一种左的倾向。在这些同志看来，只要提出政治挂帅，就可以代替一切，忘记了政治挂帅是提高劳动自觉、保证产品数量质量的提高，发挥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从而加速我们的经济建设。政治挂帅不可能代替经济法则，更不能代替经济工作中的具体措施。政治挂帅与经济工作中的确切有效措施，两者必须并重，不可偏重偏废。纠正这些左的现象，一般要比反掉右倾保守思想还要困难些，这是我们党的历史经验所证明了的。去年下半年，似乎出现了一种空气，注意了反右倾保守思想，而忽略了主观主义左的方面。经过去年冬郑州会议以后一系列措施，一些左的现象基本上纠正过来了，这是一个伟大的胜利。这个胜利既教育了全党同志，又没有损伤同志们的积极性。

现在对国内形势已基本上弄清楚了，特别是经过最近几次会议，党内大多数同志的认识已基本一致。目前的任务，就是全党团结一致，继续努力工作。我觉得，系统地总结一下我们去年下半年以来工作中的成绩和教训，进一步教育全党同志，甚有益处。其目的是要达到明辨是非，提高思想，一般的不去追究个人责任。反之，是不利于团结，不利于事业的。属于对社会主义建设的规律等问题的不熟悉方面，经过去年下半年以来的实践和探讨，有些问题是可以弄清楚的。有些问题再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摸索，也是可以学会的。属于思想方法和工作作风方面的问题，已经有了这次深刻教训，使我们较易觉醒和体会了。但要彻底克服，还是要经过一番艰苦努力的。正如主席在这次会议中所指示的：“成绩伟大，问题很多，经验丰富，前途光明。”主动在我，全党团结起来艰苦奋斗，继续跃进的条件是存在的。今年明年和今后4年计划必将胜利完成，15年赶上英国的奋斗目标，在今后4年内可以基本实现，某些重要产品也肯定可以超过英国。这就是我们伟大的成绩和光明的前途。

顺致
敬礼！

彭 德 怀
1959年7月14日

毛主席与彭德怀同志的谈话（摘录）

（1965年9月23日）彭德怀追记

主席：早在等着，还没有睡。昨天下午接到你的信，也高兴得睡不着，你这个人有个犟脾气，几年也不写信，要写就写8万字。今天还有少奇、小平、彭真同志，等一会就来参加，周总理因去接西哈努克，故不能来。我们一起谈谈吧！

现在要建设战略后方，准备战争。按比例西南投资最多，战略后方也特别重要，你去西南区是适当的。将来还可带一点兵去打仗，以便恢复名誉。

（在庐山会议时，主席问到对我的决议案如何，当时我向主席作了三条保证。）

主席问：那三条？（我说：在任何情况下不会做反革命；在任何情况下，不会自杀；今后工作是不好做了，劳动生产，自食其力。）

主席说：“后面两条我还记得，也许真理在你那边。战略后方最重要的是西南区，它有各种资源，地理也适宜，大有作为。彭德怀同志去也许会搞出一点名堂来。建立党的统一领导，成立建设总指挥部，李井泉为主，彭为副，还有程子华。”

彭去西南，这是党的政策，如有人不同意时，要他同我来谈。我过去反对彭德怀同志是积极的，现在要支持他也是诚心诚意的。对老彭的看法应当是一分为二，我自己也是这样。在立三路线时，三军团的干部反对过赣江，彭说要过赣江，一言为定，即过了赣江。在粉碎蒋介石的一、二、三次“围剿”时，我们合

作得很好。反革命的富田事变，写出了三封挑拨离间的假信，送给朱德、彭德怀和黄公略三人。彭立即派专人将此信送来，三军团前委会还开了会，发表了宣言，反对了富田事变。这件事处理得好。反对张国焘的分裂斗争也是坚定的。解放战争，在西北战场成绩也是肯定的，那么一点军队，打败国民党胡宗南等那样强大的军队，这件事使我经常想起来，在我的选集上，还保存你的名字。为什么一个人犯了错误，一定要否定一切呢？

主席继续说：你还是去西南吧！让少奇、小平同志召集西南区有关同志开一次会，把问题讲清楚，如果有人不同意，要他来找我谈。

（彭德怀：《彭德怀自述》）

正式通过调整方针： 八届九中全会

“大跃进”造成严重经济困难后，中共中央团结全党和全国人民，万众一心，为克服困难进行了不屈不挠、卓有成效的努力。1961年1月14日至18日召开的八届九中全会正式通过“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会上，毛泽东号召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

1961年1月14日至18日，中共中央在北京举行了八届九中全会。在此之前，1960年12月24日至1961年1月13日举行了中央工作会议，为九中全会的召开作了充分的准备。这一次中央全会，在这一历史阶段中具有转变的意义。

1月13日和18日，毛泽东在两个会议上作了重要讲话。中心的思想，是要求全党恢复党的实事求是传统，加强调查研究，搞一个实事求是年。

毛泽东总结近几年沉痛的教训提出，做工作要有三条：一要情况明，二要决心大，三是方法对。他说：这里情况明是第一条，这是一切的基础。情况不明一切都无从谈起，这就要搞调查研究。

他说：我们党有实事求是的传统，就是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跟中国实际相结合。过去抗日战争时期、解放战争时期，调查研究比较认真，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情况明了，决心就大，方法就对，解决问题的措施也较有力。这些年来，这种调查研究工

作不大作了。我们的同志不作调查研究工作，没有基础，没有底，凭感想和估计办事。只有正确的方针政策，但情况不明，决心不大，方法不对，还是等于零。郑州会议讲不能一平二调，方针是对的，说不算账，不退赔，这点不对。上海会议 18 条讲了要退赔。紧接着我批了浙江、麻城的经验报告。1959 年 3、4 月，我批了两万多字的东西，现在看来，光打笔墨官司，不那么顶用。他封锁你，你情况不明，有什么办法。那时省委地委的同志也不那么认识共产风的危害性。有的同志讲郑州会议是镇压，不是说服，思想还有距离，所以决心不大，搞的不够彻底。

他指出，近几年来不大了解情况，大概是官做大了，摸不摸底了。我这个人就是官做大了，从前在江西那样的调查研究，现在就做得少了。请同志们回去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一切从实际出发，没有把握，就不要下决心，调查研究这种事极为重要，要教会许多人。1961 年要成为调查研究年，搞一个实事求是年。

毛泽东还说，搞社会主义建设不能那么急，十分急搞不成，要波浪式前进。明后年，搞几年慢腾腾，搞扎实一些，然后再上去，指标不要搞那么高，把质量搞上去。不要务虚名而受实祸，要提高质量、规格、品种，提高管理水平，提高劳动生产率。要缩短工业战线，重工业战线，特别是基本建设战线。要延长农业战线，轻工业要发展。重工业除煤炭、矿山、木材、运输之外，不搞新的基本建设。

1958 年以来“大跃进”遭到惨重失败，归根到底是主观脱离了客观、思想脱离了实际。错误是从思想路线不端正犯起的，要纠正错误、克服困难，也必须首先从端正思想路线入手。毛泽东重新倡导调查研究、实事求是，是这个时期工作重要转变的开始。

1 月 14 日，全会听取和讨论了李富春《关于安排 1961 年国民经济计划的意见》的报告。李富春报告了 1960 年国民经济计

划完成的情况，指出了存在的困难和问题：农业许多产品都减产了；3年连续大跃进产生了新的不平衡，特别是工业和农业之间的不平衡；没有认真贯彻以农业为基础的方针，某些计划指标定得偏高，基本建设战线拉得太长；有些权力下放得偏多过下，有些制度破而未立，有些制度没有严格执行；思想方法上有主观片面性，工作作风上有官僚主义；干部队伍不纯。根据国民经济情况和存在的问题，他提出，“1961年国民经济计划的安排，必须更好地贯彻执行以农业为基础、把农业放在首要地位的方针，争取农业丰收，特别是争取粮食的丰收。同时，对各个部门和各个方面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争取国民经济在3年大跃进的基础上，各部门之间的比例关系得到进一步的协调，生产和建设的质量得到显著的进步”。他还提出了1961年国民经济计划的主要指标。

全会正式通过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即：“1961年应当适当地缩小基本建设的规模，调整发展的速度，在已有的胜利的基础上，采取巩固、充实和提高的方针。”

全会听取和讨论了邓小平关于1960年11月莫斯科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的报告，对以刘少奇为首的中共代表团在会议期间的工作表示满意。

全会还批准了中央政治局1960年9月关于成立党的6个中央局的决定，以加强对6个大区各项工作的指导。随后，任命陶铸为中南局第一书记，宋任穷为东北局第一书记，李井泉为西南局第一书记，刘澜涛为西北局第一书记，李雪峰为华北局第一书记，柯庆施为华东局第一书记。

关于中央局的职权，邓小平在同年9月的中央工作会议上作过如下说明：“现在中央局不同于1953年前的中央局，它主要是协商机关。没有中央局，中央办不好。建议恢复中央局职权，将中央局的职权扩大，恢复到1953年前一样，中央局决定了算数，

不能再是个协商机关，方法当然要商量，但是商量只是方法。”

（丛进著《曲折发展的岁月》）

“向群众寻求真理”： 1961年中央广州工作会议和 北京工作会议

广州工作会议集中讨论《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会议结束的这一天，毛泽东在会上讲话，突然提到邓子恢的名字，对邓子恢下农村调查研究，大加赞扬：“邓子恢同志那个时候顽强得很。邓子恢同志，为了说服你，我跟你谈过多次话。现在我跟你统一了。我跟你没有矛盾了。”在随后召开的北京工作会议上，刘少奇警告说：“再不回头，就要走到路线错误上去。”

3月14日，中央各常委及“三北会议”诸同志飞赴广州。

3月15日，中央广州工作会议开幕，集中讨论《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公社条例共10章60条，因此，习惯上称之为《农业60条》。

《农业60条》的由来

毛泽东何以想搞一个人民公社工作条例？

他说这是听了田家英的建议。“我是听了谁的话呢？就是听了田家英的话，他说搞条例比较好。我们在杭州的时候，就找了江华同志、林乎加同志、田家英同志，我们商量了一下，搞这个条例有必要。搞条例不是我创议的，是别人创议的，我抓住这个东西来搞。”

人民公社化后，高级合作社的章程自然作废了。人民公社一轰而起，几年来却始终没有一个完整的条例，有些文件规定、指示在下面得不到落实，其实中央指示也是相互矛盾，例如自留地，收了放，放了收。依毛泽东不断革命的思想，并不希望把一个体制固定下来，他批评过苏联教科书关于“彻底巩固”集体农庄的说法。急于过渡的思想支配着全党，“变”成了常态。然而，不把公社体制固定下来，农村生产关系变动不居，人心不稳，混乱就在所难免。毛泽东在“三南”会上讲：“可能搞个条例也不灵，但总得搞一个。”

这时，经过中央及地方常委的初步调查，大家都感到了需要搞个条例，把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固定下来。这些问题包括：

一、生产队和生产队之间，社员和社员之间分配上的平均主义现象；

二、公社和生产大队的规模在许多地方偏大；

三、公社对生产大队、生产大队对生产队管得太死；

四、公社各级民主制度不健全；

五、党委包办代替公社各级行政。

《农业 60 条》（草案）就是针对和为解决这些问题而制定的。

起草工作从 2 月 26 日就开始了。毛泽东指定陶铸牵头，陈伯达为副，参加起草委员会的有陈伯达、胡乔木、田家英、廖鲁言、赵紫阳（此时任广东省委书记处书记）、邓力群、许立群、王力、王鲁等。具体由廖鲁言、田家英、王鲁、赵紫阳分别起草。胡乔木修改。毛泽东亲自主持起草工作。

广州会议开始后，吸收每个大区一至三人参加起草组。华北是陶鲁笏，西北是自治民，东北是冯纪新，中南是王延春、赵紫阳，华东是林乎加、薛驹、魏文伯，西南是黄流。

《农业 60 条》经充分讨论，于 3 月 23 日通过，作为草案下

发试行。后来称为“3月草案”。

《农业60条》的“3月草案”，在郑州会议、“12条”之基础上，又解决了一些新问题。其中解决得比较到位的是社队规模问题和社员的家庭副业问题。

“一大二公”被认定为人民公社的主要特点，1958年，把“一大”的好处说了一大堆。当年建立的2.3万多个人民公社，规模巨大。平均4797户一社，不少万户以上的大社。郑州会议后，社队规模有所缩小，1960年春在反“右倾”、“创造条件过渡”的口号下，规模又扩大。毛泽东看到“共产风”、瞎指挥风泛滥，都与社队规模太大有关。到“三南”、“三北”会议时，缩小社队规模，形成了共识。

辽宁省委第一书记黄火青说：“大队干部跑遍小队，得一年时间。将社队划小，是群众的迫切要求。”

华东组的同志说，公社化后，社队这么大，社员“看不到边，摸不到底”。

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张平化说：农民反映，社队规模大了“不是共同富裕，而是共同遭殃”。

于是，广州会议，“一锤定音”。会后，各地划小社队规模。一分为二、为三，甚至更多。而且把原“生产队”改称“生产大队”，原来“生产小队”改称“生产队”。到1962年，平均每社9.4个大队，每大队7.9个生产队，每个生产队平均24.9户。比原来缩小了几倍。

再一个解决得较好的问题是家庭副业问题，把有关自留地、家庭副业、开放集市贸易等方面的政策，明确载入条例，在一定程度上消除和缓解了农民怕政策多变的恐惧心理。在这个问题上，变得太多了，农民整怕了。而在这时，恢复自留地，鼓励农民养鸡、鸭、猪、羊，搞生产自救，是把农民带出灾荒的一条捷径，毛泽东说：“再反复，就是饿、病、逃、荒、死。”

然而，由于生产队变成了大队，生产小队变成了生产队，《60条》规定“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就成了以“大队为基础”，“基础”悬在腰上了。

还有，“3月草案”可以看出，毛泽东和与会者中不少人对供给制和公共食堂，依然是眷恋不舍。尽管已经了解不少反对意见，《60条》草案仍规定分配上供给与工资相结合的制度，供给占三，工资占七；规定除特殊情况外，“都要办常年的或农忙的公共食堂”。这些规定，仍在保护“共产主义因素”，坚守“社会主义阵地”。

会议还通过了一封《中共中央关于讨论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给全党同志的信》，连同《农业60条》草案一同下发。希望通过这种办法，一杆子插到底，与群众见面，防止中间梗阻，以稳定人心。

邓子恢受到“表扬”

3月23日，广州会议结束的这一天，毛泽东在会上讲话，突然提到邓子恢的名字，引起与会者一阵兴奋。毛泽东对邓子恢下农村调查研究，大加赞扬。

毛泽东说：“邓子恢同志那个时候顽强得很。邓子恢同志，为了说服你，我跟你谈过多次话。现在我跟你统一了。我跟你没有矛盾了。”

他转向大家，说：“去年他在山西、石家庄、江苏南部作了一次调查，作得很好，他的观点很正确。农村工作后头犯的错误，是谭震林同志他们有份，他没有份的。你们看不起邓子恢同志那是不行的，人家现在正确了。”

毛泽东讲着讲着，忽然两眼向会场横扫了一遍，未见到邓子恢，就问：“邓老来了没有？”

这一天的会议，邓子恢到得稍迟一些，就坐在会场的后边。

大家不约而同用眼找邓子恢。有的看到邓子恢惊奇的样子竟笑了起来。邓子恢耳朵有些背，没有听到毛泽东的询问，就问坐在身旁的叶剑英：“他们笑什么？”叶剑英说：“笑你哩，毛主席表扬你了！”邓子恢开始认真地听毛主席讲话。

毛泽东说：“农村工作部找谁呵，还是邓老，他有很多意见是正确的。他同我谈过，我介绍他去跟总理谈。总理让他起草个文件，叫做人民公社的章程，首先倡议的是总理。”

“是他给我说的。”周恩来插话说。

“啊！首先倡议的是邓老，然后总理支持。”

对邓子恢的表扬，是毛泽东一次罕见的表示。自合作化后期起，邓子恢的意见总是与毛泽东拧着劲。在党内，也只有邓子恢同毛泽东当面吵过架，好在都是工作之争，并无个人芥蒂。1955年，毛泽东批评邓子恢是“小脚女人走路”，说“邓子恢的思想要用大炮轰”。1958年初，毛泽东批周恩来反冒进“错误”时，捎带重提邓子恢，说“邓子恢完全是资产阶级民主派那一套”。随后又让邓子恢赋闲。中央农村工作部改由谭震林负责。因祸得福，邓也就省去了违心跟风的痛苦，没有刮“共产风”的账。1959年庐山会议时，他在大连养病，陈云也在大连。听了陈云的劝告，没有上庐山，又躲过一场风雨。

三年“大跃进”的热潮过后，农村陷入一场危机，实践证明邓子恢的许多意见是正确的。中共中央转向寻找度过困难的良策，刘少奇想起了邓子恢，想请他重新出山。

1960年9月初，刘少奇得知休养了一年多的邓子恢病情稍有好转，立即约见他，问了问病情，就向他提出：农村工作中的错误颇多，造成的后果很严重，中央正在考虑解决农村工作中的问题，赶快把农民情绪稳定下来。希望你到农村去作些调查，了解些真实情况，研究些切实可行的解决办法。邓子恢二话没说，

当即应承了下来。

9月上旬，他带领工作组下乡，首站是山西省汾阳县万年青人民公社。在这个公社住了两个星期。之后，来到河北省石家庄市郊铜冶人民公社住了一个星期。他轻装简从，走家串户，同管理区、生产队干部，社员、党员、老农开座谈会，查看农田、养猪场、水利工程、食堂，接触了许多群众。

回到北京，同工作组的同志一起，对调查的情况进行分析研究。他认为，现在要改变反右，继续纠“左”。于是立即亲自动手，就调查所得向中央写了《山西、河北两个人民公社三个基本核算单位的调查》报告。

9月底，他又率工作组从北京直奔江苏无锡县。他在无锡县住了20多天，深入到一个公社的几个基本核算单位。

在无锡调查过程中，他发现，从第二次郑州会议以来，中央发了好些文件，到了基层，有的没有同群众见面，有的执行不认真，有的执行打折扣，甚至走样。这一方面与某些具体规定不切合实际有关，另一方面与某些具体规定朝令夕改有关。

于是提出搞一个社章或者条例把政策固定下来。他立即同工作组的同志一起，草拟《农村人民公社内务条例》，并邀上海、江苏、浙江、山东、安徽、福建、江西等省市农村工作部长到无锡，参加讨论。回到北京，再作修改。11月底，一份《农村人民公社内务条例（修改稿）》终于定稿。

《条例》分14章66条，1961年1月23日由中央农村工作部报送中央，周恩来看到了，很高兴。

毛泽东起初或许并不以为然。当他南下经过调查，萌生搞个人民公社工作条例的念头时，不能不信服邓子恢的先见之明。不得不承认，邓子恢的许多意见是对的，农村工作部还得找邓子恢。邓子恢的那个《条例》成为起草组的重要参考，也可以称之为《农业60条》的前身。

毛泽东3月23日的这一番话，事实上在为邓子恢恢复名誉。这使邓子恢的心气平顺多了。但他更庆幸的是，毛泽东又开始恢复实事求是，又从实际出发来看待农村的问题了，农村又有希望，农民又有希望了。

再次疾呼调查研究

毛泽东赞扬邓子恢，也是借题发挥，敦促与会者都去作调查研究。广州会议期间，毛泽东除了具体指导《农业60条》的讨论外，逢会必讲调查研究。与会者对毛泽东的一封信和《调查工作》一文反应热烈，大家深有同感，认为切中要害，非常及时，立即印发给没有到会的各省、市、区党委常委，中央各部部长、中央国家机关党组成员学习。

刘少奇说：“1958年以来，在执行三面红旗的过程中，犯了不少大大小小的错误。……有些是不可避免的，有的是可以避免的。如果作好了调查研究，……不致于陷于现在这样的被动。”

周恩来说：“所以如此不摸底，不落实……最根本的一个毛病就是没有依照毛主席的要求，深入厂矿农村，进行系统调查……便轻率从事，这就不可能做到‘情况明、决心大、方法对’了。”

根据中央意见，由胡乔木执笔起草了《中共中央关于认真进行调查工作给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的一封信》。这封指示信在3月23日通过，并附有《调查工作》一文，下发县、团级。信很长，无非强调调查研究如何必要。其中有一句关键的话：“在调查的时候，不要怕听言之有物的不同意见，更不要怕实践检验推翻了已经作出的判断和决定。”这就是说，要打破思想禁锢，因为许多错误的东西来自上面，来自中央文件，甚至来自最高领导人，不打破框框，调查也只能是视而不见，听而不

闻。

3月23日，在通过这封指示信的时候，毛泽东把田家英请到主席台上，坐在他的旁边，田家英一面读，毛泽东一面解释。最后，毛泽东专门对《调查工作》一文作了说明、讲解和发挥。信稿不过800字，文章也较短。而毛泽东的解释记录却有上万字。

“又发了一封信，这封信得罪人很多。不过，我不是讲别的，只是讲对两个平均主义问题，不甚了了，一知半解。”

“这几年官做大了，已经做了8年了，就不做调查研究。”

“没有调查就没有政策，没有政策就不能解决问题。”

“这几年出现的高指标等问题，总的责任当然是我负，因为我是主席。我的责任在什么地方呢？为什么到现在才提倡调查工作呀？为什么不早提倡呢？而且我自己也没有下去，搞一个公社、一个工厂的调查。为补过起见，现在我来提倡一下。今年我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讲过一次，九中全会上又讲了一次，这次会议还得讲一次。不然又说我没有讲。”

这时，毛泽东谈到他的一个心愿：沿着黄河而上，再由长江发源地而下，一个逆流而上，一个顺江而下，不坐火车，只走路骑马，到处做调查研究，那才真是快事。

毛泽东想走遍黄河、长江，那是突发奇想，不可能实现。他想到老百姓中交一些朋友，搞几个调查基地，也没有实现。这使他尽管大力倡导调查研究，还只能是听汇报，不能亲历其境，体察民情。

刘少奇警告：“再不回头，就要走到路线错误上去”

1961年5月21日至6月12日，在北京再次召开中央工作会议。按照毛泽东的意见，主要是继续广州会议尚未完成的工作：收集农民和干部的意见，修改《农业60条》和继续整顿“五风”。工业和城市问题留待下次会议讨论。这次会议原定5月15日开始。后来，毛泽东决定推迟一周，让大家多做几天调查，“向群众寻求真理”。过去的中央工作会议，大都是中央局和各省市第一书记参加，这次为了听到更多的不同意见，周恩来建议，除各省市第一书记外，再来一名书记。毛泽东同意了。

经过4、5两个月的深入农村调查，“向群众寻求真理”，大家的心境与三月广州会议时已经大不一样了。

其实，真理是明摆的，群众的疾苦，群众的呼声并不难掌握。然而，这几年，所有的信息都失真，所有信息手段都失灵，各级都从下一级的报告中了解情况，所有的报告都顺着上面的意图说假话，当然不会是原封不动，而是加油添醋。上头说乌鸦是白的，下面必定说乌鸦比天鹅还白。上面说成就和错误是九个指头与一个指头，下面说错误一指头都不到，基层干部跟着做了许多错事，说了许多昏话，怕整到自己头上，怕承认自己错了，于是封锁消息，报喜不报忧。下层大量的虚浮信息，又加强了上层的迷狂心态。按照现代信息论的观点，当时的体制缺乏信息反馈机制。相反，它却有一种自然的放大错误的功能。这在以后的时间里屡见不鲜。

这一次不同。在毛泽东的一再敦促下，中央、中央局、省、市区党委的“高官”们都亲自作第一手调查，终于看到了民间疾苦，倾听到百姓真话，摸清了农村的底，思想比较容易统一了。

5月31日，刘少奇在北京中央工作会议上讲话。他说：

这几年发生的问题，到底主要是由于天灾呢？还是由于我们工作中间的缺点错误呢？湖南农民有一句话，他们说三分天灾，七分人祸。我也问了几个省委书记。我问过陶鲁笳同志：在你们山西，到底天灾是主要的，工作中的缺点错误是主要的？他说，工作中的缺点错误，是造成目前困难的主要原因。河北、山东、河南的同志也是这样说的。其他一些省我没有问。

造成困难的主要原因，这可是个敏感问题，毛泽东也认为有工作中的失误，但他强调的是特大天灾、苏联撤走专家、基层干部刮“五风”、阶级敌人报复。2月田家英汇报说不是阶级敌人报复，毛泽东并没有完全听进去。4月11日，他请王任重帮助湖南工作的批语中，还批评湖南“相当多的地区，政权还没有从敌人手上夺过来”。刘少奇在这里压根没有提到阶级敌人报复的问题。他到农村看了，根本不是什么阶级敌人报复。他还为基层干部说了公道话，错误也不完全在他们，根子在上面，在中央。

刘少奇说：“现在看来恐怕不只是一个指头的问题。总是九个指头、一个指头，这个比例关系不变，也不完全符合实际情况。我们在这个地方要实事求是，是怎么样就是怎么样。”刘少奇这个话，又触及了一个禁区。因为“九个指头与一个指头的关系”，是一条政治界线，彭德怀越了界，被打倒。

刘少奇接着说：“这样一些缺点错误，并不牵涉到总路线、人民公社和大跃进这三面红旗的本身。”而是执行中的缺点错误。

刘少奇讲这个话，是在维护三面红旗，也是在维护毛泽东。但他下面的话就相当尖锐了。他说：

好在我们现在能够回头，能够总结经验，能够改过来，还不是路线错误。但是，如果现在我们还不回头，还要坚持，那就不是路线错误也要走到路线错误上去。

刘少奇历来尖锐。过去他总是在跟毛泽东，这次也是在毛泽

东出的题目下做文章，但他对时局已经有切肤之痛。他在警告：再别坚持错误了。他提到路线错误问题这事就非同小可。在党的历史上，一旦认定是路线错误，主要领导人就必须下台。毛泽东听到这话，会是什么感觉呢？

周恩来的讲话同样深刻，但语调平和多了。他说：“那时，就是有点革命，不能深思熟虑，不能冷静下来，‘欲速则不达’，跌了大交。”

讲到这里，刘少奇插话说：“想要快一点，结果是跌了大交，反而慢了。看来，搞社会主义光有好的道德、好的感情、好的干劲不行，还要适应客观规律。这一交是要跌的，跌得越痛越好，跌得不痛就感受不深。”接着他又补了一句，“问题是跌痛了没有”。

周恩来说：“我是感到痛了。”

6月12日，毛泽东作总结发言。他特别强调了训练干部的重要。他认为党内干部真正懂得马克思主义的不多。毛泽东指着河南省委书记吴芝圃说：“吴芝圃同志，我的工作没做好，你的工作也没做好。”他说，河南、甘肃省委没有一个人懂得马克思主义，山东省委只有一小部分懂得，大多数人不。懂。他表扬了河南新乡地委第一书记耿其昌。耿其昌因反对公共食堂而被整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被撤职。这次毛泽东说，耿其昌有先见之明，过去提了许多意见，现在看来和60条差不多，要恢复名誉，官复原职，仍当第一书记。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北京会议作出两项规定，一是普遍地轮训干部，二是对最近几年受批判和处分的干部进行甄别平反。完全错了的恢复名誉，恢复职务；部分错了的部分改正。并且规定，今后不再在不脱产干部和群众中间反右倾，戴政治帽子。

《农业 60 条》的新突破

由于大家掌握了大量第一手材料，这次会议修改的《农业 60 条》，对几个争论不休的问题终于统一了认识。《农业 60 条》的“6 月草案”有以下几个突破：

一、关于食堂。将原草案规定公共食堂“应该积极办好”，改为“生产队办不办食堂，完全由社员讨论决定”，口粮分配办法改为“不论办不办食堂，都应该分配到户，由社员自己支配”。毛泽东在会上说：“过去说食堂是社会主义阵地，办不办食堂是两条道路的斗争，现在搞清楚了，这些说法是错误的，过去说食堂优越性的那一套，实际上不是那么回事。”这个认识得来不易！

现在把办不办食堂的权力交给社员，这个口一松，老百姓拍手称快，欢呼“第二次解放”。只是当时亿万农民进食堂，自己的锅、碗、瓢、盆或充公了，或砸烂炼铁了，由于搞居民点，许多家的房子被拆了。现在各地安排农民回家吃饭，又费了一番周折。尽管如此，老百姓终于有了个家，又像个过日子的样子了。公共食堂这一“新生事物”在 1961 年下半年，很快在全国农村消失。毛泽东听到这个消息，心情复杂，说：“这是一件大好事。”

二、关于供给制。这与食堂紧密联系。人民公社一成立，供给制、吃饭不要钱就被看成是“共产主义因素”。1961 年 3 月广州会议上，除了对这一“共产主义因素”依恋不舍外，还提出一个新理由，认为保留供给与工资三七开，有利于照顾贫下中农。5 月 13 日，邓小平和彭真给毛泽东的联名信中，根据他们在顺义调查到的情况，得出了相反的结论：供给制不仅不利于贫下中农，甚至有利于地富和上中农。这个论点相当有说服力，一项政策有利于地富，那就没有存在的理由。而其他报告都指出，供给

制是平均主义，养了懒人。“6月草案”终于把原草案中的内容全部删除。指出，包产收入或包产以外的收入，都“按劳分工进行分配”。自此，人民公社的两项“共产主义因素”都被否定了。

公共食堂、供给制早已怨声载道，纠正起来何以如此困难？症结在于急于向共产主义过渡的空想情绪。作为一个共产党员，能不为“共产主义曙光”怦然心动吗？能不对“共产主义萌芽”百般呵护吗？其实，人们维护的是平均主义，而不是共产主义。平均主义与共产主义相差十万八千里。家庭虽不是物质生产单位，总还是人自身的生产单位，是一个消费单位，是社会的细胞。动摇了家庭组织，社会将无宁日。

三、关于山林问题。三月广州会议没有涉及。甚至1959年郑州会议以后从未有人提及。然而，4、5月各调查组到农村后，不约而同地注意到，山林的毁坏触目惊心。成片的林木被剃了光头，大量房前屋后的几十年、上百年的树木，也都被砍下来，或者喂了炼钢的小土炉，或者喂了公共食堂的火灶。刘少奇调查的长沙天华大队，土改后的55亩大树林，公社化后一下砍掉31亩，剩下的还在被砍。70亩竹林，现在一株竹子都没有了。临湘县十几万亩山林，两年多时间，差不多砍光。茶陵处于罗霄山脉西部，过去茂林修竹，延绵几十里，公社化后为了炼钢，全部砍光。其他省的情况也大同小异。

人民公社化和“大跃进”，不仅带来1200亿元的经济损失，而且造成了生态环境的严重破坏。其原因很简单，林权变动，无人负责、无法管理、无人心痛。

北京会议修改的《农业60条》增加了一条，明确了山林的所有权：归大队所有，包给生产队经营，实行计划采伐。“把小片的零星的山林和路旁的林木，分别划给生产队和社员所有。”《60条》之外，中央还专门制定了一个《关于山林问题的规定》，

希望立即止住林木的乱砍乱伐。

四、关于“党政干部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这是毛泽东的主意，他痛感“五风”的严重危害。当时许多干部骑虎难下，积重难返，不听中央的纠“左”号令。毛泽东想，能不能像红军一样，规定一个党政干部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写进《60条》，规范干部的言行，也便于群众监督。经过胡乔木的几易其稿，毛泽东反复斟酌，与会者的广泛讨论，终于形成以下内容：

三大纪律：

一、如实反映情况。二、正确执行政策。三、实行民主集中制。

八项注意：

一、参加劳动。二、以平等的态度对人。三、办事公道。四、不特殊化。五、工作要同群众商量。六、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七、按照实际情况办事。八、提高政治水平。

6月15日，中央发出讨论和试行《农业60条》草案的通知。19日，又发出《关于坚持纠正错误，彻底退赔的决定》，这些政策下到农村，逐渐稳定了人心，稳定了农村。

陈云的度荒之策

北京会议重点是讨论《农业60条》，但反映到会上，大家感到最迫切的问题仍然是粮食危机。

5月31日，刘少奇讲话，一开始就说：

现在各方面的矛盾，工业、农业的矛盾，文教和其他方面的矛盾，集中表现在粮食问题上。总而言之，人人都要吃饭，城里人要吃饭，乡下人也要吃饭，读书人也要吃饭，我们“做官”的人也要吃饭。

原来还指望，农村政策一下去，农业能很快恢复，还可以从

农民那里多挖一点粮食，以解城市之急。然而，下到农村，农户的空空如也，对农民的竭泽而渔，令许多人震惊。

5月31日，周恩来对与会者说了他在农村看到的情景：“除了树叶、咸菜、野菜以外，就没有东西了，硬是没有存粮。”他说：“粮食的形势，还没有好转，还在继续紧。”“1960年至1961年粮食紧张，城市重于农村，这是一个特点。”他还告诉大家，农业生产不可能很快恢复，而城市每年要供应500亿斤粮食，存在一个巨大缺口。

如何填补这个缺口？周恩来说，根本的方针是“从城市压人口下乡”，“三年压两千万人”。

精减职工，压缩城市人口下乡，这是陈云经过反复思考提出的一个重大对策，得到周恩来、邓小平等的支持。

5月31日，陈云在周恩来讲活后，专门为这项牵动几千万人命运的重大建议作了详细的说明，题为《一项关系全局的重要工作》。

陈云说：“由于解决了一些政策问题，农民的积极性起来了，农村的情况逐渐好转。下一年度会比今年更好些。但是，现在看，国家掌握的粮食，明年度将比今年度还要紧张，因为库存减少了。”

陈云认为，要解决摆在面前的粮食紧张问题，需要采取四条措施：

第一条是继续调整党在农村的基本政策。他说：“大跃进”后，由于瞎指挥、浮夸风、一平二调、平均主义、高指标、高征购、搞公共食堂等等胡作非为的错误，严重影响了农民生产积极性，这个时候不能不赶快解决。

第二条是工业要大力支援农业。但他认为这一条不可能短时间内见效。

第三条是进口粮食。

第四条是动员城市人口下乡，减少城市粮食的销量。

关于进口粮食，这是陈云 1960 年底提出并且得到批准的一条应急措施。当时，粮食紧张情况加剧，浮肿病大范围出现，迅速蔓延。估计到下一年春青黄不接时，情况将更加严重。

眼看着人民陷于这样悲惨的境地，陈云心里异常难过。他向中央提出，挤出一部分外汇，进口粮食！

吃进口粮？这可是个禁区！搞了 3 年“大跃进”，搞了人民公社，我们早已宣布解决了粮食问题，每年还出口粮食。现在突然要进口粮食，这在国际上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

但是，不进口粮食，人民就要挨饿，无法渡过难关。中央和国务院接受了陈云的建议。

（肖冬连等著《求索中国——“文革”前十年史》）

“白天‘出气’，晚上看戏”：七千人大会

这次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出席者达到 7000 人，创党的历史上会议人数之最。毛泽东说：“为什么一定要回到你们家里过春节才算舒服？为什么我们在北京 7000 人一道过一个春节不好？我主张集体在北京过一个春节。有这么几天，我相信能够解决上下通气的问题。有一个省的办法是：白天‘出气’，晚上看戏，两千一稀，大家满意。”“有什么‘气’出什么‘气’，有多少‘气’出多少‘气’，不管正确之‘气’，还是错误之‘气’，不挂账，不打击，不报复。”对于前几年的错误，毛泽东说：“第一个负责任的应当是我。”

1962 年 1 月 11 日至 2 月 7 日，中央在北京召开了扩大的工作会议。出席会议的有中央、中央局、省、地、县（包括重要厂矿）五级领导干部，共 7118 人。人们习惯地称这次会议为“七千人大会”。这是我们党在执政后召开的一次空前规模的总结经验大会。会上，发扬了民主，开展了批评与自我批评，初步总结了 1958 年“大跃进”以来的经验教训。这次会议对于统一全党思想，提高认识和纠正工作中发生的“左”的错误，起了积极作用。

(一) 大会始末

1961年11月16日中央发出《关于召开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的通知》，指出：1958年以来，在中央和地方的工作中“发生了一些缺点和错误”，并且产生了一些不正确的观点和作风，妨碍着克服困难，必须召开一次较大规模的会议来统一思想认识。少奇同志在向“七千人大会”所作的报告（以下简称《书面报告》）中也说明：“中央召集这次会议的主要目的，是要总结经验，统一认识，加强团结，加强纪律，加强民主集中制，加强集中统一，鼓足干劲，做好工作，战胜困难。”

由于“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连续3年多的失误，国家生产建设和人民生活都出现了严重困难。中央领导同志头脑逐渐冷静下来，开始在一系列会议上总结教训。1961年5、6月间召开的北京中央工作会议，就是在“七千人大会”之前总结教训的一次重要会议。会上，少奇同志以沉重的语气说：“我看在座的同志应该是有经验了吧！饿了两年饭还没有经验？铁路还要修几万公里吗？‘小洋群’还要搞那么多吗？工厂还要开那么多吗？还舍不得关厂吗？还舍不得让一部分工人回去吗？招待所还要盖那么多吗？恐怕应该得到经验教训了。农民饿了一两年饭，害了一点浮肿病，死了一些人，城市里面的人也饿饭，全党、全国人民都有切身的经验了。回过头来考虑考虑，总结经验，我看是时候了，再不能继续这样搞下去了。”毛主席在会上指出，如果违背了客观规律，就一定要受惩罚，我们就是受惩罚，最近三年受了大惩罚，土地瘦了，人瘦了，牲畜瘦了，“三瘦”不是惩罚是什么？这个社会主义谁也没有干过，未有先学会社会主义的具体政策而后搞社会主义的。我们搞了11年，现在要总结经验。

到1961年底，总结教训、纠正错误已经做了大量工作，主

要是调整政策和调整经济，使农业形势开始露出了好转的苗头，工业的滑坡也已停止。但由于党内思想认识不统一，调整工作遇到一些阻力，深入不下去，国民经济仍很困难。

1961年10月苏共22大后，赫鲁晓夫掀起了新的反华浪潮，中苏两党、两国的关系面临破裂。毛主席认为：我们坚持的是马克思主义立场，站在95%以上的人民一边，是不会受孤立的，天塌不下来。但是，这几年我们在工作中犯了错误，心情比较沉闷，一定要有紧迫感，做好工作，摆脱困境。12月20日晚上，毛主席同小平同志谈话，流露了这种心情。第二天，小平同志在为“七千人大会”作准备的中央工作会议上说：毛主席去年（1960）、前年（1959）心情不那么愉快，今年（1961）很高兴，因为具体政策都见效了。过去几年，包括“大跃进”3年，总的来说，我们办的好事是基本的，也出了些毛病，也有缺点错误。这些缺点错误，我们要把它总结起来，好的、成功的、错误的，统统总结起来，变成财富，使我们的工作一天一天走上轨道。毛主席在无锡找华东几个省的同志也谈了，明年（1962）要抓工、农、兵、学、商、政、党七个字，要大抓一年，这几个方面都要理出一个头绪来。毛主席还说，明年这一年的工作很重要，这次会议（指中央工作会议和接着召开的“七千人大会”。——作者注）要好好议一下过去的经验教训，要有个统一的看法，要步调一致，以便在这个基础上前进。这样，召开一次全党性的大会，集中总结经验教训，统一认识，就势在必行了。

1961年12月20日~1962年1月10日，召开了中央工作会议。1962年1月9日，会议分组讨论了少奇同志准备的在“七千人大会”上的《书面报告》第一稿。1月10日会议结束，1月11日“七千人大会”即开幕。会议原定1月28日结束，只开18天。因《书面报告》的讨论、修改延长了一些时间，还因毛主席1月29日讲话中提出了开“出气会”的建议，故会议延长，一

直开到2月7日才闭幕。

周总理说：这次会议有两个“高潮”。“第一个高潮”，从1月11日开幕到29日上午，主要是围绕少奇同志代表中央作的《书面报告》，进行分组讨论和提出修改意见。《书面报告》第一稿写出来之后，还没有经过政治局讨论，毛主席即提议直接印发大会，和大家见面。毛主席认为：参加会议的有各方面人员，多数接近实际和基层，能够从各个角度提出意见来，能更好地集思广益。在大会分组讨论的同时，由少奇同志组织了一个层次很高的21人《报告》起草委员会，参加的有政治局成员、各大区书记，进行更加深入的讨论和研究，经过8天修改，于22日拿出第二稿。24日，毛主席看过后，找少奇、小平同志谈话，表示“赞成这个方向”。25日，在中南海怀仁堂，由少奇同志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第102次扩大会议，讨论《书面报告》第二稿。大家表示基本上赞成这个稿子，同意提交大会。

1月27日，毛主席主持召开全体大会，把印好的《书面报告》第二稿发给与会者。《报告》共分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关于目前形势和任务”，第二部分是“关于集中统一”，第三部分是“关于党的问题”。少奇同志在会上没有照本宣读，而是在大家阅读、讨论《报告》的基础上，从国际形势、国内形势、集中统一和党的作风四个方面，作了一些更具体、更深入的解释、说明和补充。

会议的“第二个高潮”，从1月29日下午毛主席提议开“出气会”到2月7日闭幕，中心就是“出气”。会议原安排1月30日或31日结束，31日晚即可离京回各地过春节。可是，到29日下午，许多人反映，话还没有说完，还憋着一肚子气。有的组还反映，会上还有人压制民主，不让讲话。毛主席和政治局常委同志商量，决心让大家把要讲的话都讲出来，把“气”出完。于是提议延长会期，在北京过一个革命化的春节。毛主席说：

这次用这么个方式，在北京开这么个会，要解决问题。现在，要解决的一个中心问题是：有些同志的一些话没有讲出来，觉得不大好讲。这就不那么好了。要让人家讲话，要给人家有机会批评自己。你自己不批评自己，也可以，得让人家批评你。最好的办法还是自己来批评自己！有许多地方的同志是作了准备的，而且有的作检讨作了几年了——59年、60年、61年。有好几个省，从59年起就自我批评，不只一次、两次、三次、四次，而是五次、六次。自我批评的结果，人家就不爱听了，说：“请你不要再讲了，老讲那一套！”这个时候你就可以不讲了，这才取得了主动。我看是不是在这次会议上就解决这个问题。县、地、省都有同志在这里，不要等回去了再解决。

为什么一定要回到你们家里过春节才算舒服？为什么我们在北京7000人一道过一个春节不好？我主张集体在北京过一个春节。有这么几天，我相信能够解决上下通气的问题。有一个省的办法是：白天“出气”，晚上看戏，两千一稀，大家满意。我建议让人家“出气”。不“出气”，统一不起来。没有民主，就不可能有正确的集中。因为“气”都没有出嘛！积极性怎么调动起来。到中央开会，还不敢讲话，回到地方就更不敢讲话。我们常委几个同志商量了一下，希望解决“出气”的问题。有什么“气”出什么“气”，有多少“气”出多少“气”，不管正确之“气”，还是错误之“气”，不挂账，不打击，不报复。

毛主席讲话后，当晚各中央局召开会议，迅速部署如何开好“出气会”。1月30日上午，各省召开动员会，号召大家打消顾虑，趁热打铁，把“气”出完，重点是对省委的工作提出批评。

晚上，毛主席又在各中央局书记会上，对如何开好“出气会”作了指示。1月31日到2月7日，主要是召开小组会议，对省委、中央局、国家机关、中央机关及负责同志提出批评意见；这些负责同志在会上发言，对这几年工作中的失误进行认真检讨和自我批评。2月4日，毛主席和大家一起看戏。5日，进行春节团拜活动，毛主席和大家一起过春节。

召开“出气会”的同时，还穿插了几次大会，由中央政治局几位常委讲话。1月29日下午，林彪讲了关于党的工作和军事工作两个问题。1月30日，毛主席发表重要讲话，共讲了六点，中心是讲民主集中制和认识客观世界的问题。2月6日，小平同志讲党的建设问题，重点是讲如何恢复党的优良传统和健全党内生活，包括坚持民主集中制、建立经常工作、培养和选择干部、学习马列理论和毛主席著作等四个方面的内容。同日，朱德同志着重讲了反对现代修正主义的问题。2月7日，周总理讲了1958年以来计划工作的失误，做了自我批评，并分析了国民经济存在的困难和克服困难的办法。陈云同志没有在大会上讲话，但在2月8日陕西组会议上讲了发扬民主和怎样使认识比较正确的问题。会后，毛主席、少奇、周总理、小平、林彪的讲话经过反复修改后，分别以中央文件的形式发到各省、市、自治区党委。

2月7日闭会。8日，又召开中央工作会议，少奇同志讲了如何修改《书面报告》的意见。2月17日改出第三稿送毛主席审阅。毛主席于2月23日在审读稿上批复少奇同志：“修改得很好了，即请你处理。”第三稿于2月26日印发到各省、市、自治区。第三稿与第一、二稿相较，有两点比较大的变化：一是在“形势和任务”部分增写了“基本经验教训”；二是在“关于集中统一”部分，加进了毛主席在1月30日讲话中所阐述的关于民主集中制的重要内容，题目改为“加强民主集中制，加强集中统一”。

关于会议精神的传达和贯彻，毛主席在1月30日的讲话中指出：同志们回去后，一定要把民主集中制健全起来。要发扬民主，采取主动，作自我批评。有什么就检讨什么，倾箱倒篋而出。白天“出气”，晚上不看戏，白天晚上都请你们批评。让人讲话，采取主动好，天不会塌下来，自己也不会垮台。不让人讲话呢？那就难免有一天要垮台。小平同志在讲话中也谈到，回去后，个别的也可以开“出气”大会，这几年工作搞得不好的领导同志要进行自我批评，检讨一次不够就检讨几次。2月8日，小平同志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讲了会议精神的传达和文件阅读的问题。2月12日，中央书记处召开第314次会议，决定：中央和国家机关17级以上、司局长级以下的干部，根据《报告》传达讨论；司局长级以上的干部除了传达《报告》外，还传达毛主席和政治局其他常委同志的讲话。各省、市、自治区都分别在2至4月间，按党中央规定的范围，传达、讨论和贯彻会议精神，在各级党组织内发扬民主，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总结经验教训。

（二）对“大跃进”以来所犯错误的分析

1. 对严重困难的估计。

“七千人大会”上，对困难和形势的估计是有分歧意见的。有的人很乐观，认为形势已经根本好转，“58年的劲头又起来了”，“生产高潮正在开始到来”，过两年又“可以组织新的跃进”。有的中央局在讨论《书面报告》时，发言者纷纷表示，“对过去几年的缺点、错误讲得过分了”，认为《书面报告》关于1963~1972年的国民经济发展目标的设想、任务提得太低了。在《书面报告》起草委员会的讨论中，华东局的柯庆施同志1月17日发言，对报告中关于形势的分析和提出的任务表示不满，提出一连串问题：“《农业发展纲要40条》要不要？多少年解决

吃穿用？15年赶上英国要不要？……干劲还要不要？用什么方法鼓干劲？……指标要不要？”并且说：“越看越没劲。”

《书面报告》认为，困难“还是相当严重的”。报告列举了经济形势严峻的事实：1961年，工业总产值下降了40%多；不少企业由于原料、材料、燃料不足而陷于停工、半停工状态；市场供应紧张，人民吃穿用严重不足；国家财政收入大大减少，通货膨胀严重；不得不进口520多万吨（105亿斤）粮食，这是我们这个农业大国建国以来所没有过的。报告中也写上了“我们最困难的时期已经渡过了”。这句话的意思主要是指1958年以来的错误已经停止，正在改正，或大部分已经改正。周总理在大会的讲话中就是这样来解释的。

少奇同志的讲话对困难的估计比《书面报告》更充分。他说：1959、1960、1961这3年，农业不是增产，而是减产了，减产还相当大；工业1961年减产40%还要多一点，1962年也难于上升；由于工农业减产，人民吃的粮食、副食品、肉、油都不够，穿的、用的也不够。他尖锐地指出：“这种形势，对于许多同志来说，是出乎意料的。两三年以前，我们原来以为，在农业和工业方面，这几年都会有大跃进。……可是，现在不仅没有进，反而退了许多，出现了一个大的马鞍形。这种情况是不是应该承认呢？我想，要实事求是，应该承认事实就是这样。”

2. “三分天灾，七分人祸。”

1958年以来，出现这么严重困难的局面，过去总是归咎于或者主要归咎于自然灾害，不敢从主观上从领导工作中找原因。1961年5月，少奇同志到他的家乡湖南宁乡县花明楼进行调查，他得出了“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的结论，认为困难主要是由“人祸”造成的。所谓“人祸”，就是我们工作中的失误。这年5月31日，少奇同志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说：

这里提出一个问题：这几年发生的问题，到底主要

是由于天灾呢，还是由于我们工作中间的缺点错误呢？湖南农民有一句话，他们说“三分天灾，七分人祸”。我也问了几个省委干部。我问过陶鲁笏同志：在你们山西，到底天灾是主要的，还是工作中的缺点错误是主要的？他说，工作中的缺点错误是造成目前困难的主要原因。河北、山东、河南的同志也是这样说的。其他一些省我没有问。总起来，是不是可以这样讲：从全国范围来讲，有些地方，天灾是主要原因，但这恐怕不是大多数；在大多数地方，我们工作中间的缺点错误是主要原因。

在“七千人大会”《书面报告》中，他没有涉及这个问题。但在他的讲话中，重申了上述观点，认为困难形势的出现，就全国总的情况来说，“是由于我们工作中和作风上的缺点和错误所引起的”。他不同意总是把成绩说成九个指头，把缺点错误说成一个指头。他说：

过去我们经常把缺点、错误和成绩，比之于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的关系。现在恐怕不能到处这样套。有一部分地区还可以这样讲。在那些地方虽然也有缺点和错误，可能只是一个指头，而成绩是九个指头。可是，全国总起来讲，缺点和成绩的关系，就不能说是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的关系，恐怕是三个指头和七个指头的关系。还有些地区，缺点和错误不止是三个指头。如果说这些地方的缺点和错误只是三个指头，成绩还有七个指头，这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是不能说服人的。我到湖南的一个地方，农民说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你不承认，人家就不服。全国有一部分地区可以说缺点和错误是主要的，成绩不是主要的。

《书面报告》对几年来所犯的错误列举了四条，进行了详细

的分析，还初步总结出了16条基本经验教训。这些在本书其他篇章中已有涉及，此处不再赘述。

在当时“左”的思想还根深蒂固的情况下，在多数同志对1958年“大跃进”严重失误的原因还没有根本认识的情况下，少奇同志敢于根据一些群众和一些省市负责干部的反映，提出“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的估计，指出在分析错误和成绩时，不能用“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的关系”“到处这样套”，应该说是难能可贵的。没有大无畏的革命勇气，不可能提出这种实事求是的意见来。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就是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也就是实事求是。全国这么大，情况千差万别，各个地方的成绩与缺点错误的情况，不可能一样；在不同的时期，由于指导思想、方针政策正确与否不同，成绩与缺点错误的情况也不可能一样，怎么能够用一个比喻、一个公式到处套用呢？如果那样，还有什么实事求是精神可言？还有什么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可言？形势好，不可能绝对的好，一点缺点错误也没有，也要看到存在的问题和不足；形势不好，发生了严重失误，也不可能是绝对的坏，也要看到取得的成绩，成绩有多大就肯定多大。但更要承认失误，失误有多大也要承认多大，以利于采取纠正措施。这才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态度，才是对党对人民对历史高度负责的态度。这一点对于参与制定决策和指挥全局的各级主要领导同志来说，极为重要。回顾少奇同志的上述论述，我想我们应该从中得到这样的启示。

3. 对错误责任的分析。

“七千人大会”上对于1958年以来所犯缺点、错误的责任，形成了统一的认识：首先要负责任的是中央，其次要负责任的是省市自治区一级党委，再其次是省以下的各级党委。各有各的账，都有责任。

《书面报告》提到，“有些事情，是经过中央政治局的，中央

政治局应该担负责任”。在承担责任的问题上，中央领导同志表现出了应有的风格。

这里我说一个小插曲。在1月18日召集的《报告》起草委员会上，彭真同志发言：我们的错误，首先是中央书记处负责，包括不包括主席、少奇和中央常委的同志？该包括就包括，有多少错误就是多少错误。毛主席也不是什么错误都没有。三五年过渡问题和办食堂，都是毛主席批的。小平同志插话说：我们到主席那儿去，主席说，你们的报告把我写成圣人，圣人是没有的，缺点错误都有，只是占多少的问题。不怕讲我的缺点，革命不是陈独秀、王明搞的，是我和大家一起搞的。彭真同志接着说：毛主席的威信不是珠穆朗玛峰，也是泰山，拿走几吨土，还是那么高；是东海的水（拉走几车，还有那么多）。现在党内有一种倾向，不敢提意见，不敢检讨错误。一检讨就垮台。如果毛主席的1‰、1%的错误不检讨，将给我们党留下恶劣影响。省市要不要把责任都担起来？担起来对下面没有好处，得不到教训。各有各的账，从毛主席直到支部书记。次日，陈伯达发言说：彭真同志昨天关于毛主席的话，值得研究。我们做了许多乱七八糟的事情，是不是要毛主席负责？是不是要检查毛主席的工作？彭真同志不得不进行解释：关于毛主席的问题，要说清楚。似乎彭真讲毛主席可以批评，是不得人心的。我的意思是不要给人一个印象：别人都可以批评，就是毛主席不能批评，这不好。很显然，彭真同志的意见是对的，是有道理的，符合实事求是精神和唯物辩证法观点。他当时敢于这样披肝沥胆直言，是很不简单的。30年过去了，经得起时间检验的是彭真同志的这些话。至于陈伯达的发言，当时貌似“忠心”一片，而他后来的所作所为，人们已很清楚。忠奸之分，正邪之别，历史会做出最公正的评判。毛主席在会上不仅做了自我批评，而且带头承担所犯错误的责任，体现了党的领袖的广阔胸怀。小平同志插话讲到的毛主席的态度就

很感人。在1月30日的讲话中，毛主席还说：

去年6月12号，在中央北京工作会议的最后一天，我讲了自己的缺点和错误。我说，请同志们传达到各省、各地方去。事后知道，许多地方没有传达。似乎我的错误就可以隐瞒，而且应当隐瞒。同志们，不能隐瞒。凡是中央犯的错误，直接的归我负责，间接的我也有份，因为我是中央主席。我不是要别人推卸责任，其他一些同志也有责任，但是，第一个负责的应当是我。

周总理在“七千人大会”以前的多次讲话中都已讲到，这几年所犯错误，国务院要负主要责任。在“七千人大会”上，他再一次说：对于缺点和错误，在中央来说，国务院及其所属的各综合性的委员会、各综合口子和各部，要负很大责任。计划上的估产高、指标高、变动多、缺口大，基本建设战线过长，权力下放过多、过散，不切实际的、过多过早过急的大办、大搞，等等，国务院及其所属部门，都是有责任的。他还检查了自己所犯的两个错误：一是，1959年8月26日在人大常务委员会上，提出了超过实际可能的关于跃进、大跃进、特大跃进的标准（即规定农业每年增产超过10%是跃进，超过15%是大跃进，超过20%是特大跃进；工业每年增产超过20%是跃进，超过25%是大跃进，超过30%是特大跃进。——作者注）；一是，1958年6月2日主持起草了一个关于将轻工业下放98.5%、重工业下放76%的文件。他认为，这是“权力下放过多过散”，“形成分散主义的根源之一”。他在会上还说：这些问题，我还要在3月的人大、政协会议上作适当的解释，这是我的账，要交代。毛主席插话说：交代一回也就好了。可见周总理对错误勇于承担责任的精神。

小平同志在1961年3月的广州会议，在8、9月间的庐山会议，在年底的中央工作会议上，也多次表示：中央书记处要负错误的主要责任。在“七千人大会”上，他又说：关于这几年工作

中的缺点和错误的责任，……首先应该由做具体工作的中央书记处负主要责任。中央书记处给毛主席和中央政治局常委写了一个报告，对这几年中央的文件，作了检查。后来，小平同志在1980年4月1日对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同志说：“讲错误，不应该只讲毛泽东同志，中央许多负责同志都有错误。‘大跃进’，毛泽东同志头脑发热，我们不发热？刘少奇同志、周恩来同志和我都没有反对，陈云同志没有说话。在这些问题上要公正，不要造成一种印象，别的人都正确，只有一个人犯错误。这不符合事实。中央犯错误，不是一个人负责，是集体负责。”这些话讲得很公正，很中肯，充分体现了实事求是的态度。1992年7月下旬，小平同志在审阅党的十四大报告稿时，再一次回忆起“七千人大会”，他说：在那次会上，大家都做了检讨嘛！总之，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像“七千人大会”这样，党的主要领导人带头做自我批评，主动承担失误的责任，这样广泛地发扬民主和开展党内批评，是从未有过的，所以它的意义和作用，在我们这些亲身经历过的人当中，永远不会忘怀，而且我相信会历时愈久，影响愈深。

（三）犯错误的根源何在

“七千人大会”上，大家根据当时的认识水平，对1958年“大跃进”以来所犯错误的根源进行了分析，归纳起来，大体有这样几条：经验不够；违背了民主集中制原则；分散主义严重泛滥；丢掉了实事求是的作风；过火的党内斗争和只反右不反“左”等等。

1. 关于经验不够。

《书面报告》提出，这几年犯错误的原因之一，是“我们在建设工作中的经验还很不够”。

在会上分组讨论中，中直机关有的同志表示不大同意这个分析，认为“不能把一切缺点错误都归结到没有经验”。有的同志说，光强调经验不足，“不能服人”，因为“一五计划”时期经验更少，为什么没犯这么大的错误。

这些意见不无道理。少奇同志在讲话中对此作了解释，认为“一五”时期没有犯大的错误，“二五”时期反而犯了大的错误，原因当然不止一个，除了经验不够以外，还有不够谦虚谨慎、骄傲自满等等，但是，经验还是很不够，不能说不是犯错误的原因之一。在1月17日《书面报告》起草委员会的讨论中，陶铸同志也强调说：确实没有经验。如怎样向共产主义过渡？速度究竟多快？怎样叫有计划按比例？还有以农业为基础、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积累和消费的关系、价值法则、建设和生活的关系等等，我们没有经验。

毛主席在1月30日讲话中，在谈到第四点即关于认识客观世界问题时，从认识论的高度把这个问题讲得比较清楚和比较透彻。

他指出：人们对客观世界的认识，要有一个过程。中国的民主革命就经历了24年后才有了比较正确的认识。如果有谁说，在一开始的时候，就完全认识了中国革命的规律，那是吹牛，你们切记不要信，没有那回事。现在进行社会主义建设，也必须经过一个很长的过程，要翻过筋斗，碰了钉子，有了成功和失败的比较，才能比较主动、比较自由。恰恰在这个问题上，我们还缺乏经验。

毛主席还诚恳地说：

在社会主义建设上，我们还有很大的盲目性。社会主义经济，对于我们来说，还有许多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拿我来说，经济建设工作中间的许多问题，还不懂得。工业、商业，我就不大懂。别人比我懂，少奇同志比我懂，恩来同志比我懂，小平同志比我懂。陈云同

志，特别是他，懂得较多。……对于农业，我懂得一点。但是也只是比较地懂得，还是懂得不多。……我注意得较多的是制度方面的问题，生产关系方面的问题，至于生产力方面，我的知识很少。社会主义建设，从我们全党来说，知识都非常不够。我们应当在今后一段时间内，积累经验，努力学习，在实践中间逐步地加深对它的认识，弄清楚它的规律。

他还指出：在认识客观规律以前，我们的行动总是不自觉的，带着盲目性的。这时候我们是一些蠢人。最近几年，我们不是干过许多蠢事吗？人家不骂，我们应当自己骂自己，从这些事来看，我们实在是太蠢了。毛主席这段话讲得多好啊！他的态度如此诚恳、谦虚，当时大家听了，无不深受感动。无论干什么事，无论在什么时候，如果处于不自觉的盲目状态，就会违背客观规律，就会干蠢事。干了蠢事，别人批评了要欣然接受，别人不批评，也不能安然无事，也要做自我批评，“自己骂自己”，并真正引以为鉴，从而变得更聪明一些。这才是马克思主义者的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的光明磊落的精神。毛主席这段话的中心意思就是提倡这种精神。

经过“大跃进”和随后三年困难的挫折，对社会主义建设的长期性，毛主席也有了较深刻的认识。他说：至于建设强大的社会主义经济，在中国，50年不行，会要100年，或者更多的时间。中国的人口多、底子薄，经济落后，要使生产力很大地发展起来，要赶上和超过世界上最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没有100多年的时间，我看是不行的。这比起他1958年在南宁会议、成都会议、八大二次会议的讲话，比起那些“15年超英”、“7年超英”、甚至二年、三年“超英”的口号来，头脑要冷静得多了，思考要深刻得多了。

建设社会主义是崭新的事业，谁都没有经历过，谁也不可能

预先准备好一套经验。因而，只能一边试验，一边前进，在这样的过程中犯错误的可能性很大。在缺乏经验的情况下，如何减少犯错误，特别是防止犯大的错误呢？我想，一是在敢闯、敢试的前提下，要谦虚谨慎，尊重科学，稳扎稳打，一步一个脚印，先试点，后铺开，千万不可莽撞行事；一是犯了错误就及时总结经验教训，赶快纠正。1958年以来的这几年，错误犯得这么大，时间拖得这么长，我看就与没有坚持这两条有关。

2. 关于违背民主集中制。

毛主席在1月30日讲话的第二点，集中分析了这个问题。

“大跃进”那几年中，强迫命令、瞎指挥成风，无论在党内，还是在人民群众中，民主生活都遭到严重破坏。干部、党员和群众，都没有发言权，更不能说不同的、反对的意见，以致酿成了大的错误，并且得不到及时纠正。这是一个沉痛的教训。结合现实生活中的这个教训，毛主席在讲话中尖锐地指出：实行不实行民主集中制，是关系到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大问题。如果在人民内部不实行广泛的民主，干部和群众就不敢讲话，正确的意见就集中不起来，就不可能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在人民内部不实行民主，无产阶级专政就可能转化为资产阶级专政，甚至是法西斯专政，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就不可能正常进行下去。

毛主席强调，在人民内部实行广泛的民主，很重要的就是在党内实行民主，因为我们党是执政党。党委的领导，是集体领导，不是第一书记个人独断。第一书记同其他书记和委员之间的关系是少数服从多数。拿中央常委或者政治局来说，我讲的话，不管是对的还是不对的，只要大家不赞成，我就得服从他们的意见，因为他们是多数。他指出，凡是大事，就得集体讨论，认真地听取不同的意见，认真地对于复杂的情况和不同的意见加以分析。要想到事情的几种可能性，估计情况的几个方面，好的坏的，顺利的和困难的，可能办到的和不可能办到的。尽可能地慎

重一些，周到一些。他批评说，凡是个人说了算的第一书记，是“霸王”，不是民主集中制的“班长”。他引用了两个历史人物来说明，一是“西楚霸王”项羽，不爱听别人的不同意见，甚至连自己的心腹谋士范增的话也不听，结果只落得个“四面楚歌”，“霸王别姬”。一是刘邦，他比较能够采纳各种不同的意见。比如，他改变傲慢态度，虚心听取儒生郦食其的意见，攻取了陈留。刘邦打败项羽不是偶然的，是与他“豁达大度，从谏如流”密切相关的。而我们有些第一书记，连封建时代的刘邦都不如，倒有点像项羽。这些同志如果不改，最后要垮台的，“难免有一天要‘别姬’就是了”。

毛主席说，光在党内实行民主还不够，在人民群众中也必须要有充分的民主。就是要让群众讲话，让群众批评，哪有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怕群众的道理？犯了错误，就要真正把问题敞开，让群众讲话，哪怕是骂自己的话，也要让人家讲。骂的结果，无非是自己倒台，不能做这项工作了，降到下级机关去做工作，或者调到别的地方去做工作，那又有什么不可以呢？对于那些被错误处理了的干部，一经发现就要甄别平反，向他们赔礼道歉；而这些干部也要从逆境中受到益处和锻炼。周文王、孔子、屈原、左丘、孙臧、吕不韦、韩非等人，不都是曾经身处逆境而有所成就和作为的吗？

毛主席还认为，运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是解决人民内部矛盾、充分发扬民主的唯一正确的方法。工作中的是非问题，正确和错误的问题，是属于人民内部矛盾问题。解决这个矛盾，不能用咒骂，也不能用拳头，更不能用刀枪，唯一可用的就是批评和自我批评，用民主的方法，让群众讲话、说理、讨论。犯了错误，就应该检讨，正视错误，承认错误。

毛主席讲话后，小平同志在讲话中也着重阐述了民主集中制问题。他说，“民主集中制是党和国家的最根本的制度”，坚持这

个制度，“是关系我们党和国家命运的事情”。“毛泽东同志强调提出这个问题，意义很重大。这几年来，由于我们没有搞好民主集中制，以致上下不通气，这是一个带普遍性的严重的现象。”他在谈到实行党内民主的问题上，提出了一个重要观点，就是要对权力实行监督。我们党是执政党，对权力实行监督，最重要的是“对于我们党的各级领导人（包括党委会的所有成员），应该有监督。这种监督是来自几方面的，来自上面，来自下面（下级），来自群众，也来自党小组生活”。那么，哪一种监督最有效呢？小平同志提出了自己的真知灼见：“我觉得，对领导人最重要的监督是来自党委会本身，或者书记处本身，或者常委会本身。”他建议，领导人的党组织生活主要应放到党委会、书记处、常委会去。少奇同志插话提出一个月开一次党内生活会。小平同志说，三个月一次也很好。少奇同志表示同意，说：“一季有一次，一年四次也好，开党内生活会。这么一个建议，行不行？每一个委员会，省委也好，地委也好，县委也好，一季开一次会，搞批评和自我批评，过党的生活。”毛主席补充说：“检查工作，总结经验，交换意见。”为什么党委会自身的相互监督是最重要的呢？小平同志说：“上级不是能天天看到的，下级也不是能天天看到的，同级的领导成员之间彼此是最熟悉的。”

陈云同志在2月8日陕西小组会上，也是着重谈的民主集中制问题。他说，“发扬民主，经常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都是我们党的老传统”，“现在要把它恢复起来”。“这几年我们党内生活不正常。‘逢人只说三分话，未可全抛一片心’，这种现象是非常危险的。”“有些‘聪明人’，见面就是‘今天天气哈哈’，看到了缺点、错误也不提。如果这样下去，我们的革命事业就不能成功，肯定是要失败的。”他还提出了认识问题、认识客观事物要掌握“交换”、“比较”、“反复”的方法，以使我们的认识比较全面些。

毛主席关于民主集中制的重要讲话引起了强烈反响。会议结束的第二天，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研究如何修改《书面报告》。少奇同志说：起草《书面报告》时，把分散主义作为主要问题来批评，忽略了民主集中制方面存在的问题。他建议把第二部分“关于集中统一”改为“加强民主集中制、加强集中统一”，把毛主席讲的关于民主集中制的意思加进去。并强调说：我感觉，我们这几年的主要经验之一，就是这一条。如果我们这几年完全根据群众的意见，充分发扬民主，完全走群众路线，有许多错误不会犯，即便犯了，也可以早发现。这几年，我们吃了不调查研究的亏，吃了不讲民主的亏，麦子要割，食堂要办，这个事情人家晓得的，我们不民主，不善于听人家的意见，不充分在人民中间讨论，不认真取得他们的同意，这是一条很大的经验教训。少奇同志还提出一个重要观点：党内民主固然重要，但党内民主不能代替国家的民主，1700万党员的民主不能代替6亿人的民主，那就要充分发扬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作用，通过这个制度去实行人民的民主。他说，社员大会，社员代表大会，人民代表大会，真正要建立起来；党委员会，人民委员会，要真正实行民主，这样，才能有真正的国家的人民民主制度。因此，中央决定，要把“七千人大会”上的精神向人大、政协联席会传达，并组织讨论，提出意见。

修改后的《书面报告》，突出批评了破坏民主作风的倾向，特别是批评了用对待敌人的专政手段来对待人民内部矛盾的“国民党作风”。少奇同志在修改自己的讲话时，亲自用铅笔重写了几大段话，加进了关于民主集中制的内容，强调这是几年来犯严重错误的“根本原因”，甚至是“全部原因”。

在“七千人大会”上，中央领导同志抓住违背民主集中制，特别是抓住破坏民主的倾向，来分析犯错误的原因，确实是抓住了要害。这也是这次会议的显著特点。历史经验说明，能不能坚

持贯彻执行民主集中制，贯彻执行得好不好，直接关系到党和国家的政治生活是否正常，党和政府的决策是否正确，党和人民的事业能否顺利发展。因此，民主集中制是一个涉及党和国家全局、前途的一个大原则、大制度、大问题，任何时候疏忽不得。在“七千人大会”上，毛主席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关于这个问题的一系列论述，应该说把党的民主集中制的理论大大向前推进了一步，使之得到了丰富和发展。但是，遗憾的是，这次大会以后，民主集中制在党内特别是党的高层政治生活中，并未得到严格遵守和真正执行，而且日益受到破坏，从而也日益加剧了党内生活的不正常。我认为，这是导致“文化大革命”悲剧产生的根本原因之一。在10年“文化大革命”中，一方面是违反民主的个人崇拜达到了极点，一方面是破坏集中统一的无政府主义达到了极点，民主集中制遭到了空前的大破坏。这段悲剧的历史说明，要真正坚持和正确执行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是非常之不容易的。我一直在思索，在我们党和国家的政治生活中，尤其是在重大的决策工作中，如何才能确保民主集中制顺利执行，真正成为铁的原则，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得到遵守，不被忽视，不受破坏。但是至今也还未思索得很清楚。不过，从过去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来看，我觉得至少要具备这么几条：一是民主集中制的理论一定要完备，并用以武装大家的头脑；二是民主集中制本身所必需的一系列制度一定要健全和完善，也就是要从制度上保证任何人都不能违背它；三是在广大党员和干部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中，一定要真正养成遵守民主集中制的高度自觉性和高度责任感。所谓“高度”，就是要使这种自觉性和责任感达到始终不渝、坚定不移的程度。显然，要具备这么几条，并且做得好，也是非常之不容易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在健全完善和贯彻执行民主集中制方面，做了许多工作，取得了很大进步。但是用这几条来衡量，仍有不小的距离。不仅现在就是今后相当长一段

时间内，我们都不要轻易说在坚持和完善民主集中制问题上已大功告成了这个话。小平同志在审阅十四大报告时指出：民主集中制是我们党和国家的根本制度，也是最合理最便利的制度。这个问题在报告中要写上一段话，放到那里，将来适当的时候还要展开来好好讲一讲。我觉得小平同志这些话和考虑，十分重要，就是要求和告诫我们，要把民主集中制继续研究下去，继续完善下去，此事还任重道远。

3. 关于分散主义严重泛滥。

在“七千人大会”第一个高潮的18天里，集中分析、批评了分散主义。《书面报告》第一、二稿的第二部分，也着重讲的是分散主义和破坏集中统一的问题。当时，起草委员会在研究《书面报告》的起草、修改时，大家发言认为分散主义是主要问题，应集中批评分散主义。

今天回过头去看，当时把分散主义作为纠正错误的一个问题来抓，还是必要的。由于头脑发热，盲目追求速度、数量，各地有令不行，有禁不止，自行其是，各搞一套，重复建设，浪费惊人。在执行政策中乱提口号，乱放“卫星”，标新立异，虚报浮夸的现象也很严重。“七千人大会”上，各组发言列举了分散主义的种种表现和危害。

当时反对分散主义，强调加强集中统一领导，也是为了集中力量克服困难，渡过难关，搞好国民经济调整。在困难时期，国家财力物力严重匮乏，如果各地还像前几年那样胡吹乱搞，力量分散，显然国民经济的调整是无法进行的，国力民力也无法承受。集中统一领导在任何时候都不可缺少，尤其在渡过困难、调整经济时期就显得更为重要。

4. 关于丢掉了实事求是的传统和作风。

在“七千人大会”分组讨论中，大家分析了1958年以来所犯错误最根本的原因，就是丢掉了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和作风。

比如，山西组在1月18日的讨论中，就列举了主观主义、不实事求是的种种表现：不调查研究，以感想代替政策；瞎指挥，办事不听群众意见，不同群众商量；弄虚作假，欺骗上级；封锁消息，不让上级了解真实情况；盲目执行上级指示，不从本地区实际出发，等等。

《书面报告》对这个问题作了比较深刻的分析，指出：“最近几年，有许多干部忘记了毛泽东同志一贯提倡的实事求是的作风。他们在决定问题的时候，不调查，不研究，以感想代替政策；在进行工作的时候，乱提高指标，说空话，瞎指挥，不同群众商量。这些同志都凭‘想当然’办事，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结果必然是把事情弄糟。”“他们听了一些不确实的事情，如假典型、假‘卫星’等，就以讹传讹，盲目推广”，“根据假报告、假数字来拟定政策、编制计划，必然会犯错误，必然会对党、对人民、对国家造成很大损害”。还指出“另外有一种人”，“故意弄虚作假，瞒上欺下”，“为了争名誉、出风头，不惜向党作假报告，有意夸张成绩，隐瞒缺点，掩盖错误”。这是一种极不老实的欺骗行为，是资产阶级作风。《书面报告》强调必须把树立实事求是的作风作为加强党性的第一标准。在组织上，那几年存在着对老实人讲真话不但不表扬，还给予打击；对讲假话、做虚事的人不但不批评、处分，反而表扬、提拔。必须纠正这种现象，不能使那些不老实的人占便宜。

周总理2月3日在福建组发言，谈到这次大会检讨错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要恢复“说真话，鼓真劲，办实事，收实效。这四句话归纳起来就是：实事求是”。

5. 关于只反右不反“左”的恶果。

在传达、讨论“七千人大会”精神时，中央高级党校有同志提出：“为什么这次‘左’的错误范围这样广，这样严重，时间这么久，又这么难以纠正？……为什么中央有的部长到下边视察

工作，看到了真实情况也不敢向中央反映？对这些问题不能完全理解。”这个问题提得是深刻的。

1958年以来，特别是1959年庐山会议及其以后，我们党犯了严重的错误，损失惨重，而且长期得不到彻底纠正，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那几年党内斗争过火，只反右不反“左”，只反保守不反冒进。

反右派斗争和批评反冒进、反“右倾”，实际上形成了这么一种很不正常的政治风气：不容许党员和群众提出不同意见，否则就很容易被扣上有思想政治问题，甚至反党分子的帽子；不容许批评工作中的缺点、错误，特别是各级领导人的缺点、错误，否则就可能被说成是反对党的领导；党内斗争过火，对敢于实事求是、说真话的同志不适当地进行打击、处分；“上有所好，下必甚焉”。上面有人好“左”，下面就有一批以“左”的面孔出现的干部，群众把他们称之为“风马牛”干部（即善于看风使舵、拍马屁、吹牛皮），而这些人往往还容易受到赏识、提拔、重用；尤其在庐山会议以后，各地开展反“右倾”、整风整社和民主补课活动，人们唯恐沾上“右倾”的边。“左”比右好、宁“左”勿右，右是立场问题、“左”是方法问题等观点普遍流行，泛滥成灾。

毛主席对这个问题的严重性有所察觉。1961年1月18日，他在八届九中全会讲话曾这样指出过：庐山会议反右，把纠“左”打乱了。这年6月12日，他在北京中央工作会议上也说过：庐山会议以后，我们错就错在不该把关于彭、黄、张、周的决议传达到县以下，应该传达到县为止。一反右，就有一个假象。搞下去，就整出了许多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现在看，就犯了错误，把好人、讲老实话的人，整成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甚至整成反革命分子。一反右倾，“共产风”又出来了，几个“大办”出来了。大办水利、大办县社工业、大办养猪场、大办交通、大办文教，这五个大办一来，糟糕！

少奇同志在“七千人大会”的讲话中，关于反“左”反右问题主要讲了两点见解，这两点见解在今天看来仍然是很重要的，仍不失为真知灼见。一是，他批评了“左”比右好、“左”是方法问题、右是立场问题的错误观点。他认为：“左”派和右派是相通的，“左”倾错误造成的严重后果，“和右派差不多，不见得比右派好一点”。在党内斗争中，应该是有什么反什么，“有‘左’就反‘左’，有右就反右”。二是，他认为不应该把经济建设中的—些具体问题，看作是“左”或右。他说：“比如说，亩产800斤就是左派，亩产700斤就是右倾。这也是不正确的，在这种具体指标、具体数字的问题上，不应该联系到右倾或者‘左’倾上去。对于生产技术的问题，也不应该联系到右倾或者‘左’倾上去。”

朱德同志在“七千人大会”上参加山东组讨论时强调，不要自上而下地普遍搞反倾向斗争。他说：这几年，党内斗争扩大化了，吃了一些亏，运动中打击面宽了，伤了人。在群众运动中，往往一个偏向来了，掌握不住，越走越偏。“左”的倾向来了，也带群众性，制止不住，要到失败了，吃了亏，才制止得住，“左”的东西往往不容易看清，不容易制止。应该是有“左”反“左”，有右反右，有啥反啥，没有就不反。不要一说反什么就自上而下地来个普遍化。普遍化地进行反倾向斗争，往往造成扩大化错误，这是“左”的错误长期难以制止的一个重要原因。朱德同志这番话，也是讲得很好的，也是经得起实践检验的一种卓识。

建国以来，我们在工作中虽犯过右的错误，但更多的是犯了“左”的错误。“左”是一个顽疾。十年“文化大革命”中，“左”的错误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流毒全党，祸及全国。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党进行拨乱反正，主要就是拨“左”倾错误之乱。有了这个拨乱反正，才有了改革开放的新政策新实践，才开创了我国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新时期。小平同志为此做出了卓越

的贡献。

(四) 几点看法

“七千人大会”，总的来说，是开得好的、成功的，基本上达到了总结经验、统一认识的目的，在我们党的历史上，是一次影响深远的重要会议。陈云同志说过：“这次大会取得了非常大的胜利，不要估计低了。”

我觉得，这次会议有几个好的做法，给我们留下了宝贵的启示。

一是犯了错误，就严肃认真地对待，勇于正视，努力纠正，这是一个郑重的政党的标志。建设社会主义，是人类史上的崭新事来，我们没有经验，在干的过程中难免发生这样那样的问题，难免犯这样那样的错误。关键是要保持高度的政治敏锐性和政治洞察力，密切审视全局，及时总结工作，对的就坚持，不对的就赶快改，好的经验就坚持发扬，失误的教训就认真吸取。用毛主席的话来说，就是干了蠢事，“人家不骂，我们应当自己骂自己”。真正做到这样是不容易的，但是必须做到。做到了，做得好，益处极大：任何困难都可以克服；克服困难、继续前进的新办法、新对策就可以应运而生；领导者因为干了蠢事，犯了错误而失去的威信和感召力，可以重新恢复起来和提高起来。“七千人大会”的事实说明了这一点，说明用这个办法来总结经验，统一认识，改进工作，效果是好的。

二是创造良好的民主气氛，让大家充分讲话，真正实行“不戴帽子，不抓辫子，不打棍子”，下级可以批评上级（地委、省委，直至中央），上级虚心听取意见和批评，反复进行检讨。“七千人大会”实行这种做法，在党的历史上是一个创举，是值得我们继承和发扬的好传统。

三是各级领导同志勇于承担责任，带头进行检讨。毛主席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在这方面做出了榜样。这是资产阶级政党及其领导人不可能做到的。记得当年3月21日，在中南海勤政殿召开的最高国务会议上，张治中先生听了少奇同志介绍“七千人大会”的情况，即席发言，对中央领导同志和各省负责同志自觉检讨错误，主动承担责任，表示“万分感动、万分钦佩”。他说：这可以充分证明共产党“对国家、对人民的忠诚态度和负责精神”。张先生说：我当过十几年国民党的中央常委，从来没有听到蒋介石讲过自己的缺点、错误。蒋介石不论在大会、小会上，都是骂这个、骂那个，从来不骂自己。

当然，这次会议也存在着明显的缺点和历史的局限性。

比如，会上对“三面红旗”仍是完全肯定的，大家都小心翼翼地把握这个大前提，不敢越雷池一步。因而，“七千人大会”总结经验教训，纠正错误，就不能不是初步的，没有也不可能从根本上否定“左”的指导思想。林彪在会上的讲话就与众不同，明眼人一看就知道那是费了心思的。他说：最近几年的困难，“恰恰是由于我们没有照着毛主席的指示、毛主席的警告、毛主席的思想去做”。“毛主席的优点是多方面的，不是一方面的。我个人几十年来体会到，毛主席最突出的优点是实际。他总比较人家实际一些，总是八九不离十的。”“我深深感觉到，我们的工作搞得更好一些的时候，是毛主席的思想能够顺利贯彻的时候，毛主席的思想不受干扰的时候。”1962年3月20日，毛主席在就修改林的讲话致田家英、罗瑞卿同志的信中说：“此件通看了一遍，是一篇很好、很有分量的文章，看了很高兴。”同林彪的讲话相反，少奇同志在讲话中，用“一个大的马鞍形”来批评“大跃进”，说“三面红旗，我们现在都不取消”，过5年、10年后“再来总结经验”，“作出结论”；他还提出“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等等。这些话，今天看来很平常，但在当时听起来的确有

些刺激，从而也就留下了后来党内斗争的阴影。

（薄一波著《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

“七千人大会”的继续：西楼会议

刘少奇在中南海西楼召集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指出现在处在“非常时期”，如不采取果断措施，国民经济将进一步恶化。薄一波评价说：“我认为它是‘七千人大会’的继续，是贯彻大会指导思想的一次务实的重要会议；‘七千人大会’出了题目，西楼会议及其后召开的国务院扩大会议则交了一份比较完满的答卷，对克服当时的经济困难起了不可磨灭的重大作用。”

“七千人大会”结束后的第14天，1962年2月21日，少奇同志在中南海西楼会议室，主持召开了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后称西楼会议。会议连续开了3天，主要是根据“七千人大会”的精神，对“大跃进”造成的经济困难形势进行深入分析，把“七千人大会”上没有涉及或未能展开讨论的问题讲透，并且提出了克服困难的具体措施。我列席了这次会议，对会议的情况至今记忆犹新。我认为它是“七千人大会”的继续，是贯彻大会指导思想的一次务实的重要会议；“七千人大会”出了题目，西楼会议及其后召开的国务院扩大会议则交了一份比较完满的答卷，对克服当时的经济困难起了不可磨灭的重大作用。

（一）实事求是精神的体现

在“七千人大会”上，毛主席虽然一再倡导大家畅所欲言，

揭露矛盾，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并带头作了自我批评，但许多同志由于对国家的经济底盘了解不全面，或者出于顾虑，未能尽言；有少数同志由于还没有从“左”的指导思想中摆脱出来，不愿正视严重的困难。国家计委和财政部提交大会的1962年工农业生产计划和财政预算，虽然作了压缩，但仍有不少缺口。如1962年钢产量定为750万吨，基本建设投资59.5亿元。按此计算，当年财政收支将出现30亿元赤字，而且1958~1961年的财政收入都有水分，核实下来，赤字还会扩大。

西楼会议首先就这些问题展开了讨论。少奇同志指出：“收入要可靠，争取的数字不能打上。支出要打足，各种支出都要打上。实际支出如超出了预算，作预算的人要负责。有赤字要提出来警告大家，采取措施来弥补。过去几年没有揭露赤字是不对的。搞不好，经济还要继续恶化。只有暴露了问题，才好解决问题。”周总理提议下决心对国民经济进行大幅度调整。大家一致同意这一建议，认为只有压缩某些工业生产指标和基本建设投资，才能实现财政收支“当年平衡、略有回笼”的要求，使经济逐步恢复正常秩序，然后在这个基础上发展。

2月23日，陈云同志在会上对当时的经济形势及克服困难的办法作了重要讲话。这里，我简要记述他的讲话要点。

陈云同志指出：“目前的处境是困难的。对于存在着困难这一点，大家的认识是一致的。但是，对于困难的程度，克服困难的快慢，在高级干部中看法并不完全一致。”他认为：“不要掩盖这种不一致。这几年处于大变动中，大家对形势自然会有这样那样的看法。取得认识的一致，需要时间，需要事实的证明。”“把各种不同的看法说出来，进行讨论，不是坏事而是好事，有利于使我们的认识趋于统一。高级干部的看法统一，非常重要。”

陈云同志分析了当时严峻的经济形势，认为困难主要表现在五个方面：

(1) 农业在近几年有很大的减产。1961 年与 1957 年相比，粮食产量减少了 800 多亿斤，棉花、油料等经济作物和畜牧产品减产也很多。粮食不够吃，人民群众肚子里没有油水，身上缺少衣着，这都是农业减产直接带来的后果。

(2) 已经摆开的基本建设规模，超过了国家财力物力的可能性，同现在的工农业生产水平不适应。职工和城镇人口增加过多，不仅农业负担不了，工业也负担不了。

(3) 钞票发得太多，通货膨胀。这几年挖了商业库存，涨了物价，动用了一部分黄金、白银和外汇的储备，在对外贸易上还欠了债。一方面多发钞票来弥补财政赤字，一方面农业、轻工业减产，国家掌握的商品少，这两方面不能平衡。

(4) 城市的钞票大量向农村转移，在物资少、钞票多的情况下，出现了相当严重的投机倒把现象。

(5) 城市人民的生活水平下降。吃的、穿的、用的都不够，物价上涨，实际工资下降很多。

陈云同志认为，上述五点困难中，前两点是最基本的，其他三点是派生出来的。这些问题，都是关系全国人民的大事，关系整个社会主义建设的大事；如不采取果断措施解决，将不利于工农业生产的恢复，不利于市场的稳定，不利于经济建设的开展，也将影响社会的安定。

陈云同志提出了六条克服困难的措施：

(1) 把十年经济规划（指“大跃进”中拟定的 1963 年至 1972 年十年国民经济发展规划的初步设想——作者注）分为两个阶段，前一阶段恢复，后一阶段发展。他估计农业的恢复大约要 3 至 5 年；在恢复阶段，工业只能是放慢速度，进行调整。他认为，不把十年规划分为两段，笼统地要大家执行，又想发展，又要下马，又想扩大规模，又要“精兵简政”，就会彼此矛盾，举棋不定。而明确划分两个阶段，调整的任务才能落实。有了前

一阶段的恢复，才有后一阶段的发展。

(2) 减少城市人口，“精兵简政”。他认为，这是克服困难的一项根本措施。应在1961年已压缩城市人口1000万的基础上，继续压缩，不仅要动员“大跃进”中进城的农民返回农村，充实农业的生产力，还要动员一部分家在农村的职工“回家吃饭”。

(3) 采取一切办法制止通货膨胀。他设想了几种办法：一是严格现金管理，节约现金支出；二是尽可能增产人民需要的生活用品；三是增加高价商品，品种要少，回笼货币要多；四是坚决同投机倒把活动作斗争，在农村建立供销社，在城市建立消费社，互相配合，经营三类物资和一部分工业品，并通过税收、物价及行政手段把自由市场管起来。

(4) 尽力保证城市人民的最低生活需要。他要求做到：城市每人每月供应3斤大豆以补充营养；每年供应几千万双尼龙袜子，以减轻市场棉织袜供应不足的压力；把山珍海味等高级副食品用于高价饭馆，既可改善一部分人的生活，又能多回笼货币。

(5) 把一切可能的力量用于农业增产。他认为，除了增产粮食外，还要采取奖励的办法保证经济作物的增产，如棉农交售1斤棉花供应2斤粮食，使棉农有足够的口粮。国家每年都要拨出一部分钢材、木材，制造中小农具。

(6) 计划机关的主要注意力，应该从工业、交通方面，转移到农业增产和制止通货膨胀方面来，并且要在国家计划里得到体现。他认为，“增加农业生产，解决吃、穿问题，保证市场供应，制止通货膨胀，在目前是第一位的问题”。“国民经济的发展必须以农业为基础，必须按照‘农轻重’的次序来安排计划。”

陈云同志说：“以上六点，是克服困难的主要办法。”“我们的工作部署，要反复考虑，看得很准，典型试验，逐步推广，稳扎稳打。慎重一点，看得准一点，解决得好一点，比轻举妄动、早动乱动好得多。”“凡是看准了确实有效的办法，就要集中统

一，全力以赴。”只要兢兢业业地做几年工作，就一定能够克服困难，争取财政经济状况早日好转。

在陈云同志发言时，大家还三言两语地插话，为他的讲话内容作补充。少奇同志在插话和会议的结论中，讲了一些极为深刻的话。他说：“中央工作会议（即“七千人大会”）对困难情况透底不够，有问题不愿揭，怕说漆黑一团！还它个本来面目，怕什么？说漆黑一团，可以让人悲观，也可以激发人们向困难作斗争的勇气！”“现在处于恢复时期，但与1949年后的3年情况不一样，是个不正常的时期，带有非常时期的性质，不能用平常的办法，要用非常的办法，把调整经济的措施贯彻下去。”少奇同志还建议召开国务院全体会议，请陈云同志再展开讲一讲，统一大家认识，并征求意见。陈云同志接受了这个意见，并建议国务院会议扩大到各部委党组成员参加，由李富春、李先念和他共同传达西楼会议精神。

2月26日，国务院召开扩大会议，李富春同志作了《关于工业情况和建设速度问题》的报告，李先念同志作了《当前财政、信贷、市场方面存在的问题和应当采取的措施》的报告，陈云同志作了《目前财政经济情况和克服困难的若干办法》的报告。这三个报告，贯穿了“七千人大会”和西楼会议的精神，把问题彻底摆开，提出的措施也比较具体。特别是陈云同志的报告，丰富了他西楼会议讲话的内容，并且提出了一些新的观点，对统一高级干部的思想认识起了更大的作用，受到了与会同志的热烈赞扬。他指出：目前的困难是相当严重的，农业生产元气大伤，恢复不可能很快。而农业生产恢复的快慢，直接影响到进口粮食、基建规模和工业生产，因此经济工作要放在“争取快、准备慢”的基点上。陈云同志的报告，已收入《陈云文选》第3卷，这里不再详述。

他们三位的报告，给与会同志很大启发。大家认为，中央把

情况讲透了，又明确了经济分为恢复与发展两个阶段，就使各部委从十年经济发展规划的框框中摆脱出来，致力于调整；西楼会议及国务院扩大会议的召开，符合毛主席倡导的“情况明、决心大、方法对”的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希望中央和国务院经常召开这样的会议，及时解决经济发展中出现的问题。

（薄一波著《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

为知识分子“脱帽加冕”：广州会议

会上大家发言热烈，可以说是一马当先，百马奔腾。所谓一“马”当先，就是中国科学院的学部委员、声学家马大猷。陶铸说他在中南局的座谈会上已经宣布，今后在中南地区一般地不要用“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个名词了。但他的话只是“地方粮票”，中央领导人说了才是“全国通用粮票”。周恩来、陈毅在广州会议上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讲话，在党中央内部有少数人不同意甚至明确反对，在周恩来要求毛泽东对这个问题表示态度时，毛泽东竟没有说话。

1961年7月中央批准下发的《科学14条》（我以为，从实质上应当说，它是国家科委党组和中国科学院党组提出的《关于自然科学研究机构当前工作的14条意见（草案）》、中央科学小组组长聂荣臻为报送14条写给中央的《关于当前自然科学工作中若干政策问题的请示报告》、中央批转聂总报告和14条意见的长篇批语，这三者的简称），有力地推动了党的知识分子政策的调整。但是，这个调整，在政策思想上还没有完全到位，即所谓画龙而未点睛。就是说，还没有触及重新确认我国知识分子已经是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的一部分这个根本的政策和理论问题。

其实，周恩来1956年1月14日在中共中央召开的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上的报告，已经解决了这个问题，为党在社会主义时期的知识分子政策奠定了基础。这篇报告的特点，就是适应新的形

势发展，实现了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知识分子问题的理论和政策上的创新。在报告中，周恩来代表中央，以我国知识分子中间的绝大部分“已经成为国家工作人员，已经为社会主义服务”和在政治上思想上“知识界的面貌在过去六年来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这两点为根据，宣布他们“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

这是中国共产党在知识分子问题理论和政策上的一个全新的结论。

然而，知识分子政策的这个理论问题，当时并没有能够透彻解决。1956年9月党的八大第一次会议的政治报告，在这个问题上出现了反复。大家知道，八大的路线是正确的，是探索中国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良好开端，八大的报告是一个很好的报告。但是，八大报告没有重申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上周恩来报告中关于我国知识分子的绝大多数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的新结论，而是一方面确认“我国知识分子的面貌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另一方面又恢复了“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的传统提法，这里面就包含着矛盾。

当时，我们读到报告，对于没有确认知识分子会议的新结论，是敏感的。于光远是八大代表，我们问他，他说，他也提过，也不理解。多年以后，我有机会问到胡乔木，他是知识分子问题报告的起草者，又是八大报告的起草者，可惜他记不起来是什么原因了。他只是记得，就在知识分子会议时已有不同意见。中央政治局后来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指示》里，就没有用“工人阶级的一部分”的提法。我去查了这年2月24日通过的这个指示，果然如此。但是，指示中还是明确宣布“知识分子的基本队伍已经成了劳动人民的一部分”，这同周恩来报告的精神是一致的。八大报告也没有重申这个指示中的新结论！

1957年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毛泽东进一步说，现在的

大多数的知识分子，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他们还是属于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他还解释过，世界观没有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之分，难道可以说，无产阶级的世界观是唯物主义的，资产阶级的世界观是唯心主义的，小资产阶级的世界观是二元论的吗？

反右派以后，知识分子更被一般地归入资产阶级的范围，并且从“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社会主义革命”的高度，宣称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是资产阶级同无产阶级较量的主要力量。这个论断，应该说，是反右派运动、拔白旗运动以来，知识分子问题上“左”的错误的发展，在理论上的反映和总结。

广州会议之前

1958年12月19日，中宣部的《宣教动态》刊登了一则消息，题目叫《清华大学物理教研组对待教师宁“左”毋右》，反映清华大学检查这个支部的工作，发现党员中有一些不正确的认识：（一）认为社会主义革命时期知识分子是革命对象，过共产主义关更是革命对象，因为他们中的绝大多数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连团员助教也被认为是革命对象。（二）认为高级知识分子都是从根本上反对党的教育方针，他们摆开了阵势向我们进攻，必须还击；所有的统战对象都是促退派，把他们摆在这里，只是为了树立对立面。（三）认为从工人阶级的利益出发，应当走阶级路线，在学校中提群众路线是不妥当的。为了划清界限，宁可“左”一些。提“发挥老教师的作用”，就会模糊阶级界限，放松斗争。（四）认为现在党的威信和群众觉悟都提高了，到了党员可以取而代之的时候了。现在工作忙，做统战工作会妨碍大跃进，一切组织都应当换上党员来领导。

这个材料很能说明把知识分子一般地划入资产阶级的范围，

看成资产阶级同无产阶级较量的主要力量，造成了怎样的思想混乱和政治后果。这种情况必须要纠正。《宣教动态》提出了这个问题，毛泽东注意到了，作了一个重要批示：

陆定一同志：

建议将此件印发给全国一切大专学校、科学研究机关的党委、总支、支委阅读，并讨论一次，端正方向，争取一切可能争取的教授、讲师、助教、研究人员为无产阶级的教育事业和文化科学事业服务，你看如何？文学艺术团体、报社、杂志社和出版机关的党委、党支，也应发去，也应讨论一次。请酌定。

毛泽东

1958年12月22日

这个批示，本来应该成为调整知识分子政策的极其重要的推动力，可惜有两点：一是从1958年底开始的初步纠“左”的努力，后来又被庐山会议反右倾运动的错误打断了；二是从实践行动上指出需要“端正方向”，争取知识分子，而对于把知识分子一般地划入“资产阶级”范围这个理论根源，却还没有触动。

1961年《科学14条》针对“左”的错误的实际后果，对知识分子政策做了调整，可以说是接续由毛泽东批示启动的、后来被打断了的纠“左”的努力。中央批语中用了“端正方向”等语言，显然是以毛泽东那个批示为根据、从毛泽东那个批示中引来的。同时，也同那个批示一样，在回到1956年知识分子会议的结论上去这个根本问题上，还是没有跨出那决定性的一步。“请示报告”中用的还是八大报告的语言：“我们必须运用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力量来建设社会主义。我们也必须运用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来帮助培养工人阶级的科学技术人才。”就是说，在广大知识分子的头上，仍然戴着“资产阶级”这顶帽子。

继《科学14条》之后的《文艺10条》、《高教60条》和中

央关于高教 60 条的指示（9 月 15 日发出），也没有跨出这一步。

倒是同《高教 60 条》一起在庐山中央工作会议上讨论通过的《工业 70 条》，触及了这个问题，明确提出国营企业中的技术人员和职员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薄一波在说明这个条例草案的时候，分析了国营工业企业中技术人员状况的变化，指出：“过去每一次运动，有不少的企业总是把这些人叫做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或者叫旧人员。《条例》上也讲到这个问题，不能笼统说旧的技术人员都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更不能说我们培养出来的青年技术人员也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

这个文件只管国营工业企业，没有涉及科学教育文化机构中的广大知识分子。

陶铸功不可没

不过，随着这些条例的制订和贯彻，知识分子阶级属性这个根本问题的普遍提出，是势所必至的了。

还在这些条例通过之前，在 1961 年 6 月 19 日的文艺工作座谈会上，周恩来就说过：“有一个时期好像觉得 1956 年关于知识分子的那些问题可以不讲了，不是的，那些原则仍然存在。”

在这些条例出台以后，鲜明地把这个根本问题提了出来的，是当时任中南局书记兼广东省委书记的陶铸。

这一年 9 月 28 日，根据中央关于讨论和试行《科学 14 条》和《高教 60 条》的要求，广东省委召开了有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高级知识分子中的全国人大代表和全国政协委员参加的高级知识分子座谈会，陶铸在会上发表了在党内外引起强烈反响的讲话，郑重地提出了这个问题。

陶铸是这样说的：

12 年的时间不算短，知识分子可以说已同我们结

成患难之交。几年来的物质条件比较困难，没有猪肉吃，大家还是积极工作，没有躺倒不干。酒肉之交不算好朋友，患难之交才算，“疾风知劲草”，“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现在的问题是团结高级知识分子不够，对他们的信任不够。……今后对于思想认识问题，只能采取关心、倾谈、切磋、诚恳帮助的办法，要把思想问题与政治问题严格区分开来，今后不能采用大搞群众运动的办法来解决思想问题。……对于过去批判搞错的，应该平反、道歉、老老实实认错。“等价交换”。在什么场合戴的帽子，就在什么场合脱帽子，不留尾巴。凡是三年来斗争批判错了的，我代表中南局和广东省委向你们道歉、认错。……同时，我还建议：今后一般不要用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个名词，因为这个帽子很伤人。其次，凡属思想认识问题，一律不准再搞思想批判斗争会。第三，不准用“白专道路”的帽子。

12天后，陶铸又在他主持召开的中南地区高级知识分子座谈会上说：

我们不能老讲人家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我看要到此为止了。现在他们是国家的知识分子，民族的知识分子，社会主义建设的知识分子。因此，我建议今后在中南地区一般地不要用“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个名词了，那个名词伤感情。谁有什么毛病，实事求是，是什么讲什么，不要戴这个帽子。

这些讲话，表现了党的一位地方领导人在贯彻执行中央文件的过程中，在政策问题上的创造性和主动性。

近年的许多回忆和史籍，在讲到广州会议为知识分子“脱帽加冕”的时候，往往忽略了陶铸代表中南局和广东省委的这些活动，不能不说是一个缺陷。《陈寅恪的最后20年》一书，在这个

问题上发掘了不少史料。我在这里引用的陶铸讲话的内容，主要就是这本书上抄来的。

当时，我们没有听到、看到陶铸讲话的文本，只是从中宣部的内部刊物《宣教动态》11月的一期上看到《中南一些知识分子认为党给他们“摘掉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帽子”》这样一条消息。其中说：“10月间，中南局召开了中南地区高级知识分子座谈会。在这以前，9月下旬和10月初，广东省委也举行了几次高级知识分子座谈会。据《广东宣教动态》反映，大家对陶铸同志在会上提出的‘今后一般地不再叫他们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最为高兴，认为党已经给他们‘摘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帽子’。”还反映了许多知识分子对陶铸讲话表示欢欣鼓舞的发言。这条消息，可以说是“纯客观”的，甚至可以说是“有保留”的，但是，我们许多人是从这里知道这件事的。

聂总功不可没

本文所说的广州会议，不是指上述1961年秋天广东省委和中南局召开的高级知识分子座谈会，而是指1962年春天在广州召开的两个全国会议，一个全国科学技术工作会议，一个全国话剧、歌剧创作座谈会。因为周恩来在聂荣臻主持的全国科学技术工作会议上讲了话，接着陈毅分别在这两个会议上讲了话，在调整知识分子政策上跨出了决定性的一步，所以人们把这两个会合到一起，通称广州会议。

聂总在他的回忆录中说：

“回忆起那一段工作，还应该提到的就是《科学14条》公布半年以后的广州‘全国科学技术工作会议’，那是1962年2月16日由我主持召开的。……”

“那次会议的目的，起初是想借《科学14条》贯彻以后的东

风，搞出一个新的科学规划来。大家集中到广州以后，我先找少数科学家谈心，发现知识分子仍然顾虑很大。有人问我，对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个提法如何理解？他们说，一提起知识分子，就是资产阶级的，叫做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使子女也因此受到歧视，从没听到有人提谁是无产阶级知识分子。我觉得这个问题要解决。我先请示了恩来同志。他说：‘知识分子就是知识分子，人民的知识分子。’过去在国务院开会，对知识分子的阶级属性就有争论。我说：‘革命这么久了，大学为我们培养的都是知识分子，难道都是为资产阶级培养的？这不能理解嘛！’我记得当时的国务院副秘书长许明同志，就很同意我的意见，她很激动地说：‘办那么多学校，都是培养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我们干什么！那是不合乎逻辑的。’

“所以我感到这次会议应该进一步解决这个问题。于是把会议的要点改为两个：一是进一步搞出新的科学规划；二是进一步深入贯彻《科学 14 条》，突出地调整一下与知识分子的关系问题。”

同陶铸一样，聂总在推动知识分子政策的这一决定性调整中，也是功不可没的。

需要补充的就是，广州会议的召开，先有陶铸的中南地区高级知识分子座谈会做背景，后有中央在北京召开的七千人大会做背景。

我们中宣部科学处的同志参加了广州全国科学技术工作会议。会议按聂总的指示，遵照刚刚开完的七千人大会的精神，“白天出气，晚上看戏”，畅所欲言，共同总结几年来科学技术工作和知识分子工作中的成绩和失误，经验和教训。

—“马”功不可没

会上大家发言热烈，可以说是一马当先，百马奔腾。

所谓一“马”当先，就是中国科学院的学部委员、声学家马大猷，在会议第二天率先提出：“昨天聂总报告‘三不’，不扣帽子，可是我们头上就有一顶大帽子——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如果凭为谁服务来判断，那就不能说我们还在为资产阶级服务。如果说有资产阶级思想，或者思想方法是资产阶级的，所以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那么脑子里的东西，不是实物，是没法对证的。这个问题谁能从理论上说清楚？”

国家科委的赵石英，叫人写了马大猷发言的报道，交给会议简报（据“文化大革命”中的小报揭露，简报的主编，是国家科委的高更用，中宣部科学处的龚育之，科学院的黎功德）。先是只登向领导反映的简报，后来按领导的指示和督促，索性登在发给全体与会人员的简报上。这就引起了更大的反响和很多人的共鸣。有的科学家还说，地主劳动三年，可以改变成分，为什么我们干了十几年，还不能改变，还叫我们资产阶级知识分子？

这些情况也都上了会议简报。

总理主持决策

聂总从广州打电话，向那时还在北京的周恩来总理汇报了情况。周恩来动身来广州之前，于2月25日给毛泽东写了信，报告次日将同陈毅一起赴广州，“谈军队转业十万干部的安置问题和科学机构的精简问题，同时也准备同科学家见见面（他们正在广州开科学工作会议），听听他们的意见。”（据《周恩来年谱》）

周恩来听了汇报，看了全部会议简报。他面对的正是在中南

地区已经形成、在科学会议上进一步形成的这样的舆论背景。他到会上来讲话，作为中央领导人，难以回避对知识分子政策的这一根本问题作出权威说明的强烈要求。

我记得，于光远（中宣部科学处处长）当时告诉我们：周恩来就这个知识分子阶级属性判定的重大问题，召集在广州的一些领导同志（现在记得他提到的有陶铸、聂荣臻、张劲夫、于光远、范长江、杜润生、武衡等人）征求意见。

陶铸非常明确，说他在中南局的座谈会上已经宣布，今后在中南地区一般地不要用“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个名词了。但是，他的话只是“地方粮票”，不能在全国通行；中央领导人说了，才是“全国通用粮票”。

科学界的几位领导人表示赞同。

周恩来还特别问于光远说，你是中宣部的，你是什么意见？（不知道周恩来这时是不是注意到了《宣教动态》上的那则情况反映。）于光远也说了赞同的意见和他对知识分子问题的分析。

最后，周恩来说：不再一般地称知识分子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肯定绝大多数知识分子属于劳动人民的范围，这是今天参加讨论的同志一致的意见，我们大家共同负责啊！

这样，1962年3月2日，周恩来在广州会议上作了那篇著名的讲话《论知识分子问题》。建国以来，周恩来关于知识分子问题作过三篇重要讲话：1951年那一篇，向北京和天津的高等学校师生作思想改造的动员，它的特点，在于现身说法的人格魅力；1956年那一篇，在中央召开的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上作主题报告，它的特点，在于新条件下的理论创新；1962年这一篇，广州会议上的讲话，它的特点，则在于拨乱反正的政治勇气。这三篇讲话都收进《周恩来选集》了。

周恩来在广州会议上的这篇讲话，立论谨慎，照顾周到，但是，指出党历来认为同知识分子的联盟属于同劳动者联盟的范

围，重提6年前知识分子会议的“初步估计”，强调12年来我国大多数知识分子已有了根本的转变和极大的进步，则是非常明确的。

陈毅画龙点睛

对于周恩来的讲话，会上反应热烈，大家极其拥护，又感到还有意犹未尽、话犹未透的地方。经过同周恩来商量，陈毅3月5日在科学技术工作会议上，3月6日在话剧歌剧创作会议上快人快语，作了那个著名的“脱帽加冕”的讲话。在3月6日的会议上，陈毅说：

有些人说：“我们跟共产党走了12年，共产党总是不相信我们，还是把我们当成外人看待。”这样下去怎么行呢？这个问题必须解决。经过反复的考虑，昨天我对科学家讲话时，讲得很尖锐。周总理前天动身回北京的时候，我把我讲话的大体意思跟他讲了一下，他赞成我这个讲话。他说，你们是人民的科学家，社会主义的科学家，无产阶级的科学家，是革命的知识分子，应该取消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帽子。今天，我跟你们行“脱帽礼”。

周恩来回北京，一件重要事情就是准备即将提交二届全国人大第三次会议的政府工作报告。经中央政治局讨论同意的这个报告中明确肯定：

我国的知识分子，在社会主义建设的各个战线上，作出宝贵的贡献，应当受到国家和人民的尊重。我国知识分子的状况，已经同解放初期有了很大的不同。新社会培养出来了大量年轻的知识分子，他们正在沿着“又红又专”的道路成长。从旧社会来的知识分子，经过

12年的锻炼，一般地说，已经起了根本的变化。知识分子的绝大多数，都是积极地为社会主义服务，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并且愿意继续进行自我改造的，毫无疑问，他们是属于劳动人民的知识分子。我们应该信任他们，关心他们，使他们很好地为社会主义服务。如果还把他们看作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显然是不对的。

这就表明，广州会议对知识分子的“脱帽加冕”，已经不只是中央几位领导人的共同意见，而是经过中共中央和全国人大同意的正式意见。

《七十年》的评论和胡乔木的修改

在胡绳主编的《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中，写到广州会议这一段历史的时候，我们提出了一个论断：“周恩来在广州会议上所作的《论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同他1956年所作的《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和1951年所作的《关于知识分子的改造问题》的报告一脉相承，是建国以后代表党对知识分子的正确政策的三篇历史文献。”

胡乔木在审定书稿的时候，在这个地方亲笔加写了这样一段话：“但是，党中央对思想政治上的‘左’倾观点没有作出彻底清理。周恩来、陈毅在广州会议上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讲话，在党中央内部有少数人不同意甚至明确反对，在周恩来要求毛泽东对这个问题表示态度时，毛泽东竟没有说话。这种情形是后来党对知识分子、知识、文化、教育的政策再次出现大反复的预兆。”

的确，1962年9月“重提阶级斗争”的八届十中全会期间，有同志提到知识分子“脱帽加冕”的问题。毛泽东已经表示了他对此并不以为然的意见。不过，他没有多谈，会上也没有多讨论。会议公报中，知识分子是没有“帽子”的光头，既没有加上

“劳动人民”之冕，也没有重戴“资产阶级”之帽，相关的文字是：“要加强对知识分子的团结和教育工作，使他们充分发挥应有的作用。”这当然只是一种暂时的情况。

文教书记会议上的争论

十中全会以后，在全国文教书记会议上，关于知识分子问题发生了一场争论。

争论的一方仍然赞成广州会议上的意见。

争论另一方的意见，以10月22日陆定一的讲话为代表。这篇讲话认为：

“这些年来知识分子政策有些乱，一‘左’一右。‘左’发生在1957年，1958年，1959年的下半年和1960年的上半年，表现为拔白旗，宁‘左’毋右的那个纲领，提升职称的那个文件。右表现为脱帽加冕，知识分子都成了劳动人民知识分子。知识分子只有两种：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无产阶级知识分子，按世界观来划分。劳动人民知识分子的提法不确切，模糊了阶级界限。出身于农民、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不附属于无产阶级，就附属于资产阶级。在社会主义时期，知识分子，不附属于无产阶级，就附属于资产阶级。在社会主义时期，知识分子中的统一战线，包括无产阶级知识分子和资产阶级左派、中间派的知识分子，团结的范围一直要伸展到中右的知识分子。用这样一条界限来防‘左’防右。”

这段话，是根据我保存下来的个人笔记摘录的。其中所说“宁‘左’毋右的那个纲领”，指的就是1958年12月《宣教动态》上刊载、毛泽东作了批示的《清华大学物理教研组对待教师宁‘左’毋右》的材料。“提升职称的那个文件”，指1960年3月教育部的一个文件，其中规定，只有政治上属于左派和中左

的教师可以提升职称；属于中中的，有一半可以提升，另一半不能提升；属于中右的都不能提升，右派更不能提升。界限划在“中中”的中间，中右被划到敌人一边去了。

这场党内争论，惊动了中央。

中央书记处的“正式结论”

据薄老《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一书的介绍，11月26日在中央书记处会议上，陆定一汇报了会上的不同意见。

周恩来听后明确表示：“对知识分子，说我们提劳动人民的知识分子是没阶级分析，我是代表党作报告的，是党批准的，不是我一个人起草的。”他还引用刘少奇在宪法报告中讲过劳动人民知识分子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作为论据，说“我不认为我在广州会议上讲劳动人民知识分子有什么错误”。

邓小平表示支持，说：“恩来在广州报告没毛病，对知识分子问题应照总理讲的解释，请定一查一查，澄清一下，讲清楚。关于知识分子问题，下次会议还要讨论，统一解释口径，还是按总理在人代会讲的为准，把那一段印一下，那是中央批准的我们党的正式语言，今天正式决定。”

邓小平还说：“上次在主席处谈了，这次宣传会议关于知识分子的讨论，不下传。”

虽然有了这个正式决定，争论在会上不再进行了，但问题实际上还是没有解决。

《知识分子问题提纲》

中央书记处会议以后，陆定一立即着手，由中宣部准备一个文件，题目是《社会主义社会的文化革命和知识分子问题提纲》。

起草工作，经部长办公会议讨论，陆定一、各位副部长和一些处长都发表了意见，交给董大林主持，我和龙卧流（他已逝去多年了，呜呼！）参加。

陆定一亲自执笔为这个提纲写了第一部分，讲十中全会关于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的长期性的思想。文化革命，给了一个定义：革文化落后的命，革资产阶级思想的命。后面的部分，讲知识分子问题，按陆定一的意见，从政治上分析，强调团结一切革命的和爱国的知识分子；从阶级上分析，还是按世界观划分，分为无产阶级知识分子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同工农相结合，树立无产阶级的、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才是无产阶级知识分子，否则，还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陆定一的总的思路是：民主革命时期，同整个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结成统一战线；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改造以后，资产阶级右派分裂出去，还要同资产阶级左派和中间派（一直到中右）知识分子结成统一战线。资产阶级右派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左派是拥护党拥护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中间派是处在两者之间的。中右是有时对党对社会主义也持反对立场，但不是坚持反党反社会主义。只要不是坚持反党反社会主义，也要加以团结。把反对资产阶级右派，变成反对所有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破裂同资产阶级左派、中间派知识分子的统一战线，这是原则的错误。现状的估计是：无产阶级知识分子占30%多一点，资产阶级左派知识分子占30%多一点，资产阶级中间派知识分子占30%多一点，资产阶级右派知识分子不到10%。

这是理论的框架。

在当前工作和具体政策上，则是接续《科学14条》、《高教60条》、《文艺8条》几个条例纠“左”的努力，并且力求把几个条例中的政策规定加以总结和系统化，制定了对待“资产阶级左派和中间派知识分子”的七条具体政策：

一、在政治上，团结他们，实行民主；

二、在学术上，实行双百方针（包括在文艺上要容许政治上“无害”的作品，在学术上要“引导资产阶级学者做好非马克思主义的学术工作”）；

三、在业务上，向他们学习，实行“同工同酬”（“学术职称和工资级别根据业务水平评定，不因政治思想进步的快慢而不同”）；

四、在行政职务的安排上，实行“三三制”（共产党员加资产阶级左派加资产阶级中间派的代表）；

五、在领导工作中，实行“三结合”，吸收专家参与某些政策和计划的评论和制定；

六、在技术工作中，实行专家的“技术责任制”；

七、在生活上，给较高水平的专家以较高的待遇。

另外，还规定了实行学位制度、制定奖励办法、定期提升职称等鼓励业务积极性的措施。

作为“三三制”的一个示范的例子，陆定一亲自安排了北京大学校长的人选。增加了四名副校长，文科两位：翦伯赞，魏建功；理科两位：王竹溪，傅鹰。翦一直是著名的左派，傅一直是中右的标兵。

在起草和讨论这个提纲的过程中，在具体政策上，意见大都一致，但是在理论框架上，意见还是难以统一。不少同志对于不提劳动人民知识分子，还是表示难以同意；对于知识分子“非无即资”的划分，也表示难以同意。有些同志主张，拥护党拥护社会主义的知识分子，就可以称为劳动人民知识分子；也有同志主张，这样的知识分子可以称作半无产阶级知识分子。意见难以统一，文件也就搁置起来，没有搞成，没有提到中央讨论。

后话和后话的后话

而形势的发展，也不需要这样一个文件来统一认识了。很快，阶级斗争为纲的弦越绷越紧，随着阶级斗争扩大化和学术文化领域各种过火批判的日益加紧，教育学术文化领域被认为社会主义改造收效甚微，至今还是由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着，这种状况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

“文化大革命”在一种意义上可以说，就是从“彻底批判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和“保护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的“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开刀的。

“文化大革命”一开始，陆定一就被打倒，中宣部被当作保护“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阎王殿”给砸烂了。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陆定一复出，发表的第一篇文章，就包含这样一段自我批评：

“对于我国知识分子队伍的情况，周总理也作了实事求是的估计。有人把我国知识分子队伍说得漆黑一团，周总理不同意这种看法，他说：‘我国知识分子绝大部分是好的，他们听党的话，愿意为社会主义服务。’周总理把为谁服务的政治态度作为划分知识分子阶级属性的唯一标准，而不把世界观作为标准。世界观的改造是长期的，当然每个知识分子都应该改造世界观。这是很对的。我在这个问题上的观点，当时曾经是偏‘左’的，所以是错误的。我要努力向周总理学习。”

在另一篇文章中，陆定一又说：

“1956年，中国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全党的中心任务是建设。要团结工人农民，还要团结知识分子。党内对于是否团结知识分子，又有两种绝对相反的主张。一种人，包括周总

理、陈毅、聂荣臻、王震等同志，是重视而且能团结知识分子的。另一种人，是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认为知识分子就是资产阶级，是‘臭老九’，是敌人，‘知识越多越反动’，要打倒。‘文化大革命’就是从打击知识分子开头的。还有的人，在两者之间，比如说我自己吧，对知识分子犯了不少‘左’的错误，同时也提出过‘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正确意见。”

两篇文章，见《陆定一文集》第 697 ~ 698 页，780 ~ 781 页。陆定一的这种态度，赢得了广泛的尊敬，也是全党的经验和财富。

（龚育之：《为知识分子“脱帽加冕”的广州会议》）

全面贯彻“八字方针”： 1962年5月中央工作会议

这次在北京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由刘少奇主持，周恩来安排会议议程，拟定出席会议人员的名单。邓小平说：“如果照现在这样拖下去，无非是拖垮。”刘少奇说：“目前的经济形势到底怎么样？我看，应该说是一个很困难的形势。”周恩来说：“这两年的调整中，我们觉得，我们的经验，每次总是对困难估计不够，总是希望来得好，来得快一点。”会议之后，大幅度的调整国民经济的工作在全国范围内展开。

1960年，中央制定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但是，由于“左”的思想的影响和对困难的估计不足，这个正确的方针没有得到有力的贯彻。1962年5月中央工作会议，实事求是地分析了经济形势，做出了全面贯彻八字方针、花大力气对整个国民经济进行调整的重大决策，是我们党反对“左”倾错误的一次重要会议，成为60年代我国国民经济摆脱困境走上正确轨道的重要转折点，在我党的历史上尤其是在党领导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历史上，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

一、会议前的一些情况

1962年1月中旬至2月7日，党中央召开了扩大的中央工

作会议（即七千人大会），初步总结了1958年以来的经验教训。

2月21日至23日，由刘少奇同志主持召开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即“西楼会议”），在讨论1962年国家预算时，发现当年的预算有很大的赤字，商品供应量和社会购买力之间有很大的逆差。刘少奇同志和其他中央负责同志批评了财贸办公室的报告没有暴露赤字，没有揭露矛盾，没有解决问题，要求重新提出报告。会议分析了经济形势，进一步研究了财政经济方面存在的严重困难，指出当时我国国民经济是处在一种很不平常的时期，即非常时期。陈云同志在会上作了《目前财政经济的情况和克服困难的若干办法》的讲话，并于2月26日向国务院各部委党组成员作了同样内容的讲话。陈云同志分析了当时财政经济方面存在的粮食减产、基本建设规模过大、通货膨胀、人民生活下降等严重困难，提出了克服困难的六点意见：（一）把（以后的）十年经济规划分为两个阶段，前一阶段是恢复阶段，后一阶段是发展阶段。（二）减少城市人口，精兵简政。（三）采取一切办法制止通货膨胀。（四）尽力保证城市人民的最低生活。（五）把一切可能的力量用于农业增产。（六）计划机关的主要注意力应该从工业、交通方面，转移到农业增产和制止通货膨胀方面来，并且要在国家计划里得到体现。2月26日，在国务院各部委党组成员会上，李富春同志还作了《关于工业情况和建设速度问题的报告》，李先念同志作了《关于当前财政、信贷和市场方面存在的问题和应当采取的措施的报告》。中央于3月18日批发了陈云同志和李富春、李先念同志的讲话，要求各地认真讨论。

“西楼会议”后，向在武昌的毛泽东同志汇报了会议的情况。毛泽东同志对于陈云同志提出的把今后十年经济规划分为两个阶段的意见表示同意。并商定成立了中央财经小组（陈云同志为组长，李富春同志为副组长）。

与此同时，中央发出了《关于改变农村人民公社基本核算单

位问题的指示》，正式决定以生产小队为基本核算单位，30年不变；还成立了由杨尚昆、习仲勋等同志组成的中央精简小组，负责精简职工和城镇人口的工作。

3月7日，陈云同志在中央财经小组会上讲话，提出“今年的年度计划要做相当大的调整。要准备对重工业、基本建设的指示‘伤筋动骨’”。他讲话的中心是论述了“综合平衡”的问题。这是一个有了多年的经验教训并且有很多争论的关于经济工作的根本指导思想的问题。周恩来同志在陈云同志讲话时有一段插话，对这个问题做了非常精练的概括，他说，“可以写一副对联，上联是先抓吃穿用，下联是实现农轻重，横批是综合平衡”。陈云同志讲话的精神就是如此。他十分重视安排好人民生活的问题。“西楼会议”他提出对大中城市的6000万以上人口每人每天供应一两黄豆，这次他又提出设法供应每人每月半斤鱼和增加供应半斤肉。他强调地指出：“人民群众要看共产党对他们到底关心不关心，有没有办法解决生活问题。这是政治问题。”“农业问题、市场问题，是关系五亿多农民和一亿多城市人口生活的大问题，是民生问题。解决这个问题，应该成为重要的国策。”“为了农业、市场，其他的方面‘牺牲’一点是完全必要的。今年的计划，特别是材料的分配，应先把农业、市场这一头定下来，然后再看有多少材料搞工业。工业也要首先照顾维修、配套，能够维持简单再生产。满足了当年生产方面的需要，再搞基本建设。有多大余力，就搞多少基本建设。今年如此，今后也要如此，使人民的生活一年一年好起来。”他说：“我们花了几十年的时间把革命搞成功了，千万不要使革命成果在我们手里失掉。现在我们面临着如何把革命成果巩固和发展下去的问题，关键就在于要安排好六亿多人民的生活，真正为人民谋福利。”陈云同志详细地论述了“综合平衡”问题。他说：“所谓综合平衡，就是按比例。”“按比例是客观规律，不按比例就一定搞不好。”“搞经济不搞综

合平衡，就寸步难移。”他反对“有些同志认为，现在不能搞综合平衡，因为没有条件。他们主张先订出几个远景指标，然后推算出各种数字，制定建设方案”的错误思想，提出：“我的看法是，综合平衡必须从现在开始，今年的年度计划就要搞综合平衡，开步走就要综合平衡。”“要从现在综合平衡的经济水平出发，经过切实的研究和计算，看远景规划能达到什么水平，而绝不能采取倒过来的办法。”在说到要按什么“线”搞综合平衡时，他针对过去几年我们的计划工作上搞以钢为纲，搞高指标的主观主义的错误，提出：“按短线搞综合平衡，才能有真正的综合平衡。”“过去几年，基本上是按长线搞平衡。这样做，最大的教训就是不能平衡。结果，材料和半成品大量积压，造成严重浪费。在这方面这几年的教训已经够多了。”他说：“所谓按短线平衡，就是当年能够生产的东 西，加上动用必要的库存，再加上切实可行的进口，使供求相适应。例如生产一定数量的钢，需要一定数量的有色金属，那就要认真地计算这些有色金属当年能生产多少，能动用库存多少，能从国外进口多少，在这个基础上进行平衡，确定钢的生产指标。”“总之，计划指标必须可靠，而且必须留有余地。只要综合平衡了，指标低一点，也不怕。看起来指标低一点，但是比不切实际的高指标要好得多，可以掌握主动，避免被动。”“长期计划的指标，更要注意留有余地，而且以后再不要只想到钢了，应该在综合平衡的基础上全面安排。”

3月25日，财贸办公室向主席并中央重新作了《关于1961年财政信贷执行情况和1962年如何实现中央“当年平衡、略有回笼”方针的报告》。如实地反映了1958年以来的四年财政收入有虚假，年年有赤字的情况，提出了消灭赤字、平衡收支的各项措施。4月6日，周恩来同志将这个报告连同中央的批示稿送毛泽东同志审阅。毛泽东同志于4月12日作了批复：“即送总理：此件及附件、附表，均已看过，认为很好，可即发出。”就在当

天，中央批转了财贸办公室的这个报告。中央批示中写道：“中央认为，当前财政经济的困难，比1962年2月中央扩大工作会议时的估计，还要更大一些。今年国家财政，在采取措施以前有50亿元的赤字，这是当时所没有完全估计到的。在克服困难的过程中，我们对困难的认识逐步深刻起来，这是一件好事。”“目前主动承担这些困难，比财政继续发生赤字，通货继续膨胀，将来被迫承担更大的困难，要好得多。”

三四月份，许多地方和部门都按照中央的要求，讨论了陈云同志的讲话，并向中央送来简报和报告，反映绝大部分领导同志都同意陈云同志讲话和中央指示的精神，有的还检查了本身工作中的错误，有的则提出了补充意见。

4月16日，刘少奇同志在给毛泽东同志的信中写道：“最近，我要邓力群找陈云同志几年来有关经济工作的一些意见来看，他找来了，并搞了一个摘要。我只看了这个摘要，现特送上，请主席看看。此外，陈云同志在今年3月7日财经小组会议上的讲话，也提出了一些很重要的意见，很值得一看。以上几个文件，已要办公厅发给中央常委、书记处和中央财经小组各同志。是否还要发给其他同志？请主席阅后酌定。再征求陈云同志意见。”

4月26日，中央发出通知，把传达和讨论陈云等同志讲话的范围，由原来的省军级扩大到地（市）级。

在此期间，中央财经小组于4月2日召集国务院财经各部的党组负责同志听取国家计委关于调整1962年计划的报告，并且进行了三天的讨论。以后，财经小组成员又继续讨论了两天。4月下旬，周恩来总理和李先念副总理向中央提出了《中央财经小组关于讨论1962年调整计划的报告（草稿）》。这个报告全面、深入地分析了当时国民经济的基本形势，如实地指明了经济上的严重困难，正确地提出了克服困难的办法措施，为我们党制定了

坚决调整国民经济摆脱困境的战略方案。于是，中央决定召开以讨论这个报告为中心议题的中央工作会议，在全党的高级干部中统一认识，统一政策，统一步调，以便同心同德扭转困难局面，去“争取财政经济状况的早日好转”。

二、会议的经过

这次中央工作会议，是由中央政治局常委召开的。时间是1962年5月7日至11日，地点北京。出席人员有：在京的政治局常委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成员彭真、陈毅、李富春、贺龙、李先念、乌兰夫、陆定一、陈伯达、康生、谭震林、王稼祥、李雪峰、杨尚昆、罗瑞卿；各中央局书记，中央各部门负责同志，国务院工交、农林、财贸、文教、科学各口的负责同志，以及工作人员等共105人。刘少奇同志主持会议。周恩来同志亲自安排会议的议程，拟定出席会议人员的名单。

会议的中心议题，就是讨论《中央财经小组关于讨论1962年调整计划的报告》。会议着重研究分析财经经济的形势，确定争取经济状况根本好转的方针、办法和措施。

会议首先用了两天时间让与会同志认真阅读中央财经小组的报告和其他会议文件，然后通过小组会和大会进行了认真的讨论。常委同志分头参加了各组会议，听取意见。

在大会上发言的有：

李富春——讲了进一步压缩城镇人口、精减职工、缩短工业生产战线和贯彻农轻重方针的问题；

李先念——讲了粮食、外贸问题；

姚依林——讲了市场物价问题；

邓子恢——讲了进一步巩固人民公社制度的问题；

谢富治——讲了巩固人民民主专政的问题；

林枫——讲了教育问题。

最后一天的大会，由参加会议的四位政治局常委讲话：

周恩来——讲了经济形势和方针任务以及粮食、外汇、市场、精简等问题；

邓小平——讲了当前的中心工作、甄别平反和加强各级党委领导核心的问题；

朱德——讲了农村工作问题；

刘少奇——讲了当前的经济形势和工作中应注意的问题。

会议分为五个小组，共出了 18 号小组会发言简报。各组经过充分讨论，一致同意中央财经小组的报告。

会上十分重视精简职工和压缩城市人口的工作，为使各地能迅速贯彻会议精神，会上决定在中央关于精简工作的正式文件下发前，先将《周恩来同志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关于精简问题的讲话要点》发给参加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的各同志带回去，作为进行工作的依据。

会后，中央起草了《中共中央批发〈中央财经小组关于讨论 1962 年调整计划的报告〉的指示》。5 月 19 日，周恩来同志批报主席。当时在杭州的毛泽东同志同意中央财经小组的《报告》和中央批发这个报告的《指示》，于 5 月 24 日批复“照办”。5 月 26 日，中央即将这个《指示》连同《报告》发至全党，大幅度的调整国民经济的工作就在全国内展开了。

三、会议的基本精神和主要内容

这次会议的基本精神和主要内容概括于中央常委周恩来、邓小平、朱德、刘少奇等同志的讲话和会后发出的中央批发财经小组报告的文件（即中发〔62〕254 号文件）中。这里我们综合起

来分为十个要点作一介绍：

（一）关于对待困难的态度

这次会议十分重视地讨论了什么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对待困难的正确态度的问题。

有的小组会议《简报》反映，这次工作会议，着重地讨论一下这个问题，确是十分必要的。因为“现在困难很大，而调整进度却很慢，主要是因为大家对困难的深度和克服困难的艰巨性认识还不一致。比较普遍的情况是：还有些盲目乐观情绪和侥幸心理，似乎只要今年农业有个好收成，明年就万事大吉了。所以，大家都在观望、等待，硬撑着空架子，不肯收摊子减人，又错过了近半年的时间。如果继续这样拖下去，不仅会加重困难，使以后恢复起来更加费劲，而且万一国际上有个‘风吹草动’，粮食进不了口，全局就不堪设想”。有的《简报》反映：“现在还有些部门和地方对恢复农业的困难没有足够的认识，进行调整的决心不大，还是陈兵列马，以为只要有一两个好麦收秋收，就可以全部人马重新再上。这是同中央精神相违背的。因此全党要对形势有足够的估计，而且要向群众摊开困难。讲明为什么要退，为什么要减，不要隐瞒。”“要争取快一些渡过难关，就要有‘毒蛇噬臂，壮士断腕’的决心，把一切人力、物力、财力集中使用在刀口上，打歼灭战，同时忍痛砍掉一些东西。”

邓小平同志针对当时党内存在的恐右心理、怕承认困难被说成是“不争上游”、“没有干劲”、“右倾”等等的情况，尖锐地指出不敢迎击困难那才真正是右倾。他说：现在是有个右的问题，就是要不要信心，情况看得对不对，决心大不大的问题。如果照现在这样拖下去，无非是拖垮。拖垮是什么东西呢？拖垮是“左”是右？拖垮是右。我们现在的危险，就是丧失信心，就是看见困难不采取办法，不当机立断。见事迟，情况难免，因为认识不到，但是迟一点见到了，不采取办法，慢慢拖下去，拖垮，

毫无办法，恐怕真正的右是这个。刘少奇同志插话说：照这个趋势，不采取坚决的措施，拖下去要灭亡。邓小平同志说：灭亡，没有前途，那还有什么？那真正叫丧失信心。

刘少奇同志说：目前的经济形势到底怎么样？我看，应该说是一个很困难的形势。现在在经济上来说，总的讲，不是大好形势，没有大好形势，而是一种困难的形势。一部分地区的经济形势比较好，但是，那是部分的，总的来讲，是一种困难的形势。这一点，我看要跟干部讲清楚。讲了这样多年的大好形势，现在讲没有大好形势，而是一种困难形势，这个话是很难讲。我们这回切实这样讲一讲，你们回去跟省委书记讲一讲，然后大家才好讲。我们这里不开口，人家不好讲的。

我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讲了这样一句话：最困难的时期已经过去了。这一句话，现在大家都抓到了。最困难的时期是不是已经过去了？恐怕应该说，有些地区最困难的时期已经过去了。在城市里面，在工业中间，最困难的时期还没有过去。

我们对困难的估计，无非是这样三种：估计够了，或者过了头，或者估计不够。我看，对困难估计过分危险性不大。我们估计有那么多困难，后来发现少一点，困难没有那么多，这好，这危险不大。但是，对困难估计不够就危险了。我们多少年都是因为估计不够而陷于被动。估计过头了危险，还是估计不够危险？比较起来，还是估计不够危险。还没有到那种把困难夸大，使得我们的工作受损失的时候，现在还不到那种危险。将来可能有那种危险，但是现在还不到，现在的主要危险还是估计不够的危险。我们应当充分估计当前的困难以及我们现在还估计不到的那些困难。要准备着迎接困难，克服困难。否则，我们就是对克服困难的准备不够，这是危险的。一个人，充分估计了困难，还不害怕，还是干劲十足地挺起胸膛前进，这是勇敢的。分明有困难，说是没有困难，这样的人，不能算勇敢的人。共产党员的

革命气概应该是充分估计困难，甚至到那个最困难的地方，我还是挺起腰杆前进。我想，我们革命家的气概，马克思主义者的气概，应该这样。对困难估计不够，自己安慰自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

周恩来同志说到：我们目前对困难的情况是不是看得够了？我想要有分析。困难发展的趋势我们是看出来。前年经济调整的时候，觉得很快就调整过来了，去年经济调整也还是这样想。今年七千人的干部会议之后，在西楼开会，陈云同志讲了话，少奇同志作了结论，主席也同意，就是说，调整时期要成为一个阶段。今后十年要划成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就是调整，主要的内容就是恢复。不仅是农业的恢复，工业也要恢复。因为不仅农业生产生产力破坏了，工业也有这个情况，有些生产设备破坏了，部分的生产秩序弄乱了，规章制度都不存在了，还要重新搞起来。教育方面也有这个问题。现在看，这个时期相当长。当然，我们没有确定年限，实际上设想，一般地说，第三个五年计划恐怕就是个调整阶段，甚至于第三个五年计划还不够。现在大家都把这个时间看长一些了，争论不大了，比如这样的会议，大家看法就比较接近一致了。是不是我们现在对困难的情况都弄清了呢？那还不能说。趋势是看清了，调整的时期会长一些也看清了，但是具体情况，比如在那个时期、那个地方发生什么现象，程度多深，常常是由极复杂的因素构成的，常常是现象发生的时候我们才看到。

我们领导上把困难指出来，然后找出办法来克服困难，没有坏处，有好处。懵里懵懂，怕说困难，一听说困难，好像就泄气。过去我们是有这样的情况，这不是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主义者是要摆事实，讲道理，然后找办法。革命就是要认识困难，把困难摆出来，提出办法来，克服困难。共产党就是在克服困难中取得胜利的。我们战争是这样过来的，社会主义改造是这样过

来的，社会主义建设也应该这样往前进。

我们宁可承认对困难估计还不大够，多看一看，不会在困难面前低头、泄气的，反而会在困难面前把我们团结起来，考验我们，依靠群众出智慧，产生克服困难的办法。

这两年的调整中，我们觉得，我们的经验，每次总是对困难估计不够，总是希望来得好，来得快一点。

他们上述讲话的精神，都写进了中央的《指示》中。《指示》上说：

中央曾经指出，国内政治形势是好的，财政经济方面的困难是很严重的。今年一月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以来，我们对于财政经济方面的困难的认识是逐步深入的。有些同志问：现在我们对于困难的认识是不是已经够了。中央认为，中央财经小组的这个报告，比较全面地、深入地分析了当前国民经济的重要情况，我们对于财政经济困难的严重程度，对于克服困难的快慢，从总的方面，可以说认识清楚了。但是，应该指出，有一些具体的困难，我们还没有认识清楚；今后也还可能出现一些现在没有预料到的困难。同时，也应该指出，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如果我们不坚决采取有效的措施，逐步克服财政经济上的严重困难，国内的政治形势也有在某些地方和某些部门出现一些混乱现象的可能。这是全党干部必须警惕的。现在，必须向全党主要干部说清楚当前全国财政经济方面的严重困难情况，说清楚一部分地区和一些部门最困难的时期还没有过去，一部分地区和一些部门虽然最困难的时期已经过去，但是要完全克服困难，还需要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必须引导全党的主要干部认识清楚本地区、本部门的具体困难，并且充分估计今后可能出现的困难。充分地估计困难，有准备地应付困难，对于每一个具体困难都认真对待，创造必要的条件，讲究对付的方法，在最大的困难面前也能够挺起胸脯，顽强斗争，尽最大努力，一个一个地、一批一批地去克服困

难，战胜困难，这是真正的勇敢，是革命家的气概，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对待困难的唯一正确的态度。相反的，不愿意承认困难，或者困难本来有十分只愿意承认几分，总怕把困难讲够了会使干部和群众丧失信心，以为回避困难，问题就容易解决，对于困难不是认真对待，而是掉以轻心，很明显，这决不是真正的勇敢，决不是革命家的气概，决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应该有的态度。我们共产党人是以不怕困难著称的。只要清楚地认识了当前的困难，我们就能够找到正确的方法，克服面前的一切困难，争取财政经济状况的根本好转。

（二）关于经济形势

会议比较全面地、深入地分析了国民经济的重要情况和困难。经过反复讨论，如同中央批发财经小组报告的《指示》中所指出的：“中央认为，中央财经小组的这个报告，比较全面地、深入地分析了当前国民经济的重要情况，我们对于财政经济的困难程度，对于克服困难的快慢，从总的方面，可以说认识清楚了。”

财经小组《报告》的第二部分，详细地分析了这方面的情况。

《报告》说：今年2月21日到23日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揭露了财政收支有很大的赤字，商品供应量和社会购买力之间有很大的逆差，使我们对当前财政经济方面的困难的认识，比过去进了一步。这次财经小组会议，根据中央批发陈云等同志讲话和批转财贸办公室报告的两个指示的精神，讨论了国民经济各方面，特别是工农业生产方面的情况和问题。在讨论中，我们又进一步认识到，目前国民经济存在着严重的不平衡。这种不平衡的表现是：工业和农业之间、工业内部各个部门和各个环节之间、城市和乡村之间的关系都很不适应；文教事业的规模、行政管理的机构同目前经济水平之间的关系，积累和消费之间的关

系，也很不适应。

就工业和农业的关系来说，1961年，工业总产值比1957年上升了45%；农业不但没有改变1957年落后于工业的情况，它的总产值反而比1957年下降了26%。

就重工业和轻工业的关系来说，1961年比1957年，重工业产值上升了79%，轻工业产值只上升了16%。

就城市和乡村的关系来说，1961年，城镇人口虽然减少了1000多万人，但是仍然比1957年多2000多万人；职工总数虽然减少了870万人，但是仍然比1957年多1724万人。城镇人口过多，职工人数过多，在农业大减产的情况下，一方面加重了农村的负担，多挤了农民的口粮，另一方面加剧了城市供应的紧张，大大降低了城市人民的生活水平。这就造成了几年来城乡交困的局面。

经过近一年的调整，上述几个方面的关系，开始有了一定程度的改善。但是，按照1962年的调整计划，同1957年比较，农业总产值仍将减少22%，主要农畜产品的产量，绝大多数还将低于1952年的水平；轻工业总产值将增长9.6%，而其中六种吃的将减少37%，14种穿的将减少39%；重工业总产值将增长42%。目前农业生产提供的农副产品，无论如何也供养不了现在这么多的城镇人口，农轻重之间的矛盾还很尖锐。当前我们在国民经济各方面所遇到的种种困难，就是过去几年农轻重比例关系的严重失调所造成的后果。

毛主席在1959年庐山会议期间就曾经说过：“大跃进的重要教训之一，主要缺点是没有搞综合平衡。说了两条腿走路、并举，实际上没有兼顾。整个经济工作中，综合平衡是个根本问题，有了综合平衡，才能有群众路线。”又说：“三种平衡：农业本身的农、林、牧、副、渔；工业内部的各个部门、各个环节；工业和农业。做好这三种平衡工作，才可能正确处理整个国民经

济的比例关系。”过去几年，由于我们没有很好地领会和执行主席的这些指示，因而在工作上造成了许多本来可以避免的或者本来可以减轻的损失。

《报告》具体分析了国民经济八个主要方面的困难情况：“第一，粮食供应还很紧张，经济作物还在继续减产，整个农业经济的恢复，不可能很快。”

《报告》说到：从1959年以来，农业生产严重下降。1961年粮食（包括大豆）总产量约为2850亿斤，比1957年减少了850亿斤。1961年全国农村每人平均的口粮只有300斤左右，比1957年大约减少130斤左右。

从目前农业生产的条件和各地区粮食生产恢复的可能来看，全国粮食总产量要恢复到1957年的水平，需要三五年的时间；整个农村经济，包括农、林、牧、副、渔，包括经济作物，要恢复到1957年的水平，则需要更多的时间。

问题的严重性还在于：今后三五年内，各地方上调给中央的粮食每年只能有少量的增加。这几年来，几个主要的商品粮基地减产都很严重。四川和黑龙江，过去是调出粮食最多的省份，第一个5年，这两个省平均每年调出粮食62亿斤，现在，不仅不能调出，而且还要调进。

按照现有城镇人口的需要和其他方面的需要计算，1962年7月到1963年6月由中央直接开支的粮食至少需140亿斤。这就是说，粮食收支的差额还有80亿斤左右，必须靠进口来解决。在今后几年内，为了克服口粮不足的困难，我们还需要每年进口一定数量的粮食。但是，如果我们能够进一步精减职工，减少城镇人口，如果随着粮食生产的逐年增长，上调的粮食每年能够增加20亿斤左右，那么，进口粮食的数量是可以逐年减少的。我们应该力争做到这一点。

《报告》还谈到：为了促进经济作物的恢复和发展，弥补已

经挖空了的粮食库存，即使在粮食收支平衡的情况下，也还可以考虑每年进口一些粮食。这种进口，同上面所说的那种进口，性质不一样，意义也不一样。如果说，为了克服口粮不足的困难而进口粮食具有战役的意义，那么，用进口粮食来促进经济作物的恢复和发展，就具有战术的意义；用进口粮食来补充国家储备，以应付意外的情况，就具有战略的意义。我们的国家很大，没有一定的粮食储备是很危险的。在今后几年内，依靠国内粮食增产来增加粮食储备是不可能的。因此，如果能够用进口的办法，每年增加二三十亿斤的国家储备粮，经过几年积累到 100 亿斤左右，这是有利的。这个问题，值得我们很好考虑。

“第二，工业生产要上去，没有农业的恢复不行，没有工业内部的大调整也不行。”

“第三，基本建设规模缩小以后，必须踏步两三年，作好调整工作，才能创造条件，继续前进。”

《报告》谈到：从 1958 年到 1961 年，基本建设投资总额一共为 1112 亿元（其中，计划外的投资就有 245 亿元），平均每年 278 亿元。这样大量的投资额，在我国当时的生产水平下，并不都是通过正常的积累所能达到的，其中有相当大的部分，是靠降低人民的生活水平、动用企业的流动资金、挪用企业的设备维修费、占用银行的信贷资金、挤掉农业和手工业维持正常生产的费用等方面得来的。这一部分不正常的投资，拿一句通俗的话来说，是用“挖东墙补西墙”的办法凑集起来的。采取这种办法的结果，大部分已经表现在或者将要表现在银行的透支和财政的赤字上面。今后，不但不应该继续采取这种办法，而且必须逐步地来补偿这方面的欠账。

《报告》还谈到：过去 4 年基本建设的投资很大，效果很差。这种情况，必须坚决改变。一切不能充分发挥投资效果的项目，都必须坚决下马，否则，就会继续浪费国家资金。今后，每一个

基本建设项目的安排，每一元投资的使用，都必须具体地进行经济的技术的分析，反复地进行投资效果的比较，使之符合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要求，符合合理布局的要求，使今后的基本建设真正做到多快好省。

“第四，货物运输量减少了，铁路运输的紧张状况暂时缓和下来，目前突出的问题是短途运输的能力严重不足。”

“第五，职工人数大大超过了目前的经济水平，特别是农业的生产水平。”

《报告》谈到：1961年底全国职工人数还有4170多万人，比1957年的2450万人多1720多万人。

我国目前农业生产提供的农副产品，供养不起这么多的职工。1961年比1957年，粮食产量减少了23%，而职工人数却增加了70%。今年的职工人数即使减少900万人以上，同当前的粮食生产水平还不相称。如果不把职工人数大大地减下来，要改善职工的生活是根本不可能的。

“第六，市场的供应情况，特别是吃的和穿的，在今后三五年内很难有大的改善。”

“第七，对资本主义国家外汇的收入不可能再增加，支出的一半左右必须用于进口粮食。”

“第八，财政严重亏空，货币发行过多，主要商品挖了库存，生产资料大量积压。”

《报告》谈到：这几年，财政有赤字，信贷不平衡，多发了票子，外贸欠了账，挖了库存商品，许多企业严重亏损，目前算起来一共可能有250多亿元，或者更多一些。

“上述国民经济八个方面的困难情况，集中反映为国民收入的显著下降。据国家统计局的估算，1961年的国民收入总额为790亿元，比1957年的932亿元减少了142亿元。如果不扭转国民收入的这种下降的趋势，我们就不可能增加积累基金来扩大

再生产，也不可能增加消费基金来改善人民生活。”

(三) 关于三项重大方针性的决定

依据上述对国民经济情况的分析，财经小组《报告》的第三部分提出了三点重大方针性的措施：

(1) 整个国民经济需要进行大幅度的调整。这就是说，要按照农轻重次序进行综合平衡的方针，把建设的规模调整到同经济的可能性相适应、同工农业生产水平相适应的程度；把工业生产战线调整到同农业提供粮食和原料的可能性相适应、同工业本身提供原料、材料、燃料和动力的可能性相适应的程度；把文教事业的规模和行政管理的机构，缩小、精简到同经济水平相适应的程度；把城镇人口减少到同农村提供商品粮食、副食品的可能性相适应的程度，使工农关系和城乡关系不像现在绷得这样紧。只有这样做，才能完全摆脱现在的被动局面，加强必须加强的方面，特别是加强农业生产战线，争取尽快地恢复农业生产，创造新的有利条件，经过一段时间，使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大步地继续前进。这种大幅度的调整，当然不是一次就能够做好的，必须系统地做，全面地做，有步骤地做，分地区地做。

(2) 财政经济情况的根本好转，要争取快，准备慢。我们的工作要争取做得更好一些，同时也要准备出一些岔子，遇到一些现在还估计不到的困难，发生一些新的问题，需要我们去解决。凡是情况已经摸清楚的事情，就要断然处置，不要优柔寡断，不要因为会出一些岔子而不下决心。

(3) 如前所说，要解决今年计划平衡中的问题，要解决今年计划同明年调整任务衔接的问题，我们的出路和方针，就是要大力加强农业生产战线，努力恢复农业生产，在工业生产建设方面要进行五个排队，在精简节约方面要实行七项措施。而坚决缩短工业生产建设战线，继续大量减少城镇人口和减少职工，是在重工业生产指标和基本建设规模作了幅度较大的调整以后，继续

进行调整工作中的最最重要的一个步骤。关于恢复农业生产的问题，财经小组将组织力量，进行专门研究。下面着重地谈缩短工业生产建设战线、减少职工和城镇人口的问题。

根据国家统计局的统计，1961年底全国共有4170多万个职工，61800多个国营工业企业，中央直属的基本建设单位共有849个。这样多的职工，这样多的企业单位和建设单位，不但同目前的农业生产水平极不适应，而且同调整后的1962年工业生产建设任务也极不适应。就轻工业来说，食品工业的原料比过去减少很多，但是，食品工业的企业还有21000多个，像制糖、卷烟、罐头等行业的开工率只达到20%~35%；今年棉纱的计划产量只有260多万件，生产这么多的棉纱，加上明后年增产的需要，最多只要保留五六百万纱锭、100个以下的纺织厂，可是，现在棉纺工业一共有将近1000万纱锭、236个纺织厂。就重工业来说，按照今年的调整计划，要生产12000多台机床，并且考虑到机床品种的需要，有五六十个机床厂开工就够了，但是，现在生产机床的专业工厂还有110多个；机械工业中其他行业生产能力大于生产任务的情况，有的比机床行业更为严重；在钢铁工业方面，现在已经铺开的摊子不但同今年生产任务作比较是大得多的，而且同1200万吨钢的综合生产能力作比较也是大的。总之，全国现在有许多企业生产任务不足，有许多企业根本没有任务，但是它们还要消耗很多的燃料、电力和一部分原料、材料，国家还要支付大量的工资和管理费用。

那末，采取什么办法来解决调整后的工业生产任务同现有工业企业摊子过多的极不相称的矛盾，克服当前经济生活中的困难呢？用勉强提高生产指标、增加基本建设投资的办法，很显然是行不通的。从今年计划调整中所存在的问题看来，从上面对国民经济各方面主要情况的分析看来，不但今年行不通，就是在明后年也行不通。另一种办法，就是硬撑着架子，继续打消耗战，其

结果，必然是困难愈来愈大，工业生产将不可能稳步上升，而是继续下降，农业的负担将不可能减轻，农村经济的恢复将会更慢。

.....

既然情况已经清楚，我们就必须下定决心，有计划地保住一批工厂，缩小一批工厂，合并一批工厂，关掉一批工厂，并且改变一批工厂的生产任务，从而把工业生产战线和设备维修战线真正缩短，把力量集中起来，更好地完成今年的国民经济计划，并且为以后调整工作的顺利进行打下基础。

主动地有计划地关掉、缩小、合并一批企业，可以保住那些必需和可以保住的阵地，否则，我们就会处于更加被动的地位，就会被迫从那些必需而且可能保住的阵地上溃退下来。

这样做，有没有困难呢，能不能做得通呢？当然是有困难的，要做好是有很多复杂问题需要处理的。但是，如果不这样做，我们遇到的困难就会更大，遇到的问题就会更加复杂。现在，我们有很多的企业，消耗很大，生产很少，生产出来的产品根本不足以抵补所消耗了的物资。如果让这些企业的架子继续硬撑下去，就不但要吃光这些企业的老本，而且势必使那些现在还能够进行正常生产的企业受到连累，把它们吃穷，逼着它们也走上缩小再生产的道路，这对于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不能不承认是一个极大的危险。因此，我们认为，应该主动地承担在实行这个办法过程中可能遇到的困难，以免将来被迫承担更大的困难。

这样做，会不会损害成绩，会不会影响今后发展，会不会妨碍自力更生呢？我们认为，把过去几年铺得过多过大的摊子加以缩小，把那些半停工、全停工，而且今后几年内没有条件再进行正常生产的企业停下来，把有限的原料、材料、燃料和其他物资集中起来，供应那些现在可以正常生产的企业，使它们不断扩大再生产，不但不会损害成绩，相反能够巩固成绩和逐步扩大成

绩；不但不会影响今后的发展，相反能够为今后的发展创造更有利的条件；不但不会妨碍自力更生，相反能够为自力更生逐步奠定更可靠的基础。必须了解，在我们这样一个经济文化落后、人口众多的大国，主要依靠自力更生，按照 60 年代和 70 年代的科学技术要求，建立起独立的、完整的、现代化的国民经济体系，是一个新的课题，是一个艰巨的长期的任务，企图很快就做到，是不可能的。

（四）关于精简职工和减少城镇人口

会议认为精简职工，减少城镇人口是当时最为关键的重大而艰巨的任务。会议以主要精力精密周详地研究和部署了这项工作。

周恩来同志在讲话中指出：“昨天有一位同志说，去年下 1000 多万，今年明年再下 2000 多万，合在一起下 3000 多万，这是一个中等的国家搬家，这是史无前例的，世界上也没有的，也可能真是空前绝后。这个决心，的确也是逐步酝酿出来的，去年不可能，前年更不可能。现在下这个决心，其目的，就是要把我们的经济生活来一个大幅度的调整。使我们的经济生活在新的发展基础上来一个大改组。这个事情是领导的决心，也是全民的决心，震动极大，几乎要震动我们全民的生活，不是一个简单的事情，要意识到这个问题。”又说：“这个事情，在中国，没有哪个政权能够这样做，只有我们无产阶级专政才有这个魄力，才有这样的群众基础。去年没有出大乱子，今年会更进一步。”“今天的情况又是千头万绪，动一根头发就要牵动全身，稍一不慎，就会出乱子，我们应该有准备。一个是力争不出乱子，另一方面也要准备，万一出了乱子，也没有什么可怕。我们只要把情况跟干部、群众讲清楚，大乱子可以克服。可是办事不能急躁，必须要谨慎从事，不能草率从事。”

会上印出的《周恩来同志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关于精简问题的

讲话要点》，把精减 1000 万职工和缩减 2000 万城镇人口的方案，作了详尽周密的说明，细致地规定了各系统减人指标、对象、具体办法、政策界线，以及完成的时间、步骤、待处理职工的待遇等问题。它的基本要求也写到了财经小组的《报告》中。都强调了我们对于减下来的职工，必须以负责到底的精神，切实地把他们安置好。绝对不能采取不负责任的态度，一推了事，绝不能使被减下来的职工流离失所。

刘少奇同志说：我们下决心减少城市人口 2000 万，这也算一个勇气。……搞这件事，我看应该是决心要大，行动要快，但是要有区别、有步骤地来进行，不能慌慌忙忙一股风。

减少学校的学生，我看要注意方式。我们要保证北京、上海、天津、武汉、沈阳、哈尔滨、广州这些大城市不闹事就好。中小城市，比如石家庄那些地方，当然也要注意，闹事也不好，总是先保证这些大城市不闹大事，尽可能不出乱子，少出乱子，不出大乱子。但是我们也还要准备出乱子。出了乱子怎么办？我们也不要估计不够。因此，我们现在在精神上、组织上还得有点准备，准备它出大乱子。准备着不要紧。我们准备着，不用，那最好。我们不准备，它不出，那好，问题是它出了，你没有准备，结果事情会越闹越大，我们会陷于被动的。我想，是不是准备一种戒严性的维持秩序的办法。大乱子已经出了，秩序已经乱了，那有什么办法呢？只好戒严，断绝交通，把秩序恢复。我们要有所准备，讲清楚，先要开会研究一番。在这些大城市、中小城市也不要乱来，开枪打死人不行的。我估计，可能没有这个事。如果我们深入地做群众工作，做解释工作，我们负起责来，向他们道歉，跟他们一道同甘苦，你说实在难，我跟你一道去，这样，我估计在群众中间可以说通的。一个是准备学生、工人闹事，另一方面，还要了解，我们这个国家人民的觉悟是比较高的。只要讲清楚了，你跟他一道，他没有话讲，很容易通。最怕

的是你不讲道理，你讲不通，那他就不答应。这件事，恐怕要事先做很好的解释工作。负责人要出头讲话。解释工作应该首先在干部中做，在党内做，然后在群众中间做。在城市，在乡村，一律不登报，只作口头解释。在解释中间，党政领导要负责向群众作自我批评，说我们这几年犯了一些错误，有很多缺点，因此把你们招来多了，现在只好请你们回去。要向他们请求，要求他们，要做普遍、深入的群众工作，以便使我们的思想跟群众的思想能够统一起来，然后就能够统一行动。

刘少奇同志说：还有一个问题，为了克服困难，为了调整和改组我们的国民经济，所有政府和党的各工作部门，都必须紧张地工作，特别是工业交通部门，更应该紧张地工作。不能说农业是我们当前的重点，工业还需要降低，因此，我们工业部门就可以休息一下了。不能休息，同志们。特别是工业部门、交通部门不能休息。要比大跃进那个时期更紧张地工作。大跃进那个时期的紧张的工作困难不大，现在克服困难，要比大跃进那个时期的工作难做得多。因此，拿出来的精力，拿出来的精神，比那个时期要多得多。绝不能休息，绝不能随随便便。否则，不能进行调整，不能克服困难，不能把我们的国民经济改组好。这一点要讲清楚。

为了处理这种事情，下一两千万人，调整国民经济，行动要迅速，省市都要有指挥部，经常通消息，那里发生了什么事情，情况怎么样立即处理，这样很有必要。……要通消息，长途电话跟市内电话要多打一些，经常要有人值班，各省市、各大区都要有人值班。这样的事情，简单一个精简小组负责不了，不能单纯由精简小组来指挥这个事。不仅是精简的问题，是整个国民经济的调整的问题。这样的事情如何做，还要再议一下。我觉得，把调整工作、精简工作做好，下 2000 万人，这个工作比大跃进的工作更困难，把这个工作做好，要有更大的本事。不能说搞好大

跃进是英雄，搞好今天的工作就不是英雄。大跃进的英雄模范是登报的，今天的英雄模范是不登报的。但是，大跃进的英雄模范是简单的工作。在困难的时候是坚定的，这种工作好的，应该摆在第一位。

在调整工作中间，要加强纪律性，在目前这种非常时期，不能消极怠工，不顾大局，不能党内不团结，行动不一致，思想不统一。在目前这种时期，没有纪律不行，要有纪律。

刘少奇同志说：我们减少这么多城市人口，关这么多厂，指标调低，是不是消极的？我看不是消极的。只有这样，才能停止目前经济情况的继续恶化，才能转入主动，才能在以后继续前进。我想，这样的步骤是当前我们所能采取的最积极的措施。除开这样搞，还有什么积极措施呀？你说还要搞多少万吨钢，多少万吨煤，那才叫积极，这叫消极呀！恐怕提出那样的高指标是最消极的。在当前情况下，下这样多人，关这样多厂，应该说，这种措施是积极的，而且是最积极的。（周恩来同志：是加强农业战线。）是拉长农业战线，缩短工业战线。缩短工业战线是为了加强农业战线。

中央《指示》中指出：缩短工业生产建设战线，缩小文教事业规模，精简行政管理机构，大量减少职工和城镇人口，从而真正加强农业生产的力量，真正保证市场供应的最迫切需要，这是在目前情况下，克服困难、调整国民经济的一项最积极的措施。中央认为，现在下最大的决心，实行这个措施，我们的整个工作就有可能不再被动，而逐步转入主动，整个国民经济的情况就可以不再严重化，而能够逐步好转。中央财经小组原建议减少职工 900 多万人，减少城镇人口 1300 多万人，中央现决定改为减少职工 1000 万人以上，减少城镇人口 2000 万人，要求两年完成。具体规定，中央将另发文件。把这么多的职工和城镇人口减下来，并且把他们全部安置好，这是一件十分艰巨和十分复杂的工

作。我们必须有步骤地、有准备地、有秩序地去做。我们要谨慎从事，决不能草率粗糙。我们一定要争取少出乱子，特别是在大中城市，无论如何要争取不出大乱子；万一出了乱子，也必须坚决采取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方法，妥善地加以处理。各级党政领导干部，必须深入基层，同职工见面，普遍地、深入地进行群众工作，首先是思想工作；必须对过去领导工作上的缺点和错误，作诚恳的自我批评。关于这一解释工作，中央已另发宣传大纲。从中央到地方，必须做到指挥统一，上下通气，消息灵通，行动迅速，及时地发现问题，及时地解决问题。

中央要求各地方、各部门，特别是工业、交通、农业、外贸、文教部门的干部，在目前时期内，拿出比跃进时期更大的干劲，进行更紧张的工作，决不能有松懈情绪，更不容许消极怠工。全党干部必须了解要做好这样艰巨复杂的工作，没有坚强的党性，没有力争上游的决心，是不行的。我们必须在这个时期，考验和鉴定每个干部是不是有坚强的党性和力争上游的决心，是不是顾全大局、遵守纪律，是不是保持了充沛旺盛的革命精神和艰苦奋斗的优良作风。在这次考验中，表现好的要表扬，表现坏的要批评，情节恶劣的要给以纪律处分。

（五）关于加强财政和物资管理

中央财经小组的《报告》中说明：为了有效地缩短工业生产建设战线，裁并一部分企业，必须在资金管理和财政管理方面采取有力的措施。

中央和国务院在1962年3月10日和4月21日分别发出了《关于切实加强银行工作的集中统一，严格控制货币发行的决定》和《关于严格控制财政管理的决定》，各部门、各地方、各企业和事业单位，都必须坚决贯彻执行。财政金融部门，应该加强督促检查，并且随时注意在执行这两个决定中出现的新问题，及时地加以解决。各大区，各省、市、自治区，在国家规定的范围

内，应该分得的地方财政结余、地方预备费、地方投资及其相应的材料、设备，统由国家计委、国家经委和中央财政金融部门按年度、季度进行分配。

《报告》还说在物资管理方面，也必须采取有力的措施。

随着各行业、各企业生产任务的调整，物资的分配应该重新安排。开工的重点企业生产所需要的原料、材料、燃料，由中央主管机关一个企业、一个企业地进行安排，保证供应。分配给这类企业的物资，地方不得动用。减少生产任务的企业和缩小规模的建设单位，都应该把多余的物资如实地报告主管机关，不准隐瞒、私分。所有停工的企业，所有下马的建设单位，对一切原料、材料、燃料、设备和生活资料，都应该做一次彻底的清理，如实地报告上级主管机关，由国家物资管理部门和商业部门统一接收和处理，绝对不允许擅自转让、出卖和损坏。同时，应该把厂房和未完的工程切实保护好。

清理仓库的工作，必须根据中央和国务院 1962 年 2 月 22 日“关于彻底清仓核资、充分发挥物资潜力的指示”，抓紧进行。各部门、各地方、各企业、各单位，首先要集中力量，把目前生产上和市场上最急需的物资，如有色金属、特殊钢材、化工原料、橡胶、棉布等等，清理出来。清理出一批，就立即上报一批。对于这类物资，国家经济委员会和商业部应该按照今年生产计划的要求，根据农轻重的方针和增加国家储备的需要，进行合理的分配。任何其他部门、任何地方、任何单位未得到国家经济委员会和中央商业部的批准，都不准动用这类物资，动用了就是违反纪律。清理出来的一般物资，各地方、各部门可以按照国家计划内的需要，动用一部分，动用多少，应该如实地报告国家经委和中央商业部。

（六）关于当年计划

这次会议讨论定下来的 1962 年的计划调整方案，努力贯彻

了“综合平衡”的指导思想。只是由于长时间积下来的困难问题很多，这个计划还未能达到当年平衡。这点，刘少奇同志在会上的讲话，已做了估计，他指出：“我们还是要准备，实现当年平衡，略有回笼，今年是有很大的困难。”这个估计是实事求是的，后来定下来的调整方案也还不得不留有若干缺口。

中央财经小组《报告》的第一部分讲的就是计划调整方案。《报告》说：国家计划委员会这次提出的今年计划的调整方案，着重地注意了以下四点：

第一，尽可能地挤出一部分材料来增产农业所需要的生产资料。其中，当年可供分配的钢材，用于农业的达到75万吨，比原计划增加8.5万吨；可供分配的木材，用于农业的达到310万立方米，比原计划增加50万立方米。

第二，尽可能地安排较多的原料、材料和燃料，增加日用品的生产。调整计划拟增加商品19亿元，加上压缩购买力和增加几种高价商品的措施，预计当年商品供应量和社会购买力之间的差额可以缩小。

第三，根据农轻重的方针和实际的可能，降低了绝大多数重工业产品的指标，比原计划分别降低了5%~20%。”

第四，进一步缩小了基本建设的规模，工作量从原计划的60.7亿元降低为46亿元。

《报告》说：“国家计划委员会在调整今年计划的时候，曾经力求不留缺口，对于工业生产和基本建设力求按短线材料（包括可靠的进口资源和可能动用的储备）进行安排，并且力求使今年的计划同明后年的调整任务衔接起来。在这次讨论中，大家认为调整的计划方案还没有能够达到这样的要求。计划工作的这种状况表明，在目前国民经济严重失调的条件下，完全按照按短线材料安排和不留缺口的方针来制定调整计划，是有一定困难的。但是，在今后制定计划的时候，这个主要依靠自力更生、按短线材

料安排和不留缺口并且留有余地的方针，必须坚持。而要实现这个方针，就必须在中央统一规划和集中领导下，有步骤地分行业、分地区地做好调整工作。”

《报告》详细地分析了“就当年的平衡来说，调整计划还有不少的缺口”和“就今年计划同明年后年调整任务的衔接来说，也还有不少重大问题没有解决”的实际情况，接着指出：“面对着上述当年计划平衡中的问题，今年计划同明年后年调整任务衔接的问题，出路何在呢？总的说来，就是要坚决执行农轻重的方针，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使农业的情况一年比一年好起来，使农业提供的粮食和工业原料一年比一年多起来。而要做到这一点，必须首先通过一系列的调整工作，来减轻工业生产建设规模过大、职工人数和城镇人口过多所加给农村的过重负担。”

刘少奇同志说：搞了个 1962 年调整计划。这回大家不注意指标了，不争论了。看来，可能还有一些指标完不成。完不成也算了，问题不大，主要问题不在那里，现在方向已经转了。从 1958 年以来，这几年，我们每一次都调整计划，而每一次都是调低的，都是年初计划高，年末调低。只有 1960 年调高一次，从 1800 万吨钢调到 2000 万吨钢，结果没有完成。这一次又是调整指标，1962 年的指标又是调低。同志们，是不是以后不再调低了？让我们搞点低指标好不好？搞了这样多年高指标，我们搞一年低指标行不行？以后不要再调低就好了。以后计划要这样定：计划要低一点，在执行中间超过计划。以后定计划，叫作按短线来平衡，不是按长线来平衡，而且要留有余地，以便在执行中间超过计划。“左”了这样多年，让我们“右”一下吧。这个高指标的尾巴，一直到 1962 年还没有丢掉，这一次还有个高指标尾巴。这个尾巴今年割掉才好，明年再定计划的时候，不要再调低了。

(七) 关于农业集体经济政策问题

会上讨论了有关农业集体经济的政策问题，但未做结论和决定。

会上邓子恢同志提出：农村人民公社存在的问题，主要是以小队为核算单位的所有制问题尚未完全落实，耕畜、自留地等均有不少遗留问题，房权、林权等也没有定下来，均应尽快解决。他还说：看了几个县，不管气候怎么样，凡是自留地都是好的，大田都不好。这说明，在一定范围之内，小自由有它的优越性。个体经济发展的结果，将来造成阶级分化，危险在那个时候，在将来，危险不在当前。适当扩大自留地，社员是会满意的。我认为，平均土地在2亩以下的，可以10%，2至4亩的7%，4亩或者6亩以上的不超过5%。包括自留地、饲料地、借地、借冬闲田等等，总不要超过总耕地面积的20%。主要的生产关系还是集体所有制，加上20%的小自由就变资本主义呀？政权是我们的，干部是我们的，国家主要的经济是我们的，就发展资本主义呀？把资本主义看得太厉害了。耕牛问题……我想应该允许私养，控制到一头到二头，全部归他。私有公用，要给合理报酬，这样牲口可以发展。养猪问题，要讲清楚，不要按比例，私养再多也可以，没有关系。广西龙胜县的山地有10万人口，土地不多，这个地区，现在单干60%。原因有各种，其中有一个原因就是山区分散。我告诉他们，这样的地区不要集体，就让它单干，或者叫包产到户。这是社会主义的单干，他只要上调，有什么不好？

会上不少同志也提出自留地以外再增加点饲料地，还有小开荒、十边地、借地度荒等等，合计不超过自留地的一倍，这没有危险，对调动农民积极性有好处。对巩固集体经济也有好处。

会上还讨论了《中共中央关于养猪饲料地问题的指示（草稿）》。

所有这些都还没有做出决定。

周恩来同志说：至于整个农村的政策，我们有一系列的东西。现在还有一些问题没有完全解决好。基本核算单位中的分配问题，所有权问题，还待中央仔细研究。特别是分配，现在粮食标准这样低，重点放在按劳分配上很有危险，少数人分得很多，他的积极性就不在增加粮食，而在自由市场，而多数人分的基本口粮都不够，他的积极性也差。当然，不能动摇按劳分配的原则，可是在低标准的条件下，必须基本口粮为先，然后结合按劳分配。究竟如何，等中央研究以后再决定。

刘少奇同志也说，邓子恢同志讲的“这些问题，以后再讨论”。“养猪饲料地的稿子”，也“还要再讨论”。

中央批发财经小组报告的《指示》中说：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对于农村生产关系、生产力等方面的重要情况和问题，要系统地进行调查研究，提出切实可行的解决办法，为下一次中央工作会议研究和解决恢复农业生产问题作好准备”。

（八）关于农村工作中的一些问题

会上朱德同志说：这次安排重点就是减人、粮食、生产队问题。现在要动员全党，开始建立社会主义的基础的基础。农业是建立社会主义的基础的基础。主席早就提出农轻重，但过去实际上是重轻农，这个道路走不通，就要转。这一次才真正转，真正下农村。生产小队，60条下去，现在又加上各种的制度，把所有制再调整一下，这个基础已经立起来了，但是这个基础还要巩固。现在小队里面的正业、副业都在家庭。要两条腿走路，正业副业两不误。哪个重要呢？当然是正业重要，但不一定天天都搞正业，农忙的时候搞正业，其余的时候也搞正业，也搞副业。就是在农忙的时候，家庭里头的老头子这些人都是可以搞副业的。自留地真正是救命地。现在下去的人，每一个人都要分自留地。人没有地不行。我们北京为什么要搞机关生产呢？就是因为吃靠不住。赚钱是小事，吃要紧得很。衣、食、住、行，光靠正业分点

粮食解决不了，一定要靠家庭副业来解决。把生产队巩固起来，把山林竹木都搞好，要相当的时期。国家把生产资料统统拿到手里，不分给他，你有什么法子不让他偷？他不偷得不到东西。你分给他，他就不叫偷了。把生产队巩固起来，他安居乐业，把家庭副业搞起来，他自己就解决问题了。下去的人要到生产队，首先巩固现有的生产队。生产队安居乐业了，下去的人也就安居乐业了。安居乐业，我看是一个最主要的问题。农民不安居乐业，天天向外跑，特别是女孩子都向外跑，农村里面哪一天巩固呀？下去的人，只要有土地，参加了劳动，就站稳了。城里也好，乡里也好，大家都在工作，社会上少很多事情。

此外，下去的人要成龙配套。现在乡村里面还不配套。医生没有，教书的没有，其他的农业技术人员没有，他就不愿意回去。所以，农村公社也好，乡政府也好，配一套班子是需要的。只要配了这个班子下去，哪种人都可以下去的，不是下不去的。农村里面要把供销合作社、生产合作社都组织起来，都成龙配套，使下去的人都可以生活。这样搞好了，就叫社会主义，没有搞好，就不是社会主义。我看是可以搞得好的，不是没有困难，困难很多，但是方法搞好了，思想就可以通，前途就大，就成功。

（九）关于甄别平反

邓小平同志在讲话中说：请大家注意，最近中央发了一个关于甄别平反工作的文件。这个问题，对于调动干部的积极性，特别是调动农村县以下干部和群众的积极性很重要。所谓甄别平反的问题，主要是干部。可是每一个干部都影响群众，实际上是影响很大的群众。现在全国已经甄别平反的地区，是有数目的，比如河南 40 万，实际上不止，全国估计总有 1000 万，影响的人总有几千万。一个人影响一家人，一家 3 口人，500 万人就影响 1500 万人。这个工作，最近军队搞得很好，就是一揽子解决。

军队搞得最早，情况也安定得最早。地方来说，有些地方也搞得比较好。采取一揽子甄别平反方法的，比较主动，面貌比较好一些。因此，我们现在研究，大家都赞成这个办法，就是全国县以下，首先是农村，来个一揽子解决。就是说，过去搞错了的，或者基本搞错了的，统统摘了帽子。（刘少奇同志：不要一个一个去甄别。）因为县以下都是一些下级干部，问题只有那么多，右倾也是右倾到那个程度，“左”倾也是“左”倾到那个程度。他们又是直接联系群众的，亲戚朋友各方面听到，人心不安，大家情绪不安定，是不利的。现在我们不是要抓生产队吗？为了把基层干部和群众的积极性调动起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工作，不要轻视这个工作。首先注意农村县以下，来一个一揽子解决问题。除了个别严重的个别处理外，一般的，包括基本上搞错了的，就是有一点点还对的，都不要留尾巴，一次解决。上面的领导同志，要下去帮助他们承担负责。这样搞快一些。这件工作，请各个中央局告诉各省，凡是做了的，继续做，没有搞的，用迅速的比较简单的办法。凡是这样做的，一定要向群众当面公布。不只是当面，不只是对干部，一定要对群众。这实际上是我们承认一个错误，是搞得不对。

（十）关于两项中心工作和加强县社党委的领导核心

会议确定了当前的中心工作是两项。这是邓小平同志提出来的。邓小平同志在讲话中说：现在事情很多，这次摆了很多问题，各方面的问题摆出来了，哪一方面都有，恐怕中心是两个：一个就是抓精简，一个就是抓生产队。这两个问题都不能够迟了。有些事情还可以慢一点，但是精简的问题和生产队的问题，这两个问题越抓迟了越不利。

刘少奇同志在讲话中也说：总而言之，还是小平同志讲的，当前是两项中心工作，一个是城市里调整经济，精减人；一个是抓农村中的生产队。现在有个巩固生产队的问题。省委应该有分

工，一部分人抓城市工业调整和精简，另一部分人抓农村。两个中心工作，现在都不能放弃，都紧急。

这个问题也写入中央批发财经小组报告的《指示》中了。《指示》上说：为了尽快地恢复农业生产，逐步地克服困难，全党目前必须抓紧的主要工作，一是坚决缩短工业生产建设战线，坚决减少职工和城镇人口；一是加强农村人民公社生产队的领导，加强各方面、特别是工业对农业生产的支援，巩固农村的集体经济。从中央到地方，都要把主要的领导力量分为两部分，在统一的领导下，一部分人抓精简工作，一部分人抓农村工作。

关于树立和加强各级党委的领导核心问题，邓小平同志说：常委议了这个问题，少奇同志也提出这个问题。特别是树立和加强县以下和企业党委的领导核心，要首先解决这个问题。为了把农业搞好，首先是加强地方县以下党委的问题。地委以上，也要注意这个问题。个别的省也有这样的问题。地委也会有这样的问题。所谓树立和加强党委的领导核心的问题，主要是指县以下。县关系很大。

树立核心，第一个办法，主要是在现有的各级党委的干部中挑选作风好的来培养。无非是联系实际，联系群众，主观主义少一点。这几年主观主义多得很。命令主义还有什么群众路线？因地制宜叫什么联系实际？还有一个办法，现在我们减大批的企业，这些企业中，有好多是从农村来的，他们比现在的地方党委的干部资格都高一些的，中央和省市完全有可能利用这个机会，层层下一批干部，加到地方党委里头去，加强县，加强公社。当然，企业里面的干部也不能统统拿出来，要经过挑选。每一个省，过去调出多少比较好的干部，在哪里，他们都知道。企业里面现在是可以抽出人来的，包括不裁不并的企业，都可以抽干部出来。当然，不是每一个工厂都可以抽。办法是不是这样：先由省、市提出一批过去调出来的干部，然后中央组织部根据各省市

提的名单认真地搞一搞这个工作，调一批人来。每一个县，每一个公社，至少要有两三个当班长、副班长。不管加什么名称，书记处书记、委员都可以。去的人不一定就是带头当第一书记，可以当第二书记，可以当一个书记。要通过这个措施把农业搞好，把县、社、大队和队的领导核心搞好。不管党也好，社也好，根本的问题是选举。你有什么办法派人去当一个大队的脱离生产的干部？可以派少数人加强加强，了解了解情况，当一个时候是可以的，根本的办法总还是要当地的人，本乡的人，本大队的人，根本的办法是搞民主。但是公社和县这两级，是有个培养核心的问题。县社两级，不管现在有无核心，即使有了核心，也应该加点人去，换一换空气。老面孔，天天熟悉，太久了，有好处，有缺点，大家都习惯了，面孔熟了，人也熟了，有些事情不容易察觉，有些也就麻痹了，该提的问题就马虎了，该批评的问题就马虎了，新的感觉就比较少。调剂一下，对于转变作风，新的气象，各方面都可以有好处。中央组织部最近要认真抓这件事。省市的组织部门也要认真把这件事搞一搞。要排排队。反正一个省就是那多县，最多的一百几十个县，省委的同志，大概每一个县的人都认得的，大体上可以排一个队。搞一点新的人去，总可以有新的感觉。加点新的人去，把那个空气换一下有好处。当然，这不是说我们现在的干部不值得信赖，根本是要信任的，因为大量的的是他们，还是依靠他们，但是要树立和加强这个领导核心，把这个空气改变一下，这对于干部的培养，对于工作，都是有利的。

后来，这点也写到中央批转财经小组报告的《指示》中了：“中央和省、市、自治区的组织部门，要选择和抽调一批好的干部，去加强县、社党委和重要企业的领导核心。”

这次会议的精神和方针决策，在全国得到了迅速有力的贯彻，取得了显著的效果。1963年，国民经济形势明显好转；

1964年，调整任务基本完成；1965年又调整一年，国民经济获得了恢复和发展，扭转了基本比例关系严重失调的困难局面，使之发展到基本协调的正确轨道上。实践证明，这次会议对形势的估计和所确定的方针和措施都是正确的。但是我们党对这次会议的认识却有过的反复。1962年8月北戴河会议时，毛泽东同志对这次会议所制定的决策基本上是肯定的。如8月9日，他在中心小组会上曾说：“过去基本建设战线搞长了，搞多了，多招收了2000万职工，要吃饭，结果就要高征购，致使农民浮肿。”“1958年到1960年，3个年头犯了错误，1960年下半年就开始纠正错误，这几年整得我们艰苦，才采取了一系列正确的措施，如12条、60条、工业企业70条、8字方针、缩短基建战线、城市减人、征购减少等。现在城市工人生活太苦了，要提高一些。总之，经过这些挫折，我们懂得要谨慎了，要改正错误。”

可是后来，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中，“西楼会议”和这次中央工作会议，就被当作1962年的“右倾”加以批判了。

现在，我们全党正在学习讨论建国以来的正、反两方面的历史经验，今天再回头来研究1962年5月中央工作会议，从中吸取教训，便于我们更好地了解我们当前面临的历史任务，更好地了解当前中央采取的果断地调整国民经济的正确决策，增强我们执行政策的自觉性。

（中央档案馆党史资料研究室：《介绍1962年5月中央工作会议》）

形势急转直下：1962年北戴河会议

会议原定议题是讨论农业、财贸等方面的工作。但会议一开始，毛泽东提出阶级、形势、矛盾的问题，要大家讨论。毛泽东说：“1960年下半年以来，大家只讲黑暗，不讲光明，已经有两年了。”“这两年讲困难讲黑暗合法，讲光明不合法了。这次会上就要解决这个问题。”

1962年有两个会议给历史留下深刻痕迹：一个是年初的七千人大会，一个是秋天的八届十中全会。两次会议恰好代表了共和国建设史上两种不同的发展趋向。前者继承了中共八大的稳健的路线，它以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陈云等人唱主角，毛泽东在一定程度上也是赞同的。后者继续着反右派、“大跃进”、反右倾的一种“左”倾趋向。它以毛泽东重提阶级斗争为转折，刘少奇等人虽有不同观点，也不得不放弃己见，跟上毛的思路。

所谓八届十中全会，其实是由一连串会议组成。

7月25日至8月24日，在北戴河召开中央工作会议；

8月26日至9月23日，在北京召开八届十中全会预备会议；

9月24日至27日，在北京召开八届十中全会。

三个会议前后一贯，所以，毛泽东在全会第一天说，这次会议实际上已经开了两个月。

转折是在7~8月北戴河会议上出现的。

要召开一次中央工作会议，是5月份就确定了的，当时确定会议是研究调整和恢复问题。7月11日中共中央发出的通知确定了4项议题：农村工作问题；粮食问题；商业问题；国家支援农业问题。周恩来等正是根据这些议题准备文件的。包括《关于进一步巩固人民公社集体经济、发展农业生产的决定（草案）》、《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关于商业工作问题的决定》等。

7月25日，中央工作会议在避暑胜地北戴河召开。50年代以来，北戴河成为中共中央夏季召开会议的常选地点。这次北戴河会议开始的10天，按原定计划讨论上述3个文件，大家并没有感到有什么异常。尽管涉及到“包产到户”问题，并不把它看得很严重。

毛泽东开始是批文件，“甩石头”。8月2日，他把安徽太湖县钱能让保荐责任田的信印发大会。同日，他又将两份反映南斯拉夫经济混乱的报道批给到会者，他写道：“请大家讨论一下，走南斯拉夫的道路好，还是走马克思列宁主义道路好。”

8月5日，毛泽东先到华东组、华中组会议上吹风。他说：“我周游了全国，从中南到西南，找各大区的同志谈话，每个省都说去年比前年好，今年比去年好，看来并非一片黑暗。有的同志把情况估计得过分黑暗了。”

8月6日，毛泽东在大会讲话。一上来就撇开工作问题，专讲阶级、形势、矛盾。给大会出题目。

关于阶级问题，他说：社会主义国家，究竟存在不存在阶级？在外国有人讲，没有阶级了，因此党是全民的，不是阶级的工具、无产阶级的党了，无产阶级专政不存在了，全民专政没有对象了，只有对外矛盾了，像我们的国家是否也适应？

关于形势问题，他说：究竟这二年如何？有什么经验？有些同志过去曾经认为是一片光明，现在是一片黑暗，没有光明了，

引得一些同志思想混乱、丧失前途、丧失信心了。

关于矛盾问题，他说：如果承认国内阶级还存在，就应该承认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矛盾是存在的。阶级的残余是长期的，矛盾也是长期存在的。不是几十年，我想是几百年。又说：现在有一部分农民闹单干，究竟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农业合作化要不要？“包产到户”还是集体化？现在就有单干之风，越到上层越大。闹单干的是富裕阶层、中农阶层、地富残余，资产阶级争夺小资产阶级搞单干。如果无产阶级不注意领导，不做工作，就无法巩固集体经济，就可能搞资本主义。

毛泽东这篇讲话一出，会议气氛顿时紧张起来。他关于对“一片黑暗”的批评，对“包产到户”的批评，明显地是针对西楼会议和五月会议的，是针对中央常委们的。而且他把党内分歧有意与苏共的“两全”路线联系起来，把“包产到户”与走资本主义道路联系起来，这就使对方难以分辩了。

随后，毛泽东又在8月9、11、13、15、17、20日的六次中心小组会上多次插话，继续阐发他讲话中的观点。

所谓中心小组，是会议开始时由刘少奇提议成立的，便于集中讨论和决策。中心小组由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林彪、邓小平、彭真、李富春、李先念、谭震林、陈伯达、陆定一、罗瑞卿、谢富治、谷牧、陈毅、杨尚昆、柯庆施、李井泉、宋任穷、陶铸、李雪峰、刘澜涛组成，共24人。

林彪没有到会。陈云到了北戴河，因为腹泻，写信给邓小平并转毛泽东，说明身体状况不好，向中央请假。得到毛泽东同意。中心小组实际上只有22人。

8月9日毛泽东说：“1960年下半年以来，大家只讲黑暗，不讲光明，已经有两年了。”“这两年讲困难讲黑暗合法，讲光明不合法了。这次会上就是要解决这个问题。”

毛泽东多次批评以后，刘少奇不得不就5月中央工作会议对

困难估计的说法进行解释和自我批评。

8月11日，刘少奇说：“五月会议我对困难有两点估计过分了，一是说1962年夏收减产已成定局，一是说单干在全国估计已占20%。”毛泽东插话：“农业恢复要五年、八年，讲得那样长，就没有希望了。如果那样讲，就是说我们的政策如《60条》、《70条》、精减2000万人、减少征购等都不灵，或者说，这些政策要长期才能见效，那就需要另搞一套。”

8月15日，李富春发言解释说：“五月会议提出争取快、准备慢，问题是有些同志把重点放在准备慢上了。”毛泽东插话说：“‘争取快、准备慢’，哪一方面也适用。快了，头一句灵；慢了，后一句灵。”

8月17日，周恩来发言说：“过去一个时期，我们把困难说得多了一些，这对党内发生消极影响。虽然我们采取了正确措施，但使人看问题容易看成漆黑一团。”然而，他同时例举了大量事例，说明自七千人大会以来取得的成就。他说：中央各部委同志工作都很努力，没有泄气，想方设法完成中央提出的任务，而且措施得力，见效也快，效果比预期的好。要肯定成绩。

周恩来实际上委婉地回答了对“黑暗风”的批评。

然而，毛泽东的话得到了一些人的附和。8月13日中心小组会上，一位负责人说：“农业恢复的时间越说越长，工业指标也越讲越少，我们一辈子没有希望了，还有什么搞头。”

谭震林也不赞成说农业的恢复要5年。他说：“实际上，‘五风’纠正了，搞了《12条》、《60条》，恢复就会很快，只要两年就达到1957年3700亿斤的水平。”毛泽东插话说：“恐怕再有两年差不多，主要是今明两年，64年扫尾。”

有人在小组会上说：“大跃进的形势，肯定会要很快重新到来的。”并认为，这是社会主义建设发展的客观规律。

有人说：“现在整个国民经济的中心不是恢复问题，工业、

农业、交通运输业都不是个恢复问题。”

有的说：“‘三面红旗’究竟打不打？现在似乎理不直、气不壮了。”

有的说：“大跃进似乎很难开口了，简直就不好提了。”

有的说：“现在似乎总路线不好讲了，大跃进也不能讲了，成绩不能讲了，一讲成绩就受讽刺。”“说光明就感到有压力。”

有人批评说：“现在是越低越好，越少越好，越慢越好，越黑暗越好，把大跃进说得越不像话越好，越松劲、越单干越好。”

与七千人大会完全相反，会议迅速左转，大家很快跟上了毛泽东。

形势刚刚有所好转，许多人又按捺不住，跃跃欲试了。

邓子恢再次成为众矢之的

所谓“黑暗风”带来的“后果”，“证据”之一是造成人们对人民公社集体经济丧失信心，主张“单干”。会议一开始，毛泽东就为大家描述了一幅“单干”引起两极分化的可怕图景。

8月5日，毛泽东说：“一搞包产到户，一搞单干，半年的时间就看出农村阶级分化很厉害。有人很穷，没法生活。有卖地的，有买地的，有放高利贷的，有娶小老婆的。”

8月9日，毛泽东说：“单干从何而来？在我们党内有相当数量的小资产阶级成分，包括许多农民，其中大部分是贫农和下中农，有一部分富裕中农家庭出身的，或者本人就是富裕中农，也有地富家庭出身的，也有些知识分子家庭，是城市小资产阶级出身，或者是资产阶级子弟。另外，还有封建官僚反动阶级出身的。党内有些人变坏了，贪污腐化，讨小老婆，搞单干，招牌还是共产党，而且是支部书记。这些人很明显，把群众当奴隶。有些同志马克思主义化了，化的程度不一样，有的化得不够。我们

党内有相当多的同志，对社会主义革命缺乏精神准备。”

批判“单干风”，邓子恢成了批判重点。会上他夏天的几次报告成了批判的靶子。白纸黑字，证据如山！邓子恢只好检讨。8月11日他在中心小组会上声明：最近几天，已经觉得自己的包产到户主张是不正确的。然而，邓子恢的这个声明并不能抵挡来势凶猛的批评浪潮。

8月12日，毛泽东在一个文件上写下长篇按语，印发大会。他写道：

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邓子恢同志就动摇了，对形势的看法几乎是一片黑暗，对包产到户大力提倡。这是与他在1955年夏季会议以前一贯不愿搞合作社；对于搞起来的合作社，下令砍掉几十万个，毫无爱惜之心；而在这以前则竭力提倡四大自由，所谓“好行小惠，言不及义”，是相联系的。我们欢迎邓子恢同志在1962年8月11日核心小组会议上所作的声明。他说，他在最近几天，已经觉得自己的单干主张是不正确的了，这是值得欢迎的。但他没有联系1950年至1955年他自己还是站在一个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的立场上，因而犯了反对建立社会主义集体农业经济的错误。

邓子恢上年获得的两次表扬一笔勾销了。老账新账一起算，邓子恢又成了一个“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会上一边倒，原来赞成或容忍过包产到户的人转变立场，参加到对包产到户的讨伐之中。这场批判一直延续到移师北京的预备会议和八届十中全会。所有人都表态批评了邓子恢。

9月25日，董必武在全会讲话中说到“单干风”时，毛泽东又插话：“邓子恢同志曾当面和我谈过保荐责任田，我跟他谈了一个半钟头的话，我就受了一个半钟头的训，不是什么谈话，是受他的训。”他批评说：“中央农村工作部搞资本主义，邓子恢

同志是‘资本主义农业专家’。”

随后，中央撤销了邓子恢领导的中央农村工作部，邓子恢调任国家计委副主任，事实上不再任用。

会上，毛泽东问：“邓子恢同志还跟别的同志谈了没有？”这是在将刘少奇的军。刘少奇、周恩来不得不进行解释。

毛泽东反复讲：“建议可以，但不能采纳。”话中隐含着对刘少奇没有抵制包产到户的不满。幸好，他还不知道刘少奇曾让田家英转告他赞成包产到户的意见。在会上，毛泽东点名批评田家英60%的包产到户、40%搞集体的主张。田独自承担了压力。

批“单干风”，也含有批陈云之意。更何况批“黑暗风”陈云更是“在责难逃”。但会上毛泽东始终没有点陈云的名。或许他认为这样做动作太大；或者他对陈云的经济才干不愿一棍打死。会后他这样说：“陈云的意见是错误的，但他有组织观念，守纪律，是向中央常委陈述的，没有对外宣传。”尽管如此，八届十中全会后，陈云“一贯右倾”、“机会主义”在党内几乎成了定论。他的政治处境日益困难，从此被打入冷宫，不再重用。直到“文化大革命”结束。

批“翻案风”引出一个“反党集团”

北戴河会议期间，毛泽东就多次讲话、插话，批评彭德怀要翻案。8月5日，他同柯庆施等人谈话。柯庆施说：“《海瑞罢官》影射毛泽东罢了彭德怀的官，彭德怀不服气，要翻案。”毛泽东说：“59年反右倾斗争，大多数是搞错了。彭德怀要翻案、要求平反，我看59年反右倾不能一风吹。”

接着，他又说：“我对彭德怀这个人比较清楚，不能给彭德怀平反。”

在这之前，毛泽东的夫人江青早就嗅出《海瑞罢官》中的“阴谋”，当面向毛泽东告状，要批判《海瑞罢官》，毛未置可否。但对党内外有人要为彭德怀鸣不平越发警觉起来。

8月11日毛泽东在中心小组会上说：“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彭德怀写信，把过去说的统统推翻。”

8月13日毛又说：“我们只坚决反对背后捣鬼的，不怕搞阴谋的。”

这时，大会的注意力集中到批邓子恢身上了，批彭还未形成高潮。

谁想到彭德怀自己的第二封信，恰好提供了批判的靶子。

彭德怀没有参加北戴河会议，也许他还不知道北戴河会议的风向已转，对1962年的全面平反还抱有一线希望。

8月22日，北戴河会议结束前两天，他再次给毛泽东和党中央写信，重申不存在反党小集团篡党和同外国人在中国搞颠覆活动的问题。

他写道：“我带着苦闷的沉重的心情，再次请求对我所犯的错误，进行全面的审查，作出正确的处理，泣伏呈辞，恳希鉴察。”

彭的这封信递上去，引来了与会者激烈的声讨。一些人立即提出：这是逼着中央全会来讨论他的问题，是向中央挑战。

这时北戴河会议即将结束，多数与会者移师北京继续参加八届十中全会预备会议。

（肖冬连等著《求索中国——“文革”前十年史》）

阶级斗争扩大化：八届十中全会

毛泽东在会上断言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中资产阶级都将存在，并存在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强调阶级斗争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全会严厉批判了所谓“单干风”、“翻案风”和“黑暗风”。此后，国内的政治形势发生逆转，由刚刚进行不久的、对扭转困难局面极为重要的纠“左”又变成了反右。

（一）会议的进程

建国以后，我们党在领导经济建设中有个毛病，就是当经济形势比较好的时候，或实际上并不那么好而误以为很好的时候，就容易头脑发胀，不那么谦逊谨慎，或在思想政治上出现“左”倾，或在经济建设上出现盲目冒进。八届十中全会在思想政治上再次出现“左”倾，就是突出的一例。1962年上半年，党中央连续召开了“七千人大会”、西楼会议和五月北京中央工作会议，采取了比较实事求是的、各方面都退够的调整方针。到下半年，由于形势开始好转，也由于从年初以来在恢复农业生产和整个国民经济调整中存在意见分歧，还由于国际社会出现了一些变故、争端，国内一定范围内的阶级斗争在某些方面有些激化，毛主席又重新提出阶级和阶级斗争问题。

八届十中全会正式会议只开了4天（9月24日至27日），

但预备会议开了29天（8月26日至9月23日），预备会议之前还开了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7月25日至8月24日），为全会准备文件。所以，毛主席在全会第一天说，这次会议实际上已经开了两个月。

7月25日开始的北戴河会议，按原定计划主要是讨论农业、粮食、商业和国家支援农业等问题，重点是围绕讨论《关于进一步巩固人民公社集体经济、发展农业生产的决定（草案）》、《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关于商业工作问题的决定》等文件进行的。到8月5日，毛泽东在华东、华中组会议上吹风；8月6日，他正式在大会上作了关于阶级、形势、矛盾问题的讲话；又在8月9、11、13、15、17、20日的六次中心小组会上多次插话，继续阐发他讲话中的观点，会议也就转为着重讨论阶级斗争问题和批判“黑暗风”、“单干风”。

8月26日开始的预备会议，头一个多星期重点是讨论上述两个农业文件，批评邓子恢同志的所谓“单干风”；还讨论了国际形势和《关于有计划有步骤地交流各级党政主要领导干部的决定》、《关于加强党的监察机关的决定》等文件。到9月6、7日，六个小组先后转入批判彭德怀、习仲勋同志的所谓“翻案风”，一直到预备会议结束。

八届十中全会的4天会议，基本上是大会发言。第一天毛主席作关于阶级、形势、矛盾问题的报告。然后，陈伯达、李先念、董必武、薄一波、朱德、刘少奇、邓小平、周恩来、柯庆施、刘澜涛、李富春、彭真等同志先后在会上发言。会议最后一天下午，除通过上面提及的五个文件外，还通过了《中央监察委员会原有的委员、候补委员和增选的委员、候补委员的名单》、《关于撤销和补选书记处书记的建议》、《关于组织“关于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问题的专案审查委员会”的通知》、《关于组织“清查习仲勋等同志反党活动的专案审查委员会”的通知》

和全会公报等五个文件。

毛主席说，这次长达两个月的会议，讨论的是两项性质的问题：一项是工作问题；一项是阶级斗争问题，就是马克思主义同修正主义斗争的问题。实际上，由于毛主席提出了阶级、形势、矛盾等问题，从8月6日起，会上大部分时间是讨论阶级斗争问题和批“三风”，只用了很少时间研究和讨论工作问题。

（二）对形势的不同看法和对“黑暗风”的批判

对于1958年以来三年“大跃进”造成的困难和经济形势的估计，在党内是有不同看法的。一些思想比较“左”的同志，认为困难并不大，形势仍然是好的。华东局的柯庆施同志就是代表。毛主席曾一度认为，我们违背了客观规律，“最近三年受了大惩罚”，碰了钉子，“碰得头破血流”。但在更多的情况下，他又比较同情“左”的观点。1961年9月庐山中央工作会议上，在周总理发言时，毛主席曾插话说：错误就那么一点，没有什么了不得。随后他又形象地说，现在是退到谷底了，形势到了今天是一天天向上升了。1961年底，在召开“七千人大会”的前夕，毛主席又说：国内形势总的是不错的。前几年有点灰溜溜的，心情不那么愉快。到1961年，心情高兴些了，因为在农村搞了《60条》，工业搞了《70条》，还提出了“三级所有，队为基础”，这些具体政策都见效了。他在无锡找华东几个省的同志谈话时，表示1962年要抓工、农、兵、学、商、政、党七个方面的工作，大抓一年，工作要一天一天上轨道。1962年初“七千人大会”后，毛主席到上海、山东、杭州、武汉等地视察，听到一些地方负责人讲的都是形势去年比前年好，今年又比去年好，比较乐观。

“七千人大会”后，接着召开了西楼会议和五月中央工作会

议。这两个会议很重要的一个内容，就是强调当时是一种困难的形势，要把困难估计够。但是，党内的认识并不一致。陈云同志在国务院各部、委党组成员会上讲话指出，“对于困难的程度，克服困难的快慢，在高级干部中看法并不完全一致”，“农业恢复的速度是快还是慢？也有不同的估计”，“不要掩盖这种不一致”。“我相信，大家的认识，在实践的过程中，可以逐步地一致起来。”这些话把这种“不一致”已经挑明了。到八届十中全会前后，毛主席就把这两次会议对形势和困难的实事求是估计当作“黑暗风”来批判了。

针对这两次会议对形势的估计，8月5日毛主席在华东、中南组说：我周游了全国，从中南到西南，找各大区的同志谈话，每个省都说去年比前年好，今年比去年好，看来并非一片黑暗。有的同志把情况估计得过分黑暗了。8月6日毛主席在讲话中批评说：现在有一部分同志把形势看成一片黑暗了，没有好多光明了，引得一些同志思想混乱、丧失前途、丧失信心了。8月9日在中心小组会上，毛主席又说：1960年下半年以来，大家只讲黑暗，不讲光明，已经有两年了。我在周游“列国”时，在光明、黑暗的问题上只是露了一点，提了个题目。这两年讲困难讲黑暗合法，讲光明不合法了。这次会上就是要解决这个问题。

针对两会要把困难估计够的说法，8月15日毛主席批评说：有那么一些人，没有干劲了，怎么办？他们鼓单干之劲，鼓黑暗之劲，鼓讲缺点错误之劲。讲光明、讲成绩、讲集体经济，他们就没了劲了，怎么办？8月20日他又说：讲困难、讲黑暗已经讲了两年多了，讲光明不合法了。毛主席多次批评以后，少奇同志不得不就5月中央工作会议对困难估计的说法进行解释和自我批评。在8月11日中心小组会上，少奇同志说：五月会议我对困难有两点估计过分了，一是说1962年夏收减产已成定局，一是说单干在全国估计已占20%。9月26日，少奇同志在全会上讲

话，着重谈了如何对待困难的问题。他说：前些年困难是不可避免的；要实现国家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就要花一些代价，吃一些苦，死一些人，都是合乎规律的，比起列宁在十月革命后遇到的困难要小得多。他还把对待困难的态度分作三种：一是被困难所吓倒，动摇（这是指邓子恢同志）；一是利用困难向党进攻（这是指彭德怀同志）；一是充分估计困难，坚持社会主义道路（这是指西楼会议、五月会议）。少奇同志是维护两会的正确性的，但他也不得不承认：两会对困难估计得多了一些。“现在我们受到的困难到底有多大？我看，现在就是这样大”，“就是如此而已”。不过他还是认为，在宣传上不要把形势说得太好了，“还是有困难，还要继续克服”。毛主席接受了这个看法，插话说：公报要改一下，改成去年比前年好一些，今年又比去年将会要好一些。这也是当时对形势、对困难估计的两句有代表性的用语。

针对两会关于农业恢复的速度不能够很快的说法，在8月11日中心小组会上，毛主席批评说：农业恢复要五年、八年，讲得那样长，就没有希望了。如果那样讲，就是说我们的政策如《60条》、《70条》、精减2000万人、减少征购等都不灵，或者说，这些政策要长期才能见效，那就需要另搞一套。在8月13日中心小组会上，军队一位负责同志发言也批评说：农业恢复的时间越说越长，工业指标也越讲越少，我们一辈子没有希望了，还有什么搞头。还有的同志在小组会上发言说：现在整个国民经济的中心不是个恢复问题，工业、农业、交通运输业都不是个恢复问题。在十中全会最后一天，有的同志发言批评说：现在是越低越好，越少越好，越慢越好，越黑暗越好，把大跃进说得越不像话越好，越松劲、越单干越好。今后五年不能光讲是恢复。毛主席插话说：今后五年不只是恢复，一定要有所发展。

针对两会提出的“争取快，准备慢”，把十年规划分为前五年恢复，后五年发展的决策，在8月15日的中心小组会上，李

富春同志发言说：五月会议提出争取快、准备慢，问题是有些同志把重点放在准备慢上了。毛主席插话说：“争取快、准备慢”，哪一方面也适用。快了，头一句灵；慢了，后一句灵。谭震林同志发言也不赞成说农业的恢复要五年。他说：实际上，“五风”纠正了，搞了《12条》、《60条》，恢复就会很快，只要两年就达到1957年3700亿斤的水平。毛主席插话说：恐怕再有两年差不多，主要是今明两年，64年扫尾。无非是刮“五风”、瞎指挥不干了，高征购减少了，现在这些因素没有了嘛！有的同志在小组会上还说：“大跃进的形势，肯定会要很快重新到来的。”并认为，这是社会主义建设发展的客观规律。

从五月会议到北戴河会议，时间仅隔两个多月，对形势的看法为什么那样悬殊？毛主席为什么要批判“黑暗风”？我认为，这还是反映了中央领导同志中间对如何进行国民经济调整有不同看法。毛主席是同意进行调整的，但前提是：必须首先肯定1958年以来提出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正确性，不容许有什么触动；对前几年所犯错误的分析，对困难的分析和克服困难的办法，必须与之合拍。西楼会议、五月中央工作会议使调整工作大大深入了一步，在某些方面触动了这个大前提。因而，毛主席就要出来干预和纠正了。在8月11日中心小组会上，毛主席说：现在不赞成总路线、“三面红旗”的人，把形势说成一片黑暗。就像有些小说，如《官场现形记》等，揭露黑暗，人们是不喜欢看的，鲁迅把它叫作谴责小说。《红楼梦》、《西游记》人们爱看，因为它有希望嘛。《金瓶梅》没有传开，不只是因为它的淫秽，主要是因为它只揭露黑暗。会上，有的同志说，“三面红旗”究竟打不打？现在似乎理不直、气不壮了。有的同志说，大跃进似乎很难开口了，简直就不好提了。东北有个同志说，现在似乎总路线不好讲了，大跃进也不能讲了，成绩不能讲了，一讲成绩就受讽刺。在8月9日中心小组会上，有人说到，现在有人怕说光

明，说光明就感到有压力。毛主席插话道：说压力，那你先压我嘛！你压了我几年了嘛！你们黑暗讲了几年了嘛！越讲越没有前途了。说集体没有优越性，这不是压我？压力总是有的。这段话很能反映毛主席对西楼会议、五月中央工作会议的看法，也很能反映他对1960年底以来的调整工作的一些看法。

（三）包产到户问题引起的争论

1961、1962年，在全国一些农村，群众创造并实行了包产到户这种比较符合农村生产力水平的农业生产责任制。它是对“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经营方式的自发的否定，也是为克服农村遇到的严重困难应运而生的。它一问世就很受农民欢迎，全国不少地方都程度不同地实行起来。比如，当时搞各种形式包产到户的，安徽全省达80%，甘肃临夏地区达74%，浙江新昌县、四川江北县达70%，广西龙胜县达42.3%，福建连城县达42%，贵州全省达40%，广东、湖南、河北和东北三省也都出现了这种形式。据估计，当时全国实行包产到户的约占20%。但是，由于认识上的不一致，它长期得不到肯定。而且在这两年时间里围绕它发生了一场争论，八届十中全会上，把它作为“单干风”进行了批判。

我们党领导农民群众走农业集体化的道路，这个大方向是对的，是应该坚持的。但是，对集体化的内容和具体发展路子的理解，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存有片面性和局限性，而且在生产管理上也长时间没有找到一种好的形式。自1960年冬季开始，党中央在调整农村政策中，先后制定了《12条》、《60条》和《关于改变农村人民公社基本核算单位问题的指示》，逐步纠正了“共产风”、“瞎指挥”，基本结束了队与队之间的平均主义。但是，户与户之间的平均主义问题还没有解决。平均主义对生产力的破坏

极为严重，农民群众最厌恶的就是干活大呼隆，分配一拉平。基本核算单位下放到生产队以后，农民形容说：“大呼隆”变成了“二呼隆”，“大锅饭”变成了“二锅饭”。

1961年，在一位老农的启发下，安徽创造了在计划、分配、大农活、用水、抗灾等方面实行统一管理（即“五统一”）下的“责任田”，实际上还不是包产到户的形式。这年3月，安徽省委作出决定，在全省普遍实行这种生产形式。因怕被人误解成是“单干”，他们把这种形式叫做“包产到队、定产到田、责任到人”的责任制。实行“责任田”确实很见效，能够大幅度增产，提高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当时一个干部给毛主席写的一封信，就举了这样一个生动例子：安徽太湖县徐桥实行了“责任田”，附近的宿松县没有实行。徐桥嫁到宿松县的姑娘们三五天跑回娘家一趟，为的是多吃几餐饱饭，回去还要带些粮食走。做母亲的叹息道：“唉，你们宿松县不实行责任田，真急人。”

但是，对这种受欢迎的责任制形式，中央和华东局的态度是不明确的。安徽省委书记曾希圣同志向华东局柯庆施同志汇报，柯的态度暧昧，说这个办法不要推广，可以试验。1961年2月，柯庆施同志去安徽，途经全椒县古河镇，几位老农当面提出要求实行“责任田”，并问：“为什么不相信我们？”3月10日，在广州中央工作会议华东组会上，曾希圣同志介绍了这种办法，大家一般地表示，“试验可以，推广值得考虑”。

曾希圣同志于3月15、16日向毛主席汇报这个问题时，毛主席说：“你们试验嘛！搞坏了检讨就是了。”曾立即打电话告诉省委：“现在已经通天了，可以搞。”广州会议尚未结束，毛主席又通过柯庆施同志转告曾希圣同志说：可以在小范围内试验。3月20日，曾希圣同志又给毛主席并少奇、恩来、小平、彭真、庆施同志写信，如实分析了实行“责任田”的好处和坏处，认为好处明显，大于坏处。毛主席未表态。1961年7月，曾又赶到

蚌埠向毛主席汇报，毛主席勉强说了一句：“你们认为没有毛病就可以普遍推广。”到了这年12月，毛主席思想上起了变化，认为农村实行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以后，这是最后的政策界限，不能再退了。他在无锡，把曾希圣同志找去，用商量的口气说：生产恢复了，是否把“责任田”这个办法变过来。曾希圣同志提出：群众刚刚尝到甜头，是否让群众再搞一段时间。

1962年初，曾希圣同志在“七千人大会”上因安徽在“大跃进”中刮“五风”严重而受到批判，也把实行“责任田”作为一个问题提出来进行批判，说他搞“责任田”是“犯了方向性的严重错误”，“带有修正主义色彩”。他被撤了职。新省委做出改正“责任田”的决定，认为“责任田”“在方向上是错误的，与中央提出的《60条》和关于改变农村人民公社基本核算单位问题的指示是背道而驰的”，要求在1962年内大部分改过来，1963年扫尾。

至此问题并没有解决。因为“责任田”是一种联产计酬的生产责任制，适应农村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和广大农民的需要，有强大的生命力，广大农民群众不愿意改变。1962年6月14日，中央农村工作部副部长王观澜同志致函邓子恢同志并转谭震林同志说：安徽群众“特别强烈要求的”，是“‘责任田’三年不变，人大代表李有安（劳模）甚至代表群众说话，提出三年又三年不变”。6月，李富春同志也致函少奇、小平并书记处诸同志，说他本月16日途经安徽一些地方，看到农民生活好了，没有浮肿病和逃荒要饭的了。同农民谈话，农民都说：“实行包产到户好，积极性比过去高了”，“现在自己种自己收，多种就多收，多收就多吃”。6月29日，他还致函正在湖南农村和田家英同志一起做调查工作的梅行同志说：农业问题恐需“在政策上要活些，要以退为进”。

1962年4月7日，中央的一些领导同志对这个问题思考甚

多。

(1) 邓子恢同志的主张。他很早就重视在农业合作社建立生产责任制的问题，同时他是主张巩固集体经济，反对单干的。1962年上半年，安徽强行纠正“责任田”。4月初，宿县符离区委书记给邓子恢同志写信反映群众的意见，认为“责任田”坚持“五统一”，就是坚持了土地等主要生产资料集体所有的原则，方向是正确的。这封信引起了邓子恢同志的重视，他让中央农村工作部派工作组去安徽一些县做调查。6月中旬和7月18日，工作组先后给他发来《当涂县责任田的情况调查》、《宿县王楼公社王楼大队实行责任田的情况》、《宿县城关区刘合大队实行包产到户责任田的情况调查》。这些材料都是肯定“责任田”的，认为是“在集体农业生产的经营管理上找出了一条出路”，群众说：“越干越有奔头，最好一辈子不要再变。”

在5月中央工作会议上，邓子恢同志赞成在有些地区适合搞包产到户的就让农民搞。5月24日，他给党中央、毛主席写了《关于当前农村人民公社若干政策问题的意见》，主张给农民多一点“小自由、小私有”，强调建立生产责任制是“今后搞好集体生产、巩固集体所有制的根本环节”。5月底至7月中旬，邓子恢同志还先后应邀在军委总后勤部、解放军政治学院、中央高级党校等单位做过多次长篇报告。这些报告分析了在三年困难时期，粮食产量连续下降，农村元气大伤的原因是：所有制变动太大、分配上搞平均主义、瞎指挥、经营管理没有上轨道、干部中存在特殊化作风、工农业发展比例失调等。他详细比较了个体经济、集体经济的优缺点，结论是集体经济的优越性大。但是因为经营管理没做好，优越性没有发挥出来。因而，他主张除固定所有制、做好经济工作以外，主要是搞好经营管理，也就是“必须要有严格的责任制”。他主张搞联产计酬的包产到户。他说：“农活生产责任制不和产量结合是很难办的。因此有的地方包产到

户，搞得很好，全家起早摸黑都下地了。”他认为，不能把“包产到户”说成是单干，因为“土地、生产资料是集体所有，不是个体经济”。7月2日，安徽宿县符离区党委全体同志又给邓子恢同志并党中央寄来《关于“责任田”问题的汇报》，列举了七条理由证明“责任田”方向是对的，列举了十个变化说明它确实好。

在这种情况下，邓子恢同志坚信“责任田”的办法是正确的，决心把中央农村工作部的调查材料和安徽来信都送给毛主席看。农村工作部的同志劝他暂时缓一缓，等中央态度明朗以后再说。他毫不含糊地说：应该实事求是地向中央陈述意见。共产党员时时刻刻想到的是老百姓的利益，不怕丢“乌纱帽”。

在我们党内，邓子恢同志是对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非常了解和深有研究的一位老同志。在那些年，我们常常可以听到看到他在这方面的一些真知灼见。更可贵的是，他能够始终如一地坚持党的实事求是的原则，如实地反映农村情况，如实地陈述自己对农村问题的看法，只要事实证明他的看法是合乎农民群众的要求和愿望的，他就毫不动摇地加以坚持，不管别人怎么看，不管是否受到批评，也不管是否丢掉“乌纱帽”。其识其胆，我以为足堪激励同辈，鞭策后人的。

(2) 中央几位领导同志对田家英同志湖南调查结果的不同态度。“七千人大会”后，毛主席南下，派秘书田家英同志率调查组到湖南农村调查如何尽快恢复农业生产问题。田家英同志在1961年的广州会议上，是不赞成安徽等地包产到户的做法的。1962年3、4月份，他率调查组来到湖南韶山南岸生产队、毛主席的外祖家棠佳阁生产队、湘乡县大坪大队和少奇同志故乡宁乡县炭子冲大队，经过两个多月深入调查，发现农民对包产到户呼声极高，过去搞“大呼隆”，大家责任心不强，误工、不出活、农活质量低、干部开销大，因而粮食产量从1955年开始到1961

年几乎连年下降。农民对这种状况很不满意，强烈要求工作组“帮个全忙，把田分到户”，中央“只应当大家，莫当小家”，“小家让农民自己去当”。田家英同志深受感染，态度也发生了转变，赞成农村可以搞包产到户。

田家英同志到上海去汇报，陈云同志称赞他“观点鲜明”。他向毛主席汇报群众欢迎包产到户，而毛主席认为“包产到户”是一种后退，反映了落后群众的要求，并说：我们是要走群众路线的，但有的时候，也不能完全听群众的，比如要搞包产到户就不能听。田家英同志又回到湖南做了一段时间的调查研究，7月初回北京，田家英同志又向少奇同志汇报，少奇同志说：要使包产到户合法起来，可以把调查得出的结论在“秀才”中间酝酿。他向小平同志汇报时，小平同志很明确地表示：赞成。7月上旬，毛主席从邯郸回到北京，田家英同志被召见。田表示：全国各地出现包产到户、分田到户，与其自发地搞，不如有领导地搞，全国农村可以60%的搞包产到户，40%的仍集体统一经营、统一分配。当时毛主席没有答理。后来在八届十中全会上，因为这一条，田家英同志也一再受到批评。

(3) 邓小平同志的意见。6月下旬，中央书记处听取华东局农村办公室汇报，华东局认为安徽搞“责任田”就是单干，是方向性错误。会上赞成和反对的各占一半。小平同志说：在农民生活困难的地区，可以采取各种办法，安徽省的同志说，“不管黑猫黄猫，能逮住老鼠就是好猫”，这话有一定的道理。“责任田”是新生事物，可以试试看。7月7日，小平同志在接见出席共青团三届七中全会全体同志的讲话中，主张使包产到户合法化。他说：生产关系究竟以什么形式为最好，恐怕要采取这样一种态度，就是哪种形式在哪个地方能够比较容易比较快地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就采取哪种形式；群众愿意采取哪种形式，就应该采取哪种形式，不合法的使它合法起来。……刘伯承同志经常讲一

句四川话：“黄猫、黑猫，只要捉住老鼠就是好猫。”……现在要恢复农业生产，也要看情况，就是在生产关系上不能完全采取一种固定不变的形式，看用哪种形式能够调动群众的积极性就采用哪种形式。……现在要冷静地考虑这些问题。过去就是对这些问题考虑得不够，轻易地实行全国统一。有些做法应该充分地照顾不同地区的不同条件和特殊情况，我们没有照顾，太轻易下决心，太轻易普及。

(4) 陈云同志的意见。1962年春夏之交，陈云同志在上海、杭州。他看了安徽“责任田”的材料，认为是非常时期必须采取的办法。他打算向毛主席进言。7月初回京，与几位常委同志交换意见，看法基本一致。7月6日，他给毛主席写信说：“对于农业恢复问题的办法，我想了一些意见，希望与你谈一谈，估计一小时够了。我可以走路了，可以到你处来。”毛主席从邯郸回来，当夜就约陈云同志谈话。陈云同志阐述了个体经营与合作经济在我国农村相当长的时期内还要并存的问题。当前要注意发挥个体生产积极性，以克服困难。当时毛主席未表态。第二天传出，毛主席很生气，严厉批评说：“分田单干”是瓦解集体经济，是修正主义。陈云同志闻讯沉默不语。北戴河会议初期，他写信给小平同志并转毛主席，说明因身体状况不好，要求请假，并表示：“7月24日《关于巩固人民公社集体经济、发展农业生产》的决定草案，我已看过，我完全同意中央作这样一个决定。”陈云同志未参加八届十中全会的全过程。

1962年7月上旬，毛主席从邯郸回来，主意已定，对邓子恢、田家英同志主张“包产到户”（他认为这就是“单干”）十分反感，对少奇、陈云、小平同志没有抵制甚至赞同也不满意。9、10、11日连续三天下午他分别把河南的刘建勋、耿其昌同志，山东的谭启龙同志，江西的刘俊秀同志召来北京商谈农村工作问题。针对各地出现“包产到户”，他提议以党中央名义起草一个

关于巩固人民公社集体经济、发展农业生产的决定，改由陈伯达主持，不让田家英同志参与其事。毛主席后来在北戴河会议上说：为什么搞这么一个文件，讲巩固集体经济呢？就是因为现在这股闹单干的风，越到上层风就越大。毛主席态度明确以后，大家不能不跟着转变态度。7月18日，少奇同志在对下放干部的讲话中，专门讲了巩固集体经济问题，批评包产到户，批评从高级干部到基层干部“对集体经济的信念有所丧失”。7月17日文件初稿拿出，7月19日、20日，由陈伯达主持，在中南海怀仁堂召开有各大区书记参加的起草委员会会议，座谈这个决定。会上对包产到户取否定态度。柯庆施同志发言说：现在看，单干不行，这个方向必须批判。刘澜涛同志发言介绍了西北局围绕“包产到户”展开争论的情况。陶铸、王任重同志曾到广西龙胜县调查座谈过包产到户问题，毛主席对他们的“座谈记录”评价甚高，认为“分析是马克思主义的，分析之后所提出的意见也是马克思主义的”。陶铸同志发言还是坚持划清单干与集体的界限，认为在单门独户、分散居住的地方可以搞包产到户。

中央的决定发下去后，各省、市、自治区和各部委写出61篇讨论的“书面报告”，基调是批评包产到户，但也有的发表了赞成包产到户的意见。北戴河会议初期的讨论也大体如此。

8月5、6日，毛主席在北戴河会议讲话后，形成了一边倒，对“单干风”（实际是包产到户）进行严厉批判。8月5日，毛主席说：一搞包产到户，一搞单干，半年的时间就看出农村阶级分化很厉害。有的人很穷，没法生活。有卖地的，有买地的，有放高利贷的，有娶小老婆的。8月6日毛主席讲话强调：还是到社会主义，还是到资本主义，农村合作化还要不要？还是搞分田到户、包产到户，还是集体化？主要就是这样一个问题。8月9日在中心小组会上，毛主席又插话说：单干从何而来？在我们党内有相当数量的小资产阶级成分，包括许多农民，其中大部分是

贫农和下中农，有一部分富裕中农家庭出身的，或者本人就是富裕中农，也有地富家庭出身的，也有些知识分子家庭，是城市小资产阶级出身，或者是资产阶级子弟。另外，还有封建官僚反动阶级出身的。党内有些人变坏了，贪污腐化，讨小老婆，搞单干，招牌还是共产党，而且是支部书记。这些人很明显，把群众当奴隶。有些同志马克思主义化了，化的程度不一样，有的化得不够。我们党内有相当多的同志，对社会主义革命缺乏精神准备。

批“单干风”重点是批评邓子恢同志。会上把他夏天的几次报告和安徽省太湖县委宣传部一位同志给毛主席写的《关于保荐责任田办法的报告》都拿来批判。会上说邓子恢同志在困难面前发生动摇，是代表富裕农民阶层搞资本主义农业的要求。8月12日，毛主席在一个文件上批示，严厉批评邓子恢同志“动摇了，对形势的看法几乎是一片黑暗，对包产到户大力提倡。这是与他在1955年夏季会议以前一贯不愿搞合作社；对于搞起来了的合作社，下令砍掉几十万个（实际上，那次整顿，只减少了两万多个合作社——作者注），毫无爱惜之心；而在这以前则竭力提倡四大自由，所谓‘好行小惠，言不及义’，是相联系的”。“他没有联系1950年至1955年他自己还是站在一个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的立场上，因而犯了反对建立社会主义集体农业经济的错误。”这种批评显然是不对的。9月25日，董必武同志在八届十中全会讲话谈到“单干风”时，毛主席又插话说：邓子恢同志曾当面对我谈过保荐责任田，我跟他谈了一个半钟头的话，我就受了一个半钟头的训，不是什么谈话，是受他的训。接着，毛主席问道：邓子恢同志还跟别的同志谈了没有？少奇、恩来同志不得不进行解释。毛主席多次说到建议可以，但不能采纳。话中隐含着批评少奇等同志没有抵制包产到户的意见。他在会上还多次批评田家英同志60%的包产到户、40%搞集体的主张；批评中央农

村工作部搞资本主义，邓子恢同志是“资本主义农业专家”。这一天，我在会上也发了言，虽然主要谈的是工农业关系问题，但在开头的表态中，我对邓子恢同志也是作了不恰当的批评的。随后，中央撤销了邓子恢同志任部长的中央农村工作部，调他任国家计委副主任。

1981年3月，党中央为邓子恢同志平了反。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包产到户、联产计酬的承包责任制在我国农村普遍实行，发挥了巨大威力，是适合于我国农村当前生产力水平的一项最重要的改革。今天回过头去看，八届十中全会批判所谓“单干风”的做法是不对的。第一，对包产到户的性质弄错了。各种形式的生产责任制，包括包产到户，克服了吃大锅饭的弊端，带动了生产关系的调整，纠正了农业生产经营管理方面长期存在的缺点，深受农民群众欢迎。它本质上仍然是集体经济，只是分户经营，联产计酬，多劳多得，是把集体经济的优越性与农民分户经营的积极性统一起来的较好方式。可是，八届十中全会把包产到户说成是“单干”，把“单干”说成是搞资本主义，这就把事物的性质弄错了。第二，片面追求经营管理上的单一模式。我在前面引的同志的那段话，讲得很深刻。多少年来，误认为只有集中生产资料、集中劳动、平均分配，才是社会主义。实际上，应该根据不同地区不同条件，按群众的愿望，采取不同的管理形式。凡是有利于发展生产的，就应该采取。强迫推行单一模式，对发展生产不利，甚至造成破坏。第三，动辄把生产经营管理上的问题上纲到两个阶级、两条道路斗争的高度去分析。1962年的批判，不是从农村的生产力水平和农民群众的要求等实际情况出发，而是从“一大二公”之类的原则出发。以为只有符合这些原则才是社会主义，稍有变更就认为是搞“资本主义”。到底根据什么来判断是非呢？小平同志1992年在视察南方的谈话中，提出了判断的标准，这就是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生

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这才是唯一正确的客观标准。

（四）为何发生对“翻案风”的批判

我在本书第30篇已谈到1959年庐山会议对彭德怀等同志的批判和处理。在调整政策，为“反右倾”中被错误批判、打击的干部和群众进行甄别平反的过程中，由于毛主席坚持认为庐山会议没有错，问题只是不该传达到县以下，彭德怀同志的问题仍没有得到平反。在1962年1月召开的“七千人大会”上，少奇同志在讲话中说：1959年7月14日，彭德怀同志给主席写信反映意见，“信中所说到的一些具体事情，不少还是符合事实的”，“一个政治局委员向中央主席写一封信，即使信中有些意见是不对的，也并不算犯错误”。那么，为什么要批判他？为什么要肯定“这场斗争是完全必要的”呢？少奇同志列举了四点理由：一是在党内有一个小集团，是高、饶反党集团的主要成员；（毛主席插话补充说，彭和高岗，实际上的领袖是彭。）二是彭和高“都有国际背景”，“同某些外国人在中国搞颠覆活动有关”；三是阴谋篡党，背着中央在党内进行派别活动；四是他1959年的信早不写、晚不写，恰在他率军事代表团出访几个月回来后急急忙忙写，是以为时机已到，利用工作中的缺点错误向党进攻。

彭德怀同志没有参加“七千人大会”。会前三天（1月7日），他给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同志写信说：“六日午前，中央办公厅同志电话通知十日参加扩大会议，烦请代我请假。一、二月拟继续读哲学和政治经济学，三月去太行山区，四月去冀南区各调查一两个大队。”后来当他知道会上再次受到了批判，他不得不进行辩解和申诉。1962年6月16日，他向毛主席和党中央交了一封很长的申诉信（即所谓“八万言书”）。

这封信共分五个部分，大体上是围绕少奇同志在“七千人大会”的讲话中对他的批评来写的。第一部分，他与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等人之间是同志关系，没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不存在“阴谋篡党”的问题；庐山会议上，他对一些问题的看法，曾在会前和会中都讲过，不存在等待时机问题。第二部分，回顾同高岗、饶漱石的接触和来往情况，承认听到高岗议论少奇同志，没有及时向中央报告，是不对的，但决不存在“彭、高联盟”。第三部分，回顾1936年至1958年之间，9次同外国人的接触，每次同外国人谈话，都有翻译和外交人员在场，有案可查，不存在“同某些外国人在中国搞颠覆活动”的问题。第四部分，回顾他本人入党、平江起义、上井冈山、长征、抗日战争等情况。第五部分，针对有人说他执行了资产阶级军事路线，他说：自己在主持中央军委日常工作期间，在建军原则、领导制度、战略方针、民兵制度等方面，都是遵循党中央、毛主席的原则办事的，“不能得出什么‘资产阶级军事路线’的结论”。他特别申明，说他阴谋篡党和有国际背景，“实在腹怀委屈”，是莫须有的罪名，如果发现事实确凿，他宁愿“按以叛国论罪，判处死刑无怨”。

8月22日，北戴河会议结束前两天，他再次给毛主席和党中央写信，重申不存在反党小集团篡党和同外国人在中国搞颠覆活动的问题。他说：“我带着苦闷的沉重的心情，再次请求对我所犯的错误，进行全面的审查，作出正确的处理。”

两封信送上去以后，被认为这是彭德怀同志利用当前国际阶级斗争激烈的形势和国内发生了困难而闹翻案，是根本否认他1959年所犯的错误，根本否认“反党集团”问题，是向党进行的新的进攻。在北戴河会议期间，毛主席就已多次在讲话、插话中批评彭德怀同志。8月5日，毛主席说：59年反右倾斗争，大多数是搞错了。彭德怀要翻案、要求平反，我看59年反右倾不

能一风吹。8月11日，毛主席在中心小组会上说：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彭德怀写信，把过去说的统统推翻。8月13日又说：我们只坚决反对背后捣鬼的，不怕搞阳谋的。9月24日，毛主席在八届十中全会上又说：近来有股平反之风，无论什么都要平反，那也是不对的。我们的方针应当是：真正搞错了的，要平反；部分搞错的，部分平反；没有搞错，搞对了的，不能平反。这里说的没有搞错，不能平反，就是针对彭德怀同志说的。

彭德怀同志8月22日的信发出以后，一些同志认为，这是逼着中央全会来讨论他的问题，是向中央挑战。在八届十中全会前的预备会议上，9月3日毛主席曾召集小范围会议，布置要把彭的两封信拿到全会各小组会上讨论。一直到全会结束，小组发言，大会发言，都充满了对彭德怀同志的批评。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谭政、邓华、甘泗淇、洪学智等同志，也都一一检讨和受到批评。

这次批彭，声势也是很大的，不亚于1959年庐山会议那一次。批判主要集中在这样几个方面：彭写此信是1962年夏天刮的“翻案”阴风，是配合“三尼”（当时把肯尼迪、尼基塔·赫鲁晓夫、尼赫鲁和铁托简称为“三尼一铁”公司——作者注）反华，利用我们暂时的困难，向党发起新的进攻，100多页信纸里面埋的是“炸弹”，是反党纲领；彭一贯反对毛主席，一贯支持、执行错误路线，是“野心家、阴谋家”；不但是彭、高联盟，而且在六届五中全会上，彭就被选为中央委员，认识了王明，因而，中国的反党集团，不是一个小集团，而是大集团；算历史旧账，说彭参加革命是来“入股”，是资产阶级民主派，极端个人主义，用资产阶级世界观改造党，在历史上屡犯错误；说彭德怀同志是“里通外国”，是“国际反动别动队”。陈伯达则从“理论”高度强调：“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也会出现张邦昌、石敬

塘。”就这样，发言者都把“信”上升到敌对分子搞篡党夺权阴谋的高度去批判。9月24日，八届十中全会召开的第一天，康生就提议，被列为审查对象的彭德怀等五位同志不必要再出席全会，国庆节也不上天安门。9月27日，中央全会正式通过组成对彭德怀同志的专案审查委员会，进一步进行审查。到1965年，毛主席亲自和彭德怀同志谈话，派他到西南领导三线建设。在“十年动乱”中，他被林彪、江青反党集团派人从西南抓回北京批斗，迫害致死。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坚持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的原则，审查、纠正了对彭德怀同志的错误结论。12月24日，在北京隆重举行了彭德怀同志追悼会，邓小平同志代表党中央致悼词。悼词回顾了彭德怀同志光辉的革命历程，给他做了全面、公平的评价，为他恢复了名誉。悼词说：

彭德怀同志是我党的优秀党员、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是我们党、国家和军队的杰出领导人，曾担任过党政军的许多重要职务。他具有很强的组织领导能力和军事指挥才能。

彭德怀同志在近半个世纪的革命斗争中，在伟大导师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下，南征北战，历尽艰险，为中国革命战争的胜利，为人民军队的成长壮大，为保卫和建设社会主义祖国，作出了卓越的贡献。他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是忠于党、忠于人民的一生。他的不幸逝世，是我党我军的重大损失。

彭德怀同志热爱党，热爱人民，忠诚于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他作战勇敢，耿直刚正，廉洁奉公，严于律己，关心群众，从不考虑个人得失。他不怕困难，勇挑重担，对革命工作勤勤恳恳，极端负责。彭德怀同志是国内和国际著名的军事家和政治家，一直受到广大党员和群众的怀念和爱戴。

在预备会议批判彭德怀同志所谓“翻案风”的过程中，又发生了围绕小说《刘志丹》（上册送审样书）而引起的政治批判。小说初稿写出来以后，作者请当年担任过陕甘苏维埃政府主席、刘志丹的战友习仲勋及其他有关同志审阅。习仲勋同志认为小说没有写好，于1960年春天，两次约作者谈了自己对书稿的意见。1962年夏天，出版社印出了送审样书。

应该指出，小说作者的创作态度是不够严肃的，作品本身是有缺点或错误的（至于1984~1985年出版的三卷本《刘志丹》涉及的政治领域中的是非问题，中央领导同志已明确指出，这里就不再赘述了）。因此，曾参加过陕甘边和陕北革命斗争的老同志中，有的对它提出批评，这本来是很正常的。可是康生却别有用心，认为小说“带有政治倾向性”，“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来宣传高岗”，硬说这是一部“为高岗翻案”的反党小说，立即要中宣部通知各报刊不准发表。于是，会议就把它作为“翻案风”的例证进行批判。

9月中旬开始，各组在批彭的过程中对小说《刘志丹》也展开了批判。在批判中，又错误地把曾经参加过西北地区革命斗争的习仲勋、贾拓夫、刘景范等同志打成“反党集团”，而且还升级为“彭、高、习反党集团”、“西北反党集团”，说小说就是他们的“反党纲领”。9月24日，毛主席在八届十中全会上讲话时，康生递了一张条子说：“利用小说进行反党活动，是一大发明。”毛主席在会上念了这张条子，接着说：近来出现了好些利用文艺作品进行反革命活动的事。用写小说来反党反人民，这是一大发明。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不论革命、反革命，都是如此。毛主席后来说过：利用小说反党，是康生发现的。9月27日，全会决定成立审查习仲勋等同志的专案审查委员会，由康生负责。这个专案审查一直到“文化大革命”开始时尚未结束。“文化大革命”中，

继续对这些同志进行审查、迫害。

对小说《刘志丹》（上册送审样书）当然可以进行批评，但全会上把它作为“翻案风”进行政治批判，进而把习仲勋、贾拓夫、刘景范等同志打成“反党集团”，则是康生制造的一起大错案。1980年2月25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为所谓“习仲勋反党集团”平反的通知》。《通知》说：

习仲勋、贾拓夫、刘景范同志都不存在所谓反党问题，他们之间是工作关系和同志关系，所谓“习仲勋反党集团”，纯属不实之词。这三位同志自1962年以后长期受批判、审查，文化大革命运动中被关押多年，是康生等人蓄意制造的一起冤案。

习仲勋、贾拓夫、刘景范同志参加革命几十年来，为党为人民作了大量的工作，对革命是有贡献的。强加给他们的反党罪名应予推倒，彻底平反，恢复名誉。1962年以后审查他们所形成的一切诬蔑不实的结论意见和材料，应予否定。对因所谓“习仲勋反党集团”问题受到株连迫害的干部和群众，均应予以平反，恢复名誉。

（五）重新强调阶级斗争及其失误

从北戴河会议开始，最初的意图是要解决如何巩固集体经济，反对“包产到户”的问题。会议召开一个多星期后，毛主席认为，不抓普遍的问题，只抓具体问题，会议展不开。注意观点和分析不够，有点沉闷。现在需要务虚。离开阶级斗争就不能说明问题。不讲阶级、阶级斗争，就没劲了。就是说，需要用阶级分析的方法去观察这些问题。于是，毛主席在会上多次专门讲阶级、形势和矛盾问题，重新强调阶级斗争。

所谓重新强调阶级斗争，是相对 1957 年党的八届三中全会和 1958 年党的八大二次会议说的。这两次会议改变了八大关于社会主要矛盾的论断，认为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社会主义道路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仍然是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从那以后，虽然 1959 年庐山会议曾把党内斗争夸大为两大对抗阶级的生死斗争，但比较集中地谈论阶级斗争问题，还是这一次。

毛主席把社会主义时期的阶级矛盾、阶级斗争扩大化、绝对化了。他在几次讲话中都问道：在社会主义国家究竟还存在不存在阶级、阶级斗争？8 月 5 日，毛主席说：我看还有。地主、富农、反革命残余都还存在。既然阶级存在，就要出反革命，而他们总是想复辟的。8 月 6 日，毛主席说：外国有些人说，没有阶级了，听说国内也有人这样讲。有人听到国内还有阶级存在，就感到吃惊。8 月 9 日，他说：只要有阶级、阶级斗争，一万年也要搞，哪有有阶级不进行阶级斗争的？9 月 24 日，毛主席再次强调说：在社会主义国家，要承认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存在，老干部要好好研究，要在中层干部、基层干部，特别是青年人中进行教育，我们必须从现在就讲起，年年讲，月月讲，开一次中央全会就讲，开一次大会就讲，使全党提高警惕，使我们有一条比较清醒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应该说，在我国 1956 年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已经基本解决了。当然，由于国内的因素和国际的影响，阶级斗争还将在一定范围内长期存在，在某种条件下还可能激化。这是毫无疑问的。问题是，毛主席把这种一定范围内存在的阶级斗争现象扩大化、绝对化，看成是普遍现象了。

毛主席对资产阶级“复辟”问题，警觉性很高。9 月 24 日他引用列宁在十月革命刚胜利不久的一段话，说明“复辟”的危险是长期存在的。9 月 26 日，少奇同志讲话提出谁胜谁负的问题还没有解决。毛主席插话说：法国、英国资产阶级革命，都有

过三四次贵族复辟。英、法资产阶级革命经过多次复辟和反复辟的斗争，这没有错。问题出在毛主席把当时在党内开展的不正常斗争，也说成是反“复辟”的斗争了。

为了说明阶级斗争是普遍存在的，8月5日毛主席说：农村当中还有富裕阶层，阶层之间存在着两类矛盾，一是对抗性的敌我矛盾，一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的矛盾。农村现在主要是阶层之间的矛盾，即贫农和富裕农民之间的矛盾，农村富裕阶层是反革命想复辟的“助手”。显然，这种说法是不科学的。因为在社会主义阶段，只能实行按劳分配的原则，由于劳动者的劳动数量和质量不同，在社会分配上，任何时候都会存在一定差异的。如果把这些也看成是阶级斗争，那么，阶级斗争将永无终止。

毛主席把当时党内存在的问题看得过于严重是导致阶级斗争扩大化、绝对化的又一个重要根源。毛主席当时虽然重视社会上“阶级斗争”的各种现象，但是他认为，反革命有是有，已不很多，无非是“一个游鱼三个浪”。他把主要注意力放在党内出修正主义的问题上。8月13日毛主席在北戴河会议的一次插话中说：在中国一定不出修正主义？这也难说。儿子不出，孙子出，不过不要紧，孙子出了修正主义，孙子的孙子一定会出马列主义。按辩证法，事物总是要走向它的反面，我们也不一定不走向它的反面。9月24日，毛主席说，我们除了在国际上同“帝、修、反”的矛盾外，在国内也还有人民群众同修正主义的矛盾。我们过去叫它做右倾机会主义，现在看，恐怕以改一个名字为好，叫中国的修正主义。这次会上，他着重讲的就是怎样对待国内和党内的修正主义的问题。实际上，他在这里所说的修正主义，在很大程度上，是冲着1962年上半年的“三风”（即党内认识分歧）说的。在阶级社会里，党内斗争一般来说是阶级斗争和新旧事物矛盾在党内的反映。在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只在一

定范围内存在，党内矛盾主要是认识问题。当然，不能排除社会上一定范围内的阶级斗争在党内也会有某些反映。但如果把党内存在的认识上的分歧和不同意见随意说成修正主义、阶级斗争，势必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造成党内斗争扩大化的错误，破坏党内民主生活，导致在政治上犯错误。

毛主席的上述关于社会主义时期阶级斗争的观点，集中反映在经过他反复修改和最后审定的八届十中全会公报的一段话里。公报说：

在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整个历史时期，在由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整个历史时期（这个时期需要几十年，甚至更多的时间）存在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这两条道路的斗争。被推翻的反动统治阶级不甘心于灭亡，他们总是企图复辟。同时，社会上还存在着资产阶级的影响和旧社会的习惯势力，存在着—部分小生产者的自发的资本主义倾向，因此，在人民中，还有一些没有受到社会主义改造的人，他们人数不多，只占人口的百分之几，但—有机会，就企图离开社会主义道路，走资本主义道路。在这种情况下，阶级斗争是不可避免的。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早就阐明了一条历史规律，我们千万不要忘记。这种阶级斗争是错综复杂的、曲折的、时起时伏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这种阶级斗争，不可避免地要反映到党内来。国外帝国主义的压力和国内资产阶级影响的存在，是党内产生修正主义思想的社会根源。在对国内外阶级敌人进行斗争的同时，我们必须及时警惕和坚决反对党内各种机会主义的思想倾向。

这段话，毛主席曾作过两处较大的修改。9月26日上午在

“在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整个历史时期”之后，加写了“在由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整个历史时期（这个时期需要几十年，甚至几百年）”，下午又把括号内的“甚至几百年”几个字改为“甚至更多的时间”。在“存在着……这两条道路的斗争”之后，加写了“被推翻的反动统治阶级不甘心于灭亡（虽然只是一小撮人），他们总是企图复辟。同时，社会上还存在着资产阶级的影响和旧社会的习惯势力，存在着—部分小生产者的自发的资本主义的倾向，因此，在人民中，还有一些没有受到社会主义改造的人，他们人数不多，只占人口的百分之几，但一有机会，就企图离开社会主义道路，走资本主义道路。在这种情况下，阶级斗争是不可避免的。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早就阐明的一条历史规律，我们千万不要忘记”。后又把括号内的几个字去掉了，就成了公报公布的这段话。

这段话的中心意思就是“告诫”人们，“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不要忘记党内产生修正主义的危险。这段话后来成为“十年动乱”中概括出来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和“路线”的主要依据。1981年《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在1962年9月的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同志把社会主义社会中一定范围内存在的阶级斗争扩大化和绝对化，发展了他在1957年反右派斗争以后提出的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仍然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的观点，进一步断言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资产阶级都将存在和企图复辟，并成为党内产生修正主义的根源。”我认为，这个分析是完全正确的。

毛主席把阶级斗争问题提到这样的高度，是有其历史原因的。国际上，从1960年起，我们党认为苏联出了修正主义，考虑如何“反修防修”，问题甚多。1962年4、5月间，苏联直接插手酿成了新疆伊犁暴乱、塔城等三县边民外逃等事件，还暗中支持有的国家在我边界地区挑起冲突。我国海峡两岸局势也很紧

张。蒋介石集团叫嚷要“反攻大陆”。美国曾不断派遣间谍飞机侵犯我内陆（包括北京）领空。国内一定范围内的阶级斗争，比如敌对分子的破坏活动和严重经济、刑事犯罪活动等，表现得也比较激烈。更主要的是，毛主席把党内认识上的分歧也看成了严重的阶级斗争。毛主席强调阶级斗争，很快为全党所接受。从预备会议到八届十中全会，大家都发言表示拥护毛主席的观点，认为“毛主席提出的这些问题，在长时期内，一直到消灭阶级都是管用的”。这说明，当时存在的“左”倾思潮不是偶然的，不是个别人的责任，而是全党性的思想认识问题。

尽管八届十中全会把阶级斗争提到这样的高度，有鉴于1959年庐山会议的教训，少奇同志在8月20日北戴河中心小组会上和9月26日在全会讲话中都提议：会议精神的传达应该有个范围，不向下面传达，免得把什么都联系到阶级斗争上来分析，也免得把全党的力量都用去对付阶级斗争。毛主席在9月24日的讲话中也讲到：要分开一个工作问题，一个阶级斗争问题，决不要因为对付阶级斗争而妨碍了我们的工作。要把工作放到第一，阶级斗争和它平行，不要放在很严重的地位。当天下午，在陈伯达发言时，毛主席又插话说：庐山会议以后，又有国外修正主义的干扰，以至于1959年下半年，1960年差不多整年，我们的精力说法是对付那方面去了。这一次，不管国际国内发生什么事，我们要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船。国内也好，国际也好，只有那么大的事，没有什么好大的事。因此，他赞成少奇同志的提议，这次会议的精神只传达到17级以上干部。由于有毛主席、少奇同志的这个建议和说明，全会以后，在国民经济调整方面，还是继续贯彻执行八字方针，经济工作受的冲击不大，使国民经济的调整工作到1965年得以基本完成。但是，八届十中全会中断了继续纠“左”，不适当地重新强调阶级斗争，使“左”的思想和“左”的错误倾向不但没有得到纠正，反而更

加泛滥开来，其消极影响确实是十分严重的，最终导致“十年内乱”的发生。即使是无产阶级的执政党，如果在理论上发生了失误，就必然会导致指导思想和实际行动上的失误，必然造成国家发展的曲折和严重社会危害。从我们党在社会主义时期阶级斗争理论上的失误，到党内“左”倾指导思想盛行和“文化大革命”灾难的酿成，就充分证明了这个沉痛的历史真理。我们应该永远牢记这个真理。

（薄一波著《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

“中国出了修正主义中央”： 1964年北京中央工作会议

刘少奇说：“要想一想，我们会不会出修正主义。”
毛泽东说：“已经出了嘛！像白银厂，还有陈伯达同志调查的天津小站公社，不是有了吗？我们国家，我看1/3或者还少一点，权力不掌握在我们手里，在坏人手里。”

1964年5月15日到6月17日，在北京召开了中央工作会议。会议一开始，与会者的发言就与“后10条”的精神大不一样，会上印发了甘肃省委和冶金部党组关于白银厂夺权的报告，介绍了天津小站夺权情况。不少人提出了许多极左建议，有的提出要在农村社教中“搬石头”，要在城市“五反”中划阶级等等。

6月2日，刘少奇讲话，提出“和平演变”已经演变到高级机关中的某些人了，省委、市委都有他们的人。他不再强调依靠基层干部了，认为有些地方四不清干部对工作队的办法是“喂、顶、拖、混”，要想办法摆脱他们。他说：“他们抵抗四清就是‘反党’，破坏就是‘反革命’，要开除党籍。所以没有充分发动起来以前，不能强调团结95%以上干部、依靠基层组织。”

刘少奇对形势的估计已经够严重的了，他显然受到桃园大队社教经验的影响。

然而，更令人震动的是，6月8日毛泽东亲自主持了部分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各大局第一书记参加的小型会议。毛泽东讲话提

出了中央出修正主义怎么办的问题。

毛主席出了题目，刘少奇又要做文章了。6月11日，刘少奇在中央工作会议上作反修报告，阐述毛泽东的观点。毛泽东又作了大篇插话。

刘少奇说：“要想一想，我们会不会出修正主义。”

毛泽东说：“已经出了嘛！像白银厂，还有陈伯达同志调查的天津小站公社，不是有了吗？我们国家，我看1/3或者还少一点，权力不掌握在我们手里，在坏人手里。”

刘说：“列宁的故乡出了修正主义，才引起我们严重注意。”

毛插话：“有了修正主义，才有列宁主义万岁。可能出修正主义，准备出，不注意一定出，如果注意了可能不出，也可能出。出了怎么办？要想一想。出了也没有什么了不起，他脱离群众，无非是闹几年，几十年，还要垮，又走向反面。”

刘说：“一切社会主义国家，无产阶级取得政权以后，都可能产生修正主义。”

康生插话：“这是一条规律。社会主义国家不注意要出修正主义，注意也要出修正主义，关键在于他能不能掌握领导。”

刘少奇说：“反修斗争材料，正反两面的东西都要印给党内看看，如彭德怀、习仲勋写的东西，小说《刘志丹》、吴自立的《平江革命斗争史》。”

毛说：“要把蒋介石选集印出来，看他是怎样骂我们的。”

毛说：“我看中国搞赫鲁晓夫那一套修正主义比较难一些。我们七亿人口，工业不发达，比较落后，但比苏联民主。”

刘说：“中国是七亿人口的大国，搞修正主义，统一很难。搞起来，各省会独立。”

毛泽东要表达的意思先从刘少奇嘴里说出来了，他接过刘少奇的话茬，道出了他的核心思想。他说：“要把这个意思向各省、地、县传下去。中国出了赫鲁晓夫修正主义怎么办？中国出了赫

鲁晓夫修正主义中央，各省委要顶住！”

刘少奇紧跟着附合了一句：“一个省可以造反，可以独立。”

刘少奇再次强调要追上面的根子，他说“朝中有人”，“危险在上面”，“四不表”不只下面有根子，上面也有根子。

毛泽东说：“工业、农业、商业都要划阶级，学校、机关、军队、文化团体也要划阶级。此外，街道、小市镇也要划阶级。”

他说：“坏人虽然是少数，但是他们占据了我们的要害部门，当了权，也不得了。”

毛泽东还说：“例如冶金部是否划？中央各部门是否也要划，阶级出身和本人表现，要加以区别，重在表现。”

彭真说：“要集中整官僚主义。”

周恩来说：“官僚主义是滋长修正主义的根源之一。”

会后，中央下达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贫下中农协会组织条例（草案）》，提出了对过去划错了阶级成分都应该认真审查并改正过来。关于城市划阶级问题，要在各大区进行试点。

大家都在讲出修正主义，但是我们发现在毛泽东与刘少奇和其他领导人之间，有一个明显的区别：刘少奇指证的“修正主义”、“和平演变”主要还是指蜕化变质分子，周恩来更加明确指官僚主义。他们很少谈到路线之争，尤其不谈1962年上半年。毛泽东讲修正主义当然也包含干部的蜕化变质、官僚主义种种阴暗面，但在他心目中，更主要的是路线之争，是“三和一少”、“三自一包”和“五社一短”之类。

刘少奇和毛泽东都讲修正主义不注意也可能出，注意也可能出。而且要出在中央。都讲中央出了修正主义，各省要顶住，要独立，要造反。那么，中央不就是由毛、刘、周、朱、陈、林、邓等组成的吗？参加“最后晚餐”的，究竟谁是出卖耶稣的人呢？“中央出修正主义怎么办？”这个问题一提出，可以想见，大家的神经都不可能不紧张起来。

会议期间，贺龙元帅向毛泽东汇报了北京军区杨林军事表演的情况。毛泽东听了很高兴：“有这样的事情为什么不告诉我也去看看？”

毛泽东要视察军事表演。贺龙、罗瑞卿紧张忙碌。

6月15日下午4时，毛泽东偕刘少奇、董必武、朱德、周恩来、邓小平、彭真、陈毅、贺龙、聂荣臻、李先念、李井泉、谭震林、乌兰夫、陆定一、康生、薄一波、李雪峰、刘澜涛、杨尚昆、肖劲光、许光达以及各中央局、各省市区和中央各部委负责人，阵营浩大，云集西郊射击场。两个主席兴趣盎然地观看了表演。

6月16日，毛泽东又把原班人马带上十三陵水库。他首先在大坝边的小楼里接见了参加中央工作会议的所有人员，作了关于培养接班人五个条件的讲话。再次发出号召：“要警惕像赫鲁晓夫那样的个人野心家和阴谋家，防止这样的坏人篡夺党和国家的各级领导权。”毛泽东还提出：“大区书记要抓军队，不能只要钱不要枪。”这再次表明，在北京与地方之间，他更信任地方大员，寄希望于地方组织。

在使大家紧张起来以后，毛泽东需要轻松一下。文武之道，一张一弛。

下午3时40分，毛泽东、刘少奇等在罗瑞卿、杨勇以及体育学院许多男女学生陪同下双双下水库游泳。刘少奇夫人王光美、罗瑞卿夫人郝治平也陪同游泳。她们是毛泽东亲自点名让她们来的。江青不会游泳，只得在岸边眼见这男男女女簇拥着毛泽东，陡生忌嫉之心。

毛泽东一到水中，又进入了海阔天空的自由世界，在同学们的簇拥下或侧泳，或仰泳，或仰卧水面一动不动，任水载浮。这一场景被制成纪录片，很快在全国上映，人们看到自己的伟大领袖虽年逾古稀，却能畅游水库，挑战自然，随心所欲，无不为

之激动。

毛泽东的每一个行动，似乎都有它的政治意义。

（肖冬连等著《求索中国——“文革”前十年史》）

突兀其来的事件：上海 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

1965年11月，叶群到杭州向毛主席告罗瑞卿的状，据说讲了5个小时。这时罗瑞卿正在云南视察工作。12月8日会议开始后，林彪、叶群等罗织罪名，诬陷罗瑞卿。12月10日，中央要罗瑞卿马上到上海开会，罗完全没有思想准备，接到通知就飞往上海。一下飞机，就被接到一个戒备森严的地方，实际上是被软禁起来了……

1965年12月7日，接到通知要我到上海参加中央的会议。当时我正在下面抓“四清”。7日，我从河北永年县赶回北京，8日由北京飞到上海，行前对会议内容一无所知。

12月9日开始开会。会议由林彪主持，毛主席没有参加，会议的主要内容是批判罗瑞卿。

批判罗瑞卿的起因，是11月林彪让叶群从苏州到杭州向毛主席告罗的状。林让叶到杭州，告诉她要躲开什么人，直接找到主席。叶群到了杭州也不容易见到毛主席。主席也不知道她有什么事，让她等。她就和主席的秘书徐业夫谈了谈。她在杭州打电话请求林彪，想给主席写个东西送上去。林彪批评她：你糊涂！真蠢！意思是必须向毛主席本人讲。叶群又去，写了一个条子，要求面谈。这样才见到毛主席。

据说讲了5个小时，主席听了5个小时。主席问得很仔细，

但一直不表态。最后，毛主席相信了叶群的话。

这时罗瑞卿正在云南视察工作。12月10日，中央要他马上回来，到上海开会，罗完全没有思想准备，接到通知就飞到上海。一下飞机，由上海市委书记陈丕显和空军司令员吴法宪迎接，将他送到一个地方，警卫森严，实际是软禁。罗瑞卿是搞保卫工作的，他一住下，马上就明白自己已失去自由，非常生气，又莫明其妙，也不知道为什么。他始终没有参加会议。李井泉不知道，还给罗瑞卿送橘子。

我参加的那个组是总理主持，有贺龙，还有叶群等知情人。

叶群在会上介绍她与主席谈话的过程。她揭发罗瑞卿和刘亚楼两个人躺在床上，密谈一直到天黑。（刘已于1965年5月病故，生前为空军司令员。）说罗瑞卿要刘亚楼转告叶群四条意见：

1. 林总早晚要退出政治舞台的。不退出也要退出，现在不退出，将来也要退出政治舞台；

2. 要好好保护林总的身体；

3. 今后林总再不要多管军队的事情了，由罗总长去管好了；

4. 一切由罗管，要放手叫他去管。

还说罗骂林是“占着茅坑不拉屎”，等等。

雷英夫和我在一个小组，表现十分活跃，大讲罗对毛、林不满，等等。

在会上，邓小平比较和缓，传达了毛主席在12月2日在海军的报告上对罗瑞卿问题作的批示，内容是：“那些不相信突出政治，对于突出政治表现阳奉阴违，而自己另外散布一套折衷主义（即机会主义）的人们，大家应当有所警惕。”总理也很谨慎，态度不很明朗。贺龙讲了几句。

林彪在会议上宣布撤销罗瑞卿的职务（书记处书记、副总理、公安部部长、国防部副部长、总参谋长、军委秘书长）。

我当时想，罗是听毛主席话的，和毛、林的关系从来都是可

以的，怎么一下子成了现在这样？！

会上规定不准记录，也没有讲怎么传达。会议开得十分秘密。13日会议结束。

16日我飞回北京。要向下传达，因为没有记录只能是口头传达。我当时兼北京军区政委，在军队本应由军队的廖汉生同志传达，但他说军队、地方一块传达，非要我传达。我是第一政委，没办法，只好传达了。我也没多说，写了一个很短的提纲，后来又在华北局传达，要点就是毛主席决定开会，大家都赞成。会后，军队就开始批判罗瑞卿了。

搞掉罗瑞卿，不等于说毛主席就十分信任林彪。主席考察干部是反复的、长期的。他批评彭德怀时就说过林彪：“别的事情都是马列主义，就是对他自己的病的看法是唯心主义。”林将自己的病看得过重，迷信中医。抗美援朝这么大的一件事，高级干部应该为之拼命的，然而主席提出让林彪指挥时，他竟推了，还认为不应出兵，自己跑到苏联养病去了。这件事和斯大林有什么关系还不知道，但很可能是走的高岗这条线。高岗和斯大林有直接的来往，而高岗进行反刘少奇活动首先找的就是林彪。联系到早在长征途中的会理会议上林就反过主席，主席碰到困难的时候，林会怎么样，主席一定会反复考察的。

1964年9月28日至10月12日，罗马尼亚领导人毛雷尔、齐奥塞斯库在中国访问期间，曾劝中国同苏联和好。主席顶了，意思是不行，要和好，苏联总要有个表示，先讲话（自我批评），90%的责任应该是他们的；林彪就在一旁说99%。“文革”初期，主席讲不宜搞急刹车；林就赶快讲：如果急刹车可能摔下来。林总是这样，总是表示和主席的意见完全相同，而且讲的比主席讲的还厉害。主席一讲完话，他马上讲两句话，第一句是毛主席发表了非常重要的指示，第二句是我完全拥护。他的这些作法也可以使主席从另一个方面考虑：你一直捧我做啥？实际上，

林越是捧主席，主席就越警觉。本来，把罗瑞卿搞下去，林彪就突出了，但主席对林也不完全放心，自己牢牢掌握着军队，不然为什么定了一条：文革期间不准调动军队，调一个排也要军委主席签字，就是必须由毛主席签字。可见毛还是不完全放心，不让林有权调动军队。

1966年上半年实际是“文化大革命”的准备、酝酿时期。

上海会议后，1966年1月21日，江青由上海赶到杭州和林彪商量“文艺革命”问题。林向总政下达指示。2月2日至20日，江青根据林的委托在上海召开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江说：在文艺方面，有一条与毛泽东思想相对立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这条黑线专了我们17年的政”，“该是我们专他们的政的时候了”。3月22日林彪将座谈会纪要报中央军委。纪要经毛泽东修改三次，再由林报中央，4月10日以中共中央文件下发。

3月8日凌晨，邢台发生地震。我们正在天津召开华北局书记处生活会。8日晚周总理召开紧急会议，研究进行救护、救灾工作。我当时表示要去邢台。总理说：你先不动，我先去。

总理赴邢台视察后，12日到16日在天津参加华北局的会议。16日总理作报告，会议结束，我们回到北京。

会议还未结束时，我就接到通知，让我到杭州开会。

17日我从北京乘飞机到上海，而后乘火车到杭州，我们住在新落成的西泠宾馆。忙中偷闲，住下后游了苏堤。

当天下午5时我们就到主席那里开会，主席住在刘庄。参加会议的有中央政治局成员加上六大区书记，总理、彭真都在。小平同志没有来，他为了躲开处理罗的事，到三线视察去了。林彪似到场。

这次会议我有记录，会开得很自由，没有正式报告。主要是毛主席讲。他先是扯些闲话，很随便的，然后讲到文化革命，点了乔木的名字（他未到会），批评了吴冷西。毛主席讲吴冷西、

乔木，“我看你们只是半个马列主义者，半个三民主义者，你们自己做结论，算不算马列主义？”大家也听出来不只是这几个人的事，而是批评文化工作方面的问题。主席也没有讲得那么透。

大家听着，哑口无声，谁也不能表态，陶铸是勇敢的，敢讲话，这次也很谨慎。参加会议的人相互之间也不敢多说话，又都想试探一下，了解情况，但是谁也不主动，也不敢主动。

当时彭真的地位还可以，还是中央秘书长的角色，还管着罗的事。记得会议中间，他去接电话，回来说罗（3月18日）跳楼把腿摔坏了。这时毛主席有些惊讶的样子，问：“为什么跳楼？”然后讲了一句：“真没出息！”听起来那意思是官司刚开始打，就跳楼，官司还在后头呢。我想主席还在观察，从以后事态的发展也可以看出，主席为什么讲这句话，因为中央还未做结论嘛。主席还在考虑还可能牵扯到什么人。

3月会议主要点了杨尚昆、陆定一的事，还听了江青介绍召开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的情况。会议对罗的揭露就多了。一边倒，群情激愤，光听会上揭发的事，那么罗的问题就大了。

20日上午会议结束。

21日，陶铸领头，大区书记们参观了花坞、玉泉。我们离开杭州到上海。23日从上海飞回北京，当天召开书记处会议。

（李雪峰：《鲜为人知的“文革”发动内情》）

发动“文化大革命”： 1966年5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

1966年5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气氛紧张。会议通过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指出：“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在睡在我们的身旁。”会议以“反党集团”的罪名对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进行了批判。林彪更是火上烧油：“有人可能搞鬼，他们现在已经在搞鬼。”“毛主席还健在，他们就背叛，他们阳奉阴违，他们是野心家，他们搞鬼，他们现在就想杀人，用种种手法杀人。”这次会议标志着“文化大革命”开始全面发动。

1966年5月4日，星期三，北京。

今天北京从一大早起就云遮雾障，阴沉沉地像要下雨。天气不大好，天安门广场的游人比平日少了许多。

上午将近10点，一辆辆轿车陆续驶进人民大会堂西门院落。从车上下下来的人腋下夹着公文包，步履匆匆地进了河北厅。

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即将在这里举行。

出席这次会议的，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和有关负责人，共70多人。人们看到会场上有几张引人注目的新面孔：江青、张春桥、王力、关锋、戚本禹……这是刚刚组建不久的“文化革命文件起草小组”的几位大员，因而被“扩大”进来了。

自从“文化大革命”成了史无前例、震动世界的大运动以

来，这次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知名度大增，成为中外历史学者和中共党史专家关注的一个热点，从中分析研究出了这样那样的观点。但在当时，与会者一直到散会，仍对会议通过的文件、决定一知半解，不甚了了，真可谓“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了。

刘少奇是这次会议的主持者，同样对议程完全缺乏思想准备。

他和陈毅是4月19日从缅甸仰光飞回昆明的。他们本来打算顺便对云南这个边陲省份作些考察，中共云南省委第一书记阎红彦也已经作了安排，这时却接到中共中央办公厅电话通知，要他们马上到杭州去出席毛泽东召集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

于是，刘少奇、陈毅的专机直飞上海，接着换乘专列急赴杭州。这部杭州派来的专列本是毛泽东乘坐的，因为事情来得急，刘少奇的专列一时调不过来，就只好先临时用一下了。

刘少奇到了杭州刚住下，周恩来便急匆匆赶来，向他介绍情况。刘少奇这才逐渐知道，就在他出访的这段时间里，国内发生了一连串料想不到的事情：

3月底，毛泽东在上海几次同康生、江青等谈话，严厉批评《二月提纲》混淆阶级界限，是错误的；指责中共北京市委、中央宣传部包庇坏人，不支持左派，说“再不支持，就解散五人小组、中央宣传部、北京市委”。他还号召地方造反，向中央进攻。

4月上旬，林彪、江青合伙搞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经过毛泽东审阅修改，作为中共中央文件发到全党。其中说：“要坚决进行一场文化战线上的社会主义大革命，彻底搞掉这条黑线。”

4月9日至12日，陈伯达、康生在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上系统批判彭真的所谓“一系列罪行”。会议决定成立由陈伯达、康生、江青、张春桥等组成的“文化革命文件起草小组”，起草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批判《二月提纲》。

4月16日，毛泽东在杭州召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用林彪的说法，是“集中解决彭真的问题，揭了盖子”。

在此期间，“文化革命文件起草小组”在毛泽东主持下，写成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即后来的《五一六通知》）。《通知》中除点名批判彭真外，宣布撤销《二月提纲》和文化革命五人小组，重新设立直属中央政治局常委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文化革命文件起草小组”也就摇身一变成了“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由陈伯达任组长，康生任顾问，江青、张春桥等任副组长，成员中包括王力、关锋、戚本禹、姚文元。

这样，等到刘少奇出访回国，摆在他面前的既成事实是：彭真、陆定一已被打倒，《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已经定稿，中央文革小组已经成立。与此相联系的还有：中共中央宣传部、中共北京市委由于挨批而瘫痪，邓拓（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田家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吴晗等一批人挨整，陈伯达、康生、江青等人迅速得势。罗瑞卿（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解放军总参谋长）、杨尚昆（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早在1965年就被安上莫须有的罪名遭贬黜，这时又被说成是彭真、陆定一的同伙。

为了正式通过《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落实对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的组织处理，决定5月份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正式开会的时间定在5月4日。这次会议要通过的几件事都是毛泽东在会前亲自抓的，刘少奇几乎没有参与。但毛泽东表示暂不回北京，依惯例，会议就由刘少奇主持，由康生负责向毛泽东汇报请示。

人民大会堂河北厅布置成了会议室。5月4日时钟敲响10点的时候，与会人员都已到齐。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刘少奇、周恩来、朱德、林彪、邓小平也已经在主席台坐定。

刘少奇宣布开会。他介绍了会议的起因、议程以及出席人员的范围、开法。接着，总书记邓小平对会议文件、人员编组、各组召集人和最近几天的日程安排作了说明。

会议的第一个议程是讨论通过《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但大多数来开会的人都不明白为什么突然要发出这样一个《通知》，于是决定，先开几天座谈会，传达毛泽东最近的一系列指示，介绍相关情况。

从5月5日至7日，介绍情况的座谈会一共开了5次，分别由康生、陈伯达、张春桥介绍。其中数康生的介绍最为耸人听闻。他从5日下午开讲，一个半天不够，6日上午又讲了半天，加起来差不多8个钟头。

康生的传达是混杂不清的。他把毛泽东的指示和他自己的体会、自己的话搅在一起，使人真伪莫辨。他嘶哑着嗓音说：“我个人体会，毛主席这三次谈话，概括起来是两条：一条是批评彭真、中宣部包庇右派，压制左派，不准革命；第二条是给任务，要支持左派，建立新的文化学术队伍，进行文化大革命。贯穿一个中心问题是中央到底出不出修正主义？出了怎么办？现在已经出了，罗瑞卿是一个，彭真是一个，杨献珍是一个，杨尚昆是一个，田家英、邓拓、廖沫沙也是……”

这几次座谈会，刘少奇都没有参加。

接下来，会议转入分组讨论《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与会者已经听过介绍，都知道这是大笔杆子陈伯达执笔起草，又经过毛泽东在4月14日至30日的17天中先后8次审阅修改才定稿的，所以哪里还能提什么不同意见？只是在心里揣摩它的含意。各个小组报来的结果，已是众口一词，一片拥护声。

5月16日上午10点半，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举行全体会议，通过《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

先由陈伯达综合介绍各小组讨论情况。本来有几个同志，如

郭沫若等，提出文件中有几处标点和用语不妥，建议在某处增加一个“的”字，在某处去掉一个引号等等。但就是对这样的建议，也被陈伯达、康生一一否定。也就是说，整个《通知》稿一字不能改，连一个标点也不让动。

刘少奇似乎觉得这样不大好，出来解释了几句。他说：“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叫大家讨论，结果提了意见不改，连几个字都不能改，这不是独断专行吗？这不是不符合民主集中制吗？我原来考虑过改一点，现在大家意见还是不改的好，不如原来的好，那就不改吧！”

因为这个文件点名批判了彭真，刘少奇又特意征求他的意见，问道：“彭真同志，你有什么意见？”

彭真平静地回答说：“一个检查，一个改。”

刘少奇觉得他误解了自己的问话，又补了一句：“对通知有什么意见？”

“没有意见。”

“是赞成，还是反对？”

彭真低头看材料，没有说话。

刘少奇不再追问，环顾了一下会场，说：“现在通过这个《通知》。同意的请举手！”

大家举起了右手。从此以后，《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被简称为《五一六通知》。每个与会人员都对文件中毛泽东亲自加写的几段话留下了特别深的印象：

高举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大旗，彻底揭露那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所谓“学术权威”的资产阶级反动立场，彻底批判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夺取在这些文化领域中的领导权。而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同时批判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的各界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清洗这

些人，有些则要调动他们的职务。尤其不能信用这些人去做领导文化革命的工作，而过去和现在确有很多人是在做这种工作，这是异常危险的。

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们识破了，有些则还没有被识破，有些正在受到我们信用，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正睡在我们的身旁，各级党委必须充分注意这一点。

两天后，林彪在大会上发表讲话。人们在听了他的讲话之后，就更加震惊了。

林彪从5月18日上午10点讲到午后1点。他大谈中央内部有人要搞政变、搞颠覆，制造恐怖气氛：

最近有很多鬼事，鬼现象，要引起注意。可能发生反革命政变，要杀人，要篡夺政权，要搞资本主义复辟，要把社会主义这一套搞掉。有很多现象，很多材料，我在这里不去详细说了。你们经过反罗瑞卿，反彭真，反陆定一和他老婆，反杨尚昆，可以嗅到一点味道，火药的味道。

有人可能搞鬼，他们现在已经在搞鬼。野心家，大有人在。他们是资产阶级的代表，想推翻我们无产阶级政权，不能让他们得逞。有一批王八蛋，他们想冒险，他们待机而动。他们想杀我们，我们就要镇压他们！他们是假革命，他们是假马克思主义，他们是假毛泽东思想，他们是背叛分子。毛主席还健在，他们就背叛，他们阳奉阴违，他们是野心家，他们搞鬼，他们现在就想杀人，用种种手法杀人。

还没等听讲的人明白过来，林彪话锋一转，开始大肆颂扬毛泽东：

现在毛主席健在，我们是大树底下好乘凉。毛主席已经 70 多岁了，身体很健康，可以活到 100 多岁。

毛主席活到哪一天，90 岁，100 多岁，都是我们党的最高领袖，他的话都是我们行动的准则。谁反对他，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

从这天开始，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天天大会发言。会场后来改在人民大会堂东大厅。一些人的发言越来越不可思议：批彭真，批陆定一，批罗瑞卿，后来竟批起了朱德。内容却多是捕风捉影，无限上纲，或者纠缠细微末节。在这些批判发言中，林彪、康生、陈伯达等人可谓出足了风头。

5 月 23 日上午，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会议作出《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停止和撤销了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的职务。

如果说会场内还只是气氛紧张的话，那么会场外就真是充满火药味了。

5 月 8 日，《解放军报》发表江青组织写的署名高炬的文章《向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开火》，《光明日报》发表关锋写的署名何明的文章《擦亮眼睛，辨别真假》。两篇文章以至高无上的口吻，宣布邓拓、吴晗、廖沫沙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前线》、《北京日报》、《北京晚报》是反党工具；声称：“我们一定不放过你们，一定不会放过一切牛鬼蛇神，一定要向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开火。”

5 月 10 日，上海《文汇报》、《解放日报》同时发表姚文元的又一篇文章《评“三家村”》。5 月 11 日，《红旗》发表戚本禹写的《评〈前线〉、〈北京日报〉的资产阶级立场》。这几篇“权威性文章”一出，揭批邓拓、吴晗、廖沫沙的文章如排炮一般，

充斥各报。

在令人窒息的政治压力下，邓拓、田家英分别于5月18日、23日含冤自尽，悲愤地离开了人间。

从5月17日起，康生派他的老婆曹轶欧带人到北京大学秘密串连，策动哲学系总支书记聂元梓写大字报。5月25日聂元梓等7人突然贴出大字报《宋硕、陆平、彭云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干些什么？》，矛头直指北京大学党委和中共北京市委。

社会上的这一幕幕，显然是有人有意要将《五一六通知》内容透露出去，有些则明显是康生、江青等直接组织的。

在会场外这种咄咄逼人的气势下，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逐渐进入尾声。

周恩来、朱德、邓小平也先后发了言。他们都谈了对文化革命的认识，对工作中的缺点错误作了自我批评，特别对在文化革命问题上跟不上毛泽东思想作了检讨。他们的讲话同林彪趾高气扬的讲话形成鲜明对照。

5月26日上午10点多钟，还是在人民大会堂东大厅，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举行最后一次全体会议。这天是由刘少奇讲话，周恩来主持会议。

刘少奇的讲话谦逊而平和。他首先对会议专门安排他在这样一个重要时间讲话表示感谢，接着他讲了学习毛泽东思想、开展文化革命的意义和他自己的认识。

没有什么豪言壮语，也没有什么警句。整个讲话的精神是表示要跟形势，保持晚节，革命到底。

谈到对文化革命的认识，他说：“在我们这次讨论发言中，对文化革命问题讲得比较少。对这个问题，我们过去也是糊涂的，很不理解，很不认真，很不得力，包括我在内。我最近这个时期对于文化革命的材料看得很少。生了一次病，出了一次国，很多材料没有看，接不上头。”

刘少奇用了相当大的篇幅，检讨自己在各个历史时期所犯的缺点错误。他从1927年大革命时期在武汉同意解散工人纠察队讲起，讲到1949年在天津讲话中主张资本主义工商业可以发展，1956年反冒进，1962年对经济困难估计严重，一直到1965年制订《23条》时不主张提出“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他把参加革命几十年间的缺点错误从头到尾数落了一遍。

刘少奇检讨的这些“错误”，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历史检验，其中的大多数现在看来不但不错，而且是极为可贵的真知灼见。其所以认为错误，只是由于把党内长期形成的“左”的一套当作正确，有的则是因为同毛泽东的意见相悖。

中午1点30分，刘少奇讲话结束。周恩来随即宣布散会。

历时20多天的会议终于开完了，可人们的脑子里仍充满困惑。参加会议的人员纷纷离开会场。一辆辆轿车从人民大会堂门口开出，汽车喷出的缕缕尾气，好像是留下了一串串问号。

（黄峥著《刘少奇一生》）

“炮打司令部”：八届十一中全会

1966年8月1日，毛泽东主持召开八届十一中全会。他说：“我是没有下去蹲点的，你们都有人蹲点，越蹲越压迫学生。”“牛鬼蛇神，在座的就有。”7日，全会印发毛泽东写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指责党内有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把斗争锋芒直接引向刘少奇等中央主持工作的领导人。全会通过“16条”等决定，在党内完成了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法定程序。

“文化大革命”给党和国家造成了严重灾难。总结十年教训，弄清“文化大革命”发生的原因，这是一个需要从多方面进行考察的重大课题。研究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无疑是一个不可忽视的方面。本文仅就有限的历史材料，试图从这一方面进行初步的探讨。

“文化大革命”自1966年5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开始，8月召开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了《中国共产党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决定》，贯彻到全党全国。毛泽东同志在和斯诺的谈话中说：“1966年5月16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就决定搞文化大革命，1966年8月召开了中央十一中全会，16条搞出来了。”这反映了“文化大革命”开始的过程。

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召开时，“文化大革命”方兴未艾，我党处在历史转折的严重关头，党内外笼罩着极度紧张的气氛。5

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对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等同志进行了粗暴的、毫无根据的批判，并发出了“五一六”通知。林彪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提出所谓政变问题，说什么“这里最大的问题，是防止反革命政变，防止颠覆，防止‘苦迭打’”。5月下旬，中央作出改组北京市委的非常决定。6月1日广播了聂元梓等人诬陷北大党委的大字报，全国掀起了攻击各级党委的浪潮。在左倾狂热的冲击下，全国上下，很多党的领导机构瘫痪，乱打乱斗的现象日益严重。在动荡纷乱的情况下，为了使运动重新纳入党的领导的轨道，自6月上旬，中央各部门和各省市自治区先后派出工作组到大专学校和中学领导运动。

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发动从根本上说是错误的，而且来势很急、很猛，党中央来不及作出全盘部署，为形势所逼，仓促派出工作组，这就不可避免地要发生种种问题。加之江青、康生、陈伯达一伙怀着篡党夺权的目的，从中加以挑拨和煽动，致使多数工作组和“造反派”从一开始就形成对立。随着运动的发展，对立也日益严重。在八届十一中全会前，如何评价工作组所进行的工作，已成为党内争论的中心。

在各项运动中，由上级机关派出工作组到基层发动群众，开展工作，这是我们党的传统工作方法之一。事实上，在“文化大革命”刚开始时，毛泽东同志也曾经同意派工作组。如5月底、6月初向人民日报社、北京大学派出工作组，都是经过毛泽东同志批示同意的。甚至到6月中旬，毛泽东同志在杭州中央召开的会议上已经说了“不要急急忙忙地派工作队，不要怕乱”的话以后，6月30日，刘少奇、邓小平同志就“文化大革命”的部署向毛泽东同志请示的信中，附上一份《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工业交通企业和基本建设单位如何开展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通知》草稿，他们在信上说：“这是一个重要决定，请主席考虑决定。”拟订的通知中规定：“正在进行四清的单位，要在工作队的领导下，

把文化大革命插进去进行。还没有四清的单位……要和四清运动一起由上级派出工作队领导进行。已经结束四清运动的单位……没有达到六项标准，特别是领导核心问题没有解决的，要重新派工作队去，从文化大革命入手，把四清和文化大革命搞彻底。”毛泽东同志7月2日在这封信上批示：“同意你们的意见，应当迅速将此通知发下去。”可见，直到7月初，毛泽东同志仍然同意派工作组的办法。

毛泽东同志7月18日回到北京后，江青、康生、陈伯达一伙阴谋利用工作组问题，打击陷害刘少奇、邓小平等中央领导同志。他们谎报情况，加给工作组种种罪名。毛泽东同志改变了对派工作组的看法，他在7月25日接见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成员时说：“主要是改变派工作组的政策。不要工作组，要由革命师生自己搞革命。”在谈到“工作组阻碍群众运动”时，江青插话说：“工作组还有反革命的！”毛泽东同志竟然听信了这种诬陷之词。7月28日，根据毛泽东同志的指示，北京市委发出《关于撤销各大专学校工作组的决定》。接着，工作组被指责为“犯了方向、路线错误”，派出工作组被指责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在8月4日的中央常委会议上，毛泽东同志说：“讲客气一点是方向性的错误，实际上是站在资产阶级立场，反对无产阶级革命。”这就把事情放到敌我矛盾一边了。

对派工作组的这些指责不能认为是公正的。如前所述，在各项运动中派出工作组是党的传统工作方法之一，即使不该派工作组而错派了，也是工作方法错误的问题，谈不上路线错误，更谈不上什么反革命。至于大多数工作组在各单位和“造反派”对立，这是错误地发动“文化大革命”必不可免会发生的现象，不能归咎于工作组的成员。

对工作组的不同评价，实质上是反映了怎样进行文化革命的争论。在八届十一中全会前，这一争论主要表现为对“乱”的不

同看法。党中央绝大多数同志对当时群众运动中已经出现的动乱怀着忧虑，希望能保持党对运动的领导，要求对运动有一定的约束，派工作组即是由此考虑的一种尝试。毛泽东同志主张“不要怕乱”。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则是别有用心地主张“大乱”。林彪在8月8日接见中央文革小组的讲话中声称要“弄得天翻地覆，轰轰烈烈，大风大浪，大搅大闹，这半年就要闹得资产阶级睡不着觉，无产阶级也睡不着觉”。主张不要怕乱的理由，以后解释为乱是乱了敌人，锻炼了群众。这个逻辑是很难解释通的。在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里，政权为人民所掌握，发生动乱只能是乱了人民对国家的治理，造成各方面工作的破坏和损失，这是“文化大革命”的实践已经充分证明了的。事实上，“文化大革命”本身就是制造了一场遍及全国的大内乱。

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面临的问题，是在“文化大革命”已发动起来的条件下，工作组已经从各单位撤出后，党如何领导运动健康发展。不幸的是这次全会起了相反的作用。八届十一中全会从7月27日开始小组预备会议，8月1日正式开幕。到会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141人，各中央局和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的负责人，中央文革小组的成员，中央有关部门的负责人，首都高等学校“革命师生”的代表共47人列席了会议。这次全会原订会期为五天，议程共四项：一、通过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二、讨论和批准十中全会以来中央在国内、国际问题上的重大措施；三、通过会议公报；四、补行五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关于人事变动决定的手续（即5月23日政治局扩大会议关于停止彭真、陆定一、罗瑞卿的中央书记处书记的职务，停止杨尚昆的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的职务的决定）。

从全会的整个进程看，这次会议是仓促召开的，是在极度紧张的气氛中进行的，因而参加会议的大多数同志既缺乏必要的思想准备，又对会议的各项议程没有正常讨论的余地。这次全会距

八届十中全会已近四年，按照惯例，在这次全会上中央政治局常委要向全体中央委员报告这期间的工作，这是已列入议程的。值得注意的是刘少奇同志8月1日作报告，但没有说明是代表中央，报告前也没有形成文字稿。刘少奇同志在报告开始时说：“我讲话没有准备，讲一点。”报告很简略，只是列举了这期间中央在国内、国际方面的一些主要工作，没有什么论述。这表明全会的准备工作是很仓促的。全会的第二天和第三天，主要是中央一些部委和各大区负责同志大会发言。他们都没有就如何开展“文化大革命”提出系统的意见、建议或看法，而是一一作检讨。检查自己“学习主席著作不好”，“跟不上形势”，“跟主席，跟不上，跑步前进，力争跟上”，“仍然是很不理解、很不认真、很不得力”等等。这种情况反映出会议的紧张空气和大家都对“文化大革命”没有底。

全会印发了林彪大谈政变问题的“五一八讲话”和8月1日毛泽东同志写的《给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红卫兵的信》。信上说：“不论在北京，在全国，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凡是同你们采取同样革命态度的人们，我们一律给予热烈的支持。”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红卫兵采取的“革命态度”是怎样的呢？他们在寄给毛泽东同志的两篇文章中写道：“造反就是革命，造反就是毛泽东思想。”“不造反就是100%的修正主义！”“我们既然要造反，就由不得你们了！我们就是要把火药味搞得浓浓的。爆破筒、手榴弹一起投将过去，来一场大搏斗，大厮杀。什么人情啊，什么全面啊，都滚一边去！”“我们就是要抡大棒，显神通，把旧世界打个天翻地覆，打个人仰马翻，打个落花流水，打得乱乱的，越乱越好。”这些材料作为全会文件印发，更增加了会议的紧张气氛。

全会期间，在8月4日的中央常委会议上，毛泽东同志说：“我是没有下去蹲点的，你们都有人蹲点，越蹲越压迫学生。”这种严厉的指责，显然是针对刘少奇同志的。人们还记得，在四清

运动中，刘少奇同志曾经说过开调查会的办法不适用了，要下去蹲点，不蹲点的当不了中央委员这样一些话。当叶剑英同志在会上谈到“怕乱”的原因时说，是对军队力量估计不足，我们有几百万军队，不怕什么牛鬼蛇神。毛泽东同志插话说：“牛鬼蛇神，在座的就有！”没有任何证据，一位党的主席竟然把一位党的副主席、国家主席归于“横归”之列，这是极端不正常的。接着，毛泽东同志宣布：“今天大会不开了，开小组会好了。把这里讲的传达给大家，你们分别去参加。”中央常委不能平等讨论问题，个人变更中央全会日程，这也是极端不正常的。

8月5日晚，毛泽东同志写了著名的《炮打司令部》大字报，肯定了党内有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这个司令部的成员包括“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导同志”。大字报还使用了“长资产阶级的威风，灭无产阶级的志气，又何其毒也”这样激烈的言词。这张把斗争锋芒明确地引向中央和地方党的领导人的大字报，使参加会议的大多数同志深感震惊。第二天，已经向全会请假，在大连“养病”的林彪，匆匆飞抵北京。此后，全会的小组讨论，就转为对刘少奇、邓小平同志的“揭发批判”了。

原定8月5日通过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決定》（即16条），延至8日经全会通过。《人民日报》13日社论说：“16条，是毛泽东同志提出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纲领。”这个纲领的要点可以举出如下几个方面。

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对象，16条规定：“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是毛泽东同志在“23条”中首次提出的非科学概念，在当时就引起党内的争论。16条沿用这个概念，但是仍然没有，也不可能对“走资派”订出明确的判别标准，因此具有很大的任意性。这样，就不可避免地吧斗争的目标指向各级党的领导人，造成打击一大片的后果，制造不可数计的冤假错案。在敌我关系上的混淆和颠倒，是

16条的一个根本性错误。

关于“文化大革命”的依靠力量，16条规定：“党的领导要善于发现左派，发展和壮大左派队伍，坚决依靠左派。”文件同样对“左派”没有订出明确的判别标准和要求，依靠的力量就不可能落实。而且在当时，群众中由于对“文化大革命”有不同的认识和持不同的态度，已经开始产生分裂，互相指责对方是“保皇派”，争辩己方是“造反派”。文件把群众分为左中右，加剧了群众的分裂，这是派性斗争愈演愈烈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会议闭幕式上，毛泽东同志要把这种观点发展到党内，他说：“我看是党外有党，党内有派，从来都是如此，这是正常现象。”这就把派性的合法化，引申到党内。

关于“文化大革命”的方法，16条一再强调“敢字当头”，“群众自己解放自己”，要充分利用“四大”，公开号召“不要怕出乱子”，“不能那样雅致，那样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这些助长自发性的要求，在群众中已经出现乱打乱斗的条件下，起了火上加油的作用，必不可免地使运动很快失去控制。

关于“文化大革命”的领导，16条虽然有“在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党中央对各级党委的要求，就是要坚持正确领导”的字句，但仅只是号召性的语言，没有具体的条文规定。文件还提出了“撤换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把那里的领导权夺回到无产阶级革命派手中”的要求。事实上，在7月28日北京市委《关于撤销各大专学校工作组的决定》中，已经规定“在工作组撤销之后，大专学校之文化大革命，由全校师生员工分别选举，成立各级文化革命的组织，负责领导。”这就把党的领导排除在运动之外。

作为“文化大革命纲领”的16条，对于运动的对象、动力、方法、领导等根本性问题，都作了错误的分析和规定，从而造成了全局性的错误。

8月12日进行了中央领导机构的选举。这项内容并不是全会原订的议程。通过政治局常委的选举，林彪虽然得票不是次多的，但却名列第二位，成了“接班人”。全会没有选举主席和副主席，而实际上保留了主席，取消了四位副主席，而在不久以后，林彪又突然成了唯一的副主席。这些情况都是不正常的。八届十一中全会闭幕后，大多数政治局委员和书记处书记相继遭到诬陷和迫害，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的权力，实际上被“中央文革小组”所掌握。

八届十一中全会的整个进程表明，发动“文化大革命”时，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已经遭到彻底破坏。民主集中制的根本要求是在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在集中指导下的民主。“文化大革命”的发动，是完全违背这一原则的。进行本来意义的文化革命，即发展教育和科学文化事业，扫除文盲等，这是全党所赞同的。解放以来，我们已经卓有成效地进行了大量工作，取得显著的成绩。克服当时确实存在的教育、文化等工作中的缺点，也是必要的。但是，毛泽东同志所发动的“文化大革命”，却是要从教育、文化工作开刀，打倒实际上并不存在的“资产阶级司令部”，“斗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把斗争的锋芒直指中央政治局和党的各级领导机关，这是全党绝大多数同志不可能理解，也不可能接受的。甚至作为党的副主席、国家主席的刘少奇同志，同样是感到茫然。他在7月29日“北京市大专学校和中等学校师生文化革命积极分子大会”上说：“至于怎样进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你们不大清楚，不大知道，你们问我们，我老实回答你们，我也不晓得。”广大干部和党员被指责为“很不理解，很不认真，很不得力”，这种情况，实际上是对“文化大革命”的消极抵制。

然而，“文化大革命”毕竟是发动起来了。特别是经过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作出了决议，改组了中央领导机构，完成了组

织手续，“文化大革命”就强加给全党了。发生这种非常的情况，除了林彪、江青一类蓄意捣乱、破坏外，主要是由于长期以来党内民主生活不正常，个人崇拜日渐盛行，毛泽东同志独断专行逐步成为惯例，以致到“文化大革命”发动时，谁要是不同意毛泽东同志的意见，当即就会被指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同时，也由于全党对社会主义的发展研究不够，理论准备不足，未能察觉毛泽东同志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失误，形成“不理解的也要执行”。因此，党的中央委员会没有，也不可能阻止毛泽东同志发动“文化大革命”。这是党的历史上最沉痛的一次教训。

“文化大革命”的发生不是偶然的。但是，“文化大革命”的发生也不是不可避免的。为了使“文化大革命”的悲剧不致重演，进一步深入地总结“文化大革命”的经验教训，仍然是十分必要的。

（席宣：《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述评》）

二月抗争：怀仁堂碰头会

1967年2月13日下午3时的碰头会上，军委主席叶剑英同志首先站起来讲话。为党和国家命运感到焦虑的老师，气愤地向坐在对面的陈伯达一伙，义正辞严地说：“你们把党搞乱了，把政府搞乱了，把工厂、农村搞乱了！你们还嫌不够，还一定要把军队搞乱！这样搞，你们想干什么？”

“不能把军队搞乱”

1967年1月初，经毛泽东批准，中共中央军委决定在北京召开军委碰头会，会议集中讨论处理军队开展“文化大革命”的有关问题。在会上，林彪主张军队要搞大民主。他说：“机关要彻底搞。”“对老干部有的要烧，不但烧，有的还要烧焦……有的关起来，有的戴高帽子，有的抄家，有的贴大字报，有的一般的开会批评。”刚被任命为军委文革小组顾问的江青和陈伯达、康生等也在会上推波助澜，认为人民解放军“滑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并说，军队不是世外桃源，不能搞特殊，要军队立即开展“四大”。林彪、江青等人的意见，遭到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和大多数与会者的坚决反对，他们认为军队战备任务很急，必须保持稳定，不应开展“四大”，并对随意揪斗军队领导干部、随意抓人、抄家、戴高帽子等做法表示强烈愤慨。

1月19日，围绕批判和揪斗萧华问题，发生了“大闹京西宾馆”事件。

1月20日上午，军委碰头会继续在京西宾馆举行。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公开表示了对中央文革小组19日批判萧华的不满。会上，当谈到许多军队领导干部被抄家和揪斗的情况时，萧华也讲了昨天晚上被抄家的经过。徐向前听了这些情况后，气愤地拍着桌子说：我们搞了一辈子军队，人民的军队，难道就叫他们几个毁了吗？叶剑英也愤怒地拍着桌子说：萧华是我保护起来的，如果有罪，我来承担。还说：谁想搞乱军队，决不会有好下场。叶剑英由于过于气愤，拍桌子时拍伤了右手掌骨。这件事，后来成了被诬为“二月逆流”的一条主要“罪行”。

中央文革小组在军委碰头会上批判萧华，不过是他们搞乱军队、煽动揪斗军队领导干部许多事情中的一件。当时，军队已陷于混乱，许多部队的领导干部被揪斗，各地频繁发生冲击军事机关的事情，军队指挥系统已经很难正常运转。1月2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发布《关于人民解放军坚决支持革命左派群众的决定》后，军委碰头会议就军以上机关开展“文化大革命”的方法，以参加会议的全体人员的名义向毛泽东提出建议：一、大军区、省军区的文化大革命要分期分批进行，要同地方文化大革命错开，何时开始，要经中央军委批准；二、坚持文斗，不武斗，不许抓人，不许动手打人，不许戴高帽子，不许游街，不许抄家；三、军队不许夺权；四、在外地串连的军队人员一律返回本单位；五、运动一定要坚持党委领导的原则；六、不许冲击和占领军队领导机关。1月24日下午，徐向前亲自去林彪家里，反映当时军队的混乱状况，提出自己的意见。林彪最后同意军委发一个文件，即军委八条命令。林彪这样做的目的，一方面想利用“文化大革命”中的混乱，打倒反对自己的力量；另一方面，又不想乱到否定自己“权威”的地步。

文件起草后送给毛泽东，毛泽东认为军委八条很好，批示照发。随后，中央军委又连续发布一系列的指示和规定，这些指示和规定对稳定军队起了积极的作用。

中央军委的八条命令，反映了军委碰头会议大多数人员稳定军队的意愿，这个命令的颁布是军委领导集体同林彪、中央文革小组在军队开展“文化大革命”问题上，进行斗争后取得的一个重要成果。在军委碰头会上，军委领导集体同中央文革小组的斗争，无疑是坚持党的原则的二月抗争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毛泽东批评中央文革小组

上海“一月夺权”以后，全国全面夺权，大批老干部被打倒，国家政治和经济生活，已处于瘫痪状态。此时，毛泽东密切关注着全国夺权形势的发展。他发现在全国全面夺权中，普遍存在着夺权的组织中领导干部很少，有“打倒一切”的问题。在无政府主义思潮的影响下，甚至有的地方提出“彻底改善无产阶级专政”的口号。毛泽东意识到，没有有经验的领导干部站出来支持夺权和掌权，“文化大革命”无法继续进行，甚至无产阶级政权有失去的可能。为此，毛泽东发表了反对“打倒一切”的谈话，提出“文化大革命”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的革命；党的领导还是要的，批驳了彻底改善无产阶级专政的口号。并对中央文革小组的独断专行提出了严厉的批评。

2月5日，张春桥一手筹划的“上海人民公社”正式宣告成立。陈伯达还试着为“上海人民公社”起草了章程。毛泽东知道此事后，严厉地批评中央文革小组说，上海成立公社，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国公社，这就发生了国际重新承认中国的问题。像这样大的问题，不请示就擅自作主，发号施令，这样下去岂不要搞独立王国。

2月5日，毛泽东召开了中央常委扩大会议。除中央常委林彪、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李富春出席外，叶剑英、江青、王力参加。在会上，周恩来反映由于一些人被打倒，书记处负责的日常工作没人抓。毛泽东说：现在是文革小组代替了书记处。在这以前，中央1967年1月11日致上海市各造反团体的贺电中已经加上了中央文革小组的署名。从此，中央文革小组与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并列。在这个会上，毛泽东拿出2月4日中央文革小组对湖南省军区2月3日关于“湘江风雷”的情况报告所作的批示，对陈伯达、江青、康生说，为什么匆忙发出这个指示？也不送给我看。毛泽东进一步批评说，文革小组没有民主集中制，这怎么行？……一直到现在还没建立起制度。不只是文革小组内部没有民主集中制，而且对我也不报告，文革小组没有经过正式会议作出决定，各人说各人的，康生说一套，陈伯达说一套，江青说一套，对上也没有报告。

2月6日，毛泽东再次召开中央常委扩大会议。毛泽东批评了中央文革小组，说：你们文化革命小组，毫无政治经验，毫无军事经验。运动发动起来了，你们有功，你们现在骄傲。老干部统统打倒，你们掌权掌得起来？毫无经验，没有领导过罢工，没有指挥过打仗和群众运动，只是做了一些调查研究工作。陈伯达对我从不接触，不谈心，就是送一点文件来。江青眼睛向天，天下没有几个看得起的人。江青和陈伯达从来没有劝过我，一个要节省一点，一个对干部要宽大一点。毛泽东在谈到干部问题时说：对干部，不要不许革命。徐向前，我保，住到我这里来。江华、江渭清、杨尚奎、刘俊秀、谭启龙，这些人还是要保吧！犯了错误就打倒，就要打到自己头上来了。你们就不犯错误？陶铸是犯了错误，可是一下子就捅出去，不同我打招呼，也没有同林彪同志、总理打招呼。上脱离，下没有同干部、群众商量。你们不也是十一中全会选举的吗？抓人只能抓反革命，不能抓犯错误

的人，陶铸、刘少奇、邓小平、陈云、贺龙、朱德等等。毛泽东接着说：今后，每周到我这里谈一次。在座的，再加上李先念、谭震林、聂荣臻、关锋、戚本禹，不要另外搞三四个常委的小组。平常我要多看些材料，一周一次会，日常工作总理多做一些。

毛泽东对中央文革小组在处理重大问题时擅自作主，不请示报告和肆意打倒老干部的做法进行严厉的批评后，要中央文革小组开会批评陈伯达、江青，并叫王力马上打电话叫张春桥、姚文元来北京。毛泽东对中央文革小组的批评引起了老同志们的共鸣，这些谈话成为引发二月抗争的重要原因。所以，二月抗争发生后，毛泽东曾经指出，这些老同志是“借我批评文革的东风”。

一场面对面的斗争

1967年2月中旬，在中南海怀仁堂的会议室里，在周恩来同志主持下，召开当时主持党、政、军日常工作的同志和中央文革成员的碰头会议，讨论“抓革命、促生产”的问题。有关同志也参加了会议。

会上，围绕着“文化大革命”要不要党的领导，应不应把老干部统统打倒，要不要稳定军队等几个问题，进行了全面摊牌，展开了尖锐斗争。

2月的怀仁堂会议，是双方斗争发展的最高潮。所谓“大闹怀仁堂”，就是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同一伙反党阴谋家、野心家进行的搏斗，他们怒火喷涌，拍案而起。

1967年2月13日下午3时的碰头会上，军委副主席叶剑英同志首先站起来讲话。为党和国家命运感到无限焦虑的老师，气愤地向坐在对面的陈伯达一伙，义正辞严地说：

“你们把党搞乱了，把政府搞乱了，把工厂、农村搞乱了！”

你们还嫌不够，还一定要把军队搞乱！这样搞，你们想干什么？”

这锋利的投枪，击中一群小丑的痛处。他们一阵阴阳怪气，唧唧喳喳。

坐在叶剑英同志旁边的新任军委文革组长徐向前同志，激愤地拍着桌子，痛斥陈伯达一伙：

“军队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支柱。这样把军队乱下去，还要不要支柱呢？难道我们这些人都不行啦？要蒯大富这类人来指挥军队吗？”

叶剑英同志接着又质问他们说：

“上海夺权，改名为上海公社，这样大的问题，涉及国家体制，不经政治局讨论，就擅自改变名称，又是想干什么！”

叶剑英同志幽默地嘲弄陈伯达说：

“我们不看书，不看报，也不懂得什么是巴黎公社的原则。请你解释一下，什么是巴黎公社的原则？革命，能没有党的领导吗？能不要军队吗？”

这一场短兵相接的战斗，戳穿了林彪一伙篡党乱军的阴谋。围绕着这个焦点，双方一直进行着斗争。

三天之后……

2月16日下午3时，前来参加碰头会的谭震林同志，在门口碰到操纵上海“一月夺权”黑风的张春桥。谭震林同志问他：

“陈丕显同志来了吗？”

谭震林同志所以提出陈丕显同志来京的问题，是因为一些省、市委书记被游斗之后，毛泽东同志连续在三个不同场合一再指示，要把各省、市委书记接到北京保护起来。

周恩来同志排除多方阻拦，把一部分省委书记接到北京，可是仍有一部分在当地被无理扣押着。陈丕显同志就是一个。张春桥听了，铁青着脸，打官腔说：

“群众不答应呵！”

“群众？”谭震林同志严肃地说：“党组织可以做工作嘛！”

“党？党不管用了。”张春桥翘仰着脸，“在上海，科长以上干部统统靠边站了！”

说得多轻巧！千万干部的命运就这样被他们决定了？一股怒火在谭震林同志胸中燃烧着，他激愤地指着张春桥：“原来靠边站，打击一片，都是你领导的呵！？”

谭震林同志一进屋，就再次提出陈丕显同志回京的问题。

“陈丕显同志从小参加革命，是红小鬼，他有什么问题？几个大区书记、许多省委书记有什么问题？为什么不让他们来北京？”

“四人帮”惯于打着“群众”的招牌，把群众运动变成“运动”群众，假借“群众”之手，推行他们的罪恶阴谋。谭震林同志见张春桥故意推脱，马上打断他的话：“什么群众？老是群众、群众，还有党的领导哩！不要党的领导，一天到晚，老是群众自己解放自己，自己教育自己，自己闹革命。这是什么东西？这是形而上学！”

谭震林同志激愤地接着又说：“你们的目的，就是要整掉老干部。你们把老干部一个一个打掉。40年的老革命，落得家破人亡，妻离子散。”

谭震林同志谈到一些干部子女被冲击，他说：“高干子弟统统挨整，见高干子弟就揪，这不是反动血统论是什么？”

谈到一些所谓造反派时，谭震林同志说：“蒯大富是什么东西？就是个反革命！搞了个百丑图。这些家伙，就是要把老干部统统打倒。这一次，是党的历史上斗争最残酷的一次，超过历史上任何一次！”

1966年12月初，农口决定一部分渔轮，轮流回港学习，抓革命、促生产。这本是很正常的事。可是，因为没有经过中央文革，陈伯达就抓住这件事大做文章。谭震林同志说：“捕鱼问题

连续逼我4次。说政治上造成很大影响。经济上造成很大损失。江青要把我整成反革命。……我从井冈山到现在，你们检查一下，哪有一点反对毛主席！”

这时，负责公检法的谢富治插话说：“江青和中央文革小组是保谭震林同志的。”

“我就是不让她保！我是为党工作，不是为她一个人工作！”

说着谭震林同志愤怒地站起来，走着穿衣服，边走边说：“照这样，让你们这些人干吧，我不干了，不跟了！砍脑袋，坐监牢，开除党籍，也要斗争到底！”

周恩来同志要他回来，不要走！

陈毅同志也说：“不要走，要在里边斗争！”

谭震林同志走了几步，转回身子，面向会场说：“陈老总，我，讲就不怕，怕就不讲，我哪也不走！”

在艰苦的战争年代，陈毅、谭震林同志是并肩驰骋江南、华东的老战友。他们在风雨里，在炮火下，在一条战壕里，度过多少春秋！今天，他们和其他老同志，又面临着一场新的战斗。

耿直、爽朗、襟怀坦白的陈毅同志接着发言。他针对林彪一伙打着毛主席的旗号，进行反革命两面派活动，斥责说：“这些家伙上台，要搞修正主义……延安整风时许多老干部被整过，抢救运动搞错了许多人。挨整的还有我们这些人。总理不是挨整的吗？”

陈毅同志停一停又说：“我们一定要记取这个教训。历史不是证明了到底谁是反对毛主席的吗？（指林彪）以后还要看，还会证明。斯大林把班交给赫鲁晓夫，赫鲁晓夫不是搞修正主义吗？”

“文化大革命”一开始，陈老总就多次和他们进行斗争，当林彪一伙唆使一些人在北京街头贴大字报、刷大字标语，恶毒攻击朱德、贺龙等同志时，陈老总就说：“虽然没有人选我当老干

部的代表，我也要为老干部说话。如果说，我们的解放军是在‘大军阀’、‘大土匪’领导下打仗的，怎么能解释人民解放战争取得的伟大胜利！”

历史事实不正是这样的吗？

叶剑英同志讲到党的传统，说：“老干部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对犯有错误的干部，我们党向来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哪有随便打倒的道理？照这样，人身都不能保证，怎么做工作？”

看到许多单位发生残酷虐待老干部的事，余秋里同志拍着桌子，大声疾呼：“这样对待老干部，怎么行？照这样干法，我就不去！”

倒向林彪、“四人帮”的谢富治，妄图插话辩解。李先念同志驳斥他说：“你不要和稀泥！”接着，他愤怒谴责林彪一伙破坏党的传统，破坏社会主义法制的法西斯罪行说：“我们党一贯强调大多数干部和群众是好的，现在这样搞，团结两个95%还要不要？老干部都打倒了，革命靠什么？现在是全国范围内的大搞逼供信！联动怎么是反动组织哩？十七八岁的娃娃，能是反革命吗？”

想到许多老干部被林彪一伙整残整死，谭震林同志又说：“我从来没有哭过。现在哭过三次，哭都没有地方哭，跟前又有秘书，又有孩子，只能背地流眼泪！”

谢富治插话说，不要从个人出发，要从全局出发。谭震林同志驳斥他：“我哭不是为自己，是为全体老干部！是为整个党！”

“我也哭过三次。”李先念同志说，“从《红旗》13期社论开始（社论号召“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必须彻底批判”），全国就开始了大规模地在群众中进行两条路线斗争，还有什么大串联，老干部统统打倒了！”

周恩来同志当即质问康生：“这篇社论，你看了吗？”

康生假装不知，回答：“我没有看！”

周恩来同志气愤地说：“这么大的事，为什么你不叫我们看看！”

惯于耍阴谋的康生，当面撒谎欺骗大家。事实上，这篇煽动“全面内战”、“打倒一切”的社论，不仅是他和陈伯达指使写的，而且写好后还经过他的亲自审查。

在碰头会上，我们尊敬的共产主义老战士，就这样同一伙叛徒、特务、阴谋家、野心家进行英勇战斗。老将们铿锵、锋利的语言，像锋利匕首直刺林彪、“四人帮”的心脏，剔肤见骨地揭露了林彪一伙的罪恶，伸张了革命的正义，是代表全国人民对他们进行的审判和控诉！

恶人告状掀浊浪

在党的会议上，畅所欲言，发表不同意见，完全是正常合理的事情。可是，林彪、“四人帮”一伙利用他们窃取的地位和权力，一手遮天，大兴问罪之师。为了进一步夺权，他们一方面继续在全国煽动“打倒一切”、“全面内战”；另一方面对与“二月逆流”有关的一些老同志，进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

“恶人告状”，就在2月16日的当天夜里，张春桥、姚文元、王力根据康生的指使，来到人民大会堂，“集体整理和核对”了中央碰头会的《记录》。

出于显而易见的目的，这份《记录》有许多歪曲、篡改、断章取义的地方。然后，他们就带着这份《记录》来到中南海，用欺骗、夸大的手法，向毛泽东同志汇报了中央碰头会上，老一代革命家们怎样向他们这伙小丑进行斗争。

毛泽东同志抽着烟，静静地听着汇报。

张春桥讲到谭震林同志拿起衣服要走时，毛泽东同志说：“他不愿干，让他走嘛！”

张春桥歪曲陈毅同志的讲话，挑拨说，陈毅同志反对延安整风运动……

毛泽东同志一听反对延安整风运动，立时恼怒起来，气冲冲地说：“怎么，难道延安整风错了吗？要想翻案吗？要把王明请回来吗？”

延安整风有很大成绩。整风期间，康生大搞逼供信，把革命同志当作“特务”批斗、抢救，伤害了许多好同志。碰头会上，陈毅同志根据“文化革命”中绝大多数干部都被迫害的事实，联系历史的教训，提醒不要重复过去“左”的错误，是完全正确的，反映了历史的真实情况。

陈毅同志仗义执言的讲话，正刺中了康生的痛处，像挖了他的祖坟，引起了他的宿仇。于是，他立即唆使张春桥等人，连夜向毛泽东同志汇报，故意扩大事态，挑起毛泽东同志的愤怒。

与康生的态度截然相反，主持碰头会的周恩来同志，从维护党的团结统一和全党利益出发，则竭力使事态不要扩大。事过三天之后，向毛泽东同志汇报了碰头会的情况。这就把惟恐天下不乱的林彪一伙，更加触怒了。

怀仁堂的会议室里，连日紧张举行会议。林彪一伙咆哮如雷，向敢于坚持党的原则的老一代革命家们，进行围攻批斗。

他们疯狂地叫嚷：“否定延安整风，就是反对毛主席！”

“你们是不是想叫王明回来，恢复王明的投降路线吗？”

“能说文化大革命，没有党的领导吗？毛主席的领导，就是党的领导，攻击没有党的领导，就是反对毛主席！”

康生挥着手，气急败坏地嚷叫说：“这是十一中全会以来发生的一次最严重的反党事件！”“这是一种政变的预演，一种资本主义复辟的预演！”

江青妖里妖气，晃着脑袋：“你们的目的是想为刘少奇、邓小平翻案！”“保护老干部，就是保护一小撮叛徒、特务……”

陈伯达阴阳怪气地说：“反对文化大革命，炮打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这是自上而下的复辟资本主义，这是颠覆无产阶级专政！”

种种帽子、棍子，一齐向老师们飞来。

在怀仁堂的会议室里，他们一连对李富春、叶剑英、陈毅、李先念、聂荣臻、徐向前、谭震林同志等老一代革命家，围攻批斗了半个多月。康生指着徐向前同志凶恶地叫嚣：“徐向前呀，军队不是你的，你有什么了不起呀！你要为刘少奇、邓小平翻案，想要反党吗？”

他边说边抽烟，口角溅着白沫：“毛主席发怒，是无产阶级之怒，是无产阶级的义愤，你们提意见，就是反毛主席嘛！”

在批斗会上，谢富治尖着嗓子喊：“你们反党、反社会主义，这是反革命复辟……”

他们恶毒污蔑老师们在碰头会上的发言，是“反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反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否定延安整风运动”，叫嚷什么“保护老干部就是保护一小撮走资派，保护叛徒、内奸、特务”。

林彪、康生、“四人帮”一伙惯于给人戴大帽子。什么“俱乐部”呀，什么“黑干将”呀，什么“联络员”呀等等。陈毅同志兼任副总理和军委副主席，常到两个机关开会，康生便污蔑陈毅同志是“联络员”，有些高级干部住×××医院，他就骂什么：“×××有妖！”余秋里、谷牧同志积极支持老师，他就说：“二月逆流还有两个小伙计！”

政治局常委李富春同志协助周总理处理日常工作，是主管国务院工作的业务组长，经常通宵不眠工作。他说：“我再不抓，周总理的压力就更大啦。”

几个副总理常到他那里讨论问题。康生因此就污蔑他是“俱乐部主任”。李富春同志回答这位“帽子工厂”的老板说：“好

呀，那你就组织专案审查吧！人有嘴，话总是要讲嘛。”

在林彪、“四人帮”的淫威下，在党的民主遭践踏的日子里，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从全局出发，按住心中的怒火，忍受着冤屈，也说了些“违心”的检讨话。

与这次批斗会相配合，林彪一伙在社会上大规模掀起反击“二月逆流”的浪潮。

谭震林同志曾因写信给中央揭发江青，称她是“今日中国的武则天”，希望对她提高警惕。江青听了暴跳如雷，对谭震林同志等恨不得一口吞之而后快。

3月6日，她立即叫戚本禹和谭厚兰密谋商量，决定“反击‘二月逆流’先从谭震林开刀”，“反谭震林可以从大寨展览开刀”。相继制造了冲击农业展览馆和冲击工业学大庆展览的事件。

1967年3月8日，谭厚兰带着受操纵蒙蔽的1000多名北师大大学生，向北京农业展览馆冲来，制造了冲击“农业学大寨展览”的事件，喊出了“打倒谭震林”、“谭震林的黑报告是二月逆流的宣言书”、“谭震林欺骗毛主席，罪该万死”的口号。在农展馆，他们不仅抢走了大批文件，还当场揪走了农业部代理部长江一真同志。

3月9日，陈伯达在一次军级以上干部会上，叫嚣什么现在全国自上而下，各级都有反革命复辟现象，提出要迎头痛击“复辟资本主义逆流”！

3月10日上午，王力、关锋、戚本禹及谢富治亲临农展馆，向占领农展馆的谭厚兰等慰问打气。他们一起高举双手，狂叫着“打倒谭震林”、“反击二月逆流”的口号。

在这前后，康生也赶到这里。他摇头晃脑地在农业学大寨展览馆里转了一圈，然后说：“展览不突出毛泽东思想！”煽动青年冲击大寨展览。而人们清楚记得，这个展览除两次经周总理亲自审查外，正是他代表中央专门审查批准的。

3月14日，在林彪、陈伯达一伙操纵下，首都街头出现了10万学生的示威游行。他们高喊反击“二月逆流”，打倒国务院五位副总理和军委四个副主席，“用鲜血保卫中央文革”等口号，掀起所谓反击“二月逆流”的第一个高潮。

3月20日，林彪在军队军以上干部会议上疯狂叫嚷，胡说什么“文化大革命这一斗争胜败，是决定中国走向何处去，决定中国命运，也决定影响整个人类命运”。他混淆黑白，说什么“文化大革命”“损失是最小最小最小，而得到的成绩是最大最大最大”。进一步煽动，把反击“二月逆流”推向全国各地。

乌云可以一时迷漫天空，但终究遮不住阳光。正当反击“二月逆流”甚嚣尘上的时候，喜出望外的事情发生了。

1967年五一节前夕，4月30日的夜间，毛泽东同志请周恩来、李富春、陈毅、叶剑英、聂荣臻、徐向前、谭震林、李先念、余秋里、谷牧等同志，来到自己家里，在书满四壁的会客室，毛泽东同志同大家进行了亲切的谈话。

“文武之道，一张一弛。”毛泽东同志逐个问了几位国务院副总理、军委副主席的情况，然后说：“今天开个团结会。我们还是要搞团结嘛。”

毛泽东同志手里夹着一支香烟，一边抽，一边和悦地说：“开初，我不知道什么是‘大闹怀仁堂’。后来，我听了几次汇报，才搞清楚了。”

毛泽东同志说到这里，停顿了一下，望着这些曾与他一同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打天下的战友，说：“碰头会上的发言，是对运动有意见，是老师发牢骚嘛。”

毛泽东同志坐在沙发上，微微侧着身，用热烈的目光注视着大家。

“噢！这些话，是在党的会议上讲的，是阳谋，不是阴谋。”

接着又说：“以后，大家有意见，可以对我讲嘛！”

屋里，扬起一阵笑声，老师们严峻的面容上，重又露出了笑容。同志间过去那种紧张的空气，突然缓和了。雅静、明亮、宽敞的会客室，洋溢着老战友们亲切、团结的气氛。

就在这天夜里，周恩来同志亲自拟定了参加五一节庆祝活动的名单。经毛泽东同志批准，请李富春、叶剑英、陈毅、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谭震林等同志，和首都人民一起，欢度五一节。

（曾涛：《正义的抗争》）

制造最大冤案：八届十二中全会

因一些八届中央委员会委员和候补委员已被打倒或受审查，以致在1968年10月13日至31日召开的八届十二中全会上，实到的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不足半数。全会批准在江青、康生、谢富治等人主持下，用伪证写成的《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作出了把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的决定，制造了共和国历史上最大的冤案。

(1) 迟迟难开的全会

八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章程》规定：“党的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由中央政治局展开。每年至少两次。”按此规定，八届十二中全会应该在1966年召开。毛泽东不仅不信任中央第一线，而且实际上也不尊重八届十一中全会改组过的中央领导机构，许多重大问题实际上由毛泽东个人决定而不由中央集体决定。一些重大问题（如“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把“文化大革命”扩展到工厂农村、全面夺权）是中央全会不会通过或不会顺利通过的，所以毛泽东就不召开全会。

1966年8月12日，毛泽东在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闭幕会上说：“第九次大会什么时候召集的问题，要准备一下。已经多年了，八大二次会议到后年就十年了。现在要开九次大会，大概是

在明年一个适当的时候再开。”1967年没有开成。1967年10月21日，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发出《关于征询对“九大”问题意见的通知》。通知说：“毛主席最近提出什么时候召开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如何准备这次大会的问题，并且指示张春桥、姚文元二同志在上海做些调查。现在把姚文元同志关于他们初步调查结果给主席的一封信发给你们参考，请你们也做好调查。”姚文元在信中说：代表由各方协商产生；吸收一批工人和红卫兵入党，多一些工人和红卫兵代表列席大会；不选刘、邓、陶、彭、罗、陆、杨，“刘少奇是叛徒，要进一步批臭，清除出去”；“恢复党组织”这个口号不妥，应为整顿和改造；刘少奇一套修正主义货色，尚需继续大力批判。11月5日，毛泽东就九大和整党问题同中央文革小组成员谈话。主要内容是：关于九大问题，第一批反映已经来了，综合一下，通报各地，继续征求意见；打了一年多仗，搞出了不少坏人，现在要打出一个党来；党员要那种朝气蓬勃的，死气沉沉的、暮气沉沉的就不要加入这个党，文化大革命就是整党、整团、整政府、整军队，党、政、军、民、学都整了；要吸收新血液，要吐故纳新；党纲要修改，不要写得太长；邓小平要批，还要把他同刘少奇区别一下。11月27日，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发出《关于对征询召开“九大”的意见的通报》。12月2日，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发出《关于整顿、恢复、重建党的组织的意见和问题》（供征求意见用）。12月16日，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发出《关于进行修改党纲党章工作的通知》。至1967年年底，大部分省、自治区还没有成立革命委员会，所以召开九大只好搁置下来。

1968年7月21日，康生给江青绝密亲启信，送去了亲笔排列的八届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名单，其中写为“叛徒”、“特务”、“里通外国”或“有政治历史问题”的，达总数的71%。这个71%，自然不是康生一人打倒的，但也反映了康生的看法。

在实现所谓“全国一片红”以后，1968年10月13日至31日，党的八届十二中全会（扩大）在北京举行。这次全会实际上是九大的准备会。

（2）混淆是非和敌我的全会

毛泽东主持了全会。全会应出席中央委员87人（原97人，去世10人）、候补中央委员98人。因一些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已被打倒或受审查，在监狱中或在“牛棚”中，所以实到中央委员40人，补候中央委员19人，不足半数。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召开全会，到会者不足半数，这为中外历史上所罕见。10月13日全会开幕会上将候补中央委员黄永胜、许世友、陈锡联、张达志、韩先楚、潘复生、刘建勋、李大章、吴德、刘子厚共十人补为正式中央委员（未按惯例依名次递补）。出席全会的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共59人。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军委办事组成员、各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和大军区的负责人，中央直属机关负责人共74人列席了会议。

在10月13日开幕会上，周恩来报告了出席会议人员的组成、编组和会议的开法，并宣布议事日程：九大代表产生的指导思想和方法；《中国共产党章程（草案）》；国际国内形势；专案审查工作，特别是对刘少奇的审查。接着毛泽东讲话，主要内容如下：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建设社会主义，是完全必要的，是非常及时的。文化大革命究竟要不要搞，成绩是主要的，还是缺点错误是主要的，要搞到底还是不搞到底，大家议一议。邓小平在战争时期是打敌人的，历史上还未发现有什么问题。四川可打得厉害，十几万人打，无线电指挥，有什么不得了，天塌不下来。办学习班解决了很多问题。一定要总结经验。过去我们南征北战，那种战争

好打，因为敌人清楚。这回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比那种战争困难得多。问题就是犯思想错误的，同敌我矛盾的，混合在一起，一时还搞不清楚，只好一省一省解决。上海比北京强，120万工人掌握局势。知识分子是粘土，板结了，不透空气，不长庄稼，知识分子多的地方就是不好办。不能一讲就是臭知识分子，但是臭一点也可以。知识分子不可不要，也不能把尾巴翘到天上去。军事院校办了111个，叫111^①，其中确实有妖啊。这场文化大革命要搞到底。什么叫到底？估计要三年，到明年夏季差不多了。到底就是大批判，清理阶级队伍，精简机构，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

全会一开始，就分组围攻搞所谓“二月逆流”的老同志，围攻所谓“一贯右倾”的老同志朱德、陈云、邓子恢、王稼祥。这实际上成了全会的一个重要内容。10月17日在第一组小组会上，康生强加给所谓“二月逆流”以“反毛主席”、“否定延安整风”、“为王明路线翻案”等罪名，江青则污蔑陈毅、叶剑英、徐向前等人“乱军”。姚文元说：“‘二月逆流’就是为刘、邓、陶等叛徒、特务、走资派翻案。”谢富治说：“朱德同志从到井冈山第一天起就反毛主席。”“陈云同志在七千人大会上，主席三次叫他讲话，他说没调查没发言权，后来不到一个月做了个黑报告反毛主席，反大跃进，反总路线。”“刘、邓、朱德、陈云都是搞修正主义的。”在小组会上，黄永胜污蔑朱德是“老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有野心”，“想当领袖”；污蔑聂荣臻“一贯搞山头主义，搞独立王国，突出他个人，搞反动的多中心论”；污蔑叶剑英是“二月逆流的俱乐部主任”；污蔑徐向前没有做过有益于党和人民的事。吴法宪当着朱德的面说：“朱总司令你在井冈山怎样反对毛主席的，讲给我们听一听，教育我们。你当了一辈子总司令，

① 读“yao、yao、yao”。

实际指挥打仗的都是毛主席。因而你是个黑司令，不是红司令。”江、康、姚、谢、黄、吴等人如此恶毒地诬陷，令人发指。而陈毅、叶剑英、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不断地受到批斗，有时连请假写“检讨”也不准许。就围攻本身而言，并非江青等人擅自行动，每天都有《简报》把情况反映上去的。污蔑这些老同志的目的，是为在九届一中全会不把他们中的多数人选入中央政治局作舆论准备。

10月20日，林彪在全会上讲话。他歌颂“文化大革命”，说：“文化革命成绩最大最大最大，损失最小最小最小。”“我们一片红，等于欧洲一片红。”他宣称“二月逆流”是“十一中全会以后发生的一次最严重的反党事件”，是“资本主义复辟的预演”。10月26日，林彪以历史唯心主义的观点，大讲从古至今的四次“文化大革命运动”，美化“文化大革命”的“左”倾错误。他说：“第一次是希腊罗马的古典文化，影响2000年。……但同我们这次比较起来，微不足道，是小巫见大巫，没什么了不起的。”“第二次是资产阶级的意大利的文化，到了十四、五世纪，以文艺复兴进入了繁荣时代。”“第三次是马克思主义。”“这三次都没有毛主席领导下的这次文化大革命伟大。这次文化大革命是世界上最大最大的一次。”在国际关系部分，林彪鼓吹在国际上“支持造反派”，不要重视“当权派”而要重视“广大群众”，中国是“世界上最有影响的国家”等“左”倾论调。

在极不正常的情况下，全会作出《关于九次代表大会代表产生的决定》和《关于〈中国共产党章程（草案）〉的决定》。前一个决定，规定了九大代表产生的指导思想为毛泽东在1967年10月27日写进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关于已经成立了革命委员会的单位恢复党的组织生活的批示》中的“50字方针”，即：“党组织应是无产阶级先进分子所组成，应能领导无产阶级和革命群众对于阶级敌人进行战斗的朝气蓬勃的先锋队组织。”“50字方

针”是“以阶级斗争为纲”在党的建设上的体现。前一个决定还规定了代表的条件。《关于〈中国共产党章程（草案）〉的决定》说：“将《中国共产党章程（草案）》印发全党，作为讨论的基础。”

中央专案审查小组在江青、康生、谢富治等人把持下，用伪证写成《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审查报告说：“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中，经过广大革命群众和红卫兵小将的广泛揭发，专案组的深入调查，大量的物证、人证、旁证，充分证实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刘少奇，是一个埋藏在党内的叛徒、内奸、工贼，是罪恶累累的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的走狗。”“刘少奇 1925 年在长沙被捕叛变。”“1927 年在武汉充当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汪精卫、陈公博的走狗，进行了一系列出卖工人阶级、破坏革命的内奸活动。”“1929 年窃据满洲省委书记时的大叛卖。”“刘少奇罪大恶极，死有余辜。专案审查小组建议党中央根据党内外广大革命群众的强烈要求，撤销刘少奇党内外一切职务，永远开除党籍，并继续清算刘少奇及其同伙叛党叛国的罪行。”全会在极不正常的情况下批准了《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作出了把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撤销其党内外一切职务”的决议。（与会的陈少敏不畏高压，对这个决议不表示同意。）确凿的事实证明，强加给刘少奇的所谓“叛徒”、“内奸”、“工贼”等罪名，完全是诬陷。八届十二中全会对刘少奇所作的政治结论和组织处理，是完全错误的。这是我党历史上的最大冤案。1969 年 10 月 17 日，刘少奇被押往开封。11 月 12 日，为中国人民的解放和幸福奋斗了一生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刘少奇惨死于囚禁中。^① 刘少奇的夫人王光美及其一家受到残酷迫害。因刘少

^① 请参看王阑西《驰骋中原》的开头部分。

奇冤案受株连被错判案件共 22053 件。

10月31日，全会通过了全会公报。同日，毛泽东在全会闭幕会上讲话，大意如下：有些同志对于所谓“二月逆流”这件事不大了解，经过十几天，就比较了解了。在这个全会上，由犯过错误的同志说明他们的问题，大家又对他们有些质问，他们再说明问题，又再质问，好像经过这么几次反复嘛，大家都比较清楚了。这件事嘛，要说小，就不那么小，是件大事。要说那么十分了不起呢，也没有什么十分了不起。他们有意见要说，几个人在一起，又都是政治局委员，又是副总理，有些是军委副主席，我看也是党内生活许可的。他们也是公开出来讲的。这个世界上面，总是左、中、右。统统是左派，我就不那么赞成。九大代表，“二月逆流”的同志们如果不参加，我看就是个缺点。陈毅同志，你就以那个右的那一方面的资格，以这个身分，来参加九大。对于党内一些老同志，要一批二保三看，清理阶级队伍，注意一个“准”字，不要搞逼供信那一套。对于学术权威，注意不要做得太过分。冯友兰、翦伯赞可能还有某种用处。批是要批的，保还是要保的。邓，大家要开除，我有点保留，他和刘还有点区别。“多中心”不对。

(3) “点名很有必要”

11月11日，张春桥在上海写了《关于传达十二中全会的几个问题的报告》，提出：“‘二月逆流’的那几个人，要不要点名？看来，点名很有必要。”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中共中央将此报告转发各地。全国各地在传达中，大多点名批判了参加所谓“二月逆流”的老同志。

下面是一位老无产阶级革命家当时传达全会精神报告的摘录，以见一斑：

“刘少奇是隐藏在党内 40 余年的大叛徒、大内奸、大工贼。红卫兵收集了许多罪状。江青同志亲自负责了这个专案。罪恶累累，令人非常愤慨，应当永远开除党籍。邓、彭等与刘还有区别，但都应严肃处理。

“林副主席说：‘二月逆流’是十一届一中全会后发生的最严重的反党事件，是刘邓路线的继续，矛头指向毛主席、中央文革、革委会，目的是否定文化大革命，为刘邓翻案，为王明翻案，否定延安整风。……主席说过，去年 4 月间可见眉目。由于‘二月逆流’的出现，这一战略部署受到了严重的干扰。……这次大会严肃清算了‘二月逆流’，是完全必要的。参加‘二月逆流’的几个老同志，除谭震林外，李富春、李先念、陈毅、聂荣臻、徐向前、叶剑英、余秋里、谷牧与彭德怀、贺龙是有点区别的。他们犯错误，主席宽大为怀，允许改正。中央文革的意见，一方面批，一方面保，并建议选为九大代表。……还有几位职位较多的老同志（朱德、陈云、邓子恢），一贯有右倾错误，民主革命时期是很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就不积极了，甚至站到反动方面去了。由老战士、老战友变成了反革命，变成不断反对革命的角色，这对我们是很好的教训。

“他们（按：指几位老师们）1966 年 11 月又两次接见红卫兵，林副主席是不同意的。他们镇压了军事院校的文化大革命。1967 年 1 月，开高干碰头会，他们矛头指向中央文革。1 月 17 日四川散发了甘渭汉的传单，抓了 5 万人，说还不够，这是军委几位副主席的决定。接着，2 月 23 日青海赵永夫屠杀群众，他们打电话祝贺胜利。还有河南镇压‘二七公社’，这都是军委几位副主席批准的。……‘二月逆流’有两个‘窝子’，一个是李富春家，一个是西山聂、叶、徐、肖（肖华）住的地方。陈毅是来往两地的联络员，也是其中的一员干将。

“多中心论的代表是聂荣臻同志。……杨成武是从聂荣臻处

搬去的，不过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而已。

“今年的‘三右一风’当然还是那些人。老将出马，最明显的是外交部 91 人的大字报。”

这位老革命家奉军委办事组之命传达全会精神，他当然要如实传达。从全会上的是非颠倒中，确实可以看出“文化大革命”中两种思潮、两种倾向、两种指导思想的斗争，不过正确的一方为错误的一方所压制罢了。

（王年一著《大动乱的年代》）

闹剧叠出：中国共产党 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

九大的突出特点，是从始至终为强烈的个人崇拜和“左”倾狂热气氛所笼罩。毛泽东在《东方红》的乐曲声中一登上主席台，立即“全场欢声雷动，掌声震耳”。毛泽东一开口讲话，便不断地为“万岁”声所打断……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党的九大使‘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理论和实践合法化，加强了林彪、江青、康生等人在党中央的地位。九大在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的指导方针都是错误的。”只要回顾和研究九大召开的历史背景、会议经过和会议的主要内容，就可以充分证明，《决议》的论断是完全符合实际的、恰如其分的。

(一)

党的九大是在“文化大革命”的特殊历史条件下召开的。从1966年5月开始的全国性的“文化大革命”，是党内以关于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的错误理论和实践为主要特征的“左”倾思潮发展的顶点，是毛泽东的个人专断作风逐步损害党的民主集中制、个人崇拜现象严重发展的结果；也是林彪、江青、康生这些野心家别有用心地利用和助长毛泽东的“左”倾错误的结果。

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错误理论指导下，“文化

大革命”从一开始就是采取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运动的形式，把斗争的矛头指向根本不存在的所谓“刘少奇资产阶级司令部”。林彪、江青、康生之流乘机大肆煽动、造谣、蛊惑，掀起“踢开党委闹革命”的浪潮，“打倒一切”的极左思潮泛滥成灾，“罢官”之风刮遍全国城乡。党和国家各级组织中的领导干部，上至国家主席、党的总书记，下至支部书记、生产队长，纷纷被当作“走资派”打倒，一大批革命功臣、建国元勋横遭迫害；许多有才能、有成就的知识分子，被当作所谓“反动学术权威”遭到揪斗批判。全国党政组织基本上陷于瘫痪状态，广大党员被迫停止组织生活，全国陷入一片混乱之中。

1967年初，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等策划指挥，夺取了上海市的党政大权，掀起所谓“一月风暴”。由于得到毛泽东的赞同和支持，夺权之风迅速吹遍全国。虽经老一辈革命家的奋起抗争和广大干部群众的抵制反对，也未能扭转局势。在夺权斗争的过程中，派别对立日趋严重，武斗遍于各地，造成“全面内战”的局面。

由于毛泽东号召实现“革命的大联合”，并采取命令人民解放军介入地方“文化大革命”，实行“三支两军”等措施，局势渐趋缓和。到1968年9月，经过20个月的曲折复杂的争斗，全国29个省、市、自治区都经过夺权之后建立起新的政权机构——革命委员会，实现了所谓“全国山河一片红”。

“文化大革命”的过程，也就是九大的准备过程。在1966年8月党的八届一中全会上，毛泽东写出“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并领导开展了对刘少奇的批判之后，就明确提出了准备召开九大问题。这件事后来就委托给中央文革小组去办。1967年11月，中央文革小组以群众要求的名义整理了一份通报，发向全国。这份通报的重点是：（1）要把关于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的“左”倾错误理论写入九大党纲；（2）要写一本党内两条路线

斗争史，作出新的历史决议以代替所谓有错误的 1945 年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3）九大要大力宣传“林副主席”是毛主席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并写入九大的报告和决议；（4）要把“文化大革命”中涌现的所谓“新生力量”，即造反起家的分子，选入党的中央委员会；（5）要把被诬陷为“叛徒、特务、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的大批领导干部，“统统清除出去，以根除隐患”。《通报》强调的这五条，实际上成为各地准备九大、修改党章的指导思想。

1968 年 10 月召开的扩大的八届十二中全会，为九大作了直接准备。这次全会主要解决三个问题：（1）全面肯定“文化大革命”，赞同毛泽东关于“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建设社会主义，是完全必要的，是非常及时的”的错误结论，为九大定下了政治上的基调。（2）在极不正常的情况下，通过了江青、康生、谢富治等人制造伪证写成的《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作出撤销刘少奇党内外一切职务，并永远开除出党的错误决议，为席卷全国的历时两年多的炮打所谓资产阶级司令部的错误斗争，从政治上和组织上作了结论。这是召开九大的最重要的准备。（3）讨论和修改了党章草案，通过了九大代表的产生办法。这样，十二中全会就在公报中正式宣布：“全会认为：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风暴，已经从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为召开党的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准备了充分的条件。”

（二）

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 1969 年 4 月 1 日至 24 日在北京举行。出席代表 1512 人，代表党员 2200 万人。

大会的主要议程共三项：（1）林彪代表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

会作政治报告；(2) 修改中国共产党章程；(3) 选举党的中央委员会。

正式会议开始前，陆续到京的代表按大区组成代表团，讨论了毛泽东关于加强战备问题的指示，初步议论了党章草案，并酝酿通过了大会主席团名单。

4月1日，大会正式开幕。毛泽东主持，通过大会主席团名单，并致开幕词。他说：“我希望这次代表大会开得好，开成一个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大会以后，在全国取得更大的胜利。”接着，林彪作政治报告。报告的中心内容按照大会秘书处新闻公报的概括是：“根据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学说，总结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基本经验，分析了国内外形势，提出了党的战斗任务。”

从4月2日至13日，分组讨论政治报告和中国共产党章程的修改草案，并结合进行所谓“斗私批修”。

4月14日，召开全体大会。先进行大会发言。陈伯达说：“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在毛主席领导下，摧毁了刘少奇修正主义集团、资产阶级司令部，这是一个灿烂辉煌的胜利。”他胡说：“从来没有一个会议像我们这个大会引起全世界的注意和震动。世界共产主义者和革命人民都为我们而欢欣鼓舞，帝、修、反、蒋匪帮却为之胆战心惊。”康生恬不知耻地瞎吹说，新党章明确规定林彪是毛主席的接班人，是关系我们党和国家前途和命运的大事，关系世界革命的前途和命运的大事。在解放军、工人、农民、妇女、干部等各方面代表作了表态性发言后，大会一致通过了政治报告和党章。

从15日开始，大会进入第三项议程，酝酿、提名和选举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在提名过程中，林彪、江青一伙极力把他们的党羽塞进党的中央领导机构，而把正派的老干部排斥在外。经过错综复杂的斗争，通过了候选人名单。24日，召开大

会正式选举。列入候选名单的中央委员 170 人、候补中央委员 109 人，全部当选。其中原八届中委和候补中委只有 53 人。很多久经考验的有威望的老干部被排除在外，而相当数量的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的骨干和党羽却进入了中央委员会。林彪成为党中央的唯一副主席，陈伯达、康生成为政治局常委，叶群、李作鹏、黄永胜、吴法宪、张春桥、邱会作、姚文元等都成了政治局委员，大大加强了他们在党中央的势力。选举结束并合影后，由林彪宣布大会闭幕。

这次大会的突出特点，是从始至终为强烈的个人崇拜和“左”的狂热气氛所笼罩。代表们一到北京就为“来到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身边，而感到无比的幸福和激动”。毛泽东在《东方红》的乐曲声中一登上主席台，立即“全场欢声雷动，掌声震耳”。毛泽东一开口讲话，便不断地为“万岁”声所打断。会议的基调就是大赞大颂大批，大赞大颂的中心是毛泽东、“文化大革命”，兼及林彪和江青，大批的主要对象是所谓刘少奇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在这次大会上不允许有任何稍微不同的声音，也看不到任何认真的正常的研究和讨论。在这样情况下，九大当然不可能承担起完成一次党代表大会的重大历史使命。

(三)

九大通过的政治报告和新党章是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的“左”倾错误指导方针的集中体现，是需要认真加以剖析的。

政治报告是对毛泽东晚年“左”倾错误观点的集中体现——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系统全面论证。以这个错误理论为指导分析“文化大革命”的准备和进行过程，极力肯定“文化大革命”的必要性和重要意义，并在此基础上规定了全党和全国人民的任务。报告的主要错误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对马克思主义的一些基本原理作了错误解释或教条化的搬用。

政治报告中接连引用马克思和列宁的六条语录，企图使人认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是有充分依据的。而实际上却是对马列论述的歪曲或错误解释。例如，把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之间需要一个过渡时期的正确原理，误解为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之间都是过渡时期。把列宁在十月革命后初期关于过渡时期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存在着尖锐激烈的阶级斗争，小生产每日每时自发地大量地产生资本主义，无产阶级专政是新形势下阶级斗争的继续等论述，搬用到已经消灭了剥削阶级的社会主义社会。断言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始终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并以此作为在社会主义社会中仍应“以阶级斗争为纲”，并发动一次比一次更猛烈的政治运动的理论根据。这当然是完全错误的。

又如，误解和混淆了各种不同含义的革命。资产阶级革命以夺取政权而结束，而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不过是革命的开始，这是马克思主义的一条重要原理。但是，对于夺取政权前后革命含义的不同，革命导师一直是十分注意的。可是，九大报告中只强调夺取政权后要继续革命，却混淆了革命的不同含义和原则界限。错误地认为，在社会主义制度已经确立十年后的中国，仍要搞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政治大革命。这种革命性质上的根本错误，必然导致敌我关系的颠倒，革命动力和对象的颠倒，造成灾难性的后果。

再如，片面地强调无产阶级专政的镇压剥削者反抗的职能，而忽视它的组织社会主义建设的主要职能。政治报告中，把阶级斗争作为无产阶级专政的第一位的重要任务，大讲特讲；而对应如何领导组织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却一字不谈。这样就背离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根本任务的原理，违背

了全国人民的要求和愿望。

第二，按照两条路线斗争的模式和需要，歪曲篡改了党的历史。

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本来是为民族解放和人民幸福而前仆后继、英勇奋斗的历史，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经过反复实践而日益结合的历史，是党内正确纠正错误、光明面战胜阴暗面的历史，因而，也是经过无数艰难曲折走向胜利的历史。可是，在九大报告中全部党史却被概括为：“就是毛主席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同党内右的或左的机会主义路线斗争的历史。”党史的其他主要内容，都被一笔勾销了。

特别严重的是，报告中用较大篇幅对刘少奇妄加罪名，说“他有一条妄图在中国复辟资本主义，使中国变为帝国主义、修正主义殖民地的政治路线。他又有一条为他的反革命政治路线服务的组织路线。”这不仅是对一个人的政治诬陷，而且歪曲了整个党的历史。以这样毫无事实的捏造为依据，去论述“文化大革命”发生的必要性和必然性，是完全经不起实践检验的。

第三，错误地估量了国内形势，夸大了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

对于一个执政的无产阶级政党来说，警惕资本主义的滋长和复辟，警惕敌人的颠覆和破坏，当然是应该的。但是，在我们保持警惕注意防止的情况下，这种可能性是很小的。九大报告却完全背离了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把资本主义复辟的抽象可能性夸大成为现实的危险性。报告并没有对党内和国内形势作出全面的有说服力的分析，而是歪曲事实乱加罪名，作出一些错误的臆断。如说刘少奇“急不可待地要复辟资本主义”，“在他们控制的各部门向无产阶级进行疯狂的反革命专政”，“为推翻无产阶级专政作舆论准备”等等。并由此引申出一个吓人的结论：“毛主席已经把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更加鲜明地提到全党和

全国人民面前了！”“中国无产阶级、贫下中农、人民解放军、革命干部和革命知识分子，对刘少奇一伙的复辟活动，已经忍耐不住了，一场阶级大搏斗是不可避免的了。”但是，“文化大革命”十年的历史实践，却无可辩驳地证明，上述一切论断都是违反事实的，是根本不能成立的。

第四，确定的任务是不符合客观需要的。

九大是在经历了三年史无前例的大动乱之后召开的。当时全党和全国人民迫切要求结束混乱局面，恢复正常的社会秩序和社会主义经济文化建设。可是，九大报告中为全党和全国人民规定的任务，却是所谓“认真搞好斗、批、改”。搞什么“大批判、清理阶级队伍、整党、精简机构、下放干部”等等。其目的，据说就是要把“上层建筑领域中的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把领导权掌握在无产阶级手中。采取的主要方法是“必须高举革命大批判的旗帜，用毛泽东思想批判资产阶级，批判修正主义，批判各种违反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右的或左的错误思想，批判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批判‘多中心即无中心论’”。再一个是“深入开展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群众运动……把我们全国真正办成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一个批，一个学，就是九大规定的完成“斗、批、改”任务的主要方法。这显然是违反客观实际的，和全党全国人民的愿望背道而驰的。

此外，对国际形势的分析方面，也有一些“左”的东西，如夸大世界大战爆发的现实危险性等等。

九大党章，同样是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错误理论指导下制定的，充塞着“左”的错误论点，是我党历史上最不好的一个党章。

党章对作为党的行动指南的毛泽东思想作了不符合实际的阐述。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实践的总

结，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宝库的丰富和发展。任何忽视和否认毛泽东思想的重要历史地位的观点都是错误的。但九大的党章却说：“毛泽东思想是在帝国主义走向全面崩溃，社会主义走向全世界胜利时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是“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提高到一个崭新的阶段”。这样的定义显然是夸大的，不恰当的。特别严重的是，党章把所谓“基本路线”全文写入总纲，并明确肯定“文化大革命”“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政治大革命”。这样，毛泽东晚年的“左”倾错误论点，就被作为毛泽东思想的最重要组成部分，作为把马列主义发展到新阶段的标志，写入党纲，成了全体党员必须遵守并为之终身奋斗的最高法规。因此，其危害是极为严重的。

党章明文写上谁是党的领袖，谁是领袖的接班人。这种作法从根本上违反了党的根本的组织制度民主集中制，破坏了党的群众路线，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所罕见的。

党章对党的性质、任务和党的建设中其他一些基本问题，也作了一些不适当的规定。如把党的任务只限于搞阶级斗争，全部砍掉党员的权利，取消新党员的预备期等，这些都对党的建设产生了很不好的影响。

总之，九大的政治报告和党章，都是在“左”的理论指导下，对“文化大革命”的一套错误纲领、方针、政策作了系统论证和全面肯定，并通过党的全国代表大会的权威使之进一步合法化，成为必须遵守的指导思想和党规党法，使全局性的“左”倾错误巩固和继续下去。因此，九大在党的历史上不可能有任何积极意义。

（金春明：《九大评述》）

又一场庐山风波：九届二中全会

全会印发的简报说：大家“衷心赞成”小组会上有人提出的“在宪法上，第二条中增加毛主席是国家主席，林副主席是国家副主席”和“宪法要恢复国家主席一章”的建议。林彪让秘书把这份简报讲给他听，听后说：“听了那么多简报，数这份有分量，讲到了实质问题。”毛泽东认为有人“大有炸平庐山之势”。

在复杂的背景下，中共九届二中全会在江西庐山召开。会上出人意料地爆发了尖锐而复杂的斗争。

(1) 复杂的背景

尽管个别地方的武斗仍然激烈而频繁，但是天下大乱的局面已经结束。不仅省、市、自治区革委会早已成立，各级革委会也相继建立。一些地方的党组织已经“重建”，党的组织生活已经恢复。就变化了的客观情势的需要而言，军队不应该再那么突出。如果说，在九届一中全会，不得不“论功行赏”，把一个山头的好几个军人选进中央政治局，到了这时，它的不正常就可以看出来了。毛泽东在九届一中全会上的讲话中，说到苏联“攻击”我们的“军事、官僚体制”，亦即“军事官僚专政”，认为不值得一驳，“让人家去讲”；到了1970年8月，随着客观情况的变化，想法应该有所改变。军人在绝大多数革委会中起主要作

用，这不仅不再是必要的，而且越来越是多余的。地方党委的决定还要拿到军队党委去讨论，关系就颠倒了。匈牙利巴拉奇·代内什在《邓小平》一书中说：“‘九大’确实突出了军队的地位。1969年选出的中央委员会委员，就其原来的主要工作而言，大部分是军人（之所以只就其‘主要工作’而言，是因为1968年以来，解放军在所有机构的领导工作中起过作用，也就是说，军人兼任文职）。在新的领导机构中，这部分人大大减少。”这种情况，不能不是九届二中全会的一个重要背景。

林彪集团与江青集团的矛盾和争斗正在发展，同床异梦，上文已经说过。这又是一个重要背景。

在设不设国家主席的问题上，呈现复杂的情形。林彪与毛泽东的意见不同，而江青一伙拥护毛泽东的意见。张春桥曾经提出不要把以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思想写上宪法，林彪一伙抓住不放。一贯“紧跟”毛泽东、“主席划圈我划圈”的林彪，何以敢于与毛泽东持不同意见？可能林彪认为必须由他出面推举毛泽东任国家主席，以此还可以打击江青一伙；也可能林彪利令智昏。林彪与叶群之间也可能存在矛盾，因为无法断言叶群的阴谋活动是否为林彪所授意。这也是一个重要背景。

另一个重要背景，是上文说过的：毛泽东有让张春桥接林彪的班的意向，林彪很不满意。

在起草九大政治报告问题上，毛泽东改组起草小组，自然不是毛泽东对林彪满意的表示，林彪也未必不耿耿于怀。张春桥、姚文元起草的报告稿与陈伯达起草的报告稿大相径庭，或多或少地象征着毛泽东与林彪关于九大以后主要任务的想法上的分歧。这也是一个重要情况。

(2) 全会上的明枪暗箭

1970年8月23日至9月6日，九届二中全会召开。出席全会的中央委员155人，候补中央委员100人，共255人。谢振华、王良恩、张耀祠、杨栋梁、文道宏列席全会。毛泽东主持了会议。8月22日，中央政治局常委开会，毛泽东在会上提出了全会的方针：要把这次会议开成一个团结的、胜利的会，不要开分裂的、失败的会。这不是一般化的方针，而是针对两个集团说的。林彪、陈伯达在会上提设国家主席和要毛泽东担任国家主席的问题，再一次受到毛泽东的反对。毛泽东说：谁要当国家主席，就可加上。

8月23日，九届二中全会正式开幕。周恩来宣布了全会的议程：（1）讨论修改宪法问题；（2）讨论国民经济计划问题；（3）讨论战备问题。林彪在开幕会上发表了讲话。林彪对陈伯达说过，他的讲话是请示过毛泽东的。陈伯达1979年7月12日在《关于林彪的补充材料》中说：“散会后（指林彪8月23日的讲话后），我去问林彪事先有没有向毛主席请示，他对我进行欺骗，我信以为真，上了大当。”林彪讲话，与会者一般会认为是全会的安排。他说：“这次我研究了宪法，表现出这样的一种特点，一个是毛主席的伟大领袖、国家元首、最高统帅的这种地位，毛泽东思想作为全国人民的指导思想，这一点非常重要，非常重要。”这里已经把“国家元首”即国家主席强加给毛泽东，而且写下了在“指导思想”上做文章的伏笔。他用唯心主义的“天才”观点颂扬毛泽东，并且影射攻击同意不设国家主席的人说：“毛泽东的这种领导可以说是我们胜利的各种因素中间的决定因素。”“这个领导地位，就成为国内国外除极端的反革命分子以外，不能不承认的。”“我们的工作的前进或后退，是胜利或者

是失败，都取决于毛主席的中央领导地位是巩固还是不巩固。”“胜利以后这20年，特别是在文化革命这个时期以来，继续和更加证明毛主席思想的作用。”“我们说毛主席是天才的，我还是坚持这个观点。”“毛主席个人的这种天分、学问、经验来创造出新的东西来。”康生在开幕会上报告了毛泽东历次对修改宪法的意见和修改宪法的过程。

到会同志大都以为林彪的讲话是代表中共中央致的开幕词，没有强烈反应。叶群在背地里要吴法宪告诉李作鹏、邱会作：要在各组发言，如果你们不发言，林彪讲话就没有根据了；林彪讲话没有点名，你们发言也不要指名；串连空军、海军、总后的一些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在会上发言。这样，对于陈伯达、叶群、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说来，林彪的讲话不啻是个动员令。吴法宪在当晚中央政治局讨论国民经济的会议上提出，要全会第二天听林彪讲话的录音，学习林彪的讲话，得到政治局的同意。陈伯达于8月23日自拟了“国家主席”的宪法条文，又与叶群连夜选编称天才的语录。吴法宪于23日、24日、25日先后同王维国、陈励耘等人说要坚持设国家主席，还于23日打电话给还在北京的黄永胜，传达林彪的讲话。黄永胜按照林彪讲话的口径，讲了起草讲话草稿的要点：拥护林彪的讲话；要指出有人反对在新宪法中写上以毛泽东思想为指针，有人说称天才是“讽刺”，这是反八届十一中全会公报的（十一中全会公报有“毛泽东同志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提法）；长期以来，我们党内有许多情况不正常。

8月24日下午，陈伯达、叶群、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根据林彪23日的讲话，分别在全会的华北组、中南组、西南组、西北组发言。陈伯达在华北组说：“林副主席说，这次宪法中肯定毛主席的伟大领袖、国家元首、最高统帅的地位，肯定毛泽东思想作为全国人民的指导思想。这一点非常重要，非常重要。写

上这一条是经过很多斗争的，可以说是斗争的结果。”“现在竟然有人胡说‘毛泽东同志天才地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提高到一个崭新的阶段’这些话是一种讽刺。”“有人利用毛主席的谦虚，妄图贬低毛泽东思想。”“文化大革命取得了伟大胜利以后，有的人居然怀疑十一中全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公报，这是不是想搞历史的翻案？”“有的反革命分子听说毛主席不当国家主席，欢喜的跳起来了。”叶群在中南组说：“林彪同志在很多会议上都讲了毛主席是最伟大的天才。说毛主席比马克思、列宁知道的多、懂的多。难道这些都要收回吗？坚决不收回，刀搁在脖子上也不收回。”吴法宪在西南组说：“这次讨论修改宪法中，有人竟说毛主席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是个讽刺’。我听了气得发抖。这是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就肯定下来的，林副主席《再版前言》中肯定下来的，怎么能不写？不承认，就是推翻了八届十一中全会的决议，推翻了林副主席的《再版前言》。”“也要警惕和防止有人利用毛主席的伟大谦虚来贬低伟大的毛泽东思想。”吴法宪在小组会上与张春桥唇枪舌剑，大吵了起来。李作鹏在中南组说：“有人在宪法上反对提林副主席。所以党内有股风，是什么风？是反马列主义的风，是反毛主席的风，是反林副主席的风，这股风不能往下吹，有的人想往下吹。”“有人连‘中国人民解放军是毛主席亲自缔造和领导的，林副主席直接指挥的’他都反对，说不符合历史。”邱会作在西北组说：“对毛主席思想态度问题，林副主席说‘毛主席是天才，思想是全面继承、捍卫……’，这次仍然坚持这样观点。为什么在文化大革命胜利、二中全会上还讲这问题，一定有人反对这种说法，有人说天才、创造性发展……是一种讽刺，就是把矛头指向毛主席、林副主席。”与会者不少人出于个人崇拜，真心拥护毛泽东任国家主席，纷纷积极附和。如一位长期在毛泽东身边工作的同

志 24 日下午在华北组说：“我完全拥护林副主席昨天的讲话。”“刚才陈伯达同志的发言，我也同意。这种情况是很严重的。我们党内还有这样的野心家，这是没有刘少奇的刘少奇路线，是刘少奇反动路线的代理人。”“另有一点建议，根据中央办公厅机关和八三四一部队讨论修改宪法时的意见，热烈希望毛主席当国家主席，林副主席当国家副主席。”

在各小组会议上，没有人提出林彪当国家主席。

陈、吴、叶、李、邱的发言，不指名地反对江青一伙。这是有组织的活动。8 月 24 日晚，李作鹏写信给叶群，密商进攻的策略。信的全文是：“叶群同志：今天简报看了一下，是比较抽象的接触了问题，没有更多实质性问题，似可以发，请您再过目。致（至）于我们两人发言的书面材料，可以整理，但在简报上不挂号为机动，你意如何？李作鹏 8 月 24 日。”

由于种种原因，到会的一些人同意陈伯达等人的意见。以华北组为例来说明问题。李雪峰、吴德、解学恭三人签发的、大会秘书处印发的中国共产党九届二中全会第六号简报（华北组第二号简报）（1970 年 8 月 24 日）说：“大家热烈拥护林副主席昨天发表的非常重要、非常好、语重心长的讲话。认为林副主席讲话，对这次九届二中全会具有极大的指导意义。”“大家听了陈伯达同志、××同志在小组会上的发言，感到对林副主席讲话的理解大大加深了。特别是知道了我们党内，竟有人妄图否认伟大领袖毛主席是当代最伟大的天才，表示了最大、最强烈的愤慨，认为在经过了四年文化大革命的今天，党内有这种反动思想的人，这种情况是很严重的，这种人就是野心家、阴谋家，是极端的反动分子，是地地道道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是没有刘少奇的刘少奇反动路线的代理人，是帝修反的走狗，是坏蛋，是反革命分子，应该揪出来示众，应该开除党籍，应该斗倒批臭，应该千刀万剐，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简报说：大家“衷心赞成”

小组会上有人提出的“在宪法上，第二条中增加毛主席是国家主席，林副主席是国家副主席”和“宪法要恢复国家主席一章”的建议。（林彪让秘书把这份简报讲给他听，听后说：“听了那么多简报，数这份有分量，讲到了实质问题。”）

这是尖锐而复杂的斗争。它有紧密关联的两个方面：一方面，叶群秘密指挥夺权。她以为喧嚷一番“天才”论，推举毛泽东担任国家主席，而毛泽东已一再表示不能重新担任，国家主席的职位则非林彪莫属。她还是采用“捧杀”策略，以为如此既可以蛊惑人心，又可以万无一失。但是毛泽东提出不设国家主席的意见，除了他自己不愿重新担任而外，就是不同意由林彪任国家主席。他对于叶群等人在设国家主席问题上不听话非常愤慨，后来在外地巡视时尖锐地批评：“一句就是一句，怎么能顶一万句。不设国家主席，我不当国家主席，我讲了六次，一次就算讲了一句话吧，就是6万句，他们都不听嘛，半句也不顶，等于零。”不设国家主席就是不由林彪任国家主席，这对江青集团有利，因而江青集团坚持不设国家主席的意见，表现为拥护毛泽东的主张。其实，他们坚持这个意见并不代表党和人民的利益，而是为了保住自己的既得利益，并且企图攫取更多更大的权力。另一方面，也许是具有实质性的方面，是林彪集团打击江青集团，争宠于毛泽东。林彪集团以推举毛泽东为国家主席、称毛泽东为“天才”，是为了表明他们忠于毛泽东，用以明里暗里谴责和排斥持不同意见的江青集团。林彪集团对江青集团早有宿怨，此番要整江青集团一下。林彪欣赏华北组第二号简报就是明证。“国家主席”问题掩盖了这个具有实质性的方面。

林彪集团失算了。第一，他们言下之意，是有人反对毛泽东当国家主席；但正是毛泽东本人提出他不当国家主席，也不设国家主席。早在1958年1月，毛泽东就提出不当国家主席。从1970年3月到8月，毛泽东多次讲过不再重新担任国家主席和

不设国家主席的问题。第二，他们说有人反对提毛泽东是“天才”，说“天才”是“讽刺”；但正是毛泽东本人，在八届十二中全会讨论九大党章时，两次圈去新党章草案上的三个状语（即“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当时，有人根据全会一些同志的意见，对毛泽东说，这三个词是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的，新党章不写不好吧？毛泽东指出，党的代表大会，有权修改以前的任何文件。八届十二中全会传达和讨论了毛泽东的意见。九大通过的新党章和政治报告都没有写这个状语，宪法修改草案也没有写这三个词。第三，他们说“毛泽东思想是全国一切工作的指导方针”是经过他们斗争才写入宪法草案的；不写入已成过去，修改宪法小组已在8月12日将这句话写在草案的序言里。8月13日，这句话由序言移至总纲第二条。8月14日，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没有任何争论就通过了。

（3）批判与审查陈伯达

江青一伙相互之间也在串连。8月25日，江青一伙向毛泽东反映了情况，揭露了问题。（这就是毛泽东后来所说的江青“反林有功”的由来。）

怎么办呢？如果小组会继续开下去，由毛泽东任国家主席、由林彪任国家副主席的意见十之八九要占上风，这种局面是毛泽东不希望出现的。如果毛泽东在全会上讲一次话，表明自己的态度，肯定可以使讨论情况改变，但是毛泽东不愿意这么做。上述两办法都为他所不取。8月25日，毛泽东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决定中央全会分组会议立即停止讨论林彪8月23日的讲话，收回刚刚发下，许多人还未看过的华北组第二号简报。（暂时休会，与会者绝大多数人不知道为什么，一些人逛庐山。）

8月26日、27日，周恩来、康生连续同吴、李、邱谈话，

要吴作检讨。吴于28日晚报告了林彪。林彪说：你没有错，不要作检讨。又说：我们这些人搞不过他们，搞文的不行，搞武的行。黄永胜上山后，销毁了他的讲话稿。叶群私自撕下了她在中南组的发言记录。邱会作一再提出，要从会议记录中剪去他的发言记录。8月26日以后，叶群不断打电话安抚吴法宪说：你犯错误不要紧张，还有林彪、黄永胜在嘛！只要不牵扯到他们二人就好办，大锅里有饭，小锅里好办。

8月30日，毛泽东同姚文元等三人谈话。姚文元在他的日记中1970年8月30日这一天记到：“毛主席又同我们三个人谈了话，彻底揭开了这次‘八月逆流’的来龙去脉，分析了阶级斗争的规律，系统地驳斥反马克思主义的、唯心主义的‘天才论’，宣告了他们炮制的那份材料完全破产。同时，也告诫我们，引用了一首诗，我作为座右铭记住。”“三个人”，不知除姚以外另两人是谁。（估计是江青、张春桥。）“那份材料”，就是下文要说到的《恩格斯、列宁、毛主席关于称天才的几段语录》。

8月31日，毛泽东写了《我的一点意见》，在全会印发。印发前给林彪看过。全文如下：

这个材料指《我的一点意见》所附《恩格斯、列宁、毛主席关于称天才的几段语录》（收了七条语录）。林彪过去多次称毛泽东为“天才”，报刊上广为宣传。这一次，陈伯达却因选编了一个称“天才”的材料而获咎。是陈伯达同志搞的，欺骗了不少同志。第一这里没有马克思的话。第二，只找了恩格斯一句话，而“路易·波拿巴特政变记”这部书不是马克思的主要著作。第三，找了列宁的有五条。其中第五条说，要有经过考验、受过专门训练和长期教育，并且彼此能够很多地互相配合的领袖，这里列举了四个条件。别个且不论，就我们中央委员会的同志来说，够条件的不很多。例如，

我跟陈伯达这位天才理论家之间，共事 30 多年，在一些重大问题上就从来没有配合过，更不去说很好的配合。仅举三次庐山会议为例。第一次，他跑到彭德怀那里去了。第二次，讨论工业 70 条，据他自己说，上山几天就下山了，也不知道他为了什么原因下山，下山之后跑到什么地方去了。这一次，他可配合得很好了，采取突然袭击，煽风点火，唯恐天下不乱，大有炸平庐山，停止地球转动之势。我这些话，无非是形容我们的天才理论家的心（是什么心我不知道，大概是良心吧，可决不是野心）的广大而已。至于无产阶级的天下是否会乱，庐山能否炸平，地球是否停转，我看大概不会吧。上过庐山的一位古人说：“杞国无事忧天倾。”我们不要学那位杞国人。最后关于我的话，肯定帮不了他多少忙。我是说主要地不是由于人们的天才，而是由于人们的社会实践。我同林彪同志交换过意见，我们两人一致认为，这个历史家和哲学史家争论不休的问题，即通常所说的，是英雄创造历史，还是奴隶们创造历史，人的知识（才能也属于知识范畴）是先天就有的，还是后天才有的，是唯心论的先验论，还是唯物论的反映论，我们只能站在马、列主义的立场上，而决不能跟陈伯达的谣言和诡辩混在一起。同时我们两人还认为，这个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问题，我们自己还要继续研究，并不认为事情已经研究完结。希望同志们同我们一道采取这种态度，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不要上号称懂得马克思，而实际上根本不懂马克思那样一些人的当。

《我的一点意见》是严厉批判陈伯达的，指出陈伯达有“野心”。为什么要“揪出”陈伯达，陈伯达的“野心”是什么，这些都是可以研究的问题。这篇文章稳住了林彪，而林彪绝不会不

有感于衷。全会同意毛泽东的意见，揭发和批判了陈伯达。

8月31日，叶群、黄永胜召集吴、李、邱布置统一口径，强调山下山上没有联系，在小组会上发言不要牵涉林彪，黄、吴、李、邱只讲自己，互不涉及。8月31日至9月6日晚，黄、吴、叶、李、邱在黄的住处，交谈各组的会议情况。

全会于9月6日基本上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改草案》；通过了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建议：进行必要的筹备工作，在适当的时候召开四届人大；批准了国务院关于全国计划会议和1970年国民经济计划的报告；批准了中央军委关于加强战备工作的报告。

9月6日，九届二中全会闭幕。在闭幕会议上，毛泽东对党的路线教育问题、高级干部的学习问题、党内外团结问题，发表了重要的意见。毛泽东在讲到高级干部读马、列的几本书的问题时说：“现在不读马、列的书了，不读好了，人家（按：指陈伯达）就搬出什么第三版（按：指《恩格斯、列宁、毛主席关于称天才的几段语录》中收了恩格斯为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特政变记》德文第三版写的序言中的话）呀，就照着吹呀，那么，你读过没有？没有读过，就上这些黑秀才的当。有些是红秀才哟。我劝同志们，有阅读能力的读十几本。基本开始嘛，不妨碍工作。”“要读几本哲学史，中国哲学史，欧洲哲学史。一讲读哲学史，那可不得了呀，我今天工作怎么办？其实是有时间的。你不读点，你就不晓得。这次就是因为上当，得到教训嘛，人家是那一个版本，第几版都说了，一问呢？自己没有看过。”毛泽东在讲到庐山会议这场斗争，他们大有炸平庐山，停止地球转动之势时说：“庐山是炸不平的，地球还是照样转。极而言之，无非是有那个味道。我说你把庐山炸平了，我也不听你的。你就代表人民？我是十几年以前就不代表人民了。因为他们认为，代表人民的标志就要当国家主席。我在十几年以前就不当了嘛，岂不是十

几年以来都不代表人民了吗？我说谁想代表人民，你去当嘛，我是不干。你把庐山炸平了，我也不干。你有啥办法呀？”毛泽东在讲到党内外团结问题时说：“不讲团结不好，不讲团结得不到全党的同意，群众也不高兴。”“所谓讲团结是什么呢？当然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之上的团结，不是无原则的团结。提出团结的口号，总是好一些嘛，人多一点嘛。包括我们在座的有一些同志，历来历史上闹别扭的，现在还要闹，我说还可以允许。此种人不可少。你晓得，世界上有这种人，你有啥办法？一定要搞得那么干干净净，就舒服了，就睡得着觉了？我看也不一定。到那时候又是一分为二。党内党外都要团结大多数，事情才干得好。”

周恩来、康生在闭幕会上也讲了话，中央宣布对陈伯达进行审查。

这次全会的公报一反寻常地在9月10日才在《人民日报》上发表。公报对于全会上的斗争只字未提。事实上，与会者的大多数除了知道陈伯达受了批判而外，对于全会上的斗争并不知晓。

(4) 林立果的评价

毛泽东在全会上粉碎了叶群的阴谋，又确实在林彪集团与江青集团的争斗中支持江青集团。毛泽东当然知道，斗争远未结束。

会后不久，林立果同江腾蛟、王维国、陈励耘进行了一次密谈。林立果在密谈中对这次全会作了评价，得出反革命的结论。后来查获了林立果亲笔写的这次密谈的要点。下面是这个谈话要点的原文（文中“歼7”是江腾蛟的代号，“W”是王维国的代号，“C”是陈励耘的代号）：

与歼7、W、C讲

这是一次未来斗争的总预演，演习，拉练。双方阵容都亮了相，陈是斗争中的英雄，吴是狗熊，我方此次，上下好，中间脱节，三是没有一个好的参谋长。

这些老总们（按：指黄、吴、李、邱）政治水平低，平时不学习，到时胸无成竹，没有一个通盘，指挥军事战役可以，指挥政治战役不可以。说明了一点，今后的政治斗争不能靠他们的领导，真正的领导权要掌握在我们手里。

这个谈话要点，充分说明林立果等人不甘心失败，既要同党和人民斗下去，也要与江青集团斗下去。

此后，以林立果为头子的法西斯的“联合舰队”进行了一系列反革命阴谋活动。

（王年一著《大动乱的年代》）

提前召开的党代会：中国 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

在林彪折戟沉沙、葬身异国后，十大不得不提前召开了。年迈的毛泽东在大会闭幕后，竟衰老得站不起来。这是他最后一次出现在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上。他选中王洪文作接班人，赞扬王洪文出身贫农，当过兵，年纪轻，经过工农兵三条战线的考验，又通过十大让王洪文当上中央委员会副主席，并在周恩来患病期间一度让他主持中央日常工作。

1971年9月，林彪反革命集团被粉碎以后，周恩来在毛泽东支持下，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他受命于危难之际，以超人的毅力和卓越的领导才能，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对“文化大革命”的“左”倾错误作了纠正：平反一些冤案，落实党的干部政策和知识分子政策；重申党的各项行之有效的经济政策，加紧整顿国民经济，强调要把工农业生产搞上去；在批林整风运动中力主批判极左思潮。同时，在外交工作方面也打开了新的局面，取得了显著成绩。这些正确的政策和措施，反映和代表了人民群众的愿望。广大干部和群众从“文化大革命”的实践中也汲取了一定的经验教训，对林彪、江青一伙煽起的极左思潮和无政府主义深恶痛绝，对“打倒一切，全面内战”强烈不满，人心思治，渴望安定，他们积极工作，努力生产。因此，在周恩来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1972、1973年间，全国工农业生产逐步回升，各方面的工

作曾一度好转，社会秩序和生产状况都向好的方面发展。在全国各方面工作有所好转的形势下，中共中央决定召开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

为了筹备召开十大，1973年5月20日至31日，在北京举行中央工作会议，确定了关于十大代表的产生办法以及修改党章的原则和方法。按照五月中央工作会议的部署，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各大军区党委和中央直属单位的党组织，都成立了党章修改小组，征求了党内外群众的意见，向中央报送了41份党章修改稿。与此同时，这些党委召开扩大会议，协商选出十大代表1249名，报送中央批准。由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负责起草的《在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草稿）》、《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草稿）》、《中国共产党章程修改草案》都已完成，经过中央政治局7月会议讨论修改，然后于7月上旬报请毛泽东审阅，得到“原则同意”的批示。8月12日至19日，十大代表按所在地区、单位分成34个组就地分别举行预备会议。在预备会议上，大多数代表根据毛泽东的指示，除在文字措词方面提出一些修改意见外，表示同意中央认可的以坚持“文化大革命”的“左”倾错误为基调的3份十大文件草稿。8月20日，中央政治局通过决议，批准中央专案组《关于林彪反党集团反革命罪行的审查报告》，永远开除林彪、陈伯达、叶群、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等8人的党籍。当天晚上至8月23日，由王洪文任主任的十大选举准备委员会开会，通过十大主席团名单草案、第十届中央委员会候选人名单草案。至此，筹备召开十大的文件准备和组织工作的准备都已完成。

中国共产党第十次代表大会，于1973年8月24日至28日在北京举行。出席大会的代表1249人，代表全国2800万党员。大会的议程共有三项：周恩来代表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作政治报告；王洪文代表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作关于修改党章的报

告，并向大会提出《中国共产党章程草案》；选举中国共产党第十屆中央委员会。毛泽东主持了这次大会。

8月24日，大会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大会选举了由148名代表组成的主席团。大会通过毛泽东为主席团主席，周恩来、王洪文、康生、叶剑英、李德生为主席团副主席，张春桥为主席团秘书长。由毛泽东宣布请周恩来同志作报告。周恩来随即向大会宣读报告。报告分为三个部分：关于九大路线；关于粉碎林彪反党集团的胜利；关于形势和任务。报告仍然肯定九大路线、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和政策，强调整个社会主义阶段中始终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强调党内两条路线斗争将长期存在，还会出现10次、20次、30次。实践证明，根据毛泽东坚持“文化大革命”的“左”的错误方针作出的这些论断，都是完全错误的。

但报告中批判林彪反革命集团的内容也有正确的东西。它深刻指出林彪及其一小撮死党是一个“语录不离手，万岁不离口，当面说好话，背后下毒手”的反革命阴谋集团，这实际上也就是指出了林彪是以极左的面目出现的进行反革命活动的两面派。报告指出，粉碎林彪反党集团的胜利，是对国内外阶级敌人的沉重打击。九一三事件以后，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亿万人民进行了认真讨论，对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两面派叛徒、卖国贼林彪及其死党，表示了极大的无产阶级义愤。

报告还分析了国际形势的特点和发展趋势，并阐述了我国正确的对外政策。报告指出，我们仍然处在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当前国际形势的特点，是天下大乱。第三世界的觉醒和壮大是当代国际关系中的一件大事。它在反对超级大国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斗争中加强了团结，在国际事务中起着越来越大的作用。报告强调第三世界同欧洲、北美、大洋洲人民的正义斗争，互相支持，互相鼓舞。国家要独立，民族要解放，人民要革

命，已成为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在报告中，当周恩来讲到“时代没有变，列宁主义的基本原则没有过时，仍然是我们今天指导思想的理论基础”时，毛泽东插话说：“哎，不错。”这是因为毛泽东从林彪事件中记取了教训，他认为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这三个里程碑的提法不妥，不同意林彪把毛泽东思想说成是“在帝国主义走向全面崩溃、社会主义走向全世界胜利的时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发展的顶峰”这一不科学的评价。

大会第二项议程是王洪文向大会作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并宣读了党章修改草案的总纲。修改党章的报告仍然继续九大的“左”倾错误，肯定九大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的正确。王洪文说，党章“修改草案和九大党章比较，主要是充实了两条路线斗争经验的内容”，强调“全党同志都要十分注意路线问题，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加强党的建设，保证党在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的实现”。这就说明了这个党章总纲基本内容的错误。

8月25日至27日，大会分为34个小组进行讨论。在讨论中，许多代表愤怒地声讨了林彪反革命集团的罪行，表示坚决拥护中央8月20日作出的永远开除林彪、陈伯达等党籍的决议。

8月27日下午和晚上，大会主席团和各代表组开会酝酿、讨论新的中央委员会的候选人名单。28日，大会举行第二次全体会议，通过了中央委员会的政治报告和修改党章的报告，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章程》，还选出了195名中央委员和124名候补中央委员，组成了新的中央委员会。

8月30日，中国共产党第十届中央委员会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毛泽东继续当选为中央委员会主席，周恩来、叶剑英、李德生当选为副主席，王洪文、康生也被选为副主席（名列周恩来之后）；朱德、董必武当选为政治局常委，张春桥也名列政治局

常委；韦国清、刘伯承、许世友、华国锋、纪登奎、吴德、汪东兴、陈永贵、陈锡联、李先念等当选为政治局委员，吴桂贤、苏振华、倪志福、赛福鼎四人当选为政治局候补委员。而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则在政治局内结成了以江青为首的“四人帮”反革命集团。

如上所述，十大的筹备和召开是十分仓促和草率的。按照马克思主义党的学说和我们党的传统，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是全党的最高权力机关，它具有审查中央委员会工作、修改党章、选举中央委员会、决定重大问题的权力，它的召开是一项极其严肃的政治任务。因此，需要由党的最高领导机关中央委员会召开全体会议来商讨筹备工作，进行认真准备，精心组织；大会代表应由省、市、自治区党委召开代表大会或代表会议经过充分酝酿、严格审查、民主选举产生。而十大却不是这样，所有代表都是通过所谓“民主协商”，由党委扩大会议选举产生的；在大会召开之前，并未举行九届三中全会，仅在1973年5月召开中央工作会议来研究筹备工作，从5月中央工作会议到8月十大召开，前后不过3个月时间。要在这样短促的时间里完成繁重的各项准备工作，势必草率从事。不仅如此，问题还在于，那时对参与林彪反革命集团阴谋活动的人和事尚未彻底查清，特别是同林彪集团互相勾结、狼狈为奸的康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一伙仍在台上，他们掌管着全党的组织、宣传大权，主宰一切，为所欲为；更为严重的是，紧跟林彪、江青一伙的造反派的头子王洪文已被选作“接班人”调到中央，列席中央政治局会议并参加工作，又被任命为中央党章修改小组负责人、十大选举准备委员会主任，而周恩来却只担任副主任；张春桥、姚文元这两个反革命文痞成了十大文件的起草人。由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一伙来起草文件，修改党章，确定中央领导机构的人选，主持大会秘书处的的工作，这样的党代表大会的根本方向的错误也就不问可知。事实

上，林彪集团的一些骨干分子在他们的庇护下，得以随机应变，未下贼船又上帮车；许多造反起家的人，帮派思想严重的人，打砸抢分子，在“提拔新生力量”的名义掩护下纷纷乘机混入各级领导班子和要害部门，掌握实权。在十大期间，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一伙利用职权，滥施淫威，扼杀民主，使代表们不可能敞开思想，发表意见，行使自己的民主权利。例如，云南组在讨论十大候补中央委员候选人名单时，有的代表不同意朱克家做候选人，张春桥便大肆吹嘘朱克家是上海到云南插队落户、支援边疆建设的知识青年“优秀代表”，强行通过，终于使这个造反派头头当上了十届候补中央委员。十大一反常规，既不设立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也不对代表逐个进行严格的政治审查，完全听凭张春桥、王洪文摆布。在他们操纵把持下，公然践踏党章，把河北省一个还未入党的造反派头头封为十大代表，其理由是这个人“在组织上虽未入党，但在思想上和行动上却早已入党”。非党员竟然可以当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代表，这岂非咄咄怪事！一个出席十大的老干部，在参加四川组讨论时，对“文化大革命”中“戴高帽”、揪斗“走资派”等许多错误做法提出批评，张春桥等便认为这是否定“文化大革命”的异端邪说，立即整成“情况反映”印发，责令这个代表“正确对待文化大革命”，否则“还会犯错误”。在预备会上，海军组、江苏组有些代表认为，在军队中不能开展“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不同意把经常运用“四大”武器写入党章，主张党章应当强调严格保守党和国家的机密；青海组的代表建议在党章中把在“文化大革命”中产生的造反组织“红卫兵”、“红小兵”删去；第四机械工业部的代表认为，“实际生活中没有死不悔改的走资派”，建议在党章中把第四条所作的这一规定删去。王洪文、张春桥对这些正确意见十分恼怒，便以中央党章修改小组的名义印发“通报”，指斥这是“几个值得注意的意见”，对代表们施加压力，压制不同意见，

钳制言论，践踏民主竟至于此！

在这种气氛下召开十大，不可避免地只能是延续九大的“左”倾错误。

反映在指导方针上，十大仍然强调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坚持“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坚持“文化大革命”。十大把“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过七八年又来一次。牛鬼蛇神自己跳出来”，当作所谓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的规律，并且预言党内的两条路线斗争，“还会出现10次、20次、30次”。因此，进行“文化大革命”这样的“政治大革命”，不仅“是完全必要的，是非常及时的”，而且“今后还要进行多次”。十大在“巩固和发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成果”的口号下，重申了“修正主义仍然是当前的主要危险”的“左”倾论点，强调必须开展对“修正主义”的批判和抓紧上层建筑包括各个文化领域的“阶级斗争”。这些理论、路线和政策，都是背离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革命是一个进步阶级推翻一个反动阶级，一种进步的生产关系取代一种反动的、落后的生产关系的暴力行动。在我国，在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建立以后，特别是在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剥削阶级作为阶级已经被打倒、被基本消灭以后，虽然我们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还要为适应生产力发展的要求不断变革和完善，还要正确处理社会上仍将在一定范围内作为残余形态长期存在的阶级斗争，这些仍然属于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的一部分，但是，这种革命的性质和内容已经根本上不同于存在阶级对抗的社会中的革命。无视社会发展和历史条件的这种根本变化，在社会主义社会条件下，在无产阶级专政下，还要继续进行所谓“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政治大革命”，这种所谓“革命”就必然既没有经济基础，也没有政治基础。如果说在事实上剥削阶级已经被消灭的社会主义社会的整

个历史阶段始终存在着作为社会主要矛盾的阶级斗争，是“文化大革命”或“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基础，那末，这种论断本身的逻辑就是自相矛盾的，因此是完全站不住脚的。列宁多次强调指出：“社会主义就是消灭阶级。”如果说在社会主义社会里，阶级和阶级斗争始终存在，那无异于说，这个社会根本就不是社会主义的，也无异于说，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是永远不可能实现的。这种论断的完全不合事实、完全不合逻辑，并且完全背离马克思主义，是显而易见的。“文化大革命”被说成是同修正主义路线或资本主义道路的斗争，这种说法也根本没有事实根据，并且在一系列重大理论和政策问题上混淆了是非。“文化大革命”中被当作修正主义或资本主义批判的许多东西，实际上正是马克思主义原理和社会主义原则，其中很多是我们党和毛泽东自己过去提出和支持过的。这样批判“修正主义”，只能是颠倒是非，混淆敌我。

反映在组织建设上，十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章程》是九大党章的继续。当然，也有一些差别。例如，在总纲中，把九大党章中颂扬林彪的一段谀词，说“林彪同志一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最忠诚、最坚定地执行毛泽东同志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林彪同志是毛泽东同志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完全删除了；原来的第十二条中“高举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突出无产阶级政治”这段明显带有林彪痕迹的语言，也删去了。除此以外，十大党章的内容与基本精神和九大党章并无二致。正如王洪文所承认的：“修改草案的总纲部分，保留了九大党章关于我们党的性质、指导思想、基本纲领、基本路线等规定，结构和内容作了一些调整。条文部分改的不多。”这就是说，一仍其旧，基本未改。例如，用毛泽东论述革命接班人的五项条件来取代八大党章规定的党员十条义务（第三条）；取消党员权利的条文；取消新党员预备期的规定；取消设置中央书记处的规

定；取消设置党的纪律检查机关的规定；规定党的基层组织的基本任务是只抓“阶级斗争”（第十二条），而对党员的教育、监督、管理则语焉不详，对充分发挥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组织党员认真学习科学、文化和业务知识等任务也只字不提。所有这些，十大党章都完全沿袭了九大党章的错误规定。不仅如此，十大党章在“左”倾错误方面还有新的发展，如把“批判修正主义”列为加强党的思想建设的长期任务（第十二条）；规定“反潮流”是一个原则，强调“反潮流”的重要性，要求党员具有“反潮流”的精神。这些都是原来九大党章中所没有的。这样，就便于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等野心家打着“反潮流”的旗号，煽惑鼓噪，蒙骗群众，以售其奸。

迫于粉碎林彪反革命集团以后的形势，并经过周恩来等的努力争取，在第十届中央委员会中，虽然也选进了一些久经考验的、在“文化大革命”中备受打击迫害的老干部，如邓小平、王稼祥、谭震林、乌兰夫、李井泉、李葆华、廖承志、秦基伟等同志，但是，像王洪文这样的造反派头头、野心家居然窃据了党中央副主席的高位，使他和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在中央政治局内结成了以江青为首的“四人帮”，不可一世。他们拉帮结派，以“提拔新生力量”为名，把许多头上长角、身上长刺的“造反派”头头封为十大代表，塞进各级领导班子和要害部门，还把王秀珍、徐景贤、马天水、于会泳、金祖敏、周宏宝、祝家耀、唐岐山、刘湘屏、谢静宜等江青反革命集团的一批亲信和骨干拉入中央委员会，使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势力大为加强，从而能变本加厉地继续制造动乱，祸国殃民。

1972年，在批判林彪反革命集团的过程中，周恩来多次正确地提出要批判极左思潮，指示和支持《人民日报》发表了《无政府主义是假马克思主义骗子的反革命工具》等三篇批判极左思潮的文章。这是1967年1、2月间，谭震林、陈毅、叶剑英、李

富春、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等许多中央领导同志要求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这一正确主张的继续和发展。然而，周恩来的正确主张不但得不到采纳，反而被认为是“右倾回潮”。1973年7月4日，毛泽东在对王洪文、张春桥谈话中，批评周恩来主管的外交部，说：“结论是四句话：大事不讨论，小事天天送。此调不改动，势必搞修正。”这一批评又写入十大报告中：“有不少党委，埋头日常具体的小事，而不注意大事，这是非常危险的。如果不改变，势必走到修正主义道路上去。”当周恩来在十大作报告讲到这段话时，毛泽东连连点头称是，用意是十分清楚的。因此，周恩来在这期间不得不忍辱负重，抱病坚持工作，力求在可能的范围内，克服或减少“文化大革命”的危害，并且力争让坚持党的正确路线和优良传统的那些老同志，尽快地能重新走上领导岗位。正如邓小平在1980年8月下旬会见意大利记者奥琳娜·法拉奇的谈话中所指出的：周恩来“在文化大革命中，他所处的地位十分困难，也说了好多违心的话，做了好多违心的事。但人民原谅他。因为他不做这些事，不说这些话，他自己也保不住。也不能在其中起中和作用，起减少损失的作用。他保护了相当一批人。”也正如陈云所说：“没有周恩来同志，文化大革命的后果不堪设想。他保了很多同志下来，我们这些人就是他保的嘛！”

十大是在粉碎林彪反革命集团以后，由周恩来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全国各方面的工作有了好转的形势下召开的。林彪反革命集团阴谋夺取最高权力、策动反革命武装政变事件的发生，是“文化大革命”推翻党的一系列基本原则和破坏党的优良传统的结果，客观上宣告了“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实践的失败。这次大会的任务，本来应当是因势利导，结束“文化大革命”，总结“文化大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拨乱反正，恢复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制定的路线、方针、政策，使党的工作重新回到马克

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正确轨道上来。遗憾的是，毛泽东并未认识到“文化大革命”这一全局性的、长时间的严重错误，而坚持认为“九大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都是正确的。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领导是正确的”这种错误的结论，促使毛泽东在理论上和实践上继续犯错误。自己选择林彪当自己的接班人，本来是违反民主集中制和集体领导原则的错误作法，甚至可以说，“领导人自己选择自己的接班人，是一种封建主义的作法”。但是，毛泽东并没有从林彪事件中认识到这个重大错误，从而汲取应有的教训。在林彪折戟沉沙、葬身异国以后，他又继续个人一槌定音，选中王洪文作接班人，赞扬王洪文出身贫农，当过兵，年纪轻，经过工农兵三条战线的考验。一个人就决定让他参加中央政治局的工作，把他擢升到周恩来之上，然后又通过十大让王洪文当上党中央副主席，并在周恩来患病期间一度让他主持中央日常工作。这就说明，“毛泽东同志的‘左’倾错误的个人领导实际上取代了党中央的集体领导”，“他的个人专断作风逐步损害党的民主集中制”。事关党和国家命运的大事（如十大代表的选举，文件的起草，党章的修改，中央领导机构人选的确定等），不是经过党中央集体认真讨论决定，而是由他个人决定，或由他指定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等讨论决定，这就不能不被野心家、阴谋家江青、张春桥等所大肆利用，使他们得以有恃无恐地继续作恶。总之，错误的主要来源是“左”的指导思想。在“左”的错误思想指导下，也不可能认真总结经验教训，拨乱反正，改弦更张。结果这次大会只能是沿袭九大的“左”倾错误，未能完成它所担负的给党的工作带来转机的历史使命。

必须指出，毛泽东虽然“重用过”林彪、江青等人，但是，他领导了粉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对江青、张春桥等人也进行过重要的批评和揭露，不让他们夺取最高领导权的野心得逞。毛泽东的错误终究是一个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所犯的 error，他

的错误基本上是思想上认识上的错误。他的过失和他的功绩相比是第二位的。他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为世界被压迫民族的解放和人类进步事业作出了伟大的贡献，是他一生的理论和实践活动的主要的方面，他的功绩远远大于他的过失。

(谭宗级：《十大评述》)

新旧交织：中国共产党 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1977年8月召开的党的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揭批‘四人帮’和动员全党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方面起了积极作用。但是，由于当时历史条件的限制和华国锋同志的错误影响，这次大会没有能够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理论、政策和口号，反而加以肯定。”

中国共产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是在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后10个月的1977年8月召开的。大会宣告“文化大革命”结束，重申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任务，这对于动员群众起了积极作用。但是，这次大会的政治报告仍然肯定“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理论、政策和口号，这就起了严重阻碍拨乱反正的消极作用。党的十一大没能完成从党的指导思想和方针上根本拨乱反正的历史任务。

一、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后的国内政治形势

从党的十大到十一大的四年，是“文化大革命”期间的政治运动接连不停，重大事件连续发生，党和人民在冲破重重困难中前进，并取得粉碎“四人帮”斗争的伟大胜利的年月；又是历史已经进入新时期，开始拨乱反正，但还没有能够从根本上突破毛

泽东晚年错误和“两个凡是”的严重束缚的时期。党的十一大就是在这样复杂的政治形势下召开的。

(一) 江青反革命集团继续作乱和粉碎这个集团斗争的伟大胜利

党的十大使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势力得到加强。十大以后，他们更加紧进行篡党夺权的阴谋活动。1974年初，江青、王洪文等提出开展所谓“批林批孔”运动，他们的矛头是指向周恩来并阴谋篡夺党政领导权的。毛泽东先是批准开展所谓“批林批孔”运动，在发现江青等人借机进行篡权活动以后，又对他们作了批评揭露，宣布他们是“四人帮”，指出江青有当党中央主席和担任后台操纵组阁的野心。1975年1月，党召开了十届二中全会，讨论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准备工作，并选举邓小平为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随即在北京召开了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会上，周恩来在政府工作报告中重申，全国人民的奋斗目标是：“在本世纪内，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使我国国民经济走在世界的前列。”会议接受中共中央的提名，选举朱德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任命周恩来为国务院总理，任命邓小平、华国锋等为国务院副总理，“四人帮”的组阁阴谋归于失败。

四届人大以后，周恩来病重，邓小平在毛泽东支持下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为实现在本世纪内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宏伟目标，他主持召开了工业、农业、交通、科学、国防等方面的一系列重要会议，着手对许多方面的工作进行整顿，使形势有了明显好转。这期间，党和人民同“四人帮”进行了激烈的斗争。毛泽东开始觉察到“文化大革命”犯有“打倒一切，全面内战”的错误，也觉察到江青“积怨甚多”，特别是江青和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四人搞帮派活动的问题。遵照毛泽东的指

示，在邓小平主持下，中央政治局开会批评了江青等人，使“四人帮”稍有收敛，为各项工作的整顿创造了较为有利的条件。1975年春夏秋的全面整顿，成效显著，使全国人民看到了希望。但是，全面整顿的深入开展，实际上是对“文化大革命”的“左”倾错误的系统纠正，这是毛泽东所不能容忍的。1975年11月又发动了所谓“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四人帮”乘机煽风点火，扩大事态，很快把运动推向全国各地。他们硬把1975年党中央采取的各项政策措施说成是“右倾翻案风”，诬蔑“整顿就是复辟”，老干部恢复工作是“还乡团”，胡说什么“四个现代化”就是“资本主义化”。这场所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使邓小平等一批负责同志无法工作，全国因而再度陷入混乱。所谓“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大不得人心，受到广大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的坚决抵制。党心、军心、民心赞成邓小平主持中央工作时期所进行的全面整顿，怀念那时出现的好形势，一心向往着“四个现代化”。

1976年1月，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周恩来逝世。周恩来对党对人民无限忠诚，鞠躬尽瘁，他的逝世引起了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的无限悲痛，纷纷自动进行悼念活动。“四人帮”对广大干部和群众悼念周恩来的活动，进行种种压制和迫害，激起全国人民的义愤和反抗。1976年3、4月间，在全国范围掀起了以天安门事件为代表的悼念周恩来、反对“四人帮”，有千百万群众参加的强大抗议运动。这个运动的实质是拥护以邓小平为代表的党的正确领导，它为后来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奠定了伟大的群众基础。“四人帮”采取卑劣的手段歪曲事实、谎报情况，诬蔑天安门事件是“反革命事件”，邓小平是事件的后台，欺骗党中央和毛泽东，以致中央政治局和毛泽东对天安门事件的性质作出了错误的判断，并且错误地撤销了邓小平的党内外一切职务。1976年9月，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

无产阶级革命家和战略家、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与世长辞，全党、全军、全国人民极度悲痛。“四人帮”却认为有机可乘，加紧了夺取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的罪恶活动，这就使党不可能用党内斗争的方法来解决同他们的矛盾。10月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执行党和人民的意志，对江青反革命集团采取断然措施，实行隔离审查，取得了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的伟大胜利，结束了“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内乱，使我国进入了新的历史发展时期。

（二）揭发批判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斗争 党在纠正“左”倾错误过程中遇到严重阻碍

1976年10月胜利之后，党和国家面临着“文化大革命”十年内乱带来的严重困难局面。为迅速扭转困难局面，实现全国安定团结，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党中央号召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团结一致，深入揭批江青反革命集团，全国迅速掀起了揭批江青反革命集团的群众运动。广大党员、干部和群众，奋起揭批江青反革命集团篡党夺权的阴谋活动和罪恶历史，清查他们的反革命帮派体系。在揭批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同时，部分地开始了国家组织的整顿，以及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的工作。这个时期，对“文化大革命”造成的冤假错案的平反工作，也开始部分地进行了。揭批江青反革命集团取得的初步胜利，使全国开始出现比较安定的局面，促进了工农业生产的恢复，教育科学文化工作也逐渐走向正常。

随着揭批江青反革命集团斗争的开展，党内外同志逐渐认识到了江青反革命集团所以能够倒行逆施，条件之一是利用了“文化大革命”的“左”倾错误，因此，越来越强烈地要求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但是，这种正当要求却遇到了严重的阻碍。当时担任党中央主席的华国锋推行“两个凡是”（即“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要坚决拥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要始终不渝地遵循”）的错误方针，在许多方面延续“文化大革

命”中的“左”倾错误，阻碍拨乱反正。1976年10月26日，华国锋听了宣传部门的汇报后就指示，“目前主要是批‘四人帮’，也要批邓，一定要注意，毛主席批准过的、讲过的不能批”。1977年2月，华国锋要写作班子把“两个凡是”的内容写在为他准备的一个讲话提纲中。后来汪东兴提出写社论，于是又在华国锋错误思想指导下，发表了1977年2月7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的社论《学好文件抓住纲》，公开要求把“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推行到全国去。在“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指导下，不但“文化大革命”中被打倒的以邓小平为代表的许多老干部不能恢复工作，旧的大量冤假错案不能平反，而且为了压制广大党员和人民对拨乱反正的强烈要求，在有些地方和部门又制造了一些新的冤案，给党纠正“文化大革命”的“左”倾错误设置了严重的障碍。华国锋不仅继续维护旧的个人崇拜，还制造和接受对他自己的个人崇拜。党内外群众对此极为不满。

1977年3月，党中央召开工作会议，初步总结了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以来的工作，并部署了当年的工作任务。会上，华国锋在讲话中继续宣扬“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强调必须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肯定“文化大革命”完全必要，说什么“天安门事件是反革命事件”，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以后中央确定继续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是正确的，是经过反复考虑的。为了论证继续批邓的“必要性”，阻挠邓小平出来工作，他以李冬民假案^①为借口，硬说：

^① 1977年1月，李冬民与十多个青年在北京长安街刷大标语，要求邓小平出来工作，为天安门事件平反。当时北京市委领导人决定，于2月25日逮捕了李冬民，搞了个伪证，说李冬民的目的是“抬邓、反华、保王洪文”。这是一个冤案，后来平反了。

“现已查获，有那么一小撮反革命分子，他们的反革命策略是，先打着让邓小平出来工作的旗号，迫使中央表态，保王洪文上台，为‘四人帮’翻案。”以压制那些敢于公开呼吁让邓小平出来工作的同志。华国锋在1977年3月党中央工作会议上的长篇讲话，是他在许多方面延续“文化大革命”“左”倾错误的一次比较全面的表现。

华国锋推行“左”倾错误方针，遇到党内广大同志的抵制。早在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后不久，叶剑英、李先念就多次向华国锋提出要邓小平出来工作，华国锋不同意。在1977年3月的党中央工作会议上，陈云又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他说：为了中国革命、中国党的需要，让邓小平重新参加领导工作是完全正确的，完全必要的。同时提出查一查“四人帮”在天安门事件上的诡计。王震在会上尖锐指出：现在全党全军全国人民都热切希望邓小平早日出来参加领导工作。天安门事件是我们民族的骄傲，是全国人民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觉悟大大提高的集中表现，谁不承认天安门事件的本质和主流，实际是替“四人帮”辩护。华国锋对陈云、王震的正确意见非但不接受，而且不让会议简报刊登他们的发言。但是，与会的大多数支持陈云、王震的意见，许多老同志坚持原则斗争，揭开了拨乱反正的真正序幕。

1977年3月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以后，于3月2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向全党发出关于提前召开党的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文件。文件发出后，各级党组织即按照文件要求，为提前召开党的十一大积极作了准备。

（三）党的十届三中全会，关于提前召开党的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决定

在揭发批判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斗争获得一定进展的形势下，1977年7月，中国共产党在北京召开了十届三中全会。全会通过了《关于追认华国锋同志任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中国

共产党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的决议》、《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职务的决议》、《关于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的决议》。

全会在《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职务的决议》中指出，1977年5月3日中央转发的邓小平致党中央的两封信，受到全党同志的赞同。全会根据党内外同志的强烈要求，一致决定恢复邓小平中共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的职务。

全会在《关于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的决议》中指出，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是一个反革命的阴谋集团，他们阴谋推翻党中央，实行反革命复辟，妄图使我们的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法西斯专政，使社会主义的中国重新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全会对“四人帮”反共反人民反革命的罪行，表示极大的革命义愤。根据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的要求，根据党章规定，一致决议：永远开除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的党籍，撤销其党内外一切职务。

全会完全同意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提前召开中国共产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决定。全会指出，为了从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清除“四人帮”的余毒，加强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的大团结，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把毛主席交给我们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迅速推向前进，提前召开党的十一大是适宜的。全会一致通过党的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议程，讨论并基本通过第十届中央委员会的政治报告、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和党章修改草案。全会决定在1977年的适当时候召开党的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十届三中全会对当时揭批江青反革命集团和拨乱反正起了积极作用。但是，全会在华国锋坚持“两个凡是”的方针指导下，仍然沿袭了“文化大革命”中所谓“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和“坚

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等“左”倾错误理论，这些错误也反映在为党的十一大准备的文件中。会议通过的《关于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的决议》，认为“四人帮”推行的是一条极右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要求人们去批极右实质，而不去批极“左”。针对上述情况，邓小平在会上讲了话。他强调要对毛泽东思想体系有一个完整的准确的认识，要善于学习、掌握和运用毛泽东思想的体系，来指导我们的各项工作。只有这样，才不至于割裂、歪曲毛泽东思想，损害毛泽东思想。他指出，毛泽东倡导的作风，群众路线和实事求是这两条是最根本的东西。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党的十一大的召开作了准备。

二、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的简况

中国共产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于1977年8月12日至18日在北京举行。

代表大会正式开幕之前，于8月11日召开了预备会议。预备会议由华国锋主持。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陈锡联、纪登奎、汪东兴、吴德、许世友、韦国清、陈永贵、李德生、吴桂贤、苏振华、倪志福、赛福鼎出席了会议。应到会代表1510名，刘伯承等8位同志因病因事请假，实到代表1502名。

在预备会上，首先由华国锋就党的十一大的准备工作，大会主席团以及大会秘书处、各代表团的组成，大会的议程和开法等问题讲了话。

华国锋说，党的十一大明天就要开幕了，今天先开个预备会议。我们党的这次代表大会，是在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逝世以后，在我党取得了粉碎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的伟大胜利的形势下提前召开的。我们这次代表大会担负着重大的历史使命。

华国锋说，现在，我主要讲讲今天的预备会议要解决的几个问题和有关情况。

第一个问题，关于大会的准备工作情况。自从今年3月中央决定提前召开党的十一大，下发了中共中央1977年11号文件以后，各级党委都认真地向全党同志作了传达动员，紧张地进行了准备工作，主要是选举出席十一大的代表。5个月来，全党全军全国各条战线进一步开展揭批“四人帮”的伟大斗争，清查了和“四人帮”反党阴谋活动有牵连的人和事。在此基础上，各省、市、自治区，人民解放军和中央党政机关，都按照中央1977年11号文件的规定，召开党委、党的核心小组的领导小组扩大会议，正式选举产生了出席十一大的代表。

7月中旬，党召开了十届三中全会，讨论并通过了关于人事和组织方面的三个决议，讨论并基本通过了中央委员会的政治报告、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和党章修改草案，为十一大的召开做好了准备。

第二个问题，关于大会主席团、大会秘书处和代表团的组成。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是党的最高权力机关，大会主席团领导大会的进行。因此，选举主席团是一项极为严肃的事情。经中央政治局讨论，提出了一个223名的主席团名单，其中有主席团主席1名，副主席4名，秘书长1名。

第三个问题，关于大会的议程和开法。

党的十一大的议程，就是十届三中全会通过的议程。这次大会准备开7天，十一届一中全会开1天，加上今天的预备会议，共9天。

华国锋讲话中提到的223名主席团名单，主席团主席、副主席和秘书长，在预备会上进行了表决。代表们通过了223名主席团名单，选举华国锋为主席团主席，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汪东兴为主席团副主席，汪东兴兼主席团秘书长。预备会议还对

华国锋讲话提到的会议议程进行了表决，通过了十届三中全会提出的这次大会的三项议程：

- (一) 中央委员会的政治报告；
- (二) 修改中国共产党章程和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
- (三) 选举中央委员会。

接着，汪东兴作关于代表资格的审查报告。他说，党的十一大代表的协商选举工作，是根据1977年3月21日《中共中央关于召开党的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决定》进行的。中发〔1977〕11号文件规定，十一大代表名额为1500名。在协商选举过程中，根据需要，中央政治局确定，增加10名代表名额，总数为1510名。经审查，1510名代表，符合中央规定的代表条件，所有代表资格有效。

预备会议通过了汪东兴作的代表资格审查报告。

11日下午5时，党的十一大主席团举行第一次会议。会议由华国锋主持。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汪东兴出席了会议。主席团成员到会221名，通过了党的十一大的日程。

代表大会于8月12日正式开幕，华国锋代表第十届中央委员会向大会作政治报告。政治报告讲了这次代表大会担负的重大历史责任，我们党的第十一次路线斗争（当时还用第十一次路线斗争的提法。这个提法不科学，现在已不使用。那时讲的第十一次路线斗争，是指党与“四人帮”的斗争），形势和任务，结束语等几部分内容。

华国锋报告后，代表们分组进行了讨论。讨论中，围绕华国锋的政治报告，许多代表联系本单位的实际，以大量的事实揭批了“四人帮”篡党夺权的阴谋活动，批判了他们炮制的“老干部是民主派、民主派就是走资派”的反革命谬论，揭批了他们策动反革命武装叛乱的罪行。有些代表还分析了“四人帮”为什么作恶时间那么长以及应吸取的教训。他们说，“四人帮”所以能够

长期作恶，第一、由于他们采取了欺骗政策，大搞反革命两面手法，全面篡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搞乱了人们的思想。第二、他们采取恐怖政策，动不动就扣大帽子，就抓人，实行镇压。“四人帮”从各方面进行破坏，最严重的是破坏了党，篡改党的理论基础，摧残党的队伍，毁坏党的作风，妄图改变党的性质。因此，党一定要认真学好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认真恢复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健全党和国家的政治生活。

与会代表一致认为，“四人帮”作恶多端，人心丧尽，他们的灭亡是历史的必然。大家完全赞同党中央为粉碎“四人帮”所采取的一系列措施，完全赞同十一届三中全会关于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的决议。代表们还谈到“四人帮”被打倒了，但是批判他们的反革命谬论，清查他们的反革命帮派体系，肃清其流毒和影响还是艰巨的任务。党必须继续领导人民，把这一场斗争进行到底。

在讨论政治报告中，代表们还对其中的错误观点提出了许多批评意见，对一些内容提出了修改意见。

8月13日，代表大会举行第二次全体会议。叶剑英代表第十届中央委员会向大会作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叶剑英在报告中，对中国共产党章程修改草案，从八个方面做了说明，即：关于高举和捍卫毛泽东的伟大旗帜问题；关于党的性质和指导思想问题；关于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纲领和党的基本任务问题；关于“三要三不要”的基本原则问题；关于党的民主集中制问题；关于党的干部路线问题；关于保持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问题；关于对党员和党的基层组织的要求问题。

叶剑英报告后，代表们于8月14日至17日分组讨论叶剑英的报告和党章修改草案。代表们说，十一大党章对原十大党章在不少方面进行修改是必要的。他们还对提交大会的党章修改草案进一步提了一些意见。代表们赞扬了叶剑英、邓小平跟随毛主席

南征北战，在与林彪、“四人帮”斗争中站在毛主席一边，指出叶剑英在粉碎“四人帮”斗争中作出了重大贡献，给全党作出了榜样。

8月18日，代表大会举行第三次全体会议。会议通过了华国锋的政治报告，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会议通过了叶剑英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章程。代表们还以无记名投票的方式选出了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当选的中央委员共有201人；候补中央委员有132人。

最后，邓小平致闭幕词。他强调，我们一定要恢复和发扬毛泽东为我们党树立的群众路线的优良传统和作风，真正相信和依靠群众，细心倾听群众呼声，关心群众疾苦，一刻也不脱离群众。我们有这样好的人民，这样好的党员和干部，他们勤劳勇敢，党悟很高，非常关心国家大事，无限信任我们党。这是我们党战胜一切困难，在各方面夺取新的伟大胜利的最可靠的保证。

我们一定要恢复和发扬毛泽东为我们党树立的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做老实人，讲老实话，办老实事，这是一个共产党员的起码标准。一定要言行一致，理论与实践密切结合，反对华而不实和任何的虚夸，少说空话，多做工作，扎扎实实，埋头苦干。

我们一定要恢复和发扬毛泽东为我们党树立的批评和自我批评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在党内和整个人民内部，认真实行“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的原则，实行团结——批评——团结的方针。

我们一定要恢复和发扬毛泽东为我们党树立的谦虚谨慎，戒骄戒躁，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全心全意地为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服务。

我们一定要恢复和发扬毛泽东为我们党树立的民主集中制的

优良传统和作风，在全党、全军、全国努力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

8月19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举行了第一次全体会议。会议选举了中央机构。

十一届一中全会，选举华国锋为中央委员会主席，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汪东兴为中央委员会副主席。

全会选出的中央政治局委员有：华国锋、（以下按姓氏笔划为序）韦国清、乌兰夫、方毅、邓小平、叶剑英、刘伯承、许世友、纪登奎、苏振华、李先念、李德生、吴德、余秋里、汪东兴、张廷发、陈永贵、陈锡联、耿飏、聂荣臻、倪志福、徐向前、彭冲。

全会选出的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有：（按姓氏笔划为序）陈慕华（女）、赵紫阳、赛福鼎。

全会选出的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有：华国锋、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汪东兴。

三、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内容特点

这次代表大会通过的主要议程是华国锋的政治报告。报告阐述的内容，既有积极的正确的方面，又有消极的错误的方面。

华国锋的政治报告，在阐述这次代表大会担负的重大历史责任时，重申全党要为在本世纪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伟大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而奋斗。

政治报告总结了党同“四人帮”的斗争。指出早在“文化大革命”初期，“四人帮”就同林彪反党集团相勾结进行破坏活动。林彪反党集团被粉碎以后，“四人帮”又继承林彪的衣钵变本加厉地进行破坏活动。他们是一个反革命的阴谋集团，根本反对

“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的基本原则，搞修正主义，搞分裂，搞阴谋诡计。他们使用种种阴谋手法，反对毛主席和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反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妄图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使社会主义的中国重新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报告说，我们的毛主席英明伟大，对“四人帮”多次提出严肃的批评和严厉的警告，亲自领导我们党对他们进行反复的斗争。毛主席逝世，“四人帮”以为时机已到，急于发难，迫不及待地要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权。在这个万分危急的时刻，党中央政治局才采取果断措施，粉碎了“四人帮”篡党夺权的阴谋。报告宣布，以粉碎“四人帮”为标志，我国第一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结束了。

报告分析了粉碎“四人帮”以后的形势和任务，指出第一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结束，使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党在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内有八项战斗任务：第一、一定要把揭批“四人帮”的伟大斗争进行到底。第二、一定要搞好整党整风，加强党的建设。第三、一定要把党的各级领导班子整顿好、建设好。第四、一定要抓革命促生产，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第五、一定要搞好文化教育领域的革命，大力发展社会主义的文化教育事业。第六、一定要强化人民的国家机器。第七、一定要发扬民主，健全民主集中制。第八，一定要贯彻执行统筹兼顾、全面安排的方针。

华国锋的政治报告，在揭批“四人帮”、宣告“文化大革命”结束和动员全党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方面起了积极作用。但是，报告错误地肯定“文化大革命”期间召开的党的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认为其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都是“正确的”。报告以大量的篇幅高度肯定“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理论、政策和口号，表示继续沿着“文化大革命”的轨道前进。华国锋的政治报告的

重要特点是，既要批判“文化大革命”中长期作乱的“四人帮”，重申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目标，又不纠正“文化大革命”的“左”倾错误，而且要肯定毛泽东晚年提出的错误理论、政策和口号，为不能辩护的事辩护。这就必然给全党纠正“左”倾错误的拨乱反正设置障碍，危害党的事业。

华国锋的政治报告，在许多方面继续坚持毛泽东晚年的错误，把“左”倾错误的集中表现，即所谓“党的基本路线”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规定为这次代表大会的指导方针，把继续坚持这些错误理论和口号作为大会担负的重大历史责任；在论述八项战斗任何中，强调以两个阶级、两条道路斗争为纲。这些都是“文化大革命”时期搞阶级斗争扩大化的特有理论、政策和口号的延续。

政治报告错误地对“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给了极高的评价，说这一理论“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的思想，揭示了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规律”，“指明了无产阶级革命胜利的国家，如何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建设社会主义的根本道路”；还说什么“这是当代马克思主义最重要的成果”。

政治报告肯定这个理论所说的“在社会主义这个历史阶段中，始终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因此，在这个历史阶段中，必须坚持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斗争，坚持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专政，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

政治报告认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提出了同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作斗争的完整学说”。这个理论指出，“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这个矛盾必然反映

到执政的共产党内，这样就会产生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指的就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他们“是复辟资本主义的主要危险”。报告又说，解决这个主要矛盾和消除这个主要危险，必须搞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文化大革命”。

政治报告高度赞扬造成十年内乱的“文化大革命”，“对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建设社会主义，是完全必要的，是非常及时的”。说“我国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必将作为无产阶级专政历史上的伟大创举而载入史册，随着历史的前进，越发显示它的灿烂光辉”。报告还说明：“安定团结不是不要阶级斗争。第一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结束，决不是阶级斗争的结束，决不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结束，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始终存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个阶级的斗争，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这种斗争是长时期的，曲折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报告的结论是：“文化大革命这种性质的政治大革命今后还要进行多次。”这样，政治报告就要求全党继续按照“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理论、政策和口号去行动。这是非常错误的，是十分有害的。

叶剑英作的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和提交大会审议的《中国共产党章程》，是代表大会的另一项主要议程。叶剑英在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中指出，我们党只有以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作为自己的指导思想和理论基础，才能保持无产阶级先锋队的性质。新党章强调全党一定要永远高举和坚决捍卫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旗帜，保证我们党的事业继续沿着马克思主义路线胜利前进，这是关系党的事业成败的关键问题。

叶剑英的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还指出，新党章把“在本世纪内，党要领导全国各族人民把我国建设成为农业、工业、国

防和科学技术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的目标写进总纲，是有重要意义的。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必须加强党的建设。要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反对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世界观；要健全民主集中制，充分发扬民主，决不允许任何人压制批评和打击报复，同时又要强调在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加强党的纪律；为了维护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和党的纪律，新党章规定设立纪律检查委员会。

叶剑英的报告还特别指出，新党章要求全党保持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和优良作风。这主要是：保持和发扬群众路线、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保持和发扬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和自我批评的作风，保持和发扬谦虚谨慎、不骄不躁、艰苦奋斗的作风，防止党员，特别是党的领导干部利用职权谋取任何特权，同资产阶级思想和作风作坚决的斗争。

党章修改草案报告的上述说明是积极的、正确的。但是，这个报告在某些方面也沿袭了“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和“坚持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的错误提法。提交大会审议的党章修改草案，虽然对十大的党章作了修改，但是还没能从根本上纠正十大党章中的许多“左”倾错误。这就必然给党的建设带来不利的影晌。

代表大会的第三项议程是选举中央委员会。十一大选出的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和十一届一中全会选出的中央领导机构，也有两方面的情况。一方面，在广大党员和与会代表的热烈拥护下，把以邓小平、叶剑英、李先念为代表的坚决与“四人帮”斗争，坚持党的正确路线的同志选进中央领导机构。另一方面，也把有些与“四人帮”斗争并不坚决，而积极推行“文化大革命”的“左”倾错误的人选进了中央领导机构。相反，有相当一部分坚持与“四人帮”斗争，坚持党的正确路线的老同志本应选进中央领导机构的，却没有被选进中央政治局或中央委员会。在十一大

开会时和会后，邓小平、李先念曾多次提议选陈云进中央政治局，许多代表和中央委员拥护邓小平、李先念的提议。但是，因为华国锋不表示支持和同意，因而这个提议未能实现。这表明，党的十一大和十一届一中全会在解决组织问题上，也有其积极方面和消极方面。十一大没有能实现组织路线的拨乱反正。

党的十一大的三项主要内容的积极方面和消极方面，都是当时历史条件下的产物。十一大没能完成的拨乱反正任务，后来由十一届三中全会到十二大，经全党的努力完成了。

四、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没能纠正 “文化大革命”的“左”倾错误的原因

（一）客观上是由于当时历史条件的限制

这种限制表现在：第一、党的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时，粉碎“四人帮”仅仅十个月。消除长期“左”倾错误的影响，特别是十年“文化大革命”所造成的政治上思想上的混乱，需要有一个过程。不少同志一时尚难于分清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左”倾错误理论的界限，还不能从根本上看出“文化大革命”的理论、政策和口号的错误所在。第二、过去盛行的个人崇拜和教条主义的精神枷锁，还严重束缚着党内许多人的头脑。人们习惯地认为，凡是毛泽东说过的和做过的，从大的方面来看，都是正确的，毋庸置疑。因而，不能以实践为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去判明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看不出毛泽东晚年的失误，还做不到像后来十一届六中全会那样，根据“文化大革命”十年内乱的实践结果，科学地分析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指导思想错误以及带来的严重后果。第三、一些老革命家和老同志，虽然较早地看出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左”倾错误及其严重后果，但是这些同志当时或者还没有被解放出来，对

这种涉及全党大是大非的问题得不到发言的机会；或者虽然解放了，参加了领导工作，可是在当时的条件下，他们的意见对于中央的决策不起主导作用。譬如，老一辈革命家陈云、邓颖超等那时还未参加中央政治局的领导工作；邓小平刚刚解放出来，他的正确意见往往不为华国锋所重视和采纳；叶剑英、李先念虽然处于政治局领导成员的地位，但在华国锋、汪东兴起主导作用的情况下，也难以发挥其应有的作用。这些“文化大革命”带来的党中央领导不健全、政治生活不正常的情况，妨碍党的民主集中制和集体领导原则的贯彻，是党的十一大没能纠正“文化大革命”错误的一个客观原因。

（二）从主观指导来说，主要是由于当时担任党中央主席的华国锋，继续推行“左”倾理论和政策的后果

华国锋虽然执行中央政治局的集体决策，在粉碎“四人帮”的斗争中作出了贡献，但他的指导思想，基本上是继承和延续了毛泽东晚年的“左”倾思想。因此，从拨乱反正一开始，华国锋就违背党和人民的意愿，力图全面继承“文化大革命”的理论、政策和口号，阻挠党内外同志为纠正“文化大革命”错误所进行的种种努力。当时客观需要的拨乱反正，不仅包括拨林彪、“四人帮”之乱，而且要纠正毛泽东搞“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纠正“三大改造”以后“左”的错误。可是，华国锋出于自己的政治需要，不但不同党和人民一道去进行这种拨乱反正，反而推行并迟迟不改正“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阻碍拨乱反正。他推行“两个凡是”，并不是要把毛泽东曾经长期坚持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方针发扬光大，而是要把毛泽东晚年的失误，主要是搞“文化大革命”的严重“左”倾错误全盘延续下来。华国锋在政治上搞三个坚持，即在我国剥削阶级作为阶级已经被消灭的形势下，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坚持“文化大革命”今后还要进行多次。华国锋拖延和阻挠恢复老干

部工作和平反历史上冤假错案（包括“天安门事件”）的进程，也是拒绝纠正并延续“文化大革命”及其以前的“左”倾错误的一种表现。

华国锋作为党中央主席，不能站在全党的前头，引导党和人民在深入揭批“四人帮”的运动中进一步纠正“文化大革命”的“左”倾错误，反而阻挠人们拨乱反正，这就不能不给当时召开的党的十一大带来严重不良影响。事实上，华国锋在十一大的会前和会上，都以他的错误指导思想阻碍全党纠正“文化大革命”的“左”倾错误，这同党的十一大没能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理论、政策和口号，是密切相关的。

在党的十一大召开前，按照华国锋的指导思想起草的政治报告原稿，曾给邓小平看过。当时邓小平还没出来工作，他对许多问题的提法、论述，提了不同意见。譬如，原稿中讲了关于党内走资派问题、关于资产阶级法权问题、关于唯生产力论问题、关于无产阶级在各个文化领域专政问题等，其中有些是坚持毛泽东晚年的一些错误论点，有些是重复张春桥的谬论。邓小平认为这些错误论点应当拿掉。但华国锋仍然坚持党内有“走资派”、“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的观点。在他看来，中国共产党内从上到下存在一批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他们是“复辟资本主义的主要危险”，是革命要打击的重点对象。华国锋还坚持“无产阶级在上层建筑其中包括在各个文化领域的专政”的提法，这是延续了又一个“左”倾错误论点，同张春桥的全面专政论大有相似之处。

在党的十一大的会上，有相当数量的代表，特别是老同志，对华国锋报告的错误观点和他工作中的问题提出批评意见。这些批评意见，归纳起来有以下几点：

第一、许多代表说，政治报告讲在社会主义的整个历史阶段始终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这种“始终存在”的观

点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随之报告又说，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都要加强无产阶级在各个方面的专政，这在理论上也说不通。

第二、许多代表说，政治报告中关于“巩固和加强无产阶级在上层建筑其中包括在各个文化领域的专政”的观点，是不科学的。有些属于上层建筑范畴中的问题，如宗教、资产阶级世界观等等，只能用批评和说服的办法，而不能用压制的、专政的办法去解决。

第三、许多代表说，政治报告对“文化大革命”采取的全盘肯定、高度赞扬的说法，是不符合“文化大革命”的客观实际的。毛泽东讲过，“文化大革命”犯有“打倒一切、全面内战”的错误，报告否认“文化大革命”有错误，既不符合实际，也不符合毛泽东的说法，应当实事求是地阐明运动的全过程。只有客观地承认“文化大革命”中的错误，才能吸取深刻的经验教训。

第四、许多代表说，过去的中央政治局在同“四人帮”的斗争中，有些同志没有表现出坚决捍卫毛泽东思想、捍卫党的正确路线的精神，是有负全党期望的。特别是在粉碎“四人帮”以后，有的政治局委员当群众贴大字报批评他在“文化大革命”中的错误时，竟然让下面以“反革命罪”把批评他的人抓起来，这是完全错误的。这次党代表大会，应当十分重视和解决这些问题。

第五、聂荣臻针对政治报告存在沿袭“文化大革命”的理论、政策和口号的错误，作了系统的书面发言，着重讲了必须坚持党的实事求是、群众路线和民主集中制的优良传统和作风问题。聂荣臻讲的这几个重要问题，原来是邓小平准备在代表大会上讲的，因为邓小平要致闭幕词，就由聂荣臻同志讲了。它表明了老同志坚持原则，反对全盘肯定“文化大革命”，不赞成延续“文化大革命”的理论、政策和口号的原则态度。

尽管十一大的会上，代表们提出这样多的正确的批评意见，但是，华国锋没有接受这些意见，在政治报告定稿时仍然坚持他的一套错误看法，排除了依靠大会代表的集体智慧纠正政治报告中一些重大的错误的可能性。

但是党心民愿不可违，拨乱反正的历史潮流任何人都阻挡不住。在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带动和支持下，经过艰巨的斗争，终于突破了各种障碍和束缚，只经过一年多的时间，就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实现了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转折。正如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所指出：“1977年8月召开的党的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揭批‘四人帮’和动员全党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方面起了积极作用。但是，由于当时历史条件的限制和华国锋同志的错误的影响，这次大会没有能够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理论、政策和口号，反而加以肯定。”这个评价是完全正确的。

（王洪模：《中国共产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决定命运的 36 天：1978 年中央工作会议

这次中央工作会议开了 36 天。华国锋宣布的议题是讨论经济问题，陈云发言改变了整个会议的进程。经过艰难的斗争，天安门事件在会上终于得以平反。华国锋、汪东兴不得不在会上承认“两个凡是”错了。邓小平在闭幕式上发表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著名讲话，实际上成为随后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主题报告。

1978 年 11 月 10 日起，中央工作会议在北京京西宾馆举行。参加这次会议的代表共 212 人，都是中央各部委、各省市自治区、各军兵种、各大军区的第一、二把手，其中有的是中央委员，也有的不是中央委员。会议分为 6 个组，即东北组、华北组、西北组、西南组、中南组和华东组。

11 月 10 日下午，中央工作会议正式开幕，华国锋主持会议并发表讲话。他代表中央政治局宣布这次会议的议题主要有 3 项：

一、讨论如何进一步贯彻执行以农业为基础的方针，尽快把农业生产搞上去的问题。会上要印发两个文件，一个是《关于加快农业发展速度的决定》的讨论稿，一个是《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试行草案）》的讨论稿。

二、商定 1979、1980 两年国民经济计划的安排。关于这个问题，全国计划会议已经进行了讨论，并且为这次工作会议准备

了一个文件，也要发给大家。

三、讨论李先念在国务院务虚会上的讲话。

华国锋同时宣布了中央政治局的一个决定：在讨论上面这些议题之前，先讨论一个问题，这就是：要在新时期总路线和总任务的指引下，从1979年1月起，把全党工作的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动员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同心同德，鼓足干劲，全力以赴，为加快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而奋斗。这是一个关系全局的问题，是这次会议的中心思想。

我们提出全党工作着重点转移的问题，是鉴于揭批“四人帮”的群众运动到了胜利结束的时候，同时又是鉴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严重任务摆在我们面前，迫切要求我们把全党全军全国人民的注意力集中到这上面来。

由于绝大多数与会者的意志，会议没有按预定计划进行，实际上主要集中讨论的是：一些重大的历史遗留问题，对几个中央负责同志的批评意见，关于真理标准讨论的问题，关于中央人事的调整问题。

会议气氛热烈、活跃，代表们真正做到了畅所欲言，会议的简报也是很快打破了种种框框，基本上做到了有闻必录，及时详尽，会议越开越活跃，真正发扬了党内民主，体现了全党的集体意志，讨论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解决了不少重大问题。

会议原准备开20多天，结束后隔一段时间再开十一届三中全会。但是，由于情况发生了变化，会议的时间一再延长，12月13日闭幕会后还开了两天，到12月15日结束，实际开了36天。36天内，中央工作会议以分组讨论的时间居多，也有一些集中，开全体会议。

揭盖子与解决历史遗留问题

11月12日，陈云在东北组发言，提出坚持有错必纠的方针，有力地揭开了被华国锋、汪东兴等捂着的盖子，改变了整个工作会议的进程。这就是以《坚持有错必纠的方针》为题，收入《陈云文选》的那篇讲话。

陈云说：

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政治局一致主张，从明年起把工作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建设上来。实现四个现代化是全党全国人民的迫切愿望。我完全同意中央的意见。安定团结也是全党和全国人民所关心的事。干部和群众对党内是否能安定团结，是有所顾虑的。

华主席说，对于那些在揭批“四人帮”中遗留的问题，应由有关机关进行细致工作，妥善解决，我认为这是很对的。但是，对有些遗留问题，影响大涉及面很广的问题，是需要由中央考虑和作出决定的。对此，中央应该给以考虑和决定。

接着，他列举了6个比较重大的、亟待解决的历史问题：

一、薄一波同志等61人所谓叛徒集团一案，他们出反省院是党组织和中央决定的，不是叛徒。

二、1937年7月7日中央组织部关于所谓自首分子的决定这个文件，是我在延安任中央组织部长（1937年1月）以前作出的，与处理薄一波同志等问题的精神是一致的。我当时还不知道有这个文件，后来根据审查干部中遇到的问题，在1941年也写过一个关于从反省院出来履行过出狱手续，但继续干革命的那些同志，经过审查可给以恢复党籍的决定。这个决定与“七七决

定”精神是一致的。这个决定也是中央批准的。我认为，中央应该承认“七七决定”和1941年的决定是党的决定。对于那些在“文化大革命”中被错误定为叛徒的同志应给以复查，如果并未发现有新的真凭实据的叛党行为，应该恢复他们的党籍。此外，据我所知，在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在敌我边际地带有一个所谓“两面政权”问题。当时党组织决定一些党员在敌伪政权中任职，掩护我党我军的工作。这些党员，在“文化大革命”中也大多被定为叛徒。这是一个涉及到数量更大的党员的政治生命问题，也应该由党组织复查，对并无背叛行为的同志应该恢复党籍。

三、陶铸同志、王鹤寿同志等是在南京陆军监狱坚持不进反省院，直到七七抗战后由我们党向国民党要出来的一批党员，他们在出狱前还坚持在狱中进行绝食斗争。这些同志，现在或者被定为叛徒，或者虽然恢复了组织生活，但仍留着一个“尾巴”，例如有严重的政治错误。这些同志有许多是省级、部级的干部。陶铸一案的材料都在中央专案组一办。中央专案组是“文化大革命”时期成立的，他们做了许多调查工作，但处理中也有缺点错误。我认为，专案组所管的属于党内部分的问题应移交给中央组织部，由中央组织部复查，把问题放到当时的历史情况中去考察，做出实事求是的结论。像现在这样，既有中央组织部又有大专案组，这种不正常的状态，应该结束。

四、彭德怀同志是担负过党和军队重要工作的共产党员，对党贡献很大，现在已经死了。过去说他犯过错误，但我没有听说过把他开除出党。既然没有开除出党，他的骨灰应该放到八宝山革命公墓。

五、关于天安门事件。现在北京市又有提出来了，而且还出了话剧《于无声处》，广播电台也广播了天安门的革命诗词。这是北京几百万人悼念周总理，反对“四人帮”，不同意批邓小平同志的一次伟大的群众运动，而且在全国许多大城市也有同样的运动。中央应该肯定这次运动。

六、“文化大革命”初期，康生同志是中央文革的顾问。康生同志那时随便点名，对在中央各部和全国各地造成党政机关瘫痪状态是负有重大责任的。康生同志的错误是很严重的，中央应该在适当的会议上对康生同志的错误给予应有的批评。^①

他提出这6个问题，都是大家关心的重要问题。有两点很明显：一是陈云完全是按照实际情况依据实践标准来提出问题，来论功过是非的。因为他提出的问题，特别是一些重大案件，都是经过毛泽东同志同意、支持或批准的。二是陈云提出的问题都是“文革”中发生的或“文革”前遗留下来的重大历史问题。这6个问题的解决涉及对“文革”的评价和对“文革”前的指导思想、指导方针的评价，必然触及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理论对不对的问题。

陈云的发言被简报全文刊出后，在会上引起了强烈反响，代表们纷纷发言，表示赞成并加以发挥，会议气氛一下子活跃起来。可见，陈云的发言反映了党心，起到了扭转会议方向的关键性作用。

分组讨论中，大多数人没有去讨论华国锋提出的那些问题，而是围绕陈云提出的坚持有错必纠方针，解决历史遗留问题进行发言和讨论，而且火力越来越猛，又相继提出一些重大问题。从

^① 《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32~234页。

此，华国锋就控制不了局面了，整个中央工作会议逐渐脱离了他事先设置的轨道，朝着正确方向发展。

东北组的不少同志都发言明确表示：陈云发言讲的问题有关安定团结，关键是落实政策的问题，有必要加快解决。

在中南组，发言的同志都认为，陈云所提出的这些问题，是目前党内外干部群众议论较多，关系到全局的问题，在宣布工作重点转移的时候，中央最好能给予解决。这对调动广大干部群众的积极性，加强团结是有好处的。

在华北组也都先后谈到了“61人案”、“天安门事件”、康生、谢富治的问题等。

在西北组，一些同志也认为，这些重大的历史遗留问题中央不正式表态，干部群众有抵触情绪，最好能在谈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前，就把这些问题讲清楚。

西南组的同志在小组发言时表示，陈云提出的几个历史遗留问题影响都比较大，希望中央明确一下。这样有利于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加快实现四个现代化。

同样，华东组也有不少同志发言支持陈云的意见。

小组会的发言，通过简报等不同的渠道，反馈到中央政治局特别是各常委那里。从各方面反映出来的情况来看，不解决这些大家关注的重大的历史遗留问题，就很难统一大家的思想，集中大家的智慧，迅速而又顺利地实现全党工作重心的转移。为此，政治局及时拿出了比较正确、稳妥的处理意见。

11月25日，中央工作会议召开第三次全体会议，华国锋代表政治局讲了9个问题，其中7个是重大遗留问题的平反。

华国锋说：

（一）关于天安门事件问题。粉碎“四人帮”以后不久，中央就着手解决在天安门事件和这类事件中革命群众被迫害的问题。随着揭批“四人帮”运动的深入，

这方面的问题大都陆续得到解决。但是，问题解决得还不彻底，还没有为天安门事件的性质平反。中央认为，天安门事件完全是革命的群众运动，应该为天安门事件公开彻底平反。今年11月14日，中央政治局常委批准北京市委宣布：1976年清明节，广大群众到天安门广场沉痛悼念敬爱的周总理，愤怒声讨“四人帮”，完全是革命运动。对于因悼念周总理、反对“四人帮”而受到迫害的同志要一律平反，恢复名誉。

(二) 关于所谓“反击右倾翻案风”问题。实践证明。反击右倾翻案风是错误的。中央政治局决定：中央1975年发的23、24、26、27号文件，1976年发的2、3、4、5、6、8、10、11号文件全部予以撤销。贯彻执行这些文件的党委和个人是没有责任的，责任由中央承担。

(三) 关于所谓“二月逆流”问题。所谓“二月逆流”，完全是林彪一伙颠倒是非，蓄意诬陷，其目的是打倒当时反对他们的几位老帅和副总理，进而打倒周总理和朱委员长。现在，中央决定，由于这个案件受到冤屈的所有同志，一律恢复名誉；受到牵连和处分的所有同志，一律平反。过去各种文件、材料中关于所谓“二月逆流”的不实之词，都应该作废。

(四) 关于薄一波同志等61人案件问题。现已查明，这是一起重大错案。今年1月间，中央常委就议过要为这一案件平反的问题；6、7月间，中央要组织部对这一案件进行复查，向中央写出报告，来解决这个问题。中央组织部于今年11月3日向中央提出报告，其中说：“大量事实证明：薄一波同志等在反省院的表现是好的，他们履行敌人规定的程序，登‘反共启事’出

反省院，是执行党组织的指示，根据登‘反共启事’出反省院的问题，定61人为叛徒集团，是不正确的。”中央讨论了这一问题，决定为这一重大错案平反。关于这个问题，中央还要发一个正式文件。

（五）关于彭德怀同志的问题。彭德怀同志是我们党的一位老党员，曾经担任过党政军重要领导职务，对党和人民作过重大贡献。他在历史上也犯过错误，有的错误还是严重的。但是，经过审查，怀疑他里通外国是没有根据的，应予否定。他的骨灰应该安放到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第一室。

（六）关于陶铸同志的问题。陶铸同志也是我们党的一位老党员，在几十年工作中，对党对人民是有贡献的。经过复查，过去把他定为叛徒是不对的，应予平反。他的骨灰应该安放到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第一室。

（七）关于杨尚昆同志的问题。经过复查，过去把他定为阴谋反党、里通外国是不对的，应予平反。中央决定，恢复杨尚昆同志的党的组织生活，分配工作。

（八）关于康生同志和谢富治同志的问题。康生同志和谢富治同志有很大的民愤，党内干部和群众对他们进行揭发和批判是合情合理的。中央意见，不设立专案组，有关揭发他们的材料，可以送交中央组织部审理。

（九）关于一些地方性重大事件的问题。最近，有的地方提出了某些重大事件需要重新处理，比如，武汉的七二〇事件，河南的七二五事件，四川的产业军问题等等。中央决定，这类地方性的重大事件，一律由各省、市、自治区党委根据情况实事求是地予以处理。中央发过文件的，要将处理意见先报中央批准。这些问题，涉及文化大革命运动中曾经分裂为两大派的群众，

一定要慎重周到地处理好，防止重新引起派性斗争。积极引导群众向前看，消除资产阶级派性，做好团结工作。

除上述9个问题之外，华国锋还讲了3个问题：关于中央和各级专案组的结束问题，关于“三支两军”的问题，关于周恩来逝世后中央治丧委员会的一个电话通知问题。他说：

中央决定，各中央专案一办、三办（包括原中央专案二办）和“五一六”专案联合办公室都要结束工作。全部案件移交中央组织部。未了案件，由中央组织部根据中央处理上述案件的精神，抓紧复查，作出相应的结论。各级党委设立的专案组应逐步结束工作。它们审查的案件，属于党内问题的，移交给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或党的组织部；属于敌我矛盾的，移交给政法部门。今后不再采取成立专案组审查干部的办法。

三支两军中有些同志犯了支一派压一派的错误。这个问题要放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来看。三支两军是中央决定的，对于稳定当时的局势，起了重要作用，成绩是主要的。由于林彪、“四人帮”的干扰，加上情况复杂，有些同志犯了支一派压一派的错误是难免的，总的责任由中央承担，不要追究个人责任了。

周总理逝世以后的悼念活动中，治丧委员会办公室发过一个电话通知，通知中说，各省市自治区不要派人来京参加追悼活动，各地不组织吊唁、开追悼会、带黑纱等活动。这个通知是在“四人帮”当道的情况下政治局通过的，执行这个通知的党委和个人是没有责任的。

显然，11月25日中央政治局的决定，是充分吸收和采纳了陈云、邓小平等老一辈革命家及与会各小组的同志的正确意见与建议。得到大家的充分肯定。在大会后的小组讨论和发言中，大

家都心情舒畅，畅所欲言，并表示中央政治局的上述决定体现了党的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的好传统，对实现安定团结有重要意义。正如胡乔木 26 日下午在华东组的发言中所说的：

尽可能解决历史上和文化大革命中遗留的问题，是非常必要的，有利于全党全军全国人民的安定团结，有利于四个现代化的建设沿着正确的方向前进。这些问题解决了，一方面会巩固安定团结；另一方面也有利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和党的历史的宣传，有利于对毛泽东思想的完整准确的宣传。

天安门事件平反

中央工作会议期间，11 月 14 日，经过中共中央批准同意，中共北京市委常委扩大会议正式通过了为“天安门事件”平反的决定，并在 11 月 15 日的《北京日报》上公布：

1976 年清明节，广大群众到天安门广场悼念我们敬爱的周总理，完全是出于对周总理的无限爱戴、无限怀念和深切哀悼的心情；完全是出于对“四人帮”祸国殃民的滔天罪行的深切痛恨，它反映的是全国亿万人民的心愿。广大群众沉痛悼念敬爱的周总理，愤怒声讨“四人帮”，完全是革命行动。对于因悼念周总理、反对“四人帮”而受到迫害的同志要一律平反，恢复名誉。^①

我们知道，1976 年 4 月 5 日的天安门广场革命群众运动，是以悼念周总理，反对“四人帮”作为主题的。当年成为“四人帮”打倒邓小平的一条重要理由，也是邓小平第三次下台的直接原因。

^① 1978 年 11 月 16 日《人民日报》。

粉碎“四人帮”后，叶剑英、陈云、李先念、王震等一直呼吁：要为邓小平平反，要为“天安门事件”平反。在一批老一辈革命家的坚持和斗争下，1977年7月十届三中全会上，邓小平得以恢复名誉，再次复出。但是，由于中共中央个别领导人的阻挠，对“天安门事件”，中央仍未作出明确的决定。直到1978年下半年，坚持“两个凡是”的一些人仍然认定“天安门事件”是反革命事件，千方百计阻碍“天安门事件”的平反。

其中最典型的事件就是发生在1978年9月的《中国青年》杂志的复刊风波。

1978年9月《中国青年》杂志复刊，定于9月11日出版。9月6日、7日，《人民日报》、新华社先后发了复刊消息，10日，《人民日报》刊登第一期目录，同时北京承印的60万份全部印完，而且在北京地区已发放了4万多份。但是，10日下午汪东兴却给共青团“十大”筹委会的负责人打电话，提出4条指责：

1. 为什么只有叶副主席的题词，没有华主席的题词；
2. 《革命何须怕断头》宣传的韩志雄，你们了解清楚了吗，这个人有问题；
3. 童怀周的天安门诗抄怎么又出来了；
4. 没有纪念毛主席逝世两周年的文章。

当时只得宣布刊物停印停发，等待处理。

事实上，关于华国锋题词问题，编辑部在1978年7月27日曾分别给华国锋、叶剑英、邓小平写信，恳请为《中国青年》复刊题词，并希望在8月底交付编辑部，以便赶在9月2日付印。但由于华出访，编辑部只按时收到叶的题词。

关于韩志雄的宣传，是在北京市推荐，共青团北京市委作出了向韩志雄等人学习的决定，团“十大”筹委会把他确定为团的

“十大”代表后，才写出报道的。童怀周编选的革命诗抄，是群众怀念周总理，声讨“四人帮”的诗歌。关于纪念毛泽东逝世两周年，原计划刊登9月9日要发表的毛泽东诗词手迹，后因时间问题，经团“十大”筹委会同意，改为发表毛泽东1948年为《中国青年》复刊题词手迹。9月11日上午，编辑部就汪东兴的批评意见，提出了不同看法，并给华国锋和几位副主席写了信，同时抄报团“十大”筹委会。

12日晚，团“十大”筹委会负责人召集杂志社组长以上干部开会，传达他同汪商量的对这期刊物的处理意见：

1. 由汪出面请华题词；
2. 加上毛主席诗词三首和照片；
3. 删去《革命何须怕断头》一文中“这场伟大壮烈的人民运动，被‘四人帮’无情地镇压下去了……”等段落。
4. 删去《青年革命诗抄》的天安门题图和编者按。

会上还念了华国锋1977年3月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有关“天安门事件”和“两个凡是”的段落，指出以上两篇稿子与华的讲话精神不符，有损毛主席的形象。

13日，编辑部提出对那期刊物的调整意见。14日又受到指责，指责的重点还是在“天安门事件”问题上。

人们都明白，随着真理标准讨论的不断深入，“两个凡是”的市场已越来越小，不管你怎样阻挠，也不管你愿意不愿意，“天安门事件”的平反只是时间迟早的问题了。

为“天安门事件”平反，不仅在党内这种呼声日益强烈，而且在社会上，这种呼声从来没有停止过。人民通过各种形式表达自己的愿望，有的写大字报，有的收集整理天安门诗词，有的通过诗歌、小说、话剧等文学艺术形式，谴责“四人帮”的罪行，歌颂人民的英勇斗争精神。邓小平复出后，人民要求为“天安门

事件”平反的思想和行动更加公开化，《天安门诗抄》的正式出版，话剧《于无声处》的公演就是明证。

为弄清“天安门事件”的真相，从1978年5月开始，北京市公安部门组织专门班子，对这一案件进行全面复查，大量调查证明，这是一起重大冤案，在这个事件中被捕关押的388人中，没有一个人是反革命分子。

8月9日，共青团北京市委举行首都青年与“四人帮”斗争英雄事迹报告会，因四五运动受到迫害的北京房修二公司机械大队推土机司机、22岁的共青团员韩志雄作为代表，在大会上作了发言，大会宣布为韩志雄和贺延光两位因“天安门事件”被捕的青年彻底平反。

这样，到1978年11月中央工作会议期间，中央作出了决定，正式为“天安门事件”平反，实际上就是顺理成章的事了。“天安门事件”的平反，赢得了全国人民的拥护，在社会上引起了极大的反响。

12月21日，《人民日报》发表的题为《人民万岁——论天安门广场革命群众运动》特约评论员文章，肯定“天安门事件”的彻底平反，是深入揭批林彪、“四人帮”的伟大胜利，是人民力量的伟大胜利，是马克思主义真理的伟大胜利：

天安门事件，是中国人民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所创造的一种争取和保卫民主，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防止反革命复辟的斗争形式。党中央为天安门事件彻底平反，使人们深深感到，我们的党是同人民始终站在一起的，是坚决领导人民争取和保卫民主的斗争的。它必将进一步激励人民群众为充实实现社会主义民主，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而斗争。

这场革命群众运动，不仅是党心、军心、民心的一次大检阅，而且是人民的智慧、才能、斗争艺术和创造

力的一次大检阅。人民群众既是这场运动的勇敢战士，又是杰出的组织者和指挥员。

“两个凡是”和真理标准讨论

会议进行到11月下旬，华国锋建议，从27日起会议转入对1979年、1980年两年国民经济计划和李先念在国务院务虚会上的讲话的讨论。但是，尽管重大的历史遗留问题基本解决了，可是党在指导思想方面的问题并没有得到充分的检讨，如何保证经济工作有一个正确的指导思想，与会同志还是耿耿于怀的。

实际上，早在27日之前，胡乔木等同志就在小组会上提出过这样的问题，对“两个凡是”和阻挠真理标准讨论的人提出了批评。有的同志在发言中指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不仅仅是一个理论问题，在一定意义上也是一个政治问题。因此，希望华国锋能在会议结束时专门谈一下这个问题，代表中央对这个讨论作一个结论。认为这样做，对于统一全党思想，巩固安定团结，澄清国内外各种猜测和不正确的传说，将有很大好处。

11月27日，也就是在政治局宣布中央工作会议开始讨论经济问题的那一天，有几位宣传口的负责同志先后在分组会上发言，他们坚持原来的错误立场，辩解多、检讨少，引起许多与会同志的不满，也更进一步引发了大家回过头来检讨指导思想的积极性。本来似乎已经解决了的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评价问题，又成为会议讨论的焦点。

在此期间的小组和大组发言中，一大批同志，都先后对这个问题表了态、发了言，对上述几位同志的观点进行了批评。

在与会同志的批评帮助下，到了会议末期，那几位受批评的宣传口的负责同志先后都表示了接受批评的态度，并程度不同地

作了检查。

由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的极端重要性和与会同志的严重关注，12月13日，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在邓小平、叶剑英讲话后，华国锋的讲话中就有对有关“两个凡是”和“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问题的表态。

华国锋的讲话，主要就是谈“两个凡是”和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的。在谈到“两个凡是”的问题时，他先辩解说：

我在去年三月中央工作会议的讲话中，从当时刚刚粉碎“四人帮”的复杂情况出发，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上捍卫革命领袖旗帜的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出发，专门讲了在同“四人帮”的斗争中，我们全党，尤其是党的高级干部，需要特别注意坚决捍卫毛主席的伟大旗帜的问题。在这一思想指导下，我讲了“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都必须维护；凡是损害毛主席形象的言行，都必须制止”。当时的意图是，在放手发动群众，开展揭批“四人帮”的伟大斗争中，绝不能损害毛主席的伟大形象。这是刚粉碎“四人帮”的时候，我思想上一直考虑的一个重要问题。

接着，他自我批评说：

后来发现，第一句话，说得绝对了，第二句话，确实是必须注意的，但如何制止也没有讲清楚。当时对这两句话考虑的不够周全。现在看来，不提两个“凡是”就好了。在这之前，2月7日中央两报一刊还发表过一篇题为《学好文件抓住纲》的社论。这篇社论中也讲了两个“凡是”，即“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拥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这两个“凡是”的提法就更加绝对，更为不妥。以上两

处关于两个“凡是”的提法虽不尽相同，但在不同程度上束缚了大家的思想，不利于实事求是地落实党的政策，不利于活跃党内的思想。我的讲话和那篇社论，虽然分别经过政治局讨论和传阅同意，但责任应该主要由我承担。在这个问题上，我应该作自我批评，也欢迎同志们批评。

在谈到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时，他说：

今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发表、5月12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转载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文章，由于我当时刚刚访问朝鲜回来，有许多事情亟待处理，没有顾上看。六七月间，中央常委几位同志先后给我谈过他们听到的有关这方面的一些情况，这个时候，我才知道对这篇文章有些不同的看法。中央政治局常委开会时，议过这个问题，认为这篇文章的主题是好的，但没有专门去研究。后来，报纸上登这方面的文章多了，国内外反映也多了，叶帅考虑到国务院务虚会开得很好，提议把搞理论工作的同志召集到一起，也开个务虚会，大家把不同意见摆出来，在充分民主讨论的基础上，统一认识，把这个问题解决一下。中央常委同志都赞成这样办。由于我想常委都在家时开会解决这个问题，因小平等同志出访，在这次中央工作会议之前这个会没有来得及开。

随后，华国锋也表态说：

今年11月25日，中央常委接见北京市委和团中央主要负责同志，听取他们汇报天安门事件平反后群众的反映和北京市街头大字报的情况，联系谈到这个问题时说：“对一些具体问题，要实事求是地、按照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个原则去解决。现在报上讨论真理

的标准问题，讨论得很好，思想很活泼，不能说那些文章是对着毛主席的，那样人家就不好说话了。但讲问题，要注意恰如其分，要注意后果。有些事情，不能提毛主席，也不宜提，提了不利。报纸要十分慎重。迈过一步，真理就变成谬误了。”这是中央常委的意见。

此外，华国锋也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将召开理论务虚会，继续讨论这个问题，以求把这个问题解决好。他说：

我在前边讲了，在这次会议上，同志们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摆出了许多情况，提出了不少问题，对一些同志提出了不少批评意见，为召开理论务虚会创造了有利条件。由于这次中央工作会议的议题多，时间有限，这方面的问题不可能花很多时间来解决。中央政治局同志意见，还是按照叶帅的提议，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专门开一次理论务虚会，进一步把这个问题解决好。

这一切都表明，通过小组发言中的讨论和争论，参加中央工作会议的同志对“两个凡是”和“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包括华国锋在内的，原来坚持“两个凡是”，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持有疑义和异议，或者持反对态度的人，思想上的堡垒被摧毁了。

12月13日邓小平在讲话中，用大量的篇幅阐述这些问题，为中央工作会议在这些问题最后形成一致意见一锤定音。

后来，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公报对以上问题作了结论：

会议高度评价了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的讨论，认为这对于促进全党同志和全国人民解放思想，端正思想路线，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

这是多么高度的概括，多么深刻的见解。

对犯错误人的批评和汪东兴的检讨

小组会上，大家的讨论很热烈，除了前面说的历史遗留问题、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的讨论外，对一些领导人在粉碎“四人帮”以后的工作中的错误的批评也比较多，比较集中，而且随着历史遗留问题、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问题等的充分讨论，提得越来越尖锐，同“文化大革命”后期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相联系，针对的人也越来越清楚。

理由很简单，提出了历史遗留问题、真理标准讨论问题，很自然地就会联系到，解决这些问题为什么会有阻力？阻力来自哪里？

4位政治局委员汪东兴、纪登奎、陈锡联、吴德以及十一二位部门的负责人，在各个小组都有人揭发他们的问题，对他们的错误提出批评意见。

从发言的内容看，批评意见主要集中在汪东兴、纪登奎、陈锡联、吴德4位政治局委员。最突出的是汪东兴、纪登奎两人。

西北组有同志批评说：

汪在1976年1月8日批：彭真、杨尚昆、薄一波闹翻案，不理他们。汪在1976年4月21日又批：现在主要集中力量批邓，对敌人不能宽大。陆定一放不放还要看……

还有人揭发说：

汪分管宣传，但他对宣传口十几个人讲话时，针对实践检验真理的文章说：“党性不强，接受教训，下不为例。”“两个凡是”的社论也是汪东兴的理论组写的，发表也是汪批准的。

东北组有同志说：

几个秀才的后台就是汪东兴，建议汪在会上讲清楚。

西南组有同志表示：

建议汪东兴少管一些事，多读一些马列和毛主席的书。

华东组有同志提出：

中办要搞揭批查，政治局内要批评和自我批评。中央和国务院的警卫应由卫戍区担任。汪对老干部的态度同林彪、“四人帮”类似，希望也检查一下。

有人在东北组不指名地批评纪登奎等人说：

政治局的同志不都是那么强，有的不令人信服，有的人插手河南，把河南搞乱了。新疆、北京搞成这个样子，能使人信得过吗？有些有能力的同志进不了政治局，有的人既无功劳也无能力，为什么一定要搞成政治局委员？现在要整顿领导班子，中央可不可以整顿一下，个别同志是否可以整顿一下？能上能下嘛！

中南组也有同志批评纪登奎说：

群众反映河南问题在上边，上边就指纪。“四人帮”倒台后，纪给造反派通风，让他们表态，河南人说“心有余纪”。

西南组有同志揭发说：

纪登奎在1970年农林部成立时提出，要把农林部办成农林政治部，又对农科院军宣队指示：“科研是依靠7500人还是依靠7.5亿人？”“大学四年没招生，卫星照样上天，农业还是丰收。”

有人在华东组发言，谈到天安门事件，就点吴德的名质问：

是怎样向毛主席汇报的？现在调到中央，好像官更大了，应做点自我批评。少数人进了政治局，“一入局门深似海，从此群众是路人”。举旗不前进，把旗当幌子，实际上砍旗。

面对来自各方面的揭发和批评，汪东兴、纪登奎、陈锡联、吴德等人在各自所在的组作了程度不同的检查。当然，检查总体上不能令与会同志满意。

正如前面所说，由于在涉及冤假错案的平反、提出“两个凡

是”、压制真理标准讨论以及解决历史遗留问题等上面的“特殊作用”，当时身兼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副主席等许多要职，直接分管中央各个专案组和中央宣传意识形态工作的汪东兴，更是揭发和批评的重点。6个小组都有不少人揭发他的错误，并对他提出了尖锐的批评意见。以至到会议的后期，汪东兴对许多问题已经根本无法回避了。

汪东兴的检讨是12月13日以书面形式向会议提交的。

汪东兴的检讨，主要是围绕大家议论和批评比较多的几个问题说的。他承认：在文化大革命中确实说过错话，做过错事。粉碎“四人帮”以后，也说过错话，做过错事。

他对大家意见比较多的中央专案一、二、三办的问题，粉碎“四人帮”以后分管中央宣传工作中的问题，“两个凡是”和真理标准讨论中的问题，都作了检讨。

汪东兴分析自己犯这些错误的原因时指出：产生以上错误的最根本的原因，是对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学习不够，理解不深，思想上存在形而上学的东西，有时看问题片面、主观；对实际情况，对广大群众的思想情绪了解不够，体察不深。在工作作风上，有时也存在着简单急躁、不够谨慎的错误。

他最后表示：我所担负的职务与我的能力是不相称的，是名不副实。为此，我恳切请求中央免去我所兼的一切职务，待中央决定后，认真地向有关同志移交好。

由于汪东兴的检讨是在会议闭幕的12月13日那一天才提交的，14日、15日虽然还有两天时间讨论，但大家主要是讨论闭幕会上邓小平、叶剑英、华国锋的讲话，讨论中央政治局关于中央人事问题的建议和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组成人员的人选问题，而没有专门的时间议论他的检讨。

这里还要提到，17日下午，也就是中央工作会议结束后两天，十一届三中全会即将开幕的时候，中央常委又召集十一届三

中全会各组召集人开会，特别谈到中央工作会议上许多同志要求有错误的几位同志在全会上作个像样的检讨，常委决定，可以不再在全会上检讨了。邓小平还说：

对犯错误的同志不包庇，也不勉强。东兴同志提出不当副主席，不当常委，我们从大局出发，还是不动，以后如何，到时再说。纠缠久了对工作不利。河南如果把揭发纪（登奎）的材料带回去传达，一年也搞不完，就不要工作了。还是多搞点粮食吧。

工作重点的转移问题

关于工作重点转移的问题，总体上在会上没有什么太多的异议，大家对华国锋代表中央政治局宣布从1978年1月起，把全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都是表示积极赞同的。

前面说到，11月10日华国锋在中央工作会议开幕式上的讲话中的解释是：我们提出全党的工作着重点转移的问题，是鉴于揭批“四人帮”的群众运动到了胜利结束的时候，同时又是鉴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严重任务摆在我们面前，迫切要求我们把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的注意力集中到这上面来。

胡乔木11月12日下午在华东组的发言中指出：

把全党工作的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非常重要。这个转变，不是党的具体工作的着重点的通常性质的转变，而是具有历史意义的根本性转变。前两年，以揭批“四人帮”为中心，正是为实现这一转变创造了必要的前提。

他指出：

由于种种客观上和主观上的原因，由于种种干扰破

坏，特别是林彪、“四人帮”的十年破坏，一直没有能够稳定地有系统地贯彻始终地进行这个转变，因而社会主义建设没有能够实现持久的有计划的发展，并且发生了曲折和停滞。

现在我们克服了林彪、“四人帮”的破坏，具备了完成党的工作着重点的根本转移的条件。进入了新的发展时期，开始了新的长征。所谓新就新在稳定地全面地完成党的工作中心的转变，并且用现代化的生产技术、现代化的管理方法，来保证国民经济持久的有计划的发展。

他强调：

除了发生战争，今后一定要把生产斗争和技术革命作为中心，不能有其他的中心。否则，四个现代化的任务，就不可能在本世纪内完成。

胡乔木的这些思想，从理论上解释清楚了全党工作重心的转移，不是一时的适应形势的需要，把工作重心转移从“通常性质的转变”上升到“根本性转变”形态。这一思想为全会接受，在后来他主持起草和修改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公报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其他各个小组的讨论中，也有不少赞同胡乔木的意见的，还有些人提出了和胡乔木相类似的观点：

工作重点转移，这是一个非常英明和远见的决策。这一决策不是暂时的、短期的，而是战略性的，是针对一个历史阶段的主要奋斗目标而提出来的。今后我们要重点搞好现代化建设。

现在为了实现四个现代化，阶级斗争必须促进和保证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任务的完成，不能离开这个中心。今后主要精力要转到抓生产建设了。

认识到了全党全国各项工作重点转移的重要性和历史意义，还需要具体解决长期以来困扰党的政治与经济关系的处理问题。“阶级斗争为纲”、“阶级斗争一抓就灵”等极左思想在党内仍然有不少市场。如何正确处理政治与经济的关系，紧紧抓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这个重点，也是全党在思想、理论上亟待解决的问题。胡乔木的理解得到了当时与会的许多同志的支持。

11月12日下午，胡乔木在华东组讨论华国锋讲话时，曾就政治和经济的关系问题发了言。他指出：

离开社会主义经济，离开共产主义经济就根本谈不上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

我们一切革命斗争，终极目的就是要解决和发展生产力，就是要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和将来的共产主义经济建设，这是我们党的一贯立场，是马列主义的基本观点。并不是任何阶级斗争都是进步的，其是否进步的客观标准，就是看它是否为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创造条件。

胡乔木引述列宁的话说：

谈到政治占首位，只是为了保证政治上不发生危险和错误，为少搞些政治，多搞些经济创造条件。占首位不等于目的是，相反，经济才是目的，政治只是前提和手段。

他强调：

如果党和国家不把经济工作放在首位，谁来对人民的劳动和生活负责呢？经济脱离政治一定会走到邪路上去，政治脱离经济也一定会走到斜路上去。

会议期间，还有不少同志也谈到了类似的问题。

但是，对作为工作重心的经济发展问题，系统提出建议和意见的，还是陈云、李先念等同志。

12月10日，陈云在东北组发言，对当前的国内经济问题系统地发表了自己的意见。

他说：

实现四个现代化是我国史无前例的一次伟大进军，必须既积极又稳重。今年7月31日，我曾向先念同志提出，国务院召开的务虚会议最好用几天时间，专门听听反面意见。我们既要听正面意见，又要听反面意见。我们要坚持实事求是，就是要根据现状，找出解决问题的办法。首先弄清事实，这是关键问题。

此外，他还就经济问题谈了5点建设性意见：

（一）在三五年内，每年进口粮食可以达到2000万吨。（二）工业引进项目，要循序渐进，不能窝工。（三）要给各省市一定数量的真正的机动财力。（四）对于生产和基本建设都不能有材料的缺口。（五）要重视旅游事业的发展。

陈云表示：

建国快30年了，现在还有讨饭的，怎么行呢？要放松一头，不能让农民喘不过气来。要先把农民这一头安稳下来，农民有了粮食，棉花、副食品、油、糖和其他经济作物就都好解决了。摆稳这一头，就是摆稳了大多数，七亿多人口稳定了，天下就大定了。

要循序渐进，不要一拥而上。一拥而上，看起来好像快，实际上欲速则不达。^①

陈云的这个发言，同样也引起了与会的各小组的代表们的兴趣。许多人在发言中都对陈云的发言表示赞同。

^① 《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35~238页。

健全党内民主的问题

在解决重大历史遗留问题和对“两个凡是”等问题的批判与反思过程中，与会各小组的同志也在以亲身的经历和切肤之痛，不断思考。“文化大革命”前后十几年，“左”的错误在党内登峰造极，给党和国家造成了严重的灾难，其根本原因究竟在哪里？大家比较一致和集中的结论是：党内民主生活遭到了严重的破坏，党和国家的民主和法制遭到了破坏。

为此，在中央工作会议各小组的讨论中，加强党的建设，健全党内民主集中制，成为大家共同的话题。一批老一辈革命家在小组会、大组会和大会上都为此大声疾呼。

粟裕在发言中说：

林彪、“四人帮”长期凌驾于党之上，重要原因是党内民主生活不正常。批评只能在上级对下级或平级间进行，下级不能批评或不敢批评上级，甚至党的会议上也不能批评，否则就是反党。有的群众说有权就是真理，值得深思。

谭震林结合自己的经历和切身体会说：

井冈山时期，毛泽东、朱德、陈毅有不同意见就开会辩论，吵嘴，那时不叫反毛主席。一个领导人，如果人家讲了不同意他的话就叫反他，那还有什么民主集中制。我提议把党的民主集中制，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民主集中制建立起来。各级领导以身作则，很好地实行民主集中制。

徐向前在发言中说：

现在党内外心有余悸的状况仍然存在，有些人讲话有顾虑，不能把心里话全部倾诉出来。因此应该广开言

路，让人把心里话全说出来。

张震发言批评说：

对十年“文革”应总结教训：一、民主集中制被破坏。“文化大革命”不经中央全会讨论。一下子轰起来。民主在哪里？二、集体领导被破坏。今后全会闭会时应由政治局领导。三、政策多变，失信于民。四、法制不健全。“文化大革命”中那么多干部被抓、劳改，哪里有法制！

胡耀邦发言说：

“文化大革命”教训深刻，应很好总结，根本教训是党的生活不正常。

为了很好地总结，也是与会同志谈论得比较多的党和国家的民主和法治问题，特别是党内民主生活问题方面的经验教训，叶剑英在12月13日的闭幕会上，专门讲了领导班子建设问题、发扬民主加强法制问题和解放思想的问题。

叶剑英强调：

我们的各级领导干部不仅要有自知之明，而且要有知人之明，真正做到知人善任，任人唯贤。这句话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就不那么容易。知人之明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头脑里固有的，而是经过实践的经验和群众的经验得来的。任何个人要完全做到有知人之明，完全做到知人善任、任人唯贤也是不可能的，因为任何个人都有他的局限性，这只有依靠党、依靠党和国家的健全的民主集中制才有可能。不然，我们的革命为什么需要党，需要依靠阶级和人民，需要民主集中制和群众路线呢？所以领导班子的问题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但不是一个孤立的问题，它不能离开我们整个党的建设

的原则来解决。配备干部，特别是选配班长，一定要发扬民主，走群众路线。

他指出：

我们要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还必须认真实行民主集中制。只有充分发扬民主，才能最大限度地调动起广大干部和群众的积极性，集思广益，群策群力地建设社会主义。只有充分发扬民主，才能广开才路，及时地发现我们党的优秀人才，把他们充实到各级领导岗位中去。只有充分发扬民主，才能保障广大干部和群众有对领导实行监督和批评的权利，从而有可能及时发现和揭露像林彪、“四人帮”一类的阴谋家、野心家、两面派，巩固我们的政权，使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有切实的保证。

我们要充分发扬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我们要在全党、全国造成浓厚的民主空气，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

华国锋在13日的闭幕会上讲话中也涉及党内民主生活方面的问题，有一段讲话是这样说的：

还有一件事情，向同志们讲一下，党中央是集体领导，希望今后各地区、各单位向中央作请示报告的时候，文件的抬头不要写华主席、党中央，只写党中央就可以了。中央党政机关向下行文，也希望照此办理。也不要提英明领袖，称同志好。希望文艺作品多创作歌颂党、歌颂老一辈革命家与工农兵英雄事迹，不要宣传我个人。

12月15日，胡乔木在华东组的小组发言中，抓住华国锋这个讲话中的这段话，就有关党内民主生活问题说：

华主席在讲话中提到对他个人的提法问题。这在党的生活里面看起来是件小事，实际上是件很大的大事，所涉及的不简单是个形式问题，而是党的生活的准则和秩序问题。毛主席在生前多次讲过这个问题。毛主席解放初期曾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说，如果要提个人，一定要把个人放在党组织之后，个人无论如何不能超过党。就是说，要讲党中央毛主席，不能把次序颠倒过来。

就我记忆所及，文化大革命前似乎一直是这样做的。后来变了，在一段时间里，甚至不存在党中央，至少不存在中央政治局，只有毛主席了。文革小组代替了政治局，因此党中央实际不存在了。这样，党的生活完全乱了，党中央的制度也不存在了。虽然并没有听说过曾经开会决定和明文规定。

华主席这次提出以后不讲华主席党中央，以后只讲党中央或以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这样讲完全符合党的原则，符合马列主义，是拨乱反正，恢复党的生活的正常状态。摆正个人和党的位置，摆正各级第一把手和各级党组织的位置，在政治上有极其重要的意义。把个人摆到党之上，摆到国家和人民之上，在党内和国家生活里都是违反马克思主义，违反历史唯物主义，违反毛泽东思想的。个人无论怎样伟大，不能超过人民、阶级和党。

他谈到苏联和斯大林在这方面的情况：

苏联在斯大林时期对个人和党的关系没有处理好，值得我们鉴戒，但他们有些方面的做法还是有分寸的。例如斯大林的学术文章，一般是在刊物上发表，如《语言学问题》是在刊物发表半个月以后，《真理报》才应读者要求转载（其他报纸不转载），而且从第二版开始，

也不用大字大标题。苏联报纸第一版专登政治新闻、政治评论，这是他们的报纸规格，从不因个人关系而改变。

胡乔木接着说：

我们在报纸上只要是毛主席写的东西，不管什么文章，甚至诗词家信，还有各种手迹，非登第一版不可，有一个时期常常在第一版几乎用整版篇幅来登领袖照片，这些都是在世界上很少见的。把个人这样毫无限制地极端突出出来，这不是我们党成熟的表现，而是不成熟的现。搞一些不成熟不自然的做法，这不能提高领袖在群众、党内和国际上的威信，适得其反，只能起不好的作用。

把个人突出到党和人民之上，这不是偶然的次要的现象，需要认真地分析形成的历史条件，总结教训，不好匆忙地说什么。我想指出一件事，就是1958年成都会议上，柯庆施同志提出一个口号：“信仰毛主席要信仰到迷信的程度，服从毛主席要服从到盲从的程度。”这种说法根本违反共产党员的世界观，没有一点马列主义气味。但是提出的时候竟没有人反对，这是一个值得注意并引起了不良后果的事实。我当时听了很不满，但也没有表示反对，应当作自我批评。

胡乔木的发言得到了与会者的高度评价。直到后来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还有一些同志提到他的这个发言，并给予支持和赞扬。

后来，在胡乔木主持起草和修改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公报中，在第五部分就这个问题专门写了这样一段话：

华国锋同志在会上着重强调了党中央和各级党委的集体领导。他提议：全国报刊宣传和文艺作品要多歌颂

工农兵群众，多歌颂党和老一辈革命家，少宣传个人。全会完全同意并高度评价华国锋同志的提议，认为这是党内民主生活健全化的重要标志。全会重申了毛泽东同志的一贯主张，党内一律互称同志，不要叫官衔；任何负责党员包括中央领导同志的个人意见，不要叫“指示”。会议指出，一定要保障党员在党内对上级领导直至中央常委提出批评性意见的权利，一切不符合党的民主集中制和集体领导原则的做法应该坚决纠正。

会议认为，国要有国法，党要有党规党法。全体党员和党的干部，人人遵守党的纪律，是恢复党和国家正常政治生活的起码要求。党的各级领导干部必须带头严守党纪。对于违犯党纪的，不管是什么人，都要执行纪律。

邓小平的“主题报告”

邓小平因为 11 月 5 日出国访问东南亚的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直到 14 日才回国，所以他没有参加中央工作会议的开幕会。但是，邓小平回国后，很快就把注意力放到会议上了。除了几次召集胡耀邦、胡乔木等谈自己讲话稿的修改外，还在许多场合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谈话。

11 月 25 日下午，邓小平和其他中央常委一起，听取北京市委和团中央几位负责人汇报“天安门事件”平反后群众的反映和北京市街头大字报的情况。

当时西单墙的大字报中，有的要求公布“四五”惨案的内幕，起诉阴谋的策划者，成立“天安门事件”调查委员会；有的提出过去 10 年的历史是以周恩来为代表的科学社会主义路线同以江青、林彪为代表的家族形式封建法西斯独裁专制主义路线斗

争的历史。大字报中有不少小字批语，写着“坚决支持”、“好得很”等等。

邓小平等中央常委针对这些情况讲了一些重要意见。这些意见实际上主要就是邓小平的意见。据朱佳木回忆：

第二天（26日）晚上，乔木同志原打算去首都体育馆参加天安门诗歌朗诵会，刚要走，林乎加来请乔木去谈对中央领导人讲话精神的传达问题。经乔木帮助，形成了一个常委指示记录要点。乔木事后对我讲了一下大意，说主要是小平同志的话。

这个记录要点上有这样一些内容：

天安门事件平反后，群众反映强烈，大家很高兴，热烈拥护，情况是很好的。当然，也出现一些问题。有的大字报提出要追查天安门事件的打人凶手，要追究一些同志的责任，有的甚至追到了毛主席。对这种情况，我们的工作要跟上去，要积极引导群众，不能和群众对立。……另一方面，对大字报不能任其自流。……我们一定要高举毛主席的伟大旗帜。毛主席的旗帜是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团结的旗帜，也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旗帜。

现在，有的人提出一些历史问题，有些历史问题要解决，不解决就会使很多人背包袱，不能轻装前进。有些历史问题，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内不能勉强去解决，有些事情我们这一代人解决不了的，让下代人去解决，时间越远越看得清楚。有些问题可以讲清楚，有些问题一下子不容易讲清楚，硬要去扯，分散党和人民的注意力，不符合党和人民的根本利益。……一些问题总要有个暴露和认识的过程。

对一些具体问题，要实事求是地、按照实践是检验

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个原则去解决。现在报上讨论真理的标准问题，讨论得很好，思想很活泼，不能说那些文章是对着毛主席的，那样人家就不好讲话了。但讲问题，要注意恰如其分，要注意后果。有些事情，不能提毛主席，也不宜提，提了不利。报纸要十分谨慎。迈过一步，真理就变成谬误了。

毛主席的伟大功勋是不可磨灭的。中国历史证明，陈独秀、王明、李立三……都不行，只有毛主席能领导我们走向胜利。没有毛主席，就没有新中国。毛主席的伟大，怎么说也不过分，不是拿言语可以形容得出来的。毛主席不是没有缺点错误的，但与他的伟大功勋相比是微不足道的。……外国人问我（邓副主席），对毛主席的评价，可不可以像对斯大林评价那样三七开？我（邓副主席）肯定地回答，不能这样讲。党中央、中国人民永远不会干赫鲁晓夫那样的事。

现在中央的路线，就是安定团结，稳定局势，搞社会主义现代化。……人心思定，人心思治，人心思上，乱是脱离群众的。国际上也十分注意我们国内局势是不是能够保持稳定。现在外国反映很大，香港有些报纸都在议论，你们那么多问题，应当稳当一点嘛，何必那么急，急了会出问题。……引进新技术，利用外资，你稳定了，人家才敢和你打交道；你乱了起来，别人就不敢和你打交道了。安定团结是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必要政治条件，不能破坏安定团结的局面。这是中央的战略部署。……这是大局，我们处理任何问题，都要从大局着眼，小局服从大局，小道理服从大道理，不搞什么新运动，不要提中央没有提的什么运动。要引导群众向前看。

平反工作，中央和各地都在抓紧处理，都是有领导、有步骤地进行的。群众要求解决的问题，都有解决的渠道，可以在党的会议上提出来，可以写信、来访。林彪、“四人帮”破坏造成的一些遗留问题，都可以逐步解决。解决这些问题是为了创造一个安定团结的稳定局势，把各种积极因素调动起来。^①

26日和27日，邓小平先后接见日本民主社会党委员长佐佐木良和美国专栏作家罗伯特·诺瓦克，讲了同25日大致相同的话。

关于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邓小平说：

毛主席在中国历史上的伟大功绩是难以用言语表达的。在中国，人人都懂得“没有毛主席就没有新中国”。

我们在实现四个现代化进程中，要善于完整地准确地掌握和运用毛泽东思想。我们国家的政治生活要生动活泼，心情舒畅。

关于平反冤假错案，邓小平说：

毛主席一贯主张“有错必纠”。天安门事件是个错案，当然必须纠正。不只是天安门事件，如果有些问题处理不正确，也必须实事求是地加以纠正。有错必纠这正是我们有信心的表现。这样全国人民才能心情舒畅，大家向前看，一心搞好四个现代化。

关于群众议论的问题，邓小平说：

群众的议论，并非一切都是深思熟虑过的，也不可能要求都是完全正确的，这不可怕。我国绝大多数人民群众鉴别是非的能力和关心国家命运的觉悟是了不起

^① 朱佳木 1998年4月17日、21日在当代中国研究所新时期历史座谈会上的发言记录。

的。广大群众是要求安定团结的，是顾全大局的。有些问题群众有疑问，有些话对安定团结、实现四个现代化不利，要向群众说清楚，要善于领导。^①

27日晚，华国锋、叶剑英、邓小平等中央常委听取各组召集人汇报。大家又反映代表们在发言中提到的一些问题，如“二月兵变”、“一月风暴”、纪登奎的错误、对毛泽东的评价等等。

邓小平针对这些问题，重申了他25日、26日、27日的讲话精神。

华国锋在会上提出：

12月7日原来想开全会，现在开不开？要不要开那么长？第一书记都在北京，家里的事情很多，会议不能时间太长，要尽可能压缩时间。你们人都在这里，提一大堆问题怎么办呢？

对此，邓小平明确表示说：

会议要开紧凑一些，不要开得太长。对计划，这个多少，那个多少，不要多去讨论，大体差不多就行，主要把体制、大政策定下来就行了。全会开三天就可以了。

关于中央有错误的几个领导人的处理问题，邓小平说：

现在世界上就看我们有什么变动，加人可以，减人不行，管你多大问题都不动，硬着头皮也不动。这是大局。外国好多人和我们做生意，也看这个大局。

在此之前，发言中有人曾提出过增加政治局委员管组织宣传的建议。在此之后，代表们提出中央委员会和政治局加人的意见就逐渐多起来了。

12月1日，鉴于代表们的注意力没有转到讨论经济工作的

^① 《新华月报》，1978年第12期，第1~2页。

问题上，中央常委又召集部分大军区司令员和省委第一书记开会，通过他们向会议打招呼。邓小平作了重要谈话。他主要讲了这样几个问题：

1. 历史问题只能搞粗，不能搞细。一搞细就要延长会议，这就不利。算我一个请求，要以大局为重，道理在你们，在群众。外国人对其他事没兴趣，主要看中国安定不安定。我是有意识地稀释，只有稀释是正确的。我们想同美国在明年1月1日达成建交协议，等公报出来再同他们谈，不然他就要翘尾巴。

2. 对中央的人事问题，任何人都不能下，只能上。对那几个同志要批评，但不能动，实际上不止他们几个。现有的中央委员，有的可以不履行职权，不参加会议活动，但不除名，不要给人印象是权力斗争。对那些有意见的人，过关算了，检讨没有全过关的，我们过去也没过关嘛。

3. 关于上的问题，至少加三个政治局委员，太多，也不恰当，不容易摆平。加上几个什么人？陈云兼纪委书记；邓大姐、胡耀邦。够格的人有的是，如王胡子，也够格。两个方案，一个三个人，一个四个人。党章规定，中央委员会不能选中央委员，想开个例，补选一点，数目也不能太多。有几个第一书记还不是中央委员，如习仲勋、王任重、周惠，还有宋任穷、韩光、胡乔木、陈再道。将来追认就是了。

4. 1957年反右派斗争是正确的，但后来扩大化了。对“文化大革命”要回避，不能追，追到底不利。清华几个青年贴大字报说：反周民众反，反毛国必乱。这个水平很高。

显然，在邓小平11月14日回国直至12月13日中央工作会

议闭幕前这段时间里，邓小平发表不少指导会议发展进程的谈话，已经在中央常委中起核心作用了。

12月13日，在中央工作会议最后一次全体会议，也就是闭幕会上，邓小平发表应该说是整个中央工作会议，以及后面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最重要的讲话，这就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著名讲话。

邓小平的讲话共分4个大的部分。

第一、解放思想是当前一个重大政治问题。

邓小平指出：

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首先是解放思想。只有思想解放了，我们才能正确地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解决过去遗留的问题，解决新出现的一系列问题，正确地改革同生产力迅速发展不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根据我国的具体情况，确定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具体道路、方针、方法和措施。

他分析了思想不解放的原因，主要是：

一是因为十多年来，林彪、“四人帮”大搞禁区、禁令，制造迷信，把人们的思想封闭在他们假马克思主义的禁锢圈内，不准越雷池一步。

二是因为民主集中制受到破坏，党内确实存在权力过分集中的官僚主义。

三是因为是非功过不清，赏罚不明，干和干一个样，甚至干得好的反而受打击，什么事不干的，四平八稳的，却成了“不倒翁”。

四是因为小生产的习惯势力还在影响着人们。

他还有针对性地指出了思想僵化的严重危害：

思想不解放，思想僵化，很多的怪现象就产生了。

思想一僵化，条条框框就多起来了。

思想一僵化，随风倒的现象就多起来了。

思想一僵化，不从实际出发的本本主义也就严重起来了。

不打破思想僵化，不大大解放干部和群众的思想，四个现代化就没有希望。

他分析了真理标准讨论的实质和意义，把全党的认识提到一个新高度：

目前进行的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的讨论，实际上也就是要不要解放思想的争论。大家认为进行这个争论很有必要，意义很大。从争论的情况来看，越看越重要。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从这个意义上说，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争论，的确是个思想路线问题，是个政治问题，是个关系到党和国家前途和命运的问题。

第二、民主是解放思想的重要条件。

邓小平指出：

解放思想，开动脑筋，一个十分重要的条件就是要真正实行无产阶级的民主集中制。我们需要集中统一的领导，但是必须有充分的民主，才能做到正确的集中。他强调民主的极端重要性：

当前这个时期，特别需要强调民主。因为在过去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民主集中制没有真正实行，离开民主讲集中，民主太少。

我们要创造民主的条件，要重申“三不主义”：不抓辫子，不扣帽子，不打棍子。在党内和人民内部的政

治生活中，只能采取民主手段，不能采取压制、打击的手段。

一个革命政党，就怕听不到人民的声音，最可怕的是鸦雀无声。现在党内外小道消息很多，真真假假，这是对长期缺乏政治民主的一种惩罚。

他着重讲了经济民主的问题：

我想着重讲讲发扬经济民主问题。现在我国的经济管理体制权力过于集中，应该有计划地大胆下放，否则就不利于充分发挥国家、地方、企业和劳动者个人四个方面的积极性，也不利于实行现代化的经济管理和提高劳动生产率。当前最迫切的是扩大厂矿企业和生产队的自主权。同样，要切实保障工人农民个人的民主权利，包括民主选举、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

他结合民主，强调了法制的重要性：

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法制。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国要有国法，党要有党规党法。没有党规党法，国法就很难保障。

第三、处理遗留问题为的是向前看。

邓小平指出：

这次会议，解决了一些过去遗留下来的问题，分清了一些人的功过，纠正了一批重大的冤案、假案、错案。这是解放思想的需要，也是安定团结的需要。目的正是为了向前看，正是为了顺利实现全党工作重心的转变。

我们的原则是“有错必纠”。凡是过去搞错了的东西，统统应改正。有的问题不能够一下子解决，要放到

会后去继续解决。但是要尽快实事求是地解决，干净利落解决，不要拖泥带水。对过去遗留的问题，应当解决好。但是，不可能也不应该要求解决得十分完美。要大处着眼，可以粗一点，每个细节都弄清不可能，也不必要。

他针对对解决历史问题中涉及到的对毛泽东的评价，强调指出：

毛泽东思想永远是我们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的最宝贵的精神财富。我们要完整地准确地理解和掌握毛泽东思想的科学原理，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加以发展。当然，毛泽东同志不是没有缺点、错误的，要求一个革命领袖没有缺点、错误，那不是马克思主义。

他对大家关心的“文化大革命”的评价，提出了原则意见：

关于文化大革命，也应该科学地历史地来看。文化大革命已经成为我国社会主义历史发展中的一个阶段，总要总结，但是不必匆忙去做。要对这样一个历史阶段做出科学的评价，需要做认真的研究工作，有些事要经过更长一点的时间才能充分理解和作出评价，那时再来说明这一段历史，可能会比我们今天说得更好。

第四、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

邓小平指出：

要向前看，就要及时地研究新情况和解决新问题，否则我们就不可能顺利前进。各方面的新情况都要研究，各方面的新问题都要解决，尤其要注意研究和解决管理方法、管理制度、经济政策这三方面的问题。

他针对管理体制上存在的问题，强调克服官僚主义、加强责任制：

在管理方法上，当前要特别注意克服官僚主义。现

在，我们的经济管理工作，机构臃肿，层次重叠，手续繁杂，效率极低。如果现在再不实行改革，我们的现代化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就会被葬送。

在管理制度上，当前要特别注意加强责任制。要使责任制真正发挥作用：一要扩大管理人员的权限。二要善于选用人员，量才授予职责。三要严格考核，赏罚分明。

他特别强调要在经济政策上让一部分人生活先好起来、富裕起来：

在经济政策上，我认为要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企业、一部分工人农民，由于辛勤努力成绩大而收入先多一些，生活先好起来。一部分人生活先好起来，就必然产生极大的示范力量，影响左邻右舍，带动其他地区、其他单位的人们向他们学习。这样，就会使整个国民经济不断地波浪式地向前发展，使全国各族人民都能比较快地富裕起来。

这是一个大政策，一个能够影响和带动整个国民经济的政策，建议同志们认真加以考虑和研究。

邓小平的这个讲话虽然是在工作会议上讲的，但实际上成为后来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主题报告。近20年后，江泽民在中共十五大报告中盛赞邓小平的这个讲话是“开辟新时期新道路、开创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理论的宣言书”。

（程中原等著《1976~1981年的中国》）

新时期的里程碑：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

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京西宾馆举行。这次全会只开了5天，却实现了建国以来党和国家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与此同时，邓小平作为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核心的地位得到实际上的确立。可是，这次只开了5天的会议，怎么会成为中国历史的转折点，怎么会成为“新时期的遵义会议”呢？

经过中央工作会议的充分准备，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于工作会议结束后的第三天在京西宾馆召开了。

中央工作会议结束后，出席会议的十一届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留了下来，一些不是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的同志各自回本单位去了。京西宾馆又迎来了许多新面孔。

十一届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共有333名，其中中央委员201名，候补中央委员132名。自中共十一大以来已逝世的中央委员5名、候补中央委员1名，共6名。经中央政治局批准，不通知参加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中央委员13名、候补中央委员12名，共有25名。这样，出席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中央委员183名、候补中央委员119名，共302名；加上因工作需要中央政治局决定列席会议的9位同志，应参加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共311名。具体名额如下：

中央政治局 26 名：

中央政治局常委：华国锋、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汪东兴。

中央政治局委员（按姓氏笔画为序）：韦国清、乌兰夫、方毅、刘伯承、许世友、纪登奎、苏振华、李德生、吴德、余秋里、张廷发、陈永贵、陈锡联、耿飚、聂荣臻、倪志福、徐向前、彭冲。

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陈慕华（女）、赵紫阳、赛福鼎。

人大常委会 9 名：陈云、谭震林、李井泉、张鼎丞、蔡畅（女）、邓颖超（女）、廖承志、姬鹏飞、周建人。

中央机关 13 名。

待中央另行分配工作的 2 名。

国家机关 35 名。

全国政协 1 名。

解放军 67 名。

各省、市、自治区：北京市 7 名；天津市 4 名；河北省 5 名；山西省 3 名；内蒙古自治区 2 名；辽宁省 6 名；吉林省 5 名；黑龙江省 4 名；上海市 8 名；江苏省 6 名；山东省 6 名；安徽省 4 名；浙江省 5 名；福建省 4 名；江西省 5 名；湖南省 7 名；湖北省 7 名；广东省 6 名；广西壮族自治区 6 名；河南省 6 名；四川省 6 名；云南省 6 名；贵州省 4 名；西藏自治区 5 名；陕西省 4 名；甘肃省 5 名；宁夏回族自治区 4 名；青海省 4 名；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5 名。

列席十一届三中全会的 9 人是：全国政协宋任穷；中央军委顾问黄克诚；最高人民检察院黄火青；中国社会科学院胡乔木；国家建委韩光；内蒙古自治区周惠；陕西省王任重；广东省习仲勋；铁道兵陈再道。

由于有 21 名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因事因病请假，没有出席十一届三中全会，所以实际应出席全会的中央委员 169 名，

候补中央委员 112 名，加上列席的 9 人，共 290 人。

十一届三中全会同中央工作会议一样，分六个大组讨论，召集人没有变化，会议室也没有变化，只是各组人数与中央工作会议时略有变化，具体情况如下：

华北组 51 人，召集人为林乎加、刘子厚、罗青长、秦基伟，会场在京西宾馆第九会议室；

东北组 47 人，召集人为王恩茂、任仲夷、唐克、杨勇，会场在京西宾馆第十一会议室；

华东组 64 人，召集人为彭冲、万里、白如冰、聂凤智，会场在京西宾馆第十三会议室；

中南组 56 人，召集人为段君毅、毛致用、黄华、杨得志，会场在京西宾馆第十四会议室；

西南组 44 人，召集人为赵紫阳、安平生、张平化、梁必业，会场在京西宾馆第十五会议室；

西北组 44 人，召集人为汪锋、霍士廉、胡耀邦、肖华，会场在京西宾馆第十六会议室。

中共中央主席、副主席未编入各组。

12 月 17 日，出席会议的同志陆续来到京西宾馆报到。十一届三中全会秘书组印发了出席全会名单、全会分组名单和全会日程，印发了华国锋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三次讲话和叶剑英、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的讲话。有的代表开始阅读文件，有些参加了中央工作会议的同志向没有参加工作会议的同志介绍情况。

当天下午，中央政治局常委召集十一届三中全会各组召集人开会。华国锋主席和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汪东兴副主席出席了会议。华国锋、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就如何开好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及会议的指导思想、开会办法和议程安排等问题讲了话。讲话的主要内容是，中央工作会议上许多同志要求有错误

的几位同志在全会上作个像样的检讨，常委决定，认为可以不再在会上检讨了。

按照全会的日程安排，12月18日白天，各组分别安排讨论或阅读文件。全会秘书组印发了《1979、1980两年经济计划的安排（草案）》（1978年12月18日）和《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试行草案）》（1978年12月16日修改稿）。

这天上午，华北组、西南组、西北组分别召开会议。下午，东北组、华东组、中南组分别召开会议。各组召集人传达了华国锋主席和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副主席在12月17日下午各组召集人会议上的讲话。各组到会同志一致表示拥护这些讲话，一致同意中央确定的这次全会的三项议程、会议开法和时间安排。有的组还讨论了中央政治局常委的意见，表示赞同对汪东兴、纪登奎、陈锡联、吴德四位犯错误的同志，给予一段时间考虑自己的问题，不在这次全会上作检查。

在讨论中，除华北组、华东组决定分为两个小组进行讨论外，其余各组不再分小组。

12月18日晚8时，京西宾馆第一会议室灯火通明，十一届三中全会在这里举行开幕会。中共中央主席华国锋，副主席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汪东兴出席了会议。中央政治局委员乌兰夫、方毅、纪登奎、苏振华、李德生、吴德、余秋里、陈永贵、陈锡联、耿飏、聂荣臻、倪志福、徐向前、彭冲，政治局候补委员陈慕华、赵紫阳、赛福鼎出席了会议。韦国清、刘伯承、许世友、张廷发等27人因事因病请假，实到会284人，其中中央委员164人，候补中央委员111人，列席9人。

华国锋主持会议，并代表中央政治局就全会的任务和开法讲了话。

华国锋提出，我们这次全会的主要任务，就是讨论通过中央政治局提出的关于从明年1月起，把全党工作着重点转移到社会

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问题；同时审议、通过农业问题的两个文件，和1979、1980两年经济计划的安排；讨论人事问题和选举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华国锋在介绍了中央工作会议的情况后指出：中央政治局同志和到会同志一致认为，这次会议开得很好、很成功，为开好三中全会做了充分准备，创造了有利条件。华国锋提出，中央工作会议已经开了一个多月，所以，中央政治局的意见，这次三中全会只开五天，希望到会同志集中精力，把会议开好，完成这次全会预定的任务。

由于会期较短，各组采取了集中时间阅读文件的办法。除上面提到的文件外，12月19日，中央工作会议秘书组又印发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1978年12月16日），以及汪东兴、纪登奎、吴德、陈锡联四人分别提交的书面检讨。这一天，各组的同志认真阅读了会议印发的文件。

12月19日下午，会内会外各发生了一件事情。

一件是西北组首先开始讨论12月17日中央政治局常委的讲话和18日华国锋在开幕会上的讲话。讨论中，向中央提出了五条建议：（一）今后中央开会，在主席台就座的，应为主席、副主席、军委副主席，政治局的其他同志应和中央委员坐在一起，可以坐第一排；（二）部分开放中南海；（三）开放人民大会堂；（四）政治局的同志要多接触群众，克服特殊化；（五）成立中央书记处或设立中央秘书长。

另一件是汪东兴主持召开了关于移交中央专案一、二、三办和“五一六”联办专案材料的会议。会上确定了四条原则：（一）所有未结案的案件，全部移交给中央组织部，各专案办公室从即日起停止专案工作。所有这些案件，概由中央组织部负责复查。（二）已经结案的档案材料，由于已交中央档案馆，应立即从中央档案馆取回移交给中央组织部。（三）各专办的文书档案，一

律加以封存，待中央决定处理。（四）各专办负责人，要负责做好各专办人员的思想政治工作，避免发生问题。这些同志，要一心做好移交工作，在移交完成后，再回原单位分配工作。

这两件改进中央领导工作的事情，虽然不是这次全会的议题，但却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在随后的分组讨论中，其他组也向中央提出了建议，并拥护中央对专案工作的处理和安排。

从12月20日开始，到22日下午，各组讨论了印发的文件。20日，会议秘书组印发了《增补中央副主席、政治局委员、中央委员候选人名单》。21日，又印发了中央组织部《关于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组成问题的第三次报告》及附件《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候选人名单（草案）》。这三天分组讨论的内容，概括起来有三个方面：一是原先参加中央工作会议的中央委员们以发言等形式向未参加工作的人介绍情况；二是所有出席者都对中央领导同志的讲话表态，对全会要增补的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副主席表态，对中央设立纪律检查委员会表态；三是同中央工作会议一样，对工作重点转移、“两个凡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平反冤假错案、康生问题等发表意见。还有一个内容便是对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的草稿表态并提出修改意见。

在分组讨论中，与会者首先赞扬几天前闭幕的中央工作会议开得很成功。认为那次会议真正恢复和发扬了毛泽东生前一贯倡导的实事求是、群众路线、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优良传统和作风，自始至终坚持了民主集中制的原则。相信中央工作会议的好会风，定能在三中全会上发扬光大，使这次全会取得更大的成果。

与会同志讨论了工作重点转移、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农业问题两个文件、1979和1980两年经济计划的安排、处理历史遗留问题、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健全民主与法制、加强党的组织建设等重大问题，并建议中央以中央全会的名义作出郑重的决

定。

对农业问题两个文件，不少人提出了修改意见。在讨论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候选人时，各组同意中央政治局的意见，增加王建安为候选人。

12月22日，各组分别讨论了《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公报》（12月21日稿）。早在中央工作会议期间，就开始了这个公报稿的起草工作，先写出了一个稿子。12月10日，华国锋约胡耀邦、胡乔木、胡绩伟谈话，让胡乔木主持重新起草公报稿。12月14日，召开了一次会议。参加者有胡耀邦、胡乔木、胡绩伟、于光远、林涧青、房维中等人。之后，由林涧青等人起草出一个稿子。12月17日又开了一次会，讨论这个稿子。12月18日晚，胡乔木又找胡耀邦、于光远等人讨论了一次。12月19日，再次改过一遍后，送给了胡乔木。经19日、20日、21日胡乔木三次修改，终于在全会闭幕的最后一天，送到了与会者的手中。与会者经过讨论，提出了一些修改意见。

12月22日晚7时30分，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在京西宾馆第一会议室举行闭幕会。华国锋主席和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汪东兴副主席出席会议。实到会285人，其中中央委员164人，候补中央委员112人，列席9人。华国锋主持了会议。

全会一致原则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试行草案）》。并确定这两个文件先传达到县，广泛征求意见，由省、市、自治区集中修改意见，报中央定稿后，由中央正式发文件。

全会一致原则通过《1979、1980两年经济计划的安排》。这个文件由国务院正式下达文件，并确定传达范围。建议国务院在修改后提交明年召开的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讨论通过。

全会一致原则通过《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

全体会议公报》。中央政治局根据大家提出的意见，再作些修改，然后在12月24日发表。

全会增选陈云为中央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常委、中央委员会副主席；增选邓颖超、胡耀邦、王震3人为中央政治局委员。

全会增补选举黄克诚、宋任穷、胡乔木、习仲勋、王任重、黄火青、陈再道、韩光、周惠等9人为中央委员，将来提请党的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对这一增补手续予以追认。

全会选举了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选举陈云为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一书记，邓颖超为第二书记，胡耀邦为第三书记，黄克诚为常务书记，王鹤寿、王从吾、刘顺元、张启龙、袁任远、章蕴（女）、郭述申、马国瑞、李一氓、魏文伯、张策等11人为副书记，并选举了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常务委员和委员85人。

会议宣布选举结果后，陈云发表了讲话。他说：

我认为三中全会和在此以前的中央工作会议，开得很成功。大家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解放思想，畅所欲言，充分恢复和发扬了党内民主和党的实事求是、群众路线、批评和自我批评的优良作风，认真讨论了党内存在的一些重大问题，增强了团结。会议真正实现了毛泽东同志提倡的“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全会决定，一定要把这种风气扩大到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中去。这一次是在中央开会，要扩大到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中去，还要做很多工作，还可能遇到这样那样的问题。在延安整风时，毛泽东同志首先集中了几十个高级干部，连续开了几个月的整风会议，大家面对面地指名道姓地批评和自我批评，认真总结建党以来的经验教训，在这个基础上写出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后就

开党的七大，全党同志团结一致，取得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1957年毛泽东同志又提出了要求全党实现这种心情舒畅、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由于种种干扰，很多年没有实现。九大、十大党章中也写了这一要求，但完全没有实现。这一次党中央带了个好头，只要大家坚持下去，就有可能在全国实现。这对于安定团结、实现四个现代化一定会起重要的作用。现在三中全会选举我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中央委员会副主席，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一书记，我感谢工作会议和中央全会同志们对我的信任。

但是我的身体状况是很差的。我将尽我的力量来工作。我只能做最必要的工作，就是说量力而行。

陈云讲话后，华国锋发表了讲话。

华国锋首先对十一届三中全会和中央工作会议作了评价，并对与会者提出的一些问题表了态。他说，这次中央全会和为全会作准备的中央工作会议，充分恢复和发扬了党内民主和党的实事求是、群众路线、批评和自我批评的优良作风。大家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解放思想，畅所欲言；本着对党对人民负责的态度，运用团结——批评——团结的整风方法，对中央政治局内几位犯错误的同志，和中央几个部门的工作提出了许多批评意见。这种精神是非常可贵的，应该坚持，应该发扬。全会闭幕之后，中央政治局和政治局常委，对同志们在这两个会议上提出的许多应兴应革的批评和建议，当认真分析研究，妥善加以处理，并向下次中央全会作出负责的报告。到会同志一致认为，这两次会议都开得很好，很成功，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具有重大意义，对今后工作必将产生深远的影响。我们一定要将这两次会议的民主精神和优良风气永远保持下去，并且推广到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中去。

接着，华国锋说，全会经过讨论，一致同意全国范围的大规模的揭批“四人帮”的群众运动在今年内就可以结束了。但不搞一刀切，少数地方和单位结束运动的时间可以适当推迟；对运动中的所有遗留问题，都要善始善终地处理好。至于从思想上、理论上批判林彪、“四人帮”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彻底肃清他们的流毒和影响，仍然是一项长期的任务。但是，这决不影响党的工作着重点的转移。

华国锋着重讲了实现全党工作着重点转移所要解决的几个问题。他提出，为了顺利地实现党的工作着重点的转移，我们一定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一定要执行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一定要不断地加强各级领导班子的建设，一定要抓紧落实党的干部政策，一定要保持谦虚谨慎、戒骄戒躁的作风。

华国锋在讲了关于三中全会和中央工作会议精神的传达贯彻问题之后，着重讲了如何对待毛泽东的问题。他说，毛泽东同志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没有毛主席，就没有新中国，没有毛泽东思想，就不可能有中国革命的胜利。毛泽东同志在长期革命斗争中立下的伟大功勋是不可磨灭的，我们一定要教育我们的子孙后代永远铭记不忘。在这两次会议上，我们解决了历史上遗留的一系列重要问题。这些问题中许多是同毛主席有关系的，许多问题的错误处理是毛主席同意过的。在公报宣布以后和会议的一些内容传达以后，党内外肯定会有很多人围绕毛主席的评价问题发议论。我们会议的公报以及中央工作会议期间小平同志和其他领导同志的一些谈话，已经给同志们指明了对待这一问题的正确态度。我们纠正了一些历史上的错误，是把毛主席的旗帜举得更高。

华国锋最后宣布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胜利闭幕。

至此，十一届三中全会落下了帷幕。这次会议虽然只开了五天，但它作出的一系列重大决策，犹如一声惊雷，复苏了中国大

地，犹如一座黄钟大吕，奏响了呼唤新时代的序曲。由此，中国的历史发生了转折。这次会议理所当然地成为改变中国历史进程的转折点。

这一伟大的历史转折，表明自 50 年代以来，中共中央多次提出却因主客观条件制约，尤其是 1957 年以后钟情于“左”倾错误而始终未能实现的工作重心转移的历史任务，终于开始实现。它表明多次提出却由于历史的局限和“左”倾指导思想的干扰而一再中断的改革开放尝试，终于可以迈开步伐。更重要的是，它同时也表明从 50 年代就已开始的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在走过了“左”的歧途之后，终于走上了正轨。

十一届三中全会，标志着党和国家进入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尽管在前进的道路上还会有困难，还会遇到来自“左”的或右的障碍，但自此之后，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成为不可逆转的大趋势，想要走回头路已经不可能了。

如同遵义会议成为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伟大转折一样，十一届三中全会成为建国以来党的历史上具有深远的意义的伟大转折。中国将从此掀起一场彻底改变贫困落后面貌的革命。

十一届三中全会，就是这一伟大转折和新的革命的起点。

那么，为什么十一届三中全会能够作出这些重大决策，从而使中国的历史在这里发生了转折呢？分析起来有以下几个原因：

第一，“文化大革命”把“左”倾错误推向极端，促使党和人民的醒悟和反思。“文化大革命”使冤狱遍地，国民经济停滞不前，人们的思想僵化，人民的生活水平没有多大改善甚至下降，中国与发达国家的差距进一步拉大。这种灾难性的后果令党和人民震惊，也使党和人民不得不对“文化大革命”的教训进行深刻的反思和总结。正是针对“以阶级斗争为纲”，党提出要把发展经济作为中心；正是针对过去墨守成规和封闭，党提出要实

行改革和开放。

第二，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为十一届三中全会奠定了坚实的思想理论基础。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实际上是要不要解放思想、要不要实事求是的争论。通过讨论，冲破了长期存在的教条主义和个人崇拜的严重束缚，澄清了许多被林彪、“四人帮”搞乱了的思想是非、理论是非、路线是非，促进了人们的思想解放，人们开始从“两个凡是”的禁锢和束缚中解放出来。在中央工作会议和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充分肯定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意义，正确地解决了党的思想路线问题。正是在这个正确的思想路线指导下，三中全会才能解决一系列重大问题，作出一系列重大决策。

第三，恢复和发扬党的群众路线、民主集中制等优良传统，认真开展了批评与自我批评。在会上，大家敞开思想，畅所欲言，敢于讲心里话，讲实在话。大家积极开展批评，包括对中央领导人和中央工作的批评，都能把意见摆在桌面上。对犯有错误的领导同志，大家摆事实，讲道理，指名道姓，有时是面对面地开展批评。会议对发言不定框框，不加限制，言责自负，记录定稿就登简报。中央政治局不但鼓励大家大胆地发表意见，而且及时地解决大家提出的问题。对与会者提出的“文化大革命”中发生的一些重大政治事件和“文化大革命”前遗留的某些历史问题，中央政治局常委坚持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的原则，立即开会研究，及时作出决定，并在会上宣布。这种实事求是精神和民主精神，对于全党解放思想，调动积极因素，恢复和发展党的生机和活力，推进党的事业向前发展，起了很好的示范作用。

第四，中央政治局集思广益，善于集中正确意见。如，在中央工作会议上，中央政治局收到西北组汪峰、霍士廉、胡耀邦、肖华联名提出的关于人事等方面的书面建议后，立即在简报上登载。随后，中南组、华北组等五个组相继向中央政治局提交了书

面建议。中央政治局采纳各组的正确意见，经十一届三中全会和12月25日的中央政治局会议研究，妥善地解决了人事变动和安排问题，加强了中央领导机构。关于撤销中央专案机构的问题，不仅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宣布了决定，而且在全会期间就召开了关于移交中央专案一、二、三办和“五一六”联办专案材料会议，并确定四条处理原则。中央政治局还采纳了同志们提出的建议，决定部分开放中南海，开放人民大会堂，开放丰泽园毛泽东故居，供人民群众参观。

第五，邓小平、叶剑英、陈云等老一辈革命家和党的领导骨干在会上发挥了中流砥柱的作用。邓小平早在1978年9月就提出全党工作着重点的转移问题，经中央政治局同意，确定为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主要议题；他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的重要讲话中，提出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指导方针。叶剑英就领导班子和民主法制等问题作了重要讲话。陈云率先提出平反冤假错案，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并就经济工作提出了重要意见。他们在重大问题上的这些重要意见，对把握会议方向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与此同时，许多领导同志积极配合，提出了很多中肯的意见和建议。李先念的讲话材料中提到了对外开放问题。胡耀邦就解放思想，彻底平反冤假错案，放手恢复老干部工作问题提出了意见。赵紫阳就经济管理体制体制改革问题提出了建议，胡乔木就“少宣传个人”提出了建议，等等。这些对于开好会议，也起了重要的作用。

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了把党的工作着重点转移到现代化建设上来和改革开放的决策，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它标志着全面拨乱反正的开始，是从“文化大革命”的失败到改革开放新时期的转折点

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主要议题，是围绕全党工作着重点从1979年起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相应地作出了一系

列关系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重大决策。

第一，全会决策的中心问题是适应国内外形势的发展，及时地、果断地结束全国范围的大规模的揭批林彪、“四人帮”的群众运动，从1979年起，把全党工作的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

全会的这一决策，成功地解决了此前20多年没有解决的一个重大问题，即无产阶级掌握政权，建立了社会主义的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之后，到底应当把主要精力放在什么上面，才符合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1956年中共八大曾经正确地解决这个问题。可是不久八大的正确路线就中断了。只是经过20多年之后，有了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之后，才深刻地认识了这个问题。这一决策，是具有深远意义的，是关乎中国社会主义事业前途的大事，因为它在事实上使整个国家真正走上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轨道。

全会通过总结历史经验，说明了实行工作重点转移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全会公报在展开阐述这一问题时，明确指出：全会对于中央在二中全会以来十个月的工作表示满意。全国揭批林彪、“四人帮”的政治大革命取得了伟大的胜利；国民经济得到了进一步的恢复和发展；全国出现了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我国外交政策得到了重大进展。所有这一切，都为全党把工作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准备了良好条件。

全会指出，在我国发展国际反霸统一战线、发展同世界各国的友好关系方面，取得了新的重要成就。我国领导人今年内对朝鲜、罗马尼亚、南斯拉夫、柬埔寨、伊朗、缅甸、尼泊尔、菲律宾、孟加拉、日本、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等亚洲、非洲、拉丁美洲、欧洲一系列国家的访问，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缔结，中美两国关系正常化谈判的完成，为亚洲和世界和平作出了重大贡献。但是战争危险仍然严重存在，我们必须加强国防，随时准备

击退来自任何方面的侵略者。全会认为，随着中美关系正常化，我国神圣领土台湾回到祖国怀抱、实现统一大业的前景，已经进一步摆在我们的面前。全会欢迎台湾同胞、港澳同胞、海外侨胞，本着爱国一家的精神，共同为祖国统一和祖国建设的事业继续作出积极贡献。

全会公报指出，毛泽东同志早在建国初期，特别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就再三指示全党，要把工作中心转到经济方面和技术革命方面来。毛泽东同志和周恩来同志领导我们党在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取得了重大的成就，但是后来被林彪、“四人帮”打断了，破坏了。此外，由于我们对于社会主义建设缺乏经验，工作指导上发生了一些缺点和错误，也妨碍了党的工作中心转变的完成。现在，全国范围内揭批林彪、“四人帮”的群众运动已经基本上胜利完成，虽然少数地区和部门的运动比较落后，还需要一段时间来抓紧进行，不能一刀切，但是就整体来说，实行全党工作中心转变的条件已经具备。

全会公报阐明了实现这种转变的重要意义，指出：全会一致同意华国锋同志代表中央政治局所提出的决策，现在就应当适应国内外形势的发展，及时地、果断地结束全国范围的大规模的揭批林彪、“四人帮”的群众运动，把全党工作的着重点和全国人民的注意力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这对于实现国民经济3年、8年规划和23年设想，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巩固我国的无产阶级专政，具有重大的意义。我们党所提出的新时期的总任务，反映了历史的要求和人民的愿望，代表了人民的根本利益。我们能否实现新时期的总任务，能否加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并在生产迅速发展的基础上显著地改善人民生活，加强国防，这是全国人民最为关心的大事，对于世界的和平和进步事业也有十分重大的意义。

实行工作重点转移后，如何看待国内的阶级斗争问题呢？全会公报指出：我们国内现在还存在着极少数敌视和破坏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反革命分子和刑事犯罪分子，我们决不能放松同他们的阶级斗争，决不能削弱无产阶级专政。但是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已经基本结束，对于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斗争，应该按照严格区别和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的方针去解决，按照宪法和法律规定的程序去解决，决不允许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矛盾的界限，决不允许损害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所需要的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全会要求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同心同德，进一步发展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并且立即动员起来，鼓足干劲，群策群力，为在本世纪内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而进行新的长征。

这种对于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斗争的认识，得来不易。尽管在这次会议上还没有正式对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作出明确的回答，但这种认识已经是自中共八大明确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的社会主要矛盾以来，中共中央第一次对阶级斗争问题正式作出如此明确的限定，这就从政治上保证了工作重点转移的顺利实现。

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也就是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轨道上来，这的确是个历史性的转变。它反映了中国共产党人认识的深化和警醒，和对于纠正“左”倾错误必要性的共识。这就为党的基本路线的形成和再度迎来中国复兴的曙光，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第二，为适应工作重点转移的要求，全会强调要根据新的历史条件和实践经验，采取一系列重大的经济措施，对经济管理体制和经营管理方法进行改革，公开树立起了改革开放的大旗。

在对建国以来经济建设中的经验教训已有初步认识的基础上，与会同志普遍感到，实行工作重点转移之后，决不能再沿用

过去的管理体制、管理方法，而必须根据现代化建设的需要进行大胆改革，探索新的发展道路。全会公报指出：实现四个现代化，要求大幅度地提高生产力，也就必然要求多方面地改变同生产力发展不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改变一切不适应的管理方式、活动方式和思想方式，因而是一场广泛、深刻的革命。

全会明确提出了实行改革开放的问题。全会公报指出：实践证明，保持必要的社会政治安定，按照客观经济规律办事，我们的国民经济就高速度地、稳定地向前发展，反之，国民经济就发展缓慢甚至停滞倒退。现在，我们实现了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恢复和坚持了长时期行之有效的各项经济政策，又根据新的历史条件和实践经验，采取一系列新的重大的经济措施，对经济管理体制和经营管理方法着手进行认真的改革，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积极发展同世界各国平等互利的经济合作，努力采用世界先进技术和先进设备，并大力加强实现现代化所必需的科学和教育工作。

全会把实行工作重点转移和改革开放政策同毛泽东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联系起来，指出：毛泽东 1956 年总结我国经济建设经验的《论十大关系》报告中提出的基本方针，既是经济规律的客观反映，也是社会政治安定的重要保证，仍然保持着重要的指导意义。

全会明确指出了经济管理体制中权力过于集中等弊端，提出了一些改革的措施。全会公报指出：现在我国经济管理体制的一个严重缺点是权力过于集中，应该有领导地大胆下放，让地方和工农业企业在国家统一计划的指导下有更多的经营管理自主权；应该着手大力精简各级经济行政机构，把它们的大部分职权转交给企业性的专业公司或联合公司；应该坚决实行按经济规律办事，重视价值规律的作用，注意把思想政治工作和经济手段结合起来，充分调动干部和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应该在党的一元化

领导之下，认真解决党政企不分、以党代政、以政代企的现象，实行分级分工分人负责，加强管理机构和管理人员的权限和责任，减少会议公文，提高工作效率，认真实行考核、奖惩、升降等制度。采取这些措施，才能充分发挥中央部门、地方、企业和劳动者个人四个方面的主动性、积极性、创造性，使社会主义经济的各个部门各个环节普遍地蓬蓬勃勃地发展起来。

全会提出的这些改革措施，就使此前关于改革开放的酝酿正式成为党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总方针，使工作重点转移，同时也成为通过改革开放，探索社会主义建设新道路，进行一场新的革命的开端。

全会还围绕工作重点转移和实行改革开放的政策，讨论了当前的经济工作，作出了一系列的决策。

全会公报指出：全会讨论和原则同意 1979、1980 两年的国民经济计划安排，建议国务院在修改后提交明年召开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讨论通过。

全会讨论并原则通过的《1979、1980 两年国民经济计划的安排》提出，在经济工作上必须实行三个转变：一是从上到下都要把主要注意力转到生产斗争和技术革命上来；二是从那种不计经济效果、不讲工作效率的官僚主义的管理制度和管理方法，转到按照经济规律办事、把民主和集中很好结合起来的科学管理的轨道上来；三是从那种不同资本主义国家进行经济技术交流的闭关自守或半闭关自守状态，转为积极地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利用国外资金，大胆地进入国际市场。

全会认为，这个计划安排是积极可行的。全会指出，粉碎“四人帮”以后，我国国民经济恢复和发展的步子很快，1978 年的工农业总产值和财政收入都有较大幅度的增长。但是必须看到，由于林彪、“四人帮”的长期破坏，国民经济中还存在不少问题。一些重大的比例失调状况没有完全改变过来，生产、建

设、流通、分配中的一些混乱现象没有完全消除，城乡人民生活中多年积累下来的一系列问题必须妥善解决。我们必须在这几年中认真地逐步地解决这些问题，切实做到综合平衡，以便为迅速发展奠定稳固的基础。基本建设必须积极地而又量力地循序进行，要集中力量打歼灭战，不可一拥而上，造成窝工和浪费。

全会公报指出：会议深入讨论了农业问题，同意将《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和《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试行草案）》发到各省、市、自治区讨论和试行。全会认为，全党目前必须集中主要精力把农业尽快搞上去，因为农业这个国民经济的基础，这些年来受了严重的破坏，目前就整体来说还十分薄弱。只有大力恢复和加快发展农业生产，坚决地、完整地执行农林牧副渔并举和“以粮为纲，全面发展，因地制宜，适当集中”的方针，逐步实现农业现代化，才能保证整个国民经济的迅速发展，才能不断提高全国人民的生活水平。为此目的，必须首先调动我国几亿农民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必须在经济上充分关心他们的物质利益，在政治上切实保障他们的民主利益。从这个指导思想出发，全会提出了当前发展农业生产的一系列政策措施和经济措施。其中最重要的是：人民公社、生产大队和生产队的所有权和自主权必须受到国家法律的切实保护；不允许无偿调用和占有生产队的劳力、资金、产品和物资；公社各级经济组织必须认真执行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按照劳动的数量和质量计算报酬，克服平均主义；社员自留地、家庭副业和集市贸易是社会主义经济的必要补充部分，任何人不得乱加干涉；人民公社要坚决实行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制度，稳定不变；人民公社各级组织都要坚决实行民主管理、干部选举、账目公开。会议认为，在今后一个较长时间内，全国粮食征购指标继续稳定在1971年到1975年“一定五年”的基础上不变，绝对不许购过头粮。为了缩小工农业产品交换的差价，全会建议国务院作出决

定，粮食统购价格从1979年夏粮上市的时候起提高20%，超购部分在这个基础上再加价50%，棉花、油料、糖料、畜产品、水产品、林产品等农副产品的收购价格也要分别情况，逐步作相应的提高。农业机械、化肥、农药、农用塑料等农用工业品的出厂价格和销售价格，在降低成本的基础上，在1979年和1980年降低10%~15%，把降低成本的好处基本上给农民。农产品收购价格提高以后，一定要保证城市的生活水平不致下降。粮食销价一律不动；群众生活必需的其他农产品的销价，也要坚决保持稳定；某些必须提价的，要给予消费者以适当补贴。会议还讨论了加强农业科学教育、制订发展农林牧业的区域规划、建立现代化的农林牧渔业基地、积极发展农村社队工副业等重要问题，决定采取相应的措施。

全会还讨论了改善城乡人民生活的问题。全会公报指出：城乡人民的生活必须在生产发展的基础上逐步改善，必须坚决反对对人民生活中的迫切问题漠不关心的官僚主义态度。同时，我国经济目前还很落后，生活改善的步子一时不可能很大，必须把有关的情况经常告诉人民，并在人民和青年中继续加强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革命思想教育，各级领导同志必须以身作则。

这样，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决定党的工作重点转移的同时，作出了实行改革开放的重大决策。应该看到，这次全会提出的改革措施还是初步的，有些政策也还没有实质性的突破。如《中共中央关于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和《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试行草案）》两个文件，其大部分规定是好的，但还只是一些一般性的原则，而“人民公社各级组织都要坚决实行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制度，稳定不变”这样的话，则是没有改革精神的。况且，在《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试行草案）》中还写有“两个不许”，即“不许包产到户”、“不许分田单干”这样的规定。尽管全会公报没有把这些话写进去，但“两个不许”还是

禁锢着人们的头脑。因为那时安徽等地的实践已经证明，真正能提高农民劳动积极性的是实行“包产到户”。这说明，尽管全会已鲜明地提出了改革和开放这两大问题，但真正迈开改革的步伐，取得较大的突破，还要假以时日。

第三，全会围绕工作重点转移和实行改革开放，认真讨论了“文化大革命”及其以前的重大事件和遗留问题，强调了平反冤假错案、加强民主和法制建设的重要性。

由于长期“左”倾错误特别是“文化大革命”十年内乱造成了大量的冤假错案和处理失当的历史遗留问题，不仅使一大批领导干部长期受迫害不能工作，而且使亿万人民群众精神上也受到了压抑，积郁着不满的情绪，成为粉碎“四人帮”以后实现安定团结局面的一大障碍。而实现工作重点转移，又必须以巩固的安定团结局面为前提。因此，从巩固安定团结、实行工作重点转移和加快经济建设的需要出发，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下大力气平反冤假错案，妥善地解决历史遗留问题。

全会认真地讨论了“文化大革命”中发生的一些重大政治事件，也讨论了“文化大革命”前遗留下来的某些历史问题。全会认为，解决好这些问题，对于进一步巩固安定团结的局面，实现全党工作中心的转移，使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万众一心向前看，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为四个现代化努力，是非常必要的。

全会指出：1975年，邓小平同志受毛泽东同志委托主持中央工作期间，各方面工作取得很大成绩，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是满意的。邓小平同志和中央其他领导同志一道，按照毛泽东同志的指示，对“四人帮”的干扰破坏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四人帮”硬把1975年的政治路线和工作成就说成是所谓“右倾翻案风”，这个颠倒了的历史必须重新颠倒过来。全会指出：1976年4月5日的天安门事件完全是革命行动。以天安门事件为中心的全国亿万人民沉痛悼念周恩来同志、愤怒声讨“四人

帮”的伟大革命群众运动，为我们党粉碎“四人帮”奠定了群众基础。全会决定撤销中央发出的有关“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和天安门事件的错误文件。

全会审查和纠正了过去对彭德怀、陶铸、薄一波、杨尚昆等同志所作的错误结论，肯定了他们对党和人民的贡献。会议指出，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必须遵循毛泽东同志一贯倡导的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的原则。只有坚决地平反假案，纠正错案，昭雪冤案，才能够巩固党和人民的团结，维护党和毛泽东同志的崇高威信。在揭批“四人帮”的群众运动结束以后，这个任务还要坚决抓紧完成。全会一致认为，采取这些步骤，正是完整地、准确地掌握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的表现，正是高举毛主席旗帜的表现。

全会鉴于历史的教训，认为过去那种脱离党和群众的监督，设立专案机构审查干部的方式，弊病极大，必须永远废止。

全会对这几件重大案件的平反，成为平反一切冤假错案，进而在政治上全面清理和彻底纠正“文化大革命”及其以前的“左”倾错误的开端。

全会对于中央工作会议提出的民主和法制问题，进行了认真讨论，形成了比较一致的意见，作出了加强民主和法制建设的决定。

全会认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集中统一的领导，需要严格执行各种规章制度和劳动纪律。资产阶级派性和无政府主义必须坚决反对。但是必须有充分的民主，才能做到正确的集中。由于在过去一个时期内，民主集中制没有真正实行，离开民主讲集中，民主太少，当前这个时期特别需要强调民主，强调民主和集中的辩证统一关系，使党的统一领导和各个生产组织的有效指挥建立在群众路线的基础上。在人民内部的思想政治生活中，只能实行民主方法，不能采取压制、打击手段。要重申不抓辫子、

不扣帽子、不打棍子的“三不主义”。各级领导要善于集中人民群众的正确意见，对不正确的意见进行适当的解释说服。宪法规定的公民权利，必须坚决保障，任何人不得侵犯。

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社会主义法制，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具有稳定性、连续性和极大的权威，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从现在起，应当把立法工作摆到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的重要议程上来。检察机关和司法机关要保持应有的独立性；要忠实于法律和制度，忠实于人民利益，忠实于事实真相；要保证人民在自己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不允许任何人有超越于法律之上的特权。

全会的这些规定和要求，不但总结和汲取了“文化大革命”的教训，而且也为全党解放思想，进行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新探索创造了必要的前提条件。全会关于平反冤假错案和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的决策，不仅明确了其意义、目的和作用，而且还提出了今后民主法制建设的发展方向和实现途径。这一决策，真正揭开了大规模拨乱反正和平反冤假错案的序幕，而这一序幕的拉开，既为后来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做了必要的准备，也为以党和国家领导制度改革为主要特征的政治体制改革作了酝酿。

第四，围绕工作重点转移和实行改革开放，全会对进一步继承和发扬毛泽东所倡导的马克思主义学风，即坚持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问题，展开了深入的讨论，高度评价了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重新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在邓小平提出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方针指导下，与会同志对党的思想路线问题进行了深入讨论。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历史功绩之一，就是重新确立了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这样一条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

全会一致认为，只有全党同志和全国人民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解放思想，努力研究新情况新事物新问题，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我们党才能顺利地实现工作重心的转变，才能正确解决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具体道路、方针、方法和措施，正确改革同生产力迅速发展不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

全会公报指出：两年来，通过深入揭批林彪、“四人帮”的斗争，纠正了被他们颠倒的许多思想理论是非。但是，现在还有不少同志不敢大胆地实事求是地提出问题和解决问题。这种状态是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形成的。全会要求全党同志和全国人民要继续打破林彪、“四人帮”的精神枷锁，同时要坚决克服权力过于集中的官僚主义、赏罚不明现象和小生产的习惯势力的影响，以利于人人解放思想，“开动机器”。

全会高度评价了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的讨论，认为这对于促进全党同志和全国人民解放思想，端正思想路线，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全会公报写入了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讲话中的一段话，这就是：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

全会实事求是地阐明了如何对待毛泽东的历史地位的问题。全会公报写到，会议着重指出毛泽东同志在长期革命斗争中立下的伟大功勋是不可磨灭的。如果没有他的卓越领导，没有毛泽东思想，中国革命有极大的可能到现在还没有胜利，那样中国人民就还处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反动统治之下，我们党就还在黑暗中苦斗。毛泽东同志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他对于包括自己在内的任何人，始终坚持一分为二的科学态度。要求一个革命领袖没有缺点、错误，那不是马克思主义，也不符合毛泽东同志历来对自己的评价。党中央在理论战线上的崇高任

务，就是领导、教育全党和全国人民历史地、科学地认识毛泽东同志的伟大功绩，完整地、准确地掌握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把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原理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加以发展。这就在纠正毛泽东晚年所犯的“左”倾错误的同时，也维护了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并帮助一些人解除了思想困惑。

全会对“文化大革命”作出了初步的评价。全会公报指出：全会认为，对于“文化大革命”，也应当历史地、科学地、实事求是地去看待它。毛泽东同志发动这样一场大革命，主要是鉴于苏联变修，从反修防修出发的。至于实际过程中发生的缺点、错误，适当的时候作为经验教训加以总结，统一全党和全国人民的认识，是必要的，但是不应匆忙地进行。这既不影响我们实事求是地解决历史上的一切遗留问题，更不影响我们集中力量加快实现四个现代化这一当前最伟大的历史任务。

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的党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为贯彻执行正确的政治路线，确保工作重点转移和实行改革开放，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第五，全会总结历史经验教训，决定健全党的民主集中制，健全党规党法，严肃党纪，并加强了党的中央领导机构。

全会鉴于以往历次政治运动中出现的种种问题，根据党的历史的经验教训，为避免悲剧重演，提出了一系列健全党的民主集中制、健全党规党法、严肃党纪的措施。

全会公报指出：华国锋同志在会上下着重强调了党中央和各级党委的集体领导。他提议：全国报刊宣传和文艺作品要多歌颂工农兵群众，多歌颂党和老一辈革命家，少宣传个人。全会完全同意并高度评价华国锋同志的提议，认为这是党内民主生活健全化的重要标志。全会重申了毛泽东同志的一贯主张，党内一律互称同志，不要叫官衔；任何负责党员包括中央领导同志的个人意

见，不要叫“指示”。会议指出，一定要保障党员在党内对上级领导直至中央常委提出批评性意见的权利，一切不符合党的民主集中制和集体领导原则的做法应该坚决纠正。

全会公报指出：会议认为，国要有国法，党要有党规党法。全体党员和党的干部，人人遵守党的纪律，是恢复党和国家正常政治生活的起码要求。党的各级领导干部必须带头严守党纪。对于违反党纪的，不管是什么人，都要执行纪律，做到功过分明，赏罚分明，伸张正气，打击邪气。

全会公报指出，全会选举产生了以陈云同志为首的由 100 人组成的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这是保障党的政治路线的贯彻执行的一个重要措施。纪律检查委员会的根本任务，就是维护党规党法，切实搞好党风。

为了保障党的政治路线的顺利贯彻执行，在全会增选中央领导同志的基础上，又于闭幕后的第三天即 12 月 25 日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根据中央工作会议和十一届三中全会上许多同志的意见，讨论决定了人事任免事项：

(1) 任命胡耀邦为中共中央秘书长兼中央宣传部部长、党委书记，免去其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职务；任命胡乔木为中共中央副秘书长兼毛泽东主席著作编委会办公厅主任、党委书记；任命姚依林为中共中央副秘书长兼中央办公厅主任，免去其国务院财贸小组组长、商业部部长职务。

(2) 任命宋任穷为中央组织部部长。

(3) 任命冯文彬为中共中央办公厅第一副主任。

(4) 免去汪东兴的各项兼职（中央办公厅主任、党委书记，中央警卫局局长、党委书记，8341 部队政委兼党委书记，毛泽东主席著作编委会办公室主任、党委书记）。

这些人事安排，从组织上加强了中央领导机构，保证了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得以顺利贯彻

执行。

十一届三中全会和随后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关于组织问题的正确决定，表明党已经重新确立了正确的组织路线。

全会公报在列举上述五个方面的重大决策之后，指出：通过粉碎“四人帮”两年来的努力，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的团结有了极大的加强，觉悟有了极大的提高。华国锋同志关于“既要解决问题，又要稳定局势”和“思想再解放一点，胆子再大一点，办法再多一点，步子再快一点”的号召，已经深入人心。只要全党努力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本领，继续坚持实事求是，坚持群众路线，既勇于创造新的经验，又保持谦虚谨慎的态度，充分调查研究，实行精心指导，不打无准备之仗，不打无把握之仗，就一定能够加快实现新时期的总任务，任何困难都不能阻止党和人民的胜利前进。

从上述可以看出，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历史功绩在于从根本上冲破了长期以来“左”倾错误的禁锢，端正了党的指导思想，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政治路线、思想路线和组织路线，制定了实行改革开放的总方针。从此以后，党和国家“真正开始了全面的、坚决的、依靠群众和深思熟虑的拨乱反正”。

这就为开始以体制改革为重要特征的第二次革命，探索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开启了思想的闸门，打开了宽阔的通道。

（张树军著《大转折——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实录》）

澄清理论是非：理论工作务虚会

1978年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从1979年起把全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然而，党内对一些重大理论问题上的认识并未得到统一。于是，便有了1979年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会上提出并讨论的若干重大理论问题，对后来的中国社会产生了重大影响。

叶剑英提议召开一个理论务虚会

理论务虚会是由叶剑英提议召开的。

在真理标准讨论期间，《红旗》杂志编辑部写了一篇批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文章。文章虽然也讲实践第一、实事求是的观点，但整篇文章是强调理论的指导作用；文章不是反对教条主义，而是大批什么怀疑论、不可知论；文章最后部分，专门批判“毛主席也有错误”的言论，称之为“海外奇谈”。这篇文章的用心显然是对批判“两个凡是”进行反批判。《红旗》杂志编辑部将它送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去征求意见，哲学所提出了6点不同的看法。这篇文章没有被发表。《红旗》杂志编辑部将它和哲学所的意见一起上报中共中央政治局，最后中央没有同意发表此文。当时，鉴于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分歧情况，叶剑英依据1978年8月李先念主持国务院务虚会的经验，提议召开一个理论务虚会，把不同意见摆出来，用民主的方法统一认

识，把问题解决一下。

同年11月，为纪念毛泽东诞辰85周年，谭震林写了一篇肯定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文章：《井冈山的斗争实践与毛泽东思想的发展》。《红旗》杂志总编辑熊复要求作者删去文章中支持实践标准的内容，谭震林坚决不同意。后经邓小平、李先念出面干预，文章始得发表。接着，11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和12月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围绕着这个重大原则问题展开了一场激烈的争论，摆出了许多情况，提出了不少问题。会议高度评价了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推倒了“两个凡是”，迫使华国锋、汪东兴等人作了检讨，这标志着历时半年多的真理标准大讨论取得了胜利。但是，从理论上讲，仍有一些问题没有解决，这就使中央决定召开这样一个会议专门讨论理论问题成为必要。

邓小平十分重视叶剑英的建议，提出如要开这样的会，“索性把问题摆开，免得背后讲”。邓小平这样说是针对当时没有放弃或者没有完全放弃“两个凡是”的人。从邓小平的原意来看，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召开这样一个会，是想重点解决“凡是”人的思想问题，为改革开放扫清理论上的障碍。

据此，华国锋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的讲话中正式提出：在这次会议上，同志们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摆出了许多情况，提出了不少问题，对一些同志提出了不少批评意见，为召开理论务虚会创造了有利条件。由于这次中央工作会议的议题多，时间有限，这方面的问题不可能花很多的时间来解决。中央政治局同志意见，还是按照叶帅的提议，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专门召开一次理论务虚会，进一步把这个问题解决好。

关于会议的名称，原来的提法是“理论务虚会”。有的人提出，理论本身就是“虚”，“理论务虚会”这个会议名称不确切。后来就采用了“理论工作务虚会”这个名称，简称“理论务虚

会”。

在1978年末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胡耀邦被增补为中央政治局委员。12月25日，中央政治局会议任命胡耀邦为中央秘书长兼中央宣传部长。胡耀邦的注意力便更多地从平反冤假错案转向了思想工作，理论务虚会的筹备工作自然也就落到了胡耀邦的肩上。

为了开好理论工作务虚会，胡耀邦要求《人民日报》等几家宣传媒体，做好这方面工作，形成一种社会氛围，使理论务虚会在三中全会后再创宽松的环境。1979年1月3日，《人民日报》发表的社论《发扬民主和实现四化》指出：发扬民主就是让大家七嘴八舌，议论纷纷，反对说错了话就要追究的偏狭作法，再次宣布言者无罪，要维护宪法规定的公民权力。同时，胡耀邦通过他所主管的宣传部门加大了思想解放的宣传力度。同日，作为胡耀邦助手的中共中央副秘书长胡乔木，在中央宣传部的会议上作了题为《社会主义时期阶级斗争的一些提法问题》的报告，对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在社会主义历史阶段中，还存在着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以阶级斗争为纲以及党内斗争是否都是社会阶级斗争的反映等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胡乔木是党内资深的理论家，他对这样大的理论命题进行重新审视，自然给人们在思想解放上以很大的鼓舞。胡乔木的文章在理论工作务虚会上作为大会材料印发，反响强烈。1月7日至17日，胡耀邦召集各省、市、区党委宣传部长在北京开会，讨论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之后宣传工作的根本任务。胡耀邦认为，在这样的历史时期，应当研究新问题，要使思想理论工作走在实际工作的前边。这次会议实际上是理论务虚会的前奏。

胡耀邦还挑选了5位具有官员和学者双重身份的胡绩伟、周扬、吴江、于光远和邓力群做理论工作务虚会的召集人。邓力群因事不能参加，于是改为童大林。理论务虚会分若干组，每纽约

25 人左右。另有特邀出席者 20 人，均为多年从事或关心政治理论和经济理论的官员。理论务虚会领导小组由胡耀邦、胡乔木、黄镇、朱穆之、胡绩伟、于光远、周扬、童大林、吴冷西、吴江、胡绳等 11 人组成。

胡耀邦把邓小平想法具体化并引向深入

1979 年 1 月 18 日至 4 月 3 日，理论务虚会在北京举行。这是胡耀邦 1978 年 12 月 25 日被任命为中央宣传部长后所抓的第一件大事，人称胡耀邦新官上任的“第一把火”。

会前，胡耀邦曾把他将做的“引言”报告送中央政治局常委审阅，并写了一封信。信中写道，第一段会主要是大家讨论、小组座谈和大会发言相结合，让大家把思想敞开，畅所欲言；第二段会请华国锋、叶剑英、邓小平等人到会讲话，引导大家集中讨论解决思想理论战线迫切需要解决的一些重要问题。先民主后集中，把思想统一起来，促使全党工作重心转移之后的理论工作做得更好。胡耀邦的“引言”稿和信发出后，很快得到中央政治局常委的同意。据说，华国锋首先表示了赞同。

1 月 18 日会议开始时，胡耀邦在《理论工作务虚会引言》中明确指出：“我们召开这样一次理论工作务虚会，要达到什么目的呢？第一，要总结理论宣传战线的基本经验教训。总结经验，可以总结两年，也可总结 10 来年、30 年。建国 30 年来，理论宣传战线有许多好的经验，也有许多教训，要把这些正反两方面的经验都总结起来，把思想理论上的重大原则问题讨论清楚，统一到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来。第二，要研究全党工作重心转移之后理论宣传工作的根本任务。这两个目的是互相联系的。总结过去的经验教训，也是为了向前看，把我们会后的工作做得更好，使理论工作更加蓬蓬勃勃地开展起来。”

这两个目的是明确的，有针对性的。其实，胡耀邦要在理论工作务虚会上达到的“目的”，是对邓小平提出召开这样一个会的具体说明，也可以说是具体化。只是胡耀邦所要讨论的问题外延扩大了，涉及的问题更多了。

据参加理论工作务虚会的温济泽回忆：1978年12月31日，胡耀邦在中宣部所属单位领导干部会议上说，今后理论上还有哪些禁区要打破？希望有关单位开出一批清单来。中国社会科学院就这个问题的所属由各研究所进行了调查，并根据各所提出的问题和材料，略加整理，开出了一个清单。我们把这个清单中的问题删减了一些，保留了5个较重要的问题，提供给参加理论务虚会的与会者。看来，胡耀邦是想把这次会议开成“打破”禁区的会议，用实践的标准来总结建国30年来的是是非非。

对于会议的开法，胡耀邦提出：“应当推广三中全会和中央工作会议的那种会风，大家解放思想，开动脑筋，畅所欲言，充分恢复和发扬党内民主和党的实事求是、群众路线、批评和自我批评的优良传统，达到弄清是非，增强整个理论宣传队伍的团结。”

胡耀邦还在“引言”中回顾和分析了近两年来思想理论界的状况，赞扬了当时的理论工作。他认为粉碎“四人帮”以后的理论工作超过了建国以来任何一个时期，是最出色的两年。他针对存在的问题提出了今后理论宣传工作者的任务，一是继续扫清前进道路上的思想障碍；一是研究解决伟大转变中层出不穷的新问题。他还热情地赞扬那两年思想比较解放、勇于突破禁区的理论工作者。

他说，这两年“涌现了一大批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善于思考问题，敢于发表创见的闯将”。“他们旗帜鲜明，立场坚定，抓住真理，所向披靡，敢想敢说敢干敢闯。”讲到激动处，胡耀邦振臂挥拳，要和这些他赞扬为“闯将”的人一起，

“冲破一切禁区，打碎一切精神枷锁，彻底肃清林彪、‘四人帮’的理论专制主义，理论恶霸作风”。听众无不为之动容。一个思想解放的新时期即将到来。

胡耀邦的“引言”和讲话，实际上成了理论务虚会的具体指导方针。

提出了一些建设性的有前瞻意义的理论问题

从1月19日开始，理论务虚会各小组开会，分组讨论从一开始就很热烈。参加理论工作务虚会的人，在思想解放的精神鼓舞下，突破了许多理论禁区，提出了一些对拨乱反正和改革开放、对探索新问题颇有意义的理论观点。各组的发言均送大会秘书处，由秘书处印发详细的简报给每一位与会者。所以，情况交流得很及时。

小组讨论一开始，胡绩伟就在第一组会上宣读了他和杨西光、曾涛、华楠、王惠德、于光远等6人的联合发言，发言的题目是《关于真理标准讨论的情况》。这篇发言系统地列举了事实，说明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由来和发展过程，指出了争论的政治实质，列举了许多严重事实。这个发言大开了大家的眼界，也为后来大家纵深讨论一些问题打开了缺口，提供了样板。1月22日，《红旗》杂志总编辑熊复在第一组会议上发言。他说，我是一个思想没有解放的人，在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上，犯了思想路线不端正的错误。我非常希望，通过这次会议，使自己受到教育，把自己从思想僵化的精神状态里解放出来，以便做好党的理论宣传工作。熊复发言以后，吴冷西、李鑫等人也就真理标准讨论问题做了检讨，不同程度地认识了自己的错误。尽管与会者对有些人的“检讨发言”不满意，甚至很不满意，但有一点情况是重要的，就是这些人都承认自己在这个问题上犯了

错误。这也就是说，明确了在这场大争论中究竟谁是谁非这样的大界限，这无疑具有重要意义。

理论务虚会是在“文化大革命”结束两年后举行的。大家亲身遭受的苦难，痛犹在心；大家所见所闻的灾难和暴行，景犹在目，声犹在耳。多数人必须面对一个重大问题：“文化大革命”究竟是成功，还是失败？老老实实说，“文化大革命”失败了。过去说，不搞“文化大革命”，党就要变质，国就要变色，人民就要吃二遍苦，受二茬罪。事实是，就在“文化大革命”的过程中，党正在变质，国正在变色，人民正在吃二遍苦，受二茬罪。然而“文化大革命”在党的十一大党章和五届人大通过的宪法中仍然被肯定。

周扬在会上讲道：“首先有了对‘文化大革命’的定性问题。结论当然要由中央来做，但在理论上，我们必须弄清楚。究竟是出了林彪、‘四人帮’几个野心家阴谋家造成的，还是在路线、理论上有问题？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是否存在问题？这个问题不搞清楚，‘两个凡是’的问题也搞不清楚。”

批“左”的闸门一经冲开，人们反思的激流便再也阻挡不住了。

中央编译局负责人王惠德说：“现在全党面临着一个重新认识的问题。建国快要30年了，现在还有两亿人吃不饱饭。面对这种情况，全党、全民都在思考，我们一定是在哪里出了毛病。这个重新认识的要求是阻挡不住的。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搞理论工作的同志麻木不仁，不思考，不去研究是不行的。”

理论务虚会必然涉及到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评价问题。与会者说：毛泽东的历史功绩是不容抹煞的，同时也要指出他的错误。著名历史学家黎澍说：“毛主席本人思想有改变。他在《论联合政府》和七届二中全会上都说过，全国解放以后，要保存资本主义一个阶段，并要让它有所发展。还说过，要在殖民地

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废墟上马上建设起社会主义是空想。可是不久他又说，在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资产阶级必然要走资本主义道路，党内也会有一部分人借口中国落后需要让资本主义有一个发展，这也就是后来所说的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新的社会制度一产生，他就想超越经济自然发展阶段，这样也就带来了严重的问题。我们的社会主义搞成了贫穷的社会主义，还说贫穷能更快进入共产主义，可见解放后他的思想有改变。”

为了避免党的领导人犯毛泽东晚年的错误，大家认为，应当废除领导职务终身制。

民主与法制的问题也是人们议论比较多的一个问题。大家一致感到，民主问题，是所有社会主义国家没有解决好的一个重大问题，无论是斯大林时代的苏联，还是毛泽东时代的中国，这个问题都没有解决好。

朱穆之说：“党取得政权后，和群众是什么关系，对民主应采取什么态度，这是很重要的问题。是领导群众进一步争取和发扬民主，还是与群众游离，认为群众要民主就是向党要民主，和党对立？这个问题不正确解决，就把自己放在群众的对立面。”

有人指出，我们长期以来，以专政代替法制，使我们的法制建设遭到了很大的破坏。我们处理阶级斗争的方法，基本上是群众运动的方法而不是民主和法制的方法。

经济问题也是会上人们谈论的一个焦点，议论得比较多，反思得也比较深刻。孙冶方提出了要重视价值规律，重视经济理论研究等问题。另外，大家对“鞍钢宪法”、“以钢为纲”、“农业学大寨”等问题都进行了评议。

在讨论经济工作时，第五组建议，中央应让陈云参与领导经济工作。人们一致认为，陈云对经济工作具有很高的理论修养和丰富的实践经验。特别是在我国经济工作几次遭受挫折、处于困难的时候，他所提出的意见和主张，对于克服困难，恢复经济，

都起到了重要作用。鉴于当前我国经济工作问题堆积如山，建议中央让陈云同志参加领导经济工作。

“西单墙”与理论务虚会的一些问题引起了邓小平的注意

“西单墙”是指天安门广场往西不远的一道深灰色的砖墙，长约 200 米。1978 年的秋天与 1979 年前几个月，这里是北京最具政治特色的地方。

事情缘起于 1978 年复刊的《中国青年》。由于汪东兴勒令禁止发行这本杂志，一些人在西单的一面墙上贴出了大字报，可以说西单民主墙从此开始。在过去的年代，中国人对大字报有特殊的情结。在法制不健全、言路不畅通的社会环境里，民众可以利用大字报在有限的范围里公开自己的感受，发泄内心的积怨，争取社会的同情，以求得公正的对待。在“文革”刚刚结束的中国，那些在“反右”及“文革”中受到委屈的人，从北京的大街小巷纷纷来到这里，采用贴大小字报的形式向社会公开自己的冤情。在最初的几个月，大家只是以诉冤为主，只是就事论事，没有涉及多少政治的内容。由于建国后接连不断的运动、斗争，全国的冤情实在太多了，很多人从全国各地专程来到这里，发泄自己的怨恨和寻找再生的机会。大字报一层又一层地覆盖，人们也不仅仅是匆匆的过客了。随着官方“真理标准讨论”的日益高涨，这里的气氛也热烈了起来。

1978 年下半年，大字报的内容越来越集中于政治，也越来越接近敏感问题。就在西单民主墙活动轰轰烈烈深入发展之际，全国许多地方也跟着同步发展。从 1978 年 11 月 20 日起，上海每天有数千人在人民广场集会，讨论一些同北京大致相同的话题。在中央工作会议期间，胡耀邦通过中央党校、新闻机构、共青团等渠道，不断地把“西单墙”的情况，采用简报等形式，反

映到工作会议上，起到了推动人们解放思想的作用。在中央工作会议期间，北京市委宣布，被判为反革命事件的“四五”运动，完全是革命行动，参与此次事件的人一律平反昭雪。这就更增加了“西单墙”的热度。“西单墙”反映的大量历史积案和现实问题，时常是中央工作会议关注的议题。由于胡耀邦积极推动真理标准大讨论和平反冤假错案，“西单墙”起初的要求与之不谋而合。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人们是理解“西单墙”的，在某种程度上是赞成的，最起码也是不反对的。

11月26日，邓小平对前来中国访问的日本社会党委员长佐佐木良作说：“写大字报是我国宪法允许的。我们没有权利否定或批判群众发扬民主、贴大字报。群众有气让他们出气。群众的议论并非一切都是深思熟虑过的，也不可能要求完全正确，这并不可怕。”这说明邓小平开始是支持“西单墙”的，至少也是默许的。叶剑英在12月13日的一次讲话中也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党内民主典范，西单民主墙是人民民主典范。”

邓小平在十一届三中全会闭幕式上的讲话中，不仅表示允许群众提意见，而且对“利用民主闹一点事”，表现了政治家的大度。在对待“西单墙”上，华国锋与邓小平最初不完全是一样的。华国锋认为，少数人贴大字报，发表演说，甚至公开点名攻击中央负责同志，这种做法是完全错误的，应予以惩治；而邓小平认为，“西单墙”继承了“天安门事件”，推动了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并讲：“一个革命政党，就怕听不到人民的声音，最可怕的是鸦雀无声。”

但“西单墙”的发展，是人们很难预料的。从1978年末起，全国出现了一些非法组织。他们中一些人提出了“反饥饿”、“反迫害”、“要人权”、“要民主”等口号，煽动一些回城知青和上访者冲击党政机关，出版刊物。所谓“中国人权小组”贴出大字报，要美国总统卡特“关怀中国的人权”；“解冻社”公然提出

“废弃毛泽东思想”、“取消阶段斗争、暴力革命和一切形式的专政”；有的组织打出大幅标语，指出“万恶恶源是无产阶级专政”；有的提出“清算共产党”，“打倒社会主义”。到了这种地步，当务之急还不仅仅是与“凡是”派的斗争问题，重要的是要保证有秩序。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全党工作完全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如果继续容忍这一运动，可能在政治上对中国的基本社会制度造成伤害，可能会破坏刚刚起步的经济建设。

这一时期，在“西单墙”上说“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复辟资本主义的大字报，也忽然多了起来。有一张大字报说：“邓小平蚕食了毛主席的革命事业。”邓小平感觉到了强大的压力。

这样看来，“西单墙”不仅给求民主的人们提供了一个场所，也给“凡是”的人们找到了一个发表言论的地方。北京以外的地方，风声也挺紧。三中全会闭幕那一天，山西运城地委党校的大院里，就贴出了“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标语。可见，确有一些人对邓小平的主张怀着深深的不满。在北京，有一个自称“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研究会”的组织，把一份份传单扔得满街都是，主要内容是“批胡耀邦、胡乔木的修正主义路线”。另外一个叫做“反对机会主义者全国联盟的19人委员会”的组织，把一份他们主张的稿件同时发往十几家报社，长达1.6万多字，通篇大骂邓小平是个机会主义者。

事情的发展往往是偶然性引发必然性。由于中央理论务虚会上个别人发言不够慎重，讲出很多中央认为不能讲、不能议的东西。邓小平本人也认为有些东西最好不要讲，最起码现在不能讲，如果议了将涉及到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将涉及到对建国以来我们社会主义建设问题怎么评价问题，弄不好将伤害一些人的感情，不利于解放思想向前看。但这些人似乎没有明白邓小平的良苦用心，还大讲特讲。而且，北京大街小巷里都在议论中央理论务虚会的消息，说“秀才正在开造反的会”。有人用京腔的

谐音称“务虚会”为“戊戌会”，拿这个人人都了解的历史故事来影射中国政局，其用心一望而知。所有这些事情集中到一起，使洞察秋毫的政治家邓小平感到既有右的压力，又有“左”的压力，到了必须解决一下的时候了。

连思想解放的胡耀邦这时都指出：“我们要严肃考虑一下：关于毛主席的缺点错误，在我们没有认真研究清楚之前，讲多了好不好？公开在报纸上讲好不好？特别是在当前一个时期之内。不是说毛主席的缺点错误，我们都要包起来。共产党对谁都是有什么错就是什么错，但是这里有个前提问题，有个表达的方式问题。我提出这么个问题来，看恰当不恰当？……有些同志可能认为毛主席的缺点错误讲得越多、传得越广就越好。有没有抱这样想法的人，这需要我们注意呀！第二点是，对任何人的批评，对任何一件历史事件的鉴定，我们都应严格核实。讲的时候，写的时候，还应留有余地。”可见问题的严重性。

2月17日，对越自卫反击战开始。战争于3月16日结束，其全部过程局限于一个极小的地区。然而它对于中国国内的形势，竟会发生重大的牵制。北京出现了“反战”者，虽然寥寥无几，但是已经给党的领导人带来很大麻烦。“西单墙”上出现了批评这场战争的大字报。这时候，被战争打断的理论务虚会再度开始。就在参加理论工作务虚会的代表还在争论时，邓小平授权胡乔木为他起草一个讲话，针对会里会外发生的一切，讲讲应坚持的原则。1979年3月30日下午，邓小平代表党中央在人民大会堂向会议作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重要讲话。这个会由中共中央副主席李先念主持。邓小平讲完以后，李先念说：“小平这个报告非常非常重要，大家回去要讨论，认真地讨论。”

在北京召开理论务虚会的同时，不少省、市、区也召开了理论务虚会，沟通情况，上下呼应。北京的理论务虚会在3月30日听了邓小平的《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讲话后，进行了讨论，于

4月3日结束。

在1979年的这个春天，至少有一件事情可以肯定：大字报的作用已经走向反面，“西单墙”也不能再存在于世。1979年11月，邓小平在党的高级干部会议上提出，对那些经常在“西单墙”贴大字报的人，要做细致的思想工作，对极少数坏人也要打击一下。根据邓小平的讲话精神，1979年12月6日，北京市政府宣布，禁止在“西单墙”上张贴大字报。1980年1月16日，邓小平在一次干部会议上指出，宪法上有关“四大”，即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条文，从历史经验来看，从来没有产生过积极的作用。显然，不适宜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因此，根据长期实践，根据大多数干部和群众的意见，中共中央准备提请人大常委会和全国人大审议，把它取消。1980年9月，五届人大三次会议通过一项决议，取消“四大”，即“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

邓小平的报告指明了中国政治发展方向

邓小平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报告中说，一方面，党内有一部分同志还深受林彪、“四人帮”极左思潮的毒害，有极少数人甚至散布流言蜚语，攻击中央在粉碎“四人帮”以来特别是三中全会以来所实行的一系列方针政策违反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另一方面，社会上有极少数人正在散布怀疑或反对四项基本原则的思潮，而党内也有个别同志不但不承认这种思潮的危险，甚至直接间接地加以某种程度的支持。鉴于上述情况，邓小平说，现在，我想着重对从右面来怀疑或反对四项基本原则的思潮进行一些批判。这样，既提出了解放思想，又提出了反对右的思潮，当然是比较全面了。

但是，对于参加了一个多月理论务虚会，着重揭露剖析

“左”的思潮和错误的与会者来说，就有一个如何全面地理解和掌握既反“左”又反右的精神问题。这可以说是进入历史新时期以后，思想政治领域遇到的第一个难题。

当时，一些人认为，这二者是矛盾的。在一个时期内，开展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劲头有所减弱。有些人错误地认为强调“四个坚持”就是要用这作为“四根棍子”来打击坚持“实践标准”的人，是想阻挡十一届三中全会所开始的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进而把中央以反“左”为主的方针扭转为以反右为主的方针。这时，国际舆论也认为邓小平的《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讲话与他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那篇标志中国进入新时期的重要讲话《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有很大的不同。认为中国解放思想的大门刚刚开一点，又关上了。针对这一社会倾向，邓小平在不久以后的一次高级干部会上非常明确地指出：有人说，三中全会是放，四项基本原则是收。这完全是歪曲。共产党员决不能够容忍这种歪曲，而且必须坚决反对这种歪曲。四项基本原则首先要求坚持社会主义，难道我们能够不坚持社会主义吗？不坚持社会主义，还有什么安定团结，还有什么社会主义的四个现代化？三中全会就要求安定团结，就要求在安定团结的基础上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这是全国人民的最大利益。

万里在这一时期也说，人民有意见，要上访，要贴大字报，应该热情欢迎，不应该压制。凡是对我提的意见，我都是细看了的，而且认真研究，尽力解决。有些因物力、财力、编制、时机和其他条件而一时不能解决的，我就向提意见的人解释清楚。这是当前民主生活的主流。但是在最近时期的上访和大字报中，也出现了一些偏向，比如造谣谩骂，人身攻击，无理纠缠，硬冲机关，变相体罚，影响党政部门正常工作，这是我们坚决反对的。

其实，参加会议的有些人此时并没有完全理解邓小平的智慧设计。他不想让中国“乱”，也就是他后来讲的最大政治“稳

定”，只有这样，才能全力抓经济建设。邓小平讲的“四个坚持”并不是新的东西，它同“实践是检验真理标准”一样，都是共产党人的一种重提。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一点在邓小平看来是没有商量余地的。但是怎样“坚持”，却大有讲究。正如他反复向高级干部指出的“社会主义制度并不等于建设社会主义的具体做法”。邓小平反对“左”的“坚持”，因为这种“坚持”主张照抄照搬，固守陈规旧习，只能是死路一条。邓小平的“坚持”是坚持和发展、坚持和改革、坚持和改善等方面的综合。按这样的“坚持”方法，邓小平强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并不表明他想把改革开放政策收回去。相反，他认为这样做是为顺利贯彻执行改革开放政策“所必须采取的措施”。邓小平知道他的改革力度越大，引起的社会震动就越大，因而越是需要有一个东西加以制约，加以控制。要“坚持”是毫无疑问的，但是坚持哪些具体内容必须根据实际情况而定。邓小平用“三中全会以来党中央实行的一系列方针政策就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来暗示：三中全会制定的核心政策是改革开放，故坚持三中全会政策就是坚持改革开放。像这样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不但没有限制改革开放，还为改革开放起了积极作用。邓小平提出“四个坚持”的要旨并不在于规定有哪些东西不能改动，而在于表明一种态度：我们的改革是有原则的，不能乱来。

邓小平的这些谋略，显示出一位老练政治家所独有的精明。

中央认为把制定《历史决议》 提上日程的时机趋于成熟

对理论务虚会评价的分歧，不是由于这个会议对“两个凡是”的批评引起的，主要是由于这个会议对一系列重大问题进行拨乱反正，包括“怎样认识社会主义、毛泽东错误的问题，‘文

化大革命’问题，若干经济建设理论问题等”引发的。这也是刚刚经历过十年内乱的中国思想理论界的几个焦点问题，我们有理由相信，不但参加理论务虚会的人们在讨论，中央高层对此也有一定的关注。

在十一届三中全会期间，邓小平发表了一个深思熟虑的意见：对于“文化大革命”过程中发生的缺点、错误，适当的时候作为经验教训总结一下，这对统一全党的认识是需要的。“文化大革命”已经成为我国社会主义历史发展中一个阶段，总要总结，但是不必匆忙去做，要对这样一个历史阶段做出科学的评价，需要做认真的研究工作。

邓小平的这个意见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得到了全党的赞同，并写入了全会公报。邓小平打算在“适当”的时候总结一下，又指出“但不必匆忙去做”。可以这样说。百废待兴的中国有好多事情要做，以务实著称的邓小平在政治上站稳以后，号召人民全力进行经济建设，这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情，也是国之所需，民之所盼。刚刚走出“文革”的人们，有很多理论问题需要清理，需要理顺，理论务虚会所谈的问题大多属于这个范畴。由于人们的争论，这在客观上促使邓小平等中央领导人下决心尽快制定历史决议并提上中央的工作日程。这就有了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上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起草工作是在邓小平直接领导下进行的，从1980年3月到1981年6月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邓小平多次对决议稿的起草和修改进行指示，要起草人抓紧时间完成，不能再拖了，并指出：对建国30年历史上的大事，哪些是正确的，哪些是错误的，要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包括一些负责同志的功过是非，要做出公正的评价。但总结宜粗不宜细。总结过去是为了引导大家团结一致向前看。看来，邓小平想通过这样的一个决议来解答理论务虚会的争议，并希望

在决议通过后，使党内和人民的认识取得一致，对历史上重大问题的议论求得大体的统一。从决议的内容来看，对理论务虚会的一般争论，都作出了明确的结论，证明理论务虚会提的意见是对的，最起码是有建设性的。

1979年3月30日，作为领导人的邓小平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讲话一开始，就对这个会议作了评价。他说：“这次会议是根据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决定举行的。”“在三中全会以后召开的这次理论工作务虚会上，大家敞开思想，各抒己见，提出了不少值得注意、需要研究的问题，总的说来开得有成绩的。”这是一个总的评价，说明中央对理论务虚会是首肯的。

作为理论务虚会主持者、鼓动者的胡耀邦，他的看法与评价无异是人们最关心的。针对当时党内和社会上对理论务虚会议论纷纷的情况，1979年3月17日，胡耀邦在中央党校第三期开学大会的讲话中，谈了对这个会议的看法。他说：“我们开了理论工作务虚会议，现在外面在传，说理论务虚会议开得很不错，破了许多问题，我说对。”当然，胡耀邦也对理论务虚会中的不足做了揭示。他说：“对理论务虚会我三次打招呼，必须注意两条：第一条，理论务虚会议上批评的一些人，材料都没有核实，你们千万不要传。第二条，就是理论务虚会议提出来的观点，都是个人的，不是中央的意见，你们也不要传。可是，有些参加务虚会议的同志不管。不到10天，恐怕也有1000万人知道这个事了。我觉得这个不好，这样做对抓紧解决我们当前的问题不利，讲得不好听一点的话，这样做造成思想混乱。我是理论务虚会议的主持者，我的心情也不好受啊！我们同志之间，我们相互之间搞点信义嘛。”这是目前见到的胡耀邦惟一一次在公开场合对理论务虚会作出的评价。

邓小平在以后的一系列重要讲话和党中央的重要文件中，又进一步肯定了理论务虚会提出的若干重要建议，比如关于废止无

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理论、反对个人崇拜、对毛泽东及毛泽东思想的评价、健全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废除领导职务终身制等问题，都已为中央采纳，并在以后不久变成了政策和制度规定。

理论是具有前导性作用的，只要运用得好，它是能够走在实践前面的。

（张湛彬、张国华：《中央理论工作务虚会的前前后后》）

《历史决议》一锤定音：十一届六中全会

在1981年6月27日至29日召开的十一届六中全会上，一个伟大的历史文献诞生了。这就是《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决议》的通过，标志着党在指导思想上拨乱反正的历史任务已经完成。这次全会还同意华国锋辞去中央委员会主席和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的职务，并选举胡耀邦为中央委员会主席，决定邓小平为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

一个伟大历史文献的诞生

1981年6月27日至29日，一个伟大的历史文献诞生了。

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在北京举行。出席会议的中央委员195人，候补中央委员114人，列席者53人。中央政治局常委胡耀邦、叶剑英、邓小平、赵紫阳、李先念、陈云、华国锋主持了会议。

会议议程：一、审议和通过《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二、改选和增选中央主要领导成员。全会之前召开了预备会议，对上述议题进行了充分的酝酿和认真的讨论。会议将以在党的指导思想上完成拨乱反正的历史任务而载入史册。

全会一致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决议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对建国32年

来党的重大历史事件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作出了正确的总结，科学地分析了在这些事件中党的指导思想的正确和错误，分析了产生错误的主观因素和社会原因，实事求是地评价了毛泽东在中国革命中的历史地位，充分论述了毛泽东思想作为党的指导思想的伟大意义。

《决议》肯定了三中全会以来逐步确立的适合我国情况的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道路，进一步指明了社会主义事业和党的工作继续前进的方向。

全会一致同意华国锋辞去党中央主席和中央军委主席职务的请求。通过无记名投票，对中央主要领导成员进行了改选和增选，结果如下：

- 一、胡耀邦为中央委员会主席；
- 二、赵紫阳为中央委员会副主席；
- 三、华国锋为中央委员会副主席；
- 四、邓小平为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
- 五、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由中央主席和副主席组成：胡耀邦、叶剑英、邓小平、赵紫阳、李先念、陈云、华国锋。
- 六、习仲勋为中央书记处书记。

全会号召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高举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旗帜，更紧密地团结在党中央的周围，继续发扬愚公移山的精神，下定决心，排除万难，为把我们的国家逐步建设成为现代化的、高度民主的、高度文明的社会主义强国而努力奋斗。

会后不久，1981年7月6日，《人民日报》在第一版发表社论《认真学习决议，团结一致向前看》，指出：认真学习《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是全党下半年的中心任务之一。这次学习，最重要的，是充分认识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在中国革命的历史地位。一篇《决议》，三万余言，最核心的问题，

第一位的问题，就是如何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这是一个全局性的政治问题。

社论说，《决议》实事求是地评价了毛泽东在中国革命中的历史地位，指出他对中国革命的功绩远远大于他的过失，他的功绩是第一位的，错误是第二位的；并且充分论述了毛泽东思想作为党的指导思想的伟大意义。

社论同时指出，实事求是地评价建国以来 32 年的是非功过，也是这次学习的一个重要内容。32 年来，我们走过了曲折的道路，有过顺利发展的时候，也有过遭到挫折的时候。决不应该掩盖自己的错误。但是，必须分清，32 年来，成就还是主要的。否认这一点，同掩盖错误一样，将犯更加严重的错误。

社论说，学习《决议》，不能不回顾历史，但切不可在一些历史事件的枝节上纠缠，更不要对具体历史是非去进行群众性的争论。对待历史问题，应该贯彻宜粗不宜细的方针，把重点放在总结经验记取教训上。要着重正面教育。对于不同的认识，应当进行同志式的平等的讨论。

社论最后说：这几年来，全世界都在议论和揣测“毛泽东以后的中国”。现在，经过这次会议，有了这个《决议》，他们可以找到答案了：毛泽东以后的中国，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社会主义中国。三中全会以后，直至这次六中全会，我们所做的各项工作，归结起来，就是把毛泽东已经提出、但是还没有做的事情做起来，把他反对错了和搞错了的事情纠正过来，把他没有做好的事情经过我们的努力去做好。今后相当长的时期内，我们要做的，还是这几件事。动乱的年代结束了，徘徊的岁月终止了。我们可以向过去告别了。

那么，这个伟大的历史文献诞生的具体情况又如何呢？

1945 年 4 月中共六届七中全会通过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总结了建党 24 年的经验教训，清算了三次左倾错误，

统一了全党的思想，增强了全党的团结。那个《决议》之后，取得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

这次全会通过的《决议》，涉及的时间更长，所要解决的问题更多、更复杂。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和书记处直接领导下，从1980年3月开始正式起草工作，到六中全会讨论和通过为止，先后正式提交不同范围集体讨论的文稿本有7次之多。

197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30周年，叶剑英在庆祝大会上讲话，初步总结建国以来的历史，强调指出，“对过去30年特别是文化大革命十年的历史，应当在适当的时候，经过专门的会议，作出正式的总结”。这次讲话之后，中共中央从1979年11月起，集中了一些人，开始阅读各种资料，召开一系列座谈会，为起草文件进行准备。

1980年3月，起草工作正式开始。中共中央高层领导人在起草过程中，亲自确定《决议》的内容和结构，多次听取汇报，提出具体意见，直到动手修改。中共中央还决定，组织不同范围的集体讨论，反复修改文件。其中比较重大的几次是：

1980年10月，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和中央各部门的党员领导干部共4000人，集中20天时间进行讨论和修改；

1981年3月，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和部分老同志共50多人进行了修改；

1981年5月，中央政治局举行为期12天的扩大会议，有76位同志参加讨论和修改；

1981年6月22日到25日，中共中央邀请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130多人，在中南海开座谈会，征求他们对文件的意见。

在六中全会预备会议讨论决议的同时，还在中央党政军机关近1000名党员领导干部中征求意见。

到六中全会讨论和通过时，起草小组已先后7次将文稿正式

提交几次会议讨论。

舆论反响与评价

《历史决议》在新时期的作用既然如此重要，就不能不看看决议公布前各民主党派的反响和决议公布后西方舆论的评价。

十一届六中全会召开前夕，6月22日至25日，中共中央在中南海怀仁堂邀请在京的各民主党派、全国工商联负责人、无党派人士和全国政协的部分老同志座谈，征求他们对提交六中全会讨论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草案的意见。

中共中央副主席李先念主持座谈会。他首先讲话说，总结党的60年历史，特别是建国32年的历史，是个很大的事情。这段历史经过了许多曲折，胜利过也失败过。这些问题只在中国共产党内讨论还不够。不少党外人士对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比较了解，希望花点时间，认真地帮助党总结历史，以便统一思想，集中精力，团结一致搞好现代化建设。

中共中央书记处研究室主任邓力群受中共中央委托，在座谈会上介绍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起草过程，并对这个决议的草案作了说明。

在为期4天的座谈会上，与会者对决议草案进行了认真的研究和讨论，提出了许多宝贵的意见。许多人在发言中指出，中共中央把建国以来每个阶段的成绩加以肯定，把工作中的错误包括个人的责任一一指出来，实事求是，使人心服，令人振奋，这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的继续和发展。

许多人还认为，决议对毛泽东的评价实事求是、恰如其分。他们指出，虽然毛泽东晚年的一些理论和实践离开了毛泽东思想的轨道，犯了错误，但纵观其一生，他的功绩是第一位的，错误是第二位的。他所犯的错误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犯的错误。决

议既充分肯定他的功绩，同时又毫不含糊地指出他的错误。这样的评价，是尊重客观，向人民负责，向历史负责的。

西方舆论对六中全会反应也很强烈。许多国家的报纸和通讯社纷纷发表消息和评论，指出中国建立集体领导的体制，执行开放政策，将使建设工作迈出新的一步。

日本共同社说，经过了60年、拥有3,900万党员、领导10亿人民的中国共产党，将在六中全会建立的领导体制下，为建设社会主义强国而迈出新的步伐。《每日新闻》社论说，六中全会“重新确认三中全会以来的现代化路线意味着继续执行开放的经济政策，将会受到国际社会的欢迎”。《读卖新闻》7月1日的社论说，六中全会“基本上建立起推行现代化的体制”，“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合众国际社驻京记者6月30日报道说，《决议》表明，中国最高领导人终于对过去取得了一致的看法，现在可以把注意力转向未来了。澳大利亚《时代报》7月1日的社论说，六中全会改选结果“是一个积极的事态发展”，“对中国同外界的关系也具有重大意义”。社论说，“同中国做生意的外国企业更有理由满怀信心了”。

希腊的两家电视台6月29日下午和晚上，通过卫星转播了六中全会的实况片断，认为这次会议将对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产生巨大影响。《黎明报》说，中共六中全会的人事更动，进一步加强了党的领导，而“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将可以得到纠正。该报还认为，中共《决议》对毛泽东同志作出了正确的评价。

路透社说，中国新领导人很重视集体领导，报纸只刊登集体照片而不刊登新主席的标准像的做法，明显地反映出这一点。路透社还说，“迹象表明，新的领导方式本质上将是集体领导，全体成员处于平等地位”。

《新芬兰报》就六中全会发表社论指出，今日的中国及其人

事变清楚表明，旨在进行迅速经济改革的路线在过去四年内得到了人们非常广泛的支持。社论还说，最近组成的领导表明，中国现在是进行集体领导的。芬兰《晨报》社论指出，可以断言，六中全会后，中国现代化路线将继续得以贯彻执行。

《纽约时报》一篇专稿在评述《决议》经济建设部分时说，中国共产党“把经济成果作为党的首要工作”，逐步“实现现代化”，这除了反共分子外受到“所有人的欢迎”。

《华盛顿邮报》的报道说，六中全会《决议》最重要部分是对毛泽东思想的论述。报道说，《决议》是一篇有创新见解的论文，它“清除了过去的错误并为今后确定了正确的道路”。

正确评价毛泽东

从历史决议文件起草的整个过程，使人生动地看到，中共对建国 32 年来的重大历史问题，采取了极为郑重、严肃的态度。修改过程从头到尾发扬民主，集思广益，向人们表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共中央继承和发扬了党的光荣传统，是光明磊落的，实事求是的。

《决议》的内容可以大略分为如下几个方面：一、确立毛泽东的历史地位；二、否定“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三、建国以前 28 年历史的回顾；四、32 年来党所领导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五、高度评价十一届三中全会。

为什么《决议》第一位的问题是确立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

这就不能不联系到当时的历史背景和条件。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社会上出现了两种错误的思想倾向，一种是教条地固守毛泽东的言论，怀疑甚至否定新时期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一种是怀疑甚至否定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正是后一种倾向使决议把

确立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作为第一位的问题。

当时，一些人把建国后的历史、党和国家的工作看成一团漆黑，特别把毛泽东思想同毛泽东晚年的错误混淆起来，产生对毛泽东思想、对共产党的领导和对社会主义制度的怀疑和抵制。少数人以“社会改革”、“思想解放”为口号，耸人听闻地提出“反饥饿”、“要人权”，带领一部分人游行示威，冲击党政机关，在全国各地串连。党内少数人也思想动摇，麻木不仁、听之任之。

此外，如何评价领袖人物的功过是非、确立他们的历史地位，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没有解决好的一个重要问题。如何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如何评价中国社会主义发展的几十年的历史，也成为当时国际上关注的一个重要问题。西方媒介不断散布中共的纠“左”和拨乱反正是搞“非毛化”运动；许多社会主义国家的党和第三世界国家领导人对中国如何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也表现出异乎寻常的热切关心；不少西方国家以此作为风向标，观察中国今后道路的走向，判断中国政策是否具有连续性、稳定性，并以此作为制定对中国政策的一个基本依据。

因此，只有正确评价毛泽东的功过是非，维护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正确评价中国社会主义发展的历史，才能澄清国际舆论，树立党和国家的新的良好形象。

作为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核心的邓小平充分表现出无产阶级革命家高瞻远瞩的政治勇气和政治远见，他在同决议起草小组同志的谈话中，从一开始就提出了对《决议》的三个基本要求。是这个文件的基本指导思想和总的原则。这三个要求是：

一、要确立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这是第一位的问题，关键性的问题，最主要的问题。对毛泽东的评价，对毛泽东思想的阐述，不是毛泽东个人的问题，而是一个全局性的问题。三中全会以后，党在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所坚

持的基本点，还是毛泽东思想中的东西。当然，我们也有发展，但是基本点还是毛泽东规定了的。我们要完整地、准确地学习和运用毛泽东思想。不仅是今天，而且是以后，都要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在讲到毛泽东的时候，要对他的错误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

二、对全国解放后 32 年来，主要是粉碎“四人帮”以前，历史上的大事，哪些是正确的，哪些是错误的，包括对中央一些负责同志的功过是非，进行实事求是和恰如其分的分析，作出公正的评价。

三、对过去的事情作一个基本的总结，目的是统一全党的思想，引导大家团结一致向前看。争取在《决议》通过之后，党内、人民群众内的思想认识一致起来，以后就一心一意搞建设，一心一意研究和解决新问题。

整个《决议》的内容，特别是第七部分《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体现了这一指导思想。第七部分有两段文字是对毛泽东思想的科学的表述：

“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把中国长期革命实践中的一系列独创性经验作了理论概括，形成了适合中国情况的科学的指导思想，这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毛泽东思想。”

“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的正确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

这两段文字，科学地说明了毛泽东思想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学说中的地位，说明了毛泽东思想同我们党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的关系。决议强调指出，在中国人民的革命斗争中形成的毛泽东思想，是中国共产党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贡献，是中华民族的光

荣。毛泽东思想是我们党的宝贵的精神财富，并将长期指导我们的行动。

毛泽东思想在以下几个方面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

1. 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
2. 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
3. 关于革命军队的建设和军事战略；
4. 关于政策和策略；
5. 关于思想政治工作和文化工作；
6. 关于党的建设。

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是贯穿于上述各个组成部分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它们有三个基本方面：1. 实事求是，就是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就是要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2. 群众路线，就是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3. 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立足于本国，依靠本国革命力量和人民群众的努力，把本国的革命事业做好。

毛泽东思想不只是毛泽东一个人智慧的产物，同时是他的战友们、党和革命人民智慧的产物，是半个多世纪中国人民革命斗争的结晶，是集体智慧的结晶。

例如，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就是依靠集体的努力，在革命实践的基础上，不断总结革命斗争的经验而形成的。关于“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理论，就是党和人民在集体奋斗中创造的，是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集体经验的科学总结。毛泽东把党和人民在集体奋斗中积累起来的经验，加以科学的总结，找出中国革命的客观规律，提出了中国革命必须走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的完整理论，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

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是中国共产党在民主革命中战胜敌人的“三个法宝”。这是毛泽东从党在民主革命时期经历了失败和成功、后退和前进、缩小和发展的丰富经验中，总结出来的。中国共产党就是在毛泽东领导下，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 and 中国的革命实践相结合，认识了中国革命的特点和规律，

正确地理解了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这三个问题及其相互关系，从而迅速发展壮大，成为全民族的领导核心，领导全国人民最后夺取民主革命的全国胜利。

1945年4月24日，毛泽东在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总结并提出了党的三大作风：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作风，和人民群众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作风，自我批评的作风。毛泽东认为，这三大作风，是中国共产党人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显著标志。

中国共产党在延安这一段时间，可以说是毛泽东思想比较完整地形成起来达到成熟的一段时间。1945年4月到6月，在延安召开的党的“七大”，规定毛泽东思想为全党的指导思想。党用毛泽东思想教育了整整一代人，赢得了革命战争的胜利，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在世界上站住了脚。

《决议》阐述了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上的贡献。其中特别突出的，是他论述中国革命战争的重要著作，提供了在实践中运用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认识论和辩证法的最光辉的范例。这些不朽的著作——《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等，不仅是军事著作，而且是哲学著作。文件特别列举了毛泽东不同时期的代表著作43篇。

《决议》对毛泽东一生的功过，作出如下实事求是的、恰如其分的评价：毛泽东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和理论家。他虽然在“文化大革命”中犯了严重错误，但是就他的一生来看，他对中国革命的功绩远远大于他的过失。他的功绩是第一位的，错误是第二位的。

决议主要是总结建国以来的历史教训和经验，可是，为什么又以大量笔墨写了建国前28年历史的回顾？

因为要真正使人们从《决议》里看清楚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地位，就需要把建党以来60年的历史摆在面前，写出60年中毛泽东的贡献和毛泽东思想的贡献。因此，《决议》决定写建国

以前 28 年历史的回顾。有了党的 60 年的全部历史，并且把毛泽东在重要关头的的作用写清楚，那么，说毛泽东的功绩是第一位的，错误是第二位的，说毛泽东思想指引中国共产党取得胜利，就更令人信服了。这就是《决议》对建国后 32 年历史作出基本估计时，专门在第一部分写建国前 28 年回顾的原因。

从 1921 年到 1949 年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斗争的 28 年中，经历了国共合作的北伐战争、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和全国解放战争这四个阶段长达 22 年的人民革命战争。国际上还没有任何一个共产党经历过如此长时期的战争的锻炼。这 28 年中，党经受了 1927 年和 1934 年两次严重失败的痛苦考验，并使革命的航船转危为安，从失败转为胜利。正如《决议》所说：“如果没有毛泽东同志多次从危机中挽救中国革命，如果没有以他为首的党中央给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和人民军队指明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我们党和人民可能还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长时间。”

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

如何看待“文化大革命”及其指导思想的理论基础“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是起草《决议》碰到的重大问题。

《决议》从四个方面否定了“文化大革命”的主要论点：一、在一系列重大理论和政策问题上混淆了是非；二、这种是非混淆，必然导致敌我的混淆；三、“文化大革命”名义上是直接依靠群众，实际上既脱离了党的组织，又脱离了广大群众；四、“文化大革命”不是也不可能是任何意义上的革命或社会进步。

《决议》着重讲了“文化大革命”的错误、过程和原因。

首先，“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方法是错误的。

“1966 年 5 月至 1976 年 10 月的‘文化大革命’，使党、国

家和人民遭到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这场‘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同志发动和领导的。”

“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

这是《决议》对十年“文化大革命”作的论断。《决议》指出，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主要论点，即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明显地脱离了作为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的轨道，必须把它们同毛泽东思想完全区别开来。

“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提法，第一次公开使用是出现在1967年一篇纪念苏联十月革命50周年的文章中。文章把“继续革命”的内容概括为6条。“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一语，在“文化大革命”中的特定含义，即“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政治大革命”。

——“批修”、“批资”混淆了是非，许多被当作修正主义或资本主义而加以批判的东西，实际上正是马克思主义原理和社会主义原则，其中很多是毛泽东自己过去提出过或支持过的。

——“打倒走资派”混淆了敌我，被打倒的“走资派”是党和国家各级组织中的领导干部，党内根本不存在以刘、邓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批判“反动学术权威”，使许多有才能、有成就的知识分子遭到打击和迫害。

“直接依靠群众”实际上脱离了党组织和群众，广大党员被停止组织生活，许多积极分子和基本群众受到排斥，初期卷入运动而后来改变态度的大多数人遭到不同程度的打击。投机分子、野心分子、阴谋分子受到重用。

——“文化大革命”不是革命而是内乱。在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建立以后，尤其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剥削阶级作为阶级已经被消灭以后，根本不应该进行所谓“一个阶级推翻一

个阶级”的政治大革命。这样的“革命”不是“乱了敌人”，只是乱了自己。至于党和国家肌体中确实存在的某些阴暗面，应作出恰当的估计并运用符合宪法、法律和党章的正确措施加以解决。

其次，“文化大革命”的过程有三个阶段。在这些阶段中，党和人民同左倾错误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斗争一直没有停止过。

第一段：1966年5月~1969年4月，“文化大革命”的发动，“二月逆流”，党的九大。

1966年5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同年8月八届十一中全会召开，“文化大革命”全面发动。两次会议相继通过《五·一六通知》和《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決定》，对所谓“彭、罗、陆、杨反党集团”和所谓“刘邓司令部”进行错误斗争，对中央领导机构进行错误改组，成立了所谓“中央文革小组”，它掌握了中央很大部分权力。

1967年2月前后，一些政治局和军委领导对“文化大革命”做法提出强烈批评，被诬为“二月逆流”而受到压制和打击。

党的“九大”使“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理论和实践合法化，加强了林彪、江青、康生等人在党中央的地位。“九大”在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的指导方针是错误的。

第二段：1969年4月~1973年8月，林彪反革命集团策动武装政变事件，周恩来主持工作、提出批极左思潮，党的“十大”。

1970年至1971年，林彪反革命集团阴谋夺取最高权利，策动了反革命武装政变。这是“文革”一系列做法的结果，客观上宣告“文化大革命”失败。

随后，周恩来在毛泽东支持下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各方面工作有了转机。1972年，周恩来提出要批判极左思潮的意见。毛

泽东却错误地认为当时的任务仍然是反对“极右”。

1973年8月，党的“十大”继续了“九大”的“左”倾错误。王洪文当上了党中央副主席。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结成“四人帮”。

第三段：1973年8月~1976年10月，“批林批孔”，邓小平主持工作、“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周恩来逝世、天安门事件，毛泽东逝世、粉碎“四人帮”。

1974年初，江青、王洪文等提出开展“批林批孔”运动，矛头指向周恩来。毛泽东先是批准这个运动，在发现江青等人借机进行篡权活动以后，又对他们作了严厉批评。

1975年，邓小平在毛泽东支持下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对许多方面的工作进行整顿，形势有了明显好转。但是毛泽东不能容忍邓小平系统地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又发动了所谓“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全国再度陷入混乱。

1976年1月周恩来逝世。同年4月，全国范围内掀起了以天安门事件为代表的悼念周总理、反对“四人帮”的强大抗议运动。当时，中央政治局和毛泽东对天安门事件的性质作出了错误的判断，并且错误地撤销了邓小平的党内外一切职务。

1976年9月毛泽东逝世。同年10月，中央政治局执行党和人民的意志，粉碎了江青反革命集团，结束了“文化大革命”这场灾难。

“文革”10年中，正是由于有全党和广大工人、农民、解放军、知识分子、知识青年和干部的共同斗争，“文化大革命”的破坏才受到了一定程度的限制。国民经济虽然遭到巨大损失，仍然取得了进展。

再次，决议对“文化大革命”的原因作了全面的科学的分析。

直接原因：

毛泽东对“文革”这一全局性的、长时间的“左倾”严重错误，负有主要责任。他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主要论点（即“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是错误的。由于他的威望达到高峰，他就逐渐骄傲起来，逐渐脱离了实际和群众，他的主观主义和个人专断作风日益严重，日益凌驾于党中央之上。

不过，要把毛泽东的“左”倾错误论点，同毛泽东思想区别开来，把他的错误同林彪、江青的阴谋活动区别开来。毛泽东的错误终究是一个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所犯的错误。毛泽东经常注意要克服党内和国家生活内存在着的缺点。他在犯错误的时候，还始终认为自己的理论和实践是马克思主义的，这是他的悲剧所在。

社会历史原因：

对社会主义社会缺乏认识，习惯于沿用过去的旧经验。党对社会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建设缺乏充分的思想准备和科学研究，对出现的新矛盾新问题，容易把已经不属于阶级斗争的问题仍然看做是阶级斗争，习惯于用过去熟悉的大规模急风暴雨式群众性斗争的旧方法和旧经验，从而导致阶级斗争的严重扩大化。

还有把马恩列斯的某些设想和论点加以误解或教条化，把关于阶级斗争扩大化的迷误当作保卫马克思主义的纯洁性。此外，还有中苏论战的影响，党就很难抵制毛泽东等提出的一些左倾观点。

国际共运史上没有解决好的领袖和党的关系而出现的一些严重偏差，对中国产生了消极的影响。另外，中国是一个封建历史很长的国家，长期封建专制主义的遗毒不易肃清，种种历史原因又没有能把党内民主和国家生活的民主加以制度化、法律化。这就使党的权力过分集中于个人，党内个人专断和个人崇拜现象滋长起来，使党和国家难于防止和制止“文化大革命”的发动和发展。

两位老人的作用

邓小平和陈云，对决议的起草起了举足轻重的指导作用。

决议的起草，成为邓小平一个时期集中精力抓的一项主要工作，他先后十六七次约见中央负责同志和起草小组负责同志，阐述对决议的起草和修改意见，对如何写好决议进行了精心的指导。

《邓小平文选》收录了从1980年3月到1981年6月邓小平的9次谈话节录。

邓小平首先对决议的总的指导思想谈了3点意见：确立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对建国30年历史上的大事，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作出公正的评价；对过去的事情作个基本的总结。

十一届五中全会为刘少奇平反的决定传达下去以后，一部分人中间思想混乱。有的人反对给刘少奇平反，说这样做违反了毛泽东思想；有的人则认为，既然给刘少奇平反了，那就说明毛泽东思想错了。

对此，邓小平说：这两种看法都不对，必须澄清这些混乱思想，作出正确的回答。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评价问题，党内外、国内外都很关心，各方面的朋友也很注意。他看了某一次草稿，感到整个文件太沉闷，不像一个决议，没有把毛泽东思想是什么和毛泽东正确的方面讲清楚，便果断地说：不行，重写！

对于毛泽东的功过评价和毛泽东思想，写不写，怎么写，邓小平一直把它看作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中央警卫局是对毛泽东感情很特殊的一个部门，他便找警卫局的同志了解反应。警卫局的同志说：干部、战士对邓小平和意大利记者法拉奇谈话中对毛泽东的评价觉得能接受，讲得好。

邓小平也这么看，不提毛泽东思想，对毛泽东的功过评价不恰当，老工人通不过，土改时候的贫下中农通不过，同他们相联系的一大批干部也通不过。所以，邓小平讲：毛泽东思想这个旗帜丢不得，丢了这个旗帜，实际上就否定了党的光辉历史。

对于毛泽东和党的错误，邓小平指出，一定要毫不含糊地进行批评，但要实事求是，分析各种不同情况，不能把所有问题归结到个人品质上。对毛泽东的错误，不能写过头，写过头，给毛泽东抹黑，也就是给党和国家抹黑，这违背历史事实。

他认为现在的许多青年缺乏了解的一个重要的事实是：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才大大提高的。国内的人，国外的华侨，都对这一点有亲身的感受。即使在“文革”中，尽管国内动乱，但中国作为大国的地位，是被国际上承认的，中国的国际地位有提高。1974年4月，邓小平出席联大第6届特别会议，代表中国政府发表讲话，受到热烈欢迎，讲完以后，许多国家的代表前来热情握手。这些都是事实。

过去党内作决议，一般都爱讲多少次多少次路线斗争如何如何，那么，这次的决议起草是不是也要沿用这种套数？

邓小平主张不要用路线错误、路线斗争这个提法，因为这个提法过去用得并不准确，用得也很乱。这也是为了改变党风。他说：对于“文革”，也不要说是路线错误，按它的实质分析就是了，是什么性质就说什么性质，犯了什么错误就说什么错误。讲内容，不提路线斗争这些虚的东西。

不提路线斗争并不是说路线这个词就一概不能用。邓小平特意强调：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了正确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组织路线，这样的提法以后还可以用。有些场合拿路线两个字来表达比较妥当、自然，一讲人就明白。

人们最关心的还是如何看待过去党史上通常讲到的10次路线斗争问题，对此，邓小平谈了他的看法，并成为决议起草小组

的共识：

陈独秀、瞿秋白、李立三不是搞阴谋诡计，瞿秋白的错误不到半年，李立三只3个月。

说罗章龙是路线错误，也没有说中，罗是搞派别斗争，是分裂，另立中央。

张国焘是搞阴谋诡计的。

高岗是搞阴谋诡计的，揭露高、饶问题没有错，这个事情我知道得很清楚。1953年底毛泽东提出中央分一线、二线后，高岗活动得非常积极，他用拉拢的办法和我正式谈判，说刘少奇不成熟，要争取我和他一起拱倒刘少奇。我明确地表示了反对的态度。他又找陈云谈判，说：搞几个副主席，你一个，我一个。这样，陈云和我才觉得问题严重，向毛泽东作了反映。所以反对高岗的斗争还要肯定。但是，高岗究竟拿出了一条什么路线？确实没有什么路线，所以不好说是什么路线斗争。

刘少奇、“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和“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现在看，明显不能成立，应该根本推翻。

对于1957年的反右派斗争，怎么看？

邓小平明确表态：还要肯定。错误在于扩大化。他多次说当时确实有一股势力、思潮，杀气腾腾，要否定共产党的领导，扭转社会主义方向。今后，划错的都要改正，没有划错的不能改正。

在决议稿的起草过程中，有些人有一些极端的意见。他们痛恨“文革”，提出八届十二中全会和“九大”是非法的。

邓小平说，坚决不能接受这种意见，如果否定八届十二中全会和“九大”的合法性，那么，“文革”中党还存在，国务院和人民解放军还能进行许多必要的工作就站不住了。应该按照毛泽东在延安时对1931年上海临时中央和六届五中全会是否合法的

决策来看问题，说它们非法不好。

有人说，“文革”中党不存在了。邓小平不同意这种说法。他解释说：党组织生活停止过一段时间，但党实际上还存在。否则，怎么能不费一枪一弹，不流一滴血，就粉碎了“四人帮”呢？否定党的存在是不符合实际的。

对于党在历史上所犯的错误，怎样承担责任，邓小平强调，虽然毛泽东负主要责任，但不能回避“我们”。他说，我和陈云那时都是政治局常委，起码我们两个负有责任。集体承担一些责任，没有坏处，还有好处，可以取得教训。

1981年3月，陈云同邓力群进行了4次谈话，谈了他对决议起草的意见：

陈云很赞同邓小平关于决议宜粗不宜细的意见。他说，要在这个原则下面，把成绩和错误分别不同情况，“敲定”下来。“敲定”是上海话，敲就是推敲的意思，定就是确定的意思。要反复推敲，反复斟酌，使决议能够站得住，经得起历史的检验。

邓小平提出决议要确定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陈云说，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建议决议增加回顾建国以前28年历史的段落。他说：有了党的整个历史，把毛泽东在60年中间重要关头的作用写清楚，那么，评价毛泽东就有了全面的根据，也就更能说服人了。他把这个意见也讲给了前来看望的邓小平听，邓小平认为这个意见很好，转告了起草小组。

陈云对于毛泽东的评价有5点：1. 从遵义会议到抗日战争胜利，毛泽东一个无可比拟的功绩是培养了一代人，包括我们在内以及“三八式”的一大批干部；2. 毛泽东制定了抗日战争期间党的一系列方针政策，写了许多重要的著作，党内没有第2个人能写出这样的著作；3. 延安整风时，毛泽东提倡学哲学，对于全党的思想提高、认识统一，起了很大的作用；4. 毛泽东的一整套理论和政策，对中国革命的胜利起了决定性的作用；5.

毛泽东的威望是通过长期革命斗争实践建立起来的，老一代人拥护毛泽东是真心诚意的。

陈云对于毛泽东提倡学哲学，讲了很长一段话。他说：延安时期，毛泽东三次亲自给他讲过要学哲学。那时，他的身体不大好，在养病时，把毛泽东的主要著作和起草的重要电报认真读了一遍，深刻领会到，工作要作好，一定要实事求是。他因此联系到，建国以后，我们工作中的一些失误，原因还是离开了实事求是的原则。他说，在干部中，在青年中，提倡学哲学，有根本的意义。

邓小平看望陈云时，陈云同样把这点意见讲了。邓小平很重视陈云的意见，要求把此报告给胡耀邦，并指出，历史决议中关于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贡献，要写得更丰富、更充实，结束语中也要加上提倡学习哲学的意思。

陈云对邓力群谈话中还讲了一点重要的意见，就是要写共产国际和苏联对我们的帮助，从建党到建国后“一五”计划中的156项，决议应该如实按照事情的本来面貌写上去。通过对这些历史问题的论述，再一次说明中国共产党人是公正的。

邓小平和陈云，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上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决议高度评价此次全会，充分肯定了三中全会以来逐步确立的适合我国国情的建设社会主义的正确道路，进一步指明了我国社会主义事业和党的工作的前进方向。

《决议》是正确总结过去、开辟未来的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伟大文献，它以完成党在指导思想上拨乱反正的历史任务而载入史册。

（龙平平等主编《20年重大决策备忘录》）

开创新局面：中国共产党 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

邓小平在致开幕词时，第一次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崭新命题。十二大总结拨乱反正的经验，制定了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的纲领，通过了新的《中国共产党章程》。邓小平在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金日成谈话时说：“十二大的作用与我们党的七大一样。七大把革命引向胜利，十二大将把建设引向胜利。”

一、十二大召开的历史背景和筹备

（一）十二大召开的历史背景

1982年9月1日至11日在北京隆重举行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是七大以来党的历史上最重要的一次会议，这次会议是党在经过近4年的全面拨乱反正和局部改革，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各条战线取得一系列新的成就，实现了伟大历史性转折的大好形势下召开的。

粉碎“四人帮”后，我们党深入开展了揭批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斗争，并在全国大部分地区取得了基本胜利，“文化大革命”产生的派性及由此引起的武斗和动乱基本被制止，党和国家的组织机构得到初步整顿，被破坏的国民经济得到较快恢复，某些方

面甚至有所发展，人民生活有所提高，科学文化教育事业通过恢复整顿，出现了新的面貌，1978年开始的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促进了人们的思想解放，实事求是的作风逐步得到恢复。但是，由于个人崇拜和“两个凡是”的思想僵化与禁锢，由于当时的党中央没有从根本思想上彻底清理“文化大革命”时期和多年来党内的“左”的错误，因此，“文化大革命”的“左”倾错误在党内依然存在，根深蒂固的“左”的指导思想并未根本纠正，平反历史上重大冤假错案的工作遇到严重阻碍，经济工作中重犯求成过急的错误，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而世界新技术革命的浪潮，使被“文化大革命”破坏和耽误了的中国同世界先进国家差距进一步拉大，有两年时间党的工作处在徘徊中前进的局面。这种局面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时才告结束。

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会议的中心议题是讨论把全党工作的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这次全会前，召开了历时36天的中央工作会议。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邓小平作了题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重要讲话，中央工作会议为随即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做了充分准备。三中全会提出了一系列关系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重大决策：全会批判了“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充分肯定了必须完整地、准确地掌握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确定了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和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指导方针；果断地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做出全党工作的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

上述这些具有重大意义的转变，标志着党从根本上冲破了长期“左”倾错误的束缚，端正了党的指导思想，在思想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上实现了历史性的飞跃，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结束了1976年10月以来党的工

作在徘徊中前进的局面，为探索符合中国国情的建设道路和党的基本路线奠定了基础，开创了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

三中全会后，党掌握了拨乱反正的主动权，开始了有步骤地解决建国以来的许多遗留问题和实际生活中出现的新问题，围绕着全党全国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这一主题，进行了繁重的建设和改革工作。

首先，平反冤假错案，调整社会关系。粉碎“四人帮”以后，平反冤假错案的工作已局部进行，但进展缓慢。三中全会后，从中央到地方都按照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的原则加快了平反冤假错案的步伐。1980年2月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正式为刘少奇平反，为其他遭受冤屈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如彭真、邓子恢、黄克诚、乌兰夫、谭政等恢复了名誉；一些蒙冤多年的党的早期领导人瞿秋白、张闻天、李立三等，也先后平反昭雪。党还对“文化大革命”以前的一些重大案件进行了甄别，其中主要是：为1955年的“胡风反革命集团”案平反；在1978年4月决定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之后，又为1957年被错划为右派分子的人平反；为1959年“反右倾”运动中被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同志平反等等。到1982年底，全国大规模的平反冤假错案工作基本结束。据不完全统计，经中共中央批准平反，影响较大的冤假错案有30多件，全国共平反纠正300万名干部的冤假错案，47万名共产党员恢复了党籍，给几万名党员撤销了原受的错误处分，数以千万计的无辜受株连的干部和群众得到了解脱。

党在通过平反冤假错案调动干部队伍积极性的同时，还采取措施调整各方面的社会关系。从1979年1月起，开始摘掉地主、富农分子的帽子，给予农村人民公社社员的待遇；其子女的个人成分一律定为社员。从1979年1月起，为国民党起义、投诚人员落实政策。随后，宽大释放了在押的原国民党集团以下党、

政、军、特人员。此外，还落实了对居住在大陆的台湾同胞及去台人员在大陆的亲属的政策。从1979年11月起，开始把小商、小贩、小手工业者及其他劳动者从原工商业者中区别出来。到1981年，原86万工商业者中的70万人恢复了劳动者身分。另外，民族、宗教、侨务、统一战线、知识分子等方面的政策陆续得到恢复、调整。这些政策极大地调动了一切积极因素，极大地促进了全国的安定团结。

其次，调整国民经济，推进经济改革。1979年4月中共中央提出对整个国民经济实行“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方针，调整农、轻、重，积累与消费，原料、燃料与生产建设等各种比例关系，集中主要精力把农业搞上去。经济改革首先在农村取得突破。农村逐步建立了多种形式的联产计酬生产责任制，尤其是以家庭为基础的联产承包责任制适应了中国农村基本上仍以手工工具进行生产劳动的现状。国家还从投资、价格、税收、农副产品收购方面调整了农业政策，使农民增加了收入，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提高了劳动效率，粮食产量大幅度提高，农村的多种经营也得到了恢复和发展。农村面貌焕然一新，整个国民经济也搞活了。以城市为重点的经济体制改革也进行了若干实验和探索。国家在继续坚持国营经济占主导地位的前提下，提倡多种经济形式，扶植集体经济、个体经济等；在国营企业中推行经济责任制。这期间，对外开放方面也开始迈出实质性步伐，一是决定对广东、福建两省的对外经济活动实行特殊政策和优惠措施；二是设置深圳、珠海等四个经济特区。这些措施搞活和繁荣了国民经济。

再次，加强党的建设、改革政治体制。十年动乱期间，党的优良传统优良作风受到严重破坏，党的纪律松弛，个人主义、无政府主义思想泛滥，一些干部中还滋生了腐败现象，必须抓好党的自身建设，才能使党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更好地发挥核心

领导作用。为了贯彻十一届三中全会关于健全党规党法的决定，1979年1月，中纪委召开首次全体会议，研究制定加强党的纪律教育和作风建设的具体措施，着手解决党的建设方面的一些突出问题，并对一批党员违纪案件进行了认真的查处。1979年11月，中共中央和国务院联合发出《关于高级干部生活待遇的若干规定》，重申“文化大革命”以前一些行之有效的章程，强调高级干部必须带头发扬党的优良传统。1980年2月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通过《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就坚持党的路线、坚持集体领导、维护党的集中统一等12方面的问题做出原则规定。在加强党的建设的同时，党中央认真总结和汲取以往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的经验教训，开始提出党和国家领导制度改革的问题。1980年8月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通过了邓小平关于《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重要讲话。这个讲话，为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提出了基本的指导思想。适应现代化建设的需要，党首先在干部制度方面迈出改革的步伐。中央强调，必须按照德才兼备的原则选拔干部，尤其是中青年干部。在这个前提下，干部队伍要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1982年2月，中央作出《关于建立老干部退休制度的决定》，废除干部领导职务实际上存在的终身制。许多老干部愉快响应中央的号召，主动离休、退休或退居二线。一批经过考验的中青年干部先后走上了领导岗位。

最后，总结经验、团结奋进。十一届四中全会讨论并通过了叶剑英在国庆3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初步总结了党在建国以后的经验。1981年6月27~29日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在北京召开。全会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决议》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对建国32年来的重大历史事件，特别是对“文化大革命”作出了科学的总结，正确地分析了在这些历史事件中，党的指导思想的正

确与错误，以及产生这些错误的主要因素和社会原因。《决议》实事求是地评价了毛泽东的历史地位，科学地概括了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内容。明确提出，尽管毛泽东一生中犯过错误，尤其是他的晚年犯过长时间的全局性的错误，但他一生中的功绩远远大于他的过失，他的功绩是第一位的，错误是第二位的。《决议》还充分肯定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逐步确立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正确道路。号召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为把我国建设成为现代化的、高度民主的、高度文明的社会主义强国而奋斗。《决议》的通过，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已在指导思想上完成了拨乱反正的历史任务。

到1982年，经过近4年的全面拨乱反正和局部改革，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各条战线出现了一系列新的变化，促进了我国由“文化大革命”的严重挫折到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转变。一个崭新的局面呈现在全党和全国人民面前，主要表现为：在思想上，重新确立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逐步纠正了指导思想上和实际工作中的“左”倾错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坚持和发展了毛泽东思想，思想解放，使各条战线获得了生气勃勃的创造力量。在经济上，在党领导下，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努力纠正过去经济工作中的“左”倾错误，调整了国民经济，使我国经济渡过难关；改革开放起步，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初见成效，城市改革进行试点，经济建设有了新气象，逐步走上稳定发展的健康轨道。在政治上，揭批查“四人帮”，消除其帮派势力；陆续落实各项政策，处理了大批党内和人民内部的矛盾，调整了社会关系，实现了安定团结、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在组织上，我们逐步调整、整顿和加强了中国共产党和国家的各级领导班子，提拔一批优秀人才到各级领导岗位，各级领导权已基本掌握在忠于人民的干部手中；党内加强了教育，党的组织逐步健全，党的威信开始在恢

复中；党经受了改革开放的初步考验，在斗争和建设锻炼得更加成熟和坚强。在文化上，努力纠正了过去对教育、科学和文化方面长期存在的“左”倾错误，落实了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初步造成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气氛，调动了科教文工作者的积极性。科教文工作走上正轨并得到一定的发展，初步呈现繁荣景象，迎来了科教文战线的春天。在外交上，在五项原则基础上努力发展同各国的关系，切实加强同第三世界国家的团结和合作；高举维护世界和平的旗帜，坚持对外开放政策；根据处理兄弟党关系的基本原则，和一些国家的共产党恢复和发展关系，我国在国际上的威望提高了，朋友更多了，工作也更主动了。

上述形势的发展和巨大的变化，表明我们已基本消除了“文化大革命”所造成的严重后果，并为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的新局面创造了条件。因此，召开党的十二大，系统总结过去6年来的经验，进一步肃清10年内乱遗留的消极后果，确定继续前进的战略目标、战略步骤、战略重点和与此相适应的具体方针政策，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新局面等问题，就提到了中国共产党的议事日程上来。

（二）十二大的筹备

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是一次极为重要的会议，党中央十分重视，先后经过两年多时间的充分准备。

早在1980年2月，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就正式决定提前召开党的十二大。全会还对十二大的主要议程、代表名额和分配原则和产生办法等问题作了规定。

全会认为，党的十一大以来，特别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国内外形势都有了重大的变化和发展，随着全党工作着重点的转移，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开始走上健全发展的轨道，三中全会和四中全会所确定的党的政治路线，思想路线和组织路线，广泛地深入人心；林彪、“四人帮”一伙的反革命罪行，他们所推

行的极左路线和他们在组织上、思想上的残余，受到进一步的揭发批判；历史上遗留的大批冤假错案得到平反，党的各项政策在全国广泛地得到落实。在这个基础上，全党、全军、全国人民紧密团结在党中央的周围，为四个现代化的伟大事业和国民经济的调整、改革、整顿、提高方针的实施而艰苦奋斗。农业、工业、财贸、教育、科学、文化、政治、国防、外交等各条战线上捷报频传；安定团结、生动活泼的局面正在发展。这些事实证明，党中央所执行的路线、方针、政策是正确的，我们的国家已经从林彪、“四人帮”十年横行所造成的严重混乱状态，基本上转变成成为有领导、有秩序、有前进的方向和目标，有胜利的条件和信心的局面。这是我们党克服了巨大困难所取得的巨大胜利。全会指出：全国各族人民向四个现代化进军的伟大实践，现在向我们党提出了一系列需要不失时机地加以迅速解决的重大问题，包括确定国民经济发展的远景规划，确定适合国民经济发展需要的经济体制，确定适合国民经济发展需要的教育计划和教育体制。随着国内形势的转变，国家政治生活和党的生活中的一系列重要问题，思想上理论上的一些重要问题，也需要作相应的解决，以利于安定团结、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的发展和巩固，以利于现代化建设的顺利进行。为了解决这些迫切的问题，都要求中央委员会提前召开党的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央全会一致通过决定，提前召开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这次大会的具体时间，由中央政治局决定。

全会初步决定了十二大的主要议程，规定出席十二大的代表名额为 1600 名。各选举单位按代表人数 1/10 的比例选举候补代表。由各省、市、自治区、中央直属机关、中央国家机关，解放军各总部、军兵种、大军区，分别召开党的代表大会或代表会议，经过充分酝酿，采取差额选举办法，以无记名投票方式选举产生。

全会认为，1980年全党在各条战线上的工作任务将是十分繁重的，完成这些任务，将对胜利召开党的十二大发挥巨大的作用。因此，全会号召全党同志同全国人民一起，紧密团结在党中央的周围，团结一心，紧张努力，在各条战线上创造出优异的成绩，来迎接党的十二大的召开。

为了认真做好党的十二大代表的选举工作，1980年4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又通过了《关于十二大代表选举工作的几点意见》。《意见》根据中共中央五中全会决议的精神，对有关代表选举的若干问题提出了具体意见，要求各地的党代表大会或代表会议，必须自始至终坚持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出席十二大的代表，都要经过充分酝酿，采取差额选举的办法，以无记名投票方式产生。各省、市、自治区党委要加强领导，开好县、市的党代表大会或代表会议。同时，做好省、市、自治区的代表大会或代表会议的各项准备工作，经过充分酝酿，提出出席十二大代表候选人的预备名单。代表候选人预备名单，只作为领导掌握。整个选举工作，要充分体现多数代表的意见。各地区各单位的选举工作，应于11月底以前完成。中央政治局还对各方面代表的比例作出原则规定：妇女党员代表占代表总数的15%左右；全国著名的劳动模范和战斗英雄可占6%左右；科技、文化、教育、卫生、体育等各专业人员可占15%左右；少数民族代表不少于5%。同时，还要求代表力求年轻化，55岁以下的代表力争做到不少于2/5等。

这次中央政治局会议还作出《关于丧失工作能力的老同志不当十二大代表和中央委员候选人的决定》。《决定》指出：为了使出席这次大会的代表和大会选举产生的中央委员，有相当比例的年富力强的同志，使党的领导机构能够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繁重任务的需要，保证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长期连续性，保证党的集中领导和长期稳定性，根据许多老同志和党内外群众的

建议，根据五中全会精神和新党章（草案）的原则，中央决定，凡属年事已高，丧失工作能力和生活自理能力的老同志，不当党的十二大代表和中央委员候选人，这是废除实际上存在的干部职务终身制和逐步更新领导班子的一个重要步骤。

《决定》肯定“党内的老同志，几十年来，在革命斗争和建设事业中，忠心耿耿，艰苦奋斗，为党和人民立下了功勋。他们是党的宝贵财富”。同时，赞扬了老同志服从党的决定，用自己的模范行动带动干部制度的改革，再一次为全党同志做出榜样。

1980年5月18日、19日，在中央组织部召开的选拔优秀中青年干部工作座谈会上，胡耀邦就认真做好召开党代会的各项准备工作指出，要力争使我们党的十二大成为建国以来开得最好的大会之一。他说，要开成最好的代表大会，标准大体有三条：一、它制定的路线是正确的；二、它选出的领导班子是有威望的，是全党绝大多数同志所满意和拥护的；三、它的方法是体现民主集中制原则的，是充分走群众路线的。在谈到如何使选出的代表真正有代表性时，他说，组织部门的同志，要在各级党委领导下，认真研究，仔细考察，够条件当代表的就当，不够条件的不要勉强。要充分酝酿，真正取得广大党员的同意，不要少数人圈定。名单没有什么保密的，可以提到党员中去酝酿讨论，不要怕变动。这也是辩证法。要通过召开党代会，进行一次发扬党内民主、健全党的生活、加强党的领导的生动教育。

遵照十一届五中全会决议和有关指示精神，各省、直辖市、自治区、中央机关和人民解放军的党组织，先后分别召开了党代表大会或代表会议，选举产生了出席十二大的代表，按期完成了选举工作。

与此同时，修改党章的工作，也加紧进行。从1979年冬天开始，在中央政治局常委的领导下，由中央各有关单位调集一批干部多次举行座谈，并到全国许多地方去进行调查，征求意见，

拟出一个草稿。1980年1月，邓小平对党章的修改提出了许多重要的指导性意见。在中央的领导下，专门成立了由邓小平、胡耀邦主持，胡乔木具体负责的党章修改小组，对原有草稿进行反复讨论和修改，形成了修改草案第一稿。1980年2月提交十一届五中全会讨论，又根据全会的讨论意见，作了第一次修改。4月由中央书记处发给全党讨论，并发给部分党外人士征求意见。1980年5月作了第二次较多的修改。同年6月，又发给各省、市、自治区和各大军区党委，中央党政军各部门的党组织和全体十二大代表征求意见。7月又作了第三次修改。在上述各项准备工作的基础上，党中央政治局于1982年7月下旬在北京召开了扩大会议。中央和各省、市、自治区负责人共130余人到会，会议进行了6天，讨论了有关十二大的一些重要问题，为党的十一届七中全会进行了准备。

1982年8月6日，党的十一届七中全会在北京召开。出席会议的有中央委员185人，中央候补委员112人，列席21人。中央政治局常委胡耀邦、叶剑英、邓小平、赵紫阳、李先念、陈云、华国锋主持了会议。这是一次为召开党的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作准备的会议。

全会决定，今年9月1日召开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并向全党和全国人民公开宣布，恢复中共八大那样把自己的代表大会完全公开在全国人民面前的好传统，摒弃中共九大那种秘密进行的做法。

全会审议并通过了中央委员会向党的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报告和《中国共产党章程（修改草案）》，并决定将这两个文件提交党的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审议。

全会还讨论并通过了分别给我们党的老一辈革命家刘伯承、蔡畅的致敬信，肯定了他们在长期的革命和建设事业中对党对人民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在他们年高久病、不再担任领导工作之

际，以全会的名义表达全党同志对他们的亲切问候和致敬。

胡耀邦在全会闭幕时讲了话。他深情地指出：五年前，党的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同志们，把我们这些人推上了中国历史活动的前台。五年以后，中国历史的发展，同我们这个领导集体的工作和活动，是密切地联系在一起。我们在这段时间的功过是非，已经载入了党和国家的历史记录，印在广大党员和人民的心坎之中。公道自在人心。我们坚信历史是客观的公正的，坚信党和人民是以社会实践作为检验一切事物的标准的。人民将对我们这个领导集体，作出切合实际的评价。他接着说：几年来我们所以能够取得重大成就，是因为党的一系列重大决策是正确的，这些决策的绝大多数，首先是由我们党的几位老革命家作出的，这就是剑英、小平、先念、陈云同志，特别是小平同志。还有徐帅、聂帅、彭真、颖超等几位老同志，虽然年事已高，也出过许多好主意，做了重大的贡献，他们的高瞻远瞩、深谋远虑，对我们这个领导集体确实起了卓越的带领作用。我们这个领导集体的300多位同志，除了极个别人之外，几年来也都以自己对党 and 人民的忠诚，做出了值得称道的贡献。对此，党是看见了的，广大党员和人民也都是不会忘记的。最后，胡耀邦针对当时干部新老交替中出现的一种思想动态尖锐指出：“在我们党内生活中，有两种长期没得到澄清的错误舆论。一种是一个人被提拔了，特别是当上中委了，那末似乎他就会一下子变得特别能干，或者说他碰上了好运气，同某某人的关系好，等等。另一种是以为凡是不再当中委的，或者按其条件来说可以当中委而没有当上的，那一定是得罪了什么人，要永远倒霉了。这两种舆论，从根本上说，都是受了旧思想旧意识残余的影响。他引用毛泽东曾经多次说过的“当了中委的，不一定都比没有当上的强；没有当上的，或不再当的，也不一定就比当上的差。我们应当坚定地确信，只要真正是心在人民，心在党，党是决不当也决不可嫌弃任何

一个这样的同志的。让我们大家一起来打破那种涣散我们队伍的陈腐观念吧！让我们大家奋发努力，掌握好自己的命运吧！”

8月30日，党的十二大预备会议在北京举行。会议确定了大会四项议程，选出了由252人组成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主席团，选举赵紫阳为大会秘书长。胡耀邦在会上提出十二大的任务是：对粉碎“四人帮”六年来，特别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实现的伟大历史性转折作出胜利的总结，同时将确定党在新时期的宏伟目标和战斗任务，使我们党能够以新的面貌和坚强的战斗力，率领全国各族人民为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而奋斗。预备会通过了《关于确认十一届三中全会、四中全会增补中央委员的决定》。大会主席团选出由胡耀邦、叶剑英、邓小平、赵紫阳、李先念、陈云、华国锋、徐向前、聂荣臻、彭真、邓颖超等31人组成的主席团常务委员会，通过了宋任穷代表十二大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所作的审查报告，通过了大会日程。至此，党的十二大各项筹备工作圆满完成。

二、十二大的召开和重要成果

（一）邓小平与十二大开幕词

1982年9月1日至11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隆重开幕。出席大会的正式代表1545名，候补代表145名，代表着3900多万名党员。大会的主要议程有三项：

1. 审议通过中央委员会的报告，确定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的纲领；
2. 审议通过新的中国共产党章程；
3. 按照新党章规定，选举新的中央委员会、中央顾问委员会和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

会议由大会主席团和主席团常务委员会主持。开幕式大会邀

请了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的代表列席。

大会执行主席邓小平致开幕词。

开幕词回顾了党的七大以来的历史，阐明了十二大的重要历史地位。他说：党的七大是建党以后民主革命时期我们党最重要的一次代表大会。那次大会总结了我国民主革命 20 多年曲折发展的历史经验，制定了正确的纲领和策略，克服了党内的错误思想，使全党的认识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统一起来，达到了全党的空前团结。那次代表大会，为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全国的胜利奠定了基础。党的八大的路线是正确的，但是，由于当时党对于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思想准备不足，八大提出的路线和许多正确意见没有能够在实践中坚持下去。八大以后，我们取得了社会主义建设的许多成就，同时也遭到了严重挫折。和八大的时候相比较，现在我们党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认识深刻得多了，经验丰富得多了，贯彻执行我们的正确方针的自觉性和坚定性大大加强了。我们有充分的根据相信，这次代表大会制定的正确的纲领，一定能够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使我们党兴旺发达，使我们的社会主义事业兴旺发达，使我们的国家各民族兴旺发达。这次代表大会将是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以来一次最重要的会议。

开幕词中，邓小平总结了党的历史经验，提出了走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指导思想。他指出：“我们的现代化建设，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无论是革命还是建设，都要注意学习和借鉴外国经验。但是，照抄照搬别国经验、别国模式，从来不能得到成功。这方面 we 有过不少教训。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这个基本结论是开辟新道路的根本准则，也是创立新理论的主题。这个基本结论是中国共产党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客观规律的正确认

识和运用，也是我国各族人民的意志、愿望和要求的集中表现。我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就是在这个思想指导下取得巨大成功的。

在开幕词中，邓小平还审时度势，站在时代的潮头，提出了80年代我国人民面临的三大任务。他指出：80年代是我们党和国家历史发展上的重要年代。加紧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争取实现包括台湾在内的祖国统一，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是我国人民在80年代的三大任务。在这三大任务中，核心是经济建设，它是解决国际国内问题的基础。今后一个长时期，至少是到本世纪末的近20年内，我们要抓紧抓好四件工作：进行机构改革和经济体制改革，实现干部队伍的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打击经济领域和其他领域内破坏社会主义的犯罪活动；在认真学习新党章的基础上，整顿党的作风和组织。这是我们坚持社会主义道路，集中力量进行现代化建设的最重要的保证。

邓小平在开幕式上的致词，言简意赅、高屋建瓴，听后给人以力量，使人振奋，充分显示了邓小平这一伟人的魅力。开幕词的内容是十二大精神的高度概括，具有重大的意义。

（二）《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的政治报告

胡耀邦代表十一届中央委员会向大会作了题为《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的政治报告。报告分六个部分：一、历史性的转变和新的伟大任务；二、促进社会主义经济的全面高涨；三、努力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四、努力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民主；五、坚持独立自主的对外政策；六、把党建设成为领导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坚强核心。

报告回顾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战斗历程和各条战线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对比党领导中国民主革命期间发生过的两次历史性转变提出：这一次转变，与过去那两次相比，历史条件有了很

大的不同。我们党已经是全国政权的领导核心，我们国家已经经过长时期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人民的力量比过去革命战争时期强大得多。社会主义事业虽然由于“文化大革命”而受到巨大的损失，但仍具有不可战胜的强大生命力。我们虽然失去了毛泽东同志、周恩来同志、刘少奇同志、朱德同志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但是还有同他们并肩战斗过的许多老革命家作为中流砥柱，还有受过革命战争考验的许多老同志和建国以后锻炼成长的大批中青年同志作为中坚力量。在党中央领导下，经过全党上下的紧张努力，经过全党同志同全国亿万人民的团结战斗，我们终于实现了又一次历史性的伟大转变。

报告提出党在新的历史时期的总任务是：团结全国各族人民，自力更生，艰苦奋斗，逐步实现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现代化，把我国建设成为高度文明，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国家。从这次代表大会到下次代表大会的五年间，我们要根据上述总任务的要求，从当前实际出发，大力推进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继续健全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认真整顿党的作风和组织，争取实现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根本好转，同时，我们要同包括台湾同胞、港澳同胞和国外侨胞在内的全体爱国人民一道，努力促进祖国统一的大业。我们还要同全世界人民一道，继续为反对帝国主义、霸权主义和维护世界和平而斗争。

报告从我国实际出发，围绕总任务，制定了我国经济建设的战略目标、战略重点、战略步骤和一系列方针政策。

报告指出：在全面开创新局面的各项任务中，首要的任务是把现代化的经济建设继续推向前进，促进社会主义经济的全面高涨，从1981年到本世纪末的20年，我国经济建设总的奋斗目标是，在不断提高经济效益的前提下，力争使全国工农业的年总产值翻两番，即由1980年的7100亿元增加到2000年的28000亿元左右。为实现上述战略目标，重要的是解决农业问

题，能源、交通问题和教育、科学问题，把它们作为战略重点。在综合平衡的基础上，把这些方面的问题解决好了，就可以促进消费品生产的较快增长，带动整个工业和其他各项生产建设事业的发展，保障人民生活的改善。

为了实现 20 年的奋斗目标，在战略部署上要分两步走：前 10 年主要是打好基础，积蓄力量，创造条件，后 10 年要进入一个新的经济振兴时期，这是党中央全面分析了我国经济情况和发展趋势之后作出的重要决策。在 1981 年到 1985 年第六个五年计划期间，要继续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方针，厉行节约、反对浪费，把全部经济工作转到以经济效益为中心的轨道上来。要集中力量进行各方面经济结构的调整，巩固和完善经济管理体制方面已经实行的初步改革，抓紧制订改革的总体方案和实施步骤。在 1986 年至 1990 年的第七个五年计划期间，要广泛进行企业的技术改造，逐步展开经济管理体制的改革，同时完成企业组织结构和各方面经济结构的合理化。在 80 年代，还必须在能源、交通等方面进行一系列必要的基本建设和一系列重大科技项目的“攻关”。只要我们切实做好上述各项工作，就可以把历史遗留的问题解决好，并且为后 10 年的经济增长打下比较坚实的基础。到 90 年代我国经济肯定会比 80 年代高得多，我国经济将全面进入高涨时期。

为了促进社会主义经济的全面高涨，在全部经济工作中，必须继续贯彻执行五届人大四次会议批准的 10 条经济建设方针，特别要注意集中资金进行重点建设和继续改善人民生活，坚持国营活动的主导地位和发展多种经济形式，正确贯彻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原则，坚持自力更生和扩大对外经济技术交流等重要方针原则问题。

报告从理论高度论述了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意义和作用，提出必须努力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报告指出：我们在建

设高度物质文明的同时，一定要努力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这是建设社会主义的一个战略方针问题。社会主义的历史经验和我国当前的现实情况都告诉我们，是否坚持这样的方针，将关系到社会主义的兴衰和成败。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关系是十分密切的，物质文明的建设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不可缺少的基础。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对物质文明的建设不但起巨大的推动作用，而且保证它的正确的发展方向。两种文明的建设，互为条件，又互为目的。报告指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是社会主义的重要特征，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重要表现。过去在讲到社会主义特征的时候，人们往往强调剥削制度的消灭和生产资料的公有，按劳分配，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的发展以及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的政权，人们还强调，高度发达的生产力和比资本主义更高的劳动生产率，作为社会主义发展的必然要求和最终结果也是它的特征。这些无疑都是正确的，但是还不足以完全包括社会主义的特征。社会主义还必须有一个特征，就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没有这种精神文明，就不可能建设社会主义。报告指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内容包括文化建设和思想建设两个方面。这两方面又是互相渗透和互相促进的，文化建设指的是教育、科学、文化艺术、新闻出版、广播电视、卫生教育、图书馆、博物馆等各项文化事业的发展和人民群众知识水平的提高，它既是建设物质文明的重要条件，也是提高人民群众思想觉悟和道德水平的重要条件。思想建设决定着我们的精神文明社会主义性质，它的重要内容是工人阶级的、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科学理论，是共产主义的理论、信念和道德，是同社会主义公有制相适应的主人翁思想和集体主义思想，是同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相适应的权利义务观念和组织纪律观念，是为人民服务的献身精神和共产主义的劳动态度，是社会主义的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等等。概括起来说，就是革命的理想、道德和纪律。我们全党和

全社会的先进分子，一定要不断地传播先进思想，在实际行动中发挥模范作用，带动越来越多的社会成员成为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守纪律的劳动者。报告指出：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在今天尤其是这样。我们一定要用最大的努力，适应建设时期的新的条件和情况，把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工作认真做好，用革命的思想 and 革命的精神振奋起广大群众建设社会主义的巨大热情。

报告从我国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制度出发，提出了努力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民主。报告指出：社会主义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都要靠继续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来保证和支持。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民主，是我们的根本目标和根本任务之一。我们的国家制度是人民民主专政制度，一方面保证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劳动人民当家做主，另一方面保证对极少数破坏社会主义的敌对分子实行专政。只有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民主，才能使各项事业的发展符合人民的意志、利益和需要，使人民增强主人翁的责任感，充分发挥主动性和积极性，也才能对极少数敌对分子实行有效的专政，保障社会主义建设的顺利进行。报告强调，必须按照民主集中制的原则，继续改革和完善国家的政治体制和领导体制，把社会主义民主扩展到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发展各个企业事业单位的民主管理，发展基层社会的群众自治，并把社会主义民主的建设同社会主义法制的建设紧密地结合起来，使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化、法律化。要进一步发展国内各民族之间平等、团结、互助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这也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要十分谨慎地区别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既要防止重犯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错误，又要对少数敌对分子实行有效的专政。

报告论述了党坚持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指出：把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结合起来，从来是我们处理对外关系的根本出发点。

我们坚持执行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中国对外政策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科学理论为基础的，是从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的，它有长远的、全局的战略依据，决不迁就一时的事变，不受任何人的唆使和挑动。在任何情况下，我们永远不称霸。中国属于第三世界，坚持同第三世界国家一起为反对帝国主义、霸权主义、殖民主义而斗争。我们党坚持在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按照独立自主、完全平等、互相尊重、互不干涉内部事务的原则，发展同各国共产党和其它工人阶级政党的关系，各国党应当互相尊重，互相帮助。中国应当对世界有较大的贡献。

报告提出把党建设成为领导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坚强核心。为了加强新时期党的建设，对十一大党章做了许多有根本意义的修改。修改党章的总的原则是，适应新时期的特点和需要对党员提出更严格的要求，提高党组织的战斗力和战斗力，坚持和改善党的领导。新党章清除了十一大党章中“左”的错误，继承和发展了党的七大和八大党章的优点。

新党章在总纲中，对党的性质和党的指导思想，对现阶段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和党的总任务，对党在国家生活中如何正确地发挥作用，都做了马克思主义的规定。

新党章对党员和党的干部在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的要求，比过去历次党章的规定都更加严格；新党章强调从中央到各级组织都必须严格遵守民主集中制和集体领导的原则，明确规定“禁止任何形式的个人崇拜”。

新党章对改善党的中央和地方组织的体制，对加强党的纪律和纪律检查机关，对加强基层组织的建设，都作了许多新的规定。新党章规定，党中央不设主席只设总书记，总书记负责召集中央政治局、政治局常委会议和主持中央书记处的工作，中央和省一级设顾问委员会，以发挥许多富有政治经验的老同志对党的

事业的参谋作用；党的各级纪律检查委员会由同级党的代表大会选举产生；党的各级组织都必须重视党的建设，经常讨论和检查党的工作等。通过上述内容，我们可以看到，新党章更加充实和完善，是党的历史经验和集体智慧的结晶，是把我们党建设得更加坚强的依据和重要保证。

报告指出，为把党建设成为领导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核心力量，当前必须健全党的民主集中制，改善领导机构和干部制度，实现干部队伍的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和专业化，同时加强党在工人、农民、知识分子中的工作，密切党同群众的联系，用三年时间，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整党，使党风根本好转。

胡耀邦的报告围绕着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个中心，从政治、经济、文化思想、外交和党的建设等各方面，勾画出了实现这一宏伟目标的蓝图，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解决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的许多重大问题，激起了各方面的强烈反响。9月2日至4日，代表们用了3天时间，进行热烈讨论，大家在讨论中畅所欲言，心情舒畅，会议气氛十分活跃。

5日下午，大会主席团举行会议。大会副秘书长胡乔木就代表们在分组讨论中对十一届中央委员会报告和《中国共产党章程》草案所提出的建议和意见以及据此对报告和党章草案进行修改的情况做了说明。会议通过了关于十一届中央委员会报告的决议草案和《中国共产党章程》的决议草案，并且决定将这两个决议草案提请大会通过。会议还决定将主席团提出的中央委员会、中央顾问委员会和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候选人酝酿名单提交全体代表讨论，并通过了关于三个委员会的选举办法，提交大会审议。

6日下午，举行全体会议。大会通过了关于十二届中央委员会报告的决议，批准胡耀邦代表十一届中央委员会所做的报告。

大会的决议认为：“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是正确的，工作是有成效的。”“报告提出的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的正确纲领和一系列方针政策，应当成为今后党的各项工作的基本依据。”大会还通过了十一届中央委员会提出的《中国共产党章程》和关于这个章程的决议。决议要求全党认真组织对于新党章的学习，努力使全体党员真正理解党章总纲和党章的各项规定，使所有党员，特别是所有干部党员的认识都能够得到提高，以便为全面整顿党的作风和党的组织，把党建设成为领导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坚强核心做好充分准备。

在6日的大会上，叶剑英和陈云讲了话。叶剑英和陈云表示赞成邓小平的开幕词和胡耀邦的政治报告及中国共产党章程，并着重讲了干部新老合作交替问题。

叶剑英说：“我们的党是一个生机勃勃的党。经过这次大会，将有一批年富力强的同志，走上中央的领导岗位和其他领导岗位，这是党的事业兴旺发达的重要标志。我们老一辈的同志，看到这种情况，由衷地感到喜悦。”同时，他还引用唐朝诗人李商隐“雏凤清于老凤声”的诗句，赞扬年轻的同志，并且真诚地“希望新上来工作的年轻同志，同老同志亲密合作，挑起重担，奋勇前进”，后来居上，超过年老的同志；希望退下来的老同志思想不能退，要用实际行动写好自己晚年的历史，处处为党和人民的利益着想，继续做力所能及的工作。

陈云分析了党的干部队伍的状况，阐述了新老干部合作和交替的意义和方针。他说：“解决好干部队伍的交接班问题，是摆在全党面前的一个重要任务，要解决这个问题，首先是老干部要陆续从领导班子中退出。暂时留在第一线的老同志，要在重大问题上把好关，搞好传帮带。”他着重谈了要提拔成千上万的中青年干部进入各级领导班子的问题。他强调，“必须成千上万地提拔，而不能只提拔几十个，几百个”。只有这样，才能有足够的

干部接替老干部的工作。但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跟随林彪、江青一伙造反起家的人，帮派思想严重的人，打砸抢分子，这‘三种人’一个也不能提拔，已经提拔的，必须坚决从领导班子中清除出去”。他说：一方面要大胆提拔，一方面又要把好政治这一关。德才相比，我们要更注重德，就是说，要确定提拔那些党性强、作风正派、敢于坚持原则的人。他相信，只要把干部队伍的交接问题解决好，我们党的事业就一定会后继有人。

（三）十二大的选举

9日上午，大会主席团举行会议，根据预选结果，确立三个委员会候选人正式名单，还通过了关于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工作报告的决议（草案）。下午，各代表团举行分组会议，审议主席团提出的候选人名单。

10日和11日上午，举行全体会议，进行中央委员会正式委员、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的选举。经过充分准备，大会民主选出中央委员210人，中央候补委员138人，组成新的中央委员会。在这348名中委和候补中委中，新当选的有211人，占总数的65%，年龄在60岁以下的有171人，占总数的49.1%；具有大专以上学历的122人，占总数的35.1%，在知识化专业化方面，比上届中央委员会有较大的提高。中央委员会还保留了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陈云、徐向前、聂荣臻、彭真、邓颖超等6位德高望重、在国内外都享有崇高威望的老一辈革命家。同时，新成立了党史上过去没有过的中央顾问委员会，选出委员172人，他们都是具有40年以上党龄，对党有较大贡献，又有丰富领导工作经验的老同志。还选出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133人。

这三个委员会的产生，体现了邓小平的《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中关于设立三个委员会、进一步建立分权制衡机制的要求，贯彻了新老干部交替的原则，为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为党和国家的长治久安，为实现全面开创社会主义建设的新局面，提

供了可靠的组织保证。

11日，十二大闭幕，李先念致闭幕词。

闭幕词高度评价了胡耀邦的报告和新党章，以及大会取得的成就，号召广泛深入地宣传、学习十二大精神，采取切实措施，扎扎实实地贯彻执行，一步一步地达到我们的伟大目标。

9月12日至13日，党的十二届中央委员会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胡耀邦、赵紫阳主持会议。全会选举万里、习仲勋、王震、韦国清、乌兰夫、方毅、邓小平、邓颖超、叶剑英、李先念、李德生、杨尚昆、杨得志、余秋里、宋任穷、张廷发、陈云、赵紫阳、胡乔木、胡耀邦、聂荣臻、倪志福、徐向前、彭真、廖承志为中央政治局委员。选举姚依林、秦基伟、陈慕华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

选举胡耀邦、叶剑英、邓小平、赵紫阳、李先念、陈云为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

选举胡耀邦为中央委员会总书记，万里、习仲勋、邓力群、杨勇、余秋里、谷牧、陈丕显、胡启立、姚依林为中央书记处书记，乔石、郝建秀为候补书记。

全会决定邓小平为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为副主席，杨尚昆为常务副主席。

全会批准邓小平为中央顾问委员会主任，薄一波、许世友、谭震林、李维汉为副主任，王平等24人为常务委员。批准陈云为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一书记，黄克诚为第二书记，王鹤寿为党务书记，王从吾、韩光、李昌、马国瑞、韩天石为书记，马国瑞、韩天石等11人为常务委员。

在会上，胡耀邦代表新产生的中央书记处，就今后工作主要是1983年工作提出了4点意见：认真组织全党学习十二大文件，要把这当作十二大闭幕后第一件大事来抓；要抓好机构改革的工作；要认真考虑如何抓好整党；经济工作任何时候都不能放松。

胡耀邦还满怀激情地说：“我还要着重强调一点，就是从现在起，今后五年内，党和国家的命运，是同我们这个新的中央领导集体、新的战斗指挥部息息相关的。我想我们这个领导集体的每一位成员，都会意识到自己肩上的历史重任。”“只要大家都能向前看，都能时时想到人民的需要和自己的不足，那就一定能够不断前进，作出新的贡献。”“我们这一届中央领导集体，不但可以担负起重大的历史责任，而且应当比上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做得更好一些。”胡耀邦这一席充满信心语重心长的讲话，深深地激起了大家的共鸣，春雷般的掌声，顿时响彻全场。

一中全会结束时，中央领导同志同出席、列席全会的同志们、全体十二大代表和候补代表共 1700 多人合影留念。十二大圆满地划上了句号。

十二大以后，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掀起了学习、贯彻、执行十二大精神的高潮，党内外干部群众欢欣鼓舞，意气昂扬，一派生机。当时的中国真有“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之景象。

三、十二大的历史功绩

党的十二大是一次极其重要的会议，邓小平在十二大开幕词中说：“回顾党的历史，这次代表大会将是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以来的一次最重要的会议。”同年 9 月 18 日，邓小平在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金日成谈话时又说：“十二大的作用与我们党的七大一样。七大把革命引向胜利，十二大将把建设引向胜利。”这个讲话十分准确而概括地说明了十二大的历史地位。

众所周知，1945 年春召开的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全面系统地总结了民主革命 20 多年曲折发展的历史经验，克服了党内的错误思想，更加完备、具体地制定了正确的纲领和政策，

使全党的认识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统一起来，达到了全党的空前团结。在七大路线的指引下，很快就夺取了全国的胜利。之所以将十二大同七大相比，是与十二大取得的重大成就分不开的。具体地讲，十二大的历史功绩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明确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一重要命题。在十二大开题词中，邓小平总结了党的历史经验，提出了走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指导思想。他指出：“我们的现代化建设，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无论是革命还是建设，都要注意学习和借鉴外国经验。但是，照抄照搬别国经验，别国模式，从来不能得到成功。这方面我们有过不少教训。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邓小平提出的走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理论，有着深刻的历史渊源和背景。

首先是对毛泽东关于建设社会主义理论的继承和发展。我国在经过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进入社会主义社会以后，社会主义就不再是教科书上讲的一种学说，而是一种活生生的现实了。与此同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也就十分现实地摆到了中国共产党的面前。

1956年4月，毛泽东根据当时各部委情况的汇报，概括提出《论十大关系》。毛泽东鉴于建国初期我们照抄苏联的经验而走过一段弯路的教训，在这篇著作中提出全党和全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指导思想问题。他说：“我们的理论，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明确指出，苏联已经暴露了他们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的缺点和错误，我们没有任何理由重走他们的弯路，没有任何理由再度陷入教条主义的盲目性；唯一正确的出路，只能是坚持把马克思列宁主义

的普遍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来建设社会主义。这是毛泽东提出的指导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根本性思想原则。其后，毛泽东在1958年3月10日成都会议上说，1956年4月提出十大关系，开始提出我们自己的建设路线，原则和苏联相同，但是方法有所不同，有我们自己的一套内容。

1960年6月18日，他在《十年总结》中明确指出：“前八年照抄外国的经验。”但从1956年提出十大关系起，开始找到自己的一条适合中国的路线，“开始反映中国客观经济规律”。《论十大关系》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对我国的历史、经济、阶级、民族、思想文化、国际环境等作了深入具体的分析，指出，我们必须从我们的基本国情出发来确定我们的基本方针。这个基本国情就是一方面是一穷二白，一方面“革命又是后进的”，比人家晚。因此，我们没有任何理由骄傲自满、固步自封，而要鼓点劲，把民族自尊心提高起来，依靠自己的力量，谦虚谨慎，把社会主义建设搞得更好一些。但是，由于受到“左”的指导思想的干扰和10年内乱期间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的破坏，《论十大关系》中提出的建设社会主义理论没能够在实践中运用。“粉碎‘四人帮’以后，由于‘两个凡是’指导思想的影响，还经历了两年徘徊时间。直到1978年我们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才制定了一系列新的正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根本内容就是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1979年3月，邓小平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一文中指出：过去搞民主革命要适应中国情况，走毛泽东开辟的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现在搞建设，也要适合中国情况，走出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随后，邓小平又总结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实践经验，在十二大上提出走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这一根本指导思想。

其次是对中国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经验教训的总结。邓

小平说：“中国革命能成功，是毛泽东同志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走自己的路。现在中国搞建设，也要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走自己的路……这是我们吃了苦头，总结出来的经验。”他在对外宾谈话中坦率地说：“我们过去照搬苏联搞社会主义模式，带来很多问题。我们很早就发现了，但没有解决好。我们现在要解决好这个问题，我们要建设的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同时，邓小平在多次批判“四人帮”宁要贫穷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结果中国停滞了的事实时说，迫使我们考虑的第一条就是坚持社会主义，首先摆脱贫穷，要建设比资本主义有优越性的社会主义，就要找一条比较快的发展道路。十分清楚，他所说的这条道路就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

从国际情况来看，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殖民地国家获得独立后，经济上本来应该发展得很好。但结果凡是采用苏联模式进行经济建设的国家都发展很慢，几乎无一例外。邓小平总结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经验教训和国内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教训，在国际共运史上首先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科学命题，并坚定地走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以事实对西方的舆论作出了回答。

我们正是“总结了我国革命和建设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从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制定了一系列新的方针政策。这些方针政策，归根到底就是恢复和坚持毛泽东同志提出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根据这条思想路线来探索中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

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4年间，我们贯彻执行党的正确路线、方针和政策，在实践中探索，到六中全会通过的《决议》，我们党已经逐步确立了一条适合我国情况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正确道路，总结了10个要点，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道路描绘了一个基本轮廓。邓小平坚持理论与实践的统一，深刻总结我国历史与现实，正面与反面的经验，特别是 10 年内乱的沉痛教训，总结了国际的经验教训，在党的十二大明确地提出我国今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根本指导思想——走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这是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这既是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也是对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指导思想的新的理论概括，为十二大作出重大决策提供了科学依据。

第二，顺利实现了党的领导班子的新老交替。解决好干部队伍的新老交替，尽快实现干部队伍的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问题，是十二大的主要议题之一。从历史上看，交接班的问题从来都是关系到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一件大事，也是几十年来各个社会主义国家没有很好解决的问题。这个问题，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有过惨痛的教训，在中国共产党内也有过严重的教训。我们党的十二大比较好地解决了这个问题。十二大这样顺利地、有条不紊地进行交接班，既表现了老一辈革命家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革命胸怀，体现了全党的共同意志，这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也是一个创举。正如陈云同志讲话中指出的，这证明中国共产党已经进一步成长为一个成熟的伟大的党。这是十二大的一个伟大功绩，这一功绩的取得是经历了一个过程的，它是多年来我们党老一辈的无产阶级革命家高瞻远瞩、深思熟虑的结果。

新老交替的问题，在我国是 60 年代初期开始被提出来的。那时候，党中央领导同志的年龄在 60 岁左右，中央各部和各省、市、自治区的领导同志的年龄在 50 岁左右。有鉴于此，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曾提出要培养和选拔千百万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以后由于种种原因，特别是由于“文化大革命”的破坏，这样一个关系到党和国家盛衰存亡的大问题被搁置下来。干部一年比一年老化，新老交替的问题一年比一年更严重地摆在党的面

前。

1979年7月底，邓小平在一次会议上指出，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已经确立了，现在还没有解决的问题是组织路线问题，解决组织路线问题，最大的问题，也是最难、最迫切的问题，是选好接班人。他大声疾呼：“现在摆在老同志面前的任务，就是要有意识地选拔年轻人，选一些年轻的身体好的同志来接班。”他语重心长地说：“1975年我主持中央工作，王洪文就说，十年后再看。……我们对林彪、‘四人帮’的影响不能低估，不能想得太天真了。要想得远一点。一定要趁着我们在的时候挑选好接班人，……亲自看他们成长起来。”后来，邓小平又在一次高级干部会议上强调说：“认真选好接班人，这是一个战略问题，是关系到我们党和国家长远利益的大问题。”“要忧国、忧民、忧党啊！”同年9月29日，叶剑英在建国30周年庆祝大会上的讲话中强调要“使我们的组织状况同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政治任务相适应”，“要在老干部的帮助和带领下，在群众的监督下，让越来越多的年轻或者比较年轻的干部把我们的各项事业的领导责任担当起来”。也是在同一时期陈云同志提出，“我们选干部，要注意德才兼备，所谓德，最主要的，就是坚持社会主义道德和党的领导。在这个前提下，干部队伍要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并且要把对于这种干部的提拔使用制度化”。邓小平完全赞成这个由陈云概括出来的干部队伍“四化”的方针。这个方针在1981年十一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决议中和十二大通过的新党章中，都被明确地肯定下来。另外，胡耀邦、赵紫阳等中央领导同志也一再强调实现干部队伍“四化”的问题。直至这次十二大，叶剑英、陈云在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中，还着重论述了新老干部交接班的重要意义。

鉴于我们党的历史上曾经有过把林彪当接班人写进党章，林彪摔死后又提出王洪文当接班人那种侧重于个人交接班的失败的

教训，党中央确定，新老交替采取集体交接班的方式。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中央就开始考虑这个问题。在1980年2月召开的十一届五中全会上，中央政治局常委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陈云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高瞻远瞩，经过深思熟虑，建议设立中央书记处作为在中央政治局及其常委会领导下处于第一线主持正常工作的机构，书记处和国务院的领导要逐步年轻一些，增选比较年轻一点的胡耀邦、赵紫阳同志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分别主持书记处和国务院的工作。邓小平、李先念、陈云、王震等同志还提出，他们在五届三次人代会后不再兼任副总理。十一届五中全会接受了他们的建议，决定设立中央书记处，选举胡耀邦为总书记，并选举了书记处的其他成员。1980年9月召开的五届人大三次会议，接受中共中央建议，任命赵紫阳为国务院总理，同时任命几位年纪较轻的同志为副总理。这是党中央为解决新老干部交替而采取的第一个重大步骤。

1982年上半年中央机关和国务院各部委的机构改革，是中央为实现干部队伍的“四化”，有秩序有步骤地实现新老干部交替的又一个重大决策。这次改革，不仅使中央一级的党政机构和工作人员的编制大大缩减，而且使部、司（局）两级领导班子的平均年龄普遍下降了4~6岁，其中新提拔起来的中青年干部已分别占到部、司（局）两级新班子成员总数的16%和32%。许多老同志荐贤举能，扶持那些资望和经验都不及自己的年轻同志上来，自己甘当助手，或退居二、三线，担当起传帮带的任务。

党的十二大，从代表的产生到新的中央领导机构的选举，是在全党范围内实现新老合作和交替的一个更大的步骤。在酝酿选举代表过程中，各地都有许多老同志以党的事业为重，诚恳地向组织上要求不要提名他们为十二大代表的候选人，把名额让给符合要求的中青年干部。这次选出的1600名代表和149名候补代表，绝大多数是在群众中有威望的优秀党员，其中中青年占将近

2/5，各方面的专业人员、专家也占了相当比重。新的中央委员会、中央顾问委员会、中央纪律检查委员候选人的酝酿名单，是根据干部队伍要逐步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和新老交替的要求，用了3个月的时间，充分走群众路线，广泛征求各方面意见后提出的。这几个名单经十二大的大会主席团酝酿后，提交全体代表讨论并进行了预选，然后又根据预选的结果调整了候选人的名单，产生出正式候选人名单，提交大会进行选举，这就在民主集中制的基础上统一了全党的意志。

十二大用了3天时间对3个委员会的候选人名单进行了认真的分组讨论，代表们都赞成和拥护叶剑英、陈云在大会上发表的着重论述新老干部交接班问题的重要讲话。经过各抒己见，畅所欲言的讨论，代表们思想更趋一致，在随后的无记名投票选举中，选出了中央委员会、中央顾问委员会和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新的中央委员会有正式委员210人，候补委员138人，合计348人。其中第一次进入中央委员会的有211人，占65%；年龄在60岁以下的有171人，占49.1%（内有55岁以下的112人，占32.2%，50岁以下的占14.1%），中央委员中保留了16位71岁以上的老同志，他们是德高望重，在国内外享有巨大威望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我们党的领导核心中起着中流砥柱的作用。同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相比，新的中央委员会一个最显著的特点是吸收了一大批德才兼备，年富力强，经验丰富，具有专业知识的中青年干部。叶剑英在大会上讲话时热情洋溢地援引唐朝诗人李商隐的名句“雏凤清于老风声”来称赞我们党的这批新秀。他们走上了中央的领导岗位，这是党的事业兴旺发达的重要标志，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第三，制定和通过了一个好的党章。党章是党的根本大法，我党历次代表大会都非常重视党章的修改制定，党的十二大为把党的建设成为领导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坚强核心，为大大提

高全党的政治素质，提高党的战斗力，制定了我们党历史上最为充实和完善的新党章。十二大党章的特点是：（1）有了一个内容比较充实的“总纲”，比较完整地、简明扼要地概括了党的性质和党的总任务，对党在国家生活中如何正确地发挥领导作用，都做了马克思主义的规定。（2）对党员和党的干部在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的要求，比过去历次党章的规定都更加严格。（3）根据历史的经验和教训，新党章强调从中央到基层的各级组织都必须严格遵守民主集中制和集体领导的原则，明确规定“禁止任何形式的个人崇拜”。（4）新党章对改善党的中央和地方组织的体制，对加强党的纪律和纪律检查机关，对加强党的基层组织的建设，都做了许多新的规定。十二大的新党章是集中了全党的智慧，总结了党的历史经验而制定出来的。我们党历史上的党章，七大、八大的党章是比较好的。七大党章确立了毛泽东思想为党的指导思想，增加了“总纲”部分，强调了党的群众路线，更加完善了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八大党章突出了执政党的特点，提出了全面开展社会主义建设的任务，强调进一步发扬党内民主和加强党内集体领导，把维护党的团结统一，正确进行党内斗争的要求列入党章，并对党员提出更高的标准和要求。九大、十大党章是在指导方针根本错误的条件下产生的，实际上不大像党章，党员有些什么权利和义务，究竟怎么样才算个共产党员，不合条件怎么办，都没有规定好。十一大党章也包含有严重缺陷。十二大党章继承发展了七大、八大党章的优点，同时，清除了十一大党章中“左”的错误，因而比我们党过去的党章更加充实和完善。因此，十二大党章是建党以来最好的党章，给整顿党的组织和转变党的作风提供了强大的思想武器。

第四，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十二大对马克思主义的补充、丰富和发展，择其大者而言，可以包括以下几个方面：（1）关于社会主义基本特征的问题。过去对社会主义基本特征的论

述，往往强调剥削阶级的消灭和生产资料的公有，按劳分配，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的发展以及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的政权。还强调高度发达的生产力和比资本主义更高的劳动生产率。十二大报告指出，社会主义还必须有一个特征，就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高度的社会主义民主。这就使社会主义基本特征既包括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也包括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因而更加全面完整。

(2) 关于社会主义所有制结构问题。过去的论述往往强调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和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以及后者向前者的过渡。十二大报告指出，社会主义国营经济在整个国民经济中居于主导地位，但是，在很长时间内需要多种形式的同时并存。

(3) 关于计划和市场问题。过去的论述往往强调计划，排斥市场，十二大提出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原则，在这一原则下，要正确划分指令性计划、指导性计划和市场调节各自的范围和界限。

(4) 关于阶级斗争问题。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的阶级斗争问题是马克思主义过去没有解决的问题。十二大报告提出，在剥削阶级作为阶级消灭以后，我国社会存在的矛盾大多数不具有阶级斗争的性质，阶级斗争已经不再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但是阶级斗争还将在我国社会的一定范围内长期存在，并且在某种条件下还有可能激化。另外，在精神文明建设和党的建设等问题上也都有新的表述，这些都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宝库。

第五，全面开创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在党的历史上，曾两次提出全面开展社会主义建设的任务。一次是八大，一次就是十二大。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是在我国由新民主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的历史转折时刻举行的一次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大会。这次大会明确宣告：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社会主义制度在我国已基本上建立起来了，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不再是工人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而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

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全国人民的主要任务是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实现国家工业化，逐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的需要；虽然还有阶级斗争，还要加强人民民主专政，但人民政权的根本任务已经是在新的生产关系下面保护和发展生产力。八大的这一战略决策，反映了我国历史发展的客观进程，符合我国人民的共同愿望。适应新的形势，八大提出了全面开展社会主义建设的任务，并制定了正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为新时期社会主义的建设，国家的民主建设和执政党的建设指明了方向。八大的路线是正确的。但是由于当时党对于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思想准备不足，八大提出的路线和许多正确意见没有能够在实践中坚持下去。八大以后，我们取得了社会主义建设的许多成就，同时也遭到了严重挫折。

党的十二大对我党的历史经验进行了科学的总结，对我国当时的实际情况做出了正确的分析，制定了开创社会主义建设新局面的宏伟目标和更为完备的一系列正确方针、政策和措施，提出了党在新的历史时期的总任务和总路线，它把经济建设、政治建设和思想文化建设三个方面同时并列为建设社会主义的目标，这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史上还是第一次，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也是首创。十二大以后，我国的社会主义事业和改革开放事业进入了一个全新的时期。

总之，党的十二大取得的成就是多方面的，以上所述，只是几个主要方面，据此已足以证明十二大同七大一样伟大了。十二大也正是作为在政治上确定党在新时期的方针政策，组织上实现新老合作和交替，以及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的大会而载入党的史册的。

（陈雪薇主编《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重大事件和决策调查》）

再绘宏图：中国共产党 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

十三大的突出贡献，是系统地阐述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完整地概括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十三大根据邓小平的设想，提出了“三步走”的经济发展战略。十三大从指导思想、历史阶段、根本任务、发展动力、必要条件、总体布局、国际环境等方面，勾画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轮廓。

一、十三大的筹备

中共十二大是1982年举行的，按照中国共产党的章程规定，每五年举行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中共十二届六中全会上，会议通过了在1987年第四季度举行中共十三大的决议，当时党的总书记是胡耀邦。大会的筹备工作也由他来负责，胡耀邦积极进行各项准备，并组织了政治报告的起草班子。

在六中全会上，邓小平同志发表了一个重要讲话。他说：“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我讲得最多，而且我最坚持。为什么呢？第一，现在群众中，在年轻人中，有一种思潮，这种思潮就是自由化。第二，还有在那里敲边鼓的，如香港的一些议论，台湾的议论，都是反对我们的四项基本原则，主张我们把资本主义一套

制度都拿过来，似乎这样才算是真正搞现代化了。自由化是一种什么东西？实际上就是要把我们中国现行的政策引导到走资本主义道路。这股思潮的代表人物是要把我们引导到资本主义方向上去。”邓小平还要求在十二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中使用“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这一提法。他强调说：“看来，反对自由化，不仅这次要讲，还要讲10年20年。这个思潮不顶住，加上开放必然进来许多乌七八糟的东西，一结合起来，是一种不可忽视的、对我们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的冲击。”

在这次中央全会之前，邓小平也针对社会上的情况让人向胡耀邦转达过反对自由化的意见，但这没有引起胡耀邦的足够重视。1986年底，在合肥、北京等几个大城市发生一场较大的学潮，这场学潮成为变动胡耀邦职务的重要起因。1987年1月10日至15日，根据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的决定，召开了中央一级的党的生活会。会上对胡耀邦进行了批评，胡耀邦向中央政治局提出辞去中央总书记职务的请求。

1月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举行扩大会议，作出决定：（1）一致同意接受胡耀邦辞去党中央总书记职务的请求；（2）一致推选赵紫阳代理党中央总书记；（3）以上两项决定，将提请党的下一次中央全会追认；（4）继续保留胡耀邦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治局常委的职务。

由于以上情况的发生，中共十三大的筹备工作就在邓小平等老一辈领导人的关注下，由赵紫阳具体负责。

会议实质上有两项最重要的准备，一个是人事问题，这项准备在1月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已经基本明确。老一辈革命家从党的事业着想，从国家的长治久安着想，在这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继续带头推进废除领导职务终身制，徐向前、聂荣臻、邓颖超、彭真“四老”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邓小平、李先念、陈

云实行半退。即所说的“四老”全退，“三老”半退。并在1982年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实行年轻化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快实行年轻化的步伐，尤其是中央政治局常委班子，基本上由年富力强的同志组成。

再一项重要准备就是起草中央委员会的政治报告。这项重要的准备工作虽然由赵紫阳具体主持，但老一辈革命家给予了极大的关注。邓小平在1989年5月31日曾有针对性地说：“十三大政治报告是经过党的代表大会通过的，一个字都不能动。这个我征求了李先念、陈云同志的意见，他们赞成。”可见邓小平等老一辈革命家对这个政治报告的态度。

对这次报告的起草工作，邓小平给予极大关注和重要指导。他一再强调，报告要把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进行的改革的性质讲清楚，阐明我们的改革是巩固和完善社会主义，而不是搞资本主义，这样就可以把全党和全国人民的认识统一起来，更加勇敢更加大胆地投入改革。他还多次指出，加快和深化改革，尤其是把政治体制改革提上日程，应该是十三大的主题和基调。

1987年2月底到3月中旬，赵紫阳开始约集中央部分主要领导同志，以及参加起草报告工作的同志，多次反复地讨论了报告的思路、结构和主要内容，在广泛深入的集体讨论的基础上，就起草十三大报告的设想，于3月21日给邓小平写了一封信，信中说：“大家都认为，这个文件，关系重大，一定要写好，要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路线写清楚，写出分量来。”信中接着说：“初步考虑，报告主要写七个部分。一、讲三中全会以来，包括十二大以来，我国出现了哪些历史性的变化。二、讲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是从我国国情出发的马克思主义的路线。着重指出我国正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这是我们所以必须采取现在这样的方针政策而不能采取别的方针政策的基本根据。三、由此而来的经济建设的发展战略。四、由此而

来的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任务，和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方向。五、由此而来的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任务，和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原则。六、由此而来的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的任务，包括执政党的领导体制、党内民主和对党的领导人的监督、党的干部、党的风气。七、由此而来的在理论和思想指导上避免‘左’右两种倾向的必要性，着重阐明三中全会以来路线的两个基本点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坚持改革开放搞活，指出在新的实践中必须进行创造性的理论探索。”这封信还说：“全篇拟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作为立论的根据，这里所说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不是一般地泛指无产阶级取得政权以后的初始阶段，而是特指由中国的历史条件和社会条件所决定的、必须经历而不能逾越的初级阶段。中国进入社会主义，不是脱胎于资本主义，而是脱胎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由此产生了生产力、生产关系、上层建筑的一系列特点。中国又是一个发展中的大国，不仅与发达国家不同，而且与其他许多发展中国家不同。这就决定了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不能照搬其他国家的模式，必须从自己的国情出发，走自己的路。确认中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一是明确提出我们是社会主义，不能倒回去搞资本主义，全盘西化就会害国害民的；二是明确指出我们是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只能循序渐进，不能急于求成，也不能急于求纯，必须允许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多种经济成分长期存在，必须致力于发展社会主义的商品经济，促进社会主义统一市场的形成和发育，正确处理计划调节和市场调节的关系。同时，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也必须在我们党的领导下有秩序地逐步展开。”这封信最后说：“看来，以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立论，有可能把必须避免‘左’右两种倾向这个大问题的性质和根据说清楚，也有可能把我们改革的性质和根据说清楚。如能这样，对统一党内外认识很有好处，对国外理解我们政策的长期稳定性也很有好处。”

十三大的报告是充分发扬民主，充分听取各方面意见的产物，要把大家的智慧集中起来，使之成为领导和群众、党和人民集体智慧的结晶。

报告实际起草工作从3月下旬开始，5月、6月、7月，分别写出3次草稿。第一、第二稿写成后，赵紫阳都亲自主持，邀集中央部分主要负责同志进行讨论，同时还征求过中央国家机关和理论界部分同志的意见。7月底，在北戴河，赵紫阳主持召开中央书记处会议，对第三稿讨论了三个半天，政治局部分同志也参加了讨论。到会同志对报告草稿的主题、结构和主要内容都表示同意，同时对整个报告如何进一步体现加快改革的精神，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若干论述，对经济发展战略要强调以提高经济效益为中心和重视质量、重视科技进步，对经济体制改革中计划和市场的内在统一，对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要从中国实际出发和以安定团结为前提，对在改革开放中要从严治党等问题，都进行了比较充分的讨论，提出了许多重要意见。第3稿经过进一步修改形成第4稿后，中央书记处决定发到党内约5000人的范围内征求意见。参加讨论的，有全体十三大代表，中央3个委员会全体成员，中央机关、中央国家机关的主要负责同志，各省、市、自治区党委负责同志，军队系统各总部、各军兵种和各大军区党委负责同志，还吸收了部分地、县党委的负责同志参加。与此同时，起草组根据赵紫阳的意见，专门约请了中央和地方各方面有代表性的负责同志、专家、学者和企业界的代表人物约100多人，集中讨论一个多星期，对整个报告的框架结构、理论观点和文字表述进行仔细推敲，字斟句酌。在党内讨论的同时，还请了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和无党派爱国人士共数百人进行讨论，认真听取和吸收他们的宝贵意见。经过这样广泛的讨论，集中起来的修改意见数以千计，各方面送来的集体修改稿有数百本。起草小组对各种意见经过汇集整理，仔细研究，提出需要考虑的重要问

题，经向赵紫阳同志主持的中央书记处详细汇报，并经书记处讨论后，这才确定了进一步修改的方案。9月30日，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原则批准了经过认真修改后的第5稿。根据政治局讨论中提出的意见做了再次修改，提交十二届七中全会讨论的是第6稿。经中央全会认真讨论，又修改了150多处，形成了全会一致通过并由赵紫阳向代表大会正式报告的是第7稿。经代表大会认真讨论，又做了数十次修改，公开发表的是第8稿。

这个过程充分说明，十三大的政治报告是领导和群众、党和人民集体智慧的结晶。对这篇政治报告，邓小平等老一辈革命家非常重视。邓小平在1989年前后曾有针对性地不止一次反复强调这样一个重要观点：“要继续贯彻执行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连语言都不变。十三大政治报告是经过党的代表大会通过的，一个字都不能动。这个我征求了李先念、陈云的意见，他们赞成。”这是一个具有极其重要的有深远意义的告诫，历史的实践一再证明这一告诫的正确性。

二、中共十三大的召开

1987年10月25日至11月1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大会正式代表1936人，代表着4600万党员。大会特邀代表61人。出席大会的代表1950多人。中共十三大还邀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党外副委员长、全国政协党外副主席，各民主党派、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爱国人士，少数民族，宗教界人士96位，作为来宾列席大会。一些不是十三大代表的十二届中央委员会委员、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党内部分老同志，共317人列席大会。

这次大会的主要议程是：听取和审议十二届中央委员会的报告；听取和审议中央顾问委员会、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的报告；

审议并通过《中国共产党章程部分条文修正案》；选举第十三届中央委员会；选举新一届中央顾问委员会、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

10月25日的大会由邓小平主持。十三大的中心议题是进一步加快和深化改革。赵紫阳受十二届中央委员会的委托，向大会作了《沿着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前进》的报告。随后大会分组讨论这个报告。

10月27日，十三大会议主席团举行第二次会议，通过将中央政治局建议的中央委员会、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候选人预选名单和中央顾问委员会候选人名单提交各代表团酝酿，通过采取差额选举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和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候选人等选举事项。经两天酝酿，10月29日下午和30日上午，用无记名投票的办法，差额选出了中央委员、中央候补委员候选人和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候选人，提出了中央顾问委员会候选人名单。31日，各代表团又酝酿了主席团第三次会议通过的中央委员、中央候补委员、中顾委委员、中纪委委员候选人名单，代表们同意这些名单。

11月1日，代表大会以无记名投票方式选出了中共十三届中央委员会、新一届中央顾问委员会和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其中中央委员175人，中央候补委员110人，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200人，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69人。

接着，大会以举手表决的方式，分别通过了关于十二届中央委员会报告的决议，关于党章部分条文修正案的决议，关于中央顾问委员会工作报告的决议和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工作报告的决议。大会各项议程进行完毕后，赵紫阳致闭幕词。

11月2日，召开了中共第十三届一中全会。到会中央委员173人，候补中央委员106人，中顾委委员和中纪委委员列席了会议。全会选举了中央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中央政治局常务

委员，中央委员会总书记等，并决定了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第一副主席、常务副主席等。中央政治局常委是：赵紫阳、李鹏、乔石、胡启立、姚依林，中央委员会总书记：赵紫阳；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邓小平，第一副主席：赵紫阳，常务副主席：杨尚昆。

全会批准了中央顾问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选举产生的主任、副主任和常务委员会的人选。中顾委主任：陈云，副主任：薄一波、宋任穷。

全会批准了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选举产生的书记、副书记和常务委员会委员人选。书记：乔石，副书记：陈作霖、李正亭、肖洪达。

中共十三大号召全党同志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伟大旗帜下，在十三届中央委员会的领导下，坚持党的基本路线，牢牢掌握这条基本路线所规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加强党的团结，加强党与全国各族人民的密切联系，同心同德，振奋精神，埋头苦干，开拓创新，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宏伟目标而奋斗！

三、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形成

中国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进行再认识、对中国国情进行再认识得出的最重要的论断，是从社会性质和社会发展阶段这个根本问题上对当今中国国情做出的科学的综合判断。但是，这个判断又是来之不易的。现对这一论断的形成作一简略的考析。

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的问题，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遇到的一个重要问题。他们虽对这个问题进行了研究和艰辛的探索，但是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特别是社会主义实践的限制，他们只是在

宏观上指出共产主义的两大阶段，没有明确指出落后国家建设社会主义所要经历的特殊阶段问题。他们虽然没有具体划分社会主义所要经历的阶段，但是他们为这一理论的创立提供了世界观和方法论。

毛泽东在领导建设中国社会主义的过程中，特别是在建设遇到挫折后，他对社会主义阶段问题进行了有益的探索，他指出：“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社会主义可能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不发达的社会主义。第二个阶段是比较发达的社会主义”。应该说，这一论断是很重要的，虽然非常遗憾的是，毛泽东没有展开论述，他的探索没有继续进行下去，但却为中国共产党继续研究这一问题打下了一个基础。这是一个非常宝贵的探索，是应该肯定的。

薛暮桥整理的刘少奇在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读书会上的发言，也谈到关于社会主义的阶段问题，刘少奇说：共产主义两个阶段又可以分为许多小阶段，社会主义社会中有几个小阶段，共产主义社会中也可以分几个小阶段。

部分理论工作者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在若干场合也使用过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提法，如孙冶方 1958 年在北京经济学者纪念毛泽东同志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出版一周年座谈会的发言中，使用过“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和“社会主义高级阶段”这样两个提法。

“斯大林在《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中批判了这种无视价值规律的价格政策，但是他也是以两个所有制的存在为前提的，他也认为仅仅是因为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还存在两种所有制，还存在商品流通，因此还必须经济核算，因此不能否定价值规律的作用等等。”

“最后，既然价值规律等概念是因为存在两种以上的所有制形式和因此而发生的商品交换而保存下来的，那么至少对于未来

的只有一个全民所有制的社会主义高级阶段，以及对于当前的国营经济内部，上面那种把社会主义经济看作是玻璃板一样清晰的自然经济（或实物经济）观点将是正确的了。

然而正是这种行而上学的自然经济观点，妨碍了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前进，使得我们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缺乏一个完整的体系……

王学文在《经济研究》1961年第一期上发表的文章《〈资本论〉的研究对象》中使用过“我国现在正处于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的提法。

由于这些探索是初步的，尽管他们有人甚至使用过“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提法，但其含义与我们党现在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论断是不同的。

以上应该说是毛泽东等老一辈革命家和党内理论工作者对社会主义发展阶段问题上所进行的有益探索，是以后进行理论创新的基础。

比较科学地认识社会主义发展阶段问题是伴随着思想路线的拨乱反正开始的。也就是从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开始的。经历了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特别是经历了灾难性的“文化大革命”，深刻了解中国实际和世界发展现状的邓小平、陈云等人经过总结经验，为开创新的道路，在这时已经开始着重考虑中国国情这一基本问题。两人在1979年3月分别谈到，要使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至少应看到底子薄和人口多、耕地少这两个特点。他们认为，建国后，我们的经济建设虽然有伟大成就，但是由于底子薄，“现在中国仍然是世界上很贫穷的国家之一”；中国的“科学技术水平从总体上看要比世界上先进国家落后二三十年”。“中国式的现代化，必须从中国的特点出发。”

邓小平的这一名言，随着人们认识的提高，在当时成为一种共识。在1979年3月的理论务虚会上，有的理论工作者提到了

社会主义的阶段问题，虽然其角度是对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的“阶级斗争为纲”的指导思想提出疑问，但其中有些理论工作者的发言已经涉及到超越阶段问题。认为把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高级阶段这样一个很长的时期，看作是一个整个的历史时期，不再分阶段，这不符合科学社会主义原理，也不符合社会主义实际。这样，必然导致混淆历史阶段，而不能正确认识和掌握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规律，必然在路线上、政策上犯错误，造成严重后果。他们还提出：我国原来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生产力落后，小生产占绝对优势，人民文化水平很低，因此，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还不可能进入马克思所讲的共产主义的第一阶段，还是处在不发达的社会主义阶段。在这一年的《经济研究》第五期和第九期上，分别发表了《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后的社会发展阶段问题》和《也谈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后的社会发展阶段问题》，这两篇文章是理论界公开对社会主义发展阶段问题进行的有分量的专题论述。虽然现在阅读这两篇文章，可以明显地看出其中仍然有着不够深入的地方，但其理论勇气和探索精神则是可贵的。第一篇文章认为：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后的社会可划分以下阶段：1. 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阶段：(1) “过渡时期”；(2) 不发达社会主义。2. 发达的社会主义。3. 共产主义。第二篇文章认为应当作这样的划分：1. 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2. 共产主义第一阶段即社会主义：(1) 不发达的社会主义；(2) 发达的社会主义。3. 共产主义的高级阶段即共产主义。但可以看出这些论断由于某些因素的影响，只是提到社会主义的发展阶段问题，论述也不够深入，其提法也是用毛泽东曾使用过的“不发达的社会主义”和“发达的社会主义”等概念。

在以上探索的基础上，中共十一届四中全会通过的叶剑英《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30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初次提

出了我国“社会主义制度还处在幼年时期”的思想。这个讲话说：社会主义制度是人类历史上崭新的社会制度，它同世界上任何其他事物一样，有它发生和发展的过程。同已经有了三四百年历史的资本主义制度相比，社会主义制度还处在幼年时期。我国封建社会的历史特别长，我们的社会主义不可避免地带有这种旧社会的许多痕迹。毫无疑问，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开始显示出他的生命力和发展前途。但是，“它还不成熟，不完善”。这个讲话还指出：“在我国实现现代化，必然要有一个由初级到高级的过程。”这是中央文献上首次使用“社会主义制度还处在幼年时期”这一提法，虽然其中进行阶段划分的意思已经比较明确，但是还没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概念。

随后的一个时期，在邓小平等中央领导同志的主持下，中国共产党开始全面地总结历史经验，作出了《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这个过程实际也是人们重新认识什么是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过程。这期间，邓小平在进一步思考社会主义的发展阶段问题。1980年4月，他曾说：“现在我们正在总结建国30年的经验。总起来说，第一，不要离开现实和超越阶段采取一些‘左’的办法，这样是搞不成社会主义的。我们过去就是吃‘左’的亏。”这是党的领导人较早的谈论关于超越“阶段”问题。

1981年6月，中共中央通过了由邓小平等人主持起草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在这个历史决议上提到了“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还是处于初级阶段”，指出“毫无疑问，我们已经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但是，“我国的社会主义由比较不完善到比较完善，必然要经历一个长久的过程”，决议认为，如果对这种长期性和艰苦性没有清醒的认识和足够的估计，或者就会重犯超阶段的错误，或者就会丧失信心，导致对社会主义的怀疑。这是在中国共产党的文献上

第一次明确指出中国处于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但文字表述是“社会主义制度还是处于初级的阶段”，但这也是非常重要的一步。按理说，全党的认识应该在此基础上统一起来，但事实并非如此，这一方面也是由于历史惯性的影响，另一方面是由于人们的正确认识需要一个过程。

这个重要的判断并没有马上为人们包括理论工作者所真正理解。表现在一般的理论工作者这时还常常将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和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社会主义）相混淆。仅以《人民日报》上的文章为例，从1981年4月至1982年9月，就有近10篇文章，如《社会主义的学说与实践》等，就没有把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与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社会主义）区分开来。

理论界如此，党的重要文献上也出现类似现象。1982年9月，中共十二大的报告再次强调了“我国的社会主义社会现在还处在初级发展阶段”这一重要论断。但是，这个报告在讲共产主义在我国的发展时，却又强调：“现在这个运动在我国已经发展到建立起作为共产主义社会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社会。”并提出了建立高度民主和高度文明的社会主义强国的总任务。此后，为了驳斥对我国已经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这个基本事实持否定态度的不正确认识，理论界加强了宣传共产主义思想的力度。中共十二大以后，胡乔木在《人民日报》（1982年9月24日）上发表《关于共产主义的实践》，中宣部在《半月谈》（1982年第17期）上发表《关于胡耀邦在十二大报告的宣传提纲》，《人民日报》（1982年12月11日）发表的记者对邓力群的采访文章，题为《共产党员的崇高职责》，于光远在《人民日报》（1983年3月14日）上发表《发展作为社会主义建设的科学的马克思主义》等，都谈到我国现在是处于共产主义社会的初级阶段。宣传口径颇为一致。但也有一些例外，如高放有一篇在《人民日报》（1983年3月21日）上发表的文章《马克思主

义指引中国社会发生三次巨变》中就说：把中国从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变为现代化的、高度民主、高度文明的社会主义强国。

此后，“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这一概念，在国内报刊上几乎很少见。时间大约是从1983年的4月到1986年的4月。甚至在1984年10月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这一非常重要的文件中，虽然明确地指出“商品经济的充分发展，是社会经济发展不可逾越的阶段，是实现我国经济现代化的必要条件”，其意思已经很明白是说我国必然要经历一个不可逾越的阶段，但值得注意的是，这篇重要的文献中没有使用“初级阶段”这一概念。

社会主义的发展阶段问题再次成为理论界的研究热点是1986年5月以后。这一方面是由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尤其是改革开放发展的需要，另一方面是由于人们认识的深入。1986年5月5日，吴江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阶段》的文章。在这篇文章中，吴江指出：如果我们现实地清醒地思考问题，不难看出，我们现时已经建立的社会主义社会，其发展过程和发展阶段和马克思原来设想的作为共产主义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社会很不相同。值得注意的是，同年6月16日，中共中央书记处研究室《陈云文选》编辑组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坚持实事求是原则是一切事业的成功之道——介绍〈陈云文选〉》的文章。这篇文章说：在社会主义这个历史时期中，社会经济的发展，逐渐从低级到高级，经历若干个历史阶段，我国目前社会经济文化的实际情况，表明我们还是处在建设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我们搞建设、搞改革，都要考虑这个事实。从以上两篇文章看，党内重要的理论工作者在认识上已经趋于一致，这是非常重要的。

1986年9月，中共中央第十二届六中全会通过了《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决议指出：“我国还处在

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不但必须实行按劳分配，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和竞争，而且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还要在公有制为主体的前提下发展多种经济成分，在共同富裕的目标下鼓励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这是经过一段沉寂后，党的文件上再次公开论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问题。中央全会通过这个决议，表明全党在社会主义发展阶段问题上认识的提高。

此后，“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这个概念一时间成为传播媒介使用率最高的词汇之一。理论文章、学术著作、领导讲话等都在大量使用这一概念，人们的认识逐渐清晰。彭真在1986年11月的一次讲话很有代表性且又十分明了。他说：“我国还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即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的初级阶段。”

这个时期，理论界已经有人开始探讨比较深入的问题。如于光远提出需要探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经济、政治，中国当前的全面改革等五个问题。并有理论工作者开始探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的特征等问题。值得一提的是，1987年国家社科基金委公布的课题指南中，增加了关于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研究的新课题。这表明社会主义的发展阶段问题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也表明实践是理论发展的源泉和动力。

邓小平再次强调：初级阶段是“不发达阶段”的社会主义，一切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出发。

为准备召开中共十三大，邓小平在1987年2月6日同几位中央负责同志的谈话中说：“十三大报告要在理论上阐述什么是社会主义，讲清楚我们的改革是不是社会主义。要申明四个坚持的必要，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必要，改革开放的必要，在理论上讲得更加明白。”根据这个指示，1987年3月21日，赵紫阳把《关于草拟十三大报告大纲的设想》报给邓小平。这个报告说：十三大报告全篇拟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作为立论的根据。“初级阶段”这个提法，在党的文件中已三次出现，但都没有发

挥，十三大报告的起草工作准备循着这个思路加以展开，说明由此而来的经济建设的发展战略，由此而来的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任务和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方向，由此而来的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任务和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原则，由此而来的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的任务，由此而来的在理论和思想指导下避免“左”右两种倾向的必要性。邓小平3月25日对这个设想做了批示：这个设计好。

随后，在中共十三大召开之前，邓小平在多种场合做了几次重要的谈话，诸如：1987年4月26日的《社会主义必须摆脱贫穷》，4月30日的《吸取历史经验，防止错误倾向》，7月4日的《我国方针政策两个基本点》，10月13日的《我们干的事业是全新的事业》等，这些讲话从不同角度对“初级阶段”的理论进行了论述。特别是8月29日的《一切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出发》这篇讲话，精辟地概括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含义。他说：“我们党的十三大要阐述中国社会主义是处在一个什么阶段，就是处在初级阶段，是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他给初级阶段下的定义是“不发达阶段”的社会主义。他着重强调“一切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出发”，“根据这个实际来制订规划”。至此，“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概念的含义已经清楚。

中共十三大第一次全面论述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概念。

1987年10月25日，中共十三大在北京召开。这次具有历史意义的会议的突出贡献之一，就是系统地阐述了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确认：经济文化落后的中国建设社会主义不可避免地要经历一个特定的较长的初级阶段，这个初级阶段至少上百年的，而我国目前正处于这个阶段。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论断包括两层含义。其一，我国社会已经是社会主义，必须坚持而不能离开社会主义；其二，我国的社会主义还处在初级阶段，必须依

据这个实际来制定工作目标和方针。中共十三大的政治报告指出：总的来说，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逐步摆脱贫穷、摆脱贫落后的阶段；是由农业人口占多数的手工劳动为基础的农业国，逐步变为非农产业人口占多数的现代化的工业国的阶段；是由自然经济半自然经济占很大比重，变为商品经济高度发达的阶段；是通过改革和探索，建立和发展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体制的阶段；是全民奋起，艰苦创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阶段。在这个阶段，我们应该确立以下具有长远意义的指导方针：

第一，必须集中力量进行现代化建设；

第二，必须坚持全面改革；

第三，必须坚持对外开放；

第四，必须以公有制为主体，大力发展有计划的商品经济；

第五，必须以安定团结为前提，努力建设民主政治；

第六，必须以马列主义为指导，努力建设精神文明。

至此，无论是文字表述的规范上，还是其含义的准确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概念都基本形成，被确立为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的客观依据。

四、关于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的确立

在中国共产党历史发展的各个时期，先后提出和确立过几条基本路线（或者叫总路线）。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总路线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革命。”这是一条指引中国共产党取得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伟大胜利的基本路线。

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是“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

改造基本完成，这是一个过渡时期。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对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条总路线是照耀我们各项工作的灯塔，各项工作离开它，就要犯右倾或‘左’倾的错误”。这条总路线引导中国共产党基本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的任务。

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的 20 年间，中国共产党也制定了若干总路线（或基本路线）。首先是中共八大的路线，但没有完整的表述。随后是 1958 年中共八大二次会议提出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但由于当时指导思想存在着矛盾等原因，这条路线并没有带来“多快好省”。后来在 1962 年的八届十中全会上又提出了一条“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基本路线，毛泽东把这称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当时被称为社会主义时期的基本路线。这条基本路线在中共九大通过的党章中的表述是：“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在这个历史阶段中，始终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存在着帝国主义和现代修正主义进行颠覆和侵略的威胁。”这条基本路线可以说给党的事业带来了严重挫折，给中国人民带来了灾难。

中共十三大确定的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路线的继续、丰富和发展，是经过 30 年来的探索，总结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以及国际社会主义运动的经验而确立的路线，尤其是中国共产党正确判断中国社会主义所处的历史阶段后而确立的路线，也是被实践证明是唯一正确的路线。这条路线也是逐步形成的。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在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开始确立“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思想，奠定了党的基本路

线的基础。但是，正式在全党确立“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还必须有一个过程。

中共十一届四中全会通过的叶剑英在国庆 30 周年的讲话中确定的任务是：“团结全国各族人民，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同心同德，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1980 年 1 月 16 日，邓小平对此评价说：“这是第一次比较完整地表述了我们现在的总路线。这就是当前最大的政治。”

1980 年 2 月 29 日，邓小平再一次概括地谈到党的路线。他说：“我们党现阶段的政治路线，概括地说，就是一心一意地搞四个现代化。这件事情，任何时候都不要受干扰，必须坚定不移地干下去。”

中共十二大提出了中共在新的历史时期的总任务，即“团结全国各族人民，自力更生，艰苦奋斗，逐步实现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现代化，把我国建设成为高度民主、高度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

中共十二届六中全会提出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总体布局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定不移地进行经济体制改革，坚定不移地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坚定不移地加强精神文明建设，并且使这几个方面互相配合，互相促进。”

以上是中国共产党探索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若干阶段性成果，说明要探索一条正确的建设路线是非常艰难的。

1987 年 1 月 28 日，中共中央发出的《关于当前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若干问题的通知》和 1 月 29 日赵紫阳代表中央在春节团拜会上的讲话，明确概括了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的基本点有两条，一条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一条是坚持改革、开放、搞活的方针。这是中央首次概括“两个基本点”。

中共十三大，在总结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经验，总结国际社会主义运动兴衰成败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终于确定了在社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这就是：“领导和团结全国各族人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自力更生、艰苦创业，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奋斗。”“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是这条基本路线的简明概括。

确立党的基本路线，实质上确定了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根本指针。这表现在，第一，这条基本路线是根据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确立的，具有科学性；第二，明确规定这条基本路线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基本路线，又具有全局性；第三，把“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正式载入党的基本路线并作为主要内容，这又突出了重点；第四，确定“富强、民主、文明”三位一体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目标，这又指明了方向；第五，这条基本路线，在理论形态上，是党对建设社会主义道路进行长期探索的一次飞跃，它既包含了党的总任务，又包含了必须依据客观规律去做的根本方针，还包含了全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要实现的宏伟目标。这条基本路线的确立本身，就体现了党的各方面的成熟。

五、关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轮廓的基本形成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开创社会主义建设新理论的起点。在完成拨乱反正，实现伟大历史转折的基础上，邓小平在中共十二大上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一主题，标志着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正式提出。中共十二大后，中国共产党继续围绕着“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首要的、基本的问题进行全方位的探索，提出并阐述了与传统社会主义观不同的一系列新的科学理论观点，并初步形成了一整套相互关联的方针政策。中共十三大比较全面地概括了这些新的观

点，主要有 12 条，由此形成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轮廓。即：

(1) 关于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以实践作为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观点；(2) 关于建设社会主义必须根据本国国情，走自己的路的观点；(3) 关于在经济文化落后的条件下，建设社会主义必须有一个很长的初级阶段的观点；(4) 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集中力量实现现代化的观点；(5) 关于社会主义经济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观点；(6) 关于改革是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重要动力，对外开放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必要条件的观点；(7) 关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是社会主义重要特征的观点；(8) 关于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同坚持改革开放的总方针这两个基本点互相结合、缺一不可的观点；(9) 关于用“一个国家、两种制度”来实现国家统一的观点；(10) 关于执政党的党风关系到党的生死存亡的观点；(11) 关于按照独立自主、完全平等、互相尊重、互不干涉内部事务的原则，发展同外国共产党和其他政党的关系的观点；(12) 关于和平和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主题的观点，等等。

这 12 个观点，初步回答了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阶段、任务、动力、条件、布局和国际环境等基本问题，规划了中国共产党前进的道路。表明中国共产党在哲学、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等多方面发挥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中共十三大把这些理论观点概括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说明这一新理论的轮廓已经形成。同时，这次代表大会还强调，马克思主义需要有新的大发展，这是现代的大趋势。这又说明，中国共产党深刻地认识到今后还要继续发展马克思主义，在理论上还要继续创新。

中共十三大是一个全面系统地加快改革和开放的大会。它将作为改革、开放、民主、团结的大会而载入中国共产党历史的光

辉史册。

(陈雪薇主编《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重大事件和决策调查》)

第三代领导集体形成：十三届四中全会

在1989年北京政治风波平息之后，中国共产党于6月23日至24日召开十三届四中全会。从十三届四中全会选出新的中央领导层到五中全会邓小平退出中央领导岗位，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和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实现了顺利的交接。

在北京政治风波平息之后，中国共产党于6月23日至24日召开了十三届四中全会。

邓小平于6月9日接见首都戒严部队军以上干部时发表的重要讲话和中共中央政治局于6月19日至21日召开的扩大会议，为这次全会作了必要的思想和组织准备。邓小平在讲话中说，这次事件爆发出来，很值得我们思索，促使我们很冷静地考虑一下过去，也考虑一下未来。他提出了两个需要认真思索的课题。第一个问题，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制定的路线、方针、政策，包括我们发展战略的“三部曲”，正确不正确？是不是因为发生了这次动乱，我们制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正确性就发生了问题？我们的目标是不是一个“左”的目标？是否还要继续用它作为我们今后奋斗的目标？这些大的问题，必须作出明确、肯定的回答。邓小平认为，我们所制定的战略目标，现在至少不能说是失败的。不能因为这次事件的发生，就说我们的战略目标错了。第二个问题，党的十三大概括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对不对？两个基本点，即四个坚持和改革开放，是不是错了？邓小平说他最近

总在想这个问题。他认为，四个坚持本身没有错，如果说有错误的话，就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还不够一贯，没有把它作为基本思想来教育人民，教育学生，教育全体干部和共产党员。邓小平严肃地指出：“十年最大的失误是教育，这里我主要是讲思想政治教育，不单纯是对学校、青年学生，是泛指对人民的教育。对于艰苦创业，对于中国是个什么样的国家，将要变成一个什么样的国家，这种教育都很少，这是我们很大的失误。”邓小平还指出，改革开放这个基本点也没有错。十年改革开放的成绩要充分估计够。但今天回过头来看，出现了明显的不足，一手比较硬，一手比较软。一硬一软不相称，配合得不好。最后，邓小平说，要坚定不移地执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制定的一系列路线方针政策，要认真总结经验，对的要继续坚持，失误的要纠正，不足的要加把劲。总之，要总结现在，看到未来。全会认为，邓小平的这个讲话，是中国共产党人回顾过去、思考未来、统一全党思想认识的纲领性文献。

根据邓小平讲话的精神，十三届四中全会初步总结了北京政治风波的教训，明确了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党的方针和任务。全会强调，要继续坚决执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继续坚决执行党的十三大确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四项基本原则是立国之本，必须毫不动摇、始终一贯地加以坚持；改革开放是强国之路，必须坚定不移、一如既往地贯彻执行，绝不回到闭关锁国的老路上去。江泽民在全会上旗帜鲜明地宣布：“我们党已经制定和形成了一条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路线和一系列基本政策。概括地说，就是小平同志多次指出、最近再次强调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这是我们有信心做好工作的根本的、坚实的基础。这次中央领导核心作了一些人事调整，但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和基本政策没有变，必须继续贯彻执

行。在这个最基本的问题上，我要十分明确地讲两句话：一句是坚定不移，毫不动摇；一句是全面执行，一以贯之。”

全会要求全党当前要特别注意抓好四件大事：一是彻底制止动乱、平息反革命暴乱，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进一步稳定全国局势；二是继续搞好治理整顿，更好地坚持改革开放，促进经济持续、稳定、协调地发展；三是认真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努力开展爱国主义、社会主义、独立自主、艰苦奋斗的教育，切实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四是大力加强党的建设，大力加强民主和法制建设，坚决惩治腐败，切实做好几件人民普遍关心的事情，决不辜负人民对党的期望。

全会通过了《关于赵紫阳同志在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动乱中所犯错误的报告》。会议认为，赵紫阳在关系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犯了支持动乱和分裂党的错误，对动乱的形成和发展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其错误的性质和造成的后果是极为严重的。他在担任党和国家重要领导职务期间，虽然在改革开放和经济工作方面做了一些有益的工作，但是在指导思想上和实际工作中也有明显失误。特别是他主持中央工作以来，消极对待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方针，严重忽视党的建设、精神文明建设和思想政治工作，给党的事业造成了严重的损失。鉴于赵紫阳的上述错误，全会决定，撤销他的中央委员会总书记、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委员会委员和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第一副主席的职务，对他的问题继续进行审查。随后召开的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八次会议又撤销了他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的职务。全会对中央领导机构的部分成员进行了必要的调整：选举江泽民为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增选江泽民、宋平、李瑞环为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决定增补李瑞环、丁关根为中央书记处书记；免去胡启立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的职

务，免去芮杏文、阎明复中央书记处书记的职务。

十三届四中全会召开前后，邓小平多次对建立新的中央领导集体和自己的退休问题发表重要意见。5月30日，邓小平在同李鹏、姚依林谈话时提出，要更换中央领导层。邓小平认为，新的中央领导机构要使人民感到面貌一新，感到是一个实行改革的有希望的领导班子。有一个新的改革的面貌，是确定新班子成员的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不是九分九，而是十分重要的问题。他说，要真正建立一个新的第三代领导。这个领导要取信于民，使党内信得过，人民信得过。邓小平还提出，新的领导班子一经建立了威信，我坚决退出，不干扰你们的事。他还说，希望大家能够很好地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很好地团结。只要这个领导集体是团结的，坚持改革开放的，即使是平平稳稳地发展几十年，中国也会发生根本的变化。关键在领导核心。我请你们把我的话带给将要在新的领导机构里面工作的每一个同志。这就算是我的政治交代。6月16日，邓小平在同中央几位负责同志谈话时再次指出：任何一个领导集体都要有一个核心，没有核心的领导是靠不住的。第三代的领导集体也必须有一个核心，这一点所有在座的同志都要以高度的自觉性来理解和处理。要有意识地维护一个核心，也就是现在大家同意的江泽民同志。邓小平说，一个国家的命运建立在一两个人的声望上面，是很不健康的，是很危险的。不出事没问题，一出事就不可收拾。新的领导一建立，要一切负起责任，错了也好，对了也好，功劳也好，都是你们的事。这样你们可以放手工作，对于新的集体自我锻炼也有好处。9月4日，邓小平同几位中央负责同志谈到了他退休的时间和方式问题。邓小平提出，他退休的时间定在五中全会，方式越简单越好，并建议由江泽民担任党和国家的军委主席。同日，邓小平给中共中央政治局写信，正式提出了辞去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职务的请求。他在信中写到：“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选出的以江

泽民同志为首的领导核心，现已卓有成效地开展工作。经过慎重考虑，我想趁自己身体还健康的时候辞去现在的职务，实现夙愿。这对党、国家和军队的事业是有益的。恳切希望中央批准我的请求。”11月上旬召开的中共十三届五中全会讨论并通过了《中国共产党十三届五中全会关于同意邓小平同志辞去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职务的决定》。全会认为，邓小平同志从党和国家的根本利益出发，在自己身体还健康的时候辞去现任职务，实现他多年来一再提出的从领导岗位上完全退下来的夙愿，表现了一个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广阔胸怀。与会全体同志对他身体力行地为废除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作出的表率，表示崇高的敬意。全会在充分酝酿的基础上，决定江泽民为中共中央军委主席，杨尚昆为第一副主席，刘华清为副主席，杨白冰为秘书长；并决定增补杨白冰为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

从十三届四中全会选出新的中央领导层到五中全会邓小平退出中央领导岗位，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和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实现了顺利的交接。第三代领导集体的形成，为尽快消除北京政治风波所造成的严重后果，维护国家的长治久安，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推向21世纪，提供了最重要的政治保证。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三研究部著《中国改革开放20年史》）

继往开来：中国共产党 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

十四大以 1992 年初邓小平的南方谈话为指导，作出三项具有深远意义的重大决策：一是确立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在全党的指导地位；二是明确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三是要抓住机遇，加快发展。这次大会和邓小平南方谈话，成为中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进入新阶段的标志。一家海外报纸称：“中共十四大——跨世纪的伟大工程。”

一、十四大报告的形成

十四大的筹备，以政治报告的起草和大会代表的产生为主要工作。按照党章的规定和十三届八中全会的有关决议，十四大安排在 1992 年第四季度召开，所以，筹备工作从当年初开始。

十四大报告的起草，以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特别是 1992 年初视察南方的重点谈话为指导，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的直接领导下进行。

在中国加快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关键时刻，邓小平视察南方的谈话，高屋建瓴地阐述了关系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一系列重大问题，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指明了继续前进的方

向，也为十四大报告的起草奠定了思想理论基础。在谈话精神指导下，1992年2月，总书记江泽民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十分明确地提出了起草党的十四大报告的指导思想：报告通篇要体现邓小平今年年初视察南方重点谈话的精神，以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为指导，很好地总结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14年的基本实践和基本经验，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不动摇；要认真规划今后一个时期的战略部署，强调进一步解放思想，把握有利时机，加快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步伐，努力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2月20日下午，总书记江泽民在中南海勤政殿召开的关于十四大报告起草的座谈会上强调，邓小平视察南方的重要谈话，是他十多年来关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贯思想的高度体现和新的发展，十四大报告要以这个谈话精神作为贯穿全篇的主线；在系统地总结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14年来的实践和经验的基础上，着重阐明为什么要毫不动摇地坚持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江泽民说，一个是基本路线不变，一个是社会政治稳定，有了这两条，我们就能够不断地胜利前进。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就是要100年不动摇。结合国内外形势，江泽民特别强调指出，党的十四大报告必须回答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必须注意把握的要点是什么，党在90年代改革开放和建设的主要任务和战略步骤是什么，中国共产党人对当今世界重大问题的看法是什么，加强党的建设和改善党的领导的重点是什么。报告要展望并规划改革和建设在今后半个多世纪的进程目标，提出在建党一百周年时各方面形成一整套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在建国一百周年时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号召全党和全国人民朝着这个宏伟目标奋勇前进。

按照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及江泽民总书记提出的要求，以邓小平南方谈话精神为指导，报告起草小组很快写出了第1稿，报送

中央。4月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对报告第一稿进行讨论，参加常委会议的领导同志认为，第1稿从无到有，有了一个好的开端。但报告的理论性、思想性需要加强，对一些重大问题要进一步研究，作出更明确更深刻的阐述，如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概括，层次要提高；改革开放14年的基本经验，要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进行系统总结；要讲清楚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什么；应该怎样部署今后5年直到本世纪末的战略任务；阐述党的建设要加强针对性等。据此，报告起草小组又写出了第2稿、第3稿，不断进行修改加工。

5月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加快改革，扩大开放，力争经济更好更快地上一个新台阶的意见》，提出19条意见，这对起草十四大报告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5月20日，江泽民给中央政治局常委写信，信中说：小平同志讲话传达后，举国上下一致拥护，全国对改革开放思想更加统一了。现在重要问题在于把干部群众的积极性引导好，保护好，发挥好。真抓实干，不鼓虚劲，要鼓实劲，确确实实干出几件大事来。要紧紧地围绕经济建设，加快改革步伐；上一个新台阶，写好这篇大文章，务必结合各地实际，区分不同情况，加以落实；主要加紧转换国营企业机制，以利于粗放到集约的转轨，切实实行政企分开，增强发展活力，发展第三产业，扩大生产、就业门路，为精简机构服务；提高宏观调控，扩大投资规模，防止重复基建，产品积压；加快城市改革，加强农业和农村工作。

6月9日，江泽民到中央党校向省部级干部进修班学员发表重要讲话，就如何全面贯彻落实邓小平南方重要谈话精神，比较系统地阐述了9方面的问题，即关于抓住当前有利时机，加快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的发展；关于改革也是革命也是解放生产力；关于积极向资本主义国家学习和借鉴有用的东西；关于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关于坚持“两手抓”的方针；关于解放思想，实

事求是和要警惕右，但主要防止“左”；关于加强党的建设和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关于贯彻落实邓小平南方谈话精神的要求。在这篇讲话中，江泽民根据邓小平关于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等有关论述，根据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实践经验，明确提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江泽民对于我国经济体制改革总目标的抉择是深思熟虑的，重视集思广益。在这次重要讲话中，他指出：现在大体上对计划与市场 and 建立新经济体制问题的认识上，又有了一些新的提法，有这么几种：（1）建立计划与市场相结合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体制；（2）建立社会主义有计划的市场经济体制；（3）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上述这几种提法，究竟哪一种更切合我国的经济实际，更易于为大多数人所接受，更有利于促进我们经济建设的发展，还可以继续研究，眼下不必忙于作出定论。不过，在十四大报告中，总得最后确定一种大多数人都赞同的有关经济体制的比较科学的提法，以利于进一步统一全党的认识和行动，以利于加快我国社会主义的新经济体制的建立。我个人的看法，比较倾向于使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个提法。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也就是有计划的市场经济。社会主义经济从一开始就是有计划性的，这在人们的脑子里和认识上一直是清楚的，不会因为提法中不出现“有计划”三个字，就发生是不是取消了计划性的疑问。而且，前面已讲到资本主义经济也并不是无计划。所以，使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可以为大多数干部和群众所接受的。

根据江泽民在中共中央党校的讲话和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精神，起草小组对报告稿做了重要修改。值得一提的是，报告第4稿在提请政治局审议的同时，还报请邓小平审阅。邓小平对报告稿作了肯定的评价，认为报告稿有分量，同时对进一步修改好报告稿发表了十分重要的意见。他谈到，改革开放中许许多多的东

西，都是由群众在实践中提出来的。报告中讲他的功绩，一定要放在集体领导范围内，绝不是一个人的脑筋就可以钻出什么新东西来，是群众的智慧，集体的智慧。他的功劳是把这些新事物概括起来，加以提倡。在这个问题上，报告要写得合乎实际。

除了上述江泽民和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为大会报告的起草提出了贯穿全篇的主线外，十四大报告的起草过程，还是充分发扬民主，在民主的基础上集中全党智慧的过程。在历时共7个多月的起草过程中，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讨论了4次；政治局开会讨论了两次；江泽民同起草小组座谈了3次。党中央、国务院的一些领导同志还个别和起草小组谈了重要意见。

7月，根据中央政治局讨论时提出的要求和邓小平提出的重要意见，起草小组对报告稿又进行了两次重要的修改，形成了第6稿。中央决定将第6稿印发到全国119个地方、部门和单位征求意见。党的十三届中央委员会委员、候补委员，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党的十四大代表，中央党政军各部门、各人民团体的党员负责干部，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各大军区的党委负责同志等共3000多人参加了报告稿的讨论，每个单位都修改出了一个稿子。

与此同时，中共中央还委托中央统战部就大会报告稿征求各民主党派、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知名人士的意见。9月2日下午，江泽民、乔石邀请他们在中南海怀仁堂进行了三个多小时的座谈。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丁关根，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温家宝，也出席了座谈会。出席座谈会的各民主党派中央和全国工商联领导人有：贾亦斌、彭清源、费孝通、钱伟长、孙起孟、万国权、雷洁琼、赵朴初、陈舜礼、卢嘉锡、方荣欣、章师明、董寅初、杨纪珂、王宋大、徐采栋、赵伟之、蔡子民、吴克泰、荣毅仁、王光英、孙孚凌和无党派代表人士阿沛·阿旺晋美等。座谈会由乔石主持。他说，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

全国代表大会，是一次继往开来、肩负重大历史使命的大会。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各民主党派、无党派的朋友们都非常关注这次大会，也寄厚望于这次大会。十四大报告是一个重要的文件，为把报告进一步修改好，我们在中国共产党内一定范围征求意见，同时根据重大方针政策、重大政治文件要事先和各民主党派、工商联及无党派代表人士充分协商的一贯精神，前几天，中共中央委托中央统战部邀请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领导人，无党派代表人士阅读了十四大报告（征求意见稿）。今天，希望大家坦诚相见，提出宝贵意见。

座谈会上，贾亦斌、费孝通、孙起孟、雷洁琼、卢嘉锡、董寅初、徐采栋、蔡子民、荣毅仁等先后发言，杨纪珂作了书面发言，对十四大报告（征求意见稿）提出了各自的修改意见和建议。

在听取大家的发言后，江泽民代表党中央对党外人士坦诚相见，畅所欲言地就十四大报告的修改问题提出了许多很好的意见和建议，表示衷心感谢，并做了重要讲话。

在此期间，起草小组还征求了一些德高望重的老同志和有关专家、学者对报告稿的意见。各地、各方面、各部门负责同志和各界知名人士，对报告稿进行了认真讨论，从总体上对报告稿给予了肯定的评价。同时，也提出了不少修改意见。这些意见，大到报告结构、实际内容，小到文句字词、标点符号，充分体现了严肃、认真、负责的精神，闪耀出真知灼见。这是保证报告稿质量的一个必经之途径。

根据上述各方面的意见，起草小组对报告征求意见稿做了450多处修改。其中，对十三大以来5年的工作、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概括、经济增长速度、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和精神文明建设、加强党的建设等部分，做了较大的调整、充实和加强。

第一，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概括。在征求意见时，大家提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14年来，改革开放给我国带来了巨大深刻的变化，提供了丰富的实践经验，我们在理论概括上应该进一步升华，明确和精确。根据大家的意见，经过反复研究，报告起草小组将这一部分调整为9个方面。同时强调，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全党和全国人民集体智慧的结晶，邓小平同志为这个理论的创立做出了历史性的重大贡献。这就点出了邓小平在创立这个理论中的历史地位。

第二，关于经济增长速度。报告征求意见稿在分析国内外形势的基础上，曾提出90年代我国经济增长速度争取达到90%左右。根据许多单位的建议，为留有余地，在工作上更主动一些，将年平均增长速度修改为8%~9%，并且指出，在提高质量、优化结构、增进效益的基础上实现这样的发展速度，到本世纪末我国国民经济整体素质和综合国力将迈上一个新的台阶，为实现第三步战略目标创造更好的基础和条件。

第三，关于下决心进行行政管理体制和机构改革问题。报告征求意见稿原来提出机构改革力争5年内完成。大家认为，机构改革进展慢了，将拖整个经济改革的后腿，因此，最后报告将“5年”改成为“3年内基本完成”。这体现了全党同志加快机构改革的决心。

第四，关于加强党的建设和改善党的领导问题。在明确用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武装全党，是新时期加强和改革党的领导的关键的前提下，根据大家的意见，在结构上进行了调整，阐述了新时期加强党的建设5个方面的重要任务。

经过一次次征求意见、集思广益，一次次字斟句酌、反复推敲，报告又相继写出第7稿、第8稿。可以说，经过这样一个反复修改的过程，报告一稿比一稿成熟，一稿比一稿完善。

9月，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和政治局全体会议又分别审议通过

了修改后的报告稿，即第9稿，决定提请党的十三届九中全会审议。

10月5日至9日，党的十三届九中全会在北京开幕。出席会议的中央委员、候补委员对第9稿进行讨论。根据全会分组讨论中提出的意见，报告起草小组又在会后将26000多字的报告，大大小小修改了170多处才定稿。10月12日，在党的十四大开幕式上，十易其稿的报告本终于摆在2000多位代表的面前。

二、十四大的隆重召开

（一）预备会议和主席团会议

1992年10月11日下午，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预备会议。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主持了会议。出席预备会议的代表共1962人。

会议以举手表决方式，通过了由16人组成的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名单，宋平任主任，胡锦涛等任副主任；通过了由198人组成的大会主席团名单，江泽民、邓小平等31人为主席团常务委员，选举乔石为大会秘书长；通过了大会秘书处的工作任务和机构设置；通过了十四大的议程。大会的议程是：听取和审查中央委员会的报告，审查中央顾问委员会的报告（书面），审查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的报告（书面），审议并通过中国共产党章程（修正案），选举中央委员会，选举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

当日下午，大会主席团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第一次会议。会议由大会秘书长乔石主持。

江泽民在会议结束时讲了话。

主席团会议以举手表决的方式，通过了由31人组成的主席团常务委员会名单，通过胡锦涛、丁关根、温家宝为大会副秘书长。

会议听取了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代表资格审查的报告。报告说，十三届八中全会确定党的十四大代表名额为 2000 名，中央分配到各选举单位的名额共 1992 名。代表选出后逝世 1 名（李先念），中央批复代表 1991 名后又逝世 2 名（胡乔木、王密妮），实有代表 1989 名。

报告说，党的十四大代表的选举工作，认真贯彻执行了民主集中制原则，产生的代表具有广泛的代表性。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认为，全国 34 个选举单位选出的 1989 名代表，符合党章和中央关于选举党的十四大代表通知的规定，代表资格全部有效。这次大会参照十三大的做法，由中央确定了 46 位 1927 年以前入党、并在党内担任过重要领导职务、德高望重的老党员为特邀代表。他们具有与正式代表同样的权利。

会议还通过了大会列席和来宾的事项。中央决定，邀请党内有关负责同志和部分党外人士列席这次大会。列席这次大会的有：不是十四大代表的十三届中央委员会及中央顾问委员会、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的委员，不是十四大代表或特邀代表的党内部分老同志，以及其他有关负责同志，共 3078 人。还邀请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党外副委员长，全国政协党外副主席，各民主党派、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以及全国人大、全国政协常委在京党外人士和部分少数民族、宗教界人士等，共 139 位，作为来宾列席大会开幕式和闭幕式。

主席团会议还通过了十四大大会日程。

这是一个划时代的伟大时刻。

一次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历史性盛会，即将召开。在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伟大旗帜指引下，中国共产党人必将收获更多的希望。

（二）大会的工作报告与贡献

1992 年 10 月 12 日至 18 日，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

大会在北京隆重举行。李鹏主持大会开幕式，江泽民代表十三届中央委员会作工作报告。作为主要内容之一，大会审议并批准了江泽民代表第十三届中央委员会所作的题为《加快改革开放和现代化步伐，夺取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更大胜利》的报告。这份在结构上分为4个部分的报告，通篇体现了邓小平年初南方谈话的精神，对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14年的基本实践和基本经验做了系统、深刻的总结，对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作了精辟的概括；确定了90年代加快改革开放，推动经济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的主要任务，提出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在分析国际形势的基础上论述了对外政策；阐述了加强党的建设和改善党的领导的问题。这是指引全党和全国人民前进的纲领性文件。

关于14年伟大实践的基本总结，报告首先指出：14年来，我们从事的事业，就是坚持党的基本路线，通过改革开放，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其引起社会变革的广度和深度来说，是开始了一场新的革命。它的实质和目标，是要从根本上改变束缚我国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建立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新经济体制，同时相应地改革政治体制和其他方面的体制，以实现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报告强调，这场新的革命是在过去革命取得成功和社会主义建设取得巨大成就的基础上进行的，是在我们党领导下有秩序有步骤地进行的。它不是要改变我们社会主义制度的性质，而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它也不是原有经济体制的细枝末节的修补，而是经济体制的根本性变革。14年改革带来的最深刻的变化，就是摆脱了许多思想上和体制上的禁锢，调动起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拥有11亿人口的中国正在创造着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报告在对14年来的伟大实践作了历史回顾并就一系列重大决策作出了郑重的结论后指出，我们在工作中也发生过失误和偏差，现在还

面临着很多困难和问题，人民群众还有不少意见和一些不满意的地方。但是，总起来说，全党全国人民公认的事实，是这14年是真正集中力量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14年，是人民生活水平提高最快的14年，开创了历史的新局面，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党赢得了广大人民群众拥护。

报告强调指出，我们之所以能够取得这样的胜利，根本原因是在14年的伟大实践中，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逐步形成和发展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这个理论，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初步回答了中国这样的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如何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一系列基本问题，用新的思想、观点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主要内容是：

1. 在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问题上，强调走自己的路，不把书本当教条，不照搬外国模式，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实践作为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2. 在社会主义的发展阶段问题上，作出了我国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科学论断，强调这是一个至少上百年的很长的历史阶段，制定一切方针政策都必须以这个基本国情为依据，不能脱离实际，超越阶段。

3. 在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问题上，指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强调现阶段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必须把发展生产力摆在首要位置，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推动社会全面进步。判断各方面工作的是非得失，归根到底，要以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为标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

经济建设必须依靠科技进步和劳动者素质的提高。

4. 在社会主义的发展动力问题上，强调改革也是一场革命，也是解放生产力，是实现中国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僵化停滞是没有出路的。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在坚持公有制和按劳分配为主体、其他经济成分和分配方式为补充的基础上，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是以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为主要内容，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同经济、政治的改革和发展相适应，以“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为目标，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

5. 在社会主义建设的外部条件问题上，指出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两大主题，必须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为我国现代化建设争取有利的国际环境。强调实行对外开放是改革和建设必不可少的，应当吸收和利用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所创造的一切先进文明成果来发展社会主义，封闭只能导致落后。

6. 在社会主义建设的政治保证问题上，强调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四项基本原则是立国之本，是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健康发展的保证，又从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获得新的时代内容。

7. 在社会主义建设的战略步骤问题上，提出基本实现现代化分三步走。在现代化建设的长过程中要抓住时机，争取出现若干个发展速度比较快、效益又比较好的阶段，每隔几年上一个台阶。允许和鼓励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以带动越来越多的地区和人们逐步达到共同富裕。

8. 在社会主义的领导力量和依靠力量问题上，强调作为工人阶级先锋队的中国共产党是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党必须

适应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需要，不断改善和加强对各方面工作的领导，改善和加强自身建设。执政党的党风，党同人民群众的联系，是关系党生死存亡的问题。必须依靠广大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必须依靠各民族人民的团结，必须依靠全体社会主义劳动者、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和拥护祖国统一的爱国者的最广泛的统一战线。党领导的人民军队是社会主义祖国的保卫者和建设社会主义的重要力量。

9. 在祖国统一的问题上，提出“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创造性构想。在一个中国的前提下，国家的主体坚持社会主义制度，香港、澳门、台湾保持原有的资本主义制度长期不变，按照这个原则来推进祖国和平统一大业的完成。

《报告》在从9个方面概括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主要内容后，高度赞扬邓小平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创立做出了历史性的重大贡献，并强调指出：14年伟大实践的经验，集中到一点，就是要毫不动摇地坚持以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的党的基本路线。这是我们事业能够经受风险考验，顺利达到目标的最可靠的保证。

关于90年代建设和改革的主要任务，报告在对14年伟大实践做出基本总结后，高屋建瓴地指出，要在90年代把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推向前进，最根本的是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加快改革开放，集中精力把经济建设搞上去。同时，围绕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和精神文明建设，促进社会全面进步。报告基于近代历史和当今世界现实，强调我国经济能不能加快发展，不仅是重大的经济问题，而且是重大的政治问题。报告说，我们原定90年代国民生产总值年均增长6%，现在从国际国内形势的发展情况来看，可以更快一些。根据初步测算，增长8%~9%是可能的，我们应该向这个目标前进。为此，报告建议国务院对“八五”计划做出必要的调整，并着手研

究制定“九五”计划。

报告指出，为了加速改革开放，推动经济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必须努力实现10个方面关系全局的主要任务：第一，围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加快经济改革步伐；第二，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更多更好地利用国外资金、资源、技术和管理经验；第三，调整和优化产业结构，高度重视农业，加快发展基础工业、基础设施和第三产业；第四，加速科技进步，大力发展教育，充分发挥知识分子的作用；第五，充分发挥各地优势，加快地区经济发展，促进全国经济布局合理化；第六，积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使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建设有一个较大的发展；第七，下决心进行行政管理体制和机构改革，切实做到转变职能、理顺关系、精兵简政、提高效率；第八，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把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提高到新水平；第九，不断改善人民生活，严格控制人口增长，加强环境保护；第十，加强军队建设，增强国防实力，保障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顺利进行。

如果将报告中的这部分内容与一年前形成的关于十年规划和“八五”计划的《纲要》相比，可以明显看到，十四大报告这一部分充分体现了邓小平南方谈话的精神。其主要表现，一是在实事求是的基础上明确了加快经济建设步伐的指导思想。报告对《纲要》所定发展速度的调整不是孤立的，它预示着相应的一系列指标的调整和有关措施的加强。二是在战略部署和主要任务中，改革开放的分量加重了，举措增加了。这些都表明党在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问题上具有了一种更加积极、进取的态度。十四大这一精神的贯彻，无疑将会加速现代化建设第二步战略目标的实现，为胜利跨入21世纪打下更加坚实的物质基础。

关于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大会报告明确提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我们要建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就是要使市场在社会主义国家宏观

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使经济活动遵循价值规律的要求，适应供求关系的变化；通过价格杠杆和竞争机制的功能，把资源配置到效益较好的环节中去，并给企业以压力和动力，实现优胜劣汰；运用市场对各种经济信号反应比较灵敏的优点，促进生产和需求的及时协调。同时也要看到市场有其自身的弱点和消极方面，必须加强和改善国家对经济的宏观调控。报告强调，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结合在一起的。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一个长期发展的过程，是一项艰巨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既要作持久的努力，又要有紧迫感；既要坚定方向，又要从实际出发，区别不同情况，积极推进。十四大提出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是对马克思主义的重大突破和发展，是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上的一个伟大创造，对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将起巨大作用。

关于国际形势和我们的对外政策，报告指出，当今世界正处在大变动的历史时期。两极格局已经终结，各种力量重新分化组合，世界正朝着多极化方向发展。新格局的形成将是长期的、复杂的过程。在今后一个较长的时期内，争取和平的国际环境，避免新的世界大战，是有可能的。同时也要看到，目前国际形势仍然动荡不安，世界各种矛盾在深入发展，不少国家和地区的民族矛盾、领土争端和宗教纷争突出起来，甚至酿成流血冲突和局部战争。国际经济竞争日趋激烈，许多发展中国家经济环境更加恶化，南北差距进一步扩大。报告重申，和平与发展仍然是当今世界两大主题。世界要和平，国家要发展，社会要进步，经济要繁荣，生活要提高，已成为各国人民的普遍要求。面对新的国际形势，我们将始终不渝地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努力为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争取有利的国际环境，为世界的和平与发展做出自己的贡献。报告特别阐述了中国在建立什么样的国际新秩序问题上的主张，指出根据历史经验和现实状况，我们主张在互

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等原则基础上，建立和平、稳定、公正、合理的国际新秩序。这一新秩序包括建立平等互利的国际经济新格局。世界是多样性的，各个国家之间存在着种种差异。各国人民都有权根据本国的具体情况，选择符合本国国情的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国家无论大小、强弱、贫富，都应当作为国际社会的平等成员参与国际事务。国与国之间理应互相尊重，求同存异，平等相待，友好相处。国与国之间的分歧和争端，应当遵照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准则，通过协商和平解决，不得诉诸武力和武力威胁。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少数几个国家垄断和操纵国际事务，是行不通的。建立国际新秩序是长期的任务，中国人民将同各国人民一道，为此做出不懈的努力。

关于加强党的建设和改善党的领导，报告指出，党的基本路线要毫不动摇地长期坚持下去，社会主义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要搞得更好更快，国家要长治久安和繁荣富强，关键在于我们党，在于坚持用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武装全党。报告强调，在新的历史时期，党所处的环境和肩负的任务有了很大变化，党的思想、政治、组织、作风建设都面临许多新情况和新问题。我们一定要结合新的实际，遵循党的基本路线，坚持党要管党和从严治党，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努力提高党的执政水平和领导水平，使我们这个久经考验的马克思主义的党，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中更好地发挥领导核心的作用。根据这一总的要求，报告提出了5个方面的任务：（1）认真学习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增强贯彻执行党的基本路线的自觉性和坚定性；（2）加强领导班子建设，培养社会主义事业接班人；（3）密切党同群众的联系，坚决克服消极腐败现象；（4）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充分发挥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5）坚持和健全民主集中制，维护党的团结和统一。如何搞好党

的建设，以便更好地担当起领导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重任，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一直努力探索的一个重要课题。十四大报告根据新的形势所提出的党在这方面工作的基本要求和几项任务，都是符合党的建设和党的领导的实际和需要的。特别是它郑重提出要用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武装全党，以及与此相适应，大会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和党的基本路线的内容写进《中国共产党章程》，对于统一全党的思想和行动，提高党的执政本领和领导水平，以便更好地率领人民沿着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前进，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根据邓小平的一系列重要论述和我们党的实践经验，党的十三大、十三届七中全会和江泽民在建党七十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都曾从不同角度作过阐述。这次党的十四大报告在已有的基础上，做了新的概括和阐述，科学地回答了在中国这样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一系列基本问题，包括发展道路、发展阶段、根本任务、发展动力、外部条件、政治保证、战略步骤、领导力量和依靠力量，以及完成祖国和平统一大业的战略构想 9 个方面。

这 9 个方面是迄今为止党对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比较系统完整的科学概括，标志着党在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认识上有了重大的突破。当然，这个理论还将在实践中不断地丰富、发展和完善。

十四大报告中强调：“14 年伟大实践的经验，集中到一点，就是要毫不动摇地坚持以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的党的基本路线。”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三个最基本的问题，相互依存，缺一不可。把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一百年不动摇写进报告中，表达了全党的决心和意志。伟大的实践，需要伟大的理

论。伟大的理论，只有同实践相结合，才有生命力。半个世纪以前，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代领导核心毛泽东成功地找到了适合中国国情的阶级和民族解放道路，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半个世纪后的今天，党的第二代领导核心邓小平又成功地找到了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为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注入了新的活力。

两次伟大革命实践，两次思想上的伟大飞跃，表明中国共产党人不仅能够摧毁一个腐朽的旧世界，而且也能够建设一个美好的新世界。

十四大报告的另一个突出贡献，是明确提出了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标志着我们党对计划和市场问题及其相互关系的认识，取得突破性进展。

（三）大会的选举

10月18日下午，具有承前启后、继往开来伟大历史意义的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在选出了新一届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并通过了关于十三届中央委员会报告等决议后，在人民大会堂胜利闭幕。

大会强调指出，适应加快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步伐的新形势，必须用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武装全党。大会号召全党同志，要在十四届中央委员会的领导下，更加紧密地团结起来，为夺取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更大胜利而努力奋斗。

江泽民主持了下午的大会并宣布闭幕。

会议首先通过了由34人组成的总监票人和监票人名单。

在大会监票人的监督下，到会的2007位代表以无记名投票方式，选举出189位第十四届中央委员会委员，130位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共319人；选举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108人。

在新一届中央委员会的组成人员中，既有经过长期革命斗争

考验的老同志，又有一批年富力强，担负重要领导职务的中年同志，还有一批有培养前途的年轻干部，平均年龄 56.3 岁。一大批新人进入中央委员会，新进的占 46.7%，他们多数是中青年干部，55 岁以下的占 61%，具有大专以上文化的占 83.7%，中、高级以上技术职称的占 44.5%。

大会依次通过了关于十三届中央委员会报告的决议、关于中央顾问委员会工作报告的决议、关于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工作报告的决议。

大会对十三届中央委员会的工作表示满意，赞成报告对 14 年伟大实践的基本总结，同意报告提出的加快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步伐的决策和部署，同意报告对国际形势的分析和阐述的对外政策，强调要进一步加强党的建设和改善党的领导。

大会同意关于不再设立中央顾问委员会的建议，并向中央顾问委员会的老同志表示衷心的感谢和崇高的敬意，对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的工作表示满意。

会议还通过了关于《中国共产党章程》（修正案）的决议。大会认为，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党的基本路线写进党章，对于统一全党的思想和行动，夺取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更大胜利，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下午 6 时，大会圆满完成各项议程后在《国际歌》乐声中闭幕。

随后，中国共产党第十四届中央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于 1992 年 10 月 19 日在北京举行。

出席会议的有中央委员 188 人，中央候补委员 129 人。江泽民主持会议并讲了话。全会选举了中央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中央委员会总书记；根据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的提名，通过了中央书记处成员；决定了中央军事委员会组成人员；批准了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选

举产生的书记、副书记和常务委员会委员人选。

名单如下：

一、中央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

中央政治局委员（按姓氏笔划为序）

丁关根 田纪云 朱镕基 乔石 刘华清

江泽民 李鹏 李岚清 李铁映 李瑞环

杨白冰 吴邦国 邹家华 陈希同 胡锦涛

姜春云 钱其琛 尉健行 谢非 谭绍文

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按得票多少为序）

温家宝 王汉斌

二、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

江泽民 李鹏 乔石 李瑞环

朱镕基 刘华清 胡锦涛

三、中央委员会总书记

江泽民

四、中央书记处书记

胡锦涛 丁关根 尉健行 温家宝 任建新

五、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副主席、委员

主席

江泽民

副主席

刘华清 张震

委员

迟浩田 张万年 于永波 傅全有

六、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副书记、常务委员会委员

书记 尉健行

常务委员会委员（按姓氏笔划为序）

王光 王德瑛 刘丽英 安启元 李至伦

何 勇 陈作霖 侯宗宾 徐 青 曹庆泽
尉健行 彭 钢 健 杰

党中央新的领导机构，集中了中华民族一批忠于马克思主义、德才兼备、年富力强、政绩突出、群众信任的最优秀分子。

当日下午3时，作为党的十四大的特邀代表，邓小平同新当选的党中央领导同志一起，在人民大会堂与出席十四大的全体代表亲切见面，并合影留念，共祝大会胜利闭幕。

邓小平精神矍铄，在江泽民等陪同下，沿着宽敞的宴会大厅绕场一周，时间达20分钟。在准备离开时，他对江泽民说：“这次大会开得好，希望大家继续努力。”

江泽民握着邓小平的手说：“您今天同大家见面，使代表们深受鼓舞，大家的情绪达到了高潮。”他代表新当选的中央领导表示：现在大政方针已经确定，我们要真抓实干，把大会的精神落到实处。

邓小平满意地点着头，挥手向大家道别。

三、十四大党章的修改

十四大修改后的党章，反映了党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最新认识，提出了党在新时期的奋斗纲领和战略部署，是全党今后一个时期的行动准则。

（一）党章修改的缘由

十二大党章是1982年9月通过的，1987年10月党的十三大只对十二大党章的部分条文进行了修正。十二大以来10年的实践证明，十二大党章确定的党的性质、奋斗目标、指导思想、组织原则等基本内容和关于党的工作、党内生活的基本规定都是正确的，在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仍然适用。那么，十四大为什么要对党章进行修改呢？这是因为：

1. 党关于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最新认识需要补充进党章，而十二大时不具备这样的条件。

坚持社会主义，是党坚定不移的信念和奋斗方向。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经过十二大、十三大，党在领导全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中，不断开拓创新，总结经验，逐步形成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这表明党对社会主义的科学认识实现了新的飞跃，表明党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性的探索进入了一个新的高度。这些观点和论述，初步回答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阶段、发展道路、根本任务、发展动力、外部条件、政治保证、战略目标和国际环境等基本问题，规划了我们前进的科学轨道，构成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大体轮廓。这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领导全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极其宝贵的经验总结，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最可珍贵的精神财富，也是指引我们继续沿着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的旗帜和灯塔。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写入党章，在党的章程上确定为党的纲领，保证其权威性、严肃性和长期稳定不变，并用此统一和指导全党的思想行动，规范党组织的工作、生活和党员的行为，对于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具有根本性的意义和作用。

与此同时，党对于国内国际问题的认识，对于党的优良传统的作风在新形势下的继承和发展，对于党的各项工作的具体要求，都更加深刻、更加全面、更加正确，形成了新的语言、新的提法、新的表述。用当时历史条件下形成的这些新语言和提法，使党章更贴切地反映当前党的主张和党对各项工作的要求，具有较强的现实感和时代感，能更充分地发挥党章作为党的根本大法的作用。

2. 党的建设和实际工作中出现的新问题需要在党章中予以

修改规范。

14年经济发展和改革开放的深入，党的领导工作出现了许多新情况、新问题。党如何领导人民不断沿着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前进，这是摆在全党面前的新课题。党如何既集中精力领导经济建设，又不具体包办经济工作中的具体事务，是我党一直在探讨的问题。党同国家权力机关、政权组织、经济组织、群众组织的关系，怎样处理得更好一些，也需要不断明确。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不断深入，要求党的领导方式、方法也应作相应地改变或改进。所有这些，都是当前党的领导工作亟需解决的问题。为了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有必要在党章中根据已有经验对这些问题作出原则规定，以便全党执行，也为进一步探讨这些问题提供基础。同时，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不断深入，还对党的组织和党员、干部提出许多新的要求。特别是基层组织发生了变化，有些基层组织不很健全，部分农村党员老化现象严重，一些生产第一线党员人数减少。对这些情况，党章有必要作出新的规定。企业、农村、事业、机关单位情况和体制各不相同，为使这些单位的基层党组织有所遵循地开展工作，党章也有必要对这些不同单位基层党组织的职责作出具体规定，对党员义务和干部条件做出适当改动，以便适应当前党的任务和工作的需要。

3. 党章中一些现有规定需要修改、补充和完善。

毫无疑问，十二大党章的基本规定，在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仍然适用。但历史毕竟已经前进10年，随着形势发展和情况的变化，党章中一些在当时属于正确的规定，现在已经不适用了，这就需要删除或用新的规定代替。有些规定，经过10年的实践，需要做部分的改动，使其日渐完善。还有一些规定，随着时间的推移，需要补充一些新的内容，使其更科学、更可行。由此可见，十四大对党章进行修改是完全必要的。

(二) 党章修改的指导思想和基本原则

根据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的规定，十四大修改党章的指导思想是：总结党的十二大以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党的建设的新经验，把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党的基本路线及一系列方针、政策写入党章，对党的工作和党的建设提出切合实际的新要求，把党的建设成为领导全国人民沿着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不断前进的坚强核心。按照这一指导思想，修改党章坚持了以下原则：

1. 突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党的基本路线，并将其贯穿党章全文。

十四大党章把增加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内容作为修改的重点。总纲中，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形成、初级阶段、基本国情和特点、建设道路、主要矛盾、根本任务、根本经济制度、各项工作总的出发点和标准、经济发展战略目标、基本路线、精神文明建设、民主法制建设以及民族问题、统一战线问题、国际事务问题等方面，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做了概括而系统地阐述。同时，在条文部分，也把它作为一条主线，予以充分的体现。在突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中，又重点突出了党的基本路线。党的基本路线是党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内容和基本主张，是各项工作前进的指针，是全党团结统一的政治基础。坚持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关键是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十四大党章在总纲中对“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分段做了较详细的阐述，在条文部分也提出了进一步的要求。

2. 根据基本路线的要求，对部分条文内容作删改、调整和充实，使内容和规定切实可行，保持党章的权威性和内容的连续性。

党章是党的组织、党员的工作准则和行为规范，它的突出特点是严密性、可行性和操作性。保证党章的内容和规定符合目前

党的工作和生活的实际，便于遵循和操作，是维护党章权威性的关键。十四大党章对原党章中的内容和规定，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根据基本路线的要求一一做了研究分析，仍然适用的保留，同现实情况不符合的，或删除或修改，总体可行、局部不行的进行调整或补充，实践中总结的新经验加以补充，现实提出的新问题能规范的尽量予以规范。总的原则是，坚持真理的实践标准，使内容和规定更符合实际。

为了保持党的工作和建设的连续性，十四大党章对原党章的修改，始终把握住在继承中发展的精神，而不是对十二大党章作根本的和全面的修改，只是部分修改。在总体上，保持十二大党章关于党的纲领和党的工作、党内生活的基本规定，保持十二大党章中一切在现在仍然适用的内容，保持十二大党章总的框架和结构。在具体做法上，主要对部分段落、条款进行充实、调整、修改和删节，重点是总纲部分。即使对部分规定进行的修改，也尽可能保持其在执行中的连续性。这样做，有利于维持和保持党章的权威性，有利于使党的工作和党的建设健康平稳地发展。

3. 广泛研究和采纳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的意见与建议，使党章修改具备广泛的群众基础。党章是全党意志的共同体现，认真听取广大党组织和党员的意见，集中全党的智慧，是把党章修改好的重要条件。十四大筹备过程中，许多地区和部门的党组织通过各种方式对党章修改提出了意见和建议，中央和中央有关部门也收到许多对党章提出具体修改意见的党员来信。所有这些都充分反映了广大党组织和党员要求把党章修改好的共同愿望。修改中，对这些意见和建议，都一一进行了认真研究，不少已经采纳。可以说，十四大党章是全党智慧的结晶，体现了全党的共同意志。

（三）党章修改的简要过程和主要内容

十四大修改党章的工作，从1992年3月开始。中央政治局

常委会在研究十四大筹备工作时，认真分析了党的工作和党的建设的现状，提出要对党章进行部分修改。为此，3月底，成立了党章修改小组，开始十四大修改党章的准备工作。党章修改小组成立后，共抓紧做了4件事：第一，根据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的指示，研究了党章修改的原则、步骤和方法。第二，广泛收集了党历次修改党章的资料，并按照党章需要规范的内容，对十二大以来的10年间党关于国际国内问题的基本论述，特别是邓小平关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系列重要论述，分门别类地进行了归纳整理。第三，收集并分析了广大党组织和党员对党章的修改意见。党章修改小组把这些意见归纳整理成32条，然后一条一条地分析，提出了初步的处理建议。第四，根据各部门掌握和了解的情况，对党的工作和党的建设的实际进行了分析，特别是对面临的新情况和需要解决的新问题进行了认真研究。在做了上述4项准备工作之后，修改小组集中时间和精力，对十二大党章和十三大党章的部分条文修正案逐段逐句地进行分析研究，拟出了党章（修正案）初稿。

7月至9月，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几次讨论了党章（修正案）初稿，要求修改要突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把我们党特别是邓小平关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主张、基本观点和党的基本路线及一系列重大方针、政策系统地体现在党章中。对原党章中一切现在仍然适用的内容和规定，要予以保留。根据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的意见，修改小组对党章（修正案）初稿进行了多次修改，形成了党章（修正案）修改稿。9月中旬，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了党章（修正案）修改稿，同意提交党的十三届九中全会讨论。10月5日至9日，党的十三届九中全会召开，会议的主要议题之一，就是讨论党章（修正案）。全会对中央政治局提出的党章（修正案）进行了认真的讨论，提出了许多重要的修改意见。修改小组按照这些意见做了进一步修

改。10月9日，全会通过了党章（修正案），决定提请党的十四大审议。

1. 关于总纲部分的修改

十四大修改党章，把总纲作为重点，在内容上做了重大调整和充实，着重阐述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和一系列方针、政策，继而对党的建设的基本要求做了重要补充。

（1）对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是社会历史不可逆转的总趋势思想的明确。

原总纲第3自然段是叙述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关于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基本内容和主要观点的；第4自然段是根据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从普遍意义上论述一般社会主义的主要特征和优越性的。十二大以来，世界社会主义事业出现了巨大的变化。一是苏联、东欧的剧变，证明一些国家的社会主义模式在实践中行不通；二是我们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在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的实践中，开创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这条道路越来越显示出社会主义制度的巨大优越性。巨大变化说明，马、恩、列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必然代替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结论是正确的，但社会主义社会如何代替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后如何发展，却没有固定的模式可以照搬，拘泥于马克思主义的个别词句或个别结论是不行的。为此，修改中将第3自然段整段和第4自然段的大部分文字删去，代之以扼要地阐述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历史必然性的内容。

新增加的这段话首先指出：“马克思列宁主义揭示了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普遍规律，分析了资本主义制度本身无法克服的固有矛盾，指出社会主义社会必然代替资本主义社会、最后必然发展为共产主义社会。”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的结论是颠扑不破的。这里用《共产党宣言》发表一百多年来的历史证明，“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是正确的，社会主义具有强大的生

命力”。至于说一些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的国家以后发生了变化，那不是社会主义制度本身的问题，而是这些国家在如何坚持社会主义道路上发生了偏差。这些偏差或者错误，对整个社会主义事业是个损失，但也从反面告诫人们如何认识和建设社会主义。因此，根据邓小平视察南方重要谈话中讲的社会主义本质的思想，并根据社会主义在发展中的经验教训，从三方面对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历史总趋势做了阐述。第一，指出“社会主义制度的发展和完善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这是从时间上对这个代替过程做了规定。第二，这个过程是长期的，又不是一帆风顺的，“社会主义在发展过程中也有曲折和反复”，但总趋势不可逆转。第三，社会主义必将“通过各国人民自愿选择的、适合本国特点的道路，逐步取得胜利”。这三点，概括了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过程中的必然特征。

(2) 增加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历史进程的表述，明确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历史地位。

在总纲叙述党的历史中，加写了历史进程的表述。原文只叙述到“确立社会主义制度，发展了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文化”，这在当时是可以的，但历史已进入1992年，这次修改就把进入新的历史时期的这一段历史补充完整了。

增加的这段文字主要讲了4个意思：

第一，肯定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党的历史上的地位。把党的一次全会写进党章，这在党的历次党章和党章修正案中还是第一次。十一届三中全会对于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和党的建设的意义，无论如何评价都不过分。把它写进党章，是恰当的，符合历史的，并且有利于我们在此基础上前进。

第二，肯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所进行的主要工作。这里从两方面做了肯定：一是“党总结正反两方面的经验，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这是党开始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思想准备，

没有这一思想准备，就不会有今天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的大好形势。二是“实现全党工作中心向经济建设的转移，实行改革开放”。这是党的重大战略决策和所进行的主要工作。

第三，肯定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这一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当代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是十多年来我国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经验总结，也是今后继续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行动指南。

第四，肯定了三中全会以来取得的巨大成就。这里虽然只用“开创了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新时期”一句话，但含义很广，包括的范围很大，说明我们在方方面面都有成绩，真正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在增加的关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历史进程的文字表述后面，还增写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阐明了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基本问题，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是引导我国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前进的指针”一句话。如果说关于历史进程的文字表述是叙述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提出和形成过程的话，这段话就是确立这一理论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历史地位。这一历史地位是从三方面讲的，一是它“阐明了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基本问题”，二是它“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三是它“是引导我国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前进的指针”。这3句话，高度概括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对于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巨大而深远的意义。

(3)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问题的增写。

十四大党章在叙述完党的历史进程和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地位作用后，就我国所处的历史阶段和这个阶段的基本问题做了专段阐述。这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内

容。这段论述主要讲了初级阶段的7个基本问题。

第一，初级阶段的特点和它的历史期限。关于特点，这里用了“这是在经济文化落后的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不可逾越的历史阶段”的表述。一共讲了三个特点，一是“经济文化落后”，这是我们的基本国情；二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这是这一阶段的任务或者说是我们要干的主要事情；三是“不可逾越”，就是说必须经历这个阶段，不能跳跃或者超越这个阶段，表明这个阶段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长河中的地位和重要性。关于它的历史期限，写上了“需要上百年的时间”。如果从1956年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算起，初级阶段最低要延续到下个世纪中叶实现第三步战略目标。那时初级阶段是否结束了，只能根据那时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情况决定。

第二，初级阶段要走的道路。这里明确指出“走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这就是“在改革开放中实现现代化的新道路”。

第三，初级阶段的主要矛盾。原总纲中有关主要矛盾的表述，修改中予以保留。由于阶级斗争仍然是初级阶段的客观存在，所以在讲了主要矛盾后，保留了原文中关于阶级斗争的表述。原文关于阶级斗争的论述文字比较累赘，在保持原意不变的情况下，删去了一些话，并做了文字上的调整。

第四，初级阶段的根本任务。如何解决初级阶段的主要矛盾，这就要回答初级阶段的根本任务。关于这个问题，十四大党章是这样表述的：“进一步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逐步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并且为此而改革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中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方面和环节。”这段话引自十三大政治报告，引用时参照江泽民在建党7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和十三届七中全会决议，对个别文字做了改动，基本意思未变。根据邓小平南方谈话的精神，这次修改把“解放生产力”也作为根本任务之一，并加

上了“并且为此而改革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中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方面和环节”一句，使表述更全面。

第五，初级阶段的根本经济制度。主要讲了四点：一是以公有制为主体，允许多种经济成分并存。这些都是社会主义公有制在初级阶段必不可少的有益的补充。二是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在这个主体下，允许其他分配方式存在。三是鼓励一部分地区和一部分人先富起来，逐步消灭贫穷，达到共同富裕。四是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即“在生产发展和社会财富增长的基础上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

第六，初级阶段各项工作总的出发点和检验标准。初级阶段各项工作总的出发点是什么，用什么来检验，这是初级阶段的基本问题。这里用了邓小平1992年初视察南方重点谈话中讲的三个“是否有利于”，要求把它作为总的出发点和检验标准。

第七，初级阶段的经济发展战略目标。这是邓小平最先提出、十三大政治报告确认的。确立了初级阶段的战略目标，初级阶段的基本努力方向就明确了，初级阶段的整个轮廓就清晰了。

（4）党的基本路线内容的增写。

原总纲表述党的总任务即政治路线，用的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几年中的提法。十三大提出“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后，实际上已经用基本路线的提法取代了总任务即政治路线的提法。这次，除了改写基本路线的表述外，又分别对“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进行阐述。

关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首先，强调党“在领导社会主义事业中，必须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其他各项工作都服从和服务于这个中心”。其次，讲如何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共讲了三点，即“抓紧时机，加快发展”，“充分发挥科学技术作为第一生产力的作用，依靠科技进步，提高劳动者素质”，“效益好、质量高、速度快”。这三点，都是经济建设中最重要、最基本的方针和原

则。最后，落脚到“努力把经济建设搞上去”。

关于四项基本原则。四项基本原则的具体内容在总纲其他段落都有专门阐述，这里只是从原则上和总体上讲的。先讲四项基本原则的重要性，“是我们的立国之本”。接着讲“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整个过程中，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整个过程”，表达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长期性和不可动摇性。

关于改革开放。首先讲改革开放的重要性，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必由之路”。接着，分别讲改革和开放的内容。关于改革，除讲经济体制改革外，还讲了政治体制和其他领域的改革。经济体制改革的目的是，归结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关于开放，从范围上讲，“包括对外对内的全面开放”；从内容上讲，“发展对外经济技术交流与合作，更多更好地利用外来资金、资源和技术”，并讲到“吸收和借鉴”。最后，讲改革开放的总要求：“大胆探索，勇于开拓，在实践中开创新路。”这三句话，都是邓小平同志和中央这几年一直强调的。

(5) 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内容的充实。

原总纲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内容比较单薄，一些提法已和当前使用的语言不相称。这次修改，作了较多的删除和补充。一是写上了精神文明建设的指导思想，是“为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二是增加了文化建设的内容，写上了“尊重知识，尊重人才，提高全民族的思想道德和科学文化素质，弘扬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繁荣和发展社会主义文化”。三是对思想建设的内容做了针对初级阶段情况的修改。用“党的基本路线和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思想教育”取代了对党员和群众进行的“共产主义思想教育”，并增加了“对党员还要进行共产主义远大理想教育”的要求。同时，增加了“增强民族自尊、自信和自强精神”，“抵御

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腐朽思想的侵蚀，扫除各种丑恶现象”的要求，这些都有很强的针对性和操作性，都是从初级阶段的实际出发的。

(6) 对民主法制建设内容的补充。

在总纲中，补充了关于民主法制建设的新的要求。①“坚持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坚持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这是国家的政治制度，是民主建设的重要内容。②“积极支持人民当家作主”，“广开言路，不断建立民主决策、民主监督的制度和程序”。③“加强国家立法和法律实施工作，使国家各项工作逐步走上法制化轨道”。原文提出了“法制”，但对法制建设未作具体论述，加上这句话，就使法制建设的内容实在具体了。④加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打击犯罪活动和犯罪分子，保持社会稳定。改写这段话，一是使它更准确，二是更全面。⑤从新时期军队的地位和作用出发，强调党对军队和其他人民武装力量的领导，强调“充分发挥人民解放军在巩固国防、保卫祖国和参加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作用”。⑥加上了“实现各民族共同繁荣和全面进步”的内容。⑦增写了“一国两制”的方针。

(7) 部分改写了党对国际事务基本立场的一段文字。

根据当前的世界局势和未来的发展，以及我们党和国家的对外政策，对原总纲中党对国际事务基本立场的一段文字做了改写。首先指出：“中国共产党主张积极发展对外关系，努力为我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争取有利的国际环境。”这是我们发展对外关系的出发点和根本指导思想。接着，阐明我们在国际事务中“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维护我国的独立和主权，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维护世界和平，促进人类进步”。这5句话，概括了党对国际事务的基本主张、基本立场和基本政策，相互联系，构成整体，缺一不可。在发展同各国关系的一段文字中加上了“加强同发展中国家的团结与合作”，并加上“发

展我国同周边国家的睦邻友好关系”一语。随着对外交往的发展，党不仅要同共产党和其他工人阶级政党发生关系，而且要同更多的政党发生关系，因此，这次删去了“在马克思主义基础上”一句话，把“其他工人阶级政党”改成“其他政党”。

(8) 更加准确地概括民主集中制的原则。

对民主集中制，总纲解释为“在民主的基础上实行高度的集中”，第2章第10条又表述为“它在高度民主的基础上实行高度的集中”。这里用了“高度民主”、“高度集中”的提法。据专家介绍，仔细推敲，两个“高度”的提法不够准确。一是缺乏客观标准，高到什么程度才算“高度”，无法判断。况且民主是个渐进过程，无法一下子达到“高度”。二是作为党的组织原则的民主和集中本是互相联系又互相制约的统一整体，民主既不能削弱，又不能离开集中搞极端民主化，集中既不允许分散主义，又不能离开民主搞权力过分集中，用“高度”难以反映它们的实际内容。三是民主集中制从党一诞生就是党的组织制度，一直是指导党的组织建设的原则，而“高度”给人一种需要未来达到的目标的感觉，使人觉得它不易达到。四是“高度”在实际工作中难以操作，容易偏颇，容易为“大民主”和“一言堂”所利用。基于以上分析，总纲“在民主的基础上实行高度的集中”改为“民主集中制是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相结合”。同时，也删去了第二章第10条中“它在高度民主的基础上实行高度的集中”一句。

(9) 提出了对党的建设和党的领导的新要求。

这次修改，把加强党的建设的三项基本要求改成了四项，增加了“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作为第一项；原第一项“思想上政治上的高度一致”，去掉政治路线的内容，保留思想路线，改为“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作为第二项；后面两项保留。第19自然段党的领导的内容，根据新的历史时期的需要做了补充。

叙述党的建设总要求的内容中，增加了4句话。一是党的建设“必须紧密围绕党的基本路线”。这就把党的建设同基本路线联系起来，实际上是新时期党的建设的指导思想。二是“坚持从严治党”。这是党的执政地位、党面临的形势任务和党的建设的现状决定的，反映了党的高标准、严要求。三是在“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后面加上了“作风”二字，有利于加强党的思想作风、工作作风建设。四是明确地提出了党的建设的目标，即“把党建设成为领导全国人民沿着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不断前进的坚强核心”。

关于党的领导，明确提出了“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的要求。怎样加强和改善呢？在原有内容的基础上，新增加了三点：①“集中精力领导经济建设，组织、协调各方面的力量，同心协力，围绕经济建设开展工作。”②“实行民主的科学的决策。”③“不断改进领导方式和方法，提高领导水平。”

2. 关于条文部分的修改

条文部分修改的重点，一是按照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党的基本路线，对党员、党的干部和党的组织提出更高的要求；二是从当前党的工作的实际出发，对内容和规定进行修改、补充、完善，使其更加符合形势、任务的要求，更加符合从严治党的要求。

(1) 对党员和党的干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修改后的党章，在党员必须履行的义务中，专门增加了“坚决执行党的基本路线和各项方针、政策，带头参加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带动群众为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艰苦奋斗，在生产、工作、学习和社会生活中起先锋模范作用”一句。这里用“带头”、“带动”两个词，把党对党员贯彻党的基本路线的主要要求体现出来。带头，讲党员自身应该怎么做；带动，讲党员如何支持和组织群众。围绕这一根本要求，对党员义务的其他几

项也做了相应修改。在第1项义务中，增加了“学习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努力提高为人民服务的本领”两句话；在原第2项义务中加上了“多做贡献”，原第5项义务中加上了“坚决同消极腐败现象作斗争”等要求。同时，在结构和文字上做了某些调整和删改。

对干部基本条件的修改，也主要增加了“坚决执行党的基本路线和各项方针、政策，立志改革开放，献身现代化事业，在社会主义建设中艰苦创业，开拓创新，做出实绩”一条。同时，围绕执行党的基本路线，还增加了“掌握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能够把党的方针、政策同本地区、本部门的实际相结合，讲实话，办实事，求实效，反对形式主义”，“有实践经验”，“正确行使人民赋予的权力，清正廉洁，勤政为民，以身作则，艰苦朴素”等要求。增加这些内容的目的，是想从不同侧面要求干部执行党的基本路线，积极参加和带领群众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努力奋斗。

(2) 删去了有关顾问委员会的条文。

顾问委员会是党的十二大根据当时党的工作的实际和干部队伍的状况决定设立的。当时设想，顾问委员会作为一种过渡性的组织形式，经过两个5年，就基本可以完成历史合作。10年来，顾问委员会在对党的方针、政策的制定和执行提出建议，协助党委调查处理某些重要问题，宣传党的重大方针、政策，承办党委委托的其他任务等方面，发挥了政治上的助手和参谋作用。各级顾问委员会在党中央和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的领导下，为维护党的团结和社会稳定，促进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为党、国家和人民建立了历史功绩。根据中央顾问委员会的建议，党的十四大经过充分讨论，决定从十四大起不再设立顾问委员会。鉴此，党章中的相应条文即删去。

(3) 对党的地方组织和基层组织的任期做了适当调整。

根据多年的实践和许多地方、基层党组织的要求，十四大党章将第4、第5章中县一级党的委员会的任期由3年改为5年，基层委员会的任期由3年改为3年或4年，总支部委员会、支部委员会的任期由2年改为2年或3年。由于基层组织党员人数、单位规模、工作性质、职责权限、分布状况差异很大，对其任期作这样的弹性规定比较切实可行。

(4) 进一步明确了党的基层党组织的职责。

党的基层组织是党在社会基层组织中的战斗堡垒，是党的全部工作和战斗力的基础。十四大党章对党的基层党组织的基本任务做了部分修改，着重增加了组织党员“学习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提高党员素质，增强党性”、“做好经常性的发展党员工作，重视吸收在生产和工作第一线的工人、农民、知识分子中的优秀分子入党”等内容。为了便于党的基层党组织有效地开展工作，分别对不同类型的基层党组织的职责作出不同的规定。

街道、乡、镇是国家的一级政权，党对这些政权组织实行有力的领导。鉴此，十四大党章写上了“街道、乡、镇党的基层委员会和村党支部，领导本地区的工作，支持和保证行政组织、经济组织和群众自治组织充分行使职权”。这就明确了这些地方党的基层党组织的领导地位和职责，同时也明确这种领导不是包揽一切。

鉴于企业的情况比较复杂，十四大党章只对全民所有制企业基层党组织的职责做了规定，明确其“发挥政治核心作用，围绕企业、生产经营开展工作”。如何发挥政治核心作用呢？党章写了5条：①“保证监督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在本企业的贯彻执行。”这是基层党组织最根本的职责。②“支持厂长（经理）依法行使职权，坚持和完善厂长（经理）负责制。”厂长（经理）是企业法人，按照《企业法》行使职权，基层党组织应该支持他们充分行使这些权力。③“全心全意依靠职工群众，支持职工代

表大会开展工作。”④“参与企业重大问题的决策。”这些重大问题包括企业发展方向和目标、干部培养和选拔、精神文明建设等。⑤“加强党组织的自身建设，领导思想政治工作和工会、共青团等群众组织。”

事业单位存在着行政领导人负责制和党委领导下的行政领导人负责制两种体制。对前一种体制，十四大党章规定基层党组织“发挥政治核心作用”。对后一种体制的事业单位中党的基层组织，规定其“对重大问题进行讨论，保证行政负责人充分行使自己的职权”。机关党的基层组织的职责，十四大党章只做了文字删节。

(5) 对党的纪律和纪律检查机关的工作程序的个别改动。

为了提高全党的纪律观念，十四大党章在第7章增写了加强党的纪律的重要性这一条。同时要求“党组织必须严格执行和维护党的纪律，共产党员必须自觉接受党的纪律的约束”。党章原第38条和39条中关于违犯政纪国法的党员受政纪或法律处理问题、向党外组织建议撤销党员党外职务的问题，不属于党内问题和党纪处分，十四大党章将其删去。十四大党章在第40条中增加了追认的规定，这主要是因为全会每年一般开两次，一旦需要做出这类规定，有时就赶不上开会时间，容易拖延对问题的处理。这次规定中央政治局和地方党委常委会可以先作决定，然后由全会追认，有利于从严治党，有利于及时处理违犯党的纪律的党委成员。党章第44条还作出新的规定，纪委发现同级党委委员有违纪行为，可以“先进行初步核实，如果需要立案检查的，应当报同级党的委员会批准，涉及常务委员的，经报告同级党的委员会后报上一级纪律检查委员会批准”。

(6) 恢复了十二大党章对党组的规定。

党组是党委的派出机关。多年的实践证明，在中央和地方国家机关、人民团体、经济组织、文化组织和其他非党组织的领导

机关中成立党组，对于加强党对这些机关工作的领导、保证党的方针、政策在这些机关工作中的贯彻执行，都十分必要。十三大党章部分条文修正案取消了在政府机关、经济组织和文化组织中设立党组的规定。十四大党章从党的工作和实际需要出发，又恢复了十二大党章对党组的规定，并增写了党组“讨论和决定本部门的重大问题”和指导直属单位党组织的工作的内容。

四、十四大的重要意义和影响

十四大闭幕前后，海内外舆论给以广泛报道并高度评价，称这是本世纪末重要的历史事件，普遍认为邓小平为中国发展社会主义指出了一条唯一正确的道路；中国的繁荣稳定令世界为之震惊。一家海外报纸称：“中共十四大——跨世纪的伟大工程。”

诚然，党的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是一次民主的大会，团结的大会，充满改革开放精神和求实奋进气氛的大会，必将进一步推动我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为中国共产党的史册增添新的光辉篇章。

大会后，全党同志思想统一，在新的更高的水平上实现了思想上政治上的高度一致，使我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迈出更大的步伐。

十四大的突出特点和最大贡献，在于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做了新的概括，充分肯定了这个理论在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思想理论发展史上的重要地位，并且把这个理论和在这个理论指导下制定的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正式载入党章。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最新成果，是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这个理论是全党和全国人民集体智慧的结晶，是我们最可珍贵的精神财富。在当代中

国，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最合乎国情、顺乎民意，最能够调动亿万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创造性，促进社会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使我国建设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使人民的生活水平迅速提高。当然，马克思主义要在实践中不断地丰富和发展，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也必将在亿万人民群众的伟大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

90年代，全党和全国人民面临的改革和建设的任务十分宏伟、十分艰巨。党的十四大所提出的十大任务中，居于中心地位的仍然是经济建设。同时要围绕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和精神文明建设，促进社会全面进步。要实现这个奋斗目标，关键在于进一步解放思想，加快改革开放的步伐。据此，十四大根据邓小平关于计划与市场的精辟论断，根据14年来的实践经验，明确宣布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一理论上的重大突破，具有极其深远的意义，它必将推动人们思想的进一步解放，促进经济建设和各方面建设迅速发展，必将使我国的面貌发生新的巨大变化，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必将更充分地显示出来。

中国共产党是领导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核心力量。加强党的建设，改善党的领导，是实现十四大提出的历史性任务的根本保证。这次大会，选举产生了新的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十四届中央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又选举产生了党的中央政治局、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和中央委员会总书记，通过了中央书记处成员，决定了中央军事委员会组成人员，批准了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选出的领导机构。新的党中央领导机构的诞生，表明全党有了一个团结和带领全国各族人民高举伟大旗帜、实现伟大任务的最高指挥部。这是我们实现90年代改革和建设宏伟目标的可靠保证。

同十三届中央领导机构相比，新选出的中央领导机构朝着年

轻化的方向迈出了新的一步。一批忠诚于马克思主义、德才兼备、年富力强、政绩突出、群众信任的同志进入党的最高领导层，进一步实现了新老交替与合作，这是中国共产党兴旺发达、后继有人的生动体现。创新的事业需要创新的人，创新的事业造就创新的人。一大批德才兼备的新人走上各级领导岗位，党就更有力量，我们的事业就长盛不衰。

经过十四大修改并通过的新党章，是全党团结的准则；十四届中央委员会及其产生的中央领导机构，是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团结的核心。民主集中制是党的根本组织原则，是维护和增强党的团结的重要保证。领导干部和领导班子的团结，对于加强全党的团结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党的各级领导班子团结一致，就能巩固和加强全党的团结；全党团结一致，就能巩固和加强全国各族人民的团结；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团结一致，我们的事业就能从胜利走向更大的胜利。

正因为十四大有上述一些突出的贡献和意义，西方各大通讯社普遍迅速报道了大会的有关消息，并对新选出的中央委员会作出评论，使这次大会在国际社会产生了广泛影响。外电普遍认为，十四大确认了经济改革的路线，新的中央委员会年富力强，将保证改革继续深入发展。

（陈雪薇主编《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重大事件和决策调查》）

为新世纪奠基：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

十五大召开时，距新的世纪还有两年半的时间。江泽民说：十五大的主题是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全面推向 21 世纪。十五大确定把邓小平理论作为党的指导思想写进党章，江泽民在报告中首次使用了“邓小平理论”的提法。十五大重申了党的基本路线，确立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纲领。十五大对跨世纪的经济、政治、文化、国防、外交以及党的建设等领域的改革和发展作出了战略性的部署。

跨世纪的宏伟纲领

中共十五大是在十四大以来不寻常的 5 年发展的基础上召开的。这 5 年，全面贯彻党的基本理论和基本路线，认真实施十四大的重要决策，提出并牢牢把握“抓住机遇、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促进发展、保持稳定”的基本方针，社会生产力、综合国力和人民生活水平，又上了一个新台阶。

5 年来，经济发展取得显著成就，从 1992 年到 1996 年，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 12.1%，既实现经济快速增长，又有效抑制了通货膨胀，避免了大起大落。

改革开放取得新突破，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明显增强，宏观调控体系的框架初步建立。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格局进一步展开。

精神文明建设迈出新步伐，国防现代化取得新进展，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等等。

但是，还存在不少的矛盾和困难。

国民经济整体素质和效益不高，经济结构不合理，部分国有企业活力不强；党风、政风、社会风气和社会治安状况人民群众不满意，贪污腐化、奢侈浪费等现象蔓延滋长，官僚主义、形式主义、弄虚作假严重；收入分配关系尚未理顺，地区发展差距明显存在等等。这一切都要在跨世纪的纲领中通盘考虑。

1996年10月以后，中组部开始部署十五大代表的选举工作，到1997年6月顺利结束。中央确定代表名额是2050名，分配到全国36个选举单位时为2049名。各选举单位共选举出代表2049名，后因1人犯严重错误，撤销了他的代表资格，实有代表2048人。

参照十四大的做法，中央邀请了60名特邀代表出席十五大。特邀代表具有正式代表同样的权利。

1997年9月12日，举世瞩目的中共十五大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开幕。江泽民代表第十四届中央委员会在中共十五大上作题为《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21世纪》的报告。

人民大会堂在今天格外庄严、雄伟。大礼堂主席台正上方悬挂着“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巨幅会标。鲜艳的党旗簇拥着由镰刀和锤子组成的党徽。主席台前摆放着盛开的鲜花。大礼堂二楼和三楼的跳台上分别挂着“高举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伟大旗帜，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21世纪！”“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中国共产党万

岁！”字样的巨幅横幅。

大会由李鹏主持。9时整，会议开始。在这国乐团雄壮的乐曲声中，全场起立，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随后，全体同志为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等已故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和革命先烈，为不久前逝世的邓小平、陈云、彭真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默哀。

李鹏宣布，中共十五大的代表 2048 人，特邀代表 60 人，今天到会的代表和特邀代表共 2074 人。他还对列席大会的党外朋友和有关方面负责同志表示热烈的欢迎。

江泽民在热烈的掌声中向大会作报告。报告指出：把我们的事业全面推向 21 世纪，就是要抓住机遇而不可丧失机遇，开拓进取而不可因循守旧，围绕经济建设的中心，经济体制改革要有新的突破，政治体制改革要继续深入，精神文明建设要切实加强，各个方面相互配合，实现经济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

报告分 10 部分：（1）世纪之交的回顾和展望；（2）过去 5 年的工作；（3）邓小平理论的历史地位和指导意义；（4）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和纲领；（5）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发展战略；（6）政治体制改革和民主法制建设；（7）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建设；（8）推进祖国和平统一；（9）国际形势和对外政策；（10）面向新世纪的中国共产党。

报告提出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纲领，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文化的基本目标和基本政策。

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基本目标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市场经济，不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基本政策是：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按劳分配为主体的多种分配方式和对外开放的国策。

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基本目标是：在中国共产

党的领导下，在人民当家作主的基础上，依法治国，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基本政策是：坚持和完善人民民主专政、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发展民主，健全法制，建设社会主义法制国家。

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基本目标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培育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公民为目标，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基本政策是：用邓小平理论武装全党，坚持两为方向双百方针，重在建设，繁荣学术和文艺。

江泽民的报告多次被热烈的掌声打断。

九易其稿的大会报告

对于这次跨世纪的重要会议，大会的报告是基础和保证，而报告的主题则是灵魂。

在江泽民的倡导与带领下，5年来，十四届中央政治局常委会、政治局、书记处的同志纷纷深入基层，深入群众，考察工作，调查研究。所以，十五大报告的起草是顺应时代要求，站在世纪之交的历史制高点上着手起草的。

1996年10月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决定成立十五大报告起草小组。经过半个月的准备，起草小组召开了第一次会议。从此，十五大报告起草工作正式拉开序幕。

从报告起草工作一开始，江泽民和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就顺应时代的要求和人民的意愿，指出，十五大的主题是：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21世纪。

1996年12月11日，江泽民同起草小组作了第一次谈话，就报告的主题、框架、主要内容、基本思想作了明确指示，指

出：报告的主题要紧紧扣住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阐明世纪之交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面临的形势和任务，动员全党和全国人民为把中国建设成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

他在这次谈话中回顾了 100 年来中华民族的发展史和新中国成立以来近 50 年的发展史，深刻阐述了十五大的重要意义。他说：只有站在历史的制高点上，才能在大局的把握上高瞻远瞩。回顾过去，是为了展望未来。十五大报告要回顾 100 年，回顾 50 年，回顾改革开放以来的 20 年，特别要总结十四大以来的 5 年。要展望下个世纪的前 50 年，进一步描绘到建国 100 周年时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宏伟蓝图。

在这次谈话中，江泽民还就高举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旗帜，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和基本纲领，关于经济、政治和文化，关于外交工作和祖国统一，关于新时期的中国共产党等问题作了全面的阐述。他希望起草小组的同志们认真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在科学理论的指导下，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大胆探索。

此后不久，十五大报告产生了第 1 稿，其基本框架在随后举行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得到肯定。

长达 10 个月的起草工作，一直在十四届中央政治局和政治局常委会直接领导下进行。江泽民更是自始至终十分重视起草工作，多次就有关问题作出重要指示。

十五大报告要重点回答的另一个问题是中国经济改革和发展问题，为此，1997 年 1 月 17 日，江泽民对起草小组作了第二次谈话，着重讲了经济体制改革的 10 个问题。他说：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项基本经济制度，任何情况下也不能动摇。在坚持公有制为主体的前提下，一切符合“三个有利于”的所有制形式都可以而且应当用来为社会主义服务。股份制是现代企业的一种资本组织形式，

资本主义可以用，社会主义同样也可以用。目前广大城乡出现的股份合作制形式，是中国经济发展实践中出现的新事物，应以积极态度予以支持。

正当十五大报告的起草工作紧张进行之际，1997年2月19日，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创立者邓小平去世。全党、全军沉浸在无限的悲痛之中。

就在海内外都关注中国举什么旗、走什么路的重要历史关头，1997年5月29日，江泽民在中央党校的讲话再一次明确指出：我们说坚持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不动摇，就是高举邓小平理论的旗帜不动摇。邓小平去世后，全党在这个问题上尤其要有高度的自觉性和坚定性，无论遇到什么困难和风险，都不动摇。

从1996年10月底到1997年6月的8个月中，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召开了3次会议，中央政治局也专门召开会议，对报告稿进行讨论和审议。出席会议的同志对报告稿中确定的跨世纪行动纲领、主要任务、方针政策等许多问题进行了反复讨论。在一些重要的文字表述上进行了仔细斟酌。中央领导机构对十五大报告主要观点和内容在认识上取得了高度的一致。起草小组又对报告稿进行了认真的修改。

十五大报告的起草，充分体现了发扬党内民主，集中全党智慧这一优良传统。江泽民5月29日在中央党校的讲话得到了各地区、各部门的一致赞成。1997年7月10日，根据中央政治局会议的决定，经过反复修改的十五大报告第5稿印发中央和地方135个单位征求意见。

参加讨论的有十四届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的成员，有中央党政军各部门和各人民团体的党员负责干部，有各省区市和各大军区的党委负责人，有十五大代表和党内老同志，共

4000人。

同时，中共中央还委托中央统战部征求了各民主党派、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知名人士的意见。座谈会上，多年与共产党合作共事的党外朋友，敞开思想、献计献策，对报告稿提出了许多好的修改意见和建议。江泽民对大家表示感谢，并要求起草小组逐条研究所提意见，认真吸取。

征求意见过程中，各单位对报告稿的主题、基本框架和基本观点，一致表示赞同。同时，也提出了许多好的修改意见和建议。

各方面的意见得到中央的高度重视。起草小组对这些意见和建议逐条逐句进行研究，又对报告稿作了严肃认真的修改，共修改800多处，其中涉及内容修改的有近300处。这些修改，重点对十四大以来5年工作的总结，对邓小平理论的概括、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农业和地区经济布局、科教兴国战略、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关系、祖国统一等问题作了修改和补充，较大地充实和加强了党的建设的内容，加重了结束语的分量。同时，对党内外普遍关注的、涉及全局和群众切身利益的热点问题，如国有企业的改革和发展、部分企业职工下岗、机构改革、地区发展和收入分配差距、反腐倡廉、社会治安等问题，也都加强了论述。还对有的段落作了结构调整。

一次次的调整，一步步的完善，报告集中了全党智慧，日臻成熟。

9月6日，中共十四届七中全会在北京开幕。出席会议的代表对已是第8稿的报告又进行了3天认真仔细的审议和讨论，提出了一些修改意见和建议。根据这些意见和建议，报告再次作了修改，决定提请党的十五大审议。

9月12日，在党的十五大开幕式上，摆在2000多名代表面前的是九易其稿的党的十五大报告。

“处处为人民谋福利”

9月12日下午3时，人民大会堂上海厅响起热烈的掌声，刚刚在上午开幕式上作了2个半小时报告的江泽民，精神焕发地来到上海代表团参加讨论。他一落座就高兴地说：“今天来了不少我认识的同志，但更多的是新面孔。这说明有很多新同志参加了党代会。”

他又笑着说：“我来参加讨论，因为我是上海团的代表。我要讲的话上午都讲了，今天主要是听听大家的意见。”

在上海市计委主任韩正发言时，江泽民关心地问：“上海现在人均居住面积多少？”韩正说：“8.6平方米。到2000年要达到10平方米。”江泽民沉思着说：“上海的闸北区、杨浦区人口密度很大，不容易，还要努力。”

上海市一位居委会主任腼腆地说：“我在基层工作多年，讲不好普通话，能不能讲上海话？”

江泽民笑着说：“没关系，我听得懂。”

这位在居委会工作了23年的基层干部用上海话滔滔不绝地讲起自己的体会：“作为居委会干部，就是要在党、政府和人民群众之间架起连心桥。就像您在报告中讲的，共产党员就是要全心全意为人民谋福利。”

江泽民听后赞许地重复说：“对，我们共产党员就是要处处为人民谋福利。”

田赛男，1989年毕业于同济大学，如今已是浦东新区城建局党组成员、副局长，代表团中年龄最小的。

她发言说：“浦东新区这几年变化很快，高桥飞架，道路宽敞，这得益于邓小平理论的指引，得益于党中央的正确领导。”

听了田赛男的发言，江泽民很有感慨地说：“我1985年到同

济大学作报告时，你还没有毕业，现在已是副局长了。从刚才发言的同志看，真是长江后浪推前浪，世上新人超旧人。”他语重心长地说：“光阴似箭，日月如梭，青年同志一定要抓紧学习，发奋努力。”

听完大家的发言后，江泽民向来自第一线的代表们表示感谢。

他说：“你们的发言使我很受感动。你们在党的基层建设中做了许多有成效的工作，为国家的繁荣和上海的发展作出了贡献。希望大家继续努力，取得新的更大的成绩。上海有人才优势、技术优势，要把这些优势发挥好。在当今世界，综合国力的竞争主要在于科技，科技的竞争主要在于人才。你们一定要在培养人才上继续下大功夫。”他希望上海的同志努力工作，建设好上海，为全国服务。

江泽民最后说：“现代科学技术发展很快，新知识层出不穷。我们一定要干一行，爱一行，活到老，学到老。”

公有制的实现形式问题是十五大期间人们关注的热点和焦点。李鹏和朱镕基在和代表座谈时都澄清了在这个问题上的认识。

9月13日，李鹏参加了北京代表团的讨论。关于所有制问题，他说：“文革”后，我们党抛弃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确立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党的基本路线，这是一次思想大解放。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后，同年召开的党的十四大明确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是第二次思想大解放。这次十五大提出公有制应当有多种实现形式，是又一次思想解放。

他继续说：近年来，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国内生产总值中公有制比重有所下降，非公有制比重有所上升，一些国有企业不景气。于是有的同志存在一些顾虑，理论界也有争论。但从最新

统计数字来看，公有制经济在我国就总量来说仍占主导地位。国有企业抓大放小，放小的方式很多，股份合作制是经过实践证明了的一种有效的途径和方式。

也就在同一天，朱镕基参加了陕西代表的讨论。他一开头就说：“作为一名共产党员，我参加了两次小组讨论，听到很多同志的发言，很受启发。”

如何看待非公有制经济在国民经济中所占比重越来越大的现象？

朱镕基说：对这个问题要作客观分析，国有经济起主导作用主要体现在控制力上，现在国有经济仍然牢牢控制着国家经济命脉。发展非公有制经济没有危险。

关于“抓大放小”的问题，他强调：股份合作制是一种新事物，应该支持、引导。但不能“刮风”，不能从上而下用行政命令搞什么“股份合作化”，甚至强迫职工入股。国有企业不是都要变成股份制，“放小”也并不是股份合作制这一种形式。我从来并非“一股就灵”。十五大报告是一个有机的整体，要全面、正确地理解和贯彻。

两项最重要的成果

十五大有两个最重要的成果，一个是把邓小平理论作为党的指导思想写进党章，一个是选举产生新的中央领导机构，组建跨世纪的领导班子。

9月18日，大会审议通过了江泽民所作的报告，高度评价了十四届中央委员会的工作，一致赞同把邓小平理论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明确写进党章。同意关于我国经济、政治、文化领域改革和发展的部署。

在当天的大会通过《中国共产党章程修正案》后，新华社记

者采访了秘书处负责人。

问：请你谈谈十五大修改党章的基本考虑。

答：这次修改，集中在一个重大问题上，即在党章中明确规定，把邓小平理论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

问：对党章总纲有什么修改？

答：修改后的党章总纲规定：“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作为自己的行动指南。”对原来有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内容加以调整补充，形成了关于邓小平理论的论述。

问：对党章条文有什么修改？

答：对第3条第1款、第31条第2款、第34条第1款的文字作了调整，规定党员和干部要认真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

那么，怎样选举十五届中央委员、候补委员和中纪委委员呢？

9月14日，大会主席团通过了选举办法：先采用差额预选办法选举产生候选人名单，差额数不少于应选人数的5%，大会主席团常务委员会按照差额预选的结果，研究提出候选人名单，经大会主席团会议通过后，提交大会正式选举。正式选举时实行等额选举，候选人得到的赞成票超过应到代表的半数为当选。大会选举采用无记名投票方式。

但大会宣布选举结果的方式有所区别，大会宣布选举结果、报告所得票数和对外公布名单时，中央委员会委员、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按姓氏笔画为序排列，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按得票多少为序排列，如果得票相等，按姓氏笔画为序排序。

9月18日，大会在选举出193人的十五届中央委员、151人的中央候补委员、115人的中纪委委员后胜利闭幕。在新选出的十五届中央委员中，人们发现，以前一些很熟悉的人名不见了。

如乔石、刘华清、邹家华、杨白冰等等。明眼人一看就知道，这是在跨世纪干部年轻化方面的重大举措。

新一届中央委员会充实了一批中青年干部，年龄构成有老中青，平均55.9%。61岁以上的68名；56~60岁的118名；51~55岁的107名；50岁以下的51名，其中45岁以下的干部21名，比十四大增加了7名。

这些人，主体是省部级以上领导干部，同时又有其他领导干部和各方面优秀人才。副省部级和大军区副职以上领导干部303名，占88.1%。其他领导干部和各方面优秀人选41名，他们中有大型企业、高等院校和科研单位的领导干部，有著名专家学者，还有工作在基层的英模人物。

新一届中央委员会组成人员文化素质明显提高，大专以上318名，占92.4%，比十四大提高了近9个百分点。

新一届中纪委委员主要是熟悉纪检工作的省部级纪检工作岗位上的负责同志，还有其他方面的领导干部。年龄结构比较合理，55岁以下占了近半数；文化素质有较大提高，大专以上文化程度的，占89.6%。

中央对十五大的人事安排工作十分重视，强调中央委员会和中纪委的组成人员提名，一定要充分发扬党内民主，广泛走群众路线，把那些政治信念坚定、工作实绩明显、群众公认程度高、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优秀同志选进中央委员会和中纪委里，并确定了中央委员会和中纪委组成人员推荐、考察、提名的民主程序。

按照中央的要求，从1996年8月开始，先后在全省、自治区、直辖市，中央、国家机关各部门和军队各大单位党组织酝酿、推荐、考察新一届中央委员会和中纪委组成人员人选。全国16000人参加了民主推荐，考察组先后同12000人个别谈话，最后，提出了十五届中央委员、候补委员和中纪委委员的候选人预

备人选建议名单。

在十五大期间，2000多名代表认真讨论、酝酿了十四届中央政治局提出的这个预备人选建议名单，认为这是一个好方案，人选的素质比较好，结构比较合理，表示赞成和拥护。

代表们相信，新一届中央委员会，一定能高举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旗帜，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实现党的十五大提出的各项战略任务，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全面推向21世纪。

跨世纪的领路人

9月19日，中共十五届一中全会在北京举行，出席会议的中央委员191人，候补中央委员151人，江泽民主持会议并作重要讲话。全会选举了中央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委员会总书记；根据中央政治局常委的提名，通过中央书记处成员；决定中央军委组成人员；批准中纪委第一次全会选举产生的书记、副书记和常委。结果如下：

一、中央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

中央政治局委员（按姓氏笔画为序）

丁关根 田纪云 朱镕基 江泽民 李 鹏 李长春
李岚清 李铁映 李瑞环 吴邦国 吴官正 迟浩田 张万年
罗 干 胡锦涛 姜春云 贾庆林 钱其琛 黄 菊 尉健行
温家宝 谢 非

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按得票多少为序）

曾庆红 吴 仪（女）

二、中央政治局常委

江泽民 李 鹏 朱镕基 李瑞环 胡锦涛 尉健行
李岚清

三、中央委员会总书记

江泽民

四、中央书记处书记

胡锦涛 尉健行 丁关根 张万年 罗 干 温家宝
曾庆红

五、中央军委主席、副主席、委员

主席：江泽民

副主席：张万年 迟浩田

委员：傅全有 于永波（满族） 王 克 王瑞林

六、中纪委书记、副书记、常委

书记：尉健行

副书记：韩杼滨 曹庆泽 何 勇 周子玉 夏赞忠
刘丽英（女）

常委（按姓氏笔画为序）

马 骏（女） 刘丽英（女） 祁培文 李至伦 李登柱

何 勇 周子玉 赵洪祝 袁纯清 夏赞忠 曹庆泽

尉健行 彭 钢（女） 韩杼滨 傅 杰

这就是带领中国十几亿人民迈向 21 世纪的领导班子。这里给人们最明显的信息就是朱镕基的排名提前了一位，人们普遍认为这是为下一步朱担任总理作准备。后来的事实果然证明了人们的推测。

朱镕基，1928 年 10 月生，湖南长沙人，1948 年 12 月参加工作，1949 年 10 月入党，清华大学电机系电机制造专业毕业，高级工程师。1979～1982 年任国家经委燃动局局长、综合局副局长。1982～1983 年任国家经委技改局局长。1983～1985 年任国家经委副主任、党组成员。1985～1987 年任国家经委副主任、党组副书记。1987～1991 年任上海市委副书记、市长、市委书记。1991～1992 年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务院生产办公室主任、

党组书记，兼国务院经济贸易办公室主任、党组书记。1992～1993年担任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务院经济贸易办公室主任、党组书记。1993～1995年任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兼中国人民银行行长。1995年起任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

他是第十三届中央候补委员，第十四届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

新的中央政治局常委的班子中换了2个新面孔：尉健行，李岚清。一个管政法，一个管科教。

这个班子的领路人无疑是江泽民。

江泽民，1926年8月17日生，江苏省扬州市人。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委员会总书记、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

他1943年起参加地下党领导的学生运动，1946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47年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电机系。1980年后，任国家进出口管理委员会、国家外国投资管理委员会副主任兼秘书长、党组成员。1982年后，任电子工业部第一副部长、党组副书记，部长、党组书记。1985年后，任上海市市长，中共上海市委副书记、书记。1982年9月当选中共第十二届中央委员。1987年11月在中共十三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1989年6月在中共十三届四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总书记。1989年11月在中共十三届五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军委主席。1990年3月在七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上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1992年10月在中共十四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中央总书记、中央军委主席。1993年3月在八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

9月19日上午，中共十五届一中全会选举出的政治局常委

在人民大会堂会见采访十五大的中外记者。

大会堂东大厅，600多名中外记者早早来到这里。他们架起一排排摄像机、照相机，手持录音机、采访本，等待着常委们的到来。

11时40分，江泽民等由十五大新闻发言人徐光春陪同，在欢快的迎宾曲中步入大会堂东大厅。7位常委面带微笑，神采奕奕，不断向记者们招手致意。

江泽民首先对与中外记者见面表示高兴，并感谢他们对中共十五大的报道。接着，他逐一介绍了新当选的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鹏，国务院常务副总理朱镕基，全国政协主席李瑞环，中央书记处书记胡锦涛，中央纪委书记尉健行，国务院副总理李岚清。

随后，江泽民讲了话，他说：十五大完成了预定任务，圆满结束，开得很成功。他说，十五大最主要的成果是把邓小平理论确立为全党的指导思想。他表示相信，中国将更加美好，也祝愿世界将更加美好。

这次会见时间很简短，只有10分钟，11时50分钟，会见结束。江泽民等挥手向大家道别。

展望下世纪，第一个10年实现国民生产总值比2000年翻一番，人民的小康生活更加宽裕，形成比较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第二个10年，到建党100年时，国民经济更加发展，各项制度更加完善；到世纪中叶建国100年时，基本实现现代化，建成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我们就是要有这个雄心壮志！”这是邓小平的殷切希望。

邓小平曾经说：“任何一个领导集体都要有一个核心，没有核心的领导是靠不住的。”在世纪之交的历史时期，我们有邓小平理论的光辉旗帜，有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坚强领导集体，一个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的中国一定会昂首屹立在

世界东方民族之林。

(龙平平等主编《二十年重大决策备忘录》)

后 记

在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 80 周年的时候，我们谨将这本《中国共产党八十年实录·重大会议卷》奉献给广大的读者。在这本书里，我们选编了当事人的回忆，以及权威人员撰写的介绍或研究文章，试图对党在 80 年中所召开的一系列决定当时中国政治走向和中华民族前途命运的重要会议，作一较为全面、详细和生动的介绍。应当说明的是，在丰硕的回忆文章和研究成果面前，选择最具代表性和说服力的精品，而收录字数又有一定限制，实在是一件很难做到尽如人意的事情。我们虽然作了努力，并且对选录文中的个别明显的史实不准确的地方作了订正和校改，但是，由于水平和能力的限制，对重要会议的确定和把握，材料的选择和取舍等方面，难免有不当、不周的地方。所有这些，我们敬盼批评指正。

书中选录文章的部分原作者，出版社和我们已与之事先取得了联系，还有一部分作者由于种种原因未能联系上。在这里，我们对各位原作者一并表示感谢。并请作者尽快与出版社联系，以便奉寄稿酬。

编者

2001 年 3 月